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第三卷

（从独立到大约 1870 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组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总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Ⅲ: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Edited by Leslie Beth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根据剑桥大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3卷
(从独立到大约1870年)

徐守源 段昭麟 江瑞熙 朱云瑞 翻译
戴声浦 毛相麟 徐壮飞 张森根 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33.5印张 854千字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900
定 价:26.00元
ISBN 7-80050-457-3/K·35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3卷

（从独立到大约1870年）

徐守源　段昭麟　江瑞熙　朱云瑞　翻译

戴声浦　毛相麟　徐壮飞　张森根　校订

出版说明

由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尔教授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是七十年代中期着手编撰的一部史学巨著。参加撰稿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1984年以来，该书已陆续上市，预计将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出齐。

为推动我国的拉美学研究和繁荣学术文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院科研局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自1988年起组织所内外几十位学者着手将这一巨著译成中文出版。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新华通迅社、广播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中文版先出第四卷和第五卷，接着再出其他几卷，每年推出一至二卷，九十年代内出齐。全书约合中文800万字。

我国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同志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已征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的同意，我们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边码系原文页码。索引附于书后，注明原文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1990年12月

本卷作者：

约翰·林奇，伦敦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拉美史教授（第1章和第15章）
蒂莫西·安娜，马尼托巴大学历史学教授（第2章）
戴维·布什内尔，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第3章）
莱斯利·贝瑟尔，伦敦大学西班牙美洲与巴西史导读教授（第4章、第5章评论和第16章）
D·A·G·沃德尔，斯特灵大学近代史教授（第5章）
弗蓝克·莫亚庞斯，圣多明各社会科学发展基金会（第6章）
休·托马斯，伦敦（第7章）
图略·霍尔珀林·唐伊，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第8章）
弗蓝克·萨福德，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第9章）
汉·巴桑，墨西哥学院教授（第10章）
R·L·小伍德沃德，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图蓝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1章）
马尔科姆·迪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第12章）
埃拉克利奥·博尼拉，秘鲁天主教主教大学与利马秘鲁研究所（第13章）
西蒙·科利尔，埃塞克斯大学拉美史导读教授（第14章）
若潭·穆里洛·德·卡瓦略，里约热内卢佣斯圭萨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第16章）
理查·格雷厄姆，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7章）
杰拉尔德·马丁，朴茨茅斯综合工艺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教授

附：《剑桥拉丁美洲史》各卷内容

第一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征服前夕的美洲、欧洲与美洲以及美洲的教会

第二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人口、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精神与文化生活

第三卷　从独立至1870年左右——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的独立、加勒比地区以及独立后的西语美洲和巴西

第四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拉丁美洲与美国和欧洲列强、人口、农村社会、城市、工业、劳工、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学、音乐和艺术以及教会

第五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普拉塔河地区国家、安第斯山脉地区国家以及巴西

第六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国家与政策以及教会

第七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巴拿马

第八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第九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巴西、思想观念、文化和社会以及国际关系

本卷中文版分工如下：

译者

徐守源（序言；第1—7章和第16章；书目评论第8—15节）

段昭麟（第8—15章；书目评论第1—6节）

江瑞熙（第17章）

朱云瑞（第18章；书目评论第16—18节；索引和地图）

校订者

戴声浦

毛相麟

徐壮飞

张森根

责任编辑

张森根

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前言

李慎之

被誉为世界史学集大成之作的剑桥世界史系列之一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拉美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剑桥世界史系列开创于世纪之初，在积累经验并且饮誉士林70年之后，又推出总共 9 大卷约800万字（中文）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著作。用本书总序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作一高水平的综合，使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今后的工作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但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而且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益。”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也就是“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了，得不谓之为盛事乎！

中国必须了解拉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叫中国是这么一个大国，而拉丁美洲又甚至比一个大洲还大呢？事实是，拉丁美洲这个名词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拉美研究这门学问确立于本世纪30年代，而中国之正式搜罗人才、组织机构，专门从事拉美学的研究，到60年代也已开始了。中国对拉美的兴趣是浓厚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对拉美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很难使自己满意，就算不提过去那段以幻想代替现实的狂热岁月，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

于确切的体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做过研究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个中甘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用说对一个大洲了。认识需要长时期、多方面的积累。在一时还来不及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有意识地想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吸收新知"翻译为先"的话。30年代，鲁迅又说过一时创作不出来，不如多些译作为好的话。这就是所以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还不惜动员所内外几十人的力量，化几年的光阴来翻译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原因。

从地理上说，拉美之于中国可说是距离最遥远的地方了。虽说是"小小环球"，但是东北西南，正好相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真可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从历史上说，除非将来真能证明慧深所到的扶桑确是今日的墨西哥，即使从15世纪算起，500年来双方也极少交通。虽然如此，中国和拉美也并不是没有可比性。首先，两者都是由多种文明交融而成的庞大的文明体。中国由于历史悠久而早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拉美虽然还是多国林立，但是文化上的共同性远大于殊异性。这个由相异相敌到共存共荣的过程，看来是全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家都会感兴趣而且应该从其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对中国和拉美进行比较研究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双方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课题。虽然双方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任务是一样的。拉美人常说"不能戴着19世纪的镣铐进入21世纪"，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任务吗？

大概自古以来，分居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对异域外界同属圆颅方趾的血气之伦有观察、研究、记述的兴趣，但是直到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后，对外国问题或者国际问题的研究才渐渐成为一门学问。不过，从学科的划分上说，这种研究大抵还是隶属于传统

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此同时，却也渐渐地出现一种倾向，形成了以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汉学、埃及学、东方学，等等。这种趋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本世纪的下半期得到了特别强烈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可与传统的学科分庭抗礼的地位。拉美学的确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一经确立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然要凭借过去的基础)。这部《剑桥拉丁美洲史》就是其重大的成果之一。它当然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但是更应该说是一部拉美学的著作，地区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世界学术的一个重大趋势。理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了。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需要不断加深对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了解，而且要把对象国、对象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

我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趋势在我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学术界还不是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去顺应这个趋势，推进地区研究的发展。地区研究在其初始阶段往往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因为研究主体通常是由于外交、外贸的现实需要的推动，只求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去认识对象地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学者必然会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地区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不能不深入到它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这样，地区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越来越转向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文学。地区研究的综合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超出于传统学科的单一性之上。国际上的地区研究已经进展到这一地步了。对比起来，我们的地区研究还没有脱出初始阶段。我们必须认识世界学术的这种趋势而急起直追。《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出版至少可以帮助我国的拉美研究的深化。我希望它也能促进我国所有的地区研究的发展。

《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英文版第1卷是1984年出版的，全书9卷

将在90年代初出齐。中文版第4卷能在1990年就译好付印出版，效率是很高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个人既不研究拉丁美洲，又没有对此贡献任何力量，唯一所做的就是在当初决定进行这一大工程时起了一点促进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作用也使我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对中国有价值，对拉丁美洲也有价值，能被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所了解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乐于向中国读者推荐这部书。它不但对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对一切有志于了解世界，有志于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人都是有用的。

谨序。

1990年9月

英文版总序言

由已有定评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计划和主编并由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分章撰写的多卷集剑桥历史，自本世纪初以来在英语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的最高范例。由阿克顿勋爵计划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共16卷，已在1902年至1912年先后问世。随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等也相继出版。上述近代史现已由14卷集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最近已脱稿。剑桥伊斯兰史、剑桥伊朗史和剑桥非洲史或已出版或已将近完稿；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中国史和犹太史，而日本史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7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着手出版一部剑桥拉丁美洲史的时机已经成熟。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自1960年以来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在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这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但也有居住在美国的英国、欧洲和拉美的历史学家)，出现在欧洲(特别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也日益明显地出现在拉丁美洲本身(新的一代年轻专业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人曾在美国、英国或欧洲得到培养，已开始脱颖而出)。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拉丁美洲在世界中的作用——已经起了变化，看法也随之改变。来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和新的概念模式，正在被拉美历史学家们不断采纳。剑桥出版社已按步就班地出版了一系列拉美研究的专论并创办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而且也开始将这种历史思想和研究的新成果公之于众。

1974年，伦敦大学学院西语美洲和巴西史主讲人莱斯利·贝

瑟尔博士应邀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并在两年后为这个项目开始工作，他是第一位受权单独负责计划、协调、组织和编纂一整部历史的主编人。

《剑桥拉丁美洲史》是第一部研究拉丁美洲独特历史过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预计共分8卷*，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居民首次接触欧洲人之时（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初期）开始，直到今天的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剑桥出版社将另行出版一部剑桥美洲——北美、中美和南美——土著民族史，其中将对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达数千年之久的这个地区之民族、社会和文明演变作出应有的研究，正如本书将对欧洲殖民地统治时期和独立时期直到现在的拉美土著民族的历史进行较为详尽的阐述一样。）拉丁美洲主要由美国以南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大陆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与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通常还包括海地，共同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包括19世纪前半叶期间西班牙和墨西哥先后通过条约和战争割让给美国的大片位于北美洲的领土。也不包括英、法、荷属加勒比岛屿，或圭亚那在内，尽管，例如，牙买加和特立尼达曾有过西班牙渊源的先例，现在又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本书的目的在于将现有的知识加以高度的综合，以便为拉丁美洲历史学家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套坚实的基础，将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们有所帮助，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们也会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也希望，这部历史能为美国和欧洲通过拉丁美洲的历史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作出贡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也希望能为促进拉丁美洲本身更加重视自己的历史作出贡献。

编写本书的有美国和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

---

* 按目前计划已增为9卷。——译者

撰稿人。

本书将按历史年序出版，这在剑桥历史的出版上尚属首次，第1卷和第2卷（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内有介绍欧洲人入侵前夕美洲土著民族和文明的部分）于1984年出版；第3卷（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于1985年出版；第4卷和第5卷（约1870年到1930年）于1986年出版；第6卷至第8卷（1930年至今）将于1988年或此后尽快出版。每一卷或组成一套的几卷分别考察了拉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尽管承认拉美在当今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发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并承认拉美首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与英国和法国以至整个西欧、最后与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历史书将侧重阐述内部结构的发展方面。而且，明显地把重点放在自19世纪初除古巴外所有拉美国家取得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上，同殖民地时期和独立运动时期相比，拉美史史学家们相对忽视了这段时期。自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是8卷中两卷的主题。有6卷则集中阐述19世纪和20世纪，并与总体组合在一起，其中有围绕拉美史重大主题的章节，也有20个拉美独立国（外加波多黎各）的分国历史章节，特别是三个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巴西面积的大小、人口和独特的历史来看，在拉美通史中往往被忽略了，就大部分由西班牙语美洲人或西语美洲的专家们撰写的通史来说，对此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章将附有一篇书目评论*。这些书目评论将特别侧重于过去15—2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也就是说侧重于自查尔斯·C·格里芬主编的《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此书是为1971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拉美史会议而出版的）出版以来的这段期间。格里芬

---

* 书目评论集中放在各卷的正文后面，每一节的标题与各章相同，按顺序排列便于查阅。——译者

主编的这本书志是在1966—1969年期间准备的，其中很少涉及196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著作。

英文版第3卷序言

1984年出版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二两卷已广泛综述了拉丁美洲史自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有关殖民地时代拉美的这两卷是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第一卷的开始部分概括叙述了在欧洲人“发现”、侵略、征服并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这个“新大陆”建立居留地前夕的美洲土著人及其文化。可是，我们并无意展现一个关于多样化的美洲土著社会发展的全貌——这个社会在第一次接触欧洲人以前，几千年来是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于这一部分将在《剑桥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土著民族史》中分别详述。)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广泛综述了19世纪初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统治崩溃瓦解的过程以及独立后拉美头半个世纪的历史(截至1870年止)。本卷第一篇的5章研究拉美独立运动的起因；西属美洲大陆脱离西班牙的革命和战争——与此同时，分裂成12个以上独立的共和国——以及比较和平地脱离葡萄牙成为一个单一的独立帝国的巴西；新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最后，拉美独立运动的国际意义。第二篇分别涉及18世纪末至1870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由两章组成：第一章论述海地，这个过去称为圣多曼格*的前法国殖民地于1804年成

* 1697年西班牙根据立兹维克条约将约占伊斯帕尼奥拉岛（一译西班牙岛）1/3的西部地区割让给法国，称之为Saint-Domingue（圣多曼格）。1804年圣多曼格宣布独立，并恢复其阿拉瓦克族的传统名称——海地。该岛另外2/3的东部地区，包括位于东南部的圣多明各城(Santo Domingo)在内，1795—1808年期间被法国占领。1821年东部地区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宣布成立多米尼加共和国(the Dominican Republic)。——译者

为拉美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而圣多明各，它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以前曾被海地占领将近1/4世纪，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第2章论述古巴，在本卷所论述的期间内古巴和波多黎各始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本卷的第三和第四编，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以研究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大约自1820到1870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主。这个时期，总的说来，是正当许多国家从独立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中恢复过来并比较适当地发展拉美的面向出口的经济，而且大多数国家都逐渐被纳入英国主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部分地作为独立的后果而言，除了有许多国家废除了奴隶制以外（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巴和巴西仍未废除奴隶制），这也是一个有限的社会变革的时期。此外，至少在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里（唯独智利明显地例外）这也是一个激烈的政治冲突，不稳定和军人独裁的时期。巴西脆弱的政治稳定和统一曾于1830年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到19世纪中叶终于得救并巩固起来。由于得克萨斯州的脱离（1836）和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1846年8月）独立后的墨西哥丧失了一半领土。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冲突，但在本卷所论述时期的末期，拉美国家之间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战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同盟）与巴拉圭之间的“巴拉圭战争”（1865—1870）在这次战争中巴拉圭被击溃并丧失了领土给阿根廷和巴西；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同盟之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1879—1883），战争结果智利扩张了1/3的国土，秘鲁和玻利维亚作出了牺牲。第三篇还包括两章综合论述西属美洲独立后的情况，前一章涉及经济与社会，后一章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随后的6章则分别叙述单独的西语美洲国家或国家集团：墨西哥；中美洲（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秘鲁与玻利维亚；智利；以及拉普拉塔河共和国（阿根廷、乌拉圭与巴拉圭）。第四篇系由两章组成，叙述巴西帝国自1822到1870年的情况。

最后，作为本卷的结束，在第五篇中对拉美在独立后建国初期的文化生活——美术与建筑、音乐、戏剧，尤其是文学（浪漫主义时代）作了概括的综述。

大多数为本卷各章作出贡献的历史学家——7位英国学者、4位北美学者（3位来自美国，1位来自加拿大）和5位拉美学者（分别来自多米尼加、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和巴西）——也与他们的合作者们对各章内容进行过审读和讨论。可是我特，别怀着敬意感谢戴维·布什内尔、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西蒙·科利尔、马尔科姆·迪斯、理查·格雷厄姆、图略·霍尔珀林·唐伊和弗兰克·萨福德。此外，埃米莉亚·维奥蒂·达·科斯达对有关巴西的几章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值此两卷关于殖民时代的拉美史业已出版之际，我尤其感激我的合作者约翰·林奇，因为他自始至终对本卷的计划和编辑工作提出建议并作出如此卓越的贡献。我还曾受到R·A·汉弗莱许多鼓励，是他在大约30年前首先介绍我并使我愉快地去研究拉丁美洲史的问题。

在剑桥出版社，近年来是由伊丽莎白·韦顿担任《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责任编辑。辛西娅·波斯坦担任副编辑。剑桥大学伦敦学院的纳兹宁拉兹再次提供了无可估价的秘书工作的协助。安·赫德森编写了本卷的索引。

目　　录

第一篇
独立



第一章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根源

西班牙是一个古老但不发达的殖民帝国。到18世纪末，经过3个世纪的帝国统治后，西属美洲人民看到他们的宗主国依然跟自己相差无几。殖民地出口初级产品，西班牙也是如此。殖民地依赖外国海运商船队，西班牙也一样。控制殖民地的上层封建主无意积蓄财富进行投资，西班牙同样如此。两种经济只有一个差别：殖民地出产贵金属。但即使这种例外分工也没有给西班牙带来好处。这是近代史上一种罕见的情况——一个殖民地依附于一个不发达的殖民帝国。

18世纪后半叶，西班牙波旁王朝估量了自身状况开始谋求实现经济、社会和体制的近代化。改革者的意识形态，想法上是折衷主义，实践上是实用主义，出发点是西班牙自身的现状，特别是生产力下降。他们到各种不同学派中去寻求答案。有的提出重农主义思想，主张将农业和国家作用提高到首要位置；有的提出重商主义思想，强调更有效地开发殖民地资源；有的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取消对贸易和工业的限制。启蒙运动对西班牙也产生影响，但主要不是在新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方面，如主张理性和实验，反对权力和传统。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潮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也许还能和睦相处，但新思想和旧传统的冲突造成政策上的前后矛盾。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现有结构，不是设计新结构；基本经济目标是改进农业，而不是振兴工业。18世纪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毫不留情地追使人们重视土地。西班牙人口从18世纪初的 760 万

增加到1808年的1,200万，增加了大约57％。西班牙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推动价格上涨，使地主获利增加。同时农村人口的增长导致对土地的更大需求，地租开始上升，甚至比地价还高。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改进技术，使生产商品化，清除发展的障碍。1765年颁布的谷物法取消了粮食最高限价，除饥荒年外，允许在西班牙国内进行粮食自由贸易和出口。1788年，地主获得了将耕地改为牧场的权利。分配了一部分王室、城市甚至教会的土地。1765年开始实行的“自由贸易”条例取消了对照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最严厉限制。

经济进步导致重大社会变革。政府改革者、地主——主要是贵族和教士——和出口商之间存在着利益一致：政府改革者希望增加粮食供应，地主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出口商则寻求新的市场。但是新生中产阶层的呼声还非常微弱。商人团体忙于海外贸易，新兴工业家在半岛*各省开展事业。加泰罗尼亚已建立起近代化棉纺和毛纺工业，产品经加的斯出口到美洲，他们还在寻找更直接的新出路。商人和制造商要求进一步放宽贸易限制，让他们到美洲去寻找在西班牙找不到的市场。他们早就指望自由贸易的来临，而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然而西班牙错过了在18世纪实现基本变革的机会，最终放弃了通向近代化的道路。卡斯提尔人似乎不愿积累资本并投资手工业，甚至对发展改革者们如此热爱的手工业也缺乏热情，他们宁愿购置更多土地和进口奢侈品。土地改革由于政府漠不关心和既得利益者反对而失败；农业收入不高，阻碍了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到18世纪90年代，运输系统不能满足需求，也不能适应人口的增长；交通运输成为一个主要薄弱环节，阻碍了卡斯提尔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它无法发展自己的工业或成为其它地区的工业品市场。加泰罗尼亚和其它沿海省份

* 本卷所说的半岛均指伊比利亚半岛。——译者

由海路到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比经陆路到达卡斯提尔方便得多。最后，除加泰罗尼亚省的城镇和少数西班牙北部港口外，其它地方的商业组织都软弱无力。尽管有政府支持，绝大多数商业公司的成绩都不理想，它们忍受着资金短缺、交易呆滞的困扰，特别是对美洲的贸易不旺。商业基础设施是如此落后，尽管西班牙的谷物生产十分充足，沿海地区却经常要进口粮食，同时也错过了出口机会："古巴至少需要6万桶面粉，应该而且能够从西班牙运去，我国农业一年可以获利2,000万里阿尔，结果却被北美人从我们殖民地拿走。"①

不错，18世纪后半叶确实是一个适度经济复苏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工业和殖民地贸易对复苏起了作用，但西班牙基本上仍是个农业国家，对外贸易主要是推销农产品。查理三世（1759—1788）的近代化措施，说到底只是为了恢复一个传统经济部门，结果有一点变得比以往更明显，即西班牙世界不是建立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分工上，而是建立在两者可怕的类似上。旧的结构原封未动，而改革运动却在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惊慌中和随之而来的查理四世（1788—1808）的反动统治下垮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君主的性格。查理四世的统治已完全丧失，作为改革使者的可信性。政治家为阿谀奉承者所代替，曼努埃尔·戈多伊的任命则预示着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模式的复归。这位新首相是个典型的佞臣，他的上台并非因为有什么资格，而仅仅因为得到王室宠信。戈多伊把西属美洲只是当作金银的来源，殖民地人民只是他的纳税人。

这时，如果说西班牙不能成为西属美洲的工业品供给者和贸易伙伴，旁边却有着另一个国家。英国的经济在18世纪正经历着革命变革。从1780到1800年，工业革命已卓有成效，英国以纺织工业品为龙头，贸易额空前增长。兰开夏的棉纺工业有很大发展，

① 《贸易通讯》，1808年10月25日，引自贡萨洛·阿内斯著《近代西班牙的农业危机》（马德里，1970），第312页。

同时钢铁生产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第一个跟在英国后面的国家，法国的生产能力依然落后，在1789年以后的战争和封锁期间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时英国实际上没有对手。英国全部工业生产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可能达三分之一用于出口。1805年左右，棉纺工业出口最终产品达66％，毛纺工业35％，钢铁工业23.6％。在18世纪内英国的贸易日益依赖殖民地市场。18世纪初，英国出口产品的78％销往欧洲大陆，及至该世纪末，英国的欧洲对手实行贸易保护，它们的市场仅吸收英国出口产品的30％，北美洲吸收30％，其余40％则销往"世界各地"，实际上就是销往英帝国，特别是西印度群岛(25％)，也包括西属美洲殖民地。实际上，对英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唯一制约是他们的顾客的购买力，而顾客的购买力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英出口贸易中所得的收入。西属美洲仅有少数几种出口商品可以从英国赚取收入，但它拥有一种重要贸易媒介——白银。所以，英国重视同西属美洲的贸易并谋求其发展，可以往西班牙再出口，也可以通过西印度群岛和南大西洋的走私渠道。

当然，这些考虑并不等于就是英帝国主义对西属美洲的政策，也不是说它企图以实力驱逐西班牙，征服或解放西属美洲。尽管西属美洲殖民地流亡者不断敦促，与此有利害关系的商人也进行鼓动，但英国始终采取超然态度。很少人认为，从商业角度考虑的对西属美洲进行干预的论证非常充分，因而理所当然应为赢得新市场动武。在1806—1807危机以前(当时欧洲大陆显然已开始对英国出口产品关上大门)，人们认为，现有市场是足够的。从现在所占比重来看，西属美洲这个市场固然非常有用，非常重要，应尽可能加以扩大，但它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达到必须把它并入英帝国的程度。然而，事实早已证明，英国人要打进这个市场非常容易，消费者也很乐意。在与西班牙作战期间，特别是1796年英国海军封锁加的斯以后，西班牙殖民地物资匮乏，英国提供了出口商品。英国与西班牙，发展与停滞、强大与衰弱——两者

之间令人厌恶的对比在西属美洲殖民地人民头脑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并进一步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反应。倘若象英国这样的世界强国尚且丧失它的美洲帝国的大部分，西班牙有什么权利继续留在美洲？

西班牙美洲帝国的统治基础是行政当局、教会和当地上层人士三大权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行政当局拥有政治权力和不大的军权。它的权威来自王权和它本身的政府职能。教会使国家权力得到加强，而教会的宗教使命又得到司法权和经济权的支持。但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掌握在上层人士即城乡财产所有者手中，包括少数"半岛人"(peninsulars)* 和多数克里奥尔人(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到18世纪，整个美洲已牢固地建立起当地的寡头集团，他们的力量基础是地产、采矿和商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殖民地官府、总督近侍和检审法院(audiencia)法官建立起来的牢固的联姻和结盟关系，以及强烈的地区意识。王室政府软弱无力，又需要财政收入，这就使这些集团能对遥远的帝国政府进行有效对抗。他们花钱买得官职，私下进行交易。传统官僚机构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屈服于压力，回避冲突，事实上它已不再是帝国中央集权的代表，成了西牙王室与美洲臣民之间的中间人；不再是统一国家的手段，而成了转移权力的工具。波旁王室对此难以忍受。

波旁王室采取的政策改变了主要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本身首先出来打破平衡。〔查理三世推行的〕所谓"开明专制制度"扩大了国家机构的职能，使私营部门蒙受损失，最终导致地方统治阶级与王室离心离德。波旁王室对殖民地政府进行一次彻底整顿，使控制机制中央集权化，行政机构近代化。建立了新的总督辖区和其它行政单位，委派了新的官员——监督官，试行了新

---

* 指从西班牙去的白人。——译者

的管理方法，即行政措施和财政手段同时并举，这种手段意味着9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更严密的监督。凡是宗主国认为合理的措施，当地上层人士都看成是对当地利益的侵犯。例如以监督官代替市长(alcaldes mayores)和郡守(corregidones)，这些官员长期以来善于调和不同利益。他们的收入不是靠薪金而是靠经营，例如跟自己辖区内的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出借资本和信贷，供应设备和货物，垄断本地区的经济。他们的财政后台——殖民地的投机商们保证向新上任官员提供薪金和费用，而这些官员则强迫印第安人接受预付的现金和设备，用于生产出口农产品或消费掉过剩商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摊派劳役制。(nepartimento de comercio)摊派劳役制使不同利益集团都感到满意：印第安人被强制进行生产和消费，王室官员获得收入，商人得到出口农产品，而王室则省下了发薪金的钱。另一方面，当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地方的压力下放弃了帝国的控制。这种做法在墨西哥极为普遍，在秘鲁引起了1780年印第安人暴动。

西班牙的改革者们颁布法令，宣布为了实行合理和人道的行政管理，全部废除以上制度。监督官法令(1784年在秘鲁，1786年在墨西哥颁布)，是波旁王室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它废除摊派劳役制并以监督官取代郡守市长，印第安人中产生的副代表协助下进行工作。新法律推广领取薪金的官员，并保证印第安人享有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贸易和工作的权利。

开明的行政改革在美洲并不一定行得通。殖民地的利益集团("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都一样)发现新政策限制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憎恨西班牙王室，这种罕见的干涉。废除摊派劳役制不但威胁到商人和地主，也威胁到印第安人自己，他们向来用信贷办法构买牲畜和商品，不习惯在自由市场上使用货币。现在如何才能把印第安人结合到经济生活中来呢？资本家对于象过去的官员那样提供贷款心存顾忌，担心这样做犯法。于是出现了混乱，使生产和贸易受到损害。有些人希望取消监督官，恢复摊派劳役制。另

外一些人则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墨西哥和秘鲁再次出现了摊派劳役制，因为副代表谋求增加收入，地主希望保持对劳动力的控制，商人希望恢复原有的消费市场。因此，在一场短暂的混乱之后，波旁王室的政策在自己的殖民地遭到了破坏。当地上层人士也对新专制制度作出了否定的反应，他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是否夺取政权，以阻止推行更多的开明立法。

波旁王室一边加强行政机关，同时削弱教会权力。1767年，王室从美洲驱逐大约2,500名耶稣会教士，大多数是美洲人，他们从此离乡背井，不能再传道。这次驱逐是对耶稣会的半独立性的一次打击，表明波旁王室决心维护自己的控制。耶稣会在美洲拥有很多特许权，在巴拉圭还有一块设防的区地。他们拥有的大庄园和其它财产使他们能保持独立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又因善于经营而得以扩大。在长时间里，西属美洲人对这次驱逐怀着矛盾的心情。1767年没收耶稣会的财产后，把大片土地和富庶的庄园出售给殖民地最富有的集团——财力雄厚有钱购买的克里奥尔家族。可是，很快西属美洲人把这次驱逐看成是暴虐行为，是在自己的国家内直接打击自己的同胞。从墨西哥驱逐出来的680名耶稣会教士中，约有450人是墨西哥人。从智利驱逐出来的大约360名耶稣会教士中，58%是智利人，25%是西班牙人，其余是其它欧美国家的人。把他们终身放逐不仅在他们中间，而且也在留居国内的家属和同情者中间激起巨大愤怒。

坎坡马内斯伯爵说："一切特权都是可憎的"。波旁王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反对任何法人团体在国内拥有特许权。教会就是特权的化身。教会所拥有的宗教特权（fucros）使它得以享有民事裁判豁免权，它的财富使它成为西属美洲最大的投资来源。教会的权力（虽然不包括它的教旨），是波旁王室改革者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他们力图将教士置于世俗的民事裁判管辖之下，并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剥夺教会的民事裁判豁免权。然后，随着教会抵抗力量的削弱，他们又打算染指它的财产。教士们竭力反抗。

他们虽未向波旁王室至高无上的王权挑战，但是对侵犯他们的个人特权无比愤恨。他们抗拒波旁王室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一般虔诚信徒的支持。低级教士（他们享有的宗教特权实际上仅仅是自己的一点物质资产）的不满更为强烈，特别在墨西哥，许多人成为起义军官和游击队领袖。

另一个权力和特权的中心是军队。西班牙不具备在美洲驻扎大量正规军的人力资源，它主要依靠殖民地民兵，加上少量西班牙军队以增强军事实力。自1760年起义建立了一支新的民兵部队，防务费用全部由殖民地经济和人民负担。但是波旁王室的改革实行起来往往含糊不清。为了鼓励应征入伍，准许民兵队员享有“军人特权”（fuero militar），也就是让克里奥尔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混血种人享受西班牙军队早已享有的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特别是保护军法，损害军事裁判。加之，西班牙越来越多地把帝国防务委托给在许多情况下由克里奥尔人担任军官的殖民地民兵部队，这就无异于铸造了一件最终会转过来反对自己的武器。甚至在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前，民兵已经引起一些内部安全问题。

1780年秘鲁爆发印第安人叛乱时，当地民兵起初袖手旁观，后来又遭到严重失败。民兵的效率和忠诚引起了疑问。当局作出结论，使用由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士兵和克里奥尔军官组成的民兵去平定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叛乱未免过于冒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波旁王室的政策有不满情绪。为了击溃这次叛乱，当局从沿海抽调由西班牙人担任军官，主要由黑人和穆拉托人（欧洲人和黑人的混血种）组成的正规部队，由新征募入伍的忠诚的印第安人支援。这次叛乱过后，西班牙采取了一些步骤加强帝国控制。民兵的作用被贬低，防务责任归还给正规部队。正规军和民兵的高级军官现在一律由西班牙人担任。军人特权（特别是非白人军人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样，民兵就不再能成为独立组织，克里奥尔人沿着军队阶梯逐步提升的道路也被

切断。这是不满的根源之一，但是在秘鲁的特殊社会结构中，这种不满一直没有发泄出来。对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群众的恐惧，是促使克里奥尔人保持忠诚的强大动力，也是他们接受白人，(即使是“半岛人”)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12

墨西哥和秘鲁一样，那里的克里奥尔人也缺乏战斗力。军事生涯本身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当局也没有使它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有人对民兵持批评态度。雷维亚希赫多总督就认为发武器给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是件蠢事，他还怀疑克里奥尔军官的忠诚。甚至到1789年以后，当时事实上民兵已经扩编，克里奥尔人加入民兵通常仍是出于非军事理由，例如为了搞到一个职务和头衔，为了给通过采矿或贸易获得的财富增加一点光彩。至于军人特权，它无疑是有用的，但从军服役也是件苦差事。下层阶级当兵能得到的好处更少，虽然少数人把它看做逃避降低社会等级的一条出路。可是，这只能增加克里奥尔军官和所有白人的恐惧心理，害怕部队会掉转枪口反对他们。如果说克里奥尔人害怕印第安人，那么“半岛人”也不信任克里奥尔人，因而很少有克里奥尔人获得高级职位，1789年以后依然如此，当时西班牙已不可能从欧洲抽调正规部队。墨西哥人得到的教训是，军队迁升的门路和文职机关一样，限制日趋严格；官方敌视法人团体享有特权，显然与反对克里奥尔人在政府中的影响不谋而合。

波旁王室一边削弱西属美洲的特权，同时加紧实行经济控制，迫使当地经济直接为西班牙服务，将过去一直留在殖民地的剩余产品和财政收入转移到宗主国去。自1750年起，西班牙尽最大努力增加帝国的收益。有两种办法特别受到赞许：一是不断增加王室专利公司垄断商品的种类，包括烟草、酒精、火药、盐等消费品；二是过去传统上由私商承包的捐税改由政府直接征收。所有买卖都要缴纳可怕的销售税，有些交易的税率从4%提高到6%，征收办法更加严格。新的收入通常不用于美洲本身的公共工程和

公用事业，而是立即换成硬币运往西班牙，从而造成当地货币短缺。在墨西哥，西班牙王室收益从1712年的300万比索增加到18世纪末的每年1,400万比索，其中600万比索作为纯利纳入克德里国库。在充裕年份，从殖民地取得的收益可达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20%。而在同英国作战期间，特别是在1797—1802年和1805—1808年，这种收益几乎减少到零。可是即使在那些年份，西班牙国王仍然可通过向中立国——有时甚至向敌国——出售汇票和与殖民地进行贸易许可证，从美洲获得间接收入。

13

西班牙制订外交政策时不跟美洲人商量，可是美洲人却必须以增税方式为此付出代价，或忍受战时物资匮乏。所有消费者都愤愤不平，此外不同经济部门还各有其不同的不满。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部门支付了大量捐税，如王室五一税、战时白银税、冶炼和铸币税、国家控制的水银和火药供应费，不用说还要负担战时公债和其它特别捐款。1796年以后，因与英国作战，来自西班牙的水银供应中断，采矿者受到严重损失。因此，人们把这些西班牙统治的固有状况看成发展生产和赚取利润的障碍。然而西班牙还是比较重视采矿业，给采矿投资者一定照顾。自1776年

发生了印第安人叛乱。1781年在新格拉纳达，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抗议的猛烈程度使当局感到震惊①。1796年和欧洲重新燃起战火后，捐税变得更加残酷无情，1804年后更进一步加重。在墨西哥，要求富裕人家捐献，金额在5万至30万比索之间；在秘鲁捐献的金额较少。军人养老基金会、其它公众基金会、商会(consulados)和市政委员会*纷纷进行捐献。无疑一部分捐献是富裕的“半岛人”和官员们的爱国主义表现，但其全部分则是强制的和令人憎恨的。最使人不满的是1804年12月26日颁布的“整顿资产法令”,命令没收在美洲的慈善基金，全部汇往西班牙。

在墨西哥实施该法令时，教会财产受到侵犯，损失惨重。教会拥有大量资本资源，特别是一些施主捐款建造的歌祷堂和宗教性基金会拥有巨额财政储备，这是几个世纪信徒的捐献积累。墨西哥的教会和修道院运用它们的资本时俨然象一个非正式金融机构，它们贷款给商人和财产所有者，给任何因构置财产或其它开支而愿意筹借抵押或贷款的人，年利率5％。墨西哥教会的主要财富是资本而不是财产，教会资本也是墨西哥经济的主要动力。由于这项法令，歌祷堂和宗教性基金会被剥夺殆尽。这不但影响教会，而且也影响到许多以教会基金为资本和信贷的人的经济利益，包括贵族庄园主和小农场主、城市资产所有者和农村业主、矿主和商人，总之，包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有克里奥尔人，也有西班牙人。也许困难最大的是大量中小业主，他们无法迅速凑足资金，不得不按非常不利的条件出售财产。许多富裕地主偿还债务也有困难，有些人只好听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拍卖。教士们对这项法令也感到愤愤不平，特别是那些依靠贷款利息为生的低级教士。曼努埃尔·阿瓦德一凯波主教估计投资于墨西哥经济中的教会资本总计达4,450万比索，占全部投资的2/3。他警告西班牙政府，反抗会是猛烈的。他亲自前往马德里，请求政府重新

① 参阅下文第32—34页。此处系原文页码。

* cabildos，相当于市政府。——译者

考虑。查理四世的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但正好不久拿破仑人侵伊比利安半岛，这项令人憎恨的法令也就停止执行了，首先是由总督倡议（1808年8月），继而由塞维列的最高洪达* 正式宣布（1809年1月4日）。这时大约已有1,000万比索送到西班牙，征收官员（包括总督在内）分到50万比索的佣金。没收教会财产集中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最后十年的殖民地政策。虽然暂时没有引起灾难和叛乱，但对西班牙是个不祥之兆。这项轻率、愚蠢的措施引起了教会的警惕和财产所有者的愤恨，导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是一个坏政府的极好典型，它暴露了西班牙派驻墨西哥官员的腐败和西班牙对墨西哥金钱的滥用。当局推行上述政策破坏了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的团结，许多西班牙人起来反对行政当局。对墨西哥人来说，他们目睹墨西哥资本从当地经济中抽走并被转移到西班牙，去为他们毫无发言权也没有丝毫利益的外交政策服务，这最终证明了他们的依附地位。

没收政策促使富人和穷人、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联合起来反对帝国干涉，要求对自己的事务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加上，这项政策出台之日，正好是证明增税并不能提高生产和扩展贸易之时。

波旁王室的决策者们力图向一个不断发展而又得到控制的经济加大财政压力。首先，他们重新组织殖民地贸易，把它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来，保证西班牙独占贸易收益。西班牙的出口产品，由国营船队运往帝国市场——这是他们的理想。1765—1776年间，他们折散大西洋两岸贸易的旧结构，废弃陈旧的规章和限制，降低税率，取消加的斯和塞维列两口岸的垄断地位，开放伊比利亚半岛港口同加勒比海及其大陆间的自由通航，并准许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1778年，西班牙与美洲之间的“受保护的自由贸易”

* 洪达（junta）是拿破仑入侵后、西班牙人在各地纷纷成立的统治机构。——译者

扩展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和秘鲁，1789年又扩展到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个时期的文献非常清楚地表明，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发展西班牙，不是发展美洲，是企图把殖民地经济更紧地与宗主国绑在一起。西班牙较开明的经济学家加斯帕尔·德·霍维拉诺斯，赞扬1778年法令，因为它使西班牙工农业有更多机会进入一个因消费西班牙产品而有资格存在的市场。他说："就其为宗主国的剩余产品提供可靠市场，这一点来说，殖民地是有用的。"①

一项这类性质的殖民地条约规定：西班牙从美洲进口的货物中，贵金属应占进口总值的80%左右，其余为适销原料，还规定在殖民地不准建立除糖厂以外的其它加工工厂。从这些标准来看，自由贸易是成功的。法令本身当然不能创造经济增长。自由贸易法令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大西洋经济中的趋势并赋予法律表现而已。但是不管有多少因果关系，这时期的西班牙工农业无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复杂，这反映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上。仅航运业就增长了86%，从1710—1747年的1,272艘船增加到1748—1778年的2,365艘船。政府和私人进口的黄金和白银从1717—1738年的1.52亿比索增加到1747—1778年的4.39亿比索，增长188%；贵金属至少已占从殖民地进口总额的76%。加的斯由于拥有对美洲出口的优势，继续左右对美洲贸易。当然，加泰罗尼亚的对美洲出口曾为推行自由贸易铺平道路，而且开展自由贸易后得益很多，巴塞罗那的殖民地贸易也有进一步增长，不少是工业产品，但加的斯仍是西班牙的第一大港，它对美洲的出口居遥遥领先地位，1778—1796年期间占西班牙对美洲出口总额的76%，巴塞罗那居第2位，约占10%。这是加的斯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班牙新的发展时期。1782—1796年间西班牙对西属美洲的年平均出口值比1778年增长了400%。

16

但即便在这些年份，也依然存在一些不祥之兆。西班牙输出

① 《对于外国纺织品输往我们殖民地的意见》载《霍韦利亚诺斯文集》(马德里，1952)，第2卷，第71页。

到美洲的绝大部分是农产品，如橄榄油、葡萄酒和白兰地、面粉、干果。甚至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的工业中心，农产品也高达出口总额的40%，主要是葡萄酒和酒精，出口的工业品几乎全部是纺织品。所有这些商品殖民地自己都已能生产，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西班牙出口产品同美洲产品彼此竞争而不是互相补充，但自由贸易法令对如何使两种经济同步发展无所作为。相反，它设法刺激西班牙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西班牙留下的工业缺口被外国人填补，他们在大西洋两岸贸易中依然居主导地位。有迹象表明，18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的工业出口产品比重增加，1757—1776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出口比重分别为71.84%和28.16%，而1720—1751年时期分别为54.43%和45.57%，但增加的出口产品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国产品。加的斯同美洲的贸易很多是转口外国货物。1778年，在海关登记的出口到美洲的货物中外国产品占62%，在1784、1785和1787年外国产品仍居多数。此后，西班牙产品（仍以农产品为主）开始居多数（1791年除外），到1794年比例已颠倒过来。但是西班牙对美洲贸易的这种进步受到走私和外国对美洲直接渗透的冲击，当时同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全部商船中，约有75%来自外国。

17

西班牙仍然是个准宗主国，发达程度和它的殖民地相差无几。但是自由贸易究竟给西属美洲带来了哪些好处呢？无疑它给殖民地生产的某些部门带来一些刺激。它打开了美洲的自然贸易路线，西属美洲对西班牙的输出额1782年以后也大幅度上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革，委内瑞拉的可可和其它产品，古巴的糖，出口都有所增加。在墨西哥一个新的商人阶级诞生了，西班牙来的移民开始与原来的垄断商人进行竞争。商人不顾墨西哥城传统的反对，在韦拉克鲁斯和瓜达拉哈拉建立了新的商会（1795）。要求增长和发展的压力变得更加迫切：商会的报告希望人们注意国家尚未开发资源，大声疾呼要求扩大贸易，增加当地生产，扩大品种，降低价格。这些都不是独立要求，但是商会表达了人们因发

展受阻而普遍产生的气馁感和对西班牙垄断贸易的不满情绪。正如韦拉克鲁斯商会秘书在1817年所写的那样，“反叛者为了点燃叛乱之火而不断发挥的一个真实或想象的题目，就是对伊比利安半岛商人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供应的本国和外国商品既短缺又昂贵”。[①] 实际上，自由贸易在法律上对垄断组织毫无触动。除通过不固定途径的走私贸易外，殖民地依然被禁止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它们仍然忍受着歧视性赋税，甚至赤裸裸袒护西班牙货物的禁令。对西班牙贸易的这种新的推动立即使有限的市场饱和，殖民地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足够的钱去购买不断增多的进口货，破产频繁发生，当地工业日趋衰落，甚至象葡萄酒和白兰地这类农业加工产品也遇到进口货的竞争，贵金属在不公平的竞争中不断外流。

宗主国既不具备手段也没有兴趣去提供发展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去为经济增长进行投资，去协调帝国经济。不仅对新格拉纳达这样没人管的殖民地是这样，甚至对拥有采矿业的秘鲁也是这样。秘鲁的农业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和运输条件而萧条不振，消费者依靠智利的谷物供应，仅仅因有矿产资源才得以避免全面停滞。此外，宗主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与殖民地的贸易，而没有始终如一地去促进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西班牙帝国依然是个经济上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有机体。宗主国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牺牲整体。西班牙世界的特点是互相对抗，而不是溶为一体。智利反对秘鲁，瓜亚基尔反对卡亚俄，利马反对拉普拉塔河地区，蒙得维的亚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预示殖民地将分裂为一个个国家。

美洲的作用依然如故：消费西班牙的出口产品，生产矿产品和少量热带作物。在这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必然会增加殖民地的依附性，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在此期间，惰性与疏忽使殖民地多少

① 哈维尔·奥尔蒂基·德·拉·塔夫拉·迪卡塞著《1778—1821年韦拉克鲁斯的对外贸易。依附危机》（塞维列，1978），第113页。

有了一些自发的增长)，重新恢复到原始的殖民地状态和最低级的劳动分工。如今，充斥市场的制成品损害了当地工业，它无法与价廉物美的进口货竞争。普埃布拉和克雷塔罗的纺织工业，库斯科和图库曼的工场作坊，在来自欧洲的竞争的打击下奄奄一息。供应美洲许多地方的传统纺织品产地，瓜亚基尔的出口产品，从1768年的440大包下降到1788年的157大包。从这时起基多的纺织工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便宜的欧洲进口货抢走了它们的秘鲁和其它市场。新格拉纳达总督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贡戈拉大主教(1782—1789)以满意的心情报告基多纺织业的衰落时说，发展农业和矿业是“殖民地的合适功能”，而工业“制成品应从宗主国进口”。① 西班牙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并不能满足其属地的全部需要，可是在西班牙统治者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他们的政策行不通。西班牙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工业，它也珍惜本身的利益；作为补充，西班牙商人还能通过再出口外商货物获得利润；而且他们把保持属地的依附地位看得比减轻其后果更重。西班牙的政治家和官员有一句格言：经济上依附是政治上从属的前提，殖民地发展制造业会导致自给自足和自治。遵照帝国的定义，殖民地官员们往往对现实视而不见。圣玛尔塔省长安东尼奥·德·纳瓦埃斯—拉托雷 1778 年报告说，他曾研究过是否建立棉纺工厂的问题，因为当地可以供应大批优质原料，但是最后决定不这样做，以利现有体制，即“辽阔富饶的美洲向西班牙提供它生产的原料，西班牙的手工业和工业将原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再分配给殖民地，这样，按照两国不同特点人人各得其所，帝国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纽带和互相依存关系也得以保持。”② 西班牙的制造商们经常注意

① 《关于格拉纳达新领地状况的报告》(1789)，载何塞·曼努埃尔·佩雷斯·阿亚拉著《总督兼圣菲大主教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贡戈拉，1723—1796》(波哥大，1951)，第360—361页。

② 塞尔希奥·埃利亚斯·奥尔蒂斯编《两位殖民地经济学家的著作》(波哥大，1965)第25—26页。

着是否有人侵犯这个公式。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它在停滞和偏僻的西班牙内地缺少销路，需要美洲这个市场，美洲既是它的纺织品和其它货物的重要消费者，又是棉花原料的供应者。墨西哥和普埃布拉的纺织工厂生产比较发达，引起巴塞罗那制造商的警觉。他们不断抱怨当地产品同他们的出口产品的竞争所造成的影响，要求国王颁发“最严格的命令，立即摧毁殖民地建立的纺织工厂。”①

这是直接的利害冲突，帝国政府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1800年11月28日，王室颁布命令禁止殖民地建立工厂，1801年10月30日又颁布命令称，“殖民地建立工厂和构置机器过多，与蒸蒸日上的西班牙工业形成对立，而西班牙工业主要是为了供应我们的美洲”。政府解释说，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允许殖民地多建工厂，因为工厂会分散劳力，妨碍他们从事开采金银和生产殖民地商品这项主要任务。官员们接到指示，要在他们的辖区内查清工厂数目，并“以他们能够采取的最简便手段予以摧毁，甚至可考虑以增加生产为借口，由王室国库接管。”② 但是，时代在发生变化，1796—1802年后，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把殖民地同宗主国分隔开来，当地纺织工业又开始经营或重新运转。1804年以后，战争再次给纺织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胡安·洛佩斯·坎塞拉达1811年在加的斯声称：“我们每次与英国开战都成为新西班牙工业增长的原因”，他以加泰隆人弗朗西斯科·伊格莱西亚斯在墨西哥的纺织工厂为例，该厂雇用2,000多工人。③ 西班牙制造商们竭力反对这些事态发展。

20

殖民地充当西班牙的采矿场、种植园和大牧场，如今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即使在这些部门，与宗主国的关系也变得日

① 安东尼奥·加西亚—巴凯罗著《殖民地贸易与革命战争》（塞维列，1972），第83页。

② 同上，第84页。

③ 奥尔蒂斯·德·拉塔夫拉·迪卡塞著《韦拉克鲁斯：对外贸易》，第336—339页。

益紧张。18世纪，墨西哥的白银产量不断上升，从1702年的500万比索，增加到18世纪70年代繁荣时期的1,800万比索，1804年更达到2,700万比索的顶峰。此时，墨西哥的白银产量占美洲全部白银产量的67%，这种地位是各种条件的结合造成的——丰富的矿脉，改进的技术，合并矿山扩大所有权，因税收优惠降低生产费用。然而，自18世纪80年代起，大量商业资本注入该工业，这是自由贸易本身的副产品。一批新的商人进入这个领域，他们资本不多，但富于进取精神。竞争使利润下降，老的垄断者开始从大西洋两岸贸易中抽走资本，去寻找更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包括采矿业，结果对经济对自己都有利。墨西哥取得了格外的成功。在上秘鲁，银矿开采状况全都不佳，但波托西尚能幸存，不断有一些剩余产品运往西班牙。下秘鲁在18世纪后期白银产量增加，与墨西哥相比只是适度的繁荣，但对殖民地的海外贸易至关重要。登记的白银从1777年的24.6万马克上升到1799年的最高产量63.7万马克（每马克值8比索4里阿尔），这个高水平一直保持到1812年。在此期间，改进矿井挑水技术，从波托西转移来的资本，21 自由劳动力的供应和矿业法庭的保护——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产量。

殖民地晚期的矿业历史虽对当地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对帝国有利。首先，殖民地更迫切要求宗主国保持必要的水银和设备供应，可是在战争时期显然无法办到，结果把西班牙看成殖民地发展的障碍物。其次，西班牙殖民史上的巨大讽刺之一是，伟大的白银时代的顶峰时期正好与西班牙海上权力的毁灭因而也与它的殖民地贸易的毁灭相吻合。1796年以后，西班牙和它的商人们眼睁睁望着帝国的果实落到他人手中，望着采矿业繁荣带来的收益被外国掠夺者据为已有或因外国商人介入贸易而使赢利减少。

在农业方面，和采矿业一样，西班牙和美洲的利益无法调和。克里奥尔地主希望在西班牙所允许的范围以外找到更多销路。委

内瑞拉的业主，可可、靛蓝、烟草、咖啡、棉花和皮张的生产者，因西班牙控制进出口贸易而长期感到失望。甚至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新的商人集团，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倾向西班牙的委内瑞拉人，仍垄断控制委内瑞拉经济，对出口产品付款不足，对进口产品又要价过高。克里奥尔地主和消费者要求与更多外国人贸易，指责西班牙商人是“压迫者”，抨击商业“只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的观点，并鼓劲大家起来反对他们在1797年所说的“本省在其束缚下痛苦呻吟的垄断妖魔”。① 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也一样，自由贸易导致更多西班牙商人控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有时还与当地代理人串通勾结。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这一切受到被称为“波特纽”*（portenos）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商人的挑战，他们出口皮张，使用自己的资本和船舶，并向庄园主高价收购。这些利益集团要求直接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和不受限制地出口本国产品的自由。1809年，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开放港口，开展对英国贸易，西班牙人、加泰隆人和其他伊比利亚半岛利益集团强烈反对。这里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即使在殖民地经济利益集团内部，对独立的看法也并非一致，不断滋长的地方主义使殖民地自身发生分裂。 22
这个省要求保护本地产品，那个省要求贸易自由。但是，他们越来越强烈地相信，不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自治是唯一的出路。

1796年开始的与英国的长期战争期间，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和美洲的依附地位经受了最后的考验。1797年 4 月，海军元帅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击溃西班牙舰队后，在加的斯港口驻扎一支英国舰队，实行彻底封锁。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西属美洲各港口，并在海上袭击西班牙的航运船队。结果是十分严重的。加的斯对美洲的贸易，自1793年起本来已经处于衰退状态，现在完全陷于瘫痪。韦拉克鲁斯从西班牙进口的货物从1796年的654.9

① E.阿尔西拉·法里亚斯著，《委内瑞拉的殖民地经济》（墨西哥，1946），第368—369页。

* 一译“港口人”。——译者

万比索下降到1797年的52万比索；出口货物从 703.4 万比索下降到 23.8 万比索；许多欧洲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00％。美洲所有的商会都宣告消费品和必需品供应极端缺乏。一方面美洲各界强烈要求与外国供应商接触，而加的斯商人仍牢牢把持垄断权不放。当西班牙考虑如何解决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时，它别无选择。哈瓦那干脆向北美洲和其它中立国船队开放港口。西班牙不得不允许所有美洲属地采取同样措施，不然就要冒失去控制和财政收入的风险。作为紧急措施，西班牙颁布法令（1797年11月 18日），准许中立国船队与西属美洲进行合法的担保以重税的贸易，用法令的原话来说，“允许从中立国或西班牙港口开来的本国或外国船只进行贸易，但必须驶回西班牙港口”。① 其目的是使中立国成为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媒介，以回避英国封锁，补充西班牙船舶的短缺。中立国船舶实际上成了唯一的运输者，成了沟通西班牙殖民地与销售市场和物资供应地的唯一生命线。其结果同先前中止对外贸易一样明显。通过中立国贸易，韦拉克鲁斯的进口货物从1798年的179.9万比索上升到1799年的 551.04 万比索，出口货物从223.04万比索增加到631.15万比索。

这些战时特许权是勉强授予的，后来迅速废止了。西班牙政府害怕这样会不知不觉地失去，它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使敌人的贸易和工业获益，因为在此期间，殖民地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包括间接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的商品经中立国船舶输入美洲。这样，西班牙就只剩下帝国的负担而无任何利益。加的斯和巴塞罗那的商人理所当然地反对这种状况，于是西班牙政府不顾殖民地的抗议，于1799年 4 月20日废止了这项许可。但结果西班牙所受损害更大，因为它的决定根本不被理睬。殖民地如古巴、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继续与中立国贸易，北美洲航运船

23

① 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著《贸易与殖民地危机》（圣地亚哥，1968），第115页。

只继续驶往韦拉克鲁斯、卡塔赫纳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船只根本无法在加的斯和美洲之间航行，英国的海上权力已经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在1799年 4 月发布命令后的12个月内，驶离加的斯的22艘船仅有 3 艘到达目的地。所以是中立国拯救了殖民地贸易，同时中立国也获得了利润。这种商业对殖民地也有利，它改善了进口货物的来源，恢复了对出口货物的需求。西班牙政府于1800年 7 月18日又颁布法令，重申禁止与中立国贸易，但是如今西属美洲已习惯于同它的顾客和供应者直接打交道，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之势已不可抗拒。随着战争的继续，西班牙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1801年古巴和委内瑞拉获得与中立国贸易的特许。同时，西班牙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个位置，只得出售许可证给欧洲和北美洲的各个公司和西班牙私人，同意他们与韦拉克鲁斯、哈瓦那、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河地区进行贸易；他们的许多货物是英国工业品，持有西班牙的也有英国的许可证，回程装载黄金、白银或殖民地农产品驶往西班牙或中立国港口，甚至驶往英国。

1799—1801年期间，西班牙的贸易垄断实际上已经结束，殖民地的经济独立更加临近。1801年，加的斯对殖民地的出口比1799年下降 49 %，进口下降63.24%。与此同时，美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日趋繁荣，出口从1795年的 1,389,219 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8,437,659美元，进口从 1,739,138 美元增加到12,799,888美元。 1802 年的亚眠和约使西班牙得以恢复它与殖民地的联系，商人们好不容易又一次找到了美洲的港口和市场。又一次出现贸易高潮，1802—1804年间，加的斯获得复苏，虽然它对美洲的出口中 54 %是外国产品。然而要恢复过去的垄断地位已不可能：如今殖民地已与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建立活跃的贸易联系，并且获得了长期以来一直不让它们得到的明显利益。与英国战争的再起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西班牙海上实力的最后一点残余现在已被肃清。1804年10月5 日，预见到即将对西班牙正式开战的英国护卫舰拦截了一支从

拉普拉塔河地区开出的运载金银的船队，击沉一艘西班牙船，俘获其余三艘，船上装载着大约4,700万比索的金银。翌年在特拉法尔加，西班牙遭到了没顶之灾*。没有大西洋舰队后，西班牙跟它的美洲殖民地隔离了。殖民地产品和贵金属进口急剧减少，加的斯1805年的出口额比1804年下降85%。西班牙世界开始土崩瓦解。殖民地再一次开始抗议。他们的出口货物被封锁，价格下跌，进口货物短缺，价格昂贵。其它强国再次挤进来取代西班牙。西班牙的美洲贸易消亡的时候，英国正好在竭力寻找出路，以弥补拿破仑的大陆政策封锁欧洲市场所造成的损失。因此，英国的走私贸易有了新的迫切性，走私贸易既能赚取利润，又能补充军费。在殖民地看来，正如一个西班牙官员所说的，"英国人拿走我们的钱，使他们有实力来摧毁我们。"① 对西班牙来说，只有一种反对走私的办法，那就是允许开放同中立国的贸易。1805年，这样的贸易再次获准进行，这一次取消了船只必须返回西班牙的规定。如今这个宗主国实际上已被驱逐出大西洋。1805年以后，中立国航运业控制了韦拉克鲁斯的对外贸易，占1807年全部进口的60.53%和全部出口的95.11%(白银超过80%)。1806年没有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船只驶入哈瓦那，古巴的贸易都由中立国、外国殖民地和西班牙殖民地经营。1807年西班牙没有接到一艘运送金银的船只。

这次战争对西班牙的后果是一场全国性灾难。各种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失去了重要市场，造成农业部门的萎缩，大约1/3的纺织工厂关闭。工业和消费者都感到殖民地初级产品的短缺，贵金属不能运来不仅对商人，对国家也是个打击。西班牙王室不得不寻

* 指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将军指挥的英国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海角全歼法西联合舰队。——译者

① 安东尼奥·德·纳瓦埃斯(卡塔赫纳，1805年6月30日)，戴奥尔蒂斯编《两位殖民地经济学家的著作》第112页。

求新的财源：从1799年开始，试行由行政当局负担经济收入，要求每年上缴3亿里阿尔。他们发行新公债，提高进口税，最后颁布了致命的整顿资产法令。西班牙作为强大殖民帝国的未来现在已难以逆料。对殖民地的经济垄断已经丧失，再也无法恢复。剩下的只有政治控制了，而政治控制也日益岌岌可危。

1806年6月27日，一支英国远征军从好望角出发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侵略者正确估计到他们不必惧怕西班牙总督和他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低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的自卫决心和能力。一支当地军队加上志愿军，由一名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的法国军官圣地亚哥·利尼埃斯指挥，于8月12日袭击英军并迫使他们投降。这支英国远征军原先并未得到正式授权，但英国政府为利所诱，对它派出增援部队。1807年2月3日，增援部队占领蒙得维的亚。当地反应也很果断。无能的总督被检审法院(audiencia)免职，利尼埃斯被任命为都督。* 再次部署了克里奥尔民兵。侵略者的行动正好是攻其所备。他们从蒙得维的亚越过拉普拉塔河，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平原中心，在那里陷入防御者的埋伏，被迫投降并同意撤退。

英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入侵可以提供不少教训。西属美洲人似乎并不愿意更换一个帝国主人。然而西班牙并不能由此得到安慰。它的殖民地防御弱点暴露无遗，行政官吏丢尽了丑。罢免总督，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保卫殖民地的是当地居民，不是西班牙，特别是克里奥尔人得到了掌握权力的甜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意识。这样，西班牙在美洲的衰落使克里奥尔人登上了政治舞台。

18世纪后半叶，政府中和商业上的新机会吸引日益增多的西

---

* 都督(captain general)，是西属美洲一些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一般由国王任命。他统辖的地区称为都督辖区。——译者

班牙人前往美洲。有些人在新官僚机构中谋职，另一些人走上自由贸易之路。从西班牙北部涌来移民形成了一个事业上成功的企业主阶级，活跃了商界和采矿业，并且不断有人从伊比利亚半岛来参加他们的队伍。半岛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对土地和就业的压力，而且成为扩张帝国的另一个理由。西属美洲人感到自己成了侵略、新殖民主义、西班牙再次扑向贸易和行政机构的牺牲品。可是人口统计结果实际上对克里奥尔人有利。根据亚历山大·洪堡的统计，1800年前后，在西属美洲全部1,690万居民中，有320万白种人，其中只有15万“半岛人”。事实上“半岛人”的实际数目远远低于此数，在整个西属美洲只有将近3万人左右，至多不超过4万人。即使在移民最多的墨西哥，在全部600万人口中，有100万白种人，其中也只有14,000“半岛人”。这样少的人数不可能指望无限期地掌握政权。尽管移民人数不断增加，但人口的发展趋势对他们不利。从人口统计学来看，独立具有不可避免性，也就是多数人推翻少数人。但这里还不仅仅是个人数多少问题。

所有西班牙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论他们是“半岛人”还是克里奥尔人。但是法律并非一切。西班牙人根本不放心让美洲人担任负有政治责任的工作，而宁愿让在半岛上出生的西班牙人担任高级职务和管理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有些克里奥尔地主或矿主，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与“半岛人”同属于社会上层。但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只有中等收入。有些是经常要为抵押和家庭费用挣扎的庄园主，另一些是地产或矿场经理，或当地商人，还有一些人靠手艺挣钱维持生活，有些贫穷的克里奥尔人已融合到市民阶级的上层，他们通过婚姻关系和社会地位变动，与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走到了一起。第一代美洲人感受到的压力最大，因为他们受到新的移民浪潮的直接挑战，而且由于他们最接近欧洲人，因而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因此，对克里奥尔人来说，官职是一种需要而不是荣誉。他们不仅要求与“半岛人”机会均等，而且希望获得多数职位。不管怎么说，这终究是他们自己的地方，

连来自其它国家的克里奥尔人也被看成局外人，并不比“半岛人”更受欢迎。18世纪前半叶，王室由于财政需要，向克里奥尔人出卖官职，因而克里奥尔人担任美洲检审法院法官的事司空见惯，有时他们的人数还占优势。在1687—1750年间，全部311个被任命的法官中有138名克里奥尔人，占44%。18世纪60年代，在利马、圣地亚哥和墨西哥的检审法院中，多数法官是克里奥尔人。这种情况对帝国政府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克里奥尔法官通过婚姻或利害关系与拥有土地的上层人士结合在一起，检审法院变成了专门保留给当地豪富和权贵家族的部门，所以出卖官职逐渐成为克里奥尔人的象征。

从1750年起，帝国政府摆脱原来的习惯做法，开始重振它的权威，减少克里奥尔人参与教会和国家事务的机会，并切断官员与当地家族之间的联系。教会中的高级职位重新归还给欧洲人。在新任命的监督官中很少见到克里奥尔人。人数不断增多的高级财政官员都由来自半岛的人担任。克里奥尔军官被西班牙退休军官所取代。这个新政策的目的在于使美洲殖民地政府非美洲化，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不再出卖检审法院官职，克里奥尔人担任法官的比例减少了，而且现在克里奥尔人很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担任职务。1751—1808年间，美洲266名检审法院法官中仅有62名(23%)克里奥尔人，而“半岛人”有200名(75%)。1808年，在99名殖民地审判员中仅有6名克里奥尔人在本地区任职，19名到外地任职。

新的帝国政策提高了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之间的差异意识。正如亚历山大·洪堡所说：“最粗野、受教育最少、毫无教养的欧洲人也感到自己要比新大陆出生的白人高一等。”① 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费利克斯·德·阿萨拉报导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反感是如

① 亚历山大·洪堡著《关于新西班牙领地的政治文集》(西班牙文第6版，4卷集，墨西哥，1941)，第2卷，第117页。

27

此之大，往往存在于父子之间和夫妻之间。在墨西哥，卢卡斯·阿拉曼确信，“半岛人”优先获得官职和机会所造成的对立，是独立革命的“起因”。

近代史编写者的看法可不这么肯定。有人认为，殖民地上层人士（他们是在农业、矿业和贸易方面进行投资的企业家）起着使“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群体互相融合的作用，他们在城市和农村的职业交往也起这样的作用。尽管波旁王室采取上述政策，当地家族和殖民地官员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智利，克里奥尔上层人士〔与当地官员〕密切结成亲属关系或政治集团，他们宁愿控制行政机构，不愿跟它斗争。在秘鲁，存在着地主、商人、市政官员和官僚寡头的联合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融合成为一个白人统治阶级。在墨西哥，约有50个权贵家族担任着不同职务和角色。有的靠经营对外贸易发了财，然后在采矿业和种植业投下资本，主要在出口部门活动。这些家族主要是“半岛人”。其余家族（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集中经营采矿业和为采矿业服务的农业。他们生活阔绰，挥金如土，或把钱用于军队和教会。同样，他们也宁愿通过婚姻和利害关系去拉拢帝国官员，不愿去正面反对他们。但是他们最终发现自己的影响有限，西班牙依然阻挠墨西哥的发展，依然对墨西哥的财富征收赋税，而且只允许墨西哥建立一个低级政府。这种做法使他们对波旁王室政策产生不满，但未必使他们支持独立。西属美洲各处爆发独立战争时，主要是西班牙统治的维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内战，哪一边都有克里奥尔人。因此，职务、利益和亲属关系的作用超过了克里奥尔人同“半岛人”的对立，而后者就显得意义不大了。这种看法是对夸大其辞的说法的一个有用的修正，但是还没有说明全部问题。

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互相厌恶的迹象十分突出，无法否认，也十分普遍，不能忽视。他们的对抗是当时社会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时代人谈论它，旅行者评论它，官员们深刻地感觉

到它。西班牙官员和美洲人都知道有这种分歧存在。1781年，新格拉纳达的起义者公社社员(comuneros)要求由“在这块领地上出生的克里奥尔人”担任官职，并坚持“美洲国民应比欧洲人优先录用，并得到特别照顾。”①

墨西哥有一个紧密结合的半岛移民集团，他们从事贸易、金融、采矿发了家，有时与当地豪富联姻。他们的克里奥尔后嗣则因经营土地而丧失了家财。低利润、抵押和奢侈的生活使他们的期望破灭，以致引起愤懑，尽管这种愤懑有些荒唐，但却实际存在。在委内瑞拉，克里奥尔贵族是个由地主、官僚和市政委员会成员组成的权势集团，他们在波旁王朝年代靠扩大贸易、增加可可和其它商品的出口获取利润。但是经济增长对他们既有利，也带来威胁。西班牙在委内瑞拉的垄断商加紧了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此外，经济增长引来一批批新的移民,巴斯克人,加泰隆人，尤其是加那利群岛来的移民。这些贫穷但野心勃勃的人很快就控制了委内瑞拉这一头对西班牙和内地的贸易，成为仓库、栈房、商店和酒吧的主人。地主与商人之间的这种对立无疑可以称之为生产者与买主之间的矛盾，(以免又使人想起克里奥尔人与“半岛人”之争)。但事实依然是商人依靠西班牙进行垄断。英国的封锁使他们得以进一步勒索克里奥尔生产者，收购他们的出口产品时压到最低价，出售进口产品则索取高价。因此，克里奥尔人强烈反对中立国贸易。委内瑞拉生产者1798年抱怨说,“我们的商业法似乎只是为宗主国的利益制订的。”②

29

此外，新来的“半岛人”开始侵犯委内瑞拉权贵们的政治禁区。1770年，西班牙王室宣布下列原则：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在

① 约翰·莱迪·费伦著《人民与国王。哥伦比亚1781年公社革命》(麦迪逊，1978)，第174，179—180页。

② 米格尔·伊扎德著《对革命的恐惧。委内瑞拉争取自由的斗争(1777—1830)》(马德里，1979)，第127页。

委内瑞拉享有与美洲人同等的担任官职的权利。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半岛人"开始与委内瑞拉人分享市政委员会席位，在新近成立的检审法院中则处于支配地位。委内瑞拉和其它地方一样，在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也存在西班牙人反对克里奥尔人操纵的问题，同时，此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克里奥尔人谋求官职不仅是为了荣誉，也是为了控制政策和维护他们的传统特权。后期波旁王朝偏袒"半岛人"反对克里奥尔人，把美洲作为给西班牙人的奖品，这种政策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更加尖锐，加深了克里奥尔人的离心倾向。

倘若克里奥尔人用一只眼睛望着他们的主人，另一只眼睛就得盯着他们的仆人。克里奥尔人强烈意识到来自下层的社会压力，他们力求与有色人种保持一定距离。种族偏见造成美洲人对西班牙人的矛盾态度。"半岛人"无疑是纯粹的白种人，即便是贫穷的移民。美洲人多少也是白种人，甚至最有钱的人也意识到种族混合问题，迫切希望证明自己是白种血统，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法律。但是种族问题被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搞得复杂化了，白种人优越论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在它的堡垒外面麇集着大量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自由黑人、穆拉托人和奴隶。在西属美洲有些地区，爆发奴隶起义的情景是如此可怕，以致克里奥人不敢轻易离开帝国政府的庇护或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行列。另一方面，波旁王室的政策也能提供不少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例如准许帕尔多人(pardos，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参加民兵，他们也可以通过购得王家敕令赦免证明，买到合法的白人身份。根据1795年2月10日颁布的法律，帕尔多人可以解除卑贱身份，申请一旦获准，就有资格接受教育，同白人结婚，担任公职和神职。这样，帝国政府承认的帕尔多人日益增多。它希望通过消除特别恶劣的种族歧视来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结果模糊了白人与混血种人之间的界限，使许多非纯种印第安人或黑人在社会上和文化上被视为与西班牙人一样。但是白人强烈反对这些让步。在整个

18世纪，混血种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白人惊慌不安，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新的种族意识，并决心保持种族歧视。这一点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新格拉纳达和西属美洲的其它地区都能见到。但是带头抵制波旁王室的社会政策并形成革命气氛的是委内瑞拉，因为那里有种植园经济、奴隶劳动力和众多的帕尔多人（两者构成人口的61%）。

委内瑞拉的白人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其上层是地主和官僚贵族、奴隶主（殖民地财富的生产者）、民兵司令官，中层是一批较小官员和教士，底层是大量边缘白人（blancos de orilla），如店主、商人、工匠、海员、服务和运输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同帕尔多人一起生活，跟他们通婚。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半岛人"和加那利群岛人都属于这类贫穷白人。克里奥尔人对"半岛人"的某些对立情绪很可能就是贵族地主对他们认为出身微贱的普通移民的怨恨。但"半岛人"是纯种白人，而许多克里奥尔人都不是。这种情况加强了种族敏感性，也加深了克里奥尔人对帕尔多人、印第安人和奴隶的疑忌。帝国的政策增加了他们的愤懑，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对帕尔多人和奴隶过于宽容。克里奥尔上层人士顽固地反对提高有色人种的地位，抗议出售白人身份，抵制普及教育和让帕尔多人上大学。他们还担心在大庄园发展和出口增长时期丧失依附性劳动力。帕尔多人大多是平原上的手工业者、独立自耕农或从事养牛，白人地主力图使他们处于依附地位，给自己当雇农。他们还认为提高帕尔多人的地位危及自己的安全，因而向殖民地当局请愿，反对吸收帕尔多人参加民兵，但未获成功。他们认为"本省白人竟然让自己奴隶的后裔穆拉托人加入自己的阶级"，这是无法接受的。他们争论说，建立帕尔多人民兵无异于给有色人种一件叛乱武器，显然无助于改善帝国防务①。奴隶骚动和起义的恐怖加强了这些预感。克里奥尔人中的

31

① "1796年11月25日的建议书"，载F.布里托·菲格罗亚著《委内瑞拉殖民地社会的黑人奴隶暴动》（加拉加斯，1961），第22—23页。

贵族再次抱怨自己已被宗主国抛弃。1789年5月31日，西班牙政府颁布新的奴隶法，并正式编入法规，它明确了奴隶的权利和奴隶主的义务，设法给奴隶较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克里奥尔地主抵制国家干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以奴隶生性卑劣、易闹独立性、他们的劳动对经济至为重要为理由，竭力反对这项法律。在委内瑞拉——甚至在整个西属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都抗拒这项新法律，并于1794年使其中止执行。克里奥尔人胆战心惊：他们害怕在法国革命学说和有传染性的圣多曼格暴乱的煽动下爆发一场种族战争。

在西属美洲的其它地区，种族紧张关系的形式是白人上层人士和印第安群众之间的直接对抗，这里的克里奥尔人不得不注意保护自己。在秘鲁，他们属于极少数。在1,115,207人口中(1795)58%是印第安人，20%是梅斯蒂索人，10%是帕尔多人和奴隶，白人仅占12%。这个少数虽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但总是忘不了包围着他们的印第安群众，也不能忽视接连发生的反抗王室官员和白人压迫的叛乱。在秘鲁，克里奥尔人没有理由怀疑西班牙压制印第安人的决心，但是在图帕克·阿马鲁起义以后，他们注意到自己保卫安全地位下降了，他们的民兵也被遣散了。在墨西哥，社会形势也一触即发，白人一直知道，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愤怒正在慢慢沸腾，下层阶级中的不法行为日益增多。为了控制局势，他们频繁地部署军队和民兵。阿拉曼把墨西哥印第安人描绘成"一个完全分离的国家，所有不属于他们的人都被看成外国人。他们虽享有特殊待遇，但遭受所有其他阶级的压迫，他们也以同样的仇恨和不信任看待所有其他阶级。"1799年，米却肯当选主教曼努埃尔·阿瓦德-凯波谈到墨西哥社会的深刻分裂时说，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在一无所有者和拥有一切者之间，奴隶和领主之间始终迷漫着敌对情绪"。① 在传

① 卢卡斯·阿拉曼著《墨西哥史》(5卷集，墨西哥，1883—1885)，第1卷，第67页；曼努埃尔·阿瓦德—凯波著，《1799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居民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载《何塞·马里亚·路易斯·莫拉选集》(墨西哥，1963)，第204—205页。

统上，上层人士指望西班牙保护他们，财主们依靠西班牙当局来对付劳动者和工人的威胁，对付贫困和不法行为带来的暴力。但是墨西哥群众心中郁积的愤怒终于在1810年爆发，形成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它证实了克里奥尔人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的想法。归根到底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社会秩序和殖民地遗产的保卫者。既然他们的人数在白人中占多数，这任务只能由他们来担当。

倘若在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存在一个“西班牙反动”，那末也存在一个克里奥尔人的反击。克里奥尔人已经失去对波旁政府的信任，开始怀疑西班牙是否具有保护他们的决心。他们迫切需要摆脱处于殖民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两面夹攻的困境。政府近来抑低了他们的政治影响，而群众对他们的社会领导地位已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波旁王朝在1808年瓦解时，克里奥尔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能不去填补这个政治真空。他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抢在群众起义之前。他们深信，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更危险的力量会这样干。

殖民地的经济缺点和殖民地社会的紧张局势在骚乱和起义中暴露出来了。这无非是在某个层次上对波旁王室政策的回答。发展殖民地经济和增加国库收入——在西班牙改革者心目中这是两个完全协调一致的目标，但美洲人却把它看成是帝国政策中的基本矛盾。波旁王室管理印第安人的政策同样也自相矛盾，(如果王室不这么看，至少印第安人是这样想的)。它一面希望保护印第安人不受凌辱，同时它最为关心的则是纳贡者人数和劳动力供应的问题。对于改革措施，各方也从不同立场出发进行评价。西班牙当局认为，加强波旁王室的国家控制、结束地方分权和克里奥尔人参与政府，是走向控制和复兴的必要步骤，但是克里奥尔人认为这意味着不再使用传统的由总督出面谈判的办法(总督愿意在国王和人民之间进行调停)，而改由新的官僚机构发布来自中央集权国家的不容谈判的命令，这不是进步。因此，抗议运动(如抗

33

税骚乱和反对各种弊政的起义）是对政府新措施的公开反抗。它们在殖民地社会体制范围内产生，但并不向殖民地社会体制本身提出挑战。但表面现象是不可靠的。在表层下面，反叛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种族矛盾、冲突和动荡。这些因素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平静状态，可是当赋税压力和其它不满促使若干社会集团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行政当局，并给低层群众奋起反抗的机会时，就突然爆发出来。它们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然而揭露了掩盖着的社会冲突。这一点可在克里奥尔主要人物的反应中看到。他们一开始也参加一些纯粹是有关财政问题的骚动，后来看到了爆发来自下层的更剧烈的抗议的危险，这种抗议矛头不仅针对行政当局，而且反对所有的压迫者。于是克里奥尔人联合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把叛乱者镇压下去。

叛乱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两次最早的运动——巴拉圭的公社运动（comuneros）（1721—1735）和委内瑞拉的叛乱（1749—1752），在时间和空间上和其它叛乱都无联系，它们显示了初步的地区意识，认识到美洲人的利益不同于西班牙的利益。而1765年的基多起义，是工业衰落地区的一次单纯然而剧烈的抗税运动，这次运动使人们看到了西班牙人和美洲人之间的潜在冲突。正如新格拉纳达总督报告所说的，它表现了克里奥尔人“对捐税、欧洲人……和任何形式的压制的憎恨。”① 在战争时期，收税官员变得更加严厉，他们不仅要为帝国的防务取得收入，还要为西班牙在欧洲和其它地方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援。因此，1779—1783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使殖民地负担沉重，因为宗主国力图从殖民地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愤怒发展成为叛乱，帝国的安第斯各省立即陷入危机。

1781年新格拉纳达爆发的一次运动提供了一个顺序模式——波旁王室革新，殖民地反抗，恢复专制制度。暴乱的主要起因是

① 约瑟夫·佩雷斯著《西班牙美洲解放的先驱运动》（马德里，1977），第64页。

摄政兼总巡视员* 胡安·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德·皮涅雷斯的做法，他的残忍手段和毫无余地的要求与传统的谈判和妥协方式完全不同。他将销售税增加到4%，从农场征收后直接用于行政管理，而且恢复了一种已经废弃的海上防务税。他还重新实行烟草和酒类专卖，提高出售给消费者的价格，只让高质量地区生产烟草。这些负担都落在停滞的经济、贫穷的人民、尤其是众多的小农身上。在发生一系列抗议和骚乱后，1781年3月16日爆发严重叛乱，叛乱集中在索科罗和圣希尔两地。叛乱者抗缴捐税，袭击政府仓库，驱逐西班牙行政当局并以公社的名义，宣布一批领导人名单。主要领导人是胡安·弗朗西斯科·贝尔韦奥，一个拥有中等资产的庄园主，略有作战经验。运动一开始是一场以梅斯蒂索人为主的人民起义，它的指挥权很快落到克里奥尔上层地主和官员手中。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参加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难以阻止的事情发生。

公社起义者至少在人数上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几千人的队伍向波哥大前进，跟他们一起还有一股印第安人。他们本来可能会攻占首都并对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实行恐怖统治，但是贝尔韦奥和他的伙伴们不是革命者。他们的运动口号是传统的口号："国王万岁，腐败政府下台。"他们反对的只是西班牙官僚机构的暴政，不是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因此，贝尔韦奥和其他克里奥尔人让起义军停止前进，他们愿意同卡瓦列罗-贡戈拉大主教谈判，间接同波哥大的上层人士谈判。这是传统的做法，结果双方达成妥协，签署了锡帕基拉协定(1781年6月8日)。协定规定停止烟草专卖和各种捐税，将销售税从4%降低到2%，改革行政管理以利当地自治，允许更多美洲人担任官职，改善印地安人的处境。 35
事实上，这个协定是贝尔韦奥和卡瓦列罗两人谈判达成的，双方都深信，为了避免一场更剧烈的革命 有必要彼此作出让步。随

* 总巡视员(Visitor-gerenal)，王室派往西属美洲殖民地，负责为王室进行特别调查的官员。——译者

后贝尔韦奥被任命为索科罗郡守，他估计运动已告结束。但真是这样吗？

殖民地所有社会阶层对王室政策都有所不满，起义开始时反映了这一点。这次公社运动是贵族和平民、白人和有色人种反对官府压迫和财政改革的暂时联盟。领导者是中等的地主和商人，他们站到运动的前列，是为了控制它，使它变得对自己有利。波哥大的克里奥尔贵族也是一种类型的同盟者，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对苛捐杂税不满，协定中有一项条款对他们特别有利，而与运动的宗旨并不相干。这一条规定：在任命官员时，“美洲国民应比欧洲人优先录用并得到特别照顾。”① 这一点使克里奥尔上层人士感到满意，倘若叛乱走得更远，他们准备同当局采取一致行动。因为确实还有其他受害的人和其它不公正的事。印第安人也参加了叛乱。在圣菲和通哈，他们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卡萨纳雷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也揭杆而起反对西班牙当局、教士和白人。各地印第安人都反对纳贡。波哥大的公民感到城外的印第安人比公社起义者更可怕。因侵占他们的村社土地（resguardos）而被激怒的印第安人，不会轻易跟克里奥尔庄园主和对土地馋涎欲滴的梅斯蒂索人结成同盟，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印第安人被迫迁往他处定居和拍卖其土地中得到过好处。虽然协定规定了减少贡税义务和恢复村社土地，但他们还特意规定了印第安人有权拥有和出售土地。这一条与其说对印第安人村社有利，还不如说对潜在的土地购买者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有利。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感到失望的，还不止是印第安人。这次叛乱也唤起了殖民地的穷人和一无所有者的希望。他们虽然也要求废除专卖制。降低消费品价格和生产自由，但他们的仇恨是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一无所有者对拥有一切者的仇恨。在安蒂奥基亚地区，发生了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骚乱，奴隶们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要求自由。接近叛乱中心，一个代表社会被压迫者的领袖脱颖而

① 费伦著《人民与国王》，第179—180页。

出。何塞·安东尼奥·加兰来自人民，是个穆拉托，也可能是个梅斯蒂索，他认为协定是一次背叛，是阻止起义者进入波哥大的诡计。他带领运动中剩下的较激进分子，使运动成为即便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是一次对社会下层群众——混血种人和奴隶具有更强号召力的抗议。

克里奥尔人十分恼怒，他们和当局串通一起，把他们运动中的这支未经许可的队伍镇压下去。前公社起义领导者搜捕加兰，称他为“我们领地上的图帕克·阿马鲁，”同时防备他第二次向波哥大进军。一位王室官员报告道：“索科罗的同一批指挥官以果断、团结和热诚的态度帮助平息了困难的局势；他们以此表明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服从和爱戴，表明他们只是希望摆脱摄政的压迫和固执”。[①] 于是，公社起义的领导者得到了赦免。至于加兰和他的伙伴们，他们被残忍地处死。这是给克里奥尔人的一个警告给人民的一个儆戒。叛乱过后，捐税降低到原来的水平，但专卖制依然保留，财政制度较前略为温和，但目标如旧，王室收入继续增加。后来，人们认为这次公社运动失去了一次走向独立的机会。可是在当时，起义者和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把它看做一次独立运动。当局反复强调这是搞社会颠覆，克里奥尔人则表明他们害怕人民甚于西班牙，宁愿依附于人，也不要革命。

西属美洲其它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公社运动发展到委内瑞拉，那里的殖民地社会产生了相似的分裂，运动也在孤立无援中失败。它表面上也是一次抗捐税、反专卖叛乱，社会所有各阶层都参加。他们对新监督官辖区加强帝国压迫和监督官何塞·德·阿瓦洛斯惹人讨厌的政策感到愤慨。正如起义者总指挥胡安·何塞·加西亚·德·埃维亚所说的，“富人和贫人、贵族和平民都在抱怨”。但作出的反应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最激烈的反应是安第

① 1781年6月2日的报告，《米兰达将军档案》（24卷集，加拉加斯，（1929—1930），第15卷，第42页。

37 斯山诸省普通群众的武装暴动，参加者有小农、工匠、小商贩、城乡劳动者，有时还有印第安人。运动的领导人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集团，他们相信可以从新格拉纳达的克里奥尔人签订的协定中分享利益。但是大多数有产者都采取不介入态度。马拉开波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对贸易、发展生产和出口比对内地穷人的不满更感兴趣。当他们终于注意到公社起义时，他们进行谴责，而且表示愿意“出自己的人”① 帮助镇压起义。委内瑞拉都督向政府赞扬克里奥尔贵族富于“效忠精神和对国王的爱戴”，赞扬他们拒绝人民的要求。事实上，克里奥尔人宁愿要西班牙，也不要无政府状态。社会结构本身是西班牙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一点在秘鲁可以看得最清楚。秘鲁的白人和印第安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很难接近的状态下共处。但秘鲁的起义都不是只有印第安人参加。又是一次城市运动，从1780年1月开始象传染病似地蔓延开来，矛头指向内地关卡，提高销售税和其它财政压迫。虽然也有几百名来自城市及周围山区的印第安人加入抗议，但更明显的参加者是穷苦的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乔洛人(cholos)* 和其它混血种人。他们对纳贡义务扩大到自己身上感到愤怒。主要的抗议中心在库斯科、阿雷基帕、拉巴斯和科恰班巴。拉巴斯的起义号召大家保持北美殖民地居民表现出来的那种“值得怀念和羡慕的”② 团结一致精神。但是克里奥尔人的不满和印第安人的不满不是一回事，当抗税骚乱被印第安人起义压倒时，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即畏葸不前，或退出城市运动。奥鲁罗的情况就是这样。1781年在那里发生一次克里奥尔人领导的起义，在人数上被印第安人和乔洛人压倒，于是克里奥尔人同西班牙当局联

① 卡洛斯·E·穆尼奥斯·奥雷阿著《委内瑞拉的公社起义者》(梅里达，1971)，第136—137页；佩雷斯著《先驱运动》，第106页。

② 博莱斯洛·莱温著《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和美洲解放运动的根源》(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第151页。

* 白人和土著的混血儿。——译者

合起来把他们击败并驱逐出去。

印第安人的不满更为严重，原因也更加深刻，主要是郡守以及一般官员、法官和商人对他们的暴虐专横，硬性要他们缴纳贡税、捐税和什一税，强迫摊派(reparto)货物，米塔(mita)制度下的非人的强制劳动，特别在波托西矿区。在波旁政府的许多应急措施中，特别是销售税从4%提高到6%和内地设立收税关卡这两件事，给印第安人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增加的负担很重，使印第安人社会的中等集团离心离德，培育了起义领袖。整个18世纪，秘鲁一再发生起义，而以何塞·加夫列尔·图帕克·阿马鲁领导的运动为最高潮。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印第安酋长，印加王族的后裔。图帕克·阿马鲁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以和平手段鼓吹变革，最初试图在西班牙的法庭上求得公道，结果失败。当总巡视员何塞·安东尼奥·德·阿雷切对秩鲁印第安人拧紧螺钉时，他领导他的追随者发动猛烈的暴动，袭击郡守，抢劫工场，占领村庄。1780年11月，运动在库斯科附近开始，不久即席卷秘鲁南部大部分地区，然后在第二阶段也是更激进的阶段蔓延到上秘鲁的艾马拉诸省。图帕克·阿马鲁的庞大家族和亲属关系，他们与地区贸易和运输的联系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团结一致的指挥系统、新兵来源和领导的连续性。但最大的动力来自运动本身。

38

图帕克·阿马鲁宣布誓死与西班牙人作战到底，他宣布目标是“消灭郡守……废除波托西的‘米塔’劳役制、销售税、内地关卡以及其它各种苛捐杂税。”他还尽力使运动具有普遍性，超越社会各阶层界限。他呼吁克里奥尔人加入印第安人的队伍一起“消灭欧洲人”，同时他又声称主张“保护、保存欧洲人和他们的安宁”。①同克里奥尔人重新结盟的企图未能成功。图帕克·阿马鲁的社会政策过于革命，只能满足一无所有的穷人。他抨击强制劳动，许诺解放奴隶，至少那些加入他队伍的奴隶。他还打算摧毁手工作

① 同上，第402—403，415—416，422—423页。

坊和摊派劳役制，而他的追随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白人城镇和白人居民。被起义的巨大声势吓得惊慌失措的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合作，保护他们的祖传产业。教会和国家，克里奥尔人和欧洲人，整个现制度势力一致起来反对图帕克·阿马鲁。经过激烈斗争，运动瓦解失败，10人在战斗中牺牲，其中多数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领袖们被残酷杀害，他们的追随者被追捕。到1782年1月，经过短暂但是猛烈的震动后，西班牙人又恢复了控制。然后开始实施少许体制上的改革——以监督官代替郡守，废除摊派劳役制。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帝国实力，并非为印第安人的福利。

图帕克·阿马鲁是否有志于独立？西班牙当局说他有，美洲其它地方的同情者把他看成秘鲁的国王。毫无疑问，革命一经开始，他就变得更加激进，但独立却是另一回事。从文献上看，证据显然不足，甚至大可怀疑。总之，摆脱西班牙统治只是他的运动的一部分任务。这场革命的真正宗旨是反对白人特权（既包括西班牙人，也包括克里奥尔人），最终目的是结束印第安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基本上是社会目标。至于独立，一场印第安人起义不一定会有这种意识、组织性和完成独立事业所需的军事手段。印第安人也缺乏团结。在图帕克·阿马鲁起义期间，至少有20个酋长，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和部落对抗的动机，或者由于已经被招募参加西班牙的组织，让他们的部落继续效忠王室，有的甚至参加了王室部队。印第安人起义还缺少独立的另一个条件，即克里奥尔人的领导。克里奥尔人一心要维护现有经济结构，而矿井、庄园和工场中的印第安人劳动力是现有经济结构的基础。此外，克里奥尔人在数量上远远被印第安人超过，他们不太愿意去领导一个可能控制不住的运动。独立，只能在另外的条件下产生。

因此，严格地讲，18世纪的起义并不是独立的"先导"。当然，西班牙当局或者出于担心，或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谴责他们搞颠覆。监督官阿瓦洛斯争辩说，1780—1781年所有起义的根

本原因不是捐税,"而是土著居民对西班牙的敌对情绪和强烈的独立愿望。"① 这超过了起义者自己的想象。还不如说，吸引他们的是过去的乌托邦，是加罗林王朝以前的黄金时代，那时还不知中央集权和苛捐杂税为何物。不过，起义者虽然没有系统表达独立思想,却创造了向传统统治进行根本性挑战的舆论气氛。事实上，他们证明"国王万岁，腐败政府下台"的口号已经过时，作为抗议手段已不再有现实意义，已被波旁王室自己否定。它的中央集权政策使国王和政府的区别不再象过去那样界限分明，如今，国王坦率地为他的臣仆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此外，历次起义都突出这样的事实，即新政府是国外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些起义代表着殖民地自我觉醒的新阶段，更加明亮(虽然尚不清晰)的民族主义新曙光，对不属于宗主国的特性和利益的大维护。公社起义者表达了一种信念：新格拉纳达是他们的国家，它属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而这些土生土长的土地主人却受到西班牙人侵者的威胁。甚至秘鲁的起义也表露出一种民族意识。图帕克·阿马鲁谈到过老乡同胞，意思是秘鲁人不同于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他在1780年11月 16 日的宣言书中建议解放奴隶，号召秘鲁人(la Gente Peruana)为了"这个地区的共同利益"。②帮助他对付欧洲人(Gente Europea)。他所称的秘鲁人(Gente Peruana)或国民(gente nacional)，包括所有在秘鲁生长的白人、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唯一的标准是他们不是外国人。这些观念是殖民地经历的自然产物，但并不代表整个印第安人运动。

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影响，但不属于印第安人。图帕克·阿马鲁的宣言所表达的，是克里奥尔人的而不是印第安人的观念，是一位早熟领袖的思想而不是典型的印第安人

① 给查理三世的报告，加拉加斯，1781年9月24日，载穆尼奥斯·奥雷阿著《委内瑞拉的公社起义者》，第39页。

② 《秘鲁独立文献汇编》(30卷集，利马，1971)，第2卷第2部分，第272页。

思想。印第安人和殖民地社会其他受排斥的人很少可能会有民族意识。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是庄园、村社或当地行政机关，再没有比它们更大的实体了。而克里奥尔人的期望所反映的则是一种更高的觉悟，一种不断发展着的自我意识，一种他们是美洲人而不是西班牙人的信念。这种初步民族意识比具体改革要求对西班牙的统治具有更大的颠覆性，更易助长独立。与此同时，美洲人不仅开始否认自己是西班牙民族，还认识到自己美洲人之间也有差异。甚至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前，各殖民地之间就已在资源和要求方面彼此发生对抗。美洲是一块非常辽阔的大陆，美洲又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难以使人对它保持忠诚。人们首先是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秘鲁人、智利人，而且是在各自的国家，不是美洲，找到了本民族的家园，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历史、疆界和自然环境，不仅不同于西班牙，彼此间也存在差别；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

这种民族意识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美洲人在独特的美洲文学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国土。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的克里奥尔作家表达并培养了一种对祖国的新认识和更强烈的排外意识，正如《秘鲁信使》报所说的："现在我们更想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① 首先从文化上表现美洲主义的是1767年被逐出故土的克里奥尔耶稣会教士，他们在流放中成为美洲民族主义文学的先驱。秘鲁耶稣会教士胡安·巴勃洛·比斯卡多是个热情的独立鼓吹者，他为独立事业留给后世一部遗著《致西班牙美洲人的信》，出版于1799年。比斯卡多写道："新大陆就是我们的家园，它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到这段历史中去寻找我们目前处境的原因。"② 比斯卡多的论文是革命行动的号召。但大多数耶

---

① R.巴尔加斯·乌加特著《秘鲁史。总督辖区时期（18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第36页。

② 米格尔·巴特略里著《隐修院院长比斯卡多，关于耶稣会教士干预西班牙美洲独立的历史和神话》（加拉加斯，1953）附件，第Viii页。

稣会流亡教士写书是出于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消除欧洲人对他们国家的无知。所以他们描述他们国家的自然面貌、历史、资源和财富，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文学和学术著作。如果它还不能算是一种民族文学，至少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基本成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但是耶稣会教士的著作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们的直接影响——在他们生前很少著作用西班牙文出版——而在于反映了其他不太善于表达的美洲人的思想。克里奥尔人自己表达爱国主义时，往往比那些流亡者乐观。在独立前时期产生了认识自我文学，其中美洲作家赞颂自己国家，欢呼他们的资源，评价他们的人民。这些作者不仅教导他们的同胞认识自己的资源，而且指出美洲人具有担任官员和实际上实行自治的资格。他们反复使用一些词汇——祖国、家园、民族、我们的美洲、我们美洲人——向人们灌输信心。这种思想还只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而且并不是与帝国不相容的，然而它提醒人们美洲有独立的资源和管理他们的人，从而为独立进行了思想准备。 42

这种新美洲主义比启蒙运动的影响更强烈。法国启蒙哲学家的思想，他们对当代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批判，他们对人类自由的响往，西班牙世界并非一无所知，但不是普遍接受，多数人依然信奉天主教，并为君主专制制度献身。西班牙式的启蒙运动抽掉了意识形态，使它成为现制度下的一个近代化纲领。把它运用到美洲，意味着使帝国经济成为更丰饶的财富和权力的源泉，意味着改进控制的手段。“将我的王室财政收入提高到适当的水平”——这就是查理三世在1776年所表述的他的殖民地政策，它与启蒙运动毫无关系。如果西班牙本土在1765年后只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末在西属美洲，原来的社会准则和结构依然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有人也许会问，用“启蒙运动”甚至“改革”这样的字眼来描绘1765—1810年时期西班牙的帝国政策或它的意识形态环境是否恰当。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化应归功于18世纪的思想：重视实用知识，设法运用应用科学改进生产，相信

国家的功能，等等。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想法。正如大主教卡瓦列罗-贡戈拉总督向他的继任者所说的，有必要以实用精密的科学取代无意义的空谈，在一个象新格拉纳达那样的领地，要开发产品，修建公路，采掘矿藏，抽乾沼泽，让训练有素的人去观察和测量比推究哲理更重要。这样的近代化需要技术超过政治。西班牙“启蒙运动”在美洲确实只是新帝国主义的一项纲领而已。

43 但是西属美洲也能直接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哲学发源地获得新的哲学。启蒙运动的文献可以比较自由地在这里流传。墨西哥有人研究牛顿、洛克和亚当·斯密，还有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孔迪亚克和达朗贝尔。读者有高级官员、商人和专业人员、大学教师和神职人员。秘鲁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是圣·卡洛斯皇家学院毕业生，经济学会会员和《秘鲁信使》报撰稿人，他们了解洛克、笛卡儿和伏尔泰的著作，熟悉社会契约论、理性第一和崇拜自由等思想。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启蒙运动在美洲的影响决不是普遍的，一旦移植也难以不受干扰，茁壮存活。它发育不良，保守主义削弱它，传统势力禁锢它。从年代来说，它的影响姗姗来迟。1780—1781年的革命很少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只是到这次革命和1810年期间才开始扎根。18世纪90年代，启蒙运动的传播加速：在墨西哥，宗教裁判所当即作出反应，使他们感到惊慌的主要还不是新哲学宗教上的异端邪说，而是它的政治内容，宗教裁判所认为新哲学具有煽动性，“反对国家安全”，满怀“人人平等自由的一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可怕的毁坏性的法国革命”① 的新闻媒介。但是总的说来，启蒙运动灌输给它的克里奥尔信徒的主要不是解放哲学，而是让他们对已经接受的观念和制度采取独立自主的态度，要理性强于权威，实证强于传统，科学强于空谈。对西属美洲的这些影响无疑是持久的，但当前只起了推动改革的作用，还不是

① M.L.佩雷斯·马昌德著》根据宗教裁判所文件看18世纪墨西哥的两个意识形态阶段》（墨西哥，1945）第122—124页。

导致破坏。

可是有些克里奥尔人的眼光越过改革，望见了革命。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8世纪70年代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时，读过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他将思想变为行动。西蒙·波利瓦尔当然也是如此。自由主义教育、博览群书、在欧洲的广泛旅行，把他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接触了英国的政治榜样和启蒙运动的思想。霍布斯和洛克、百科全书派和启蒙哲学家，尤其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都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终生献身于理性、自由和秩序。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广泛阅读了新哲学著作。和其他革命者一同毕业于丘基萨卡大学的马里亚诺·莫雷诺是卢梭的热烈崇拜者，"为了教育美洲青年，"他于1810年编辑出版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在新格拉纳达，一群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在政治上比公社起义者更进步，是西班牙政权的激进反对派的核心。佩德罗·费尔明·德·巴尔加斯将启蒙运动思想贯彻到主张颠覆。他曾担任锡帕基拉郡守，1791—1792年从那里逃往国外，为他的革命计划寻求外国援助。他向英国政府宣称，西属美洲人和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的待遇犹如外国人和奴隶，已经达到举行起义的地步："这个国家的居民非常渴望独立，新格拉纳达领地现在象最年长的儿子，需要解放自己。"① 为了筹措逃亡费用，他把藏书卖给了波哥大一个富有的克里奥尔青年安东尼奥·纳里尼奥。1793年纳里尼奥在他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法国《人权宣言》的译文，这个文件在美洲早已被卡塔赫纳宗教裁判所禁止。这一版印了100份，很快就被销毁，出版者随后以叛逆罪被流放。纳里尼奥在基多有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斯佩霍的朋友，是个梅斯蒂索医生和律师，也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埃斯佩霍在一系列讽

① 巴尔加斯向英国政府的报告，1799年11月20日，载《米兰达将军档案》第15卷，第388页。

刺性出版物上猛烈批评基多经济的缺点，并指责西班牙统治是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1795年他也以颠覆罪被控下狱。尽管西班牙当局将这些克里奥尔人的反抗作为反叛处理，事实上1793—1795年的上述事件只是宣传，并非革命，并且仅限于社会上层人士。他们在显示法国革命的影响方面有某些重要性，但缺乏牢固的权力基础。

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马里·埃斯帕尼亚的密谋更为严重，他们直言不讳地主张建立独立的委内瑞拉共和国。这两个委内瑞拉人曾得到西班牙流放者胡安·包蒂斯塔·比科内利的指点，

社会地位的人经常持有对立的政治观点。思想观点有它自己的力量、信念和说服力。

启蒙运动被北美和法国的革命带到了政治中心。在1810年前后的年代里，美国仅靠它本身的存在发挥影响。西属美洲身边这个自由和共和主义的榜样一直是它的一个生动的鼓舞力量，并未因为有人对这个强大邻邦的政策有所顾虑而遭受损害。早在1777年，大陆会议（1774—1775）宣言的西班牙文译本已到了何塞·伊格纳西奥·莫雷诺博士手中，后来他担任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校长并成为1797年密谋活动的参加者。汤姆·潘恩的著作，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和华盛顿的演说都在次大陆流传。独立运动的许多先驱者和领导人都曾访问美国，亲眼看到自由制度。1784年，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在纽约形成了"整个西属美洲大陆的自由和独立"的构思。波利瓦尔始终不渝地尊敬华盛顿 46 赞美（虽然不是没有批评）美国的进步，他描述美国为"自由的土地和公民道德之家"。美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不仅是货物和服务的通途，也是书籍和思想的渠道。美国商人把译成西班牙文的《共和国宪法》和《独立宣言》带进这个地区，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与发展无垄断市场的利益是一致的。1810年以后，西属美洲人在追求生命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中，不断从他们北方邻邦建立共和国的经验中寻求指导。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其它地方的宪法几乎完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许多新的领导者——虽然不包括波利瓦尔——深受北美联邦主义的影响。

法国革命模式的吸引力较小。正如米兰达在1799年所说的，"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伟大的榜样：美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让我们慎重地仿效前者，小心地避开后者。"① 先入的印象激起更大的希望。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那时他在西班牙——在自传中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对1789年事件的反应时说："自由、平等、安

① 《米兰达致瓜尔》，1799年12月31日，载《米兰达将军档案》第15卷，第404页。

全和财产的观念牢固地攫住了我，我看到那些阻止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去享有上帝和自然界赋予他们的权利的人就是专制暴君”。① 西班牙政府企图阻止它的臣民得到有关法国的新闻和宣传，但是壁垒被西班牙和美洲的革命著作浪潮冲毁了。有些人阅读这些新作品是出于好奇，另外一些人却本能地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他们拥抱自由原则，欢呼人权。平等则是另一回事。处于西班牙人和群众之间的克里奥尔人希望自己多得到一点平等，下层群众少得到一点平等。法国革命演变得愈激烈，知道的人愈多，对克里奥尔贵族的吸引力也愈少。他们把它看成一头极端民主和无政府状态的怪兽，倘若让它进入美洲，势必摧毁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世界。这种危险已不遥远了。

1791年，法属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曼格岛卷入了一场群众性奴隶起义。圣多曼格是一个典型，是新大陆出产最多的殖民地，它的唯一功能是向宗主国出口糖和咖啡。为了这个目的，法国建立了军事—官僚统治、种植园经济和靠暴力维持的奴隶劳动力。社会形势经常是爆炸性的，不仅是因为对50万奴隶进行残酷剥削和使自己的有色居民遭受屈辱待遇，而且也由于人数占少数的白人内部发生分裂。圣多曼格四分五裂的状况，是殖民地美洲的缩影：大白人(grand blanc)小白人(petit blanc)白人反对穆拉托人，穆拉托人反对黑人。1789年革命成为一付速溶剂，触发了对有机会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不同反应，使长期被压抑的社会和种族张力释放出来。奴隶们在得悉白人主人的分裂已弥合无望后，于1791年8月举行起义，攻击种植园和它们的主人，一场争取废除奴隶制并从法国统治下独立的长期、猛烈的斗争开始了。法国的政策在国民议会颁布的废除奴隶制命令和拿破仑为了法国统治和奴隶制度重新征服该岛的企图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法国最终不得不承认失败，1804年1月1日黑人和穆拉托将军们宣布成立海地新国

47

①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自传》，(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第13—18页。

家，美洲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对西属美洲来说，海地是一个榜样和警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越来越感到害怕。克里奥尔人现在已能看到宗主国丧失团结、当局丧失勇气、殖民地统治阶级失去控制的必然结果。海地不仅是独立，而且是革命，不仅是自由，而且是平等。新政权有条不紊地消灭余下的白人，防止任何白人重新成为有产者，任何在其它殖民地出生的非洲人后裔，无论是黑人还是穆拉托人，奴隶还是自由人，它都承认是海地人，并请他们离去。它还向奴隶买卖宣战。这些社会和种族政策使美洲所有的殖民地和奴隶制政权都把海地看作敌人，它们立即采取步骤保护自己，但是谁也比不上西班牙的措施那么有力，它在海地革命过程中已经失掉了毗邻的殖民地圣多明各。1791年11月，革命爆发还不满3个月，西班牙殖民地当局即得到告诫，要它们采取防御措施防止蔓延。一律禁止海地黑人进入各西班牙殖民地，白人避难者也成了怀疑对象。

48

有人认为委内瑞拉特别易被渗透，一是因为与海地相隔很近，二是因为委内瑞拉本身在整个18世纪都有奴隶抗议、反抗和逃亡的历史。拿破仑反攻后，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逃出来的黑人和穆拉托人取道特立尼达到达委内瑞拉东海岸。在官方眼中，他们是潜在的第五纵队。因当地帕尔多人地位上升而提高了警惕的委内瑞拉克里奥尔人反应激烈。加拉加斯检审法院竭力维护奴隶制度，抵制法国革命学说，认为它“会使头脑简单的人特别是奴隶产生偏见，而仅在本省就有10万多奴隶。”证据是现成的。1795年一次黑人和帕尔多人起义震撼了科罗城。科罗是制糖工业中心，也是种族和阶级意识鲜明的白人贵族的根据地。运动由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和何塞·卡里达·冈萨雷斯两人领导，他们是自由黑人，曾在加勒比地区旅行，知道法国和海地的事变。他们在奴隶和有色人种劳动者中进行动员，300人于1795年5月起事，宣布实行“法国人的法律，建立共和国，解放奴隶，禁止征收销售税及

其它捐税。”[1] 起义者占领庄园，掠夺财产，杀死地主并侵入科罗城，但他们孤立无援，很快就被击溃，许多人未经审讯即被处决。海地革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1799年5月，一支海盗船队从太子港出发，企图与马拉开波的起义者合作，那里200名帕尔多民兵正在开始杀死白人，建立“自由平等制度”，成立海地那样的黑人共和国，首先废除奴隶制。这次起义又告失败，但它是黑人持续不断的反对白人斗争的另一个实例，这种斗争是殖民政权最后年代的特征。

西属美洲的革命者迫不及待地要同海地革命划清界线。米兰达特别担心海地革命影响他在英国的声望：“我承认，我希望新大陆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我更害怕无政府状态和革命。上天决不允许其它国家再遭受圣多曼格那样的命运，那里的屠杀和罪行都是在争取自由的借口下干的。还不如让他们在西班牙野蛮愚蠢的压迫下再生活一个世纪”。[2] 米兰达争辩说，他必须赶在海地人之前抵达委内瑞拉。1806年，他率领一支极小的远征队驶向他的故乡。不利于他的声誉的是，他在海地停下来重新部署队伍，在那里有人劝他不要满足于鼓励克里奥尔人起义，应该“割脑袋，烧财产，”同时传出谣言，说他“计划利用海地黑人”。[3] 其实，米兰达在社会问题上和其他克里奥尔人一样保守，而且他也无意煽动一场种族战争。但损害已经造成。在科罗他首先遇到的是冷酷的沉默，接着遭到克里奥尔地主的反对，他们指责他是“异教徒”和“叛徒”。

因此，如果说海地革命是一个警告，那么它也是一次推动。西属美洲人即将面临宗主国的危机和帝国统治的崩溃。到那时，他们将不得不去填补政治真空，夺取独立，以防止出现另一个海地。

---

① 佩德罗·M·阿卡亚著《科罗山区的黑人暴动》（加拉加斯，1949），第38页。

② 《米兰达致特恩布尔，1798年1月12日》，载《米兰达将军档案》第15卷，第20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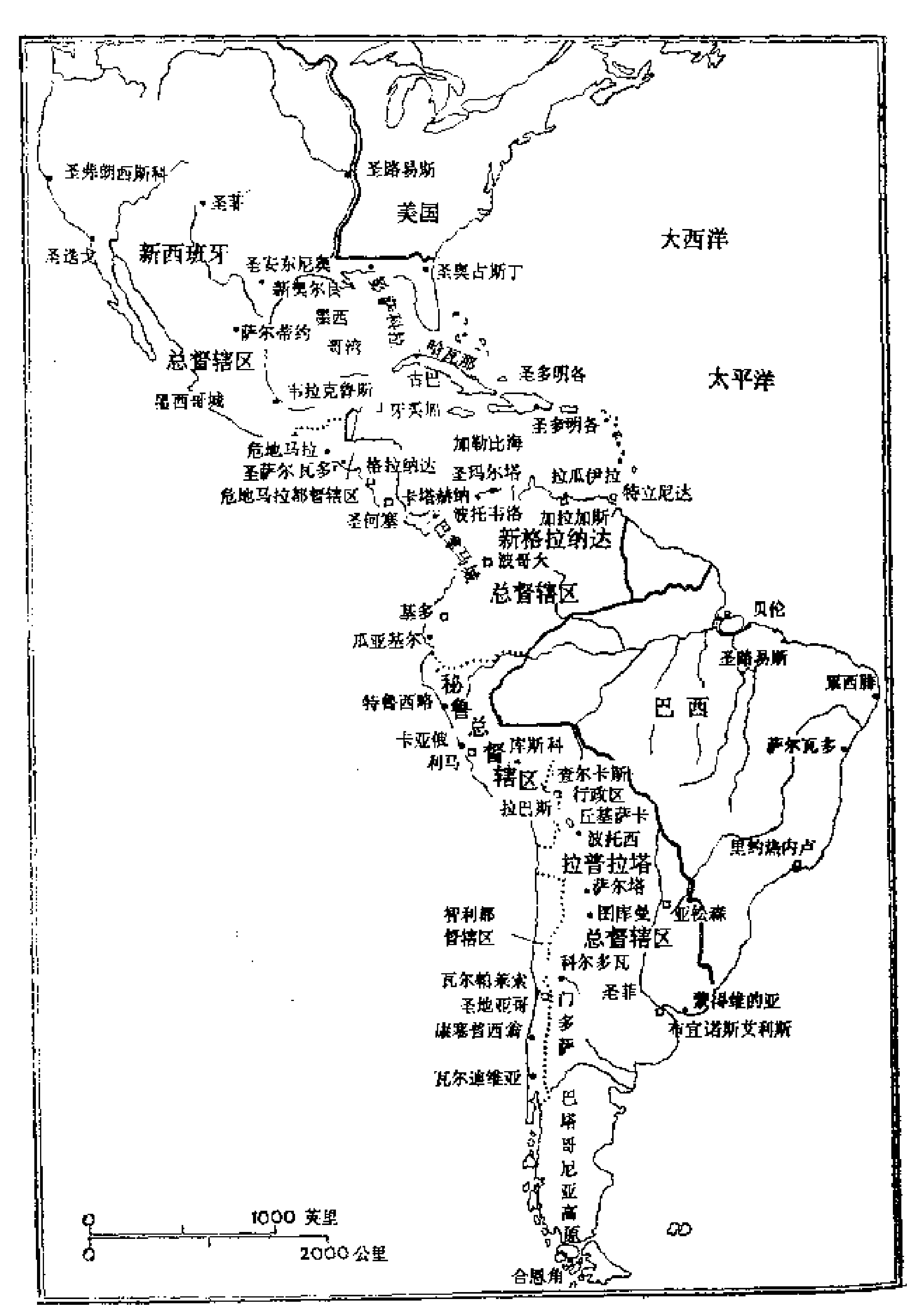
③ 保罗·贝尔纳著《佩蒂翁和玻利瓦尔》（加拉加斯，1969），第95页。

1808年危机终于来临，这是20年萧条和战争的顶点。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改革取得的一点进步早已在法国革命的冲击下宣告结束，法国革命把胆战心惊的大臣们驱向反动，把手足无措的国王推进曼努埃尔·戈多伊的怀抱。随着政府领导离开查理三世的旗帜，他的改革大臣投向查理四世和宫廷宠臣，政府的作用下降在国内只是个庇护者，在国外则是个委托人。西班牙人民忍受了严重的苦难。1803年的农业大危机造成严重的饥荒、断粮和死亡，证明波旁王朝对改进农业、贸易和交通长期无所作为。在此期间，政府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保持国家独立，但既无远见又无手段去解决紧迫的对外政策问题。与法国结盟未能挽救西班牙，而只是突出了它的弱点，延长了战争，招致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攻击。在这些年代里，西属美洲去半岛的游客对他们目睹的现状感到不寒而慄，一度强大的宗主国竟衰弱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心甘情愿地充当法国的附庸。如今他们越发懂得西班牙的利益并非他们的利益，美洲"需要保持中立才能获得幸福"（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语）。可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1807—1808年，拿破仑决定把西班牙变成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国家，派兵入侵半岛，波旁政府发生内讧，致使国家在进攻面前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1808年3月，一次宫廷政变迫使查理四世解除戈多伊的职务，自己也宣布逊位，由王储费迪南即位，不久，法国占领马德里，拿破仑敦促查理和费迪南七世去巴约纳进行谈判。1808年5月5日，拿破仑在巴约纳强迫父子二人一起逊位，并于6月宣布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国王。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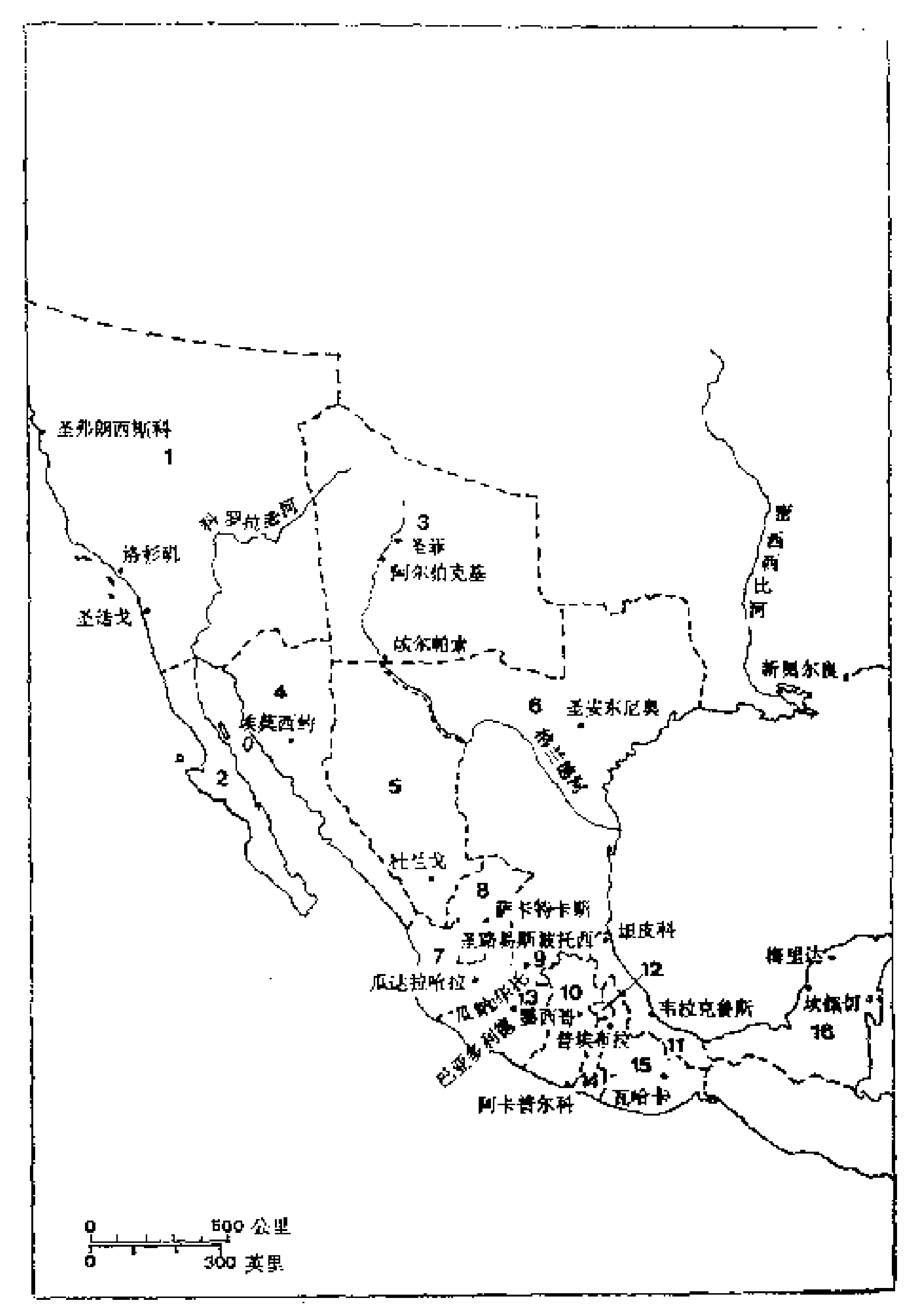
在西班牙，人民开始奋起为独立而战。1808年5月底，各省洪达组织力量反抗侵略者，9月组成中央洪达，它以国王名义，行使权力，力图联合反法力量，并于1809年1月发布法令，宣布美洲领地不是殖民地，而是西班牙君主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些事件在美洲引起了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危机。按照传统权

力来自国王，法律是国王的法律，理应服从。而今已没有国王可以服从。这种状况使权力结构以及如何在帝国官员和当地统治阶级之间分配权力成了问题。克里奥尔人必须决定采取最好的办法来保护他们的世袭财产，维持他们的控制。西班牙美洲不能成为没有宗主国的殖民地，也不能成为没有君主的君主国。



1800年左右的西属美洲殖民地



独立前夕的墨西哥

说明：1—新加利福尼亚行政区；2—老加利福尼亚行政区；3—新墨西哥行政区；4—阿里斯佩监督官辖区；5—杜兰戈监督管辖区；6—圣路易斯波多西监督官辖区；7—瓜达拉哈拉监督官辖区；8—萨卡特卡斯监督官辖区；9瓜拉哈拉德圣菲监督官辖区；10—墨西哥监督官辖区；11—韦拉克鲁斯监督官辖区；12—特拉斯卡拉行政区；13—巴亚多利德监督官辖区；14—普埃布拉监督官辖区；15—瓦哈卡监督官辖区；16—梅里达德尤卡坦监督官辖区。

第 2 章

墨西哥与中美洲的独立

在争取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斗争前夕，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墨西哥）的面积十分辽阔，从加勒比海到太平洋，从危地马拉和恰帕斯边境到广袤的东部和西部内地省份，包括后来并入美国成为其西南部的领土。这个总督辖区1814年拥有居民6,122,000人（美国1810年为7,240,000人），占西班牙海外帝国全部人口的1/3以上。总督辖区首府墨西哥城是北美和南美的最大城市，1811年有居民168,811人，为西班牙帝国第 2 大城市，仅次于马德里。

新西班牙也是西班牙最富裕的殖民地。1800至从1809年，主要港口韦拉克鲁斯的年平均贸易额达2,790万比索。在下一个年代，即1811至1820年，年平均贸易额为1,800万比索，进口和出口额各占一半。这个殖民地1800年的货物和服务总产值约为2.4亿比索，大体上人均产值40比索。这仅仅是美国当时人均产值的一半，但比任何其它西属或葡属美洲殖民地高得多。农业和畜牧业大约占用全部劳动力的80%，生产39%左右国民财富，制造业和家庭手工业约占总产值的23%，贸易17%，采矿业10%；其余11%来自运输业、政府和其它部门。这样一个经济规模直接或间接为西班牙王室生产大量收益。新西班牙全部产品的9%至10%（约2,400万比索）进入王室国库或教会金库，其中将近一半（1,200万比索）从殖民地运往半岛，其余部分留下作为总督辖区政权的费用和每年用于管理和保卫加勒比诸岛、东西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其它领地的补助金。此外，西班牙对新西班牙贸易横加束缚，其中最重要的是禁止同外国口岸通商，烟草、火药、水银、官方用纸等重要商

品实行王室专卖，对出口墨西哥货物、进口西班牙货物以及经西班牙进口非西班牙货物征收大量捐税。殖民地产品出口到外国市场须在西班牙付15%至17%的税，外国货物往西班牙转运殖民地须付36.5%的税。新西班牙运往西班牙的贵金属和农产品至少再出口90%。据计算，在殖民地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中，大量苛捐杂税和贸易限制每年要使新西班牙损失1,730万比索，人均2.88比索，相当于殖民地全部收入的7.2%。这个数字接近英国在美国独立前的最后几年强加给13个北美殖民地的负担的35倍。①

这些数字都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当然，在殖民时代结束时，墨西哥人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而已。虽然当时西班牙的经济控制和垄断是殖民地不满的主要根源，但西班牙的社会和行政限制同等重要。三个主要民族集团——白人、梅斯蒂索人(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具有不同的法律和习惯身份，每个集团各有一系列不同的财政义务、公民权利和社会经济特点。印第安人占全国人口的60%，混血种人22%，白人18%。白人又危险地分为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被称的伽秋平人)，*前者占全国人口的17.8%，后者不过15,000人，占全国人口的0.2%。可是极少数半岛移民却成了殖民地行政管理的骨干，控制着政府和军队中的所有高级职位。这些欧洲人中大约有7,500名军人，6,000名文官和商人，1,500名教士。在整个殖民地没有几个欧洲妇女——据德国观察家亚历山大·洪堡统计，墨西哥城仅217人——因为欧洲移民愿意娶富裕的克里奥尔家族的女儿为妻。这些欧洲来的上层人物控制着政府、军队、教会、大部分对外贸易以及国内的酿酒和纺织工业。

55

在社会阶梯的下一层有矿主、商人和土地及其它财产所有者，

① 约翰·H·科茨沃思著《墨西哥19世纪经济发展的障碍》，载《美洲历史评论》83/1(1978)，第80—100页；同作者著《从落后到不发达：1800—1910年的墨西哥经济》(即将出版)，第4章。

* 伽秋平人(gachupines)，意为带靴刺的人。——译者

他们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是墨西哥居民中"天生的精英"，有些人还获得西班牙贵族头衔。然而他们受到排斥，不能充分参与政治权力。他们还由于同半岛移民通婚，由于经济萧条或投资失败，乃至由于帝国的法令，而面临丧失财产的危险。例如1804年的整顿资产法令，在1808年废止以前一直威胁所有的财主。他们必须偿还向教会借的大量抵押贷款，以便把钱送到西班牙去支付欧洲战争费用。墨西哥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虽得到很多照顾，但仍对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地位感到忐忑不安。

社会地位再低一等，是律师和其他受过训练的克里奥尔人，大多数较低级的政府和教会职务由这些人担任。在1811年，墨西哥城总督府的大约555至600个职位大部分(65%)由克里奥尔人担任，欧洲人只占35%。但是西班牙出生的白人都担任高级职务，而墨西哥人只能担任较低的职务，只有个别例外。① 1808年，有12名欧洲人和5名克里奥尔人(只有3人是当地出生)在墨西哥城检审法院任职，6名欧洲人和1名克里奥尔人在危地马拉检审法院任职，4名欧洲人和3名克里奥尔人在瓜达拉哈拉检审法院任职。与此相似的是，独立时全国主教座堂的男女神职人员绝大多数是克里奥尔人，但只有一名克里奥尔人主教。生活不太顺心的还有小商人、中等庄园主、小矿主以及1810年后日益重要的民兵中低级克里奥尔军官(他们竭力想在迅速扩充的民兵队伍中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些成分合在一起，可以称为资产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相比享有无数特权，但与半岛移民或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相比，依然感到遭受歧视。或许这个社会白人中间产生政治紧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资产阶级要求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随着新西班牙在18世纪晚期的经济发展，这个阶级人数迅速增多。他们的政治觉悟高，特别是那些熟悉启蒙哲学家 56

① 琳达·阿诺德著《墨西哥城中央官僚机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1808—1822》，向墨西哥和北美历史学家第5次(帕茨夸罗，1977)提出的论文。

所鼓吹的思想的人。有些人甚至熟悉耶稣会流亡教士弗朗西斯科·克拉维赫罗的著作《墨西哥古代史》和其他思想家关于自我认识克里奥尔人的著作，也就是刚出现的墨西哥主义。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弗赖·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尔和卡洛斯·马里亚·布斯塔曼特等作家把这些思想转变为成熟的反西班牙民族主义。

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共占总人口的82%，正式法律和风俗习惯(还有贫穷)把他们同特权阶级完全隔离开。他们是社会的劳动者和供应者，但世代相传的王室法律丝毫没有减轻对他们的压迫，法律规定他们不得担任公务和神职理论上禁止与白人住在同一个村庄里，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职业以限制其提高社会地位。印第安人和跟他们一起居住的梅斯蒂索人，必须纳贡并服从某些具体法律。每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会发生一两次瘟疫，夺去10%至50%的城市贫民和无数农村穷人的生命。瘟疫纷纷带来周期性农业歉收，结果生活必需品价格盘旋上涨，引起大规模失业，农民向城市迁移，爆发社会骚乱。独立前最后二十年玉米价格上涨的统计数字表明，穷人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1790年玉米的售价每法内加* 最低16里阿尔，最高21里阿尔，1811年涨到36里阿尔。1808至1811年，一次严重农业危机席卷墨西哥，引起1810年群众起义。穷人差不多要花费人均收入的一半购置玉米充饥。他们经常生活在死亡的边缘。掠夺性的和重商主义的、建立在新封建主义劳动制度基础上的殖民地经济，对庄园、矿山和血汗工厂中的劳动群众不断进行压迫。此外，西班牙法律中的种族界线，不但是新西班牙下层阶级政治动乱，也是经济上缺乏效率和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影响到后来墨西哥智力资源的开发。这种法律甚至延续到独立以后，常常引起立法混乱。在一些采矿中心和南部牧区劳动力不足的地区，种族界线有所放宽，但是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劳动力过剩，

57

* 法内加系干量单位，约合55.5升——译者

实际上都发生种族歧视。1810年开始的起义企图纠正这类弊端，至少这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对他们所受压迫的一种回答。

1810年和以后的下层阶级起义，特别是两位伟大的独立运动英雄——米格尔·伊达尔戈和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领导下的起义，在墨西哥独立斗争中非常突出，但是在墨西哥或西属美洲其它任何地方，决定独立的结果或新国家采取什么国体的却不是下层阶级。下层阶级起义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延缓乃至掩盖了墨西哥人的不同意见的主要根源——克里奥尔主义，即通过居住财产所有权或亲属关系（即使不算出生），与墨西哥连结在一起的克里奥尔白人中上层阶级和白人上层人士希望控制经济和国家的迫切要求。伊达尔戈以费迪南七世的名义宣布独立，莫雷洛斯宣布独立反对费迪南七世，但墨西哥的资产阶级和上层人士在运动初期的目的是在帝国内部实行自治。

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逐渐产生了分离主义意识。他们从克拉维赫德以自豪的心情撰写的著作中知道了墨西哥被征服前的伟大历史；他们把自己理想化为最早征服这块土地的阿兹蒂克人或其他什么人的真正继承人（他们认为这批人是被王室行政官员赶离家园的）；他们虔诚地相信，瓜达卢佩圣母在墨西哥的出现给墨西哥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神圣命运的标记。克里奥尔人就是如此认定自己是不同于“半岛人”、具有不同政治目标的美洲人。总之，他们已意识到自己作为殖民地臣民的作用。与此同时，当地上层人士即便没有这种新阿兹蒂克主义和原始墨西哥主义的思想，但对帝国政权怀有严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因1804年整顿资产法令而达到顶点。自从1542颁布新法各项以来，这些上层人士第一次意识到半岛颁布一个专横法令就能威胁他们的生存。尽管如此，上层人士和克里奥尔中等阶级都还无意于完全独立，因为他们害怕群众，需要依靠教会和国家的传统势力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他们确实可望自治。两位当代杰出的观察家清楚地觉察到了这方面的迹象，他们是米却肯的当选主教曼努埃尔·阿瓦德—凯波

和亚历山大·洪堡，尽管他们两人倾向于强调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的政治冲突。

1808年西班牙在拿破仑猛烈攻击下土崩瓦解，紧接着克里奥尔资产阶级和拥有财产的上层人士之间形成的联盟也宣告破裂。查理四世和他的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被推翻，费迪南七世即位后不久，拿破仑之兄约瑟夫篡夺王位，并将费迪南七世囚禁在法国——这一切使人对西班牙政体的基础——王权高于一切——产生了怀疑。墨西哥城于1808年6月9日听到费迪南七世继承王位的消息，7月16日又听到费迪南被拿破仑废黜。以后两个月殖民地出现了一次独特的危机。西班牙各省纷纷建立洪达政府，并互相争夺墨西哥的承认。得到英国初步承诺在反法共同斗争中给予援助的奥维耶多洪达和塞维列洪达都派遣专人前往墨西哥。墨西哥城当局无法立即断定两个洪达哪个合法。首府检审法院和拥护专制制度的“半岛人”少数派竭力反对承认任何自己宣布成立的洪达，主张墨西哥在职王室成员继续留任，直到国内出现合法政府。基本上代表克里奥尔人利益的墨西哥城市政委员会，在两名成员何塞·普里莫·贝尔达德和胡安·弗朗西斯科·阿斯卡拉特的领导下，在激进思想家秘鲁修士梅尔乔·德·塔拉曼特斯的影响下，7月15日正式作出决议，要求何塞·德·伊图里加雷总督以费迪南七世和人民代表的名义直接控制政府。市政委员会的中心理由是，当国王不在位或无法行使权力时，“应由整个领地和组成领地的各阶级，特别是管理国家并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以及代表公众的团体行使主权。”① 也就是说，市政委员会要求总督承认这个国家的主权并在最近的将来召集新西班牙各城市代表大会。这等于是在三个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情况下要求成立自治政

① 《墨西哥城给伊图里加雷总督的报告》1808年7月19日，载《前地方自治机关档案》，见《墨西哥通史》第2234卷，第34号。

府。这个计划的主要倡导者，除阿斯卡拉特、普里英·贝尔达德 59 和塔拉曼特斯外，还有一些杰出的克里奥尔人，如乌鲁亚帕侯爵、拉亚斯侯爵、梅迪纳伯爵、雷格拉伯爵和检审法院成员哈科沃·德·比利亚乌鲁蒂亚。这个计划的主要反对者是检审法院的大多数成员和“半岛人”庄园主、商人和矿主。克里奥尔人的这项建议几乎一事未成，幸而伊图里加雷总督表示支持，至少不加反对。他召集首都主要团体的代表讨论成立新西班牙未来的政府。君主专制制度拥护派议定，如要避免新西班牙在总督的纵容下逐渐滑向革命，唯一办法是撤掉总督职务。

从法律上来说，既然君主已不在位，西班牙各种洪达又都以国王名义宣布拥有权力，墨西哥克里奥尔人的建议并非反叛。他们只是要求由市政委员会恢复行使。在克里奥尔人看来，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市政委员会就是墨西哥的权力机构。建议的倡导者阿斯卡拉特和普里莫·贝尔达德都没有对国王的最高权力表示异议。普里莫·贝尔达德争辩说，“上帝将权力赐予国王，但不是直接，而是通过人民”。阿斯卡拉特争辩说，“国家和国王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国王不在位时，由国家执掌权力；一旦国王复位，人民直接行使的权力即自行停止。”[①] 可是，在君主专制主义者看来，这是严重的叛逆行为，因为它严重威胁西班牙的统治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墨西哥是不是殖民地？主张自治的人不接受他们的国家是殖民地的思想，认为它是组成西班牙君主国的一块领地，象半岛上的各省和各领地一样，在危机期间墨西哥也能建立省级洪达，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管理。君主专制主义者争辩道，新西班牙和半岛上的领地不一样，因而任何建立区域自治的提议都是不合法的。对他们来说，墨西哥必须继续成为宗主国的金银供给者，虽然宗主国正在外国的征服下面临死亡的命运。检审法院认为提议召集各城市代表大会会引起对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的联想。这 60

① 路易斯·比略罗著《独立革命的思想演变》(墨西哥，1967)，第37—38页。

是十足的双重标准，这一点墨西哥人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西班牙各省早已在做墨西哥建议做的事。即将在西班牙成立的战时政府将宣布墨西哥和其余海外领地，都是君主国平等的一部分，然而西班牙的政策却要求殖民地不享有平等地位。

在伊图里加雷的催促下，1808年8—9月首府的领导人物举行了四次会议(但城市代表大会始终没有召开)。辩论的主要问题是，西班牙两个主要洪达，墨西哥应承认哪一个。结果，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哪个也没有承认。这几次会议的主结要果是，“半岛人”深信，总督既然愿意听从克里奥尔人的意见，他已无可挽回地损害自己的声誉。于是在保守的“半岛人”庄园主兼商人加夫列尔·德·耶尔莫的领导下，策划了推翻总督的阴谋。在检审法院和大主教的支持下，耶尔莫和一群商会“半岛人”，总共约有300人，1808年9月16日早晨进入总督官邸逮捕总督。在以后的几小时内，密谋者逮捕了几个最主要的主张建立临时政府的人——塔拉曼特斯、阿斯卡拉特、普里莫·贝尔达德和其他几个克里奥尔领导者。几天后，普里莫·贝尔达德在监禁中身亡。1809年，塔拉曼特斯在韦拉克鲁斯监狱中死于黄热病。他们成为克里奥尔主义的第一批殉难者。伊图里加雷总督被检审法院撤职，由八十多岁的退休陆军元帅佩德罗·德·加里瓦伊取代，“半岛人”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傀儡。

现在新西班牙已不可能走向克里奥尔人主张的建立临时政府和实行独立的道路，而南美洲大多数殖民地在1808—1810年期间却走上了这条路。一小撮强有力的保守主义者仅巧妙的一击，就把克里奥尔自治主义者打垮了。新总督或者他的继承者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利萨纳—博蒙大主教(1809年7月—1810年5月)，或者从1810年5月至9月短暂地代行总督职务的检审法院，都来进行行政改革或其它改革。西班牙要建立统一政府——中央洪达，它宣布给美洲人以平等，并号召成立有美洲议员参加的议会。这些都没有使墨西哥人感到满意。自1808至1810年的历届墨西哥政府

都非常无能，不去疏导克里奥尔人的问题和下层阶级的不满，却集中力量去处理派到美洲来的法国密探所引起的微不足道的危险问题。"半岛人"中的君主专制主义者采取异乎寻常的非法手段推翻一个西班牙总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大大削弱西班牙的合法权威。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尔在他的著作《新西班牙革命史》(1813)一书中声称，伊图里加雷被推翻就证明了美洲独立的正义性，因为政变破坏了连结墨西哥和西班牙国王的社会契约。这个问题可能属于哲学范畴，对于新西班牙的被压迫者来说，这次政变不过是日益加剧的西班牙暴政的另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1808年对自治主义者活动的镇压加深了墨西哥人的不满，并导致了1810年的起义。那年5月，米却肯的阿瓦德一凯波主教警告说，群众性社会暴动在新西班牙已迫在眉睫。到了9月，新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贝内加斯抵达墨西哥城刚两天，革命就开始了。

在瓜纳华托监督官辖区的富饶农业中心克雷塔罗，一批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包括骑兵军官和富商之子伊格纳西奥·阿连德、民兵军官胡安·德·阿尔达马、另一个民兵军官马里亚诺·阿瓦索洛和克雷塔罗郡守(官职最高的密谋者)米格尔·多明格斯，发动了一次革命密谋，企图推翻西班牙君主专制主义者和他们的检审法院。阿连德和阿瓦索洛在这以前曾参与过一次由两名军官何塞·马里瓦诺·米切莱纳和何塞·马里亚·加西亚·奥韦索在巴亚多里德城发动的密谋。这次密谋在预定发动的日子1809年12月21日前夕遭到镇压。1810年夏，克雷塔罗的密谋者们赢得了多洛雷斯小镇的一名不从国教的、自由生活的教区神甫米格尔·伊达尔戈一科斯蒂利亚的支持，他立即成为密谋的领袖。伊达尔戈是具有卓越学术成就的克里奥尔人，曾悉心研究启蒙运动的著作和村社组织，以便改善教区内的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生活。由于对世俗生活的严重关切，他多年从事讨论和考虑国家的社会的政治问题，并得到一大批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追随者的支持。密

谋者们计划举行以印第安人为基础的群众暴动。他们考虑，印第安人会参加他们的队伍去剥夺伽秋平人的财富和财产，同时尊重克里奥尔白人的财富和财产。

瓜纳华托监督官辖区的大部分在地理上称为“低洼地区”，由于它的特殊社会结构，成了演出这次密谋活动的舞台。瓜纳华托是个发达富足的地区，结果也成为社会压力尖锐的地方。它的经济主要以采矿业为基础，采矿活动带来了满足采矿需要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一半以上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不住在传统的村庄中，而作为自由劳动力在矿山和庄园干活，因此他们比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纳贡者较能提高社会地位，抱着更多的期望。“低洼地区”的富足使它较少依附墨西哥城，因而那里富裕的克里奥尔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政治上受歧视。那里的发展受到过时的社团经济结构的限制，引起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尔人的一致不满。这样，“低洼地区”在墨西哥许多地区中领先走上培育革命反叛思想的道路。1808—1809年的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1810—1811年饥饿给农民带来巨大痛苦，一些矿山因没有粮食饲养骡子而关闭，矿工被解雇，出现爆发性的社会骚乱。解除伊图里加雷的职务和西班牙政府两年无能的统治关闭了所有通向温和改革的大门。被压抑的愤怒和不断的苦难终于在“低洼地区”爆炸了。

这次起义原来计划在10月初发动，但在9月的头两个星期。保王当局从不同来源获得了计划反叛的消息，郡守多明格斯在克雷塔罗被捕。密谋泄露的消息传到多洛雷斯的伊达尔戈家中，他决定立即发动起义。1810年9月16日晨，伊达尔戈发表他的讲话“多洛雷斯呼声”，号召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在星期日集市上集合，参加起义，宗旨是保卫宗教，摆脱以应对撤消伊图里加雷职务一事承担责任的人为代表的“半岛人”统治的束缚，结束贡税及其它使人蒙受屈辱的可耻标志。革命以费迪南七世的名义开始，宣告瓜达鲁佩圣母——墨西哥人虔诚的最高象征——为起义的保卫者和守护神。后来伊达尔戈还在这个含糊不清的纲领中增

加另外一些内容，为号召独立，废除奴隶制，归还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在此期间，他从未禁止他的追随者抢劫，事实上，他鼓 63 励他们去剥夺西班牙人。

起义随着愤怒的爆发，迅速蔓延到整个瓜纳华托监督官辖区，大批纳贡者自发参加，使运动很快变成一场剧烈的反对一切白人的报复战争，既反对“半岛人”，也反对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认定他们都是压迫者。起义第一天，起义者夺取了圣米格尔埃尔格兰德城，两天后进入富裕的城市塞拉亚。9月23日，一支没有武器但情绪高昂的大约25,000人的队伍到达监督官辖区首府瓜纳华托城。9月28日，起义者猛攻一个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当作避难所的要塞似的谷仓，屠杀它的守卫者并对全城进行两天洗劫。对瓜达华托的破坏此后提供了一个起义者残暴的形象，保王派轻而易举地利用它进行宣传。到10月初，起义者的人数已达到6万，10月17日攻下巴亚多利德城，它是主教管区的中心，伊达尔戈曾在这里学习。起义者为迅速的成功所鼓舞，计划转过头来进攻总督辖区首府墨西哥城，希望一举而解放整个殖民地。

伊达尔戈起义虽然宣称独立是它的目标，但目的并不明确，缺乏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坚强的领导。伊达尔戈号召被压迫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参加激烈的起义，结果是放出了一支他无力控制和很少理解的力量。新西班牙的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把这次起义看做是印第安人暴动，是1780年秘鲁帕克·阿马鲁起义的墨西哥翻版。瓜纳华托大屠杀后，有一点看来已很清楚，这不是反对政治压迫的起义，而是反对所有白人和财主的种族战争。伊达尔戈起义的领导者虽是克里奥尔人，但他得不到更多克里奥尔人的支持。甚至1808年自治运动的幸存者，如胡安·弗朗西斯科·阿斯卡拉特，也公开谴责这次起义。墨西哥城市政委员会先前是克里奥尔人抱怨欧洲人垄断官职和商业的中心，如今却表示愿意全力支援总督辖区政府。教会以停止教权、宗教裁判所定罪和宣传来回击起义者。总督贝内加斯发表公开声明，严厉警告一切帮

助起义者的人，并计划重新组织22,000名当地民兵和1万名由退64役士兵组成的军队。他委派“半岛人”费利克斯·马里亚·卡列哈旅长担任该城市新编军队指挥官，希望凭卡列哈的21年经验、同墨西哥的个人联系和他的独特技巧取得克里奥尔人的支持。为了保持或重新赢得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效忠，10月5日他下令废除贡税制，这个行动西班牙议会立即仿效。保王派进行广泛的宣传运动，甚至使国家中部地区的下层阶级也相信起义者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1810年10月28日，伊达尔戈和他的追随者（现在已达8万人）到达墨西哥城城郊。10月30日，起义部队在名为蒙特德拉斯克鲁塞斯的山脉隘口与一小支保王部队遭遇。这是未经训练的起义部队第一次与训练有素的保王军队作战。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完全可以取胜，击退保王部队，但这是一次付出重大牺牲的胜利。伊达戈尔在战斗中损失了2千人，更重要的是，估计有4万人即他的一半兵力四散逃跑。迅速获胜的梦想破灭了。伊达尔戈的部队在城外驻扎了3天，要求总督投降。但伊达尔戈不愿冒全军覆没的危险，11月2日下令向克雷塔罗撤退，从而失去获胜的最好机会。11月7日，起义部队在阿库尔科村附近与卡列哈的部队作战，惨遭失败。这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短暂但可怖的起义的结束。随后，伊达尔戈和阿连德兵分两路伊达尔戈前往巴亚多利德，再去瓜达拉哈拉，阿连德去瓜纳华托。在巴亚多利德和瓜达拉哈拉，伊达尔戈下令（或准许）立即处决四百多名欧洲人，从而暴露了先前在领导层中不存在的复仇主义。产生这样的暴行是因为伊达尔戈知道，运动即将失败。11月24日，阿连德被逐出瓜纳华托的据点，群众屠杀了138名被俘的欧洲人。卡列哈将军进城后采取报复行动，保王派指挥官何塞·德·拉克鲁斯在克雷塔罗以东的村庄中大开杀戒。伊达尔戈起义期间，在新西班牙15,000名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中，估计有2,000人被杀，被杀的克里奥尔人更多，证明印第安人不想区别对待他们的白人压迫者。

伊达尔戈和他的指挥官们在瓜达拉哈拉度过了1810年12月和1811年 1 月上半月，整编被击溃的部队。到 1 月中，人数又扩大到8万人。这些未经训练的徒手农民于 1 月17日投入战斗，在瓜达拉哈拉城外的卡尔德隆桥与卡列哈的保王军队主力作战。起义部队遭到最严重的失败，领导人纷纷逃走。在部队毫无组织地向比较安全的北部溃逃时，伊达尔戈被他的副手们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到3月中，卡列哈将军已重新控制墨西哥中部和西部。在继续向北逃走途中，伊达尔戈和主要军官们 3 月底在科阿韦拉被俘。他们被押送到奇瓦瓦城，经审判后处决。伊达尔戈对领导这次起义有许多悔恨表示，据称死前曾签署一份一般性声明，公开宣布放弃革命。他在 7 月30日被枪决，他和另外三名起义领导者的头颅一起送到瓜纳华托，悬挂在该城一个谷仓墙上示众达10年之久，那里曾是起义者进行最大规模屠杀的现场。

伊达尔戈在墨西哥近代史上被称为“独立之父”，并奉为墨西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他发表“多洛雷斯呼声”之日，9 月16日，被定为墨西哥独立日。然而伊达尔戈的起义仅仅持续 3 个月，它对争取独立斗争所起的主要是反作用。它使这个国家的中部遭受流血和破坏，把克里奥尔人赶进了保王派的阵营以保卫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把自治的本来目的淹没在血海之中。伊达尔戈失去对起义的控制并允许或纵容极端的残暴行径。起义的最大弱点是缺乏明确的目标，而且在克里奥尔人中引起恐惧，他们本来是可能支持破坏力较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卡列哈将军承认这一点，他在1811年写道：“这个幅员辽阔的领地对一个脆弱的宗主国来说负担太重。本地居民甚至欧洲人都深信建立独立政府会有好处。倘若伊达尔戈的荒唐起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也许——我现在这样看——它不会遇到多大对抗①。

① 休·哈米尔著《伊达尔戈起义：墨西哥独立的序幕》(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66)，第220页。

对伊达尔戈的血腥起义的回忆使许多潜在的支持者不愿加入起义队伍。但起义没有被扑灭。卡列哈将军写给总督的报告说："暴乱远未平息，它会卷土重来，象九头蛇一样，头被砍掉后又会长出来"。①运动的领导权转移给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神甫和伊格纳西奥·洛佩斯·拉永，他们继续领导"低洼地区"起义的剩余部队。另外还有一批规模较小的起义领导者，有些是忘我的爱国者，另一些差不多是土匪头目。莫雷洛斯是远较伊达尔戈伟大的领袖和更有才能的指挥官。拉永在1812年1月的锡塔夸罗战役中威望受到损害后，莫雷洛斯终于被承认为起义的主要领袖。莫雷洛斯出生在米却肯一个贫穷的梅斯蒂索人家庭，年青时当过骡夫。他最终通过大学学习提高自己，成为一名神甫，被派到米却肯贫苦的印第安人教区。莫雷洛斯比伊达尔戈更接近印第安人，他在起义开始的头几个星期就参加了。他受伊达尔戈的派遣，将起义向南部海岸扩展。他建立了一支有效的、易于管理的小部队，这支部队成为保王派势力的主要威胁直到1815年。莫雷洛斯还在阐明起义的政治和社会目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些目标在伊达尔戈领导下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他的纲领内容是：独立（1813年宣布），议会制政府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贡税、奴隶制、等级制和对下层阶级提高社会地位的法律障碍，征收所得税。他是起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丢掉效忠国王权力的虚伪面纱，赋予瓜达卢佩圣母这个象征以更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他还主张将土地分配给耕种它的人，在一份有争议的文件中显然号召没收并重新分配敌人——富有者——的全部财产。为了缓和社会革命，他宣布天主教的绝对地位和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他还宣布尊重私有财产。他发表比较温和的声明，公开争取克里奥尔人的支持，但和伊达尔戈一样没有成功。

1812年春，卡列哈将军几乎扑灭莫雷洛斯的起义。他将起义

① 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阿兰戈伊斯—贝尔萨瓦尔著《墨西哥从1808年至1867年》（4卷集，马德里，1871），第1卷，第137页。

部队包围在库奥特拉阿米尔帕斯镇达72天之久，莫雷洛斯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准备进攻墨西哥城。莫雷洛斯和他的队伍5月1日突出重围，损失惨重，但没有被消灭。1812年11月，莫雷洛斯集结队伍攻占南部重要城市瓦哈卡，使他得以控制墨西哥南部大部分地区，并将自己置于权力的最高峰。他用1813年整个夏季夺取阿卡普尔科城，最后获得成功，但对大局无补。继夏末攻占阿卡普尔科之后，莫雷洛斯的军事命运开始走向衰败。他离开阿卡普尔科到奇尔潘辛戈去组织召开国民会议。这是他在政治顾问敦促下作出的决定。会议于1813年9月14日开始后，立即授予兹雷洛斯行政权力。国民会议的真正任务是建立某种正式的政府机构，争取得到外国承认。莫雷洛斯的政治顾问们说服他接受这种安排，以便消除对他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怀疑。国民会议于1813年11月6日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后，莫雷洛斯的军事力量迅速削弱。1813年12月，他进攻巴亚多里德失败，他原来希望将该城作为起义首都。1814年1月5日，他的退却部队在普鲁阿兰遭到又一次严重失败，主要指挥官之一马里亚诺·马塔莫罗斯被俘并被处决。与此同时，奇尔潘辛戈的小小的国民会议陷入内部争吵，伊格纳西奥·拉永争夺莫雷洛斯的最高权力。1月，国民会议被迫撤离奇尔潘辛戈，此后它就一直是一个流动的机构。1月22日，莫雷洛斯被迫向国民会议交出行政权力，实际上也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国民会议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伊格纳西奥·拉永、何塞·马里亚·科斯和胡安·内波穆塞诺·罗赛恩斯三人掌握。在此期间，瓦哈卡城回到保王派手中，莫雷洛斯的另一个主要副手埃梅内希尔多·加莱亚纳在一次小接触中阵亡。最后，1814年夏国民会议在阿帕钦甘安顿下来。这时君主专制制度已在西班牙复辟，国民议会在卡洛斯·马里亚·布斯塔曼特、安德列斯·金塔纳·罗和伊格纳西奥·拉永的影响下，10月间在这里发布了一部正式宪法，意在争取墨西哥自由派的支持。莫雷洛斯虽然作为国民会议成员，也是签名者之一，

但他对这部宪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阿帕钦甘宪法》建立三人执政制度，并禁止任何政府官员掌握军事指挥权，这些都是针对莫雷洛斯早先一人统治的。然而宪法没有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68 因为起义者不具备足够的印刷出版手段，无法广为传播。实际上，唯一替他广泛传播的倒是保王派的宣传品，他们为了谴责它引用它的内容。

起义者的国民会议在1815年大部分时间内不断迁移，逃避保王部队，它的安全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1815年9月，国民会议决定转移到东部海岸，需要整个起义者政府穿越保王派控制的地区。莫雷洛斯被指派在转移中担任掩护任务。11月5日，一支600人的保王部队追上了起义者队伍。莫雷洛斯保护会议代表，代表们在混乱中逃脱，但他本人被俘。他被押送到墨西哥城，受审后被判有罪。作为神甫他又受到宗教裁判所审讯，大主教管区法庭正式将他撤职。1815年12月22日，莫雷洛斯被押解到墨西哥城以北的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埃卡特佩克，由行刑队处死。

莫雷洛斯起义得到梅斯蒂索人的支持比印第安人多。它的作战技巧、组织性和政治目标都超过伊达尔戈的难以控制的印第安人暴动。莫雷洛斯赢得多次重大胜利，他阐明了革命的目标，倡议独立宣言，成立了国民会议使政府工作正常化。他使用组织良好、训练有素的革命部队作战，表现出高超的才能和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然而和伊达尔戈一样，他提倡的社会改革过于激进，使一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居民不愿参加。而且就在他积极领导运动期间，他不仅必须面对其他野心勃勃、不服从他领导的起义领导人——特别是拉永——还须对付一支重新组织得到加强的保王军队的对抗。1810年9月以后，已不再能象伊达尔戈对保王派搞突然袭击。

保王派领导——总督贝内加斯和他的主要将军及继任者卡列哈——不比新西班牙历史上任何领导逊色，尽管这两个人在贝内

加斯任职期间曾发生激烈争吵，主要是关于卡列哈采取极端军事措施迅速消灭起义的野心。贝内加斯同墨西哥城的的“半岛人”商人集团关系密切，因为他来这里当总督以前是加的斯市长，加的斯一直是西班牙与美洲贸易的主要中心。加的斯商人操纵着摄政会议时期的政府和议会（1810年时都在加的斯）。因此克里奥尔人有理由对贝内加斯产生怀疑，但他在半岛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是一名成功的军事指挥官，特别是曾参加西班牙获得重大胜利的拜伦战役，1810年当总督后态度正直和正确——所有这些使他赢得了胆战心惊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拥护。从1808到1810年，在在加里瓦伊和利萨纳担任总督的两年半内政权处于空白期，总督府的威望下降，而贝内加斯上任后制止了威望进一步下降。但是有一个错误克里奥尔人永远不能原谅他——尽管他只是按照加的斯政府的命令行事——那就是他一到墨西哥城，立即给加夫列尔·德·耶尔莫等推翻伊图里加雷总督的重要分子颁奖。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对当地居民的感情很不敏感，而西班牙的不敏感是臭名昭著的。以后许多年，西班牙议会中的克里奥尔代表一直把墨西哥人的独立愿望归咎于这次给伊图里加雷的专制主义敌人的不恰当的颁奖。从地区民兵队伍中吸收过来的起义者由于对伊图里加雷忠贞不渝也坚持这种说法，因为他曾重组民兵并授予他们新的荣誉。

同新西班牙历次起义作战的是总督政府。尽管总督辖区政权代表西班牙并效忠母国，然而由它制定大部分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由它将军队投入战场，提高税收，开展宣传运动，组织民兵，招募军队，甚至不理或回避西班牙王室的不适当命令。西班牙从来很少自己参加作战，大部分是墨西哥人打墨西哥人。与伊达尔戈作战的王室部队中95％是墨西哥人。战前在新西班牙全部事力量32,000人中，有战斗经验的西班牙仅10,620人。1812至1817年间，又有几支远征军从半岛来到新西班牙，有8,448人加入新西班牙军队（到1820年已扩充到85,000多人）。保王派军队的主力依然是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独立战争不是大局已定的

一面倒比赛，毋宁说，它是一场在效忠问题上酿成民族分裂、最后结果尚未定局的斗争，它是一场革命内战。

贝内加斯总督在许多方面重建了总督辖区政权并将其置于战争状态之下。对于一个曾经遭受伊达尔戈的“多洛雷斯呼声”意外袭击的政权，这个任务不轻。可是，仅仅三个月时间，保王派已经成功地证明起义是可以遏制的。“呼声”之后不久，贝内加斯已把现有老兵部队改组为12个防区，——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韦拉克鲁斯、巴亚多里德、瓦哈卡、萨卡特卡斯、圣路易斯波托西、普埃布拉、瓜纳华托、索诺拉、杜兰戈和梅里达——还改组了卡列哈的核心部队，委派有才能的西班牙人和高级克里奥尔军官指挥。他还迅速行动，组建新的地方民兵，充实各省军团和各市民兵。到1811年4月，所征新兵实际上都是为了使这些部队满员，结果商会、学校、政府机关甚至大学都被抽调人力。“墨西哥王室和教皇大学”的学生全部编入“爱国营”，大学的主要建筑由军队接管充作营房，致使这所大学实际上等于解散。到1811年8月，警察当局也着手编制征兵名册，并开始在工匠和城市下层阶级中直接征兵。甚至先前免除服兵役的纳贡税的印第安人似乎也在征集之列。卡列哈将军，(他不仅得到极端保王分子和“半岛人”而且也得到许多克里奥尔人的支持)。不断督促总督征集所有的欧洲人入伍(总督拒绝)，并指责墨西哥的“半岛人”拒绝作战。到1812年5月，贝内加斯和卡列哈之间的争执公开化。卡列哈在库奥特拉阿米尔帕斯包围莫雷洛斯之后(此战役代价高昂而收效甚微)，贝内加斯总督断定卡列哈的公开对抗是一个威胁，因而将核心部队解散。此后，卡列哈将军在墨西哥城定居，极端保王派和克里奥尔自由派趋之若鹜，都想争取卡列哈站到自己一边。这两派根本不同的追随者集团纷纷向西班牙提出请求，要求由卡列哈取代贝内加斯。

与此同时，贝内加斯总督实施了监视和控制平民的有效反起义措施。1811年初的两起密谋事件促使他在首都和其它主要城市

建立某种军事管制法。一起是在4月间，有人密谋绑架总督，强迫他下令释放在科阿韦拉被俘的伊达尔戈。这个事件表明在首府的主要克里奥尔人中间有一批可疑分子。第二起密谋，在1811年8月查获，结果逮捕并处决了若干密谋者。几名教会人士也受到牵连。关于谁有权审判他们的叛逆罪，在政府和教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贝内加斯最后同意准许卷入密谋事件的修士逃亡国外。总督对教士的怀疑，以及一些下层教士与起义领导有牵连，导致他于1812年6月25日颁布著名的“血与火”法令，取消被发现犯有叛逆罪的教会人士的一切特殊豁免权。他授权战场上的王室指挥官审讯所有起义的教会人士。这道命令严重冒犯了教会豁免权传统，不仅使墨西哥，而且也使西班牙感到震惊，因而未能在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付诸实施，但在其它地方得到执行。1811年8月的密谋事件后，贝内加斯在墨西哥城建立了一个新的警察和公安洪达，以代替并吸收1809年成立的类似名称的机构。这个公安洪达实行身份证制度和国内治安制度，授予这支新的警察部队在本地区法院审理案件和实行处罚的权力。治安制度一直实施到1813年西班牙政府下令废除为止，而身份证制度则在独立战争期间一直实行。

为支付日益扩大的军事费用，总督辖区政府先是号召个人自愿捐献和购买公债。1812年以前，这个办法从富有的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那里收集了大量捐款。1812年2月开始实施第一个强制性战时公债条例。贝内加斯总督开征食品特别税和10%的私人建筑及住宅税。卡列哈总督又开征其它一些捐税，其中有一种所得税，称为“强制直接捐”，对年收入超过300比索的人，按不同税率征收。卡列哈征收的新税还有车马税、增大的销售税和新的谷物税。最后，1814年卡列哈计划开征一种罕见的新税——义务彩票，主要由公务人员购买。显然由于公众的强烈不满，他被迫收回了彩票计划。

开征这些新税的同时，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因各地起义遭到普遍破坏，结果食品价格大涨，总督辖区政府债务猛增，从1813年

的4,900万比索增加到1816年的8,000万比索。尽管开征新税使王室政府幸免财政崩溃，但它们抑制了生产，搅乱了私营企业的正常经营，增加了成本，降低了利润，限制了恢复矿山和农场所需的私人资金。矿山代表团（矿业法庭的地区分部）被迫支付矿区驻军的费用，还要负担重点护送金银的护航税矿主和工人纷纷抛弃矿井，抽走资本，信贷缺乏，提炼白银所需的水银供应不足，价格高昂。结果，铸成硬币的黄金白银的平均年产量从1800—1809这十年的2,250万比索下降到下一个十年的1,130万比索，几乎下降50%。这个殖民地19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进出口贸易比头十年下降1/3以上。根据当时的记载，农业生产和国内工业生产也猛烈下降。这些后果除战争的直接影响外，同样也是由政府的税收政策和保王派的横征暴敛造成的。

72

西班牙在西属美洲商业上继续奉行排外主义，这种政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害很大。英国非常希望获得合法进入墨西哥市场的权利，但是所有与西班牙达成正式协议的努力均无结果。例如，英国曾建议出面调停墨西哥起义，以交换贸易许可。西班牙以起义政府没有控制那个地区为由，断然加以拒绝，但是实际上从1811至1820年它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格拉纳达两地多次谈判英国调解问题。总是这一方或那一方使谈判破裂，当时西班牙依然坚持贸易垄断，虽然实际上西班牙船舶早已从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上消失。西班牙经过古巴与墨西哥的直接贸易一直延续到最后，尽管贸易水平逐步降低。墨西哥与秘鲁不同，它以未彻底断绝与西班牙的航运，因而同外国的贸易是隐蔽进行的。

卡列哈于1813年3月4日就任总督。在他的统治下，征兵和捐税继续增加，到1813年中，新西班牙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一个军事政权。这时莫雷洛斯起义如火如荼，正是保王政权最危险的时期，同时，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瘟疫流行，仅墨西哥城一地死于1813年瘟疫的达2万人之多，占全城人口的1/8。而执行1812年西牙班宪法所引起的政治混乱也使恢复秩序和收复失地

的工作大大复杂化。

除各地起义之外，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西班牙议会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西班牙议会统治西班牙和西印群岛从1810年9月直至1814年5月费迪南七世复位为止)。议会的改革包括废除印第安人的贡税和宗教裁判所，给予海外国民平等地位，严格限制教会权力，实行出版自由。1812年，西班牙议会又在改革纲领之外通过一部成文宪法。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基本上也是今后西班牙各部宪法和1824年第一部墨西哥共和国宪法的先导。这部宪法1812年3月在加的斯颁布，同年9月在墨西哥正在公布，从而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受限制的君主立宪国家，把国王降低到行政首脑的地位。议会和国王(在他被俘期间由摄政会议代表)分别构成政府的立法和行政两个部门，倘若国王从法国被释回国，将要求他在恢复王位之前首先接受这部宪法。总督和省长成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政治首脑”。各省代表团*由选举产生，和政治首脑分享权力，世袭的市政委员会改由选举产生。从法律上讲，新西班牙总督对那些已有自己的都督的地区已无管辖权——如东部和西部的内地各省、新加利西亚和尤卡坦。检审法院则降低到一般法院的地位。

墨西哥的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议会反应热烈，派出一些杰出代表前往加的斯。到1811年，墨西哥的代表已成为议会中美洲代表团的领导人。他们中间知名度最高的有米格尔·古里迪—阿尔科塞尔(特拉斯卡拉)、何塞·米格尔·拉莫斯·阿里斯佩(科阿韦拉)和何塞·米格尔·戈多亚(萨卡特卡斯)。他们积极倡议在宪法中写进更自由的条款。但也有一些墨西哥代表是重要的保守派，著名

* 按照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文的分析，省代表团(provincial deputations)从它的权力和职责的性质来看，相当于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国王任命的省长同代表团一起工作，任省代表团的主席。——译者

的有安东尼奥·华金：佩雷斯（普埃布拉）和何塞·卡耶塔诺·德·丰塞拉达（米却肯）。

74 13名墨西哥代表签署了一份建议书，1811年8月1日由各美洲代表团联合递交议会。建议书评价了独立斗争的起因，提出了解决办法。谈到墨西哥的起义时，代表们认为伊达尔戈起义的原因是一小批欧洲人推翻伊图里加雷，后来这些人还受到贝内加斯总督的奖赏。他们宣称，每个海外殖民地都应在国王的宗主权统治下分别设立自己的政府，组成自治共和国联邦。这个提议议会当然没有接受，因为尽管自由派在议会中占支配地位，但议会设在加的斯城内，实际上靠垄断商人提供财政收入维持西班牙的国家生存。议会尽管有自由主义思想，但它的政治倾向仍是欧洲式的，继续将海外领地视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墨西哥代表还和所有美洲和亚洲代表一起向议会提交一份建议书。建议书包括关于海外领地实行改革的11条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西班牙议会实行平等的比例代表制*，自由对外贸易，禁止所有的国家和私人垄断组织，自由开采水银矿，美洲人享有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平等权利，每个领地分配一半行政职位给当地出生的居民，在美洲恢复耶稣会教士的地位——上述要求没有一条为议会接受。

墨西哥的专制主义保王派将西班牙议会视为对西班牙人的权力的一个主要新威胁，因为它鼓励克里奥尔人的政治觉醒。结果，贝内加斯总督采取的做法是，有选择地执行议会的改革法令，其余法令不予执行。卡列哈总督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使总督感到恼火的第一个议会法令是实行出版自由。这项法令西班牙议会1810年11月通过，墨西哥城1811年1月收到。法令宣布，除有关宗教事务的出版物外，人人皆可自由发表政治观点，无需政府当局事先批准。贝内加斯完全拒绝执行，他确信在墨西哥的条件下，这项法令只会鼓励叛乱。他坚持了两年，不发表有关这项法令的消

* 当时西班牙每7万人（另一说是5万人）选一名议会代表，殖民地每50万人选一名代表。——译者

息，于脆置之不理。他征求教会上层和政界领导人的意见，多数人建议他不要执行。在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克里奥尔人提出抗议。议会代表拉莫斯·阿里斯佩在加的斯领导这场斗争，要求命令总督实行出版自由。墨西哥城的市政委员会抱怨贝内加斯拖延不办，指责他暴虐专横。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出版自由在墨西哥始终未能贯彻。直到1812年9月颁布宪法。没有一个权力机关，甚至西班牙议会，有力量迫使总督贯彻这项法令。

随着自由主义宪法在墨西哥颁布，持不同政见的克里奥尔人大为兴奋，以为宪法将保证他们对当地决策有更大的发言权。出版自由是宪法中的一项主要条款，不能再加抵制，也就自动地实施了。在报刊上批评西班牙制度的新闻工作者中有出版《小玩具》杂志的卡洛斯·马里亚·布斯塔曼特和出版《墨西哥思想家》杂志的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两人都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但都没有被宣布为反叛者。实施出版自由3个月之后，贝内加斯总督觉得他已经看够了。1812年12月5日，同检审法院商议后，他中止执行宪法第371条——出版自由条款。1813年3月卡列哈继任总督后，继续中止执行该条款，尽管他担任总督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声明承诺完全执行宪法。直到1814年6月，他发表声明宣布，他继续中止执行出版自由条款是为了防止叛乱蔓延。西班牙议会代表和市政委员会再次要求实施该条款，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动摇这位总督的决心。布斯塔曼特逃亡躲藏起来，并公开宣布支持起义者；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被捕入狱。

这两位总督对宪法要求举行的选举同样采取专制态度。1812年11月29日，墨西哥城举行第一次教区投票，选出若干选举人，然后再由选举人选出新的市政委员会。选出的选举人全都是克里奥尔人，有几个还是著名的起义支持者。坚决支持独立的秘密组织“瓜达卢佩人”的一些成员写信给莫雷洛斯说，选举结果意味着伽秋平人的政府即将灭亡。12月14日，贝内加斯总督宣称发生

了许多非法行为，选举结果无效，并命令墨西哥城的世袭市政委员会继续留任。对总督的这一突然打击，克里奥尔人没有作出反应。事实上，并未发生什么非法行为，贝内加斯只是玩弄了一种十分拙劣的政治手腕而已。卡列哈当上总督后就没有那么笨拙，他的做法是，故意不重视宪法机构，但对温和派不采取专横行动，以免引起他们的喧嚷。他命令继续完成流产的市政委员会选举。1813年4月，选举人选出了新的市政委员会，全部由克里奥尔人组成。总督宣称，他们中间3/4是起义的同情者。接踵而来的是选举省代表团和西班牙议会代表。可是，自卡列哈就任之时起，到第二年废止宪法时止，他始终干预当地的选举，试图影响选举结果，或者巧妙地拒绝当选团体的建议。他已不再拥有总督的官衔，但依然像总督那样行事。西班牙议会并未对他进行指责，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在1813年晚些时候甚至还建议在墨西哥建立军人政权对付莫雷洛斯的威胁。卡列哈并不需要这样的支持，因为他早就象军人独裁首脑那样行事了。缴获的起义者的文件表明，市政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在支援起义问题上有牵连，卡列哈对墨西哥城按照宪法选出市政委员会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检审法院坚持认为当选官员都是独立的鼓吹者。卡列哈经常抱怨说，他打算将叛乱的可疑分子送去审判，但受到宪法程序的阻挠。直到国王复位以后，他才能对那些自由派克里奥尔立宪分子（他怀疑这些人犯有叛国罪）提出起诉。1815年废除宪法后，卡列哈逮捕了墨西哥城一些著名的克里奥尔领导人，包括4名前市政委员会委员和3名已经当选但没有让他们前去出席的西班牙议会代表。

76

到1814年，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已广泛蔓延。极端保王分子继续将西班牙议会和宪法看成维持王室权力的最大威胁。卡列哈在致西班牙政府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和检审法院已经商定，他应继续作为总督行使职权，而不单是最高政治首脑；他是西班牙国王的个人代表并以此身份活动。当时，大多数克里奥尔人认识到议会和先前各级政府一样，是支持君主制的，宪法也并未明显改善

他们的地位。

法国在西班牙的统治崩溃后，1814年3月，拿破仑释放了费迪南七世。他在法国被囚6年，现在终于回到了西班牙。5月4日，他在巴伦西亚发表长篇宣言，废除1812年宪法和加的斯议会颁布的一切法律。王室的这个突然行动8月间在墨西哥宣布，那里的保王当局兴高彩烈，欢呼君主专制制度复辟。(莫雷洛斯领导的起义者以颁布他们的《阿帕钦甘宪法》作为回答。他们希望这部宪法会赢得克里奥尔自由派的支持。)到1814年末，一系列法令又把政府恢复到1808年的状况。选举产生的机构被取缔，世袭的市政委员会又恢复工作，检审法院、总督和都督恢复了他们的权力。1815年，甚至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也都恢复了。

1810—1814年间的这些事件具有头等重要性，但西班牙议会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为美洲人表达对旧政权的不满情绪提供了讲坛。几乎没有一个墨西哥代表不被议会辩论以及在自由、激进的西班牙的强烈气氛中进行的政治活动所感动。1810—1814年间参加西班牙议会的大多数墨西哥人，当议会在1820年重新成立时又回到了西班牙，后期议会(1820—1823)的许多代表在独立后的第一届墨西哥政府中担任部长和领导人。

1808至1814年西班牙帝国的大变动也反应到危地马拉领地(中美洲)。危地马拉领地由一名总都督和一个检审法院在危地马拉城进行统治。它包括危地马拉、恰帕斯(独立后加入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是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最北面的省份，独立时归入南美洲，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1786年，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恰帕斯已相继建立监督官辖区；哥斯达黎加是尼加拉瓜监督官辖区的一个部分；危地马拉未纳入监督官辖区系统，而由首府的都督直接管理。危地马拉领地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存系统的意识，尤其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建立监督官体系就是为了适应这种

意识。中美洲在19世纪初约有人口125万，其中一大半是印第安人，其余大多数是拉迪诺人(ladinos)，也就是各种不同混血程度的梅斯蒂索人或穆拉托人。和新西班牙一样，一小撮白人控制着政府和经济，其中欧洲出生的白人只占极小比例。危地马拉在18世纪末也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鼓舞，特别是在圣卡洛斯大学，大多数克里奥尔领导者都是这个大学的毕业生。1796年，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创办了一个宣传改革思想的中心“国家之友经济协会”。协会从1800至1811年间被取缔，但仍发挥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这个改革者团体的代表人物有洪都拉斯律师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萨尔瓦多种植园主和商人胡安·色蒂斯塔）伊里萨里、报纸编辑亚历杭德罗·拉米雷斯和西蒙·贝尔加尼奥—比列加斯，还有《危地马拉日报》发行人伊格纳西奥·贝特塔。

在中美洲上层人士中间没有关于政治独立的理论，他们的主要愿望是改善本地的贸易、航运和农业墨西哥的伊达尔戈起义在这个阶级和王室行政官员中曾引起广泛的关注。1801至1811年担任第34任危地马拉检审法院院长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莫利内多—萨拉维亚，1811年奉命去墨西哥帮助镇压起义，被起义者俘获身亡。他的继任者何塞·德·布斯塔曼特—格拉(1811—1818)在许多方面奉行与卡列哈总督同样的政策。布斯塔曼特也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必须按照1812年宪法管理国家而他本人又反对这个宪法。和贝内加斯和卡列哈一样，他仅在字面上执行宪法而不贯彻它的精神。他也阻挠贯彻出版自由，干预选举并企图压制当选市政委员会和省代表团的政治倡议。他两次拖延省代表团会议的召开，直到1813年晚些时候。1812年宪法引起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新的争论，导致了和墨西哥相类似的政治骚动。它大大鼓舞了联邦制精神在中美洲的发展，恢复了被取缔的经济协会的活动，在危地马拉城和莱昂建立了两个省代表团，在较大城市选出了市政委员会，通过了在莱昂成立一所新大学的法令。中美洲代表积极参加西班牙议会的讨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们是墨西哥

代表团的合作者。最杰出的中美洲代表是安东尼奥·拉腊萨瓦尔，1811年，他按照危地马拉城市政委员会的指示，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要求，主张政治自由，实行选举和代议制政府，放宽商业限制，促进生产和教育，实行出版自由和成立中美洲最高洪达。其他中美洲代表，如弗洛伦西奥·卡斯蒂略（哥斯达黎加）何塞·伊格纳西奥·阿维拉（圣萨尔瓦多）、曼努埃尔·德·米切奥和何塞·克莱托·蒙铁尔（危地马拉）、马里亚诺·罗夫莱斯和费尔南德·安东尼奥·达维拉（恰帕斯），则特别强调他们长期被忽视的省份的要求，包括改善港口、运河、河流系统以及今后发展内地所需要的其它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大学和高中等。克里奥尔代表的愿望主要是为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利益服务，但是像大多数其他美洲代表一样，使用的都是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语言。这时，布斯塔曼特政府站在新西班牙商人利益集团、纺织品制造商和小土地所有者一边，反对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利益。这样议会时代在危地马拉第一次出现了政党的临时性组合，富有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发现他们的利益受到欧洲人和身份较低的克里奥尔人新政府党派的反对。西班牙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是争论的关键性因素，这时布斯塔曼特奋力抵制从英国在危地马拉东海岸的立足点伯利兹源源不断流入的英国廉价棉花。克里奥尔贵族党派的领导人是艾西内纳家族。艾西内纳家族虽然不是独立的鼓吹者，却是宪法的热情支持者。何塞·德·艾西内纳是前圣萨尔瓦多监督官，1812年成为西班牙宪法规定成立的枢密院* 的成员。他是达到如此高位的第一个危地马拉人。

79

当时中美洲没有发生群众性起义，但议会时代的激情也触发了四次较小的起义或密谋。1811年11月在圣萨尔瓦多发生暴乱，要求建立独立的主教管区；1811年12月在格拉纳达发生暴乱，反对莱

---

* 根据1812年宪法规定，枢密院是国王下面的唯一的私人会议，共有40名成员，其中有4名教士代表，4名西班牙大贵族，其他是重要行政官员。——译者

昂的政治控制和监督官的苛政；1814年1月圣萨尔瓦多在莫雷洛斯起义的鼓舞下再次发生起义。曼努埃尔·何塞·德·阿尔塞（他后来担任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这两次圣萨尔瓦多起义的主要人物。最重要的密谋事件1813年12月发生在危地马拉城，中心问题是关于贝特莱姆教派问题，但在采取行动前被察觉。所有这些叛乱都被布斯塔曼特政府迅速镇压。

布斯塔曼特对废除西班牙议会和宪法同卡列哈一样兴高彩烈，或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1814年早些时候，西班牙议会曾下令撤消他的职务。他立即开始有步骤地迫害在艾西内纳派内[80]的克里奥尔自由派和危地马拉城的市政委员会——事实上，所有在1810年同意市政委员会向拉腊萨瓦尔发出指示的人都遭到迫害。根据他的建议，国王同意将所有签字者撤职。拉腊萨瓦尔在西班牙被捕入狱，这是专制制度反扑的一部分。1817年以前，艾西内纳家族成员和其他一些人都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权利，他们被撤消市政委员职务，被控拖欠税款，而且政府不予保护。这些做法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都督和目前时运亨通的垄断商人的不满。甚至《危地马拉日报》也在1816年被勒令停刊。现在主要的克里奥尔家族开始同因政治观点或出生地点问题而不被任用的贫穷的克里奥尔专业人员（letrados）逐渐建立联盟，这个“第一流家族”和志愿从政的贫穷克里奥尔人的联盟后来在1821年把危地马拉引向独立。不过，只要布斯塔曼特在位一天，危地马拉就处于严厉控制之下，政治上就会无声无息。

艾西内纳家族不停的抱怨，频繁地在他们和半岛上的西班牙商人盟友的通讯中表达出来，也由现在担任西印度群岛政务委员会委员的何塞·德·艾西内纳表露出来，到1818年终于产生了效果。布斯塔曼特的检审法院院长兼都督的职务改由卡洛斯·乌鲁蒂亚—蒙托亚担任，他是个年纪较大、态度温和的军官。乌鲁蒂亚在他离开圣多明各的职位前，就已被克里奥尔贵族包围，到达危地马拉城以后，就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乌鲁蒂亚到任后，奉行

他认为可以防止走私的商业政策，但实际上这样做正合那些主张开放贸易的克里奥尔上层人物的心意。1819年他批准与英国占领的伯利兹开展贸易。他放松了布斯塔曼特的沿海缉私活动，这样不仅鼓励了走私，还引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格拉纳达起义政府的南美洲私掠船第一次进入中美洲海域进行劫掠。此外，当1820年重新颁布宪法时，乌鲁蒂亚对它持友好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危地马拉还是墨西哥镇压早些时候的起义后上台的行政当局，政治上都比较宽松；他们无意中助长了持不同政见的克里奥尔人重新开始政治活动。废除宪法后，新西班牙的卡列哈总督发誓要扑灭起义，即使要他带领全军踏遍全国，使整个土地遭受战火蹂躏也在所不惜。结果，他用1814年下半年和1815年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全力镇压起义。他取得很大成功，俘获并处决莫雷洛斯后各地起义渐告平息，只剩下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和文森特·格雷罗等少数几个首领，或者没有追随者，或者只有小股人员，靠偷窃牲畜抢劫财产为生，对政权已不构成严重威胁。但有些王家指挥官担心游击队已转入地下。从1820和1821年运动又迅速兴起的情况来看，这种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当卡列哈1816年9月16日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时，革命已经失败而且声誉扫地，他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庞大军队，有新捐税提供收入的组织健全的国库在护航队保护下重新组织起来的民间贸易和正规的邮政系统。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作出结论说："如果西班牙不是由于后来的事件失去对这些国家的统治，卡列哈将被看成新西班牙的再征服者和第2个埃尔南·科尔特斯。"① 卡列哈在新西班牙居住和工作27年后，离开了墨西哥。他敦促他的接任者继续使用他的平定国家的办法。

① 卢卡斯·阿拉曼著《墨西哥史——从1808年第一批准备独立的运动至当代》（5卷集，墨西哥，1942），第4卷，第308页。

新总督胡安·鲁伊斯·德·阿波达卡认为，在1816年末最好奉行和解政策和实行大赦，希望能在各阶级之间，墨西哥和宗主国之间恢复正常的政治关系。阿波达卡对前起义者实行大赦的建议被成千上万的人欣然接受。直至1820年，阿波达卡必须对付的唯一的一次起义威胁是1817年哈维尔·米纳的流产尝试。他是一个对政府不满的西班牙自由派，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在海岸登陆为独立而战。米纳被俘并被处决。王室政权的另一件紧急事务是1817—1819年间关于签定割让佛罗里达条约的谈判延而未决，出 82 现了与美国发生战争的明显危险。1816年作为古巴都督，阿波达卡曾下令舰队进入战备状态，现在作为墨西哥总督，他更加担心。北美入侵东部内地各省或古巴的可能性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人们早已看到美国人在得克萨斯扩张的威胁，卡列哈将军就任总督以前，就提出过在争议地带屯驻墨西哥民兵的计划。在1819年缔结的佛罗里达条约中，美国承认了明确的边界，懦弱的西班牙认为这是美国作出的巨大让步。但是尽管存在这些边界纠纷，墨西哥内部局势已迅速稳定。阿波达卡自豪地看到商业已逐渐恢复正常，长期废弃不用的邮路重新开放，正常的白银护航运输已能穿越过去的起义地区，甚至废弃的白银矿又重新开采。

西班牙本来也许可以恢复它对新西班牙的控制，但是它没有恢复过去的全部威信。事实上，由于宠臣戈多伊长期专权，费迪南推翻其父查理四世，拿破仑篡夺王位，议会的建立以及费迪南七世复位以后他本人顽固的专制制度等原因，国王的威望早已受到致命的伤害。然而，君主制度的观念依然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墨西哥、尤卡坦和中美洲独立的妥协方案的基础。法兰西和北美共和国是侵犯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美洲人切身利益的实际或潜在的侵略者，他们的革命模式足以使大多数政治上的温和派感到害怕，从而抛弃共和主义理想。同时，殖民地的上层人士继续认为，和迄今为止他们所见到的其它制度相比，还是君主制度同他们的利益具有基本一致性。现在缺少的是这样一个方案，它既

能打破殖民地对西班牙的依附，又能保证某种程度的社会稳定和个人财产安全，又能逐步走向参与政权。也就是说，需要一个温和的独立妥协方案，不同于伊达尔戈、莫雷洛斯等先前的起义者所提供的方案。同时需要某种催化剂来推动上层人士和资产阶级采取一致行动。

1820年1月至3月的西班牙革命成了这种催化剂。当时在加的斯集合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约14,000人），在前总督卡列哈（现任安达卢西亚都督）指挥下，待命出发再次征服拉普拉塔河地区。部队举行起义反对费迪南七世的专制政权。西班牙全国各部队纷纷响应，起义的原因是，军队对1814年后大量武装部队复员的政 83 策长期不满，但1820年革命迅速吸引了半岛上不断增多的自由派团体的支持。支持起义的是一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如共济会的秘密成员、所谓的“1812年人”（doceañistas）也就是1812年在加的斯进行革命实验的自由派、极端激进派（exaltados）、流亡在外的亲法派（afrancesados）即1808—1814年法国统治的前合作者以及其他反对费迪南的暴虐专制制度并赞成革新的分子。这次反对派运动几乎没有一个问题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恢复1812年宪法这个最显著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了。国王惊恐万状，他没有军队支持，别无选择，唯有依从，在今后三年中接受自由主义议会的控制。

1820年革命和远征军未能离开西班牙，保证了拉普拉塔河地区和智利的独立。秘鲁总督拒绝保王部队增援，因为他已经预见到西班牙这块最忠诚的殖民地的陷落。西班牙革命也给欧洲其它国家反对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注入新的生命。在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西班牙模式为榜样的立宪制度也很快在革命和内战中建立起来，这两个王国由于和西班牙交往频繁，联系最为密切。由此可见，西班牙革命的影响扩及欧洲和美洲。

在西班牙本土，以国王名义并经他批准（虽然是被迫的）恢复了宪法。这意味着这次和1812年不一样，宪法得到充分贯彻实施。

国王第一次按照宪法的要求主持行政部门工作。在此后3年中，西班牙时时出现议会危机，因为费迪南充分行使他的宪法权利，不断委任部长和都督，同温和派和激进自由派发生直接争执。在所谓的“三年期间”政府几度更迭，动荡的政局使帝国(或者不如说所剩无几的帝国)陷于瘫痪。最后，1823年初，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派遣一支法国军队前来援救费迪南。法军侵入西班牙领土，摧毁了自由制度。内阁挟持费迪南七世(他实际上已成为俘虏)逃往塞维列被称为“圣路易之子”的10万法国部队在许多地区象解放者那样受到西班牙保王派的欢迎。1823年6月，自由派再次挟持国王从塞维列撤退到加的斯，有些人甚至考虑要处死国王。立宪派在西班牙自由主义的传统堡垒加的斯港被包围了两个月，最后终于投降。费迪南第2次恢复行使他的全部权力。他的统治后期(1823—1833)，被称为“不祥的十年”。国王在半岛上实行白色恐怖，处决并监禁自由派领导人，更严酷地重复1814年的反动统治。

1820年西班牙革命在墨西哥如同在西班牙帝国其它地方一样，也产生了重要政治影响。1820年6月，1812年宪法再次付诸实施。8月间，各市政委员会、各省代表集团和西班牙议会代表都已选出。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和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当选，他们都是自治主义者。阿波达卡没有象他的前任那样对当地选举设置障碍，而是对实施宪法给予充分合作。国王在一份7月间在墨西哥发表的声明中，对他1814年废除宪法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同时请求他的臣民不要抓住这个判断上的错误来反对他。这种声明只能摧毁美洲人对国王已经动摇的信任。

宪法的恢复向墨西哥(和中美洲)最后证明，国王和宗主国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从而引起了独立的最后行动。墨西哥独立并不象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由于上层人士中的反革命保守主义。因为总的说来，墨西哥人象1812年一样，是支持恢复宪法的。还不如说原因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是证明西班牙人口是心非，是

旧政权与自由主义新制度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这些向墨西哥人表明，西班牙帝国的控制现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利益是不利的。他们继续拥护宪法；许多人走向独立，的确仅仅是因为宪法似乎是保证他们获得宪法授予的权利、保护它不被总督的暴政一点一点剥夺掉的唯一可靠的道路。墨西哥、中美洲和尤卡坦选择独立的道路，是因为独立方案保证实施加的斯宪法。墨西哥社会中那些主张温和改革和君主立宪制的人如今取得了胜利。这些目标同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革命的激进目的相比的确是保守的，但它们未必是反动的。墨西哥已经拒绝过印第安人或梅斯蒂索人革命的激进主张。上层人士和资产阶级认识到，新近恢复的西班牙议会，尽管对半岛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采取了激进的改革纲领，但是对美洲人的主要不满仍未采取任何行动。议会仍不承认美洲人的自治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仍不允许美洲拥有平等代表权（因为非洲人后裔没有选举权）。所以，墨西哥拥护宪法超过拥护议会，议会政府依然是个拥护帝制的政府。

随着影响教会和军队地位的根本性改革的提出，对议会的做法的不满加剧，尽管这些改革并未在墨西哥立即实施。1820年9月，议会颁布法令，取缔隐修院修会，限制托钵修会的发展，取缔耶稣会，对一切财产禁止限定继承，禁止民间和教会团体进一步购置不动产，废除教会特权（fuero）即民事诉讼豁免权，废除在美洲服役的民兵的军人特权（fuero）。这些的确是重大改革。教士和民兵军官强烈反对。如今民兵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各省民兵已达到22,000人，城市民兵已达到44,000人，它的权力已扩展到全国，民兵军官已掌握对大地区和地方的政治控制。议会还发布命令，规定民兵应服从当地民选的洪达和市政委员会，甚至还规定当地首脑不得掌握军队指挥权，除非他同时被授予都督的权力。这些规定推动一些过去曾在保卫王室政权方面起过主要作用的团体支持独立。

于是，对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地统治产生了普遍的不满，

而且由于阿波达卡实施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不满公开表达出来。但是这种独立趋势并不是旨在阻止实施议会改革的反革命。事实上，由于爆发新的起义，议会在1820年末颁布的许多改革法令在墨西哥并未充分实施，到独立以后才得以贯彻，包括解散宗教裁判所，耶稣会和医院骑士团；没收以上各教派、菲律宾传道会和耶路撒冷十字军的财产；没收向流亡者支付红利的教会资金；废除财产限定继承。第一届独立政府比西班牙议会走得更远，它还建议废除公民身体的种族差别、政府职位向所有公民开放、废除奴隶制等。某些军官在独立后甚至自动表示愿意放弃军人特权。墨西哥的独立力量并不反对宪法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独立方案——"伊瓜拉计划"赞成宪法，并一直实行到1822年12月。独立以后，墨西哥颁布法令宣布，在恢复议会和宣布"伊瓜拉计划"期间通过的所有西班牙法律(包括1820年 9 月颁布的反对特权(fuero)、宗教教派和限定继承的法律)一律有效。

因此，所以要实现独立，是因为这个得到恢复的立宪政权表明，西班牙的王冠和圣坛的帝王之尊已不复存在，因西班牙的护宪自由派仍然一心一意要使美洲领土继续处于殖民地依附地位。这种状况使长期以来对西班牙统治的一切不满重新提了出来。这些不满如果在专制制度下是确实存在的话，在自由主义制度下就能更深刻地感觉到。此外，在半岛上温和派和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造成的政治混乱提醒墨西哥，宪法在西班牙本土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必须在墨西哥采取断然措施来维护它。从现有舆论倾向来看，墨西哥只需要一个有吸引力的政治方案，即能把舆论争取到独立这一边来。

第一次使独立成为一种可能选择的政治计划是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这个计划由他和起义领导人文森特·格雷罗共同发表，1821年 2 月24日公开宣布。伊图尔维德公开背叛他的忠诚誓言，发动了一次新的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他长期担任王室军官，早先曾在反对墨西哥起义的几次重大战斗中指

挥作战，参加过击败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起义的战役，1816年因涉嫌滥用权力和不正当行为被撤消指挥官职务，1820年阿波达卡总督恢复他的显要地位，任命他为王室军队南部指挥官，受命去击败仍然在那里活动的格雷罗。到1820年12月，伊图尔维德转向独立事业，个人动机显然是由于对他过去的功绩缺乏奖励感到愤怒，其他参加过击败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的克里奥尔军官和半岛上的部队同样也感到愤怒。费迪南七世拒绝对美洲或半岛部队进行任何特殊任命或奖赏，结果为此付出了1820—1821年间在本国和海外发生军事叛乱的代价。

在“伊瓜拉计划”的条款中，新西班牙成为一个单独的天主教君主国，在制订出墨西哥新宪法以前，执行加的斯宪法；请求费迪南七世登极为皇帝，如果他拒绝，则请他的两个兄弟中的一个称帝；召开墨西哥议会，召开前成立临时最高洪达，随后成立摄政会议。这个新政府保证天主教会继续存在、实行独立、西班牙人和美洲人联合。这三项保证表达在“宗教、独立、联合”的口号中。这三条将由“三保证军队”(Ejercito Trigarante)予以保护，这支军队由起义者和愿意宣誓忠于“伊拉瓜计划”的前王室军队成员组成。所有的人和财产都得到尊重和保护。保留教会的特权，所有政府、教会、军队人员如果接受这个计划，他们的职位将得到保证。作为对不受约束者的最后姿态，“伊瓜拉计划”甚至赞扬西班牙是英雄和宽宏大量的宗主国。“伊瓜拉计划”宣布的最高洪达成员有高级教士、贵族、军官、市政委员会委员、教师和检审法院法官，其中有保王派，也有起义者。计划提议由总督任洪达主席，被拒绝。

伊图尔维德在“伊瓜拉计划”中提出的政治和解使独立成为

的愿望。教士和军人也衷心支持，因为计划保证他们的状况不会恶化，甚至还有迅速高升的希望。而富于献身精神的起义者现在 88 跟他们以前的对手找到了共同的事业，看到如今独立已非空想，新国家虽不象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共和国，但毕竟是个改革。“伊瓜拉计划”形成了一个新的（即使是暂时的）西班牙帝国制度难以抵挡的政治联盟。经过11年战乱以后，如今墨西哥终于获得了共识。后来中美洲和尤卡坦也先后以相似的方式对“伊瓜拉计划”作出响应。

“伊瓜拉计划”公布后仅7个月，总督政权即告瓦解。半岛保王派对这次新的起义感到出乎意料，但无力进行抗拒。不久，伊图尔维德通知阿波达卡总督，“伊瓜拉计划”将以破竹之势席卷全国，结果确是如此。被赦免的起义分子都出来支持伊图尔维德，保王派军队哗变投奔他，克里奥尔人热烈响应他的号召，驻军一批接着一批不放一枪就投降。6月，他的部队攻下了富饶的“低洼地区”，即伊达尔戈起义的心脏地带。在墨西哥城，“伊瓜拉计划”大量散发，大批部队投诚。阿波达卡总督在他的军官的催促下，暂停若干基本宪法保证，以便对抗起义者。他这种做法使克里奥尔人更加不满，他们认为伊图尔维德保证贯彻加的斯宪法，而总督却危及宪法的实施。根据上述理由，墨西哥城的市政委员会公开宣布不再支持王室政权。到6月底，起义者已控制大部分主要城市的驻军。7月和8月，其它城市大部分实行倒戈，保王派控制的只剩下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1821年7月5日，某半岛部队哗变，因阿波达卡总督镇压伊图尔维德起义不力将他免职，取代他的是原炮兵部队副总监弗朗西斯科·诺韦利亚，为反对独立作最后顽抗。

7月底，西班牙议会新任命的新西班牙都督、自由派前陆军部长胡安·奥多诺胡抵达韦拉克鲁斯。他承认既成事实，要求同伊图尔维德谈判。伊图尔维德同意，并指定韦拉克鲁斯附近的科尔多瓦村为会议地点。8月24日，伊图尔维德和奥多诺胡签订科尔瓦多条约。奥多诺胡认识到抵抗已无济于事，未经西班牙的许可，

单方面承认墨西哥帝国的独立，并且作为都督，自任为王室部队首脑，同意敦促部队投降。两人和“三保证军队”进驻墨西哥城郊，9月13日诺韦利亚向奥多诺胡投降，完成了基本上未流血的伊图尔维德起义和独立的过程。伊图尔维德等待到9月27日他38岁生日那天，以新政府首脑身份，胜利进入墨西哥城。他成为墨西哥帝国的摄政会议主席。官方的想法认为(一些新出现的政治人物不同意)，这是1521年被西班牙征服的前墨西哥帝国的重建。

在尤卡坦，1820年恢复实施宪法也在克里奥尔改革派和自治派(他们控制着梅里达和坎佩切的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和省代表团)以及一个被称为“圣胡安协会”的自由派团体中间引起了广泛的热情。1820年6月，他们敦促1815年以来一直掌权的80高龄的都督米格尔·德·卡斯特罗·阿劳斯辞职，而支持自由派和共济会会员马里亚诺·卡里略上校上台。卡里略排挤掉省代表团主席，安插进他的伙伴、温和的立宪派保王党人胡安·里瓦斯·贝尔蒂斯。这种做法引起同激进改革派的公开冲突。结果，西班牙议会在1821年1月派来了新都督胡安·马里亚·埃切韦里。直到1821年8月，埃切韦里才得以宣称大多数尤卡坦人不支持独立，尽管伊图尔维德起义在墨西哥建立了先进国家。在此期间，有势力的省代表团，不顾西班牙和墨西哥城三令五申加以禁止，采取步骤取消烟草专卖，继续与牙买加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存在已有6年之久，大部分是非法的。尤卡坦人感觉到他们在西班牙议会建立的政权下已有所获，因而对伊图尔维德起义的最后阶段抱着袖手旁观的消极态度。同墨西哥城的交通被切断后，关于民事、司法和财政上的事，他们就跟危地马拉城的王室当局商量。但伊图尔维德不是个能轻易打发的人。8月间，塔瓦斯科居民热烈欢迎“三保证军队”省代表团收到奥多诺胡签订科尔多瓦条约的消息后，提议9月15日在梅里达召开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宣布尤卡坦脱离西班牙独立，但西班牙都督埃切韦里仍担任行政首脑；伊图

尔维德的政府如果保证尊重西班牙宪法确立的公民自由权利，它将得到承认。由于墨西哥许诺（在“伊瓜拉计划”中）在制定墨西哥宪法以前遵守西班牙宪法，尤卡坦在11月加入独立的墨西哥帝国，后来成为联邦体制中的一名主要成员。半岛行政官员，包括都督埃切韦里在内，如今都悄然离去。在尤卡坦，如在墨西哥一样，至关紧要的因素是支持加的斯宪法和伊图尔维德对比的保证。

中美洲的情况非常相似，但多少更复杂一些。在那里，1820年重新实行宪法后，立即引起立宪主义的复活，并组成第一批公开的政治派别。比较激进的派别是由艾西内纳寡头集团和中产阶级分子组成，最初在反对布斯塔曼特政府的斗争中产生的同盟。佩德罗·莫利纳主编的《宪法编辑》报是他们的喉舌。另一个较为温和的派别以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和他经常撰稿的《祖

卡坦人的会议同在1821年9月15日那一天举行。当时莫利纳积极敦促接受独立，而巴列的报纸都坚持保王派立场。会议讨论极为激烈，但后来几名温和派为了避免发生内战勉强接受独立。一份由巴列执笔的《独立宣言》以23票对7票获得通过。象在尤卡坦一样，政府实际上保持原状，现任西班牙长官盖恩萨留任行政首脑。和墨西哥及尤卡坦一样，独立以1812年宪法为基础。

危地马拉城的行动迫使中美洲其它省份也必须在独立问题上作出决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究竟继续作为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还是完全分离。要由洪达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方针。圣萨尔瓦多普遍存在被墨西哥或危地马拉吞并的恐惧感。自由派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和曼努埃尔·何塞·德·阿尔塞领导下的洪达于9月29日宣布萨尔瓦多监督官辖区独立，尼加拉瓜也存在着相似的恐惧感。莱昂的省代表团9月28日宣布脱离西班牙和危地马拉独立。哥斯达黎加是尼加拉瓜监督官辖区的一部分，因此尼加拉瓜自认为它的宣言也适用于哥斯达黎加。然而，哥斯达黎加各地市政委员会却分别召开会议，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并于11月1日将西班牙省长免职。在此期间，洪都拉斯也宣布独立，但在加入危地马拉还是加入墨西哥的问题上发生公开分裂，特古西加尔巴城主张加入危地马拉，而科马亚瓜城主张加入墨西哥。

为了向那些尚未决定加入墨西哥帝国的人施加影响，伊图尔维德威胁要向中美洲派兵。那里的混乱终于平息，至少是暂时平息。早先曾反对墨西哥并吞中美洲的加维诺·盖恩萨，如今却邀请中美洲各城市举行市政委员会公开大会(cabildos abiertos)，92 决定将整个前危地马拉领地并入墨西哥帝国的问题。各地投票虽然参差不一，但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赞成合并，为首的是一些保守派和富商巨贾，如马里亚诺·艾西内纳和他的侄子胡安·何塞·艾西内纳侯爵、危地马拉的拉蒙·卡绍斯大主教、尼加拉瓜的尼古拉斯·加西亚·赫雷斯主教等。12月29日，危地马拉城和克萨尔特南戈与墨西哥合并。1822年1月9日，盖恩萨宣布整个中美

洲与墨西哥合并。但是有些中美洲人不同意，著名的有圣萨尔瓦多的德尔加多和阿尔塞。1822年6月，一支墨西哥小部队在比森特·菲利索拉维将军指挥下抵达中美洲，1823年1月用武力使萨尔瓦多屈服。然后，墨西哥帝国本身瓦解。

伊图尔维德当上了墨西哥新帝国的行政首脑和摄政会议主席。伊图尔维德明知西班牙不会承认墨西哥独立，更不会允许王朝的一个成员僭取王位，但继续策划选举他当皇帝。军队宣布推举他为候选人，议会在威胁之下（不是法定人数）于1822年5月19日选举他为皇帝。他自称为阿古斯丁一世。在一个短时期内他就疏远了人口中的大多数，1822年10月他解散议会后，在两位将军领导下爆发了一次起义。这两个将军是瓜达卢佩·维多利亚（不久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和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以后多次任总统）。到1823年2月，反对派已在“卡萨马塔计划”基础上联合起来，要求召开新的议会从皇帝手中接管政权，要求授予省政府更大权力。皇帝于3月逊位，在意大利和英国旅居一年后，1824年7月返回墨西哥，当即被捕并在塔毛利帕斯洲处决。伊图尔维德称帝的短暂经历在墨西哥历史上对他的声誉投下了阴影，但是不应忘记，正是他的领导和他在“伊瓜拉计划”中的妥协才使墨西哥的独立成为可能。

伊图尔维德的倒台割断了将中美洲和墨西哥结合在一起一年多的纽带。菲利索拉将军从危地马拉撤退前，1823年3月29日要求各省选派代表参加中美洲会议。前危地马拉领地各省，只有恰帕斯留下仍作为墨西哥的一部分，其余各省于7月1日成立一个临时洪达，宣布中美洲独立。在墨西哥，伊图尔维德帝国倾覆后，1824年成立联邦共和国，制定了部分地以1812年西班牙自由主义宪法为蓝本的新宪法。墨西哥和中美洲都放弃了中央集权制，承认各地区在联邦共和国中享有国家权利并实行区域自治，许多地区长期追求的目标——地方自治终于实现。

93

墨西哥和中美洲独立过程结束时，到处是长期斗争的创伤。独立战争期间生命损失估计高达10%，即60万人。人均收入从1810年的35—40比索下降到1821年的25—30比索，独立斗争的最后几年，人均食品消费量也有下降。由于废弃矿井和随之发生的浸水和损坏，加上抽走资本和殖民地开采、水银供应和冶炼等体系的破坏，采矿业生产下降到不足原来产量的1/4。由于农村荒芜，庄园主死亡或出走，流动资本消失，农场、牲畜和机械破坏，农业生产比原来的水平下降了一半。工业生产下降2/3。继续执行过时的西班牙限制贸易法律和一成不变的以不同民族划线和新封建主义为基础的劳动制度，使经济长期落后，前总督辖区与迅速发展的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英国和美国的进口货物填补了西班牙贸易消失后留下的空隙，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产品无法与之竞争。贵金属、洋红、靛蓝、香草、棉花和皮革等出口产品的价值远低于进口产品。墨西哥和中美洲由于财力不足，初步发展规划归于失败。1824年，墨西哥与英国银行就第一笔贷款进行谈判。中美洲在1825年也是与一家英国银行签订了第一笔贷款合同。贷款主要目的是在修订税制以前，增加政府收入，也是为了鼓励在尼加拉瓜开凿一条沟通两大洋的运河。后来在1825年，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也打算自行与英国公司洽谈贷款，但它们的计划被危地马拉城否决*。 94
然而在整个墨西哥和中美洲，丧失信心、缺乏安全和稳定都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不受控制的军国主义的兴起，中央政权无法抑制的地方主义的膨胀，盗匪活动和政治暴力的蔓延——所有这些独立斗争的间接影响继续在这个地区作祟。长期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可能在政局不稳和内部倾轧的情况下得到改善，而这种状况今后还要存在几十年。这些新国家还继承下来其它许多问题，如西班牙人离开这个地区时抽走资本，采矿业、工业和农业的破

* 危地马拉城系当时中美洲联邦的首都。——译者

坏，大量的债务。如果这些新国家在政治形式上能取得一致，上面这些问题或许本来是能够解决的。伊图尔维德和"伊瓜拉计划"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在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革命失败后结束了西班牙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现在只能着手重新规划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第 3 章

西属南美洲的独立

95 西班牙君主国1808年危机(它使国家陷于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合法政府的境地)不能不对从新西班牙到拉普拉塔各个美洲殖民地产生深刻影响。从事后可以看到，危机大大加速了那些已在采取行动的力量的步调，最终导致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脱离西班牙。可是在那时，彻底独立似乎仅仅是若干可能采取的办法之一，拥护的人还寥寥无几。西属美洲人可以接受约瑟夫·波拿巴的统治，也可以宣誓服从在西班牙民族抗法运动中产生的临时政权，也可以服从费迪南七世的姐妹卡洛塔，她早些时候随丈夫葡萄牙摄政王唐·若昂避难到里约热内卢，建议在那里暂时代表他的兄弟统治西属南美洲。西属美洲人也可以考虑象西班牙各省所做的那样，在美洲当地建立洪达，以被囚的费迪南七世的名义进行统治。从短期看，最后这个办法无异就是在王国的框架内实行事实上的自治，而从长期看，它是走向完全分离的一个过渡阶段。1810年以前，各地建立起来的自治机构没有一个成功，但是没有充分理由将那一年作为独立运动的开始；只是说到1810年为止，自治主义者在斗争中全都失败了。

在西班牙本土，约瑟夫一世的合作者中有若干西属美洲人，如不久前担任马德里植物园园长以后要当大哥伦比亚临时副总统的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但在殖民地，这类有时欢迎法 96 国人到西班牙的自命的改革者很可能就是自治派阵营里的人。至于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有希望成为赢家的人，几乎不可能相

信拿破仑会在大洋的美洲这一边获胜。附近地区没有法国军队，只有英国海军。何况，那种对一切法国的东西都反感的情绪，在西属美洲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是革命过激派在西班牙人中间散布的，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预后进一步加强。因此，波拿巴分子的计谋获得很少进展；最多只有一些高级军官简单表示一下承认约瑟夫一世的意思，但常被殖民地居民的强烈敌意所阻止。他们自己也认识到，损害王室的正统性很容易危及殖民地对西班牙的依附关系，从而也危及他们自己的地位。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情况似乎最有希望。早先英国对那里的入侵（1806—1807）曾把一名法国军官圣地亚哥·利尼埃斯推上掌权的地位，担任代理总督。1808年8月，拿破仑及时派出使节访问利尼埃斯，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同意接受招募。总之，法国人自己很快认识到，约瑟夫·波拿巴已不可能赢得西属美洲于是转而采取鼓励独立的政策，尽管巴黎政府对美洲殖民地不断发展的局势从来无所作为。

拉普拉塔河地区似乎为卡洛塔的选择办法提供了最好的前景，可是最后也一无所成。卡洛塔在里约热内卢，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较近，而在西班牙统治的最后岁月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最易发生政治动乱的殖民地中的之一。英国的入侵一方面表明西班牙不堪一击，同时也使克里奥尔人的气势剧增，因为是他们肩负了击败入侵者的重任。作为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易于接受外来的思想和经济影响，同时，紧靠着它的内地出口大量畜牧产品使地产利益集团和投机商人进一步认识到扩大自由贸易的潜在好处。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拉普拉塔河地区应在支配自己的事务方面享有更大发言权的舆论不断增多；并且乍看起来，费迪南在巴西的姊妹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一条途径。一个克里奥尔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派别，包括后来的独立斗争领导者曼97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和胡安·何塞·卡斯特利等人在内，他们希望通过接受卡洛塔统治西班牙殖民地的要求，在新大陆形成一个开明的君主国，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样的人也许可以从中分享一

部分权力。在其它地方，卡洛塔也有一些零星的同情者。然而即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卡洛塔主义”也只能使本来就含糊不清的局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首先，有人担心卡洛塔充当葡萄牙代理人，这就削弱了它潜在的号召力。其次，卡洛塔本人性情暴躁，政治上是个专制主义者，而她的克里奥尔支持者希望建立一个温和的改革不激烈的新制度。当这个固有的矛盾逐渐变得明朗化，对她的热情也就一落千丈了。

卡洛塔的解决办法之所以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帮克里奥尔改革派具有吸引力，只是因为那里的王室官员不想理睬卡洛塔这个理论上相当不错的设想，而是去直接效忠那些自命为费迪南衣钵继承者、在自由西班牙还保留一个朝不保夕的立足点的人，在1808年底，也就是直接效忠塞维列的中央洪达。它声称在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上统治国家，这虽有中世纪的先例，实际上是个革命口号，后来美洲殖民地的洪达也群起仿效。但至少它是建立在宗主国内，承认它的权力对惯常的指挥系统破坏较小。这个优点，加上它领导反法斗争所唤起的巨大热情，保证了殖民地几乎所有高级军官和一大批有官职和没有官职的“半岛人”对它的忠诚。大部份当地出生的殖民地居民也本能地对它保持忠诚。但是另外一些人对它声言要统治海外领地表示异议。他们争辩说，美洲各省在当前紧急时期和西班牙人一样有权建立统治机构。各地都有人支持这种论点，虽然支持的人数和影响的大小各地参差不齐。

拉普拉塔河地区有两个较早建立的洪达，虽然不是典型的。1808年9月在蒙得维的亚建立的洪达由西班牙省长为首，目的不是要使今天的乌拉圭摆脱塞维列洪达的控制，而是希望脱离利尼埃斯总督的管束。这个洪达的倡议者指控利尼埃斯有支持波拿巴政权的倾向。后来利尼埃斯被塞维列解职，由一名可信赖的半岛西班牙人巴塔萨尔·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取代，蒙得维的亚的洪达也就很快自行解散了。洪达存在时，在当地得到广泛支持，主要因为它符合在政治上和商业上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抗的 98

情绪。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试图在1809年1月1日建立洪达，矛头同样也指向利尼埃斯。主要策动者之一是半岛富商马丁·德·阿尔萨加，他曾动员市政委员会反抗英国入侵，如今仍领导着当地一个重要政治派别。这派别的成员以西班牙出生的人为主，但当时也包括一些知名的克里奥尔人士如马里亚诺·莫雷诺，他是个律师，后来领导拉普拉塔河地区革命中比较激进的一派。阿尔萨加的敌人甚至指控他是共和派，但他的集团只有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赶走利尼埃斯，不管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怀疑他不忠，还是和进一步政治革新打开通路。政变尝试轻而易举地被挫败了，因为利尼埃斯仍得到总督官僚机构和克里奥尔民兵的支持（民兵对于在总督的庇护下已经获得的地位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失败者在当年稍晚一些时候看到利尼埃斯和平地下台、新总督西斯内罗斯上任也很满意。西斯内罗斯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稳健而灵活的行政长官——例如1809年11月他对开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同西班牙当前的盟友英国进行贸易的要求慷慨地作出了让步。

1808年委内瑞拉都督辖区首府也有人进行建立洪达执掌政权的尝试。这一次目标比较明确，但也未能成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这里也有西班牙控制的商会，倾向于同加的斯进行贸易，反对贸易自由化。但在委内瑞拉，当地的影响和舆论更坚决地赞成与外部世界自由通商。当地社会占优势的成分，用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的话来说，是“商业和农业资产阶级”。①它的领导成员都是被群众称为“曼图亚”*的人。在这个“资产阶级”中，地主和商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职能区分。地主也好，商人也好，都是依靠生产和出口可可和其它种植园作物，他们充分认识到，西班牙的商业制度，尽管有暂时的例外和漏洞，是继续发展和繁

---

* 曼图亚(mantuanos)：委内瑞拉方言，意思是贵族出身的人。——译者

① 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著《殖民地社会的危机》(加拉加斯，1976) 第80 页。

荣的障碍。同时，也象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加拉加斯和委内瑞[99]拉北部和中部的种植地带是各种外来影响容易达到的地方，有欧洲的影响，也有不属于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影响，主要是受后者的影响。

委内瑞拉在1806年同样也遭受过一次入侵，但入侵者不是外国，而是一名委内瑞拉出生的密谋者和革命鼓动家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那时“曼图亚”和普通居民都团结在西班牙当局一边反对米兰达，他的彻底独立的口号还显得过于激进。克里奥尔上层阶级小心谨慎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担心在奴隶和自由的帕尔多人中间无意之中爆发一场海地式暴动，这两种人加在一起超过委内瑞拉总人口的一半。同时，害怕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敢把维持秩序的责任交给一个日益软弱、显得很不可靠的西班牙政府委派的官员，这个政府已经多次表明它非常愿意鼓励帕尔多人的愿望。

西班牙1808年事件在加拉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是警告，又是机会。代理都督胡安·德·卡萨斯显然准备考虑投向波拿巴，直至他看到法国使团抵达委内瑞拉时在群众中爆发出来的敌意。他一度表示可以支持在加拉加斯建立一个临时洪达政府，但他很快决定不必走那么远。因此，当1808年11月一批显贵的请愿者(包括两位伯爵和一位侯爵)正式提出建立洪达时，卡萨斯以逮捕和监禁的浪潮作为答复。没有人受到严厉惩罚，但都督的镇压是不祥之兆。在对有不满意见的“曼图亚”采取行动以前，他小心翼翼地先取得帕尔多人的支持，命帕尔多民兵部队进行戒备。虽然这些并没有完全阻止克里奥尔人的密谋活动，但委内瑞拉的西班牙当局经受住了多次威胁，直到1810年4月。

上秘鲁(今天的玻利维亚)的洪达分子比较幸运，至少暂时为止。1809年5月，在殖民地首府丘基萨卡建立了某种类型的洪达。将近两个月后，在拉巴斯又建立一个。其中第一个是殖民地官僚机构内部，查尔卡斯〔检审法院〕院长和检审法院法官互相倾轧的

100 直接副产物。* 院长虽然没有正式支持卡洛塔分子的选择，但表示感兴趣。卷入的个人都是“半岛人”，他们非常希望保持殖民地和西班牙之间的传统关系，但对于如何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取得一致。事件于1809年5月25日和26日达到高潮，检审法院解除院长的职务，接收他的权力，并宣誓完全效忠费迪南。这个洪达和由本地区居民组成的洪达不尽相同，但得到一小批对政府不满的专职人员支持——包括阿根廷人贝尔纳多·德·蒙特阿古多，他后来脱颖而出成为解放者圣马丁的得力助手——圣马丁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某种形式的美洲自治。事实上，这些人是千方百计促使危机早日爆发，接着把动乱扩大到上秘鲁的其余部分。

最惊人的反响发生在拉巴斯。7月16日，市政委员会免除了当地监督官和主教的职务，指控两人有暧昧的反对费迪南七世的叛逆行为。不久，一个辩护性洪达出来控制局面，由一名自称律师的梅斯蒂索人佩德罗·多明戈·穆里略任主席。它发表宣言，号召建立严格以美洲利益为基础的“新管理制度”，同时对殖民地所受的的压迫表示不满：“他们毫无权利攫取这些不幸的殖民地，而且对它们的统治极不公正，暴虐专制。”① 在拉巴斯革命的这个或其它正式文件中没有明确勾消对被囚的费迪南的自发忠诚，但是关于实行有效自治的要求都是措辞激烈，并未含蓄或不含蓄地限制它为临时紧急措施。所有这些，革命者多少有些判断错误。他们号召纠正对印第安人的错误做法，公开呼吁支持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群众，这些同样令人不安。引起的反响并不都对革命有利。克里奥尔人对在上秘鲁由图帕克·卡塔里领导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记忆犹新，他们多数人不愿再冒同样事件重演的风险。

拉巴斯洪达的激进表现不仅导致它的最初支持者彼此不和，也加剧了从来就不同情它的人的反对。但是最有效的反对者来自

---

* 查尔卡斯为检审法院院长辖区，院长为最高行政长官。——译者

① 卡洛斯·乌尔基索·索萨编《1809年辩护性洪达宣言：对历史的说明》(拉巴斯，1976年)第144—145页。

外部——库斯科〔检审法院院长辖区〕院长何塞·曼努埃尔·德·戈耶内切。戈耶内切出生于秘鲁，他和极端保守、特别能干的秘鲁总督何塞·费尔南多·德·阿瓦斯卡尔——索萨一样，全力支持西班牙中央洪达。到目前为止，在库斯科和秘鲁其它地方，还没有任何力量对政治现状提出过严重挑战，也就是继续服从在西班牙本土以费迪南名义实行统治的任何政权。先前在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中间曾经有过一些不满活动，甚至秘鲁民族主义的萌芽，但是和上秘鲁一样，这种不满情绪被害怕重新唤起印第安人骚乱和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固有的保守主义所抵消。这些上层人士过去建立的功勋与秘鲁能在西班牙帝国体系内享有特殊地位是直接相关的。尽管18世纪后半叶帝国进行改革和改组后，秘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实行变革未必就能使情况好转。殖民地的相对停滞使利马的上层阶级更加依赖西班牙政府所提供的职务和恩惠，处事愈益谨慎小心，至于人口中居明显多数的印第安人，他们就象克里奥尔人不信任他们一样不信任克里奥尔人，加上他们原来的领袖大多数已被消灭、被吓倒或被收买。因此，现在最高当局可以用全部力量来镇压毗邻辖区内爆发的骚乱。不久，戈耶内切在阿瓦斯卡尔总督的有力支持下，率领一支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部队向拉巴斯进军。1810年10月，部队刚刚接近，内部已经发生争吵的革命者就丧失了士气。不需要进行多少战斗。首领们被俘并及时受到惩处。穆里略等人被处死。与此同时，在丘基萨卡，检审法院已经巩固它的地位，但立即改变主意，表示同意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斯内罗斯总督临时委派的查尔卡斯院长。 101

拉巴斯革命尚未结束，另一场革命又在基多爆发。基多革命者的目标不如拉巴斯激进，但比丘基萨卡明确。事件的根源要追溯到1808年12月，当时若干基多人在富有地主、厄瓜多尔领导独立运动的主要知识分子“先驱者”欧亨尼奥·埃斯佩沃的前保护人塞尔瓦·阿莱格雷侯爵领导下，开会商讨对拿破仑征服西班牙 102

如何作出反应。他们因受到怀疑而被捕，然后又因证据不足释放。1809年8月10日，密谋策划者将卫戍部队争取过来后，逮捕了基多辖区院长鲁伊斯·德·卡斯蒂利亚伯爵，并建立洪达执掌政权，由塞尔瓦·阿莱格雷任主席，尽管他显然并未参与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基多主教任副主席，他碰巧是新格拉纳达人。其他克里奥尔显贵都承认这个洪达。洪达宣誓维护一个真正的宗教、一个合法君主——费迪南七世——的权力。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侯爵、主教或基多贵族和教士中的其他领导人物声称效忠费迪南是言不由衷。实际上，基多似乎不太可能成为领导任何革命活动的地方。它有一个颇为自负的上层阶级，一条深深的社会鸿沟把它和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群众分离，地理上又把它跟新思潮中心隔开。但正是基多贵族的这种自命不凡（塞尔瓦·阿莱格雷并不是他们中间唯一拥有西班牙爵位的人），大概使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和权利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厄瓜多尔高原的经济衰退（例如波旁王朝的商业改革对当地纺织工业产生不利影响）激起了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洪达提出的方案——在对传统秩序破坏最小的条件下把权利转移给本地人——获得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逻辑的。

在基多起义的领导人中，有些人社会知名度较低，但做了大部分实际工作。这些人具有更远大的，可能是共和主义的目标。因此，基多运动内部包含着类似在拉巴斯见到的那种潜在的紧张因素。更严重的是象上秘鲁一样，也有外部的反对。洪达宣布它的权力遍及整个基多院长辖区，但是昆卡省和瓜亚基尔省处处都对辖区首府怀有戒心，它们在“半岛人”省长的坚定控制下不接受洪达的管辖。秘鲁总督阿瓦斯卡尔对待基多洪达自然不会比对待拉巴斯洪达宽容。新格拉纳达总督安东尼奥·阿马尔——博尔冯（基多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也发出威胁的叫嚣。

但是，阿马尔总督必须首先处理有人要求在他自己的首府波

哥大① 建立洪达的问题(基多当然会要求波哥大以自己为榜样)。他最后终于现出了这次运动，但精力被分散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致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来对付基多。阿瓦斯卡尔可不是这样。他派遣的反革命部队从来不需要进行任何认真的战斗。1809年10月，早在部队到达以前，基多洪达就已土崩瓦解，恢复了鲁伊斯·德·卡斯蒂利亚的辖区院长职务。应该提到，塞尔瓦·阿莱格雷已在早些时候辞职，有一派历史学家指责他和其他一些贵族领导人彻底背叛他们领导的运动。上述指控至今查无实据，但是胆怯害怕和缺乏真正的革命信仰，那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可以理解的。②

拉巴斯洪达和基多洪达的失败并没有解决王位暂时空缺所产生的问题。但是西班牙国内发生的事件又一次使事态陷入危机。法国军队节节胜利，攻陷了大部分西班牙民族抵抗运动的中心，包括塞维列在内。西班牙中央洪达撤退到加的斯，1810年1月底，它本身也宣告解散，把政权交给一个摄政会议。摄政会议的任务之一是筹备召开代表整个西班牙帝国的议会。从洪达变成摄政会议，除了需要新大陆当局承认这个新机构以外，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又一次提出了殖民地的地位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西班牙能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完全恢复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殖民地如今似乎比过去更有理由怀疑了。结果，在克里奥尔人中引起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新的渴望，而在现制度的维护者中间则出现了前途未卜的情绪。

第一次重大突破发生在加拉加斯，主要不是因为那里存在骚动的气氛(虽然另一次密谋刚在几星期前泄露)，而是因为委内瑞

① 殖民地时期称圣菲，独立时期改称圣菲·德·波哥大，最后简称波哥大。为方便起见，在此一律使用波哥大这最后的名称。

② 见迈克尔·T·哈默利菁《1809年基多洪达主席塞尔瓦·阿莱格雷：叛徒还是爱国者?》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48/4(1968)，第642—653页，以及文中所引资料。

拉是美洲大陆离欧洲最近的殖民地，能首先听到西班牙形势发展的消息。一群克里奥尔显要人物在1810年4月19日作出反应，将当地都督免职，并建立一个洪达接替他的位置。这个机构在法律上以费迪南的名义实行统治——这是革命者以各种不同程度的诚意宣誓效忠的一个公式。但是它明确反对新的西班牙摄政会议可以合法地对美洲行使权力。文武官员当场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委内瑞拉都督辖区各边远省份纷纷仿效，大部分建立了本省的洪达。它们是半自治机构，接受加拉加斯的统一领导。但西面的科罗和马拉开波与东面的圭亚那是例外，它们表示依然效忠加的斯。对委内瑞拉边缘地区的许多人来说，抵制加拉加斯的统治是保王派可以选择的一个精彩活动内容。

104

西班牙(现在又加上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在新格拉纳达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阿马尔总督迅速承认摄政会议，但是克里奥尔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在美洲建立洪达更会令人满意。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首府地处偏辟的区，因而没有象加拉加斯那样起带头作用。走第一步的反而是沿安第斯山脉的卡塔赫纳。5月22日，卡塔赫纳市政委员会指定两个人在一个至少类似洪达的机构中与省长分享权力。潘普洛纳和索科罗在7月上半月成立自己的洪达，波哥大也跟上步伐，在1810年7月20日成立了统治机构洪达。总督阿马尔这一次乖乖地向克里奥尔人的压力屈服，一开始被拥戴为洪达主席，但是过了几天，各种人都利用这次政权变迁，要求革除不受欢迎的官员，把有些官员投入监狱，对总督的可靠性的怀疑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多。7月25日，仍以效忠费迪南的名义解除了他的洪达主席职务。从波哥大传来的消息，激起更多的骚动，新格拉纳达其它地方也纷纷建立洪达。这些情况再次促使基多陷入危机，一个新的洪达9月22日在那里成立，基多辖区院长鲁伊斯·德·卡斯蒂利亚任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比阿拉马尔在波哥大长得多。他洪达中也包括基多主教和塞尔瓦·阿莱格雷等知名克里奥尔人和参加过1809年斗争的幸存者。

在南美洲的另一端，西班牙的事态发展产生了另外一系列革命反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革命”。在那里，西斯内罗斯总督勉强同意召开一次市政委员会公开大会。1810年5月22日，公开授权市政委员会成立洪达。两天后洪达成立，推举总督为主席。洪达还没有开始行使职权，抗议之声即已四起。互相配合提出抗议的是克里奥尔民兵指挥官和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他们从1808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起，就已经看到西班牙君主国的危机是改变殖民地现状的一次危机。这些力量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5月25日正式成立洪达，总督没有参加，而由科尔内略·萨阿韦德拉上校任主席。他是上秘鲁商人出身，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期定居，他的权力基础是1806—1807年反抗英国入侵时组成的民兵部队。洪达宣誓忠于费迪南而不是摄政会议，宣布它的权限遍及整个总督辖区。

关于导致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各种事件如何反映了公众舆论的真实倾向，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写得很多。有些历史学家把“五月革命写成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这样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只是噜噜嗦嗦说了一些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多数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都没有参加任何行动，参与其事者也没有跟他们商量，也不可否认许多人持反对态度、漠不关心或踌躇不决。但是尽管如此，正如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指出的，参加的民兵组织占这个城市参加经济活动男性人口的很大比例，同时这次革命进一步唤起了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积极反应，他们自从英国入侵以来已经深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光辉的使命和能力①。比较成问题的是总督辖区其余部分的态度，那些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各种地区性对抗，包括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抗，排除了一致依附新政权的可能性。洪达最后终于得到了总督辖区内构成今天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那部分地区的承认。而蒙得维的亚早在1808年

① 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著《阿根廷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剑桥，1975)第155—156页，169页并散见各处。

即已建立自己的洪达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庭抗礼，如今又公开表示支持摄政会议。同总督辖区首府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对抗仍是使它决定这样做的一个因素。巴拉圭也站在一边不予支持，主要不是出于顽固的效忠西班牙的立场，而是由于对在政治和商业上充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下手感到怨恨。上秘鲁开始也没有支持，那里1809年的革命者还没有从戈耶内切的镇压下恢复过来——如果依然活着的话，而且当地文武官员都处于戒备状态，防止发生新的暴动。

106

秘鲁依然保持着它的忠诚堡垒的地位，对于西班牙国内新上台的统治当局，只要还掌握着一丁点儿正统性，它就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同时对阿瓦斯卡尔总督提供新的捐献，作为保卫帝国之用。但是智利都督在拖延一段时间后，认为已经到了仿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智利人口稀少，偏僻闭塞，带有静止农业社会的特征，少数贵族家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严格地说来，智利尚未处于政治和理论争论的前线。智利独立的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弗赖·卡米洛·恩里克斯后来说只有大约6个智利人能阅读法文书，没有一个人能读英文书，结果是“他们对自由主义哲学著作跟地理和数学一样一无所知”。① 恩里克斯无疑有点夸大其词。智利在殖民地晚期对西班牙的商业条例是否存在不满，或者不满到什么程度，这是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智利人至少已经具有最初的民族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西班牙1808年危机的第一个反应是公开宣布效忠费迪南七世，但是对继续依附西班牙当局、反对在智利建立洪达是否恰当的疑问与日俱增。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半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断加剧。检审法院为了稍微缓和一下紧张关系，1810年7月免去了专横跋扈、不得人心的都督的职务，由一位年长的克里奥尔贵族接替。但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9月18日在圣地亚哥召开的市政委员

① 劳尔·席尔瓦·卡斯特罗编纂《卡米洛·恩里克斯的政治文稿》(圣地亚哥，1960)第187页。

会公开大会，最终使智利也建立了它自己的统治机构洪达。

在传统的关于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的历史编纂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1810年建立洪达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运动，是产生1776年英属北美殖民地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西方世界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还进一步设想，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以及两个革命榜样的力量对拉丁美洲发生的一切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不够充分。保守作家强烈反对这种解释。他们指出，西属美洲爱国主义者的思想可以在传统的西班牙思想中找到先例。被引证得最多的是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1548—1617)，最著名的是他不同意王权神圣不可侵犯，提出上帝通过人民将国家权力授予国王。因此，美洲人民针对西班牙君主国危机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既可以从杰斐逊或卢梭的思想，也可以从苏亚雷斯的思想中找到依据。事实上，提及苏亚雷斯的名字之所以使人感到意外，是由于革命者没有宣传他。如果早一些熟悉他的学说，人们也许会更容易接受后来的法国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思想家；而后者是实践中经常引用的权威，就象必然引用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在西班牙也经常在法庭答辩中引用他们来证明费迪南下台后人民有权建立新政府。① 另一种观点贬低政治思想对西属美洲事态发展的影响，强调事态发展的根源是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的对抗或者是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压力，这种观点的理由更充足一些。但是不论如何，思想至少是一种武器，既然如此，在选择武器的问题上，西属美洲革命同西欧和美国的新兴自由民主思潮之间必然会有许多联系。

1810年克里奥尔人建立洪达跟西班牙民族抗法政府不仅有许

① 关于引用权威的频繁，参看胡安·安赫尔·法里尼著《1810—182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总索引》(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 和何塞·伊格纳西奥·博奥克里斯·科罗拉多著《〈哥伦比亚日报〉索引》，载《哥伦比亚日报》复制版(共和国银行，波哥大，5卷本，1973—1975)第5卷。

多共同的论据，证明自己的存在合法，而且都声明效忠费迪南七世。但是不管声明是否真诚，洪达不能指望得到西班牙当局或者依然在美洲掌权的保皇官员的合作。前者目前没有力量来对付这些新兴的洪达，后者有时还能够。与此同时，一开始就应看到，虽然法国人侵西班牙给克里奥尔革命者创造了机会，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外国列强不可能象支持美国革命那样进行公开干涉。各地新政府在国外的确博得了很多同情，特别在美国，它把任何走向西属美洲自治的运动都看成是仿效自己的榜样，但同情有深有浅，都没有自发地导致行动。

108

在英语美洲，由资产阶级和新教徒构成的公众长期受反西班牙的“黑圣徒”宣传影响，* 对西属美洲的事态发展多少持怀疑态度，所抱期望不大。正如约翰·亚当斯有一次所说的，那种认为自由政府可以在南美洲各国扎根的观点是荒谬的，就象试图“在飞禽走兽和鱼类中间建立民主制度”① 一样。显然，这并不是希望应对它的居民缺乏公民美德承担大部分责任的西班牙君主国继续进行统治。不久以后，许多英语美洲代言人对西属美洲的事业产生了积极的热情。另外一些人纷纷出售物资或提供服务。但官方政策继续保持谨慎的中立，这意味着即便是帮助革命者的私人活动也受法律限制和断断续续的制裁。1810年美国因中立权等问题同英国发生激烈争论，并导致1812年战争，这时华盛顿政府更不想在西属美洲的问题上放弃中立，或者说它只想插手它的南部和西部边界问题，这时美国公民正在侵占西班牙领土。美国希望通过谈判最终获得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这是它避免与西班牙公开为敌的另一个原因。

欧洲国家正忙于跟拿破仑作战，唯一可能向革命者提供援助

* 黑圣徒(Black Legend)是一些新教徒历史学家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贬义词，原意是批评16世纪西班牙国王的反新教政策。——译者

①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编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著作》(10卷本，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856)，第10卷，第145页。

的是英国，但英国的情况也不美妙。极右的托利党直截了当地对西属美洲正在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无条件表示同情的主要是激进自由派和某些商界人士。官方政策也是模棱两可。殖民地和西班牙之间的联系的任何松弛都会增加英国同西属美洲直接贸易的机会，然而西班牙又是欧洲反对拿破仑的同盟国。何况，革命思想不应鼓励。因此，从英国的立场来看，圆满的解决办法是让西属美洲在一个松弛的西班牙君主国的框架内实现事实上的独立。于是，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的充分理论和支持下，开始同美洲革命者控制的港口进行贸易，而官方代理人则审慎地劝告西班牙美洲人不要切断与宗主国的所有联系。为了平衡它对起义者的劝告，英国政府又敦促西班牙采取和解态度，并且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示愿意为结束冲突正式进行调解。

1810年成立的革命政府中第一个面临主要挑战的是委内瑞拉。在整个独立时期，那里的斗争比西属美洲任何其它地区都更激烈。其中有一个纯地理的原因。委内瑞拉是南美大陆离西班牙最近的殖民地，直接面对西属安的列斯群岛，因而有遭受攻击的危险。西边的新格拉纳达大部分在爱国者手中，这使委内瑞拉得到一定掩护。新格拉纳达帮助委内瑞拉的起义者从第一次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但是委内瑞拉的第二次失败为西班牙重新征服新格拉纳达铺平了道路。

促使委内瑞拉突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一个因素是革命运动的的迅速演变，它是西属美洲殖民地中首先出来支持完全独立的运动。原来的加拉加斯洪达没有采取行动抛弃“费迪南而具”，但是它派代表团到英国和美国去陈述情况并寻求支持。它也采取了一些立即令人满意的措施，如对友好和中立国家船舶开放港口，禁止贩卖奴隶和停止征收基本食品销售税。它想通过这些措施同时讨好出口商和进口商、英国人和人民群众。但是它在号召选举第一届委内瑞拉国会时提出的代表条件，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社会倾

向性。只有独立经营者或至少拥有2,000比索财产的男性成年人才有选举权，这项条件自然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

在1811年3月国会召开前，革命产生了另一个协商机构——加拉加斯爱国协会。它集结了“商业和农业资产阶级”中战斗性较高的一派和其他社会成份（甚至包括帕尔多人）的象征性代表，迅速地变成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等人的论坛。玻利瓦尔是最富有的可可种植园主之一，他不相信西班牙能改变它的殖民地制度，也不相信它能打击拿破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当主要密谋者米兰达1810年12月从英国回到家乡时，玻利瓦尔的观点（还有爱国协会）获得了另一个代言人。米兰达的到来引起了克里奥尔温和派的不安，但完全独立的思想不断取得进展并于1811年7月5日正式由国会宣布。

110

国会接着着手起草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的自由宪法，并于同年12月正式颁布。宪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联邦制结构，前委内瑞拉殖民地的各个省保留对内部事务的管理权，但各省加入联邦，由联邦处理共同关心的事务。玻利瓦尔后来批评这个宪法，认为联邦制是某些“善意的空想家”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之一，希望建立“他们想象中的异想天开的共和国”，① 并把它强加给一个不准备接受它的国家，从而把它引向毁灭的边缘。实际上，使宪法制订者感到鼓舞的这个联邦共和国既不是异想天开，也不是出于想象，它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玻利瓦尔对美国也赞美不已，但认为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不是委内瑞拉的合适样版。在这方面，米兰达也不想仿效美国。他们两人都希望建立一个更多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导致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联邦制的不全然是美国的榜样。毕竟，委内瑞拉作为差不多目前这样的面积和形状的一个政治实体，是1777年建立都督辖区时才出现的，加拉加斯

① 比森特·莱库纳汇集，小哈罗德·比勒克编《西蒙·玻利瓦尔选集》（两卷本，纽约，1951），第1卷，第19页。

还没有时间去克服其它省份强烈要求政治上特殊的倾向。同时，在社会结构、经济和种族成分方面存在着实际地区差异（例如加拉加斯周围使用奴隶劳动的热带作物种植园地带、奥里诺科盆地人烟稀少的广阔牧区、有最密切联系的西部高地之间的差异），跟新格拉纳达安第斯山区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度比中央集权结构会少一些人为的不自然。

1811年宪法规定所有人不论种族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条规定引起相当大的争论，但它似乎是国家创始人政治说教的不可逃避的结果。他们希望这一条能讨好帕尔多人，同时又不至于危及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统治，因为同一个宪法严格限制选举人的职业和财产资格。委内瑞拉国会的改革冲动也反映在轻率地剥夺教士和军人特权的宪法条款上。容忍异教依然被否决，可能是原则上引起反对，也可能纯然是时机尚未成熟，但毕竟进行了公开讨论，而讨论本身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

111

在委内瑞拉，许多本地出生的人也和欧洲人一样，感觉革命已走得太远。早在1811年七、八月间，在巴伦西亚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骚乱。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场骚乱镇压下去。新政权没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摧毁在更远的西部的马拉开波和科罗的保王派据点。1812年3月，从西班牙控制的波多黎各开来增援部队后，一支小部队在加那利人海军上校多明戈·德·蒙特韦德指挥下，开始从科罗出发，向爱国者控制的地区推进。蒙特韦德前进还不太远，大自然帮了他一次大忙：3月26日发生地震，严重毁坏了加拉加斯和共和国控制下的其它许多城市，但忠于国王的地区几乎没有受到损失，神明偏袒哪一方，那是一清二楚的，这对爱国者士气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灾难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爱国军的后方引起混乱。

持续的社会种族关系紧张使形势越来越暗淡。废除奴隶贸易和正式授予自由帕尔多人平等权利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通过革命实际上获得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利用它

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奴隶制继续存在，逃走的奴隶遭到追捕。起草了一组有关平原地区的条例，以扩大对牧场和野牛或半驯养牛群的私有制，但是对平原上那些自由散慢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居民十分不利，他们将沦为进行有组织劳动的雇农阶级。平原人愿意接受保王游击队领袖的号召；在委内瑞拉其它地方一帮一帮的奴隶在国王的名义下奋起反对他们的主人。

1812年4月23日，任命米兰达为拥有独裁权力的最高统帅，但不足以挽回局势。诚然他具有职业军人的经历，但问题不在于有112无这样的资格，主要是许多人对他本人不信任。蒙特韦德继续推进。接着发生保王派俘虏暴动，西蒙·玻利瓦尔7月6日被迫放弃关键要塞卡贝略港。7月25日米兰达投降。当时他被他的部属（玻利瓦尔也在内）所阻止未能安全逃脱，他们怀疑米兰达的投降动机。蒙特韦德不顾自己允诺的投降条件，将米兰达囚禁，并用船押往一个西班牙城堡。他1816年死于狱中。

1812年底，玻利瓦尔本人在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历史学家一度所称的“愚蠢的祖国”当时闹得正欢。所谓“愚蠢”主要是指内部的极端不协调。新格拉纳达的交通困难和地区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甚至比委内瑞拉更为尖锐。它的首府是所有总督政府所113在地中最小和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海边到首府只能沿马格达莱纳河逆流而上，然而走安第斯山中的小道，旅途极为艰难。在波哥大周围的高原地区，大地产与小庄园和残存的印第安人村社土地相互交错在一起。村社土地不断被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侵占，已难以维护它们的完整。东北部的索科罗依然是重要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中心。西北部的安蒂奥基亚省和太平洋沿岸低地出产黄金，是新格拉纳达唯一重要的出口产品。巴拿马政治上从属于新格拉纳达，但跟其它省份几乎无任何接触。卡塔赫纳是内地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纽带，它本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明社会，由人数不多的白人上层阶级管辖着大多数人——基本上是非洲裔加勒比人。

各省之间的政治和其它对抗十分严重，以致直到1811年11月才有可能建立新格拉纳达联合省。这是一个比委内瑞拉更脆弱的联邦，而且并不是所有省都愿意加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波哥大自己，如今它已成为昆迪纳马卡国的核心。具有半独裁权力的首脑是“先驱者”安东尼奥·纳里尼奥。独立斗争开始时，他在卡塔赫纳监狱里，但终于回到他的故乡波哥大，接管了昆迪纳马卡政府。纳里尼奥认为，在新格拉纳达建立一个集中的政权是使革命事业具有稳固军事和政治基础的唯一通路。他以联合者的联盟形式太脆弱为由，不让昆迪纳马卡加入，从而使联合省更加软弱。昆迪纳马卡和联合省的对立甚至恶化到发生武装冲突，这场冲突断断续续一直进行到“愚蠢的祖国”将近垮台时才停止。

在新格拉纳达的其它一些地区，两派都没有力量，政治上忠于西班牙的摄政会议。其中的一个地区是巴拿马，它始终不介入斗争，直至利马在十余年后宣布独立。另一个地区是圣玛尔塔，它是爱国者控制的卡塔赫纳的传统对手。曾短暂地参加过1810年革命，但当年就转变到敌对一方去了。还有一个地区是最南部的帕斯托，它象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山中堡垒，文化和经济都很闭塞，并狂热地埋头搞它自己的群众性天主教信条。帕斯托以北的波帕扬是个双方争夺的地区，它翻来复去摇摆于保王分子和革命力量之间。纳里尼奥希望把敌人逐出波帕扬，然后推进到帕斯托。为此，他与联合省暂时结盟，在1813年9月带领一支小部队从波哥大出发，夺回了波帕扬，但是他本人却在距最后目的地不远的地方被俘。（他象米兰达一样被押运到西班牙的一座监狱，但一直活到释放回家。）支持和反对革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局限在上述或其它一些战区，都无决定意义。爱国者的注意力有时被上述军事行动所吸引，暂停内部争吵，但时间从来不长。

新格拉纳达虽没有取得组织上的统一，但各省最后还是分别宣布完全独立。1811年11月11日，卡塔赫纳带头宣布独立。卡塔赫纳拥有最大的港口，因此也负责其西班牙以外的国家进行经常

性贸易和废除奴隶贸易。它还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它是殖民地三个主要宗教裁判所所在地之一。)有些省下令把村社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个人，表面上看来，取消村社土地的目的是让印第安人获得土地私有制的好处，但实际意图显然是为了让非印第安人最终更容易获得这些土地。对印第安人来说，新政权不真正实施这次法案可能更好。1814年，安蒂奥基亚通过一项生而自由的法律，规定今后女奴所生的孩子法律上一律获得自由。这是连委内瑞拉也没有做的事情，而且对这个省来说，奴隶人口的多少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安蒂奥基亚采金工业中使用奴隶劳动的盈利已在下降，这也是事实。① 虽然制订了这条反奴隶制法律，但是有一点很明显，新格拉纳达的革命领导者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所代表的大致相似。新格拉纳达之所以没有爆发威胁革命的社会和种族冲突，主要是因为潜在的紧张关系还没有像在委内瑞拉殖民地末期那样，被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引向顶点，同时也由于独立斗争时断时续，没有给群众多少参加的余地。

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仿佛蒙特韦德可以牢固地恢复委内瑞拉殖民政权了。但是他把和解和镇压同时并用，既不摧毁西班牙的敌人，也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典型的例子是对西蒙·玻利瓦尔的处理：没收他的地产和其它许多财产，但是给他自由并允许他离开殖民地。此外，蒙特韦德由于仅仅象征性地接受通过的1812年宪法(议会希望它成为在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度下重新联合欧洲和美洲西班牙人的基础，又由于他周围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店主和过去当店主的人，特别是加那利群岛同乡，引起西班牙许多原来支持他的人同他对抗。

1813年1月，革命形势重新开始好转。早些时候在特立尼达避难的圣地亚哥·马里尼奥袭击委内瑞拉东部并在那里建立一个

① 阿尔瓦罗·洛佩斯·托罗著《19世纪安蒂奥基亚的移民和社会变化》(波哥大，大，1970)第29—30页。

立足点。几个月后，玻利瓦尔得到新格拉纳达联合省的援助，从西部发动另一次进攻，并在所谓1813年“惊人的战役”中迅速向加拉加斯推进，8月6日胜利入城。在这个战役中，玻利瓦尔6月15日在特鲁希略发表“灭绝战”声明，宣布所有不积极支持革命的西班牙“半岛人”有罪，而对克里奥尔人效忠王室分子，甚至那些拿起过武器的人实行大赦。玻利瓦尔显然希望由此造成西班牙人和美洲人两极化，迫使前者要求同起义者共命运，要求放弃委内瑞拉，使后者更坚定地投入争取独立的战斗。上述政策除进一步助长了双方的暴行外，预期目的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是很不清楚的。但是它忠实地反映了玻利瓦尔在这斗争新阶段的顽强态度。作为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同时由于他在“惊人的战役”中取得辉煌成功，玻利瓦尔没有恢复1812年宪法。第二共和国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玻利瓦尔希望这样来克服政治上的软弱，在他看来，这些弱点就是第一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社会和种族冲突也是促成第一共和国毁灭的因素，但这些问题他没有去解决。现在帕尔多人对革命领导者愈来愈不信任。此外，玻利瓦尔虽然重新占领加拉加斯，许多地区仍在效忠王室分子掌握之中，从两侧威胁重建的共和国，而恢复活动的效忠王室的游击队又从内部侵蚀共和国。“半岛人”小商人和前走私者何塞·托马斯·博韦斯成了最有成就的游击队领袖，他把帕尔多人组成非正规军，得到他们的绝对效忠，部分原因在于他很乐意让他们对白人采取各种过火行为。他还许诺分配克里奥尔爱国者的财产，以此激励部队士气。有些历史学家试图把博韦斯的这种做法说成是有条不紊地推行平均社会财富的政策，甚至说成是“土地改革”，这似乎是很成问题的。①然而，不可否认，博韦斯和其他效忠王室的游击队领袖的

116

① 参阅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著《博韦斯：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历史活动》(第2版，加拉加斯，1968)；德梅特里奥·拉莫斯著《关于博韦斯的“策略”的一个方面》，载《国家历史研究院公报》(加拉加斯)，51/201(1968)，第69—73页。卡雷拉·达马斯驳斥土地改革的论点，拉莫斯则以有限的形式加以介绍。

战斗力很强。博韦斯也遭受过失败，但1814年6月15日在拉普埃尔塔战役中击溃了玻利瓦尔和马里尼奥的联军，迫使爱国者再次撤离加拉加斯。同年晚些时候，博韦斯在委内瑞拉东部一次扫荡行动中被击毙，但是第二共和国也宣告结束。

至于玻利瓦尔，他再次向新格拉纳达转移。自从他1813年离开后，新格拉纳达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效忠王室分子的一些孤立据点依旧没有屈服。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仍然经常争吵。1814年12月玻利瓦尔攻克波哥大，从而帮助联邦派解决了他们同中央集权派的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赞同联邦派的主张，而是由于他欠了他们一笔账，联合省曾在1813年帮助过他。随后他受委托率领军队去对付效忠王室分子控制的圣玛尔塔，结果攻打未成，却陷入与爱国者占领的卡塔赫纳的争吵。不久，他带着厌恶的心情离开新格拉纳达前往西印度群岛，去设计新的行动计划。因此最后的灾难发生时，他不在新格拉纳达。

1813年，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军队失败，翌年初，费迪南七世重新登上西班牙王位，西班牙又处于对付殖民地叛乱的有利地位。国王不顾过去的诺言，迅速扫除西班牙自由派在他不在位期间所建立的君主立宪机构，想方设法用专制政权代替。他和他的117 大臣们提出了“平定西印度地区”的各种建议，包括在商业和其它方面对殖民地群众作出让步，实行更有效的军事镇压和争取第三国(首先是英国)进行调解。从一大堆互相矛盾的想法中没有理出一条前后一致的政策。但是在1815年初，一支由一万多名装备精良的军人组成的远征大军终于出发了。这是西班牙在争取重新控制美洲殖民地的斗争中派出的最大的一支军队。有经验的职业军人巴勃罗·莫里略担任指挥官，委内瑞拉是头一个目标。选择委内瑞拉而不选择眼睛盯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的加的斯商人愿意选择的拉普拉塔河地区，一是因为委内瑞拉较近，二是因为从那里容易到达其它战略地区。远征军一旦在委内瑞拉巩固王室控制，就可以对付新格拉纳达。然后，南美洲北部暂时不用的军队

都可以继续向秘鲁(经过巴拿马)或新西班牙推进。

莫里略1815年4月到达委内瑞拉时，发现博韦斯等人已清除掉大部分叛乱分子，但他还是设法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军政府。随后他率领一支5,000人的军队取道圣玛尔塔进入新格拉纳达。他首先向卡塔赫纳推进，该城在12月6日陷落，不是由于受到直接攻击，而是由于饥饿。莫里略的部队接着向内陆进军，1816年5月占领波哥大。新格拉纳达组织涣散的爱国军在这场斗争中根本不是入侵者的对手，但莫里略不愿采取宽大政策：从卡塔赫纳城外开始，一直到波哥大陷落以后，大规模处决了“愚蠢的祖国”的大多数高层指挥官和次要人物。少数人因为有些关系或幸运仅受到较轻的刑罚，幸免一死，还有些人逃到新格拉纳达东部平原，最后和爱国者的委内瑞拉覆亡后外逃的流亡者会合。到1816年底，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基多在内，都稳稳当当地落到了效忠王室分子手中。

自1810年以来，基多的发展与总督辖区其它地区很少直接联系，但不能与保王派在秘鲁的权力中心隔断关系。因而它在1810年9月组成的第二个独立政府被阿瓦斯卡尔总督从秘鲁派来的军队推翻，和第一个独立政府在1809年被推翻的情况一模一样。第二个政府存在的时间长一些——大约两年。在此期间，跟北边由极端保王派控制的帕斯托和南边的昆卡和瓜亚基尔发生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冲突，它们和1809年一样，再次拒绝服从基多的领导。基多当地贵族中发生过几次宗派斗争，甚至达到宣布自己是独立君主立宪国家的程度。其它方面无多大成就。

118

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革命从未被第二次征服，或被反革命压倒，但是它经历了由内部和外部原因引起的似乎无穷无尽的危机。前面已经讲过，首先，1810年5月，在克里奥尔民兵领袖科尔内略·萨阿韦德拉领导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统治机构洪达。最初，在没有一个象米兰达或玻利瓦尔那样具有军事和政

治全才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马里亚诺·莫雷诺了。他是洪达两书记之一，激进的仰慕者和保守的诬蔑者都把他归入“雅各宾派”* 一类。

拉普拉塔河地区革命初期的激进主义主要不是表现在进行法律或制度改革。就以开放贸易港口来说，洪达只需要重申并重新规定西斯内罗斯总督在临时的基础上已经做过的事就行了。洪达肯定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后裔基本平等，但是明显地缺少一个关于帕尔多人平等地位的声明。①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平等的动听语言主要用来煽动群众的激情，去反对真实的或所谓的西班牙“半岛人”的特权，他们在政府部门就业和摊派捐款方面开始受到歧视。

被怀疑不忠的西班牙人和其他人遭受的痛苦就不止是歧视了。检审法院的法官们被流放，因为他们胆敢建议洪达承认西班牙的摄政会议，建立了一个新的最高法庭来代替检审法院。1810年8月，那些与第一次公开反革命图谋有牵连的人受到更严厉的惩处。此事发生在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要求同那里强烈的保王情绪发生冲突。在科尔多瓦反抗运动的倡议者中有保卫布宜诺斯艾利斯反抗英国人入侵的英雄圣地亚哥·利尼埃斯，他于1809年被解除总督职务后在此地退休。但是洪达的反应十分迅速，而且具有惩罚性，莫里诺就是坚持从严惩处者之一。不顾他过去的功绩，利尼埃斯和其他被认为是首恶的人立即一起被处死。

119

莫里诺个人的任务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他负责洪达的官方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利用报纸

---

* 雅各宾派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译者

① 《阿根廷共和国国家档案，包括从1810到1891年的全部文件》(共14卷，其中前3卷标题为“官方档案”，布宜诺斯艾利斯，1879—1891)第1卷第34页。此处引用的法令将印第安人民兵部队从原来同帕尔多人组合在一起的单位中调出，而与白人组合在一起，以强调他们比帕尔多人优越，与白人平等。

进行舆论准备，以便一旦时机成熟接受更彻底的变革。他本人撰写的文章几乎毫无掩饰地为共和政府和独立辩护。最令人震惊的是分期连载了莫雷诺翻译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小心地删去了有关宗教的章节，但是即便作了这样的删节，无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是只感到革命走得太远太快的人都不能很好接受。

对于革命步伐的不安情绪在内地各省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有一点已十分明显，只有使用武力，才能使总督辖区的边远地区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的管辖，至少莫雷诺是乐意接受这个艰巨任务的——可是新政府却通过和平方式同今天的阿根廷的大部分地区的寡头集团，至少同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派系，达成了和解。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过去为各省旧政权服务，如今在新政权下继续工作的，是同样的人，或者说是同一类人。他们除了为自己谋求更大权势以外，对激进事业不感兴趣，而对于处决利尼埃斯和出版卢梭著作这样的事多少有点不安。当他们的代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许诺给他们的洪达中的职务时，成为对马里亚诺·莫雷诺和他最接近的伙伴的明显威胁。莫里诺企图推迟他们的就任，但是即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一些人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顾虑，洪达主席科尔内略·萨阿韦德拉就是其中一个。他仍控制着军事机构，并且站在各省代表一边。当代表们12月中旬参加洪达时，莫雷诺承认失败并辞去职务。他接受了派赴欧洲的安抚性外交使命，这第一次外交流放非常有效，这位被免职的洪达书记死在途中，葬身海底。

莫雷诺的离去并没有结束莫雷诺分子萨阿韦德拉分子和其他大小派别互相之间的冲突。洪达成员经历了进一步的变化，到1811年下半年就完全解体了，接替它的是第一届三人执政团，不久又让位于第二届三人执政团，到1814年初又让位给一个最高执政。说实在的，各个派别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取得权力或保持权力。在下文中可以看到，他们不断地在上秘鲁和蒙得维的亚进行反对革命敌人的斗争，尽管他们同这些敌人斗争的热情时高时

120

低。1812年4月，他们禁止奴隶贸易，这是一个进步的（即便不是十分激进的）改革措施，而且是一件使英国人满意的事情。同年的另一项措施是吸收移民，但实际上主要的“移民”是英国和其他外国商人。他们由于具有良好的国外联系和使用新的贸易手段，立即控制了进出口贸易中一个不相称的份额。英国的影响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比在整个西属美洲更强大，更直接，而且对爱国者当局不放下“费迪南面具”和不公开宣布独立有一定关系；因为对一个被囚禁的君主佯装忠诚，使英国同时既当在欧洲反对拿破仑的西班牙的盟国、又当反叛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朋友的任务简单化了。

但是在某些人（包括残存的莫雷诺分子）看来，在支持独立问题上不采取坦率立场似乎应该受到谴责。莫雷诺分子是1812年1月建立的爱国社的骨干，他们鼓动人们更有力地去实现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爱国社的目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成员，同劳塔罗支部* 的目的和成员是重迭的。后者是一个按半共济会方式组织起来的秘密社团。在劳塔罗支部的创建者中有一个人——何塞·德·圣马丁——后来成为阿根廷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一直在西班牙军队里当职业军官，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回来。他的参加劳塔罗支部，并通过这个组织将革命推向更大的政治场面——这是出现新的政治力量正规军的典型方式，正规军的军官大部分是在革命开始后临时凑成的，而不是象他那样的职业军人，但它至少是一支能与主要由萨阿韦德拉分子组成的城市民兵相抗衡的力量。总之，莫雷诺的政治继承人同圣马丁和其他一些与劳塔罗支部有关的军队领导人的结合，使控制第一届三人执政团的萨阿韦德拉派残余无力招架，终于在1812年10月被推翻。接替它的第二届三人执政团是劳塔罗支部的工具，因此实际上，1813年1月开

121

---

* 劳塔罗（Lautaro）是印第安人首领，16世纪曾在智利领导反抗西班牙征服者的斗争。——译者

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第一届国会进行工作的制宪大会也是劳塔罗的工具。

从制宪大会这个正式名称可以看出，它本应该为过去的总督辖区、今后的“拉普拉塔联合省”制定一个宪法。但事实上始终没有通过，甚至也没有宣布独立，只是通过了国旗、货币和国歌，象征性地宣布了国家主权。制宪大会还颁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包括作为废除奴隶制第一步的生而自由法，废除法定刑讯和贵族头衔，禁止限定继承权以及其它许多改革。还采取了第一次反教权行动。禁止已被削弱而且臭名远扬的宗教裁判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争议，但是禁止30岁以下的任何人宣誓出家当修士或修女的法律是对各教派的一个严重打击，这是有意这样做的。1813年8月通过了禁止给婴儿在冷水中受洗礼的法令，它本身是一件小事，但表露了一种敌视传统宗教仪式的潜在倾向。实际上制宪大会的法案对社会基本结构并未造成冲击，因为除上秘鲁各省外，并不存在贵族头衔和限定继承权问题全然是无关紧要的事，生而自由的原则对奴隶制度的直接影响还不如一些越来越普遍的实际做法，如征召或没收奴隶入伍，倘若活着回来就获得自由。可是从这些法案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它们在阿根廷历史上获得“一三年制宪大会”这个雅各宾式称号是有道理的。正如大会通过的国歌中所说的：

人们，且听这庄严的呼声：

自由，自由，自由；

听听打碎镣铐的响声，

且看崇高的平等得到尊重。

在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边远地区中，上秘鲁首先引起阿根廷爱国者的一致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它拥有波托西白银矿，它的贸易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间商和税务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809年这个地区的多次骚动及其严峻后果表明，解放他们的军队一定会受到欢迎。于是一支军队出发了，翻山越岭，费力地进入上 122

秘鲁。指挥员是一位名叫胡安·何塞·卡斯特利的政治委员。他是律师，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成员和马里亚诺·莫雷诺的盟友。他和莫雷诺一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要将革命扩展到总督辖区最远的边界。1810年11月7日，革命军在绥帕查战役中赢得决定性胜利，然后立即进入波托西。在其它许多地方，包括丘基萨卡和拉巴斯，当地爱国者夺取了政权，并迅速与入侵部队建立了联系。

事情进展得实在太顺利了，卡斯特利和他的副手们胆子越来越大，几乎完全忘记了应该小心谨慎的道理。他们不但对失败的效忠王室分子过分严厉，对自发欢迎他们到来的人也盛气凌人。他们丑化对宗教的虔诚态度，公开显示自己不受宗教思想的束缚。他们为了争取印第安人的拥护，过多地让他们在法律上取得平等地位。在一个拥有大量印第安居民的地区，这样做不仅具有宣传意义，而且也有实际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白人甚至梅斯蒂索人都能接受。阿根廷人在军事上也不是经验丰富的忠于王室的司令官何塞·曼努埃尔·德·戈耶内切的对手。这次他又象1809年那样，从秘鲁来恢复秩序。1811年6月20日，他在的的喀喀湖附近的瓦基给爱国者一次毁灭性打击。接着是一次长距离大撤退。在撤退途中，阿根廷人不断遭到被他们解放的群众的骚扰。这次撤退直到胜利的效忠王室分子几乎进入图库曼后才停止。

123

到1813年，阿根廷爱国者重新掌握主动权，再次作为解放者把军队开进上秘鲁。这一次由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率领，他是一个严格地自学成才的军事指挥官，稳健而有条理，避免了上次所犯的严重错误。5月中旬，他到达波托西，在这里和其它地方普遍留下了好印象直到1813年11月为止。他在向南退却以前，试图炸毁波托西造币厂未遂。他的最终失败完全是由于西班牙将军华金·德·拉·佩苏埃拉指挥的敌方部队占有军事优势。1815年，另一次入侵又被佩苏埃拉击败。此后，阿根廷爱国者把注意力转向其它方向，而将上秘鲁的抵抗事业留给人数众多的游击队。他

们早在1809年就开始组织，从未被完全消灭。这些游击队招募印第安人入伍（在那个战区人人都这样做），但通常由梅斯蒂索人或不是贵族出身的克里奥尔人领导。他们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下的山谷中特别壮大，那里一个个小“共和国”接连兴起又衰亡。1816年以后，游击队的活动范围缩小了许多，但是今天的玻利维亚范围内的独立运动就是他们在进行，直到1825年一支解放军从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方向——秘鲁来到这里（见下文）。

把上秘鲁放弃给当地游击队，实际上保证了该地区最终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不管哪个政府手中，尽管那时对这一点还认识不清楚。巴拉圭事实上的分离更早一些。由于巴拉圭迟迟不肯承认1810年5月成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向它派出了一支由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指挥的远征军（他后来在上秘鲁遭到失败）。1811年初，远征军两次被巴拉圭的民兵部队打败。但贝尔格拉诺一撤退，巴拉圭人在1811年5月经过一次不流血政变成立了自己的洪达。他们开始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谈判，希望找到合作的基础。但实际上巴拉圭独行其是并不听从马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它几次短暂地——最后在1813年底——沦于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坚定的个人独裁统治。他是一个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他的统治得到说瓜拉尼语的梅斯蒂索群众的支持。弗朗西亚不信任布宜诺斯艾利斯，设法使巴拉圭与阿根廷脱离接触，主要不是停止商业联系，而是防止阿根廷政治混乱的影响。① 在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比巴拉圭不服从更大和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操心。

124

对波特纽人（即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来说，一个比巴拉圭更重要的问题是蒙得维的亚和它的腹地（即现在的乌拉圭）的局势。1811年初，乌拉圭的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对西班牙统治进行

---

① 见约翰·霍伊特·威廉斯著《巴拉圭在弗朗西亚博士统治下的孤立》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52/1（1972），第103—109页。

第一次有效打击。他是一个在农村拥有巨大财富并曾担任公职的蒙得维的亚家族的后裔。阿蒂加斯在乡村高举起义旗帜，他与高乔人、定居移民和中等地主的良好关系使他赢得一支强大的追随者队伍。他最初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的最高地位。但不是无条件支持，因为他脑子里有建立一个松散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各省邦联的想法，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继掌权的政府都不同意这样的安排。阿蒂加斯还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解放乌拉圭并不打算真正承担义务，它跟依然盘踞在蒙得维的亚的西班牙部队和葡萄牙人达成停战协议就是证明（葡萄牙人看到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仍有重新取得立足点的机会，乃于1811年派出一支“绥靖”部队，但第二年即离去，这是因为英国人担心这样会使局势不必要地复杂化，因而施加压力的结果。）18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终于迫使蒙得维的亚投降，但至此与阿蒂加斯的关系也完全破裂。事实上，阿蒂加斯正在成为巴拉那河沿岸所谓滨海地区各省反波特纽联邦派的领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得不同时对付阿蒂加斯和其他不同意它的人——更不用说始终解决不了的上秘鲁问题
125 了。它无法使阿蒂加斯屈服，最后只好在1815年2月将蒙得维的亚让给他。

阿蒂加斯一旦控制“东岸”*全境，即在他领导下着手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在农业政策方面，他采取了一些在独立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独创办法。他面对的问题是畜群锐减，大片土地被它们的主人抛弃。他的解决办法是无偿没收属于那些已离境（相当多的情况是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坏欧洲人和更坏的美洲人”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优先分给自由黑人、属于同一阶级的桑博人*、印第安人和贫穷的克里奥尔人。”① 由于这种措施，人们

* 在殖民统治时期，乌拉圭一向被称为“东岸”(Banda Oniental)，因为它位于乌拉圭河以东。——译者

* 桑博人是黑人和土著人的混血种。——译者

① 纳尔逊·德·拉·托雷、胡利奥·C·罗德里格斯和露西亚·萨拉·德·托龙合著《阿蒂加斯的土地革命：1815—1816》（蒙得维的亚，1969）第167—168页。

把阿蒂加斯称为南美洲第一个伟大的“土地改革家”。它确实反映了社会问题上的一种平民主义倾向，也反映了阿蒂加斯的一种设想：使土地恢复生产最快的方法是把它们交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小农和小牧场主。但是阿蒂加斯没有时间去实现他的全部计划，1816年他不得不去对付来自巴西的葡萄牙人的再次入侵。这一次英国人没有进行有效干预，波特纽人更没有。加上，侵略者得到数目可观的乌拉圭人的拥护，这些人对阿蒂加斯的土地改革不满而且(或者)确信他的事业毫无希望。到1820年初，整个“东岸”已在葡萄牙人控制之下。

结果，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革命在第二个五年里，目标和行动都有所收缩，这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存在广泛不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这种不满既来自保守势力对革命改革的不信任，也来自地方势力对政治上的集中控制的怨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上层阶级的大多数始终不太愿意跟新政权靠得太紧，他们对强制性借款和其它横征暴敛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感到彻底的厌倦，对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也已多少有点蔑视，自810年以来，这些人已把“革命事业”当成自己的专业。①

在首都和内地，革命领导对付外部敌人的失败是革命理想幻灭的又一个根源。此时在整个西属美洲，起义运动也正在接近它 126 的最低点，同时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引起了一股反革命浪潮，越来越反动的费迪南七世在西班牙的复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这个时候约束一下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革命活动显然是有利的，1815年4月最高执政官卡洛斯·马里亚·德·阿尔韦亚尔的倒台也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他是劳塔罗支部的另一个创始者，虽然他最近曾支持寻求与西班牙和解的万不得已的计划——如果失败，就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他终究是莫雷诺激进传统的继承

① 霍尔珀林·唐伊著《政治、经济与社会》第204—205页，210—213页并散见其它各页。

人。内地还把他看成是执行波特纽人最可憎的指令的代理人，对他的权力的反抗也是从内地开始的。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把运动接了过来，阿尔韦亚尔先前的主要依靠力量——大部分军队——如今转过来反对他。

阿尔韦亚尔先是被一个临时执政取代，然后又是另一个。与此同时，选出了新的制宪会议代表，并于1816年3月在图库曼召开——这显然是对各省不满的让步。图库曼会议比“一三年制宪大会更加保守，几乎一半代表都是神甫，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最终在1816年7月9日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但与其说这是革命战斗性的标志，不如说它已认识到，随着专制制度在西班牙复辟、继续宣誓忠于费迪南已属荒谬可笑。实际上，宣布独立的代表也就是那些主张新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代表。有些人认为最好能找到一个前印加皇帝的合适后裔，拥戴他为“拉普拉塔联合省”国王，或许还可以让他娶一位葡萄牙公主，以便得到更多保护。另外一些人则寄希望于找一个欧洲王子，以后几年还派出一些试探者到欧洲去物色合适人选。这些计划结果全成泡影，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当时的情绪。新国会想重新开始它的前任所珍视的改革工作，结果也一事无成。

1816年5月，图库曼国会选举它自己的代表，胡安·马丁·德·普埃伦东为最高执政，他象国会本身一样千方百计地避开自由主义的改革。1817年国会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还紧密地配合国会一起工作，开始认真地制定宪法，并于1819年完成。结构完整的首届政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由中央行政机关直接任命各省省长；社会政策上是保守的，以有限的选举权和半谘政性议会为特征；表面上是共和政体，但一旦时机成熟，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排一个王室国家元首，但是此时君主制度的潮流已开始消退，不断寻找国王的势力对普埃伦东和国会在国内的声誉已无任何好处，他们在葡萄牙人占领乌拉圭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对他们也没有帮助。同时，新宪法的中央集权主义在其它省份引起了强烈

127

反抗。在各方面日益增强的反对面前，普埃伦东在1819年6月辞去最高执政职务，但是他的继任者更少平息风潮的能力。1820年初，执政政府和国会双双解体，已经独立的阿根廷陷于无政府的分裂状态。

从西属美洲独立更广阔的画面上来看，人们记住普埃伦东政府主要是因为它在丢弃阿蒂加斯不管的同时，曾帮助何塞·德·圣马丁建立功勋。圣马丁是一个驻札在阿根廷的西班牙军官的儿子，他本人作为一名西班牙军官也曾立下战功。可是，向往自由的感情和对他少年时代离开的故乡的热爱使他在1812年回到了美洲。他不但通过劳塔罗支部卷入了革命政治，而且贡献他的精力和才能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军事机构。他回到家乡仅两年即授命指挥北方军，负责保卫拉普拉塔河地区已经获得自由的各省，反抗以上秘鲁为基地的保王势力，并最终向那些安第斯山区的堡垒再次进军。圣马丁并不喜欢这项任务，因为他逐渐感到，自1810年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把占领上秘鲁作为战略目标是错误的。当然，上秘鲁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管辖范围，它又位于前往南美洲保王分子反抗的神经中枢利马的最直接的通道上。但另一方面，经验已经证明从南面去征服并控制它是困难的。圣马丁认为，进军利马的一条较好路线是借道智利，从智利经海路抵达秘鲁海岸。当时智利的爱国者政府正遭到秘鲁总督派来的军队的进逼。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是合乎逻辑的战略估计。圣马丁进一步相信，占领利马将使他迂回取得秘鲁的其余部分，上秘鲁和下秘鲁都将到手。这个想法后来证明是不太合乎逻辑的。 128

圣马丁被调往门多萨，任库约地区监督官。他接任到职时，安第斯山脉另一边的智利爱国者政权正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他推断智利很可能比上秘鲁更愿意支持解放军。他跟普埃伦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强烈支持独立宣言并鼓励君主立宪思想。但最重要的是，他聚集了兵员，准备了给养。智利逃亡者是人力的一个来源，另一个来源是这个

地区的奴隶，绝大多数强壮的男性奴隶都参加了圣马丁的安第斯山部队①。普埃伦东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他送来奴隶，他最后开拔时大约一半步兵是黑人。在门多萨建立了制造火药乃至大炮的工场，周围其它省份也尽其所能作出贡献。到1817年初，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支大约5,500人的军队穿过三个不同的安第斯山隘口向智利进军，在行进途中小心谨慎地和谐配合，以便做到最大程度地使敌人惊慌失措。

1817年初，圣马丁出兵去解放的智利是在效忠王室的反革命势力掌握之中，智利的"古老的祖国"已被彻底肃清，——"古老的祖国"是1810年9月在圣地亚哥建立第一个洪达后成立的实验性自治政府。这个爱国者政府地区之间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纠纷始终不断，直至1814年瓦解。在此期间，革命也不断激化或"深化"，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并无具体计划。

智利最早的洪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对国际贸易开放港口和选举国会等（国会于1811年7月开始工作）。洪达的权威人物是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但是他很快同国会多数发生冲突，因而退到智利南部的主要港口和居民中心、他的支持者的主要基地康塞普西翁，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的省级洪达。他在圣地亚哥的职位空缺则由"古老的祖国"中积极领导革命激进行动的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填补。卡雷拉也象政治舞台上的大多数演员一样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政治作风平易近人，真诚地争取非贵族群众的支持；同时，他是刚从半岛归来的西班牙军队中的前克里奥尔军官，在新政权的羽毛未丰的军队中得到普遍的尊敬和拥护。良好的家庭关系、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军队的支持，使他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打不倒的人物。

129

① 何塞·路易斯·马西尼著《门多萨的奴隶制度，独立时期》（门多萨，1962），第20—23页。

卡雷拉首先清洗国会中的保守分子，为通过进步措施铺平道路，如奴隶出身子女获得自由。1811年底前，他已完全解散了议会，使自己成为独裁者，并以此身份主持进一步的改革，如制定国旗，建立智利第一家印刷厂，可是他没有实行任何可以称得上结构性的改革。奴隶出身子女获得自由法在智利也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奴隶比较少，大多数在城市就业，或当家庭佣人。引进印刷术无疑更为重要，它导致了政治性报刊的诞生，从而鼓励一小批知识分子去考虑更广泛的政治选择，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建立共和政府完全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建议。卡雷拉个人当然更愿意选择独立，罗萨斯也是一样，但是宣布独立的时机始终没有到来，共同的目标也没有把罗萨斯和卡雷拉结合到一起。1812年7月，一次当地起义推翻了康塞普西翁洪达，此后卡雷拉使罗萨斯亡命异乡。

可是卡雷拉对付不了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秘鲁总督阿瓦斯卡尔。阿瓦斯卡尔在1813年初派遣一小支远征军开赴智利。卡雷拉亲上前线指挥反抗入侵者的战斗。他事先在圣地亚哥建立一个洪达代替他在离职期间统治国家，但是洪达趁他不在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后来成为他的主要政敌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取代他。奥希金斯是前智利都督和秘鲁总督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之子，这位新爱国主义指挥官曾在英国受过教育，在那里受到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主张西属美洲独立思想的影响。在作风和气质上（尽管不是在根本目标上），他比卡雷拉更为保守。奥希金斯执掌了最高指挥权，但是在反抗现已得到大量增援的秘鲁军队的战斗中，并不比卡雷拉更成功。1814年5月，他同意停战，停战协定允许智利在西班牙统治下实行有限的自治。但是这个协定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同年7月，卡雷拉发动另一次政变，恢复了他的独裁统治，引发一连串自相残杀的冲突，使爱国者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以致1814年10月1日和2日在圣地亚哥以南约80公里的兰卡瓜战役中大败于保王分子。兰卡瓜战役导致了“古老的

祖国"的崩溃。卡雷拉、奥希金斯和其他许多人走小路到达门多萨，在阿根廷避难。复辟的西班牙政权对留下的人进行严厉镇压。一些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送往遥远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监禁，还有许多人被没收财产。但是长期镇压激起了游击队的反抗，圣马丁在1817年初突然进入智利时，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

2月12日圣马丁和敌人在查卡布科(位于圣地亚哥通向门多萨主要山隘的中途)交战时，他已经从他的安第斯部队各单位集合了大约3,500人，包括相当数量的智利人。卡雷拉不在他们中间，因为他给圣马丁留下了讨厌和不可靠的印象，而奥希金斯得到阿根廷领导人的信任，成为亲密的合作者。事实上，奥希金斯在查卡布科指挥两个爱国者师中的一个，一时性起，没有等另一个师完成侧翼迂迴就发动正面进攻，几乎造成整个战役的失败① 。但是爱国者赢得了胜利，未遭遇进一步的反抗进入圣地亚哥。在那里匆匆召开的立法会议建议圣马丁领导智利政府，他立即拒绝，让给奥希金斯。

圣马丁在查卡布科获胜后，智利仍有大量敌军部队。他们得到来自秘鲁的增援后，1818年3月在坎查拉亚达大败圣马丁军，但是4月5日圣马丁在圣地亚哥外围的迈波赢得另一次胜利。这是 131 一次决定性胜利。保王分子在智利南部保留一个据点，另外有一支游击队在奇洛埃岛抵抗了好几年。他们在瓦尔迪维亚还占领一个重要海岸要塞，据称工事坚固，难以攻克，但在1820年2月被英国海上冒险家科克伦勋爵攻克。科克伦受命指挥智利一支小小的但在发展中的海上部队。排除那个敌人据点后，圣马丁才能开始进行他的第二阶段战略计划，那就是解放秘鲁。

进行秘鲁战役的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为奥希金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从已经解放的智利取得物质支援，因为阿根

① 莱奥波尔多·R·奥恩斯坦著《查卡布科战斗内幕》，载《调查与文章》(布宜诺斯艾利斯)，10/1(1971)，第178—207页。

廷人越来越严重地卷入国内纠纷，不大可能给予很多帮助。奥希金斯成功地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他控制了被保王分子放弃的行政机构，征收捐税，查封敌产，并强有力地运用自己的权力顶住爱国者阵营内部的所有挑战。卡雷拉集团算不了是个什么问题，因为何塞·米格尔和他的两个兄弟仍在阿根廷，他们插手阿根廷事务，企图最终重新掌握智利，结果却被阿根廷人处决。总之，智利政府工作做得很好，满足了圣马丁最迫切的需求，1820年8月他扬帆启航时，舰队共有23艘战舰和运输船，主要是由智利资助装备起来的，是智利政府一笔令人难忘的人力和物力支出。舰队指挥官科克伦和大多数高级海军军官实际上都是外国雇佣军，但是船上的智利人仍然超过其它国籍的人。这次远征的结局将在下面叙述。

奥希金斯政府终于在1818年2月宣告智利独立，这个姿态同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不一致的。在智利的情况下，奥希金斯实行的某些改革是比较大胆的，如法律禁止限定地产继承权、废除世袭爵位等。大部分西属美洲地区在独立时期都或多或少象例行公事一样实行过这些措施，但是在智利引起了严重的不满，这表明了智利社会中反抗变革的势力的强大。与此同时，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智利人，本来也许会欢迎一定程度的谨慎的社会改革，可是奥希金斯的独裁政治制度和他极端信赖一个不得人心的顾问——前保王分子何塞·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阿尔德亚引起了他们的对抗。奥希金斯1818年勉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宪法，宪法赋予他无所不包的权力，只受一个几乎是谘询性质的参议院的限制，而参议院成员都由他自己指定。参议院阻挠限定继承权法令的贯彻，尽管这不太符合自由立宪主义的标准。1822年，奥希金斯允许以一个比较符合传统的共和主义宪章取代1818年宪法。可是，他操纵代表选举（宪章要由代表们起草），使宪章的条款仍能保证他自己几乎无限期地继续执政。这样，“宪章”当然不能平息对政治制度的不满，加上对奥希金斯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长期愤恨，以及他

不能平息南方保王分子的反抗，终于在1822年下半年和1823年初接连发生骚乱和密谋事件。奥希金斯承认失败，于1823年1月25日放弃权力。

秘鲁军队参与镇压智利的“古老的祖国”，不过是秘鲁在独立斗争的大部分时间内自始至终充当西属南美洲保王势力的主要基地的一次表现而已。基多和上秘鲁已在早些时候(不止一次)被同一个势力重新征服。秘鲁的这种作用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秘鲁自身的革命力量较弱，二是由于何塞·德·阿瓦斯卡尔总督成功地建立了他的军事机构。阿瓦斯卡尔竭尽全力扩大并加强正规部队；还大规模扩充秘鲁民兵，民兵的训练和装备水平还存在缺点，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迅速和大规模增加军队实力的一种办法。到1816年，军队和民兵加在一起，名义上已超过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兵。有战斗力的兵力稍微少一些，但潜在敌手的情况也是一样。当然，秘鲁的中心地理位置提高了它的军事重要性。必要时，总督可以很容易地向北、向东或向南派遣增援部队，去解救被围的保王分子。阿瓦斯卡尔在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增援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内的战场，也十分果断坚决，这意味着利马恢复了在18世纪行政改革中所失去的一些阵地。

133

这种情况显然使秘鲁的克里奥尔人感到满意，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容忍，是十分重要的。秘鲁成为可靠的保王派基地，也意味着它有社会从1812年西班牙自由主义宪法中得到好处，如由人民选举产生市政委员会和省代表团，新闻出版的相对自由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其它让步。秘鲁甚至在加的斯议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派出了8名当选代表，还没有算在西班牙的秘鲁居民，常常要求他们在国内代表到达以前临时参加西班牙议会工作；有一个秘鲁人最后成为议会的议长。所有这一切，也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感到满意，然而半岛新政权未能在代表权上给西属美洲真正平等，不可避免地动摇了那些曾经期望通过帝国的政

治改革解决殖民地不满的人的信心。

极端保守的阿瓦斯卡尔对这个自由主义插曲并不感到高兴。他毫无热情地公布了宪法，对实施宪法也是半心半意。1814年费迪南重新登上王位并废除宪法后，总督同样迫不及待地在殖民地恢复了专制制度。秘鲁人进一步发现，无论有无宪法，他们为捍卫帝国完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他们必须交纳税款和特别捐献；对这一点自由派和专制派都不满意。有些人，甚至在秘鲁，公开支持革命道路，结果使总督政府再也不能集中全部注意力对付秘鲁边界外的起义。在利马本地，也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密谋事件，有的确有其事，有的只是怀疑，虽然没有一次成功。各省也零零星星发生过短时间的混乱，有些是受上秘鲁起义活动某一时期取得进展的影响(如1811和1813年在塔克纳)，另一次1812年发生在瓦努科，开始只是印第安人为了某些凌辱他们的具体事件表示抗议，但后来得到对当局不满的当地克里奥尔人的支持，开始具有更多的政治性。边远地区不满更为严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离阿瓦斯卡尔较远，同时对政治上和经济上屈从于利马也十分愤慨。

各省起义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814年的库斯科起义。它开始是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抗议库斯科检审法院的专横统治，间接地抗议利马的领导，后来迅速建立新政府，甚至得到主教的支持。后来起义者争取到机会主义的印第安人老年酋长马特奥·加西亚·普马卡瓦参加。多年前他曾帮助殖民政权反对图帕克·阿马鲁，不久前又参加反对上秘鲁的起义者。他是个有价值的人物，因为库斯科革命者必须对付阿瓦斯卡尔的毫不留情的敌对行动，而普马卡瓦能够召集这个地区的印第安居民投入战斗。事实上，动员印第安人愈多，改变主意的克里奥尔人也愈多。运动扩展到拉巴斯和阿雷基帕，但最终还是完全被击败。从一开始，运动的目标就有点含糊不清，领导者的目的五花八门，从谋求个人发迹，解决具体不满，到争取完全独立。库斯科起义(1814年—1816)瓦

134

解后的几年内，秘鲁高原地带的骚乱和利马的惊慌逐渐减少，其它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纷纷被保王派击败，或者进入暂时静止时期。

阿瓦斯卡尔1816年回西班牙，把完全效忠王室的秘鲁交给新总督华金·德·拉·佩苏埃拉，他也是个经验丰富的军官。然而国库空虚，采银业——殖民地后期唯一逃脱普遍经济衰落的工业——遭受浸水和战时混乱的严重打击，包括冶炼白银所需的西班牙水银供应中断。军事上，拿破仑战败后，秘鲁得到西班牙少量正规军的增援，但他们中间有些军官是自由主义派别的秘密成员，他们的存在不利于团结。与此同时，其它地方的独立运动（尤其是1817年后的智利）恢复了势头，财政和其它方面的压力再次增加到秘鲁身上，这时甚至有信念的效忠分子也已对斗争感到厌倦。智利的独立还引起了其它一些复杂问题，例如智利的谷物供应中断，以前由秘鲁北海岸生产者控制的智利烟草市场丧失，悬挂智利旗的船只开始袭击秘鲁港口和西班牙船队。因此更多秘鲁人开始考虑转到对方去可能对自己更有利，这不足为奇。他们并不打算急忙这样做，但是1820年9月圣马丁的到达迫使他们立即表态，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135 阿根廷的这位解放者（见上文）率领4,500人的部队先在利马以南约200公里处的皮斯科登陆，接着又进入首都以北不到200公里的瓦乔。他在上述两地基本上采取小心等待的政策。他知道1820年1月西班牙发生革命，不仅使仍在南美活动的王室部队丧失了获得增援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成立了新政府。新政府正着手恢复宪法并准备通过强制手段解决殖民地冲突。他于是利用每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出现过多次——与对方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提出了就结束战争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办法是建立一个在西班牙王族一位亲王统治下的独立君主国。他后来说提出这个建议只是一种谈判策略，但无疑这是圣马丁个人愿意看到被采纳的建议。谈判最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结果，但在此期间西班牙在秘

鲁的领导突然发生变动，一次军事政变废黜了倒霉的佩苏埃拉总督，把何塞·德·拉·塞尔纳扶上了台。

在探索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前景时，圣马丁没想他的到来可能会鼓舞秘鲁人公开宣布独立，这样就不需要再发动全面进攻。他在他建立的据点确实受到普遍欢迎，接近1820年年终时，一连串的北部沿海城市自发地投奔爱国者一边来。在中部高原地带，游击队的抵抗活动也很高涨。但是利马没有改变立场。1821年7月，西班牙当局自动撤出利马，进入安第斯高原，圣马丁这才未遭抵抗进入利马，并于7月28日正式宣布秘鲁为独立国家。由于他在秘鲁身边没有奥希金斯这样的人物，他立即同意以护国者的名义担任秘鲁的临时统治者。

保王派撤出利马，不仅是由于感觉到事态发展正在转向对他们不利，而且还由于一种现实的估计，认为秘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资源不在寄生性城市和它的周围，而主要在高原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站稳脚跟，进行抵抗。对利马的圣马丁来说，他发现自己切断与高原地区的联系后，要维持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并养活5万平民相当困难。他被迫征收特别捐献，可是并不比前政权征收的捐献更受老百姓欢迎。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他采取严厉措施，驱逐那些不积极拥护新政权的半岛西班牙人，并没收他们 136 的财产，结果引起利马大部分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对立，他们总的说来并不真正赞同爱国者的事业，而且通过联姻等多种多样的关系与西班牙人连结在一起。利马人将“迫害”西班牙人的事件主要归罪于圣马丁在新政权中的主要合作者——阿根廷革命家贝尔纳多·德·蒙特阿古多，但不可避免地也损害圣马丁本人的声誉。由于采取了规定修道士宣誓出家的最低年龄等措施，他冒犯了比较保守的教会人士；又由于征召地主们的奴隶入伍和规定奴隶生下的子女获得自由的原则，得罪了沿海河谷地区有势力的地主。另一组法令废除了印第安人的纳贡义务和强制性劳役，甚至禁止使用“印第安”这个词，然而实际效果甚微，因为许多印第安居

民都在西班牙人控制的地区；但上述法令唤起秘鲁克里奥尔人的热情有限。此外，和智利奥希金斯的情况一样，圣马丁在秘鲁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勉强提出了一个政治方案——圣马丁赞成以君主政体作为独立政府的最终形式——这个方案疏远了一些本来最能接受上述法令的人。

在此期间，圣马丁继续避免与敌人发生全面冲突。他同高原地区游击队保持接触，但是既不给予有效支持，也不采取果断行动。他继续希望时间会对他有利，但是缺乏足够的资源基地和利马城内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事态的发展是否能如他所愿。或许他本人也产生了这种疑虑，因而急急忙忙在1822年 7 月动身前往瓜亚基尔，去同他的北方伙伴西蒙·玻利瓦尔进行商谈，后来又自愿完全放弃秘鲁战场，将解放秘鲁(以及上秘鲁)的任务交给玻利瓦尔去完成。

一支部队从南美洲北部进入秘鲁，打破了秘鲁的僵局。南美洲北部的独立运动已从1816年的低点逐渐恢复过来。恢复的主要设计师是玻利瓦尔。他在新格拉纳达最后崩溃前从智利启程前往西印度群岛。他首先在牙买加立足，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牙买加 137 书信》(1815年9月)，书中除再次批评早些时候的爱国者政权的体制外，表达了他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然后他前往海地，在那里成功地争取到亚历山大·佩蒂翁总统和一些外国商人对他事业的支持。他在海地重新补充人员、船只和军事装备后，1816年5月向委内瑞拉东海岸进军，也就是巴勃罗·莫里略将军重新征服波哥大的同一个月。玻利瓦尔的远征未能成功，9月返抵海地。但在重建他的部队后，12月28日又回到委内瑞拉。此后他再没有离开南美洲。

当时，委内瑞拉的状况日益有利于爱国者运动的复苏。总是有一些反叛游击队在各地出没，始终没有被完全消灭，在平原地区还特别强大(博韦斯为了掠夺第二共和国曾在这里招募新兵)。

在阿普雷地区，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率领一队平原弟兄逐渐扩大对保王势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的平原人(以及委内瑞拉的一般下层群众)愿意同爱国者共命运，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保王派的唯一成功之处是他们现在能提供更吸引人的战利品。他们还开始背上了阶级和种族对抗的包袱，因为1815年上半年莫里略到达后接过了博韦斯和其他群众游击队领袖为国王夺回的地盘，这仅仅是走向重建过去的政治和军事结构的第一步。职业军官和文官(无论是“半岛人”还是克里奥尔人)如今凌驾于博韦斯之类游击队头目和他们的帕尔多选民之上，他们感觉受到冷遇。同时，在保王派军官和官僚之间也不乏冲突，主要原因是后者抵制马德里授予莫里略的事实上的绝对权力，而莫里略前往新格拉纳达时(1816年12月才回到委内瑞拉)又把它交给自己的一个军官。这种冲突削弱了保王派的事业；加之委内瑞拉的资源极端贫乏，经过5年激烈冲突后，已无法支撑一个井井有条的文官政府和军事机器去抗击反叛分子。

这并不是说，玻利瓦尔的任务是轻松的。他在1816年底回来后同一些仍在委内瑞拉东北部活动的分散的爱国者团体接上了头，并对敌人保持压力。同时，在爱国者阵营中也重新出现不和，特别是在玻利瓦尔和圣地亚哥·马里尼奥将军之间。马里尼奥也是从西印度群岛避难回来，他对玻利瓦尔在他过去的活动地盘内自称领导感到恼火。多少是为了避免同马里尼奥发生摩擦，玻利瓦尔把他的军事行动转向南边的奥里诺科河，爱国者1817年7月17日在那里获得一次显著的胜利：攻占安戈斯图拉城。这个给人印象不深的内河口岸成为第二次再起的委内瑞拉共和国事实上的首都。远洋货船可以直达该城，从而提供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宝贵途径。从安戈斯图拉经奥里诺科河及其支流，还很容易同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平原上的爱国者据点建立联系。 138

玻利瓦尔利用奥里诺科河道建立了同派斯等人的联系。1818年1月，他亲自拜访了这位平原人首领，通过派斯把平原人争取

了过来，派斯几乎无条件地承认他为最高首脑。玻利瓦尔在1817年10月颁布过一项法令，许诺按等级高低将敌产分配给部队和军官；实际上这是正式批准并扩大派斯非正式作出过的许诺。玻利瓦尔还采取其它办法扩大他对派斯的支持，例如将解放奴隶包括进他宣布的目标（他自1816年第一次回到委内瑞拉以来一直在这样做），又如注意让帕尔多士兵同样得到升迁。他的废除奴隶制的诺言只对服兵役奴隶立即生效，但这种做法符合玻利瓦尔所主张的某种军事平民主义。他努力履行克里奥尔人关于给予帕尔多人平等的诺言也符合这种主张，但有一定限度。级别最高的帕尔多将军奥努埃尔·皮亚尔由于大胆地威胁要再次提出种族问题反对玻利瓦尔，终以虚构的险谋罪被处决。当然，玻利瓦尔本阶级成员控制着绝大多数的最高级指挥岗位以及安戈斯图拉文官政府的几乎所有领导职务。但是玻利瓦尔不愿意使共和国的事业再次被看成仅仅是少数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的事业。

1818年，解放者企图冲出平原，进入安第斯山区，未获成功。他的平原人骑兵不是莫里略老练的山地步兵的对手。但是莫里略

139 在平原上对玻利瓦尔和派斯也无法得手。玻利瓦尔期望陆续到来的欧洲志愿军能使天平最终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这些志愿军大部分是对拿破仑战争感到厌倦或失去信心的退伍兵，他们携带海外代理人为共和军购买的不同数额的军事装备，经安戈斯图拉港纷纷到达。玻利瓦尔不满足于让自己陷入纯粹的军事准备工作。他还在安戈斯图拉召开选举产生的国会，将共和政权置于更正规的合法基础之上。这项措施符合玻利瓦尔当前政策中的另一个内容，即争取主张制定自由主义宪法的非军职爱国者（也就是他将第一共和国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信任与合作。1819年2月15日在向大会所作的开幕词《安戈斯图拉演说》中，玻利瓦尔引用孟德斯鸠的思想，强调制度适当特定工作环境的必要性，他还用暗淡的措词描绘西属美洲的环境说："在愚昧、暴政和罪恶三重

束缚下，美洲人民不可能获得知识、权力或美德。……”① 因此，玻利瓦尔认为，象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地方的政府，尽管表面上是共和政体，应该通过限制选举权、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和世袭的参议院，再加上由负责促进教育和良好习俗的杰出公民组成的“道德力量”来抑制平民的不守秩序的本能。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声明，它概括了玻利瓦尔政治理想的持久的特点。然而在同一篇演说中重新号召废除奴隶制和有效落实士兵退伍金等，表明玻利瓦尔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灵活和比较开明的保守主义。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他号召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最终实行联合。

安戈斯图拉会议及时地通过了一部宪法，其中吸收了玻利瓦尔的某些（虽非全部）政治思想，但将奴隶问题搁置到以后再解决。在此期间，解放者已开始进行他所有战役中最惊人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使他从委内瑞拉的平原地区到达新格拉纳达的心脏地带。这个战略包括让加拉加斯在莫里略手里多留一段时间，同时利用新格拉纳达的敌人军事上较弱而群众情绪对他有利的因素。莫里略1815－1816年重新征服新格拉纳达后，死刑、流放和没收财产的浪潮使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对西班牙丧失好感，而增加捐税、任意征兵和摊派劳役引起了社会上其他阶层的愤恨。不时有游击队出现，虽然迄今尚未真正威胁西班牙的统治。自从“古老的祖国”崩溃后，新格拉纳达平原地区的卡萨纳雷省成了共和派逃亡者的避难所。玻利瓦尔（他很少注意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之间理论上的边界）曾派遣他们中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的人（过去学过法律，现在是将军）到那里去建立一个前进基地。这个任务桑坦德完成得很顺利，这也是玻利瓦尔决心西进的一个原因。

140

即使如此，依然障碍重重。在穿过雨季洪水泛滥的卡萨纳雷平原的艰难行程后，接着要翻越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东侧的高山

① 《玻利瓦尔选集》第1卷，第176页。

峻岭，下山后先要经过海拔3,900米高的皮斯瓦荒凉高寒地带，以后才到达气候比较宜人的高地河谷。平原人习惯于炎热气候，不能忍受寒冷，而英国的退伍军人一旦丢掉鞋子，就什么事也办不了啦。一路上，玻利瓦尔的军队还得同何塞·马里亚·巴雷罗指挥的保王军先头部队不断作战。但他们终于通过这些艰险，并开始得到新的兵员和给养。1819年8月7日的博亚卡战役使战斗达到高潮，该地在通哈以南不远通向波哥大的大道上。这次战斗持续了不到两小时，卷人的人数不多，玻利瓦尔和巴雷罗双方投入的兵力不超过5,000人，共和军方面略占优势，但结果玻利瓦尔大获全胜。保王军被摧垮，巴雷罗本人被俘，通向波哥大的道路已畅通无阻，三天后玻利瓦尔未遭抵抗进入该城。西班牙在新格拉纳达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顷刻崩溃，爱国者获得了可靠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运动取得了新的势头，使他们后来不仅完成新格拉纳达的解放，而且返转来向委内瑞拉前进，并在晚些时候进攻保王势力根据地基多和秘鲁。

博亚卡战役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正式建立历史学家称之为“大哥伦比亚”的国家，但当时只称哥伦比亚。安戈斯图拉国会1819年12月17日宣布，前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所有领土合并为一个国

141

家。这不仅符合玻利瓦尔明确表示过的愿望，也符合实际情况：当时从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招幕部队并不仔细划分，玻利瓦尔在两地之间来回穿梭，形成了一个军事统一体，如今只需要赋予政治形式和合法地位。至于安戈斯图拉国会是否是赋予这种合法性的适当机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它只是象征性地代表新格拉纳达，依然完全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基多院长辖区也没有代表参加。但凡是玻利瓦尔的军队到过的地方，都接受国会的法令。在选举大哥伦比亚制宪会议代表以前，安戈斯图拉国会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性政府机构。制宪会议最终于1821年5月在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边界上的库库塔召开。

从1819年解放新格拉纳达中部到召开库库塔制宪会议，这期

间很少重大军事行动，但是爱国者控制地区共和主义统治者的不断巩固，敌人的战斗意志日益削弱。博亚卡战役已使保王派士气涣散，接着1820年1月又发生西班牙起义，使宗主国本身再次陷于混乱。1820年西班牙爆发的起义导致了自由派政权的恢复。根据新的指示，莫里略将军设法找到玻利瓦尔，希望和他共同宣布休战，休战协定于1820年11月26日在特鲁希略签署（1813年玻利瓦尔在此地发表他的"灭绝战"声明）。西班牙新政府希望这个协定能成为在西班牙人与美洲人和解的基础上走向结束战争的一步，然而如今西班牙同叛乱分子作为平起平坐的正式的交战一方打交道，这无异承认自己的虚弱。莫里略本人就怀着十分勉强的心情参加停战谈判，不久就放弃了指挥权。他的继任者米格尔·德·拉托雷决定提前结束停战，以抗议爱国者鼓动保王分子叛离。玻利瓦尔无意表示歉意，相反，他在委内瑞拉国土上发动了最后一次大战役。1821年6月24日，巴伦西亚正南面的卡拉沃沃战役使战斗达到顶点。双方卷入的兵力大约是博亚卡战役的两倍，但结果却是一样。拉托雷的军队被摧垮，几天后加拉加斯最后一次获得解放，委内瑞拉终于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

玻利瓦尔还获得了另一方面的成功。大哥伦比亚制宪会议在卡拉沃沃战役期间召开。它重申了安戈斯图拉会议的合并法令（尽管仍然没有厄瓜多尔代表参加），接着又为新共和国通过了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宪法，从而拒绝了回到联邦制的要求。玻利瓦尔认为联邦制就是早先的爱国者政权软弱无力的原因。此外，宪法体现了比较传统的自由共和主义，包括三权分立、保障个人权利以及其它各种模仿英语美洲和欧洲模式的内容。尽管宪法中写进了在紧急情况下行政部门可以行使"非常权力"这一条——这几乎是早期和后来西班牙语美洲宪法中千遍一律的条文——，但赋予立法部门广泛权力使玻利瓦尔感到担心，他为此以及其它原因认为大哥伦比亚宪法在自由主义方面无疑走得太远了。更有甚者，库库塔国会颁布的其它一些基本改革同样也普遍具有自由主义倾 142

向。其中之一是生而自由法，即女奴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享有自由，但要求他们为他们母亲的主人劳动到18岁。这项法律把1814年安蒂奥基亚通过的制度扩大到整个共和国，意味着玻利瓦尔关于结束奴隶制的许诺最终得到了贯彻，尽管有它的局限性（这个法律还包含以下条款：设置一项特别基金以赎买不幸在该法律颁布以前出生的奴隶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有很少数奴隶用这种办法获得自由）。新格拉纳达“古老的祖国”政权在库库塔恢复并使之适用于整个共和国的另一项“改革”是分割印第安人村社土地，但这项改革仍不外乎是个政策目标。一项新政策（最终证明是个麻烦）是取缔所有少于8名修士的男修道院并没收它们的财产，用于举办中等教育。这次法律措施是自由派第一次真正的反教权主义尝试，但是让学校成为没收财产的受益者，使修道士和他们的世俗信徒不满。

库库塔制宪会议选出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和副总统。总统的唯一人选只能是玻利瓦尔，代表们只是确认他已经掌握的最高权力而已。副总统的人选则不太明确。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经过同安东尼奥·纳里尼奥进行激烈竞争，最后获胜。（纳里尼奥最近获释归来是西班牙自由派起义的又一副产品。）桑坦德的成功是对他在1819年奉玻利瓦尔委托担任新格拉纳达地区行政首脑时的有效工作的礼物，而纳里尼奥过去的功劳都被他个人和派别的敌人依然存在的怨恨抵销了。

143

战场上还有西班牙军队，玻利瓦尔无意坐在波哥大的办公室里，因而副总统桑坦德很快成为代理行政首脑主持政府工作。一个重要目标是巴拿马地峡，那里一直有革命同情者，但与爱国者的主要活动中心并无联系，并且由于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西班牙的卫戍部队从未撤离。现在玻利瓦尔把它当成通向厄瓜多尔并最后进军秘鲁的垫脚石。（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西班牙统治已于1820年10月被当地革命推翻，但高原仍在保王分子手里。）可是，玻利瓦尔正在准备的进军已无必要。1821年11月28日巴拿马自己

发动了起义。巴拿马地峡人民宣布独立，同时加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正如今天的巴拿马人经常注意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主动这样做的。(当时别无选择不用说也是左右他们的决定的原因。)但是，在爱国者部队打开通向巴拿马的道路以前，玻利瓦尔已经派遣他最信任的副手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将军，率领一小支辅助兵力去援助独立的瓜亚基尔，同时为它的同样不可避免的加入大哥伦比亚扫清道路。苏克雷对厄瓜多尔高原的第一次袭击以失败告终，但1822年他随同玻利瓦尔参加了对基多的钳形攻势，解放者从新格拉纳达南部发动进攻，那时帕斯托还在狂热的保王分子手里，苏克雷从瓜亚基尔向内地进军。玻利瓦尔4月7日指挥的邦博纳战役既是一次胜仗，又是一次败仗，反正是一次损失很大的战役，但是他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有助于苏克雷实现他的计划。依靠圣马丁补充的一支由阿根廷人、智利人和秘鲁人组成的增援部队，玻利瓦尔于5月24日赢得了决定性的皮钦查战役的胜利。皮钦查位于一个俯视基多的山坡上。结果，基多的西班牙当局投降，帕斯托也间接地投降。但是帕斯托人在这个地区完全平定以前重新投入战斗，进行持久的游击战。

皮钦查战役的另一个成果是今天的厄瓜多尔正式加入大哥伦比亚。在基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瓜亚基尔的情况却比较复杂，秘鲁派、哥伦比亚派和自治派互相争夺控制权。其中自治派的力量大概在当地最强大，但是瓜亚基尔已经将武装部队的领导权交给苏克雷，玻利瓦尔在占领基多后，不会允许它的出海口作出真正的自由选择。1822年7月31日，瓜亚基尔正式投票加入大哥伦比亚，这不过是确认既成事实而已。 144

四天前，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在瓜亚基尔举行会谈，当时这个港口城市的未来地位并未成为问题。这次会谈没有逐字逐句的记录，以致时至今日仍主要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之间引起争论，争论主要内容是关于圣马丁可能曾请求玻利瓦尔给予军事援助以便完成秘鲁的解放以及玻利瓦尔是如何答复的。根据阿

根廷的标准说法，圣马丁强调为了把保王分子赶出他们的最后据点，他需要帮助，为此他本人愿意听从玻利瓦尔的指挥；据称，玻利瓦尔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圣马丁决定放弃秘鲁战场，将这个光荣留给他的北方同行。委内瑞拉的学者们则将圣马丁描绘成对秘鲁的保王部队不甚关心（这似乎不大可能），同时正确指出玻利瓦尔曾着手派出增援部队。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即两位解放者在秘鲁都没有足够的活动余地。圣马丁认识到，他自己能在秘鲁发挥的作用已越过全盛时期，因而决定引退，在9月20日放弃了全部权力，启程前往欧洲，最终成为自我流放。

圣马丁离去后，他的智利一阿根廷远征军的残余部分继续留在秘鲁，但是从此以后，无论智利还是阿根廷都没有再对秘鲁的独立斗争作出有效贡献。它们都忙于自己的事务，希望让大哥伦比亚来承担这个责任。何况，大哥伦比亚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准备承担这个责任。副总统桑坦德牢牢掌握着国内事务。看来他乐于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在他的领导下，政府机构运行自如。桑坦德与立法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立法部门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但通常最后总是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成了一个“尊重法律的人”——这是玻利瓦尔给他的称号。随着桑坦德和他的合作者继续沿着库库塔国会所制订的广泛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前进，有些人对政府政策有所不满，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地区冲突。然而，所有这一切暂时还只是表现在热烈的报纸论战和议会辩论，没有破坏国内秩序；而且玻利瓦尔本人在国内的威望无疑仍然和以往一样高，因此他能够关注秘鲁的呼吁而不必顾虑国内的纠纷。

145

这个呼吁不久就传来了。秘鲁本身没有可以代替圣马丁的领袖，最佳人选只有一个利马贵族——何塞·德·拉·里瓦一阿圭罗，他不象本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是独立的坚决支持者，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成为总统。他支持爱国者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

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但在扩充和改组部队方面显示了旺盛的精力。可是他耗费不少时间同秘鲁国会争吵。他和国会都没有能力解放依然大部分被保王分子控制的高原地带以结束战争。因此，不少人主张从外面邀请一位人士来领导解放斗争，这个人必须手里有部队，以善于作战著称于世而且没有卷入过秘鲁的内部事务。除其他方面的恳求外，玻利瓦尔还接到了国会的正式邀请，于是1823年9月1日在卡亚俄登陆。玻利瓦尔试图一边与国会和国会建立的同里瓦一阿圭罗对抗的新行政领导合作，同时也和里瓦一阿圭罗商量，但是里瓦一阿圭罗由于同西班牙人进行谈判，（其实未必就是卖国行为）。政治力量削弱，轻而易举地被他自己的某些追随者所推翻。玻利瓦尔开始在秘鲁北部开辟一个军事基地。1824年2月发生兵变，使卡亚俄，并间接地使利马暂时回到保王分子手中，惊慌不安的国会投票表决赋予玻利瓦尔独裁权力，于是他公开将政治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

至1824年中，玻利瓦尔已为他的最后进攻做好准备，他穿越高原地带向南进军，途中获得爱国者游击队的援助，8月6日在胡宁赢得第一次重大胜利。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骑兵冲突，但它直接和间接的结果是迫使保王分子最后从利马撤退。1824年军事行动的顶点是12月9日由苏克雷指挥的阿亚库乔战役（当时玻利瓦尔在利马）这是此次战争的最后一次主要战斗，苏克雷一举歼灭和俘虏由何塞·德·塞尔纳总督统率的7,000人军队的全部。此后，除上秘鲁外，已没有多少抵抗。到1825年4月初，苏克雷又发动一次进攻，保王分子不断逃亡，抵抗最终全部被扑灭。1826年1月23日，一支依然坚守卡亚俄要塞的西班牙小分队同意投降，南美洲的战争事实上宣告结束。

保王分子的失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上秘鲁的今后地位，如今已脱离西班牙独立，独立以后何去何从？战前，它是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一部分，但从文化、经济和历史上来看，也有正当的理由考虑它并入秘鲁。可是，在少数政治意识强的居民中——

他们以后会成为任何新政府的工作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成立一个单独的共和国。玻利瓦尔试图作出决定，但是苏克雷召集的上秘鲁制宪会议于1825年8月宣布完全独立，他接受了这个决定，代表们议决共和国命名为玻利瓦尔（不久改称玻利维亚）并邀请他为共和国起草宪法。

玻利瓦尔应制宪会议请求制订的宪法表明他进一步企图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外表和某些实质同防止不断蔓延的混乱结合起来，据他看来，这种混乱威胁着西属美洲解放者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他想到的不仅有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不团结和秘鲁、智利、墨西哥之间的纠纷，而且有大哥伦比亚的事态发展。大哥伦比亚在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近来他不断听到一些怨言。有些怨言反映了一些社会集团的不满，因为制宪会议或后来几次会议所采取的措施对他们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天主教修士和奴隶主，更不用说还有厄瓜多尔高原的纺织品制造商，他们对于缺乏有系统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感到不快。还有许多富有公民对征收直接税（结果失败）或者逃避不缴，或者提出指责。其它一些抱怨则涉及委内瑞拉人和厄瓜多尔人对最后留驻在波哥大的当局所实行的任何制度的反感。还有一些怨言是由于在组织一个新政府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失误。很自然，大家将一切责难推到副总统桑坦德一人身上。还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玻利瓦尔也有同感），认为困难的一个主要根源是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变革者变革得太多太快。

玻利瓦尔断定有必要调整两方面的关系，应加强稳定和权

147

威；《玻利维亚宪法》就是他的解决办法。这部宪法最臭名昭彰的一条就是终身制总统并有权指定继承人；这样的总统完全是一个立宪君主，只差名义而已。法律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而总统个人的权力都漫无限制。这个发明以复杂的三院制议会作为补充，其中的监察院是玻利瓦尔1819年在安戈斯图拉提出的"道德力量"的恢复，但他没有再次提出设立世袭参议院的想法。这部宪法的总格调是专制制度和贵族政治的不太合理的混合。玻利瓦尔

认为，独立的拉丁美洲最初的体制设计者们大多因过于迷恋法国或盎格鲁撒克逊的立宪自由主义而被引入歧途。他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然而他从未提出令人满意的替代办法。

玻利维亚形式上接受了新宪法，但热情不高。苏克雷责无旁贷，同意担任第一任总统，但一开始就声明不想终身任职。1825年年底前，秘鲁也通过了同样的宪法，但热情更低，手续是否合法也成问题。这样做符合解放者的一个梦想，他打算把玻利维亚、秘鲁和大哥伦比亚结成一个安第斯国家邦联，这个邦联及其每一部分都采用他的立宪灵丹妙药。1826年下半年，玻利瓦尔终于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脱身，回到故乡大哥伦比亚。他的动机就是动员舆论支持他的计划。可是，更重要的正是去应付迅速恶化的国内政治形势。自 4 月以来，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领导下公开叛乱，而委内瑞拉的叛乱又鼓励厄瓜多尔进一步反抗桑坦德政权。玻利瓦尔没有排除利用这次危机实行他的新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这次危机是大哥伦比亚解体的开始。不仅如此，在他离开利马数月以后，秘鲁也发生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运动，他的秘鲁朋友丧失了政权，他的玻利维亚宪法也被废除。

玻利瓦尔的安第斯国家邦联的思想由于缺乏有效支持，很快就放弃了。长期以来他推动所有西班牙语美洲新国家结成一个松散联盟的努力，结果也告失败。这是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雄辩他提出、后来又经常重复阐明的一个目标。玻利瓦尔明确地不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国家在地理上不易处理更不用说还有地区利益冲突或各自不同的感情方面的障碍。当然，在前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并不多，部分原因是它们与欧洲和美国的接触较之它们相互间的接触更多，但是这种相对缺少接触并不是完成更大统一体的有利条件(相对缺少接触并不排除偶尔在一些问题上发生磨擦，如秘鲁对智利谷物征收关税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企图控 148

制经过巴拉那河与巴拉圭的贸易和交通——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承认巴拉圭的自治)。前殖民地首府之间的政治对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其中任何一个在另一个统治下势必动荡不安。甚至在独立运动开始以前，西班牙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已经萌发最初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的基础就是他们感到彼此之间(不仅是自己同宗主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西属南美洲的遍及整个大陆的斗争，有一段时期曾有利于各殖民地之间产生新的联系，譬如委内瑞拉的士兵出征到厄瓜多尔，最后娶了妻子定居下来，或者他们在秘鲁学到的新词汇丰富了加拉加斯的语言。① 然而，军队不仅仅从南美洲北部，而且从拉普拉塔河地区和智利涌进秘鲁产生了一种感激和排外思想的不稳定的混合，它首先给圣马丁，然后给玻利瓦尔带来麻烦，其它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把你当作解放者，明天又把你看成征服者。在大哥伦比亚的军事领导人中间，新格拉纳达人对委内瑞拉人——特别是社会等级较低的委内瑞拉人——的优越地位的不满，可能同样是造成建立联盟的尝试最终失败的因素之一。

玻利瓦尔虽已充分感觉到在密切结合的道路上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仍希望看到在各个独立区域之间至少能出现某些协商和合作的持久性安排。他主要是考虑建立一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联盟，他强调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重要性。因此，他始终把美国和海地排除在他的泛美体系概念之外。关于已于1822年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的巴西，他毫无把握。玻利瓦尔对阿根廷多少有点怀疑，它也是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但是被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布特纽上层分子所控制，他们缺乏真正的美洲人感情，这一点早先曾引起圣马丁的注意。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在1824年12月阿亚库乔战役前夕，玻利瓦尔认为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从利

149

① 马萨·希尔德布兰特著《玻利瓦尔的语言：词汇》(加拉加斯，1961)，第189—231页。

马发出了参加将于巴拿马举行的第一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的邀请。尽管有顾虑，他还是邀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没有邀请巴西和美国，但是他希望英国——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却是西班牙语美洲的头号贸易伙伴，政治和军事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会将他的计划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后来大哥伦比亚政府还是邀请了巴西和美国，但意义不大。两名美国代表一人死于途中，另一人未能及时赶到(会议在1826年6—7月举行)，但也没有多大损失。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仅有墨西哥、中美洲联邦、大哥伦比亚和秘鲁出席。会上达成的关于永远结盟以及在军事和其它方面合作的协定仅在大哥伦比亚获得批准。后来在墨西哥的塔库瓦亚再次开会，更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结果。

因此，巴拿马会议虽成为日后泛美合作的先例，但是它表明当时还缺乏那种合作的条件。因为西班牙语美洲新国家都陷入了似乎无法解决的国内问题，在本国国内都做不到(或者做得很糟)的事，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实在更难做到。独立斗争的胜利已得到充分保证，即便西班牙尚未承认失败，反对宗主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已无必要。同时，其它欧洲强国站在西班牙一边进行有效干涉的可能性(从未认真考虑过)，已由于英国不赞成而消除。英国本身仅对经济渗透感兴趣，而这些新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一点普遍欢迎。也不存在结成联合阵线同英国人谈判以便取得较好的贸易或投资条件的良好前景；饱受战争蹂躏的前殖民地同这个头号贸易和工业强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太脆弱了。最后，或许还有人说，可以建立西班牙语美洲国家防御同盟，反对扩张主义的美国，或者巴西，但是很难设想，这个防御同盟譬如说对阿根廷1825—1828年在东岸问题上同巴西的战争(它导致现代乌拉圭国的建立)，又如对墨西哥在二十年后同美国的战争，能起多少实际作用。

当然，西班牙语美洲新国家的出现并不是长期独立斗争的唯一结果。斗争造成大量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还有社会环境的某些变化，包括好的变化或坏的变化。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最大的是

委内瑞拉，那里不仅战争激烈，而且几乎持续不断。有些历史学家的结论认为，委内瑞拉经历了急剧的人口净下降，独立战争结束时的人口——大约80万——同战争开始时一样多。① 近年来的研究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停止不是完全由于战争中死亡以及对"灭绝战"的报复和反报复。在委内瑞拉，象在西班牙语美洲其它国家一样，敌对双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大量人力投入战争，"灭绝战"也从未始终一贯不折不扣地执行过。正如大多数历史上发生的冲突那样，双方军队和平民遭受大量损失，不仅是由于军事行动，而且也由于疾病，再加上自愿或强制的迁移。大多数逃亡的爱国者最后都回来了，有些保王分子也是如此，但大多数保王分子显然没有再回来。

同委内瑞拉的情况相反的另一极端是巴拉圭，那里的人员损失微不足道。另外，独立战争对人口的影响各地区很不平衡。一度流行的观点认为，阿根廷的黑人人口不多，是由于有计划地征召奴隶和自由帕尔多人参加独立战争，有的战死，有的被圣马丁弄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没有再回来。这种观点也已遭到非议，但其中似乎包含着真实的内涵，至少对库约地区是如此②（对比之下，在大哥伦比亚，玻利瓦尔提出的征召黑人奴隶入伍的一个理由正好是要使黑人的伤亡数字达到一定比例，以保持种族平衡③）。然而，独立战争对不同社会阶层产生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人

151

① 参阅约翰·V·隆巴迪著《委内瑞拉殖民地时代的人民与地方》(印第安那州布卢明顿，1976)，第591页并散见各页。隆巴迪并未对独立时期的人口变化予以估计，但提供了大量数据，承认有几处，特别是有些地区的人口数字不够正确。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所提供的数字似乎并不能支持人口普遍剧烈下降的意见。另见米格尔·伊萨尔德著《对革命的恐惧；委内瑞拉争取自由的斗争(1777—1830)》(马德里，1979)第43、46、175页。

② 马西尼著《奴隶制度第12—15页、59页并散见各页。参阅历史调查组《1800—183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它的人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89、194—196、248页。

③ 《玻利瓦尔致桑坦德》，1820年4月20日，《选集》第1卷，第223页。

数不多的"半岛人"迁离后所造成的后果。他们的队伍大为减少，虽然不知道已去何处。来自半岛的西班牙人(还有不愿和解的克里奥尔保王分子)的离去，不仅影响人口，当然也产生经济影响。不动产不能带走，全被没收，用作新政府经费和奖励有功的爱国者；流动资金则比较容易抽走。圣马丁对利马西班牙商人的骚扰所引起的资金外流，对圣马丁本人和随后各届政府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势快，规模大。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非资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和其他外国商人的到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取代了西班牙人。他们带来各种消费品，这些商品在西班牙语美洲新开放港口找到了很大的需求市场，甚至超过了当时美洲出口收入的偿付能力。此外，由于军事斗争本身对生产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用资本性资产(包括流通中的货币)支付进口产品的需要量更大。虽然贝尔格拉诺炸毁波托西造币厂的企图未遂，然而上秘鲁和下秘鲁的采矿设施，在冲突的不同阶段由于故意破坏和不自觉的照管不周遭受严重毁坏。从乌拉圭到哥伦比亚的羊群和牛群为了给路过的军队提供食物和运输工具大批死亡，很少考虑和未来的繁殖保留一些牲畜。尽管如此，肉牛、马和其它家畜并没有全部消灭，在适当的季节，可以较快地恢复到原来的头数，而且肯定比浸水的矿井重新投产或修复毁坏的机器花费较少。至于绝大部分西班牙语美洲人靠它维持生活的种植业，恢复荒芜的土地或被践踏的庄稼所需要的时间更短。经济作物种植园遭受的损害则比较复杂，因为种植园资本的损失和劳动力供应的中断造成一些特殊问题。委内瑞拉的可可种植园和秘鲁沿海河谷的制糖原料或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园由于奴隶应征入伍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 152

不可否认，在经济画面上也存在少数光明点，其中最明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畜产品工业的增长，这是工业国家对皮革和其它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发展综合腌肉工厂的结果。后者18世

纪晚期首先在乌拉圭沿海出现，独立时期在拉普拉塔河的另一边也扎下了根。与外国港口贸易畅通自然有助于各种类型的畜牧产品的出口，而乌拉圭受到军事行动的严重直接影响，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别得益。但是从整个西班牙语美洲来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农业的适度成功是不寻常的(且不说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同时，战争对如此众多的传统生产形式的消极作用并没有因刺激新的经济活动而得到较好的补偿。对某些手工业产品(如缝制军服的布匹)的需求增加了，一些特种金属铸造业、火药工厂和其它军事工业出现了，但是专门与战争相关的商品需求对经济和技术的影响似乎并不深刻，也不持久。事实上，一部分军需供应是从国外得到的，结果造成资金进一步流失，外债增加。

战争行动不可避免地向爱国者和保王派双方当局提出平时的捐税已不能满足的新的财政需求。战争对生产的干扰影响到赋税收入，国家专利事业又由于营业资本被挪用于军事或其它额外支出而遭受损失。在委内瑞拉，迟至1827年的烟草专卖利润仅达到战前水平的1/4。其它捐税在战争条件下更是难于征收，有些捐税(象贡税)表面上已予废除，虽然并未完全实行。只有关税显示出增长趋势，特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港口，它始终在爱国者的控制之下，而且背靠着它的内地的经济状况比较良好。但是，153 收支相抵以后，各地都有大量赤字，只能靠“特别捐款”和强制性公绩等办法予以抵补。在智利，1817年自愿和非自愿的国内借款金额超过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但政府依靠借款是普遍现象，而且在贷款人中间还有外国商人侨民，从而模糊了内债和外债的界线。甚至在新政府尚未确立、欧洲债券市场还没有认真对待它以前，爱国者在国外的代理人已通过赊购和其它短期金融业务活动开始借入外债。

1822年筹集到第一批主要外债：智利奥希金斯政府筹借100万英镑，秘鲁120万英镑，大哥伦比亚200万英镑。大哥伦比亚在1824年、秘鲁在1825年又分别借到475万英镑和61.6万英镑。当然，上述

府政并未得到部分债款，也没有拿到归还早期债务后剩余的金额，大部分用于采购军货了，而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军货当时已不再需要。而且，所有上述公债很快到期而不能偿还。结果，资助独立运动留下一大堆外交纠纷，许多年以后才得到解决。不仅同欧洲债权人发生这种纠纷，美洲各共和国也期望帮助另一国赢得解放后能获得报酬。大哥伦比亚要求秘鲁偿还“战债”，秘鲁又向玻利维亚提出类似要求。

战时内债也给新政府造成一些问题，但是筹措资金的方式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样重要。筹集强制性借款往往对那些拥有流动资产的人打击最重，尤其是政治上失宠的人，例如爱国者领土上的半岛商人或西班牙统治复辟时期的爱国者商人。那些以土地为主要财富的人享有天然的屏障，可以不受强制性借款的损害，总的说来，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除非他们激怒了当局，把他们的财产公开没收。教会是革命财政措施的另一个净损失者。教会有时把钱借给斗争双方，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属于强迫。教会还眼看它的什一税收入总额不断下降，而且经常被国家留作军用。

154

这还不是教士们面对的唯一问题。他们对群众舆论有影响，因此爱国者和保王派都想控制他们，以便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罗马教廷过去一直忠实于它的传统盟友西班牙王室，而且在革命者的胜利已成定局以后，还不断对他们严加谴责。现在教廷不可避免地看到它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地位已有所削弱。半岛上来的教士普遍代表教会的上层，也倾向于保王派，而地方上的教士基本上都根据非教会人士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反对独立的立场。比如在帕斯托，人都是保王派，神父们也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如果在某地区克里奥尔上层人士中占优势的是爱国者，那些献身基督教事业的克里奥尔人大概也是爱国者。因此，大哥伦比亚的官方报纸在可以允许的夸张范围内赞颂说：“在教士们的爱国主义基础上建立了自由的宝座。”① 即便如此，罗马教廷的不妥协态度打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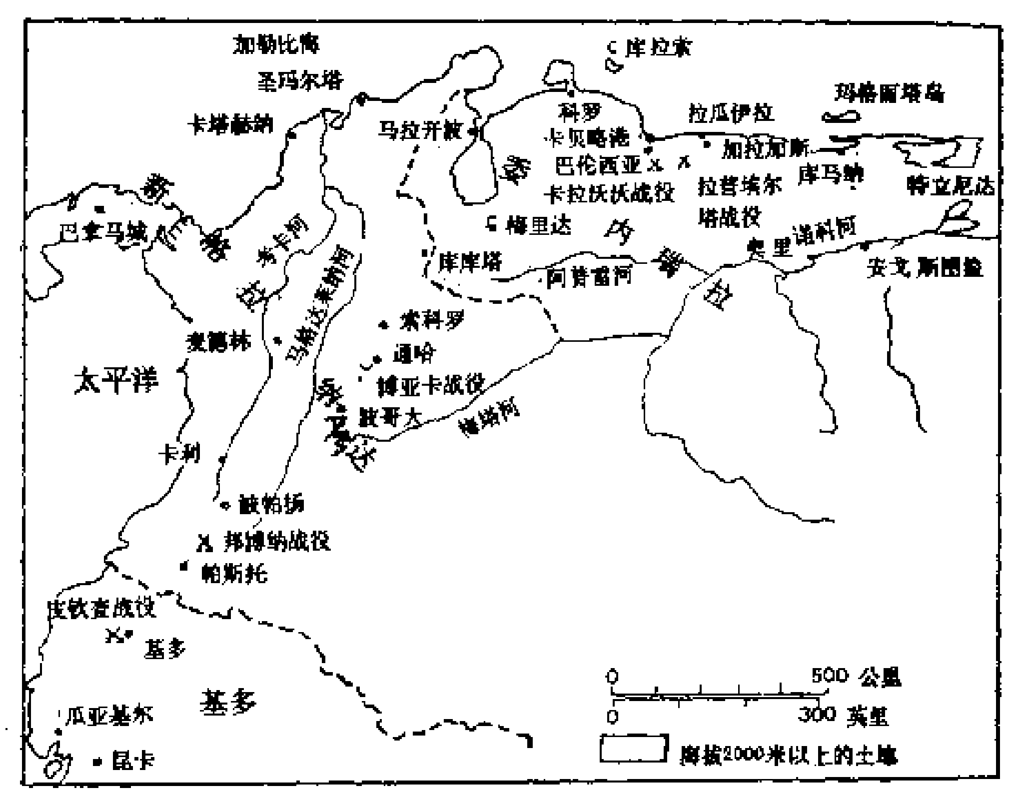
① 《哥伦比亚日报》，1823年2月9日。

了教会的正常指挥系统，给整个共和国领土上的教会制造了麻烦。一个问题是，如果主教死去或逃亡，根本找不到接替的人。幸而，1827年传来了罗马教廷准备承认西班牙语美洲新政权这个既成事实的第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按照经副总统桑坦德认可的名单，教庭任命了大哥伦比亚各主教管区的空缺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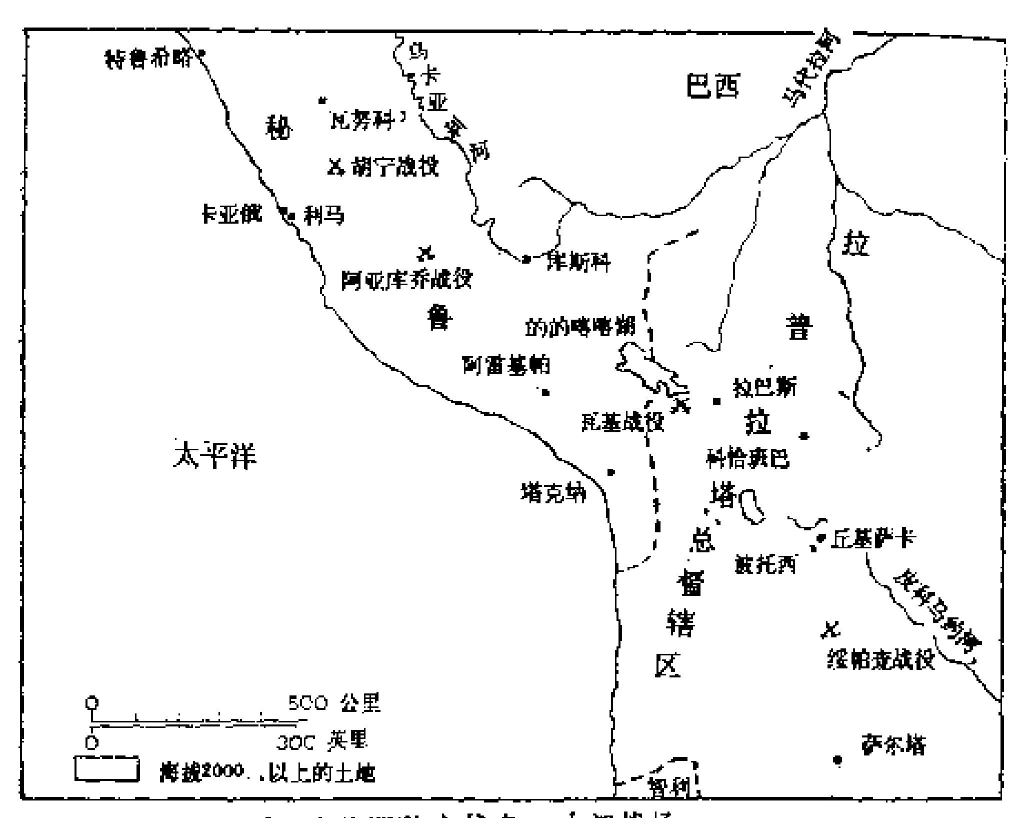
从长远来看，与罗马教廷中断关系同开始反教权改革相比，还不算是太严重的问题。在此期间，各地普遍废除宗教裁判所，主要是一种象征性姿态，并不意味必然要取消对信仰异教的现行限制，充其量只是预示限制会有所放宽而已。对于教会更为不祥的倒是限制宗教职业和取缔小修道院等措施，在西班牙语美洲不同地区已经出现上述措施的零散事例。还可以列举其它一些措施。所有这些还只是旨在限制教会影响的第一批措施。可是实际上，用法律限制宗教职业并无必要，因为革命时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即各种宗教职业都在自行没落。这种状况大概部分地反映了国外的世俗化和非宗教化思潮的影响。(传统主义的代言人对这种思潮常加指责。)它也反映出与其它职业相比，教士职业的吸引力在下降。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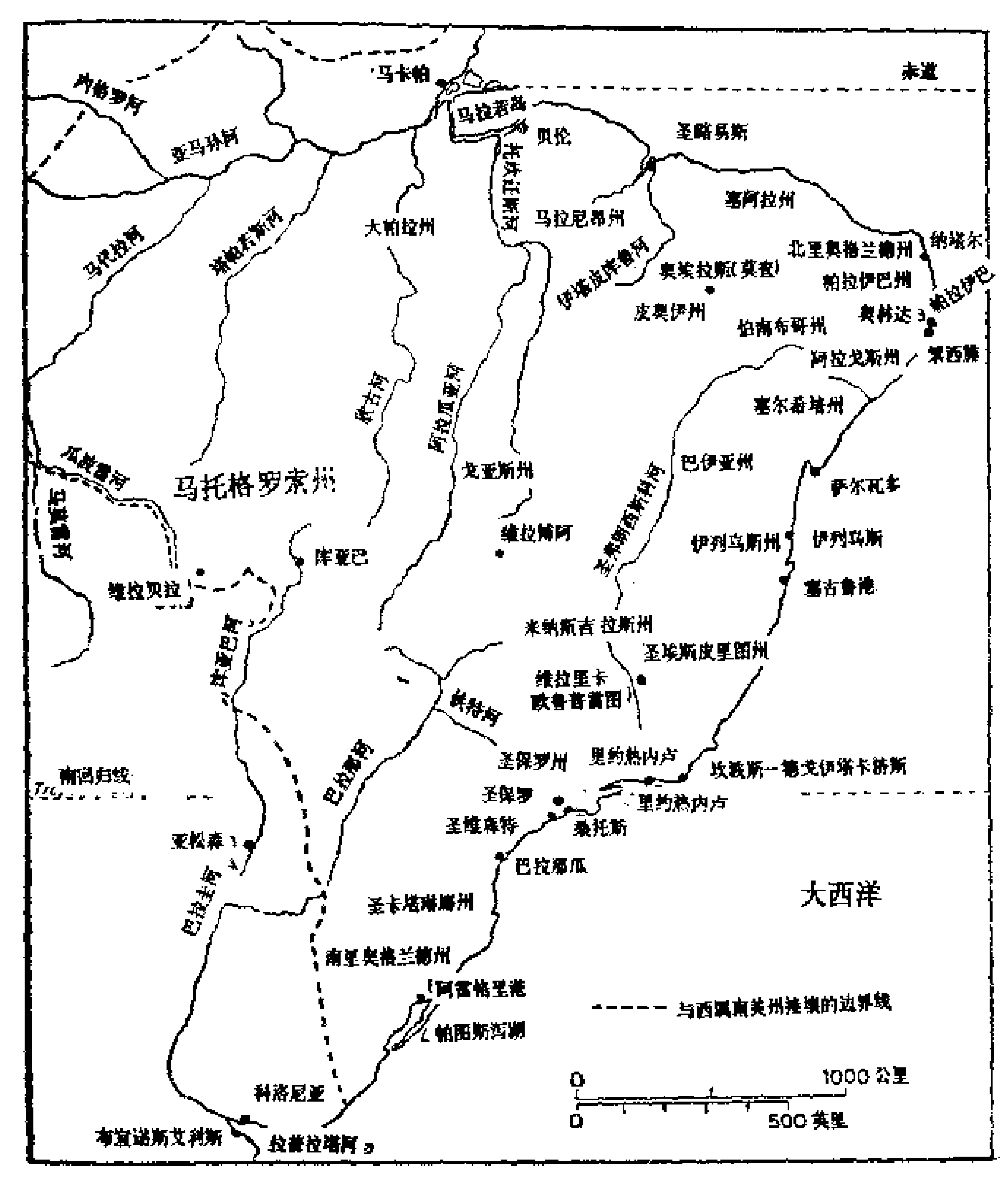
同教士(和其他人)相比，军队的人数和重要性正在增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要独立斗争持续下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军队在独立后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与新成立国家的文官政府机构软弱有关。但是军队也发生了数量和质量变化。战斗扩大，军队也随之增加，克里奥尔上层阶级已不再能提供所需全部军官。在殖民地时期帕尔多人民兵部队一般都由白人指挥，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些经过挑选的帕尔多人提升到很高的军衔，甚至开始指挥非帕尔多人。许多低等级的克里奥尔人或梅斯蒂索人发现，在显示才能的基础上在军队中比较容易被提升。典型例子就是平原人首领何塞·安东尼奥·派斯，他出身微贱，被提升到最高军衔，并成为委内瑞拉的政治领导人(至少当玻利瓦尔不在时)。不仅如此，为了酬劳他对独立的贡献，他得到地产，



西属南美洲独立战争：北部战场



西属南美洲独立战争：中部战场



殖民地时期的巴西（1800年左右）

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没有获得(他并未去谋求)与那些还活着的上层贵族相等的社会地位，但无疑受到他们的尊敬。

在委内瑞拉和西班牙语美洲的其它地区，象派斯这样的典型可以找出很多。然而，他们仅仅意味着少数人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相对增多，并不表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情况，即没收并重新分配敌人的财产，本来可以造成最大的结构变化，但结果没有做到。只有乌拉圭的阿蒂加斯明确地采取了将大地产分配给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办法，但是他的土地措施结果失败。更典型的是玻利瓦尔1817年的《退伍金法令》，它设想将没收的财产保持原封不动，只有小额申请者，如果他们想要，可以共同接受一份单一的地产。这项规定基本上未能执行，显然使玻利瓦尔感到失望。 156
因此，照例新的大庄园主取代老的，如果老庄园主是好的爱国者，则设法拥有更多土地。良田和肥沃牧场的所有权日益集中的状况并无重大改变。

有关奴隶制的措施所立即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奴隶制虽尚未完全废除，但征召奴隶入伍，废除奴隶买卖和各地(巴拉圭和巴西占领的乌拉圭除外)实行奴隶新生子女获得自由的原则，更不用说战时的混乱为奴隶提供更多逃亡机会——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奴隶制逐渐衰微。在独立斗争时期，委内瑞拉的奴隶人数下降约1/3，有些地区下降得更多。另一方面，在西班牙语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奴隶劳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比较有限，而在奴隶劳动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如委内瑞拉的北部和中部，刚获解放的自由民有的成为农村无产阶级，有的成为流动人口(到公地上居住或四处流浪)。社会上层对以前的奴隶闹事的潜在可能性表现出惊慌不安，这反映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有所削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对奴隶制的这种打击仍应认为是独立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改革”，然而它未能导致一次根本性的经济权力再分配，其它社会和经济改革(无论是由新政府颁布实行，还是作为独立斗争无意中的副产品而产生的情况也是为此。西班牙语美洲的

主要生产资料依然掌握在克里奥尔上层阶级手中，这个阶级因脱离西班牙独立，如今又控制了最高层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转移意味着今后将根据民族利益而不是宗主国的利益，更确切地说，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所理解的民族的利益来作出决定。这并不妨碍在稍加改变的形式下继续依赖对外经济，因为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利益经常与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有关。相反，它消除了西班牙帝国制度所固有的对完全加入世界市场的那些限制。除了个别的例外，其他社会成分参加国家决策还得等待很长时间。

第 4 章

巴西的独立

157 18世纪末，葡萄牙是西欧边缘上一个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小国家，它的自然资源有限，陆海军力量不强，但是至少从外表上看，它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一个世界范围的横跨三大洲的帝国，包括地大物博的殖民地巴西。葡萄牙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海外领土，尤其是巴西，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管理和维持帝国所需的收入主要靠征服生产税、消费税和国内贸易税、王室专卖、自愿捐献(有些人不那么自愿)和进出口税。葡萄牙尽可能地垄断帝国范围内的贸易，里斯本和波尔图不仅是葡萄牙商品的贸易中心，也是向殖民地出口非葡萄牙商品、进口并向欧洲其他国家再出口殖民地农产品的商品集散地。转口输出巴西产品(在18世纪后期主要是糖和棉花)对葡萄牙的贸易平衡特别重要。英国是葡萄牙的主要贸易伙伴，向葡萄牙(间接地向巴西)供应工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换回葡萄酒、橄榄油和巴西的棉花。(18世纪前七十多年间，巴西的黄金是合法和非法的英葡贸易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根据14世纪末签订的条约，英国还是葡萄牙独立和葡萄牙帝国领土完整的保证人。

18世纪后半叶，也就是若泽一世(1750—1777)、玛丽亚一世(1777—1792)和1792年宣布多纳·玛丽亚精神崩溃不能视事后 158 摄政王若昂(即后来的若昂六世)统治期间，葡萄牙也象波旁王朝后期的西班牙一样，曾对自己和帝国的工作进行总结。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唐·若泽一世整个统治时期实际上的首相和独裁者)和他的一些继承者都受当时的"开

明”思想及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中著名的有海军与海外领地国务秘书(1770—1795)马蒂尼奥·德·梅洛-卡斯特罗、海军与海外领地国务秘书(1796—1801)和王室国库主席(1801—1803),罗德里戈·德·索萨·科蒂尼奥(后为利尼亚里斯伯爵等)。他们提出并实施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改革措施，旨在克服葡萄牙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态，减少它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英国的依附。他们希望使葡萄牙农业近代化；发展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改善教育；扩大殖民地贸易；增加扣留帝国收益的比例；减少贸易赤字；尤其要在葡萄牙和帝国的政府费用,(特别是国防费用)不断增加的时期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对巴西来说,改革意味着：第一,要加强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中央集权。大帕拉与马拉尼昂国(Estado di Grão Pará e maranhão)自1621年起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1774年并入巴西国(Estado do Brasil)，由一名总督管辖（总督府1763年从萨尔瓦多城迁至里约热内卢)。可是实际上，总督在里约热内卢辖区和圣卡塔琳娜和南里奥格兰德两个附属辖区以外权力非常有限。其它8个都督辖区的督军的权力得到加强，他们基本上直接对里斯本负责。这8个辖区是：大帕拉(包括附属辖区里奥内格罗)、马拉尼昂(包括皮奥伊)、伯南布哥(包括塞阿拉、北里奥格兰德和帕拉伊巴)、巴伊亚(包括塞尔希培和圣埃斯皮里图)、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马托格罗索和戈亚斯。负有行政和司法责能的地区和城镇王室法官的权力也得到加强，而选举产生的市政委员会的权力下降。特别是改进了征税办法。但是没有实行西属美洲的那种监督官辖区制度。第二,在严格实行商业垄断的前提下,对殖民地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往来于葡萄牙、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之间的船队制度于1766年结束；分别在1755年和1759年成立的同大帕拉和马拉尼昂、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进行贸易的特许公司（取代前圣路易斯和累西腓的船队）在1778—1779年关闭；若干国家垄断组织也被取消。第三，大力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希望这

159

会同时扩大葡萄牙产品的市场(加强了对当地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的限制，例如在1785年)。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经过一个半世纪多主要由种殖业，和18世纪前半叶主要由黄金和钻石开采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之后，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对巴西来说却是一个持续的经济危机时期。东北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在17世纪中叶就失去了对世界蔗糖生产实际上的垄断地位，甘蔗仍是巴西的主要经济作物，但自17世纪80年代以来糖的出口多少已处于停滞状态。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的黄金和钻石的生产和出口1755年后急剧下降。 160

庞巴尔和他的继承者们未能振兴内地的采矿业，但是到18世纪80年代，作为他们努力的部分成果，巴西沿海开始经历一次农业复兴。① 18世纪后期，由于西欧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开始工业化，食品(包括糖)和原料(尤其是棉花)的市场不断扩大，使这次农业复兴更加蓬勃。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还有法国的产糖岛屿圣多曼格血腥的奴隶起义，削弱了巴西的许多竞争者，提高了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另外，西班牙从1796年直至1808年的危机实际上隔断了同它的殖民地的往来，而葡萄牙和它不一样，直至1807年为止，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崛起后的历次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未受到严重破坏。主要的产糖都督辖区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得到恢复，虽然是暂时的，有点象它们过去的繁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都督辖区糖的出口数量不断增加。(里约热内卢辖区的坎波斯德戈伊塔卡济斯和首都本身的农业地区是产糖中心，从里约热内卢出口的糖1790年至1807年间增加了一倍)。棉花产地最初在北部(马拉尼昂和塞阿拉)和伯南布哥，如今已发展到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第2种主要出口农作物。巴伊亚继续出口烟叶和糖。同时在巴西的不同地区开始有新的货物出口，

① 关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巴西经济，特别是关于"农业复兴"的讨论，见多里尔·奥尔登著《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15章。

如帕拉的可可，马拉尼昂，帕拉和里约热内卢的大米，南里奥格兰德的小麦。18世纪90年代末，首次从里约热内卢出口大量咖啡

161 （从里约热内卢出口的咖啡在1798—1807年间增加了六倍，预示巴西经济的咖啡周期的开始，这个周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巴西农产品出口数量和价值的增长，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飞速增长，成为葡萄牙19世纪初期繁荣的最大因素。德国博物学家J.B.冯·施皮克斯和C.F.P.冯·马齐乌斯把里斯本描述为一个“活跃和富饶”的地方，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上最大商业城市”。① 在1791—1807年期间，葡萄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除两年外，每年都有盈余。更值得注意的是，1798年后对英贸易每年出超。巴西农产品（主要是糖和棉花）占葡萄牙从它的殖民地进口的产品总额的80％，占葡萄牙出口和再出口产品总额的60％。② 早在1779年马蒂尼奥·德·梅洛-卡斯特罗即已承认，“如果没有巴西，葡萄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25年以后，葡萄牙对巴西资源的依赖变得更深。但巴西经济在1780—1800年间的发展，是同英国产业革命，特别是同英国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史无前例的发展相吻合的，而且部分地是它的结果。不断扩大的巴西市场上不但有葡萄牙产品，而且还有英国产品，有的象以前那样由在里斯本的英国工厂和英国商人的联营机构运来，有的以不断扩大的规模直接通过巴西港口（特别是里约热内卢）走私，尽管葡萄牙当局在旅居葡萄牙的英国商人的支持下，用尽一切办法想制止未经批准的船只与巴西进行贸易。自18世纪90年代起，葡萄牙这个依赖殖民地的不发

---

① 转引自肯尼思·尼·马克斯韦尔著《冲突与反叛。1750—1808年的巴西与葡萄牙》（剑桥，1973）第234页。

② 关于18世纪后期葡萄牙贸易（和巴西贸易）的讨论，见安德烈·芒叙-迪尼斯·席尔瓦著《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第13章，多里尔·奥尔登著《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15章和费尔南多·A·诺瓦伊斯著《旧殖民制度危机中的葡萄牙和巴西（1777—1808）》（圣保罗，1979）。

达宗主国与它的最重要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开始出现逆差。这里还必须补充说一句，除经济因素之外，人口因素也越来越对葡萄牙不利。18世纪末，巴西的人口（葡萄牙控制之外的印第安人未计算在内）已超过200万，虽然其中白人仅占30%，增长速度比葡萄牙快。有些人估计，巴西人口已高达300万至350万，这是当时葡萄牙的人口。很明显，巴西的人口会很快超过葡萄牙，如果尚未超过的话。罗伯特·索锡在他的《1800—1801年在葡萄牙居住期间的日记》中写道，"这样重的树枝是不能长久留在如此腐朽的树干上的"。①

162

某些历史学家争辩说，巴西人的民族意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654年战胜荷兰人（荷兰人占领巴西东北部达1/4世纪之久），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圣保罗的远征探险者到巴西腹地探险以及早先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同西班牙发生冲突的时候。但是和新大陆的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一样，在一部分美洲出生的白人寡头政治集团中产生一种更深刻和更普遍的独立自我意识，那是在18世纪后半叶。这个集团主要包括甘蔗种植园主和糖厂主，畜牧业巨头和有权势的地主，其次是矿主、商人、法官和官员。少数巴西人，（尽管是相当大的少数）如今去欧洲旅行，间接地受到那里新思潮的影响；更多的巴西人在科英布拉大学和欧洲其他大学如蒙彼利埃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受教育；里斯本的检查局虽然尽了很大努力，还是有许多书籍从欧洲（还有北美洲）流入巴西私人图书馆，甚至供人阅读。巴西经济、人口和思想发展的结果，在18世纪后期第一次可以听到相当规模的批评的声音，首先是批评商业制度和它强加给殖民地贸易——因而也强加给农业生产——的限制；其次是批评苛捐杂税；第三是批评进口工业品数量不足，

① 罗伯特·索锡著《1800—1801年在葡萄牙居住期间，和1839年访问法国的日记阿道夫·卡夫拉尔编（牛津，1960年）第137—139页。

价格昂贵。要求在庞巴尔和他的继承者所实施的限制措施以外给予更多自由，而且不仅是经济领域。有些自由派——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律师、官吏和教士，也包括一些地主和商人——准备向葡萄牙的专制制度挑战，要求至少实行更大程度的政治自治和允许巴西人参与政府工作。

就这样，巴西人愈来愈认识到，在巴西和宗主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现实和潜在的利害冲突，同时也认识到，葡萄牙不但经济上比它最重要的殖民地落后，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是软弱的。葡萄牙君主垄断着政治上的正统性，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政治和社会稳定。可是，首先要保证它的兵力不大。迟至1800年，它在巴西仅有大约2,000名正规军、志愿军和雇佣军，而在新西班牙超过6,000人。而且许多军官都是巴西出生的、殖民地知名地主和军人家族的子弟，士兵大部分从殖民地招募。18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完全由欧洲人组成的部队驻扎在里约热内卢；1818年以前没有这样的部队驻扎在巴伊亚。民兵是对付外部攻击或奴隶暴动的预备部队，军官大部分是地主，士兵理论上都是有关地区的自由民，但主要城市的民兵都按肤色和职业组成。第三线的地方部队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和补充正规军，也由巴西地主阶级操纵。

163

对里斯本控制巴西经济和政治的不满以及本地出生的巴西人和巴西的葡萄牙人之间的敌意(后者独占国家高级职务，操纵大西洋贸易)，在18世纪后期，无疑变得更为广泛和强烈。但是对此不应夸大。同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相比，巴西人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要密切一些，产生不满的因素要少一些。原因很多。

首先，巴西的寡头集团大多扎根不深。葡萄牙人到巴西定居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定居地区的人口迟至1700年还不足50万人)。当然，有些拥有土地的家族(特别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可以追溯他们的祖先直至16世纪的封地受封者(donatarios)，但许多著名的巴西地主只是第一代巴西人，有的甚至出生于葡萄牙但已与巴西融合。其次，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不象西班牙的统治那

样暴虐和排外。葡萄牙是一个较弱的国家，财力、军力和人力资源有限。中、下级官员中许多是巴西出生的人，他们不但在巴西而且在葡萄牙帝国的其他地方(如果阿和安哥拉)甚至担任国王任命的地方长官和督军，有的还在葡萄牙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更有别于西班牙者，葡萄牙往往通过当地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来管理殖民地，让这个阶级直接执行政策，即便不能参与制订政策；殖民利益很少受到挑战。第三，巴西和葡萄牙的上层人士之间存在家族和个人纽带，这条纽带由于他们共同的知识形成(许多人都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而得到维持和增强。不象西属美洲,巴西本身在殖民地时期未开设大学——甚至没有一家印刷厂。第四，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古巴除外)，美洲上著印第安人构成劳动力的主体，而巴西是一个奴隶社会，奴隶占全体居民的1/3以上,这是整个巴西城乡社会的一大特征。另一个30%是自由穆拉托人和自由黑人。在面向出口的单一作物种植园农业地区，如伯南布哥的马塔，巴伊亚的雷孔卡沃，马拉尼昂的沿海地区以及接近18世纪末的里约热内卢部分地区，奴隶大概占居民的大多数。只占少数的白人担心发生社会和种族骚乱，只好同宗主国妥协，愿意接受殖民统治以求得社会安宁。第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8世纪后期的巴西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是农业和畜牧业，而且面向出口。巴西的甘蔗和其他作物种植园主和西属美洲的大多数大地产主不一样，他们同宗主国的商人、大西洋贸易、并通过宗主国的货物转口中心，里斯本和波尔图同欧洲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农业为基础的出口经济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日益发展，90年代更加兴旺。同时，种植园主阶层依赖大西洋两岸的奴隶贸易(这是葡萄牙的一项占压倒优势的事业)获得劳动力。巴西东北部腹地或南里奥格兰德的肉类、谷物、皮革、牛和骡子的生产者都严重地依赖种植业。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相比，巴西的国内经济和国内贸易规模不大。此外，巴西的城市既少又小，在1880年仅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两个城市拥有5万居民。第六，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的商

164

业垄断较少；葡萄牙经里斯本向巴西出口的货物中，英国产品占大部分，直接从英国出口的规模同样也在增长。

165 最后，18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对它与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新评价以及帝国的改组，同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工作相比，其影响不是非常深远，对殖民地现状和殖民地上层人士的利益的直接威胁较小。正相反，“农业复兴”、1759年驱逐耶稣会教士后没收耶稣会财产和扩大贸易使许多巴西人获益。此外，官僚机构和民兵的扩大，为巴西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新机会。事实上，尽管在18世纪后半叶葡萄牙和巴西未能完全避免大西洋世界的“民主革命”和“旧殖民制度的危机”，但只发生过两起反葡萄牙在巴西的统治的重大密谋事件（没有时间发展成为叛乱）——第一起1788—1789发生在米纳斯吉拉斯，第二起1798年发生在巴伊亚。另外两次密谋——1794年在里约热内卢和1801年在伯南布哥——刚开始就被镇压下去。

“米纳斯吉拉斯密谋事件”是18世纪后期最严重的一次反葡萄牙运动。18世纪90年代，米纳斯吉拉斯是巴西最重要和人口最稠密的都督辖区之一。18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采矿业逐渐衰落，米纳斯吉拉斯遭受严重衰退，需要进行调整，向农业和牧业混合经济过渡。它也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生活丰富的地区。这个地区一些最富有和最有影响的人物卷入了这次事件，包括王室法官、庄园主、商人、纳税农场主、律师、神甫、正规军军官等。其中大部分是巴西出生的，少数是葡萄牙人。为这次叛乱进行思想准备的是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和法国学习。（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科英布拉大学受教育的巴西人中，米纳斯吉拉斯州人的比例特别大）。反叛一开始是抗议。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征收拖欠葡萄牙王室的黄金，五一税、人头税和效率更高、差错更少的征税制度，但是它很快变成一次反殖民制度性质、以结束葡萄牙在米纳斯吉拉斯和巴西的统治的反叛。密谋事件的领袖受到美国革命的鼓舞，梦想建立

一个“象英属北美洲那样自由和繁荣的共和国”。可是，密谋事泄失败，主要密谋者被捕，受审，被流放，若阿金·若泽·达·席尔瓦·沙维尔(以“拔牙者”著称)被处绞刑。重要的一点是，“米纳斯吉拉斯密谋事件”完全没有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更没有在巴伊亚或伯南布哥)激起类似的要求政治上脱离葡萄牙的运动。 166

十年以后在巴伊亚发生的密谋事件主要是城市居民的一次非常激进的运动，目的在于发动一次穆拉托人、自由黑人和奴隶的武装起义。领导者主要是手工业者(特别是裁缝)和士兵。少数受过教育的巴西白人青年(著名的有西皮里亚诺·巴拉塔·德·阿尔梅达)也参加了。对这次密谋事件，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主要的。叛乱领导者要求脱离葡萄牙，政治独立、民主、共和政体和贸易自由还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废除奴隶制和一切种族歧视(这个都督辖区的1/3人口是奴隶，2/3人口是非洲血统。萨尔瓦多城的白人以1:5的比例占少数)。尽管如此，巴伊亚的统治阶级无意听取任何政治改革要求。圣多曼格爆发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和奴隶的暴动已向整个美洲的奴隶主发出严厉警告，在奴隶制社会传播自由、平等和人权思想以及白人居民中的革命分子对宗主国控制的挑战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18世纪90年代制糖业的兴旺和全面经济繁荣（这更加强了奴隶主们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依恋)，进一步推动巴伊亚寡头集团对现存的殖民地关系采取容忍迁就的态度。这次“裁缝谋反”遭到严厉镇压，数十人被捕并受到严厉惩处；4名领导人被绞死肢解尸体；另外6人被流放到不属于葡萄牙的非洲。

这并不是说，到18世纪90年代，殖民地巴西的白人上层人士对殖民制度的批判已经完全平息。伯南布哥的改革派主教若泽·若阿金·达·库尼亚·德·阿泽雷多·科蒂巴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食糖价格的回顾》(1791)、《关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贸易的经济论述》(1794)、《论巴西采矿业现状》(1804)和若奥·罗德里格

斯·德·布里托著《关于巴伊亚农业和商业的经济—政治信札》(1807)都提醒人们，在巴西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满，不但反对高税收，而且也反对特权和垄断，反对在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和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限制生产和贸易(特别是葡萄牙作为货物转口中心的作用)。不管将巴西和葡萄牙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大，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如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葡萄牙始终面临一种危险。即要求放松经济束缚，总有一天会导致要求实行政治分离。

167

在这个危急关头，葡萄牙——不象西班牙——是幸运的。它不仅在历次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而且有优秀的政治领导人。1792年上台的西班牙查理四世的腐败无能的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和1796年开始掌权的葡萄牙首相唐·罗德里戈·德·索萨·科蒂尼奥，两人可以说有天壤之别。索萨·科蒂尼奥坚决反对法国革命所坚持的一切原则——前面已讲到，1798年巴伊亚密谋事件遭到坚决镇压——但是，他在他的著作《关于改善美洲领地状况的备忘录》(1798)中，承认需要有一个开明政府和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保证巴西寡头集团继续效忠。这时英国已失去北美殖民地，法国正在为保住圣多曼格而拚命挣扎，西属美洲各地出现了反抗和起义不断加剧迹象。因此，葡萄牙政府继续采取有限的、但重要的经济自由化措施(1801年废止盐业和捕鲸垄断)并任命巴西人——如曼努埃尔·费雷拉·德·卡马拉和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在宗主国和殖民地行政机关中担任高级职务。与此同时，索萨·科蒂尼奥明智地认识到，改革只能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可能使之加速发生。而且，葡萄牙和巴西的未来关系多少受外部因素的支配。倘若葡萄牙被拖进战争，特别是如果拿破仑入侵葡萄牙(1801年以后，各种迹象表明有这种可能)，那么唐·罗德里戈·德·索萨·科蒂尼奥在1803年底辞去首相职务前建议与其冒最终失去巴西的危险(或者经过内部革命或者被殖民对手占领)，作为最后手段摄政王唐·若昂可以

而且应该放弃葡萄牙，迁往巴西，在南美洲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葡萄牙本土毕竟“既不是这个君主国最好的也不是最主要的部分。”①

将葡萄牙朝廷转移到巴西的想法并不新鲜。更早的时候，当王朝处境危险甚至还不算十分紧急的时候，也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譬如，18世纪的大政治家唐·路易斯·达·库尼亚就在1738年提出过，根据是巴西的自然资源比葡萄牙丰富，里约热内卢的地点作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和商业帝国的首都，也比里斯本更合适。当然，唐·罗德里戈1803年的建议受到里斯本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主要是经营殖民地和国外贸易的商人，其次是制造商。但是英国政府出于战略和商业上的双重原因，赞成葡萄牙在法国入侵的情况下迁往巴西。早在1801年，英国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就曾指示英国驻里斯本大使让对方了解，如果作出迁往巴西的决定，英国准备“保证这次远航的成功，并与〔摄政王〕共同采取最有效办法以扩大并巩固他在南美洲的统治权”。②

168

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6月25日)签订以后，拿破仑最终决定封闭他的大陆体系中剩下的几个缺口，以摧毁英国与欧洲的贸易。1807年8月12日，他向葡萄牙外交大臣安东尼奥·德·阿劳若·德·阿塞韦多发出最后通牒：摄政王必须对英国船只关闭葡萄牙港口，监禁在葡萄牙的英国居民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否则他

---

① 见芒叙-迪尼斯·席尔瓦著《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第13章；马克斯韦尔著《冲突与反叛》第233—239页；K.R.马克斯韦尔著《18世纪90年代一代人和葡萄牙—巴西帝国的构想》，载多里尔·奥尔登编《现代巴西的殖民地根源》(伯克利，1973)。

② 转引自马克斯韦尔著《冲突与反叛》第235页。

* 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尼门河畔提尔西特的一个木筏上签订的和约。主要内容为建立法俄联盟反对英国，法俄两国瓜分欧洲。——译者

将面临法国入侵的后果。作为答复，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通过当时在里斯本主持英国使馆工作的年轻爱尔兰贵族斯特兰福德子爵六世珀西·克林顿·西德尼·斯迈思，威胁唐·若泽，倘若他屈服于法国的恫吓，英国将在塔古斯河截获并摧毁葡萄牙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就象9月间在哥本哈根摧毁丹麦航队那样），并夺取葡萄牙的殖民地，包括巴西在内；同时又许诺，如果他立场坚定，英国将重新担负起保护布拉干萨王室及其领地免受外部功击的责任。根据1807年10月的秘密协定，坎宁提出，如果摄政王决定暂时撤退到巴西，英国将提供保护。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将169是最满意的结果：不但能防止葡萄牙朝廷和它的舰队、还有巴西落入拿破仑之手，也许还可以指望巴西开放与英国的直接贸易。当时英国的贸易正处于危急关头，英国商品被排斥在欧洲之外，还受到无法进入北美的威胁，而且英国商人前不久在拉普拉塔河地区遭到一次似乎相当重大的挫折（指1806—1807年英国入侵失败）。巴西本身是一个重要市场，又是一扇进入西班牙语美洲的方便之门。

唐·若泽一度曾试图采纳一些反英措施满足拿破仑的要求，而又不与英国发生全面对抗，从而避免作一次痛苦的选择。可是到11月初，他闻知朱诺将军已率领一支23,000人的军队离开巴约讷，正向葡萄牙进逼。11月16日，英国拧紧螺钉，由海军少将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指挥的一支英国舰队到达塔古斯河口外。11月23日传来消息，4天前法国军队已越过葡西边界，4天急行军即能到达里斯本。翌日，唐·若泽作出决定离开这个除非做法国的附庸，否则已不可能拥有的王国（甚至布拉干萨王朝能否生存也已大成问题），穿越大西洋撤往他的最重要的殖民地。朝廷决定转移到巴西，被当地居民视为怯懦的背叛行为，可耻的狼狈溃逃，一次总崩溃。无疑唐·若泽是被迫作此选择的，存在着混乱的因素，甚至象一场闹剧。但如前所述，这也是一个经过长期策划的明智的政治谋略，而且在拿破仑的最后通牒和朱诺入侵的间隔时间内进行

了细致的计划。自11月25日晨至11月27日晚，大约10,000—15,000人——摄政王唐·若泽和十余名王族成员（包括他的精神失常的母亲，玛丽亚女王、他的妻子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之女卡洛塔·华金纳公主、他的儿子唐·佩德罗（9岁）和唐·米格尔），还有国务委员，大臣和顾问，最高法院法官，国库官员，陆海军高级将领，教会上层人士，贵族阶层的成员，官员、专业人员和实业家，数百名朝臣、仆役和随从，海军部队1,600人以及用各种不同手段获得出逃机会的各色平民——他们登上旗舰“太子号”，还有8艘正规海军部队舰只，8艘较小的战舰和30艘葡萄牙商船。装上船的还有王室财宝——白银、器皿、珠宝、钱币和所有动产——政 170 府档案、政府的全部随身办公用具、一个印刷厂和若干图书馆，包括阿胡达皇家图书馆，它成为里约热内卢公共图书馆，即后来的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的基础。11月29日（朱诺到达的前一天）趁着顺风船队起锚，驶出塔克斯河，横渡大西洋前往巴西——由4艘英国军舰护航。一个欧洲国家元首偕同他的整个朝廷和政府移居他的一个殖民地，这是欧洲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后来斯特兰福德勋爵写到这件事时，虽然大大地夸大了他和海军上将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说服唐·若泽离开葡萄牙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英国提供援助时，摄政王已经上了船），但并非毫无道理。他写道，“我已使英国有资格与巴西建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并要求他们顺从我国，作为保护的代价”。①

这是一次恶梦似的旅程：一场暴风雨使舰队互相失散，王室人员经受了过分拥挤、缺少食物和淡水、虱子（妇女不得不把头发剃光）和疾病的折磨，替换的衣服勉强靠英国海军提供的被单和毯子代替。但最后终于完成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1808年1月22日，王室逃亡者抵达巴伊亚，受到热情接待。这是第一次一名

① 转引自艾编·K·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优越地位。它的兴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33），第67页。

在位欧洲君主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唐·若泽拒绝了在萨尔瓦多建立宫庭的建议，一个月后前往里约热内卢，3月7日到达时又一次受到热烈欢迎。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欢迎来自当地居民。

无论对1808年以前巴西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它与宗主国的关系和独立前途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关于葡萄牙宫廷的到达对巴西，特别是对里约热内卢的深远影响是没有争议的。里约热内卢自1763年起成为巴西总督所在的首府，18世纪后期在经济上日趋重要，如今一夜之间又成为一个一直扩展到果阿和澳门的世界性帝国的首都。1808年4月至10月期间，专制的葡萄牙的主要国家机构都已设置妥当，包括国务委员会、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王室金库、王室财政委员会和商业、农业、工业、航运业委员会以及巴西银行等。现在巴西已不是由里斯本而是由里约热内卢统治，171 当然，管理权依然掌握在同一些人手中，全是葡萄牙人：摄政王、各部大臣（著名的有利尼亚里斯伯爵，唐·罗德里戈·德·索萨·科蒂尼奥，现任外交及军务大臣，是最有影响的大臣直至1812年去世）、国务委员、高级审判员和官员。重要的是，其中没有一个巴西人。各省和地方的行政权掌握在王室任命的都督和王室法官手中（其中许多是巴西人），但是葡萄牙国王和葡萄牙政府代替总督在里约热内卢坐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加强。

19世纪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丁斯谈到1807—1808年事件时写道："葡萄牙〔如今〕是殖民地，巴西是宗主国"。近代巴西历史学家也谈到了这块殖民地的宗主国化。毫无疑问，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已发生决定性变化。严格地说，巴西已不再是殖民地。但它也不是能支配自己命运的独立国家。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葡萄牙宫廷转移到里约热内卢，是巴西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正如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它已不可能恢复原状。

或许，比在里约热内卢建立宗主国政府具有更重大意义（因为后来证明更难逆转）的事是对殖民地贸易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垄

断的结束和里斯本作为巴西进出口商品转口城市的作用的消失。唐·若昂在巴伊亚短暂逗留期间——实际上他到达后还不到一星期——1808年1月28日曾以王室勅令的方式宣布开放巴西港口，与所有友好国家进行直接贸易。他这样做是根据一些人的建议，提出此项建议的有罗德里戈·德·索萨·科蒂尼奥、唐·费尔南多·若泽·德·波图加尔-卡斯特罗（后为阿吉亚尔侯爵，国务委员，不久前曾担任总督〔1801—1806〕，后来在里约热内卢新政府中出任内政与财政大臣）、蓬蒂伯爵（巴伊亚辖区都督，一年前曾调查巴伊亚种植园主对经济的看法以及若泽·德·席尔瓦·利斯博阿（1756—1835）（后为凯鲁子爵，出生于巴伊亚，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1804〕作者，此书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很大）。事实上，摄政王当时已别无选择，（有迹象表明，当时把开放港口作为一种暂时措施。）巴伊亚的仓库里堆满了糖和烟叶，无法出口；由于法国的占领和英国的封锁，葡萄牙各港口都已关闭。而且，政府财政完全靠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关税。葡萄牙政府只有使走私贸易合法化，才能加以控制并向它征税。葡萄牙本土既然已被法国占领，英国当然期望葡萄牙政府开放巴西港口，直接与英国进行贸易。这是1807年10月秘密协定的一部分，是英国提供保护的代价。 172

这样，几乎是偶然之间，唐·若昂抵达巴西后立即与巴西大地主的利益取得了一致，向老殖民制度的批评者们的最殷切要求作出了让步。（1808年4月，他又宣布废除所有禁止在殖民地从事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法令，免除工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明或引进新机器，并对棉纺、毛纺、丝织和钢铁工业提供直接补贴）。对外开放港口引起了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利益集团的反对浪潮，唐·若昂对此作出反应（也是为了海关管理方便），于1808年6月11日颁布法令，将对外贸易限于5个港口——贝伦、圣路易斯、累西腓、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并规定只允许葡萄牙船只进行巴西沿海贸易以及与葡萄牙帝国其余地区进行贸易。他还

对葡萄牙的航运作出优惠规定，凡由葡萄牙船只装载的货物，将进口货物普通税率由1月间确定的24%降至16%。尽管如此，开放贸易的基本原则毕竟已经确立。

实际上，至少在战争结束以前，同友好国家进行直接贸易也就是同英国进行贸易。正如坎宁所预料到的里约热内卢成了“运往整个南美洲”——不仅限于巴西，而且包括拉普拉塔河地区和西班牙语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地——“进行消费的英国制成品的陈列所”。① 早在1808年8月，约有150—200名商人和代理商在里约热内卢形成一个兴旺的英国人小社会。有一个名叫约翰·勒科克的商人是利兹卢普顿公司的合伙人，在此居住了10年，1820年发表他的著作《在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南部的笔记》，是首次全面描述巴西中南部、特别是1808年以后在里约热内卢及其周围所发生的经济变化的著作之一。他在1808年6月间到达里约热内卢时，发现这个城市“到处是〔英国的〕纺织品、五金商品、服装和陶器。”② 据估计，1808年出口至巴西的英国商品总值超过200万英镑——以后十年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1808年驶入里约热内卢港口的船只超过1807年4倍多，大部分是英国船。巴西出口的糖、棉花和咖啡(1808年以后继续增长，而且初级产品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价格创历史最高纪录)现在也主要靠英国船只运往欧洲。

然而英国对巴西的开放政策并不感到满足。它要求得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葡萄牙享有的那种特惠权利。唐·若昂无法拒绝这些(和其他)要求，他完全靠英国的部队和武器同入侵葡萄牙的法国人作战，靠英国海军保卫巴西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其余地区。斯特兰福德勋爵作为英国外交使节随摄政王来到里约热内卢，经过漫长的谈判，最终于1801年2月迫使摄政王签订了“航

① 转引自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优越地位》第78页。

② 见赫伯特·希顿著《一个商人冒险家1808—1818年在巴西》载《经济史杂志》第6期(1946)。

海与商务条约"和"同盟与友好条约"。商务条约规定，巴西对进口的英国商品(主要是棉、毛、麻织品、五金器具和陶器按价征收的关税税率最高不超过15％)。1810年10月18日颁布法令将从葡萄牙进口货物的关税从16％降至15％，但这项措施丝毫无助于恢复葡萄牙与巴西的贸易，1809—1813年葡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至1800—1804年水平的大约30％。仍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对巴西的唯一贸易是贩卖从葡属非洲运来的奴隶。与此同时，廉价的英国进口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1808年以后建立巴西工业的努力。不用说，英国并没有采取互惠措施，降低对进入英国市场的巴西糖和咖啡(虽然不包括棉花)征收的非常高的关税。1810年，摄政王还正式承认英国商人在巴西定居和从事批发和零售商业的权利。此外，英国政府还获得了任命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法官、特别行政长官负责审理涉及巴西英国侨民的案件的权利。

174

根据同盟条约第10条，摄政王开始履行关于减少并最终废除奴隶贸易的第一项条约义务。1807年4月，英国在自己废除奴隶贸易后不到3个星期，就曾呼吁葡萄牙仿照办理，结果不出所料毫无成效。摄政王定居巴西这个新情况为英国提供了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的难得机会。摄政王不得不第一步先禁止在葡萄牙属地以外从事奴隶贸易，也就是不允许葡萄牙奴隶贩子在英国人被迫退出的地方进行奴隶贸易，同时承诺逐步废除。此后，英国为要求葡萄牙履行最后一项诺言，向它施加了毫不容情的压力。

1808年葡萄牙宫廷转移到里约热内卢不仅使巴西经济上开放，而且也结束了巴西文化和思想上的闭塞状态。新人新思想开始进入巴西。1808年5月，在首都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随后1811年在萨尔瓦多、1817年又在累西腓建立了新的印刷厂)，开始出版报纸和书籍。公共图书馆、文学、哲学和科学等学术机构、学校和剧院也建立起来了。1808至1822年间，除24,000名葡萄牙移民外

登记的外国移民即有4,234人（他们的妻子、孩子和仆人未计算在内），其中1500名西班牙人，特别是西班牙语美洲人，1,000名法国人，600名英国人，100名德国人，其余则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和北美洲。[①] 他们大多是专业人员和工匠，包括医生、音乐家、药剂师、裁缝、鞋匠、面包师等等。在唐·若昂留居期间，里约热内卢城的人口翻了一番，从5万增加到10万。

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政府也欢迎杰出的外国科学家、艺术家和旅行者前来访问，为他们提供方便——自从荷兰人17世纪30年

德、约翰·巴普蒂斯特·波尔及其重要合作者动物学家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施皮克斯以及植物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克·菲利普·冯·马齐乌斯，其中许多人是在哈布斯堡王室利奥波迪纳公主的赞助下访问巴西的（公主是奥地利皇帝的女儿，1817年与唐·若昂长子唐·佩德罗结婚）。她把奥地利画家托马斯·恩德（1793—1875）也带到了巴西。另一个著名艺术家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1802—1858），1821年，随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朗斯多夫伯爵率领的赴马托格罗索和帕拉访问的科学代表团第一次来到巴西。

随着葡萄牙的解放和欧洲战争的结束，人们普遍期待葡萄牙摄政王返回里斯本。1814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派遣海军少将约翰·贝雷斯福德爵士赴里约热内卢，两艘正规海军部队舰只和一艘武装快速帆船随行，准备护送唐·若昂回国。贝雷斯福德1814年12月底到达后，将英国舰船阿基里斯号交摄政王支配作回国之用。但是唐·若昂很喜欢住在巴西。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流亡国王，他随身带来了葡萄牙整个国家机器，还有数以千计的葡萄牙统治阶级成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在巴西扎下根，而现在舍不得离开。唐·若昂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照例是犹豫不决。最后，他听从了主要大臣（1814—1817）巴尔卡伯爵阿劳若·德·阿泽韦多的劝告，决定留在巴西。1815年12月16日，他将巴西升格到王国的地位——与葡萄牙平起平坐。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项决定（而不是1808年葡萄牙宫廷的到达）标志着巴西殖民地地位的结束。三个月后母亲去世，摄政王继位，成为葡萄牙、巴西和阿尔加维国王若昂六世。但是以新大陆为中心建立葡萄牙——巴西双重君主国，是注定要失败的。唐·若昂无法专心致志治理巴西。葡萄牙的宫廷和政府继续与巴西的葡萄牙人社会保持密切关系，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说到底也就是葡萄牙的利益。同时，1808年以前有利于巴西不利于葡萄牙的人口和经 176

济趋势，1808年以后因双方财力上的差异而进一步加强。因而巴西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根本冲突并未解决，也无法解决。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葡萄牙王室与巴西地主阶级上层人士之间的联系1808年后有所加强。因为双方在开放贸易上利益一致。特别是里约热内卢(甚至整个中南部)和“开明”督军阿科斯伯爵治理下(1810—1818)的巴伊亚，糖、棉花和里约热内卢的咖啡出口增长，尽管战后棉花(由于美国的产量增加)和糖(由于古巴的产量加速增长)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下跌。但是王室的经济政策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令人厌恶的商业垄断和特权，唐·若昂仍想方设法保护旅居巴西的和葡萄牙国内的葡萄牙商人的利益。此外，巴西人担心一旦唐·若昂返回里斯本，巴西可能会回到殖民地地位，丧失1808年以来获得的全部成果。

在政治方面，已经证明，巴西上层人士对开明的专制制度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唐·若昂的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促进了巴西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同时又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巴西和西属美洲不一样，1808年拿破仑颠覆西班牙王国后，西属美洲就没有国王可以服从了，而在巴西并未发生政治正统性危机。而且巴西在1815年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唐·若昂还运用他的权力，象大陆葡萄牙人一样授予当地巴西人(和外国人)非世袭贵族头衔——男爵、子爵、伯爵和侯爵——以及不同层次的这等勋章：基督勋章、圣·本托·德·阿维斯勋章、圣地亚哥勋章、宝塔和宝剑勋章、贡赛松圣母勋章。也就是说，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作为效忠王室的报酬。但在表面现象之下，潜伏着自由主义的、甚至更强烈的反葡萄牙政治情绪。在葡萄牙专制政府统治下的里约热内卢，能立即感觉到宗主国的统治。通往某种有限的分享政治权力的道路已被堵死；多不胜数的有利于葡萄牙人的歧视性措施更加公开。财政负担也大大加重了，因为支持葡萄牙宫廷和庞大的官僚和军事机构的义务只落在巴西人肩上。此外，还要求巴西人为唐·若昂和他的妻子卡洛塔·华金纳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野

177

心(以及巴西南部庄园主的利益)付出代价。西属美洲的独立革命，特别是阿蒂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斗争，给葡萄牙提供了重新占领萨克拉门托移民镇的好机会(该地是在经历一个世纪的冲突后于1778年割让给西班牙的)。早在1811年，葡萄牙部队就越过了西班牙边界，但不久即撤退。1815年4月，曾在这问题上对葡萄牙进行约束的斯特兰福德勋爵离开里约热内卢返回伦敦。不久，从欧洲战争中解脱出来的葡萄牙部队开始到达巴西。1816年6日，一支葡萄牙舰队和3,500名士兵离开里约热内卢开赴拉普拉塔河地区。1817年1月，莱科尔将军占领蒙得维的亚。1821年7月，整个“东岸”——今天的乌拉圭——并入巴西，成为锡斯普拉蒂内省。

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明里约热内卢政府为了葡萄牙国家利益牺牲巴西利益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同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和其他一些取缔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的条约。英国海军曾在一段时间内将1810年条约中关于禁止在葡萄牙领土以外从事奴隶贸易的规定理解为不准在赤道以北进行奴隶贸易，英国军舰俘获了一些葡萄牙的贩奴船，直至1813年才停止这样做。向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出口奴隶的商人遭受严重损失，奴隶价格上升。后来在维也纳会议上葡萄牙终于同意(1815年1月签订条约)禁止在赤道以北进行奴隶买卖，而以财政补助作为补偿，同时重申决心逐步结束贩运奴隶。1815年2月，欧洲八强(包括葡萄牙)宣布，奴隶贸易“有悖于人道主义和普遍的道德原则”。但是从巴西奴隶主的观点来看，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1817年7月，葡萄牙驻伦敦外交代表帕尔梅利亚伯爵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1815年条约的附加协定，使条约更具威力：英国海军有权在公海上巡视并搜查被怀疑在赤道以北经营非法奴隶贸易的葡萄牙船只，同时组成英葡混合代表团，负责裁决截获的船只和释放奴隶。葡萄牙再次承诺通过并实施反奴隶贸易法规，最终完全废除这种贸易。但进一步要求葡萄牙作出让步的外交压力受到抵制，奴隶贸易(现在赤道以南合法，赤道以北不合法继续

178

向巴西供应劳动力。这种贸易从19世纪初叶每年15,000——20,000人增加到19世纪20年代初每年30,000人。然而，许多巴西人感到奴隶贸易似乎开始要结束了，葡萄牙出卖了对巴西奴隶主生死攸关的利益。

巴西人对葡萄牙政权的不满情绪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或许正在增长，但在里约热内卢是否已根深蒂固，不应言过其实。还不存在，强烈的，也肯定没有普遍的政治变革要求。对葡萄牙的专制制度和它强加于巴西的政治制度持续不断进行批判的是伊波利托·若泽·达·科斯塔，他自1808年6月至1822年在伦敦发行了一种很有影响的报纸——《巴西邮报》。只有一次公开的叛乱，但主要是反对里约热内卢政治上和财政上的从属地位，还不是真正反对葡萄牙的统治。然而1817年3月间爆发了一次军事叛乱，参加者有少数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他们出口的糖和棉花利润下降而奴隶价格上升），还有一些富商、王室法官、神甫、小佃农、公地上的定居者以及手工业工人，最后在伯南布哥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的“基本法”包含宗教上容忍异端和“权利平等”，但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度。叛乱迅速蔓延到阿拉戈斯、帕拉伊巴和北里奥格兰德。但是后来它畏葸不前，内部产生了许多派别活动。英国已经达到开放巴西港口的目的，主张巴西保持稳定和统一。当共和国向英国派去代表时，英国拒绝承认。两艘改装过的商船从海上封锁了累西腓。最后，从巴伊亚（督军阿科斯依然效忠王室）和里约热内卢集合了一支军队。1817年5月20日，叛乱者投降。这个东北部的共和国维持了两个半月。巴西的其余部分依然保持平静。然而，1817年革命表明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军队里也有。来自葡萄牙的部队现在被调来驻防主要城市。在现有部队中（例如在巴伊亚），葡萄牙人愈益频繁地被提拔到巴西人之上。独立革命在西属美洲南部和北部的迅速进展是向葡萄牙发出的警告，现在有迹象表明，葡萄牙政权已变得更具压迫性。在唐·若昂居留巴西期间，托马斯·A·维拉·诺瓦·

179

波图加尔(1817—1820)无疑是所有大臣中是最反动和最亲葡萄牙的。

巴西独立运动终于因葡萄牙1820—1821年的政治发展而突然爆发。1820年8月24日,波尔图爆发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起义,接着,10月15日又在里斯本爆发另一次起义。起义由军人发动,得到葡萄牙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得到对葡萄牙战后政治和经济状况深为不满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专制的国王若昂六世还在里约热内卢,对葡萄牙发生的问题似乎很不敏感。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作用完全颠倒了。葡萄牙在唐·若昂长期不在的情况下由一个摄政会议统治,主席是英国人贝雷斯福德元帅,他在战后继续担任葡萄牙陆军总司令。战争结束后,葡萄牙同巴西的贸易多少有所恢复,但仍大大低于1808年以前的水平。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地主、制造商、商人、航运业老板——总之大多数葡萄牙人——的经济收益,1808年以前严重依赖葡萄牙对巴西贸易的垄断地位以及对巴西大宗产品的转口贸易,而今正持续遭受巨大的经济困难(尽管葡萄牙的经济衰落并非完全由于"丧失"巴西。此外,葡萄牙由于失去了来自巴西和巴西贸易的收益,财政预算长期出现赤字,文官和军人都领不到薪金。1820年底,自由派成立临时洪达,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并要求国王立即返回里斯本。他们指望若昂六世在制订葡萄牙新宪法以前(为此目的匆忙召开了非常制宪会议)采纳西班牙1812年自由主义宪法(1820年1月—3月西班牙发生自由派革命后该宪法恢复生效)。根据11月22日指示,议会应在整个葡萄牙领土上选举产生,每3万自由臣民选出一名代表(巴西在总共200多个席位中分配到大约70—75个席位),巴西各都督辖区(现在的省)应建立忠于葡萄牙革命的临时洪达,监督选举里斯本议会代表。但在所有这些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措施背后,潜伏着葡萄牙决心恢复巴西在1808年以前的殖民地地位的意图

180

葡萄牙自由派立宪革命的消息在巴西许多城市并未引起重大骚乱。但是和葡萄牙本土一样，也是军人率先采取重要行动反对巴西的专制制度。1821年1月1日，贝伦的葡萄牙部队发动叛乱，为帕拉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洪达，不久马拉尼昂(4月3日)和皮奥伊(5月24日)也追随于后。洪达立即宣布准备组织里斯本议会代表选举。2月10日，自由派部队在巴伊亚组织了类似的军人密谋反对他们的专制军官。这次叛乱导致督军帕尔马伯爵去职和成立临时洪达，拥护制订葡萄牙巴西联合王国自由主义宪法。它的成员大多是葡萄牙人，但得到许多知名巴西人的支持，只是排除了极端自由派参加。在首都里约热内卢，2月24—26日也发表宣言支持立宪革命。一支葡萄牙部队集合在拉戈·德·罗西欧(现在的拔牙者广场)，强迫内阁改组并逼迫国王本人批准葡萄牙和巴西未来的自由主义宪法；他还按照里斯本临时洪达的指示 命令尚未建立洪达的各省成立洪达，选举葡萄牙议会代表。

181 但是在议会要求国王返回里斯本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在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帮(主要是高级军官、高级文官和基本上依然与葡萄牙保持密切联系、渴望恢复垄断地位的商人)自然支持国王回国，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专制派或巴西分子，不是自由派。另一方面，“巴西帮”却出来表示反对。它的主要成员是整个巴西尤其是靠近首都各都督辖区的大地主、巴西出生的官吏和司法人员。但并非所有“巴西帮”成员都是巴西出生的人。其中也包括已在巴西土地上扎根的葡萄牙人：包括因王室政府迁至里约热内卢而获益的葡萄牙官员，已适应开放贸易的新经济环境、特别是经营零售外国商品和国内贸易的葡萄牙商人，投资于土地和城市产业或已与巴西人结婚的葡萄牙人，或者就是喜欢呆在巴西的人。许多“巴西帮”成员并非革命者，也不是反殖民主义者，当然更不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支持制订一部削弱国王权力、增加自己权力的宪法。当时还不知道葡萄牙议会是十足反巴西的，而维护现状、保持巴西自1808年以来获得的政治上与宗主

国平等和经济自由是符合所有“巴西帮”利益的，倘若唐·若昂离去，上述一切将受到威胁。

巴西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大多数人是保守派，至多是自由保守派。他们希望保持以种植园制、奴隶制和向欧洲市场出口热带农产品为基础的殖民地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和累西腓等城市也有自由派，甚至激进自由派和一些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自由职业者（特别是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或手工业工人（裁缝、理发师、技工），也有一些小零售商、士兵和神甫。大多数是白人，也有许多穆拉托人和自由黑人。他们期望发生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变化：人民权力、民主、乃至共和国；社会和种族平等、甚至土地改革和废除奴隶制。他们在唐·若昂究竟应该返回葡萄牙抑或留在巴西的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

唐·若昂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倘若回国，他将落入自由派的掌握之中，还可能冒失去巴西的风险；如果留下，毋庸置疑，他将失去葡萄牙。他曾考虑派他22岁的儿子唐·佩德罗去里斯本，但最终在1821年3月7日同意自己回国。在这之前，他曾再次受到来自军方和自由立宪派帕尔梅利亚伯爵的压力，伯爵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中击败了专制派首相托马斯·维拉·诺瓦·波图加尔（英国也仗势逼迫唐·若昂返回里斯本。卡斯尔雷〔首相〕暗示，英国保证帮助布拉干萨王朝抗拒外部攻击，但不管内部革命）。里约热内卢的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唐·若昂依然犹豫不决。4月21—22日，里约热内卢贸易广场发生群众示威，要求象帕拉和巴伊亚那样成立洪达，选举议会代表。最后，于4月26日唐·若昂和大约四千名葡萄牙人（以及国库和巴西银行的全部现金）在巴西居留13年之后启航返回里斯本，留下年轻的唐·佩德罗在里约热内卢任摄政王。

“巴西帮”如今别无选择，惟有组织起来在议会中保卫巴西利益。大部分地区在5月至9月间进行了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几

乎所有当选代表都是巴西出生的，其中还有几名参加过1817年革命的重要激进分子，如西皮里亚诺·巴拉塔(巴伊亚)、穆尼斯·塔瓦雷斯(伯南布哥)、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德·安德拉达·马查多-席尔瓦(圣保罗)。圣保罗选出的6名代表中，除安东尼奥·卡洛斯外，另外还有3人独立后成为知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帕德雷·迪奥戈·安东尼奥·费若、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索萨-梅洛和尼科劳·佩雷拉·德·坎波斯·维尔格罗博士。这次选举(和给当选代表的指示)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他们显然还没有把巴西的独立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议会第一次会议1821年1月底在里斯本召开。7名伯南布哥代表是首批到达的巴西人(8月29日)；5名里约热内卢代表9月和10月到达，马拉尼昂代表11月到达，巴伊亚代表12月17日到达，最庞大的圣保罗代表团则到1822年2月至5月才到达；有些代表，如米纳斯吉拉斯的代表始终未到。但是在大多数巴西代表参加开会以前，葡萄牙议会早已准备把时钟倒拨，恢复巴西从前的殖民地地位。葡萄牙资产阶级决心要恢复对巴西的统治权，尤其不能容忍英国直接接近巴西，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巴西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发展。对殖民地关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尤其是1808年以后)，也没有认识到欧洲和美洲发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已使葡萄牙一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单独保持它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

1821年4月传来帕拉、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爆发立宪运动的消息后，特别是唐·若昂回国后(他于7月4日抵达里斯本)，议会开始越过里约热内卢直接与巴西各省打交道，但未获成功。它还试图废除与英国的贸易协定，也未能成功；葡萄牙人打算再次让英国商品经由宗主国运往巴西并征收更高的关税。8月间，向巴西派出增援部队，然后采取一系列决定性行动。9月29日，议会下令撤消1808年在里约热内卢建立的所有政府机构，迁回里斯本，这表明它要直接管辖巴西。10月1日又宣布对巴西每个省任命一名军事省长，他不受省洪达管辖，直接向里斯本负责。最后，10月8日命令摄政

王本人回国。当巴西代表在1821年最后几个月和1822年上半年终于陆续抵达葡萄牙时，据他们说，他们遭到嘲笑、侮辱、威胁和公开的对抗(也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尊严过于敏感)。葡萄牙自由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费尔南德斯·曼努埃尔·托马斯有句名言，巴西是"猴子、从非洲沿海抓来的黑人和香蕉的土地"。因此，毫不奇怪，巴西人提出的要求，例如1822年3月安东尼奥·卡洛斯在圣保罗洪达的《记录与回忆》中提出的政治和经济上与葡萄牙平等建立两个平行的政府机构、里约热内卢和里斯本轮流作为君主国的政府所在地等要求没有得到答复。总而言之，已经太晚了。巴西的事态正在不可抗拒地、迅速地向与葡萄牙最后决裂发展。1822年10月，7名巴西代表——4名圣保罗人(包括安东尼奥·卡洛斯)和3名巴伊亚人(包括西皮里亚诺·巴拉塔)——非法逃离里斯本，先到伦敦，然后返回巴西，他们拒绝宣誓忠于1822年宪法并担任预定于12月首次召开的普通议会议员。其他巴西代表(许多人由于在里斯本的痛苦经历变得激进起来)也立即离去。 184

自1808年以来，巴西已经前进得太远了，除了与宗主国保持完全平等以外，其他办法都无法接受。9月末10月初通过法令的消息于1821年12月11日传到里约热内卢，最终证实了葡萄牙的不妥协态度，它决心将1808年以来葡萄牙与巴西关系方面的所有改变完全颠倒过来。接着在巴西进行一次较大的政治重新组合。"葡萄牙帮"(唐·若昂返回里斯本后留下的人员)与"巴西帮"最后永远地分裂了。在中南部"巴西帮"中的各种不同势力——葡萄牙出生的在巴西有财产的里约热内卢人，巴西(特别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极端自由派和激进派——联合起来反对葡萄牙议会。由于唐·若昂显然不能保证继续实行1808年的安排，越来越自信的巴西人终于撤回了他们对若昂六世国王的忠诚，开始转向摄政王唐·佩德罗。挽留唐·若昂呆在巴西的斗争已于1821年4月失败，巴西今后自治的当前关键是说服唐·佩德罗留下。在1821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和1822年头

几个星期，里约热内卢的政治家和新闻界展开了紧张的政治活动对摄政王施加压力，他经过一时犹豫之后，终于被争取过来。唐·佩德罗1822年1月9日答复由若泽·克莱门特佩雷拉呈递的有8千人签名的请愿书时宣称，他将留在巴西。（这个事件便是巴西历史上有名的“我留日”，“O Fico”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Ficar，意为“留下”）。佩雷拉本人是长期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商人，一个自由派，里约热内卢市政委员会主席（若昂六世留驻在此时根本不重视这个机构）巴西与葡萄牙的联结尚未破裂，但是摄政王的这个严重的不服从举动无异于抵制葡萄牙统治巴西的权力。几天后，宣誓效忠唐·佩德罗的葡萄牙部队（他们成为巴西正规军的核心）迫使拒绝宣誓效忠唐·佩得罗的葡萄牙军队离开里约热内卢（葡萄牙派来的新部队于2月抵达时未获准登陆）。1月

185

16日，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1763—1838）被任命为“巴西”新内阁首脑。若泽·博尼法西奥是巴西富有的桑托斯家族的一员，曾在科英布拉受教育并作为科学家和王室行政官员受雇于葡萄牙达35年之久（直至1819年），时年58岁，任圣保罗临时洪达主席。虽然内阁所有其他成员都是葡萄牙人，但任命博尼法西奥象征巴西统治如今已发生巨大变化。

唐·若昂与唐·佩德罗的私人通信中有某些迹象表明，前者离开巴西赴葡萄牙时已预见到这种事态发展的进程，他劝告他的儿子与巴西人共命运，以便使帝国的两部分至少都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有朝一日也许还可能重新结合在一起。唐·佩德罗复信给里斯本的唐·若昂时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之葡萄牙是一个贫困的四等国家，物资匮乏，因而有求于人；而巴西是一个独立的头等国家”。① 也可能是巴西的自由派对唐·佩德罗施加了压力（他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独裁主义的），因而他决定去领导运动（它开

① 转引自曼努埃尔·达·西尔韦拉·卡多佐文章，见A.J.R.拉塞尔-伍德编《从殖民地到国家。有关巴西独立的论文》（巴尔的摩，1975）第207页。

始越来越象一次独立运动)而不是被它推翻。历史学家对于政治上完全脱离葡萄牙成为巴西人的目标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争论。到1821年底，葡萄牙议会的意图已不再有人怀疑，但在此以前，独立还只是少数激进派的目标。有人认为，甚至到1822年，巴西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中的某些人和里斯本议会中的巴西代表(包括圣保罗小组在内，他们不断强调忠于国王)，他们谈到的独立，只是意味着双重君主国内部的自治，主张继续与葡萄牙保持某种类型的联盟。

在1822年初，若泽·博尼法西奥无可非议地是巴西政治进程中的主要人物。他在社会问题上的见解是异常进步的——他赞成逐步废除奴隶贸易乃至奴隶制、欧洲人自由移居和土地改革——但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极端反对民主。争取唐·佩德罗留在巴西的运动一结束(它勉强使巴西各派力量暂时联合起来)，若泽·博尼法西奥立即不仅与极端自由派和民主派(他把这些人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煽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共和派)，而且与许多比较温和的自由派拉开距离，同时开始纠合保守派和自由保守派地主、高级官员和法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科英布拉大学受过教育)以及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商人，准备在巴西建立一个独立的君主国。他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君主国是在向独立过渡的危险时期内保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甚至领土统一)的唯一办法。

186

1822年上半年，若泽·博尼法西奥与若阿金·贡萨尔维斯·莱多、帕德雷·雅努瓦里奥·德·库尼亚·巴尔博扎、多明戈斯·阿尔韦斯·布兰科·穆尼斯·巴雷托、若泽·克莱门特·佩雷拉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里贝罗·德·安德拉达(他和安东尼奥·卡洛斯一样是里斯本议会圣保罗代表团领导人，若泽·博尼法西奥的兄弟)等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冲突的主要形式是，双方利用各自的共济会组织——"宗教徒团"和"伟大的东方"——竞相对缺乏经验的年轻摄政王施加影响。权力斗争中有一个意识

形态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召集制宪会议的问题上。若泽·博尼法西奥强烈反对在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中有群众代表。他于1822年2月16日说服唐·佩德罗只需成立以传统程序提名的由“善人”* 组成的各省检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6月2日成立，但未能存在下去。6月3日，唐·佩德罗不顾若泽·博尼法西奥的反对，同意召开制宪会议。6月19日，极端自由派争取群众直接选举会议代表的努力失败，从而失去了主动权（制宪会议代表是在严格限制投票权的条件下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直至1825年5月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那时主要激进派人士已被监禁或流放）。在此期间，1822年5月作出决定，今后葡萄牙议会的法令如无摄政王的明确同意不予执行。7月，更多巴西人参加若泽·博尼法西奥内阁。8月，唐·佩德罗和巴西政府的“独立”活动增多。1822年9月7日，在圣保罗附近的伊皮兰加河畔走出了最后一步。在这里唐·佩德罗收到里斯本的最新信件，宣布废除他颁布的所有法令，指责他的大臣犯有叛国罪，并再次要求他回国和巴西完全接受葡萄牙统治。与此同时，若泽·博尼法西奥和佩得罗的妻子利奥波迪纳公主劝告他与葡萄牙——永远决裂。据一位目击者（一名王室人员）的叙述，唐·佩德罗以一种典型的冲动姿态从信使手中夺过信件，揉成一团扔在地上，愤怒地对周围的人说道，“从今天起我们结束和他们的关系。我不再要葡萄牙政府任何东西，我宣布巴西永远脱离葡萄牙”。然后，抽出佩剑挥舞着大声喊道，“独立自由、巴西脱离葡萄牙万岁”。10月12日，他24岁生日那天，唐·佩德罗被拥戴为巴西的立宪皇帝和永久保护者。1822年12月1日，他在里约热内卢以极其盛大的仪式接受加冕。

187

巴西独立运动的力量来自中南部最重要的省份——里约热内

---

* “善人”（homens bons），葡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好人”，属于巴西社会的上层阶层。——译者

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特别是首都里约热内卢。伯南布哥的巴西人主要阶级是反葡萄牙的，但是没有忘记1817年革命和建立共和国的尝试，那里的守备部队比较少，愿意转而效忠唐·佩德罗，因而伯南布哥迅速承认了独立的巴西帝国。东北部和北部其他各省，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葡萄牙军事力量、相当大的葡萄牙商人社团和浓厚的亲葡萄牙情绪（至少在沿海城市），因此继续忠于里斯本议会。流传着一些奇异的谣言，说葡萄牙可能派出讨伐部队，而且作为重新征服的第一步，可能将东北部和北部从巴西分离出来，因为东北部和北部地理上比较接近葡萄牙，经济上并未与中南部结为一体，历史上在许多方面与里斯本的联系较之与里约热内卢更密切。若要完成和巩固独立进程，避免长期内战，使新皇帝的权力达到整个葡萄牙前殖民地，那就必须尽快将东北部和北部，特别是巴伊亚省（依然处于葡萄牙控制下的最重要省份）纳入独立行列。

1823年初，巴伊亚省出现严重分裂，概括地说，是在雷孔卡沃和萨尔瓦多之间发生分裂。这次分裂可以追溯到1822年2月任命伊格纳西奥·路易斯·马德拉·德·梅洛（一名保守的葡萄牙上校军官）为巴伊亚省的军事省长，遭到洪达成员、巴西军官、雷孔卡沃的糖厂主和城市激进分子的反对。反对未获成功，马德拉·德·梅洛设法树立了自己的权力。1月间被迫撤离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部队3月间到达萨尔瓦多，不久又从葡萄牙得到增援。马德拉·德·梅洛当时在萨尔瓦多控制着2,000名正规军卫戍部队，加上1,500名民兵，这是葡萄牙在巴西集结的一支最大的军事力量。但先是6月22日在圣阿马鲁，继而在卡舒埃拉，保守的雷孔卡沃糖业富商奋起反对葡萄牙重新将巴西变成殖民地的企图。他们撤回对若昂六世的忠诚，会同一些巴西出生的法官在卡舒埃拉建立一个效忠唐·佩德罗和里约热内卢政府的巴伊亚全省临时政府委员会。保守革命者的上述行动改变了更激进的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分子（即有人所称的“煽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一些人主张单

188

独建立巴伊亚共和国)的行动方向,同时保证了社会安定，它正受到雷孔卡沃日益增多的奴隶起义和该省南部萧条地区群众骚乱的威胁。但是巴西军队在人数、装备和指挥上都处于劣势，尽管包围了萨尔瓦多城,却没有力量赶走葡萄牙军队。在马德拉·德·梅洛方面，他在1822年11月8日和1823年1月6日两次企图从萨尔瓦多突围都告失败。战事陷入僵局。

1822年7月,唐·佩德罗任命法国军官皮埃尔·拉巴蒂为巴伊亚省反葡萄牙军指挥官。拉巴蒂在他的路程的最后阶段从累西腓走陆路，直至10月底才抵达目的地，接着即以巨大的精力和专业技能着手组织一支绥靖部队。尽管拉巴蒂本人因1823年5月兵变被免职，由若泽·若阿金·德·利马-席尔瓦将军取代他任指挥官，但是到1823年年中，他已经动员了一支至少在人数上相当可观的军队：一共有14,000人(包括来自里约热内卢和伯南布哥的3,000人)。不过，马德拉·德·梅洛的部队仍是一支令人生畏的不易失败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巴伊亚还驻扎着一支葡萄牙的海军分舰队——一列战舰，5艘武装快速帆船、5艘海防舰、1艘横帆双桅船和1艘双桅纵帆船。葡萄牙人掌握了全部制海权。

189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佩德罗请求科克伦勋爵(后为邓唐纳德伯爵十世)出马。科克伦傲慢、暴躁、好斗，是他那个时代最勇敢和最有成就的第一线武装帆船船长之一。1814年他因证券交易所舞弊案件被海军除名。几年后他开始一种新的生涯——当雇佣军，为出高价者服务，但通常都站在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运动一边。1818年他组织智利海军，并与圣马丁一起，曾为智利独立和至少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秘鲁沿海地区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暂时在智利金特拉自己的庄园里过着半退休生活。他接到了唐·佩德罗要他为巴西效力的邀请。

再一次不顾1819年英国颁布的外国募兵法，科克伦接受了这次邀请——尽管在地位(最终担任第一海军上将和总司令)和报酬(他愤愤不平地拒绝接受葡萄牙海军上将的薪俸，说这是“世界

上最坏的”待遇问题上有过争论。科克伦带了几名同他一起在太平洋上工作过的英国军官，于1823年3月13日到达里约热内卢，立即着手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巴西海军（总计9艘舰只）去封锁巴伊亚。（他鼓励当时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水手离开他们的船只参加他的舰队）。但除了旗舰是装备74毫米炮双层甲板的"佩德罗一世"号（即从前的"马尔蒂姆·弗雷塔斯"号，是1807年11月驶离里斯本的舰船中的一艘），外，其他船只都很简陋。尽管如此，葡萄牙人畏惧他的名声甚于他指挥下的实际兵力，他的到达迫使他们从巴伊亚撤退。1823年7月2日，利马-席尔瓦将军率领巴西军队进城。英国海军中将托马斯·哈代爵士告称"双方都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或残酷的镇压行为"。哈代是英国南美洲分舰队总司令，为了保护英国人和生命财产不受威胁上一年9月他的旗舰"克里奥尔"号驶抵巴伊亚。按当地说法，这基本上是雷孔卡沃地主的胜利——另一次保守派革命。

一支葡萄牙船队——包括13艘战舰和大约70艘运输船及商船，载有5,000名军人、大量军事物资和一些葡萄牙主要家族成员——驶出港口，科克伦即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加那利群岛，接连好几夜将殿后的船只一艘艘击沉，最后剩下不到1/4。由另一名英国人约翰·泰勒指挥的巴西武装快速帆船"尼斯罗伊号"尾随葡萄牙残余船队直抵塔古斯河口，冒着号称葡萄牙海军的骄傲的"若昂六世号"的炮火烧毁了另外4艘舰只。约翰·泰勒曾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服役于纳尔逊麾下，今年早些时候离开他在里约热内卢的船，加入了科克伦的舰队。

190

这时科克伦已把注意力转移到北部的马拉尼昂省。7月26日，他主要靠虚张声势，迫使圣路易斯的一小股葡萄牙卫戍部队投降。两天以后，马拉尼昂和它过去下属的皮奥伊辖区一起正式并入巴西帝国。8月13日，科克伦的副指挥官约翰·帕斯科·格伦费尔的"马拉尼昂"号（前葡萄牙横帆双桅船"唐·米格尔"号）再次主要用炫耀武力而不是使用武力的办法，成功地迫使贝伦方面

的保王分子投降，使帕拉省和它过去下属的里奥内格罗辖区，也就是整个亚马逊河下游地区成为巴西帝国的一部分。在锡斯普拉蒂内省也加入独立的巴西帝国后，最后一支撤离巴西的葡萄牙部队于1824年3月离开蒙得维的亚。科克伦在北部完成他的业绩后回到里约热内卢，1823年11月9日受到唐·佩德罗的接见，又被授予马拉尼昂侯爵的称号和其它奖赏。毫无疑问，英国根据科克伦自己写的《为智利、秘鲁和巴西解放事业服务记述》一书(1859)所作的记载多少有些夸张，但是科克伦和其他英国海军军官完全以非官方身份对巴西的独立事业，更重要的是对巴西的统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①。至1823年中，巴西已无可置疑地摆脱了葡萄牙统治，确立它的独立地位，同时避免了内战和领土的分裂。但巴西新政府迫切需要国际上承认巴西事实上的独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防止葡萄牙负隅顽抗，由于发生了由专制主义者若昂六世统治，得到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列强的鼓励和可能的援助的自由镇事件(1823年5月)，再次重申葡萄牙对巴西的统治权；其次，(从根本上说是更重要的)，加强皇帝自己在巴西国内的权力，对付效忠葡萄牙王室分子、分裂分子和共和分子。英国的态度显然是决定性

191

① 关于和科克伦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格伦费尔成为巴西海军上将(在1851—1852年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战争中，担任最高统帅)，曾任巴西驻利物浦领事(1868年死于利物浦)。泰勒也成为巴西海军上将，娶巴西女子为妻，最后在里约热内卢附近一个咖啡种植园退休。科克伦本人与巴西的关系不太融洽。他认为给他的报酬与自己的贡献不相称，以致如往常一样，同主人闹得不欢而散——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如此。1824年，科克伦帮助镇压共和派分裂分子在伯南布哥发动的叛乱后，"擅离职守"，驾武装快速帆船"皮兰加"号驶往斯皮德黑德(在那里，1825年6月16日，首次在英国海面上向巴西旗帜致敬)。他当时拒绝返回巴西，因而被巴西海军除名。可是，他后来不但在英国海军中复了职(例如担任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基地海军总司令)，而且在他临死前(1860年)奥林达侯爵的政府(1857—1858)不咎既往愿意授予他一笔相当于10万英镑的利息半数的终身年金(他一直认为巴西政府还应给他10万英镑)，最后付给他的子孙4万英镑。

的，它的海军控制着大西洋，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结束后，它已不仅在欧洲出类拔萃，在全世界也处于优势，同时它对里斯本能施加很大影响。费利斯贝托·加尔德拉·布兰特·庞特斯（后为巴巴塞纳侯爵，1821年7月起担任唐·佩德罗驻伦敦代表）1823年7月写道："有了英国的友谊，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对付世界其他国家……不必再去乞求任何其他强国的承认，因为它们将全都愿意与我友好。"①

英国并未努力促进承认，但乔治·坎宁（因卡斯尔雷勋爵自杀，他于唐·佩德罗1822年9月7日发出《伊皮兰加的呼声》后仅一星期即回国担任外交大臣）很想尽快承认巴西独立，他这样考虑有着特别强烈的原因（附带说一句，承认巴西有助于承认各个新成立的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至少那些无庸置疑正脱离西班牙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而英国又同它们具有密切商业联系的国家）。首先，葡萄牙军力和财力不足，难以重新统治巴西；坎宁相信，巴西实际上已获得独立，虽然从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的时候起，葡萄牙一直占据着东北部和北部。其次，由于葡萄牙宫廷留驻巴西，英国已与巴西建立关系，如今巴西是英国第3个最大的国外市场。在它需要的时刻向它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可以借此巩固自己对巴西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第二，巴西不象西班牙语美洲，它保留了君主政体。坎宁渴望保持它作为大陆上"普遍的民主政治邪恶"的解毒剂和新旧大陆之间的一个宝贵环节。不适当地拖延承认巴西帝国可能危及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破坏它的不稳定的统一（1824年3月，在伯南布哥发生武装叛乱，确曾导致在巴西东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赤道邦联"，但6个月后被击败）。最后，巴西宣布独立提供英国一个在奴隶贸易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难得的机会。

192

在平常的情况下，不可能想象能说服新近独立的巴西废除奴

① 转引自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优越地位》第193页。

隶贸易。巴西是新大陆进口非洲奴隶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威尔伯福斯看来，它是“奴隶贸易的产物和维护者，甚至可以说是奴隶贸易的化身”。但是坎宁很快认识到，正如英国曾取得葡萄牙的勉强让步（不管多么有限）以换取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对它的支持一样，巴西希望英国承认，也将“使它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问题上听从我国摆布”。1822年11月，坎宁与巴西代表布兰特（他在8月12日即已接到唐·佩德罗的指示，要他同英国谈判承认问题）开始非正式讨论巴西立即废除奴隶贸易以换取英国立即承认巴西的问题。一旦承认巴西独立，巴西又废除了奴隶贸易，葡萄牙自己就没有理由不履行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了（即在今后某个时候废除赤道南北的奴隶贸易——这是它的主要殖民地巴西的利益之所在）。不管怎么说，不仅前不久的英葡条约，而且早在1716年葡萄牙法律就已禁止向葡萄牙帝国领土以外贩运奴隶。但是坎宁受到内阁中极端保守的托利党党员和乔治四世的约束，不准他在承认巴西问题上采取草率行动。巴西虽然保存了君主政体，巴西政权毕竟是革命政权，而且唐·佩德罗加冕为皇帝是得人心的，具有拿破仑式的味道（事实上，这个称号更多的起源于自由主义的共济会传统，在若泽·博尼法西奥的眼中只是巴西广大面积的反映）。此外，英国不得不考虑它在葡萄牙传统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布兰特方面，他不能承诺立即废除奴隶贸易。尽管唐·佩德罗和若泽·博尼法西奥两人都厌恶奴隶贸易（1823年5月召开的制宪议会的许多代表也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不敢得罪巴西的大地主，他们是独立的巴西帝国的主要支持者，而他们没有其他劳动力来源。过早地废除奴隶贸易引起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可能比得不到承认的风险更大。因此，他们所能提出的最大承诺是四、五年内逐步废除奴隶贸易以换取英国的立即承认。同时他们答应遵守1815和1817年英葡条约中关于取缔赤道以北奴隶贸易的条款。然而坎宁坚定地执行以下方针，即新大陆国家除非已经废除奴隶贸易，否则不能获得英国的承认。他告诉英国出席维罗那会议的

193

代表威灵顿公爵，“承认只能靠明确放弃奴隶贸易来赢得”。他赞同威尔伯福斯的意见，巴西“在投入我们怀抱以前，必须先洗净它身上的污垢”。①

1823年9月，葡萄牙请求英国从中斡旋它与巴西的关系，坎宁同意。但是他言明，他不准备无限期地等待葡萄牙承认巴西的独立，这样会损害英国在巴西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他特别考虑到，1810年签订的英葡商务条约（巴西新政府已接受）即将于1825年重新签订，届时与巴西直接谈判将不可避免。国际承认拖延愈久，将愈难使巴西在感激之余不仅同意英国在巴西继续享受商业特权，而且同意废除奴隶贸易。由英国和奥地利倡议，巴西和葡萄牙于1824年7月开始在伦敦进行谈判。谈判11月中止，1825年2月终于破裂。坎宁决定，现在已是英国单独行动的时候。半岛战争期间英国驻里斯本公使、1815年以后任驻巴黎大使的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作为特使被派往里约热内卢谈判缔结英巴商务条约。在途中他成功地说服比较灵活的葡萄牙新政府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他被授权同时代表葡萄牙进行谈判。

194

斯图尔特7月18日抵达里约热内卢，8月29日签订条约，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② 作为交换，巴西同意付给葡萄牙200万英镑赔偿金。唐·佩德罗还亲自保证维护葡萄牙帝国其余部分的领土完整，决不允许任何其他葡萄牙殖民地与巴西帝国合并——例如，葡属非洲的罗安达和本格拉两地历来与巴西有着密切联系（早在1823年2月，若泽·博尼法西奥就告诉英国驻里约热内卢代办，“非洲沿岸的殖民地，我们一概不要，其他地方也不要；巴西土

① 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剑桥，1970）第31页。

② 1826年1月，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加梅罗·佩索阿在伦敦作为巴西外交代表被接见，这时英国已事实上承认巴西。同年晚些时候，罗伯特·戈登被派往里约热内卢任英国驻巴西公使。美国实际上已于1824年5月26日第一个承认巴西。见斯坦利·E·希尔顿著《美国与巴西的独立》，载拉塞尔-伍德编《从殖民地到国家》。

地广阔，物产丰富，我们已经够了，上帝赐予我们这块土地，我们已心满意足”）。① 另一方面，唐·佩德罗保留继承葡萄牙王位的权利——坎宁希望保持这种可能性，有朝一日巴西和葡萄牙将会和平地在布拉甘萨王朝下重新统一。

英国为巴西赢得独立以及今后英国的友谊和援助是有代价的。首先，英国在1822年以来所有的谈判中始终要求废除奴隶贸易作为承认巴西独立的回报。葡萄牙承认巴西时，斯图尔特曾与巴西谈妥一个条约，结果被坎宁否决，最后在1826年11月终于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批准此约3年后(即1830年3月)，巴西的全部奴隶贸易将成为非法。其次，1827年8月签订英巴商约，规定继续实行过去的办法，即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税率最高不超过15%，在处理涉及居住在巴西的英国商人的案件时英国有权指控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法官。英国将它在葡萄牙享有的高度经济特权地位转移到巴西的过程，从1808年开始，就这样顺利完成了。

巴西脱离葡萄牙，象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和西属美洲脱离西班牙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整个大西洋地区旧殖民体系总危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的结果。巴西的独立(比西属美洲的独立更明显)也是19世纪头25年欧洲政治和军事形势发展及其在新大陆的反响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独立前的半个世纪内无疑产生了殖民地的自我意识和经济与政治的自决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特点，殖民地经济的性质，奴隶制的压倒优势，宗主国与殖民地上层人士的密切联系等等——在巴西远逊于西属美洲。可以这样认为：1807—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葡萄牙宫廷从里斯本转移到里约热内卢只是推迟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最后对抗，而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王国在西属美洲触发了这种对抗。但它也使葡萄牙王室与巴西的寡头统治集团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

195

① 转引自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第49—50页。

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巴西人在经济上甚至统治上的不满情绪。可以认为巴西是从1808年起逐步地和不可避免地走向独立的，但是也应该承认，迟至1820年在巴西尚不存在完全脱离葡萄牙的普遍要求。是1820年葡萄牙革命、1821年葡萄牙宫廷返回里斯本以及葡萄牙决心推翻1808年以后巴西取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迫使巴西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包括许多葡萄牙出生的人）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的。在这个进程中，曾在葡萄牙度过大半生的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旦决定以后，巴西实现独立就比较迅速，比较和平。这与西属美洲完全不同，那里大部分地区争取独立的斗争时间拖得很长而且比较激烈。在巴西很少人同情葡萄牙王室分子，归根结蒂，葡萄牙不具备阻止巴西独立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另外，巴西不象西属美洲，没有分裂成若干各自为政的国家。在巴西不存在真正的民族意识。中南部、东北部和北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不同的世界，各自有它们自己的完整的经济，彼此相隔遥远，交通不便，尽管没有地理条件上的障碍。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但是其他省和地区的上层人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大致相同，所以支持以里约热内卢为首都的新国家。在巴西还有一个布拉甘萨王朝的王子愿意承担独立运动的领导责任，这一点具有决定性作用。唐·佩德罗是正统权力的象征和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的有力工具。另外还有高度集中的官僚和司法制度把这个国家结合在一起。从东北部和北部驱逐依然效忠葡萄牙的军队的“独立战争”时间很短而且实际上并未流血，没有为分离主义倾向提供机会，也没有机会为此动员群众。巴西帝国的独立还幸运地及早获得了国际承认。

196

巴西从殖民地到独立帝国的过渡具有高度政治、经济和社会连续性的特点。佩德罗一世和巴西的统治阶级接管了现存的葡萄牙国家机关，事实上，它从未停止运转。经济没有遭受严重混乱：贸易和投资格局起了变化（特别是英国成为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

和资本来源)，但是“殖民地”生产方式和巴西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作用基本上未受影响。也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群众力量始终软弱无力(他们因阶级、肤色和法律地位不同而分裂)，被成功地遏制；对社会下层群体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尽管奴隶贸易现在受到了威胁)。一言以蔽之，完成了一次保守的革命。1789、1798、1817、1821—1823和1824年的极端自由派(还有共和派)的运动均受挫和失败，从这一点来看，完成的是一次反革命。

尽管如此，1822—1823年的巴西独立可以说是不完全的。佩德罗皇帝迅速失去巴西人的信任，尤其是由于他拒绝割断与巴西的葡萄牙帮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拒绝与葡萄牙断绝关系。直到1831年4月7日，唐·佩德罗让位给他的巴西出生的5岁儿子——未来的唐·佩德罗二世，巴西脱离葡萄牙的进程才算最终完成。

第 5 章

国际政治与拉丁美洲的独立

197 导致拉丁美洲各国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从一开始就引起欧洲和大西洋国家体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国家的关注。这不是新的利害关系问题。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就已对西印度地区的巨额财富垂涎三尺，它们希望自己能从中分到一份，而最好别让竞争对手捞到好处。18世纪西班牙和法国两个波旁君主国家之间的家族协议对英国构成威胁，但是英国通过与西属美洲广泛进行私下贸易抵消了波旁王室的优势，它并没有认真考虑把任何西班牙主要殖民地并入英帝国。

可是，殖民国家这种庄严的商业竞争小步舞被18世纪90年代混乱的事态发展破坏了。法国革命向国际关系引进了新的政治原则；圣多曼格的奴隶起义使新大陆所有种殖园殖民地胆颤心惊；西属美洲持不同政见的克里奥尔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在欧洲到处宣传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美洲殖民地。更具体地说，软弱的西班牙君主对法国的极端屈从，使西班牙于1796年卷入反对英国战争，经过短暂的休战后，1804年再次对英开战，导致英国政府考虑对西班牙属地采取措施。征服计划与解放策略交替运用，但是截至1806年两方面皆无成效，而到1806年，英国的海上实力已足以保证它（而不是法国）成为西班牙的日益遭到破坏的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受益者。

即使到1806年，英国对南美洲的几次干预，也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步骤。米兰达赴美国组织一次解放委内瑞拉的尝 198

试以前，也许从英国首相皮特那里得到过某些口头许诺，但是皮特在米兰达到达西印度群岛以前去世了。这位独立运动先驱设法说服当地的英国海军司令支持他登陆，然而并未得到英国新内阁的同意。英国唯一授权的下一步行动是协助米兰达撤退，当时他的远征没有得到委内瑞拉群众的支持。同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入侵，是由一支驻轧在南非的英国部队发动的，完全未经授权，对此负责的海军上将必须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尽管英国的公众舆论要求继续占领，但政府热情不高，只是在进一步实施野心勃勃的并吞计划和交还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换取欧洲的某些利益之间摇摆。最后，为巩固英国，已占阵地所采取的措施太少，而且已经为时太晚，英国部所在援军到达之前已被逐出。1807年重新征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尝试也由于当地反抗而迅速放弃了。

1807年英国面临的一个更为紧要的问题是葡萄牙属地巴西可能遭遇的命运。葡萄牙正遭法国皇帝逼迫，要它适应他的大陆体系，计划同它传统的盟国和贸易伙伴英国割断联系。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无力保护葡萄牙，但决心不让巴西落入拿破仑之手。葡萄牙朝庭处于两面受夹、进退维谷的境地。葡萄牙王室经过一番犹豫，直到法军已经逼近里斯本，最终才接受英国提议，由英国海军护航前往巴西。这是一个深刻影响巴西前途的决定。

也是在1807年，英国根据上一年的经验重新评价了它对西属美洲的政策。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表明，殖民地不愿意从忍受西班牙统治变为接受英国统治；米兰达的惨败也表明，不能指望西属美洲人起来反对西班牙政权，除非有一支同情他们的军事力量存在，使他们得到鼓励。1808年上半年，拿破仑进一步加强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最后发展到废黜西班牙国王并将他的长兄约瑟夫扶上西班牙王位。作为对策，英国着手准备向南美洲派遣解放 199 远征军，同时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加强政治和宣传活动。但在远征军启航前，西班牙抵抗波拿巴篡位、西班牙爱国主义者谋求与英国结盟反对共同敌人的消息传到伦敦。这个情况意味着必须彻底

改变政策。于是，英国军队停止前往西班牙殖民地，转而开赴伊比利亚半岛。英国不再考虑征服或者解放西属南美洲。现在英国的政策是鼓励西属美洲全力支持宗主国爱国者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

法国对西班牙君主国的侵占触发了殖民地脱离西班牙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由来已久而且具有比较复杂的根源。正如一位墨西哥爱国者所说的，"拿破仑·波拿巴，……西班牙语美洲如今享有自由和独立应归功于你。是你向将两个大陆绑在一起的锁链砍了第一剑"。① 这当然不是拿破仑的本意。他派遣使者到殖民地，指示殖民地官员宣布约瑟夫·波拿巴为他们的国王，指望殖民地会接受改朝换代。但是除少数全靠控制西班牙宫廷的法国影响升官的最高级官员外，殖民地舆论对法国接管西班牙政权极为反感，到处热情洋溢地宣布忠于被俘的波旁君主费迪南七世。于是，法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鼓励殖民地独立，作为削弱半岛上的西班牙反抗的一种手段。但是法国的宣传收效甚微。确实，某些西属美洲的激进分子赞成法国革命的原则，法国的冒险家也不时在各省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美洲各殖民地在1810年建立自治政府，实质上是对拿破仑可能侵占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作出的反应，是为了切断与有可能被法国完全控制的宗主国政府的联系。

和拿破仑一样，英国1808年—1814年对西班牙帝国政策，也从属于半岛战争的压倒需要。在1808年，不需要说服，英国的政治目标就是让西属美洲同宗主国（英国的新盟友）一起反对法国。与西班牙的经济合作则比较难以捉摸。英国坚持殖民地贸易中必须有它一份，这样它才能对半岛进行有效军事援助，可是西班牙爱国者政府不愿放弃帝国对贸易的垄断。1808年以后，还是象

200

① 卡洛斯·马里亚·布斯塔曼特，转引自W.S.罗伯逊著《法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2版，纽约，1967)第71页。

过去两国进行战争的年代一样，英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渗透依然采取经当地临时许可或私下非法交易的形式。然而在某些战争年份，英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仍占英国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的损失。

从英国政府的观点来看西属美洲1810年的革命是一种不愉快的事态发展。英国不能支持殖民地推翻宗主国的统治，因为西班牙政府的合作对于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至关紧要。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轻率地站在西班牙一边反对殖民地，这样会危及英国同那些新兴国家的未来关系，如果它们独立成功的话。一位英国内阁大臣建议："我认为，我们既不应该鼓励目前独立，也不应该不鼓励它们最终获得独立。对整个西属美洲也好，或任何一部分也好，都该如此。"① 英国的政策应该是在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保持中立，避免触怒任何一方。英国异常成功地走了若干年的钢丝。

在开始阶段，这个平衡动作做得比较成功，因为西属美洲的革命者们以西班牙君主国的名义行事，承认费迪南七世的统治权，虽然他们不支持自称在国王被囚期间代表国王进行统治的摄政会议。英国政府紧紧抓住这条生命线。它对委内瑞拉发生革命的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在一份广泛传播的公函中指出西班牙摄政会议仍在积极进行反法战争，并强调大敌当前西班牙帝国应以团结为重。可是，英国同时在一份秘密公函中向库拉索岛总督（是他呈递的关于加拉加斯革命的报告），明确指出，英国不准备拿起武器反对委内瑞拉人，即使他所坚持公开反抗西班牙政府；英国虽然没有承认新政权，但与委内瑞拉的贸易应予鼓励。

201

1810年7月，一个委内瑞拉代表团到达伦敦，寻求外交承认和军事保护。这是对英国政策的一次考验。外交大臣在自已家中私下与代表会晤，未正式接见，以避免与西班牙发生对抗。但是他既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不能说服他们接受西班牙摄政会议

① 《哈罗比勋爵的建议书》[1810]，英国图书馆手抄本室，MS Add.38360f. 301(利物浦文件)。

的权力。与委内瑞拉革命者这样的接触仍然引起了西班牙的愤怒和猜疑。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在击败拿破仑以前避免同西班牙作任何方式的摊牌，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尽管英国政府从它同双方的接触中了解到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绝对不可能和解，但它仍公开表示相信和解是可能的，并着手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也许更重要的是赢得时间，而不在乎是否有成功的希望。西班牙对调解的态度同样也缺乏诚意，不愿接受英国要求它在宪法和商业上对殖民地让步的建议，它还抱着有朝一日可能使用武力迫使殖民地屈服的希望。确实，西班牙政府设在加的斯，受加的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大，它坚持要保留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英国感觉到，西牙班对这一点似乎比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半岛更为关心。而西班牙人认为，英国建议殖民地贸易自由，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英国一旦调解失败，对殖民地叛乱实行武力镇压。这个要求英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威胁不但会损害调解和英国的中立态度，而且还会招致西属美洲的怨恨，产生长期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实际上并无共同愿望，但是当时英西谈判有关调解的基础的细节问题从1811年一直拖到1813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得以避免公开破裂。

如果说英国对西属美洲革命的态度使英西外交关系紧张，那么英国和西属美洲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困难。叛乱政府派往英国的代表甚至在一些南美洲国家已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以后，仍只能通过中间人同英国外交大臣接触。例如，一位新格拉纳达代表在伦敦呆了大约6个月时间，没有同外交部进行任何直接接触，只见到一两个反对派政界人士，另外同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内阁大臣有过两次非正式的会谈。[①] 英国也没有派外交代表前往西属美洲，同一些叛乱政府的联络是通过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基地的海军司

202

① 见塞尔希奥·埃利亚斯·奥尔蒂斯著《哥伦比亚独立运动中的知名人士法学兼外交家何塞·马里亚·德尔雷亚尔博士》，（波哥大，（6966）。

令进行的，同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则通过英国或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库拉索等英属殖民地总督联络，这些官员奉命严守中立，避免任何政治卷入，同时要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尤其要保护英国国民和他们的财产。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情况使正常贸易渠道日益减少，英国资产正在源源输入南美洲。有时外交方面的要求使战斗岗位上的军官有点难办。海军上将悉尼·史密斯爵士对于卡洛塔公主的要求显得过于热情（卡洛塔公主是葡萄牙摄政王妃，要求代表她兄弟费迪南七世接管西班牙的殖民地），被政府从巴西召回，相似的命运落到库拉索总督陆军准将莱亚德身上，他使英国对委内瑞拉爱国者政府承担了过多义务。然而上述情况只是个别例外。首先，当时大多数海军军官的同情似乎在爱国者一边，这大概同他们跟商业社团的业务接触较为密切有关，这些社团都支持独立运动，因为独立运动为他们提供直接进入新市场的难得机会。但是大部分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总督想到的是席卷圣多曼格的种族战争的恐怖，同时也担心颠覆南美洲北部现政权可能对他们自己的奴隶居民产生不良影响，因而站在保王派一边。其次，英国官员很少因自己偏袒某一方而采取可能使本国政府为难的行动。比史密斯和莱亚德的轻率行为更典型的是牙买加当局的态度。一支西班牙王室远征军即将攻击卡塔赫纳，牙买加当局拒绝了防御者提出的将港口交给英国控制的要求，同时也拒绝了西班牙人提出的向他们的船队提供铁锚和锚链的要求。① 在半岛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西属南美洲殖民地都在爱国者控制下，

203

中立通常意味着不顾爱国者的压力。维护西班牙的权利但是西班牙对英国的努力并不感激，他们感到有资格从他们的盟国获得积极的支援以反对叛乱者。他们抱怨英国官员“不适当地袒护那些不效忠的省份”。在一份详细驳斥上述说法的文件中，英国外交部

① 《道格拉斯致克罗克，1815年6月16日，11月7日》，伦敦国家档案馆，ADM 1／266—7；《富勒致巴瑟斯特，1815年6月10日》，伦敦国家档案馆，CO137／149。

暗示中立确实是一次徒劳无益的任务，并指出“好多次都是偏袒西班牙的事业，因而引起叛乱者当局的很大不满”。①

英国在这个地区唯一的外交代表是驻里约热内卢葡萄牙宫廷的公使斯特兰福德勋爵，他使英国保持高度影响直至1815年离任。英国认为，由于它1807年的行动为葡萄牙王室保全了巴西，因而它有资格享有若干特权作为回报。这些特权体现在1810年由斯特兰福德通过谈判签订的条约中，包括英国商品享有优惠关税税率和英国商人获得特殊法权。同时，葡萄牙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限制横渡大西洋至巴西的奴隶贸易，逐步达到废除的目的。斯特兰福德还几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事务。1810年革命以前，他与该地区总督谈判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放对英贸易，此后革命政府公开声明继续效忠费迪南七世，使他得以与革命政府保持非正式关系而又不破坏英西同盟。比较复杂的是“东岸”的情况1814年以前蒙得维的亚一直忠于西班牙摄政会议，而内地大部分地区掌握在乌拉圭爱国者手中，他们拒绝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统治。斯特兰福德不得不在各方之间保持英国中立，同时对葡萄牙加以约束，葡萄牙对这个毗邻的西班牙属地省份垂涎三尺，妄想使形势对自己有利。1812年，葡萄牙部队应蒙得维的亚西班牙人的请求进入“东岸”，斯特兰福德促成了 204 葡军的撤退。但是在效忠王室分子被撵走以后，他无力制止乌拉圭爱国者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国者之间的争端，这终于成为葡萄牙人于1816年入侵“东岸”恢复秩序的借口。此时斯特兰福德已经离任回国，然而从1808至1815年他为减少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冲突、提高英国在南美洲的声誉做出过贡献。

当时美国也许是能向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挑战的唯一国家。这个年轻的联邦没有欧洲的复杂情况和义务的束缚，与拉美又有地域上和新生的泛美感情上的联系，还有一支有创业精神的

---

① 《外交部致韦尔斯利，1813年8月14日》，伦敦国家档案馆，FO72／142f'126。

商人船队作为非正式的政策手段，它在1808年似乎处于可以利用帝国链条的松弛的有利地位。但是事实上，19世纪初时的北美洲在许多方面依然是大西洋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也深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英国和法国为了达到它们的战争目标，都不承认中立国的权利。1807年底，杰斐逊总统为了报复对美国国旗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封闭美国港口，禁止一切出口。他指望由此造成的商品匮乏会迫使交战国尊重美国的船舶。这次禁运以失败告终，因为它对美国伤害超过了欧洲各国，而且美国坚持禁运就无法在西半球探索新的贸易机会。1809年一旦禁运解除，美国的供应商为他们的农产品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市场，半岛战争的双方都有需要。1810年革命以后，英国影响随之上升，美国在南美洲的利益曾发生过短暂的波动。美国派出了一些使者，在华盛顿同西班牙语美洲人也打了一些交道，甚至与法国的政策也有一些合作。但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积极政策可能获得的利益，必须从属于避免其与西班牙发生对抗，因为美国和西班牙尚有若干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也要避免触怒英国，因为它仍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最后，1812年—1815年英美战争使美国没有精力再考虑南部大陆。尽管美国的武装快速帆船曾在南美洲海面上偶而战胜英国的战舰，但英国的海军依然全面控制着海面，抑制美国商业关系的发展，直到战争结束。

205

1815年的拉丁美洲形势表明，国际注意力已转向欧洲战争。就巴西而言，法国进攻葡萄牙导致英葡合作，这一决定性行动使葡萄牙王国显然牢固地保住了这块殖民地。但是就西属美洲而言，欧洲的形势使法国和西班牙皆无力加以控制，而英国和美国都认为避免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最符合它们的利益。这样西班牙的殖民地就获得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它们的命运在1815年依然捉摸不定，主要是由于内部纷争，而不是由于欧洲的影响。

国际形势1815年发生了变化，欧洲从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欧

洲政治家依然从可能对他们在欧洲的利益产生什么影响出发来考虑西属美洲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是，在发生法国革命这个不受欢迎的插曲和拿破仑战争以后依然企图恢复旧制度。他们把正统性和专制制度视为安全原则，把自由主义看成洪水猛兽。这种反动态度在费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达到了极端愚昧无知的地步。他废除1812年宪法，取消对半岛上的自由派和殖民地的参与所作的让步，并派遣军队开赴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开始用武力镇压叛乱。

欧洲主要强国也赞同正统原则，但是一般不支持西班牙的镇压措施。它们认为使用武力未必有效，只会导致殖民地进行革命争取独立的成功。出现这样的局面将会鼓励欧洲的自由派革命者试图颠覆同盟列强极力企图维护的现制度。它们宁愿西班牙向殖民地作出让步，这样既可以满足殖民地的合理要求，同时又可以保持正统政权。这样的政策同欧洲的商业利益也高度一致。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商业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俄国在1815年的前几年在太平洋地区有过野心勃勃的计划，但最后真正落实的只是保持它对阿拉斯加的控制同该地的联系。① 普鲁士和其它北德意志联邦国家也和法国一样，希望开拓南美市场。英国到1815年早已在这个地 206
区取得大量既得利益。商业因素随着爱国者的成功变得更为重要。除拉普拉塔河地区外，1816年南美洲的独立运动正处于最低点。但此后圣马丁几次战役开辟了智利和秘鲁沿海的贸易。随着玻利瓦尔在大哥伦比亚作战胜利和1821年墨西哥独立，与欧洲的直接贸易获得重大发展。到1822年，拉丁美洲吸收将近10％的英国出口产品；英国商人在南美大陆的各大港口建立了进出口企业；利物浦和伦敦的商人和金融家以商业信贷和借款方式向各国新政府投入了数额可观的资金。

---

① 见R.H.巴特利著《1808—1828年俄罗斯帝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得克萨奥斯汀，1978)。

然而尽管英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方面不断发展的利益，贸易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中似乎并非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在拿破仑失败以后，卡斯尔雷仍继续专心致志于维护欧洲和平，将西班牙看成是防止法国东山再起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于是，主张英国在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保持中立的意见（此意见曾在战争期间占优势）如今又起作用。1814年重新签订条约恢复英西同盟，条约内容包括英国承诺禁止向西属美洲叛乱分子提供武器。1815年，西班牙提出要求英国进行调停的新请求，并表示倘若英国劝导殖民地重新归顺西班牙获得成功，愿意向英国提供贸易独占权。卡斯尔雷答复说，英国并不谋求任何特殊权利，英国认为唯一可行的调停基础是西班牙向殖民地作出实质性让步。西班牙政权则认为，任何让步都将被殖民地视为软弱的表现，因而坚持调解应以实力为后盾。英国认为这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肯定早已在西班牙的预料之中。英国的拒绝使西班牙得到了转向其它欧洲强国寻求反对殖民地独立斗争的支持的口实，英国一直拒绝给予这种支持。

西班牙采取这个行动，或许是因欧洲列强对它与葡萄牙占领“东岸”的争端中表示同情而受到鼓励。英国政府事实上也对西班牙表示同情而且接受了西班牙的调解请求；但英国认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乌拉圭问题上的争端同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争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后面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上，卡斯尔雷1817年8月提出一份《秘密备忘录》，对西班牙试图召开一次欧洲会议的呼吁陈述了英国的意见，建议同盟国进行联合调解，以停战协定、普遍大赦、殖民地的平等地位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特别排除使用武力。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英国的立场，部分原因是它们看到同英国站在一起是抵制它们的强大邻邦俄国在同盟国中的支配地位的最好办法。俄国是欧洲最同情西班牙的君主国家，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未向费迪南七世提供直接援助反对殖民地，而且他似乎也强调让步的必要性。尽管如此，他毕竟不同于其他

强国，他建议如果殖民地不接受让步，应施加经济制裁，实行某种形式的封锁；1817年他出售给西班牙8艘俄国战舰。这种做法看来使西班牙增加了驳回卡斯尔雷备忘录的勇气，并把希望寄托在对南美洲的一次新的远征。但希望最终破灭了，俄国的战舰证实是不能胜任作战的。葡萄牙人拒绝撤出蒙得维的亚，这件事又成为西班牙试图重新征服南美洲的根据。

于是，1818年6月，西班牙着眼于即将召开的亚琛会议*，提出一个新建议，接受以大赦和殖民地平等地位为调解基础，但在贸易让步问题上含糊其词，坚决表示西班牙君主国的尊严和权利决不能放弃。这一点可以解释为排除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西班牙还各方奔走，希望获得参加会议的邀请，俄国和法国支持，但被其它国家否决。可以说，在亚琛会议上五强几乎只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即不使用武力反对西属美洲的叛乱者。法国和俄国建议吸收美国参加，目的在于阻止它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普鲁士则希望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出席会议。对于调解究竟应由一个委员会还是由威灵顿公爵来进行的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威灵顿表示只在对调解条件取得明确谅解并为西班牙接受的情况下，他才准备采取行动。俄国和法国建议，倘若调解失败 208 即切断与叛乱者的所有往来，但英国和奥地利反对。后来卡斯尔雷终于使沙皇相信，贸易封锁是行不通的。会议的结果使西班牙的幻想破灭，甚至俄国对马德里的影响也不能阻止费迪南七世放弃调解使用武力。整个1819年西班牙集中力量准备对拉普拉塔河地区进行远征，但准备开赴目的地的军队发生哗变，触发了1820年的自由主义革命。

沙皇在经济制裁问题上改变立场后，法国变得孤立。它在会后一段时间扮演了一个独行其是的角色。当它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基爱

---

* 亚琛会议（1818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英、奥、普、俄、法五强举行的四次会议中的第一次，主要商讨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问题。——译者

国者秘密策划安置一个法国王族后裔担任拉普拉塔河地区君主的内幕暴露后，引起美国和西班牙的不悦。当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家一致同意，作为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政体来说，君主政体较之共和政体更为可取。圣马丁和其他一些爱国者领袖也有这样想法。但是一想到这是一个法国君主是法国影响的扩展，就引起强烈的妒嫉和猜疑。

1819年，英国做出希望与西班牙修复关系的姿态，通过了“外国募兵法案”。这是对西班牙严重不满的一个延迟了的反应。殖民地爱国者代表和同情他们的英国人自1817年起即在英国和爱尔兰招募部队赴委内瑞拉服役。他们还设法筹集贷款并远送武器、制服和其他军用物资帮助玻利瓦尔的军队。1817年曾发表“皇家声明”，禁止在南美洲服役，但没有产生效果。英国政府发现，尽管它在1841年条约中向西班牙作出了制止向美洲叛乱分子出口武器的保证，但无法阻止弹药运至丹麦的西印度岛屿圣托马斯等中立港口，再从那里运往委内瑞拉。西班牙不断抱怨，后来公开招募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严重违反了英国公开声明的中立立场，政府感到不得不向议会提出一个法案，要求从严执行这条法律。结果，起义事业的英国支持者获得了公开表达反西班牙情绪和献身独立事业的精神的机会，他们表示担心这个法案可能招致爱国者的对抗，丧失已经在同他们进行的宝贵的贸易的危险。某些反对者或许背后有与向叛乱分子提供物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包商和金融家在驱使，但法案实在是不得人心，政府不得不把它提到维护国家荣誉的高度在议会强行通过。但是当法律付诸实施时，一个英国退伍军人军团已经到达南美洲并对玻利瓦尔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正如乔治·坎宁曾经预言的那样（他曾代表他的利物浦选区的商人向众议院提出反对这个法案的请愿书，后来又同它脱离关系），西班牙语美洲人同英国做生意的意愿似乎受到影响。

209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也碰到了在具有党派色彩的舆论压力下保持中立的问题。携带叛乱国家的证书、在美国港口进行装备、

由美国水手充当船员的私掠船队在海上劫掠西班牙船只。针对这些活动，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1817年美国国会通过新法律，加强了中立法规，但是陪审员们反对不顾公众舆论，法律难以实施。另一方面，关于1818年提出的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的建议也未加以执行，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不愿在亚琛会议可能通过一项欧洲协商一致的措施以前采取行动，而且美国后来对南美洲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许诺越来越产生了怀疑。何况，此时越来越需要与西班牙保持良好关系，这与美国的重要利益有关。佛罗里达的割让以及美国和西班牙帝国西南边界的划定虽以圆满达成协议，并于1819年2月签订亚当斯—奥尼斯条约，但是西班牙拖延条约的批准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保持中立避免任何反西班牙行动至关紧要，否则可能影响问题的最后顺利解决。

到1821年，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班牙的自由主义革命消除了派遣新远征军的威胁，同时出现了立宪政府向殖民地作出前任专制政府拒绝作出的让步的可能性。但是后来很快证明，新政权并不比旧政权更愿意让殖民地自治，而且在1812年，委内瑞拉终于获得解放，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宣布独立，和解的希望全部消失。这些发展当然主要是由西班牙帝国内部的事态和因素造成的，但是英国坚决反对任何第三方干预斗争，并说服其它欧洲强国，也起了一定作用。

210

1822年，尽管西班牙王室军队仍然占据着秘鲁山区和上秘鲁，但实际上西属美洲争取脱离西班牙的斗争已获得成功。外部世界开始根据这个事实调整政策。美国率先采取行动（鉴于它不受君主政治和正统王朝思想的束缚，这不足为奇）。1月，美国国会要求行政当局提出报告，门罗总统于3日答复，建议美国事实上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独立。建议获得国会批准，6月正式付诸实施，大哥伦比亚的代表受到总统正式接

见——这是南美洲国家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外部世界承认。

美国的发端产生了迅速的反响。同年4月，大哥伦比亚派往欧洲的全权代表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在巴黎发表致欧洲列强政府的声明，威胁说，大哥伦比亚只与承认它独立的国家保持关系，并将断绝与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塞亚采取的行动并非出于上级指令，并且他的声明随即为其政府所否认，但声明还是引起了很大惊慌，特别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小国中间，它们不能不考虑强大的邻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正统主义态度而自行其是，同时它们又看到它们在南美洲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对美国的偏爱而受到威胁，这一点在塞亚的声明中已有所暗示。类似的考虑甚至影响到英国政府，1822年5月，它朝着承认西属美洲实际上已经完成独立的方向采取了第一个重要步骤，在当时正在议会辩论的修订的航海法中规定，允许悬挂南美洲国家旗帜的船舶进入英国港口。英国这样做说明了它对美国承认南美洲国家和塞亚声明的态度。

在此其间，西班牙对华盛顿承认殖民地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请
211 求欧洲各国政府不要仿效美国的做法，尤其是西班牙还在进行谈判，争取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与殖民地达成和解。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向西班牙保证坚持正统原则；但是卡斯尔雷于1822年6月警告西班牙不能指望英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预示英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并接着指出：

“世界如此大的一部分，如果长期不给予某种承认或与之建立关系，它就不可能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相互关系；一个国家既不能用它的议事机构，又不能使用武力有效地维护它自己对其属地的权利，强制属地服从自己，并由自己负责属地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这样的国家必须迟早准备看到由于形势压倒的需要将以其它某种形式建立起那些关系。”①

① C.K.韦伯斯特(编)《1812年—1830年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2版，纽约，1970)第2卷第338页。

几个星期后，正在为将于10月和11月在维罗纳召开的欧洲列强会议进行准备的卡斯尔雷确定了承认南美各国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界线。他如今认为，承认南美国家"与其说是时间问题，不如说是原则问题。"他希望能说服欧洲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一起从目前事实上存在的贸易关系前进到外交承认的中间阶段，至于什么时候到达最后的法律承认阶段，将取决于西班牙是否放弃它对殖民地的权利。

卡斯尔雷的意见在维罗纳会议上能否象在亚琛会议上那样赢得支持，那是很可怀疑的，因为1818年以后，英国同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但由于卡斯尔雷自杀，这一点已无法证实。代替他参加维尔纳会议的威灵顿不能在欧洲政治家中间发挥卡斯尔雷那样大的影响，更不用说1822年9月继任外交大臣的坎宁了。实际上，坎宁是积极反对欧洲列强会议的，然而，抛开欧洲列强会议虽然可以使美国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却消弱了英国对欧洲列强的潜在影响。结果，英国对西属美洲的意向没有引起支持，也没人反对。而法国却在会议上掌握了主动权，它对宗主国西班牙的兴趣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它已决定讨伐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让费迪南七世恢复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并为获得 212
欧洲各国的默许准备条件。

这时，坎宁已经开始着手为承认西班牙殖民地单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已准备好向西属美洲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派遣英国领事，同时命令一支海军部队开赴加勒比海。此举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可以同叛乱政府合作共同对付以西属美洲水域为基地的海盗，同时可以强有力地要求归还被保王派当局扣押的英国船舶和财产。但是到1822年底西班牙政府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入侵的危险情况下，以少有的敏捷平息英国的不满，再次邀请英国为它和殖民地进行调解。坎宁相应地下令停止海军行动并暂缓派遣领事，直到西班牙自由派政权完全被法国军队击败，费迪南七世依靠法军军事行动复辟专制统治——法军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

1823年大半年。

由此可见，坎宁任外交大臣初期关于迅速采取行动承认西班牙语美洲新国家的许诺证实是个空想。在与巴西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同样情况，但原因迥然不同。葡萄牙国王一直推迟到1812年才从里约热内卢返回里斯本，当时局势已很清楚，倘若他留在巴西，葡萄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会把他推下王位。一年后，葡萄牙政府试图使巴西降格退回到原来的殖民地地位，留在里约热内卢的王子、担任摄政王的唐·佩德罗让自己成为殖民地分离运动的领导人，并于1822年9月宣布独立。坎宁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推进英国一项政策目标的机会，对此他本人比他的前任承担更大的义务，那就是废除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奴隶贸易，现在巴西是这种贸易的主要市场。英国在1810年迫使葡萄牙第一次承诺最终废除（奴隶贸易），后来在1815年和1817年继续就此达成协议。坎宁不但指望确保巴西这个新国家尊重前宗主国的保证，而且还期望利用英国承认巴西的前景推动巴西完全废除奴隶贸易。他已决定将这一点作为承认任何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必要条件。

213 1822年11月在伦敦同巴西代表的会谈表明，巴西可能同意以废除奴隶贸易交换英国的立即承认。坎宁感到这样做与英国对葡萄牙的义务并无抵触，也不致损害葡萄牙国王同巴西国王随后签订的任何协定。但是后来知道巴西代表无权缔结这样一项协定，会谈转移到里约热内卢进行。坎宁于1823年2月指示他的谈判代表，一方面敦促巴西废除奴隶贸易，同时不要让英国承担承认巴西的义务，因为可能坎宁现在了解到，他不能指望内阁批准他的政策。巴西政府急于获得英国的承认，相信“有了英国的友谊，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对付世界其它国家”①，但是也知道国内最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把奴隶贸易看作对他们的繁荣生命攸关的事，

① 转引自A.K.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支配地位：它的兴衰》（第2版，纽约，1964），193页。

因此不敢同意立即废除。迅速解决的可能性渐渐消失。坎宁转而确信联合葡萄牙共同考虑承认巴西的独立较为有利。走向承认的势头已经丧失，任何实质性进步要推迟到一年多以后。

1823年4月，法国开始入侵西班牙，至9月占领全国，费迪南七世摆脱立宪派的控制，恢复专制权力。这次入侵成功可能继之以法国援助西班牙重新统治西属美洲，这种可能性自然是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十分关注的事。但是尽管法国显然不止一次考虑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却从未达到认真制定计划的阶段。经过几次摇摆和犹豫之后，法国人似乎已经认识到，他们在西班牙语美洲的主要利益是商业上的，如果其他国家开始正式承认巴西并签订商务条约，法国在这方面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法国对正统性承担的义务（这是复辟波旁王朝的全部基础）使它无法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宗主国之前承认它们的独立。因此，法国的正确政策应该是说服西班牙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从1823年中起，它打算在让费迪南七世获得自由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南美洲问题，在会上由欧洲列强联合对西班牙施加压力。 214

但是，对外界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想法决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有理由相信存在着法国干涉西班牙殖民地的实际威胁。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前几天，坎宁向法国政府提出警告就包含着这种意思。他警告说，英国中立的条件是假定法国不接受西班牙语美洲的任何部分，但是他没有收到肯定他的假定正确的保证。究竟坎宁的恐惧是真实的，还是外交上的做作，一直引起很多猜测。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它产生了以下的外交活动。坎宁于1823年8月向美国驻伦敦外交代表理查德·拉什试探关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的可能性，内容如下：英国和美国都不相信西班牙有能力收回它的殖民地；双方对西班牙殖民地都没有兼并野心；英美两国反对将西班牙帝国的任何一部分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拉什准备同英国合作，只要英国和美国一样承认这些新国家的独立。但是坎宁

尚未克服大多数内阁同事对承认政策的反对，他只好在9月间将此事搁下。

西班牙立宪派的抵抗崩溃在即，坎宁决心要得到表明法国意图的某种正式声明。结果在1823年10月同法国大使波利尼亚克亲王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坎宁将会谈记录整理成文件，名为《波利尼亚克备忘录》。在上述谈判中，双方一致认为西班牙在其殖民地恢复权力已无希望，并表示对西班牙帝国没有任何领土企图，也不想在那里获得独占的商业特权；但是英国提出警告，任何限制它的现有贸易关系的企图，或任何"使用武力或恐吓的外国干涉"，势必招致对这些新国家的立即承认，同时法国宣称没有"任何以武装力量反对这些殖民地的行动意图"。此外，坎宁坚持，鉴于英国的特殊利益，它不能"在与其他强国平等的基础上"出席任何讨论西班牙语美洲问题的会议。他还主张应该让美国参加任何一次这样的会议①。

215 不能说《波利尼亚克备忘录》防止了法国的干涉，因为法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进行干涉。法国政府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利用它作为借口，拒绝其他强国要它派遣军队前往南美洲的请求。尽管如此，这次会谈是坎宁的一次策略上的胜利，法国的一次失败，因为波利尼亚克未能使英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作为达成一致的条件。尽管法国说服费迪南七世召集会议，但坎宁拒绝出席。他在答复西班牙的邀请时指出，虽然英国赞成西班牙率先承认美洲殖民地独立，但英国必须保留根据它自身利益在适当的时间和条件下采取行动的自由。这个声明受到欧洲大陆强国的严厉抨击，但坎宁无动于衷。会议在1824—1825年开了几次，均无成效。

尽管坎宁对他向拉什建议发表英美宣言一事很快感到后悔，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拉什的第一次报告到达华盛顿，美国政府总的说来倾向于接受这个意见。但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怀

① 韦伯斯特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2卷，第115—120页。

疑坎宁主张共同宣布没有领土野心的真正动机是防止美国获得古巴，同时他感到，“公开声明我们的原则……比之象英国军舰后面的一条拖船那样出现，会更加坦率，更加庄严”。① 问题尚在考虑之中，拉什却报告说，坎宁似乎对此事已失去兴趣，也许他正在直接同法国进行磋商(情况确是如此)根据这些情况——怀疑法国可能正在打算对西班牙语美洲进行军事干涉，了解到英国反对这种干涉，英法和其他欧洲强国宣布的有关西班牙语美洲的命运的意图——产生了1823年12月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总统咨文中，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咨文着重指出了欧洲政治制度与美洲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声明任何以压迫或控制西半球独立政府为目的的欧洲干涉，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不友好表示。

欧洲列强对美国不让它们插手美洲大陆事务的告诫反应不佳。“门罗主义”的公开发表和英国不顾欧洲大陆列强决心在西班牙语美洲问题上单独行事这两件事同时出现，令人生疑。坎宁也希望欧洲各国相信是他鼓励美国发表门罗宣言。但是事实上，坎宁认识到，门罗强调美洲脱离欧洲是对英国影响进行挑战。他此后的对美洲政策时常反映出一种与美国纠缠不清的对抗。 216

坎宁看到西班牙对法国侵略的抵抗显然已经停止，立即将他为英国保留的行动自由付诸实行。1823年10月，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瓦尔帕莱索、利马、巴拿马、卡塔赫纳、马拉开波、拉瓜伊拉、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等地派出了领事。英国政府的特派员也启程前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政府要求他们弄清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已宣布独立并决心坚持下去；能否对其领土行使权力并赢得居民的信任；是否已废除奴隶贸易。1824年初，在获得任何报告以前，承认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独立的问题在议会中提了出来。坎宁以发表《波利尼亚克备忘录》和拒绝西班牙要求

① 转引自H.坦珀利著《坎宁的外交政策，1822--1827》(第2版，伦敦，1966)，第123页。

英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作为对议会的答复。上述行动清楚地表明政府对这个问题已有研究。但6月间，这个问题又以伦敦的商人和金融家请愿书的形式再次提出来，他们敦促政府立即承认。贸易确实在发展，拉丁美洲如今已吸收大约15％的英国出口产品。投资已达几百万英镑，有的是借给新政府的贷款，有的用于商业和采矿业的投机事业。贸易的复苏和不久前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发还的乐观报告是一致的。7月间，英国内阁同意授权就签订商务条约进行谈判。签约也就是外交上承认。但当时这个决定没有公开。谈判耽搁了几个月，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正在谋求代表拉普拉塔联合省进行国际活运的权利。

在此期间，赴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特派员报告说，给他们的指示中所列的几条标准，这两个国家都已达到。坎宁对报告的某些方面不很满意——具体讲，他希望墨西哥特派员应该更充分地调查一下在那里恢复君主政体的可能性——但是他感到报告的内容已为他采取行动提供充分理由。坎宁在催逼内阁承认西班牙语美洲新国家的过程中（为此他甚至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担心的似乎主要不是西班牙语美洲的现状和英国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是同美国尤其是法国的对抗。在辩论中使他赢得胜利的最后一个理由是，法国政府拒绝说明它准备何时从西班牙撤兵。两年以后坎宁在众议院正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了下面这段有名的话："我下定决心，倘若法国占有西班牙，那就不应该是'拥有西印度的'西班牙。我让新大陆诞生，以弥补旧大陆的不足"。① 按照坎宁的观点，英国承认西班牙语美洲独立可能主要是一次针对大陆强国和它们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有计划的挑战行为，但是从他的当时直接反应来看，他也从另外的观点来总结此事的重要性："西班牙语美洲自由了。倘若我们处理得当，它就是英国的"。② 当然

217

① 转引自坦珀利著《坎宁的外交政策》第381页。

② 转引自W·W·考夫曼著《1804—1828英国的政策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2版，伦敦，1967），第178页。

美国承认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更早一些，它们的宗主国则好几年后才予承认。但是同世界头号的海军、商业和工业国家的承认比起来，它们的承认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在哥伦比亚的特派员报告说，当他们听到英国承认的消息时，"波哥大所有的人高兴得有点发狂了……他们高呼，'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①

美国承认的进程1822年就开始了，但截至1825年仅与哥伦比亚和中美洲缔结条约。英国很快赶了上来。1825年英国同拉普拉塔联合省和哥伦比亚缔结了商务条约。这些条约使居住在南美洲的英国公民享有法律保护，免除服兵役、认购强制性公债和歧视性税收，并保障他们信奉新教的权利。在贸易上，英国不要求给它的商品特别优惠，只要求征收的税金不超过最惠国。英国所坚持的在商业和海运方面的互惠原则当然有利于老国家，不利于新国家。但是南美洲人觉得同英国签订条约值得作出一些牺牲。另一方面，墨西哥人似乎夸大了他们的国家在英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强迫英国谈判代表作出一些让步，而英国外交部没有接受。于是条约草案被否决，在墨西哥和伦敦重新举行谈判。英国在墨西哥反对的某些实质性内容上作了让步，同时保留了它的海运原则。条约最终在1827年得到批准。②

218

以上这些困难和耽误的一个原因是英国和美国外交代表为了扩大各自在墨西哥的影响而进行对抗。英国外交代表声称，他挫败了美国人阻止批准英国条约的企图，阻止了墨美商务条约的批准，破坏了美国争当美洲国家联盟领袖的要求。但是英国和美国在发展同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关系方面的分歧还存在着一些更基本的因素。1824年，哥伦比亚曾探询"门

---

① 韦伯斯特著《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1卷第385页。

② 见海梅·B·罗德里格斯·O著《西属美洲的出现：维森特·罗卡富埃特与西班牙美洲主义，1808—1832》(伯克利，1975)，第123—142页。

罗主义”是否意味着美国有建立并加入（美洲）防御同盟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是，在受到干涉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和欧洲列强合作采取行动。墨西哥1826年提出了类似的试探，结果表明“门罗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拉丁美洲承担义务。相反，哥伦比亚欣赏英国在1825年对法国的行动提出的强有力的抗议，并不惜违反《波利尼亚克备忘录》，向西班牙开赴古巴的增援部队提供海军护航。

古巴是美国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岛屿落到别国手中，一致同意最好莫过于继续让西班牙占有。但是美国不太愿意参加可能阻止古巴将来加入美洲联盟的保证。更不准备允许这个岛屿被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军队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这将包含在非常靠近美国各蓄奴州的地方发生奴隶叛乱的危险。所以，美国在1825年警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不要进攻古巴。但英国认为，只要西班牙继续与美洲新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哥、墨两国就有权进犯西班牙领土，但又指出，进攻古巴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英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也不利。

219

英国是在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上作出这个暗示的，哥伦比亚也就照此办事。这次会议表明了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目的明确而美国的态度自相矛盾。英国欣然接受邀请，派遣观察员出席了这第一次泛美会议。而且轻而易举地提高了英国的影响。它保证，西班牙语美洲国家采取的任何一致行动都不会损害英国利益。而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美国国会在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意见分歧（北方各州看到了贸易机会，而南方各州只看到拉丁美洲同情反对奴隶制和初级产品的竞争），但一致同意，美国的不卷入外国纠纷的总政策对拉丁美洲也不应例外。国会最终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巴拿马，但它行动过于迟缓，并且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把自己置于一个全美洲国家邦联的领导地位并操纵这一邦联

反对欧洲（包括英国）的明显意图"，而这正是坎宁的忧虑所在[1]。其实美国的对抗并未真正威胁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尽管强调这种威胁可能符合坎宁的目的），这种霸权地位是牢网地建立在以海军力量为后盾的经济优势的基础之下的。

英国和美国在调整它们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的进展使其它欧洲强国（特别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国家）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但是它们坚持不走在西班牙前面的正统主义原则以及费迪南七世顽固地拒绝承认他的帝国世袭遗产的任何部分的丧失，（这使西班牙的承认一直推到他1833年逝世以后），阻碍了它们的行动。法国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825年派出了比先前的代表团更具官方性质的商务代表。随后在商界压力下，又开展了正式的领事工作。1826年，允许悬挂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旗帜的船舶驶进法国港口，第二年同墨西哥签定了商务协定。它与其说是个条约，还不如说是个"宣言"。墨西哥人将它解释为外交承认，而法国声称签订协定和它的不承认政策并无矛盾。唯一的早期政治发展是1825年法国对海地独立的承认，而海地以赔偿和在易上的让步作为回报。海地过去是法国殖民地，因此法国的这个举动并不影响别的国家的权利，但是它的确包含着承认一个反殖民制度起义中诞生的政权的意思，因此正统主义者，（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感到这是放弃他们奉若神明的戒律。查理十世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让步，直至1830年七月革命把他推翻以后，法国才接受承认的原则。此后事情就发展得比较迅速了。在以后几年中，法国同好几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谈判商务条约。但是法国的行动来得太迟了，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220

普鲁士在19世纪20年代同西班牙语美洲的商业联系不断增多，普鲁士政府既不正式批准也不阻止。在英国承认以后，经济利益集团（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商，他们很重视西班牙语美洲市场）

---

① 韦伯斯特著《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2卷第543页。

逼迫普鲁士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826年与墨西哥互派商务代表，1827年普鲁士和墨西哥签订了一个类似墨西哥和法国签订的贸易协定。随后开始签订商务条约谈谈判。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承认墨西哥的独立，但是墨西哥政府一直拖到1831年才予批准。

俄国和奥地利，在西班牙语美洲几乎没有直接商业利益，因而谴责同这些“不合法”的新国家进行任何交易。它们的这种态度不但使普鲁士，而且使德意志联邦中的小国和其他欧洲小国家不得不采取慎重和隐蔽的方式同美洲建立关系。对参加汉萨同盟的城市来说，同西班牙语美洲进行贸易是最重要的，它们只能在半官方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商业关系，以免引起强大的欧洲邻国愤怒。221 荷兰因承认哥伦比亚而遭到俄国指责以后，以派遣领事的权宜办法与墨西哥进行贸易，但是有一项条约的谈判则一直拖延到普鲁士开创先例后方达成协议。瑞典的运气较差，它不得不向俄国的压力屈服，取消了卖船给墨西哥的交易。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欧洲主要强国的态度推迟了欧洲大陆国家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建立，但是这对发展贸易（实际上这是联系美洲新国家和旧大陆的唯一共同利益）影响很小。

正统主义思想推迟了欧洲列强与西班牙语美洲建立关系，但它在巴西没有产生那样大的作用。唐·佩德罗既是巴西皇帝，又是葡萄牙王位继承人，这就比较容易设想继续由同一个布拉甘萨王朝统治的解决办法。何况，巴西的决裂来得突然而且比较和平；葡萄牙与巴西的关系虽然很不友好，但是并没有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的关系那样，达到因长期战争的积怨造成无法调解的地步。而且当里约热内卢是葡萄牙政府所在地时，欧洲列强与巴西已有直接关系，这也有利于促进各方的关系。英国对结局有着特殊利益，因为它与葡萄牙具有传统的特殊关系，根据1810年条约在巴西享有贸易特权，又关心废除奴隶贸易问题。奥地利由于王室关系（唐·佩德罗娶奥国公主为妻）也卷入了巴西事件。梅特涅希望寻求某种介于完全分离和完全屈服之间的解决办法以调和

他的正统主义思想。

经英、奥调解，巴西与葡萄牙于1824年7月开始。谈判经过若干次会议，在葡萄牙坚持宗主权和巴西要求独立之间没有妥协余地。坎宁提议建立联邦制君主国，宗主权轮流属于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葡萄牙政府在强烈的反英情绪影响下，不但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反建议，而且背着两个调解国，在巴西、法国、俄国和普鲁士争取对这些反建议的支持。为此，坎宁愤怒地中止了调解。但是此事在英国看来具有某种紧迫性，因为英国与巴西贸易，所遵循的1810年英葡商务条约将于1825年到期。因此坎宁决定派遣特使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先到里斯本，再去里约热内卢试图解决所有问题。葡萄牙的政局变化帮了斯图尔特一个大忙，新内阁对英国比较友好，授权斯图尔特代表葡萄牙王室在财政赔偿和保留葡萄牙王家对巴西若干产权的基础上同巴西谈判独立问题。斯图尔特于1825年5月离开里斯本。在王家产权问题上多次讨价还价，巴西最后同意付给葡萄牙200万英镑的赔偿。这个解决协议于1825年7月签字，11月获得批准。这意味着宗主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权利，法律上承认巴西独立，同时为各国（甚至最教条的正统主义国家）承认巴西开辟了道路。包括奥地利，法国、普鲁士和汉萨同盟诸城市在内的若干国家走得更远，在1828年间与巴西谈判缔结了商务条约。美国也是一样，它尽管在1824年就先于葡萄牙带头承认了巴西，但未能迫使巴西政府更早地进行商务谈判。 222

然而，英国在巴西的利害关系最大，现在该由它来摘取这次外交成功的果实了。斯图尔特自作主张，一个人干了起来。政府指示他在达成新的协议以前，将现有商务条约延长两年，而在新协议中应包括立即废除奴隶贸易的条款。他不顾上级指示，不仅签订了一个永久性商务条约，而且还签订了一个废除奴隶贸易的条约。当他的亲手杰作送达伦敦时，两个条约都被坎宁否定，因为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不符合英国的要求。坎宁派出了新的特使，于1826年签订了新的反奴隶贸易条约，该约使巴西人在1830年以

后与奴隶交易的任何牵连都相当于海盗行为；他在1827年又签订了新的商务条约，这个条约使英国在巴西贸易中继续保持了15年的特权地位。

英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在巴西极端不受欢迎，并成为唐·佩德罗丧失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最终导致他在1831年逊位。这位皇帝下台的另一个原因是东岸的丧失，这是英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的另一个事态发展。尽管西班牙不断抗议，这个地区一直由葡萄牙控制，以后又转而由巴西统治。1825 223 年拉普拉塔联合省对此地区提出要求，并支持那里爆发的叛乱，随即发生了与巴西的战争。巴西对拉普拉塔河进行封锁，交战双方以重金引诱英国商船上的水手参加它们的海军，这些都使英国贸易遭受损失。最后，当地英国外交代表迫使双方接受调解，并于1828年同意让这块有争议的地区独立，成为乌拉圭国。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签订的商务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没有互相竞争的各国所渴望的那么多。事实上，拉丁美洲当时的经济前景被外部世界过分夸大了。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及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拉丁美洲的许多贸易已经从伊比利亚半岛转移到欧洲北部的国家。这个过程独立后仍在继续，但是对外贸易总额有适度的而不是惊人的增长。人民群众的贫困限制了对欧洲进口货的需求；大部分拉丁美洲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性质限制了出口农产品的数量；战争使本大陆传统上可供销售的资源。白银的开采遭受严重破坏。迅速发展（经济）的希望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一度产生虚假的繁荣，但到1826年希望完全破灭了。政府无法偿还债务，采矿业生产状况不佳，革命和内战威胁到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独立初期推行自由贸易路线和主张现代化的国际主义者被迫让位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仇外的因循守旧派。

同时，拉丁美洲国家迅速离开国际外交的最前线。它们都忙于解决国内问题和同邻国的边界争端，没有一个国家再去参加远隔

重洋的欧洲的均势政治。总的来说，欧洲列强也没有再到拉丁美洲去进行竞争。也许有两个例外：先是1838年法国对墨西哥和布宜 224 诺斯艾利斯的干涉，法国这样做主要可能是由于需要在欧洲获得外交上的成功，并非对拉丁美洲国家有什么实际不满；其次是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卷入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事务，这看来是由于这两个欧洲国家希望找到一个它们可以合作的问题，以便抵消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争端的影响。法国人可能没有从这事件中吸取教训，60年代他们又在墨西哥发动了一次更加野心勃勃的干涉行动，可是40年代的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英国人早已从1806年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中所获得的教训：欧洲国家在南美大陆施展它们的威力一般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

英国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同巴西打交道的经过充分说明了从外部施加政治影响的局限性。在这整个时期内，英国始终未能迫使巴西废除奴隶贸易，这个要求是作为它协助巴西获得国际承认的报酬提出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一再敦促巴西对英巴反奴隶贸易条约和巴西自己通过的取缔奴隶贸易的法律作必要的修改，始终未获得成功。1845年，英巴条约中少数尚未完全失效的条款之一，（即双方同意由英巴混合委员会审判奴隶贩子）到期，巴西不同意续订。于是，英国议会通过阿伯丁法。根据这项法律，英国可以单方面采取武力制止巴西的奴隶贸易。1850年，英国海军在巴西水域采取了强制行动。这是导致两国几乎立即停止贸易的主要因素。巴西最后废除奴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巴西在这个问题上有影响的舆论发生了变化，以及巴西政府权力和有效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另一个发生争端的问题是英巴商务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商人在巴西法庭上得到特殊保护，对英国商品的关税征收标准受到限制，结果使其他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也得到了这种优惠。条约1842年满期时，巴西拒绝续订。失去特惠条款并不太重要，因为这时英国商界已不再需要它们；但是巴西政府甚至不愿签订一个 225

简单的协定让英国享有与其它国家同等待遇，除非英国作出它能接受的让步。此后，英国的贸易不得不在没有条约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由此可见，英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优越地位并不能使它控制巴西的政治决策。

预期的英美对抗从未真正在南美洲实际发生。当然，经常有人表示担心，美国的航运业会不会抢走英国的生意，但是实际上美国船舶装载的货物许多是英国产品，而且英国的工业优势保证它对巴西市场一直控制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外交使节经常嫉妒他们的英国同行享有的显赫影响，有时他们呼吁国务院设法加以破坏。但是华盛顿，对这些新国家建立不起美国模式的民主政府感到心灰意懒，对此也不感兴趣。

靠近美国边界地区的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得克萨斯1836年脱离墨西哥后，有一个时期，英国曾试图用支持得克萨斯共和国独立的手段与美国竞争，以抗衡美国在北美洲的优势。然而，1845年得克萨斯并入美利坚合众国后，英国对1846—18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后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墨西哥北部省份，都没有进行反抗。

英美真正发生对抗的地区是中美洲地峡，那也只是因为1848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对找到一条比穿越大平原和落矶山脉的危险的拓荒者小道更为方便的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道路突然发生了兴趣。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地峡地区，对英国势力在那里的扩展，或者对中美洲独立后有关在两大洋间开凿运河的种种建议和考虑都不甚关心。美国政府采取的唯一积极步骤是1846年与新格拉纳达签定了一项保证巴拿马地峡中立以及所有权属于新格拉纳达的条约。签定这项条约也是由波哥大政府倡议的，它害怕欧洲可能进行干涉，而且建议取消对美国贸易的歧视性关税，这正是美国多年来所要求而未能得到的。条约送达华盛

226

顿后，美国政府拖延了一年多没有批准，直到获得加利福尼亚后地峡通道问题成为对美国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大事。

1848年以前，英国势力在中美洲的发展与运河规划或美国对抗并无关系，但是它在这里确实超越了支配进出口贸易的界限（支配进出口贸易是英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特征）。在洪都拉斯英占地区，英国殖民者过去根据条约一直享有在西班牙殖民地领土上砍伐木材的权利，如今西班牙在这个地区的权利已经结束，他们敦促英国政府对英国殖民区充分履行责任，承认他们侵占的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以外的地区。占据了米斯基托海岸的其他英国冒险家则催促政府恢复18世纪英国与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建立的关系（当时印第安人"国王"给予英国人多方面的特许权）。早已来到几乎荒无人烟的罗亚坦岛等巴伊亚群岛上定居（英国传统上一直声言巴伊亚群岛属于英国）的开曼群岛上的英国移民也要求政府保护，反对中美洲当局的领土要求。尽管当地某些英国代表怀有很大的野心，但并没有迹象证明伦敦政府有任何利用上述情况在中美洲建立针对美国的势力范围的计划。然而，当1848年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巴拿马地峡时，发现英国占据着中美洲大西洋沿岸的重要地带，包括圣胡安河的出海口，那是开凿一条横穿尼加拉瓜的运河唯一合适的终点，那时被认为是比巴拿马更有希望的线路。

紧接着是一个疯狂活动的时期，在此期间当地的英国和美国代表在各个中美洲国家里争夺外交和战略优势，当时英国官员和美国勘探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道路的人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很可能导致英美决裂。但是双方政府都希望避免决裂，并在1850年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达成妥协，双方宣称在中美洲放弃领土要求，保证通道中立，并在开凿运河问题上合作。条约签订后，对条约的解释和履行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争吵，直到英国同意撤出巴伊亚群岛和米斯托保护地确定英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边界线以 227 后方告结束。到1860年，随着中美洲日益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英国终于承认，为了保持1850年条约所给予它的权利，做出上述步让是必要的。

由于英国在海军、商业和工业方面占有优势，它在拉丁美洲向独立过渡时期是最重要的外部势力。19世纪的头十年，它对西班牙殖民地采取的是从兼并或解放到实行帝国结构内的自由化等多种政策。1810年各国革命后，它宣布中立并力求将这个政策扩展到所有第三方国家，表示反对外部干涉。鉴于它的海军力量，这种反对等于禁止。但是中立政策未能满足西班牙自认为有资格寄予的期望，也不符合拿破仑以后欧洲反动君主的愿望。当独立看来已不可避免时，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变得有点蹩扭而且紧张。另一方面，对进行叛乱的殖民地，英国奉行不承认和争取在君主政体结构内和解的政策，这种政策一直维持到独立政权已有效地建立起来以后。总的来看这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够采取的最好的政策，结果英国同那些新兴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英国的政策不但给革命带来成功的机会，而且使英国的经济势力已经取得的有利地位更加有利，而欧洲大陆君主国家的正统主义政策使它们的商人和制造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相对来说，美国虽然没有陷入欧洲的纠纷，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太脆弱，不能不顾欧洲采取独立的方针，在支持叛乱事业方面只能比其它强国先走一小步。拉丁美洲独立后有半个世纪之久，美国也只能在紧靠它边界的地区内向欧洲国家挑战。然而，对美国可能会暗中抢光的忧虑仍然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制订政策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他国家对西属美洲独立的贡献是很大的，甚至可能是至关紧要的，但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走向解放的进程不加阻挠，而不是积极促进。通过不干涉政策，欧洲列强听任内部斗争和当地及宗主国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来解决问题；而当这些新国家开始走上独立道路时，这种情况又有力地影响到它们国家的形式，条件和性质。

228

英国在葡属美洲的作用更为积极。尽管巴西的独立完全不是由英国积极促成，但是英国对葡萄牙宫庭迁往南美起了作用，这件事为分离创造了条件。再者，葡萄牙帝国政府设在里约热内卢

时期，英葡之间的传统关系得到加强，这使英国在创造实现巴西独立的条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地在19世纪头25年内作为独立国家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世界事务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中没有发挥作用。欧洲各国发现，不仅与拉丁美洲贸易的利益（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光采夺目，而且它们对对外贸易的控制对这些拉丁美洲新国家的政治决策并未产生实际影响。

229

评论：教会与拉丁美洲的独立[①]

西属美洲独立斗争（1808—1825）双方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争取天主教会的支持。从一开始，教会统治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支持王室。根据在16世纪因教皇向哈布斯堡王朝让步而产生、18世纪因波旁王朝强调王权至上而得到加强的国王的圣职人员推荐权，主教一律由国王任命并从属和服从国王。所有的地方占压倒多数的主教都由"半岛人"担任，他们完全支持西班牙的利益。他们也认识到革命和自由化思想对教会原有地位的威胁。主教对国王的忠诚如受到怀疑，不是召回西班牙就是实际上剥夺他们的主教职务，加拉加斯的纳西索·科利-普拉特主教、库斯科的何塞·佩雷斯-阿曼达里斯主教的情况就是那样。此外，自1814年费迪南七世复辟至1820年西班牙发生自由主义革命期间，宗主国在42个美洲主教管区中任命了28个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的新主教。可是，也有少数主教明显同情爱国者的例子——如米却肯的安东尼奥·德·圣米格尔和基多的何塞·德·奎罗-凯塞多。还有一些是机会主义者，一旦爱国者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他们就毫无困难地同他们管区内的爱国者妥协。

下层教士，特别是世俗教士，主要是克里奥尔人，他们的态度也和克里奥尔上层人士一样互不相同，但总的说来更倾向于支持西属美洲自治，最终支持独立。此外，广大的教区神甫同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存在着经济的和社会的深刻裂痕，对"半岛人"实际上垄断教会高级职位普遍不满。教区教士也同波旁国家疏远，

230

因为国家前不久侵犯了他们的主要（通常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即

---

① 约瑟普·贝纳达斯博士和汉斯-于尔根·普里恩教授为本文提供一些材料，编者在此表示感谢。——原编者

弥撒等活动收入（capellanias，也就是在小教堂或歌祷堂为施主做追思弥撒等活动收入）和其他信徒捐款；还侵犯让他们享受民事裁判豁免的教会特权（fuero cclesiasfico）。个别神甫在西属美洲的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著名的有新西班牙的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和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他们称瓜达卢普圣母为西属美洲革命的守护神，成功地吸引了虔诚的群众，特别是虔诚的印第安人。在基多，1809年有3名神甫发表独立宣言；1814年，一名保王派将军将一百多名神甫列入爱国者名单。在圣菲·德·波哥大，有3名神甫参加1810年洪达，9名神甫参加1811年国会。1815年，在墨西哥有一百多名神甫被处决，其中包括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更多的教士，包括世俗的和属于修道会的被革出教门。有16名神甫在拉普拉塔独立宣言上签名，13名神甫在危地马拉独立宣言上签名。有人认为秘鲁的教士对独立较少热情，但是1822年国会的57名代表中，有26名神甫。同时应该看到，继续鼓吹服从国王效忠王室的神甫人数也不少。这种情况在"半岛人"的比例高于克里奥尔人的修道会中尤其明显。当然，许多下层教士倾向于按照上级态度行事，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

在西属美洲独立和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罗马教皇坚持与西班牙国王结盟、反对自由主义革命的传统立场。教皇庇护七世在他的1816年1月30日通谕"*Etsi longissimo*"中，要求西属美洲的主教和教士明确宣讲反叛正统政权的可怕后果。但后来梵蒂冈在政治上变得较为中立，一个原因是为了响应西属美洲的呼吁和关心那里的信徒心灵上的福祉，另一个原因是西班牙1820年革命后，自由派政府实行了反教权措施，1823年1月甚至发展到驱逐罗马教廷大使。教皇最终同意向拉普拉塔和智利派遣教皇代表团（代表中有未来的庇护九世〔1846—1878〕，他成为访问过新大陆的第一位教皇）。但是代表团出发前不久，庇护七世逝世（1823年9月28日，这一天费迪南七世在西班牙完全复辟专制政权）。在正

统君权的坚持捍卫者教皇利奥十二世时期，罗马教廷对西属美洲独立革命的态度重新变得坚硬起来。正好在西班牙国王和西属美洲的保王派即将遭到最后失败的时刻，教皇在他的1824年9月24日通谕“Ltsi iam diu”中给他们全力支持。诸如此类政治上的错误判断在罗马教廷的历史上并非少见，也没有给教会造成长久的损害。有些问题比这更严重的多。

独立斗争后，西班牙语美洲的天主教会受到很大削弱。过去王室和教会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君主政体的垮台给整个西班牙语美洲的教会的声誉带来严重打击。首先，教会的思想地位削弱了。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理性呼声也对天启宗教* 提出挑战，或者说显得好象提出了挑战。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在建立新政治制度的过程中，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找到一种道义上的根据。他们没有从天主教的政治思想中，而是从理性时代的哲学，特别是功利主义中得到了启发。边沁** 在西属美洲的影响对教会是一种具体的威胁，因为它给予共和主义以理论上的可信性并提出了另一种人生哲学。教会没有通过思想争论作出反应(这方面它准备不足)，而是呼吁政府镇压宗教的敌人。于是引起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在各国共和政府统治下，教会的地位有些捉摸不定。当时最令人关注的是，某些主教职务在权力转移期间长期出缺，许多主教依附王室事业受连累，自愿或被迫返回西班牙，还有一些主教已经亡故补缺。在神圣同盟各国的压力下，罗马教廷拒绝与西班牙语美洲的新统治者合作，所有的新统治者至少已决定对教会行使过去西班牙国王所享有的全部权力，特别是圣职人员推荐权，即提示（事实上是任命）高级神职员的权力，而有些思想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已开始显露出反教权主义的迹象。但这里也存在着教皇

---

* 天启宗教，指信仰一个有意志的神的任何宗教，如犹太教、天主教等。——译者

** 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译者

工作运转不灵的因素，原因是在不到10年（1823—1831）的时间内更换了三次教皇。1825年阿雷基帕的何塞·塞瓦斯蒂安·戈耶内切-巴雷拉大主教是包括今天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的整个地区的唯一合法主教。1829年危地马拉大主教和普埃布拉主教去世，墨西哥和中美洲就一个主教也没有了。以下是一些长期没有补缺的主教管区：墨西哥，1824—1839；米却肯，1810—1831；瓦哈卡，1824—1841；危地马拉，1830—1844；尼加拉瓜，1825—1849；加拉加斯，1817—1827；波哥大，1818年—1827；昆卡，1814—1847；利马，1822—1834；特鲁希略，1821—1836；康塞普西翁，1817—1832；拉普拉塔，1816—1834；圣克鲁斯，1813—1835；亚松森，1820—1845；布宜诺斯艾利斯，1813—1833；科尔多瓦，1816—1857。但在罗马教皇格利高利十六世（1831—1846）时期，若干国家的主教管区逐步改组，许多空缺得到填补。1835年自新格拉纳达开始，罗马教廷与西班牙语美洲各共和国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

主教以下的教会机构瓦解到多大程度，这一点不太清楚。有些教士死了，有些回到了西班牙。战争中的派别活动，加上与罗马教廷失去联系，使许多地方的纪律遭到破坏。革命后宗教职业似乎普遍地减少了吸引。教会失去了大约50％的世俗教士，属于修道会的教士减少更多。例如，在墨西哥，世俗教士的数目从1810年的4229人下降到1834年的2,282人，属于修道会教士从1810年的3,112人下降到1831年的1,726人。在利马的弗朗西斯科大教区，从事宗教职业的年平均人数，从18世纪的最后30年间（1771—1800）的6.9人下降到1801—1810年的5.3人，1811—1820年的2,3人，1821—1827年间落到一个不剩。玻利维亚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一年之内，全国41个女修道院有25个关上了大门——虽然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的敌视教会法规在这里无疑起了作用。

教会的财产基金在1767年驱逐耶稣会教士、查封并出售他们的大量房地产后已严重减少，后来又受规定要没收教会财产和资

本的1804年12月整顿资产法令（仅部分实施）的威胁，独立战争期间更进一步受到损失。从墨西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支持王室分子和爱国者双方，一面声言献身于宗教信仰，同时却接二连三采取紧急措施，向教会征用现金、什一税收入、建筑物、土地和牲畜，乃至礼拜仪式用品。

西班牙语美洲各个新独立的共和国政府承认天主教为国教，233 但同时又经常接受容忍异教原则（西班牙语美洲各国独立后与英国签定的条约中往往保证信教自由）。各国都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即便只是一种象征性做法。主要在港口城市定居的外国商人和手工业者，还有外国传道组织会的代表将新教带到了西班牙语美洲。许多自由派除了主张国家与宗教分离至高无上和保卫思想自由外，还力图大大缩小教会的世俗权力和影响，他们认为教会的这种权力和影响是独立后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教会的财产、资本、收入、教育上的影响、司法特权都受到抨击。在教会方面，在教皇至高无上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教皇庇护九世时期，它不断进行抵抗，而且动员西班牙语美洲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包括群众的力量，起来保卫教会自身利益。结果，自由主义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成为19世纪中叶（甚至中叶以后一段时间）整个西班牙语美洲的一个中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墨西哥，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问题导致了一场激烈对抗和全面内战。

巴西的天主教会在19世纪初叶，既没有象墨西哥和秘鲁的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也没有那样的经济财富和司法特权。根据国王的圣职人员推荐权（这种制度在18世纪后半叶又因庞巴尔侯爵的王权至上论而得到加强），巴西的唯一的一名大主教（在萨尔瓦多）和6名主教，也象西班牙语美洲的主教一样，完全由国王任命并从属于国王（王权至上论的主要反对者耶稣会教士，在巴西也象在西班牙语美洲一样于1759年被驱逐出境）。但巴

西教会的上层统治集团中有许多巴西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象伯南布哥的主教若泽·若阿金·达·库尼亚·德·阿泽雷多·科蒂尼奥，是著名的巴西土地利益集团的维护者。在巴西，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和下层教士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对立要少得多。此外，葡萄牙宫廷1807—1808年由里斯本迁至里约热内卢在很大程度上使巴西——从而也使巴西的教会——摆脱了极端的政治和思想冲突，而这种冲突在拿破仑第一次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后来1814年费迪南七世复辟以后一直困扰着西班牙语美洲和西班牙语美洲的教会。在1821—1822年的政治危机中，大多数巴西教士都支持巴西人集团，反对葡萄牙人集团，并最终支持在佩德罗一世统治下实行巴西独立。当然，教会中也有新葡萄牙分子，特别是在巴伊亚、皮奥伊、马拉尼昂和帕拉等省，他们之间有些人在1823—1824年间被驱逐出境。也有一些极端自由派和共和派教士，在1817年的伯南布哥革命中尤其在1824年在东北部建立的独立共和国——赤道邦联——中崭露头角。赤道邦联由弗雷·若阿金·卡内卡教士领导。他失败后于1825年1月被处决。许多神甫（大多数是温和的自由派）在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各级洪达（1821—1822）、葡萄牙议会（1821—1822）、制宪会议（1823）的活动中。在第一届立法机关（1826—1829）中，神甫的席位超过任何其他社会集团（100个代表席位中占23席）。圣保罗神甫迪奥戈·安东尼奥·费若参加过所有这些机构的工作，佩德罗一世逊位后，成为第一任司法部长，随后又任摄政两年（1835—1837）。

234

巴西从葡萄牙殖民地过渡到独立帝国的一个特点是，教会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样也保持了连续性。巴西独立运动的相对和平性质和继续保持君主政体，保证了巴西教会——它的人员、财产、声誉——相对地说来未受损害（这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形成鲜明对照），虽然即便在巴西，19世纪的前几十年内世俗教士，尤其是属于修道会的教士的人数也有所下降，当时各种修道会进入了一

个衰退时期。但是，巴西教会的财富、特权和影响一直比较适度，没有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那样，独立后受到咄咄逼人的自由派的反教权主义的威胁。天主教依然是国教，圣职人员推荐权，特别是主教任命权，从葡萄牙国王转移到巴西皇帝手中，在罗马教皇利奥十二世1827年的论书"Praeclara Portugaliae"中获得承认。巴西国家和教会之间除发生一次争端外（这次争端使重要的里约内热卢主教职位从 1833 年空缺到1839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直到19世纪70年代巴西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受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为止。

第 二 篇

加勒比海地区

第 6 章

海地与圣多明各

1790—约1870[①]

237

18世纪后期，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占全岛三分之一面积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是安的列斯群岛中物产最丰富的殖民地，也是一块饱受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折磨的土地。圣多曼格的经济基础是糖，还出产一定数量的咖啡、棉花和靛蓝。产糖时代始于17世纪末法国占领该岛部分地区以后，当时西班牙声称全岛为它所有。整个18世纪，法国种植园主继续经营制糖业，产量超过英属西印度群岛糖产量的总和。到18世纪末，由于圣多曼格生产糖的费用大大低于英国，法国人能在欧洲食糖市场上抢走英国人的生意。他们的成功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独立后变得更为明显，因为北美殖民地一经摆脱英国的殖民垄断，立即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产品，特别是圣多曼格的产品供应自己。尤其是1783年以后，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已临近尾声，这块法国殖民地已经很高的发展速度又进一步加快，蔗糖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圣多曼格的种植园主（主要是白人）在法国革命前平均每年输入3万名非洲奴隶。起初在17世纪后半叶，向圣多曼格甘蔗种植园提供黑奴的贸易掌握在法国政府成立的垄断公司手里。但是种植园主不服从这些公司和它们的垄断组

① 本章由理查德·布维德博士译自西班牙文；译文经编者校阅。编者向大卫·尼科尔斯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本章定稿时曾得到他的帮助。

238 织，于是两者皆被取消。这之后，奴隶贸易落入的法国最重要港口为基地的商人手中，他们利用从奴隶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为圣多曼格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例如，在1783—1789年间，单是波尔多的商人就在这块法国殖民地投资一亿图尔里弗，用于增加蔗糖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产量，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但是法国商人和金融家与圣多曼格种植园主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融洽的，种植园主尽管生产兴隆，发现自己始终依赖宗主国的资本家。不少心怀不满的种植园主在巴黎组织了一个著名的马西亚克俱乐部，密谋为圣多曼格获得较大程度的政治自治和贸易自由。1789年，圣多曼格的大种植园主(即所谓"大白人")对法国的殖民制度确实是非常不满。

社会的另一阶层——已获自由的奴隶（affranchis，即有色人种自由民，他们大部分是穆拉托人，也有些黑人）——与法国的殖民制度，更是格格不入。18世纪80年代，有色人种自由民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到法国革命时达到约28,000人。有些如今已成为地主和奴隶主，控制着殖民地大约1/3的种植园（包括奴隶)。他们憎恨4万白人——行政官员、士兵、商人和种植园主，也有零售商和工匠(即所谓"小白人")——这些白人不能容忍奴隶的后代在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获得如此优越的地位。为了限制已获自由的奴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白人在18世纪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法律，结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产生了无休止的仇恨。那些居住在巴黎的富裕的穆拉托人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利，组织了"黑人之友协会"，这个协会在法国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团体中享有广泛的声誉。因此，1789年大革命开始时，一些最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和圣多曼格富裕穆拉托人的代表之间已经建立亲密的友谊。他们提供600万图尔里弗帮助法国新政府偿还公共债务，这笔巨额债务是触发这次大革命的一个因素。作为对这个帮助的报酬，穆拉托人打算争取国民议会颁布法令，承认他们是享有充

239 分权利的公民。

法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得到了圣多曼格已获自由的奴隶的好处，但是否向他们作出让步，长期犹豫不决，原因是让步以后可能接着会要求他们解放占全部人口85％—90％的将近50万黑奴。废除奴隶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殖民地的经济崩溃，继而使法国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遭殃，因为它的兴旺和权力主要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之上。

“黑人之友协会”，不管它的名称如何，实际上仅代表有色人种即穆拉托人的利益。协会曾派出两名成员前往伦敦寻求援助。他们在返回圣多曼格途中即考虑用武力夺取法国拒绝给他们的权利。协会的主要代表文森特·奥赫于1790年10月返抵圣多曼格，试图跟他的兄弟和另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沙瓦纳的穆拉托人一起组织一次武装起义。这次尝试没有成功，被法国当局镇压，奥赫和沙瓦纳被俘并处绞刑。

尽管如此，殖民地而今仍处于紧张的革命骚动状态之中。人人都在谈论法国革命所赢得的自由和美国已经树立的榜样。“大白人”种植园主谋求实行自治。因奥赫和沙瓦纳之死而激动不已的穆拉托人力求取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最后赢得独立。无人想到或谈到黑奴有任何权利，或应该得到什么权利。但是日子一久，黑奴也听到了主人中间的辩论。在邸宅，在种植园，在村庄，在市场，奴隶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摆脱这种处境的可能性，只要走上传奇式的叛逆者弗朗索瓦·马康代尔1758年向他们指出的道路。奴隶们逐渐组织起来。1791年8月，在圣多曼格北部的种植园里爆发了一次持续达十年之久的奴隶起义。

白人和穆拉托人地主的根本利益受到了奴隶暴动的威胁，于是他们结成共同阵线，在法国人的刺刀支持下，起来保卫自己的财产。他们还急忙呼吁外国援助，因为他们发现英国很想对圣多曼格进行军事干预，以便使冲突转向对自己有利，使法国失去它最重要的西印度群岛中的殖民地。然而，白人和穆拉托人无法长期保持良好关系。1791年末，法国政府向圣多曼格派去一个很有 240

权力的文官委员会，结果徒劳无功。委员会经过谈判促成的白人和穆拉托人的正式同盟由于这两个集团彼此怀有深刻敌意而很快解体。

对立阵营之间的分裂如今开始公开化。起义黑奴争取到了本岛东部占全岛2/3面积的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的支持，圣多明各当局看到这是重新征服一个多世纪以前失去的西部领土的机会，尽管1700年以后采取了默认政策，但从未将这部分领土正式割让给法国。1792年3月4日，法国革命政府终于颁布法令，承认穆拉托人与白人享有平等地位，从而把穆拉托人争取过来。“大白人，则谋求英国的帮助，要求牙买加当局派军队帮助他们镇压黑人，同时加强他们对付穆拉托人的地位。在这种动乱形势下，由强烈反对白人的雅各宾党人莱热·费利西泰·松托纳率领的第2个法国文官委员会抵达圣多曼格，有6千名士兵同行。他的任务是恢复殖民地的秩序。

241

但是如今维持秩序是最困难的任务：奴隶暴动已变成一场穆拉托人反对白人、种植园主反对中央政权的内战，一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参加的国际战争。法国军事指挥官和文官委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法国的力量，有利于西班牙人。一支由起义黑人和圣多明各克里奥尔民兵组成的军队越过了边界，驻牙买加的英国军队也趁机在南部登陆。倘若松托纳没有超越授权，于1793年4月29日临时机智地作出决定，发布在圣多曼格废除奴隶制的法令，法国人或许已经失败。他立即号召黑人起义者（如今已是自由人）与军队团结一致，击退旨在援助蓄奴白人种植园主的英国军事干涉。

这一政策产生了重要结果。主要的黑人革命领袖之一、当过克里奥尔人*家庭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响应号召，率领4,000人

* 在西班牙语美洲出生的欧洲白人后裔，和在西印度群岛出生的黑人后裔，均称克里奥尔人(Creoles)，此处指后者，参阅本章原文第249页。——译者

倒向法国人一边。其余的黑人不理会松托纳的法令，仍留在西班牙人的军队中。穆拉托人也发生了分裂。有些人拥护法国政府，尽管他们不同意废除奴隶制；另一些人支持与英国人结盟的"大白人"种植园主。

242

法国的军事行动因得到主要黑人和穆拉托将军们的归附而大大增强，最著名的将领是杜桑，他成为圣多曼格法军无可争议的司令员，1796年成为陆军准将，1797年晋升为少将。西班牙人被迫退却，越过边界回到自己的领土上，丧失了一些重要的养牛地区(那里饲养的牛大多供应圣多曼格)。英国人经过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斗争，损失了25,000多名军人，最终被迫撤退，于1798年4月撤离该岛。在这之前，英国代表梅特兰将军到达圣多曼格，与杜桑签订秘密条约，商定英国人放弃军事占领以换取商业上的特殊权。在谈判期间，梅特兰多次向杜桑暗示，要他依靠英国保护宣布独立。杜桑没有选择这条道路，部分原因是他对穆拉托人的意图有怀疑，宁愿以法国名义统治这个殖民地。他的权力为法国总督拉韦沃将军和其他法国官员所承认。

然而穆拉托人感到不能服从前黑奴杜桑的政府。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1799年2月，主要的穆拉托将军安德列·里高德和他在南部的支持者发动反对杜桑的叛乱，内战爆发。结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和杜桑的卓越军事领导才能起了决定性作用。果，黑至1800年8月，穆拉托人被击败。

243

在此期间，杜桑开始对殖民地进行整顿，设法恢复先前的经济繁荣。他保持种植园制度，将庄园发还给先前的所有主，同时以制止游手好闲为借口强迫过去的奴隶重操旧业。此外，他与美国建立关系，美国开始向他供应武器、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以交换殖民地产品。1800年10月12日，杜桑(如今是圣多曼格督军兼军队总司令)制订了农业生产法规，规定1789年时的奴隶仍须到种植园工作，但作为雇佣劳动者；种植园的产品，1/4留给劳动者，一半上缴国库，其余1/4为种植园主所有。种植园主不愿看到种植园的

产品分配给他们以前的奴隶，在古巴、美国和欧洲发动一场猛烈的宣传运动反对杜桑。在法国，象杜桑一样被革命推上台的拿破仑·波拿巴，利用这些伤害行为力图在圣多曼格殖民地将时钟倒拨。他代表帮助他上升到权力顶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渴望获得圣多曼格的财富，它占法国殖民地收入的2/3。所以，拿破仑决定恢复宗主国法国对这块殖民地的绝对控制。

根据1795年6月签订的巴塞尔条约，西班牙同意将伊斯帕尼奥拉岛属于西班牙的部分割让给法国，以换回它在欧洲丧失的领土。但是法国政府坚决主张，殖民地圣多明各只能移交给一支由白人士兵组成的法国军队，以免圣多曼格的奴隶革命感染这个岛的西班牙部分。可是由于战争在欧洲延续，一直派不出这样一支军队。现在拿破仑计划派遣一支部队去圣多明各，以圣多明各为基地将圣多曼格的杜桑赶下台。但杜桑抢在法国军队前面，亲自率军侵入岛的东部地区。1801年1月26日，他抵达古老的圣多明各城，使该城的西班牙居民和许多从革命的圣多曼格逃出来的法国难民惊慌失措。杜桑着手将这个岛的两部分统一。他任命各种官员管理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宣布了若干措施，企图将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依赖经营牧场的经济改造为以农业和生产出口作物为基础的经济。然后他回到西部，继续从事那里的重建工作。可是，新近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的拿破仑拒绝接受已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的新秩序，他派出一支庞大的侵略军，要将宗主国的控制权重新强加于圣多曼格和圣多明各。

244

1802年1月29日，法国舰队的一半抵达该岛东部的萨马纳海湾。其余的一半2月3日出现在法兰西角的海面上。接着军事行动开始，法国军队分成几股，在不同地点发动进攻。一支部队直接向圣多明各城前进，轻而易举地夺取到手；其余的部队在该岛西班牙部分的其他地点登陆。部分舰队袭击了太子港，而大部分远征军在维克托—埃马纽埃尔·勒克莱尔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他把妻子、拿破仑之妹保利娜·波拿巴带在身边），克服严重困难后攻

下了法兰西角。6月7日，杜桑被人出卖，落入法国人之手，第二年死在法国囚禁地。然而黑人和穆拉托人如今在杜桑的副手、当过奴隶的让-雅各·德萨兰领导下团结一致，开始在通向独立的道路上进入血腥的最后阶段。

5万8千名法国人花了21个月时间试图征服他们以前的奴隶。同样是这些士兵，曾在意大利和埃及所向无敌，势不可挡，可是这一次却无法取胜。圣多曼格的黑人和穆拉托人获得了最有力的同盟者——黄热病——的帮助。据法国军队的数字，大约50,270名士兵在此战争中丧生。勒克莱尔本人在1803年12月底死亡，在绝望的罗尚博将军指挥下的少数幸存者有的投降，有的溃逃，战争遂于1804年宣告结束。1804年1月1日，德萨兰和其他胜利的黑人将军宣布海地独立。海地是美洲印第安人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称呼。法国丧失了它最富饶的殖民地。美国、加勒比地区、西属美洲和巴西的奴隶主们都觉得大大地减少了安全感；而各地的奴隶感到更有了希望。海地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圣多明各省长唐·华金·加西亚—莫雷诺自1795年以来遭致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他要使殖民地的工作正常运转，可是它已不属于西班牙，而法国又拒绝在集合足够的部队以前予以占领。莫雷诺没有经费，因为英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上活动，无法从墨西哥得到定期财政补贴。他不得不去找大主教，可是大主教心里只想着如何尽快和所有其他世俗教士一起移居国外，以免与反教会的法国人或起义的奴隶共处。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家庭因缺少船只不能移居国外而跟他纠缠不清。可是难民仍每天涌入圣多明各港口，他们随身带着可以携带的财产和奴隶，造成当地市场负担过重，根本无法买到他们需要的食物和基本必需品。

245

1795年将圣多明各割让给法国，是多米尼加国家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创伤。它打破了西班牙的殖民体系，将这个国家投入革命、

战争和入侵的激流，使它走向破产，脱离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总的发展轨道。1795年10月，割让给法国的消息传到圣多明各。那些不愿顺应新形势的居民在一年之内纷纷迁居古巴、波多黎各或委内瑞拉，在那里获得一些便利条件，开始重新创业。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圣多明各的居民一直面临法国人从岛的西部进行渗透和侵占的威胁，不得不在斗争中求生存。从圣多曼格奴隶起义的最初日子起，他们的战斗目标就是要将所有法国人从这个岛上赶走。现在听说即将受法国人统治，这对于大多数已变得强烈地亲西班牙的多米尼加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此，许多人决定移居国外。在1795—1810年之间，估计有125,000人离开该岛西班牙地区，剩下的居民比法国革命以前减少了2/3。

在杜桑的部队短暂占领多米尼加领土期间（1801—1802），西班牙人家庭移居国外的速度不断加快。法国难民带到圣多明各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消息使当地居民胆战心惊。此外，杜桑决心根除多米尼加传统的劳动制度和农业制度，这些制度是建立在畜牧业和土地粗放经营的基础之上的，只使用少数奴隶（不足15,000人），主要是当牧场上的管理员和放牧工。杜桑知道东部居民以懒惰闻名——成为18世纪法国旅行者的话题——这是支撑这块西班牙殖民地将近三个世纪的畜牧业经济的副产品。杜桑试图按照18世纪在圣多曼格发展起来的高度资本化的法国种植园的模式，将这块用于养牛的土地种植业只能自给自足）转变为精耕细作生产出口农产品的土地。但是法国由勒克莱尔指挥的大规模入侵破坏了他的全部计划，1801年1月他到达圣多明各时发布的废除奴隶制法令也未能实行。属于西班牙的东部地区的地主们宁愿拥护拿破仑派来的法国军队以恢复奴隶制，不愿接受以杜桑的兄弟保罗·卢维杜尔为首的圣多曼格黑人军事指挥官们的统治。结果，多米尼加人为了驱逐海地人，与勒克莱尔和他率领的法国军队合作。然而多米尼加人注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西部的战争随着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而告终，德萨兰及其部属就会惩

罚西班牙地区的革命敌人，并驱逐撤退到圣多明各的法国人。

德萨兰一年多以后才侵入圣多明各，因为在投入新的战役以前，他需要巩固他的地位和组织自己的新国家。但是圣多明各法军总司令让·路易·费朗发布一项法令，允许奴隶主穿越边界为他们的种植园寻找奴隶，这项法令最终招致了1805年2月的入侵。一支海地军队从北部南下，另一支经这个岛的南部海岸向圣多明各城进军。围攻从1805年3月8日开始，圣多明各城被21,000多名海地人包围了3个星期，由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合力拚死抵抗，才得以避免落入海地人之手。但最主要的原因是，3月26日，在海上出现了一支法国海军分舰队，破坏了海地人的计划。这支舰队正在袭击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英国属地，而德萨兰以为这支舰队正在考虑对海地发动新的入侵。

247

海地人解除包围，通过内地居民区撤退，一路上抢劫蒙特普拉塔、科图伊和拉贝加等城镇，屠杀莫卡和圣地亚哥的居民。他们毁坏庄稼，放火焚烧城市，把教堂夷为平地。在莫卡，仅有两个人扒在教堂的死尸堆里幸免一死（教堂是大屠杀现场）。这次大屠杀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对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后果。屠杀引起了大规模的不顾一切的移民潮，因为多米尼加人得出结论，他们由于军事力量薄弱，迟早注定要落入海地人之手，遭受该岛另一端法国人所遭受的命运。

留下来没有走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全，这种情绪广泛地削弱了法国人在以后3年中重建国家和改善经济的巨大努力。不过，边境上牛的贸易得到恢复，因为海地饲养的牛从来不够自己居民食用，需要向圣多明各购买。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双方保持了一个时期的平静。法国军政府意识到居民中亲西班牙感情的力量，因而建立了一个尊重传统法律和习俗的家长式政府。

法国人和多米尼加人之间相对的融洽1808年遭到了破坏，首先是因为费朗总督命令殖民地居民中止同海地人的所有贸易，特别是牛的贸易；第二，更严重的是由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1808年

5月2日马德里爆发反对法国人的群众起义，迅即在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在波多黎各过着逃亡生活的多米尼加人中间，成为众所周知的新闻。居住在波多黎各的富有地主胡安·桑切斯·拉米雷斯得到总督的支持，企图把法国人从圣多明各赶走。早在1808年7月，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就知道西班牙已成立洪达取代被废黜的费迪南七世，并以西班牙的名义对法国宣战。

桑切斯·拉米雷斯回到圣多明各，1808年7月至11月间全力策划密谋，招募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1808年11月7日，他组织这支军队在国家的东部同600名法国兵作战。在著名的拉萨瓦纳德帕洛因卡多战役中，法国人被彻底打败，总督阵亡。失败的消息传到 248 圣多明各城，法国人立即全城戒备，准备抵抗估计会随之而来的进攻。但是桑切斯·拉米雷斯的部队还没有力量攻下这座城市。围攻持续了8个月。在此期间，牙买加的英国人与波多黎各的西班牙人取得联系，围攻一开始，他们就封锁了圣多明各港口。

法国人由于饥饿和匮乏而被击溃，终于在1809年7月向英国海军投降。多米尼加人对此感到特别震惊，他们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同法国人作战，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国家的首都不向他们而向英国人投降。只是在经过艰巨的谈判后，英国人才同意撤离圣多明各城，但撤离前搬走了教堂的大钟和要塞最好的大炮。他们还迫使新的地方当局交付大量桃花心木材偿付海军封锁费用，仿佛这还不够，多米尼加人还得保证英国船只自由出入这个殖民地，同意让英国进口货取得与西班牙产品同等的优惠待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米尼加人的反法战争恢复了西班牙对圣多明各的统治，而此时西属美洲的其余部分却正在准备抛弃西班牙的殖民制度。而且，所谓的再征服战争（1808—1809），加上在这之前海地的两次入侵（1801和1805），使这个国家遭到彻底破坏，经济完全崩溃。作为圣多明各18世纪繁荣基础的牛群被冲突双方的军队吃光。不管付出多少努力去恢复畜牧业，19世纪始终未能恢复到18世纪达到过的出口额。现在最明显的生产活动是自

给自足农业，仅存的赚钱业务在南方是采伐和出口桃花心木材，在北方是栽培和出口烟叶。每年出口数十吨烟叶，数千张皮革，若干桃花心木材，少量糖浆和朗姆酒。进口货则仅限于不超过75,000穷困居民（不到15年前的30%）最起码的必需品。

249

在海地，独立伊始并未改变杜桑实行的政策，即仍以种植园制度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劳动者被永远束缚在土地上。战争期间留在殖民地的大部分白人已被杀死；德萨兰很快没收了白人的种植园并永远禁止白人在海地拥有自己的财产。1804年4月，他宣布1803年以前的土地买卖和赠送一律作废。以前的奴隶未经政府许可不得离开他们的种植园。这项措施很不得人心，因为它意味着从前的奴隶又下降到了无限期的奴隶地位。

德萨兰在黑人群众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他试图扩散旧的效忠关系，将他们结合进一个民族国家。必须记住，海地独立时大多数居民不是在非洲出生的（博萨尔人），就是新大陆的第一代黑人（克里奥尔人）。他们获得最起码的自由后，语言相似或同一部落祖先的人就结合在一起，谋求重新组成他们的血缘群体。此外，德萨兰从一开始就不受穆拉托人欢迎，不仅是因为他的肤色，还由于他的没收土地政策。1806年10月，德萨兰被敌人暗杀，尸体被群众扔到街头，撕成碎块。但是在他统治的两年间，没收土地的工作干得非常有效，到他死时大部分土地——估计占海地土地面积的2/3至9/10——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

德萨兰死后，冲突再次爆发，1807年海地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互相敌对的部分。在北部，黑人将军亨利·克里斯托弗继续奉行他的前任杜桑的政策，企图原封不动，保留种植园和它们的劳动力。但是他在这个政策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以利于增加农业生产和出口、国家的实力和繁荣。克里托弗的办法是，允许他的最重要的将军和官员出租或经营种植园，他们必须保持规定的生产水平，将1/4的产品交给国家，将另外的1/4作为工资付给种植园工

人，其余50％全部归己。1811年克里斯托弗改组他的政权，把它变为王国。他的主要战友们过去接受了他授予的不动产，如今又有机会获得多得不胜枚举的贵族头衔。在克里斯托弗轰动一时的统治时期，列举这些头衔成了赴海地的英国游客的重要消遣内容。克里斯托弗的统治使海地王国成为19世纪拉丁美洲最别出心 250 裁的政治试验品。他模仿当时的欧洲朝廷创立了一个“非洲”朝廷和贵族制度。克利斯托弗在建筑上的杰作也是有名的。他在米洛建造无愁宫用来接待赛客和展示他的宫廷礼仪；为了保卫他的王国，防范法国人的袭击（他始终认为法国人会进攻他的都城——前法兰西角），他在拉费里耶尔建造了一个庞大的要塞，堪称世界奇迹之一。

克里斯托弗成功地使海地北部过去的种植园再次提高生产，并使出口保持在高水平上。大多数农村居民继续留在种植园内，军队担任监督生产的任务，防止获得自由的奴隶重犯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毛病。克里斯托弗和他的黑人和穆拉托上层人物下定决心，决不让海地王国仿效德萨兰死后在西部和南部实行的那种激进变革。在那里，一些不同意克利斯托弗主张的将军——大部分是已获自由的奴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推举穆拉托将军亚历山大·佩蒂翁为总统。

共和国政府开始出售国有土地给个人私有，后来又分配小块土地给军官和士兵，分配面积按等级而异。佩蒂翁用这种办法把他的官兵（无论是穆拉托人还是黑人）都转变为地主，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他们的效忠。他还将德萨兰没收的大种植园发还给它们的穆拉托主人，从而也获得了这个阶级的拥护。佩蒂翁相信，通过分配土地给军队，他已保证共和国免受北部入侵，也保证了国内和平。早在1809年，海地南部和西部的土地就已经回到私人手中，由自由劳动者耕种，他们的劳动不再受过去德萨兰时期的农业监督人员监督。

海地共和国将土地划分成小块的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

大部分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只求自给自足，不种植出口作物，特别是不再种植甘蔗、可可、靛蓝等需要复杂的加工和销售过程的作物。结果是，随着许多以前的种植园蜕变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国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出口作物生产日趋萎缩，只种家庭食用所需的庄稼，或者干脆让小块土地闲置不种，因为无人强制他们耕种。此外，如今每人都有了自己的土地，无人愿意再去为那些大范围种植甘蔗、咖啡、棉花、可可的大地主劳动。

损失最大的农作物是甘蔗。例如，1818年佩蒂翁逝世时，糖的年产量已降低到不足200万磅，而在杜桑时代年产量达6,000万磅。靛蓝是劳动密集型作物，因而已完全停止种植；棉花减少到以前产量的5％。只有咖啡生产尚能保持，使共和国免于完全破产。咖啡生产速度下降较为缓慢：1818年的产量尚未降到过去水平的1/3以下。

1818年，佩蒂翁的秘书兼部长让-皮埃尔·布瓦耶将军继任共和国总统。两年后，1820年10月，北部的亨利·克里斯托弗国王在出席一次礼拜仪式时突患中风。他的病倒为他自己的亲信进行反对他的密谋活动提供了机会，他的专横和为了完成他的要塞工程而强加在全体居民身上的艰巨劳动使人厌恶已极。克里斯托弗发现这次密谋时，感到被人背弃而自己无能为力，因而在群众公开起义，放火焚烧他的无愁宫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地北部的起义者招请布瓦耶北上，他迅速率领军队进发，于1820年10月底占领海地角城——前法兰西角，1820年改称亨利角。

海地北部和南部两个形成对比的政权绝然不同的生产水平如今变得更为明显：布瓦耶进入克里斯托弗的金库，发现库内积储达1.5亿金法郎（合4,500万海地古德）。佩蒂翁制造了一个拥有他所分配的土地的自由农民阶级，但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克里斯托弗使国家富裕，却使群众再受奴役。布瓦耶使海地重新统一。他颁布命令，将所有可耕地和种植园分配给北部黑人群众，从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分配办法仍按照佩蒂翁早些时候在海地南部的分

配比例，也就是按照每个人的身份（是军官、普通士兵还是种植252园工人）发给他一小块土地。在经济上，上述措施产生了在南部和西部产生的同样后果。

布瓦耶一面在海地北部实施他的政策，一面将眼光投向这个岛的东部。西班牙又在那里统治了12年，仍无法使这个国家摆脱重新征服战争所造成的贫穷。许多人正在寻求西班牙美洲其他属地正在取得的政治解放。事实上，自1808—1809年战争以来独立运动一直在酝酿之中。某些克里奥尔人象海地人1804年所做的那样，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思想所吸引。另外一些人则受到1810年4月加拉加斯走向独立的行动的影响，这个消息是《加拉加斯日报》传到圣多明各的。这个消息引发了若干次武装暴动，其中的一次以“意大利人叛乱”著称，因为主要领导者的原籍是意大利。大约4个月以后，4名原籍法国的中士发动另一次性质不同的叛乱，他们计划发动政变，恢复法国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但这些流产的叛乱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1812年由一批黑人领导的在圣多明各城近郊发动的叛乱。他们有的是奴隶，有的是自由民，打算发动这块殖民地所有有色人种进行起义，按照海地的模式屠杀所有白人。

但是19世纪初的多米尼加与海地有很大不同。自由穆拉托人，（他们感到自己同西班牙人的关系较之同自己出身的奴隶关系更加密切）和贫穷白人，在不超过75,000人的全体居民中占大多数，过去几个世纪的贫困使全体居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拉平，种族问题不很突出。法国革命以后的20年间，圣多明各进一步被战争搞得民穷财尽，移民外流使国家更加衰落。人们都希望皮肤不要纯黑，这一点很重要，至少不要黑到被人当作奴隶或海地人。多米尼加的穆拉托人已经获得与白人十分接近的社会地位，尽管还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平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出生的白人”（blanco de la tierra）这个词汇开始使用，意思是多米尼加的西班牙人，也就是自己思想上觉得与西班牙等同的克里奥尔人。和加

勒比海其他地区一样，圣多明各的穆拉托人一点也不愿意被人当做黑人。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几次黑人起义或奴隶起义在居民中得不到普遍支持的原因。

253

与此同时，费迪南七世1814年复位后，多米尼加人对他的忠诚很快开始减弱。他们希望从宗主国得到的援助只是从哈瓦那国库送来的那点补贴，每年从未超10万比索。这点财政补贴甚至还不到法国革命前那些年这块前殖民地的费用的1/3，连军队的吃饭穿衣也不够。军队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马德里当局许诺给那些曾与法国人作过战的军人的奖赏从未兑现。圣多明各其余的居民只得节衣缩食，靠同一些西印度岛屿（特别是库拉索岛和圣托马斯岛进行少量桃花心木材、烟草和皮革贸易谋生。

所有这一切，让-皮埃尔·布瓦耶都知道。他还知道有些多米尼加的团体赞成与海地合并，以便于岛的西部分之间进行牲畜贸易。1820年有谣言称，圣多明各的一些公民为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所鼓舞，正在计划发动政变，实现独立。同年，一份在加拉加斯起草和印刷的颠覆性宣言在圣多明各流传，号召多米尼加人奋起反抗。与委内瑞拉的联系十分频繁，士兵、官员和商人都对西班牙无力改善他们的状况感到厌恶。由此产生的几次密谋使海地的上层统治阶层特别感到鼓舞，他们自杜桑时期以来从未放弃过合并全岛由一个政府治理的前景。多年来亨利·克里斯托弗一直企图引诱圣多明各北部居民加入他的王国，但是德萨兰对多米尼加人的屠杀记忆犹新，在这次行动中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军队也曾插手，因而使合并受得阻碍。然而，现在海地有一个自由派政府，由一位穆拉托人当总统，他许诺免除牲畜贸易的关税。现在既然圣多明各居民中普遍存在对西班牙的不满情绪，说明联合的时机已经成熟。

说服布瓦耶及时采取行动的是这样的消息，据说一群法国冒险家正在马提尼克岛组织一次对海地的新入侵，要收回白人在20年前失去的种植园。这些冒险家计划先攻占软弱的圣多明各，然

后要求法国派遣军队收复圣多曼格。圣多明各的守备部队根本无力抵抗外部攻击。此外，海地人怀疑西班牙可能会和法国合伙，帮助它夺回以前的殖民地。

254

面对对海地独立的新威胁，布瓦耶立即着手备战，同时试图拉拢本岛东部居民反对西班牙，加入海地共和国。1820年12月，消息传到圣多明各，布瓦耶的代理人正在边界地区向愿意支持这个计划的领导人授予军衔、政府机关肥缺和土地。与此同时，在圣多明各的官员甚至军人中，另一个独立运动开始沸腾起来，那里的克里奥尔白人受到西蒙·玻利瓦尔的成就的鼓舞，如今也变得热心起来。这两个运动——一个在边境地区支持海地，另一个在首都以独立为目的——整个1820年和1821年一直在独立地、平行不悖地向前发展。最终于1821年11月8日，在边境城市贝莱，一批支持海地的人在安德烈斯·阿马兰特斯少校领导下宣布独立，并号召圣多明各城以北各城镇加入海地共和国，几天以后，首都的独立运动领袖唐·何塞·努涅斯·德·卡塞雷斯听到了这个消息。努涅斯·德·卡塞雷斯过去12年一直在这个殖民地的西班牙省长手下任高级官员，所以他能够非常熟练地控制殖民地的行政和军事机器。他完全适合受过教育的、对政府不满的克里奥尔人的要求：在一名西班牙任命的官员手下当副手；由于西班牙完全不能解决他的阶级或他的国家的任何问题而与之离心离德。

由于边境地区已经宣布独立并与海地合并，努涅斯·德·卡塞雷斯等人立即认识到，如果他们要使圣多明各独立并作为一个国家参加当时西蒙·玻利瓦尔正式试图建立的大哥伦比亚邦联的计划取得成功，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大胆地提前政变日期，依靠首都军队的支持，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西班牙省长唐·帕斯夸尔·雷亚尔。1821年12月1日凌晨6时，他们的炮火齐鸣，惊醒了圣多明各城的居民，宣布西班牙在圣多明各的殖民统治的终结，建立“独立的西班牙语海地国”

宣布成立“独立的西班牙语海地国”时，正好布瓦耶总统的

225

王位使节到达圣多明各，他们来的目的是要通知西班牙当局海地政府决定支持边境地区的独立运动。这里刚发生的情况对海地政府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海地正受到法国从马提尼克经过圣多明各向它入侵的威胁，而如今圣多明各根本得不到西班牙的军事或外交保护。因此，1822年1月初，布瓦耶根据海地参议院授权把军队开进这个岛的东部以防卫边境城市并完成全岛的政治统一。为了避免流血，布瓦耶给努涅斯·德·卡塞雷斯送去一封长信，要他相信在这个岛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分裂的独立政府。

与此同时，布瓦耶宣布他正率领一支12,000人的军队，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他前进。努涅斯·德·卡塞雷斯和圣多明各市政当局仅有数十名营养不良、装备低劣的士兵。面对上述情况，他们明白别无选择，只好依从布瓦耶总统的要求；于是他们通知对方，完全同意置自身于海地共和国法律保护之下。其实，圣多明各运动的领导者已派出一名信使去加拉加斯，希望会见玻利瓦尔，让他知道他们已决定加入大哥伦比亚。但玻利瓦尔当时不在加拉加斯，副总统派斯接见了多米尼加密使，但他无权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1822年2月9日，布瓦耶到达圣多明各城。他在市政府大厅受到文职官员和天主教会当局的接待，被授予城市的钥匙，然后所有的人前往大教堂，在那里齐唱上帝颂歌。

就这样，结束了西班牙对圣多明各的殖民统治。就这样，本岛东部地区经过短暂的独立以后，开始了海地对它的持续22年的统治。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两个民族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整整达一代人之久。海地统治时期将法国大革命思想带给了圣多明各，它打碎西班牙归殖民政权建立了全岛政府。这个政府受当时共济会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君主政体，反对奴隶制。与此同时，布瓦耶总统树立了对他个人的政治崇拜，1816年海地宪法规定他是终身总统。海地在这些年月中贫穷闭塞，是个戴着王冠的共和国，各种机关只是表达总统意识的工具。他的权力基础归根

256

结蒂是军队。

布瓦耶控制圣多明各后在1822年2月作出第一个官方决定：下令在该岛东部地区废除奴隶制并向所有自由民提供土地，让他们能够在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自由耕种，自食其力①。政府希望他们种植咖啡、可可、甘蔗、棉花、烟叶和其他出口农产品。然而，不仅在东部推行了3个世纪之久的西班牙财产法与来源于法国法律体系的海地法律不同，耕作制度也完全相异。自佩蒂翁时代起，海地的土地私有权由国家发给个人的土地证作为保证，而在这个岛的西班牙语地区，主要的制度是公社土地所有制(terr-
257 enos comuneros)。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多和粗放的使用方法（主要用来养牛和采伐木材）土地所有制很不规范。于是，在东部产生了许多土地难以确定所有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自由民不得不等待一些时间才能得到布瓦耶在1822年6月15日公告中再次许诺发给他们的土地。

在此期间，那些希望脱离他们的主人取得自由的前奴隶，一时无所依托，只得应募参加海地军队。为此，建立了所谓第32步兵营，它和由有色人种自由民组成的第31步兵营一起，成为负责东部地区安全的主要军事力量。

为解决国家手里需有土地分配给以前的奴隶的问题，布瓦耶于1822年6月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同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提出下列财产属于国家：

---

① 让·皮埃尔·布瓦耶、《关于海地总统指示的通报。致：阿苏亚的弗雷泽上校，巴尼的霍古上校；塞贝的普雷、索上校，并致圣让的伊斯纳第指挥官，拉马特的萨拉丁指挥官。关于他们的任务和职责，圣多明各，1822年2月11日》，载林斯登特·德·普拉廷编《海地政府法规总汇编》(巴黎，1851—1865)，第3卷第448—456页。同时参阅让·普里斯·马尔斯著《海地共和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太子港，1953)，第1卷，第198—300页；何塞·加夫列尔·加西亚著《圣多明各历史简编》(4卷本，圣多明各，1968)，第2卷，第93—94页，本书对《通报》部分内容作了评述。

（1）过去属于西班牙王室的土地；

（2）女修道院的地产，连同有关房屋、农场、牲畜、庄园和建筑地基；

（3）教会医院的建筑和附属建筑，连同有关庄园；

（4）被西班牙政府征用的法国人财产，尚未归还原主者；

（5）在1808年萨马纳战役中与法国人合作的人的财产，以及登上法国分舰队船只迁居国外的人的财产；

（6）免役地租和因年久而倒塌的或未倒塌而已归还教区金库的教会建筑；

（7）为大教堂利益而抵押的土地。

布瓦耶将报告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1822年11月7日，两院批准报告。圣多明各的总司令兼总督J.-M，博赫利亚将军将批准解释为已使报告中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此后，他就专心致志去没收名义上产权属于教会、实际上18世纪末以后已归私人所有的财产。海地总督剥夺他们的庄园和房屋，把它们分配给新解放的奴隶，以低价出售给他自己的朋友，或交给海地的士兵、军官和官僚。

258

为了安抚受损害的各方面人士，布瓦耶于1823年1月22日又任命一个委员会，责成它研究这个问题，并设法平息财产被国家没收的东部居民的不满。摆在这个委员会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大问题：签订巴塞尔条约后，大主教和各修道会纷纷离开这个岛屿，在这以后的25年多的时间内，教会财产产权问题变成了一团乱麻。这些年间，许多多米尼加人在民政当局的同意下占有了这些土地和建筑。西班牙的土地法规定，凡占有土地20年产权即归占地者所有。

为进一步澄清局势，1823年2月8日布瓦耶又颁布法令，凡原在西班牙地区拥有土地，但已于1822年2月9日以前移居国外的居民，除在萨马那密谋事件中曾与法国合作过的人以外，均可在4个月内回国申请归还他们的财产。驻守东部的士兵奉命没收那些不

愿回国的多米尼加人的财产。不出所料，大多数出国的人都继续留在国外，于是他们的财产（在许多情况下由他们的亲戚占有）被没收。

在海地占领一整年以后，多米尼加居民中一些重要阶层极端不满。特别是海地的土地政策使白人地主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圣多明各的大主教在不满者的名单上名列榜首：天主教会的财产已被收归国有；而且，1823年1月5日起布瓦耶中止支付薪金给大主教和大教堂其他神职人员。

1823年发现了几起效忠西班牙王室的密谋事件。政府还镇压了一次反对监督工人修复圣地亚哥—普拉塔港公路的海地军队的暴动。最危险的是1824年2月间策划的一次密谋，但被及时发觉，政府判处4名领导人死刑，3月9日在圣多明各城把他们绞死。接着又有一批家庭逃往波多黎各避难，一时无法制止。但是最近这一次外迁浪潮很符合政府的计划，因为外迁增加了可以用来分配的土地。

1824年7月，布瓦耶颁布一项法律：

“应确定东部地区哪些动产和不动产属于国家；关于东部地区的私人，应根据共和国其他地区已建立的制度制订有关地产的法律；还应给予圣多明各大教堂神职人员中的高级教士适当补偿；应向女修道院已被解散的修道会成员提供生计。”①

在政府看来，根据这项法律，共和国所有居民都将有权获得自己的土地，领到政府发给个人的土地证。

为了确定哪些地产应永久列为国家财产并确定它们的明确边界，布瓦耶决定进行一次土地普查。同时为了一劳永逸地确定所有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布瓦耶责成他的代理人收回西班牙地区原有的土地证，以利重新分配。用这个办法，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份应得的土地，并以新土地证更换旧证。

① 林斯登特·德·开拉廷编《总汇编》第4卷，第15—50页。

根据这项法律，每个人至少可以分到5“卡罗”土地（“卡罗是新订的土地面积单位，每“卡罗”大约相当于5公顷，后来多米尼加人称它为“布瓦耶拉纳”〔boyera na〕）。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新土地上除了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外，政府要求他们主要种植出口作物。如果土地所有者不想把全部土地投入生产，则要求他将土地转让或出售给新的所有主。此外，禁止在不足5“卡罗”的土地上养猪或建畜牧场——养牛如果真想有利可图，必须至少有这点土地。

总之，1824年7月法律的目的在于消灭公社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制度下，东部的土地完全不受国家控制；同时它试图将每一个农村居民转变为自耕农，有他自己的土地，而且法律要求他必须耕种。这项法律是对圣多明各特有的土地占有制度的一个直接打击，它的实施意味着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大都是殖民地时代传下来的西班牙王室封赠的土地）分成碎块，其中一部分分给他们从前的奴隶和海地来的移民。

260

过去一些年由于殖民地经济衰落，许多大土地所有者债台高筑。布瓦耶为讨好他们，打算减少他们用财产抵押欠教会的债务。教会的财产和放贷的资金，如今已属于国家，现在政府宣布仅须偿还贷款本金的1/3。为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已经减轻的债务，布瓦耶给大土地所有者3年宽限期。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每半年偿还一次他们尚欠国家的本金，逐步还清他们的抵押欠款。

对于各修道会教士和属于教堂的世俗教士，国家补偿他们每人每年24000比索，大主教本人每年补贴3,000比索，因他过去所受损失最大。即便如此，大主教永远也不会宽恕布瓦耶，破坏多米尼加的教会。他拒绝接受发给他的补贴，对海地政府坚持公开的敌对态度，毫不动摇。

使布瓦耶和其他军队领导人吃惊的是，大主教反对他们时并不孤立。他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不了解种植可可、甘蔗或棉花的目的。他们宁可致力于过去数十年已经证明有利可图的生产活

动——在南部采伐桃花心木，在中部锡瓦奥河谷种植烟叶，在东部辽阔的土地上放牧牛群；他们的产品保证有出口市场。

此时，海地的穆拉托上层人士对国家的日益贫困开始感到惊慌。1826年5月，布瓦耶向海地参议院提出一连串改革海地农业经济的法律草案，基本原则是，种地为农民应尽的义务，逃避种地必须受到惩罚。这一组以《农业法典》著称的法律的目的是，把海地经济的生产力提高到德萨兰时代的水平。除政府官员和公认的专业人员外，不允许任何人放弃耕种他的土地，也不准离开他许活和劳动的庄园，除非获得当地治安法官或地区军队司令官的生可。甚至种植园主也无权允许工人离开工作超过一个星期。农场工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主，他就必须为他的雇主至少劳动3年。他若提前离开，将受罚款、监禁或强制劳动等严重惩罚。绝对禁止游手好闲。为了充分实行这些措施——还有更多的规定，目的都是要把工人束缚在种植园内——军队奉命派士兵驻守在每一个种植园监视工人。担负这个任务的士兵，由种植园主提供给养。

当时，这个法典被认为是海地立法的杰作。但是，尽管政府认为毫不拖延地执行这个法典好处很多，它从未充分实施。在海地农村工人根本不予理会。自从克里斯托弗和德萨兰时代以来，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小庄园农民阶级——他们是小块土地所有者，只对自给自足农业感兴趣，他们的利益与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完全对立，尤其是决心不再象农奴那样为大庄园劳动。此外，军队也决不是支持治安法官在农村强行实施法典的合适代理人。

首先，大多数士兵本身就是小自耕农出身。其次，在法典颁布的前一年（1825年），经过长期和曲折的谈判，并在停泊太子港的11艘法国战舰进行炮击的威胁下，海地政府最终与法国签订条约，同意赔偿法国殖民者的损失，作为交换法国承认海地独立。条款是苛刻的，但是它解除了军队自革命以来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肩负的责任：18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防备着哪一天法国可能会入侵，使每个人再次沦为奴隶。此后军队很快变得纪律

松弛，士兵们现在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农场和家庭，而不是到种植园去监督工人，因此，农业法典颁布后需要这个纪律严明的实体帮助实施法典时，这个实体却已腐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还希望这部法典成为提高海地出口收入的手段，以便能付给法国1.5亿法郎（平均分五次付清），这是条约规定的补偿前殖民者的赔偿。这一条，连同一些商业上的让步，就是法国承认海地独立的条件。

262

海地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钱来支付给法国的第一期赔款：海地国库已一无所有。因此，布瓦耶与一家法国银行签约贷款3,000万法郎，以支付1825年12月31日到期的第一期赔款。同时，他宣布这笔贷款为国债的一部分，并颁布一项法令对这个岛的东、西两部分征收特别税。

这项法令在东部居民中激起强烈的对抗。《查理十世命令》（1825年4月）清楚地说明，应该每年分期支付赔款的只是原法属地区的居民，但是如今东部居民估计每年要分摊458,601古德去偿还他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债务。海地人的情绪也被布瓦耶的政治反对派鼓动起来，他们普遍地拒绝纳税去购买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在革命中用武力赢得的独立。布瓦耶为了得到现款，不得不发行纸币，结果引起通货膨胀，不到两年，海地古德贬值250%。经过一段时间后，古德在国外彻底地丧失了信用。为此，1827年底布瓦耶又不得不向一家法国银行乞求一笔新贷款，这家银行利用海地的经济困难，勒索特别高的利率和佣金。布瓦耶不但使国库完全枯竭，而且从此在海地的穆拉托上层人士中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对派，他们感到布瓦耶同法国签订的条约条款使他们受到屈辱。

在以后的年月中，特别是1832年以后，这种不满在国会中由议会反对派领袖，尤其是由人数不断增多的青年律师表达出来，他们受到在路易·菲利浦的法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改变自建立海地共和国以来始终占上风的政府制度。政治冲突越来越多地与暴力相伴随。1833年8月，布瓦耶政府将两名主要反

对派领袖——埃拉尔·迪梅斯勒和大维德·圣普列——逐出国会。但是随着反对政府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普遍，反对派代表1837年重新被选进国会，而且获得了新的支援，增加了新的攻击内容。经济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6月间，审查国家财政状况的委员会报告称，农业生产实际上陷于停滞。海地的主要农产品咖啡的生产已经令人惊讶地连续3年下降：从1835年的4800万磅下降到 263 1836年的3,700万磅，1837年的数字也不能指望好转。事实上，1837年的产量下降到仅有3,100万磅，一个原因是这一年大部分时间全国干旱。

与此同时，东部反海地情绪日益加深，这是政府实行多米尼加居民海地化措施的结果，如全岛成年男子强制服兵役，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西班牙文，要求各地初等教育使用法语，限制庆祝传统宗教节日，甚至限制斗鸡。布瓦耶非但不放弃保持统一的努力，反而在1830年6月下令对公共大道、教堂和修道院的所有西班牙标志和盾形纹章一律换成共和国标志。他向军队指挥官解释说，"共和国的利益要求东部人民尽快改变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采取共和国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使两部分的合并臻于完善，使以前存在的差异立刻消失①但是，最主要的是海地在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组织方面的政策和立法，使反对的火花在东部不断燃烧。

布瓦耶发现，他越是强迫土地所有者将土地证交给当局，由当局根据1824年7月8日颁布的法律确定他们的合法地界，他们每个人就越坚决、顽固地进行对抗，而且通过与海地政府有交往的多米尼加显要人物提出抗议。而对这种做法，一年年过去了，除过去属于教会的或拒绝回国的多米尼加出国移民的地产外，布瓦耶未能为国家接收任何地产。尽管海地当局不断要求，到1834年仍

---

① 让·皮埃尔·布瓦耶《值此东部地区侵入共和国之际，用法文和西班牙文致人民的公告》，载林斯登特·德·普拉廷编《总汇编》第3卷，第452—455页。

未能说服大土地所有者交出他们的土地证。因此，在那一年的4月7日，布瓦耶发布决定，再给土地所有者一个宽限期，要他们在限期内将土地证交当局查验。

这次决定实际上是个最后通牒，威胁谁不遵照规定，就要取消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决定的目的是一举废除多米尼加的土地制度。这次决定使多米尼加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惊慌。他们向负责实施这次决定的当局提出呼吁。布瓦耶为了消除磨擦，不得不在1834年8月宣布，具有用益权＊的占有人遵守四月决定不受时间限制；但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对政府的意图仍很不信任。

1838年7月16日，圣多明各一批青年人（有些是商人或商人子弟）聚集在一起组织一个秘密团体，目的是组织多米尼加人起来反抗，争取东部地区与海地共和国分离。这个团体名“拉特立尼塔里亚”（La Trinitaria），＊＊由商人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领导。它通过紧张的宣传吸收了圣多明各城的大多数青年人（他们的家庭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海地政府各种立法或军事决定的伤害）。“拉特立尼塔里亚”团结了所有布瓦耶的反对派，在圣多明各的居民中间培养了一种新的革命意识，而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上是冷漠的。这样，在1838—1842年间，当海地人继续在立法机构中进行斗争，企图迫使布瓦耶实行政权自由化和改善海地经济条件的时候，多米尼加人组织了一次秘密的运动，去实现他们的独立。

在西部，海地的反对派也组织起来，成立了所谓“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协会”，在埃拉尔·迪梅斯勒领导下进行驱逐布瓦耶总统的斗争。这个海地自由派团体经常利用在南部和西部穆拉托主要领导人家中举行宴会的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在那里反对布瓦耶已成为传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扎下很深的根。这些“爱国者的宴会”多选择在热雷米和莱凯两地举行，当时它们是反政府情

＊ 用益权（usufruct），指在不损害产业的情况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效益的权力。——译者

＊＊ La Trinitaria，意译为“三位一体社”。——译者

绪的中心。布瓦耶政府的管理不善已暴露无遗。尤其是，反对派领袖向自耕农许诺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有利的市场，给他们创造用低得多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的机会。

1842年5月7日，北部两个最重要的城市海地角和圣地亚哥发生地震，遭受严重破坏。这次地震的一个后果是增强了反对布瓦耶的情绪，人们指责他对人民的灾难无动于衷，他本人没有亲自去向受难者表示同情。1842年9月，"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协会"联合海地反对派领袖，散发一个宣言，针砭时弊，严厉攻击布瓦耶，还抨击当时仍有效的1816年宪法。同年11月21日，起义已准备妥当。那天，密谋者们推选夏尔·埃拉尔将军为领导，等待适当时机发动攻击。

反对布瓦耶的起义于1843年1月27日爆发。人们称这次起义为"改革运动"。正如所期望的那样，它迅速扩展到海地整个南部。布瓦耶下令军队动员，但是南部的居民拒绝出售或供应给养和食品给政府军队。这就决定了革命的结局，因为这使布瓦耶失去了守住太子港的军事手段。3月13日夜8时，布瓦耶登上一艘英国双桅纵帆船偕同他的家人流亡国外。他放弃掌握了25年的权力，将政府交给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它后来把权力移交给革命者。

1843年3月24日下午，布瓦耶下台的消息传到圣多明各，那里已经弥漫着激动和密谋的气氛。这个消息成为一个信号，反对派政治团体走上街头，高呼圣多明各独立和改革。在发生了那么多事变和骚乱以后，亲布瓦耶当局不得不投降，于3月30日将城市移交给"人民革命洪达"。

1843年4月间，来自圣多明各和太子港的消息和指示到达东部各地，自由派领导人纷纷建立群众性洪达，公开宣布其目的为保卫"改革运动"。在上述活动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利益集团。与布瓦耶的垮台同时，在东部至少出现两个不同的独立运动组织。一个由"拉特立尼塔里亚"分子和自由派组成，由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领导，得到桑塔纳家族成员的支持。桑塔纳是东部经

营养牛业的富裕家族，他们指望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或帮助下实现独立。另一个由年龄较大的人组成，大多数曾在海地政权下担任行政职务；他们主张在法国的帮助下结束海地统治，以政治、关税和领土方面的让步作为回报。

东部支持独立的政治骚动不断增长。1843年7月，海地政府发现了一个由“拉特立尼塔里亚”组织的、谋求实现分离的广泛密谋。埃拉尔总统迅速采取行动挫败了这个运动，并率领军队进入东部各个城镇。他在每个城镇对“拉特立尼塔里亚”采取反击措施，把他们逐出群众性洪达，逮捕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送往太子港作为人质。这次军事扫荡使“拉特立尼塔里亚”的密谋活动一时陷入混乱，杜阿尔特不得不逃亡国外，他的伙伴们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活动。

266

当时，那个亲法国的团体在政治活动的真正中心太子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地下活动。它的主要领导人已当选为制宪会议代表，他们抓住这个机会与法国领事皮埃尔·勒瓦瑟进行接触，敦促他支持原来的计划，即东部脱离海地并将其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将东北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萨马纳半岛割让给法国。在勒瓦瑟的鼓励下，他们选定1844年4月25日这一天发动反对海地人的政变。“拉特立尼塔里亚”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计划于1844年2月20日宣布多米尼加独立，也就是比他们的对手决定的日子早两个月。1844年1月1日，亲法团体发表宣言，陈述导致他们谋求在法国保护下脱离海地共和国的理由。两星期后，1月16日，“拉特立尼塔里亚”也公布他们的宣言，鼓动多米尼加居民奋起反抗海地人，同时公布一份多米尼加人受侮辱的记录，据他们判断，这是海地人在过去22年中使他们遭受的痛苦。

这两份宣言概括了东部人民的感情，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无论在语言、种族、宗教和习俗方面都与西部居民完全不同。两份宣言在全国流传，它们的作者控诉海地人最卑劣的罪行，激起群众对海地人的仇恨。至1844年2月中旬，两个团体的分离主义宣传

已把东部居民特别是圣多明各城人民的情绪，提高到狂热的顶点，双方都在部署自己的政变。“拉特立尼塔里亚”的政变被迫推迟一个星期，最终在1844年2月27日午夜发动。翌日，圣多明各的海地当局发现自己已无能为力，只有请求让他们离去。

圣多明各的1844年2月27日政变立即在海地引起反应，埃拉尔总统的政府（它本人发动的革命也还在进行之中）不能容忍国家被一分为二，而况东部的分离将减少偿还尚欠法国的债款所需的财政收入。因此，埃拉尔决心武力镇压多米尼加的起义，象他去年夏季所做的那样。

1844年3月19日，埃拉尔亲自率领海地军队，从北部侵入东部省，向前推进直抵圣地亚哥，但因损失惨重被迫立即撤退。太子港也普遍发生由布瓦耶前拥护者发动的骚动，结果埃拉尔垮台，5月2日由上年纪的黑人将军菲利普·盖里耶取代。

盖里耶将军目前处于控制海地政治的地位。但是他的政府为错纵复杂的困难所困扰，排除了再次入侵东部的任何可能性，但他还是忙于发表宣言，号召多米尼加人与海地共和国重新联合。菲利普·盖里耶掌握海地的统治权还不到一年，于1845年4月死于高龄，由让-路易·皮埃罗将军继任。皮埃罗决心洗雪圣地亚哥城下之耻，维护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皮埃罗总统立即重组军队，再次向多米尼加进攻。但是他在第2次进攻中发现多米尼加人已经比前一年准备得更好：胡安·巴勃罗·杜阿尔特掌权仅数日即被强制流亡，由佩德罗·桑塔纳所取代。桑塔纳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位军事考迪罗和以后20年政治舞台上的权威人物（他于1844—1848年，1853—1856年，1858—1865年三度任总统）。海地1845年的攻势在边境被挡住。1846年1月1日皮埃罗再次宣布对多米尼加进行讨伐，但是他的军官和士兵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这次新的征召。于是，一个月以后——1846年2月——当皮埃罗命令他的部队向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军时，海地军队发生哗变，它的军队宣布共和国总统已被推翻。

268

在海地，反对多米尼加的战争已变得极不得人心。新总统让-巴蒂斯特·里付将军已无力部署另一次入侵。皮埃罗的垮台已在农民中激起一次革命暴动。内战再次爆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海地人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问题。

自1843年布瓦耶垮台以来，农民运动的主力在海地南部的莱凯。三位黑人农民领袖——让-雅克·阿卡于、D.萨莫、让-克洛德——谴责穆拉托人在海地的政治领导权，主张首先将富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进行分配。他们的由农民杂乱拼凑的非正规军队以长矛、砍刀和梭标为武器，当时称为"皮凯人"。* 由于重新提出了海地政治上令人烦恼的种族和肤色问题，穆拉托上层人士感到胆战心惊，因而增加了总统职位应由一位黑人将军担任的观点。因而太子港的穆拉托政治家们挑选了年长的黑人将军盖里耶、皮埃罗和里什，以便让海地的黑人群众感到他们的政府是代表他们的。但实际上是穆拉托人在幕后操纵。这就是所谓的"替角政治，"也就是说，在政治上使用替身演员，以黑人军人政府占据舞台，让人看不清他们不过是一些按照穆拉多人的指示行事的傀儡。

由于皮埃罗作出了各种政治让步，阿卡于和他的"皮凯人"有几个月保持平静。但是当阿卡于看到他的政敌里什当选总统时，他就发动叛乱，海地再次陷于内战。政府猛烈镇压"皮凯人"，阿卡于死于非命。但尽管如此，这次叛乱在以后两年中一直吸引着海地，暂时分散了它的统治者对多米尼加问题的注意力。

269

多米尼加人虽在1845年战役中打败了海地人，他们的领导人依然确信，他们的共和国不可能避免被海地重新占领的危险，除非接受一个强国的合作和保护。因而1846年5月派出外交使团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政府谈判承认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同

---

* 皮凯人（piquets），指农民出身的职业士兵，来自海地北部的称为"卡科人，"来自南方的称为"皮凯人"。——译者

时，准备同无论哪一个强国缔结友好和保护条约，只要它能提供最有效的援助。使团在欧洲进行的谈判并未立即产生结果，因为当时西班牙政府仍相信它或许重申对圣多明各的宗主权。所以它拒绝承认多米尼加独立，而且毫不妥协，也不同意它成为任何种类的保护国。法国政府，后来还有英国政府，只同意向圣多明各派出领事代表它们的利益。在此期间，海地总统里什在掌权没有几天即于1846年2月27日去世，并由一位不出名的军官福斯坦·苏卢克将军继任。苏卢克缺乏政治经验，而且没有受过教育，海地的政治家们却把他看做一个理想的工具。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能够通过苏卢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在苏卢克政权的头两年，他面对多次密谋事件和反对活动，使多米尼加人获得了更多喘息时间来继续重组他们的国家。1848年，法国终于承认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同它临时签订了一个和平、友好、商务与航海条约，海地立即提出抗议，声称这个条约是对他们自身安全的进攻；他们担心该条约将使法国获得占领萨马纳湾的权利。此外，法国承认多米尼加独立减少了海地重新占领东部地区的可能性，海地将因而丧失对多米尼加资源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这些资源正是它根据1825年条约向法国偿付债务（以交换法国承认海地独立）所迫切需要的。苏卢克决定在法国政府批准条约以前入侵东部。没有浪费时间，1849年3月9日，15,000人分成几个军团，由最杰出的海地军官指挥越过边界。在一次势不可挡的猛烈攻击中，海地人一个接着一个占领边境城市，直至4月21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时，苏卢克和他的部队败北，被迫仓惶撤退。

270

独立战争的几次早期战役使多米尼加的经济陷入严重混乱，在圣多明各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从一开始，多米尼加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就设法向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美国争取援助，反抗海地入侵。法国和美国都渴望接管萨马纳半岛和萨马纳湾，但又都希望阻止对方捷足先得。另一方面，英国的利益要求保证法国和美国都得不到萨马纳，希望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成为自由国

家，不受外部干涉。在贸易上英国和这个新共和国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1850年英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缔结了和平、友好、商务和航海条约，以后几年，经过它的领事罗伯特·朔姆布尔克爵士的努力，在那里建立了商业霸权地位。英国知道，一旦法国或美国占领萨马纳并建立保护制，它将丧失贸易上的有利地位。为此，英国在太子港向其他国家的代表做工作，说服苏卢克与多米尼加签订一个有效期为10年的停战协定。结果，苏卢克签订了一个有效期仅两个月的协定，但外国使节向他施加的外交压力有效地防止了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达数年之久。苏卢克把他的军事动员活动限制在海地边境一边。自1851至1855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它们的边界地区保持了相对的和平。

两国之间的和平后来由于多米尼加主动与美国谈判签订友好、商务和航海条约而受到威胁。这项条约的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割让或租借萨马纳半岛给美国。尽管英国和法国领事反对，谈判继续进行。英、法和海地一样，对美国影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任何一点扩大都保持警惕。海地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主要的维护奴隶制强国美国在多米尼加土地上的存在会危及海地本身的独立。

因此，1855年11月，苏卢克（他已仿效德萨兰宣布自己为海地皇帝福斯坦一世）第二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双方进行了若干次战斗，这是多米尼加和海地的战争中最激烈的几次较量，但最后皇帝率领海地人越过边界逃回海地。皇帝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将军们的所谓无能和背叛行为。几名最高级军官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并执行。

福斯坦看到用军事手段已不能使圣多明各与海地重新统一，于是企图用外交策略来达到同样目的。1858年10月，他派遣前法国驻太子港领事马克西姆·雷博去圣多明各，指示他向多米尼加人建议，他们应与海地政府达成谅解，同意重新加入海地邦联，这样才能避免被美国吞并。否则，海地将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发

动进攻，迫使他们屈服。

多米尼加政府认为这些建议极端无礼，桑塔纳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将雷博驱逐出境，未作任何答复。但是他们非常担心海地皇帝正在计划再次入侵多米尼加领土，并且相信他们缺乏足够的物力去抵御福斯坦的新进攻，因为新共和国的经济已在同海地的历次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皇帝确实真要动员他的军队再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但是海地的军官们对福斯坦一世的暴政已感厌倦。他们看到每一次与多米尼加人的战争爆发，福斯坦都要抓住这个机会谋杀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1859年年底前，他们在法布尔·热弗拉尔将军领导下策划了一次密谋，并在1860年1月初将皇帝推翻并迫使他流亡国外。热弗拉尔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通知多米尼加政府，他的政府不会计划任何入侵。然而，经过那么多次入侵后，多米尼加简直不可能相信，所以他们继续准备对抗海地人，并进一步发行大量纸币用以支付军事动员费用。

在苏卢克的最后一次入侵以后，多米尼加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如此纷繁，如此严重，致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决定重新考虑争取外国（最好是西班牙）援助的老主意。雷博的使命同这个决定很有关系，因为桑塔纳总统从那时起非常害怕海地再次入侵。桑塔纳似乎还非常担心美国可能利用他的政府的脆弱向这个国家发动突然袭击，就象一群北美人不久前对尼加拉瓜所做的那样。多米尼加政府确实正在经历一个士气最低落的时期。海地人虽然象热弗拉尔宣布的那样已取消过去的侵略政策，但他们如今正在引诱居住在边界地区的多米尼加人与海地重建商业联系。海地提供的市场对边境地区的许多居民具有很大吸引力，因而海地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良好的反应，但是据当时许多多米尼加人的看法，热弗拉尔的意图是想通过这种贸易使边界地区在经济上海地化，从而用和平手段使海地逐步控制那个地区。据多米尼加财政与商业部称，至1860年5月，边界贸易已达到空前规模。

272

桑塔纳总统当时脑子里考虑的就是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因此他利用费利佩·阿尔法乌将军建议赴欧洲休养的机会，任命他担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阿尔法乌的使命是向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说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处的绝望境地，请求女王给予必要的援助和武器，使多米尼加得以加强并守住港口和沿海据点。由于它们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这些正是美国妄想占领的地方。除此以外，他还要谈判签订一个协定，使圣多明各成为西班牙的保护国，帮助多米尼加人从海地手中重新赢得他们的独立。1861年3月18日，多米尼加当局庄严宣布，这个国家已再次与西班牙合并。圣多明各再一次被外国人统治，多米尼加人将不得不重新进行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

然而西班牙发现，他们要去统治的人民已不再如他们曾经期望的那样西班牙化。不但存在着种族差异（大多数圣多明各居民是有色人种）。在几个世纪的殖民隔离后，随之以22年与海地人共同生活，而后是17年的独立，他们的习俗已明显地不同于西班牙。不太久就产生了西班牙官兵和多米尼加居民之间的冲突。强制实行种族隔离；西班牙政府不承认前共和国军队军官的军衔；没有立刻收回纸币；西班牙部队虐待农民；新来的西班牙大主教由于迫害共济会会员而激怒了上层人士，由于强制实行严厉的新行为准则而疏远了教士，由于硬性规定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而使世俗信徒群众感到不悦；新的法官带来的法律体系与当地习俗不合拍，与传统的多米尼加法律相抵触，（如今当地的法律在海地的影响下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自由出售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农产品烟叶受限制，当局决定强制执行对西班牙有利的专卖制；商人们对强制实行有利于西班牙船舶和西班牙货物的进口税新税率表示不满。

所有这一切产生一种普遍不满的气氛，这一点至1862年年底已非常明显。当时西班牙官员警告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将很快爆发叛乱。果然，1863年2月初，叛乱爆发，到同年年中发展成一场

273

熊熊大火。海地政府还火上加油，它从一开始就抗议西班牙的吞并，而且向多米尼加起义者供应金钱、武器和粮食。起义者成功地拿下了内地主要城市圣地亚哥，并在那里建立临时政府，指挥光复共和国的斗争。

在圣地亚哥建立政府导致了一场持续将近两年的全面战争，使西班牙付出1万多人的伤亡和3300万比索的战费。多米尼加也丧失数百人的生命，加重了经济破产。除了圣多明各城和一些邻近的城市，全国都拿起了武器。这是一场光复国土的战争：它以农民起义开始，很快转变为种族战争和群众性游击战争，最终使全国都参加斗争。

热弗拉尔援助多米尼加人的决定是容易解释的。西班牙吞并圣多明各使海地完全处于暴露的位置，它看到自己已被一个拥有奴隶的强国西班牙包围，西班牙在安的列斯群岛的领地——古巴、波多黎各和现在的圣多明各——是对海地继续独立以及海地为之奋斗的一切是个威胁。此外，西班牙吞并圣多明各还使海地继续占有在杜桑时期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中央平原领土处于险境。西班牙人宣布有权强行收复这块土地，并根据1852年1月14日王室命令，开始驱逐所有住在边界地区的海地人。而且，既然这个命令已宣布西班牙对多处海地的居留地和领土为西班牙所有，海地政府完全可以预料西班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入侵，掠夺海地人已占有60多年。认为合法地属于他们的土地。对海地本身安全的这种威胁是热弗拉尔不顾西班牙人的威胁，决定全力支援多米尼加的强大动机。

反对西班牙的战争1865年7月以多米尼加恢复独立告终，然而这个国家已饱受蹂躏，濒于瓦解。大多数农民都拥有武器。多米尼加共和国长期处于政治上分裂和不稳状态，战争结束时，全国由几十个军事领导人和游击队首领控制，接着他们开始争权夺利，互相斯杀。象1865年以前一样，主要的冲突是桑塔纳派（桑塔纳去世后他们依然是一股力量）和巴埃斯派（拥护布埃纳文图拉·

巴埃斯的政治一军事派别，巴埃斯从共和国早期起就是桑塔纳的强大对手，被西班牙吞并前两度担任总统）之间的冲突。巴埃斯曾担任六年总统（1868—1874），以后再次担任两年（1876—1878），但是事实上，在1865—1879年期间，存在过21届不同的政府，发生过不下50次军事叛乱、政变和革命。

1867年法布尔·热弗拉尔下台后，海地又经历了两年内战。西尔万·萨尔纳韦总统（1867—1869）本人是一个肤色浅黑的穆拉托人，但支持他的主要是贫穷的城市黑人（最初在海地角，随后在首都）和拉格朗德湾的"皮凯人"。他耗费了任期内的全部时间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与叛乱者作战；他最终被迫逃离首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被捕，引渡给叛乱分子后被处决。在尼萨热·萨热政府统治时期（1870—1874）（他是一个肤色深黑的穆拉托人），政治又复归于相对的稳定，但是上层人士和军队继续操纵政治，在黑人和穆拉托人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欠法国的债款给海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长期缺乏资金供军人和政治家进行建设性活动。农民拥有的土地变得更为零碎，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只能自给自足。黑人农民和穆拉托上层人士之间的距离拉大。19世纪后半叶，有好几次农民运动震撼海地社会，但穆拉托上层人士保持了对中心城市的政治领导权。可是海地领导人在一个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放弃了将伊斯帕尼奥拉岛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意图。这两个相处不甚融洽的独立共和国——占该岛三分之一面积的西部的海地（人口约100万）和占该岛三分之二面积的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仅15万）——开始走上彼此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275

277

第 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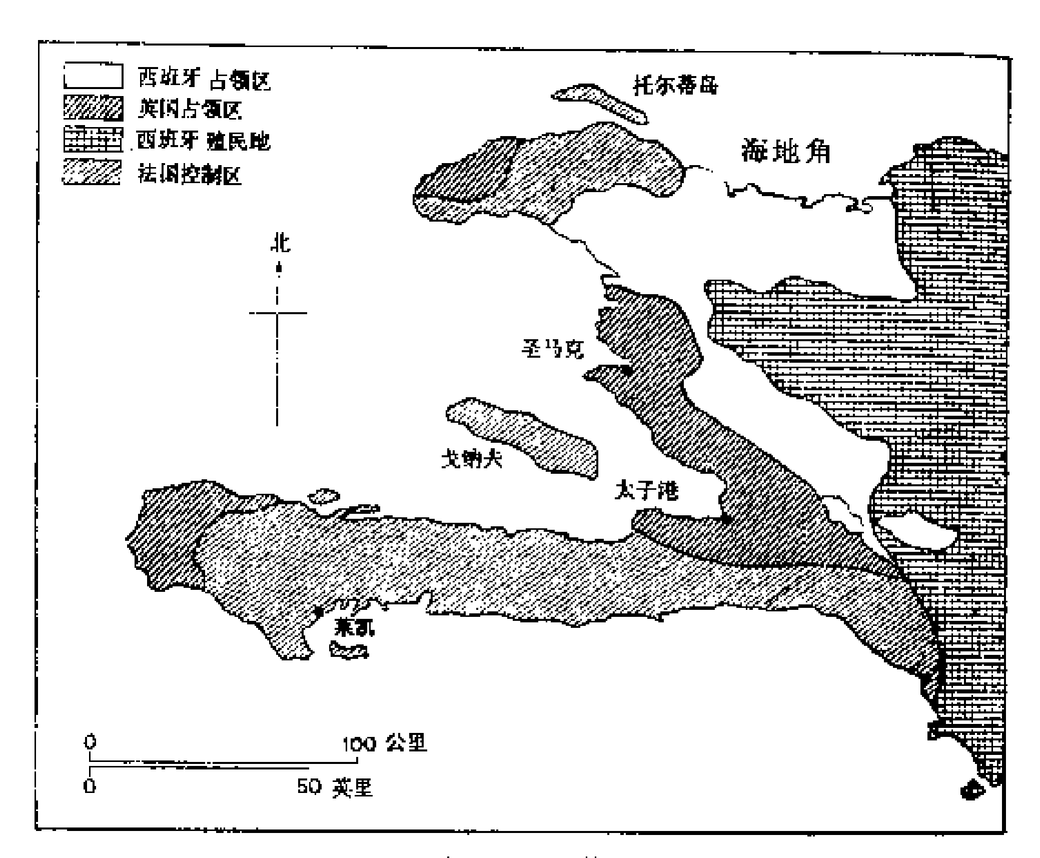
自18世纪中叶到1870年的古巴

18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还是一个遍地森林、一半地方人迹罕至的岛屿。西班牙人和他们在欧洲其他帝国的敌人都把它看作哈瓦那的腹地。哈瓦那这个著名的港口在这个岛北部的一个天然港湾内，是16世纪60年代建造起来用作补给站的。装载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舶可以从那里得到庞大的海军护航队。少数勇敢的深入腹地的旅行家发现古巴的动物对人友好：这里没有蛇，很少爬行动物，没有巨大猛兽。印第安土著居民泰诺人和西沃内人据认为已被同化或杀绝，实际上在人迹罕至的东部仍有少数泰诺人村庄。一些西班牙"白人"（或称克里奥尔人）家族，包括哈瓦那最显赫的雷西奥斯·德·奥肯多家族，已有少许印第安人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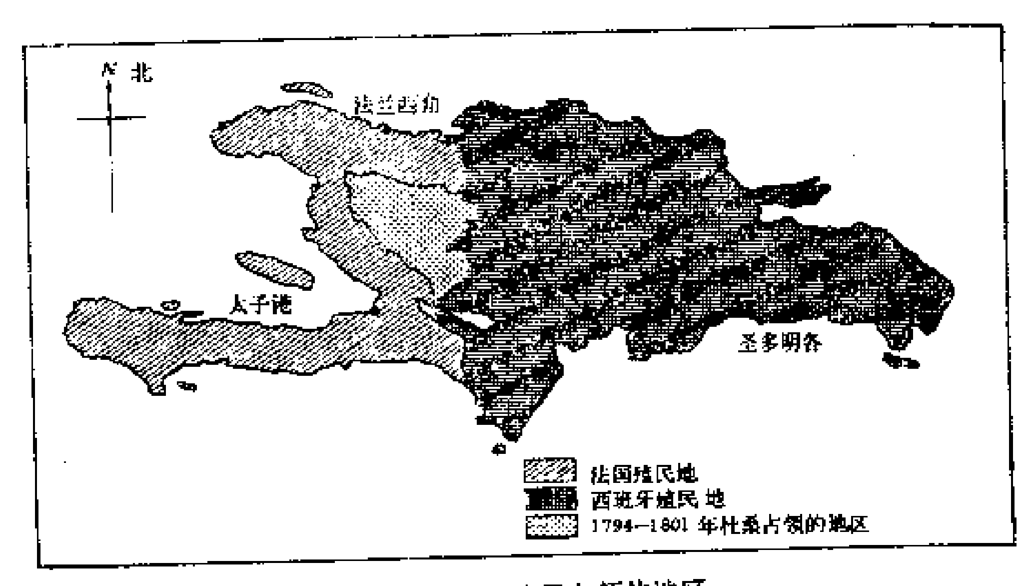
古巴大约有15万人口，其中一半左右住在哈瓦那城，那里疟疾和黄热病经常流行。其余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另外几个城镇，如大主教所在地圣地亚哥德古巴、普林西帕莱港（它以主教管区而自豪）、圣斯皮里图斯、特立尼达、马坦萨斯和马列尔。这些城镇没有一个达到一万人口。在这些城市里或附近，有一些16世纪建造的古堡和教堂。在哈瓦那，建造了三个要塞——拉富埃尔扎、埃尔莫罗和拉蓬塔保卫这个港口。和西班牙语美洲其他地方一样，交通主要靠海路，很少道路。唯一富裕的雇主是西班牙督军管理下的哈瓦那皇家船舶修造厂。为了保证他有足够的热带硬木，岛上采伐硬木树要受到控制。

古巴很少工业，只有修理船舶、猪肉加工、腌制牛肉和鞣制皮革，这些工业都是为韦拉克鲁斯和贝洛港的护航队服务的。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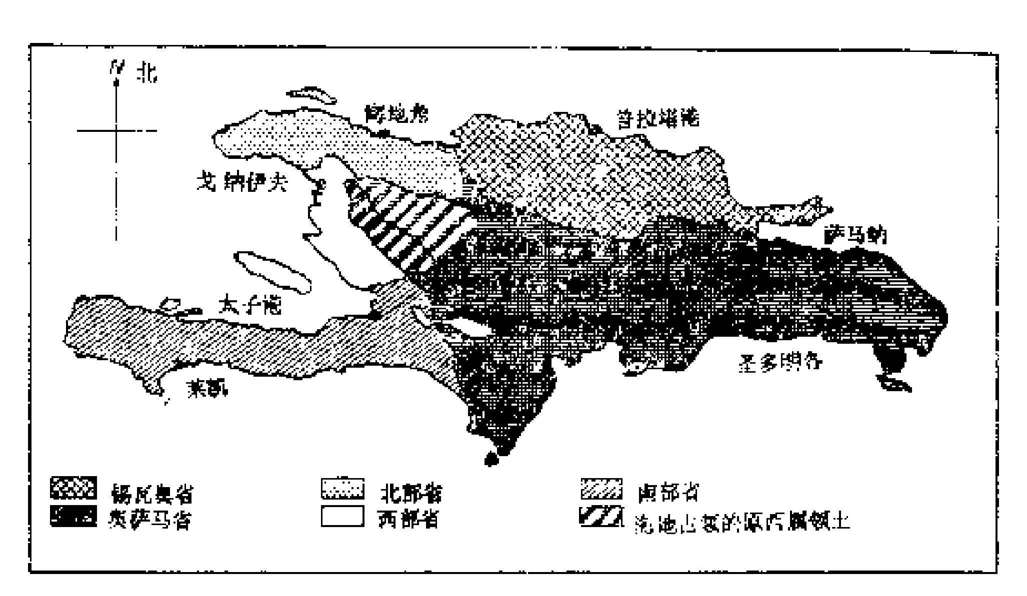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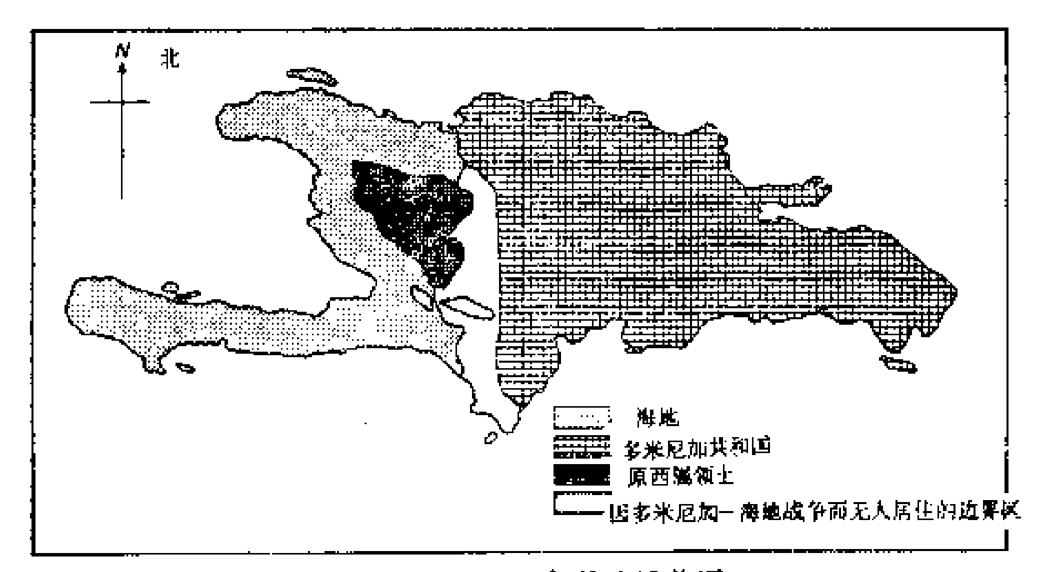
1794年的圣多曼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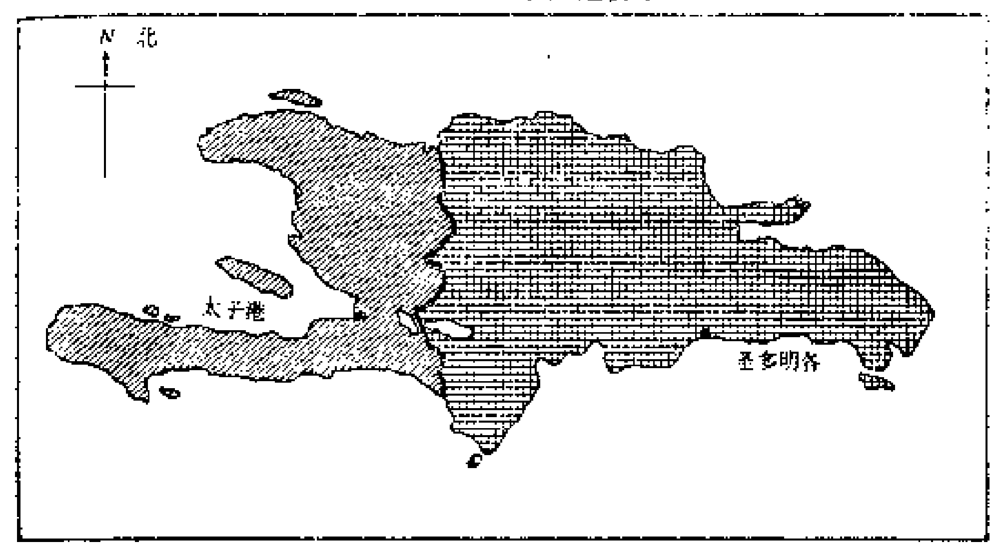
1794—1801 年杜桑占领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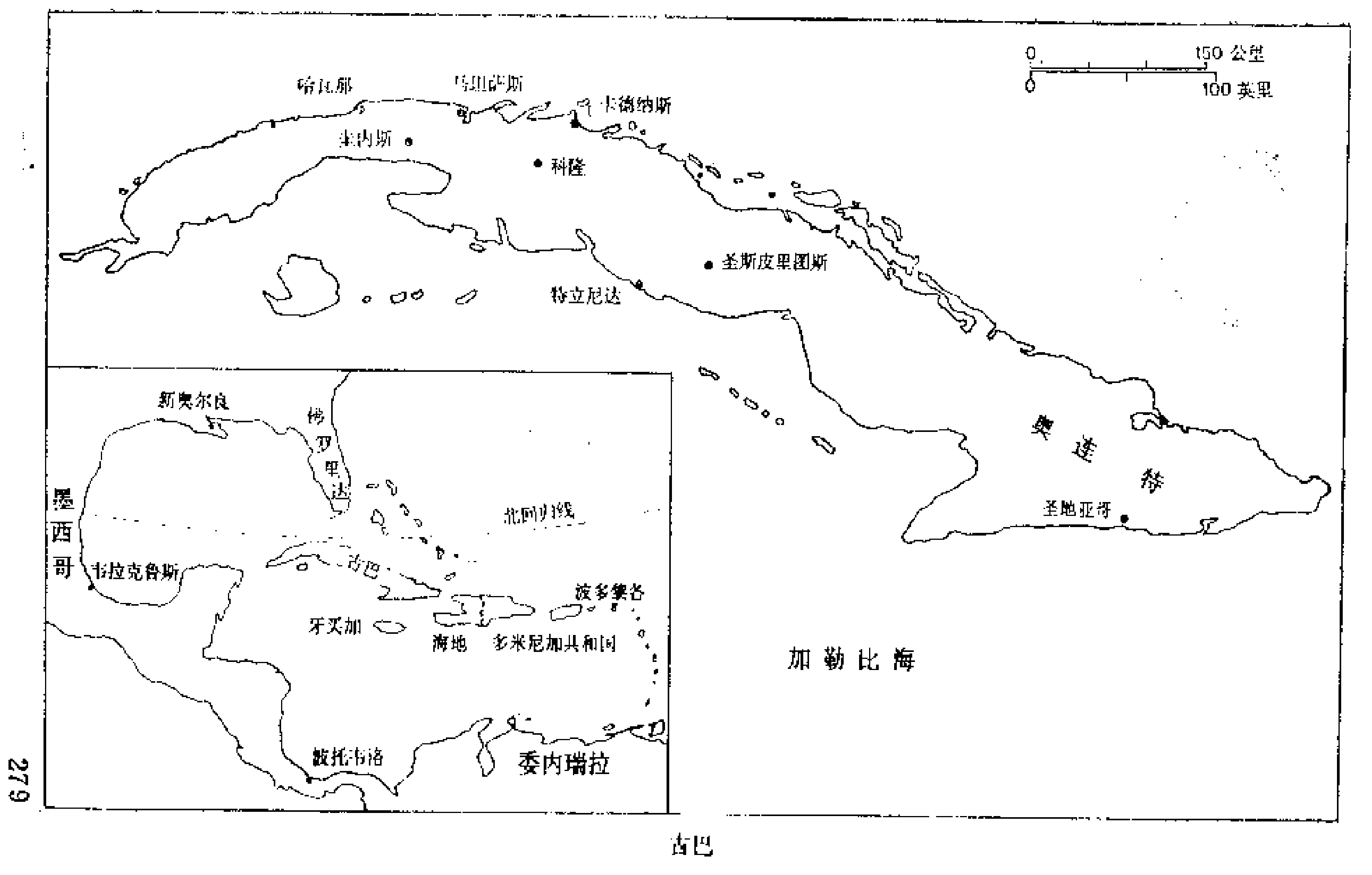
1822—1844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行政区划



1844—1861年的边界状况



1874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线


0
150 公里
100 英里
哈瓦那
马坦萨斯
卡德纳斯
圭内斯
科隆
圣斯皮里图斯
特立尼达
奥连特
圣地亚哥
加勒比海
新奥尔良
佛罗里达
墨西哥
北回归线
古巴
韦拉克鲁斯
牙买加
海地
多米尼加共和国
波多黎各
波托韦洛
委内瑞拉

古巴

世纪在古巴的河道中曾发现过一点黄金，但早已被淤没。1750年古巴大约有100个小甘蔗种植园，多数在哈瓦那附近，将糖运到其他港口的费用很高，通常用少数几条牛驮运。它们大概每年生产59吨糖，其中仅1/10正式出口。比较起来，领土比它小得很多的法国和英国的产糖殖民地，如圣多曼格和牙买加，大约有600个较大的种植园，每个一年可产糖250吨。

造成古巴这种落后状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岛上很少适于安装水力压榨机的河流，而加勒比地区其他殖民地却靠它创造财富。另一个原因是，象蔗糖这样的奢侈品在西班牙不存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烟叶是古巴最有利可图的农产品。许多烟叶被制成鼻烟，但是一些烟草种植者已在古巴西部的库亚瓜特赫河谷开垦了烟草田，后来用这里的烟叶制成的“哈瓦那雪茄”被誉为吸烟世界的瑰宝。然而，直到1770年以后古巴才开始有制造雪茄的工厂，世世代代都是采摘烟叶后当场卷成雪茄，或将烟叶运到西班牙塞维利亚制成雪茄。烟草农场规模都很小，和专门采集蜂蜡的养蜂农场一样(蜂蜡是另一种数量不大的出口产品)。古巴中部平原上有少数牧场生产皮革和牛肉。在鼻烟发展起来以前，牛肉和皮革是古巴的主要出口产品。

16世纪，土著印第安人还向西班牙人传授种植甘薯、山药、丝兰、南瓜、玉米和豆类的技术，虽然殖民者不喜欢蔬菜，而且宁愿进口几乎每一种吃的东西。例如，烤制面包，通常都用进口小麦。葡萄酒也靠进口，自己不酿造。鱼类他们不太爱吃。咖啡已开始在法属西印度群岛栽培，但尚未引入古巴——也还没有被引入任何西班牙殖民地。

由督军负责对古巴的政治控制，他本人隶属于墨西哥总督。但墨西哥离古巴有几星期的航程，到西班牙至少要6个星期。因此，当运送金银财宝的船队在哈瓦那停留时(每年约六个星期)，哈瓦那督军事实上与船队司令共同负责。督军是由塞维利亚的国

内行政当局任命的少数官员的首长。大多数官员和督军本人一样，报酬菲薄。人人都想利用职权贪污谋利。司库、会计、法官、海军首长和港口官员来到殖民地时都是贫穷的"半岛人"，主教和神甫也是一样，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富翁回到安达卢西亚或卡斯提尔。但是许多这样的人事实上再也没有回国，他们离开自己的家族，加入当地克里奥尔人的队伍，这些人掌握着市政委员会，操纵大部分基本商品的价格，经营农场，常常最终成为商人或地主。

280

古巴也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到18世纪已产生它自己的由一小撮富裕家族组成的克里奥尔贵族阶层，其中有些家族，如雷西奥斯·德·奥肯多、埃雷拉、努涅斯·德尔·卡斯蒂略、卡尔沃·德·拉·普埃尔塔、贝尔特兰·德·拉·克鲁斯等已在岛上生活了好几代。他们通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哈瓦那、圣地亚哥或特立尼达等城里，在收获季节或宗教节日期间到他们的种植园或牧场住一段时间，他们照例从不访问西班牙或帝国的其他地区。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那些在加勒比其他地区发了财的不在地主。* 这些古巴寡头人物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倒更象大陆上的地主。

古巴跟加勒比地区的许多非西班牙殖民地还有另外三点不同：奴隶比较少；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比较多；比较重视城市生活。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和葡属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一样，都使用大量奴隶。古巴的甘蔗种植园数量少，规模小，需要的奴隶也少。1750年时，在哈瓦那的私人住宅、造船厂或牧场使用的奴隶大概比甘蔗种植园使用的奴隶还多。已获自由的黑人几乎占哈瓦那黑人和穆拉托居民的1/3。自由黑人的比例这样高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有明确的法律，使奴隶赎买自由比譬如说英国等国家的殖民地容易。另一个原因是古巴的统治阶级愿意在临终时

---

* 不在地主（absent landlords），指居住在城里的地主。——译者

解放奴隶——特别是解放他们的私生子。古巴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余部分一样，导致了城市的出现。加勒比地区的英国殖民地几乎没有任何城市生活，英属北美洲也是如此。

281

18世纪后半叶，古巴变成了繁荣的产糖殖民地。有以下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在西班牙国内和其他地方——包括新近独立的美国——形成了新的食糖市场；第二，出现了一个愿意开发土地增加财富、而不是只想守业的地主阶级；第三，从非洲向古巴输入奴隶的规模扩大；最后，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开明大臣们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包括解除许多对贸易的陈腐的官方限制。加勒比地区其他岛屿的蔗糖生产逐渐衰落也有助于古巴的繁荣。日益增多的来自西班牙帝国以外的投资者向古巴投资，对他们自己有利，对这个岛也有利，同时这个殖民地迅速引进了制糖业新技术。

下述事态发展所围绕的中心事件是1762年英国对哈瓦那的占领。只要证明有道理，我们不应该害怕把某些事件称为历史的转折点，下面这些事态发展就当之无愧。阿尔伯马尔勋爵远征古巴西部的胜利，当然首先意味着英国所进行战争的胜利结束。哈瓦那以前从未落入外国侵略者之手。英国的胜利是一个信号，英帝国在各地贩卖谷物、马匹、棉毛织品、五金制品、小工业设备、榨糖设备以及奴隶的各类商人立即蜂拥而至。1762年以前，古巴市场对外国人形式上是关闭的，尽管走私活动十分活跃。

阿尔伯马尔的胜利的主要后果是，在英国主持哈瓦那事务的那一年里，在当地卖掉大约4,000名奴隶。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当时岛上奴隶人数的1/8。早些时候在西班牙统治下有人申请扩大奴隶进口，都被哈瓦那政府驳回，理由是岛上增加那么多新来的奴隶（博萨尔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样的顾虑如今证明是过分谨慎。奴隶突然增加并没有引起大的奴隶暴动。英国人在巴黎和会（1763年）后离开这个岛屿时，奴隶经销人没有走，保持了与英属岛屿的商业关系。在1763年以后的18年中，每年来到古巴的船

只由6艘增加到200艘。特别是，输入古巴的奴隶稳定增长，其中许多奴隶是从牙买加转口运来的。某些公司垄断奴隶贸易又持续 282 了一代人的时间，但有些奴隶贸易避开了它们。英国和北美洲的商人是古巴市场上的常客。1775年以后，西班牙商人开始直接从非洲将奴隶运回哈瓦那，其中许多奴隶被转卖到帝国的其他地方。1778年，西班牙从葡萄牙购买到费尔南多波岛和安诺本岛*。1789年，西班牙政府允许商人任意将奴隶运入帝国，不受数量限制，唯一的规定是每三艘船中必需有一艘装运妇女。

英国征服古巴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大部分西班牙原有的捐税——商品进口税（向所有从西班牙进口的货物征收）、海损税（付给海军）、商品出口税（向所有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征收）、捐献（应马德里的要求加征的额外摊派款）。——都取消了。虽然其中一些捐税在英国离开后又一度恢复，但是大部分对贸易的限制已被永远废除。1765年，西班牙有权同加勒比地区进行贸易的城市从加的斯扩大到其他港口。开始是扩大到7个，但是这确实意味着西班牙任何人想要同古巴进行贸易已都能做到，因为开放的港口包括巴塞罗那、马拉加、阿利坎特、拉科鲁尼亚和桑坦德——分布面很广。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西班牙帝国范围内的贸易是自由的。1771年，不稳定的当地铜币为银比索所取代。1776年，哈瓦那成为自由港。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无论在古巴还是在委内瑞拉，当地市政委员会不再管理商业。王室在西班牙和在整个帝国的利益由一名财政总监察官予以保证，他的工作成绩很大。他使西班牙王室能从较为公平的税收中获得更多收入——这是一个理想的财政成就。在18世纪90年代，制糖和加工咖啡的机械进口税都被取消。外国商人不但允许进入并居留在岛上，而且准许购买房地产，所以英国和美国商人很快在这里安家立业。

种植园主兼律师弗朗西斯科·德·阿朗戈（他曾成功地在马

* 费尔南多波岛和安诺本岛今属赤道几内亚。——译者

德里法庭上进行斗争，反对关于恢复授与英国贝克——道森公司奴隶贸易垄断权的建议），和他的远亲、甘蔗种植园主卡萨·蒙塔尔沃伯爵到英国旅行，考察利物浦和伦敦的商人如何进行奴隶贸易，英国制造商如何经营工厂。他们1792年回到古巴后，仿照西班牙和西班牙帝国其他地方的模式，在哈瓦那成立了“国家之友经济协会”。这个团体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搜集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还间接导致创立古巴最早的报纸，从1793年开始发行的一份单张日报——《日报》。

弗朗西斯科·德·阿朗戈这一代人是各种革新的先驱。他们创立公共图书馆，建造医院、精神病院和免费学校（仅限白人儿童）。在英国，阿朗戈曾参观蒸汽机，印象很深。1794年莱因霍尔德公司将一台蒸汽机运到古巴，1797年在卡萨·蒙塔尔沃伯爵的女婿在塞瓦沃的种植园里试用。水力碾磨机也第一次在古巴西部使用成功。在此之前，法国的种植园主和技术人员在海地革命期间逃出来时，给古巴带来了上射水车* 的设想。18世纪90年代的另一项革新是发明自动翻转器，它可代替奴隶将甘蔗塞进碾磨机。18世纪90年代还引进了粗秆的南海“奥塔海特”甘蔗新品种。当时大概同等重要的是，英国商人菲利浦·奥尔伍德带来芒果，丰富了单调的水果品种（奥尔伍德是利物浦庞大的奴隶贩运商贝克—道森公司驻哈瓦那的有权威和引起争论的代表）。

因此，到18世纪和19世纪交替之际，古巴已明显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部分，它的种植园一直扩展到离哈瓦那很远的地方，很可能已超过牙买加而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西班牙对那些生产和出口食糖的商人以及寻求奴隶劳动力的人都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援。到1800年，从古巴出口的糖已超过皮张、烟叶、甘蔗酒、蜂蜡、咖啡和坚果，上述商品也都

---

* 上射水车（over-shot water wheel），一种横轴水车，周缘有叶片或斗，从上面倾入斗中的水的重量使轮转动。——译者

用船从哈瓦那运往西班牙。在18世纪70年代，古巴每年出口1万多吨糖，到90年代拿破仑战争爆发前夕，已超过3万吨。甘蔗种植园的数目从大约100个增加到500个左右，种植甘蔗的土地也从1万英亩猛增到将近20万英亩。1762年，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的平均规模大概不超过300英亩；到90年代，将近达到700英亩。许多老甘蔗种植园仅仅使用十几个奴隶，90年代许多新种植园使用100个奴隶。

284

任何事业，扩大经营规模都包含痛苦的成分。扩大种植园意味着地主的态度更加冷漠。穆拉托人和获得自由的奴隶1760年以前偶而自己还开个糖坊，现在不开了。增加奴隶意味着需要更多住处，集体工棚取代了茅舍，18世纪初，奴隶也许还可以在自留地上养鸡或种些木薯充饥，现在自留地越来越少了。小糖坊消失了，或者不生产地道的高质量蔗糖了，现在只生产糖塔或粗糖以供奴隶自己消费。过去那种除制糖外，还种植玉米和蔬菜，烧自己的木柴、吃自养的家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小甘蔗种植园越来越少。很少再有种植园操心去执行教会的规定，用天主教教义教育所有的奴隶。越来越多的新糖厂不再用宗教的名称，而改用世俗名称。神父们对工人星期日工作装作没有瞧见，奴隶们死后也不再葬在教会的墓地上。即便如此，哈瓦那的修道院和神学院在18世纪90年代都有他们自己的糖坊。

另一个因素如今也进入古巴的历史（这个因素此后从未全部消失），那就是世界食糖市场，也就是其他国家富裕的食糖消费者的利益。约翰·亚当斯*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羞于承认，糖浆是美国独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1775年以前两代人的时间内，马萨诸塞州一直饮用安的列斯群岛最好的朗姆酒，而且靠销售这种酒获利。牙买加由于土壤肥力耗尽，甘蔗产量下降，不再能满足马萨诸塞州朗姆酒商人的需求。在那个时代，农民和种

*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届总统。——译者

植园主一样对施肥的益处还一无所知。因此，在独立战争前，北美洲的商人愿意和法国和西班牙的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英国的规定阻止他们这样做。美国提名罗伯特·史密斯担任美国第一任驻古巴商务代表，提名美国革命的财政家罗伯特担任驻哈瓦那代表，表明了与古巴贸易在北美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古巴增产的大部分糖很快都出售给了美国。

海地（圣多曼格）革命比美国革命对古巴的影响更大。奴隶起义首先增加了对古巴糖的需求，使阿朗戈和他的同事们特别高兴。糖价的上涨促进了古巴地主把土地改种甘蔗的趋势。但是海地革命也在古巴所有的种植园引起了恐惧的战慄。1791年以后，海地的商业遭到破坏，可能使古巴在经济上获利。然而这种破坏也有蔓延或人为传播的可能。毕竟，圣多曼格有些革命者是牙买加人或是西印度群岛其他地方的人。

结果，那些能逃出来的法国种植园主逃离海地，来到古巴和其他当时依然安全的加勒比岛屿。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可怕的杀戮和革命的情况，而且还有许多有用的栽培甘蔗和制糖新技术，使不久前运用的技术更臻完善。最重要的首先是所谓“牙买加列车”，用这种方法可使一长列铜锅用一个火以同样的温度同时加热；其次是前面已讲过的上射水车。曾在海地工作过的种植甘蔗技师（许多人出生于法国）很快来到了更大的古巴种植园。

然而，国际联系虽带来财富，也招致国际性纠纷。拿破仑战争不仅中断了贸易，延误了古巴的糖厂大规模引进蒸汽机，也使种植园主遭受糖价的大幅度波动。1807年，由于美国突然禁止与所有交战国进行贸易，古巴糖产量的 2/3 未能售出。1808年，西班牙王室在拿破仑践踏下崩溃，督军索梅鲁酸洛斯候爵实际上掌握了古巴的全部权力。这个岛战略上处于易受攻击的位置。这种形势促使杰斐逊总统第一次表示美国愿意保护这个岛屿。他说，美国希望古巴（还有墨西哥）继续属于西班牙，但是倘若西班牙没有能力保住这个岛屿，美国愿意买它。这个提议被拒绝。但是后

来由弗朗西斯科·德·阿朗戈的堂弟何塞·德·阿朗戈领导的哈瓦那市政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西班牙国内（特别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出现了危险的自由主义倾向，因而采取步骤建议与美国合并，这时杰斐逊总统又一次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

当然，拿破仑战争是拉丁美洲独立的接生婆。南美洲各地的克里奥尔人，由于西班牙舰队在特拉法加尔覆灭而断绝了与宗主国的联系，经济上因过去30年波旁王室的经济改革而富裕起来，政治上得到了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鼓励，因而都在考虑实现政治自治，乃至脱离西班牙正式独立。这种思想当然也传播到古巴，而且还搀杂着海地的革命思想。例如，1809年，共济会员指蒙·德·拉卢斯为了实现古巴独立，组织了一次带有斯汤达小说或意大利统一复兴运动特色的、那种浪漫主义和缺乏效率的密谋。然而这些思想没有取得成果。原因只有一个：海地的幽灵。只要有一丁点儿被奴隶起义领袖利用的机会，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种植园主会愿意去冒与西班牙和西班牙驻军进行严重冲突的风险。因此，哈瓦那最高洪达拒绝了加拉加斯市政委员会关于参加独立战争的邀请。某些自然条件的障碍也限制了古巴人。古巴是一个岛屿，只要一支舰队的少数船支就能使它的城镇效忠西班牙，如果正好有一支舰队的在那里集合的话。其次，许多效忠王室的难民从南美大陆的西班牙帝国的各个地区逃往或移居古巴，提高了古巴作为“永远忠诚的岛屿”的名声。最后，古巴的神父和大陆上的神父不一样，大多数出生于西班牙，他们没有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和莫雷洛斯神父那样的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最限制古巴人的，大概还是害怕成为“一个新海地”。另一次浪漫主义密谋的暴露更增加了人们的这种担心。这一次密谋的领导人是一个黑人木匠，何塞·安东尼奥·阿庞特，他计划烧毁甘蔗田和咖啡田。他显然与海地同教派人有接触；他祈求非洲的“钱戈”神(Chango)保祐。再晚一些时候，19世纪20年代有一次密谋，以何塞·弗朗西斯科·莱穆斯为首的“玻利瓦尔的阳光和闪电”组织规模更大，但是和

阿庞特的密谋一样，最终也被出卖。

与此同时，英国在1808年禁止贩奴船只进出英国港口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取缔奴隶贸易的国际运动，古巴种植园主们对此非常关注。弗朗西斯科·阿朗戈等人在发言中强烈反对在这条战线上作出任何让步。西班牙起初在1812年和1813年，费迪南七世复位后的第一届政府在1814年，也都拒绝英国的要求。但到1817年，英国人终于说服西班牙正式仿效英国的做法。1820年，西班牙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并付给奴隶商人40万英镑作为赔偿。西班牙还同意英国皇家海军有权拦截贩奴船，有权将可疑的奴隶贩子带到混合委员会受审。不用说，在哈瓦那看来可能已是奴隶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这项措施导致了奴隶进口的增加。但是，不管英国怎样开始让古巴懂得对他们的事务进行国际干预的可能性，禁令并未实施。对奴隶的需求很大，而且不断增长，奴隶贸易时起时伏又存在了50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马德里政府不愿因支持英国人而与古巴种植园主发生对抗，而且他们认为英国人是假装好心、伪善和追求私利。

这次英国干涉的部分后果是，古巴的种植园主在1822年开始重新研究加入美国作为它的一个新的州的想法。美国内阁讨论了这个想法，并设法劝阻古巴人。他们宁愿维持现状。可是，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估计古巴加入他们的联邦不过是迟早问题——至多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古巴独立。

19世纪20年代中期，在哈瓦那的咖啡馆的游艺厅里广泛地讨论着独立或合并的各种计划。但是，结果西班牙决定保住古巴和波多黎各，因为西班牙帝国已经失去了美洲大陆。从19世纪20年代起，西班牙派出4万名军队驻守古巴。军队和一个政府间谍网使这个岛继续保持忠诚。玻利瓦尔曾一度打算倘若西班牙人不承认他的新哥伦比亚就入侵古巴。美国的态度令人沮丧，它错过了时机。

下面我们会看到，由西班牙驻军保证的古巴政治上的顺从，

是以糖业为基础的古巴经济迅速繁荣的根本原因。到19世纪30年代，古巴的税收为西班牙王室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普遍认为，大部分西班牙大臣的薪俸主要靠古巴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也是西班牙政府能够向伦敦银行家偿还债务的唯一保证。驻古巴督军也获利甚多——一部分是纵容奴隶贸易的贿赂。这些钱财使他们能够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去进行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要是督军们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废除了奴隶贸易，他们早已丢掉这块殖民地——是丢给美国而不是丢给独立运动。克里奥尔人与"半岛人"之间的社会隔阂继续存在。克里奥尔人被禁止参与行政管理——总之不存在从政的任何机会——因而牢骚满腹。惟有致力于赚钱。西班牙的控制稍一放松或者对奴隶起义稍一失控，都会提醒古巴的地主，已到了加入北美合众国的时候。先后几个督军的决心都使种植园主们感到高兴。他们经常把进步作家或民族主义作家驱逐出境，或避免在古巴实施西班牙有时突然向宪政政治倾斜的决定。19世纪40年代建设的最大糖厂有时也曾发生奴隶叛乱，都被残酷镇压，古巴的种植园主们担心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 288

但是并入美国的想法最后还是攫住了由卡洛斯·努涅斯·德尔·卡斯蒂略、米格尔·阿尔达马、克里斯托瓦尔·马丹、伊斯纳加家族和德拉克家族领导的大部分古巴知名种植园主们的想象力。他们的目的是加入美国以保持奴隶制和保护他们制糖致富。他们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说服美国舆论界接受他们的观点。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1848年后)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相继加入美国后，古巴似乎已显然是下一个候补者。这个想法也吸引了新一代的北美政治家，获得前面说的那些领土使他们兴奋，美国的全面成功和繁荣使他们陶醉。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明确意识到，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命运注定"，美国应该控制(如果不是征服的话)。南北两个美洲。他们开展了一场敦促美国购买古巴的运动。许多富有的古巴人明显地支持这个主张倘若需要，他们还愿意出钱。1847年《纽约太阳

报》的编者写道："古巴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权利……必须是我们的"，它是"世界的花园"。

兼并古巴问题成为184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重要内容。波尔克总统答应正式向西班牙提出以一亿美元购买古巴。西班牙认真讨论了这个意见，但事情泄漏，引起一片鼓噪。西班牙政府为了继续留任，不得不拒绝这个意见。然而合并主张依然存在。1849年在新奥尔良策划了一次由西班牙叛逆将军纳西索·洛佩斯率领的"解放"远征，并最终于1850年出发向古巴进军，目的首先是

289 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然后加入合众国。计划被出卖，洛佩斯被俘并处绞刑。但是洛佩斯的旗帜——红底蓝色条纹一颗白星——继续鼓舞着另一代更真诚的独立探求者。

接着又有几次远征。合并的思想在美国南方政治家的头脑里燃烧得越来越旺。得到古巴必然会加强美国蓄奴州的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解放古巴一直是年轻的美国、南方分离主义者和欧洲浪漫主义革命家（如加里波第、马志尼和科苏特等）的梦想。他们的主张增加了这个基本上含糊不清的事业的份量。至于古巴的种植园主，甚至在督军佩苏埃拉于1853年重申不废除奴隶制后，仍然害怕废奴主义可能控制西班牙官员的头脑。

1854年皮尔斯总统* 再次提出向西班牙购买古巴。这个建议再次被马德里自由派新政府拒绝。古巴的种植园主们感到灰心丧气。他们担心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可能在英国伪善者的支持下得到加强，从而允许建立一个他们所谓的"非洲人的共和国"。于是，他们又作出新的尝试去取得美国的关心——如果必要，要求它进行干涉。美国前国务卿和1854年伦敦公使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倘若西班牙拒绝考虑美国关于古巴的"合理"建议，美国有理由从它手中"夺取"。布坎南、皮尔斯、苏莱（美国驻马德里公使）和美国驻巴黎公使发表的《奥斯坦德声明》指责所有可能导致

---

*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古巴"非洲化"的计划，但是华盛顿不承认这个声明。这时，在新奥尔良，另一支解放古巴的远征队已经在路易斯安那州长约翰·奎特曼领导下集结起来，但它的成员之间发生争吵以致原地解散。1857年，约翰·布坎南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奥斯坦德声明》的名气。布坎南着手收买西班牙政客出售古巴，但是并不比他的前任取得更大成功。1861年美国陷入内战，当时南方政治家依然希望能用取得古巴的办法永远保留奴隶制度。南方的失败封闭了古巴种植园的通路，同时也结束了奴隶贸易。因此，美国南北战争对古巴而言是1815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

在此期间古巴已成为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殖民 290 地（这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西班牙在19世纪20年代丧失其帝国的其他省份后并未很好从心理上和思想上进行总结）。到19世纪60年代，哈瓦那（人口将近20万）和圣地亚哥德古巴已成为喧闹的国际都市，另外8个城市的人口都已超过1万人。古巴各港口每年接待3,600艘船，其中一半驻在哈瓦那以外的港口。早在1825年，美国已成为这个殖民地的比西班牙更重要的贸易伙伴；北美人（商人与政治家一样）对这个岛表现出极大兴趣，在那里投资，购买古巴出口产品的比例也日益增加。

有一个时期，咖啡成为古巴主要出口农产品蔗糖的有效竞争对手。咖啡早在1748年即被引进古巴，但是从未大规模栽培，直至海地革命以后，许多有经验的咖啡种植者移居古巴。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古巴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并充分利用了为帮助发展咖啡种植业而采取的免税政策。1825至1845年间，古巴的咖啡出口量从未低于1.2万吨，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播种咖啡的土地面积还稍大于播种甘蔗的面积。但是种植咖啡的收益始终比不过种植甘蔗的收益，到19世纪50年代，许多咖啡园都改种甘蔗。1834年美国对进口咖啡提高税率，40年代可怕的飓风，以及巴西开始进行竞争，所有这一切损害了古巴种植咖啡的利益。然而，咖啡仍

是重要的农产品，直至独立战争开始。1860 年，古巴仍有大约1,000个咖啡种植园，出产8,000吨咖啡，大部分在古巴东部。后来又有几次飓风使许多咖啡种植园主陷于贫困，引发了被剥夺感，这种意识有助于60年代后期在那个地区产生反抗的情绪。

烟草也是蔗糖的一个不大但是持久的竞争对手。烟叶生产历史上的转折点是1817年废除王室对雪茄制造业的垄断。1821年，陈旧的王室烟草工厂——一栋18世纪70年代的建筑——被改为军队医院。此后烟草工厂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厂主主要是西班牙。移民，如拉蒙·拉腊尼亚加和拉蒙·阿利翁内斯。对古巴雪茄的评价越来越高——尽管大部分烟草田仍在东部而不是西部，那里最好的烟叶已闻名于世。另一种古巴的出口产品是朗姆酒，在市场上出售获得最好效果的是法昆多·巴卡迪，一个30年代的加泰罗尼亚移民，到60年代已成为百万富翁：他的淡琥珀色产品是一大国际成就。

291

但蔗糖在整个 19 世纪依然是古巴最重要的遥遥领先的农产品。1860年，约有1.85亿美元投资于制糖业，糖厂数目达1,400家，产量达到45万吨左右——相当于世界糖产量的1/4，远远超过牙买加(50年代的糖产量仅14.8万吨)。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首次将英国的蒸汽机应用于甘蔗种植园(4台用于1818年的收获季节)。大的蒸汽动力工厂如今每年可生产约 1,000 吨糖，以牛拉为动力的工厂的年平均产量仍只能达到130吨。西班牙王室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允许公开买卖所有先前具有用益权的王室土地。王室还批准毁坏硬木林扩大种植面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马坦萨斯省的圣胡安河和尤穆里河河口、马坦萨斯、科隆和卡德纳斯三地之间开发了一个新的甘蔗种植园地区，大多数用蒸汽机的糖厂都开设在那里。1860年古巴最大的制糖厂就是马坦萨斯省的圣马丁糖厂，它所属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显然是西班牙的王太后。它使用800个奴隶，种植1,000英亩甘蔗，年产糖2,670吨。

早在1845年，先进的糖厂都修建了自备铁路通往哈瓦那，这

项革新大大降低了甘蔗运输费用。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古巴最早修建铁路，哈瓦那与贝胡卡尔之间的铁路于1837年通车，哈瓦那与圭内斯之间的铁路于1838年通车。在1830年，运载一箱内装二、四英担* 蔗糖的平均费用估计为12.50美元，1840年以后用火车装运的费用降低到1.25美元。19世纪20年代还出现了蒸汽机船。哈瓦那和马坦萨斯之间开辟定期航班与欧洲开辟这种航班是在同时。19世纪30年代，哈瓦那与新奥尔良之间已有汽船通航。19世纪中叶古巴的其他技术革新还有真空锅炉——1835年首次在古巴使用。这种先进的真空锅炉是夏尔·德罗纳根据诺贝尔·里利那的设想在巴黎发明的，实际上是一台协调全部工序的“制糖机”。这台机器1841年在古巴首次由德罗纳本人安装在文塞斯劳·比利亚——乌鲁蒂亚的拉梅利亚种植园。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蔗糖制造商对奴隶劳动的依赖。安装真空锅炉的工厂还能生产一种闪亮的新品种白糖，在市场上非常吃香。最后，古巴在1850年引进一台离心机，安装在华金·德·阿耶斯特兰的阿米斯塔得糖厂。这台机器能使离开轧滚后的甘蔗汁立即转化为纯净、松散、干燥的精制白糖以代替老式的糖块。这些技术的开发增加了买得起新设备的种植园主的财富，但是进一步压低了依然以牛拉动机器的老式糖厂主的收益，并且驱使他们投身叛乱。

292

那些增加新财富的种植园主可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前辈从西班牙（或巴斯克）来古巴后，靠经营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发家，后来将收益投资于种植园或通过取消抵押人的赎取权而获得地产。使用当时的大部分新技术的成就是这一类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胡利安·德·苏卢埃塔，19世纪60年代古巴最大的财主。第二类，是那些在18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接受西班牙王室授予的甘蔗种植园的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岛上的贵族。这些家族互相有紧密联系，把持哈瓦那市政府已有一百年之久。第三类，

* 1英担(CWT)＝100磅(美制)。——译者

是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这个岛上生活一代人时间以后，已经西班牙化（或古巴化）。以上三类人中的佼佼者已成为达到国际水准的富翁，获得西班牙爵位，常去欧洲或北美洲旅游、在哈瓦那建造了华丽的宫殿，在那里和其家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特立尼达的一个种植园主胡斯托·埃特罗建造了一幢附有罗马式浴室的住宅，浴室里安装两个有翅膀的小天使头，一个不断地喷出杜松子酒，供男人享用；另一个不断地喷出科隆香水，供妇女使用。

古巴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资金对西班牙兴办企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财政上错综复杂的联系是难以解开的，但关系还是密切的。例如，胡安·格尔—费雷尔用他的古巴资金投资于加泰罗尼亚的棉花事业。另一个古巴百万富翁巴勃罗·德·埃斯帕萨创办了毕尔巴鄂银行并担任第一任董事长。曼努埃尔·卡尔沃在1870年资助萨沃依国王阿马德奥进行竞选。古巴奴隶商人中有许多人(象胡安·希弗雷)在19世纪曾资助加泰罗尼亚的第一阶段 293 工业化。在此期间，督军、法官和其他官员继续利用他们在古巴当官的机会发财致富，然后将财产转移到西班牙。

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是奴隶。19世纪糖业经济的成功和古巴奴隶贸易的迅速扩展，意味着岛上黑人和白人的相对平衡趋于消失；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黑人和穆拉托人已占较大多数。但是到60年代，由于在这个世纪中叶有大量移民入境，白人再次成为最大的种族集团。1869年在大约 140 万人口中，奴隶约占27%，而40年代是44%。大约1/3的奴隶在农村劳动。在 60 年代，大多数奴隶是非法运进这个岛的，奴隶进口商违反1820年和1845年的反奴隶贸易法，成功地避开了英国海军根据1817年和1835年英西条约组织的反奴隶贸易巡逻队。奴隶依然可以根据过去的赎身制度，或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自由；在50年代每年大概有 2 千人这样获得自由。许多黑奴母亲可以用较少的金额为她们的婴儿买到自由。否则，一个奴隶必须付出他自己的市价才能获得自由——30

年代在500美元上下，60年代为1,000美元。人们认为，在1860年，获得自由的黑人和穆拉托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6%(24万)，他们进入官僚机构或大学没有太多问题。①

美国南方在内战中失败后，兼并古巴的计划破产，其直接后果是，在著名的古巴种植园主中间组成了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企图至少促成目前西班牙本土的进步商人正在推行的某些宪法改革。加入这个集团的某些种植园主，象米格尔·阿尔达马，先前就是合并主义者，但大多数人没有那些主张兼并的人富有。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即：参加上述活动的人中间，很少人（至少在60年少）拥有以最先进制糖技术装备的工厂(阿尔达马是一个例外)。他们希望缩小督军的权力，召开制宪会议，实行纳税比例代表制，扩大市政委员会的权力。

这一代具有改革思想的种植园主还确信，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奴隶贸易即将结束。1862年，美国一艘奴隶船的船长，纳萨尼尔·戈登，因装运890个奴隶前往哈瓦那而被绞死。这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惩罚。同年，美、英两国发起联合军事行动，企图最终取缔古巴的奴隶贸易。当西班牙政府自己在1866年通过新的法规时，奴隶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最后一批奴隶运入古巴是在1867年。西班牙和古巴的许多改革者支持废除古巴奴隶贸易，但相信奴隶制度本身可以在这个岛上保留下来。

---

① 波多黎各，历经三个世纪主要是一个停泊港口和军事基地，到18世纪末也开始出产蔗糖。从19世纪20年代起出口稳步增长，1870年达到10.5万吨（仅及古巴糖出口量的1/7，但稍多于巴西的出口量）。见安德烈斯·安东尼奥·拉莫斯著《1873—1898年机械化对波多黎各食糖生产体制的影响》(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7)，第一章，《1815—1873年甘蔗种植园制度在波多黎各的兴起与发展》。波多黎各还出产少量咖啡和烟草。形成了一些中等规模的种植园，有一些个别的技术革新。波多黎各的奴隶经济从未占优势。1846年奴隶人口达到顶点，为51,200人，占这个岛总人口的11.5%(拉莫斯著《机械化的影响》第46页)，在1870年仅39,000人。——编者注

可是维持奴隶制有赖于继续不断地进口奴隶（奴隶自身始终未能做到正常地繁殖，巴西就是这样）。因而人们认识到，总有一天古巴将面临没有奴隶的前景，不得不寻求其他劳工来源。一些种植园主已经开始从经济观点出发，提出契约工无论如何比奴隶劳工更为可取，而且奴隶的价格在过去20年内已上涨了一倍多。他们与加列戈斯人、加那利群岛人、爱尔兰人和来自尤卡坦的印第安人订立了试验性契约。最令人满意的是中国人：在1853至1872年间大约有13万中国人在甚至比非洲奴隶更坏的条件下输入古巴（如果旅途中的大量死亡也算在内的话）。

19世纪60年代的古巴改革者同两个开明督军——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多明格斯（1859—1862）和多明戈·杜尔塞—加拉伊（1862—1866）相处颇为融洽。1865年，双方同意派遣一个古巴代表团前往马德里商讨这个岛的政治前途。翌年在古巴第一次举行选举。诚然，选举权的财产条件很高，但同西班牙的选举权条件基本上一样。在马德里的情报委员会（它也有波多黎各代表）不仅讨论了奴隶制问题，还讨论了宪法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古巴代表相信，他们在说服西班牙政府对宪法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已取得某些进展，但是他们所有的工作都被马德里发生的又一次政变所破坏。这次政变让气量狭隘的纳瓦埃斯将军攫取了权力。改革者们回到哈瓦那没有带回任何关于政策和前途的建议。西班牙帝国内部的宪法改革似乎象与美利坚合众国合并一样，道路也被堵死了。

295

去马德里的古巴改革者过于绅士气，不可能去考虑发动叛乱争取独立，或许他们依然对18世纪90年代的海地叛乱心有余悸。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冒惹起一场危机的风险，在危机中他们可能立即失去自己的奴隶，虽然他们可能一直在考虑如何逐步消灭奴隶制社会。这种想法在19世纪古巴的大富豪中更为普遍，他们从未考虑过除了与美国合并以外的任何政治改革。少数早期的工会工作者，特别是烟草工厂中的工会工作者，只对提高工资、改善

工作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感兴趣。他们还没有考虑古巴的政治前途。他们所想的只是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如何向美国出售更多的雪茄和蔗糖。在19世纪60年代的古巴社会中唯一对叛乱感兴趣的一部分人是东部较小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主。他们穷困，作为地方性的种植园主阶层被世界大事搞得心事重重，他们在最近的甘蔗收获季节中赚不到钱，因为他们既没有钱去买新机器，也没有钱去增加奴隶。他们的工厂离哈瓦那太远——没有铁路和公路通到他们那里——不容易支配哈瓦那商人的贷款。东部有些种植园主抢先解放奴隶，让他们在收获季节到外面去挣工资。有些家族有足够的钱送他们的子女去欧洲或美国受教育，但这些人回来时头脑里装满革命思想，殖民地的习俗使他们苦恼，殖民镇压使他们感到羞耻。正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是在共济会员中间，叛乱的情绪于1867和1868年开始蔓延。

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甘蔗种植园主，虽然他在下面这一点上并不典型：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在西班牙失败的政治活动中度过。1868年，他在奥连特省自己的农场里召开公开大会，在会上浪漫主义地恳请他的听众们追随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所走的道路。毫无疑问，塞斯佩德斯的运动本来不大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可是当时在西班牙发生了严重动乱——一次军事叛乱，女王伊萨伯拉二世于1868年9月逃离马德里。随后在波多黎各也爆发叛乱。然后，古巴东部为一个种植园主路易斯·菲格雷多在他的农场内绞死了一个西班牙税务官并把他当做歹徒要求大家揭发他的罪行。古巴的叛乱开始了。塞斯佩德斯解放他的奴隶，10月10日在拉德马哈瓜他的庄园里建立了一支147人的小部队，模仿《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宣言《亚拉的呼声》。这就是“十年战争”（1868—1878）古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开始①。

① 1870年波多黎各自由改革党（后为自治党的成立，表明庄园主的政治斗争的恢复。这个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得到某些专门职业者和手工业者的支持。——编者注

到1868年，未来古巴社会的模型已经形成，后来就保持了那个样子。古巴的人口已经表现出它的大部分现代特征——西班牙血统和居民稍过半数，黑人和穆拉托人稍低于半数，此外，还有少数中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等。这个比例自1868年以来基本上保持不变，虽然奴隶制最终消亡，20世纪第一个25年期间有很多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到19世纪60年代，制糖非常肯定地是主要工业，生产的数量很大，以满足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这种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整个古巴经济一直围绕着甘蔗的收获运转，以后也始终如此。制糖业的结构不久后发生了某些变化，其特征是糖厂的数量减少而甘蔗种植面积增加。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有了廉价钢材，可以修建更多铁路线，二是70年代甜菜的竞争。这种情况又导致克里奥尔旧贵族的衰落，1900年以后由公司起而代之，1960年以后，这些公司又被国营农场所取代。但是制糖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多大变化。最后一点，追求叛乱思想的两代人（有的流亡，有的隐藏在哈瓦那的秘密地点）给古巴的民族文化增添了一种崇尚英雄主义和造反精神的感情（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①

---

① 在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议会通过了莫雷特法(1870)，一项有条件地让奴隶新生婴儿获得自由的法律，也让超过60岁人的奴隶获得自由。波多黎各在1873年废除奴隶制。在古巴，1880年7月29日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对奴隶主没有实行补偿，而是实行一种监护制度(a system of patronato)，一直实行到1888年。监护制度最终在1886年10月7日废除(那时在古巴仅有约25,000个被监护人)。关于古巴废除奴隶制，见劳尔·塞佩罗·博尼略著《糖与废奴》(哈瓦那，1948)；阿瑟·F·科温著《西班牙与古巴废除奴隶制，1817—1886》(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7)；富兰克林·W·奈特著《19世纪的古巴奴隶社会》(麦迪逊，1970)；丽贝卡·J·斯科特著《逐渐废除和古巴奴隶解放的动态，1868—1886》，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63/3(1983)，第449—477页，以及《古巴的奴隶解放：向自由劳动的转变》(即将出版)。——编者注

第　三　篇

独立后的西班牙美洲



第 8 章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后*的经济与社会状况①

在1808年至1825年期间，西班牙美洲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到这个世纪中叶，西班牙美洲经济开始更充份地和日益扩大的国际经济结合起来，从70年代起这种结合变得更加明显。和这种充份的经济结合相比，政治独立的成就所引起的变化可能显得非常肤浅和有限。然而这些变化构成了西班牙美洲与世界其余部分关系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从18世纪末期起，旧的殖民主义商业体系开始瓦解，但只是在1808年以后，西班牙作为西班牙美洲与欧洲其余部分——特别是英国——的商业中间人的地位才最后消失。当时欧洲和所有大西洋国家的特殊处境对西班牙美洲未来的商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法国军队挺进伊比利亚半岛(它触发了美洲各殖民地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程）的意图是为了完成欧洲大陆对英国贸易的封锁。英国在越来越同它的欧洲市场相隔离的情况下，怀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紧迫感设法寻找另外的市场。因此，葡萄牙宫廷迁往里约热内卢所造成的第一次同巴西直接进行贸易的机会，英国迫不及待地把它抓住了。西班牙国王在马德里被推翻之后，西班牙美洲发生了第一次政治动乱，里约热内卢不仅变成了英国在巴西本身，而且也变成了英国在西班牙美洲——特别是拉普拉塔河

* 本章所讲的西班牙美洲“独立后”或“独立后时期”(Post-independence Period)，是指独立至19世纪70年代这一段时期。——译者

① 本章由理查德·萨瑟恩博士根据西班牙文译出，译文经编者修订。



墨西哥
墨西哥城
韦拉克鲁斯
海地
圣多明各
(1822—44年被海地占领)
古巴
(西属)
波多黎各(西属)
牙买加(英属)
中美洲联合省
特立尼达(英属)
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
新
格
波哥大
拉
纳
达
基多
厄瓜多尔
亚马孙河
巴西帝国
秘
鲁
利马
萨尔瓦多
(巴伊亚)
拉巴斯
玻利维亚
苏克雷
巴
拉
圭
亚松森
里约热内卢
阿根廷联邦
圣地亚哥
智利
布宜诺斯
艾利斯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2000 公里
1000 英里

1830年的西语美洲

地区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发动咄咄逼人的商业攻势中的货物转运口岸。

300 拉普拉塔河地区早在1809年就由最后一任西班牙总督向英国开放贸易。然而，英国以后扩张到西班牙南美洲是依靠革命武装的运气，因为尽管保皇派行政长官们最终表示准备作为一项例外措施开放他们的领土同英国进行直接贸易，但是爱国者的私掠船活动使得这种贸易失去了吸引力。智利是在1818年才最终开放的，利马直到1821年，而秘鲁的其余部分开放得更晚一些。在加勒比海周围国家，〔独立运动〕进展缓慢而且不很彻底。委内瑞拉的独立战争和新格拉纳达一样，持续了10年之久。拥有西属西印度地区一半以上人口与财富的墨西哥取得独立较晚（1821年），圣胡安德乌卢阿岛上的保皇派更是又过了几年之后才被消灭，这种情况使墨西哥在加勒比海的主要港口韦拉克鲁斯受到影响。古巴岛和波多黎多岛仍是西班牙的属地，但是它们从1817年起就敞开大门同外国进行直接贸易，尽管这种贸易受到限制（为了替西班牙产品——从纺织品到面粉——保留这最后一个殖民地市场）。圣多明各在1844年以前一直处于海地占领之下。

因此，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是纳入英国新商业体系的第一个地区，迫使英国迅速扩大其海外市场的处境也是最早在那里产生最大的影响。在1808年至1812年期间，大批英国商人冒险家到达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几年之后，瓦尔帕莱索变成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港口，成为英国货物转运到从拉塞雷纳到瓜亚基尔各沿海港口的中心。从事探查和开发拉丁美洲市场的这些商人冒险家是直接为英国的商人和工业家进行活动的，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为威胁到英国经济增长的剩余商品找到一个市场。从一开始，他们所关心的就不是价格，而是迅速售出货物和迅速获得收益（贵金属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收益形式）。为了实现这种商业渗透，英国货物所订的价格往往比原先计划的价格还要低。例如，1810年，在听到放宽贸易和布宜诺斯艾

利斯外交革命的消息后，许多商人冒险家离开伦敦，到南美洲去 [301] 出售英国货物，然而当他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不仅发现那里的英国商人冒险家太多，而且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同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商人竞争。结果他们不得不赔本出售，从而使英国海外产品加速战胜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上那些来自安第斯山麓或来自秘鲁和上秘鲁的传统产品。另一个后果是，把以前没有进入消费者市场的社会集团也包括进来，扩大了现有的消费者市场。

拉丁美洲向外部世界开放贸易和英国人的大量来到还给老式的商业习惯以严重打击，这些商业习惯（至少在西班牙美洲）一直是建立在死板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西班牙的出口商同西班牙美洲各港口和销售中心的西班牙商人联系，后者同小城镇的小商人联系，小商人再同活动商贩联系。这一制度的基本办法是逐级贷款（在墨西哥称为avio，在西班牙南美洲称为habilitación）。这就是说，等级制度高阶层的那些人向低阶层的那些人以贷款方式提供资本，保证每一阶层都能得到非常高的利润，尽管从提供贷款所得的利润并不总是容易和从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商业活动的利润区别开来。英国人拚命要在这一商业制度的低阶层使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尽管是零零星星的），他们的介入具有毁灭性影响。由于他们宁愿以低价迅速出售产品并且宁愿使用现金而不使用贷款，这就开始在各个阶层提供一种代替旧制度（这种制度使最高层的人得到最大利益）的办法。

独立战争期间长期的政治、社会与军事不稳定为英国和平入侵西班牙美洲提供了便利（不稳定局面削弱了当地潜在的对手）。商人冒险家很快看到了从这种不稳定状态中谋取厚利的机会。他们不是设法去建立正常的商业关系，而是采取一种投机的贸易方式。例如，罗伯逊兄弟从巴拉那河畔匆匆来到圣菲省出售巴拉圭马黛茶，那里由于缺货，价格非常昂贵。① 再如，1821年当圣

① J.P.和W.P.罗伯逊著《巴拉圭通信》（伦敦，1838）第1卷，第358—359页。

马丁正在智利准备发动进攻夺取利马时，巴兹尔·霍尔受伦敦商人的秘密委托把一批货物抢在竞争者之前运到利马；他得以从那个长期隔绝的市场——它是秘鲁总督辖区的首府——“取得最大好处”①。

这种贸易对当地竞争者来说是致命的，但对英国商人冒险家来说也不是没有风险。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大胆，很少人在这一探索和征服阶段结束时还幸存下来而未受伤害。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条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经济的需要迫使商人们不断扩大市场，而市场显然是有限的，因为当地的需求无法使之实现；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每次扩大市场的尝试肯定都要以失败告终，因为只有这种失败才能使这种尝试走到终点。可以理解，关于受害者的令人痛心的消息越积越多。然而，没有一个受害者使他本人为之做出贡献的全面进展发生倒退。即使那些从英国人的观点而不是从拉丁美洲人的观点来评价结果的人，也难以说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没有为未来留下一笔重大遗产。尽管英国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出口不再像1809年和1811年那样占英国全部出口的35％，然而，1820年至1850年期间平均每年向拉丁美洲出口约500万英镑（其中大致上一半出口到西班牙美洲，一半出口到巴西），按价值计算，比18世纪后半叶的平均数翻了一番（按数量计算增加了好几倍）②。

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英国逐渐失去它在独立战争期间获得的商业上的准垄断地位。这一优势遭到美国竞争的威胁。美

① 塞缪尔·黑格著《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和秘鲁概略》（伦敦，1831）第Vii页。

② 关于1820—1850年英国对拉丁美洲出口数字，见D.C.M.普拉特著《1806—1914年拉丁美洲与英国的贸易》（伦敦，1973），第31页。你是否和普拉特教授一样得出结论认为，独立后三十年的数字同“关于殖民地贸易的残存下来的估计数字”并非“完全不符”，这取决于是否认为贸易翻了一番是一个重大变化。当然，如果和19世纪后半叶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这种变化可能显得不大。

国商人在优越的商船队的支持下，率先实行一种比较灵活的贸易和航运制度。他们不是像他们的英国竞争者那样为工业经济的需要服务，所以他们不只是把美国的货物而且还把欧洲的、非洲的和东方的货物运往拉丁美洲市场，特别是运往英国人供应最差的那些市场。（英国人倾向于模仿他们的前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作法，偏爱那些最富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然而，美国出口产 303 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用纺织品”，即比曼彻斯特产品粗糙和便宜的布。当工业革命的进展所造成的长期价格下跌抵销美国的价格优势时，它就消灭了对英国商业优势提出的挑战中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因素。因此，尽管美国贸易能够取得地方性优势（例如，它在这个世纪中叶曾在委内瑞拉同英国贸易一争高低），但是这种优势并没有引起伦敦和利物浦的惊恐。

拉丁美洲除了与北美进行贸易外，和法国、德国各邦、撒丁以及昔日宗主国的贸易也越来越频繁。然而，这些贸易看来只是作为英国贸易的补充而不是和它竞争。法国在奢侈品市场居领先地位，德国（和独立前一样）在半奢侈品方面占先，这并没有影响英国在范围更加广的大众消费品方面的支配地位。法国、撒丁、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再一次成为越来越多地向拉丁美洲出口农产品（葡萄酒、油类和小麦）的产地国家。由于独立战争的非常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人们很难指望英国在这些产品的出口方面继续保持过去通过直布罗陀所曾取得的优越地位。

因此，英国在作为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国方面还是保持了领先地位。同时它也是拉丁美洲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尽管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像巴西的咖啡）并且英国的这一地位比它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地位下降得更为迅速。英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这种商业关系由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金融交易中的“在伦敦结账”这一支配性作用而得到加强。

1808年从英国对西班牙美洲出口的增加对这个地区的贸易平衡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尽管有1778 年—1782 年

间的所谓"帝国自由贸易法"的影响)，西班牙美洲的出口额一直高于进口额，现在这种情况颠倒了过来。当然，大部分贸易差额由出口贵重金属来补足。在殖民地时期，贵重金属一直是西班牙美洲的主要出口品项目(它在18世纪的前2/3时间里在巴西出口产品中占主要地位)。然而，巴西的黄金繁荣已一去不复返了；西班牙美洲的金银开采业虽然直到独立危机的前夜生产并没有严重下降，但在战争期间产量大幅度下跌(上秘鲁是唯一的重大例外)。 304
因此，19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中西班牙美洲大量出口金属货币是资本流失(甚至是资本外逃)而不是继续出口或恢复出口传统产品，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种资本外逃有许多原因。政治不稳定导致许多西班牙人离去，这是原因之一。当然，征服了拉丁美洲市场的英国人的商业习惯也造成贵重金属的外流。然而，早在1813年—1817年期间，作为第一次英国商业攻势的特色的那种势头就已放慢。从19世纪20年代初期起，大部分拉丁美洲新国家在一系列商业条约的支撑下建立起比较正规的制度，这些条约保证贸易自由，它们是作为英国承认这些国家的先决条件强行签订的(没有任何谈判的可能性)。英国商人开始采取类似他们的前辈西班牙人所采取的那种贸易方式，包括使用信贷。但尽管如此，即使在英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同时也下降的时候，拉丁美洲的贸易不平衡状况还在继续。因此，根本原因看来是出口停滞。拉丁美洲某些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领域(尤其是采矿业)，出口大大低于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十年。同时，新的商业制度的特点对当地资本积累不利。相反，正当更大规模地进入世界经济提供了进行投资的大好机会时，却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大量贵重金属白白浪费在进口消费品上面，而且进口的数量达到了拉丁美洲的正常出口所无力承担的水平。如果不增加出口品的生产，甚至连19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降低了的国际贸易水平也无法维持，而增加出口品的生产需要有远远超过当地资本所能提供的大量投资。当

时某些人认为(和一个世纪以后某些人的看法一样)，如果英国希望保持甚至扩大它同拉丁美洲各新独立国家的联系，它们的商业关系就必须有提供政府贷款和私人投资的金融关系相伴随。这是英国代办H.G·沃德爵士1827年提出的关于墨西哥前途的建议，305 沃德爵士是一位有洞察力然而绝非公平无私的观察家。根据他的意见，英国投资者的首要责任是装备采矿业，从长期看这将为在被忽视的和人口稀少的热带低地开发作物创造必要的资本，从而给予墨西哥出口以新的推动力。然而，从短期看，装备采矿业将是让墨西哥继续为它扩大了的进口付钱。毫不奇怪，沃德激烈反对另外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限制进口和鼓励当地生产(例如纺织品)来实现平衡①。

在拉丁美洲投资并不是英国商人主要关心的事，因为他们希望支持一种有来有往的贸易交流。投资对于寻求高额和快速利润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然而，他们很快就大大失望了：尽管这些新国家的债券和为了开发拉丁美洲各国矿产而在伦敦发行的公司股票最初在1823年至1825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大繁荣时期运转顺利，但是到1827年，除巴西以外，所有国家都已停止支付债券利息和分期偿还债款，只有少数墨西哥矿业公司免于破产。

在这个世纪的下一个25年(1825—1850年)，拉丁美洲和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商业关系。在金融关系方面，继续存在的只有一些组成股份公司的采矿企业(它们因经营不佳，无人起而仿效)和由感到失望和不满的债券持有人组成的若干委员会，他们焦急地注视着拉丁美洲经济改善的迹象，以便提出他们的债权要求。即使是设法避免停止付款的巴西，许多年来也不愿再求助于外债。

然而，既然贸易不平衡没有立即消失，在这一时期必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来自外部的贷款和投资，至少是以(在不再有任何比较

① H.G.沃德著《1827年的墨西哥》(伦敦，1828)第1卷，第328页。

有效的制度化机制的情况下)维持某种平衡。首先，从1820年起，为建立现有比较正规的商业体系(仓库、运输手段等等)进行了必要的投资。其次是至少部分地用于生活设施方面的投资(甚至在一些较小的商业中心，外国商人一般也拥有最好的住宅)。其他投资来自经营工业企业或更多的是经营农业产业的商人。然而，在巩固和正规化时期，只有假定这些外国常驻商人继续充当宗主国* 商人或资本家的代理人或合伙人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才能抵销拉丁美洲各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差额。要肯定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地区都可以找到这种关系的例证。

对拉丁美洲来说，独立使它在比过去有利的条件下重新确定了它同宗主国的关系。不仅是商业关系不再附加直接的政治控制，它还消灭了以前殖民地关系中负担最重的财政因素。新的商业宗主国拥有远比以前的殖民国家的工业经济更具活力的工业经济，至少从短期来看，它的代理人准备以较低的利润幅度在新市场上销售更多货物。虽然从19世纪20年代起，拉丁美洲同英国的贸易已更加类似殖民地时代晚期拉丁美洲同英国的贸易，然而工业革命的稳步前进保证了拉丁美洲从长期来说可从英国出口品价格下跌中得到好处——虽然由于一些暂时的情况会有波动。到1850年，一些最大众化等级的棉布(它仍是向拉丁美洲出口的最重要物品)的价格比1810年—1820年时期下降了3/4。其他产品的价格没有下降得那么多，如呢绒由于直到1850年前后还没有进行技术改造，价格只下降了大约1/3。由于英国海关分类制度的改变，其他产品——例如瓷器和玻璃——不太容易进行对比，但是它们的价格看来同样也有下降，而且在全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例

* 此处的宗主国(metropolitan countries)不是指拉丁美洲过去的宗主国西班牙或葡萄牙，而是广义地指从经济上控制拉美国家的欧洲和北美经济、殖民大国。下同。——译者

要比纺织品小得多。总起来看，在这个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品的组成与放宽贸易的最初几年基本上一样，但其价格看来已下降到1810年—1820年时期的一半左右。

307 在这几十年中，初级产品的价格也趋向下降，但不那么明显。白银同黄金的比价下降了6%，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皮革价格下降了30%左右，咖啡和糖的价格下降幅度与此相仿。只有烟草价格下降了50%左右①。直到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朝着有利的贸易条件转变的初步迹象才变得明显起来。

说来似乎矛盾的是，出现这些有利条件的结果是，拉丁美洲向世界贸易开放并没有产生1810年以前所预期的那么深刻的后果。由于可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似乎并没有立即受到威胁，结果是鼓励了增加出口量而没有促进生产技术进步以降低成本。总之，发展出口部门的努力由于缺乏当地资本而受到严重限制，而战争和前面讲到的独立时期的贸易不平衡加剧了当地资本的缺乏。

然而新的对外关系之所以未能充分引起变化，主要是由于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是商业性质的。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在随着1823年—1825年大繁荣而来的短暂的乐观时期），宗主国才考虑过资本投资，以扩大出口品生产并使之现代化；我们还看到，这些企业后来的命运就是如何确保它们在几十年内保留它们的例外性质。

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看到缺乏当地资本和外国资本家不愿在这个地区投资是拉丁美洲出口经济在独立后时期增长缓慢的主要原

① 英国出口产品价格是根据伦敦档案局海关部分第6辑关于有关年份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产品的申报价值。关于从拉普拉塔河地区进口的皮革的价格，见T.霍尔珀林·唐伊著《布宜诺斯艾利斯农村畜牧业的发展》载《经济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第65页。关于委内瑞拉咖啡价格，见米格尔·伊萨尔德著《委内瑞拉历史统计丛书》（梅里达，1970），第161—163页。关于食糖和烟草价格，见M.G.马尔霍尔著《统计字典》（伦敦，1892），第471—474页。

因。那个时代的观察家通常首先注意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为了评价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必须记住，被破坏的不仅仅是资源——也就是指交战双方军队所吃掉的牲畜、被水淹没的矿井、从公共或私人保险柜中攫取的钱财——而且还有一整套经济、司法和社会关系。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在损失清单中列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上考卡或秘鲁沿海的种植园主和矿主失去对他们的奴隶的控制；强迫招募秘鲁高原的工人到上秘鲁的矿井做工的"米塔"制度的结束，以及由于以后这两个地区政治上分离而无法恢复这一制度；智利向过去的秘鲁市场提供的小麦出口发生波动；整个安第斯山区买卖骡、粮食、酒类和手工纺织品的复杂交易遭到破坏等等。我们甚至还可以列入战争的间接后果。除了作战地区的矿井遭到破坏外，其他地方的矿井，因战争原因而使矿主多年不注意进行必要的投资，生产也下降了。用这种办法看战争遗留下的后果，它的确显得非常严重，尽管难以做出确切估价。甚至连实际损失也从来未能作出恰当估计。此外，像拉丁美洲向世界开放贸易的影响一样，战争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部门分布也很不均衡。 308

在西班牙美洲和欧洲都有人预计，矿产品将非常可能迅速利用开放贸易所提供的机会，但是乐观情绪逐渐消失了。在这个世纪中叶，只有智利的矿业生产超过殖民地时期的产量(那时产量也很小)。在西班牙美洲其余部分，有些采矿地区的生产经过严重下跌后又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这些算是最成功的地区，许多地区，例如新格拉纳达或玻利维亚，生产恢复得更晚一些；另外一些地区始终没有恢复。

成绩如此令人失望的原因是复杂的。为了比较充份地了解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强调，引起失望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短暂的投资热时期(它在1825年危机中突然中止)欧洲有点人为地抱有也许是过高的希望，这种过高的希望又蔓延到西班牙美洲。如果从16世纪开始的西班牙美洲整个矿业史的背景出发来考虑，在我们看来，1810年至1850年期间采矿业的发展状况似乎不是当时它

所处的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所造成的结果，而当时的观察家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采矿业经历了发现、开采和枯竭的周期。因此，墨西哥或者甚至秘鲁在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十年已经达到最高生产水平，在恢复和平后需要25年时间来恢复，这完全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如果我们记住智利的采矿中心是在独立后才发现的查纳西约矿，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智利在独立后最早享有矿业繁荣了。墨西哥矿业的恢复，和更晚些时候在玻利维亚一样，并不是由于以前老采矿中心的生产恢复到了原有水平，而是由于在萨卡特卡斯和其他一些州出现了新的采矿中心。尽管如此，人们对独立后矿业生产和出口状况感到失望，看来仍然是有道理的。有理由希望商业革命通过刺激进口品的数量和价值的增长导致更加迫切地需要增加出口，特别是贵重金属的出口。因此，用繁荣——危机周期(它是由发现或耗尽富矿脉决定的)来解释采矿业反应迟钝的原因就不够了，需要考虑作出另外的解释。

304

那些在1825年前曾被表面上的光辉前景所吸引的外国人多半从文化和体制方面来解释，那是毫不奇怪的。诸如：统治阶级道德败坏，举止轻浮；难以找到具有必要素质的矿工；在发生违反工业纪律的事件时(包括外国企业家在内)，统治阶级对工人过于宽大；管理采矿业的法律性质刻板，等等。这里我们不打算研究这一大堆指控，这些指控主要反映了西班牙美洲人与那些试图介入西班牙美洲经济的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外国人不再限于经商而且进入了生产活动的地方，这些分歧自然就更加尖锐。

妨碍矿业部门取得进步的其他障碍完全是属于经济方面的，那就是缺乏劳动力和资本。在西班牙美洲所有矿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两个因素。然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个地方都夸大了招募劳动力的困难。毫无疑问，墨西哥这个殖民地时代后期最富的矿区所遭受的战争损失严重地阻碍了战后的重建工作，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缺乏劳动力到如此程度。独立以后，矿工得到

的货币工资比农业工人高，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总之，这并不一定表明实际工资有任何差别。此外，即使上面提到的采矿业中的 310 "米塔"制度的结束使独立后的玻利维亚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然而独立后最初几十年间自由工人的工资更接近于"米塔"制度下的工人所得的工资，而不是接近殖民地时期自由工人的工资，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①，这并不说明缺乏劳动力。此外，新的矿区或者那些表明扩大最迅速的矿区，似乎并不比老的肖条地区更难招募必要的劳动力。例如，智利采矿业的扩大看来并没有因缺乏劳动力而受到阻碍。

缺乏资本所造成的问题看来更严重。战争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似乎不那么容易弥补。实际军事行动对矿井和加工厂的破坏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关矿区属于战区。中断用于扩大和维修方面的投资具有更持久的影响。西班牙美洲的采矿业要得到恢复，必须先进行集中的资本投资。然而从这个观点来看，1850年以前的矿业发展看来并不是太不令人满意的：由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有英国和当地的资本，智利和秘鲁有几乎完全是当地的资本，事实上矿业有一定的恢复。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投资不是更集中一些，结果更令人瞩目一些呢？从那些负责作出投资决定的人的观点来看，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除智利以外，矿业投资都得不到收益，或收益很低。例如在墨西哥，英国雷亚尔·德尔蒙特公司（一家在大繁荣期间成立、1825年结束的最重要的公司）的投资完全没有利润。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没有采取使矿井摆脱停滞状态的措施，相反，公司作了若干耗费钱财的努力来进行改善。它继续——尽管收效更少——以前业主的努力，把水从矿井低层抽出，在一个以前只有骡子做交通工具的地区修了一条供车辆行驶的道路。雷亚尔·德尔

① 路易斯·佩尼亚洛萨著《玻利维亚经济史》（拉巴斯，1953—1954）第1卷，第208页；第2卷，第101页。

蒙特公司有十足的理由来抱怨它的命运不济：它进行25年投资遭到亏本之后，开采权转移到当地企业家手里，后者很快就开始赢利，部分是靠原来那些资本。① 然而，那个时代的观察家似乎准备从这个经验中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教训：H.G.沃德——他绝不是在墨西哥成立的一些英国公司的公平无私的辩护士——心甘情愿地承认，在改善生产、开采和运输方面进行巨额投资的决定是轻率的。在西班牙美洲另一端，约翰·迈尔斯在智利开采铜未获成功，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他也认为，对于每一项拟认中的技术改进预计会产生什么经济影响，必须加以仔细研究；在不采取技术革新的情况下为增加产量而进行投资也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②。就这样，保守态度使人们在考虑向采矿业进行新投资时更加谨慎小心，除非象智利的情况那样是特别富的矿脉，保证可以迅速得到大量利润。这种保守态度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流行风气，在这个时期中没有可与这个世纪后半叶相比拟的技术进步。

战后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导致在组织采矿活动方面采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新措施。在劳动力方面，毫无疑问，雇佣劳动现在起主导作用，即使在殖民地时期没有起主导作用的地方。玻利维亚的情况肯定是如此，新格拉纳达金矿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即使在那里，奴隶劳动的重要性也明显减少。然而在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年获得最迅速发展的矿区，雇佣劳动那时也已经起主要作用。当然，这样说还是掩盖了西班牙美洲从墨西哥到智利小北地区不同地区的非常不同的实际情况。洪堡发现墨西哥的工资水平高于萨克森当时的工资水平；小北地区则否认(比其他地区更能令人信服)那里有真正的雇佣劳动力。这种多样性在过渡到独立之

① 罗伯特·W.兰德尔著《墨西哥的一家英国采矿企业：雷亚尔·德尔·蒙特公司》(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2)第81页，100—108页，54—56页。

② 约翰·迈尔斯著《智利和拉普拉塔河地区游记》(伦敦，1826)，第2卷，第383—385页。

后继续存在，尽管毫无疑问，从停滞转变到迅速扩大必然影响到智利矿工的状况。

在殖民地时期，采矿业本身的组织方式同样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墨西哥，用自身利润来扩大经营的大生产单位居主要地位，它们有时甚至能够用利润来购买经济上和矿井结合在一起的农业财产。在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生产单位较小，不能摆脱它们的供应者和资助它们继续经营的人而真正独立（上秘鲁的情况是，矿业家不得不经常向握有开采权的不在业主付高昂租金，这种情况使采矿企业家的处境进一步恶化）。①独立之后，墨西哥和秘鲁在这方面的悬殊差别继续存在。直到1879年，莫里斯·杜·沙特内还评论说，塞罗德帕斯科的采矿企业家大多数不是“有资本可以利用的阔人，……而不得不向别人借钱。”他们不得不以低于正常的价格向他们的债主出售产品。②迈尔斯曾描述过19世纪20年代智利铜矿区的类似情况。然而，1831年后智利采银业的繁荣导致了一个矿业企业家阶级的兴起，他们不仅独立自主，而且取得了成功，足以在这个世纪中叶后有大量资本进行投资；最富有的企业家成了智利中部城乡大资产所有者。同一时期在玻利维亚，管理采矿业活动的法律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取消了不在业主拥有的特权，并且通过提供新的特许权来鼓励兴办比殖民地时期更大的采矿企业。然而，由于玻利维亚银矿业在独立后时期停滞不前，因此直到19世纪最后30年人们才感觉到这些变化的后果。

因此，西班牙美洲采矿业的扩大几乎到处都受到资本不足的限制。对资本的需求从来都只能得到部分满足。然而，限制拉丁美洲出口经济扩大的另一个因素——需求水平——总的说来并没

312

① 约翰·费希尔著《1776—1824年殖民地时代秘鲁的矿井与矿工》，（利马，1977），第101页。

② 莫里斯·杜·沙特内著《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实况》（载《民用建筑与矿井建筑流派年鉴》），第1辑，第1卷（利马，1880），第119页。

313 有影响采矿业。的确，在19世纪20年代，智利铜的生产有盛有衰，这主要是英属印度对铜的需求先是增长后来又猛降的结果①。但是在整个地区，白银比任何其他矿产品都远为重要，人们需要用西班牙美洲的白银铸造银币，这种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致无法想像扩大生产何处是止境。农业部门不可能指望有这样一种稳定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依靠有关的商品，也有它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不像独立斗争期间垮掉的某一种采矿业那样必须进行大量投资后才能实现利润。

能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益的生产部门是畜牧业。此外，它也许比任何其他部门更受有无国外市场的影响。从拉丁美洲开始殖民化时起，养牛业就成了利用土地资源的途径，而当时还不可能有比这更有利可图的办法。在当时不能指望有令人满意的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养牛业分布的地区极其广大：从墨西哥北部到巴西东北部（在巴西境内，米纳斯吉拉斯的采矿业繁荣结束后，又扩大到这个州）；从新格拉纳达高地到委内瑞拉平原和中美洲广大地区，一直到智利中央河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巴西南部。在19世纪前50年中，一种技术上还非常落后的开发行业意味着没有必要（以后才有必要）把养牛业限制在这些广大地区的最适宜的土地上。因此，之所以这些地区中只有一部分地区并入新的出口经济，其原因与生产方法无关，而更多的是和商业有关。善于把生产导入独立前和独立后的商业网络的能力，才是拉普拉塔河地区、委内瑞拉和巴西南部的养牛业取得成功的原因。

有些地区由于没有资本或极其缺乏资本，又由于人口非常稀少，社会秩序在若干情况下受到动乱时代进一步影响，扩大养牛 314 业生产主要靠扩大可以利用的土地。然而，正如约翰·斯蒂芬斯

① 英国驻瓦尔帕莱索领事查尔斯·R·纽金特的报告，1825年3月17日，载R. A.汉弗莱斯编《英国领事关于拉丁美洲贸易与政治的报告集》（伦敦，1940），第96页以下各页。

在19世纪中叶所指出的那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养牛人越来越富，而中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养牛人一贫如洗，二者的差异十分惊人。当然，原因在于那些在中美洲拥有相当于一个欧洲公国的面积那么大的地产的人无法出售他们无用的财富，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地主可以自由进入欧洲市场①。这是因为放宽贸易后拉普拉塔河地区扩大进口比别的地方早一些和多一些，这种情况创造了不断出口的需要,因为只有不断出口才有可能不断进口。在智利，尽管不存在可以同拉普拉塔河地区相比拟的自然条件，但是它为了出口也扩大了养牛业，虽然数量小得多。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瓦尔帕莱索的进口商需要货物运往欧洲，他们的船只返航时也需要货物。他们有时还自己承担出口畜产品的责任。因此，在其他受到贸易开放影响较少的地区，妨碍其扩大出口的因素是没有川流不息的进口，在这个世纪中叶，瓜亚基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太平洋沿岸的情况尤其是这样。

开放贸易使拉丁美洲的牲畜饲养者得以进入欧洲市场，这个市场早先由俄国控制，现在仍由俄国控制。这种情况限制了拉丁美洲扩大生产(主要靠土地极其丰富和便宜)的可能性。欧洲市场长期以来皮革价格下跌，危险地浸蚀了地主的利润幅度。当然，皮张保持了它作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地位，但饲养业是靠畜产品的多样化来维持和扩大的。腌肉出口在独立战争以前即已开始，到1820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继续增加，一直到这个世纪中叶。奴隶是腌肉的主要市场(主要在古巴和巴西)。牛脂从1830年起开始在对欧洲出口产品中占更大比例，它的价格几乎不断上涨，与皮革适成对照。出口的牛脂大部分不再是生的，严格说来，是用蒸汽浓缩的精制油脂。例如，拉普拉塔河农村地区的地主和商人设立了“蒸汽工厂”。因此，它的生产包括一个制造阶段，但是对 315

① 约翰·L.斯蒂芬斯著《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旅行记事》(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49)，第1卷，第300—301页。

劳动力的数量和专业化要求或对投资的需求并不大。牛肉生产需要更加重要的制造程序。在港口或港口附近建立的腌肉厂通常至少需要集中50名工人，大一些的工厂有时集中几百名工人，这些工人多有专职，分工很细，包括从屠宰到切块抹盐和晒干等各个加工阶段。在巴西南部，此类具有许多资本主义特点的制造企业大多使用奴隶劳动力，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和智利，腌肉工厂的劳动力是雇佣劳动者，能得到当时拉丁美洲城市中专业工人所享受的高水平报酬。①

养牛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也由雇佣劳动者组成，工人得到货币工资，不受非经济压迫，也不是因交通不便而非得把他的工资全部用于从他的雇主那里或从雇主同意在庄园做生意的商人那里购买东西。像驯马人、钉马掌的铁匠和赶骡人等临时工人和专业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的工资一概都高于长期工人的工资。然而，即使长期工人可能未能作为消费者直接进入市场（这一点并不是在所有工厂中都很明显）并且是一些立法措施的受害者（有些法律规定他们必须经常被雇佣，违者处以监禁、强迫劳动或征召入伍的惩罚），但是根据所有养牛地区的证据来看，这一整套经济与政治控制机器只是用来保证在养牛的庄园上确实有劳动力，它的纪律惩处一直是不完善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养牛业本身的性质，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劳动力。

在19世纪初期，多种类型的牲畜饲养业中，养牛业（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半空旷地区）受放宽贸易的影响最大。绵羊、山羊和美洲本地牲畜的饲养业都在老的、人口比较稠密的传统地区，但是直到这个世纪后半叶它才发生变化，当时新的商业压力变得更强，

316

① 关于巴西南部情况，见费尔南多·H·卡多佐著《巴西南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南里奥格兰德奴隶社会的黑人》（圣保罗，1962）。关于拉普拉塔河地区情况，见阿尔弗雷多·J·蒙托亚著《阿根廷腌肉厂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

并且更均衡地扩展到整个西班牙美洲。在紧接着独立后的时期，只有秘鲁的羊毛出口有明显扩大(包括绵羊毛和安第斯山的驼羊毛)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由于产毛牲畜头数增加，宁可说这是以前由安第斯山区纺织业利用的毛纤维转向出口的结果。①

某些农业部门成功地利用了放宽贸易所提供的机会，尽管没有一个部门像养牛业那样彻底地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温带作物(谷类、葡萄和橄榄)只可能取得有限的增长，因为欧洲市场的需求没有增加并且运费昂贵。烟草(它在热带气候和温带气候中都能生长)的出口直到这个世纪中叶才有明显增长；只有在哥伦比亚，这一进程早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就已开始。西班牙一直是可可的主要市场，因此外贸结构的变化对可可生产并没有像它对其他出口农作物那样产生有利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厄瓜多尔沿海，甚至在委内瑞拉(它在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年一直是可可的主要产地)，可可出口的绝对值稍有增加，但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

在委内瑞拉——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厄瓜多尔——可可一直是用奴隶劳动生产的。厄瓜多尔从独立后开始重建经济时起，由于战争期间解放奴隶和强迫入伍而缺乏的劳动力——虽然这里不像别的地方那么严重——看来是由从沿海和高原来的印第安人补足的。并不是把印第安人组织在像传统的大庄园那样的单位中进行生产，而是让他们在大庄园主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把他们的一部分收成交给大庄园主，也许还以劳动形式付地租。② 在委内瑞拉，情况比较复杂：由于以前奴隶劳动占主要地位，因此战争对委内 317

① 让·皮埃尔著《农民在19世纪秘鲁国民生活中的地位》，载《过去与现在》，46(1970)，第108—136页。

② 关于委内瑞拉情况，散见约翰·V.隆巴迪著《1820—1854年委内瑞拉黑人奴隶制的衰落与废除》(康涅狄格州西港，1971)。关于厄瓜多尔情况，见迈克尔·T·哈默利著《1763年—1842年旧瓜亚基尔省的社会与经济史》(瓜亚基尔，1973)第106页以下各页。

瑞拉劳动力的破坏性影响比对厄瓜多尔劳动力的破坏性影响更大。在战后时期，人们曾进行持续的努力（这些努力不是完全不成功）把一些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把已被解放的黑人置于在许多方面类似奴隶制的境地。尽管如此，奴隶和以前的奴隶在劳动力中的比例逐步下降。在委内瑞拉，他们似乎更多的是被雇佣劳动者而不是被农民所取代（这些农民可以在地主的小块土地上种自己的庄稼，同时为地主种地作为回报）。

可可失去它在委内瑞拉农业中的相对重要性首先是由于咖啡种植业的扩大。委内瑞拉在殖民地时期就种植咖啡，战后时期迅速扩大，19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活动水平。在新的土地上栽培咖啡，从栽树到第一次收获赢利，需要3年时间。扩大种植的地主缺乏资本，不得不到市场上去筹款。1834年4月10日的法律取消了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反高利贷法所规定的对契约自由的限制，目的是创造一个基础更广泛的金融市场，而结果也许是太成功了。咖啡业的繁荣鼓励地主以非常高的利率筹集贷款。当咖啡繁荣在1842年结束时，他们有十足的理由感到后悔。一个长期负债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一个一心要讨债的商业和金融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以后几十年间委内瑞拉动荡不定的政治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继咖啡价格下跌后咖啡繁荣的结束并没有排除咖啡在委内瑞拉出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在1842年危机之后的5年的咖啡出口量比危机前5年增加了大约40％，这一新水平一直持续到1870年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和非常显著的增涨。这个世纪中叶，咖啡占委内瑞拉出口总额的40％以上，到70年代超过60％。①巴西在这个时期扩大咖啡生产几乎完全靠奴隶劳动，而委内瑞拉和巴西不同，它的咖啡生产者一般雇佣自由劳工。然而，地主318们财政拮据日甚一日，只能减少使用雇佣劳动者；咖啡生产者和小果农主之间的安排（小果农在咖啡种植园劳动，作为拨给他们一

① 伊萨尔德著《统计丛书》第191—193页

块土地的报酬），现在变得更为经常，最后成为委内瑞拉生产咖啡地区的主要劳动制度。

这样，委内瑞拉的咖啡种植业尽管缺乏资本和劳动力，在独立后时期当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从长远来看似乎不再是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找到了一条继续存在和扩大的出路。另一方面，西班牙美洲各地的甘蔗种植业一直局限在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范围内（墨西哥小范围种植甘蔗地区是局部的例外情况），并且难以摆脱这一制度。在秘鲁沿海地区，甘蔗种植业在独立后时期和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一样，仍依靠使用奴隶劳动力。甘蔗种植者总是说不可能增加奴隶数目是生产停滞（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主要原因。然而，缺乏市场看来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

说来似乎矛盾的是，西班牙美洲有一个唯一的地区，那里以种甘蔗为主的热带农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那就是古巴。古巴和波多黎各在这整个时期仍是西班牙的属地。人们一般认为，1762年英国对哈瓦那短暂的占领是扩大生产阶段的起点，这个扩大阶段，尽管有起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18世纪后期以前，古巴经济一直是多样化经济，但很不发达，从18世纪后期起，开始慢慢转向以糖业为主，但烟草和咖啡也有扩大，养牛业也未消失。西班牙国王通过放宽关于获得和利用土地的法律部分地鼓励了这一进程。但更直接的影响是其他外部变化，主要是法国结束了对圣多曼格的统治，这一变化从市场上消灭了世界上最大的食糖生产者，并使圣多曼格的一些地主连同他们的资本和奴隶一起迁移到古巴。

19世纪初期，产糖中心从奥连特省转移到哈瓦那。然而，生产单位——制糖厂——在以后几十年仍比较小。原因是运费昂贵 319
和工厂缺乏燃料。有一些大生产者拥有几个工厂，但即使是他们，也大多要依靠商人向他们预付开业资本和不断提供货物，尤其是奴隶。事实上，正是由于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奴隶（多数直接从非洲运来），才使得古巴扩大食糖生产成为可能。在19世纪最初 10

年，英国和美国已禁止向它们的领土输送奴隶，并且禁止本国公民从事国际奴隶买卖。然而，尽管有这些国际压力（特别是英国的压力），西班牙始终未能履行早先关于结束奴隶买卖的许诺以及以后的一些许诺。保护奴隶买卖是古巴糖业大王接受西班牙统治该岛的重要动机，因为如果古巴独立了，它将比衰落的西班牙王朝更不能抗拒英国的要求。古巴在19世纪内，也就是在60年代结束奴隶买卖以前（巴西在10年前，即1850—1851年，最终取缔奴隶买卖），进口了几十万奴隶，1835年至1840年间达到最高峰，在这6年间，有16.5万名非洲人运入该岛，大多数到甘蔗种植园劳动。奴隶人口从1774年的不足4万人增加到1827年的将近30万人（那时白人人口一度不再构成人口的多数），到1841年增加到将近45万人。①

从19世纪40年代起，由于英国对奴隶买卖的控制更为有效，奴隶进口减少。可是甘蔗种植业的扩大又持续了20年。事实上，甘蔗种植业后来不再那么依靠大量增加奴隶劳动力。古巴早在1834年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第一段路轨在1838年铺成通车，当时不论西班牙本身还是西班牙美洲各独立国家都还没有铁路。铁路不仅便利了甘蔗种植园和港口之间的交通，而且还使扩大甘蔗种植成为可能，这在以前由于运费昂贵不能做到。铁路还使种植园摆脱了需在附近有燃料来源的限制，能腾出更多土地种植甘蔗。后来，铁路建到了庄园本身，使庄园内部运输更便宜、更有效，从而决定性地帮助克服了以前对庄园的规模存在的种种限制。②

320

① 富兰克林·W奈特著《19世纪古巴的奴隶社会》（麦迪逊，1970），第22页（表1），第86页（表8）。关于古巴制糖业和古巴奴隶制的进一步论述，见托马斯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7章。

② 关于这一过程的精采分析，见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著《制糖厂：古巴蔗糖的社会经济综合体。第1卷，1760—1860》（哈瓦那，1964）。

同时，在更新一代又一代的奴隶方面越来越大的困难促进了制糖业相应的革新：更广泛地使用蒸汽机。这又不可避免地使雇佣100名奴隶、每年生产100吨糖的种植园过渡到更大的种植园，并取代一大部分地主阶级。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从这种新机会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商人。这不仅是一个思想不同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财力不同的问题：原来的糖业大王中没有几个人能够进行现代化所需要的那种投资。尽管如此，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巴甘蔗生产的扩大是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成功。

此外，除了投入铁路的少量英国资本以外，这一成功并不是由于古巴经济更充份地和日益扩大的欧洲资本市场的结合。扩大食糖生产所需资本有的来自古巴岛本身（如上所述，商业资本占主导地位），有的来自西班牙甚至来自独立后离开美洲大陆的西班牙人。（古巴看来是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逃离——譬如说——墨西哥的人的主要避难所）。在古巴，像在美洲大陆一样，几乎完全没有从海外来的新资本。尽管如此，古巴和独立的西班牙美洲形成对照的是，它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

古巴出口经济取得的异常成功是推动古巴社会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的主要因素——相当重要的是人口的种族构成方面的变化。在西班牙美洲大陆，出口经济（即使在最有利的地区也没有古巴扩大得那么快）在独立后时期并没有对社会变革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相反，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社会变革制造了种种障碍和限制，使得出口经济不得不去适应它们。

321

这并不是说，没有例子可以说明存在着一些由于出口品生产增长而诱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地区。比如智利的小北地区，那里出现了一个在结构上不象智利中部那么刻板的社会。然而，象它那样有说服力的例子并不多，而且即使在小北地区，它对整个智利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些出口增长的例子——从

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皮张和委内瑞拉的咖啡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到秘鲁南部的羊毛取得的小得多的成功——倾向于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即扩大出口的努力只有在它的倡导者学会了使自己去适应一个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然而他们自己只能对它施加有限影响的社会结构的时候才能取得成功。由于在西班牙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墨西哥到中美洲，从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到秘鲁沿海和玻利维亚——出口的增长在这个时期出乎意料地微弱，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影响社会变化的方向的其他因素，主要是殖民主义旧秩序（不仅是行政结构而且还有调节各个社会集团和种族集团之间关系的一套格式的危机）和西班牙美洲向世界开放贸易及其一切后果（不仅是商业领域内的后果）。

当然，独立战争大大破坏了西班牙美洲的旧秩序。独立战争是自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来直接涉及几乎整个西班牙美洲大陆的第一次战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独立战争不仅导致了财产的破坏，而且还导致了西班牙美洲社会不同成份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政治权力分崩离析，社会军事化，动员各种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进行战争——这一切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对从属阶级的社会控制永远不会在譬如说委内瑞拉的平原和奥连特地区、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高原以及乌拉圭的平原恢复了。

在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和之后，社会关系也受到自由平等新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摒弃那种作为殖民地时期特征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它渴望把不同的社会集团和种族集团并入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以便加强这些新国家的政治统一。

322

西班牙美洲社会有三个特征特别与19世纪初期比较自由平等的倾向相抵触。这三个特征是黑人奴隶制；公私两方面对混血种人的法律歧视；以及像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本身一样古老的社会分裂——分裂为一个"西班牙人共和国"和一个"印第安人共和国"，这两者之间的壁垒虽然事实上非常容易跨越，但是到1810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

19世纪初期，在西班牙美洲大陆的生产关系中，奴隶制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古巴——当然还有巴西——那样处于中心地位。大多数革命政府已结束奴隶买卖，不少政府早在1810年至1812年就结束了。智利(1811)、阿根廷(1813)、大哥伦比亚(1821)、秘鲁(1821)通过了奴隶生下的孩子立即获得自由的法律，尽管有些规定使这些法律遭到部分的抵销，如规定奴隶的孩子要在一段时间内当徒工或进行强迫劳动以偿还抚养费。解放奴隶所生孩子的法律很少有效地实施，而且除了从长期来看以外，它并没有构成对奴隶制本身的进攻。前面已经讲过，战争的需要导致征召奴隶入伍，有些奴隶获得解放，有些没有。独立以后，奴隶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废除了奴隶制：智利(1823)、中美洲(1824)、墨西哥(1829)。与此同时，也有些地区努力使奴隶制恢复生气，特别是在奴隶制对生产出口产品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地区。这种努力首先由于国外奴隶来源枯竭而遭到挫折。非洲奴隶买卖对保持奴隶制来说是必要的，而在西班牙美洲大陆，只有拉普拉塔河地区在独立后(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口了较多奴隶。这种情况毫不容情地导致了非洲奴隶买卖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的衰落，并且说明了为什么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阿根廷各省最终在19世纪50年代下令废除奴隶制而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和经济破坏。

对混血种人遭受的法律歧视所进行的冲击较少犹疑不决，并且总的来说比较成功。诚然，废除这种法律歧视比革命时期所宣布的措施可能导致人们设想的要差一些，没有那样彻底和直接。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拉普拉塔河地区，那里的平等主义论调和法律在1810年革命后的10年中是一清二楚的，然而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允许梅斯蒂索人和帕尔多人进科尔多瓦大学。而且，当保持不同的标准对一个新国家的财政有利时，不平等状况就很可能继续下去。例如，在秘鲁，梅斯蒂索人交纳的税款(种族税)带来相当大的收益。这种捐税虽被废除一个短时期，从来却又重新征收，

323

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停止。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建国初期起不再强制人们在婴儿出生后报告它的种族血统，各地的种族等级制度也就差不多连根破坏了，甚至秘鲁也废除了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受洗礼和结婚要单独登记的制度。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年，从加拉加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在城市地区一些有种族混血血统的人富起来了（虽然只是极少的少数人），开始影响有产阶级的种族构成，那么，废除种族集团之间的法律差别取得成效——尽管不一定结束纳税方面的不平等——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后来战争使得一些有种族混血血统的人上升到具有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后者不那么常见）的地位。仍然对自己的种族纯洁性有自豪感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还是被说服了：把他们的偏见体现到法律或政治歧视中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这些新国家的财政需要也是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修改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的工作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西班牙在1810年废除了印第安人纳贡的义务。在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的新独立国家中，墨西哥没有重新强加这一义务，但是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尽管在法律上废除了纳贡（有一些国家还重申废除纳贡，例如1821年在库库塔会议上），然而贡金继续是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以传统的名义征收，有的以明显的委婉说法征收。①

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发生的变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人们知道得比较少。现有的一切研究都显示出一幅基本稳定然而是多种多样的、各不相同的图案。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殖民地秩序发生最后危机之前已经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有些地

324

① 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废除贡金，征收贡金。共和时代的社会经济不变式》”载《秘鲁高原的印第安人与贡金》（利马，1978），第187—218页。

区，文化上的西班牙化和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一体化当然比其他一些地区走得更远些。今天在我们看来，墨西哥中北部与南部的差别（这是最近才开始研究的一个题目）就像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沿海地区与高原之间的差别一样明显。这些差别决定了独立危机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随着解放危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上发生的比较普遍的变化，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具体变化。例如，独立后时期墨西哥出现的印第安人叛乱浪潮就是墨西哥农村普遍放松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纪律的结果。

各国新政权几乎全都对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作了重大修改，并对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采纳了一种与旧政权时代所流行的概念大不相同的概念，但是这些具体的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比旧秩序的普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要小。建立单独、平行的印第安人共和国的概念和新秩序是格格不入的，新秩序拒绝接受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承认印第安人有独立的生活方式的任何代替办法。此外，现在人们认为，印第安人共和国——即被赋予占有土地的权利的印第安人村社——的基本制度从法律上说是脱离常规；从经济上说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将土地和劳动力并入市场经济；从社会和政治上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是为印第安人被新的政治秩序同化制造难以克服的障碍。尽管如此，印第安人村社即使在殖民地时期就经历了被慢慢浸蚀的过程，在独立后头半个世纪中却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各安第斯共和国很好地幸存下来了。曾有人建议，例如玻利瓦尔曾在秘鲁建议，通过法律使印第人村社解体(如果这样，那将使它的成员转变为个体地主)，但是只是偶而制定这样的法律，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法律的地方，看来也没有影响村社生活的实际运转。各村社设法从殖民地时期保存下来的承袭领土并没有遭到任何重大的浸蚀，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被浸蚀的比较有利的气候。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新的政治秩序暂时的脆弱和这个时期没有人口压力而被推迟了。更有决定意义的是商业性农业未能大大扩大。简而言之，新的对外关系对西班牙美洲经济的 325

复杂而松散的结构——例如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有效的经济闭塞状态——迟迟产生影响大概是印第安人占居民绝大多数的那些地区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

在西班牙美洲广大地区，由于缺乏市场扩大本来可以提供的那种推动力，减弱了在牺牲印第安人村社的情况下进一步集中土地和扩大大庄园的压力。当然，村社以外的土地仍是高度集中的，虽然现有的土地在内战和政治动乱时期比殖民地时期更加频繁地易手，有时还有一些最大的地段被分割。对墨西哥城附近一个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了一大片领地如何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变成了政治和军事胜利的战利品。第一个新业主是短命皇帝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然后转到和下一个10年中第一次出现的自由派有联系的比森特·里瓦·帕拉西奥手中。然而，从长期来看，这度战利品已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传统的农村劳动制项的削弱使得开发这些土地已不如过去有利。① 这个时期在秘鲁北部沿海的希克特佩克，克里奥尔大地主阶级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这些大地主有的是永佃权土地（以前属于教会）拥有者，有的是新共和国的文官和军官。② 在委内瑞拉，帕斯将军和其他许多人一道进入了政治上和他打成一片的有产阶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可以养牛的土地是如此之多，因此分成了若干个巨大的庄园，在新老地主之间没有引起多大争论就分配完毕。然而，鉴于西班牙美洲幅员辽阔，情况多样，而且迄今所进行的研究有限，因此对独立后的土地占有情况作出总的结论是非常危险的。

326

在城市里，克里奥尔上层人士是政治解放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实现了取代占有最高行政和商业职位的西班牙人的目标，同时，建立独立的共和政府增加了在政府和政界谋职的机会。然而

① 约翰·M·图蒂诺著《墨西哥大庄园的社会关系：独立时代的查尔科地区》，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55/3(1975)，第496—528页。

② 曼努埃尔·布尔加著《从封地到资本主义庄园。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希克特佩克河谷》（利马，1976），第148页以下各页。

同革命前时期相比，城市上层人士的力量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而遭削弱：作为上层人士一个重要部分的西班人的遗产和威信被消灭；一批批外国商人进入上层人士阶层(但是没有完全结成一体)，他们大多替代了西班牙人；个别的梅斯蒂索人进入上层社会；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以大城市为权力基础、以城市为政治和行政中心来行使权力的制度，被另一个主要以地方为基础、更具农村性质、由大地产主和考迪罗*行使权力的制度所代替。城市上层人士被剥夺了过去的显赫地位的一部分物质基础，还被剥夺了一大部分为他们的显赫地位辩护的理论。当财富(和过去相比)正在变成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尺度的时候，他们对财富的垄断却比过去少多了。这导致他们比过去更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但是按教育程度来享受社会地位的看法也越来越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了。抛弃这种看法为农村(或城市)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领导人和城市中人数更多、更加富有并或多或少受独立革命所传播的平等思想影响的一部分民众之间达成谅解提供了机会(城市上层人士无疑夸大了这种机会)。

这就导致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城市社会(尤其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放宽对外贸易影响的城市)在这一演变阶段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至关重要。人们通常断言，放宽贸易使输入英国和欧洲的大量新工业产品成为可能，因此必然对当地用手工方法生产这类商品的人产生有害影响，就是说，城市民众的贫困化是自由贸易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相反的论点则认为，即使在1810年以前，"奢侈品"(卡斯提尔的棉布、冶金产品、酒类)的进口以及地区之间这些产品和大众化消费品的贸易已经限制了城市手工业的扩大；另外，外贸的扩大导致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就为地方手工业者创造了新机会。毫无疑问，以上两种影响都 327

* 考迪罗(Caudillo)，西班牙文音译，意指首领或长官。一译考迪略。
——译者

存在，它们的平衡点在西班牙美洲各个城市显然是不一样的①。扩大贸易——以及城市社会日趋复杂——的一个比较容易肯定的后果是一批人数众多的零售商的兴起。进口量增加不一定导致外国大进口商放弃西班牙人直接向公众出售商品的作法，然而他们不得不把数量越来越大的零售生意交给人数越来越多的小店主。小麦面包消费的增加使得通常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的面包代替了以前在家里自己烤制的各种玉米面包。日益频繁的人员流动导致开办更多的小旅店。此外，虽然进口布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对当地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在重要的城市中心这种人很少)，但是进口棉布在进口布消费集中的城市里创造了对服装商和裁缝的需求。总的说来，在独立后时期的西班牙美洲城市中，下层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人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尽管这不是普遍现象。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城市上层人士经常表示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威胁，但是社会秩序看来却并没有遭到任何公开的挑战。

尽管如此，西班牙美洲经济中一些非初级产品部门并没有得到机会在独立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依赖——对这个时期来说，应首先理解为在新的经济家主国所确定的国家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使这些与世界市场非常严密地结合起来的地区实行经济多样化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事实上，直到本章所研究的时期结束时止，在西班牙美洲，建立了能够改造生产程序并且和海外进口产品竞争的纺织工业的唯一地区是墨西哥。当我们研究墨西哥比较成功的原因时，看来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市场的范围和自从殖民地时期起就存在的活跃的国内贸易，这两个因素使得以新工艺所要求的规模进行生产在经济上行得通。此外，在最初阶段，有大量熟练的手工业者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心——

328

① 关于智利圣地亚哥这些变化的有启发性的研究，见路易斯·阿尔韦托·罗梅罗著《平等的社会。1820—1851年智利圣地亚哥的手工业者及其最初的政治经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第11—29页。

普埃布拉——他们可以被雇来从事墨西哥更明确的工业化新阶段的纺织生产。[①] 其他地方的国内市场要小得多——比墨西哥人数少，收入低——并且被外国商人占领，拉普拉塔河地区就是如此，还有些地方的国内市场始终很小，未结成一体并且基本上同外部世界隔绝，几乎整个安第斯山派地区就是那样。在那些地区，传统的纺织生产(以及许多别的生产)的体系得到保存。

上面对紧接着独立后的时期西班牙美洲社会的连续性和变化所进行的这一必然是简短的研究中，还没有谈到可能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一个因素，即人口趋势。没有谈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趋势知之甚少，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从已经知道的情况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口趋势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演进中不是一个像它们在殖民地时期或在1870年以后那样的决定性因素。在墨西哥，继18世纪人口增长之后，19世纪最初几十年全国人口陷于停滞，在某些地区呈下降趋势。在西班牙美洲其余地区，人口趋势显然是上升的，虽然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肯定明显不同。尼古拉斯·桑布斯-阿尔沃诺斯认为，可以作出下面这样的区分：在比较近期的西班牙殖民地区(古巴、新格拉纳达的安蒂奥基亚-考卡地区、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委内瑞拉)，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不管这些地区是否受到独立后开放海外贸易的影响；而从墨西哥经过中美洲到主要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脊地区，人口增长较慢。以科恰班巴(玻利维亚)为例，1793年和1854年的数字的比较可以证实一个普遍性结论：河谷地区(那里扩大了农业并且吸引了移民)的人口比高原人口增长得快。[②]

人口的全面增长首先建立在农业地区边界向前推进的基础之上。在新格拉纳达或拉普拉塔河地区，推进的方式是兼并以前西 329

---

① 简·巴赞特著《普埃布拉纺织工业的演变》载《墨西哥历史》(墨西哥)，13(1964)，第4页。

② 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从哥伦布抵达前到2000年拉丁美洲的人口》(第2版，马德里，1977)，第127页以下各页。

班牙政治控制界限以外的新领土，但是其他地方的推进形式几乎都是向殖民地时期各个居民区之间的大片领土扩张。古巴和委内瑞拉也许提供了这一进程的最好例子。扩大边界和农业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古巴、委内瑞拉或拉普拉塔河地区很明显，而在新格拉纳达、智利或(刚刚引用的小例子)遥远的科恰班巴河谷地区就不那么明显。和那个时代的当地和外国观察家的印象相反，主要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有的低于整个人口增长率(例如哈瓦那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开始时城市人口很少的地方，则稍高于整个人口增长率(例如智利的圣地亚哥或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的麦德林)。有些城市的人口在19世纪上半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战后缓慢的恢复不足以抵销由于独立战争和它的间接后果所造成的人口下降(例如利马和加拉加斯)。由此可见，生活在西班牙美洲大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没有增加，开放贸易看来并没有特别刺激人口增长。哈瓦那、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最受强有力的扩大出口影响的地区中心只有看来是低于西班牙美洲人口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增长。

这一比较缓慢的城市人口增长率以及两类地区(已经和以出口农产品为基础的日益扩大的经济结合起来的地区和没有和这种经济结合起来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大体一致，提供了又一衡量尺度，表明西班牙美洲跻身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它的核心是英国而不是昔日的帝国宗主国)的影响有限。然而，从19世纪中叶起，西班牙美洲和外部世界之间逐渐出现一种比紧接着独立后的那段时期更密切、更复杂的关系。

19世纪第3个25年是西班牙美洲经济史中从独立后经济停滞

330 (古巴除外)时期走向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起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肖条)的一段过渡时期。西班牙美洲国家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渐重新确定。对于一些西班牙美洲大陆国家——主要是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的出

口部门来说，新的机会来到了。

19世纪中叶对欧洲经济来说标志着衰落时期的结束，这次衰落在1846年危机中达到最低点、又因1848年政治风暴而进一步加剧之后，让位于一个引人瞩目的增长浪潮，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1873年的大萧条为止(其间尽管有1857年和1865年两次危机)。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消灭了它同发动工业革命的那个岛国的差距。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工业都以比不久以前更快的步伐继续增长，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以一种比英国更果断的姿态采取了体制上和组织上的革新措施：例如设立储蓄和投资银行，开办不再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特别是在金融和运输方面。欧洲(和北美)越来越需要拉丁美洲的初级产品。在南大西洋和太平洋，汽轮航运方面的进展比北大西洋要缓慢得多，但是建立邮轮航班保证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有了新的规律性(19世纪70年代南美洲才用电报和外部世界联系；海底电报在1874年通到里约热内卢)。

对未来更加重要的是在比较牢固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金融关系，这种金融关系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欧洲的剩余资本为在拉丁美洲贷款和投资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诚然，国外贷款的扩大还远没有达到它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的那种数量，而且输入到各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数量极不平衡，拉丁美洲国家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得以和一些具有可靠信誉的银行建立密切关系，从而使投资家有可能怀着比过去更大的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总是有充份根据的）进入拉丁美洲市场。在1850—1873年期间，给西班牙美洲各国的贷款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1873年危机以前，不止一件事情——例如关于给洪都拉斯和巴拉圭的贷款①——使人回想起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事件。但是尽管如此，已经出现了和宗

331

① 关于洪都拉斯情况，见D.C.M.普拉特著《19世纪拉丁美洲的英国债券持有者。伤害与治疗办法》载《美洲各国间经济事务》14/3(1960)。关于巴拉圭情况，见H.G.沃伦著《巴拉圭与三方联盟。战后十年(1869—1878)》（奥斯汀，1978），第129页以下各页。

主国未来的金融关系格局的一些苗头。在某些国家(像秘鲁,我们下面将看到),贷款同控制这个外围国家的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和智利),贷款为向这些外围国家出口非消费品打开了方便之门。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了第一批专门办理海外贸易贷款以及西班牙美洲和欧洲之间汇款业务的外国私人银行。这些英国银行后来合并为伦敦-墨西哥-南美洲银行。当然,欧洲大陆的银行家也进入西班牙美洲,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内向英国的霸权提出挑战。

最后,在向世界开放贸易时期在西班牙美洲的港口和商业中心扎下根基并且同英国大商业公司有联系的一批批英国商人的作用开始下降,就像他们的自治权开始下降一样。在这一时期,当地国家和当地资本家都更加卷入西班牙美洲的经济增长,但是对未来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康采恩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铁路公司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企业康采恩不仅从它的起源来看(虽然它的资本可能不完全是宗主国的),而且从它的管理总部,尤其是它和宗主国经济保持的密切关系来看都是宗主国性质的。这种新的铁路公司不仅是宗主国和新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一种商业结合的工具,使新殖民地国家便于把力量集中在出口初级产品方面;而且从宗主国的观点来看,它能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因为它在铁路建设阶段能为冶金和机器产品提供出路,一旦铁路开始运行之后,它又能为上述产品(虽然数量减少然而定期供应)和煤炭提供出路。

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美洲大陆特别是阿根廷开始扩建铁路,这反映了宗主国地区和外围国家地区的新关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西部铁路是1857年由当地资本家开始修建的,以便于运输羊毛。然而不久就发现资本来源不足,省财政当局接手继续营建,之后又指望把铁路的修建和经营工作交给外国公司。10年以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修建第二条重要铁路南部铁路(像这一阶段的西部铁路一样,是一条运输羊毛的铁路)时,当地英国血统的生产

332

者和商人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负责管理铁路的这家私人公司的董事。不过，这家公司设在伦敦，从一开始就听命于宗主国的利益集团。南部铁路和它为之服务的该地区主要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开始时十分密切，但几十年后几乎完全消失了。从罗萨里奥到科尔多瓦的铁路——未来的阿根廷中央铁路的主要干线——从一开始就是另一种情况。西部铁路和南部铁路是为一个已经开发的生产地区的需要服务的，而这条铁路和它们不同，它着眼于开发和鼓励农村工商业，不可能迅速赢利。实际上，建成这条铁路是由于几家付给承担修建和经营这条铁路的英国公司一笔津贴费（除了拨给土地以外）从而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利润。宗主国和那些与修建铁路有关的财势集团的关系就比修建南部铁路时更加势不可挡地建立起来了。同当地农业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关系主要是在铁路建成之后，作为修建铁路的一个后果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不仅不如修建南部铁路时那样密切，而且以几乎长期存在对抗情绪为特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为修建这条铁路所提供的条件；所给予的保证同铁路延长程度成正比，这样做虽然鼓励了投资，但却使那些以改善服务为目标的人泄气。第二个原因是，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之间的铁路是为运输谷物而建造的，由于谷物的储存和运输的特点，生产者和运输者之间发生了比运输羊毛更严重的利害冲突。① 最后，作为1873年经济肖条的后果（阿根廷在1874年感到经济肖条的影响），英国铁路公司拒绝延长铁路（铁路在1870年已通到科尔多瓦）。国家承担了这项建设的责任，但是这一决定看来使扩建铁路不再受宗主国支配，因此它修改了（但没有结束）和外部的关系。修建铁路的工作由英国企业家特尔芬纳承担，他过去曾为修建铁路在物资方面投过资本，而在此经济衰退时期同意向阿根廷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

333

① 后来的研究未能取代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大不列颠与阿根廷》（牛津，1960），第342页，以下各页。

然而，阿根廷虽然在西班牙美洲和宗主国未来的金融关系的趋势方面先行一步，但它并不是这一时期修建铁路的典型方式。在智利，小北矿区的第一条铁路虽是根据威廉·惠尔赖特的倡议修建的，但资本似乎是从当地采矿企业家和瓦尔帕莱索的英裔智利商人筹集的。在智利中部，国家从一开始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修建铁路主要通过外国贷款集资，然而修建工作本身由一个企业家承担，他当然是外国人(即美国人亨利·梅格斯)，但是他不属于那个把铁路从英国带到南美洲和全世界的组织严密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团体。秘鲁的铁路建设更是完全由梅格斯掌握。在秘鲁扩建铁路也以外国贷款为基础，这倒不是因为宗主国方面有分享这个建设项目的野心，而是秘鲁在鸟粪市场享有垄断地位的一个间接后果。甚至在墨西哥——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受到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阻碍——以宗主国为基地的公司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1873年落成的从墨西哥城到韦拉克鲁斯的铁路干线是由一家墨西哥私人公司修建和经营的，一部分资金由法国占领军提供，他们需要加快修建这条铁路以供军用。①

宗主国通过譬如说早期的金融系统和铁路公司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参与外围国家的经济，不仅对于扩大西班牙美洲出口部门的产量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使西班牙美洲能够以竞争性价格进行生产也同样是必要的。西班牙美洲国家前一时期(1808年—1850年)在贸易条件方面拥有的优势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到过渡时期(1850年—1873年)结束时就完全消失或者至少急剧减少了。尽管西欧大陆和北美的宗主国地区在地域上扩大了，然而现在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再低于宗主国。西班牙美洲的外围国家现在不仅在自身之间竞争，或者同东欧旧的外围国家竞争，而且还同从

334

① 玛格丽塔·乌里亚斯·埃莫西略著《曼努埃尔·埃斯坎东，从公共马车到火车，1833年至1862年》，载西罗·F·S·卡多索编《19世纪墨西哥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墨西哥，1978)，第52页。

加拿大到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些新地区竞争。没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转让，就比紧接着独立以后的时期更难获得持久的出口繁荣。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西班牙美洲国家经济增长遇到的一个障碍是，政治和军事冲突连绵不断而且日趋加剧。这也是西班牙美洲各国之间经济成就的差别越来越大的一个原因。冲突毁坏了财产，吸走了本来应当用于生产的资源，吓跑了外国资本。例如，几乎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墨西哥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委内瑞拉都深深地为自从独立战争以来最糟糕的内战所困扰。墨西哥的内战因外国干涉而趋复杂化。即使在阿根廷，财政部长在1874年估计，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内战加上巴拉圭战争（1865年—1870年）的费用等于阿根廷政府在这个时期收到的外国贷款的总和。

在1850年以后的20年中，西班牙美洲出口经济发展得最快的是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在1861年—1864年，古巴每年平均出口价值达5700万比索，即使在1868年开始的十年战争第一阶段，也没有从这个水平上降下来。因此，在70年代初期，古巴的出口几乎等于曾经在增加出口方面非常成功的那些西班牙美洲独立共和国的出口的两倍。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三国的出口都在3,000万比索左右，比墨西哥高，墨西哥在1870年出口值为2,400万比索。墨西哥经济停滞既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影响，也反映了它的矿业的衰落。较小的出口国也出现了明显的重新排队现象：乌拉圭的出口值为1,250万比索，是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出口的两倍（两国的出口值都在 400 万比索左右），部分原因是蒙得维的亚也是运输某些阿根廷农产品的港口①，而玻利维亚还没有摆脱采矿经济垮台的影响，委内瑞拉则还没有摆脱内战所付出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以及它的主要出口产品咖啡价格逐步下

335

① 关于这一时期西班牙美洲出口情况，散见F.马丁著《政治家年鉴》（伦敦，1874）。

跌的影响。

古巴制糖业在19世纪中叶几十年中继续它的引人瞩目的增长，但是地平线上已出现问题。糖价下跌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明显，但是已经开始，对于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最终将被废除的预料(奴隶买卖在1865—1866年终于结束)导致进口奴隶的价格显著提高。在这双重压力下，对种植园经济的前途日益悲观。人们现在认识到，甘蔗种植业若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找到劳动力和资本的新来源，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是否能够找到这两者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大多数古巴种植园主，甚至那些最近才加入这个行业并且主要是他们使种植业最近得以扩大的人，在为了甘蔗种植业的生存而必需采取改革措施面前，已无法维持他们的支配地位。十年战争(1868—1878年)暴露并且加剧了古巴制糖业内部的紧张关系，而且现在已更加肯定无疑：奴隶制的结束(在80年代)和糖厂的现代化将标志着古巴和西班牙种植园主对古巴甘蔗种植业的控制的结束。

秘鲁出口经济的繁荣，像古巴一样，不断有前景不妙的预报相随。但这是两国经济相同的唯一特点。秘鲁扩大出口以鸟粪为基础，只是在鸟粪业繁荣的最后阶段，其他产品——有些是传统产品，像糖和棉花，另外一些是新产品，像硝石——才开始与鸟粪竞争。鸟粪在秘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糖在古巴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首先，国际鸟粪贸易的特点不同：由于欧洲农业对鸟粪的需求越来越大，秘鲁在这整个时期几乎垄断了供应。鸟粪对秘鲁经济的影响也不同：出口鸟粪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收集，而收集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因此吸收的主要是不熟练劳动力；此外，从运输观点来看，它的数量比价值相当的食糖的数量要少得多。最后，生产鸟粪地区和秘鲁经济核心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不同；鸟粪来自离海岸相当远的一群岛屿组成的、范围很小的边远地区。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扩大鸟粪生产对秘鲁经济所起的作用。它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改造的能

336

力是极为有限的。然而，由于秘鲁垄断了鸟粪的供应，秘鲁国家能够从出口部门的利润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看来超过50％[①]。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只有委内瑞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石油出口得到的利润比例与此相等。

在1860年以前，鸟粪贸易掌握在一些外国企业康采恩手里，其中英国的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居支配地位。但是，财政部获得的产地使用费(此外，由于秘鲁的偿付能力，它还可以另外得到国内外贷款)不久就在增加财政开支上反映出来，主要用于增加行政人员和军人的薪饷。少量鸟粪收入用于公共工程和购买武器。而清理内债——它把大量资源转移到私人手里(其付款要求是否合理，往往是非常可疑的)——从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来说，是秘鲁鸟粪繁荣第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把秘鲁同最重要的买主英国的鸟粪贸易的垄断权让给一批有获得特许权的秘鲁人。贸易扩大时期已经结束，习惯于不断增加收入的财政部开始感到拮据。它现在越来越多地伸手向获得鸟粪贸易特许权的人要求贷款，这些人在秘鲁的金融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1869年，一个由巴尔塔将军领导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政府(军队和秘鲁南部对它的支持超过利马对它 337 的支持)打破了这一金融关系，把鸟粪贸易特许权转让给一名法国企业家奥古斯特·德雷菲斯。他一旦获得特许权后，就不难在欧洲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政府的鸟粪收入和贷款都进一步增加，这些新的财源用来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修建铁路的计划，以便把南部和中部高原同太平洋各港口连接起来。同时，鸟粪繁荣虽然无疑有助于恢复秘鲁沿海地区的甘蔗和棉花种植业，但是并没有造就一批强有力的本国资本家。看来，一个原因是因为积极从事鸟粪出口的这批秘鲁人的金融独立性有限，他们从一开始就依靠智利

① 根据沙恩·亨特提供的数字，载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著《秘鲁的鸟粪与资产阶级》(利马，1974)，第144页。关于鸡粪对秘鲁经济的影响的进一步论述，见博尼利亚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3章。

和英国的贷款。特别是，秘鲁参加硝石开发的规模是很小的。(在秘鲁极南部和玻利维亚沿海地区开发硝石不那么费钱，可以代替鸟粪，因而加速了鸟粪业的衰落)。从1874年起，鸟粪繁荣的结束使得有必要进行某些痛苦的调整，同时秘鲁对于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那样严重的考验并没有作好准备。

说来似乎矛盾的是，秘鲁独立后第一个出口贸易周期的结束，使秘鲁遭到严重削弱，此时它正面临智利的挑战；而同时发生的智利的第一个出口周期的结束，却使智利领导人相信迫切需要发动这一挑战，以便在生产硝石的沿海为扩大智利自己的出口能力占领一个新基地和扩大智利政府的财政基础。智利扩大出口的范围比秘鲁广泛得多。在采矿方面，采银兴起之后是采铜的兴起。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国。采矿业在小北地区的科金博和科皮亚波的扩大首先是当地企业家的活动和投资努力的结果(虽然是通过在瓦尔帕莱索的英国-智利公司和英国商业资本建立的关系)。劳动力虽然因有阿根廷西部来的移民而膨胀起来，但主要还是智利人。北部采矿业的这种扩大与中央河谷的商业性农业的扩大互为补充。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小麦始338 终是中央河谷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小麦出口远远超越有限的秘鲁传统市场，开始输往太平洋的新市场，即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当不久之后澳大利亚谷类能够自给自足时，智利出口的大部分面粉和小麦运往阿根廷和欧洲。阿根廷到1870年才实现自给自足。

智利在修建纵向铁路以前就开始向南部扩大谷物种植。这是由于建立了像孔斯蒂图西翁和托梅这样一些小港口，它们为一些仍被陆地把它们同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形成的核心隔离开的地区提供了出口。生产在地域上的扩大导致把大量擅自占地者赶走，这些占地者一直可以随意占有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只要这些土地并没有给拥有它们的地主阶级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现在人们更强烈地要求得到私有土地，国有土地不久就转入私人手里。

在遥远的南部，在农业垦殖方面进行了重大努力——这工作由德国移民进行，他们后来成为业主——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向私人所有制的转让有利于原来的地主或来自城市上层阶级的新地主。同时，这解决了寻找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尽管地主们抱怨说矿井、公共工程和城市地区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纪律构成威胁，然而事实上农村的劳动力供应增加了。这反映在佃户的地位逐步恶化上。他们的人数增多了，不得不为越来越少的小块土地付出更多的劳动。

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为智利农业在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日益加剧的竞争面前提供了一种解救办法(阿根廷拥有大量土地，而美国和加拿大，由于机械化和选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更高的农产品)。这种解救办法就是采取一种陈旧的生产制度，即使用大量劳动力但除水利工程外投资不多。然而，它并不是非常保险的办法。第一个受害者是谷物种植业的补充性行业面粉业。智利在同使用装有钢滚筒的新式碾磨机的欧洲和北美生产中心的竞争中很快打了败仗。此后，智利农业生产者不愿再生产这种碾磨机所需要的硬质小麦，结果不到20年智利小麦被逐出了 339
国际市场。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退化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它首先反映在农产品出口量特别是利润的下降。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由暂时的情况造成的。接着，采矿业完全垮了，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智利——它作为一个铜生产国曾经享受过它作为一个谷物生产国所未曾享受过的地位——被完全逐出世界市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国由于采取了运用新工艺的新采矿制度，开始以比智利低得多的成本生产铜，而小北地区的矿业企业家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革新的手段与之竞争。到20世纪，智利采铜业在那些在19世纪间接摧毁了智利采铜业的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恢复。

这样，智利懂得了，新的世界经济气候虽然向外围国家提供

了新的机会，但是都使它们受更严峻环境的支配，而繁荣并不一定经受得起这种严峻环境的考验。在采铜业衰落的同时采银业得到了恢复，但是白银虽由智利矿业企业家生产，却产自仍属于玻利维亚领土的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随着采银业的恢复，秘鲁和玻利维亚沿海地区的硝石生产也扩大了。然而，说来似乎矛盾的是，太平洋战争虽然使智利得到了对这个地区的政治控制，却削弱了智利和英裔智利开发者对这些新的生产硝石的北部地区的支配地位。因此，这次胜利并没有把曾经使智利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享受过短暂繁荣的那种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在这种制度下，主人翁是一个拥有土地的、重商的企业家阶级，这个阶级虽然部分是外国血统但基本上是属于当地的）。相反，这里的结局和秘鲁在鸟粪方面的情况相类似：越来越受国外控制的硝石出口业和智利经济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国家从硝石出口征收的捐税中得到的款项在它增加的财政收入中占非常大的比例。①

在阿根廷，更明显的扩大趋势保证了它的出口增长不那么突然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尽管如此，我们也能在阿根廷觉察到我们在智利看到的那种趋势。19世纪中叶，专门生产皮张、牛脂和腌牛肉的老的养牛业由于欧洲市场的饱和看来已经达到它的极限。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养牛业有了重新扩大的可能，首先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把俄国供应者和西方市场隔离了开来，同时还由于制鞋业的进步使这种扩大更加持久，（制鞋业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了对皮革需求的增加）。尽管如此，停滞时期虽然短暂，却已足以大大鼓励养牛业的扩大。不久，羊毛成了阿根廷出口中最重要的畜产品，直到这个世纪末。

340

养羊业的扩大（它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都是在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发生的）首先得力于铁路的延伸，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移

---

① 关于太平洋战争前智利经济的进一步论述，见科利尔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4章。

民的增加(主要是爱尔兰和巴斯克移民)。移民人数的增多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不利的条件，而正是由于农业工资的急剧下降才使在1867年开始的艰难岁月中有可能保持、甚至扩大畜牧生产。两个最重要的市场(法国和美国)对进口羊毛课以重税，同时澳大利亚的竞争又压低了阿根廷羊毛的价格。由于原始的生产条件，更重要的是由于原始的储存和销售条件，阿根廷羊毛的质量低劣。

在这种情况下，养羊不可能为阿根廷出口经济的扩大提供主要的推动力。在随后10年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边缘地区——在那里，过去养羊业曾把养牛业挤走——恢复了养牛业，陈旧的腌牛肉业出现了最后的繁荣时期，它保持了昔日的古巴市场和一部分巴西市场。更重要的是，谷物生产也增加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即使已到了这样晚的时期，谷物增产是在传统的大庄园的范围内发生的，但是在圣菲省——它已变成主要的产粮省——谷物增产以农业垦殖(再一次由移居的农民进行)中心为基础。如前所述，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需求增长(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殖民)的刺激下，阿根廷扩大了小麦生产，达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程度。

341

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对潘帕斯草原地带的印第安人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这一进攻由于分配了新的战利品土地，使得阿根廷过去扩大经济的经济公式获得了新生。那个公式就是：利用富饶而廉价的土地，使用只需要少量资本和较少量劳动力的技术，以竞争性价格进行生产。阿根廷的劳动力不足，从来没有像智利农村的地主那样可以得到那样便宜的移民劳动力。即使在这一公式的格局之内，投资也开始增加，例如建筑铁丝围栏和开始实行牲畜杂交。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对羊进行杂交。然而，阿根廷出口经济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决定性地显示出它的新方向，那时谷物和肉类开始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这是由于实行了跟秘鲁和智利的经济所实行的转变同样深刻、然而不那么有损伤性的转变的

结果。

西班牙美洲重新确定它同欧洲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关系是1850—1870年时期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来得很缓慢。首先，西班牙美洲各国都逐步废除了奴隶制。在一些奴隶较少的国家，如智利、中美洲、墨西哥，独立之后立即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经济上使用奴隶较多的国家，直到这个世纪中叶才废除奴隶制。乌拉圭在1846年废除奴隶制，阿根廷共和国在1853年废除奴隶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除外，这个省只是在1860年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才废除奴隶制）。哥伦比亚是在1850年，秘鲁和委内瑞拉是在1854年，巴拉圭是在1870年，它是西班牙美洲大陆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制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逐渐失去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大西洋奴隶买卖的逐步废除以及关于奴隶的子女出生后即获得自由的各种法律甚至使保持少数现有的奴隶也越来越困难了。

只有古巴以及新大陆最后一个残存的奴隶社会巴西，仍然认为奴隶制对农业（即制糖业）至关重要。即使在那里，在古巴的奴342 隶买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结束之后，奴隶制也受到了威胁，古巴种植园之中关于采取可能的代替办法的谈论变得更普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愿意采取的代替办法是移入西班牙自耕农民，但是这牵涉到要将种植园划分为较小的生产单位，由佃农或分成农来耕种，因此实际上最常采用的代替办法是进口中国苦力（譬如在秘鲁），让他们在收集鸟粪的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农业中劳动。然而，中国移民所提供的劳动力始终无法同非洲奴隶买卖所供应的数目相比。中国移民最后在英国压力下结束。

在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1868—1878年）期间，双方都试图从使参战的奴隶得到自由的办法来取得奴隶的支持。正如西班牙美洲大陆各地独立战争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奴隶是一个诱人的兵员来源。1870年，西班牙议会通过《莫雷特法》，宣布给予奴隶生

下的孩子以自由。这些措施并没有导致大批奴隶获得自由，但有助于加强关于不可避免地立即结束奴隶制这一共同意见。奴隶制终于在19世纪80年代结束，它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迫使古巴制糖业作出某些痛苦的调整。

在1850年—1870年期间，对印第安人村社土地进一步进行蚕蚀，正如独立以来(实际上也在独立以前)一直在做的那样。此外，法律改革破坏了这些村社存在的法律基础。这些改革有的强制在村社成员中分配他们继承的领土，使他们成为有权转让他们的财产的业主(这一权利并未得到法律完全承认，但可以履行)，有的把村社土地的用益权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可以把它连同其他公共土地卖给私人)。然而这些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引起突然的社会大变动。例如，在墨西哥，莱尔多法(1856年)和其他关于改革的法律直到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1876 — 1911 年)才全面实施。在秘鲁高原的广大地区，在法律上废除村社之后，村社实际上并没有消灭，而直到20世纪才消灭。原因是，像惯常那样，首先只有更普遍的经济转变使得村社土地上的产品在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上有利可图的时候村社才会消灭，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并不一定会消灭。例如，在危地马拉和秘鲁北部，出口农牧产品的经济部门需要从村社补充劳动力，但是它们或是把生产扩大到并非由村社本身所拥有的土地上(危地马拉的情况)，或是扩大到村社土地中的一个很小的地区(秘鲁的情况)。结果是这些村社实际上得到了加强，因为它们的经济活力被那些移居来的人的劳动保持下来了。由此可见，并不一定会出现一种对大庄园有利的、从村社土地所有制到个人土地私有制的直线式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在本章所研究的时期内，出口农业的扩大很少影响到村社土地，因此未能严重破坏它们的社会结构。 343

西班牙美洲的对外商业和金融关系的开始转变以及随后发生的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城市特别是首都的发

展，有利于增加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毫无疑问，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出口业的扩大。诚然，在1870年，拥有大约22万居民的墨西哥城仍然是西班牙美洲最大的城市，就像它在这个世纪初期时一样。但是哈瓦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20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比墨西哥城和哈瓦那要快得多，不久就会超过它们。利马的人口刚刚达到10万人，现在比蒙得维的亚（1870年人口估认为12.5万人）和圣地亚哥（13万人）要少。另一方面，波哥大和加拉加斯仍停滞不前，各有5万居民。当然，有些情况是，城市的扩大不是发生在政治中心而是发生在外贸中心。例如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比波哥大发展得快，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超过了基多，虽然所有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率都很小。但另一方面，在智利，圣地亚哥在这一时期超过了瓦尔帕莱索。①

外贸并不能直接使大批人就业，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以下情况感觉出来的：国家和国家雇员人数扩大；运输业现代化，它虽然减少了实际雇用人数，但有助于使他们城市化；于是，铁路和有轨车工人代替了马车夫和赶骡人。同时，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零售业和家庭服务继续吸收了数目日益增多的城市被雇人员的很大一部分。现代化也许是表面性的，但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采取了像用煤气供街道照明等革新措施，而且由于公私两方面日益繁荣，修建了剧院，并由国际闻名的艺术家演出。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社会集团居住区互相分开的情况日益增加；虽然过去并不是没有以贫穷和犯罪为特点的居住区，但是富人和穷人认为互相住在一起对彼此都方便的理由，在现在这种扩大和革新了的城市里不如过去充分了。的确，大城市的发展足以产生房地产投机事业。在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城出现了它的最早的城市“侨居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将近

344

① 关于这一时期各城市的人口数字，散见理查德·M.莫尔斯著《拉丁美洲的城市。Ⅱ历史发展》（墨西哥，1973）。

20年后才开始把土地划成小块进行投机，但是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得非常迅速。① 与此同时，公共交通开始出现，它最早的重要的形式是马拉有轨车。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大的潜在市场，从而也鼓励了手工业的发展，有些工厂集中雇用劳动力，例如酿酒厂和捲烟厂。然而，参加第三产业的人数比第二产业雇用的人数要多。早期的现代无产阶级在工业中还不多，更多的是在运输业和公共服务业。

这些发展中的"行政一商业"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初级产品出口业的扩大。它们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同时也更容易受到西班牙美洲以外的事态发展的伤害。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基本脆弱性和城市扩大的经济基础的不稳定性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并没有构成使人惊恐的理由。其原因之一是，通过扩大行政机构和公共工程，国家可以比过去间接控制城市居民中更广泛的阶层。另一个因素是，外国人在城市经济中的比例很高，而且不再仅仅是在上层。在这个世纪中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大多数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人(这个比例后来进一步提高)。尽管这两个城市的情况远不是典型的，但是在大多数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外国人在零售业和轻工业中的比例相当大。 345

除了这个日益扩大的城市社会的这一特点之外，城市特有的政治外貌日益淡薄，其原因是城市在经济和财政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一制度由于建立在出口农牧产品基础之上的部门的稳步发展而得到巩固。国家和城市的繁荣和稳定现在都取决于西班牙美洲国家初步产品出口部门的持续不断的发展。

① 马里亚·多洛雷斯·莫拉莱斯著《1840—1899年墨西哥城的主要分割情况》，载卡多索著《形成和发展》；詹姆斯·R.斯科比著《1870—191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纽约，1974)。

第 9 章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

347 对西班牙美洲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作出恰当的概括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多种多样。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墨西哥有大量印第安人，他们只是部分地跟居统治地位的拉丁美洲文化同化。在其他地方，梅斯蒂索人在人数上更明显地居支配地位，几乎所有的梅斯蒂索居民在文化上都已与拉丁美洲社会结成一体。这种差异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有些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在文化上与拉丁美洲上层人士格格不入，这个阶级不大可能积极参与政治。

这些国家在地理上也有很不相同。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各安第斯国家的大多数居民被封闭在内陆高原，而委内瑞拉、智利和拉普拉塔河大部地区的多数居民住在沿海地区。这种差异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因而也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拥有沿海居民和资源的国家，开始同西欧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较早，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海关收入，能比内陆国家建立更巩固的财政基础，因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里并不是只有两种模式。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智利共和国的全部地区都比较稳定，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只有一些小块的孤立地区建立起秩序。委内瑞拉经过繁荣的19世纪30年代的平静时期之后，由于40年代咖啡跌价而出现了不稳定时期。

这些国家的殖民地传统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各有不同。所有这

些国家都使用西班牙的语言和体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被同一种殖民制度所统治。这种制度及其机构虽然一望而知是西班牙式 348 的，然而在共和国时代初期它们在各个国家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墨西哥由于在将近3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下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那里的教会已经在体制上和经济上建立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是较晚发展的地区（如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河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在墨西哥，一代又一代富有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把经济资源捐赠给女修道院和宗教事业基金会，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教会的权力和财富在别的地方具有重要性以前，在墨西哥早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墨西哥，摧毁教会权力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而且具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性。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委内瑞拉，教会的根基不深，殖民地教会的权力和特权比较容易地就被剪除了。

同样，独立战争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不同。在墨西哥和较小程度上在秘鲁，独立前夕由西班牙人训练并授予军职的一批克里奥尔军官在独立后基本上原封未动。结果，一个自觉的、多少有些凝聚力的职业军人利益集团在墨西哥和秘鲁政界起重要作用。墨西哥军事领导人经常干预政治进程以维护军人在西班牙统治下曾经享有的特权(fuero)。在秘鲁，军人特权不是那么成问题，然而军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corporate group)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也对国家总的政治留下了印记。个别的军事领导人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秘鲁。在其他地方，殖民地时代后期的军人集团在独立战争中被粉碎，但是结果各不相同。在赢得委内瑞拉独立中显露头角（并且也为解放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起了重要作用）的一大批革命的克里奥尔军官企图为独立战争的英雄们确立西班牙人训练的墨西哥职业军人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地位。然而在委内瑞拉，独立战争的英雄们始终未能作为一个团结的利益集团有效地行动，尽管——和秘鲁的情况一样——个别领导人成为政界主要人物。在新格拉纳达和智利，参加独立战争的军事

349 领导人不久即从属于文职政治上层人士利益集团，1830年以后很少作为一个集团采取行动。在阿根廷，职业军人集团实际上在同当地民兵团体的冲突中被摧毁。由此可见，难以对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作出单一的、简单的概括。

除了西班牙美洲国家的多样性所产生的问题之外，对独立后时期的政治缺乏系统的研究也妨碍作出概括。除了一些关于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历史的名著以外，很少有符合当前历史研究准则的分析性作品。一些最好的作品还处在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即只是对上层人士在出版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进行分析。对于政治进程的实际情况及其社会影响还没有什么分析。大多数现有著作都只是研究中央一级的政治问题，主要是描述政治活动家在国家首都的活动。除了在阿根廷和墨西哥有一些零星作品外，很少有人研究地方一级的政治进程、在地方上活动的团体和利益集团、以及它们同国家政治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的政治进程，是被歪曲了的进程，因为我们主要是通过争夺民族国家控制权的少数有表达能力的政治上层人士的眼睛来看政治进程的。然而应该记住，在这个时期，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极其软弱；它们只能掌握非常有限的财政收入；许多国家的国民军并不比各个省能够临时集合的部队强多少。在大多数国家，各省都由当地地主和商人进行有效控制，他们往往与全国性政治无关。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大多来自上层，但并不是所有上层阶级成员都参加国家政治活动。

也许西班牙美洲这个时期的政治史中最主要的题目是脱离西班牙后在建立有活力的新国家方面所迁到的困难。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国家无法重新充分树立1808年以前西班牙国王享有的那种正统的权威。他们制定了正式的立宪制度，大多数宪法规定了通过选举移交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但是这些宪法的正式条文经常是一纸空文。没有一个政治集团相信它的对手会遵守它们。掌权的
350 人歪曲宪法原则，常常为了保住政府而粗暴地压制反对他们的

人。未掌权的人则认为——一般说来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无法通过宪法正式规定的手段占有国家，因为选举是由掌握政府的人控制的。因此反对派政治家——既有军人也有文职人员——就等待时机，利用政府软弱的时刻推翻统治集团。政府大多无法抵抗这些叛乱，因为它们往往财政空虚，无法保持优势的军事力量，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恩赐以收买潜在的反叛者。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政治上层人士充份团结起来，使他们的国家得以避免政变、叛乱和内战。

第二组有关的题目是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瓦解——某些方面是逐步瓦解，另外一些方面是迅速瓦解——有关的问题。从政治方面说，不仅是从君主制变成共和国，而且是从中央集权结构变为这些结构的瓦解或放松，变为联邦制形式。随着中央国家的削弱，一些团体的力量以及在殖民地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并且在统治社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等级差别(casté distinctions)* 也渐削弱。

殖民地结构的这种破坏和瓦解不仅是独立战争和随后发生的国内冲突的结果，也是占优势的自由主义思想所促成。尽管政治上层人士在一些问题上还有严重意见分歧，但是总的说来，人们普遍接受了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概念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理想的许多方面。自由的社会与经济思想是同最强大和经济上最先进的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西班牙美洲的大多数政治上层人士把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它们信奉自由原则，把西班牙美洲经济落后归咎于西班牙占统治地位的不自由的体制和政策。此外，法国大革命尽管伴随着暴力行为，但它至少部分地有助于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理想合法化。于是，政治上层人士着手——也有过中断和后退——废除或

* 本章中所讲的等级差别、等级制度、受歧视的等级，主要是指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有色人种或混血种居民。——译者

削解最触犯自由原则的殖民地的社团和等级结构。

351 在独立时代的最初几十年中，从法律上废除了——且不说永远在事实上废除了——等级差别。与此同时，朝着废除黑人奴隶制采取了一些初步步骤。这一进程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基本上结束了。在独立时代初期，上层人士还建议——虽然并没有立即实施——把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分割后归个人所有。他们认为，这种村社土地所有制与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概念和自由经济原则不相容。自由经济原则认为，只有个人的财产利益和各种经济因素(如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市场上自由发挥作用才能提高生产力。

西班牙美洲的上层人士常常说，分割印第安人的土地最符合印第安人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旦分割后，就有可能落到克里奥尔地主手中。在有些地方，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是由于必须(或希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劳动力以生产出口原料。摧毁印第安人村社的一些初步步骤是在这个时期之初采取的，但是这个进程到1850年以后才达到顶点，当时西班牙美洲经济已更紧密地同日益扩大的国际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自由主义思想和经济现实的相互作用，过去在殖民地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社团(主要是商人、矿主和手工业者的殖民地行会)大多消失。商人和矿主的行会无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它们所依靠的西班牙国家垮台了，它们的西班牙成员迁走了，英国和其他外国的资本和企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西班牙的资本和企业。手工业者的行会之被削弱则可能是由于手工业在进口制成品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也由于人们思想上对行会组织的反感。

殖民地时期两个最大的社团(corporate groups)——教会和军人集团——仍然重要，虽不再居支配地位，但是它们的结构在独立时期也已被动摇。教会暂时被削弱是由于一部分教士，特别是教会统治集团曾经维护王室的利益，还由于新国家和罗马教352 皇在任命主教的权利问题上持续不断地发生冲突。从长期来看，

教会遭受挫折是由于新政府攫取了它的经济资源，教会职业作为可供克里奥尔上层人士选择的一种职业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职业军人在某些地方也衰落了，因为共和国政府无力维持大量军队，平民也反对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尽管如此，教会和军人集团仍然是新国家不得不与之斗争的难以对付的两大集团。

教会和军人的特权（教士和军官所享有的司法特权）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理想，并且有剥夺国家权威的倾向。此外，人们认为，教会还以各种方式阻挠自由经济的实现：教会的节假日妨碍生产，而且教士本身就是非生产性的；向农产品征收什一税减少农场利润，从而阻碍农业发展。教会向私人地产征收免役地租*妨碍这些地产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同样，教会拥有永久管业的地产**妨碍地产的自由流通，并且根据自由派的设想，这些地产没有用于生产——在这些方面类似印第安人的村社土地。因此，许多文职政治家认为教会的权力和特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最后，许多人认为教会和军人根深蒂固的权力是对文职人员控制国家非宗教事务的一种威胁。

人们尝试在政治上树立共和制度，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树立个人主义概念，同时又努力创建基础广泛、面向实际的教育制度作为补充。政治上层人士担心，人民群众的无知和缺乏自治经验可能会使共和政府无法奠定基础。当务之急是在所有社区建立小学，使人民为行使公民职能做好准备。同时，在国家（而不是教会）控制下实施的初等教育将有助于灌输效忠新政府的思想，因为新政府的合法性充其量来说也是不稳定的——尽管上述意图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此外，对每一个人来说，为了使他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制度中举止有度，在自由经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潜能，

---

* 免役地租（quitrents），也称代役税，指向封建领主或教会缴纳的免除劳役或兵役的固定代偿金。——译者

** 拥有永久管业权的地产，这里是指私人或团体为宗教目的而永久地留给教会的地产。——译者

353 基础教育是必要的。各个政治团体的一些领导人还谋求改革上层人士子弟的高等教育，不再学习无用的学术公式，鼓励实验性地讲授自然科学，以期造就一批更加面向实际、在经济上有事业心的新的上层人物。

这些意识形态上和体制上的变化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在所谓波旁王朝改革时期就已扎下根基。有些学者把共和国时代初期政治结构的分散化和殖民地时代后期实行监督员辖区制度联系起来。同样，在波旁王朝时期等级制度也已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产生了越来越把以前加以歧视的等级纳入社会的某种倾向。一些波旁王朝的行政官还主张放弃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推行的使印第安人村社跟西班牙社会分离的政策，并且鼓励印第安人和整个社会结成一体。在波旁王朝后期，许多印第安人村社遭破坏。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向教会的司法特权进攻并试图减少教会对经济的妨碍。最后，在1780年以后的一些年月还采取了初步步骤来建立小学并在中学推行切实的、科学的教学方法。

但是，如果说西班牙美洲19世纪的自由化在18世纪就已扎下某些根基的话，那么这一进程在独立后加速和扩大了。这一进程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在独立初期，西班牙美洲的上层人士对他们的新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可能做些什么非常乐观，在这种乐观精神的推动下，开始在政治、司法、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改革。在某些地区，最主要的是拉普拉塔河地区、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这一改革时期发生在1810年至1827年之间；在玻利维亚，改革集中在19世纪20年代；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改革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达到顶点。然而，在这个改革的突然爆发时期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加深、发生一些初期的政治不稳定事件以及（在某些地方）社会作出反对改革的反应，几乎各个地方都接着出现了一个悲观和保守的时期。这种保守情绪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在西班牙美洲居支配地位，使体制改革的努力停顿下来。最后，在一些国家，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

代，充满新的乐观精神的一代新人，在较有利的经济环境的鼓舞 354
下，以新的活力恢复了自由化进程。

〔1810—1870〕这个时期的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形式多于实质。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新的共和国往往未能符合立宪主义者的理想。虽然上层人士坚持他们的虚构想法，要建立一个由假定是平等的原子组成的个人主义社会，然而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事实上是在按照社会中——这个社会以经济与社会的巨大不平等为标志——传统的庇护者—被庇护者关系所建立的准则生活。对教会和军人特权的进攻几乎没有削弱教会的政治影响，也没有削弱军人的权力。立法者所设想的小学校很多，而村庄里实际建造的很少，上层人士子弟转向实际证明也是幻想。但尽管如此，人们相信这些新的形式，它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

最后，在1810年—1870年时期，这个地区经济上接触和依赖比较发达的大西洋国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太重要了，因而不能不说。首先，西班牙美洲新独立国家的严重贸易逆差和因此产生的货币和经济紧缩，以及它们的政府越来越多的外债，对这些新国家的不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问题一起发生作用，形成一种保守气氛，这种保守气氛支配了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出口经济的增长和贸易的扩大在许多国家鼓励起一股新的自由主义热情。和国际经济日益结成一体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在多个国家互不相同。早在19世纪30年代，智利通过出口和太平洋沿岸的瓦尔帕莱索港的卓越地位赢得了繁荣，繁荣帮助它实现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在其他地方，在殖民地时代多多少少结成一体的经济在外部经济力量冲击下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殖民地时代后期，波托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白银贸易把今天的阿根廷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结合在一起。在独立时代，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联系消失了，因为波托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切断了联系，它作为采矿业中心的地位

也趋衰落。此外，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变为畜产品的有效出口地和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地，它在政治上逐渐和内地省份脱离，内地省份由于运输费用昂贵不能进行有效的出口，也不能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来和外国制成品竞争。同样，新格拉纳达独立后和比较先进的大西洋国家增进了交流，而它的国内运输仍然落后，这种情况促使在殖民地时期曾经繁荣过的地区间经济分崩离析。这个国家东部的索科罗向西部盛产黄金的安蒂奥基亚出售棉纺织品的贸易缩减，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安蒂奥基亚的黄金去购买外国布。在若干西班牙美洲国家，有些地区同外部世界的贸易超过了同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果削弱了内部的政治联系。

西班牙美洲上层人士所面临的一个深刻而持久的问题是建立能够有效地和持久地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西班牙美洲国家领导人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受到若干彼此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他们试图设法使它们协调起来。不管他们在独立斗争期间是多么强烈地反对西班牙统治，但是他们几乎无法逃避把他们哺育成长的西班牙政治传统；不管他们如何正式否定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往往在正式体制中，而且始终非正式地在各种政治行为的模式中继续存在。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通过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媒介受到法国和英国的政治范例以及北美模式的强烈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1830和1848年革命），显然都影响到上层人士关于哪种政治模式合适的概念。卓越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从孟德斯鸠和卢骚到贡斯当和边沁，到托克维尔，深刻地影响他们对政治体制的结构和政治进程如何进行的想法。上层人士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同英国、法国和北美的政治模式协调起来。此外，这个问题不得不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解决，这种经济背景在许多地方对于保持国家稳定是极其不利的。

第一个、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重

建合法权威的问题。废除西班牙国王这个权威的象征后，是否能够找到恰当的代替者？此外，还有一个怎样看待西班牙国王的权 356 威的问题。从16世纪初开始，西班牙国王完全控制着议会、贵族、教会和西班牙社会中其他潜在的掌权者。结果，代议制政府、主权属于人民等概念在西班牙说得最好是很薄弱的，权力集中在国王手中。国王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能够或者应该按照这些传统的西班牙专制制度来建设西班牙美洲各国新政府吗？还是西班牙美洲上层人士应该放弃他们的政治传统而采取在英国、英语美洲和(非常短暂地)在法国大革命中显示出来的自由立宪模式呢？最后，还有控制西班牙美洲社会中最强大的集团即教会和军队的问题。在西班牙制度下，最终只有国王一人能够掌握这些集团的忠诚并使它们服从。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新国家能够对它们施加同等有效的权威吗？

在独立时期的第一阶段，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最早的一些政府(1810—1813年)求助于主权属于人民的概念，但也承认被俘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的权威。只是在同费迪南七世的关系最后破裂的时刻来到时，才不得不面对如何使这种权威适当地象征化的问题。总之，在独立的第一阶段，尽管各级洪达和临时政府形式上效忠于费迪南七世，但是它们的权威至多也是不完整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敌对集团诉诸于政变，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殖民地首都力图控制各个省，结果爆发了地区之间的内战。

在这一早期的混乱时期，几乎立即出现了控制有势力的集团的问题。尤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加拉加斯、波哥大和圣地亚哥，民兵过去在废黜西班牙行政官方面曾起重要作用，如今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随着它的队伍在反对西班牙权力中心的斗争中的扩大，它在缔造或者推翻政府方面的作用丝毫没有削弱。在这一时期，争论的问题是直截了当的控制军队问题，军人特权问题还没有提出来。

357 控制教会和取得教会支持，同样也是与新政府生存有关的重要问题。最早的克里奥尔领导人比较照顾教会，对教会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一般没有改变。新成立的政府几乎一律废除了宗教裁判所，但人们并不把这看作是对教会本身的进攻，而仅仅看成是消灭了一个机构，这种机构的过份行为是与启蒙运动后的西方国家不协调的。克里奥尔领导人在保持国家保护教会的传统的同时，提出了享有圣职授予权的要求，尤其是推荐(实际上是任命)教士担任神职的权利。新政府要求享有过去由西班牙国王享有的这一权利，理由是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罗马教皇当局和当地教会治统集团坚决拒绝，他们争论说圣职授予权只是授予西班牙国王的。一般说来，新政府在控制教会和利用教会的影响来维持国家方面，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成功。许多下层教士同情新的自治政府，但是教会统治集团(除少数例外)对西班牙美洲各个新共和国持敌对态度。在委内瑞拉，教会对新生共和国的攻击在使1812年共和国倒台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别的地方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在利用教会为独立事业服务方面比较成功，但是国家控制教职权任命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方面，共和国最初期的克里奥尔领导人承认费迪南七世为政府的象征性首脑，并且试图使国家和教会的传统关系永久化，谋求以此来保持国家的连续性，但与此同时，新政府所体现的政治概念却表示与过去明显决裂。所有新政府都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多数新政府都是按照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模式建立起来的。除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领导人以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迅速采取行动拟订宪法，以表示国家必须从属于一部成文宪法的信念。不管是明显地或是含蓄地，这些宪法都以社会契约概念为基础。最初的一些宪法(1811—1812年的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智利)，据宣布，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现——虽然“普遍意志”通常被解释为多数人表决通过的意见。当然，普遍意志是通过代议制政府来贯彻

的。几乎所有这些最早的宪法都宣布了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安全、财产)，许多宪法规定了新闻出版自由，有些宪法试图建立陪审制度。几乎所有的宪法都谋求通过三权分立和使行政部门比立法机构相对软弱的办法来保护这些权利。①

358

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智利早期的自由立宪政体的实验宣告失败，它是被各派上层人士之间和敌对地区之间的斗争摧毁的，在斗争过程中，权力落入一个最高执政手中。不久以后，三个地方的克里奥尔人的政府都被西班牙军队消灭。后来的评论家重复西蒙·玻利瓦尔在1819年所说的话，倾向于强调，早期的克里奥尔领导人部分地是被指引他们的启蒙运动的设想毁掉的：即对人的本性过份乐观，过份相信法律和宪法铸造人类行为的能力，没有考虑西班牙传统和西班牙殖民历史在影响实际政治行为方面的份量。自由立宪原则(尤其是三权分立和宪法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违反西班牙的政治传统(权威集中在国王手里)和当时西班牙美洲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克里奥尔领导人由于采用了在启蒙运动思想和外国模式启迪下实行的体制，就注定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失败。这种异国体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迅速垮台。

这种观点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建立这些体制可能不只是受外国模式的影响。设置受宪法限制的、软弱的行政官，虽然采取了受外国启迪的形式，但也可以看做是当地反对殖民地总督控制的一种反应。同样，采取联邦制结构(一般把它归因于受美国宪法的影响)也是对政治现实作出的回答。1810—1811年在新格

① 西蒙·科利尔著《1808—1833年智利独立的思想与政治》(剑桥，1967)第140，154，177—178页；安东尼奥·庞波和何塞·华金·格拉著《哥伦比亚宪法》(4卷集，波哥大，1951)第1卷，第122—129，144—147，151—157，189—190，246—250，261—262，273，294—303页；第2卷，第97—106页；乌利塞斯·皮康·里瓦斯著《委内瑞拉宪法目录》(加拉加斯，1944)第9—15页。

359 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以及1822—1824年在墨西哥，各个省曾出现过极端反抗中央集权统治的自治政府[1]。在智利，1826年暂时出现了联邦制，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在1824—1825年垮台了。

1815年以后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趋势，就是建立设有强有力的行政官并对省政府实行中央集中控制的政府。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需要动员起来在战场上击败西班牙保皇军。许多克里奥尔领导人还认为，建立比较强有力的、比较中央集权的政府是赢得欧洲强国的信任、得到贷款和外交承认所必需。还有些人担心，脱离西班牙独立之后，西班牙美洲各国政府如要抵御外国干涉，就必须保持强大。在王政复辟的欧洲出现的反动的、反共和的气氛，既加剧了这种担心，又驱使西班牙美洲领导人去接受比他们在1815年以前所知道的更保守的思想影响。

但是，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在西班牙美洲的独立被一些主要国家承认之后，在法国1830年革命之后，加强行政权力和中央集权的趋势继续存在。事实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在1826年至1845年期间变得特别明显。因此，在1825年以前就存在并且一直持续到整个19世纪40年代的当地条件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独立初期，存在着乐观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助长了1811—1812年间制订乌托邦式的宪法方案。然而，1825年以后，由于发生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和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产生了对西班牙美洲的社会秩序和经济与政治前景感到悲观的气氛。在1820至1845年期间，政治领导人经常表示担心无政府状态已迫在眉睫或已成现实。于是这几十年特别令人关心的事是追求政治秩序。

然而，对于如何去建立秩序，有一些分歧意见。有些人，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着眼于各种欧洲的立宪形式，认为它们是实现稳定的关键。另外一些人，主要是军人和没有受过良好教

---

① 关于墨西哥情况，特别参阅内蒂·李·本森著《墨西哥的省代表团与墨西哥联邦制》（墨西哥，1955），第85页以下各页。

育的人，认为不需要这种华而不实的宪法内容而着眼于使用武力——如果不说是恐怖手段的话——作为维持秩序的手段。

1815年以后想建立比较强有力的立宪国家的愿望表现在譬如 360 说力图建立由欧洲亲王领导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努力比较短暂）。这种君主立宪制形式在阿根廷（1814—1818年）和智利（1818年）最为明显。在不少国家，支持君主制的人谋求同拿破仑以后的欧洲反动君主国家达成和解。阿根廷和智利都曾向君主国家作出姿态，希望这些国家承认它们的独立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保护它们免遭外部进攻。1814—1819年建立君主制的计划也反映了至少一部分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即君主立宪制有助于国内稳定。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1816年在图库曼制宪会议上为君主立宪制辩护时既强调了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内部混乱，又强调了欧洲占优势的政治气氛；他认为采用君主制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在外交上是稳当的。

1819年，君主立宪制的想法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名誉扫地，从这以后，君主立宪制作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手段只在墨西哥得到重要支持。在那里，早在1830年，卢卡斯·阿拉曼就让英国使节理解，由于墨西哥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引进一名欧洲亲王的想法正赢得支持。19世纪40年代曾公开讨论过这样的建议，但支持它的人可能仍然很少。最后，在1864至1867年期间，进行了由一名欧洲亲王统治的唯一的一次具体实验，和拿破仑三世勾结的墨西哥保守派引进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作墨西哥皇帝。然而，像前几次一样，国内政治稳定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目标。对墨西哥保守派来说，法国支持的君主制是使日益衰落的政治力量恢复元气的最后一次努力。对墨西哥保守派和拿破仑三世来说，这次实验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当马克西米利安在1867年被处死时，墨西哥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他一起死亡了。

君主立宪制在西班牙美洲从来没有取得成功。在早期阶段（1810—1830年），难以找到一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欧洲候选人。

由于费迪南七世采取不妥协态度，不可能遴选一位和西班牙君主国有密切联系的候选人。另一方面，又难以找到另一个英国和法国可以接受的人——而英、法接受是外交上这一着棋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即使找到了欧洲强国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他也只是一件人工移植品(像马克西米利安后来证明的那样)，因为他缺乏君主制取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那种合法性。找一名土生土长的君主的尝试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告失败。贝尔格拉诺提出的让一位印加人后裔登上王位的建议也许能涂上一层合法色彩，但是由于克里奥尔人蔑视印第安人，这个建议本身就是荒谬的。由一个克里奥尔人当君主也不行，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1821年—1822年在墨西哥就发现了这一点。上层人士很难接受由某个近在身边的、已经知道他并不比其余的人优秀的人实行君主式或帝国式统治。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君主制思想已失去大部分吸引力。虽然西班牙美洲各国都羡慕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巩固性，但是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终究是代表过去的残余。在独立的最初年月的乐观气氛中，大部分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宁愿让自己同共和制联系在一起，共和制度似乎代表未来的潮流。而且，在最初阶段，建立共和国有助于证明同西班牙决裂是正确的。后来，在早期的乐观情绪和革命热情开始消退后，已被确认的共和模式开始产生一种体制上的势头。因此在1820年以后，为巩固中央控制而进行的大部分努力至少在形式上是共和性质的。

从1819至1845年期间，两种基本的立宪方式比较突出：一种是在形式上类似1812年西班牙加的斯宪法所规定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方式，另一种是西蒙·玻利瓦尔所提倡的拿破仑式的国家方式。第一种方式十分普遍，它似乎在文职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在律师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中得到广泛支持，而拿破仑——玻利瓦尔模式似乎在军人中有更多拥护者。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多数宪法中都有加的斯宪法的明

显印记，如1821年的大哥伦比亚宪法、1830年和1832年的新格拉纳达宪法、1830年的委内瑞拉宪法、1823年和1828年的秘鲁宪法、1826年的阿根廷宪法、1830年的乌拉圭宪法以及1828年的智利宪法。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也受西班牙宪法的重大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墨西哥宪法采取联邦结构。这些宪法大多建立国务委员会向总统提出意见；大多数宪法中规定行政首脑只有暂停性否决权；大多数宪法要求实行部长负责原则，至少要求部长共同签署所有法令。许多宪法仿效加的斯宪法，试图增强立法机构的权力，办法是设置一个国会常设委员会，在立法机构休会期间代表立法机构工作。除墨西哥宪法外，所有宪法都规定由中央任命各省官员（有的叫地方行政长官，有的叫州长，有的叫省长），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总统只能从各省机构所提名单中进行选择。最后，几乎所有这些宪法都设立类似西班牙的省代表团 362 (diputación provincial)的机构。省代表团由选举产生，帮助地方行政长官或省长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征收捐税。和西班牙一样，原来设想这个机构的职能基本上是咨询性和行政性的，不是立法性的。然而在墨西哥，省代表团很快就演变成为全面的省立法机构。在新格拉纳达，这种演变比较缓慢和发育不良，直到19世纪40年代它们的法令还必须经全国立法机构批准。在其他地方如秘鲁和乌拉圭，这个机构不是无声无息就是从来不很重要。由此可见，许多地方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仿效西班牙1812年宪法，是试图建立一种用立宪制当装饰品打扮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

西班牙美洲上层人士被1812年宪法所吸引，大概是因为1812年宪法努力做的实质上就是他们想要做的同一件事情：即把英国和法国的自由立宪理想引进西班牙的政治结构。然而，在加的斯宪法起草者的任务和后来西班牙美洲宪法拟订人的任务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加的斯的西班牙自由派特别关心的是要限制一个专制国王的权力，把他变成一个立宪君主，而在西班牙美洲，是

要利用同一个立宪模式来加强而不是削解中央权力，最早的西班牙美洲宪法就是这样制订的。此外，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宪法都在加的斯宪法上增加了重要的一条，即允许总统在发生外来威胁或内部骚乱时使用非常权力。对立宪政体的各种正式约束的这一紧急出口，在西班牙美洲各地曾被大量使用，并且经常用来使宪法庄严宣布的各种自由事实上归于无效。

在一些选择加的斯宪法模式的国家，对中央集权的支持不是一致的，有些政治上层人士继续为联邦结构辩护。在哥伦比亚(1821年)、智利(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以及墨西哥和阿根廷(在整个这段时期)，重要政治人物都支持联邦制度，因为地区之间发生对抗或各省不信任首都，还因为他们认为联邦结构可以防止暴政。然而在许多国家，联邦派被那些担心联邦制将导致或已经导致无政府状态的人所压倒。通常情况是，那些拥护中央集权国家的人愿意承认，从自由立宪主义原则的观点来看，联邦制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是同时他们又争论说，这种制度“太完美无缺了”,在西班牙美洲行不通。这些主张中央集权的人认为，西班牙的统治使人民愚昧无知，毫无政治经验，人民对于如此极端的民主共和政府形式毫无准备。整个民众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公民责任感(公民品德)，没有能力在基层做出明智选择。此外，没有那么多合格的人来担任各省所需要的职务。最后，这种制度由于机关增多，意味着开销很大，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无力承担。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争论说，为了不冒采用联邦制后必然会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的风险，必须牺牲一点点自由以便保持秩序。他们争论说，通过加的斯模式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轮流执政以及在中央一级实行其他宪法约束，公民自由将得到适当保护。

在几乎所有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央集权的宪法中都规定了选举权的财产条件，这是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能力缺乏信任的反映。然而，像在其他方面一样，难以分清，为选举权规定财产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反映西班牙美洲内部的保守主义潮流，在多大

程度上是仿照欧洲模式。欧洲的宪法范例以及像邦雅曼·贡斯当这样的欧洲主要立宪主义者的学说对于西班牙美洲各国所规定的那种严格的财产限制提供了充份的支持。

作为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标志的西班牙美洲中央集权化的总趋势中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但是这些例外情况有的多多少少是暂时性的脱离常规，例如1826—1828年智利联邦制宪法就是如此；有的是当地政治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例如，墨西哥和秘鲁脱离西班牙独立较晚（墨西哥是1821年，秘鲁是1824年），它们开始一系列宪法演变也比其他地区晚。因此，第一个秘鲁宪法（1823年）和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智利的早期宪法（1811年）一样，设置了一个软弱的、受议会支配的、由多人组成的行政机构，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建立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1811年宪法所规定的联邦结构。但是，秘鲁和墨西哥相当迅速地追上了扩大行政权力和中央集权这一总的趋势。1823年的秘鲁宪法以及它的由多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几乎立即被推翻，从那时起秘鲁就掌握在通过强有力的总统制政权行使权力的军事考迪罗手中。在墨西哥，联邦制宪法在1830—1832年遭到事实上的删节，从1836到1846年被中央集权制正式取代。中央集权化格局的最大例外是阿根廷，这一例外反映了另一种当地的特殊性。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努力最终导致制订1826年的宪法。然而，当各省考迪罗和他们在当地的支持者宣告脱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独立（独立经1831年联邦公约批准）时，中央集权制几乎立刻就垮台了。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证明他能够影响其他各省的政治方向，但是他对其他各省的权力是非正式行使的，并不是立宪制度承认的。

虽然在1820至1845年期间受过大学教育的政治家们最赞成近似加的斯宪法的宪法，但是政治上层人士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最显著的是军人）认为，即使是这种模式也不足以在西班牙美洲产

的一个早期例子。这个大纲要求设置一个仿效英国上院的世袭参议院和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如果说玻利瓦尔的安戈斯图拉计划具有英国模式，那么他的1826年的玻利维亚宪法更受拿破仑宪法的影响。总统实际上是终身制的执政官，有权指定副总统（他的继承人）和各部部长。总统不对他的政府的行为负责，只有副总统和各部部长才能被弹劾。总统除拥有广泛的任命权力之外，还有权随意命令立法机构休会和复会。这种制度由一个监察院（三个立法机构之一）进一步固定下来，监察院成员终身任职，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促进和保护人们提高公民品德（维护新闻出版自由和警惕滥用权力是监察院的两项任务）。

366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有几位将军恢复实行拿破仑一玻利瓦尔模式。这几位将军曾在玻利瓦尔手下任职，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安德烈斯·圣克鲁斯将军把秘鲁和玻利维亚暂时统一为一个联盟后，1837年颁布了宪法。根据这个宪法，行政部门由一名任期10年的护国者领导，另设终身制参议院，其成员由护国者任命。1843年，玻利瓦尔的另一名以前的下属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在厄瓜多尔通过了一个类似的宪法，规定设置一名任期8年的总统和类似的终身制参议院。1836年，墨西哥的保守份子制订了一个对这个模式略加修改的宪法。

这些建立在拿破仑一玻利瓦尔模式基础上的宪法都是短命的。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玻利瓦尔在1826年强制施行他的宪法暂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建立的政府垮了台，他自己离开舞台后，他的宪法实际上也就立即被抛弃了。当玻利瓦尔在1826至1830年期间试图把他的想法强加给哥伦比亚共和国时，他在文职上层人士中遭到如此巨大的反对，以致他认为有必要建立独裁统治；独裁统治反过来又促使波哥大年轻的文职上层人士试图杀害玻利瓦尔（1828年9月）。不久，玻利瓦尔的事业在他身边瓦解，他不得不承认失败而辞职。玻利瓦尔宪法的变种——圣克鲁斯和弗洛雷斯的两个宪法也都是短命的，只维持不到两年，虽然圣克鲁斯宪

法是除内部叛乱外，被从智利来的外部干涉击败的。

玻利瓦尔模式在各地遭到失败，一部分原因是，许多文职上层人士觉得它的君主制味道太浓。此外，由于规定终身制总统和终身制监察官，玻利瓦尔的计划违背了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派所珍视的一个立宪原则，即防止专制的轮流执政原则。文职人员还担心军事领导人垄断总统职位。不管是出于原则还是出于私利，玻利瓦尔宪法受到受过教育的自由派的强烈反对。这些自由派在秘鲁由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卢纳·皮萨罗神甫领导，在哥伦比亚由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和一批年轻律师领导。

尽管玻利瓦尔和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1826—1830年间是死对头，但是他们不同的施政处方来源于同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尤其是邦雅曼·贡斯当的学说。贡斯当的学说在1820年西班牙自由派革命时曾被译成西班牙文，在西班牙出版后广泛流传。但是 367 自由派倾向于比玻利瓦尔更强调贡斯当关于个人自由的一面(陪审制度、新闻出版自由、财产不可侵犯、对军人施加限制)。玻利瓦尔则强调贡斯当学说中的稳定性因素，特别是他的三权分立概念。贡斯当设想，立宪君主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轮摆，能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节制冲突。玻利瓦尔把总统(立宪君主)和他的部长的行动分开，把节制冲突的权力交给监察官，都是遵循这一设想。在1836年墨西哥的中央集权制宪法(以“七条法律”闻名)中也可以发现贡斯当的制衡权力概念。

贡斯当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普遍影响仅仅是表明温和的欧洲立宪主义思想在西班牙美洲知识份子中居统治地位的一种迹象。不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智利报纸上，还是在1830年乌拉圭的制宪会议上，还是在19世纪40年代新格拉纳达政治家的图书馆里，最经常遇到的三位作者是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边沁。卢骚的著作为1810至1815年期间建立革命政府进行辩护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在1820年以后和西班牙美洲所关切的问题越来越无关了。政治上层人士最感兴趣的是有关执政的实际领导艺术的作品，而

不是有关主权基础的抽象的理论性论文。马基雅弗利在那个时期的图书馆里地位突出。但是人们也向立宪主义作者征询意见，寻求帮助。文职上层人士转向贡斯当的《政治教程》，因为它对于草拟宪法很有用处。关于边沁，他们较少阅读他早期的哲学著作，而更多的是阅读那些似乎能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提供指导的作品（关于民事和刑事立法、司法证据、刑法的论文以及关于政治策略和议会谬误的文章）。吸引上层人士的其他许多著作也被看成是立宪政府的施政手册。例如科图关于英国刑事审判和英国施政精神的著作，菲兰杰里关于立法的著作，贝卡里亚和杜蒙特关于刑罚的著作，基佐关于死刑的著作，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835年以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美洲的民主》一书与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边沁的著作一起成为人们普遍阅读的关于立宪政府施政的权威作品。对于那些有保守倾向的人，19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阅读的作者名单中可能还包括夏多布里昂、伯克和科辛。①

368

在1820至1845年期间的政治活动家们的知识武库中显然看不到当时欧洲政治思想的极端派的著作。在他们的图书馆里和公开讨论中，很少出现专制主义的保皇派梅斯特尔和博纳尔德。同时，法国社会主义作品在那些在1845年以前支配政治活动的人们身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在19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影响的最显著例子是阿根廷的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他特别喜爱圣西门

① 科利尔著《思想与政治》第171—176页；胡安·E.皮韦尔·德沃托著《乌拉圭政党与政治思想史》，第2卷：《党派的定义（1829—1838）》〔只出版一卷〕（蒙得维的亚，1956）第53页；古籍图书目录，见哥伦比亚国家档案馆，共和国部分，第二编，1840年，第43卷57r—58r；1851年，第264卷，759r—763v；1852年，第269卷，26r—29v；第三编1848年，第435卷534v—6r。另见查尔斯·A.黑尔著《1821—1853年莫拉时代的墨西哥自由主义》（纽黑文，1968），散见第55—60，76，149—154页。关于19世纪40年代极端保守派所赞同的原始资料，见巴托洛梅·埃雷拉著《著作和演说》（两卷集，利马，1929），第2卷，第95—96页。

的作品。但是，埃切韦里亚实际上属于还没有争夺权力的年轻一代。

由此可见，在1820至1845年期间，从自由的到温和的欧洲立宪主义是所有政治派别——不管是“极端的”、温和的还是保守的——受过教育的领导人的思想主体。当然，对这一份19世纪早期的政治权威名单的某些方面有一些不同意见。人们虽然广泛阅读边沁和德斯蒂特·德·特拉西的著作，但并未广泛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两人的“唯物主义”(即耸人听闻的)哲学受到政治保守派的强烈攻击。然而最反对边沁的唯物主义的保守派却是正统的自由立宪主义者。新格拉纳达著名的反边沁主义者华金·莫斯克拉之所以攻击这位英国功利主义者，部分理由是由于边沁否认天赋权利学说。另一个强烈的反功利主义者、秘鲁人何塞·马里亚·德·潘多是多少受到博纳尔德和梅斯特尔的超级保守主义影响的西班牙美洲少数政治知识份子之一。然而，即使在潘多的立宪处方中，也没有为专制制度辩护，而是为一种保证新闻出版自由和陪审制度的、温和的、贡斯当式君主立宪制辩护。①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保守主义明显盛行时期，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上层人士中间，自由立宪思想仍居主导地位。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虽然至少在认识上接受了立宪主义的思想，然而往往事实上并不奉行立宪主义的准则。并不是每一个活跃 369 在政界的人都信守这些思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草拟宪法和法律，占有立法机构的大部分席位，担任内阁职务。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演员，虽然他们跟有关治理国家的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有很大关系。重要的政治角色、掌握最高权力的角色是由其他人扮演的。这些人是职业军官、地区考迪罗、商人和地主。他们对立宪主义思想往往所知甚少，关心更少。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家来说，

① 何塞·马里亚·德·潘多著《关于道德与政治的思考与笔记》(加的斯，1837)第3—5，14—22，62，110—111页。

政治形式、体现在法律和宪法中的思想很重要。他们关心这些思想及其预料的社会后果，在他们的心目中和那些文明的欧洲人的心目中，这些思想和体制意味着政治的严肃性。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旅行或大学教育结识欧洲政治模式的人来说，这种考虑的份量轻得多。职业军官参与政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有时是由于他们希望保护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军人，有时是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集团。地区考迪罗必须注意满足当地土地所有者寡头集团的要求，他们往往是地区考迪罗的权力基础。大土地所有者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能在土地占有权的纠纷中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或善意的中立。商人们较少关心政府的形式，而更关心商业规章对他们是否有利或至少不会出乎预料。由此可见，虽然政治思想和它们所体现的制度使受过教育的政治家们感情冲动，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不关心立宪原则的态度曾在迭戈·波塔莱斯身上尖锐地表现出来。波塔莱斯是个商人，是19世纪30年代智利的主要政治人物。1834年，当时担任瓦尔帕莱索省长的波塔莱斯对保守派法官马里亚诺·埃加尼亚的意见大发雷霆。埃加尼亚认为，没有法庭命令，他就不能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埃加尼亚还送去一本关于人身保护法的书，这就进一步触怒了波塔莱斯)①。

总之，按照埃加尼亚法官的意见，政府在有人要推翻当局的威胁面前应当袖手旁观，除非这个嫌疑犯被当场抓住……我们无法同司法人员达成谅解；而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如果宪法和文件不能对一件已知其存在的罪恶提出惩治办法的话，那么它们是干什么用的〔1〕……在智利，法律不为任何事情服务，只是制造无政府状态、不加制裁、无法无天、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例如，如果我监禁了一个正在搞密谋的人，我就犯了法。如果法律不允许政府在适当时刻自由行动，就让法律见鬼去吧。

370

① 劳尔·席尔瓦·卡斯特罗编《波塔莱斯的思想与自白》(智利圣地亚哥，1954)，第57—58页。

立宪原则培育出来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政治家自己在行使权力时也背叛这些原则。例如，比森特·罗卡富尔特(19世纪20年代在墨西哥、1834年以前在厄瓜多尔的自由派反对派领导人)，1835年一旦在厄瓜多尔掌权而且面临武装叛乱时就宣布，"只有恐怖"才能使叛乱份子遵守秩序并"维护所有法律中的第一条法律，即公共安宁的法律。"

我的唯一方针是让他们在我面前发抖。如果必要，我愿意知道如何把我自己变成一个苏拉*，以便把我的国家从正在企图把它吞噬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真正热爱光明和文明的人，我同意被视为暴君。①

他说到做到，下令枪杀了数十名叛乱份子。

人们对19世纪西班牙美洲所宣布的立宪原则经常遭到违反作出各种各样解释。一种意见认为，立宪制度虽然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完全不符合西班牙的政治传统②。然而也有人这样说，至少在少数情况下，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在完成任务时，是必然要违反立宪原则的。他们为了推翻西班牙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把以英国、法国和其他外国模式为基础的新体制移植过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革命的。③因此，他们在试图引进这些变革时经常诉诸暴力措施，这不足为奇。

---

* 苏拉(Sulla)，古罗马将军和独裁执政者——译者。

① 转引自理查德·帕蒂著《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和他那个时代的厄瓜多尔》(基多，1941)，第56页。

② 格伦·迪利著《拉丁美洲一元论民主制的传统》，载《安第斯地区研究》，4/1(1974—1975)，第159—201页。

③ 见拉尔夫·李·伍德沃德著《危地马拉的社会革命：卡雷拉叛乱》，载《启蒙运动的应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新奥尔良图兰大学中美洲研究所出版物23，1972)，第49—53页。并见查尔斯·黑尔关于自由派立宪主义的目标(它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与他们想打破社团对个人主义的障碍的愿望(这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论述：《何塞·马里亚·路易斯·莫拉与墨西哥自由主义的结构》，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45/2(1965)，第196—227页。

在相当大程度上，权威并没有成功地体现在西班牙美洲许多宪法所设想的正式体制中，相反，它体现在一些人物身上。权威落入了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手中，他们倾向于站在法律或宪法之上。这些领导人过去和现在往往被称为考迪罗——这些人的性格力量使他们能够掌握一大批追随者的个人忠诚，他们发动他们的追随者向法定的权威挑战，或者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权力。

371

考迪罗一词指的是任何一种杰出的领导人，在1810至1870年期间使用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大多数考迪罗，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最初几十年，具体讲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军事领导人。但是这个词这些年也适用于其他种类的领导人。在19世纪20年代,秘鲁将军奥古斯丁·加马拉——他本人显然是个考迪罗——用这个词来指主教的政治领导。① 在当前关于19世纪的学术作品中，这个词的含义比当时要狭窄一些。现在一般认为，考迪罗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或者是指挥正规军队的职业军官，或者是领导民兵或非正规军队参加政治战争的民兵军官或骑马的文官，或者是(更广泛地讲)参加暴力镇压的基本上是文职的领导人，如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博士或智利的迭戈·波塔莱斯。

1840年以前，我们目前认为是考迪罗的那些人，大多在政治生涯开始以前即有某种军事成就——象独立时期的士兵或一个省的民兵领导人。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由于同印第安人作战而获得声誉。19世纪40年代以后，独立时期的将军们从舞台上消失，国内政治战争的军事领导人的角色就部分地被那些以文职人员身份开始政治生涯的人——律师、新闻记者、商人和地主——承担了，这些人是被当时激烈的政治局面的紧急需要推上军事领导地位的。

① 大元帅奥古斯丁·加马拉的《书信集》,阿尔韦托·陶罗编(利马，1952)，第47，148，209页。

考迪罗和他的一批追随者是靠个人忠诚关系集结在一起的。这种个人依附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人们追随考迪罗？19世纪关于这个现象的作品，还有20世纪的大部分作品都强调考迪罗本人的性格。根据习惯说法，考迪罗是具有很大个人吸引力、以意志力量来控制次等人物的人。1845年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对阿根廷省级领导人法昆多·基罗加的描绘是19世纪关于考迪罗的典型描绘。据说这位考迪罗曾说，“如果我走到街上对我遇见的第一个人说，‘跟我来’，他会毫不犹疑地跟我走。”考迪罗的追随者之所以响应他，是既因为他们发现他吸引人，也因为他威吓他们。还是根据习惯说法，考迪罗是勇敢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树立了勇敢和大胆的榜样因而能指挥别人去完成英勇业绩的人。他还经常被描绘成“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人；即使他是上层阶级的一员，他也经常培养普通人的风度，以便鼓励他的追随者同他本人打成一片。据说委内瑞拉的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为了显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和跟追随者打成一片，曾同他们的牛仔随从比赛骑术。虽然许多考迪罗喜爱普通的格调，但另外一些考迪罗爱用富丽堂皇的场面来颂扬自己，这可能是为了吓唬民众，也可能是为了让领导人自己高兴。考迪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独裁性格。由于他残酷无情，也许更由于对他捉摸不透，考迪罗往往使他的追随者和他的敌人一样感到害怕。

最近的许多论述虽然也讲考迪罗的性格特点，但倾向于着重讨论领导人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网。在这些论述中，把考迪罗现象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建立在首领和扈从相互依赖之上的制度。有人举出了各种各类的庇护人—依附者的关系。普遍认为，考迪罗给他的追随者赏赐，作为忠实服务的报酬。① 但是

---

① 埃里克·R.沃尔夫和爱德华·E·汉森著，《考迪罗政治：一种结构性分析》，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9/2(1967)，第168—179页。

更深一层的解释还指出另外一种庇护人—依附者关系，考迪罗本人是富有的庇护人的依附者，这些富有的庇护人“造就和控制”他，作为自己的政治和(或)经济计划中的一笔投资。[①] 当然，即使是后面那种情况，我们也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论是依附他人的考迪罗还是他的富有的庇护人，都不能完全控制这种关系。大多数把考迪罗现象当作庇护人—依附者关系的论述主要认为考迪罗是从地区性文化落后状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且设想支持他的关系网是当地地主的一种联盟。但并不是所有的考迪罗都是从各省的默默无闻中出现的。许多考迪罗得到国民军军官的支持或者这些军官的某些小集团的支持，作为他们的权力基础。有些最强有力的考迪罗，例如墨西哥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拥有地区寡头集团和军官集团的共同支持。最后，我们应当指出，考迪罗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网往往形成复杂的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当地权贵和他们的个人追随者向地区性头目效忠，地区性头目又至少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支持考迪罗或在中央活动的其他政治领导人。

从社会阶级来说，考迪罗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产物，出身比较卑贱，他的攫取权力的野心部分地被想望得到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欲望所驱使。当然，这种概念非常符合既依附于富有的庇护人又对一些追随者实行庇护的那一类考迪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描述的考迪罗的例子。但是许多考迪罗，例如哥伦比亚的西蒙·玻利瓦尔和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将军，都出身于上层阶级。这些人比较不容易受上层阶级控制，后者认为他们特别难以预料，因而是令人害怕的。

由于考迪罗通过暴力取得权力，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总是成问

① 罗杰·M.黑格著《一名考迪罗的产生与控制》，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44/4(1964)，第481—490页。并见罗伯特·L.吉尔摩，《1810—1910年委内瑞拉的考迪罗现象与尚武精神》，(俄亥俄州阿森斯，1964)。书内论述详尽。

题的。因此，他统治他在当地或全国的地盘时，经常怀着一种地位不稳的感觉，知道他也可能被某个竞争的头目推翻。他的事实上的政权缺乏宪法上的合法性，并且经常遇到其他考迪罗的竞争，所以他经常发现自己被迫用暴力来进行统治，很少或根本不注意宪法细节。他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似乎经常独断专行。由于考迪罗是根据他个人的考虑进行统治，他的行为就更加无法预料。对考迪罗来说，首要问题是个人忠诚。被认为忠诚的人可以指望得到支持；被怀疑不忠的人可能遭到可怕的报复。另一方面，考迪罗可能缔结出人意料的联盟，这种联盟也经常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大多数考迪罗不考虑什么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可以支持各式各样和彼此矛盾的事业。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考迪罗有时把自己说成是中央集权主义者，有时把自己说成是联邦主义者，除了作为表明是朋友还是敌人的手段以外，这些名词往往并没有多大意思。在墨西哥，圣安纳将军有时支持自由派，有时支持保守派，这取决于他对他们军队的力量对比的估计。在新格拉纳达，何塞·马里亚·奥万多将军在1840年的叛乱中挥舞联邦主义的旗帜，发动这次叛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免遭中央政府的起诉（在他看来，就是迫害）。1853年，他又认为作为联邦制政府的总统无法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奥万多的主要政敌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按照野心的驱使，19世纪40年代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派，到19世纪50年代相当容易地变成了同样强有力的联邦派。

374

考迪罗的个人至上的领导往往表现在对当选政府发动叛乱。但是也有居支配地位的考迪罗运用自己的权威支持羽毛未丰的政府结构的情况。在智利，考迪罗发动叛乱夺取政权成为“古老的祖国”集团统治时期（1810—1814年）和19世纪20年代的特点。但是在1830年以后，通过华金·普列托将军和他的部长迭戈·波塔莱斯的个人权威建立起来的政府终于发挥了组织力量。到1851年，智利政府已不需要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恩惠也能维持自己的权威。在新格拉纳达，19世纪30年代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桑坦德将军和19世纪40年代的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将军的个人权威帮助支持了立宪政府，在这些年中，立宪政府只受到一次大的考迪罗叛乱的威胁。同样，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在委内瑞拉的权威（1830—1848年）和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权威（1829—1852年）有助于维持国家秩序。然而在西班牙美洲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考迪罗能够支配局面，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似乎是无止境的内战或政变来决定由谁进行统治。这一格局在玻利维亚、秘鲁（1823—1845年）以及拉普拉塔河地区（1860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极其显著。

考迪罗现象的起源一直是人们进行推测的一个题目，但是很少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这里无法列出关于考迪罗的全部假说，但是可以概略地说说一些主要的解释。许多解释都强调独立战争的影响。有一种解释认为，争取独立的斗争使一些军事主角有了地位和权力，而文职上层人士和他们控制的施政机构相应地被削弱了。因此，考迪罗的出现可以看作是1810至1825年期间政治“军事化”的结果。① 这种解释对于在独立斗争中遭受过长期激烈冲突之苦的那些地区——最显著的是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墨西哥——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些地区，像中美洲，在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军事冲突较少，然而在独立后时期也出现了考迪罗。这一事实以及在独立斗争后考迪罗政治又持续了几十年，说明有必要在独立时期的军事化这个原因以外寻找考迪罗现象的根源。独立战争无疑影响了个人至上的领导形式，但是考迪罗现象本身有更深的根源，是更持久的力量的产物。②

375

① 例如，阿谢尔·克里斯坦森著《拉丁美洲政府的演变》（纽约，1951），和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著《拉丁美洲革命的后果》（纽约，1973），第1—43页。后者的论述更加深奥。

②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论述，请见本章第413—420页〔原文〕关于解释西班牙美洲在独立后时期政治不稳定情况的段落。

在西班牙美洲，独立最显著的受益者是克里奥尔上层阶级。在殖民地时期末期，这个阶级的大多数成员都拥有地产，许多人当神甫，少数人从事大规模的国际商业。有些人也占有政府职位，但主要是次要职位，如律师，税务官员或次要的省行政人员。独立后，克里奥尔人在政府和政界谋职的机会增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取代了担任最高职位的西班牙人，而且也因为他们建立的共和政府本身的性质。殖民地制度只需要比较少的法官、省行政人员、军官和税务官员，而新建立的共和国需要所有这些人而且需要更多：建立了更周密的上诉法院系统；必须有国会议员（通常是两院），还必须经常找到省议员；最后，在最高一级，内阁和内阁下属的职位、国务委员会和至少是少数外交职务需要分配。

新的政治机会在克里奥尔集团成员中导致了相当大的地区流动性。来到首都当议员的外省人常常留下来让子女受教育，享受文化生活，追求更高的政治前程。外省家庭也把子弟送到首都的主要中学和大学受教育，倒不一定是打算为他们谋取政治功名——虽然上过这些学校既提供了受过教育的证明，又提供了政治上发迹所需要的人事关系。到首都求学的人很少再回省里。向首都集中的趋势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各省由于抽走了受过教育的精英，发展遭到破坏。

376

当来自各省或其他比较偏僻地区的上层阶层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进入政界时，在某些地方，最富有和传统上最有声望的家庭却明显地没有参加政治生活。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政界不少富有的和有社会地位的人被掌握暴力工具的军人取代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最富有的人自愿离开了政治舞台——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因为混乱状态已使政治功名臭名远扬，也许是对活跃在政界的社会新成员感到厌恶。然而，富有的人往往小心谨慎地在幕后活动，指挥或至少影响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看

来将会控制政治生活的军事考迪罗。[1]最富有的上层阶级成员不公开参加政治事务的作法也许在阿根廷最明显，在墨西哥稍差一些。然而，这决不是普遍现象。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最富有和最有地位的家庭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政界相当突出。

除克里奥尔集团外，独立所给予的政治报酬是有限的。克里奥尔人不愿意跟梅斯蒂索人和其他生活在殖民地社会最下层的人分享权力。个别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在争取独立斗争期间的确曾在政治上显露头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游击队或其他军事力量的领导人表现英勇。但是这些个别人物的出现使克里奥尔人感到不安。例如，西蒙·玻利瓦尔常常对隐约出现的"帕尔多人统治"(即"由黑皮肤的人进行统治")表示不安。克里奥尔上层人士几乎是有计划地(现在回顾起来似乎确是如此)从高级职位上消灭这些低层阶级的人，特别是穆拉托人。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两个最高级穆拉托军官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和何塞·帕迪利亚将军由于违法而被枪毙，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白人身上很可能会被赦免。在墨西哥，黑皮肤的叛乱领导人文森特·格雷罗遭上层阶级忌恨，说他粗野、无知、完全不称职；他当总统被赶下台后被反对他的人枪杀。 377

尽管少数杰出的穆拉托军官被迅速消灭，但使上层人士感到更棘手的是如何在克里奥尔文职人员和克里奥尔军人之间分配权力的问题。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强调，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拉普拉塔河地区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把军人推到非常显著的地位，使曾经控制殖民地政权的文职上层人士(文职行政人员和教会统治集团)的权力相对削弱。军人的人数因战争需要而膨胀起

[1] 黑格著《一名考迪罗的产生》，第481—490页。黑格的例子是关于阿根廷北部内地省份萨尔塔的情况。关于托马斯·曼努埃尔·德·安乔雷纳等大地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影响，可以提出同样的论点。

来，而民政管理机构却因政府缺少财政收入而削弱下去。在许多地方，政府最优先支付军队费用，而减少文职行政人员的薪金。这件事具有象征性意义。教会也由于下面两个问题而力量削弱：一是罗马教皇反对西班牙美洲独立，这种独立在政治上损害了教会的统治；二是在任命主教的权力应属于国家还是应归还教皇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1827年以前没有任命过新主教。教会还在长时期内因财产在战时被征用而丧失了财政资源。霍尔珀林认为，在民政和教会管理机构衰落的同时，城市商人也相对地丧失了权力和地位（特别是就商业落入外国人控制而言），而地主相应地获得了权力。因此，霍尔珀林认为，这个时期既出现了权力军事化又出现了权力农村化的现象。① 下面的讨论将表明，这一权力军事化和农村化的论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而只能看成是和殖民地时期相对而言的一种程度上的变化。

对于1810年至1830年期间（许多地方是在这个时期之后很久）的文职政治家来说，政治军事化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在开始时，文职上层人士愿意接受军事统治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独立 378 还不稳定。然而，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独立似乎已是事实，西班牙美洲各地的文职人员开始对军事控制和军队规模过大感到恼怒。因此，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一个标志是，文职人员竭力减少现役军官的数目，并在各省建立民兵来和常备军抗衡。这些年还有一个特点，军人和文职政治家之间彼此强烈敌对，这是不足为奇的。

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的努力在智利取得显著成功。迭戈·波塔莱斯在圣地亚哥贵族的有力支持下，建立了配备上层阶级军官的民兵作为与常备军抗衡的力量，继而又鼓励出身优越的青年到正规军担任职务。19世纪30年代在委内瑞拉，一些独立运动中的

① 霍尔珀林著《拉丁美洲革命的后果》第1—43页。

英雄因丧失军人特权和减少军队人数而发动叛乱，但是叛乱很快就被委内瑞拉总统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镇压下去——也是在上层阶级文职人员的支持下。在阿根廷，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领导的民兵部队成功地粉碎了一支独立时期的军队的残余力量，(它早先在控制东岸的行动中已遭削弱)。在新格拉纳达，处理军队的问题由于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瓦解而部分地得到解决，因为许多最会闹事的军官是委内瑞拉人，其中大多数人在1831年以后都已回国。剩下的许多最高级的新格拉纳达军官和文职上层人士有密切联系。虽然一些军官追随何塞·马里亚·奥万多将军发动叛乱(这次叛乱从1839年直到1841年底彻底毁坏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拿起武器是为了一场既有文职人员拥护又有军人拥护的广泛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为了保卫作为一个团体的军队利益。在所有这些国家，减少常备军的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常备军实质上是为了赢得独立而建立的临时性产物，许多最高级军官是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是部分地来自他们的军事职业，因此他们不反对退出现役。对于另外一些不是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来说，退役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可以得到大量土地，作为对他们服役的报酬。

然而在墨西哥，正规军的军官是职业军人，这些人是在殖民 379 地时期最后几年被招募参加西班牙军队的。由于墨西哥独立的特殊性(保皇军领导了同西班牙最后决裂的行动而不是被叛乱军击败)，西班牙招募的克里奥尔职业军人上层集团在独立后仍然完整无损和坚强有力。他们当中有些人(人数比有些国家要多)同作为地位来源的军事职业以及作为一个团体的军队血肉相联。因此墨西哥的国民军保留了一种强烈的团体利益意识，并且采取了果断行动来维护这些利益，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但是墨西哥军官的政治行动并不限于维护军队的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干预是属于政治行动，反映了一些具体集团而不是全体军官的利益。在秘鲁和玻利维亚，西班牙招募的殖民地军官阶级的残余份

子仍留在共和国军队中，他们同样也和作为地位来源的军事职业血肉相联。在这些国家，也是军官在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然而他们采取行动很少是为了维护团体利益，通常是追求个人的野心。

削减正规军的力量——即使在证明行得通的地方——并不一定要把军人排斥在政治之外。即使在文职上层人士能够建立起对军队的优势的地方，他们几乎也都让将军当国家正式首脑。文职政治家认为，只有一个有威望的将军才足以起威慑作用以防兵变或地方向中央权威挑战。因此在智利（在那里，上层阶级的团结与经济繁荣的幸运结合使得文职上层人士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控制常备军），两名将军统治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的关键性的头20年。在委内瑞拉也是如此，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历届文职"寡头"政府，有的是由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和他的副手兼继承人索夫莱特将军担任首脑，有的是依靠他们的支持。在这些国家，文职上层人士和军人的关系比较平安无事。在其他地方，文职人员的控制就很没有把握，上层人士发现有必要利用他们并不信任的军事领导人，他们知道国家还没有条件直接由文职人员统治。因此在墨西哥，一批批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文职人员都企图使狡诈的圣安纳将军供他们使用，但只取得部分成功。在秘鲁，自由派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卢纳·皮萨罗很不喜欢军事领导人在政治上居显要地位，但是由于认识到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安排选举了他认为他可以控制的几个军事领导人。

380

在国家变得非常软弱、政治权力支离破碎、无法集中的情况下，军事领导人也是重要的维持秩序的工具。在阿根廷，国民军的垮台把地盘让给了当地的考迪罗，各省的文职上层人士都想利用他们作为控制局势的工具，但是这些考迪罗本人也不是始终可以完全控制的。在委内瑞拉，也是在地方上扎根的考迪罗来到了前台，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派斯将军所主持的政府垮台之后。而在墨西哥，虽然国民军最终保持了军事优势，直到在1846

年战争中被消灭为止，但某些省的考迪罗，像今天的格雷罗州地区的胡安·阿尔瓦雷斯在当地称雄。和委内瑞拉一样，墨西哥的这些地区性头目的人数和权力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的中央政府的削弱而增加。在新格拉纳达，19世纪50年代实行联邦制政府也产生了使较多权力转移到地区性考迪罗手中的后果。

由此可见，政治军事化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在墨西哥和秘鲁，居支配地位的考迪罗在正规军中有支持他们的基础，他们试图攫取对全国政府的控制，动机是个人野心、团体利益和上层阶级文职人员的鼓励等多种因素的结合。在另一个极端(拉普拉塔河地区四分五裂的各个省提供了最好的例子)，主要模式是：考迪罗得到当地民兵和这个地区的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在支持他的上层阶级看来，这位考迪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和保卫本省免遭外来破坏。然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个地区成为考迪罗和他的支持者试图攫取国家权力的基地。在大多数国家，以军队为基础的考迪罗和以地区为基础的考迪罗兼而有之，程度互有不同，至于哪一类考迪罗更为重要，这部分地取决于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一支有力量控制各省的国民军。

往往由武装力量(不管它是掌握在国民军手里还是掌握在地方考迪罗手里)决定谁来控制中央或各省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由中央或各省的军事人物来决定政治路线或政策方向，即使是在这些军事人物的活动极其明显的那些国家里也是如此。军事考迪罗(不论是正规军的高级将领还是地方上的人物)往往是按照文职人员的指示或和他们联合一致攫取权力的，更常见的是，他们一旦掌权就靠文职人员提供政治意见并委托他们负责政府实际工作。只有新格拉纳达的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将军是个例外，他自己作出政策决定，亲自操纵政府杠杆。

考迪罗经常被人们描绘成或者是同大地主联盟，或者是由大

地主推出和控制。大地主的经济资源和债役雇农为考迪罗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基础。当然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特别是在省一级，虽然我们应当加上一句：商人也是地方权力上层人士的一部分。但是这些经济上层人士不是同考迪罗有联系的唯一的非军人人员。考迪罗往往同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律师一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虽然这些人经常抱愿考迪罗对政治进行干预)。不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中央一级，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总是依附那些有前途的军事领导人，然后进而操纵他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常常担任秘书，考迪罗常常依靠他们出主意。有时候是进行远距离操纵，首都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不断寄去报纸文章和书面建议来影响省里和中央的考迪罗。① 最后，某考迪罗一旦掌权，他必然求助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做政府的实际工作和在报纸上捍卫政府。这样，考迪罗和文职政治家被一种以互相猜疑和互相依存为标志的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②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往往需要考迪罗把他们带入权力地位；考迪罗需要受过教育的文职人员的知识和行政才能。当然，考迪罗和知识分子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取决于双方相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象卢卡斯·阿拉曼那样富有和受人尊敬的人甚至可以象小学老师那样教训一位像圣安纳将军那样有权力的考迪罗(或者一个像埃加尼亚那样的人也可以这样对待一位像波塔莱斯那样的考迪罗)；贫穷的无名之辈可以谄媚奉承，政治原则可以改弦易辙。

382

因此，虽然许多地方由考迪罗决定谁来行使权力，但是如果以为他们可以垄断权力，或者设想城市上层人士在他们面前完全

① 吉尔摩，《考迪罗现象》，第54—56页；弗洛拉·特里斯坦—莫斯科索著《一个贱民的朝圣》(利马，1946)，第261—262页；委内瑞拉，总统府），《19世纪委内瑞拉的政治思想：有关的研究资料》(15卷集，加拉加斯，1960—1962)，第11卷，第302—333页。

② 皮书尔·德沃托著《政党与政治思想史》，第9—21，67页；同前著者《乌拉圭政党史》(两卷集，蒙得维的亚，1942)，第1卷，第57—59页。

俯仰由人，那就错了。认为大地主完全控制这个时期的政治，同样也是错误的。诚然，一些大地产主可以左右本地区的选举或者动员力量支持省里或中央的考迪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主总是使用这种权力，更不能设想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协调一致地使用这一潜力。大多数大地产主只是希望别管他们的事。一般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国家的照顾，如果他们需要省当局的帮助——譬如说发生了土地纠纷——他们通常可以靠自己在当地的声望来取得帮忙，不需要向首都求援。总之，对大多数地主来说，国家政治只是意味着麻烦——在内战时期抢他们的牲畜和强迫借钱，在其他时期则是花言巧语、搅乱人心和缺乏安全。甚至那些对国家政治感兴趣的地主也很少影响政治进程。由于他们住在他们的大庄园里，远离国家大事的中心，他们同国家大事的关系必然是间接的，很少而且不经常听到关于首都的消息。总之，地主通常总是靠报纸和住在首都的职业政治家的通信获得政治指导和政治方向。相形之下，城市政治家可能缺乏地主在当地拥有的那种影响，时常处于财政窘迫状态。但是由于他们住在国家的神经中心，而且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靠对政府的影响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来确定国家的政治方针，他们对此也感兴趣。因此，知识份子上层人士虽然比较贫困，但是他们——作为兜售影响的人、记者、上层人士子弟的教师和政府雇员——在中央在各方面比地主拥有更多实际权力。

然而，这种概括的正确程度，根据各国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省又是一个国家），大地主在地区上充份集中，因而人们容易感觉到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他们的代理人罗萨斯有效地把知识分子上层人士赶下了舞台。而在地理上更加支离破碎的政治制度中（像新格拉纳达的政治制度），地主们在地区上是分散的，大多数是极其闭塞的。因此，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在中央进行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 383

上也是这种情况。

尽管许多地方的城市上层人士对国家政治施加支配性影响，然而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权力是值得怀疑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它们对各个省的控制充其量也是不充分的。因此，城市上层人士开动的是这样一部机器，它的行动往往可能在省一级受到在当地居支配地位的地主和商人的阻挠。当然，许多当地的重要问题是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明显参与的情况下由各省的上层人士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权力已农村化。

在独立后时期，西班牙美洲的许多——且不说是大部分——政治冲突是为了决定由谁来控制国家及其资源。但也有一些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是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各国互不相同。在1810至1845年期间，国家应采取中央集权制结构还是联邦制结构的问题使墨西哥、中美洲和拉普拉塔河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智利和新格拉纳达，这个问题只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智利是在19世纪20年代，新格拉纳达是从1838至1842年。此外，在发生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冲突的地方，冲突的性质或根源不一定相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联邦制在某些地方同地区经济利益有关。而在墨西哥和智利，地区经济利益至少在这一时期对联邦制的出现和发展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还不如说，在这些国家，联邦制既反映了地区谋求政治自治的愿望，又反映了一种信念，即认为联邦制是保护个人自由免遭国家权力侵犯的最好手段。在新格拉纳达，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联邦制只是在野党在适当时刻为它企图用武力重新控制国家进行辩护而举起的一面旗帜。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主要问题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也是由谁来占有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地区利益问题。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虽然联邦制有时可能表达了地区的经济利益，但是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决定由哪些考迪罗（和当地哪部分寡头集团）来控制某些省而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斗争。

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在许多地方在1835年至1845年期间渐趋沉寂。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力量1831年在智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36至1846年在墨西哥、1841至1849年在新格拉纳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虽然1831年后联邦制仍然保持了形式上的胜利，但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采取行动在联邦制的框架内把权力集中在手里。由此可见，不管是通过镇压还是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联邦制有一段时期有退居幕后的倾向。

然而在1845至1870年期间，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在较弱程度上的)秘鲁出现了第二次联邦制浪潮。但是在这一时期，联邦制与教会的地位问题相比已成为激烈斗争的次要根源。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各政党一致赞成联邦制的局面。在新格拉纳达，19世纪50年代的自由派支持联邦制是出于信念，而以前倾向于中央集权制的保守派拥护联邦制是出于机会主义。保守派由于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断定，联邦制将最能使他们保住对保守派力量最大的地区的控制。和有关教会的问题所产生的强烈感情和深刻献身精神相比，人们关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问题的态度主要是口头上和策略上的。

像联邦制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政治问题的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许多政治冲突都基于一个多多少少共同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有些政治家(大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希望西班牙美洲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政治家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西班牙的体制和价值观念是造成西班牙美洲落后的原因；他们希望尽可能按照英国、法国和北美的模式改造他们的社会。

如前所述，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方面在波旁王朝时代就已扎下根子，那就是波旁王朝的行政、经济、财政和教育合理化计划。波旁王朝在执行这一合理化计划时，坚持世俗优先于教会的原则，特别是试图减少教士的司法特权和免税特权并且让教会的经

济资源为国家所用。波旁王朝还谋求把大学教育从学院式教学转向有实际使用价值的自然科学。

除了追求和波旁王朝有联系的改革目标之外，19世纪的共和派政治家还谋求做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时代至多是一个小题目——那就是把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个人主义移植到西班牙美洲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行为中来。从政治上来说，创造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与宗教分离的国家至高无上，还意味着保障思想自由。所有这些目标——国家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思想自由——都要求打破那些曾经控制殖民地社会的社团组织，特别是教会和军人集团。这两个团体反对国家至上，它们的特权否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对它们成员的控制剥夺思想自由。从经济上来说，创造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意味着建立自由市场。为了建立自由市场，必须废除起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垄断特权，不管是政府的垄断特权还是私人的垄断特权。为了同样的理由，必须分割印第安人的村社土地，迫使印第安农民作为个体业主按照市场力量的纪律经营土地。人们还争论说，为了使国家的经济资源充份用于生产，必须没收教会永久管业的庞大资源，解除私人财产缴纳永久性免役地租的负担，以便于它们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这一改革计划的许多方面得到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普遍支持，虽然在改革的速度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除拉普拉塔河地区和有一段时期在委内瑞拉外，人们通常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一致意见。在1820年至1845年期间，大多数后来以保守派和自由派著称的人都宣称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经济原则，但是当情况需要时他们的实际政策又都背离这些原则。在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英国的进口货洪流造成严重的贸易逆差，加上流通手段缺乏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紧缩，不论是在自由派(像墨西哥的洛伦索·萨瓦拉)还是在后来以保守派闻名的人(像墨西哥的卢卡斯·阿拉曼和新格拉纳达的亚历杭德罗·奥索里奥)中间都出现了

386

主张保护当地制造业的人。同时，这两种政治倾向中都有一些人继续坚决信奉自由贸易原则。

这种各派在经济政策上意见一致的倾向在1825至1845年间是明显的。1845年以后，随着西班牙美洲大多数国家更充份地纳入大西洋贸易体系，这一倾向变得更加显著。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意见不一致是有道理的，因为对英国和法国发生严重贸易逆差这一事实支持了保护本国工业的论点，同时自由经济理论的独霸地位又鼓励人们英勇地(如果已被错误引导)信奉自由贸易原则。然而1845年以后，事实与理论不再明显地发生冲突，而是倾向于互相加强。由于欧洲和北美越来越需要西班牙美洲的原料，这就使得这个地区更多国家的对外贸易归于平衡，从而似乎证明了自由派在经济上信奉自由贸易的正确性。因此，在1845至1870年期间，大多数国家至少在自由经济政策的自由贸易方面有了接近一致的意见。(墨西哥已有的工业利益集团要求得到保护，这是总格局中的一个例外情况)。

在委内瑞拉，经济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一个时期成为严重政治冲突的根源。那里的咖啡种植者在19世纪30年代价格高昂时期借了钱扩大生产，到30年代末期市场不景气时，他们无力偿还所欠债务。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咖啡种植者积极参加运动，反对1834年的自由派法律(这个法律取消了殖民地时期为反对高利贷而规定的对利率的限制)，后来又反对为出售债务人财产提供方便的法律。种植园主还要求政府积极援助遭受困难的农业部门。有意思的是，种植园主对自由经济政策的后果作出的反应为委内瑞拉自由党的成立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这个党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一贯是主张自由的。这种情况的可以预料到的另一面是，由派斯将军和索夫莱特将军主持的"保守派"政府严格坚持自由经济原则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像经济政策一样，财政政策一般不是一党一派的问题。所有政治团体一致谴责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税收制度是不自由和不合

理的，并且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乐观时期采取行动对它进行了改革。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推行的直接税遇到人民抗拒并且未能产生很大财政收入，政治上层人士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把它搁置起来。在财政危机的气氛中，所有政党都同意把改革推迟到比较有利的时机。在1845年以后的乐观时期，当人们重新作出努力来废除与自由经济原则冲突的一些传统税收时，改革没有引起重大冲突。

如果说上层人士政治集团对经济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关于奴隶制和印第安人村社的社会政策也是如此。在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上层人士在突然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基本上是一致行动对最终废除奴隶制作出了法律保证。但是后来，经过30年代进入40年代后，所有政党都谨慎地不再匆忙让奴隶制死亡，甚至采取步骤延缓它的结束。维持奴隶制的行动一般都是保守派政府采取的，但是它们没有遭到自由派的严厉批评。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委内瑞拉的主要自由派理论家托马斯·兰德尔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维护奴隶制的人。

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人们对奴隶制的态度发生变化，这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中的一些人指责这种制度。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忠于社会平等的理想。这一代政治新人对新格拉纳达（1850年）、厄瓜多尔（1852年）、阿根廷（1853年）、委内瑞拉和秘鲁（1854年）废除奴隶制起了卓越作用。然而，所有政治集团显然都已认识到实现这一想法的时候已经到来。年轻的自由派强烈提出这个问题时，保守派对废除奴隶制并没有进行反抗，应该说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支持这样做。①

在对待印第安人村社土地问题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态度一致的倾向。从19世纪20年代起，人们普遍同意村社土地应当分割后在印第安人中分配。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

① 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8章有关霍尔珀林观点。

违反自由经济原则，因为据认为它不能保证个人利益。他们还认为，印第安人应当至少是在理论上或形式上平等的基础上更充份地与主导社会结为一体；只要他们远离社会其余部分，生活在由不同原则统治的社会里，一体化就无法做到。上层人士含蓄地承认这种合并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分割印第安人土地的法律对印第安人出售他们的土地的自由略加限制，以保护他们免遭剥削。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把印第安人变成个体的土地持有者并把他们并入主要社会是一个可取的目标。在合并的初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只是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才有少数上层人士——有些是保守派，有些是自由派——对这样做可能伤害印第安农民表示惊慌。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有较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认识到这种改革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是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使他们陷入更加悲惨的贫困。①

由此可见，以自由的形象重建西班牙美洲的社会与经济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在受过教育的政治上层人士中引起冲突。但是当进行自由改革的努力冲击教会的权力和特权时，上层人士发生了分裂。当然，冲击教会权力和特权的工作是经常在做，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来说，教会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教会控制大量财产使国家得不到财富，而国家迫切需要财政收入。教会有权向私人财产征收免役地租，这使农业衰落。教会的司法特权既破坏了国家的权威，又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成为笑柄。教会作为一个特殊团体鼓励教士们主要同教会而不是同国家同心同德。教会的纪律剥夺教士的思想自由，而在自由派看来，教士又试图对普通百姓强制施行思想控制，谴责那些他们认为对道德和信仰有害的书籍。教会对教育机关的控制也威胁思想自由，妨碍引进新的科学知识。教会反对宗教信仰自由，从而妨碍不信天主教的欧洲人移入，而这些人的技术和资本

388

① 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8章有关霍尔珀林观点。

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是迫切需要的。[1]

389 在面临自由派要削弱教会权力和削减教会特权的情况下，教会可以依靠各种各类的同盟者。教士能够动员城市下层阶级既反对宗教信仰自由又反对外国移民(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为了保护外国移民)。如果自由派企图结束教会的司法特权，教士经常可以指望得到职业军人的支持，因为通常是职业军人的特权同时也岌岌可危。攫取教会的经济资源往往触怒上层阶级，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是对所有财产的侵犯。人们争辩说，至少在共和时期最初几十年，大土地所有者倾向于在政治冲突中支持教会，因为他们感激教会的机构给他们贷款。[2] 不管情况是否如此，很大一部分上层阶级保护教会抵抗自由派的攻击，显然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是控制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

如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教会的地位和权力问题是在各国同时出现的，那就是误解了。在这个问题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各国有它自己的节律。19世纪20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19世纪30年代在蒙得维的亚，自由派世俗政治家大规模削减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并未引起教士的有效反抗。而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当19世纪30年代自由派对教会利益进行正面攻击时，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冲突，自由派改革者被击败，他们谋求的许多改革被推迟了几十年。在其他地方，最初几年冲突不是那么激烈。在新格拉纳达，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把边沁和德·特拉西的著作用作大学课本激起了教士及其政治支持者的强烈谴责，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教会的权力和地位问题上避免了正面冲突。秘鲁和智利的自由派力量微弱，他们在共和时代的最初几年里，更

---

① 例如，见何塞·马里亚·路易斯·莫拉著《教士、教育与自由》(墨西哥，1949)，第43—61页；同前作者《教士、国家与国民经济》(墨西哥，1959)，第22，27—34页。

② 迈克尔·P.科斯特洛著《墨西哥的教会财富：关于1800—1856年墨西哥大主教管区“牧师会法庭”的研究》(剑桥，1967)，第28页。

加小心谨慎地避免和教会对抗，把大力削减教会权力和特权推迟到19世纪50年代。

在1830至1845年期间，西班牙美洲某些国家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最明显的是智利、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其次稍差一些是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在这些国家，国家权威只遭到偶而发生的暴力行动的挑战。然而1845年以后，这些国家上层人士意见一致的局面开始破裂。19世纪40年代，一代新政治家脱颖而出，对19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掌权者和他们的政策提出挑战。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国家一直是由实现独立的那一代人在进行统治。在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总统权力似乎被独立时期的军事英雄所垄断，而同一代的文职上层人士则在组织政治行动和管理政府方面进行配合。在独立前夕出生的人，特别是文职人员，有理由想知道他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可能到来。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说过，几乎所有西班牙美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到的财政窘迫限制了吸收年青一代参加公职的能力。①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事实是，在19世纪40年代，年轻一代开始——在许多地方是十分有意识地——向现有的政治权力机构挑战。应当说，有些地方的政治权力机构已经失去了进行统治的意志和能力。1844年在委内瑞拉，当时为委内瑞拉寡头集团进行统治的卡洛斯·索夫莱特将军冷静地容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当局的活动，他没有动员力量支持现有的制度。在墨西哥，1846年至1848年同美国战争的惨败破坏了所有重要派别的有地位的政治家的权威，使新的一代产生了必须采取激烈措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紧迫感。1848至1849年，新格拉纳达的执政党发生分裂，为新的一代提出挑战开辟了道路。在智利，波塔莱斯体制也开始出现衰竭的迹象，执政党成员开始分裂出去反对曼努埃尔·蒙特总统，从而引起在19世纪50年代发生一系列

390

① 霍尔珀林，《革命的后果》，第127—129页。

自由派叛乱。

尽管这个时期的政治动态可以看作是社会上层内部一个新的年龄组的人发出的挑战，但是斗争在某些地方也有阶级性质的一面。研究墨西哥革新时期(1855至1876年)的历史学家认为，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自由派人物不仅从年龄来说而且从社会出身来说都是“新”的一代。他们认为，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自由派大多是野心勃勃的外省人，由于独立初期扩大了中等教育，这些人才有可能提高社会地位。[1] 对新格拉纳达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秘鲁和智利也可以作出类似的概括。这种社会出身的年轻人有特别的理由向权势集团垄断权力的作法提出挑战，并且希望推毁可能阻挠社会地位变动的那些殖民地体制的残余。

和受过教育的外省年轻人一起在1845年至1860年期间开始显露头角的另一个社会集团是城市手工业者。在新格拉纳达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墨西哥、秘鲁和智利，这个集团和上层社会的年轻政治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它们合作了一个时候，但是这两个集团似乎是被十分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原因动员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有助于使上层社会年轻人鼓起力量的一个因素是西班牙美洲的对外贸易的扩大。欧洲对西班牙美洲热带作物和原料日益扩大的需求在上层阶级中产生了新的乐观气氛，鼓励了实行政治更新和进行体制实验的精神。然而，对城市手工业者来说，这意味着一阵进口消费品的浪潮，使他们面临被吞没的危险。1845至1855年期间由于进口增加而陷入贫困状态的手工业者发现自己暂时和年轻的上层社会政治家结成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联盟，几乎所有这些年轻的上层社会政治家都是主张自由贸易和扩大对外商业的虔诚信徒。

---

① 胡斯托·谢拉著《墨西哥人民的政治演变》(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9)第204页；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1848—1853年墨西哥政权剖析》(墨西哥，1977)，第442—443页。

这新出山的一代上层社会政治家谋求建立他们自己的、不同于老一代的政治实体的意识，他们乐于接受新的欧洲影响，这些影响对于业已定形的、有地位的政治家已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些新的外部影响的冲击，加上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推动，有助于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到1870年使政治两极分化，到1870年新的一代已完全居于支配地位。

由于各地的政治情况不同，对那里新的一代产生影响的欧洲政治事件和思想潮流也不一样。在西班牙美洲大部分地区，教会的权力和特权仍是一个未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教会问题上发生的骚动到1845年以后影响了西班牙美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新格拉纳达、智利和秘鲁。米切莱特和基内特在19世纪和40年代对教会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的攻击以及他们攻击耶稣会的著作对于像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1823—1865年)这样的智利的年轻民主主义者是有影响的，也有助于在新格拉纳达的年轻一代中煽动起与耶稣会的对抗。 392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教会的许多权力和特权在1835年以前就已被剥夺，青年知识份子不太关心欧洲的政教争吵。然而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中间有显著影响。例如，他们的知识份子领导人之一、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宣布要组织“青年阿根廷”。埃切韦里亚和他的同伴还对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思潮产生一定兴趣。而在西班牙美洲其他地方，至少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前，情况就远不是这样。

1845至1870年期间一些西班牙美洲共和国的教会—国家问题的激化，以及文职政治家在对待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新的激烈态度，部分地来源于朗梅内的影响。他批评教会是一个主要关心金钱、权力和威严的政治团体，同时他提倡一种原始的、大众的、超天主教会的基督教，这种态度使新一代中的许多人感到鼓舞。他向他们提供一套说词，指责现有的教会是压迫性归秩序的

一部分，同时他宣称信奉一种更纯洁、民主的基督教。他坚持宗教和政治分离，因而坚持教会和国家分离。这种主张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秘鲁和智利产生了反响。他的强烈的民主精神，加上他支持扩大投票权，也鼓励了新一代的民主热情，正像他要求行政权力下放加强了西班牙美洲联邦制的政治潮流一样。朗梅内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人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后者绝大部分都不理睬他。毫无疑问，朗梅内和马志尼一样，是反叛现体制权威的象征，对年轻一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欧洲1848年革命引起了西班牙美洲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注意，也使这种思想的影响具体化。欧洲革命开始后不久，胸怀大志的青年政治家在欧洲榜样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城市下层阶级——主要是手工业者阶级而不是最贫困的人——努力想把他们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在一些地方，这种动员甚至在1848年革命之前即已开始，最著名的也许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所进行的鼓动工作。19世纪30年代在新格拉纳达也有过一些先例。但是毫无疑问，1848年革命推动人们作出进一步努力去动员城市工人阶级。在新格拉纳达，1848年成立手工业者协会，抗议降低对精加工品征收的关税。协会被雄心勃勃的自由派大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员接过来作为政治武器。手工业者的组织后来改为“民主协会”，1849年帮助自由派取得政权。此后，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分会，动员人们支持新政府。新格拉纳达的自由派政府对一些社会主义形式作出姿态，下令仿照法国国家工厂成立手工业者训练工厂，同时年轻的自由派纵情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协会和基督教民主的言论。

393

然而总的来说，新一代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① 他们对手工业者协会的主要贡献是

① 见罗伯特·L.吉尔摩著《新格拉纳达的社会主义幻影》，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36/2(1956)，第190—211页。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由政治经济学的优点的不受欢迎的讲演。当自由派新政府不能为手工业者的产品提供关税保护时，年轻的上层阶级激进份子和波哥大的手工业者之间固有的不相容性就变得明显了。1854年一次军人和手工业者的联合革命推翻了自由派政府，迫使年轻的激进派同保守派结成联盟，以镇压在波哥大建立的代表手工业者利益的政府（这个政府现在极孚众望）。手工业者的许多领导人被放逐到几乎必死无疑的巴拿马丛林，但是手工业者仍然是一支力量，在以后几十年中还要和它进行斗争。

秘鲁和智利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也作出了动员城市工人的类似努力。在秘鲁，1849年成立了进步协会；在智利，1850年成立了平等协会。像新格拉纳达的协会一样，秘鲁和智利的协会试图以家长式的姿态启发群众，动员群众。这一进程的特点是，智利的协会出版了《人民之友》期刊，连载了朗梅内的《信徒的话》。秘鲁和智利两国年轻的鼓动家在19世纪50年代都煽动起人民暴动。创立这些协会的上层阶级年轻成员不断鼓吹和群众打成一片，可是从来没能超出他们从国外引进的一套言辞去真正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支持那些仿照1848年法国的做法建立的模范工厂，想通过这种支持来吸引手工业者，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计划，表明青年大学毕业生所关心的是竭力想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显露头角的政治环境。例如，秘鲁的协会像新格拉纳达的协会一样，特别强调有必要进行有可能实现文官控制政府的政治改革，包括削减军队人数和加强地方国民警卫队。秘鲁的协会还要求鼓励外国向秘鲁移民，这一条很难得到工人阶级选民的同意。

394

1848年革命在新格拉纳达、秘鲁和智利受到热情欢迎。这些国家新的一代不得不同执政集团进行斗争（可以说这个集团基本上是杰出人物统治论者），因此，在这些国家，民主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变革的手段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的独裁政权像各省比较小的考迪罗政权一样，得到平民阶级的广泛支持。因此，在拉普拉塔河地

区，年轻知识分子政治家倾向于对民主革命采取比较消极的看法。19世纪40年代流亡在智利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和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甚至在欧洲革命以前就表示相信，掌握在愚昧无知的群众手中的人民主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当韦朗西斯科·毕尔巴鄂等新一代智利人指责他们的政府是杰出人物统治论者的时候，他们的住在智利的阿根廷同代人却为波塔莱斯政权辩护，说它是开明的少数派的统治，远比阿根廷的野蛮的多数派的专制统治可取。1848年革命以及随后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证实了(至少在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里)萨米恩托和阿尔韦迪不相信民主的观点。因此，西班牙美洲有些国家的新一代人即使在1850至1870年期间他们地位上升之后还倾向于高谈民主(不一定行民主之实)，而在阿根廷，在1852年推翻罗萨斯之后，新上台的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却倾向于对政治民主采取比较保守的看法。

395

19世纪40年代涌现的新一代自由派政治家在许多方面遵循和他们的政治前辈(19世纪2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者)一样的倾向。但是他们怀着一种新的精神和激烈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的前辈未能完成使西班牙美洲社会自由化的使命。1845至1870年的改革者和19世纪20年代的自由派一样，从本质上肯定个人主义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概念。和他们的先辈一样，他们是在信仰上(如果不是在行为上)主张意志自由的立宪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似乎更加绝对，鼓吹意志自由更加热情。他们不仅要求个人自由，而且还要求信仰、新闻出版、教育和商业的绝对自由，在新格拉纳达，甚至要求准许买卖武器的绝对自由。他们不仅要求实行陪审制度和废除死刑，而且还要求在宪法上承认造反的权利。为了捍卫这些个人自由，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的自由派重新献身于联邦制的理想，把美国看作典范。他们恢复了1825年—1835年关于限制军队人数和建立公民国民警卫队的计划。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这个世纪中叶的改革者还重新献身

于自由个人主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他们认为这二者都被他们的先辈损害了。他们谋求按照19世纪的自由主义概念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合理化。这意味着取消从殖民地时期起一直允许存在的一些限制企业的捐税，例如销售税、什一税和政府垄断。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非常固执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不管是以公营企业的形式，还是以把垄断特权扩大到私人企业的形式，还是以保护主义关税的形式。他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肯定意味着取消教会和军人的司法特权。他们还谋求通过废除奴隶制以及把印第安人社会并入居主导地位的欧洲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概念。这新一代改革者承认，这些都是19世纪20年代前一辈自由派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他们认为，前一代人只是朝着必须消灭殖民地结构的方 396 向走出了最初的试验性的几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将使在1810年开始、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被出卖了的运动得以完成。

虽然1845年—1870年的自由派认为自己是在继续进行1810—1825年的改革者的工作，然而他们的事业的内容和精神在某些方面和过去是不同的。首先，教会的权力和特权作为一个问题更加尖锐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早先曾引起争论，但是除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以外，它后来一直比较无声无息。在1845至1870年期间，在教会的权力和特权问题上的冲突爆发成全面战争，特别是在墨西哥和新格拉纳达，而在危瓜多尔、秘鲁和智利，教会第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心政治问题。其次，在1845至1870年这一代人中，自由个人主义在一些地方(例如新格拉纳达和智利)同法国社会主义协会言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一倾向没有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第三，还是由于法国社会主义和1848年革命的影响，他们(阿根廷除外)比早先几代人更加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且随着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还出现了早先改革时期所不具备的革命热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1810至1825年的改革者的特点是试图冷静地以边沁主义精神使他们继承的制度合理化，而1845至1870年这一代——至少在新格拉纳达、秘鲁和智利——却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场革命。或者，像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埃切弗里亚那样，更愿意认为这是一次"新生"。

正当自由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出更大热情的时候，同时平行地产生了一种明确表达出来的保守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西班牙美洲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一直是在基本上没有理论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在这10年中，保守派营垒内的3个最成功的建筑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萨斯、智利的波塔莱斯和委内瑞拉的何塞·安东尼奥·派斯——一直是在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理论的帮助下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拥有各种社会机构的联合支持，又没有重要的政治反对派，所以不需要理论。对波塔莱斯来说，治国之道基本上是对有威胁性的力量进行抗衡——如果不是镇压的话——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必要求助于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理论。

397 在19世纪30年代，墨西哥人卢卡斯·阿拉曼的保守主义基本上在于维护他本阶级的利益。他认为那10年中发生的一些政治战争是"有财产和尊严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保证他们会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和一小撮有野心的社会劣等人(他们希望"在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谋利)之间的战争。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阿拉曼支持一种类似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并且受他影响)的比较直率的保守主义。阿拉曼现在明确地反对把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建立在抽象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倾向，强调政治体制只能是某一民族的长期历史经验的结果。建立一个有效的政体不可能靠单独一种概念，也不可能"从好推理的立法人员的理论出发，这些立法人员一心要使人类服从虚假的原则，他们希望让这些原则作为象天启神谕一样的无上真理通行无阻。"它只能是许多世纪的"知识与经验的成果"。权威实际上只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自由派学说由于破坏了尊重权威这个传统基础，使政府当

局"除使用武力让人服从自己之外别无他途。"阿拉曼像墨西哥其他许多保守派一样，到头来投身于君主立宪事业。①

当阿拉曼把伯克式传统和有财产人士当作政治秩序的基础的时候，秘鲁的主要保守派理论家巴托洛梅·埃雷拉教士转向西班牙传统的政治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威的保守主义学说。埃雷拉仿效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学院式理论，否定自由派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人民主权理论，认为主权来源于通过自然法则起作用的"神的智慧"。主权只能从永恒的原则中产生，因此不可能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人民意志是多变的，因此经常是错误的。在埃雷拉看来，人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制订法律。"只有"习惯于克服脑力劳动的困难的有才智的人"才能发现法律所依据的原则。②

阿拉曼和埃雷拉是早期的和极端的保守主义倡导者。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有些曾经自认为是温和的自由派、但现在又开始把自己说成是保守派的人和他们结成了政治联盟。1848年欧洲革命强烈地影响了这一进程。欧洲革命最初不仅受到年轻人的热情欢迎，而且还受到老一代温和的自由派的热情欢迎。老一代温和的自由派最初认为欧洲革命仅仅是共和理想的胜利。然而，当法国革命开始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时，西班牙美洲的温和派退缩了，担心欧洲的暴乱可能产生影响，使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下层份子思想混乱。在墨西哥(那里印第安农民的叛乱已引起人们

398

① 何塞·E.巴拉德斯著《阿拉曼：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墨西哥，1938)，第367页；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卢卡斯·阿拉曼的政治思想》(墨西哥，1952)，第59，86，116—117，123—128页。

② 埃雷拉著《著作与言论》第1卷，第63—150页；引语见第131，137页。教士克莱门特·德·赫苏斯·蒙吉亚在他的《自然法》(1849)和J·J·佩萨多在1857年都在墨西哥提出过类似论点。见冈萨雷斯·纳瓦罗著《政权的剖析》，第374—375页；沃尔特·V·斯科尔斯著《1855—1872年华雷斯政权时期的墨西哥政治》(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69)，第18—19页。

的关切），路易斯·贡萨加·奎瓦斯（一个独特的温和派，后来演变为极端保守派）谴责欧洲革命是对社会本身的基础——财产——的进攻。奎瓦斯担心，如果墨西哥跟着1848年革命的"荒谬理论"走下去，它的小小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可能无力镇压接着发生的人民动乱。从迫在眉睫的动乱的角度来说，奎瓦斯、贝尔纳多·科托和墨西哥其他温和派对墨西哥反教权活动的激化特别感到关切，因为教会作为一个反对社会动乱的堡垒比以往更显得不可或缺。因此，1848年以后，墨西哥的许多温和派和这个国家的一小批拥护君主政体的人一道，变成了激烈的、支持教会的保守派。①

在西班牙美洲其他国家，形成保守主义的因素并不完全一样。在新格拉纳达，保守派不是担心农民可能造反，而是担心波哥大的手工业者动员起来，过了一些时候又担心卡利的民众动员起来。在秘鲁和智利，也是城市暴动的威胁比农民大。此外，在墨西哥以外，不存在任何拥护君主制的运动可以作为保守派政党的支柱。尽管如此，情况虽然多种多样，但西班牙美洲其他部分在这个世纪中叶的保守主义具有许多和墨西哥的运动一样的印记。绝大部分保守派曾经自认为是温和派，现在使他们怀着恐怖的心情作出反应的不仅是巴黎发生的过火行为，而且更是本国青年发表的社会主义言论。他们支持教会，认为教会是捍卫社会秩序的最牢固的基础。

399　一般说来，保守派往往以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作家海梅·巴尔梅斯作为鼓舞者，他们认为教会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权威至关重要。然而保守派如何看待他们同教会的政治关系，情况各不相同。教会是埃雷拉的国家和社会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他许多保守派领导人似乎以比较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看待教会，认为

① 冈萨雷斯·纳瓦罗著《政权的剖析》，第29—35页；吉列尔莫·普列托著《我的时代的回忆录》（巴黎—墨西哥，1906），第55，166—167，174，287—289，332页。

教会作为有凝聚力的社会纽带或是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是一个有用的机构。阿拉曼（他的虔诚是不容置疑的）在1853年曾暗示过这种关于教会的社会效用的概念，当时他写信给圣安纳说，“当所有其他环节都已断裂的时候，天主教〔是〕……把全体墨西哥人联结在一起的唯一环节。”① 新格拉纳达的保守党创始人之一、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对教会的实用主义态度更明显，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政治动员的力量。奥斯皮纳在1852年写信给他的保守派伙伴何塞·欧塞维奥·卡罗时冷静地研究了保守派应该在什么“旗帜”下组织力量反抗激进派——自由派政府的问题。他说，政治自由是有知识的保守派所相信的一个题目，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凝聚力量，因为保守的群众不理解它。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保守派也重要，但不幸的是，仅仅由于关心安全而动员起来的人谨慎行事，不愿战斗。他断定，“唯一有生命力的、显示决心和活力的保守派旗帜是因宗教感情而采取行动的旗帜。”②

由于保守派倾向于利用宗教作为赢得政治支持的源泉——且不说作为政治武器——他们和谋求削弱教会的权力和特权的自由派完全一样，把教会推进了政治争论的中心。墨西哥发生这种情况较早，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政府（1830—1832年）为了支撑脆弱的政治地位，采取了明显地亲教会的姿态。结果，在此以前在墨西哥政治中一直不太突出的教会的权力和特权问题，现在成了反对派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推翻布斯塔曼特之后，原来的反对派几乎立即向教会的特权发动正面进攻。同样，在新格拉纳达，教会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多少处于休止状态，一直到保

400

① 引自黑尔著《墨西哥的自由主义》，第32页。保守派杂志《文集》在1852年也拥护宗教有助于保护财产的观点（冈萨雷斯·纳瓦罗著《政权的剖析》，第110页。）

② 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1852年6月22日自麦德林写给何塞·欧塞维奥·卡罗的信，载何塞·欧塞维奥·卡罗著《书信集》（波哥大，1953），第348—352页；引语见第350页。

守派在1842年至1844年引进耶稣会修道会作为可能造反的年轻一代的纪律教员为止。这一行动的明显的政治目的对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学生不是没有起作用，他们在1849年掌权之后就立即要求驱逐耶稣会，并且在1850年把他们赶走。这导致了同新格拉纳达教会统治集团的全面对抗。

这并不是说，保守派利用教会作为政治同盟者是对教会权力发动进攻的唯一原因。特别是在墨西哥，19世纪20年代各州政府的财政拮据，以及随后几十年中央政府的财政窘迫促使文职政治家和军人政治家都把忌妒的眼光投向教会的大量财富。财政勒索和没收教会财产(特别是在内部冲突或对外战争时期)在墨西哥点燃了教会特权这一纯政治性问题。在新格拉纳达1861年内战时期也发生过没收教会财产的情况。在其他地方，教会财产从来没有成为大问题。

尽管保守派和教会统治集团在他们的政治地位削弱时自然地彼此向对方伸出手来，然而教会统治集团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利益绝不是一致的。教会领导人不时发现自己试图摆脱保守派的拥抱(但未能奏效)，因为正是这一政治联系有时使教会遭到政治攻击，否则这种政治攻击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保守派实用主义地利用教会作为政治武器是这个世纪中叶教会权力和特权遭到攻击的一个原因，但是教会本身内部的态度对这一结果也有重要影响。在教皇庇护九世领导下，罗马天主教会在1848年以后反对自由主义越发冷酷无情，教皇鼓励(有时是命令)西班牙美洲的高级教士采取同样的不妥协态度。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发生的由教士领导的反政府叛乱的热潮中(1855年)，墨哥西的大主教斥责了叛乱份子，试图与政府和解，然而教皇谴责1857年的自由派宪法后，大主教相应地采取了不妥协立场，把所有支持新宪法的人革出教门。部分地由于教皇和罗马教廷采取强硬方针，在1845至1870年间有些国家(例如墨西哥和新格拉纳达)提出了涉及教会地位的问题，结果发生了急剧而猛烈的对抗

401

(在自由主义力量太薄弱的地方，例如玻利维亚，到1870年以后才提出这些问题。当最后实行自由化时，这个进程比较顺利而且和平)。

然而，教会和国家的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取决于文职领导人和教会领导人的个性。在墨西哥，1851年米却肯的蒙吉亚主教对文职当局的强硬反抗在触发19世纪50年代文职人员和教会的剧烈斗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格拉纳达，莫斯克拉大主教采取了类似的不妥协态度，从而鼓励了两极分化。而在秘鲁，戈耶内切大主教采取和解立场，因而避免了重大冲突。然而应当补充说一句：秘鲁的高级教士没有真正面临像墨西哥和新格拉纳达的教会统治集团所面临的那种挑战。在这两个国家，自由派反对派有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支持。在秘鲁，自由派力量弱小得多，拉蒙·卡斯蒂利亚将军的强大的、温和的中间派领导能够加以控制。

在墨西哥和新格拉纳达，涉及教会地位的问题在1845年至1870年期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这两个国家，取消教会司法特权、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禁止宗教修道会、生育婚丧仪式世俗化——这些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然而在其他地方，冲突不是那么激烈，或者这个问题在其他时候已经争论过并且(或者)已经取得解决。秘鲁在1851年废除教会特权，但是自由派没有能够像墨西哥和新格拉纳达的自由派那样进行一次全面进攻。在中美洲，自由派的进攻在早些时候(1829至1838年)已经开始，并且至少在危地马拉已被击败(危地马拉亲教会的保守派政府一直统治到1870年)。在厄瓜多尔，教会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没有成为激烈冲突的根源，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建立了一个极端地亲教会的制度以至最后逼得自由派采取行动。在玻利维亚和智利(智利有些例外情况)，教会问题多少被搁置到1870年以后。另一方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教会力量较弱，而世俗化影响较强，因此教会特权和宗教修道会已经很容易地在早期(1840年以前)就被取消或削弱了。

402　除教会问题以外（这个问题在墨西哥、危地马拉、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以及较小程度上在秘鲁是造成分裂的重要根源），对立政治集团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既有冲突也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一致。尽管如此，政治上层人士还是比较明确地分成许多派别。至于这些派别在1870年以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政党，这在各个地区互不相同。在一些由粗暴的考迪罗进行政治统治的国家，像拉普拉塔联合省、玻利维亚或秘鲁，没有发展以赢得选举胜利为目的的政党的余地。在其他地方，那就看政党的定义是什么了。

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西班牙美洲任何地方肯定都不存在能把大量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政治组织，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很罕见。在这整个时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如果说政党的存在需要人们在长时期内一贯献身政治，那么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国家拥有政党。在智利，尽管个人的信仰不断变动，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可以看到两组政治明星（一边是保守主义的戴发套的人、专卖商和奥希金斯派，一边是自由主义的年轻新手* 联邦主义者和民众），尽管二者都没有作为一个有凝聚力、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存在下去。在新格拉纳达和乌拉圭，19世纪30年代末曾出现过一些比较一贯的集体忠诚组织，但这种忠诚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明确性。

在选举在政治中起重大作用的那些共和国内，政党（从以赢得选举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的意义上说）从早期就出现了。大多数全国性政治职务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设法引导人们支持某些先行选出的选举人十分重要。因此，散发印好的选举人名单来动员这一帮或那一帮选民是常见的事。新格拉纳达早在1825年就这样做了，墨西哥是在1826年，乌拉圭1830年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也是这样做的。1836至1838年在新格拉纳达，名单

---

* 年轻新手（pipiolos），有孩子的意思，是智利国内战争时期天主教徒给自由党的绰号。——译者

是由两党的非正式——但经公众承认的——委员会决定的。①报纸也是动员政治力量和获得一定程度的凝聚力的重要手段。通过首都出版的报纸，政治领导人为他们在外省的支持者确定所要遵循的政治方针。委内瑞拉在19世纪40年代，报纸和从加拉加斯派出的政治代理人在动员外省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 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党的指导机构仍然是非正式的，往往从国会核心小组或在记者和其他积极参加首都政治活动的人中产生。但即使是非正式的，它们也是作为一种统一党的行动的手段而存在。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某些国家竞选全国性职务的候选人才由各省正式代表参加的党代表大会选出。

403

这些政治团体(不管是政党还仅仅是派别)，成立的基础是什么？个人又如何依附这个或那个团体？对第一个问题的一种嘲讽性的然而不是没有道理的回答是：成立派别或政党主要是为了控制政府和政府职位。支持这一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选择哪一个政党是无所谓的事。个人总是愿意依附比较可能给他们回报的政治领导人或团体。这往往意味着他们会依附和他们是同乡或有其他个人联系的领导人和团体。用这种方法来看西班牙美洲这个时期的政治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有些政治团体的核心似乎就是这种个人联系而不是什么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例子很多。围绕着考迪罗或其他居统治地位的领导人成立的那些团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墨西哥的哈拉帕人和韦拉克鲁斯人不考虑意识形态而追随圣安纳；新格拉纳达的考卡人围绕着莫斯克拉将军组合起来，等等)。这种地区性或其他社团性联系在巩固由意识形态信念

① 《教区选民》(波哥大，1825)；迈克尔·P.科斯特洛著《墨西哥的第一个联邦共和国(1824—1835)》(墨西哥，1975)，第73—78页；皮韦尔·德沃托，《政党史》，第1卷，第37页；《1837年的总统。普通公民何塞·马里亚·奥万多》，载《昆迪纳马卡立宪报》，1836年5月15日；《守卫者报》，波哥大，1838年4月15日；《国旗报》，波哥大，1838年5月6日。

② 《委内瑞拉的政治思想》，第11卷，第320—333页。

结合起来的政治团体方面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新格拉纳达1850至1880年间的激进派不仅都有标准的自由思想，而且还有共同的同代人经验(大家都是19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和共同的地区背景(主要来自这个国家的东部)。

404 过去，对政治上层人士的分类所作的社会学分析大多从阶级和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的角度来看问题。许多分析看来都把墨西哥作为样版，并以此类推。关于墨西哥政治的大多数资料，包括许多基本上与所发生事件属于同时代的资料(例如阿拉曼写的历史)，把1820至1850年的政治斗争解释为大地主、教会统治集团和高级职业军官跟那些没有地位的、社会上涌现出来的人的斗争。由于分析的人不同和所描述的政治时代不同，这些解释也不完全一样。有时，把政府官员、富有商人和金融家列入保守派联盟。被各种作者列入自由派联盟的则是年轻专业人员和知识份子(特别是来自各省的)、下层军官、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分类除了有个别不同外，人们普遍同意对于那个时期的墨西哥政治进行的阶级分析是正确的，虽然最深入的解释也把地区性的可变因素包括进去。①

在说明19世纪西班牙美洲总的政治状况时，关于墨西哥的陈述中的细微差别往往就被去掉了。通常的分类方式是把地主、军人和教士列入保守派联盟，而把专业人员和商人列入自由派阵营。把商人和专业人员放在一起——作为地主和教士的对立面——可能是把欧洲关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分类办法应用到西班牙美洲。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大多数分析家仿效多明戈·福斯蒂诺

① 卢卡斯·阿拉曼著《墨西哥史》(5卷集，墨西哥，1849—1852)，第5卷，第823—824，850—851页；谢拉著《政治演变》，第185—186，203—205，226页；科斯特洛著《第一个联邦共和国》，第74，85，169，185—187，276，342页；弗朗索瓦·舍瓦利耶著《墨西哥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关从独立到法国干涉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论文"，《世界史手册》，8(1964)，第457—474页。

·萨米恩托把国家分成文明和野蛮两部分这一强有力的范例，一直强调城乡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也加强了把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阶级分开的想法。

这种分类方式正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① 首先，这种分类方法意味着每个社会集团内部实际上完全一致，这差不多可以肯定是错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使人一看就拒绝接受这类总的解释。这种按地主、商人和专业人员作为划分社会利益集团的办法是不合理的，因为19世纪西班牙美洲的上层阶级没有这种功能上的特殊性。某一个人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商人，又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或军官。如果一个人不能占全所有这些功能的话，他的亲近家族中的另一个人一般能够补足。因此，按照职业来作政治分类往往是武断的。 405

此外，即使上层阶层的成员可以整整齐齐地划分为经济功能集团，然而认为他们是在按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界限发生冲突，这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出口农业原料的经济部门和进口供那些原料生产者使用的消费品的经济部门之间，在地主—生产者、商人—转运者、和律师(不管是私人开业还是担任公职，都是照顾地主和商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一致性。当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个别地主和商人贷款者之间会发生暂时的冲突。但是，除了19世纪40年代在委内瑞拉以外，这些纠纷并不具有系统性冲突的性质，因而没有变成政治问题。总的来说，城乡上层阶级的团结占上风。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关于那里发生城乡冲突的说法。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人和皮张和腌肉生产者的利益是紧密配合的，并且他们往往是同一个人。

---

① 以下论点比较详尽地包括在弗兰克·萨福德著《共和制西班牙美洲初期政治结盟的基础》一文中，载理查德·格雷厄和彼得·H.史密斯合编《对拉丁美洲历史的新观点》(奥斯汀，1974)，第71—111页。

最近对西班牙美洲各个地区的研究断定，在几乎所有政治团体中，可以发现地主、商人和专业人员都居于显著地位。那么，区分互相竞争的政治集团的社会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不能指望可以找到确切地适用于所有西班牙美洲国家的一个或一套区分原则，这些国家在地理、种族构成、经济特点和殖民地传统方面都不一样。然而，可以列出至少适用于某些国家的几种格式。

如果按经济功能集团分类行不通的话，我们可以在若干国家中看到一些政治分类，这些政治分类与权力和地位的分配(超越职业界限)有重要关系。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和秘鲁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政治上层人士的依附关系大体上和他们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相一致，也就是说，跟他们与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威望结构的关系相一致。这种关系一般来说部分地是由出身地区决定，也是由有关地区之内的血统和社会关系决定。

406

从社会意义上讲，处在社会中心位置的人倾向于成为保守派。这种中心位置可能是体制上的。保守派往往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这些城市在殖民地时期是重要的行政中心和(或)教育中心。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同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外省城市相比，具有更贵族化的气质，更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殖民地时期的行政中心由于在19世纪头50年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保守气氛往往更为加强。然而在这些地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同行政管理和教会的统治集团有社会联系，又因为他们曾经进过高等院校(它们是通往权力地位的输送管道)，所以进入政治上层人士行列具有明显的有利条件。社会中心位置也可能是经济上的。保守派也常常来自有集中的经济力量的城市。或者他们的家庭是大财主，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有经济实力的大商贾或大企业家。

自由派常常处在社会外围位置。他们往往来自外省城市，这些城市在殖民地时期在经济、行政或文化上不那么重要，社会分层也不那么明显。他们经常通过比较有限的机会进入高等院校，高

等院校提供进入政治上层人士行列的渠道(通过正式训练和社会接触)。这些年轻人从外省来到有名的文化中心，往往身无分文，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进入政治上层人士行列时会碰到不公平和困难的遭遇。通过表现出来的才能、勇气和运气而不是靠出身进入政治上层人士行列的这一类人，可能对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机会等自由主义思想最为敏感，并且可能对保护殖民地的权力、特权和威望结构没有既得利益。

在自由派行列中也有处于外围位置的商人和地主——虽然他 407 们一般来说不如专业人员那么显而易见，因为明显的政治身份可能使经济事业更危险。典型的处于外围位置的商人可能是外省的零售商，他们的资本有限，市场有限，靠商业中心的大商人向他们提供货物和贷款。这种人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奋力打破由少数垄断商控制的贸易与信贷的现有商业结构。然而，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动机也可能同社会机遇和经济作用有关。这些外省商人经常比前往文化中心城市学法律的外省人更少特权，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他们享受那样的奢侈；因此他们也强烈地拥护机会平等的理想。然而，许多这种外围商人也有可能对一切政治活动都采取保守的或敌对的态度。处于外围位置的地主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地产或者由于面积不大或者离城市市场太远因而收入不多，并且由于同样原因，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地产处于有利地点的人要低。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可能从事出口农产品，因而更容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这些人和外围商人一样可能(但不一定)附属于自由派政治力量。

有许多人的行为是违反上述格式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上涌现出来的专业人员(不管他们是首都人还是外省人)往往被罗致到保守派行列中充当代理人(记者、议员等等)。还必须指出，在那些虽然不是重要的殖民地中心、但在共和国国家政治体系中不完全是边缘性的省份里，自由主义最为强大。它们是可望争取获得政治影响和权力的省份，并不是在人口上和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地

区。例如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米却肯或哈利斯科这样一些州，自由主义是居支配地位的力量。在墨西哥人口稀少的最北部地区，它远离国家政治，少数大地主能够支配政治，自由主义就不是那里的特点。同样，在新格拉纳达，自由主义在索科罗(它能够向波哥大挑战)力量强大。而大体上处于国家政治舞台以外的帕斯托、乔科、里奥阿查等省份是由少数地位牢固的家族统治，这些省具有保守倾向而不是自由倾向。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墨西哥，很难严格确定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身份，其中一个原因是彼此矛盾的政治倾向、不断变化的个人信仰、变动不定的派别关系太多。但尽管如此，在这些年中仍可以看出四种倾向，它们的力量在不同时刻有盛有衰。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1830年后采取了主张中央集权和亲教会的立场，而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变成了保守派。这些公认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国家的中心——即来自一切事物的中心的墨西哥城的上层阶层，来自工业中心以及重要的教会和教育城市普埃布拉，来自和普埃布拉有密切联系的奥里萨巴。另一个产生大量保守派政治上层人士的城市是尤卡坦的坎佩切，它在地理上不居中心，但在殖民地时期是个重要的地区性城市，在19世纪初期遭受经济停滞。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墨西哥保守主义中心人物的卢卡斯·阿拉曼是瓜纳华托的一个富有矿主的儿子，他的家庭还同那里的西班牙行政官有密切联系。其他著名的保守派，像安东尼奥·德·阿罗-塔马里斯和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同普埃布拉的工业发展有关。经常和这些文职保守派结盟的是职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军官，特别是那些在西班牙军队中开始其军事生涯的军官。文职保守派依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更能产生秩序，而对职业军人来说，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国家预算有钱支持一支庞大的国民军和让军人控制这支军队的先决条件。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是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联邦派或19

408

世纪40年代的极端自由派(puros)，他们最坚决地拥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摧毁教会和军人特权的纲领。这些自由派的领导人主要是受过法律或医学专业教育的人，虽然经过内战的紧急状况后有些人已经从事军事职业。他们特别来自在保守的、中央集权的核心地区周围形成一个弧形的省份，北边从圣路易斯波托西起，经过西北部的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一直到西部的哈利斯科和米却肯，再到南部的格雷罗和瓦哈卡。一般来说，处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中央权力与特权结构之外的这一外省人地位，使他们希望去摧毁或削弱这些结构。特别是在墨西哥城以北和以西的一些省份里，小农阶级创造了一种与中央的贵族气派大不相同的、基本上是社会平等主义的气氛，并且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地来支持外省的自由派上层人士向中央集权的控制和教会特权发动进攻。①

409

在墨西哥政治光谱的两极之间是两个中间集团，它们经常和两个极端派之一结成联盟一起掌权。温和的自由派聚集在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周围，形成这两个中间集团(或摇摆集团)之一。他们在原则上是自由派，但是和保守派一样，不喜欢有太多下等阶层味道的东西。他们忽而同保守派结盟，而保守派的独裁的中央集权制是他们所不信任的；忽而同极端自由派结盟，而极端自由派的平民主义倾向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温和的自由派中的一些人被吸收到保守派阵营，团结在教会后面反对极端自由派的反教权主义。这些温和派的社会出身似乎比两个极端派的成员成分更复杂，它既从形成极端自由派骨干的那些外省人中吸收成员，也从以中央集权的、亲教会的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中心地区的贵族中吸收成员。另一个中间集团由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为首，主要有三种追随者——他

① 戴维·A.布雷丁著《墨西哥民族主义的起源》(墨西哥，1973)，第207—221页；舍瓦利耶著《保守派与自由派》，第457—474页。

在哈拉帕和韦拉克鲁斯的基地的当地支持者、政府债券的投机商和他在职业军队中的追随者(他经常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新格拉纳达，政治分类的格局从社会学上讲同墨西哥相似，但比墨西哥简单。到19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了两个政党，它们更多地是在控制政府的问题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被称为保守派的那个政党在波哥大、波帕扬、卡塔赫纳和通哈等城市中特别有力量。所有这些城市在殖民地时期都是民事和教会管理中心。在这些城市里还住着因开采金矿或从事商业而致富的克里奥尔人，有的还拥有大量地产，由印第安农民或黑奴耕种。因此一切都由以民事和教会管理人员为首的、得到大地产所有者支持的社会统治集团支配。作为集中了财富和威望的中心，这些城市有许多捐赠的女修道院财产和虔诚的基金。这意味着它们拥有最好的中学，因为在1821年，人员不足的女修道院的财产被用来资助这些地方的中学和大学。在这个世纪中叶以前，波哥大、卡塔赫纳和波帕扬是全国三座大学的所在地，而通哈拥有一所最好的捐赠的中学。从1837年一直统治到19世纪40年代末的政治权势集团(最后以保守派闻名)制订了规章，使其他城市不可能授予医学或法律学位，从而加强了这些城市的教育优势。结果，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城市里长大的青年比出身于教育方面没有捐赠的小城市的青年更容易得到证明有治理国家事务本领的大学文凭。当政的上层人士为这种限制进行辩护，理由是年轻律师就业不足将增加对公职的需求，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①

410

自由派力量在索科罗地区、加勒比海沿岸的圣玛尔塔港和上马格达莱纳山谷的一些地方最明显。在殖民地时代后期，索科罗地区在经济上有一定重要性，它向总督辖区的其他地区供应家庭制

① 弗兰克·萨福德著《求实者的理想:哥伦比亚形成技术精英的斗争》(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6)，第107—135页。

造的纺织品。但索科罗不是一个民事或教会的管理中心，因而缺乏周密的社会等级制度或广泛的传统基金。它是一个独立小农社会，他们的收入要靠妇女生产家庭纺织品来补充。它在社会精神方面贵族气息要比行政中心少得多。圣玛尔塔港在殖民地时期不太重要，海外贸易由加勒比海沿岸的行政、军事和教会中心卡塔赫纳垄断。然而1820年以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圣玛尔塔港成为新格拉纳达的主要进口品通道，代替了日益衰落的卡塔赫纳。圣玛尔塔港是一批完全致力于自由企业利益的、新涌现的、精力充沛的商人所在地。上马格达莱纳山谷是烟草、金鸡纳树皮和可可的产地，也和扩大国际贸易有联系。马格达莱纳山谷和索科罗一样，小商人和小农要求废除政府对烟草的垄断，这种垄断减少了个人机会，限制了这种潜在的重要出口产品的生产。但是那些在政府中有地位的人以财政需要为由维护这种垄断。在所有这些省份和其他省份，有的没有中学，有的不能满足政府的要求。希望获得法律学位的青年人，如果父母供应得起，不得不前往大城市——通常是首都——去寻找成功之路。新涌现的自由派上层人士在1849年获得政权后，他们首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对中等教育的限制。

然而，新格拉纳达有一个地区不符合保守派行政中心对自由派省份这一两分法，这个地区就是有金矿的安蒂奥基亚省。安蒂奥基亚省像索科罗等自由派省份一样，缺乏完整的教会统治机构，因而也缺乏女修道院对中等教育的捐赠。也像索科罗一样，它的特点是，和波哥大或波帕扬比起来，社会比较平等。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安蒂奥基亚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显然，它虽然没有取得殖民地体制的遗产，但是由于它的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与保守主义结为一体。通过开采黄金，它在殖民地时代后期和整个19世纪上半叶创造了新格拉纳达的大部分外汇。因此，安蒂奥基亚商人和其他许多省份的上层人士不同，他们需要保护繁荣的经济。于是，他们加入了维护现制度的一方，不管可能采取什么政

治形式。像其他保守派一样，他们支持罗马天主教会，这既是出于虔诚，也是因为天主教会帮助支撑社会秩序。

这种“社会位置”分析模式可以推广到秘鲁。在秘鲁，看得清利马的保守的潘多家族、帕尔多家族和埃雷拉家族与外省新兴自由派（例如来自阿雷基帕的卢纳·皮萨罗、来自普诺的贝尼托·拉索和来自卡哈马卡的加尔韦斯弟兄）之间的区别。然而，这种模式在其他一些地方并不那么适用。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可能把体现在养牛和腌肉企业主身上的经济力量看作是保守的政治力量。但是聚集在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周围的政治保守派同殖民地体制结构的联系，并不比他们的对手同它的联系更密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冲突，看来基本上是这些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他们宁愿不要政治这个累赘，支持罗萨斯作为社会制度的代理人）和一批受过教育、追求西方自由政治标准的人之间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 412 “野蛮”和“文明”之间的斗争。一批试图实行类似欧洲政治标准那样的东西的城市有知识的上层人士和具有农村联系、没有什么立宪意识的考迪罗之间的类似的斗争也是这个时期乌拉圭政治的标志。

不管西班牙美洲上层人士具有何种政治信仰，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显得对他们的新国家是多么没有信心。大部分属于西班牙人后裔的上层人士决不同组成他们国家的下层阶级的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合在一起。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同欧洲资产阶级的关系更为密切。上层人士断定他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落后无知，很难靠这些人来铸造一个新国家。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几乎西班牙美洲所有国家的上层人士都热情地鼓励欧洲移民入境。他们认为，移民将不仅带来技术和资本，而且还会带来一个欧洲型的社会。除了他们不信任人民大众以外，由于这个时期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在内战时期财产不安全，他们的信心进一步遭到损害。丧失信心表现在各个方面。有些上层

人士移居欧洲，还有一些人希望不离开家而能出国，那就是使自己成为美国或某个欧洲国家的公民，从而使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

外国的压力使这些新国家丧失信心的情况更加严重。墨西哥、拉普拉塔河地区、新格拉纳达和其他一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感到了英国和法国封锁的压力。墨西哥和中美洲除此以外还不得不对付北美的侵略。这些外部势力对上层人士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上层人士中的一些派别往往情不自禁地愿意牺牲国家独立去换取某一个外国的援助。乌拉圭的绅士们和流亡在蒙得维的亚的阿根廷中央统一派(unitarios)就是如此，前者在1817年至1825年期间谋求葡属巴西的援助，后者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忍不住要和法国人结盟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萨斯(当然，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派别还谋求得到西班牙美洲邻国的援助)。

有时候，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上层人士甚至愿意以某种方式完全放弃国家独立。墨西哥的洛伦索·萨瓦拉对美国的经济力量和活力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1831年他欢迎北美渗入得克萨斯州，希望通过美国佬的殖民化，使自由在墨西哥取得全面胜利。不久以后，得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萨瓦拉把他的命运同美国佬的得克萨斯州连在一起。在此后10年内，尤卡坦的上层人士在控制印第安人叛乱方面无法获得垮台了的墨西哥政府的有效帮助，于是企图把他们的省并入美国。更令人吃惊但不太为人知晓的是，1857年美国逼迫新格拉纳达对美国公民在巴拿马骚乱中死亡一事赔偿损失，新格拉纳达领导人对获得英国保护感到绝望，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总统竟向华盛顿建议由美国并吞整个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奥斯皮纳推论说，鉴于美国在1846至1848年同墨西哥的战争中以及19世纪50年代在尼加拉瓜进行的冒险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的扩张行动，新格拉纳达早晚将无可避免地被它吞噬，最好快一点了却

413

这件事，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统治很可能会带来稳定和财产安全。在同一时期，墨西哥保守派采取的是另一种放弃独立的方式，但目的一样——他们谋求让一位欧洲君主来统治他们的国家。

这种脆弱的国家意识大概在墨西哥（它受美国威胁最大）和拉普拉塔河地区（那里所谓的拉普拉塔联合省在1861年以前很难说已经构成一个国家）最盛行。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在智利大概是最强的。智利由于1839年对秘鲁一玻利维亚联盟的战争取得胜利，加上1830至1850年期间经济显著繁荣和政治秩序井然，因而民族自豪感得到增强。

人们对1810至1870年期间西班牙美洲的政治不稳定作出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两大类，每一类之中又有许多小类。一种解释采取极长期的看法，比较强调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体制模式的作用。另一类解释则比较注意当时的事件，强调较易变化的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方面对西班牙美洲不稳定状况的解释又有好几种不同说法。20世纪初期的解释强调心理一文化因素多于体制因素。秘鲁人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在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等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的西班牙作者的影响下，把西班牙美洲的不稳定状态归因于西班牙文化中固有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气量狭窄的、排他主义的个人主义。同时，加西亚·卡尔德隆指出了一种似乎相反的君主制传统，这种传说在共和时代有助于总统独裁，而总统独裁反过来又激起叛乱。①

414

① 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著《拉丁美洲：兴起与进步》（纽约，1913）。最近一位美国学者格伦·迪利不仅发掘了西班牙无政府个人主义这个题目来解释考迪罗现象，而且争论说，自由立宪主义及其强调对不同意见持容忍态度，在西班牙美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是同西班牙天主教"一元论"传统相抵触的，这种传统采取一个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社会形式。迪利著《一元论民主制的传统》，第159—201页和迪利著《公共的人：对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天主教国家的一种解释》（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1977）。

英国学者塞西尔·哈内的一部光辉杰作对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一文化因素进行了另一种探讨。他和加西亚·卡尔德隆一样也是归因于来自西班牙的因素，但是他更加强调西班牙文化内部的矛盾。哈内认为，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美洲人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企图用完美无缺的形式既保持秩序又得到个人自由、以致使西班牙美洲的政治从一个极端（专制统治）摆到另一个极端（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从两个对立的原则之间的立宪这个折衷办法中寻找稳定。哈内认为，在16世纪和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设法将这两个极端倾向兼收并蓄，使它们矛盾地然而有效地共存（哈布斯堡国王宣布保持专制秩序，但是实际上，由于不能有效实行而允许人们有很多自由）。一旦国王被废黜，两个极端就无法有效共存。在19世纪，当体现秩序原则的保守派掌权时，他们把追求秩序推向极端，以致不可避免地激起人们为保卫自由而作出激烈反应。同样，当自由派制订西方标准的、保护个人的自由主义政策时，西班牙美洲人并没有怀着倡导这些自由的英国人所期望的那种责任心来运用这些自由，而是把它们推向无政府状态这一极端。对独裁缺乏约束带来个人主义的混乱，这种混乱反过来又促使恢复独裁。①

更近一些时候，理查德·莫尔斯又以另一种方式从文化上来进行解释。莫尔斯和加西亚·卡尔德隆一样，关心的是把这种倾向既归因于19世纪西班牙美洲的个人至上的独裁统治，又归因于无政府状态。莫尔斯认为，这些特点既是西班牙遗产本身所固有，又由于西班牙传统和传入的西方自由立宪主义理想（这种理想在独立时期在西班牙美洲起了作用）之间的冲突而得到加强。 415

莫尔斯认为，理解西班牙美洲政治的关键是西班牙的世袭国家。他指出，西班牙和欧洲其他部分完全不同，它的封建体制很弱；各种利益集团（贵族、教会、商人等等）不是去建立相对自治

① 利昂内尔·塞西尔·简著《西班牙美洲的自由与专制》（伦敦，1929）。

的权力中心，而是严重依赖国家。国家体现在国王的世袭权力上，国王不仅是一切庇护的来源，而且是一切纠纷的最终仲裁者。这位世袭统治者(按照韦伯的类型学)：

不愿让"法律"来缚自己，他的统治方式是发出一系列指示，每一个指示都可以被另一个指示取代。……经常认为所谓按法律解决问题并不是贯彻实施"法律"，而是根据某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给予恩赐或特权，但每次恩赐或特权都不能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①

他就是这样以个人至上的、可能是专断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统治的。

因此，在这个制度中如何组织权力最终取决于国王。没有国王存在，制度就垮了。西班牙美洲由于缺乏封建传统，不具有"契约性臣仆关系这一基础结构，这种臣仆关系能使封建政权的组成部分适合于自治生活。"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封建主义软弱，因此议会传统也软弱。于是，在国王消失的情况下，

最高权威的垮台使当地寡头集团、市镇和扩大了的家族体系的潜在力量在这些专横确定的新兴共和国中积极进行一场争夺权力和威望的斗争……在没有和立宪程序有利害关系的、发达的和互相影响的经济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这些新国家忽而建立起无政府状态的政权，忽而建立起个人至上的专制政权。攫取一个世袭的国家机器——它是从原先的帝国机器中分裂出来的——的斗争变成每一个新国家公共生活的推动力量。②

416 在莫尔斯看来，19世纪西班牙美洲的政治领导人经常不断地企图重新建立西班牙国王的世袭权威。但是这些个人至上的政治领导人(考迪罗)虽然有些人能够建立暂时的、能以超凡魅力吸引

① 理查德·M.莫尔斯著《拉丁美洲的遗产》，载路易斯·哈茨著《新社会的建立》(纽约，1964)，第157页。

② 同上，第162页。

追随者的权威，但是他们不能使他们的统治体制化，使之具有大家能接受的“超个人的合法性”。能反证莫尔斯的定律的重要例外情况是19世纪的智利。在那里，一批团结一致的拥有土地和从事商业的上层人士在迭戈·波塔莱斯的能以超凡魅力吸引追随者的领导下，做到了使一种制度合法化，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官成功地行使近似西班牙国王所行使的那种世袭权力。

莫尔斯认为，妨碍按照传统的西班牙方式重新建立世袭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独立时代西方立宪主义思想的传入。英法的自由立宪主义——及其强调法治、分权、宪法对权威的制约以及选举的效力——与深入西班牙美洲人骨髓中的那些传统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互相矛盾的。自由立宪主义不适于传统的西班牙政治文化，所以按照自由原则建立和保持国家的企图总是遭到失败。另一方面，从外国输入的自由立宪主义思想的权威虽然不足以提供一个可行的政治模式来取代传统的政治模式，却往往足以破坏按照传统模式行事的那些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在莫尔斯看来，传统的政治模式（西班牙美洲各国领导人本能地倾向于这种模式）和立宪原则（它经常批评那些以传统方式行使权力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1810至1870年期间西班牙美洲的政治不稳定局面。按照莫尔斯的解释，只有把二者合成（合成后，传统模式居支配地位而立宪原则仅仅是装饰门面），方能实现稳定。他争论说，这就是智利这一例外情况的格式。在智利，“重新建立了西班牙世袭国家的结构，只对英法立宪主义作出最低限度的让步，这些让步对于一个刚刚摒弃君主统治的19世纪的共和国来说是必要的。”①

莫尔斯从文化方面进行的分析在许多方面是令人信服的。我们回顾西班牙美洲独立后50年的政治历史，可以发现有许多行为活动恰好符合他的想法的例子。另一方面，这种分析也有一些明显的弱点。首先，和许多强调文化是决定性可变因素的分析一

417

① 同上，第163—164页。

样，莫尔斯的解释以及在他之后的一些解释以过份静止的方式来看待文化——仿佛西班牙文化在遥远的过去的某个时候定形之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特别是有一种倾向，他低估了国外输入的自由立宪主义思想被接受的程度，它不但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真诚地信仰，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合法性。自由立宪理想虽然未能获得它们在英国文化中所享有的那种领导地位，但是它们的确对各种政治思想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至少部分地纳入了政治规则。例如，立宪主义的"不得再次当选"的观念虽然屡遭违反，然而却有足够的力量使那些谋求继续任职的人名誉扫地。在一些国家中，到这个时期末，它已成为正在实行的宪法的一个有效部分。

其次，莫尔斯等人从文化方面所作的解释集中注意合法性和政治与社会价值等概念，没有很好考虑地理、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在使政治制度不稳定或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例如，智利拥有土地和从事商业的上层人士在地理上相当集中，这一独特情况有助于智利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罕见的稳定局面。智利在这些年还享有在其他西班牙美洲国家少有的繁荣。繁荣产生了资金，使智利政府能够加强自己对付叛乱。从这一点来看，波塔莱斯的总统独裁制(波塔莱斯死后这种独裁体制化了)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它与传统的价值和期望协调一致，[①] 不如说是由于它拥有镇压异己的财力，这是其他财政上软弱的共和国所无力做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政府难道不是主要因为它有力量保存自己而被认为"合法"的吗?

418 其他分析强调西班牙美洲政治不稳定的经济原因，这和从文化上来分析的解释适成对照。此类分析的一种看法(现在已有些过

---

①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莫雷诺把莫尔斯的解释应用于波塔莱斯的智利，见《拉丁美洲的合法性与稳定：对智利政治文化的研究》(纽约，1969)，第91—127页。

时）强调不同地区之间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由于在国际经济方面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冲突。胡斯托·谢拉的著作中就含有这种解释（尽管是非正式的）。他争论说，1850年以前墨西哥的几次叛乱是由反对政府改变关税政策的沿海商人策划的。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迈伦·伯金对这个时期阿根廷政策的分析，他的分析强调地区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①

最近，人们对强调集团间利益冲突或地区间利益冲突的解释产生了一些怀疑。商人或地主个人之间在贷款或合同问题上产生民事或私人纠纷是可能的，但是商人和地主作为集团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冲突，因为在出口经济中，他们的长期利益是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发生的情况属于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地区之间发生经济利益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这些地区性经济利益冲突也不大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冲突。在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国家，运输十分落后，运费非常昂贵，不同地区很难形成同一经济的一部分，它们的利益没有机会发生尖锐冲突。有时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争相成为口岸或政治中心，地区内部的确发生过小冲突。但是这些地区内部的冲突不大可能使全国政府感到不安。

事实上，在这些经济未结成一体的国家中，不稳定局面更可能是由于缺乏经济利益而不是由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造成的。在有些国家，最经常发动叛乱反对全国政府的是那些其所处地点使它难以或不可能有效地参加出口贸易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上层人士由于缺乏把精力投入经济的机会，因而转向政治—军事冒险。新格拉纳达的考卡地区夹在两大山脉之间，不能有效地出口它的产品，因而成为整个时期发生叛乱的温床。对阿雷基帕和库斯科经常发生的反对利马当局的叛乱，经济停滞无疑地也起了作用。

---

① 谢拉著《墨西哥人民的政治演变》，第213，218—219，222，229—230页；迈伦·伯金著《阿根廷联邦制的经济方面》（马萨诸塞州剑桥，1946）。

194 阿根廷内地的某些地区大概也符合这种格局。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最有效地纳入出口经济的地区常常是政治上最稳定的地区。在阿根廷，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的机会毫无疑问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和大牧场主团结起来支持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严厉而又严肃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认识到他们的省的进步在于国际贸易，又认识到打算控制这个国家其余地区只会阻碍这种经济进步，这就鼓励他们支持罗萨斯采取一种专心致力搞好本省和放弃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政策。

有几种解释争论说，在1870年以前，有些国家由于纳入国际经济的程度有限，而且国民经济没有一体化，推迟了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出现，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在同外国利益集团联盟后，可以有效地采取行动保证西班牙美洲的政治秩序和稳定。由于大庄园经济的性质，土地所有者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形成能够控制国家政治的政治联盟。结果，野心勃勃的、社会上涌现出来的考迪罗进入权力真空。然而，这些作为政治事业家的考迪罗只能暂时满足追随他们的武装团伙，因此，他们的统治时期一般来说都是短命的。①

上面这种论点（强调没有一个团结强大、保证支持国家的阶级来解释不稳定状况）得到另一种论点（强调新政府财政上软弱）的补充。新政府缺乏资金使它难以保持军队的忠诚，也难以通过施加恩惠把可能持有不同政见的文职上层人士收买过来。例如，墨西哥像其他西班牙美洲国家一样，它在19世纪20年代借了大量外债。据简·巴赞特的看法，墨西哥历届政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征收捐税来还债，这样会招致内部叛乱；要么不归还外债，这样会引起外国干涉。墨西哥领导人希望把国家从长期的近乎破产的局面中拯救出来，因此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教会的巨额财富；但

① 沃尔夫和汉森著《考迪罗政治》，第168—179页。关于考迪罗主义的进一步论述，见本章第370—375页。

是向教会的财产动手也引起叛乱，有时还使政府垮台。[1]

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把从财政上解释政治不稳定的论点 420 和另一种认为政治不稳定是由于缺乏强大阶级的支持的分析结合在一起。霍尔珀林把这些新国家财政上软弱部分地归于西班牙美洲同大西洋国家打交道的影响。贸易严重不平衡造成货币紧缺和经济收缩，削弱政府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们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因外商侵入和国家无力支付文职雇员的工资也遭削弱。[2] 霍尔珀林可能根据阿根廷的经验把西班牙美洲商人受损害的程度夸大了，因为在有些地方外商控制市场只是暂时的。但是，强调这些新国家商业状况的解释不仅有利于帮助说明1810至1870年时期的不稳定(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贸易地位大多比较软弱)，也有利于帮助说明1870年以后时期的较大政治稳定(此时欧洲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这些新国家的出口额，改善了它们的贸易平衡)。

与大多数西班牙美洲国家在1810至1870年期间政治不稳定形成对照的是，从1870至1910年这几十年是这些国家政治上巩固和实行中央集权的时期，一般是由世俗和实行现代化的、但多多少少是独裁和不民主的班底组成的政府统治。在墨西哥，马克西米利安的帝国政府1867年被推翻后，由贝尼托·华雷斯建立的自由派统治演变为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1876至1911年)。在危地马拉，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的政权(1871—1885年)同样也是形式上的自由主义和独裁统治的结合。在委内瑞拉，相类似的反教会和实行现代化的自由派独裁者是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1870至1888年)。在哥伦比亚，拉斐尔·努涅斯在19世

---

① 简·巴赞特著《墨西哥教会财富的异化》(剑桥，1971)，详细说明见斯蒂芬·R.尼布洛和劳伦斯·B.佩里著《对19世纪墨西哥编史工作的最新补充》，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3/3(1978)，第13—15页。

② 霍尔珀林著《革命的后果》，第1—43页。

纪80年代尝试建立了独裁政权。努涅斯原来是自由派，他同教会和强烈亲教会的保守党结盟以维持他的中央集权政权。阿根廷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另一种方式。19世纪70年代，它在寡头集团统治下（而不是在独裁者统治下）统一全国，政治上得到巩固，并在以后几十年中取得了拉丁美洲空前的经济增长。

421　从强调知识和文化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波菲里奥和其他自由派独裁政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们几乎放弃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切，只留下了它的外衣，并且采取了冷静而且讲求实际的、独裁的政治风格。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政权回到了接近西班牙传统的统治模式。然而，对1870年以后的政治巩固时代进行分析的大多数人都比较强调新秩序的经济基础。欧洲和北美对拉丁美洲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带来了外国对铁路、矿山和出口型农业的源源不断的贷款和投资，对阿根廷和乌拉圭还带来了欧洲移民。这些外国投入以及从出口和对进口品征收关税所得到的大大增加了的收入，在1870年至1910年期间使得一些政权有钱可以把潜在的持不同政见的人收买到政府工作岗位上来，用特许权和合同安抚他们，并且可以维持一支现代化国民军以镇压那些收买不过来的反对派。这些中央政府现在财政上比较强大，因而比较能够遏制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时代的经济机会也吸引了上层阶层的注意力，他们把政治当作某种形式的经济事业的兴趣因此大大减退。对上层阶层来说，新时代是一个赚钱而不是政治冲突的时代，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务实时代而不是进行意识形态讨伐的时代，是一个“秩序与进步”的时代。

第 10 章

423

自独立到1867年[①]的墨西哥

1821年2月24日，王室军队旅长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在南部热带"炎热之乡"的小镇伊瓜拉宣布墨西哥独立。伊图尔维德在他的宣言"伊瓜拉计划"中号召独立、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联合、尊重罗马天主教会。政府形式是君主立宪制，皇帝将从一个欧洲——最好是西班牙——王朝中遴选，"以便让我们有一位现存的君主，避免致命的野心行动"。国家宪法将召开代表大会制订。伊图尔维德的所谓"三项保证"的第一项保证，赢得了争取独立的老游击队战士尤其是文森特·格雷罗将军的支持。格雷罗当时正在离伊瓜拉不远的地方作战。第二项保证向西班牙出生的墨西哥居民提供了安全。第三项保证是他答应保留最近遭到西班牙自由派革命政权攻击的教会特权，企图以此来吸引教会统治集团。军队将承担"保护"这些保证的任务。

伊图尔维德的呼吁是卓有成效的。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他已是国家(除首都以及阿卡普尔科和韦拉克鲁斯两个港口以外)的主人。新任命的西班牙督军胡安·奥多诺胡7月30日在韦拉克鲁斯上岸。他奉命把自由主义改革引进新西班牙，同时要确保这个殖民地继续留在西班牙帝国之内。然而他得到的指示是马德里根据大约四、五个月以前接到的关于这个殖民地的情报作出的，他很快认识到从那时以来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在他看来，墨西哥独

① 作者和编者谨向布里斯托尔大学迈克尔·P·科斯特洛教授在本章最后定稿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424 立已经成为事实，同时，他打算尽快离开这个流行黄热病的港口，因此决定设法同伊图尔维德会晤。8月24日，他们在大雪覆盖山顶的锡特拉尔特佩特火山脚下的科尔多瓦举行会谈，并且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承认“墨西哥帝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条约写进了伊瓜拉宣言的内容，但作了若干修改。根据宣言，皇位将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如果他拒绝接受，则留给执政王朝的一位亲王。据设想，至少会有一位亲王愿意接受皇位。然而在科尔多瓦签署的文本点名提了4个具体的候选人。他们都是西班牙王朝的人，没有提到欧洲的其他皇族。如果这4个西班牙人拒绝接受皇位，未来的皇帝将由墨西哥国会选出。这一改变不可能是偶然作出的，后来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特别是对野心勃勃的伊图尔维德的生涯来说。科尔多瓦会谈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因此似乎可以肯定，伊图尔维德事先已仔细拟订好冗长的条约，并且充份认识到改变原先的伊瓜拉宣言的含意。另一方面，奥多诺胡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必然已疲惫不堪，而且可能正在生病，因此忽略了这一修改。他以督军兼最高政治长官这一宪法规定的头衔签署了文件，尽管到今天他仍以最后一个西班牙总督闻名于墨西哥。伊图尔维德旅长则以帝国军队最高首脑名义签了字。几个月后，他成了大元帅。

奥多诺胡接受墨西哥独立，为首都交权提供了便利。伊图尔维德为了把进城日期订在他38岁生日那一天，特地推迟了日期。9月27日，伊图尔维德骑着马进入墨西哥城。第二天上午，他选出了伊瓜拉宣言和科尔多瓦条约所规定的执政洪达的38名成员。然后洪达正式宣布墨西哥独立。洪达以伊图尔维德为主席，由知名的教士、律师、法官、墨西哥贵族成员和若干军官组成。军官中包括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上校，他和伊图尔维德一样，原来也是王室军队军官。像尼古拉斯·布拉沃、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和格雷罗这些争取独立的老战士都不是洪达成员，但按照科尔多瓦达成的协议，奥多诺胡被包括在内。原来期望他在从总督辖区

向由一名西班牙亲王领导的未来帝国过渡期间帮助伊图尔维德。事实上，奥多诺胡病倒并且在10天后去世，因而未能任命一批本来要去马德里谈判解决办法的专员（这件事也是科尔多瓦协议规定了的）。作为洪达主席和帝国摄政，伊图尔维德大元帅本来可以派使者去马德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西班牙从一开始就对墨西哥独立采取敌视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驻在墨西哥的大部分西班牙军队宣誓效忠新国家，但是一批死硬的保皇份子撤退到圣胡安德乌卢阿——韦拉克鲁斯港前面的一座岛屿要塞——在那里等待援军到来后重新征服这个国家。马德里政府并没有抛弃他们，1822年2月13日西班牙议会拒绝了科尔多瓦条约。几个月后，母国拒绝接受墨西哥独立的消息传到了墨西哥城。

1821年的独立并没有立即给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或经济结构带来任何革命性变化。第一个主要结果是以前由王室官员行使的政权转移到军队手中，那就是说，转移到伊图尔维德的王室军队和格雷罗的共和派军队的联盟手中。

新国家的第二个支柱是罗马天主教会。像所有原来已经建立的殖民地机构一样，罗马天主教会在10年战争中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遭到重大损失。到1822年，10个主教管区中只有4个有主教，世俗教士从1810年的总共4,229人减少到3,487人。到1821年底，男修道士从1810年的3,112人减少到大约2,000人，修道院数目从208个减少到153个。概括地说，教士总数从9,439人减少到7,500人，教区数目也减少了。教会收入特别是什一税收入大幅度下降。在墨西哥大主教管区，什一税收入从1810年的510,081比索减少到1821年的232,948比索，在米却肯主教管区，从500,000比索减少到1826年的200,000比索。

什一税的数字反映了已经发生的全面经济衰退。铸币数量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采矿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从1800年至1809年每年平均铸币2,250万比索减少到1820年和1822年的大约

426 1,000万比索(1821年只铸造了大约600万比索)。没有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可靠资料。各类生产到1820年可能已经恢复，但是甘蔗和其他农作物仍处于衰退之中。制造业产量可能下降了一半，财政收入以同样比例下降。1822年政府收入为900多万比索，但是支出增加到1,300万比索，造成400万比索赤字。公债(即国债)显著增加，从1808年的2,000万比索增加到1814年的3,500万比索，1822年增加到4,500万比索。

制宪会议就是在这种经济衰退和预算赤字的背景下于1822年2月24日在首都召开的。使伊图尔维德感到吃惊和不愉快的是，大多数代表要么是"波旁王朝份子"(即亲西班牙的君主制拥护者)，要么就是共和派。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同他在若干问题上发生争论，而正是在伊图尔维德和代表们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的背景下得到了西班牙拒绝科尔多瓦协议的消息。在此以前，母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它结成的亲属与宗教纽带仍然是强有力的——一直受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尊敬。现在西班牙拒绝让它的子国享有自由。接着产生的愤恨和失望情绪迅速激起了一种感情——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墨西哥不应该有一个它自己选择的君主。西班牙拒绝接受独立的现实和抛弃使墨西哥继续留在波旁王朝内部的机会，正合伊图尔维德的心意。1822年5月18日夜晚，当地驻军宣布他为墨西哥皇帝阿古斯丁一世。第二天上午，国会在军队和民众的重大压力下，接受了这一局面，承认他为墨西哥新君主。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代表(他是医生，未来的自由派领导人)说，西班牙既然已经拒绝科尔多瓦条约，墨西哥就有了决定它自己命运的自由。在没有大主教在场的情况下(他拒绝为新统治者施涂油礼)，国会主席7月21日在首都宏伟的大教堂为伊图尔维德加冕。

伊图尔维德的帝国不可能长久。从一开始它的生存就迂到一些基本障碍。墨西哥贵族渴望有一位欧洲亲王，瞧不起商人的儿子伊图尔维德；大庄园主和商人(他们大多数在西班牙出生)希望有一位欧洲亲王使他们免除强迫贷款和其他财政负担；最后还有

一批强有力的共和派，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记者、律师和进步教士。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尔就是这样的一位教士，他在欧洲和美国经历了一段冒险生涯之后被监禁在圣胡安德乌卢阿要塞的地牢里。要塞的精明的西班牙司令在5月底把他释放，塞尔万多不久就在国会占有一个席位。他不论是在会场内还是在场外公共场所都以极大的热情宣传他的共和思想。 427

因此，伊图尔维德的垮台甚至比他上台还快，这是不足为奇的。波旁王朝份子指责他违背了把皇位献给一位欧洲亲王的诺言。伊图尔维德本人的专横行动鼓励了共和思想的传播，而在这以前，有共和思想的人大体上只限于知识份子。野心勃勃的军官也不满意；他们也许可以容忍一位外国亲王，却难以接受他们的一个同行；如果不能从国外引进一位亲王，那么解决办法应是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共和国制度下，他们还可能成为总统。反对伊图尔维德的情绪不断增长，而在发表意见的自由受限制的气氛下，密谋活动像雨后春笋般发展。到8月26日，即在伊图尔维德加冕后刚刚5个星期，他已经监禁了19名国会议员和若干军官。10月31日他干脆把令人讨厌的国会解散。他采取了一系列没收性的财政措施，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地位。遭受损失的商人（多数是西班牙人）转向波旁王朝份子寻求支持。

韦拉克鲁斯港对伊图尔维德的安全特别重要。它面对仍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的圣胡安德乌卢阿岛要塞①。可以在西班牙的默许——如果说不是支持——之下在韦拉克鲁斯发动叛乱，万一失败，叛乱领导人可以在要塞避难。伊图尔维德不信任韦拉克鲁斯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军事司令官、28岁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上校，把圣安纳召到离港口100多公里的山中小镇哈拉帕，解除了他的司令官职务并且命令他到墨西哥城报到。圣安纳一点也不打算服从皇帝。他骑马奔驰了一整夜，第二天上午回到他的

① 圣胡安德乌卢阿岛的西班牙人到1825年才投降。

兵营，当天（1822年12月2日）下午，他在被解职的消息传到韦拉克鲁斯之前，公开谴责伊图尔维德暴虐无道。他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要求重新召开国会并在“宗教、独立与联合”（即伊瓜拉宣言的三项保证）的基础上制订宪法。他说这三项保证已被皇帝破坏。他还要求同母国实现和平与通商，希望以此争取韦拉克鲁斯当地有影响的西班牙商人的支持①。

然而，几天之后圣安纳对他匆匆表明的共和信念就改变了主意。在1822年，墨西哥共和派在他们的宣传中并不经常使用“共和国”这个词；谈得较多的是自由、国家和国会的主权。10年以前，伊达尔戈并没有正式宣布独立，而使建立一个不臣服于西班牙国王的墨西哥的思想生根，花了好几年时间。现在，共和国这个字眼听起来同样也是太革命了。因此圣安纳修改了他的立场，4天后他发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详细宣言。这个文件大概是由新独立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前驻墨西哥公使米格尔·圣马里亚起草的（他是韦拉克鲁斯人）。圣马里亚因参加共和派密谋被伊图尔维德驱逐，当时正在韦拉克鲁斯等船回国。宣言没有提到共和国，而是要求废除皇帝。“祖国的真正自由”，对共和派来说意味着共和国，对波旁王朝份子和西班牙人来说意味着君主立宪制。因此宣言敦促两派团结起来反对伊图尔维德。宣言坚持伊瓜拉宣言的三项保证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独立”对墨西哥人至为重要，“联合”对西班牙人十分必要，而“宗教”对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都重要。至于圣安纳是真心实意要建立共和国，还是有称帝野心，那就不知道了。

一个偶然的情况帮助了圣安纳。不久前逃出监狱的游击队老战士瓜达卢佩·维多利亚碰巧正好在韦拉克鲁斯，他在圣安纳1822年12月6日的宣言上签了字。圣安纳在独立战争期间是王室

① 宣言书载于C·M·布斯塔曼特著《墨西哥历史日记，第1卷，1822—1823》（萨卡特卡斯，1896），第16—17页。

军队军官，在此之前支持伊图尔维德，如今他获得了一名已经被怀疑有共和倾向的著名反叛将军的援助。几星期之后，莫雷洛斯以前的战友布拉沃将军和格雷罗将军从墨西哥城逃出。他们一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区"炎热之乡"，就宣布支持韦拉克鲁斯起义。他们宣称："我们反对现政府制度。我们不打算成为共和份子，远非如此，我们只谋求我们的自由。"然而，这种否认似乎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共和派这一印象。但支持他们的是不仅被人们认为是信教的而且还是拥护君主制的印第安农民。最后，军队中大多数人（军队中的军官曾经是保皇派，后来支持伊图尔维德，军官中许多人是西班牙出生的）受了参加西班牙议会的两名前墨西哥自由派代表米格尔·拉莫斯·阿里斯佩神甫和何塞·马里亚诺·米切莱纳的影响。军队"宣布"反对伊图尔维德。皇帝于1823年3月19日退位，重新召开的国会迅速任命了一个临时的三人执政机构，由维多利亚将军、布拉沃将军和内格雷特将军组成，人们一般认为头两个人是共和派。4月8日，国会宣布伊瓜拉宣言和科尔多瓦条约无效，并下令说墨西哥今后可以自由采取它所希望采取的任何立宪制度。共和国已成为事实。

429

圣安纳就这样发动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使伊图尔维德的帝国垮台，并且以建立共和国告终。这一新的政治制度是知识份子构想出来的，但把它变为现实同时成为它的主人的却是军队。它取得成功的速度为心怀不满的军官将来发动叛乱指出了道路。

国会考虑到伊图尔维德过去对国家独立所作的贡献，最初并没有严厉对待他。只要他住在意大利，就给他一笔慷慨的津贴。但是这位以前的皇帝不乐意过流亡生活。当时谣传有人支持他，他在这种谣言的错误指引下于1824年7月回国，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坦皮科附近登岸，并不知道在他不在国内的时候国会已宣布他是叛徒。他到达后几天之内就被逮捕并被处决。

伊图尔维德未能把某种恢复秩序的措施引进财政部是他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人执政立即致力于恢复公众信心的任务，而

气氛的改善使他们在伦敦市场上获得了两笔贷款：1824年初从戈德施米特合伙公司借到1,600万比索，几个月后又从巴克利合伙公司借到同样数目的款项①。墨西哥因此承担了3,200万比索的外债负担，但是由于合同规定的价格很低和银行家的扣除，事实上只拿到大约1,000万比索。政府原先期望用这些钱来长期改善国内状况，但是当这些钱最后到来时，它迅速被经常支出(例如政府雇员特别是军队的薪金)吞噬。尽管如此，这些贷款在建立共和国后的最初几年似乎是一种稳定因素，1823年至1824年需要偿还的外债看来并不过大②。由于英国非常明显地对墨西哥的矿业资源感兴趣，因此墨西哥对自己的前途是乐观的。在1823年至1827年期间，英国对墨西哥采矿企业特别是银矿公司的投资在1,200万比索以上。这样总共就有2,000多万比索注入墨西哥的病态经济。

把英国资本引进墨西哥最起作用的人是卢卡斯·阿拉曼，他从1823年4月起担任内政兼外交部长(4个内阁成员之一)。阿拉曼是一个曾经获得西班牙贵族称号的墨西哥矿业家族的优秀子弟，他在欧洲呆了很长一段时期后在伊图尔维德倒台后不久回国。作为圣克利门特侯爵，他也许曾梦想在墨西哥波旁君主的宫廷当一名大臣，但是伊图尔维德的帝国垮台后并没有重新作出努力把皇位献给一位欧洲亲王。相反，它意味着今后许多年都不会有认真考虑建立君主制的计划。因此，阿拉曼进入共和政府任职。

在共和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君主制几乎被看成是卖国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贴新的标签。以前支持建立一个由一名欧洲亲王当首脑的墨西哥帝国的那些人变成了主张中央集权的共和派，他们拥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权，这使人回想起总督辖区制。大多数反对伊图尔维德的共和派变成了联邦派，他们支持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由各个州组成的联邦。过去的保皇派和

① 在本章所研究的整个时期，1比索等于1美元。

② 此时有4,500万比索的国内公债。

独立派（他们在1821年分别变成波旁王朝派和共和派，后来成为反对伊图尔维德的暂时同盟者）之间的毁灭性斗争1823年在不同的口号下重新出现。伊图尔维德退位后，权力短时期落入波旁王朝派手中，但是后来一个也许是出人意料的事态转折帮助了共和派的事业。支持以前的皇帝的那些人指责波旁王朝派推翻了伊图尔维德，他们现在同共和派合在一起，同时新的制宪会议的选举结果使联邦派获得了多数。

431 制宪会议在1823年11月开会，差不多1年以后通过了一个和美国宪法十分相似的联邦宪法。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把全国分为19个州和4个地区，各州分别选出自己的州长和立法机关，各个地区由全国国会管辖。它保留了通常的分权办法——行政、立法和司法——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同它的北部邻国的模式不同：它庄严地宣布，"墨西哥国家的宗教现在和将来永远是罗马天主使徒教。国家以明智和公正的法律保护它并且禁止传播任何其他宗教①"。伊瓜拉宣言的三项保证只保留了两项：独立和宗教。第三项和西班牙人联合（这意味着建立以一名欧洲亲王为首的君主制），已被联邦共和国取代。

1814年叛乱份子制订的阿帕钦甘宪法规定法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1824年的宪法和它形成对照，没有提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删略肯定不是为了维护只包括几十个家族的少数（不是说微不足道的）墨西哥贵族的利益。它的意义要大得多，因为它允许继续保留教士和军人所享有的特权，即民事法庭豁免权。当然，这些特权在独立前就已存在，但是当时教会和军队都从属于皇权，公民服从法律取决于皇权，而3个世纪无人对皇权提出过严重的怀疑。现在最高法律权威消失了，也不存在强有力的贵族或资产阶级，这一真空立即被取得了胜利的军队的人民英雄所

① 费利佩·特纳·拉米雷斯著《墨西哥根本法（1808—1973）》（墨西哥，1973），第168页。

填补。军队不再受皇室约束，变成了新国家的权力裁决者。不管他是联邦派还是中央集权派，将由将军来当共和国总统。

墨西哥也采取了英国关于选举一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的作法。这两位主要行政官可以是不同政党或敌对政党的成员，因而显然有他们在职时彼此之间继续敌对的危险。的确，第一位总统是一个拥护联邦制的自由派——出身微贱的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将军；而副总统是一个拥护中央集权制的保守派——富有地主尼古拉斯·布拉沃将军。两人过去都是争取独立的游击队战士，

432 但是到1824年分别属于敌对的两派。那时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政党，但是两派都利用共济会运动作为它们活动和宣传的焦点。中央集权派成为"苏格兰礼式派"共济会成员，而联邦派在美国驻共和国公使乔尔·R·波因塞特的帮助下成为"约克礼式派"共济会成员。两派共济会的分会也就是差不多25年以后兴起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先驱。

维多利亚总统谋求在他内阁中的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保持平衡，希望在全国政府中保持某种团结的外貌。可是，最能干的亲中央集权派部长卢卡斯·阿拉曼在1825年就在联邦派的攻击下被迫退职。第二年，在进行了长期和激烈的竞选运动斗争之后，联邦派在国会获得了重大多数，特别是在下院。1827年1月发现了想恢复西班牙统治的密谋活动，紧张局势加剧。西班牙是唯一没有承认墨西哥独立的重要国家，并且许多富有的西班牙商人仍住在新共和国，还有其他一些西班牙人保留了在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因此不难煽起人民对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仇恨。墨西哥民族主义变成了联邦派用来攻击被广泛认为是亲西班牙的中央集权派的一件方便和有效的武器。中央集权派采取守势，利用宗教作为对付民族主义的武器。他们对阿拉曼被解职进行报复，展开了一场反对美国公使波因塞特(他是一个新教徒)的运动。由于心肠好但是办事缺乏实效的维多利亚总统无法控制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联邦派，中央集权派领导人兼副总统布拉沃最后发动了反政府叛

乱。布拉沃迅速被他以前的战友格雷罗将军击败并被放逐。他们两人曾在莫雷洛斯指挥下并肩与西班牙人作战，但是格雷罗选择了联邦主义事业，使他得以继续控制他的老家“炎热之乡”。

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即将到来的、预定在18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布拉沃的反叛破坏了中央集权派的机会，他们甚至提不出一名候选人。后来联邦派分裂成温和派和激进派。中央集权派（即保守派）决定支持温和派候选人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将军。他是维多利亚内阁的国防部长，前王室军队军官，后来支持伊图尔维德。他的对手是格雷罗将军，他名义上是联邦派领袖，但许多人认为他只是被自由派记者、前参议员（代表尤卡坦州）洛伦索·萨瓦拉控制的一个傀儡。戈麦斯·佩德拉萨当选为总统，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将军当选为副总统。但是格雷罗不承认选举结果，同时萨瓦拉于1828年12月在首都为他组织了一场成功的革命。接着仅仅是一些形式问题。1829年1月格雷罗正式“当选”，并于4月1日接替维多利亚的职务。宪法秩序在仅仅4年之后就被破坏了。

433

反西班牙战争的人民英雄格雷罗是墨西哥反抗一切西班牙事物的象征。他迅速下令驱逐仍住在共和国的西班牙人①，并且开始准备抵抗期待已久的西班牙入侵军。格雷罗的财政部长萨瓦拉发现国库空虚，于是开始设法增加财政收入。他出售被殖民当局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从而得到一些资金；他还下令征收累进所得税，这在这段墨西哥历史时期的税收工作中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尝试。他对教会财产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众所周知的他同波因塞特的友谊使教会不欢迎他；他在社会改革和谋求下层阶级支持方面所作的努力使所有有财产的集团都忌恨他。

等待已久的西班牙军队的入侵终于在1829年7月底到来，全国一致响应团结的号召，入侵使政治派别冲突暂时平静下来。圣

① 1827年已下令驱逐一部分西班牙人。

安纳将军匆忙从韦拉克鲁斯总部来到入侵军登陆的坦皮科，迅速把他们击败。他立即成为战争英雄，全国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好景不长，外部威胁被克服后，支持天主教和保守的一派不久重新展开了反对格雷罗政府的运动。他们那时还不敢攻击总统，他仍然是争取独立的英雄，现在又是使国家免遭西班牙侵略的救星。而新教徒波因塞特和民主份子萨瓦拉成了靶子。对他们的攻击变得如此激烈以致萨瓦拉在11月2日被迫辞职，波因塞特——一个方便的、可以牺牲的替罪羊——不久离开了墨西哥。

434 格雷罗失去萨瓦拉和波因塞特的支持后，下一个月失去了职位，当时副总统布斯塔曼特在不久之前流亡归来的布拉沃将军的支持下领导了一次叛乱。格雷罗回到远离中央政府控制的南方庄园退隐，没有受到骚扰。1830年1月1日，布斯塔曼特担任总统，组成内阁。新政府与1823年至1827年的两届政府（它们试图在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和有平民主义倾向的格雷罗政权形成对照，它公开采取保守立场。主要内阁成员是阿拉曼，他再次担任内政兼外交部长这一关键性职位。他上任后立即执行他的政治纲领：经过几年完全自由之后，反对派遭到镇压；自从伊图尔维德倒台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谋求约束各个州（在那里自由主义新思想泛滥成灾）；财产权（它们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得到维护；教会的特权重新得到肯定。阿拉曼显然在考虑同西班牙和罗马教廷取得和解。

这些和其他一些事态发展是格雷罗所不喜欢的，他开始领导一批游击队战士在南方发动叛乱。布拉沃将军决定效忠于布斯塔曼特和阿拉曼，他被指派领导军队反对格雷罗。1831年1月格雷罗被俘，几个星期后中央政府下令将他处决。

格雷罗遭到残酷处置，这需要加以解释。布拉沃在1827年被击败后，只是被放逐，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因此，人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格雷罗处以极刑？萨瓦拉对此提供了线索。几年后他写文章时指出，格雷罗是混血儿，大地主、将军、

教士和住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都反对他担任总统。这些人不可能忘记独立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与种族颠覆的威胁。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布拉沃虽然参加过革命，但他属于这个"绅士俱乐部"，有文化的克里奥尔人萨瓦拉也是一样，尽管他有激进思想。因此，处决格雷罗也许是对那些被认为在社会地位上和种族上属于低等的人发出的一个警告：别想作当总统的美梦。

布斯塔曼特的保守政府所做的事并不都是消极和反动的。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国家的财经状况得到改善。从1827年底开始出现内部冲突时起，墨西哥一直无力偿付在伦敦借到的两笔外国贷款的利息。现在已和债券持有人商定，将400多万比索的拖欠款转化为本金。这样就以增加本金债务为代价恢复了信心，但是大概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由于前些年过份扩大生产以及军事和民间骚乱，银矿业仍然处于肖条状态。当时没有多少办法可使这个行业复苏，阿拉曼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例如，他开办了一家政府银行，对引进纺纱机和织布机予以资助，同时他禁止进口英国棉织品。这家银行的资金则来自高昂的保护主义的关税。本国和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凡是有兴趣成为制造商的，都可以得到银行贷款。机器是从美国订购的，1833年第一批棉纺厂开始营业。这时，布斯塔曼特-阿拉曼政府已不再掌权，但是阿拉曼为纺织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继续发展，虽然政府几经更迭。作为这一倡议的结果，10年以后，墨西哥有了大约50家工厂，可以适当地向人民群众供应廉价的棉布。纺织工业在传统的纺织业城市普埃布拉和水力资源丰富的产棉州韦拉克鲁斯特别有名。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增长速度：1838年工厂纺纱63,000磅，1844年超过1,000万磅；1837年工厂织布45,000匹，1845年达656,500匹。随后增长速度放慢。阿拉曼并没有把他的注意力局限在纺织业，但是他未能在——譬如说——农业方面实现这样惊人的结果。尽管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不得不承认农业受到教会什一税的严重妨碍。

435

布斯塔曼特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持一个持久的、中央集权共和国，不久就出现了敌对的政治集团。银矿州萨卡特卡斯的州长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小心翼翼地发展了一支强有力的民兵，他决定向首都亲教会的政权挑战。他的朋友、以前支持伊图尔维德的参议员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建议该州发起一次关于教会和国家各自的财产权利的论文竞赛。一个贫穷的神学教授何塞·马里亚·路易斯·莫拉1831年12月提出的一份参加比赛的论文获胜，论文证明撤销教会财产的限定继承权是有道理的，从而为反教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时机是有利的。击败格雷罗和萨瓦拉后，私人财产权得到明确的保护。因此不存在攻击教会财产可能发展成为激烈攻击一般财产的现实危险。自由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摧毁教会财产同时加强私人财产。

莫拉是个理论家，不是活动家，因此反对布斯塔曼特的组织工作落在戈麦斯·法里亚斯身上。由志愿者组成的萨卡特卡斯民兵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因此他需要在职业军队中找一个盟友。自从1832年1月以来圣安纳将军一直反对布斯塔曼特。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很清楚，但是在公众心目中他与他一贯支持的格雷罗有广泛的联系。因此，对他来说，这里就存在一个机会，可以从处决格雷罗这件不得人心的事情上得到好处。此外，他仍然是民族英雄，又因击败1829年西班牙人侵而享有荣誉，因此他可以作为人民的宠儿谋求取代格雷罗。戈麦斯·法里亚斯的自由主义运动加上圣安纳的军事叛乱迫使布斯塔曼特解除了阿拉曼和国防部长何塞·安东尼奥·法西奥的职务，人们广泛认为这两个人应对处死格雷罗一事负责。这样的内阁变动是不够的，1832年底布斯塔曼特被迫承认失败。戈麦斯·法里亚斯作为临时政府的新财政部长在首都控制了政府。萨瓦拉（他在美国等了两年多之后回到墨西哥）没有得到内阁职位；他的平民主义招牌现在已被中产阶级反教权主义的照牌所取代，他不得不以担任墨西哥州州长一职而感到意足。1833年3月，圣安纳当选为总统，戈麦斯·法里亚斯

当选为副总统，他们的任期从4月1日正式开始。戈麦斯·法里亚斯渴望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而圣安纳暂时宁愿把实施权力一事交给他的副总统，他自已则留在他在韦拉克鲁斯的庄园等待公众舆论的反应。

戈麦斯·法里亚斯在没有总统约束的情况下，着手实行一项广泛的改革纲领，特别是关于教会方面。取消了民法规定的交纳什一税的义务，交纳与否变为完全自愿。然后，又取消了民法关于强制履行修道誓言的规定，允许男修道士和修女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自愿还俗。还宣布独立以来属于各修道会的财产的一切转移无效。第一个法律主要涉及主教和大教堂的教士，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什一税；后两个法律的目的是要最终取消修道会。国会已开始讨论如何处理修道院的不动产问题，出售这种财产已被宣布为非法，以防教会把它们出售给他们所信赖的人从而逃避取消这些财产的限定继承权的规定。即使这样，自由派在许多年以后也还看不到取消财产的限定继承权的规定得以实施。

437

戈麦斯·法里亚斯、他的内阁和自由派国会还试图削减军队人数，不久高级军官和高级教士恳求圣安纳进行干涉。最后，一些军官和他们的部队在1834年5月叛变而且叛变逐步扩大，此时，圣安纳决定离开他的庄园到首都履行总统职权。不久，后果就明显可见。改革被撤销；1835年1月，戈麦斯·法里亚斯被剥夺了副总统职务。两个月后，一届新国会批准了修改1824年宪法的动议，目的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圣安纳知道得很清楚，联邦主义的堡垒是萨卡特卡斯，他派兵进入这个州，击败了民兵并且免去了加西亚州长的职务。1835年10月23日，国会发表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临时宪法，这个宪法用各个地区代替各个州，各地区长官今后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然而，圣安纳并没有完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工作。在击败萨卡特卡斯之后不久，北方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对墨西哥和对圣安纳来说都是最不愉快的复杂情况。得克萨斯省反抗

政府朝着中央集权制所采取的行动，最后诉诸于武力。在当地居民把北部的墨西哥军队赶走之后，圣安纳决定亲自领导一次他认为仅仅是惩罚性的远征。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他对法国和英国的公使说，如果他发现美国政府在援助叛乱者，“他可能继续向华盛顿进军，在它的国会大厦上插上墨西哥国旗①”。圣安纳在1836年3月初成功地占领了圣安东尼奥，但是在下一个月遭到决定性失败，本人被俘。这时，得克萨斯已宣布独立，新得克萨斯共和国的副总统不是别人，正是来自尤卡坦的自由派洛伦索·萨瓦拉，但是他在6个月后去世。圣安纳落入得克萨斯人手中成为战俘，签订了一项准予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并且承认格兰德河为两国之间的边界。他后来被释放，1837年2月不光彩地回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政府当时已拒绝接受这项条约，并且拒绝放弃它对以前那个省的权利。

438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以在欧洲外交战线上的成功抵销了它在北部的失败：1836年底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终于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差不多同时，国会批准了一个详尽的中央集权制宪法。这个宪法把总统任期从4年增加到8年，以期使国家得到它十分需要的稳定。一时看来，人们可以期望有一段和平时期。这种希望过早了一点。布斯塔曼特被恢复职位，担任新总统，但是那些记得1830至1832年间他的强有力政权的保守派感到失望。两个主要的中央集权派圣安纳和阿拉曼已名誉扫地，没有他们的支持或压力，布斯塔曼特显得越来越倾向于倒向那些煽动恢复1824年宪法的联邦派。一名保守派政治家警告总统说，教士和富有阶级可能感到不得不“把自己交到圣安纳将军手中”。

1838年，法国侵入韦拉克鲁斯，为法国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索取赔偿。法国的入侵给圣安纳以重新获得人民尊敬的机会。他

① W.H.考尔科特著《圣安纳的故事——墨西哥化身，谜一样的人物》（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64），第126页。

进军韦拉克鲁斯。他的勇敢行动再次使他成为民族英雄。第二年，布斯塔曼特离开首都去和联邦派叛军作战时，圣安纳被任命为临时总统。但几个月后，圣安纳把职位交还给它的合法占有人，回到他的农村退隐地等待有利时机到来。他没有等很长时间。人民对布斯塔曼特的支持日益减弱，1840年7月他被联邦派军队俘虏。联邦派军队把戈麦斯·法里亚斯召来——法里亚斯从流亡地回来后进过监狱，后来又出狱——并宣布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经过几天巷战，叛乱被镇压下去，布斯塔曼特获释。作为对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的一种反应，作家何塞·马里亚·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主张建立一个有一位欧洲亲王登极的君主制度作为解决墨西哥的弊端的办法。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像萨瓦拉一样是尤卡坦人，尽管他采取了相反的道路。当尤卡坦在得克萨斯取得的 339 胜利的鼓午下正在对墨西哥的中央集权制进行它自己的战斗时，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断定，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太软弱，无力维持秩序。没有多少人赞同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的建立君主制的意见，但是布斯塔曼特显然已经失去激进联邦派和极端保守派双方的支持。圣安纳也对1836年宪法不满，宪法规定建立一个古怪的“最高权力维护院”(Supreme Conservative Power)来约束总统权力。最后，尤卡坦宣布独立，布斯塔曼特不论通过谈判还是通过武力都无法使它回到共和国来。增加捐税、关税和提高价格只是使不满情绪更加扩大。进行另一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1841年8月，瓜达拉哈拉的司令官马里亚诺·帕雷德斯·阿里利亚加将军号召解除布斯塔曼特的职务并选举新的制宪会议颁布1836年宪法的修正案。他迅速得到军队的支持，而圣安纳作为调解人插了进来，1841年10月成为临时总统。帕雷德斯将军也是前王室军队军官，以保守派闻名，因此新的局面实际上成为一场中央集权派反对中央集权制的叛乱。然而，圣安纳十分精明，他不让自己受制于任何一派。他需要资金以便收复得克萨斯

和尤卡坦以及供他自己挥霍，而只有教会能够提供资金。作为对教士施加压力的办法，他把财政部长一职交给1835年他本人罢免的萨卡特卡斯州前自由派州长弗朗西斯科·加西亚。新国会的选举有较大自由，选举结果联邦派或自由派代表居多数，他们之中许多人很年轻，多年之后成为知名人士。1842年，他们被迫在圣安纳总统的阴影下拟订新宪法。尽管如此，他们设法拟订了两个草案。这两个草案仍然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唯一获准的宗教，并且为了不使圣安纳恼火，他们只提各个地区，不提各个州。然而，第二个草案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包含了一个人权宣言或所谓“保证”；特别是它规定法律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应有任何特殊法庭存在。换句话说，民事豁免权应该废除，一切政府垄断应结束。此外，教育将是自由的。

1842年12月，当国会正在讨论宪法改革时军队解散了国会，441 并在圣安纳不在场的情况下，代理总统布拉沃任命了一个由主要的保守派地主、教士、军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几个月后这个委员会设计了一个圣安纳可以接受的宪法。这个文件是中央集权的和保守的，没有提到人权，尤其是没有提到平等。同时由于删掉了1836年宪法中的“最高权力维护院”而加强了总统权力。总统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因为新宪法拟订人虽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元首，但不希望有一个暴君。

新国会只不过是比被解散的国会稍微温顺些，而当圣安纳的财政勒索变得不可忍受时，以在财政问题上诚实著称的帕雷德斯将军在瓜达拉哈拉叛变。首都的下院对他的举动表示同情，其他军队不久也宣布支持。圣安纳于1844年底被推翻，受到监禁，然后被终身流放。国会选举著名的温和派何塞、华金·埃雷拉将军担任总统。

首都的最近这一轮政治动乱是在墨西哥和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1843年，英国和法国曾在墨西哥和得克萨斯之间进行调停，实行休战，但是休战并没有导致墨西哥承认得克

萨斯独立。相反，圣安纳坚持得克萨斯仍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他宣称如果美国把它并吞——许多美国人赞成这样做——那将无异于宣战。

美国国会在1845年2月事实上批准了合并，此后事态发展的步伐加快。墨西哥舆论，不管是保守派舆论还是自由派舆论，都情绪激昂，反对华盛顿的好事侵略的政治家，但新总统埃雷拉将军不久发现，国家的财政和军事状况使反抗毫无希望，欧洲的帮助也决非垂手可得。因此他试图谈判解决问题。在当时的气氛下，这样一个行动被墨西哥人民看成是卖国行为。1845年12月，帕雷德斯将军再次叛变，借口是"共和国领土将被割让，同意与背信弃义的美国内阁打交道这个无法抹掉的丑行将永远沾污国家的荣誉[①]。"他要求把埃雷拉免职并召开非常国会制订新宪法。首都的 442 军队服从号召，埃雷拉辞职，1846年1月初，帕雷德斯成为总统。当时生效的是1843年的保守派宪法，作为天主教保守派的帕雷德斯打算把它修改，但他显然不期望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当他作如下宣布时，暗示了他的想法。他说："我们谋求一种强大、稳定、能保护社会的力量；但是在管理这个社会时，我们既不要军人的专横独裁，也不要雄辩家的使人屈辱的枷锁[②]"。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要建立君主制度。在他的保护下，卢卡斯·阿拉曼公开恢复了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的中心思想，即建立由一名欧洲亲王当皇帝的墨西哥君主国。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样一个君主国可能成为反对美国扩张的堡垒，但是当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墨西哥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君主国只能依靠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贵族。作为少数墨西哥贵族家族之

---

① T.E.科特纳著《何塞·华金·埃雷拉的军事与政治生活（1792—1854）》（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49），第146页。

② J.F.拉米雷斯著《与美国战争期间的墨西哥》，W.V.斯科尔斯编，E.B.谢尔译（密苏里洲哥伦比亚，1950），第38页。

一的成员，阿拉曼忽略了建立君主国的这一先决条件，可能他是期望君主国将得到欧洲军队的支持。他似乎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墨西哥的统治集团——军队——是共和派。

不管怎么说，根本没有时间引进一位欧洲亲王从而获得帮助来反对美国。1846年4月战争爆发，两三个月后美国军队击败墨西哥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北部的一些地区。帕雷德斯没有能力捍卫国家，而且他同情君主制，这就使公众舆论摆向另一个极端。人们认为，也许年老的联邦派戈麦斯·法里亚斯和一度是民族英雄的圣安纳——两人都以仇恨美国闻名——可能更有办法。早在4月份，圣安纳在古巴流亡期间就已预见到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应，当时他曾写信给那时流亡在新奥尔良的戈麦斯·法里亚斯。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圣安纳以其习惯的噜苏方式建议：两人进行合作；军队和人民实行团结；他现在接受自由的原则。戈麦斯·法里亚斯可能认为军队需要圣安纳，而且以后他能够摆脱他，因此表示同意。两人达成默契：圣安纳再次担任总统，戈麦斯·法里亚斯担任副总统。

443 戈麦斯·法里亚斯动身前往墨西哥，8月初在何塞·马里亚诺·萨拉斯将军率领的部队的协助下占领首都并恢复1824年宪法。随后美国政府允许圣安纳穿过封锁线在韦拉克鲁斯上岸——也许美国认为，极端反美的帕雷德斯倒台后战争可能结束；或者圣安纳会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缔和；或者他会给已经乱成一团的墨西哥带去更大的混乱。1846年9月16日，两个迥然不同的英雄圣安纳和戈麦斯·法里亚斯同乘一辆敞篷马车穿过首都。12月，他们的关系正式确定，国会任命圣安纳为总统，戈麦斯·法里亚斯为副总统。

圣安纳不久离开首都去领导军队，而戈麦斯·法里亚斯为了满足军队的迫切需要，把价值1,500万比索的教会财产收归国有，这个数目大致为教会全部财富的1/10。由于没有时间进行估价，他下令把估计价值1,000万比索的教会财产立即没收出售。教会当

然提出抗议。1847年2月底首都开始发生反动军事叛乱。3月21日圣安纳回到首都，一星期后他撤回两个没收命令，但是首先得到教会当局的承诺，他们将保证提供150万比索的贷款。圣安纳显然已学会利用自由派来讹诈教会。教会同意照办，知道这笔贷款大概永远也不会偿还。然而他们没有现金，因而由政府将短期债券打折扣出售给金融家来筹款，同时保证教会将赎回这些债券。由于戈麦斯·法里亚斯拒绝下台，副总统一职在4月1日取消。这是两位主要政治家的第二次合作，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

3月9日，当首都成为内战战场时，美国军队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指挥下在韦拉克鲁斯附近登陆，这个港口于3月29日投降。入侵军5月份占领普埃布拉，9月15日占领首都，尽管首都居民表现十分英勇。第二天，圣安纳辞去总统职务（但没有辞去总司令职务），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家。墨西哥停止抵抗，美国军队并没有进一步向内地进军。它在首都成立了一个市政委员会，由知名的自由派组成，其中包括米格尔·莱尔多（他将在几年以后出名），同时等待出现一个墨西哥政府，以便同它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这时埃雷拉将军把残余部队集合在一起，在未被占领的托卢卡——后来在克雷塔罗——成立新政府，由无党派的最高法院院长曼努埃尔·德·拉·塔尼亚一塔尼亚担任总统。像戈麦斯·法里亚斯和新一代中的梅尔乔·奥坎波（他也将在若干年后出名）这样一些反美的自由派不参加新政府。人们一般把失败归罪于圣安纳的无能和卖国。有些墨西哥人指责“北方的巨人”。15名著名人物在1848年这样写道：“墨西哥共和国得到大自然十分慷慨的赠予，具备缔造一个伟大而幸福的国家的各种要素，但它在其他次要的不幸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不幸，那就是邻近有一个强大而精力充沛的民族①”。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寻找替罪羊。一位作

444

① 拉蒙·阿尔卡拉斯等著《墨美战争史略》（墨西哥，1848）；英译本《另一方面：或称墨美战争史略》（纽约，1850），第1页。

家抱怨“美国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正的和可耻的统治”，但是他接着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惩罚是罪有应得①”。

美国军队尽最大努力来缩短墨西哥人民蒙受苦难和耻辱的时间。它和新政府进行接触，谈判达成了一项和平条约，并于1848年2月2日最后签订。墨西哥丧失了事实上早已失去的东西：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然而，墨西哥谈判代表的确收复了美国认为它已经永久占领了的许多地方，譬如说，下加利福尼亚。即使如此，失去的省份等于墨西哥领土的一半左右，虽然它们只包括墨西哥总人口的1—2%，也没有什么当时已知的天然资源。因此，失去它们并没有破坏墨西哥的经济，而且墨西哥将得到1,500万美元的赔偿。墨西哥的一些社会阶层认为这是个屈辱性的条约，签约人是卖国贼，还有些人希望对入侵者进行游击战争。这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智占了上风。5月30日，国会最终勉强批准了条约，占领军不久即撤走。这使墨西哥地主阶级产生了复杂的喜悦心情，这时他们正受到一次社会革命的威胁。

445 1829年，美国外交家波因塞特曾以下面一段话概括墨西哥农村的状况：

“因此这里需要的正是社会中的那一部分人——自由的自耕农民(free peasantry)——他们是每个国家的力量之所在。还不能认为印第安人已是那一部分人。他们勤劳、耐心、顺从，但是令人痛心地无知。他们正在慢慢地摆脱他们所陷入的那种悲惨境地。……目前居民的7/8生活在肮脏的棚舍中，没有最普通的生活便利。他们唯一的家俱是几张供坐卧之用的粗席子，他们的食物是玉米、胡椒和豆子，他们的衣服既粗糙又很少，令人伤心。他们不能获得比较舒服的生存条件(尽管每年有许多节日)，并不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他们不是在赌博中把钱输光，

① 拉米雷斯著《与美国战争期间的墨西哥》，第161页。

就是把钱花在天主教会的铺张浪费的活动上。……所有这些弊端将通过教育而大大减少①”。

到1847年，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状况依然如故。农村地区由大庄园(haciendas,可以把它们说成是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居民区或大宅院(estates)、印第安人村庄和他们的村社土地组成。在大庄园里，劳动者经常通过劳役偿债制——殖民地时期的遗留物——被束缚在这个产业上。债役雇农在还清债务以前不得离开，除非另一个大庄园主为他还了债。换句话说，农村劳动者是以他们所欠借务多少为价格被买来买去的。如果一个债役雇农逃跑，可以追捕，抓回来后进行惩罚。这一事实上的劳役偿债制在墨西哥中部是典型的。在闭塞的尤卡坦半岛和人烟稀少的北部仍然存在着合法的劳役偿债制。

梅尔乔·奥坎波是就墨西哥农村劳动制度这一敏感题目写过文章的第一个自由派大庄园主。他在1848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谴责劳役偿债制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进步是无益的。奥坎波写道，他曾四次取消他的所有债役雇农的全部债务。如果他的一个债役雇农从他的农场逃跑——或许是为了给另一个可以提供较高工资的大庄园主干活——他只是在他犯有罪行时才予索回。他在文章结尾规劝债役雇农不要借钱，规劝雇主只是在有紧急需要时才把钱借给他们。

最近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农村劳动者都欠他们雇主的钱。至少在一些大庄园，有数目相当多的工人丝毫不欠债，甚至还有大庄园主欠他们钱的情况。债役雇农往往支取他储存的钱在大庄园主的商店里买东西。最后，有些大庄园主并不向当局告发 446

① 威廉·R.曼宁编《美国关于拉丁美洲各国独立的外交通讯》(纽约，1925)，第3卷，第1673—1674页；载刘易斯·汉克编《拉丁美洲文明史，第2卷：现代史》(伦敦，1967)，第22—26页。

逃走的债役雇农，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回来①。债役雇农即使不欠钱，也不是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离开他们的雇主。流浪法——也是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使得无地的债役雇农难以到全国各地去另找较好的工作。依附于某个大庄园主长期在那里呆下来比较安全一些。有意思的是，尽可能多借一些，尽可能少干一些，对雇工反而有利，因为这样他可以永远不被解雇。这是奥坎波特别批评的这个制度的另一个方面。

村庄里的印第安人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在邻近的大庄园里当季节工。这种安排比较方便，因为没有多少自耕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够一年的吃用。他们是自由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庄稼歉收，就要挨饿。劳役偿债制的一个优点是，债役雇农总是可以从大庄园主那里借到玉米。

农村中还有其他几类人，必须把他们同债役雇农和村庄里的自耕农区别开来。这些人就是擅自占地者、租户（renters）、佃农和分成农。他们住在大庄园的地界之内，通常是住在小居民区内。他们很少有现金交纳租金，经常不得不用自己的劳动或儿子的劳动来顶交租金，如果抗拒，他们的牲口——也许是几头牛——可能被没收。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撵走，但这种情况可能比较罕见，因为让他们留在那里作为潜在的债役雇农对地主有利。大庄园主在他的地盘内显然是太上皇。大家都接受这种社会地位和种族方面的不平等，债役雇农、自耕农和佃农似乎对他们处于下等地位并不怨恨。只是在通过正常渠通难以——且不说不可能——对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行为找到纠正办法时，他们才提出抗议。

① 见丁·巴赞特著《五个墨西哥大庄园。圣路易斯波托西三个世纪的农村生活（1600—1910）》（墨西哥，1975），第103—108页；同上作者《从伊达尔戈至卡德纳斯的墨西哥简史（1805—1940）》（剑桥，1977），第64—66，88—89页；同上作者《1822—1910年墨西哥北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地主、劳工和佃农》，载肯尼恩·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编《拉丁美洲的土地与劳动》（剑桥，1977），第59—82页。

尤卡坦的情况特殊。当地的大庄园主种植供出口用的黑纳金树——即西沙尔麻，一种生产纤维的龙舌兰——取得成功，另外他们同墨西哥中部没有什么联系①。很自然，尤卡坦拥护联邦制。1839年它在玛雅族印第安士兵的帮助下背叛墨西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1840年，美国旅行家约翰·L·斯蒂芬斯发现印第安人债役雇农表现顺从，低声下气。过了两年，他进行第二次访问之后警告说：

"经过多少年代的奴隶状态之后，当他们发现自己再一次掌握了装器并且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体力时，其结果可能如何呢？对于那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谁也无法预言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②"。

斯蒂芬斯的预言在5年之后得到证实。作为对印第安农民当兵的酬报，白人答应取消或至少减少教区费，取消所有印第安成年人需要交纳的人头税，并且让他们自由使用公有土地和村社土地。这些诺言一个也没有兑现，1847年夏天玛雅人开始叛乱，他们的目标是消灭或至少赶走白人居民。叛乱很快发展成全面战争，从那时起它被称为种姓之战。墨西哥刚刚被美国打败，即使它希望派一支军队去尤卡坦镇压叛乱，它也无力这样做。在随后发生的残酷战争中，印第安人几乎把他们的敌人赶到海里去。白人在绝望中甚至表示愿意把尤卡坦送给英国、美国或者任何愿意保护他们的国家。

当尤卡坦陷于这场种族战争的痛苦之中的时候，由于美国的扩张而被迫南迁的印第安部落侵入了墨西哥北部人烟稀少的地区。他们烧毁大庄园、村庄和采矿居民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那里的居民。墨西哥政府又因软弱无力而无法制止印第安人的袭

① 霍华德·克莱因著《尤卡坦的黑纳金树插曲》，载《国际经济事务》2/2(1948)，第30—51页。

② 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著《尤卡坦旅行琐记》(俄克拉何马州诺曼，1962)，第2卷，第214页。

击。

社会与种族叛乱在墨西哥中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里的印第安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语言集团，他们也不像尤卡坦的玛雅人那样处于明显的多数。然而，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士兵、逃犯、游民和类似份子乘墨西哥军事失败和继而发生混乱之机，结成武装团伙开始在农村进行恐怖活动。至少在一个地区，在瓜纳华拉州、克雷塔罗州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的群山中，出现了一个革命的农民运动。这次所谓的戈达山叛乱谋求把土地免费交给大庄园的佃农和债役雇农。但是叛乱份子没有足够的力量进攻城市，他们只448好满足于焚烧大庄园。丧失斗志和四分五裂的墨西哥统治阶级痛苦地、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们一度伟大的国家剩下来的部分开始分崩离析。

但是后来情况开始慢慢好转。美国军事历史学家R.S.里普利在1849年评论道：

“战争对墨西哥的影响一直是并将继续是大大有利的。第一个巨大的明显好处是军队的威信……被一扫而光。情况就是这样，以下两点可以作为证明：自从缔和以来，墨西哥比较平静，而且根据共和原则施政的政府至少表面上是稳定的①”。

然而，情况好转的主要原因是战争赔偿。埃雷拉总统的由温和的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没有任何财政收入，如果它在开始时没有得到先付的300万比索的赔偿费，毫无疑问它早就垮台了。有了这笔钱，它能够从美国军队购买剩余军事装备，在墨西哥中部恢复社会秩序，并把援军派到北部和尤卡坦。在尤卡坦进行几年战争之后(在这场战争中，当地地主得到他们的债役雇农的支持，还雇用了美国雇佣军)，玛雅族印第安人的叛乱逐渐平定。尤卡坦的克里奥尔人保住了生命财产，但是永远失去了脱离墨西哥独立的希

① R.S.里普利著《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纽约，1970)，第2卷，第645页。

望。此外，尤卡坦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①。

先付赔偿费的作法继续实行，墨西哥的国家财政逐渐得到整顿。1846年，经过在伦敦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欠外国的债务的本金确定为5,100万比索。后来因发生战争，没有偿付新本金的利息。但是伦敦债券持有人委员会对墨西哥采取友好态态，牺牲了过期未付的欠款，并且同意把年利率从5％减少到3％。此后，数额比较合理，到1854年一直如期支付。整个经济看来也已好转。根据铸币数字，最重要的工业——金银采矿业——有所恢复。独立战争前每年平均生产2,000多万比索，到1822年跌至1,000万比索，此后逐渐增加，到1848年至1850年，年产量几乎再次达到2,000万比索，这三年是得到赔偿费的年头。此后，1854年又下降到1,600万比索，在1858年—1867年这10年中又增加到1,780万比索。 449

1850年最后几个月墨西哥再次举行总统选举。埃雷拉中意的是他自己的国防部长马里亚诺·阿里斯塔将军——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其他集团支持它们自己的候选人。阿里斯塔虽未得到绝对多数，但获得遥遥领先的地位。1851年1月初，下院选他为总统，8个州的代表团投票支持他，5个州的代表团支持布拉沃将军。这是独立以来第一次一个总统不仅能够干完他的任期——尽管不是一个十足的任期——而且还能够把职位交给一个合法选出的接任人。然而，行宪进程不久再次被打断。

只要社会颠覆活动威胁着已经建立的秩序，自由派和保守派就愿意团结起来共同自卫。保守、反美的阿拉曼甚至对人们所仇恨的新教占领军的撤退表示遗憾，占领军曾保护他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免遭匪徒和叛乱份子的侵犯。自由派大师莫拉从欧洲寄信给墨西哥的朋友说，应该大力镇压印第安人叛乱。但是一旦眼前的危险扫除之后，保守派反对温和的自由派政权的行动再一次加

① 1837年的人口为582，173人；1862年的人口为320，212人。

强。在1851年初的选举中，有1/3以上的选票投给保守的布拉沃。此外，新政府的财政前景远非乐观；美国的赔偿费几乎已用完；由于离美国边界更近，扩大走私活动更加容易，政府收入因此减少；军队人数减少了，但是由于印第安人重新侵入墨西哥北部（以及被解职的军官参加反对派行列），军事开支仍然庞大。1851年预算赤字超过1,300万比索①。阿里斯塔将军的政府不久就遭到保守派、激进自由派和圣安纳的支持者的攻击。虽然这些人的名声都有污点——一些主要的保守派过去有拥护君主制的观点，一些激进的自由派曾同占领当局合作，当然圣安纳不称职、近似卖国——但这无关紧要。潮流的方向不利于温和的自由派，在人民心目中，他们签订和约"出卖"一半领土，背叛了国家，要对目前的灾难负责。

450

1852年7月，在瓜达拉哈拉，前国民警卫队上校何塞·M·布兰卡特解除了州长赫苏斯·洛佩斯·波蒂略（一个温和的自由派）的职务，另一起军事叛乱扩展到其他州。马上还不清楚是谁参加了叛乱——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还是二者都参加——也不清楚其目的何在。几个月后尘埃落定，看来是人人都希望圣安纳回来。阿里斯塔辞职，将军们相信自己无力进行统治，都同意把当时住在哥伦比亚的这位前独裁者召唤回来。1853年3月17日，国会正式选举圣安纳担任总统，政府派人去请他回来。

阿拉曼在给圣安纳的一封信中说明了保守派的纲领：充份支持教会；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废除联邦制；设置一位强有力的行政长官，但受一定原则和责任的支配。然而，他没有说清楚谁将监督圣安纳。也许他把圣安纳的下一届总统职位看成是通向波旁君主制的一块踏脚石。保守派在他们重新进行的活动中并不是孤立的。圣安纳在韦拉克鲁斯上岸时，他受到米格尔·莱尔多·

① 在1821—1847年间，政府每年支出平均为1,750万美元，收入只有1,000万美元。

德·特哈达的欢迎，莱尔多是作为激进自由派代表派去欢迎他的。早在1848年，莱尔多就曾指责军队和教会是使墨西哥毁灭的原因。圣安纳要求他出面提出他的想法，莱尔多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重申了他早先的批评，并且在结尾时提出了共和国迫切需要的各种重要改进办法的建议。

圣安纳在1853年4月20日就任总统。这一次他得到的支持比1846年更广泛，那时有组织的政治集团中只有激进自由派要求他回来。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听从他的领导，两派都相信他们能使他站到自己一边。他组成了一个混合内阁，由保守派的阿拉曼出掌内政和外交部，由独立自由派的安东尼奥·德·阿罗一塔马里斯担任财政部长。鉴于圣安纳以前曾利用自由派讹诈教会，后者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命。莱尔多·德·特哈达成为新成立的发展部副部长，他在电报线路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对墨西哥山区的发展至关重要。1824年的宪法暂停生效，但是没有宣布用什么来代替它。圣安纳本来可以恢复1843年的中央集权制宪法，但这个宪法虽然是保守的，却对总统权力施加了若干限制。例如，它禁止总统出售、赠送、交换或抵押任何一部分国家领土。由于当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这种限制是他所不喜欢的。因此，他是在没有宪法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451

在圣安纳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失去了两个最能干的部长：阿拉曼在6月去世，阿罗在8月辞职（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发行用教会财产做保证的债券，以此弥补1,700万比索的预算赤字，但未成功）。教士对阿罗的政策提出强烈抗议，圣安纳不得不想另外的办法来搞钱。3月间，就在他就任总统的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占领了今天的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墨西哥无力把入侵者赶走，而美国强烈要求把它卖给美国。1853年底双方达成协议。售价为1,000万比索，墨西哥将立即得到其中的700万比索①。

① 这块有争议的领土在墨西哥叫做拉梅西拉；在美国，这笔交易称为加兹登购地。

圣安纳的政权变得越来越反动和专制。他喜爱官场的富丽堂皇、讲究排场，但轻视政府的日常工作。在他担任国家首脑的早期，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总统的工作交给文职副总统，把军务和荣誉留给自己。1853年，由于国家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并且处于再次瓦解的边缘，他发现他不得不接受总统一职的全部负担。然而，他以如此多种多样的头衔和特权来装璜总统的门面，以致他除了名义以外完全变成了一个君主。伊图尔维德被处决一事意味着圣安纳绝不会采用皇帝的称号，但是他却获得了甚至比伊图尔维德所曾想像到的更实际的权力。1853年12月，他被授予提名继承人的权利，当后来打开密封的信封时，发现里面是伊图尔维德的儿子的名字。为了支撑他的权威和威信，也许还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宁，圣安纳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使自己显得是那个人——他对他的倒台曾起那么大的作用——的继承人。例如，1853年11月，他宣布追赠伊图尔维德以解放者头衔，并下令把伊图尔维德的肖像放在一些政府大楼中。

452 他还向教会作出许多让步，允许耶稣会教士复职，废除1833年关于取消民法强迫履行修道誓言的规定的法律，这些和他的反动态度是一致的。他限制新闻出版，把许多自由派关进监狱或流放。他终于走得太远了。1854年2月，南部的一些军官在F·比利亚雷亚尔上校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3月1日，在阿尤特拉，起义者为这场革命提出了一个纲领，10天以后又在阿卡普尔科作了修改。它的要点如下：免除圣安纳的职务；由革命军总司令指定的代表选举一位临时总统；最后一点是，要求召开非常国会产生新宪法。早些时候在别的地方也宣布过类似的要求，但是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阿尤特拉-阿卡普尔科宣言没有提到那些众所周知的自由派要求，本来也没有人会猜想从这一次目标有限的军队起义中会产生一个自由主义的墨西哥。在阿尤特拉发动叛乱的那位没有名气的上校在阿卡普尔科被一名退休的上校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所取代，科蒙福特是一个富商和地主，并且是不断发

生叛乱的南部权贵将(cceauq)瓦的·尔朋斯阿安胡雷军友。

阿尔瓦雷斯继承了格雷罗对"炎热之乡"的控制，而格雷罗本人是继承了莫雷洛斯的威信。他们都曾在独立战争中一起战斗。阿尔瓦雷斯本人是个大庄园主，他的权力基础是印第安人自耕农民的支持，他保护这些印第安农民的土地。他的军队是从印第安人招来的，印第安人的支持使他得以在太平洋沿岸掌权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最后，他控制的地区从墨西哥州分离出来，成为新的格雷罗州。他没有更大的野心，只要中央政府——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的——不干涉他的领地，他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好的。当然，圣安纳任命阿拉曼担任内阁职务，曾使阿尔瓦雷斯感到不愉快，因为人们广泛认为阿拉曼是处决格雷罗的主谋，但是当这位能干的保守派部长在被任命后不久去世后，圣安纳和阿尔瓦雷斯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后来这位上了年纪的独裁者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不再信任阿尔瓦雷斯，或者也许他只是希望推行他的中央集权化计划。不管属于何种情况，他解除了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军官和政府官员的职务，因此他们就聚集在阿尔瓦雷斯周围。这场革命就是在阿尔瓦雷斯的大庄园里策划的。战略是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圣安纳，因此纲领只限于一般原则。表明这场革命可能是自由派性质的唯一迹象是它有温和的自由派科蒙福特参加。阿尔瓦雷斯担任领导，但是正如过去格雷罗一样，不清楚他对国家基本问题的见解是什么。起义不可抗拒地扩大，1855年8月，圣安纳放弃总统职位，乘船流亡国外。革命政府没收了他的一度曾值100万比索的巨额财产①。他不久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政府不准他重新进入墨西哥，一直到1874年，当时的总统塞瓦斯蒂安·莱尔多才允许他回到墨西哥城，两年后他死在那里。

453

① 罗伯特·A.波塔什著《圣安纳的遗嘱》，载《墨西哥历史》，13/3(1964)，第428—440页。

由于首都是在阿尔瓦雷斯的印第安士兵手里，因此出现下述情况不足为奇：阿尔瓦雷斯被代表们选举为总统，这些代表是他从起义领导人和从监狱和逃亡生活中回来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中选出来的。布拉沃前不久去世，剩下阿尔瓦雷斯成为独立战争的硕果仅存的英雄，因此他的当选象征着伊达尔戈、莫雷洛斯和格雷罗的革命传统。然而阿尔瓦雷斯并不谋求当总统，他已经65岁，并且他在首都并不感到像在家里那样舒服。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对待他和他的印第安人的态度肯定也使他愤恨。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担心种族和阶级战争再起。也许是出于本能，他们回想起在莫雷洛斯叛乱中的民主潜流以及格雷罗同激进的萨瓦拉的联系。阿尔瓦雷斯现在有机会惩罚统治集团并为格雷罗被处死一事报仇，但是他的目标可能只限于通过扩大格雷罗州和使这个州的边界更靠近首都的办法来加强他对南部的控制。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理睬科蒙福特的劝告，但是有一个例外，他任命了一些激进的自由派即人们所说的极端派(puros)担任内阁职务。阿尔瓦雷斯把国防部留给科蒙福特本人，科蒙福特是温和派，可以指望他把军队团结起来；他把外交部委托给梅尔乔·奥坎波，并任命贝尼托·华雷斯担任司法部长，吉列尔莫·普列托担任财政部长，米格尔·莱尔多·德·特哈达担任发展部长，庞西亚诺·阿里亚加担任内政部长。

这五位部长属于新的一代，没有被前几届自由派政府的失败所沾污。除一人以外他们都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诞生，他们只知道一个永远处于混乱状态的独立的墨西哥。他们梦想有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政权，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自成体系的思想家或理论家。这也许并不是一个严重弱点，因为莫拉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拟订了自由派的纲领。除了莱尔多以外，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受过圣安纳的迫害。

上面已经谈过奥坎波和莱尔多的情况。奥坎波作为米却肯州长和普通公民曾因攻击高昂的教区费而出名。教区费是使大庄园

上的债役雇农负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都高，所以大庄园上的劳动者把大量的钱花在洗礼和葬礼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大庄园主支付实际费用，然后和他们的债役雇农算帐。婚礼费也很高，以致许多男女不结婚。奥坎波由于触及到了问题的根子，不可避免地招致数以千计的教区神甫的仇恨，这些教区神甫的生计就依靠这些费用。他们同高级教士、主教和大教堂教士不同，后面这些人的生活主要靠什一税收入（自从1833年以来什一税一直是自愿交纳）。圣安纳最后一次担任总统后不久奥坎波就被驱逐出墨西哥，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自由派流亡者云集的新奥尔良，奥坎波和瓦哈卡州前州长贝尼托·华雷斯交上了朋友，华雷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印第安人，他由于在墨美战争中反对圣安纳而被放逐。在奥坎波影响下，华雷斯成了激进自由派。

1855年11月，司法部长华雷斯制订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把教会法庭的司法权限制在处理教会案件，从而废除了教士的豁免权。它还建议剥夺军队的某些特权。阿尔瓦雷斯也许认为他已经做了足够的事情来造成不可逆转的改革，或者也许是在所谓的“华雷斯法”激起的抗议风暴的迫使下，在12月初任命科蒙福特担任代总统，本人则在几天以后辞职。虽然他担任总统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个月——但这段时间对国家的前途具有决定意义。

科蒙福特任命了一个由温和的自由派组成的内阁，但为时已晚。在国家的若干地区，一批一批的世俗信徒、军官和神甫高呼“宗教和豁免权”的口号制造动乱。一个武装集团要求废除华雷斯法，解除科蒙福特的职务，恢复1843年的保守派宪法。1856年 455
1月，这个集团占领普埃布拉城并在那里建立政府。科蒙福特虽然是温和派，但他不得不镇压暴动，3月底他迫使普埃布拉投降。当地的拉瓦斯蒂达主教竭力使自己不同叛乱份子有牵连，但是科蒙福特把责任加在教会身上，并且下令扣押主教管区内的教会财产，直到镇压暴动的费用得到弥补为止。拉瓦斯蒂达认为教会不

应对叛乱负责，拒绝支付赔偿费，结果政府把他驱逐并没收教会财产。教会财产正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用来资助反政府叛乱，而回答似乎就是没收。但是，鉴于普埃布拉没收法令所引起的强烈反应，采取另一种间接的、看来不是那么反教权的态度似乎较为慎妥。这大概就是现在担任财政部长的莱尔多·德·特哈达在1856年6月底颁布撤销限定继承权法的背景。

前面已经说过，莱尔多·德·特哈达是一个激进自由派，他曾参加首都的市政委员会与美国占领军“合作”，后来又在发展部和反动的圣安纳“合作”。他对墨西哥进行一场自由派革命的能力一直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这场革命必须从上面或从国外强加给墨西哥。但是最后，在1856年，他得到机会来执行一个激进的反教权主义的纲领。所谓的“莱尔多法”的主要特点是，教会必须把它在城乡的所有不动产打折扣(这种折扣须对买主有吸引力)卖给各自的佃农和承租人。如果买主拒绝购买，则由政府官员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受这条法律影响最大的教会团体是各个修道会。修道院在农村拥有大量地产，在城市拥有房产，女修道院在城市拥有最好的不动产。高级教士不会受很大损失，因为他们的财富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教区神甫不会直接受到影响，因为除了教区房屋本身以外，教区一般不拥有任何财产①。然而在乡村，有专门致力于宗教目的的兄弟会和联谊会，其中有许多拥有土地或财产，现在要撤销限定继承权，这使得村民和神甫都很伤心。乍看起来，这条法律并不是没收性质的，因为买主要向教会付款，可以是分期付清相当于原来租金的数额，也可以是一次付清相当于估算的租金的数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漏洞。根据法律，教会在将来不再能得到或拥有财产。因此教会将没有任何保障从而将面临逐渐遭受剥夺的局面。所以教会当局提出抗议并且拒绝照办。

456

作为私有财产的信徒，自由派还谋求清理民间团体的财产。

---

① 教区神甫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是不受这项法律的影响。

这特别影响到印第安人村庄，其中大多数仍然是大土地持有者。这些村庄占有各种各类的财产，包括村社牧场(即公地ejidos)，它们是免于撤销限定继承权的，因为莱尔多认为它们对村庄来说是必要的。尽管如此，在实际执行中，一部分公地开始被卖，尽管自耕农民提出抗议。

莱尔多法立即付诸实施。由于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出售财产，因而由政府官员给以前的承租人或佃户（现在的房主或地主)签署出售契约。许多虔诚的佃户不要求得到财产，于是财产就被富有的投机者买去，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出名的金融家，专门从事向政府贷款的买卖，因而成了政府债券的重要持有者。他们以前可能同保守派政权有关系，但是对撤销限定继承权的教士财产的投资有助于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同盟者。忠于教会的租户不理睬新的房东，继续把租金交给原来的房主教会，等待把房子归还给教会的那一天到来。法律实施几个月后，因撤销财产的限定继承权而出现的混乱复杂的情况变得更明显，显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当莱尔多处理教会财产时，他的同事、新任司法部长何塞、马里亚·伊格莱西亚斯正在制订一项限制教区费的法律。概括地说，1857年4月11日颁布的“伊格莱西亚斯法”宣布在殖民地时期或在墨西哥独立初期所征收的费用有效，这种费用显然很低。但是它禁止向那些被定为只能挣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收入的穷人征收教区费。由于大多数教区居民都很穷，这意味着不再有富裕的教区神甫。法律规定对那些给穷人服务而收钱，或拒绝免费给穷人施洗礼和主持婚葬礼仪的神甫加以严厉的惩罚。教会再一次谴责这个法律非法和不道德，并且拒绝照办。

457

与此同时，国会中大约150名代表正在辩论新宪法，这些代表大多数是来自专业阶级——律师、政府官员或新闻记者——的年轻的自由派。老一代的代表中有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他是1850年莫拉在巴黎逝世后墨西哥自由主义的元老，现已75岁。

1856年出现的问题和奥坎波在1842年迂到的问题不同，和戈麦斯·法里亚斯在1833年迂到的问题更不同。跟美国进行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大多数自由派的思想上留下了印记。例如，1848年，奥坎波把各个州和中央联邦政府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贯的无政府状态①”。他得出结论说，自从通过1824年宪法以来就在墨西哥存在的联邦制，方便了得克萨斯的分离和尤卡坦的暂时脱离，后来又造成国家的失败和肢解。他肯定是回想起了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尔的意见，即墨西哥在它独立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许中央集权制的确是正确道路，虽然不能让军队和教会进行控制。现在既然政府是自由派政府，那么加强它是明智的，特别考虑到现在距离美国边界很近，墨西哥中部对北部各州的控制能力削弱，将来国家有可能进一步被肢解。由此看来，自由派变得和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一样拥护中央集权制了，尽管他们在口头上继续提倡联邦制，而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自由主义和联邦制是一回事。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之后，1857年2月5日通过的新宪法保持了联邦结构，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824年宪法的正式名称是“墨西哥各州联盟联邦宪法，而新宪法的名称是“墨西哥共和国政治宪法”。

现在既然联邦制问题已失去它的意义，教会问题就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主要争论问题。1856年，自由派希望使各种宗教都享有充份的信仰自由，换句话说，就是容忍异教。这大大背离了1842年的宪法特点，更背离了1824年宪法。这个建议是太先进了。墨西哥居民大部分是忠于他们的教会的农民，尽管受过教育的阶级可能像他们欧州的同行一样开明，但是他们不能和已被他们的神甫煽动起来的广大村民对抗。内政部长警告国会说，“印第安人已经非常激动，因此，如果再加进一种新的因素，那是非常

458

① 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墨西哥政权剖析(1848—1853)》(墨西哥，1977)，第378页。

危险的，敌视进步的人一定会加以夸大，以便把我们淹死在真正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之中①”。结果放弃了这项建议，但同时也删掉了关于墨西哥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这一传统说法，从而在宪法中留下一个奇怪的缺口。代表们不敢碰“天主教的墨西哥”这个对普通人民来说是神圣的形象，可是在宪法中包括了所有其他反教权的要求，特别是“华雷斯法”（1855年）和“莱尔多法”（1856年）的基本概念。

自由派是反军人集团的，正如他们是反教权主义的一样。然而他们认识到，在这方面必须谨慎行事，因为总统兼军队总司令科蒙福特将军已经表现出对国会不耐烦的迹象。因此自由派代表只限于废除军队的司法特权，从而肯定了华雷斯法已规定的东西。

最后，新宪法肯定了全体公民的完全自由。自从1814年制订阿帕钦甘宪法以来，这是第一次每一个墨西哥人，不管他多穷——但是游民和罪犯除外——都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对人权宣言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由于宪法禁止社团拥有不动产，它比莱尔多法更彻底。莱尔多法把村庄公地即村社牧场免除在外，但是这个宪法没有提到它们，其含意是可以撤销它们的限定继承权。事实上已经试图根据新宪法撤销它们的限定继承权，但是由于印第安人反对，不得不暂停实施。自由派经不起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教会又反对印第安农民。就教会而论，自由派谋求通过在社会各阶层中获得同盟者的办法来孤立它。他们在一些城市中心这样做获得成功，在这些地方，中产阶级和一些上层阶级由于撤销社团财产的限定继承权而得到好处。在教会势力历来强大的农村地区，他们就无法孤立它，但是他们通过让大地主购买以前教会的大庄园的办法，的确在迄今为 459

① 弗朗西斯科·萨尔科著《制宪会议史（1856—1857）》（第2版，墨西哥，1954），第630页。

止顽固保守的农村打进了一个楔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倾向于支持自由派的是农村中的财主，而不是农村中的穷人。

大多数自由派认为，1857年宪法得到通过是实现了他们终身的梦想。他们现在可以在一些方面采取比较和解的态度了。例如，公众舆论的微妙变化使政府重新开放了首都的圣方济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曾被关闭几个月，因为据说有人在它的围墙内进行密谋活动。而且随着莱尔多在年初辞职，撤销财产限定继承权的作法放慢了。政府准备进行谈判，1857年5月1日，科蒙福特派他的司法部长去罗马。教廷似乎准备接受迄今已经进行的撤销财产限定继承权的交易，但它要求恢复教会获得和拥有财产的合法权利。甚至保守的墨西哥报纸也在8月份建议通过和罗马达成协议使撤销财产限定继承权的作法合法化。

看来很明显，要想同教会和保守派达成妥协，需要废除宪法中比较极端的条款。据信科蒙福特(9月份根据宪法选出的总统，只得到激进派勉勉强强的支持，激进派宁愿选莱尔多）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是避免内战的唯一道路。但是妥协未能占上风。自由派认为科蒙福特是保守派，而保守派认为他是自由派，因而他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被搁在一旁。在随后发生的内战中，保守派主动出击。在首都由费利克斯·苏洛阿加将军率领的反动部队在1857年12月叛变，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废除宪法。军队一面支持科蒙福特的权威，一面控制了这座城市，解散国会并且逮捕了——除其他人外——最高法院的新院长贝尼托·华雷斯。经过一些犹豫之后，科蒙福特表示赞成苏洛阿加的纲领。一个月后，苏洛阿加采取第二步行动：他解除了科蒙福特的职务，自己担任总统。也许是出自对忘恩负义的保守派的报复心理，科蒙福特在他掌权的最后时刻设法把华雷斯从监狱中释放，然后在保守派不加干扰、自由派不予理睬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国家。然而，他释放华雷斯的决定给自由派事业帮了大忙，未来的事态发展将表明这一点。

华雷斯逃到克雷塔罗，从那里前往瓜纳华托。他争辩说，宪法秩序已遭破坏。他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总统并且任命了以奥坎波为最著名成员的内阁。作为最高法院首脑——1857年宪法未设置副总统职位——在没有合法选出的总统的情况下，他根据宪法有权继任总统。他到达瓜纳华托后不久，一个居民写信给墨西哥城的朋友说，“一个名叫华雷斯的印第安人到了这座城市，自称是共和国总统①”。

这样，在墨西哥城有一位保守派总统，在瓜纳华托有一位自由派总统，“三年战争”开始了。在前几十年中，当自由派面临反革命局面时，他们几乎不加抵抗就屈服于军队。现在，他们仍然没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队，但是他们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有群众支持，这就有可能逐渐创建一支由以前的自由派律师和记者担任军官的新军队。相形之下，阿拉曼死后，保守派中奇怪地缺乏受过教育的文职人员。事态发展将表明，正规军和教会靠自身力量不足以抵抗自由派运动。圣安纳的反革命政变曾经轻易取得胜利，而这一次就不是这样了。

苏洛阿加发动第二次政变后，一些州长承认他是总统，另外一些州长宣布反对，还有些人完全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华雷斯设法逃到韦拉克鲁斯，韦拉克鲁斯州长请他到这个港口建立政府。整个国家不久分裂为力量大致相等的两部份。沿墨西哥湾各州在自由派控制之下，但不包括精疲力尽的尤卡坦州，它保持中立。远一点的北部各州也属自由派。国家的中心地区属保守派，但米却肯州和萨卡特卡斯州除外。

从一开始，两派都得想办法搞钱来支持他们的战争行动。苏洛阿加履行对教会的诺言，宣布莱尔多法无效，教会将重新拥有它的已被撤销限定继承权的财产。作为交换条件，大主教教区的

① 拉尔夫·罗德著《华雷斯和他的墨西哥》（两卷集，纽约，1947），第1卷，第161页。

教士会被迫答应借给他150万比索，但是教会团体没有现金，这笔461 钱的9/10是以教会财产作担保的票据。保守派政府把这些票据打折扣卖给金融家。后来教会无力赎回票据，金融家获得了教会的不动产。打折扣是必要的，因为自由派政府已经宣布保守派政权的一切行动和交易都是非法的。因此票据价格按风险程度降低。随后又接受了其他类似的贷款，其中包括罗思奇尔德商行同意给的一笔贷款。用这种办法，放债者在牺牲教会的情况下资助了苏洛阿加，而教会被迫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到处丧失。像米却肯和北部这样一些比较闭塞地区的自由派州长和军事司令官争辩说，教会是自愿资助苏洛阿加的，于是下令向教士强迫借款，实际上等于是没收教会财产。韦拉克鲁斯的情况很不相同。1858年5月华雷斯到达后不久，运给一名法国上尉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的一船步枪到达这个港口。当然，立宪政府迅速征用了这批武器。由于它无法用海湾各州剩下的数目有限的教会财产来付钱，手头又没有可供使用的现金，它就用墨西哥城的教会不动产来支付。首都掌握在苏洛阿加手里，自由派政权能够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答应在一旦自由派获胜时就移交这批财产。购买这批武器的财产价格也是按照这笔贷款的风险程度来定的，因此利曼图尔和其他外国进口商以极低的作价获得了墨西哥城的这笔财产。

华雷斯在1859年二、三月间面临严重的局势，当时保守派新总统和军事司令官米格尔·米拉蒙企图占领韦拉克鲁斯。这次尝试失败了。但是几乎在同时，墨西哥西部的自由派司令官桑托斯·德戈利亚多企图占领墨西哥城也未成功。德戈利亚多战败后，十多名自由派军官(包括7名军医)被俘并在首都郊区被处决。冲突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几乎全国都成了战场。看不到战争何时结束。国家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

自由派在国家面前提出他们的目标的时刻已经到来。韦拉克鲁斯的立宪政府于1859年7月7日发表一项宣言，由华雷斯总统和两名最著名的内阁成员奥坎波和莱尔多签署。它把战争的一切

责任归罪于教会，并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没收教会一切财富（不论是不动产还是资本）；自愿交纳教区费；教会与国家彻底分离；查禁一切修道院并且废除女修道院的见习制度。没有宣布信仰完全自由。宣言还承认有必要把地产分割成小块，但是它又说，这样的重新分配将在将来进行，作为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然结果。当前，它只答应制定一项法律，消除自愿分割农村地产所遇到的法律障碍。 462

随后4个星期中发表了实行这些改革的具体法律。被没收的“国有化”财产——不管是不动产还是抵押品——将出售给根据莱尔多法购买教会财产的人。莱尔多作为韦拉克鲁斯政府的财政部长起草了没收法，他坚持必须在早先的撤销限定继承权和当前的国有化之间保持连续性。在保守派占领地区，有些买主已把财产归还给教会，这些买主在自由派获胜后可以收回这些财产，届时可以用较长期分期付款方式或者以很低的作价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政府缴款。这一措施势必把以前的和今后的买主都吸引到自由派方面来，特别是在保守派占领的、最值钱的教会财产集中的墨西哥中部地区。在自由派控制地区，大部分教会财产早已处理，像韦拉克鲁斯这样一些州，教会一直很穷，因此自由派政府从出售被没收的财产中立即得到的只有少量收入。

但是覆水已经难收。这是教会和旧军队对中产阶级专业人员、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859年7月的革命的“改革”法把政治热情激发到最高程度，战斗加剧了，财政部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在拚死挣扎中，立宪政府同意给予美国穿越特万特佩克地峡和从格兰德河和亚利桑那州到加利福尼亚湾的过境权和通行权，以及使用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护穿过这些地区的人员和财产的权利，以换取200万美元。这一所谓的麦克莱恩——奥坎波条约是由梅尔乔·奥坎波——他肯定不是美国的朋友——谈判达成，并于1859年12月14日签字。一家自由派报纸评论道：“难道华雷斯先生不知道，自由派宁愿再次在军队和教会的双

重专制面前倒下，也不愿让自己套上外国的枷锁①？”我们不知道自由派政府对它建议签订的条约是具有诚意的呢还是为了争取时间。不管是哪种情况，几个月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这样就使自由派摆脱了极端贫困使他们陷人的那种尴尬处境。事实上，这200万美元已不需要。宣传战正在结出果实，在米拉蒙于1860年春天第二次试图占领韦拉克鲁斯遭到失败后，保守派军队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开始退往首都，米拉蒙设法在那里筹款。他现在正在大主教的允许下做自由派违背教会意志所曾做过的事情。8月份他从教会手中没收银制工艺品来铸造钱币，还没收黄金和其他珠宝，把它们典当给放债的人。然后在11月，在既无贷款又无资金的情况下，他没收了委托英国公使馆交给英国债券持有人的66万比索，这是英国债券持有人自从1854年以来第一次收到应当付给他们的一部分利息。但为时已晚，自由派军队开始包围首都。

1860年12月，胜利已成定局，韦拉克鲁斯的自由派政府终于下令实行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它不再关心神甫领导的印第安人可能有什么想法。自由派已在战争中获胜。12月22日，自由派司令官赫苏斯·冈萨雷斯·奥尔特加（以前是萨卡特卡斯的一名记者）在争夺墨西哥城的战斗中打败米拉蒙，在3天以后的圣诞节占领了这座城市。3个星期之后，华雷斯总统从韦拉克鲁斯来到墨西哥城。自由派拿下了城市，保守派军队转入农村打游击，这时墨西哥可以自由地进行竞选运动了，几乎随着总统和他的内阁的到达，就开始了竞选总统的运动。

在自由派领导人中，有4个人可能当总统：梅尔乔·奥坎波、米格尔·莱尔多、贝尼托·华雷斯和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奥坎波不谋求总统职位。他被认为是莫拉的继承人，满足于作自

① 沃尔特·V.斯科尔斯著《1855—1872年华雷斯政权时期的墨西哥政治》（第2版，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69），第36页。

由主义的先知，因此他帮助他的门徒华雷斯反对莱尔多，他意识到莱尔多是一个对手。华雷斯可能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尽管他是总统，许多人认为他同奥坎波和莱尔多比较起来仅仅是个二流人物。他沉默寡言，不装腔作势，后来人们说他"不是一个能提出纲领、改革或想法并给它们推动力的领导人。这个任务反而交给了他周围的人，而他对他们的领导或表示默许或予以拒绝①"。莱尔多作为涉及教会财产的法律的制订人，具有威信和权威，他受到激进自由派的欢迎。冈萨雷斯·奥尔特加是一位民族英雄，打败过保守派军队。这三个人——华雷斯、莱尔多和冈萨雷斯·奥尔特加是最高职位的候选人。

464

1861年1月底，看来有6个州赞成华雷斯，6个州赞成莱尔多，5个州赞成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其余7个州没有消息。莱尔多在首都和两个州获胜，不料在3月22日去世。旷日持久的间接选举制度使选举不得不继续在剩下的两个候选人——华雷斯对冈萨雷斯·奥尔特加——之间进行。据最后统计，华雷斯得到57%的选票，莱尔多得到22%的选票，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得到20%稍多一些的选票。看来，在莱尔多死后选举仍在进行的那些地区，支持他的人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华雷斯。一个明显的解释是自由派不信任军人。最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都是文职人员：萨瓦拉、莫拉、戈麦斯·法里亚斯、奥坎波、莱尔多、奥特罗和德·拉·罗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当过总统。天生保守的军队不愿意同他们分享权力。除了德·拉·培尼亚当过过渡性总统以外，在华雷斯之前从未有过一个文职的国家首脑。尽管冈萨雷斯·奥尔特加是一个很好的自由派，但他是一个将军，因此不可信任。

1861年6月，国会宣布华雷斯担任墨西哥总统。他将单独承担这个职务的全部负担，因为奥坎波不久前被保守派游击队俘虏并处死。他比他的对手莱尔多只多活了两个多月。华雷斯也从未

① 小弗兰克·艾夫里尔·纳普著《塞瓦斯蒂安·德·特哈达的生平（1823—1889）》（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51），第157页。

摆脱军队的阴影，尽管军队是一支自由派的革命力量。当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在战场跟保守派作战时，他被国会选举为最高法院院长（这是不符合宪法的，因为应当直接选举），当总统只差一步了。反华雷斯派认为，由于共和国总统大都是软弱的文官，因此应当作一些规定以防万一发生紧急事件。应当赞扬冈萨雷斯·奥尔特加的是，必须说，他并不打算进行军事接管。

华雷斯面临着严重的难题。出售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价值大约1.5亿比索，约占全部国家财产的1/5）的工作已于1861年1月开始。为了吸引墨西哥买主（作为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反对没收），也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自由派政府一直在接受各种票据、信贷、期票和贬值的国内债券作为购买教会财产的付款或者至少是部分付款。结果，1861年出售了联邦区被没收的、价值1,600万比索（这是已贬值的价值）的财产，政府实际上只收到100万比索的现金。此外，韦拉克鲁斯的金融家，像利曼图尔等人，已经用实物或现金为他们买的财产付了款。最后，政府承认有势力的罗思奇尔德商行在保守派执政时期购买的教会财产有效。有些财产的作价只有它们的价值的一小部分，有许多财产已经预先付款。这一切说明从1861年的没收中所得到的收入是极少的。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原来期望共和国政府出售没收的财产后能付给他们一些利息欠款，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同样，法国也竭力对保守派政府发行的、最近由法国有影响的政治家购买的杰克债券（Jecker bonds）提出它的权利要求。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要求，要求赔偿外国国民在内战期间据说是遭受到的或确实遭受到的损失。然而华雷斯拒绝为保守派政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他干脆就是没钱。他的政府被迫于7月暂停一切付款。欧洲债权人感到受了骗，逼迫他们的政府索取赔偿。1861年10月31日，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伦敦签订了一个“三方公约”，同意对墨西哥进行军事干涉。此后不久，它们的军队在韦拉克鲁斯登陆。然而，事情不久变得很明显，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墨西哥别有用心。

465

因此英国和西班牙撤回了它们的军队，把事情留给法国人一家去干。

这些事态发展为住在欧洲的、主张君主制的墨西哥人——像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提供了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机会。如果法国占领了墨西哥，他们终身的梦想就可能实现，即建立一个在欧洲国家——这一次是法国——保护下的墨西哥帝国。他们为这个君主国找到的合适人选是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

466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正在墨西哥取得进展。这次入侵不仅在自由派中而且在全国都激起了真正的爱国热情。这时还不知道法国是打算帮助保守派来反对自由派，还是企图征服这个国家。两位前保守派总统苏洛阿加和米拉蒙犹疑不决。作为将军和前总统，他们对建立由一名外国亲王当皇帝的帝国不热心。此外，他们不信任法国并且都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独立事业。米拉蒙最后把兵权交给了华雷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像1858年至1860年那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而是维护墨西哥独立还是让它被一个外国征服的问题。当然，大多数保守派由于仇恨华雷斯，的确把法国人看作使他们摆脱自由派枷锁的解放者，但是也有些保守派设法参加了正在和入侵者作战的军队。例如，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未来1880—1884年的墨西哥总统)在1858至1860年是保守派军队中的一名军官，现在自愿要同法国人作战。他被接受了。科蒙福特也被华雷斯接受，1863年他死在战场上。

1862年5月，法国军队在普埃布拉战役中被萨拉戈萨将军暂时击退。它进行了改组，并在福雷伊元帅率领下发动更强有力的攻势。萨拉戈萨身亡，华雷斯不得不任命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华雷斯一直未让他担任军职)指挥东部各军。1863年5月他在普埃布拉被包围两个月后投降。法国人毫无阻挡地占领首都并把他们的统治扩大到其余地区。华雷斯为了继续在北部作战，5月31日离开墨西哥城，10天以后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建立政府。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在被法国人押往韦拉克鲁斯途中设法逃跑，和华雷斯汇

合。

首都的保守派，特别是前普埃布拉主教、现在的墨西哥大主教拉瓦斯蒂达期望法国人做苏洛阿加在1858年所做的事，那就是废除所有的没收法并把收归国有的财产交还给教会。然而，拿破仑却决定采用自由派的纲领，并且，使教会上层人物感到沮丧的是，福雷伊元帅承认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并予以出售的做法有效。马克西米利安（他的自由派背景是众所周知的）1864年 4 月10日在里雅斯特附近的米拉马尔宫接受墨西哥皇位时，保证举行法国关于教会和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的政策。他 6 月份抵达墨西哥城时，发现华雷斯的共和国政府仍控制着墨西哥北部，共和国游击队正在同占领军作战。他试图使华雷斯站在他一边，说服他顺从他的帝国，但是当然他失败了。尽管如此，他的确成功地把留在法国占领下的首都的一些自由派争取了过来。他拒绝保守派的支持并把他们最著名的领导人米拉蒙将军送往国外。这样，他就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是自由派的内阁，其中有两人是参加1856年至1857年制宪大会的代表：佩德罗・埃斯库德罗-埃查诺韦和何塞・M・科尔特斯-埃斯帕萨。埃斯库德罗当了司法和教会事务部长，科尔特斯当了内政部长。外交部、发展部和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也在自由派手中。财政部由法国人直接掌管。

马克西米利安走得那么远，甚至拟订了一个自由主义宪法，称为“墨西哥帝国临时法规”，在他接受墨西哥皇位一周年的时候签署。宪法宣布墨西哥采取“温和的世袭君主制政体，由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亲王登极”，同时还宣布信仰自由是人权的一项内容。作为这些权利中的首要权利，“皇帝的政府”保证“帝国全体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①，而1857年宪法只是含蓄地提到这个权利。宪法还规定了劳动自由。自由派政权从来没有颁布过明确禁止劳役偿债制的法律，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在1865年11月 1 日这样做了。

① 拉米雷斯著《墨西哥根本法》，第670—680页。

劳动者有权随意离开他们的雇佣场所，不管他们是否欠他们雇主的债；取消10比索以上的一切债务；限制工作时间和使用童工；禁止对劳工实行体罚；为了允许同大庄园的商店竞争，允许小贩进入大庄园向债役雇农兜售货物。最后，马克西米利安采取了一个背离1857年宪法的行动，即恢复印第安人村庄拥有财产的权利并且把村社土地给予那些没有村社土地的村庄。

马克西米利安可能正在谋求占国家绝大多数的墨西哥穷人的支持，因为迄今为止他的权威完全靠外国占领军的力量。但是在大多数墨西哥人看来，这一点比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信念问题更重要。1858至1860年，斗争是在墨西哥自由派和墨西哥保守派之间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墨西哥与法国之间、墨西哥共和国与一个外国君主国之间的问题。华雷斯的自由派政府代表墨西哥，而帝国被看作是一个外国的工具。 468

征服和建立帝国的行动差不多取得了成功。在1865年最后几个月，向前推进的法国军队把华雷斯赶到了帕索德尔诺特，这是格兰德河上美国边界那边的一个小镇。同时，华雷斯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他的4年总统任期将在1865年12月1日期满，在法国占领大部分国土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选举。华雷斯依靠国会以前授予他的非常权力，把自己的任职期限延长到有可能再次举行新的选举时为止。这一行动无疑是不符合宪法的，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将军——他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也不符合宪法——要求担任共和国总统。看来华雷斯、甚至共和国的寿命已屈指可数，但是这位将军既没有胆量又没有实力进行军事接管。华雷斯及时把他逮捕并监禁起来。华雷斯暂时渡过了危机。

1866年，拿破仑决定撤回他的军队，军事形势转而对帝国不利。法军开始离开，从而暴露了马克西米利安地位的弱点。两年来，他一直设法把自由派吸引到他的阵营中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成了帝国的高官，但是在法国远征军即将撤离的情况下，他必须有一支墨西哥军队来代替它。由于无法找到愿意打仗并且愿意在

必要时为他的帝国牺牲性命的自由派，他转向保守派。法国人离开后，将再一次变成一场墨西哥保守派同墨西哥自由派的战争。马克西米利安任命了一个保守派内阁并且欢迎最优秀的保守派司令官米拉蒙返回墨西哥。保守派和这位奥地利大公不知不觉地签订了一个死亡公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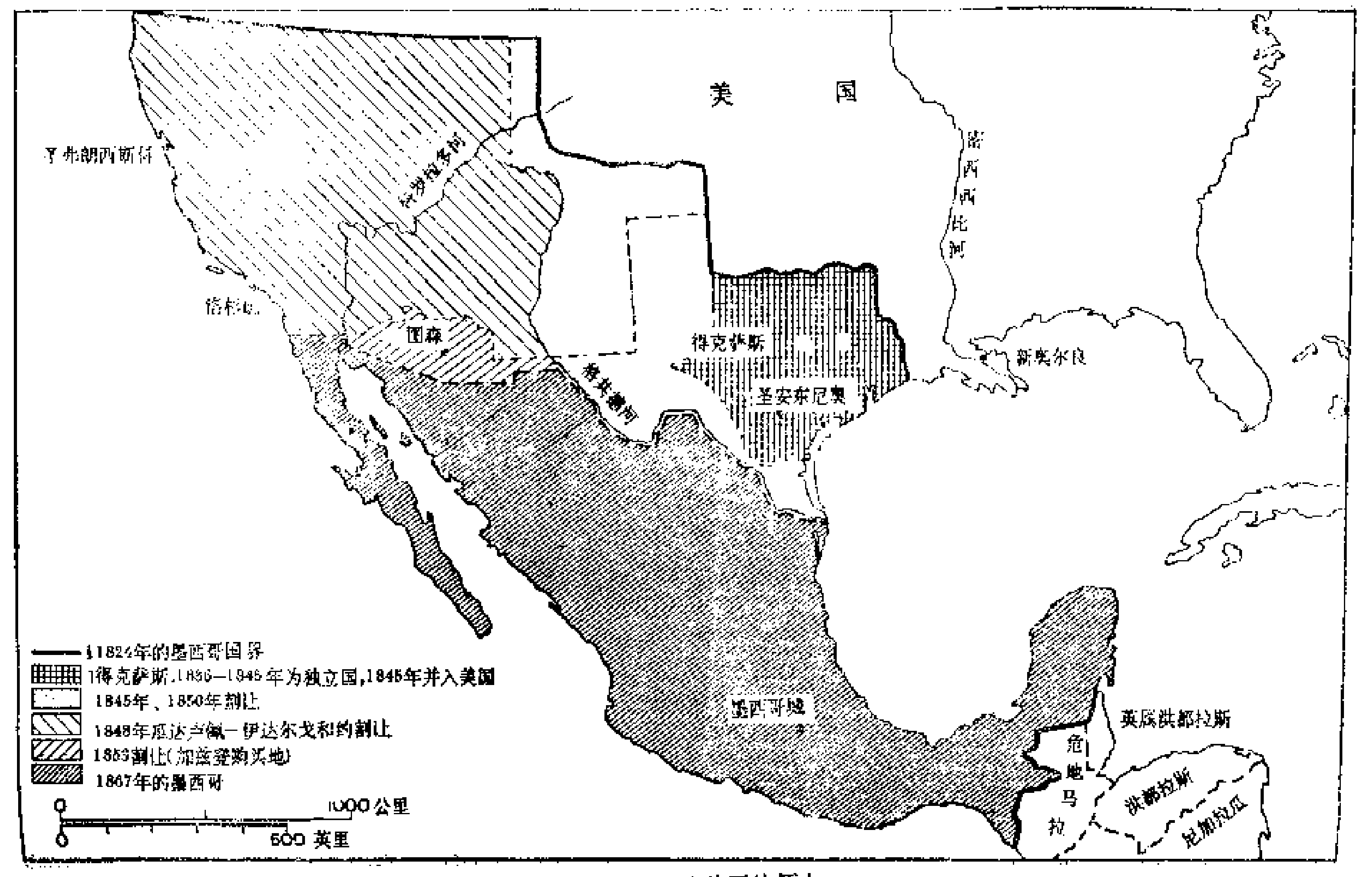
共和国军队包围了仍然控制墨西哥中部的摇摇欲坠的帝国。东部军队向普埃布拉前进，北部军队向克雷塔罗前进，马克西米利安决定在克雷塔罗作最后抵抗。他被打败，和米拉蒙将军以及梅希亚将军一起成为战俘，梅希亚将军是一名印第安人出身的保守派。不论是在1858—1860年内战期间还是在1862—1866年法国入侵期间，处决被俘虏的军人和文职人员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他们可以枪决奥坎波，为什么就该饶恕马克西米利安呢？他的皇家血液无关紧要。他必须遭到和伊图尔维德同样的下场。华雷斯打算警告全世界：企图征服墨西哥，不管出自何种目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因此，处决马克西米利安、米拉蒙和梅希亚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判处犯战争罪，于1867年6月19日被行刑队处死。在离开首都4年多以后，华雷斯总统于1867年7月15日回到他的首都。

回顾起来，第二个墨西哥帝国看来是一场充满错误的悲喜剧。保守派选错了人。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守的君主来支撑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某个只会在他们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人。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个走极端的、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亲王，他们也许会做得更好一些。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是企图把一种自由主义的欧洲君主制移植到一个由教会控制的拉丁美洲共和国身上，那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事业。他和米拉蒙发生争吵而没有把华雷斯争取过来。他的社会改革使他同统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发生冲突。他的改革来得太晚了，以致无法为他赢得穷人的人心。最后，他来到了一个并不需要他——特别是不能作为一支入侵军的礼物——的国家。总之，这位皇帝谋求把自由派和保守派，富人和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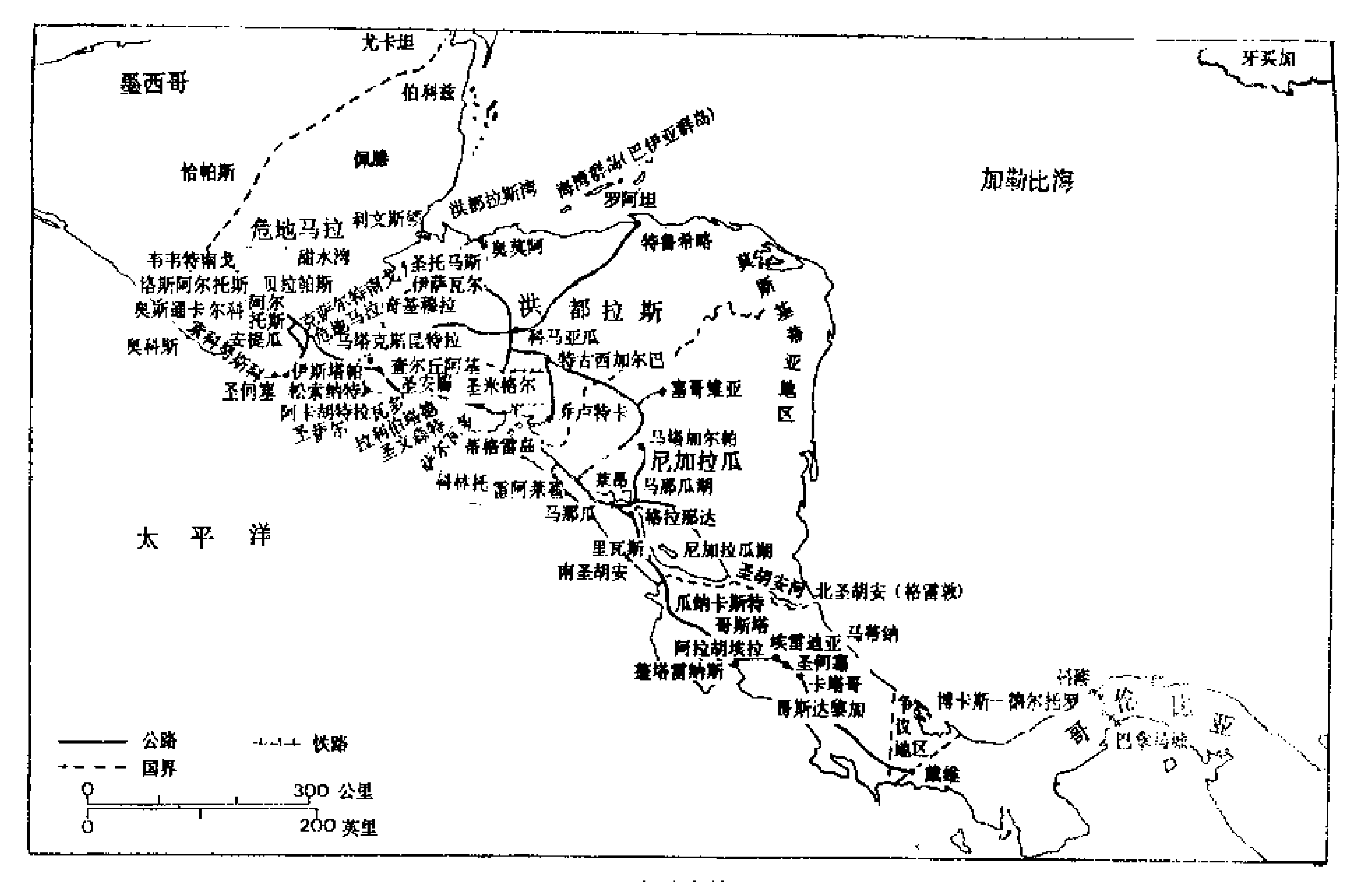
墨西哥人和欧洲人团结在一起，到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

然而在开始时，在1863至1864年，有些墨西哥人的确认为建立一个帝国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途径，是取代过去差不多50年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一个合理的、甚至是可取的办法。他们已对他们国家治理自己的能力丧失信心。只有一个具有皇家血液的欧洲人可能受到大家的尊敬、约束个人野心和公平地裁判他们的争端。这个帝国不是实现了1821年的伊瓜拉计划吗？伊瓜拉计划坚决认为只有一位欧洲亲王才能把国家团结起来。当然，结果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得太晚了。如果在独立之后它马上到来，它本来可能使这个新国家得到某种稳定。但是现在，墨西哥已经拥有一批能够进行统治的人，正如他们不久即将表明的那样。而正是这些人同帝国作战并且打败了它。

华雷斯在1867年恢复了自由派的共和国，它一直持续到1876年，这时，反法爱国战争中的英雄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推翻了文职总统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塞瓦斯蒂安·莱尔多是米格尔·莱尔多的弟弟，是华雷斯在1872年去世后的续承人。迪亚斯利用他的前任的政治机器的一些部件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机器，它帮助他掌权达35年。他给墨西哥带来了相当大的稳定，使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但是他对政治机构的绝对控制以及这个政权日益加剧的专制统治(大多数年轻的同代人都这样看)，最后使他在1911年墨西哥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倒台。 470



墨西哥割让给美国的领土


墨西哥
尤卡坦
伯利兹
牙买加
恰帕斯
佩滕
加勒比海
洪都拉斯湾
海湾群岛(巴伊亚群岛)
罗阿坦
危地马拉
利文斯顿
甜水湾
韦韦特南戈
洛斯阿尔托斯
贝拉帕斯
奥斯通卡尔科
阿尔
托斯
安提瓜
奥科斯
圣托马斯
伊萨瓦尔
奥莫阿
特鲁希略
奇基穆拉
洪
都拉斯
科马亚瓜
特古西加尔巴
马塔克斯昆特拉
伊斯塔帕
圣何塞
松索纳特
圣安娜
圣米格尔
阿卡胡特拉
圣萨尔
拉利伯塔德
圣文森特
乔卢特卡
蒂格雷岛
科林托
雷阿莱霍
塞哥维亚
马塔加尔帕
尼加拉瓜
马那瓜湖
莱昂
马那瓜
格拉那达
里瓦斯
尼加拉瓜湖
南圣胡安
圣胡安河
北圣胡安(格雷敦)
瓜纳卡斯特
哥斯塔
马蒂纳
阿拉胡埃拉
埃雷迪亚
圣何塞
卡塔哥
蓬塔雷纳斯
哥斯达黎加
博卡斯—德尔托罗
争议地区
蓬塔
哥伦比亚
巴拿马地峡
公路
铁路
国界
太平洋
0
300 公里
0
200 英里

1855 年的中美洲

第 11 章

自独立到1870年的中美洲

对于以前组成危地马拉领地的那些省——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①——来说，民族独立后的头半个世纪并不是愉快的时期。殖民地时代后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紧张状态导致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内战，中美洲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开始时所表现的很高期望不久就在现实的坚硬岩石上撞得粉碎。经济停滞、阶级对抗、政治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取代了西班牙时代比较平静和稳定的局面。到1870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繁荣、独立的地峡国家，而是出现了一批四分五裂、长期不和、自称为“共和国”的城邦。尽管如此，不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速度多么令人失望，但在从殖民主义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附属国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重要的和必要的步子。

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对于中美洲的独立往往简单几句一笔带过，认为中美洲独立只是墨西哥独立的自然结果。诚然，中美洲没有发生血腥的战争，而血腥战争是墨西哥和西班牙南美洲独立斗争的特点。拿破仑1808年侵入西班牙后，中美洲的克里奥尔人没有攫取对政府的控制。伊比利亚半岛在危地马拉城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21年。一批知名人士1821年9月15日集合在一起，表示接受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这一既成事实，独立就这样实现了。然而，在19世纪头20年，危地马拉领地经历了

① 恰帕斯是危地马拉领地的一个省，独立时和墨西哥合并。巴拿马是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一个省，后来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发现过重大的政治活动。1821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使中美洲联盟瓦解的那些问题与独立以前那几年发生的冲突直接有关。 472

特别是1810—1814年时期，人们目睹了中美洲政治斗争的开始，这些政治斗争后来持续了几十年。1811和1812年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以及1813年底在首都本身，出现过克里奥尔人的密谋和叛乱，但是危地马拉都督兼检审法院院长（1811至1818年）何塞·德·布斯塔曼特—格拉的强有力的政府一一挫败了这些运动。与此同时，加的斯议会及其1812年颁布的宪法为正在涌现的、开始对经济和社会状况表示不满的克里奥尔自由派提供了政治界限和内容。1812年宪法规定实行新闻出版自由，不仅市政委员会而且新成立的省级机构（省代表团）要由选举产生；还规定殖民地选派代表参加西班牙议会；指出了进一步向代议制政府和更民主的程序前进的道路；鼓励更自由的贸易并且使传统的特权和专卖制受到威胁。它为中美洲自由党以及它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内实行的大部分纲领奠定了政治基础。① 布斯塔曼特厌恶加的斯宪法，尽最大努力来阻止或推迟它的实施。最后，1814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复位，使布斯塔曼特实行独裁和镇压自由派变成了正当行为。但是，1818年接任的卡洛斯·乌鲁蒂亚—蒙托亚年老，体弱多病，先是放松了强暴统治，继而在1820年西班牙发生革命后同意恢复1812年宪法。

1812年宪法不仅鼓励和加强了中美洲自由派的政治论点，而且强调当地和省一级政府应在自己作出决定以及反对宗主国——西班牙、墨西哥或危地马拉——的传统统治方面发挥作用。中美洲地区的不满情绪和分离倾向的出现在各省都有文件可资证明，但是都没有萨尔瓦多那样明显。萨尔瓦多长期以来是危地马拉省

①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著《1808—1826年加的斯在中美洲的实验》（伯克利，1978）。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18世纪作为危地马拉领地主要出口产品靛蓝的主要产地而变得更加重要。1773年圣地亚哥德危地马拉遭到 474 破坏，并于1776年迁移到40公里以外的新址之后，圣萨尔瓦多变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城市，而且在独立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这个地位。1786年在圣萨尔瓦多建立监督官辖区政府，第一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行政自治，也可以认为这是朝着萨尔瓦多建国迈出的第一步。接着出现了要求教会自治的呼声，萨尔瓦多人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主教，脱离危地马拉的主教管区。加的斯提出的各项改革为萨尔瓦多的克里奥尔人提供了自治的机会，圣萨尔瓦多变成了自由派思想和行动的温床，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萨尔瓦多自由派对他们称之为危地马拉城的"贵族"、控制土地的保守家族(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商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不满情绪在从恰帕斯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各省的中心城市得到了响应。1812年宪法的恢复和1820年要求举行地方自治机关和省代表团选举的呼声在整个中美洲促使政治活动升级，1811至1814年的政治辩论再次复活。

在首都本身，对话是在自由派和温和派之间进行的，内容都在两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由脾气暴燥的佩德罗·莫利纳(他是医生、私生子)指导的《宪法编辑》报(它同主要家族没有密切关系，代表克里奥尔律师)现在第一次向传统体制和西班牙继续统治提出挑战。同他对立的是由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编辑的《祖国之友》报。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出生在洪都拉斯一个牧场主家庭，在首都受教育，后来留下来成为这个殖民地的主要知识份子之一，是在克里奥尔上层人士中受到广泛尊敬的著名律师。他在布斯塔曼特时代作为政府的一名忠仆提高了地位和声望，他和政府的关系使得他对独立问题持温和和谨慎态度。然而，以艾西内纳家族为首的主要克里奥尔家族支持莫利纳的煽动，因为他们现在对西班牙自由派重新掌权有可能威胁他们享有的威望和垄断地位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何塞·德尔·巴列得到

殖民政府、欧洲人、反对自由贸易的人和不那么富有的克里奥尔人的支持。1820年底举行的选举不是决定性的，尽管巴列本人在选举中获胜，当选为危地马拉城的市长。

475

1821年2月，伊图尔维德开始在墨西哥造反。他的伊瓜拉计划赞成建立独立君主国的消息向南传开。当时重新强调由当地自己作出决定，这条规定开始发生作用。每个城市的地方自治机关都自己决定应如何对墨西哥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在恰帕斯，科米坦、雷阿尔城和图斯特拉的地方自治机关分别于1821年8月28日、月3日和9月5日宣布支持这一计划，并宣布加入独立的墨西哥。在危地马拉，代理都督加维诺·盖恩萨于9月14日同意省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召开主要机构代表大会的要求。第二天举行大会，辩论非常激烈。克里奥尔和半岛的领导人在场内进行辩论，场外的群众则呼喊要求独立。最后，代表们，包括何塞·德尔·巴列领导的大多数温和派，投票赞成独立。实际上其他什么也没有改变。以盖恩萨为首的西班牙行政机构依然保留。政府和经济交给危地马拉贵族控制。克里奥尔上层人士现在已经摆脱西班牙自由派政权，不再需要同莫利纳以及当地更激进的自由派结盟，保守党诞生了。

原来考虑危地马拉城作出的赞成独立的决定适用于整个领地，但是当地参预的思想现在是如此强烈，以致随着消息向南传播，每一个市镇都分别投了票。所有的城市都同意脱离西班牙独立，但是它们对未来的态度却各不相同。在圣萨尔瓦多，在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神父的自由派领导下成立了洪达，9月29日，宣布萨尔瓦多独立，并且强迫那些赞成同危地马拉或墨西哥联合的人离开这座城市。萨尔瓦多其他城镇作出不同反应，因而发生了麻烦。在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接受危地马拉的领导，而科马亚瓜坚持脱离危地马拉和西班牙独立。同样，在尼加拉瓜，保守的格拉纳达保证支持危地马拉的中央政府，而莱昂宣布脱离西班牙和危地马拉独立，它显然愿意同墨西哥联合!距离遥远并且对

都督辖区的活动一般持超然态度的哥斯达黎加，于10月27日脱离西班牙，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态度则模棱两可，同时它建立了一个完全脱离尼加拉瓜政府的临时政府。但是，随着圣何塞 埃雷迪亚和阿拉胡埃拉同殖民地的权力所在地卡塔哥争取平等地位，这4个主要城市几乎马上开始争吵起来。由此可见，建国时期开始后，中美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卷入了地区性和地方性的分离活动的浪潮。

476 是否和墨西哥合并，是使人们明显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总的说来，整个中美洲的保守派都赞成合并，而自由派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共和国。保守派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政府机器和大多数其他的邦，他们成功地挫败了自由派抗拒合并的努力。11月底伊图尔维德派出一支墨西哥军队，促进了主张合并的人的事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发生了暴力事件，但是共和派只在萨尔瓦多占上风。到1821年12月底，已有115个地方自治机关宣布并入墨西哥帝国，（104个是无条件的，11个附有某些条件）。另外32个地方自治机关把这个问题留给临时政府决定，21个宣布只有国会全体会议才能决定这个问题。只有2个绝对反对联合，67个还没有表示意见。站在主张合并一边的还有拉蒙·卡绍斯大主教的强大势力，他只是勉强同意独立。1822年1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表明，合并是全国占压倒多数人的意志。几天之后，盖恩萨（他名义上仍是国家首脑）禁止并反对这一决定。临时洪达自行解散，并很快在盖恩萨监督下选出了参加墨西哥新国会的代表。

只有圣萨尔瓦多和格拉纳达断然拒绝合并，但是对这个问题在哥斯达黎加（那里还有同哥伦比亚联合的情绪）和洪都拉斯（在那里科马亚瓜和特古西加尔巴继续互相敌对）继续存在分歧。圣萨尔瓦多在德尔加多领导下开始用武力来保持它的地位。它的军队在曼努埃尔·何塞·德·阿尔塞指挥下，在松索纳特附近击败了盖恩萨的危地马拉军队，从而触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后来

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破坏了建立中美洲联盟的机会。新都督比森特·菲利索拉率600名墨西哥军队的到来证明是决定性的。菲利索拉于1822年6月22日就职并立即谋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圣萨尔瓦多参加谈判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到11月情况已经很清楚，这座城市不会和平地屈服于墨西哥统治。11月末，菲利索拉率领一支2,000人的部队侵入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疯狂地为摆脱困境寻找出路，包括宣布同美国合并。一切都失败之后，这座城市于1823年2月10日投降。然而，格拉纳达继续反对尼加拉瓜主张合并的人；在哥斯达黎加，从圣何塞和阿拉胡埃拉来的反墨西哥军队4月间在卡塔哥击败了亲帝国军队。

477

当然，伊图尔维德的帝国已经注定要失败。菲利索拉征服萨尔瓦多自由派的时候，墨西哥的自由派宣布了卡萨马塔计划反对帝国。皇帝退位的消息到来后，菲利索拉3月29日通知危地马拉省代表团，墨西哥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号召按照1821年9月15日计划召开中美洲代表大会，得到各省热烈响应。随后举行了选举，大会于1823年6月24日开始举行会议，它代表除恰帕斯以外的所有各邦(恰帕斯愿意继续和墨西哥呆在一起)。这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中美洲当局所召集过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它明显地比以前的政府更开明。许多保守派当时还在墨西哥，他们由于帝国政府垮台而名誉扫地。1823年7月1日，代表大会在萨尔瓦多的德尔加多神父主持下宣布中美洲自由和独立，取名“中美洲联邦”(Unidas del Centro América)。第二天，代表大会变成“全国立宪会议”着手起草共和国宪法。墨西哥承认联邦，菲利索拉和他的军队撤退。

经过将近两年的分裂与混乱(现在人们把这种分裂与混乱怪罪于西班牙、墨西哥和他们的“顺从的支持者”)之后，新的中美洲共和国现在怀着十分天真的团结愿望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开始活动。尽管政治事态发生了有利于自由派的突然转变，但是中美

洲的实际情况无助于取得1824年宪法的制订人所设想的那种现代化的进步国家的成功。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和分裂阻挡着他们的前进道路。

联邦即使在丧失恰帕斯和不包括伯利兹的情况下也有100多万人口①。(见表1)大部分居民是对国家前途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识字的农民和债役雇农。大约65%的中美洲人是印第安人，31%是拉迪诺人(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有4%左右是白人。当然，各邦情况有很大不同。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所占比例比其他各邦都大，而哥斯达黎加的少量人口主要是白人。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人口中有大量拉迪诺人。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沿岸有一些黑人，但是他们大部分处于中美洲社会之外。②

在独立前的20年中，中美洲经济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给新生共和国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简单说来，在18世纪后期，危地马拉领地已成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靛蓝的重要出口地。其他省份向地峡以外出口的东西并不很多，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在较少程度上还有哥斯达黎加，是向生产靛蓝的地区和领地的行政中心供应牲畜和农产品的重要地区。因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① 那个时代对人口的估计众说纷纭，不很可靠。表1的估计数字反映了对这些估计数字以及殖民地时代和19世纪晚期人口资料的分析。考虑到当地灾难、传染病和其他情况所造成的变动，估计独立的头50年的人口增长率约为1.3%。

② 没有关于人口的种族构成的可靠统计，但是对整个地区来说，贝塞韦罗·马丁内斯·佩莱斯著《香蕉之乡，说明危地马拉殖民地现实的文章》(危地马拉，1971)，第397—398页。马丁内斯·佩莱斯说，尼加拉瓜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84%的人口是拉迪诺人。亚历杭德罗·马罗金著《关于独立的社会学评价》(圣萨尔瓦多，1964)，第25—28页，曾计算萨尔瓦多1807年的(不包括松索纳特和阿瓦查潘，它们还是危地马拉的一部分)人口构成的百分比如下：西班牙人0.86%，克里奥尔人2%，拉迪诺人53.07%，黑人和穆拉托人0.1%，印第安人43.07%。在这个时期，中美洲人口的种族构成可能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尽管种族混血的进程肯定在继续。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由于欧洲人移民，中美洲白人的百分比在1821—1870年期间稍有增加。

表1　中美洲估计人口，1820—1870年　　（单位：1,000居民）

	1820	1830	1840	1860	1860	1870
哥斯达黎加	63	72	86	101	115	137
萨尔瓦多	248	271	315	366	424	493
危地马拉	595	670	751	847	951	1,080
洪都拉斯	135	152	178	203	230	265
尼加拉瓜	186	220	242	274	278	337
中美洲	1,227	1,385	1,572	1,791	1,998	2,312

殖民地时代后期的经济与国际经济有很多联系，领地内部在经济上也密切结合在一起。①

然而，19世纪头20年间萨尔瓦多靛蓝生产的迅速衰落给整个中美洲带来了经济混乱。靛蓝出口明显减少是蝗灾、对西班牙航运的袭击和其他更容易进入欧洲市场的生产靛蓝地区的竞争造成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靛蓝种植者被迫改种粮食，这又使向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购买牲畜和谷物的数量减少。这样，当殖民地时期结束时，领地内部变得不再那么互相依存，对国际市场也不再有那么多联系。这意味着正值西班牙政府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征收的重税和提出的借款要求使中美洲上层人士的负担加重的时刻，生活水平降低了。②

① 见阿尔韦托·拉努萨·马塔莫罗斯著《尼加拉瓜的社会经济结构、权力与国家（1821—1875）》（圣何塞哥斯达黎加大学未发表的论文，1976），第83—89页。

② 小R.L.伍德沃德著《阶级特权与经济发展：1793—1871年危地马拉的商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66），第39—41页；R.S.史密斯著《殖民地时期危地马拉的靛蓝生产与贸易"，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39/2，（1959），第183页；迈尔斯·沃特曼著《1787—1819年中美洲的政府收入与经济趋势》，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55/2（1975），第262—264页。

可以理解，危地马拉贵族指望扩大贸易、取消经济限制和增加新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胭脂红)成为摆脱困境的手段。有些人已经转向走私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属洪都拉斯)，从而加剧了他们同布斯塔曼特政权的纠葛。同时，他们反对社会上的其他份子取得经济进展。独立后，统治阶级的基本保守态度变得明显了。反对他们的——特别是在各个省——是各种专业与各个中间阶层的代表和政府行政人员，他们觉得自由主义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和经济机会。这两部分人在全部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广大的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处于政治辩论之外。但是，不只是上层人士感觉到这一经济困难时期。实际上，城市贫民中贫困状况的扩大在独立的时候加剧了社会紧张并且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有助于为双方军队提供士兵。

480 在建国之初使自由派同保守派分裂的那些问题与同一个时候使西班牙人分裂的那些问题没有很大不同。这些问题在关于1812年加的斯宪法的辩论中大部分已被勾划出来。保守派认为君主制比较稳妥，而自由派拥护共和制。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份子没有得到任何一派足够的喜爱，以使保守派长期珍爱的君主制保留下来。但是，即使在1824年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争论显然已经解决之后，中美洲的保守派仍不相信有谁(除了受过教育和有财产的人以外)能治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教会。自由派谋求教会与政府分离，并解除它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保守派认为教会是他们的特权的维护者，是控制群众和赢得群众支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自由派谋求摧毁对经济的垄断控制，取消保守派在教会、商业和大学等等方面的特权。教育问题同教会问题上的争议密切相关，自由派主张教育脱离宗教、以群众教育作为最终目标，而保守派维护在教会监督下的上层教育制度。双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有必要实行现代化并且对经济问题采取合理态度，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中美洲一些主要家族因家属和姻亲关系而有跨地区的联

系，但是各地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常常使他们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起初，还有相当多玩弄政治手法的余地，但是在独立后中美洲的那些激烈斗争消除了许多中间地带，把两派变成了立场分明的两个交战阵营。这两个交战阵营的斗争后来成为这个世纪其余时间中美洲政治的特点。

1823年7月1日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后，最初是自由派控制全国立宪会议。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取消阶级特权。7月23日，一切荣誉称号，不管是皇家的还是贵族的，包括“唐”这个尊称，都被取消。这一法令还包括一些反教权主义的改革，例如主教和大主教被剥夺了除“神甫”（pedre）这个称号以外的一切称号。① 废除墨西哥帝国政府的一切法律和断然解除西班牙和墨西哥官员的职务很快激起了人们对自由派的不满。第一次暴力行动在9月中爆发。拉斐尔·阿里萨一托雷斯上尉领导了一次叛乱，表面上是要求给军人报酬。结果政府进行了对保守势力较有利的改组，但是从萨尔瓦多调来了自由派军队支持政府。内战是避免了，但危地马拉居民对萨尔瓦多人的出现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在军队离开之后恶感继续存在。这场暴动——以及一场也是军队迅速镇压下去的亲西班牙的叛乱——表明危地马拉局势不稳定，人们越来越敌视自由派控制的立宪会议。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当代表们继续辩论拟议中的宪

481

① 殖民地时代的一些用词也被摒弃：检审法院（audiencias）和地方自治机构（ayuntamientos）分别改称为地区法院（cortes territoriales）和市政府（municipalidades）。后来，其他礼仪形式、徽号和贵族标志也被废除（1823年8月21日）。“上帝，团结，自由”代替“上帝永远保佑你”作为一切通讯结尾时的正式客套话。（1823年8月4日）。亚历杭德罗·马鲁尔著《中美洲共和国从1821年至1842年发生的突出事件大事记》（第2版，危地马拉，1895），第11—12页；伊西德罗·梅嫩德斯汇编《中美洲萨尔瓦多法律汇编》（第2版，圣萨尔瓦多，1956），第1卷第20，126页。

法时，会议中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1824年11月最后出现的文件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何塞·德尔·巴列对拟订这个文件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文件把1812年西班牙宪法的一些内容和1789年的美国宪法掺和在一起。1824年宪法致力于保护“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第2条)，保证罗马天主教是国教，“排斥公众信奉任何其他宗教”(第11条)，宣布奴隶制非法(第13条)并且为个人自由提出了广泛保证(第152—176条)。通过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产生一院制的联邦国会(第23—54条)。每个邦选出两名参议员(其中1名可以是教士)组成参议院，一切法律必须经参议院批准(第92条)。国会可以以2/3的多数票使参议院的否决无效，但关于税收的案件需要3/4的多数票(第76—86条)。总统没有否决权，法律一旦经参议院通过，总统就必须执行(第87—88条)。总统(他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副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最高法院也由间接选举产生，有5至7名法官，任期两年，彼此的任期错开(第132—140条)。宪法规定成立由5个自治邦组成的联邦，各自治邦有邦议会、邦行政部门和邦司法官员，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制订与联邦宪法相一致的邦宪法。每个邦应设立一个类似联邦参议院的参议会，以便批准法律和向邦行政长官提出建议(第177—195条)。这部宪法甚至在1825年8月由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批准它之前就立即生效①。

482

第一次全国大选在萨尔瓦多自由派曼努埃尔·何塞·德·阿尔塞和温和派何塞·德尔·巴列之间进行，竞选运动十分激烈。两人都是临时执政洪达成员。有些地方曾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威胁要把那些反对新宪制的人处死。新国会1825年2月在危地马拉的马里亚诺·加尔韦斯博士主持下开会时，自由派看来已取得胜利，然而4月份的总统选举有利于比较温和的何塞·德尔·巴列。

① 《1824年联邦宪法》，载里卡多·加利亚多著《中美洲联邦共和国宪法》(马德里，1958)，第2卷，第103—138页。

他在实投79张选举人票中获得41票，而法定的选举人票是82票，因此他仅以 1 票之差未获多数，这样，选举就被提交国会处理。阿尔塞玩弄阴谋，他不仅要赢得总统职位而且还要形成有广泛基础的联盟。他认为这样的联盟才能使联邦政府有成效地治理国家。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向保守派保证他将不坚持为萨尔瓦多单独设主教，从而获得了保守派议员的支持。国会以25票对 5 票选举阿尔塞任总统。巴列拒绝接受副总统职位，激进自由派何塞·弗朗西斯科·巴伦迪亚也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最后由危地马拉保守派马里亚诺·贝尔特拉内纳担任。因此，新的共和国在怀疑有人背叛全体选民意愿的阴云下开始存在，当时极端自由派（巴伦迪亚派）已经对自由派总统不抱幻想，他们认为他已经把自己出卖给可恨的“顺从派”（保守派）。

阿尔塞总统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对组成联邦的 5 个邦的任何一个实行过有效控制。每个邦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各邦政府按照宪法自己组织起来，但是在几个邦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阿尔塞在1825年初曾亲自率领军队平定尼加拉瓜，但是他在那里建立的和平只是格拉纳达和莱昂之间的斗争的短暂间歇。在胡安·莫拉紧紧控制下的哥斯达黎加仍然脱离联邦政府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与进步。萨尔瓦多已隐隐出现严重的麻烦。在那里，任命德尔加多神父为主教遭到卡绍斯大主教和危地马拉城的阿尔塞联邦政府的反对。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问题，表明萨尔瓦多强烈要求脱离危地马拉而独立。然而，阿尔塞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受自由派“狂热份子”控制、由胡安·巴伦迪亚领导的危地马拉邦政府。邦政府沿着激进的路线前进，一再触犯联邦政府中和阿尔塞结盟的那些比较保守的份子。在阿尔塞当政的第一年，两个政府的裂痕扩大。1826年 4 月，阿尔塞将巴伦迪亚免职，9月把他逮捕。危地马拉邦政府其余的人在副长官西里利奥·弗洛雷斯领导下先是逃到圣马丁-希洛特佩克，后来又逃到克萨尔特南戈。在克萨尔特南戈，邦立法机关颁布了煽动性的自由

483

派法律，宣布教士子女是教会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取消商会，把什一税砍掉一半。这些法律是无法实施的，但是它们为1829年以后制订许多自由派立法奠定了基础。自由派在克萨尔特南戈执政的时间不长，因为10月份一群暴徒袭击弗洛雷斯，真的把他碎尸万段，自由派政府就垮台了。

在保守派马里亚诺·艾西内纳领导下的新的危地马拉邦政府和阿尔塞总统合作，把残余的自由派逐出该邦。但是萨尔瓦多的自由派现在起来向圣萨尔瓦多的亲阿尔塞政府挑战，从而引起了3年血腥内战。阿尔塞指挥联邦军队，但是他的政府对危地马拉邦的依赖是如此之大，以至艾西内纳不久在声望上就取代了他。这场残酷的斗争遍及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大部分地区，双方都怀着刻骨仇恨，手段凶狠残忍。在洪都拉斯，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团结自由派，在洪都拉斯的拉特立尼达击败联邦军队(1827年11月10日)后，成了自由派主要军事人物。阿尔塞现在谋求和解，因和解不成，于1828年2月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贝尔特拉内纳接任总统，但是实际上艾西内纳成了反对自由派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政府向教士和当地富有公民(包括外国商人)大量索取强迫性借款，使当地富有公民欢迎自由派取得胜利。1828年3月，联邦军队在查尔夸帕赢得一次血腥的、代价巨大的胜利，但是以后形势转而对莫拉桑将军有利。他在1828年底收复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后，1829年初攻入危地马拉，2月包围首都，484 当时自由派在安提瓜重新建立了邦政府。莫拉桑3月15日在拉斯查尔卡斯取得决定性胜利，艾西内纳终于在4月12日投降。

这场内战(1826—1829年)的直接结果是对保守派领导人采取报复性政策并颁布激进的自由派法律。何塞·F·巴伦迪亚主持共和国直到1830年9月选举把莫拉桑提升为总统。莫拉桑击败了何塞·德尔·巴列。巴列以前同危地马拉的阿尔塞—艾西内纳政府没有联系，现在能够回到政界，但是他未能制止自由派的压倒性胜利。胡安·巴伦迪亚被短暂地恢复了危地马拉邦首脑职务，但

是1831年马里亚诺·加尔韦斯在那里举行的选举中获胜。加尔韦斯博士虽然明显地属于自由派阵营，但他没有何塞·巴伦迪亚和胡安·巴伦迪亚那么激进，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分裂。莫拉桑在3个主要邦的官员中也有同盟者，自由派在哥斯达黎加占上风，但是所有这些邦的反对派不久开始限制他们发挥作用。萨尔瓦多内部的困难促使莫拉桑在1834年决定把国家首都迁到圣萨尔瓦多。

1834年的总统选举反映了人们对莫拉桑和他的纲领的广泛不满，何塞·德尔·巴列争取重新当选取得成功。然而，对温和派事业不幸的是，巴列在就职前去世，莫拉桑是第二个得票最多的人，根据宪法仍由他当总统。看来，实行温和路线的最后希望也随着何塞·德尔·巴列一起消逝了。莫拉桑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胜利在温和派和保守派中间留下了广泛的忿恨和不满。随着对自由派不满情绪的增长，他们的沮丧情绪变成了仇恨。

危地马拉邦的情况最好地说明了19世纪30年代冲突的性质及其结果。加尔韦斯和莫拉桑的信念相同，都认为中美洲可以通过开明的社会与经济立法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共和国。在主要保守份子流亡国外的情况下，一个和平和有秩序的时期似乎是有保证的。当时，被授予特别权力来对付反对派的加尔韦斯政府已经成为执行莫拉桑的自由派纲领的带路人。他们认为西班牙殖民主义是他们不发达的根源，因此他们谋求摧毁西班牙体制并且通过仿效美国的明显成功来取代它们。然而，实际上，虽然在上层人士中有许多人接受加尔韦斯的纲领，但是他未能战胜国家下层阶级中的广泛反对意见。 485

反对意见有好几个来源。自由派的贸易政策严重损害了本国的纺织业，而加尔韦斯的关税改革已为时过晚，无法保护它。更严重的是实行一种新的直接税——每人2比索的人头税，这在农民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动荡。在萨尔瓦多，这种税在1833年导致了广泛的人民造反，不得不在那里暂停征收，但是加尔韦斯继续在

危地马拉征收。强迫人们进行大量劳动来修建公路和其他公共工程，使不满进一步加剧。

自由派经济纲领的另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面是提倡私人获得公共土地或村社土地作为增加生产和出口的手段的政策。扩大胭脂红生产后，对危地马拉中部和东部的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的土地和劳力的需求开始增加。此外，对外国人的大量转让引起很大的不安。英国人在伯利兹的商业活动加剧了人们对外国人的传统怀疑。西班牙殖民政府曾大力取缔外国的无照营业者，但是独立以来，自由派的政策却是欢迎他们，从而在那些认为自己是外国竞争的受害者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忧虑。外国的影响在加尔韦斯纲领的许多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特许外国人采伐红木以及让英国殖民者在国家北部和东部地区落户的计划，使那些地区的居民认为自由派偏向外国利益而不顾本国利益。1839年3月至8月间，危地马拉政府几乎已把它的全部公共土地割让给外国垦殖公司。当英国加紧控制伯利兹、米斯基托海岸和巴伊亚群岛、得克萨斯的英美殖民者摆脱墨西哥统治时，许多危地马拉人开始怀疑加尔韦斯的垦殖计划是否明智。然而，加尔韦斯对居民反对垦殖契约的请愿置之不理或进行压制，他拒不接受关于自由派正在把国家出卖给欧洲人的意见。1835年秋天，在奇基穆拉和其他东部城市爆发的叛乱可能同萨尔瓦多一次反对莫拉桑的暴动有联系。军队把叛乱镇压下去，但是居民仍然愤懑不平，尤其是在第一船英国殖民者在1836年年中到达之后。

自由派纲领触犯了农村群众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教士的攻击。486 反教权主义特别高涨，因为教会在1826—1829年间一直支持马里亚诺·艾西内纳的保守派政权。莫拉桑的联邦政府流放了许多反对自由派的教士，首先是卡绍斯大主教。在取缔各修道会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之后，联邦政府说服各邦政府继续向教士的传统权力和特权进攻。在1829至1831年期间，危地马拉检查教士的通信，攫取教会基金，并且没收修道院的财产。1832年，加尔韦斯停止

征收什一税，取消了许多宗教假日，没收更多的教会财产，下令教士有权随意书写遗嘱并使教士子女继承其父母的财产合法化。随后，危地马拉立法机关批准民间婚姻，使离婚合法化并且使教育脱离教会的监督。在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的村庄里(那里的教区居民出于其他原因已经对加尔韦斯的政策感到恼火)，神甫们责骂政府向他们的权威挑战，袭击他们的神圣机构，把外国新教徒引入国内，威胁社会的根本基础。这些农村中的神甫是1837年震撼危地马拉的暴动的先锋。

新的司法制度引起人们进一步反对自由派政府。自由派认为有私人特权和多种法庭的西班牙制度是不公正和过时的，他们采纳爱德华·利文斯顿法典，自1837年1月1日起生效。何塞·巴伦迪亚提倡将这部1829年为路易斯安那州编纂的法典作为他们一直在一点一点废除的那个制度的代替品。* 实行陪审团参加审判是新制度的一个主要内容，这几乎立即在农村引起了问题，那里大部分人是文盲，加上根深蒂固的阶级结构使得陪审团制度无法实行。人民群众认为这个法典就是危地马拉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是外国影响和反教权主义，而不认为它代表社会正义。此外，自由派进行这些改革的独裁方式很少起到改善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作用。自从布斯塔曼特的高压统治以来，中美洲的军事镇压一直在升级，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在努力发展出口经济、管理居民的道德品行、压制对它们自己的政策的批评和通过流放和没收措施来迫害它们的政敌时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使它们更加不得人心，就像政府军队的行为不得人心一样。

487

1837年从伯利兹传入的流行性霍乱使危地马拉东部农民潜在的和现实的不满变成了公开叛乱。1837年3月，政府对传染区实

---

* 爱德华·利文斯顿(1764—1836)，美国律师、议员、政治家。他在新奥尔良执律师业时，编纂了司法程序临时法典，1805—1825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实施。1821年编写刑事法和程序法典，在美国和欧洲有广泛影响。——译者

行隔离，并且采取了其他卫生措施，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遭到误解。已经同加尔韦斯政府疏远的农民害怕疫苗并且相信神甫对他们说的，保健官员放到水里的药品是毒药。结果发生了恐慌和暴力行为。1837年第一次大暴动是在洛斯阿尔托斯的圣胡安奥斯通卡尔科发生的(那里的土著人暴动，反对负责实施利文斯顿法典的官员)，但是最大的麻烦是在危地马拉东部山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何塞·拉斐尔·卡雷拉出现了，他后来组织和领导农民走向胜利，并且决定危地马拉今后25年的命运，一直到1865年他死去时为止。卡雷拉是个拉迪诺，1814年生于首都，1826—1829年内战期间在保守派军队中当鼓手，后来漂流到山区，在那里当过猪倌。一位乡村教区神甫安排他同马塔克斯品特拉的一个妇女结婚后，他有了一些财产。卡雷拉最初指挥一支负责实施霍乱隔离的巡逻队，但是他转而反对政府并且带领他的部队援助那些正在圣罗莎抵抗政府军的农民。卡雷拉的领导使他们转败为胜。不久他指挥一支控制了危地马拉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游击队。流行性霍乱限制了政府招募军队的能力，但是卡雷拉的游击队的人数和战斗力都不断加强。6月末，他在一份宣言中列举了他的要求，这个宣言反映了给他出主意的神甫们的保守影响：1.废除利文斯顿法典；2.保护生命财产；3.让大主教回来并恢复各个修道会；4.取消人头税；5.赦免1829年以来所有被流放的人；6.尊重卡雷拉的命令，违者处死。

加尔韦斯在面临人民造反的情况下，同保守派结成全国团结联盟，这使人想起阿尔塞早先的行动。这样，他迫使何塞·F·巴伦迪亚和佩德罗·莫利纳领导的比较激进的自由派变成了一个反对派。首都上层人士的分裂对卡雷拉有利，他的衣着褴褛的军 488 队扩大了控制地区，使有产阶级、商业和外国旅客感到恐怖。为弥补自由派之间的裂痕而作的努力结果使加尔韦斯辞职，让位给邦的副首脑佩德罗·巴伦苏埃拉，后者对巴伦迪亚来说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努力未能阻止卡雷拉一伙人在1838年1月31

日蹂躏危地马拉城。不久卡雷拉把军队从首都撤出，回到他的家乡米塔地区，但这是在开始同保守派结成联盟之后。

克里奥尔贵族阶级——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经济力量遭到自由派统治者的破坏，但没有被粉碎。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有些人获得了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扩大了他们的产业。这个阶级的有些成员仍然呆在自由派阵营，但是大多数人现在支持保守派事业。1833年，保守派以强大姿态在危地马拉立法机关恢复活动并且以满足卡雷拉"将军"的某些要求来向他献殷勤。教会恢复了它以前的地位；自由派军事司令官被解除职务；采取行动恢复宪法统治，以便让保守派可以通过选举担任政府职务；3月份废除了利文斯顿法典。这些行动反映了这位游击队考迪罗所表达的人民意愿。1838年3月12日一则法令的序言解除了所有不是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职务，这表明立法机关对这一意愿的注意，当时它承认"国家绝大多数居民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那个违背他们的保证和基本契约的政府"，并且证明反对加尔韦斯的革命是正确的，它"指向建立法律和自由……保全自己以反对暴政，从道理和正义上讲它不仅合法而且是神圣的。"①

卡雷拉对立法机关在废除自由派的改革方面进展缓慢感到不耐烦，他重新发动游击队进攻，并且扬言要再一次入侵首都。同时，保守派在选举中的收获和保守派马里亚诺·里韦拉·帕斯所领导的新的参议会把巴伦迪亚派置于无法立足的境地。最后，巴伦迪亚求助于他的自由派盟友莫拉桑，莫拉桑在3月月中率1,000名萨尔瓦多军队赶来援助。巴伦苏埃拉的政府曾告诫这位联邦考迪罗不要入侵危地马拉，警告说这样一来将推翻同已经和平地回到米塔的卡雷拉所达成的谅解。但是当卡雷拉重新发动进攻时，它迫使这个邦向联邦政府求援。

莫拉桑发动全面攻势，追击和摧毁卡雷拉的军队，同时制止危 489

① 《官方公报》（危地马拉），第11期（1838年3月17日）第474—477页。

地马拉政府的保守倾向。游击队以新的凶猛姿态作出反应。双方的暴行都大大增加。这时联邦政府还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内部以及危地马拉面临保守派的反对，而现在处于布劳略·卡里略的温和的保守统治之下的哥斯达黎加实际上是对联邦不予理睬。英国领事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以前支持莫拉桑，现在认为联邦事业已无希望，谋求同新上台的保守派统治者发展和英国的密切关系。联邦国会认识和感觉到这些压力，于1838年7月7日宣布这些邦是“享有主权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政治体”。*

莫拉桑返回圣萨尔瓦多，重新树立他的权威。① 此时他已大大削弱卡雷拉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完全消灭威胁。

由此可见，到1838年年中，战线已经分明。卡雷拉是反对莫拉桑、主张自治的保守派事业的旗手，而自由派则支持联邦。在其他一些邦，保守派同新出现的民间考迪罗结成联盟，巩固了他们的力量和组织。这样，保守主义已同地方自治和使中美洲联邦瓦解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莫拉桑在圣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的保守派迅速恢复了权力，7月22日巴伦苏埃拉把行政权移交给里韦拉·帕斯。新政府重新废除了自由派的纲领。在农村，卡雷拉再次控制了大片地区。然而，自由派将军卡洛斯·萨拉萨尔9月突然发动一次反攻，迫使卡雷拉退回到山区。莫拉桑参加追击，卡雷拉为了争取时间，12月23日同意放下武器并且同意承认危地马拉城的政府以换取恢复他在米塔地区的军事司令官职务。

莫拉桑为卡雷拉游击队的明显垮台所鼓舞，1839年1月30日他解除了里韦拉·帕斯的职务，让萨拉萨尔将军代替。然而，与此同时，保守派已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掌权，联合起来反对萨尔瓦多的自由派。自由派的新攻势使卡雷拉相信，不消灭莫拉桑，

---

* “中美洲联邦”于1838年解体。此后各邦陆续宣布建立共和国。——译者

① 曼努埃尔·皮涅达·德·蒙特汇编《危地马拉法律汇编》(危地马拉，1869)，第1卷，第69页。

不可能有和平。他在1839年3月24日从马塔克斯昆特拉发动的一次暴动中指责莫拉桑残酷对待教士和其他危地马拉人、破坏商业、没收私人财产和在全国各地制造恐怖。他发誓要恢复里韦拉·帕斯的职务，参加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保守派反对莫拉桑的联盟。一个月后，里韦拉·帕斯和保守派再一次统治危地马拉。卡雷拉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进行扫荡。然后，在1840年1月，他长驱直入1838年脱离危地马拉的洛斯阿尔托斯，粉碎了那里的自由派。 490

卡雷拉和莫拉桑之间不可避免的摊牌在1840年3月到来，当时卡雷拉的军队击溃了在危地马拉城的自由派军队。莫拉桑和他的一些军官逃跑了，最后到达巴拿马的戴维，但联邦是完了。两年以后，莫拉桑回国，在萨尔瓦多重新组织军队，但他得到的支持比他原来期望的要小，然后他侵入哥斯达黎加，推翻了布劳略·卡里略。莫拉桑要使联邦复活的梦想在人民起来反对他的暴动面前几乎立刻就扑灭了。经过迅速审判，他于1842年9月15日被行刑队处决。

莫拉桑和自由主义的失败既反映了人民和上层人士对自由派政策幻想的破灭，也反映了人们谋求恢复西班牙时代的所谓平静局面的怀旧情绪。在这5个邦的每1个邦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同民族主义的诞生模模糊糊有关的、亲西班牙的排外心理。这一倾向在历来就是西班牙权威和传统的所在地的危地马拉最为明显。然而，保守派虽明显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却还不能支配一切。在一个以各邦内部和各邦之间的内战为特点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中美洲的当前主人是当地的考迪罗，其中卡雷拉是最大的一个。卡雷拉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上层人士之间挑拨离间从中牟利，什么时候政府不听从他的命令就把政府搞掉。他试图用这种办法来保持他在危地马拉的统治。教会是主要受益者和支持他的主要团体。耶稣会和其他修道会又回到中美洲。然而，自由派发现卡雷拉是

反对保守派的潜在的盟友，他们对卡雷拉1844年第一次就任总统起了主要作用。后来对教会特权进行了某些抑制，但是卡雷拉对全面恢复自由派政策绝不宽容，因此自由派最终要把他赶下台，这是不可避免的。

491 危地马拉东部发生的新暴动加上自由派的反对迫使卡雷拉在1848年下台。自由派控制着国会，而卡雷拉未能平息山区的暴动导致他在1月提出辞职。保守派说服他撤回辞呈，但由于事态恶化，他决定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召开新的立宪会议的要求。8月15日他召开了新的立宪会议。他在开幕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回顾了他为危地马拉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以及他如何在1847年确立危地马拉的完全独立。然后他宣布辞职，前往墨西哥流亡，这同时就引起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后来导致他胜利归来。

卡雷拉从恰帕斯注视着国内发生的混乱。随后建立的一连串短期的政府都未能恢复秩序或统一施政。9月中，保守派又暂时控制了危地马拉国会，宣布卡雷拉是民族英雄，并且肯定了他在1847年发表的危地马拉独立宣言。自由派面临着一个统一的保守的反对派而本身发生了分裂，这是这个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1849年1月1日，马里亚诺·帕雷德斯上校作为妥协性的国家首脑在危地马拉城就职。帕雷德斯在保守派政治家路易斯·巴特雷斯经常给他出主意的情况下，公开反对卡雷拉回国，但是私下持宽容态度，1月24日，卡雷拉宣布他决定要恢复危地马拉的和平与秩序。自由派军队试图不让他回来，但是帕雷德斯政府破坏了他们的努力。4月，卡雷拉占领克萨尔特南戈。不久以后，政府同这位考迪罗达成和平协议。帕雷德斯继续担任总统，卡雷拉被重新任命为中将，成了武装部队总司令。恢复秩序后，他对曾经反对他的自由派领导人进行报复。没有逃跑的人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这样，自由派不再在危地马拉政治中起主要作用达20年，尽管少数人仍留在国会和次要职位上。

卡雷拉在粉碎山区叛乱和挺进萨尔瓦多援助那里的保守派之后（见下文），1851年11月6日再次成为危地马拉总统，从1854年起成为终身总统，实际上是一个君主，有权指定继承人。直到1865年去世，他和教会以及保守派贵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一直是西半球最强有力的考迪罗之一。他凭借武力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保持友好的政府，也对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施加影响。 492

19世纪中叶没有一个中美洲国家逃脱保守派考迪罗的统治，但只有危地马拉有一个像卡雷拉统治那么久的考迪罗。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敌对考迪罗之间的混乱状况特别具有破坏性。由于自由派处于混乱状态，某些考迪罗(著名的有尼加拉瓜的特立尼达·穆尼奥斯和萨尔瓦多的弗朗西斯科·杜埃尼亚斯)忽而支持这一方，忽而又支持那一方，乘机利用当地的机会和情况。

自由派在萨尔瓦多仍然有力量，但是没有一个公开表明拥护莫拉桑观点的领导人能够长时期逃脱危地马拉的干涉。莫拉桑于1840年被击败后，卡雷拉安排自己的一个军官弗朗西斯科·马莱斯平在那里掌权。后者对军队的指挥权使他成为萨尔瓦多的主要考迪罗和尼加拉瓜及洪都拉斯的一支政治力量，一直到1846年被暗杀为止。马莱斯平除了同卡雷拉和危地马拉保守派保持联系外，还同圣萨尔瓦多在政治上活跃的豪尔赫·比特里主教和英国领事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密切合作，以便自由派一旦继续掌握政府和国会职位，保守派利益可以继续占上风。然而，由于萨尔瓦多的自由派有一定实力，马莱斯平就同自由派合作并加以利用(就像卡雷拉本人在4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做法有时在他同他的保守派盟友之间产生一些问题。

这时，卡雷拉在洪都拉斯的盟友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努力在那里建立保守派统治。他还同马莱斯平合作使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自由派无所作为。像卡雷拉一样，费雷拉出身于一个下等阶级的、拉迪诺家庭，同大家族没有关系。另外，也和卡雷拉一样，

教士对他的掌权和他的思想方式有很大影响。费雷拉作为莫拉桑派的死敌，1833—1835年第一次统治洪都拉斯，1841年1月成为它的第一任"总统"。尽管他是国家的主要考迪罗，直到他在1848年去世为止，但是自由派使洪都拉斯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费雷拉和马莱斯平经常抵制自由派。1845年5月22日在科马亚瓜发生政变，使自由派领导人特立尼达·卡瓦尼亚斯短暂地控制政府40天。费雷拉不久恢复了控制，1847年辞去总统职务，但是继续在胡安、林多领导下担任国防部长。林多是这个时期比较开明的考迪罗，很难说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林多曾在马莱斯平的保护下担任萨尔瓦多的第一任总统（1841—1842年）。他曾反对恢复莫拉桑的联邦。回到老家洪都拉斯后，他得到费雷拉的保护，虽然一些比较好战的保守派不喜欢他。在他担任洪都拉斯总统期间值得纪念的行动之一是1847年7月对美国宣战，支持墨西哥。1848年他召开制宪会议，制订了一部比较保守的宪法。林多的开明的保守主义为洪都拉斯带来了独立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和平。然而，1850年他的外交部长桑托斯·瓜迪奥拉将军企图推翻他，使和平遭到破坏。特立尼达·卡瓦尼亚斯用萨尔瓦多自由派军队进行干预，尼加拉瓜也许诺提供援助，拯救了林多（林多的保守主义更接近何塞·德尔·巴列的保守主义而不接近瓜迪奥拉或卡雷拉的保守主义）。这一事件决定性地把他推进自由派阵营。1851年，林多和萨尔瓦多的卡瓦尼亚斯联手，企图击败卡雷拉。然而，卡雷拉1851年2月27日在奇基穆拉附近的圣何塞—拉阿拉达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1852年林多不愿再担任第三届总统，让国会选举卡瓦尼亚斯接任。卡瓦尼亚斯的自由主义比较露骨，他又打算重新建立中美洲联邦，几乎立即导致瓜迪奥拉在卡雷拉支持下从危地马拉入侵，1855年7月6日卡瓦尼亚斯被击败。经过短暂的争夺总统职位的斗争后，瓜迪奥拉1856年2月占据了这个职位，一直到1862年为止。他的不开明的保守统治给洪都拉斯带来一定的秩序，但是没有带来什么进步。

在哥斯达黎加，1842年处决莫拉桑之后，保守派势力一般说来占上风，尽管国家在政治上仍不稳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强悍然而开明的保守派J·拉斐尔·莫拉在1849年夺取政权。他当政10年。相形之下，尼加拉瓜在19世纪中叶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内战中所遭受的痛苦比任何其他邦都大。在这里，当地考迪罗之间的机会主义斗争比别的地方更明显，不断干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事务(特别是自由派进行的干涉)导致了血腥的和代价巨大的冲突。保守派在格拉纳达一带巩固地位后，也曾谋求在国外建立联盟，以扼制莱昂的坚韧不拔的自由派力量。尼加拉瓜的保守派甚至表示愿意考虑重新联合，以解决独立以来持续不断的混乱状态。这时，弗鲁托·查莫罗(他是殖民地时代结束时一个危地马拉移民的私生子)作为主要的保守派考迪罗出现了，他建立了尼加拉瓜最重要的保守帮派之一。何塞·特立尼达·穆尼奥斯抛弃了他以前的自由派同盟者，支持保守派J.L.桑多瓦尔，于1845年进行接管，使自由派对莱昂的控制遭到严重打击。桑多瓦尔和一些保守派继承人不断遭到自由派考迪罗在萨尔瓦多支持下的围攻。1847年，比特里主教转移到尼加拉瓜，那里的政治气候对他来说远比自由主义的萨尔瓦多更为有利。不久，尼加拉瓜同教皇达成新的协议。1851年，穆尼奥斯背叛政府，回到自由派阵营。查莫罗的军队击败了他并把他流放到萨尔瓦多。马那瓜作为莱昂和格拉纳达之间的妥协性首都的兴起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若干首领(包括查莫罗在1852年)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总部。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保守派一般说来占上风，并且仿效中美洲其他地方强调邦的主权。他们在1854年把尼加拉瓜命名为“共和国”，把最高执政的头衔改为“总统”，并且象征性地用一个黄条来代替自由派的蓝—白—蓝三色旗最上面的那个蓝条。共和国新印章上的标语“自由、秩序、劳动”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保守的宪法取代了1838年的自由派宪法。然而自由派拒绝让步，1855年从萨尔瓦多入侵，控制了国家西部并且再次在莱昂建立敌对政府。下面我们将看

494

到，就是在这个时候威廉·沃克的掠夺性远征军到达，它在尼加拉瓜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自从中美洲独立以来，北美洲和欧洲的商业集团一直把地峡看成是两洋间的通道。联邦政府和邦政府都曾鼓励在这里修建运河，但是在独立后的头20年中，英国、荷兰、美国和法国都没有很好设计，而且资金不足。它们除了引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之外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然而英国和美国举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既是为了确保它们各自在两洋间通道方面的权利，也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国民的利益。

1850年以前，美国在地峡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美国前后一些代理人为保护那里的少数美国人做了很好的工作。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把"杰克逊式革命"直接带到中美洲的人（法国的代表们产生了类似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而且对1848年的危地马拉革命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495

英国的经济与领土利益要大得多。英国在伯利兹和从巴伊亚群岛到哥斯达黎加的米斯基托海岸一带的新拓居区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就已经为英国在中美洲的贸易中赢得很大的份额。① 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伯利兹成了中美洲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伦敦的金融机构向邦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提供了供发展之用的信贷和贷款。独立后不久，英国政府派乔治·亚历山大·汤普森来调查发展贸易和修建运河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尼加拉瓜。他开始在英国外交官和中美洲领导人尤其是保守党领导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1837年至1838年，英国设计师约翰·贝利为尼加拉瓜政府勘查了一条修建运河的路线，这条路线加上美国代理人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的关于运河潜力的报告不久激起了外国对这项计划

① 特洛伊·S·弗洛伊德著《英国—西班牙争夺莫斯基蒂亚地区的斗争》（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67）。

的很大兴趣。从1834年至1852年，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担任英国政府驻中美洲代表，他审慎地进行工作以扶植和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并且试图使他的政府参预更雄心勃勃的帝国计划。尽管他并没有积极破坏中美洲联盟，但是他的同情最终是在保守派一边，成了19世纪40年代玩弄阴谋和政治手腕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他谋求使英国债券持有人得到保证并且召来皇家海军以便在必要时强迫中美洲作出让步。他同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主要保守派结合在一起，在这两个邦出现强有力的保守派政府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查特菲尔德的个人秘书是曼努埃尔·F·帕冯，是卡雷拉的主要顾问之一。这样，当中部各邦谋求恢复自由派联邦时，查特菲尔德就竭力建立保守派联盟或一些单独的保守的主权邦来同它对抗。①

从一开始，英国在中美洲东部沿海一带的意图就使自由派不安。伯利兹新拓居区、1823年—1824年格雷戈·麦格雷戈在洪都拉斯沿海进行的命运不佳的波亚伊斯垦殖计划以及英国在尼加拉瓜米斯基托沿海一带建立的贸易站都有利于商业扩张，但是也对中美洲的主权提出挑战。英国追捕从伯利兹逃入危地马拉境内的奴隶进一步激怒了自由派，因为他们在独立后立即废除了奴隶制。 496

1839年，一艘英国军舰把中美洲军队赶出巴伊亚群岛，两年后帕默斯顿勋爵宣布这些岛屿是英国领土，应该保护在那里定居的英国国民。这一炮舰外交的最新事例在中美洲各地激起了抗议风暴。这个世纪中叶的一些保守派政府在抗拒英国的领土野心和捍卫民族独立方面做得比它们的自由派前任更有成效。

当时，英国同地峡之间已经发展了密切的贸易关系。由马歇尔·贝内特和约翰·赖特领导的伯利兹商业公司乘机利用伯利兹作为

① 见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著《中美洲的一个帕默斯顿式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先生》（亚利桑那州图森，1964）。

中美洲进出口主要港口的地位。中美洲人缺乏自己的得到保护的深水港，独立后出口产品和进口制成品都靠伯利兹商人。一般说来，英国商人在中美洲扎下的根基没有像他们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深，但是也有少数明显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贝内特，他在19世纪20年代在危地马拉建立了威廉·霍尔与卡洛斯·米尼商行，作为他的伯利兹公司的分公司。在这10年中，乔治·斯金纳和查尔斯·克莱建立了一些商行，它们到今天还是重要的。在独立后的头30年为英国商业利益服务的人当中，在尼加拉瓜有托马斯·曼宁、约翰·福斯特、霍纳斯·格林通和沃尔特·布里奇；在萨尔瓦多有威廉·巴查德、里查德·麦克纳利、弗雷德里克·莱斯佩朗塞、威廉·基戈尔和罗伯特·帕克（他们的经营没有取得长期成功）；在米斯基托海岸有彼得·谢泼德和塞缪尔·谢泼德。这两个谢泼德得到米斯基托国王赠予的大量土地，作为几箱子威士忌酒和几匹印花布的回报。

中美洲的进口反映了同英国商业的密切关系。到1840年，危地马拉将近60％的进口产品是通过伯利兹新拓居区运来的，另外20％直接从英国运来。其余的20％中，3/4是西班牙来的。英国纺织工业的扩大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靛蓝和胭脂红提供了重要市场。从1825年起，英国几乎对所有中美洲的主要出口产品胭脂红、靛蓝、染料木、红木和其他高级木材、皮张和龟壳逐步降低了关税。到1846年，除咖啡以外的所有中美洲农产品进入英国时都免税。咖啡（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古巴咖啡出口垮台之后，咖啡在哥斯达黎加变得比烟草更重要）不久也得到优惠待遇。表2、表3和表4反映了独立后头30年英国商业的范围和扩大情况。①

497

① 表2、表3和表4是根据罗伯特·A·内勒从伦敦档案局海关记录中搜集的资料制订的《商业统计表，1821—1851》和《英国同中美洲的商业关系，1821—1851》（新奥尔良图兰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58），第310—369页。以上表格是根据"官方价值"。内勒的表格内有多处使用"申报价值"（一般较低）并根据不同商品使用吨、磅等计量单位。当然，表2、表3和表4只表明中美洲

表2　中美洲从英国和牙买加的进口，1821—1850年

（单位：1，000英镑）

年　　份	英国向中美洲的直接出口	英国向伯利兹的出口	牙买加向中美洲的出口	总　　计
1821—1825	6.7	1,455.9	0.0	1,462.6
1826—1830	12.6	2,805.6	0.0	2,818.2
1831—1835	112.3	2,937.6	74.0	3,123.9
1836—1840	40.3	6,328.9	61.2	6,430.4
1841—1845	76.0	4,578.1	56.4	4,710.5
1846—1850	2,376.4	3,961.5	85.4	6,423.3

表3　中美洲直接和通过伯利兹、秘鲁和智利向英国和牙买加的出口，1821—1850年

（单位：1,000英镑）

年　份	英国从中美洲进口			牙买加从中美洲进口	总　　计
	直接从中美洲	通过伯利兹	通过秘鲁和智利		
1821—1825	12.8	395.9	3.3	0.0	412.0
1826—1830	23.9	402.7	14.2	0.0	440.8
1831—1835	105.3	1,214.5	51.0	44.9	1,415.7
1836—1840	368.7	2,719.8	129.7	41.4	3,259.6
1841—1845	308.1	4,133.7	435.2	6.9	4,883.9
1846—1850	2,631.7	5,526.7	73.0	2.7	8,234.1

和英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包括伯利兹和英国在中美洲东部海岸所占有的其他领土的农产品。西罗·F.S.卡多索和埃克托尔·佩雷斯·布里尼奥利著《中美洲与西方经济（1520—1930）》（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77），第324—325页，曾根据内勒的资料编制两个统计表，表明英国和中美洲每年进出口情况。不幸的是，他们的表格中有一些严重错误，特别是那张关于英国对中美洲出口的表格，在这张表格中，卡多索和佩雷斯错误地把英国输往牙买加的全部外国货物和英国的殖民地货物都作为中美洲的进口包括进去。此外，在他们的总数中还有一些计算上或排印上的错误。

表4　中美洲向英国的主要出口产品，1821—1850
（在中美洲向英国全部出口中所占百分比）[a]

年　份	木材[b] %	胭脂红 %	靛蓝 %	咖啡 %
1821—1825	73.9	7.7	15.5	0.0
1826—1830	66.9	21.6	8.4	0.0
1831—1835	46.3	42.6	4.2	0.3
1836—1840	30.7	63.6	4.3	0.5
1841—1845	18.5	47.3	1.6	12.2
1846—1850	20.9	61.2	0.9	18.8

a. 中美洲向英国的全部出口根据表3。

b. 红木、尼加拉瓜木、巴西木、洋苏木、雪松、愈创树、佛提树。其他森林产品未包括在内。这些木材大部分是从伯利兹或米斯基托海岸输入英国，因此不是同中美洲共和国贸易的主要部分。

伯利兹仍是加勒比海唯一比较重要的港口，尽管中美洲一再在努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停泊地。中美洲人的一些港口——伊萨瓦尔，奥莫阿，特鲁希略，北圣胡安，马蒂纳——很少能停泊同外部世界直接贸易的船只。它们只是充当在伯利兹和中美洲海岸之间航行的小快艇和纵帆船的转运码头。在这个世纪上半叶曾试图在北圣胡安（格雷敦）建立为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服务的第二个英国货物集散地，但都失败了。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大部分农产品从太平洋港口科林托运出，它的重要性逐渐取代了殖民地港口雷阿莱霍或蓬塔雷纳斯。只是在1855年建成巴拿马铁路之后，中美洲商业总的来说才急剧转到太平洋。

贷款在英国和中美洲的商业关系中增添了一种债务关系。1825年巴克利—赫林—理查森公司贷款的大失败使得投资者不敢再贸然进入中美洲。尽管如此，英国公司向中美洲国家提供的一系列贷款造成了一大堆债务问题，到20世纪才解决。自由派鼓励

这种安排，保守派政府虽然比较谨慎，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这种 498
交易。例如，卡雷拉政府在1856年同伦敦的伊萨克和塞缪尔合伙公司谈判一笔贷款来偿付它早先的债务时，不得不保证以危地马拉的50％的关税收入来支付债务的本息。

如上所述，自由派也曾鼓励英国的垦殖计划。从危地马拉到巴拿马，各国政府都曾制订计划吸引欧洲移民。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稀稀落落地来了一些英国人，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不是死了，就是回家，有的则漂流到城市里。值得注意的是危地马拉加尔韦斯政府的计划。① 先是给外国人少量土地，接着把大量土地租借给中美洲东海岸商业与农业公司，人们怀疑这个集团的来历同格雷戈·麦格雷戈的波亚伊斯冒险事业有联系。这家公司同意开发从伊萨瓦尔和贝拉帕斯到佩滕的整个东部地区。不幸的是，英国人对开采红木林比垦殖农业更感兴趣。结果，这个计划只是增加了危地马拉东部居民的反英情绪。和一家比利时公司达成的关于发展圣托马斯港口和圣托马斯地区的类似安排最后取代了给英国人的转让权。卡雷拉和保守派曾对这一租借措施是否明智有严重怀疑，但是通过行贿和恐吓，政府批准了比利时的合同并且尽最大努力确保它成功。然而合同在1852年失败，低地地区仍然未被开发。这些垦殖计划的一个付产品是加勒比海沿岸的航运业得到了改善。英国公司的“贝拉帕斯号”汽轮把杜尔塞湾同伯利兹连接起来，从而增加了危地马拉在商业上对这个英国港口的依赖。后来比利时公司提供了同比利时的不定期航运。到1850年，从加勒比海岸到欧洲有了定期的(但有时是不可靠的)轮船航运业务。

如果说英国卷入地峡事务较多并且到1850年由于查特菲尔德

① 威廉·J.格里菲斯著《荒野中的帝国：外国在危地马拉的垦殖活动与发展，1834—1844》(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65)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

的缘故是支持保守派事业的，那么美国在这个世纪中叶越来越多地卷进来并且通常是支持自由派的。这种情况在1849年任命E·G·斯奎尔担任美国驻中美洲使节后就变得更明显了。英美的敌对加剧，并且由于控制地峡通道问题而达到顶点。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大大提高了美国对地峡的兴趣。当美国人络绎不绝地通过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开辟的通道穿过尼加拉瓜时，他们发现英国人已在北圣胡安（格雷敦）和韦塞卡湾的蒂格雷岛控制地峡两岸的领土。但是双方头脑冷静下来，1850年通过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同意将来如开凿地峡运河，实行双边控制和保护，这样才避免了战争。英国和美国保证它们"不对……中美洲任何部分进行占领，不在上面修筑工事，不进行垦殖，不对它进行或实施任何统治。"虽然这个条约缓和了查特菲尔德和斯奎尔所造成的敌对气氛，但是它并未结束英美在尼加拉瓜的对立状态，当时自由派和保守派正在那里摊牌。

威廉·沃克是1850年越过地峡（大概在巴拿马，不是在尼加拉瓜）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一个笃信新教的开拓宗教边疆和杰克逊式民主原则的、作风严谨的家庭的子弟。沃克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纳什维尔（后来在范德比尔特）、爱丁堡和海德堡的一些大学学医，后来放弃医学在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大学（后来在图兰大学）学法律。然而，他很快又转向新闻工作，成了新奥尔良有争议的自由派报纸《新月报》编辑。然而，他的未婚妻过早地死去，使他离开新奥尔良，到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开始生活。在那里他再次干起新闻工作，但是这工作既没有使他发迹，也不能使他的永不静止的精神得到满足。他通过朋友关系先是参加对墨西哥的远征（这次掠夺性远征遭到失败），然后又同意组织一支远征军支持受到进逼的尼加拉瓜自由派。

沃克一伙58人于1855年4月16日在雷阿莱霍附近登陆，取得显著成功，帮助自由派打了几次关键性的胜仗。然而自由派在战役中也遭到挫折，由于几个自由派领导人阵亡或病死，沃克迅

速成为尼加拉瓜自由派的主要军事首领。经过激烈战斗，格拉纳达落入他的军队手中。此后，沃克试图通过同保守派内奸结成联盟实现和平。他向教会保证他对教会并无恶意，并且向若干保守派提供要职。这些保守派中包括帕特里西奥·里瓦斯，他成为共和国总统。一些自由派感到沮丧，与沃克决裂，同时许多保守派拒绝参加联盟。这样，斗争就变成了沃克的“民主派”和“正统派”之间的斗争。现在都处于保守派统治之下的中美洲其他政府都向尼加拉瓜人提供援助反对沃克。哥斯达黎加的拉斐尔·莫拉率先组织这一“民族运动”反对他。里瓦斯认识到他的地位不稳，终于职辞，沃克本人接替他担任总统。许多北美人（大部分是来自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墨西哥战争的退伍军人）得到保证说，他们将得到土地和其他特许权，于是纷纷涌入尼加拉瓜，参加沃克的队伍。《尼加拉瓜人报》（这是一家用英、西两种文字印的报纸，英文比西班牙文多一些）宣布进行自由主义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

501

尼加拉瓜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莫拉的哥斯达黎加人、马里亚诺·帕雷德斯指挥的危地马拉人、赫拉尔多·巴里奥斯领导的萨尔瓦多人和瓜迪奥拉领导的洪都拉斯人——不久在人数上超过了沃克的军队。他们先是遏制了北美人和他们的残余的自由派同伙，然后把他们击退。北美人和他们的自由派同伙在战场上遭到损失并且害了霍乱病。英国人通过哥斯达黎加向他们的同盟者提供武装和其他供产品。华盛顿政府举棋不定，它从来没有承认沃克的政权（尽管美国驻尼加拉瓜公使这样做了），但是它迟迟没有对他采取行动。最后美国一支海军部队终于到达，实际上是为援救沃克和远征军的少数幸存者。1857年5月1日沃克投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乘一艘美国海军舰只回国，在新奥尔良象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不久得到支持去进行一次新的掠夺性冒险。美国官员几次阻挠，但沃克还是同罗阿坦岛上心怀不满的英国居民合作，发动了一次远征（这些英国居民反对洪都拉斯对巴伊亚群岛享有主权，而英国已在1859年同意它享有主权）。沃克希望利用罗阿

坦岛作为重新入侵中美洲的基地，并向仍在洪都拉斯与瓜迪奥拉进行斗争的特立尼达·卡瓦尼亚斯进行了接触。但是当沃克到达罗阿坦时，英国人还没有撤走，沃克就直接攻打特鲁希略。在取得短暂胜利后，由于英国海军干涉，他被俘虏并交给洪都拉斯当局。经过短暂审讯，沃克于1860年9月12日被行刑队处死。

沃克的插曲对中美洲有长期的后果。残余的反美和反英情绪此后长期存在，以至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猜疑和不信任，并且加深了保守派已经怀有的排外心理。同沃克的联盟进一步使自由派在中美洲各地名誉扫地，保守派在各个地方的地位更加巩固，尤其是在尼加拉瓜。到1860年，自由派只在萨尔瓦多继续是一个严重威胁。中美洲现在已明确地分为5个主权国家，但是保守势力很强固。

当然，一般说来，保守派同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要比同美国或法国的关系好一些。西班牙承认中美洲各国以及同罗马达成新协议，是保守派外交政策的积极成就。同英国人旧日的纠葛一般说来已和好地解决。债务问题也已经通过各国分摊一部分的办法得到解决，但只有分摊到最小份额的哥斯达黎加付清了全部债务。1859年危地马拉显然已解决伯利兹问题，危地马拉签订了艾西内纳—威克条约承认英国在那里的主权，以换取英国修建一条从危地马拉城到加勒比海的大车道。英国未能修建这条道路，最终导致废除条约，因为后来的自由派政府都不愿意重新进行谈判。到1860年，洪都拉斯也解决了它同英国人的领土纠纷，尼加拉瓜也朝着这个方向取得了进展。英国最后放弃了保护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责任，但那是这个世纪末的事了。

保守派统治中美洲，不太强调扩大出口和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是自由派时期的特色。保守派统治的文化和政治基调反映了传统的西班牙—天主教的准则，重新回到自足自给的农业和更加关心保护印第安人和拉迪诺人的村社土地。在独立的头

50年，城市很少发展——如果说有发展的话——生活主要仍然是农村性质的。然而随着内战后秩序的恢复，不可避免的是农业生产增加，保守派政府无法抗拒从对外贸易增加收入的诱惑。1840年后除洪都拉斯外，出口都迅速增长。洪都拉斯只是向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出口牲畜和粮食。殖民地时代晚期和独立后不久那种依赖天然染料的情况继续存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是靛蓝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危地马拉也稍微扩大了靛蓝生产，但主要依靠出口胭脂红。到1845年，哥斯达黎加生产咖啡的初步成功开始刺激中美洲其他地方的生产者。1856年发现煤焦油染料，使靛蓝和胭脂红的生产遭到损害，最后完全被破坏，种植咖啡的人更多。染料仍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出口经济的支柱，但咖啡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危地马拉的高原地带。到1871年，保守派政权最终在那里结束，此时咖啡已占危地马拉出口的50%。美国的内战(1861—1865)使中美洲在国际棉花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但这只是暂时的。得不到所有这些国家的可靠统计数字，但是表5、表6和表7说明了1850年至1870年出现的增长情况。①

503

1850年以后英国仍是供应进口产品的最重要的国家，尽管随着太平洋贸易在1855年以后的发展，伯利兹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表8所示百分比是海关计算的从1850年至1870年国外输入危地马拉的情况。表8也反映了中美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很少。从一些首都和生产地区到港口修建了道路，但各国之间仍无道路通行。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已经开始的经济上互相依赖到1870年已最后结束。各国之间变得更加隔绝。最后，虽然外国卷入地峡同拉丁美

① 关于中美洲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情况迄今只编制过一些零碎的贸易统计，而且往往不甚可靠。托马斯·斯库诺弗著《19世纪中美洲的商业与海运活动：一种定量研究的原始资料》载《拉丁美州研究评论》，13/2（1978），第157—169页，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这种资料的线索。

洲其他地区比较起来是有限的，但无论如何，从中美洲国家本身的观点来看，这种卷入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为自由派重新掌权后外国进行更大的控制铺平了道路。

到1860年，中美洲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秩序，同时咖啡成了主要出口产品，这种情况是同自由派重新努力控制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同时发生的。在年轻的上层人士成员中，特别是在那些与咖啡生产有关的成员中，有一种不安情绪，他们越来越普遍认识到，中美洲尽管在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成就，但是远远落在迅速扩大的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后面。自由派的重新崛起首先发生在萨尔瓦多。赫拉尔多·巴里奥斯原先是莫拉桑派，他曾在保守派政府任职并且同卡雷拉和莫拉合作反对沃克，但是1859年他在萨尔瓦多掌权后，他再次显露出自由派感情。他象征性地下令把莫拉桑的遗体运回圣萨尔瓦多进行国葬。随后他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教育上实行改革，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攻击教会，在外交上向危地马拉的卡雷拉保证他将继续保持友好。卡雷拉疑惧地注视着巴里奥斯的举动，同时在边境集结军队。当1863年不可避免地出现反教权主义时，卡雷拉发动进攻。但是巴里奥斯在科阿特佩克把他击退，然后转向尼加拉瓜，力图结束保守派在那里的统治，但是他自己却被击败了。1863年10月，卡雷拉第二次入侵萨尔瓦多，结束了巴里奥斯的政权；代替他的是比较可靠的保守派弗朗西斯科·杜埃尼亚斯。两年后巴里奥斯企图卷土重来，未能成功。但是，即使在杜埃尼亚斯统治下，自由派的许多改革仍被保留。

504

1865年卡雷拉之死给这整个地区的自由派带来了新的希望。比森特·塞尔纳继续在危地马拉进行保守派统治，直到1871年米格尔·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和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的改革使他下台为止。与此同时，洪都拉斯的自由派结束了保守派在那里的统治，并且同萨尔瓦多的自由派合作，在同年把杜埃尼亚斯赶

下台。在尼加拉瓜，保守派坚持掌权到1893年，但是尽管如此，1860年后不久即开始出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倾向。哥斯达黎加

表5　危地马拉主要出口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1851—1870年

年　　份	出口值（百万美元）	胭脂红 %	棉　　花 %	咖　　啡 %
1851—1855	6.2	78.4	0.0	0.0
1856—1860	7.8	81.1	0.0	0.3
1861—1865	7.4	56.4	8.3	11.3
1866—1870	10.8	46.6	2.0	32.4

资料来源：R.L.伍德沃德著《阶级特权与经济发展：1793—1871年危地马拉的商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66），第58—63页。

表6　尼加拉瓜主要出口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1841—1871年

年份	出口值（1,000美元）	靛蓝 %	贵重金属 %	皮张 %	棉花 %	橡胶 %	木材 %	咖啡 %
1841	167.8	83.1	0.0	14.8	0.0	0.0	1.5	0.4
1851	1,010.0	7.9	39.6	1.2	0.0	0.0	15.8	3.0
1864	1,112.4	8.6	9.1	17.2	47.9	8.8	2.0	1.2
1865	1,155.0	16.9	12.3	8.9	47.1	4.6	2.5	2.6
1867	893.9	44.8	11.4	9.5	9.4	12.6	2.7	4.9
1870	930.3	27.0	17.9	18.0	1.7	15.7	9.7	5.4
1871	1,424.7	26.6	13.0	7.1	5.0	18.3	8.1	8.7

材料来源：A.拉努萨·马塔莫罗斯著《尼加拉瓜的社会经济结构、权力与国家（1821—1875）》（哥斯达黎加大学未发表的论文，1976）第126—204页。

表7　萨尔瓦多的主要出口产品，1864—1874年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总出口值	靛蓝		咖啡	
		价值	在总出口中的%	价值	在总出口中的%
1864	1.7	1.13	67.4	0.08	4.8
1866	2.4	1.59	65.1	0.20	8.1
1870	?	2.62	?	0.66	?
1874	3.8	1.70	44.8	1.33	35.0

材料来源：马里奥·弗洛雷斯·马卡尔著《萨尔瓦多统治形式的起源》(圣何塞，1977)第147—163页；戴维·布朗宁著《萨尔瓦多。风景与社会》(牛津，1971)，第162页。

表8　危地马拉进口来源1850—1870[①]（占总额百分比）

505

英国	61
伯利兹	6
法国	17
德国	5
西班牙与古巴	4
美国	3
比利时	2
其他	2
	100

向自由派统治的过渡比较有秩序，但是方式并没有很大不同。1859年莫拉被推翻，接着是蒙特亚莱格雷家族的10年统治，这个

① 根据1851—1871年《危地马拉日报》发表的资料编制。

家族是温和派，对发展咖啡种植业曾起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教育、教会和经济政策中开始出现某些自由派倾向。比较明显地把自由派改革带到哥斯达黎加的是托马斯·瓜尔迪亚将军，1870年他在哥斯达黎加建立了自由派的独裁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自由派在中美洲的改革向曾经建立新西班牙政权(neo-Hispanic regimes)的克里奥尔上层人士提出了挑战。在破坏性内战和政治实验之后，殖民地时代晚期的主要家族在恢复它们的经济与社会领导地位方面大体上已经取得成功。同时，同民众考迪罗的合作加快了拉迪诺人参加政府的进程，因此到1870年白人上层人士已不再垄断中美洲高级政府职务。此外，上层人士和中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曾要求发展和扩大出口导向经济到一定水平，但保守派的统治未能做到这一点。殖民地时代的体制大部分已得到恢复，但是这个时期有两个新的事态发展，那就是考迪罗现象和国家主权，这两者将在保守党不再是一支力量以后在中美洲长期存在。

第 12 章

独立后前半个世纪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507 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需要使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委内瑞拉都督辖区和基多检审法院院长辖区在独立时组成一个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但是，它的目的不久就达到了，在1830年12月玻利瓦尔去世以前很久即已明显看出，这个共和国是不会持久的。帝国时期旧的行政划分一直不很清楚，各部门对边界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只是靠常识和地方感情来划定。在最后战胜西班牙军队之后，要波哥大的统治长期坚持下去确实不容易，因为彼此距离太远，各省的特性太强。这三个省之间没有牢固的经济联系。在殖民地时间结束时，不只是上层人士，广泛的舆论也都已感觉到各省有明显不同的特性。正如早期"古老的祖国"时代的联邦派所表明的那样，在一个小范围里很容易表现出感情，而对将在1830年出现的那样一个具体的共和国，就不容易产生这种感情。但是这个较大的实体确实也得到一些舆论支持，从帝国的历史传统和管理的地理条件来看，也有它的优越的一面。委内瑞拉平原上的普通士兵早在1816年就表明了他们是如何看待桑坦德将军的，他们把这位在波哥大受教育的库库塔人称为"neinoso futudo"①桑坦德将军以不信任对待不信任。作为副总统，后来又作为玻利瓦尔的反对者，他的许多行动和言论都表明新格拉纳达以

① 格拉纳达新领地的一个可恶的居民。

后会分离出去。南部边界更为模糊，反正是在波帕扬和基多之间的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大哥伦比亚的外表确实曾给人以深刻印象——它给坎宁先生以深刻印象，它给他派出的最初几位使节以深刻印象，它给19世纪20年代初期处理哥伦比亚债券问题的那些人以深刻印象。

大哥伦比亚曾得到承认。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最后还是接见了“那些黄皮肤的小个儿”，尽管他不愿意签订包含“共和国”这个英文字眼的任何条约。然而，外交部对于这个显然注定要成为西班牙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殖民地曾经表示很大关切，现在不到5年，越默默地注视着它的瓦解。皇家海军甚至还向它提供过一点援助。伴随着这一政治建筑物倒塌的是财政和经济危机，这是几个接着建立的国家后来的历史中经常反复出现的一种格局。在1826年垮台的，不仅是大哥伦比亚的信誉。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本国人来说，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过去对它的经济与财政资源普遍估计过高。（本国居民同样受到共和国早先的错误估计的伤害，而且也许原因更多。）大哥伦比亚支持过解放战争，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为在南方作战的玻利瓦尔的军队提供过人力和物力，在非常时期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为团结作出过努力和支付过开支。少数空想家和大批玻利瓦尔的军官以及一些反对各个新共和国中央当局、拥护联邦制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一段时期曾表现出怀念联盟的情绪。然而，在1830年，当时的现实主义者是派斯将军、桑坦德将军和弗洛雷斯将军，他们分别成了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的统治者。 508

这三个接着建立的共和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人口稀少：大哥伦比亚的全部人口还不足300万，其中新格拉纳达可能有110万，委内瑞拉有90万，厄瓜多尔有50万。三个国家的种族成份都很复杂，不但彼此各不相同，各国本身也多样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没有一个超过4万居民的城

市。在19世纪，它们的总人口和城市都发展得很慢。国内交通和共和国之间的交通一样，既费力又费钱。主要住在高地的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的居民长期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状态之中。沿海和内河航运在轮船出现之前问题很多，而轮船本身并非灵丹妙药，它必须有货物经济上才合算。各国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战争打乱和缺乏资本，货物很少长途运输，长途运输的货物只能靠骡队驮运，因为没有能力利用先进运输工具。少数地方有短途车辆交通。正如货物很少长途运输一样，人们也很少到外地去——因战争而流动的人数一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随着和平来到，大部分地区的人员流动慢了下来，又恢复了有限的地区来往。很少人有流动的手段、兴趣或自由，而且流动经常有损健康。定居的方式要服从条件，你不能不考虑条件。几乎没有任何人去过欧洲或美国。桑坦德将军如果不是被放逐，他也不会出远门。这种机会还没有强加给派斯将军和弗洛雷斯将军。人们的财产不多。根据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标准看，加拉加斯的贵族或许算得上是有钱人了。玻利瓦尔就是他们当中最富有的人之一。大哥伦比亚没有任何其他集团有过这么多的财富，而且大多数人在战争中遭到了损失。殖民地时代的贵族人数很少，除他们之外，没有几个人的财富多得使他担心官方会来鼓励他购买头衔。共和国的生活是在共和国的节俭气氛中开始的。保持节俭并不是由于自觉，也不是出于清教徒的信仰，尽管有些人以贫穷和俭朴为美德并且试图把它变成政治资本。实际上这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造成的。

独立时，三个共和国中人口最多的新格拉纳达的经济最没有活力。新格拉纳达有一些矿山：有波帕扬周围和乔科省用奴隶开采的金矿，有安蒂奥基亚主要雇用自由劳工开采的少数大矿和无数分散的砂矿，在托利马的圣安娜有吞噬大量投资的银矿。的确，在这个世纪最后25年种植咖啡之前，贵重金属一直是共和国最可靠的出口产品；而安蒂奥基亚的贵重金属生产一直不间断地占全国产量的大部分，这是该省在商业上领先的一个因素。哥伦比亚

采矿业没有遭战争严重破坏，虽然生产曾自然中断。尽管如此，它在下半个世纪中没有能迅速发展。外国在托利马和安蒂奥基亚的投资，总的来说收益不高。解放奴隶和内战打乱了这个国家南部的采矿业。没有发现新的矿藏，因而这个时期金银在共和国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金银的出口比新出口产品更持久，但数量也一直是令人失望的。

除金银以外，殖民地时代的新格拉纳达出口其他产品很少。西班牙波旁王朝热心于植物的人发现了一些看来有希望的东西——金鸡纳树皮和"波哥大茶叶"——并且从北部沿海出口少量的棉花、烟草和染料木，还有数量更少的其他热带产品。刚成立的卡塔赫纳商会和波哥大处于萌芽状态的报纸在殖民统治最后几年曾推测可能实现生产多样化。但到1830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511

相形之下，委内瑞拉是西班牙最成功的农业殖民地。委内瑞拉的可可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可可，它是这个地区运往欧洲和墨西哥的主要出口产品。在18世纪最后几年，委内瑞拉人开始转而种植咖啡，种咖啡支出较少，而收益较丰。在1810年以后的20年斗争期间。这种改变加剧。虽然奴隶制尚未消失，而且还继续种植可可，但是咖啡和分成制和自由劳动现在已居支配地位。在咖啡生产的第一个周期，主要是在中央腹地的山区种植咖啡。当时也出口棉花、烟草和皮张。骡马则运到各个岛屿。西边的安第斯山区各省最初与外界比较隔绝，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咖啡生产从这个世纪中叶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以后，这种隔绝状态才被克服。总之，和新格拉纳达相比，委内瑞拉的出口比较发达和多样化。沿海的厄瓜多尔也生产可可，质量不如委内瑞拉可可好，但产量比它大。除帽子以外，其他出口产品只运往邻国，主要是高原地区的作坊织的布和木材。这个时候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都没有开采重要矿产品。

1837—1838年曾到那里旅行的瑞典代理人卡尔·奥古斯特·戈塞尔曼提供了把三个共和国的出口值进行简明比较的数字（见

表1）。

这些数额确实非常非常小。（厄瓜多尔的出口收入按通常的兑换率计算，和当时萨瑟兰大公的年收入相等——20万英镑）。当然，它们只涉及一个经济部门，但是这个部门是推动增长和变革的主要因素，而政府的收入越来越依靠海关，它是秩序与稳定的支柱。

但它不是一个可靠的支柱。在19世纪，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都没有找到一种稳定的主要出口产品。它们对外国投资者也不是很有吸引力。所有这三个共和国有时一块儿、有时个别地遭受价格波动和衰退的影响，在价格下跌、生产者破产和商人停止进口时，已被削弱了的政府就面临更加窘迫的处境。例如，委内瑞拉的咖啡种植者借钱的利率远远高于殖民地时期的水平；

512

表1 出口

（单位：1,000比索）

日期	国家	商品	价值
1837	委内瑞拉	咖啡	1,660
		可可	875
		棉花	616
		总计	4,944
1836	新格拉纳达	棉花	199
		烟草	191
		金币	1,579（+1,000私下出口的）
		总计	2,828
1836	厄瓜多尔	可可	690
		帽子	100
		总计	1,000

19世纪30年代由于争夺劳工提高了成本；1837—1838年美国危机之后，咖啡价格下跌；他们又受到债权人宪章（1834年第10号法律）的严厉条款的束缚（该法律取消了过去殖民地时代对契约、高利贷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所施加的限制）。由此引起的一场文章论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次危机及其在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影响。在其他时期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格局。但是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期，咖啡仍是委内瑞拉的主要出口产品，出口量仅次于巴西和爪哇。委内瑞拉其他出口产品的价格同样也受猛烈的价格变动的支配，这种价格变动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剧烈。以安第斯各国为种植基地的咖啡出口的第二个周期内，产量增加了一倍，但是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哥伦比亚的首要出口农产品是烟草。在殖民地时期烟草由王室专卖，后来继续由政府控制，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但是政府既鼓励私人更多地参加——专卖是要花很多钱的——又鼓励出口。安巴莱马烟草找到了一些市场，特别是在德国，25年来烟草是哥伦比亚出口的支柱。哥伦比亚商人还试验过其他商品。当金鸡纳树皮的非常不稳定的行情合适时，出口过金鸡纳树皮。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棉花短时期成了时髦货，但在生产靛蓝的尝试中赔了钱。19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个国家的出口开始进入一个长期的危机。它们和委内瑞拉出口一样不能逃避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这场危机具有前所未有的彻底性：由于少量适合种烟草的土地的地力耗尽，加上东印度的产品占领了德国市场，烟草行业垮了台；哥伦比亚的金鸡纳树皮在充斥着锡兰货的市场上销不出去。有一段时期哥伦比亚除矿产品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出口。后来它转向咖啡，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有一定的种植规模，但是到19世纪末，经济恢复看来仍毫无把握。

厄瓜多尔的财富仍和可可联系在一起，可可占全部出口的1/2到3/4。整个19世纪，厄瓜多尔是世界上主要的可可出口国，外贸波动对它的影响不像它以前的大哥伦比亚伙伴们所遭受的波动那

么严重。可可给沿海带来了商业上和财政上的优势以及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快，而且山区不断有移民迁来沿海。沿海地区当时还生产大部分帽子。

一个仔细阅读那个时代的地理学家和比较有耐心和同情心的旅行家——奥古斯丁·科达齐、费利佩·佩雷斯、曼努埃尔·比利亚维森西奥、卡尔·阿普恩、伊萨克·霍尔顿和费里德里希·哈绍雷克——的作品的读者，很快就能描绘出在对外贸易统计数字中看不到的另外一种经济情况，感觉到另外一种经济生活。大部分当地手工艺人的产品能很好抵抗随着独立到来的进口产品的更加激烈的竞争。进口产品毕竟不是什么新东西。厄瓜多尔或哥伦比亚的纺织品并没有像19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迅速或完全毁灭。质量最好的当地产品——例如乔康塔的马鞍——仍在三个共和国各地出售。当然，手工业者对这个世纪中叶关税较低提出过抗议，但是他们并没有都严重地受到低关税的影响。有些活动还得到扩大，哥伦比亚的制帽业就是一个例子。运费依然昂贵，对物品的特殊爱好依然存在。互相起作用的当地经济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些。但是认识到这种不同情况的确有重要意义：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政策（或危机）在各地的影响是不同的。它使我们看到在逃脱执政官注意的地区的企业活动和机会，这些活动和机会也许规模很小，但是对以后的发展往往具有重大作用。它使我们能够摆脱周围那些使人产生误解的关于生存的陈旧的模糊概念，摆脱那种关于农村生活的传统印象——好象农村生活就不外乎是庄园主和债役雇农、种植园主和奴隶、印第安人村庄的传教神父和印第安人村社，还有就是平原某个地方有一些粗野的驯马人，通过土里土气的过程不时产生的考迪罗。

这三个共和国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并不是一样的，在每个地方也绝不是静止不变的。这些年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直接由新的出口作物带来的。咖啡在委内瑞拉产生了解放奴隶的影响。后来在哥伦比亚也产生了那种影响。殖民地时代的

可可种植园使用奴隶。有些咖啡种植园也使用奴隶，但是大多数咖啡种植园实行分成制，或使用季节工。工人们逃避旧的控制，被吸引到新的地区来寻找参加自由劳动市场的机会。在较小规模上，烟草在哥伦比亚起了类似的作用。除这一点影响外，它还有深远的影响。这个炎热的国家的第一个重大事态发展使汽轮航运通到了马格达莱纳河，使哥伦比亚人第一次同欧洲直接进行贸易。沿海的可可逐渐改变了厄瓜多尔的平衡局面。

如果设想拉丁美洲独立斗争的领导人都曾致力于建立平等的农村秩序，那种想法是不符合时代的实际情况的。关于给军人一些土地的许诺本来就不打算认真执行，事实上也没有认真执行。但是不能说，除了招兵的影响和物质上和财政上的破坏以外，旧秩序仍然完整无损。奴隶制并没有完全废除，但是由于征召黑人入伍、结束奴隶买卖以及库库塔制宪会议有限的解放奴隶命令，使奴隶制遭到了破坏。长期以来，奴隶制在厄瓜多尔的作用并不重要，而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某些活动中的作用一直比奴隶数目（1830年左右两国分别有42,000人和45,000人）所表明的作用要大。但是，在这两个共和国中都没有开始进行任何使用奴隶的新活动，而且在许多地区，没有再有效地重新确立旧的权威。早期的大哥伦比亚立法曾试图把印第安人村庄纳入共和国的进步潮流，但是由于印第安人的反抗和政治上与财政上诸多不利，这些计划不久就被放弃了。印第安人也许现在更不听从政府的干预， 515 更不像殖民地时代晚期那样听命于教会的控制。教会的控制从来就不是彻底的，现在更加削弱。教会在这里的影响同在比较温和的地区的老拓居区、比较老的山地城市和印第安人势力较大的地区的影响差不多。在整个委内瑞拉，教会势力并不强大：它的主教管区不富裕，它对帕尔多人（指黑人奴隶或已获自由的奴隶）没有什么控制。东部的传教团体已被摧毁，教会力量较大的西部各州在国家事务中还没有什么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听从教会控制。在新格拉纳达也是如此，教会的力量支离破碎：梅

斯蒂索人的哥伦比亚曾有许多关于殖民地敌视教会的例子。在这个炎热的国家，很少地区被彻底地教会化——托利马、考卡山谷、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从来没有受到像博亚卡、昆迪纳马卡和帕斯托等高原地区那种程度的教会控制。在厄瓜多尔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加西亚·莫雷诺的神权独裁统治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人们常常大肆宣传庄园主和神甫控制农村生活，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许多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庄园主和神甫的权力或者已被削弱，或者从来就不存在，或者由于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受到约束，像委内瑞拉的平原，居民分散的马格达莱纳河谷，托利马的养牛的平原，考卡山谷，厄瓜多尔沿海比较自由的地区就是如此。上面已经说过，奴隶制在衰落。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奴隶制以外的农村结构非常复杂多样，决不能用像劳役偿债制这样一个简单的字眼加以概括。

把农村居民说成主要是奴役性劳动者，不仅忽略了幸存的印第安人村社和独立的小拓居区，也忽略了其他许多非农业性活动，如手工业、采矿、畜牧、饲养骡马以及驮运业——这是当地许多有名的巨富开始发家致富的一种重要的活动。不同地方的债役雇农也不都是一个样子的人，也不一定是终年只从事一种活动。描述地方习俗的19世纪作家喜欢在这种风俗和另一种风俗之间加以区分，并且喜欢描述他们的全部习惯和活动。现在历史学家也开始这样做。好的描述不仅应当生动笔真，它还应当有助于说明这样一个看来似乎矛盾的问题，即这种所谓静止的和多层次的社会是难以掌握的。

516

对所有这三个共和国来说，19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有的统治不稳定，有的比较令人乐观，但至多只是不久前才摆脱不稳定状态。所有三个国家都经常遭受内战之苦，19世纪结束时还处于战争状态。当时大部分当地的著作都对这种令人失望的状况表示痛心；回想起早先的光荣战争——这些战争和今天的战争差不多

是同一个方式但却是反对不同的敌人——这些地方性斗争就显得更加不光彩。大部分外国评论对这些所谓革命严厉指责，甚至挖苦嘲弄，把它们归咎于狂妄自大、莫名的好战精神和争权夺利，或归因于没有君主立宪制、种族混杂或拉丁人的不可救药的轻浮性。大部分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所关心的是这些革命的进程以及这些国家长期不能成为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原因，然而没有很好分析不稳定的原因，也没有估价不稳定的意义和程度。秩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几个外交家或外国旅行家对它进行过详细研究，没有几个当地的军人或政治家能在自己的著作中摆脱党派观点，或者都想寻找一个单一的原因。夸大其词的文章有的偷偷出现，有的大批涌来。讲国家权力只讲最好的时期，毫无道理地强调明显的全国性事件而不强调地方上的事态发展，这种作法往往夸大了这些危机的灾难性。同样，有些著作把不正规的战斗和野蛮与残暴混为一谈，把政府破产和普遍性毁灭混为一谈，把黑人和印第安人参战和种族战争混为一谈。判断的标准完全是欧洲式标准。这并不是说许多南美洲人不赞成这种标准，也不是说混乱状况可以轻易不予考虑。

这些新政府都实行共和制，致力于成立共和制的代议制政府。新格拉纳达在1853年、委内瑞拉在1853年、厄瓜多尔在1861年宣布男性公民普遍享有选举权，尽管每个国家都规定了选民的文化条件。当然，这个世纪中叶的这些安排既不是在各地全都实行，也不是不可逆转的。选举是合法性的来源，不能因为选举中广泛产生不法行为而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可以弃之不要。但是选举是合法性的一个不完备的来源。选举不得不由政府来“组织”，所有三个共和国都是在某些排他性集团的控制下开始它们的独立生活的。派斯和他的朋友们把持着委内瑞拉，排斥许多从战场回来的玻利瓦尔的军官和其他有功劳的爱国人士。桑坦德将军最先看到，掌握复杂的选举机器和宗派主义新闻机构是在新格拉纳达走向权力的道路。他在世俗、宗教和军队方面树敌甚多，并且始终 517

对他们保持强烈的敌意。弗洛雷斯将军甚至不是厄瓜多尔人，他的军队中许多人的肤色和厄瓜多尔山区人民的肤色不一样。这三个人都是在战争中树立的威望，但是这种威望并不是无敌的或无可争议的。

他们也没有得到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的支持。教会的财力和领导权在战争期间都遭到了削弱。许多主教的位置出缺并且一直空着，教会组织已部分瘫痪。所有三个共和国都继续信奉天主教，并且谋求继承西班牙国王的圣职推荐权，但是外交方面的纠葛使罗马到19世纪40年代才承认这些新国家。而共和国的天主教教义是走了样的天主教教义。派斯将军在1835年驱逐加拉加斯大主教，从而十分明确地表明，教会的支持在委内瑞拉是多么无关紧要。桑坦德将军的主张与行为同样也表明他不打算争取教会的支持。但是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教会：它可以给它的朋友以宝贵的支持，使它的敌人遭到危险的反对。然而，由于教会和这些独立后的政府之间有许多摩擦根源，因此不能把教会看作是维护秩序的支柱。它的影响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不一样，有时极为重大，有时微不足道。教会本身也没有强有力的统治集团，而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对于采取决定性的全国行动十分必要。主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他自己的主教管区的太上皇；波哥大无法控制帕斯托或麦德林的宗教感情。

在殖民地时期，这里没有非常强大的行政机构。取代它们的共和国行政机构同样也不强大。内阁通常只有三、四个部——种植园部、国防与海军部、由政部、对外关系部——并且常常是两三个部由一个人掌管。机关的数目不多，官职的任命权有限。许多职位并不吸引人，政府发现很少人愿意担任各省的法官、市长、甚至省长。有些职业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或以腐败手段得到报酬——尤其是在莫纳加斯兄弟和古斯曼·布兰科的委内瑞拉。多数职业并非如此。多届政府以廉洁简朴著称，如委内瑞拉的派斯政府（1831—1835，1839—1843）和索夫莱特政府（1843—1847）、新

518

格拉纳达的埃兰政府(1841—1845)和马里亚诺·奥斯皮纳政府(1857—1861)、厄瓜多尔的比森特·罗卡富尔特政府(1835—1839)几乎都同财政丑闻没有牵连。但是,节约和正直并不一定得到以政治支持为形式的回报。在这些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政府直接雇用的或者与政府活动直接有关的人数还很少,即使把军队包括在内也不多。

大家都很清楚原因是什么。政府缺乏收入,因此要节约。这里再次引用斯堪的纳维亚人卡尔·奥古斯特·戈塞尔曼关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这是既不令人高兴又不令人失望的年头)的冷静计算(见表2),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

表2 国家收入

日期	国家	来源	价值(单位1,000比索)
1837	委内瑞拉	进口税	968
		出口税	168
		其他(包括在221,000比索关税上附加征收的特别税)	463
		总计	1,599
1836	新格拉纳达	关税	907
		烟草专卖	237
		食盐专卖	225
		其他	654
		总计	2,023
1836	厄瓜多尔	关税	202
		身份证(印第安人缴纳的贡金)	184
		其他	194
		总计	580

519 这些爱国者最初以为，采用比较先进的税收制度、开放港口和制订仔细计算的关税将使他们得到财源，这种财源将远远超过殖民地时期的累退性的、压迫性的“常规”收入。他们梦想进行地籍调查，梦想征收直接税。但是征税基础的性质和战争的无止无休的需求到19世纪20年代末就迫使他们恢复非常类似旧制度的税收制度，这种制度只能由接替大哥伦比亚的国家来慢慢抛弃。他们在财政思想上是富有想像力的，甚至是敢作敢为的——哥伦比亚结束烟草专卖就是财政上一个自觉的冒险行动——但问题是棘手的。每一种收入都有它的限度。随着1826年的经济崩溃，外国贷款没有了。尽管后来作出努力来恢复外国贷款，但是在这些窘迫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可能是优先要做的事。不论是哥伦比亚还是厄瓜多尔在1830年后的50年中都没有再向国外大量借款，虽然委内瑞拉的古斯曼·布兰科在19世纪60年代看到恢复借款至少对个人有好处。每个政府都有它的一批金融方面的引水鱼——证券投机商——这些人是筹借短期贷款和操纵这些政府不久前拖欠下来的把人搞糊涂了的各种各样内债的行家，但是国内金融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只能提供少量利率很高的短期贷款。在委内瑞拉，古斯曼·布兰科在19世纪70年代和“信贷公司”一起改革和提高这些安排取得成功。也是在70年代，哥伦比亚创办了第一批银行并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在这整个世纪，这些政府仍然经常遇到尖锐的财政紧急状况。大家都去寻找新的应急措施。教会财产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两国都遭到牺牲；在本世纪末在厄瓜多尔遭到埃洛伊·阿尔法罗的进攻。但是教会并不十分富有，在这些艰难时期的收入是令人失望的。唯一能够迅速扩大的一种收入是关税，所有这三个共和国都越来越依靠它。例如，到19世纪60年代，关税收入占哥伦比亚财政收入的2/3以上。曾经尝试实行过盐和酒类专卖、征收土地税和其他许多办法，并且作了许多努力和费了许多心机对它们进行调整，但是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能制订强有力的措施（而如果政府有更大财力，这些战争本来也许就可以避

免)。但是即使采取强有力措施，在它们的严厉的外表背后，对那些完全付不起钱的受害者也只能实行妥协。

因此，这样的政府谋求把支出保持在最低限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里，欧洲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和当地的需要不谋而合，使得当地的自由派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的弱小的政府是进步的先锋。他们经常试图削减的一个重大支出项目是武装部队。海军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认为要塞是反对共和国的，因而任其坍塌，甚至予以拆毁。1830年以后各国的常备兵力不断削减，只保持少量退伍老兵，他们只是以看守军火库和在紧急状态时征招入伍，但是在和平时期尽量减轻对国库的压力。大哥伦比亚解体后的政治环境对削减军队有利。派斯将军利用在他直接指挥下的军队并且通过和一些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物实行妥协在委内瑞拉建立起他的统治。在委内瑞拉国外的许多玻利瓦尔的军官被拒之门外。在新格拉纳达，大量军官正是这些委内瑞拉人，还有许多委内瑞拉士兵。他们想在当地落脚，但未成功。他们的离去使波哥大政府松了一口气。弗洛雷斯将军和部分委内瑞拉人组成的军队在厄瓜多尔建立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各个地方的军队人数很少，并且从来没有多少部队保持满员，所以实际人数比官方所说的人数要小。委内瑞拉拥有8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新格拉纳达有4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和3个骑兵中队，力量相对雄厚，总共有3,300人；然而，由于经常不断地设法使这个数目降下来，到这个世纪中叶人数不足1,000人。厄瓜多尔官方维持720名步兵和360名骑兵。因此在整个前大哥伦比亚，常备军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有些时候还要少一些。即使是这个数目，也占用了各共和国的一大部分预算。戈塞尔曼说，武装部队费用在厄瓜多尔为510,000比索(预算收入估计为580,000比索)；新格拉纳达是818，000比索(预算收入为2,517，000比索)；委内瑞拉是481，000比索(预算收入为1,599,000比索)。不应把这样高的军费比例看作是军事考虑占上风的迹象。这个比例是出于政治生活的

520

简单事实：需要最低数目的军队来保持一些据点。但即使是少量军队也很费钱。军队和行政人员不一样，必须给他们发饷，否则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迅速变成对他们周围环境和他们主人的威胁。

引起骚乱和造成这种“军国主义化”(许多人无意之中注意到这种“军国主义化”,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解释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些人数不多的军队或正规雇用的军官。这些守备部队大多数是忠于雇用他们的政府的。不是没有发生过兵变——1835年在加拉加斯就发生过一次引起改革派叛乱的兵变，梅洛将军在1854年以同样方式在波哥大成立了一个罕见的哥伦比亚军政府——但是这种情况不是这个地区的特点。内部冲突和内战有更广泛的和不那么简单的原因——它们不是这些微不足道的驻军所做的事情，而很可能是当局势变得紧张时，这些驻军无法控制局势。

殖民地时期的所谓政治，就是官僚机构和市政委员会要要阴谋,教会搞竞争,但是独立带来一种在强烈程度上、规模上、方法上以及各种各样的结果上都是新的政治生活。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是完全新型的。例如，在波哥大人何塞·马里亚·卡瓦列罗的《圣菲省日记》的笔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它本来是1810年在殖民地收集的对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和自然现象进行的观察,可是到共和国时代就突然变成了一本公认的政治日记。到1830年，整个大哥伦比亚已经历了几次不同的选举、国会、制定会议、族长会议、建立党派及其附属报纸——以及组织选举、解散议会、对报纸进行恐吓、放逐政治反对派等等作法。士兵和平民都知道这些手法。

参加选举是正式受到限制的。最初对选举权施加了限制，并且某些选举是间接选举。然而，有许多迹象表明，非正式参加选举的规模更广泛，而发表意见(政府对它最担心)不限于具有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的公民或那些愿意选举的人。哥伦比亚人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1845—1849、1863—1864、1866—1867三任总统、大将军和波帕扬贵族）在和他的政治总管拉蒙·埃

斯皮纳将军的通信中表示非常关心激发人民提意见的详细情况。莫斯克拉这样做只是仿效当地政治习惯的带头人的榜样：桑坦德的民主方式使英国驻大哥伦比亚的使节们大吃一惊，他在选举时期穿着平民的套头斗蓬在小酒店和人们干杯。胆小的上层阶级选举人往往发现谨慎的作法是听从他们当地人民的意见。从哥伦比亚共和国单独存在的最初的日子开始，它的舆论就不统一，波哥大从来就不容易控制它。桑坦德精力充沛，他是一名通讯员，是《日报》的一名显然是匿名的、半官方记者，他控制着政府，他愿意把这种控制用来为他的党的目的服务——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做到让他希望在1836年的选举中接他班的候选人回国。获胜的文职人员何塞·伊格纳西奥·德·马克斯有足够的支持使他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支持来治理国家。他的威信不高，他拥有的支持局限于中部高原。他缺乏足够的全国性舆论的支持。 522

委内瑞拉的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地位多少比较稳固，他把对共和国的统治一直保持到1848年初。但是这决不是仅仅由于众所周知的他和高原的和睦关系，他的统治也决不是未受到挑战。派斯的统治地位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军事威望和随着这一威望而来的在紧急时期招募军队的能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1835年和1846年已得到证明。但是，派斯在玩弄政治手腕和实行妥协方面的本领也很重要，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付像马里尼奥将军和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将军这样的敌手方面看出来。派斯并不是唯一拥有军事威望的人，其他人也能招募军队。和他的一些继承人相比，派斯处理问题的手法较轻：1830—1848年的“保守派共和国”虽然在1835年以后放逐过它的一些敌人，但是派斯将军和他的朋友以及加拉加斯商人阶级的联盟似乎对国家并没有造成压力，30年代的繁荣持续的时间较长。委内瑞拉的出口在战后迅速恢复，乐观情绪不断高涨，直到1837—1838年美国危机的影响使价格跌落为止。此后，派斯政权遭到反对的程度和恶毒性加剧，使人们对政局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看到了派斯的权力和威

望的局限性。加拉加斯的殖民地商业传统使商人和地主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这种利益的不一致显然比大哥伦比亚其他地方更容易加以利用。出口价格下跌加剧了这一潜在的冲突，出现了一个地主反对派，反对这些年向商人倾斜的政府。地主反对派拥护自由派事业，并且看来愿意使自由派事业走向罕见的教条主义的极端。这个反对派产生了两个天才记者：一个是理论家托马斯·兰德尔(他在遗嘱中吩咐把他的尸体像边沁那样制成木乃伊)。另一个是多才多艺的、有密切的社会关系的煽动家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可以认为，兰德尔和古斯曼开展的运动在正式承认的政治阶级内部和外部都有影响。他们在各省找到读者，这些读者又找到听众。古斯曼的威望能够把群众——大批“手工业者”和其他不那么好划分的人——聚集起来。政府对选举的控制减少，已无法保证稳定的继承。1844年，瑞典外交家阿德勒克罗伊茨伯爵(他本人作为一名玻利瓦尔的雇佣军上校在组织选举方面有第一手经验）向他的政府报告说，自由派已在各省的直接选举中获胜，“寡头政党”只能做到对全国国会的间接选举施加压力；即使这样，它也只能选出平庸之辈。在经济危机、骚乱增长的情况下，派斯失去了“群众的喜爱和同情”。

523

来自基佐和路易·拿破仑的欧洲的旅行者帕默斯顿和弗兰茨-约瑟夫对人们在低级聚会场所和边远地区发表的政治谈话之多感到吃惊，上述那种喜爱和同情就是在这些低级聚会场所和边远地区表现出来的，并且不是没有后果。帕默斯顿和弗兰茨-约瑟夫不愿承认这种政治生活有很大意义，因为这种政治生活除了在城市里有少数零星的政治俱乐部和一些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只有一份不定期出版的报纸和一个微弱的记者网)以外，没有正式的或永久性的机构，而且社会上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文盲。他们过高估计了地主的政治控制。权力经常带来土地，但是土地决不会自动带来权力。他们低估了没有主人的人的数目。他们也不可能理解，地方的敌对和反感情绪(它们往往具有殖民地时期的根源）是

如何卷入新的共和国政治之中的。即使社会是由一批地位巩固的上层人士牢牢控制的——大多数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上层人士也会找到在它们内部进行争吵的理由。大家都清楚知道的城市与城市、省与省之间的敌对往往会在不易觉察的水平上——一直到下面小市镇的区——重新出现。

必须从这种背景来看待革命和所谓的革命。要在只有这么多的篇幅的研究中详细说明它们的原因和进程是不可能的。委内瑞拉经历了1835年改革者的叛乱，这是由被排斥的玻利瓦尔分子对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博士的不成熟的文官政府（这个政府将自己置于派斯的保护之下）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1846年发生了广泛的叛乱，派斯本人进行了战斗，反对他的最后一个提名候选人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在1848年取代他，但是没有成功。莫纳加斯家族的10年统治并不是平静的，最后发生了1859—1863年的联邦战争。古斯曼·布兰科的政权并不巩固，直到1868年和1870年他再次进行斗争之后，才巩固他的权力。在新格拉纳达，教会的不满情绪1839年在南部的帕斯托爆发，这种不满情绪发展到在其他省发表一系列联邦主义宣言，即1839—1842年的“最高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的保守派中央集权政府看到它的人员和政策在40年代后期被继任的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政府逐步抛弃。保守派在1849年选举中完全丧失了权力。1851年，他们对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将军的自由派政府发动叛乱，但未获成功。（他们在洛佩斯背后看到了得人心的、更令人不放心的何塞·马里亚·奥万多将军。）他们在学生、手工业者和考卡山谷黑人的混乱和充满矛盾的骚乱中，甚至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幽灵。奥万多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但又是个胆小的政治家，他把地盘让给了何塞·马里亚·梅洛将军的短命的军事政权，而这个军事政权又在1854年的短促战争中被各种派别的绅士所招募和领导的军队所压服。当时在选举中获胜的保守派政府——在新格拉纳达，普选也就是反对革命 524

——后来被莫斯克拉将军领导的1859年至1862年的联邦主义的自由派叛乱所推翻。像委内瑞拉一样，哥伦比亚通过了一个极端联邦主义的宪法，但是那里不存在产生一个古斯曼·布兰科的条件。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若干次地方性叛乱。哥伦比亚人在1876—1877年、后来又在1885年打了两次大内战。在委内瑞拉，古斯曼·布兰科在1870—1888年长期享有的最高权力似乎表明某些地理政治问题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但是接下来1892—1898年华金·克雷斯波将军领导期间并不完全平安无事。克雷斯波将军本人在战斗中被打死。像哥伦比亚一样，委内瑞拉在内战中结束这个世纪。

在厄瓜多尔，山区居住着大量印第安人——这是一个孤立的地区，只是断断续续地参与白人和乔洛人*的政治。这可能导致人们猜测这里的政治生活由于一定的消极状态而放慢了。这可不是一个可靠的结论。山区居民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弗洛雷斯在1845年逃亡以前曾镇压过几次暴动。各省的敌对状态非常尖锐，领导权的范围和能力都受到限制。报纸在这里比在哥伦比亚或委内瑞拉更难立足而且读者更少，它以特别恶毒的姿态来弥补这一缺陷。

525 从1833年对那些支持《自由基多人》报的人进行大屠杀的时候起，厄瓜多尔新闻界建立了一种暴力和煽动暴力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和他的对手胡安·蒙塔尔沃而达到众所周知的顶点。但是这里应当强调前者紧张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弗洛雷斯并没有给厄瓜多尔留下一个平静的古罗马执政官的传统。

这些战争在这整个地区有某些共同特点，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样。它们常常恰好在经济困难时期发生，有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时发生，有时是在当地的特别不幸的时刻发生——而如果确是在这种时候发生，就更严重。经济困难使政府的收入减少，贫穷的政府更无力使支持他们的人感到满意和热心起来，更无力反对他

* 在拉丁美洲有些国家，梅斯蒂索人也称乔洛人。——译者

们的敌人。当贫穷的政府的支出对地方照顾不够时，各省的地方性不满情绪就变得更为强烈。在整个经济中，其他后果使发生麻烦的可能性加大。新的作物或新的出口活动，像19世纪50年代委内瑞拉平原的皮张繁荣或19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桑坦德的采集金鸡纳树皮的活动，都使大量的人涌进新的地区和重新依赖波动的市场。"只求生存"这话听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例如，19世纪30年代末咖啡价格下跌，遭到损失的不仅仅是过份扩大经营的委内瑞拉种植园主，而且还有被解雇的工人，他们失去了工资，现在也许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种植季节来了，但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不是说这些人对叛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有些人会参加叛乱。这种困苦、烦恼和不幸——不是博亚卡或皮钦查高原上受压迫更深的人的长期贫困——提供了革命可以利用的气氛。这些地方实际上没有维持治安的部队。

这些战争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受资源和地形支配：很难使叛乱迅速结束，即使在它们最初规模很小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征兵，而征兵使自己更不得人心。所有三个共和国都有民兵制度，但是不能依靠它们到远处去作战，而在叛乱地区根本不能依靠民兵。征兵是一种使用暴力和不得人心的作法。比较顺从的居民会跑开，躲藏起来，其他的人将凶狠地进行抵抗，可能使叛乱进一步扩大。开小差是如此普遍，以至法国旅行家霍林斯基说，在厄瓜多尔，敌对的司令官们似乎必须催促他们的军队赶快上战场，因为他们 526 担心在彼此面对面时将无一兵一卒而成了孤家寡人。事实上，催赶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通常是不可能的。军队得不到充份的给养他们不得不分散活动才能生存，因为每个地方剩下的物资都有限，他们不得不根据资源情况和气候条件进行活动，不超过给养供应所能允许的程度，也不超过军队能经受得住的气候变化。政府偶而得到比较热情的支持，但是总的说来它们依靠以老战士为核心费力聚集起来的少量军队，并且很谨慎小心地行动。叛军更多地是依靠志愿兵，依靠对事业的激情和获得掠夺品的前景，并且依

靠当地游击队。优秀的领导人必须了解当地战争的实际特点和心理特点、所在地区在资源和人力方面能够生产或支持些什么、以及发动地区居民的技巧。给予多种多样高级头衔与其说是反映了拉丁人对头衔的一种幼稚的爱好，不如说是反映了有必要使当地的情绪保持平衡。

很难在这些人物中发现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考迪罗。他们大多是有某种社会地位，尽管财产和招募军队的能力之间很少有直接关系——即使像派斯和莫纳加斯这样的平原人也是靠他们的威望而不是靠他们的财产来招募士兵的。"得人心"的领导人（像何塞·马里亚·奥万多和埃塞基耶尔·萨莫拉）一般都有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并不象他们的罗曼谛克的崇拜者所描绘的那样；萨莫拉和奥万多两人都拥有少数奴隶。有些人在独立战争中树立了威望；战争中的许多老战士在19世纪60年代仍然能够并且愿意上战场。他们所显露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在类型上和渊源上并不相同。萨莫拉开始营生时是一个外省商人和放债者，当民兵军官时发现了他的特殊的军事雄心；1846年他把这种对战斗和指挥的喜爱纵情地用于反对派斯。他使用游击队，但是他远不止是一个游击队领袖——他的杰作圣伊内斯岛战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壕伏击战。他也许对过火行为有宽大的解释，但是对于那些滥用这种解释的人，他严格执行纪律。作为胜利者，他是仁慈的模范。他作为一个平等主义的改革者的名声无非就是靠人缘好——一种和各个阶级都合得来的本领——正像他的军事地位的上升完全来自作战的才能一样。他不是平原人，也不想成为平原人；他不是任何特定地区的产物。许多战役他都打赢了，直到最后死于1860年的圣卡洛斯战役。

何塞·马里亚·奥万多是上个世纪产生的哥伦比亚最孚众望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和波帕扬的名门望族有非婚生血缘关系，但是他所以在南部具有威望首先是因为他曾为西班牙国王作战，其次是因为他减轻了爱国者职业的横暴行为。他在帕蒂亚河谷有些

土地，这是养牛地区，一直供给他一百名左右的骑兵。他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反对玻利瓦尔，1831—1832年担任副总统。他因被控暗杀玻利瓦尔最忠实的副手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他在1822年下令劫掠帕斯托，南部人民不太哀悼他）而声名狼藉，也因在被放逐的桑坦德回国之前使新共和国得到巩固而声誉四起。奥万多随后的生涯——因苏克雷事件再次受指控，内战，流放和贫困，回国和当选总统，失败与耻辱，和他的宿敌莫斯克拉结成联盟，1861年胜利前夕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丧命——含有一种令人感到悲怆的因素，使他活着的时候赢得了“美洲的奥狄浦斯”的称号。奥万多既有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由于他受过帕波扬贵族迫害和驱逐的历史而使这种吸引力更大），又有军事才能和良好的军人风度。这种吸引力不仅在帕斯托和考卡山谷的其他地方有，在加勒比沿岸和波哥大的手工业者中——他们是奥万多在1835—1854年短时期担任总统期间最有效的支持者——也很明显。但奥万多是殉道者，不是政治家，他未能把他的优势变成权力。这些激进的名声是感情、爱戴和威望问题，而不是纲领问题。

其他全国性军事人物——并不是说只把他们看作战士——的生平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莫纳加斯兄弟和索蒂略家族是平原人，他们和委内瑞拉东部平原保持密切接触。马歇尔·法尔孔出身于科罗附近一个拥有土地的家庭。在科罗城，这个和善而有文化的人首先作为一名有进取心的少爷而闻名。古斯曼·布兰科的父亲是加拉加斯记者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母亲是贵族。有耐心、忧虑重重、明白事理的埃兰将军（1841—1845年任新格拉纳达总统）出身中等家庭，长期从事军事生涯，有一段时间在王家部队中度过；尽管如此，他很有平民化的思想。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是瓜亚基尔一个商人的儿子，曾学习当教士，达到低级教阶。他打过许多仗，在1861—1875年处于有权势地位的岁月时他远比新格拉纳达最严厉的将军还更容易处死反对派。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出身于一个波帕扬领主的家系，曾 528

从事无足轻重的职业，即在独立战争后期在他父亲的朋友玻利瓦尔手下当兵。他的权力欲可能和这一背景有关，但是这肯定不能说明他随后的飘忽不定的政治生涯，也不能说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与失败。大部分时间他的家人怀着惊恐和不赞成的心情在一旁看着。

这些领导人并没有构成任何明显的和自觉的特权阶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主要是军人，许多人像平民一样对内战有深深的厌恶情绪。法尔孔和埃兰是军人爱好和平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这一级司令官以下的军人的情况也不一致，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按它自己的看法对破坏秩序的行为作出反应。有些地方产生了获得残暴名声的比较小的司令官，人们由于担心种族冲突或再发生过去的暴行因而对这种残暴行为加以渲染。在委内瑞拉有“印第安佬兰赫尔”和“印第安佬埃斯皮诺萨”（他们是1846年和1859年的人物），有东部的索蒂略团伙。在哥伦比亚有奥万多的盟友“土匪”萨里亚，铁拉登特罗的派斯的印第安人的瓜伊纳斯酋长，以及卡利的穆拉托人戴维·塔尼亚将军（他在一次著名的场合让出身高贵的保守派妇女打扫城市街道）。厄瓜多尔山区的印第安人并不总是驯服的受害者或别人的冲突的旁观者。这些等而下之的人也进行过残酷的战斗，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战斗中确实发生过种族间的屠杀。在委内瑞拉联邦战争中，巴基西梅托地区就发生过这样的例子。这些战争加强和加剧了当地的对抗情绪，因为参加这些战争的人一再采取某些不可避免的方式：这次战争中输了，在下次战争中报仇。

然而人们容易夸大动乱的剧烈程度和范围，并且很容易夸大这些冲突中的残暴行为。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且不说其他原因——一切战争都是这样，有时长时期过去了，并没有发生很多事情。军队仍然人数较少，许多调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战斗伤亡很大，由于疾病和不适应环境而造成的死亡更为普遍，但是屠杀和处死的情况远比外国观察家根据大部分战争的不正规性所推

断的要少得多。他们的结论看来往往是根据他们对混血种人的残暴性所持的偏见和看到拿着长矛和大刀的衣衫褴褛的军队而产生的震颤心理得出的。他们把"南美洲"的这种战争和阿根廷与墨西哥发生的战争混为一谈，而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正如在西班牙一样)。哥伦比亚人何塞·马里亚·桑佩尔抱怨说，"罗萨斯是我们的象征；圣安纳、贝尔苏、莫纳加斯和其他可怕的人物被看成了一般规律。"这些人当中只有莫纳加斯代表这三个共和国，而他只是因为腐败而使人们感到可怕。没有关于这些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的可靠数字，一些进步的克里奥尔作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把可能的数字加以夸大：人们怀疑，康拉德的唐·何塞·阿韦利亚诺斯在他写的《治理不当的五十年》一书中把科斯塔瓜那共和国过去的历史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黑暗和更血腥。这些作家怀着耻辱和失望的心情来写作，常常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背景，这种背景并不总是能帮助他们了介那些起作用的过程。很少人没有党派性——任何地方都是那样，一方的"有力措施"在另一方看来就是暴行。另外我们还必须把这场冲突同另一场冲突加以区别，并且记住，每一场特定的战争对某些省份的影响总要比对其他一些省份的影响大。政府可能不得不宣布它们整个领土的公共秩序遭到破坏，而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

529

即使是短期的战争也可能使财产特别是牲畜遭到很大破坏。比较大的战争，象委内瑞拉的联邦战争和哥伦比亚的莫斯克拉与奥斯皮纳的冲突，造成了按比例来说比较大的损失，因为政府和叛军都依靠紧急勒索，军队从一个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地方开拔到另一个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地方，农业荒芜，贸易停顿。最糟糕的战争无疑产生严重的直接经济后果。所有的战争都破坏人们所期望的稳定：公共工程停止建设，想把政府财政搞好的努力不得不置之脑后，信任和威望丧失，利率提高，投机分子使企业家黯然无光——如果一个人不是兼有这两种身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关心的是当前自己的存亡，不可能去关心花费更多的连

续性。主要感到痛心的是那些人，他们在这些共和国内期待的政府是他们无法维持的政府。

战争还产生其他一些后果。前面已经说过，战争加强和加剧了——有时是制造了——对抗情绪。这种对抗情绪在比较和平的

种潮流或派别还是支持另一种潮流或派别并不是那么容易分清的——不能说商人就是自由派，地主就是保守派。所有这些简单的概括都太轻率，不值一驳，完整的说法必须建立在对地区、家族、事态、甚至才干和倾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有的划分似乎很清楚，例如19世纪40年代委内瑞拉商人与地主的对抗。但是仔细一观察就模糊不清了，或者造成这种区分的问题一解决，这种划分就不适用了。然而，政党是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否认，在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方法启发下进行的分析也会大大有助于了解这些结构，但是许多情况将会分析不了。拥有土地并不是那么容易变成对邻近地区的政治控制或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城市政治可能是难控制的，大城市闹腾的问题在小城市会有反响；蒙波克斯的手工业者和波哥大的手工业者一样关心他们的利益并且接受同样的民主思想。

531

自由主义思想牢牢控制人的头脑以及这些思想发生演变的例子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例如越来越清醒的萨尔瓦多·卡马乔·罗尔丹和总是容易激动的贵族激进派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博尔达（他至死都相信耶稣会教士的密谋和放毒事件）的思想就是如此。1877年，哥伦比亚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和到过许多地方的商人恩里克·科尔特斯列举了他认为他的党已经得持久性胜利的一些问题：废除永久性产业和取缔女修道院；废止因负债而坐牢、使人蒙受耻辱的惩罚、强迫劳动和死刑；新闻出版绝对自由；市政自由。一些很少怀疑的自由派可能会使这个单子更长，加上自由贸易、驱逐耶稣会教士、建立联邦制、教会与国家彻底分离。但是科尔特斯不是狂热分子，他对这些成就能持续多久表示怀疑。他对他记录下来的那些项目在他认为十分之九处在黑暗之中、十分之一处在光明之中的居民当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重要性也不抱过多幻想。但是他的确认为这些是他的党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后来他还拿它们和1885年保守派的反应作对比。

保守派不同意的理由绝不是根据殖民地时代陈旧的论点。在

哥伦比亚，19世纪40年代初期担任内政部长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的回忆录用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现代方式汇集了保守派的论据。当地的传统保守思想不仅以不同于委内瑞拉的方式保持下来(在委内瑞拉，保守派论点不得不以自由主义一实证主义的伪装出现)，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60年代和70年代的自由派政府经常遭到保守派的批评，这种批评既来自报界，也来自教会，也来自安蒂奥基亚邦的范例——这个邦是一个和平、比较繁荣、统治力量强大、在天主教影响下的和保守的邦。自由派不得不接受1882—1885年期间实行联邦制和自由贸易的激进共和国垮台的后果，在这场危机中，“无党派者”和保守派表明自己比较讲求实际。这个共和国是在拉斐尔·努涅斯(1880—1882年和1884—1894年的总统)和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1894—1898年的总统)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结束这个世纪的。这两个人不仅是令人生 532 畏的善辩家和政治家，而且有大量的保守主义论点。哥伦比亚在官方和在宪法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孤岛，夹在委内瑞拉的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1899—1908)的混乱的自由主义和厄瓜多尔的埃洛伊·阿尔法罗(1895—1912)的激进主义之间。人们可以尖锐地感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帕斯托主教管区，即使在自由派政府统治下，也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相反，在安蒂奥基亚、在委内瑞拉的安第斯山区、甚至在厄瓜多尔山区的天主教徒不时地遭到好斗的、世俗化的行政当局的压迫，并且作出可以预料到的反应。

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之后，各个共和国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古斯曼·布兰科设法在委内瑞拉建立了一个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越来越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财政津贴、经济发展委员会、联邦委员会等手段把外省的对手置于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之下。古斯曼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失败和他自己阵营中的主要军事对手的失败——以及随着咖啡出口恢复并且超过早先水平，有了实现这一纲

领的手段。同时，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验产生了一种不如原来设想的平等那么积极的政治与文化影响：现在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的余地，更不用说思想争论了。软弱的教会遭到进一步的屈辱。在派斯时代已经可以看到的谄媚当权主宰人物的传统得到大力鼓励。派斯、莫纳加斯兄弟、古斯曼·布兰科、克雷斯波、卡斯特罗这些相继主宰委内瑞拉的人物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地区或阶级背景和不同的风格，但在他们掌权时并不代表这些地区或阶级，除了对某些熟人有所偏爱以外。他们处于文职人员与军人的平衡点上，在这一点上，尽管全国政府仍然对地区生活的许多方面不予置理，但权力却比新格拉纳达或厄瓜多尔更加集中。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较少。加拉加斯的高级社会从来没有真的使派斯同化，他的许多时间是在马拉凯等地的庄园度过的，他的做法为他的许多后继者树立了仿效的榜样。这些后继者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自称贵族；古斯曼·布兰科则在他远走巴黎以前，把自己的身份提高到了无法同化的程度。

新格拉纳达的政治不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在整个世纪中，不是一种潮流消灭另一种潮流，也不是接近于这样做。波哥大占有良好的防御阵地，能抵抗各省的进攻，不同的省份难以联合起来向首都同时发动进攻，这个城市位于人口稠密和可以补充兵源 533 的地区中心。但是全国政府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所需要的资源。在这里，1886年的宪法比经济领先20年。从独立运动中（新格拉纳达的独立运动相对说来没有触动社会结构），没有涌现出具有派斯那样的政治与军事威望的人物。桑坦德将军在政治技巧方面也许能和派斯并驾齐驱，在运用上还略胜一筹。但他是一个有更大争议的人物而且缺乏军事威望。他无法装成站在政党之上的样子。哥伦比亚需要由这样一些人来统治，他们能够使迥然不同的各个省结成联盟，能够组织选举，管理国会，支付老战士军饷，使每个人怀有适度不满而又抱着希望。没有几个人的权势持续很久——桑坦德在1836年失去权力，莫斯克拉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

支配地位，文职人员穆里略·托罗和拉斐尔·努涅斯只是因为珍惜使用，才得以较长时期保持住他们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老练和谨慎的。这里的意识形态辨论特别尖锐和广泛——欧洲1848年的事态发展在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像在贫穷隔绝的新格拉纳达的政治家、手工业者、学生、甚至士兵家中所找到的如此热情的追随者和仿效者。联邦制原则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1863年的里奥内格罗宪法中表现的那么充份，这个宪法规定可以自由买卖武器，还详细规定联邦政府不得干涉各主权邦之间的战争。智利诗人兼外交家何塞·安东尼奥·索菲娅在向他国内报告这个激进主义时期行将结束时的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时，描绘了两个“伟大的教条主义政党”如何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在这里，对一切事情都热烈地和热情地进行讨论”。对一个智利人来说，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看来是混乱的、过份肯定的、危险的。下层阶级（最好的人，但有一些显著的例外）并不参加，正如那么多军官出身低下使得军队成为对出身高贵的人没有吸引力的职业一样。索菲娅描绘了一种竞争气氛，并且承认在这些过份行为背后存在着原则性问题。他目睹了这个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的衰落和保守主义以其全部崭新的意识形态活力卷土重来。努涅斯认为他有一个实现“科学的和平”的处方——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与教会和解、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限制选举权……。1885年以后又发生两次战争，表明野心再次胜过了智谋，即使这个处方是正确的处方。但是解决办法结果不是从独裁制而是从由于教会的支持而得到加强的新的联盟中找到的。哥伦比亚政治生活的大部分特色并没有改变——那么多的自然联邦主义、加紧利用报纸、不停的竞选活动、向新兴的法律—新闻—国会方面的能人开放发迹机会。努涅斯做到了把过去的各个主权邦改变为行政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未能做到他所希望的根本改变国家的行政地图。1886年宪法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中央集权。自由党到本世纪结束以前没有放弃他们对老的联邦制的忠心。

534

厄瓜多尔——它最初的正式名称是“哥伦比亚南方之国”——的政治开端比较明显地是古罗马执政官式的。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娶了一名基多贵族女子，他以玩弄狡猾的阴谋闻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依靠他的老战士，也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委内瑞拉人，如残酷无情的黑人上校胡安·奥塔门迪。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反对这个“可恶的外国人”的活动，有些活动是边沁主义者英国上校弗朗西斯·霍尔领导的；霍尔直到他横死之前一直是聚集在《自由基多人》报周围的一批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导人之一。维持军纪也不容易——弗洛雷斯面临多次兵变。1833年底梅纳上校在瓜亚基尔发动的叛乱在沿海的瓜亚斯省和马纳维省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即奇瓦瓦战争。① 弗洛雷斯在军事上支持世界主义者瓜亚基尔人比森特·罗卡富尔特继任的政府，后来他又自己担任总统直到1845年，当时由于他试图征收了比索人头税引起了对他的政府的普遍抗议运动。可以看到后来的几届总统是按照弗洛雷斯的模式进行统治的：他以前的副官何塞·马里亚·乌尔维纳从1852年统治到1860年，部分地把他的权力建立在陶拉斯人（一支从陶拉斯地区招募的由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的军队）的基础之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居统治地位的人物伊格纳西奥·本特米利亚明显地大力依靠他的“3,000突击队”。在厄瓜多尔政治中，兵变和军事暴动比在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更常见，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国家一级发生兵变或军事暴动的例子是罕见的。在厄瓜多尔，对反对者——士兵和平民——采取极端措施也是常事。罗卡富尔特和弗洛雷斯、加西亚·莫雷诺和本特米利亚都曾枪毙或放逐过他们的敌人。加西亚·莫雷诺曾下令执行臭名昭著的鞭笞之刑，而在本特米利亚政府统治下，基多大主教在作弥撒时被放在圣餐

① 给它起这个名称是因为反对弗洛雷斯的主要人物比森特·罗卡富尔特曾在墨西哥住过；此后“奇瓦瓦”一词就进入厄瓜多尔的民间语言，意为屁股着了火赶紧跑开的玩爆竹的人。

杯中的马钱子碱毒死。实行放逐的一个特别艰苦的方式是取道纳波河和亚马逊河把人送到巴西。厄瓜多尔斗争中的这些特点也许是由于参加过大部分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他们许多人是外国人)的统治以及由于政治生活的规模较小造成的。山区的印第安人居民(他们并不都像那些只观察基多周围的印第安人居民的人所说的那么遭到践踏)仍然是一个分离的集团,他们被有效地排除在他们很不愿意参加的正式政治生活以外——纳贡通常使印第安人免于征召入伍。沿海地区混血的蒙特维奥(montuvio)居民比较活跃,他们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被激进的阿尔法罗有效地动员起来。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厄瓜多尔的个人成份较浓的政治中表现出来;它们也反映了地方性差别。罗卡富尔特是西班牙美洲最杰出的早期自由派之一。弗洛雷斯(他通过婚姻关系和一些最著名的家族有了联系,并且是一座巨大的和摇摇欲坠的基多王宫的建筑师)变得越来越保守。乌尔维纳和本特米利亚的敌人仿效新格拉纳达的例子说,他们两人是军事激进派。加西亚·莫雷诺因其极端的教权主义而国际闻名,但是他的改革活动使他无法得到所有教士的欢迎。瓜亚基尔的自由主义感情从共和国最早的日子起就同基多的保守主义形成对照。长期以来恶劣的交通状况使摩擦得到缓和。厄瓜多尔还远比哥伦比亚或委内瑞拉遭到更大的外交纠纷的折磨:秘鲁觊觎瓜亚基尔的木材和造船厂,卡斯蒂利亚总统在1860年曾试图入侵。秘鲁的历届政府都援助并安慰厄瓜多尔的流亡者。和哥伦比亚毗邻的北部边界也较复杂,因为它和基多的检审法院院长辖区的老边界不一致。发生过多次入侵和反入侵,结果通常总是厄瓜多尔遭殃。这些紧急事件使非常稀少的人力物力遭到很大压力,正如弗洛雷斯将军在1845年出走之后打算率领一支得到西班牙人支持的远征军卷土重来造成很大压力一样。厄瓜多尔的确时刻有理由感到它的生存遭到威胁。国家的权力非常有限,这一点可以从加西亚·莫雷诺的生涯中清楚地看出来。为了求得生

存，他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来反对内部和外部敌人。政治上的严 536
重失望导致他向法国建议建立一个保护国——他并不是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抱有这种想法的陷入困境的政治家。

但是外国观察家——特别是像目空一切、令人讨厌的英国登山运动员爱德华·怀姆帕和持悲观态度的美国驻厄瓜多尔公使哈绍雷克这样的人——总是喜欢对他们的观察进行概括并且描绘出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停滞的图景。在这些处境不利的政府统治下，曾经发生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这些变化目前正被不是主要关心国家失败的当地史料揭示出来。可以认为某些地方的经济和地方政权曾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例如安蒂奥基亚的保守派政府、圭亚那的达利亚·科斯塔政权。如果提出一种新的估量尺度，不过分强调铁路等罕见的进步的标准，那么修建了一条较短的公路、改善了骡道、作出了地方办学的努力、维持了不同地区的法律和秩序——这些就都是有意义的。

那个时代的人知道这些差别和变化的重要性，甚至有时由于对一些在陌生人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表现出热情而使自己显得可笑。他们也敏锐地看到在习惯方面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这些共和国都没有大量移民入境，但是也有少数外国人移居进来，主要是商人，除外交官外还有一些工程师、手工业者和医生。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专门技术，还带来了不同的行为、爱好和风尚。在同当地商人发生初期的敌对之后，经过19世纪20年代后期的失望处境而幸存下来的那些人除法律上尚未入籍外，其他方面都已归化。委内瑞拉的德国人还有新格拉纳达的少数英国人娶了克里奥尔妇女。在那些希望尽量摆脱那种无休无止的要求赔偿内战损失的工作的使节看来，他们在卷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变得和当地人无法区分。更多的克里奥尔人到国外旅行，或送到国外受教育。有些回国的人不仅有了旅行家和时髦人的声誉，而且还对他们自己国家的特点、不利条件和——有时候——对其优点和财富有了新的认识。哥伦比亚人梅达多·里瓦斯当看到欧

洲人是如何嘲笑海地人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热带的热情的共和精神。大多数旅行者被伦敦的规模和财富所折服，但也对那里的贫穷和卖淫现象感到噁心，这些现象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还不明显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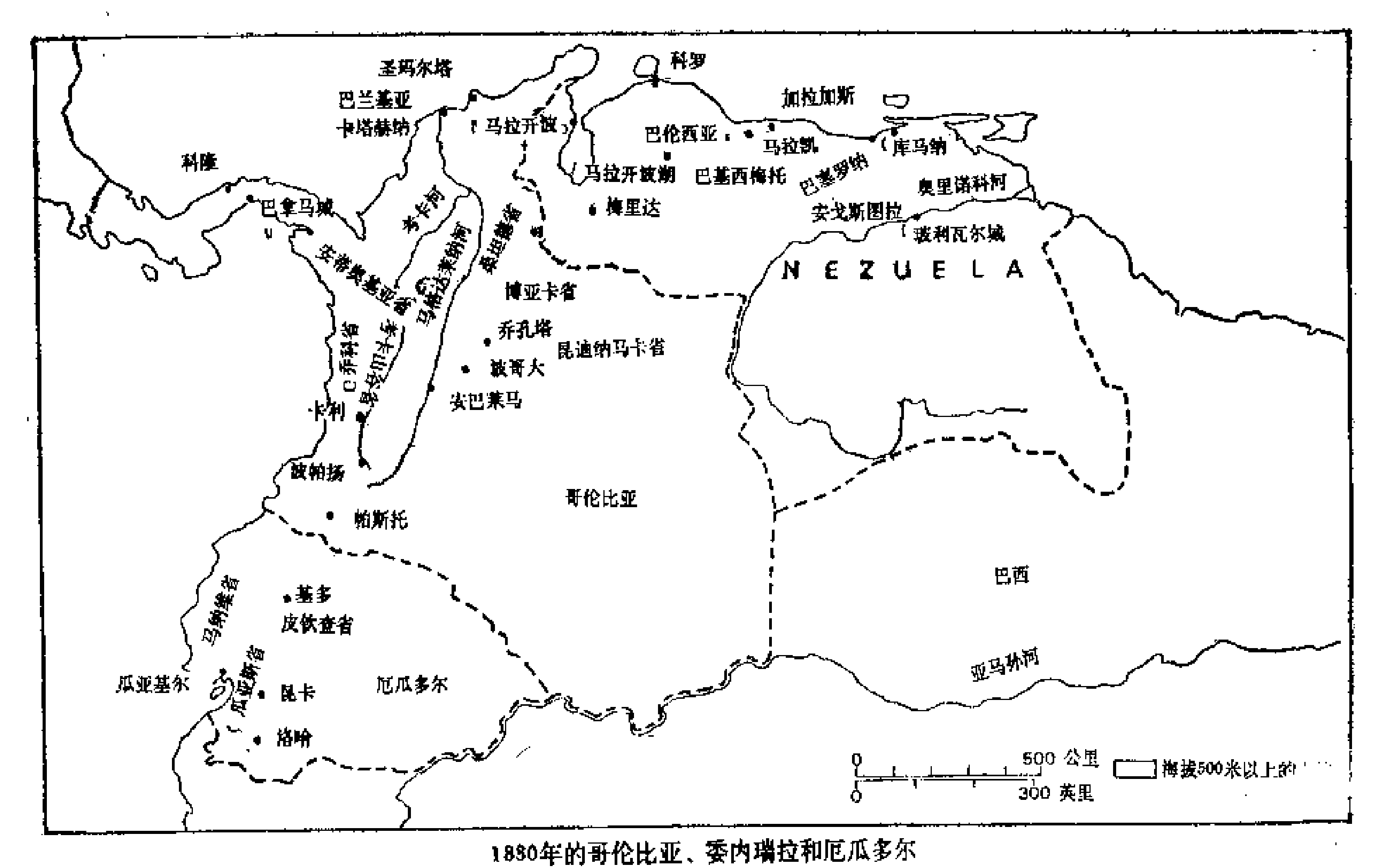
537

过去人们十分倚重的外国观察家对于当地的变化步伐不可能有很大感觉，不管他们是多么敏锐。他们停留的时间一般都不长。但是人们经常发现当地的风俗派作家的著作描述习惯和态度方面的变化。一位历史学家记载了波哥大及其周围的这些变化，他对重要细节的记忆堪称天才：何塞·马里亚·科多韦斯·莫雷（1835—1918年）是《圣菲省与波哥大回忆录》的作者。这是一部"传统史学"著作，以后许多著作都无法与之相比。

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哥伦比亚还是厄瓜多尔，在19世纪都没有获得唐·何塞·阿韦利亚诺斯所说的"在互相尊重的国家关系方面应有的一席之地。"例如，最早的统计学家、哥伦比亚神父费德里科·C·阿吉拉尔博士在1884年所写的《面对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的哥伦比亚》一书中揭露了哥伦比亚的弱点：人均进出口值很低，结果政府收入不多；铁路通车里程有限，建造费用很高；港口活动量不大；学校很少。和阿根廷、智利与乌拉圭的差异十分明显，并且差距还在加大。阿吉拉尔神父为哥伦比亚找到的唯一居领先地位的东西是报纸的数目。大哥伦比亚的各个继承国没有吸引多少外国投资。古斯曼·布兰科的保证的确给委内瑞拉带来一些外国投资，但代价很大。这些（用智利的一句话来说）"乌七八糟的北方共和国"可以拿出来比一比的有利条件是把握不大的，也不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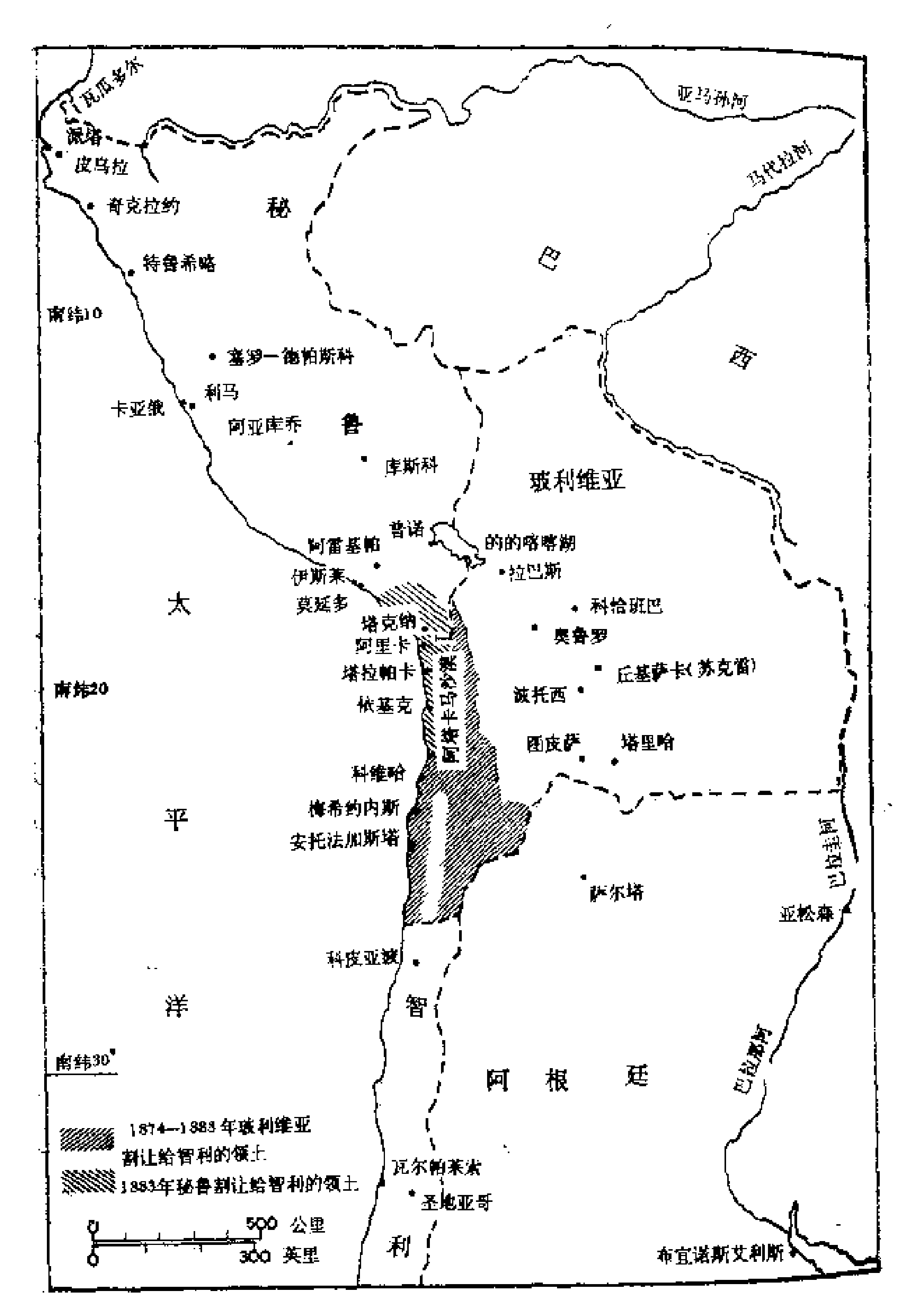
这些情况使人感到这些正式"国家"头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令人不堪回首，根据当时公认的进步标志来看，这段历史是失败的。这样一种简单的看法必须让位给详细的研究，研究当地不利的气候和地形条件是如何克服的，哪些危机没有圆满解决，以及每一个周期如何留下了一些问题。还有一点也已很清楚，坚持严

格的维多利亚式判断习惯和只考虑国际商业统治集团利益的习惯是不大可能使人们看清楚这些国家这段时间的历史的。何塞·马里亚·桑佩尔在他写的《关于哥伦比亚各共和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情况的论文》(1861)中抱怨说，“欧洲国家研究我们的火山比研究我们的社会花的力气更大；它对我们的昆虫比对我们的文学了解得更多；它对我们河里的鳄鱼比对我们的政治家的活动知道得更清楚；它对如何砍金鸡纳树皮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何糅制皮革比对我们处于襁褓时期的民主的活力有更大得多的学问！”这个抗议今天仍然适用。 538



1880年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19世纪期间这些国家的正式名称和边界都有变化



独立后的秘鲁和玻利维亚

第 13 章

539

自独立到太平洋战争①时的秘鲁和玻利维亚

1821年7月28日，阿根廷将军何塞·德·圣马丁宣布秘鲁割断与西班牙的殖民联系，并为政治上组织新共和国铺平了道路。1824年玻利瓦尔的军事进攻摧毁在秘鲁的帝国军队，从而完成了秘鲁独立的进程。然而独立战争后，殖民地秘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在许多方面仍然原封未动。独立进程是由少数非常脆弱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的行动促成的，这些人一心要在自由主义新外衣下保持以前的特权；关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建立独立秘鲁的决定都是在完全没有人民代表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居支配地位（尽管远不是居领导地位）的阶级由于力量脆弱无力把全国印第安人和黑人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使军事考迪罗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一个接着一个掌握了权力。

根据1828年出版的《外地人指南》的材料，秘鲁在独立时有125万人口：（见下表）

540 秘鲁的出口经济在殖民地时期最后几年已开始衰落，而伴随着独立运动发生的许多次军事冲突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沿海地区的基本劳动力奴隶被招募强迫参加爱国者和保皇派双方军队，使

① 理查德·萨瑟恩博士和戴维·布鲁克肖博士根据西班牙文译出，译文经编者校订。编者谨向罗里·米勒博士、路易斯·奥尔特加博士和詹姆斯·邓克利博士为本章最后定稿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行 政 省	居 民
阿雷基帕	136,812
阿亚库乔	159,608
库斯科	216,382
胡宁	200,839
拉利伯塔德	230,970
利马	148,112
普诺	156,000
	总计 1,248,723

沿海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水银供应减少，废除了米塔制(矿井组织印第安人劳动力的主要制度)，又无力解决矿井积水和战争破坏这一持久性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秘鲁采银业的明显衰落。塞罗德帕斯科（它当时拥有最大的白银储量)的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恢复，从1830年的95,261马克增加到1832年的219,378马克，和1840年的307,213马克。* 然而，全国白银产量一直没有达到殖民地时期的水平，现在以银币形式出口，这大大减少了秘鲁本身的货币供应。因此，在独立后的头20年，大部分秘鲁经济是围绕着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庄园和印第安人村社组织的。可出售的剩余产品很少，只以不稳定的方式供应国内市场。通过出口少量的糖、棉花、可可、金鸡纳树皮(主要在玻利维亚生产，通过秘鲁南部的港口输出)、铜、锡和硝石和国际市场(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智利)保持脆弱的联系。① 从

* 马克，这里为金银重量单位，每马克约重8盎司。——译者

① 沙恩·亨特著《1830—1962年秘鲁出口品的价格与数量估计》(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讨论文件第33号，1973)第57—58页。关于1825—1840年期间秘鲁对英国、法国、美国和智利的出口(不包括白银)的估计，见亨特著《价格与数量估计》，第38页。

19世纪30年代后5年开始，为了响应英国纺织业日益增长的需求，541 大量羊毛(先是羊驼毛，然后是绵羊毛)以及少量骆马毛和无峰驼毛开始从秘鲁南部出口①。在出口行业停滞的情况下，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末以前，秘鲁必须出口大量银币以支付它从英国的进口。1825年，银币出口占秘鲁全部出口的90%，到1840年仍占82%②。

独立时，秘鲁已向世界贸易尤其是英国贸易开放港口。欧洲和秘鲁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贸易路线在18世纪最后30年即已开通，但是大部分英国货物通过大陆南端的麦哲伦海峡运到秘鲁，这使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成为这一贸易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秘鲁各港口在商业上要依靠瓦尔帕莱索，尽管圣克鲁斯总统1836年曾试图通过对直接开到卡亚俄的船只给以报酬的办法来改变这一情况。然而，1839年圣克鲁斯被推翻和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垮台(见下文)结束了这一实验。1826年，经过麦哲伦海峡到达的货物，整个途程需102天，其中到达瓦尔帕莱索90天，从瓦尔帕莱索到卡亚俄又需12天。另一方面，殖民地时期通过巴拿马的老路线总共需要125天，走海路本身并不需要那么多时间，而是因为越过巴拿马地峡造成长时间的耽搁。1840年以后，汽轮开始在太平洋水面出现，从欧洲到秘鲁的航行时间减

---

① 羊毛出口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顶峰，那时伊斯莱位于卡亚俄之后是秘鲁第二个最重要的港口。然而，作为一个港口，伊斯莱从来未能建立它自己的经济生活。它的发展是同南部内地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因此，1874年修建普诺—阿雷基帕铁路并在莫延多建立铁路终点站使伊斯莱突然完全衰落。它的人口在1862年有1,554人，1874年下降到400人。此后，莫延多是秘鲁南部主要进口港，到1878年已有3,000居民。见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著《大不列颠与秘鲁》(利马，1977)，第105—107页。

② 同上，第96页。关于1825年、1839年和1840年秘鲁对英口出口的估计数字，见威廉·马修著《1820—1865年英口—秘鲁商业和金融关系》(伦敦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64)，第77页。

少到大约45天。同时运费降低，从智利进口农产品（特别是谷类和水果）供应沿海城市，变得更为合算。结果，秘鲁内地高原越来越和沿海经济脱离。

在19世纪头50年，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按重要性排列，依次为英国、美国和法国。英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另外两国。到1824年，秘鲁已有大约36家英国商行，其中20家在利马，16家在阿雷基帕。① 英国对秘鲁的出口值从1821年的86,329英镑稳步增加到1825年的559,766英镑，1826年跌到199,086英镑，但是1830年回升到368,469英镑。② 在1820年到1830年期间，纺织品大约占英国对秘鲁出口值的95%。其后不久，这个比例显著下降到平均占50%，在19世纪其余时间都是如此。英国纺织品继续像洪水般涌进秘鲁的港口和市场，而且来势更加猛烈。这一进程是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开放而开始的。这就是说，已经削弱和支离破碎的秘鲁国内市场现在在更大规模上被英国产品占领，使本国的手工业和印第安人的作物实际上停止生产，它们由于工艺落后，无法同进口的英国纺织品竞争。另一方面，纺织品进口比例下降——这在1830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表明秘鲁市场是非常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是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在印第安人居民中尤其如此。

秘鲁第一任财政部长伊波利托·乌纳努埃解释说，"当我任职时，国库是空的。距首都30里格之内的耕地一片荒芜。矿井被敌人占领。卡亚俄在敌人手中，妨碍了一切贸易。由于捐税繁多，人民的经济资源已被吸干。他们由于完全被包围，已处于饥饿之中。举目四望，除了不幸与荒凉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

---

① R.A.汉弗莱斯著《英国领事关于拉丁美洲贸易与政治的报告，1824—1826》（伦敦，1940），第126—127页。

② 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利亚·德尔·里奥、皮拉尔·奥尔蒂斯·德·塞瓦略斯著《自由贸易与安第斯经济危机》，载《历史》杂志（利马），2/1（1978），第3页。

三年以后(1825年)，这位部长又说：

“在我们国家为独立而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的全部时间里，我曾三次奉命担任财政部长。头两次还有一、两座废墟可以修建成大厦。但是现在甚至连这些废墟也不见了。”①

然而，除了要支付2,600万比索外债的本息外，新的秘鲁国家每年还必须筹措大约500万比索用于经常性支出，主要是文职官员特别是军人的开支。(1845年以前秘鲁没有正常预算，因此不知道公共支出的确切分类。但是，莫拉莱斯—乌瓦尔德(1827年)和何塞·马里亚·德·潘多(1831年)的回忆录提供了证据，说明军事支出负担相当大。1827年，它占总支出的48%，1831年上升到59%)②。544 政府不时地采取减少官员人数和冻结工资的办法。有时候，政府通过外国和本国商人的自愿或强迫贷款或者干脆没收各种地方资源作为暂时的解救办法。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使政府能够用于开支的款项来源是印第安人的资金、关税和外国贷款。

1821年8月27日，圣马丁在宣布印第安人是秘鲁公民之后，进而废除了殖民地时代规定的纳贡。然而，破产的秘鲁国家经不起在很长时间内实行这种慷慨作法。由于需要向印第安人居民征税来维持共和国财政，并且由于秘鲁政府早先采取的社会政策，1826年8月27日又恢复交纳贡金。财政部长何塞·马里亚·德·潘多1830年宣布，“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向印第安人征税的考虑是慎重的和有预见的。它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已成为这些人

---

① 伊波利托·乌纳努埃著《科学与文学作品》(巴塞罗那，1914)，第Ⅱ卷，第361、370页。

② 埃米利奥·罗梅罗著《秘鲁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第318页；埃米利奥·丹夸尔特编《秘鲁财政年鉴——共和国财政立法与历史所包括的各项法律、法令、条例和决定、关税率、预算、决算及契约》(利马，1902—1926)，第Ⅱ卷，第154—171页(以下援引时简称《年鉴》)。

思想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任何背离它的新做法将是危险的”。① 结果，古老的殖民地时代的贡金再次成为国库的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直到1854年拉蒙·卡斯蒂利亚最终把它废除。然而，作为对自由主义新时代的让步，将纳贡改称为印第安人的“捐税”。

为了征收这种“捐税”，必须把印第安人居民在财政上分为三类：(1)拥有土地的当地印第安人，(2)拥有少量土地的非当地印第安人(外地人)，以及(3)无地的印第安人。第一类印第安人每年交纳5—9比索，后两类每年交纳2.5—5比索。最后，除了印第安人的捐税之外，还有社会等级税(Cortribution of Castas)，那就是说，由社会中非印第安人成份交纳的税，数目为5比索以及他们的产业的净生产值的4%，这种税直到1840年才废除。印第安人的捐税总额1830年达到1,039,331比索，社会等级税总额为431,787比索。② 鉴于秘鲁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不稳定，人们发现在估计捐税收入和实际征收的数目之间有很大差别，这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它对财政收入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据潘多估计，1829年财政收入总额为7,962,720比索，其中945,468比索来自捐税。在1839至1845年期间，印第安人的捐税平均每年为1,757,296比索，而进入国库的总收入平均为4,500,000比索。但印第安人的捐税在1846年仅有830,826比索。③

545

强迫印第安人纳贡在历史上一直是同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联系在独立后逐渐地——尽管是无规律的——遭到浸蚀。独立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反对保持那些可能阻碍货物和人员在市场上不受限制地流通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印第安人村社的存在遭到玻利瓦尔1824年4月8日发布的法令的威胁。这个法令宣布，印第安人有权拥有他们的土地。推而广之，他们也

① 《年鉴》第Ⅱ卷，第154—171页。

② 《年鉴》第Ⅱ卷，第49—50页。

③ 《年鉴》第Ⅲ卷，第54—55页；第Ⅳ卷，第36—37页。

有权把土地出售给第三者。这个决定的内在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富裕、独立的土地拥有者阶级。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当局不久开始意识到这一措施对印第安人村社造成严重威胁，因而推迟到1850年才实施。尽管如此，在保护印第安人村社免遭大庄园侵犯的屏障上已经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痕，从而为大土地所有者在一旦新的力量开始使整个农村经济具有活力时进行扩张铺平了道路。

就关税而言，秘鲁政府不得不向各种不同利益妥协。首先，有英国利益要求自由贸易的压力。另一方面，有软弱的本国生产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制止英国纺织品的洪流，这种洪流有使他们有惨遭灭顶的危险。最后，还有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的压力。

关税收入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总之，秘鲁政府在政治上的极端脆弱性不允许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始终如一的方针。在许多套管理贸易的规定中——在1821年至1836年期间共有6套——它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

显然，在1833年以前秘鲁政府的意图是保护主义的。1821年的临时法对进口的外国纺织品征收40％的税，1826年的法律对它们征收80％的税。第三个法律（1828年6月）称为“禁止法”，即在10个月内禁止进口对本国生产有损害的货物，尽管有迹象表明这种禁止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在英国的利益和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的双重压力下，无论是不稳定的政府的意图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软弱的本国生产者的愿望都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秘鲁政府按照1833年的法律开始采取比较放宽的关税政策。它把纺织品进口税减少到45％。根据1836年的法律（这个法律是在秘鲁一玻利维亚邦联期间（1836—1839年）通过的），继续保持这种放宽贸易的倾向，把进口纺织品的关税进一步削减到只有20％。

546

这种情况意味着同秘鲁做生意的英国商人的胜利，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1836年的法律只是批准了英国贸易界所批订的建议

而已①。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第二年英国和秘鲁签订了“友好通商航运条约”。对秘鲁政府来说，1836年的法律也表示它谋求同欧洲建立直接联系，这是它想破坏瓦尔帕莱索港的领导地位的愿望的一部分。大量削减关税和圣克鲁斯总统所采取的各种行政措施(主要的有把阿里卡、科维哈、卡亚俄和派塔规定为自由港，对经过太平洋沿岸其他港口后才到达卡亚俄的货物征收附加税)都是出于这个目的。②

人们认为，1839年圣克鲁斯的失败和联盟的垮台是对欧洲和美国商业利益的沉重打击，③但是后来的贸易条例保持了1836年确定的关税税率。同时，大量进口英国的廉价纺织品加速了英国商业扩张，而关税收入变成了公共开支的一个主要支柱。这一进程以彻底破坏本国生产告终。

秘鲁切断殖民联系后，英国投资者和制造商和商人一样热情高涨，他们看到了投资开发秘鲁的传奇般的贵重金属矿藏的机会。在紧接着独立后的几年中，专门为这一目的建立了5家公司：智利—秘鲁联营公司、波托西—拉巴斯—秘鲁矿业联营公司、帕斯科—秘鲁矿业公司、秘鲁贸易与矿业公司和英国—秘鲁矿业联营公司。头4家公司有100万英镑资产，最后1家公司有600,000英镑资产。④然而，幻想很快破灭，筹集这笔资本引起了19世纪英国金融资本主义第一批危机之一。造成这次灾难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种可以动员本国劳动力前往矿业中心的机制。英国人不得不等到1890年成立秘鲁公司后才能重新尝试直接投

547

① 威廉·马修著《自由贸易帝国主义，1820—1870年的秘鲁》，载《经济史评论》丛书，第2辑，21(1968)，第566页。

② 豪尔赫·巴萨德雷著《秘鲁共和国史》(第5版，利马，1962—1964)，第Ⅱ卷，第566页。

③ 伦敦外交部档案局61/93，科普致威尔逊的信，1842年10月12日。

④ 亨利·英格利希著《经营外口矿井公司综合指南》(伦敦，1825)，第8—51页。

资。

在1879年同智利的战争之前，资本输出通常是以向秘鲁政府提供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第一笔贷款是圣马丁在1822年谈判取得的。他的特使胡安·加西亚·德尔·里奥和迭戈·德·帕罗伊西恩将军从托马斯·金德获得120万英镑贷款。利息6%，佣金2%，债券成本75%，偿还期30年，以关税和白银生产的收入作为保证。2年以后，玻利瓦尔委托胡安·帕里什取得一笔616,000英镑的新贷款，利率6%，债券成本78%。从这个总数中，秘鲁实际上得到的数目只有200,385英镑，① 尽管它有义务要偿还全部名义贷款。这些贷款全部用于维持在独立战争时进行合作的外国军队。然而，由于经济停滞，秘鲁政府在1825年以前无力偿还外债本息。

外国财源不久即告枯竭，秘鲁政府转而依靠国内贷款来弥补征收印第安人的捐税和关税后仍不足的部分。1845年，内债估计为6,846,344比索②，但是它包括西班牙政府向利马富商发行并得到新政权承认的债券。

取得独立后的秘鲁社会结构反映了秘鲁经济的支离破碎状态。与其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社会，还不如说它是一些以庄园为中心的地区性社会更正确。庄园是基本生产单位，以有限的能力维持这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政治上，庄园主直接地或者以与当地某个考迪罗结盟的方式在各个地区行使无可争议的政治权力，建立一整套典型的依附关系的制度，以确保他的下属的忠诚。然而，地主虽在当地拥有权力，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在中央建立和巩固政治领导权。利马政府通过支持各个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和他们结盟的办法来行使权力，但不一定代表他们的利益。严格说来，在曼努埃尔·帕尔多1872年担任总统以前，每个考迪罗总统的权

548

---

① 《年鉴》，第Ⅰ卷，第50页。

② 《年鉴》，第Ⅳ卷，第46页。

力都来源于他的追随者的军事能力。同样，这里的问题是这些追随者的人数很多，每个人都通过个人忠诚关系与他的军事考迪罗相联系，因而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个总统有能力使大家普遍服从他，或者形成一致意见，因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结果造成尖锐的和无止无休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以便掠夺国家资源。

西蒙·玻利瓦尔1826年9月离开秘鲁后，国家进入政治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时期。秘鲁贵族中的保守份子和自由派份子都曾试图给这个新国家建立一种体制和政治结构——这反映在1836年以前通过了6个宪法——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能聚集足够的社会支持，政治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地区考迪罗手中。集团利益、地区主义和个人忠诚成了权力政治中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有武装追随者支持的一些活动家先后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府达10年之久。在1836年建立秘鲁—玻利维亚联盟之前，秘鲁在10年间有过8个总统，其中只有一人即独裁而残忍的奥古斯丁·加马拉将军得以干完4年任期。在他离职之后，在差不多两年时间内，密谋和暴动使好几个军事领导人接管总统职位，可是几个星期就被暴力手段推翻。1835年初，卡亚俄卫戍部队的年轻司令官费利佩·萨拉韦里采取夺权行动取得成功。萨拉韦里进行高压统治，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似乎已唾手可得。但是就在他攫取权力整整一年之后，他在一次叛乱中被行刑队击毙。下一个在秘鲁谋取权力的挑战者是玻利维亚总统(1829—1839)安德列斯·圣克鲁斯将军。他是一个能干、有本领的政治家，他通过和秘鲁南部一些考迪罗结盟不仅取得了对秘鲁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且在1836年宣布成立秘鲁—玻利维亚联盟。

圣克鲁斯的计划在秘鲁有一定号召力。南部利益集团和玻利维亚在历史上有商业联系，对利马控制国家感到不满，他们事实上欢迎建立联盟，积极予以支持。然而，在利马和拉巴斯，联盟遭到坚决反对。利马的上层人士对分裂他们的国家表示强烈不满，

因为秘鲁南部变成了联盟中的一个单独的国家。玻利维亚人则很不赞成圣克鲁斯选择利马作为联盟的政府所在地。但是对联盟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智利，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也明显地表示不悦。智利政府的领导人认为，联盟是对智利独立和它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与商业领导权的重大威胁。他们在1836年12月宣战，接着阿根廷政府也在1837年5月宣战。智利人在1837年入侵未获成功，1838年7月又进行第二次尝试。这一次他们获得一支由大批秘鲁流亡者组成的队伍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这些流亡者中最著名的有奥古斯丁·加马拉将军和拉蒙·卡斯蒂利亚将军。在秘鲁本身，一大批利马上层人士(他们始终不能接受国家丧失独立)积极支持远征军。其中自由派(他们一直反对圣克鲁斯的政治计划和暴戾统治)和倒霉的萨拉韦里的追随者热情响应加马拉和卡斯蒂利亚发表的公告，他们在公告中宣布打算恢复秘鲁的自治。1839年1月，圣克鲁斯的军队在永盖战役中被粉碎，联盟就此垮台。

智利军队于1839年10月离开秘鲁后，加马拉再次成为总统并且通过了一个保守的宪法。但是这位新总统不久入侵玻利维亚，1841年11月在因加维被击败并被杀害。秘鲁再一次陷入政治混乱。当玻利维亚军队从南部入侵时，厄瓜多尔人表明他们打算从北部入侵。派去和入侵者作战的军队对利马政府的权威置之不理，于是新的内战爆发。加马拉的按宪法产生的继承人被推翻后，三位将军成为秘鲁的最高统治者。1844年7月，拉蒙·卡斯蒂利亚击败比万科将军，成为国家新的强有力人物，这时政治混乱才得以结束。卡斯蒂利亚控制秘鲁的政治与体制一直到1868年逝世。

550

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1879年和智利的战争开始，秘鲁的经济与政治演变都这样或那样地取决于开发沿海岛屿的鸟粪储藏。秘鲁沿海地区干旱缺雨，这意味着积累在岛上的鸟粪没有失去它的化学成份。考古学的证据和何塞·德·阿科斯塔、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和阿古斯丁·德·萨拉特的记事指出，在哥伦布发现美

洲以前，农业使用过鸟粪。同样，在殖民地时期，沿海地带的农业也施用鸟粪增加土壤肥力。然而鸟粪始终没有进入——至少没有大规模进入——殖民地的出口贸易，直到19世纪英国农业变革才使开发鸟粪得到新的推动力。越来越多地使用肥料是英国耕作技术的一项革新，目的是增加产量，满足英国工业的需求。使用秘鲁肥料最初数量有限，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3年以后英国和欧洲发生衰退，质量最好的鸟粪储藏枯竭，合成肥料进行竞争，最后是智利军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霸占了鸟粪储藏，使秘鲁的鸟粪繁荣时期宣告结束。

除鸟粪外，秘鲁在这个时期还出口铜、羊驼毛和绵羊毛、棉花、糖和硝石以及少量的锡、可可、咖啡和金鸡纳树皮。秘鲁对外贸易的估计数字所依据的那些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和智利——的贸易数字中都没有记载贵重金属特别是白银的出口情况。然而，白银生产(塞罗德帕斯科矿的白银产量占一半以上)在整个1840—1879年时期每年稳定在30万到50万马克之间①。尽管如此，鸟粪在秘鲁对外贸易中享有绝对的优势，在1840年至1852年期间大体上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为4.5%，在1852年至1878年期间为5.2%。②

由于缺乏完整的记录和公共管理陷入混乱，关于鸟粪出口量和它的销售收入的估计是不很可靠的。鸟粪出口在逐步增加到1849年的将近10万吨以后，人们估计，它在1850年至1878年期间每年在稍微不到20万吨至70万吨之间波动。③据《共和国庄园年鉴》编纂者之一J.M·罗德里格斯估计，在这整个时期大约共出口10,804,033吨鸟粪。④如果平均以每吨价格10英镑计算，出售

551

① 亨特著《价格与数量估计》,第57—58页。

② 同上,第67页。

③ 同上，第38—9、43—46页。

④ J.M.罗德里格斯著《对秘鲁经济和财政研究及共公共财政的一瞥兼论改革的必要性》(利马，1895)，第317—319页。

鸟粪的总收入将近1亿英镑。此外，有一点应该指出，鸟粪从来不是外国或本国的公司或家族的私有财产，从一开始就归秘鲁国家所有。因此秘鲁拥有必要的资本来开始重建经济，使生产多样化，并且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率。尽管如此，虽然鸟粪在某些时候对某些经济部门产生了良好影响，但是它的总体影响是消极的。

在分析鸟粪收入时，必须考虑工人、国内商人和国家三方面的情况。关于前者，即工人，他们在鸟粪收益中所占份额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现有的估计数字认为，在产鸟粪的岛上总共有1,000名工人，他们的生活费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4%。在1841年至1849年期间，外国商行(主要是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垄断了承销人合同，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非常软弱，政府只拿到大约33%的收益。在以后的合同中，这一份额上升到65%左右。国内商人在出售鸟粪方面加强竞争后，政府和国内商人所保留的收入加在一起在最后销售值的60%至70%之间。1869年，奥古斯特·德雷菲斯(他是得到巴黎的总公司支持的一个法国商人)最后取得了对鸟粪贸易的垄断性控制，国家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变得更大。总之，在1840—1880年这整个时期，秘鲁政府从鸟粪贸易中大约得到60%收入，即381,000,000至432,000,000比索。这个数字还应当加上秘鲁承销人所得到的6,000万至8,000万比索，这个数目占鸟粪收入的5—10%。在1846年—1847年，鸟粪收入约占全部国家收入的5%；在1869年和18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0%。然而，虽然鸟粪收入在1847年至1872年—1873年期间增加了4倍，但在这个时期支出增加了7倍。为了回答为什么鸟粪收入并没有对秘鲁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一问题，重要的是要看在鸟粪时代收入是如何花掉的。鸟粪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扩大文官人数(占29%)和军队(占24.5%)。鸟粪收入还用于扩大铁路网(占20%)，向外国人和本国国民转付款项(占8%和11.5%)以及减轻穷人的捐税负担(占

552

0.7%）。[1]

鸟粪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结果之一是，在拉蒙·卡斯蒂利亚政府时期废除了印第安人的捐税。1854年，卡斯蒂利亚希望扩大他的政治基础，取消了印第安居民要交纳的这项捐税。然而，对整个秘鲁经济来说，取消纳贡导致了可以出售的剩余农产品的减少，使物价上涨。对大多数印第安人家庭来说，出售剩余产品是和纳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出售剩余产品才能找到钱来缴税。一旦取消纳贡，生产和出售剩余产品就没有意义了，农民家庭又回到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此外，由于取消纳贡，地主越来越谋求占有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作为得到和控制印第安人劳动力的办法，而政府不再拥有保护印第安人村社免遭大庄园侵占的刺激力量。）

鸟粪收入的另一个用途是废除奴隶制。秘鲁在1854年有25,505名奴隶，占总人口的1.3%。[2]解放奴隶的办法是，每使一名奴隶获得自由，付给奴隶主300比索。为了这件事，把7,651,500比索从政府国库转移到奴隶主手中。解放奴隶把大量资金置于地主手中，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笔钱后来有一部分用来开发沿海地带的农业。然而，显然不可能从高原动员印第安人农民，因而这一发展进程意味着有必要在伪装的奴隶制下进口大量中国苦力，代替旧有的奴隶劳动力。在1850年至1874年期间，到达卡亚俄港的中国移民达87,952人；在1871—1872这两年中到来的有25,303人，占前一数字的1/4多一点。[3]

553

通过公共开支，鸟粪增加了国内需求，并且产生了在整个秘

① 沙恩·亨特著《19世纪秘鲁的发展与鸟粪》（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1973），第64、84、69、72—75、80页。

② 尼尔斯·雅各布森著《秘鲁奴隶人口的发展及其对沿海农业的重要性》（伯克利，未发表手稿，无日期），第82页。

③ H.B.H.马蒂内著《秘鲁的农业》（利马，1876），第32页。

鲁经济中都能感觉到的影响。① 据估计，在鸟粪繁荣时期，实际工资以每年大约3％的速度增加。② 然而，尽管有这些条件，生产结构没有能力响应需求的刺激。人们把这种失败归因于以下因素：由于手工业遭到破坏而缺乏一个企业家阶级，鸟粪造成国内成本和价格提高，鸟粪收入的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以及传统的体制未能创造加强生产的必要框架。需求的增加未能刺激国内生产，却使进口显著增加。一些铁路（修建铁路也是由鸟粪提供资金）直到19世纪末才建成。

和开发鸟粪有联系的另一个进程是秘鲁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贷款合同。贷款分两类。一类是同鸟粪商人签订的合同，这些贷款基本上只是要付利息的预付资金，以后用出售鸟粪所得来偿还。另外一类贷款比较重要，主要由出售鸟粪作担保取得外国贷款。这是秘鲁政府在1849至1872年所奉行的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吸收外国资本，用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由于偿还债务而削弱或破坏了国内积累资本的能力，它可以成 554 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秘鲁利用外债事实上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不仅是政府没有选好在财政上可行的建设项目的问题，而且明显地使秘鲁国家财政陷于瘫痪，这一进程导致了在1890年把国家的某些生产性资源转移到秘鲁外债的英国债权人的控制和拥有之下。

我们前面讲过，在1822年和1824年，秘鲁在伦敦获得了价值181.6万英镑的两笔贷款。由于无力偿还，两年后它停止支付利息。1848年，积累的利息已达2,564,532英镑。也就是说，债务总

---

① 散见亨特著《发展与鸟粪》；参看乔纳森·莱文著《出口经济：从历史角度看其发展模式》（马萨诸塞州剑桥，1959）。他从出口鸟粪所获得的利润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鸟粪未能使经济发展的原因。

② 亨特著《发展与鸟粪》，第88页。

额已达4,380,532英镑。鸟粪成为秘鲁收入的主要来源后，英国债券持有者和与他们有联系的金融投机家增加了压力，要求秘鲁政府恢复偿还债务的本息。1849年1月4日达成一项最后协议。① 清理后的债务将从1856年开始偿还。为此目的，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应把出售鸟粪的收入的一半存入英格兰银行。由于恢复了秘鲁政府的金融信誉，这一行动带来了一再向外国借款的政策。谈成每一笔贷款意味着要用一大部分去收回前一笔贷款的债券。简而言之，就是以新债抵旧债。

从1869年起，我们将看到，修建铁路的计划加重了秘鲁政府对数目更大的新贷款的需求。最后，在1872年，政府试图筹借3,680万英镑的贷款，其中2,180万英镑指定用于偿还1865年、1866年和1870年的贷款。

1872年的贷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公众购买股票不到23万英镑②。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相继破产——这些国家是伦敦市场上最积极的顾客——浸蚀了伦敦贷款人对拉丁美洲国家偿债能力的信心，他们开始拒绝新提出的贷款要求。因此，到1872年，秘鲁有3,500万英镑左右的外债，它每年要分期偿还250万英镑。在政府财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支付这样一笔巨额债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876年秘鲁第二次不履行偿债义务。

总之，这项筹借巨额外国贷款的政策对国内经济发展毫无好 555 处，而是使国家习惯于越来越依靠外国贷款，而当一场危机——例如1872年危机——断绝了这一外国资本来源时，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就逐渐为最后垮台铺平了道路。

我们已经说明了鸟粪收入通过公共开支对国内需求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说明了生产体制不能响应这一需求的原因。但是当我们转过来看看面对海外市场的那些经济部门、特别是看看

① 《议会文件》(伦敦，1854)第LXIX卷，第124—126页。

② 《年鉴》，第IX卷，第35—36页。

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带的农业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全然不同的前景。从19世纪60年代起，大庄园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作出响应，通过生产棉花和食糖开始了它们的恢复与扩大的进程。食糖生产从1862年起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到1879年食糖已占全部出口的32%。它的产地主要是在特鲁希略和奇克拉约之间的地区。1877年这个地区的食糖占出口食糖的58%，1年以后达到68%。棉花生产的扩大与美国的棉花危机有关。棉花生产在地区上也是集中的：1877年，14%的出口棉花产自皮乌拉，38%产自利马行政省，42%产自皮斯科—伊卡。①

出口导向农业的扩大是加紧剥削苦力劳动力和大量投入资本的结果。例如，棉花出口从1860年的291吨增加到1879年的3,609吨。在同一时期，食糖出口从610吨增加到83,497吨。② 如果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和鸟粪贸易所得到的好处有联系，这种情况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国家因清理内债(见下文)偿还国内债权人的资金约有50%用作农业投资。废除奴隶制也使固定资产(奴隶)转变为流动资本(赔偿金)。③ 除此以外，还应加上商业和银行部门向地主阶级提供的贷款，而商业和银行部门是由于鸟粪所产生的剩余资本而得以存在的。说明鸟粪产生的剩余资本和农业资本之间的联系的最好的例子是秘鲁北部沿海希克特佩克河谷的卢里菲科庄园的情况。④ 然而，沿海出口农业的发展是很不保险的，不仅因为它几乎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波动，而且还因为它从属于金融资本。据表明，在1875年，甘蔗庄园的全部债务已达3,000

---

① 亨特著《发展与鸟粪》，第55—56页。

② 亨特著《价格与数量估计》，第38—39、43—46页。

③ 巴勃罗·马塞拉著“1821—1875年的安第斯甘蔗种植园》”载《史学著作》(利马，1977)。

④ 曼努埃尔·布尔加著《从委托监护制到资本主义庄园》(利马，1976)，第174—178页。

万索尔，其中1,750万索尔欠金融机构。①

和沿海地区形成对照的是，高原农业受鸟粪繁荣的影响较小，尽管利马(以及矿业地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的确以某种方式促进了中部山区畜牧业的扩大。②鸟粪对秘鲁的工业发展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手工业由于欧洲货物大量涌入而遭到严重打击。的确，利马街头发生过几次手工业生产者的激烈的示威，例如1858年的几次示威。③当时存在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利马，主要生产啤酒、面食制品、饼干、巧克力、黄油和其他加工食品。大多数工厂主是移民，他们的资本无疑来自储蓄和贷款。在山区，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在基斯皮坎奇斯省卢克雷庄园上1859年建立的纺织工厂，那里的劳动力已从农奴变为雇佣劳动者。

19世纪70年代初，鸟粪时代结束。它给秘鲁留下一笔为数3,500万英镑的巨额外债，每年需要偿还大约250万英镑的本息。鸟粪刺激了国内需求，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同时促使中部和北部沿海庄园进入新的扩大阶段。但尽管如此，关键问题是国内市场未能发展和扩大，供应这个市场的国内生产未能真正增加。如果有必要把鸟粪繁荣时期说成是一个丧失机会的时期，那正是因为在这整个时期行使政治权力的军人和在鸟粪时代出现 557 的新的统治阶级未能实行另一种发展计划，这种计划不仅应以开发国家的自然财富，而且还应以根除秘鲁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为主，还必须建立必要的体制基础使国家能够充份响应鸟粪出口所造成的机会。

1821年独立时，秘鲁没有一个拥有必要的权威和合法性、能对初生的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统治阶级。正是这种政治真空使军

① 亨特著《发展与鸟粪》，第58页。

② 纳尔逊·曼里克著《中部山区国内市场的发展》(利马，农业大学，油印稿，1978)，第68—69页。

③ 豪尔赫·巴萨德雷著《秘鲁史》，第Ⅲ卷，第1291页。

人取得了控制。在掌权的所有军事领导人中，拉蒙·卡斯蒂利亚（梅斯蒂索人）是最有力量和具有最大政治与行政本领的一个。在1844年至1868年期间，他担任过多项高级政府职务（包括财政部长）并两次担任总统。在实际政治问题上，他的统治反映了一种非常讲求实效的态度，并且他一直准备妥协。在一个由于内部斗争而严重分裂的国家，卡斯蒂利亚镇压暴动十分坚决，但能容忍对他的政权的一定程度的批评，允许国会定期开会不受干涉，甚至任命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担任重要职务。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使国家财政正常化。但法律和秩序是他主要的优先课题，也许他的最显著成就是成功地使秘鲁在1845年至1851年期间第一次获得了稳定的政治统治。卡思蒂利亚的第一任总统任期结束后，立即被何塞·鲁菲诺·埃切尼克将军所代替，后者缺乏政治与行政经验，做了许多事情破坏卡斯蒂利亚使国家稳定的政治工作。不久，自由派感到不得不进行另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在1854年初发生，卡斯蒂利亚是它的领导人。在激烈的对抗中，革命军得到人民相当大程度的支持，推翻了埃切尼克。1854年7月，卡斯蒂利亚开始担任第二任总统，一直到1862年。在他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最著名和较重要的措施无疑是前面已经谈过的取消印第安人纳贡和废除奴隶制，这使卡斯蒂利亚赢得"解放者"的称号并且更孚众望。在政治上，他的第二任任期是在是否须有一部新宪法的热烈辩论中开始的。辩论的最初阶段自由派取得胜利，1856年的宪法获得通过。这个宪法减少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强了立法机构的权力。卡斯蒂利亚只给予新宪法以温和的、有保留的支持，但是采取了适度的行动方针，一直到1858年他解散国会，组织选举，产生一个比较保守的制宪会议。1860年秘鲁产生了另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较好地反映了卡斯蒂利亚自己的政治信念，重新使总统成为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这两部宪法的文本像在它们之前（1846—1851年）保守派巴托洛梅·埃雷拉和自由派佩德罗·加尔韦斯之间进行的关于国家性质的著名辩论一样，其显著之处就

558

是它们和19世纪中叶秘鲁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完全无关，使人读起来感到有兴趣的，只是它们表明了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和整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

1862年，米格尔·圣罗曼将军接替卡斯蒂利亚担任总统，但是他在短期任职后因病死亡。他的继任人、副总统胡安·安东尼奥·佩塞特由于西班牙对钦查群岛提出领土要求而面临和西班牙发生冲突的困难岁月(1864—1866年)。他对西班牙的要求采取的和解政策被认为是丢脸的，引起了上层人士和军人的愤怒和不满。最后，马里亚诺·伊格纳西奥·普拉多上校发动反对总统的武装叛乱，1865年11月把总统赶下台。普拉多接管了总统职务并领导秘鲁军队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令人心悦诚服的军事胜利。但是他为了继续担任国家首脑，必须继续巩固他的地位。他在自由派支持下决定恢复1856年宪法，但是激发了另一次内战。领导那些要求恢复1860年宪法的是卡斯蒂利亚。在冲突的初期阶段，这位年已70的“解放者”因健康状况不佳去世。他的副司令佩德罗·迭斯·坎塞科将军接管了运动的领导权，并在1868年初取得胜利。胜利的保守派势力恢复了1860年宪法，7月份任命何塞·巴尔塔上校为共和国总统。巴尔塔的任期的特点是无能和腐败，而正是在他为期4年的统治期间秘鲁上层人士内部的反军人情绪达到顶点，成立了文官主义党*，1872年它的一位领导人曼努埃尔·帕尔多攫取了总统职位。

当鸟粪成为秘鲁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时，不仅外国债权人加倍努力要求偿还他们的贷款，国内债权人也开始为要求承认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卡斯蒂利亚第一次执政在1851年结束时，清理后的内债总额已达4,879,608比索。① 据卡斯蒂利亚本人说，债务 559

* Partido Civil，一译文官执政党。——译者

① 《年鉴》，第Ⅳ卷，第5页。

总额不可能超过六、七百万比索。然而，在埃切尼克政府统治下，政府承认的债务总额达23,211,400比索（将近500万英镑）。① 被承认的债务之所以大量增加是由于秘鲁行政机构贪污腐化。正是这一弊端为卡斯蒂利亚在1854年发动叛乱提供了借口。第二年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国内债权人（商人和地主）手中的债券中有1,200万比索以上是假的②。

1850年，秘鲁政府和一批本国商人签订了向西班牙、法国、中国、安的列斯群岛和美国出售鸟粪的为期10年的合同。这些商人创办了“鸟粪承销公司”并且着手发行股票吸收资本。然而，结果情况不好。一年以后他们被迫把他们的活动限于美国市场，合同期限不超过5年。③ 但在1860年和1862年，他们利用清理内债支付给他们的资金来取代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作为向英国——最重要的欧洲市场——出售鸟粪的承销人。全国承销公司中有一些最有力量的利马商人，其中许多人是清理内债的受益者，他们现在得到了机会，不仅靠出售鸟粪而且还靠向秘鲁政府贷款索取高额利息来增加收入。通过这种方式，投机性资本和商业资本彼此互相支持。

鸟粪贸易发展后，有必要建立一些机构为迅速筹集信贷提供便利。这里也一样，如果没有本国资本家控制一大部分出售鸟粪收入，那么，制订第一批指示，首先是立即认购所发行的股票将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了新的融合。例如，1862年9月成立普罗维登西亚银行，资产为50万比索。1863年5月成立秘鲁银行，资产为1,000万比索。就是这家银行和全国鸟粪公司有最密切的联系，它的股东也属于鸟粪公司。同样，1869年3月成立的利马银行资产为320万索尔，它的股东中也包括 560

① 何塞·埃切尼克著《秘鲁史料（1808—1878）》（利马，1952），第II卷，第199页。

② 《年鉴》，第V卷，第46页。

③ 《年鉴》，第V卷，第27—28页。

这个时期一些比较知名的阔人。最后，在1866年创办了抵押信贷银行，开办资本为150万比索，它专门对城乡产业发放抵押贷款和长期贷款。①

当棉花和食糖生产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扩大时，来自鸟粪和银行的资本找到了对农业部门投资的新机会。这样，一个强大的、互相密切联系的寡头集团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财富是从金融、贸易和土地混杂在一起得来的。结果，在这个由强有力的个人小圈子之内，没有什么大的内部分歧，因为他们控制的资本所投入的部门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

由商人、金融家和地主组成的这一寡头集团的出现不久就组成了秘鲁第一个现代化的政党。1871年文官主义党的成立使他们有了一个可以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说话的工具，并且，作为他们发挥自己的力量与影响的结果，在1872年把曼努埃尔·帕尔多提到总统的职位。文官主义党人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反对军人执政（自从1821年以来军人几乎不间断地控制着国家），并且反对国家的经济方向，特别是对鸟粪所创造的财富的使用方式。文官主义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在1859年至1863年期间开始在《利马评论》上表达出来，并且在出现文官政府之前就已经开始应用。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曼努埃尔·帕尔多，这并非巧合。帕尔多和他在《利马评论》中的朋友十分清楚地知道，秘鲁的前途不可能长时期和鸟粪联系在一起。这一资源有枯竭的危险，另外还可能受其他肥料竞争的影响。此外，他们也知道鸟粪收入正在被浪费和用于非生产方面。帕尔多认为，正因为如此，必须重新确定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把鸟粪还在创造的少量资金用于建成全国铁路网。铁路通过扩大市场和把市场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把秘鲁经济更有效地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将在促进国民生

561

① 卡洛斯·坎普鲁维著《秘鲁银行史》（利马，1957），第Ⅰ卷，第39—40、61—64、85页。

产方面起有益作用。把鸟粪变成铁路，并且吸引外国资本用于另外的开支，这就是帕尔多和《评论》所提出的论点的主要支柱。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铁路促进生产这个方程式并不是从为国内市场促进生产的角度着想的。由巴尔塔计划的、在他执政期间部分建成的一些主要铁路把沿海港口和原料产地连接起来。北部铁路为运输棉花和食糖服务，中部铁路为运输银和铜服务，南部铁路为运输羊毛服务。结果，依然是利用铁路为更有效地开发国家财富并把它并入国际市场扫除障碍。对地主来说，崎岖的地形和靠骡马驮运这种没有竞争力的运输系统妨碍他们利用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机会和从中牟利。另一方面，铁路网的完成也将使垄断商人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把他们的货物运入内地市场。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文官主义党的政治家们的计划都不意味着秘鲁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有任何真正的改变。它纯粹是并且完全是使运输系统现代化以便把秘鲁经济和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联系起来的计划。在这方面，关键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采取另外的方针。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政策，那将意味着拆除使秘鲁经济和社会具有殖民地性质的支柱，废除沿海和高原地区的大庄园目前的生产关系，改变农民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为建立健康的国内市场打下基础，这样做也许能为国家的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国内的刺激力量。然而，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意味着不仅是修建铁路的问题。它意味着要改变政治制度，而对于这样一批人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任务，这批人——不管其他方面怎么样——既缺乏这样做的力

562

量，又缺乏必须这样做的信念。

当曼努埃尔·帕尔多在利马人民挫败军方想继续掌权的企图之后于1872年8月2日就职时，他发现国家已经破产。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修建铁路的政策促使外债增加到3,500万英镑，分期每次偿还约250万英镑——这个数目和全年预算相等。此外，偿还1870年和1872年贷款本息全部吃掉了德雷菲斯根据1869年合同保证每月要汇给国家的款项，这就造成了850万索尔的预算赤字。和前几

十年不同，伦敦金融市场的情况使秘鲁政府不能再采取以前筹集贷款的政策。1874年德雷菲斯宣布要到1875年底才能考虑偿还以前的证券本息，情况更加恶化。秘鲁政府拚命想找一个办法来代替德雷菲斯——通过1876年巴黎总公司和秘鲁鸟粪公司签订的商业协订——但结果毫无成效。1876年，秘鲁政府再次财政破产，无法获得新的外国贷款，也无力偿还现有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帕尔多的政策主要是减少850万索尔的预算赤字。一项仔细研究的措施是把荒凉的塔拉帕卡省的硝石变成可以资助公共开支的新财源。然而硝石和鸟粪不同，它是秘鲁人、智利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私有资源。因此，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帕尔多在1873年对硝石实行专卖，1875年又征用生产硝石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得到由当地银行担保的"硝石证书"。这些硝石矿矿主因此把他们的活动转到智利，在那里积极进行战争宣传。1878年以后，战争宣传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开始激烈起来（见下文）①。同时，帕尔多计划之中的专卖并未收到预期结果。这时外国贷款来源枯竭，鸟粪出口开始下降，银行和政府被迫大量增加货币发行量，结果使1872年以来一直在酝酿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帕尔多和文职政治家们掌权后只能无能为力地眼看着发生这一场秘鲁最大的财政灾难。这是自从鸟粪繁荣开始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他们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机会加以克服的一场危机。 563

从政治上来看，帕尔多政府的特点是遭到日益增长的对抗和坚决的反对。他打算减少公共开支，遭到文职人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前历届政府的大手大脚做法。同时许多军事机构憎恨这一政策对它们的机构的影响。教会强烈反对政府把促进脱离宗教的普通教育作为国家职责的政策。不久，心怀不满的政治家和军人再一次采取传统的作法。帕尔多在任期过了一半时开

---

① 另请见科利尔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Ⅲ卷，第14章。

始面临军事叛乱，其中许多次是由尼古拉斯·德·彼罗拉领导的，他大力反对他认为是政府的反教权主义。可怜的国家经济状况也对巩固“文官政府”不利。因此，1876年，帕尔多认为解决秘鲁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文官和军人的动乱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个由一名军人作为他的继承人来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这名军人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普拉多将军。几乎不可能认为他是文官主义党人。在普拉多就任总统后不久，他就脱离了那些曾经希望对他和他的政府施加影响的文官主义党人。然而，他未能争取到彼罗拉的追随者的支持，因此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他击败了这两个集团所组织的若干次叛乱，但是相当费力。1878年11月，帕尔多在情况不明下被暗杀，秘鲁更进一步走向混乱。彼罗拉的追随者和文官主义党人(他们认为前者应对帕尔多遇害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之间业已激烈的对抗情绪进一步加强，并且有了不详的特点，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已非常明显。只是由于发生了更激烈的事变才使对抗得以避免。

1879年2月，智利占领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港，两个月后对玻利维亚和秘鲁宣战，秘鲁是玻利维亚的盟国，两国曾于1873年秘密签订共和防御条约。智利在占领玻利维亚整个沿海地区后，1879年底成功地侵入秘鲁的塔拉帕卡省，1880年初又侵入塔克纳省和阿里卡省，1880年9月侵入北部沿海地区。1881年1月利马陷落。智利陆军和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使秘鲁在19世纪70年代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达到高潮。①

564

今天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在1825年8月8日建成独立国家，其领土范围就是原来的查尔卡斯检审法院院长辖区。新的拉丁美洲国

① 关于太平洋战争对秘鲁的影响的论述，见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著“太平洋战争与秘鲁的民族和殖民问题”，载《过去与现在》，81，1978年11月，第92—118页。

家中，也许除弗朗西亚领导下的巴拉圭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像玻利维亚那样与世隔绝。在1879年发生激烈事变之前，这个国家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极其薄弱，实际上只是继续保持殖民地时期留下的两条脆弱的通道：一条通往大西洋，是把波托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连接起来的传统通道，这条通道在拉普拉塔河地区诸共和国取得独立和运输成本增加后已失去它的大部分重要性。另一条通往太平洋，它也许是两条通道中更重要的一条，它使玻利维亚可以通到它的唯一港口科维哈，但是只有在艰难地穿过阿塔卡马沙漠之后方能达到，而经过秘鲁的阿里卡港口的贸易又取决于支配秘鲁与玻利维亚的政治关系的气氛变化。除了这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之外，国内关系也严重脱节。在殖民地时期，上秘鲁活跃的经济中心是波托西；它的矿藏和市场吸引了像科恰班巴那样的整个地区的贸易。随着矿业生产的衰落(这甚至在独立战争以前就已经开始，但是战争使衰落进一步加速)，不仅通道被切断，而且像今天的贝尼、潘多、甚至圣克鲁斯也变成了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的内部地区。

据英国观察家约翰·巴克利·彭特兰估计，玻利维亚独立时有110万人口，其中有80万印第安人，20万白人，10万梅斯蒂索人，也叫乔洛人(混血种人)，4,700黑人奴隶和2,300获得自由的黑人。① 大概只有20%的居民能说西班牙语，绝大多数人讲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最大的城市是拉巴斯，有4万居民，其次是科恰班巴，有3万人。维持人民生存的经济陷入深刻危机。在这个世纪头几十年，波托西的生产和人口都已显著减少。据彭特兰称，1827年它仅有9,000居民，而在18世纪末有75,000人。② 在1820年至1830年期间，上秘鲁的银矿生产比1810年至1820年下降了30%；

① J.B.彭特兰著《关于玻利维亚的报告，1827》(波托西，1957)，第40—42页。这是《关于玻利维亚的报告，1827》(英文本)(伦敦，皇家历史学会，1974)一书更完整的西班牙文版本。

② 同上，第58页。

565 19世纪20年代的产量——平均每年稍低于20万马克——还不到18世纪最后10年产量的一半。妨碍采矿活动恢复的因素有：战争期间矿井被破坏、水淹和放弃，缺乏投资资本，在废除米塔制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劳动力(尽管必须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很低的和变动不定的)以及在后殖民地时代国家通过偿债银行继续对收购白银实行垄断(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这使利润锐减。在独立时——以及以后一段时期——矿业生产很低，主要是利用废弃的矿石而不是向深处采掘。

在农业部门，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庄园和村社（自由印第安人村社)，最重要的产品是金鸡纳树皮(用于制造奎宁)、古柯、玉米、小麦和土豆；金鸡纳树皮和古柯很容易在这个地区以外出售，其他产品主要供国内消费。彭特兰指出，1826年，在拉巴斯城古柯每年的贸易额价值达143,600英镑，这个数目几乎等于当年白银出口价值的50％，而玉米和小麦的贸易价值为6万英镑。①

“工业”部门以生产纺织品的工场为代表。但是由于波旁王朝份子实行商业改革和独立时颁布贸易自由法，它们无法同欧洲的棉布竞争。彭特兰估计，纺织品的产值为16,000英镑，而过去曾高达20万英镑。②

由于生产结构上的弱点，玻利维亚经济对国际市场的贡献很小并且极不稳定。玻利维亚1826年的出口值为722,750英镑，其中主要是白银和黄金，其次是金鸡纳树皮和锡，但它们的出口值比白银和黄金少得多。另一方面，玻利维亚1826年的进口值总计为637,407英镑。进口货物是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1/3）和阿里卡（2/3)输入的。这个总数中，大约70％从英国进口，主要是棉布。其余30％从法国、德国和荷兰进口。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地方性贸易也非常活跃。秘鲁特别出口莫克瓜河谷和坦博河谷生产的

① 同上，第99页。

② 同上，第100页。

原棉、葡萄酒和白兰地，价值总计82,800英镑。反过来，玻利维亚向秘鲁出口的基本上是农产品，价值30,640英镑，以满足秘鲁南部市场的需要。① 由于有广泛的走私活动，这些官方数字当然是保守的。 566

在这种情况下，玻利维亚政府遇到很大的财政困难。在1825年和1826年，国家收入每年平均只有40万英镑，而在1827年只有35万英镑。② 在紧接着独立后时期，这一收入中大约60％为军事开支，而在这整个时期一直到1879年，军事开支保持在40—50％的水平。③ 此外，独立的玻利维亚国家在建国时欠秘鲁4万英镑，另外还欠14万英镑，这是1825年制宪会议决定的作为对解放军的赔偿的20万英镑赔款的余额。④

有一点应该强调指出，玻利维亚政府在初期并没有求助于外国贷款来资助它的公共开支。这一点和其他拉丁美洲独立国家政府的作法有明显不同。相反，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的政府（1825—1828）试图通过发行债券来吸引国内的存款，票面价值为20万英镑，由国家财产担保。这些财产是苏克雷奉行目的在于摧毁修道会教士的权力与影响的政策后获得的。苏克雷在独立后

① 同上，第124、121、104页。

② 同上，第139页；威廉·E.洛夫斯特罗姆著《改革的前途与问题。玻利维亚独立后最初几年所尝试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康奈尔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第456页。

③ 1827年，军队有2,291名玻利维亚士兵和“解放号”何塞·安东尼奥·苏克雷带来的2,253名哥伦比亚士兵。见罗伯托·克雷哈苏著《玻利维亚与英国人》（拉巴斯，1973），第148—149页。1828年，苏克雷保持一支2,700人的军队，根据当时的标准来看，军队人数过多。太平洋战争之前，玻利维亚军队从来没有超过5,000人，比较经常的是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它们的费用从来不少于国家收入的40％，而在梅尔加雷霍统治时期高达70％。见詹姆斯·邓克利著《对玻利维亚1825—1879年考迪罗制的重新估价》，载《拉丁美洲研究公报》1/1（1981），第16—17页。

④ 彭特兰著《关于玻利维亚的报告》，第141页。

的西班牙美洲对教会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进攻中，关闭了大量修道院，修道院直接拥有的或者通过抵押而受它们控制的有价值的城乡财产以及因宗教活动而捐赠给教会的基金都被国家没收。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有助于加强国内地主和商人的力量，因为他

苏克雷在写给玻利瓦尔的一封信中预言说："我相信，我们正在上面耕耘的是一块泥沙地，在这样的基础上任何建筑物都不可能存在……。"①玻利维亚在1879年同智利发生战争以前的政治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兵变、政变和反政变作为获得权力和掠夺国家贫瘠资源的手段，这些行动是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在某些丘基萨卡的博士的合谋下采取的。在这种政治不稳定、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下，安德烈斯·圣克鲁斯政府(1829—1839)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568

圣克鲁斯是个梅斯蒂索，在很晚的时候才参加叛军行列，但是他在争取独立的决定性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玻利瓦尔对他的宠爱，使他不久即成为支配独立的玻利维亚命运的强有力的候补者。玻利维亚第一次试图有效地组织政府和经济以及寻找新的途径来克服玻利维亚与外部世界隔绝状态，这要归功于圣克鲁斯。开放科维哈港口使玻利维亚南部市场有可能得到从国外来的货物供应，这些货物由骡子驮运，艰难地穿过阿塔卡马沙漠之后到达波托西、丘基萨卡、图皮萨和塔里哈。鉴于玻利维亚全国支离破碎，几乎完全没有适当的国内运输手段。因此，加强阿里卡港，使之作为供应玻利维亚北部各省的中心和运输玻利维亚出口产品的港口，后来也十分必要。但是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圣克鲁斯主要还是作为缔造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安第斯团结(未获成功)的建筑师而被人们铭记在心。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在殖民地时期有牢固的经济和行政联系。他们所以分离，就像西班牙美洲其他地区一样，是争取解放的斗争有盛有衰变幻不定的结果。玻利维亚主要是通过和它的一些邻国的许多次冲突最后才巩固了它的岌岌可危的国家地位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明确或持续不断的进程。两

① 引自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1809—1821年玻利维亚通史》(拉巴斯，1922)，第65页。

个国家的考迪罗在独立后都不习惯最初的分离状态（从地理上或者从经济结构上说这种分离都是没有道理的），一直谋求利用另一个国家的资源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们还利用在以前的军事战役中建立起来的同志情谊，争取邻国（他们经常到那里去避难）统治者的军事援助，来达到（至少是试图达到）重新掌握权力的目的。这种"援助"或者"挽救"其中一个国家摆脱混乱的必要性经常被用来作为秘鲁对玻利维亚或者玻利维亚对秘鲁进行军事远征的借口。边界仅仅是一条——正如后来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总统所说的——"想像中的界线"，因而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在相互敌对和猜疑的气氛中维持的。这些因素加上共同使用阿里卡港所造成的困难以及1830年后贬值的玻利维亚货币充斥秘鲁市场，①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国内政治反映出两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569

尽管如此，智利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海军力量所造成的威胁使圣克鲁斯（他在19世纪20年代曾短暂地担任秘鲁总统）相信，应设法同秘鲁结成巩固的共同防御联盟和解决两国之间的经济困难。对秘鲁进行军事进攻（1835年6月）的借口是有必要保护一位考迪罗奥布戈索，他被另一个考迪罗狂暴的萨拉韦里推翻了。然而，圣克鲁斯进行干涉的理由不限于帮助他的倒台的朋友。圣克鲁斯后来在厄瓜多尔逃亡时写到他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时争辩说，干涉秘鲁的事务对玻利维亚来说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②

圣克鲁斯获得胜利后继续留在秘鲁，以便使新的政治组织获得明确的形式，那就是建立由他以"保护者"的身份进行个人领导

① 被称为"软弱的比索"的成色不足的铸币是圣克鲁斯在1830年第一次发行的；这种铸币占1830—1834年发行量的14%，到1850—1859年占85%。见邓克利著《对考迪罗制的重新估价》，第18页。

② 《圣克鲁斯将军对自己在任秘鲁—玻利维亚联盟保护者时的施政方针及政策动机进行辩解》（基多，1840），载奥斯卡·德·圣克鲁斯编《圣克鲁斯将军》（拉巴斯，1924），第74页。

的三个国家(北秘鲁、南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使建立秘鲁一玻利维亚联盟成为可能。通过这种办法，并且在面临智利的潜在威胁的情况下，秘鲁一玻利维亚联盟在1836年10月28日成立了，这是实现玻利瓦尔的梦想的一次为时已晚的、局部性尝试。在这次实验失败之后，直到1873年又是在面临智利威胁的情况下才又进行一次类似的尝试，但这一次纯粹是军事性的。

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联合破坏了粉碎殖民地秩序后出现的各国之间的均势，而且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对这些国家的利益的严重威胁。阿根廷，尤其是智利，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迭戈·波塔莱斯1836年9月10日写道，"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将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情况下永远比智利强大"。[1] 12月26日，他以联盟"威胁了其他美洲国家的独立"为由对它宣战。4个月后，1837年5月9日，阿根廷以边界争端为借口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570

智利对联盟的出现作出军事反应，不仅是由于害怕这个新的力量联盟，而且还由于对圣克鲁斯为加强秘鲁沿海各港口的商业地位而采取的措施感到担心。瓦尔帕莱索早已成为南太平洋和欧洲之间的主要商业环节，获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优势；圣克鲁斯为了抵销这种优势宣布阿里卡、科维哈、卡亚俄和派塔为自由港，同时对在其他港口卸下的货物征收附加税。这是一个直接针对智利商业利益的措施，只能以武力解决。联盟军队开始在一次战役中(1837年)获得优势，但是1839年1月20日在秘鲁北部高原的城镇永盖，由布尔内斯率领的智利军队，在秘鲁军队和军官支持下，摧毁了联盟脆弱的大厦。圣克鲁斯先是在瓜亚基尔避难，然后(1843年)到欧洲流亡。

秘鲁一玻利维亚联盟(1836—1839)只存在了一个短时期，并且自始至终经常遭到国内外的进攻，它将只是由于它的未实现的

① 引自豪尔赫·巴萨德雷，《秘鲁共和国史》(第5版，利马，1963)，第Ⅰ卷，第401页。

诺言而为人们记忆。联盟不仅受到智利和阿根廷的外部进攻，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的攻击。它受到被围困的玻利维亚商业利益集团和许多士兵的攻击，他们认为在这一冒险中，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秘鲁人当然不喜欢被一个玻利维亚人“保护”。特别是北部秘鲁人，不相信他们能和极远的南部安第斯山区居民共命运。无论如何，对玻利维亚来说，圣克鲁斯在永盖的失败，接着是奥古斯丁·加马拉的出征(这是秘鲁试图对玻利维亚强施霸权的尝试)于1841年11月在因加维的失败，标志着恢复过去关系的一切愿望都肯定地完结了，并且使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败未定的玻利维亚的独立得到了巩固。

在联盟垮台和圣克鲁斯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时期内，玻利维亚的各届政权很不稳定，不能保持政策一贯，各届政权之间的差别主要取决于每个考迪罗的个人风格和他通过分别提供庇护而吸引追随者的忠诚的能力。例如，贵族出身的何塞·巴利维安(1841—1847)有丰富的想像力，他鼓励到玻利维亚东部探险，寻找通往太平洋的更有效的出口，在被罗萨斯驱逐的阿根廷上层知识份子的帮助下改组教育制度，但是这些努力由于时间或人力物力不足，都没有取得成功。在巴利维安被迫辞职和南部考迪罗何塞·米格尔·贝拉斯科(他在圣克鲁斯之后和巴利维安之前曾在1828年、1829年和1839—1841年担任过总统，并经常在北部领导人的冲突中进行仲裁)短时期重新掌权之后，曼努埃尔·伊西多罗·贝尔苏(1848—1855)成立了一个至少在外形上具有不同性质的政府。这个政府明确地谋求把自己建立在城市手工业者(特别是作坊中的贫困化的手工业者)和农村群众的支持的基础上，同时它通过提高对进口棉布征收的关税和恢复国家对金鸡纳树皮的垄断鼓励国内生产。贝尔苏自称读过蒲鲁东和圣西门的著作，他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过如下的演说：

“同志们，一群疯狂的贵族成了你们的财富和你们的命运的主宰。他们不停地剥削你们。他们日以继夜地像剪羊毛似地剥夺你

们。他们在他们中间分配土地、荣誉、职业和权位，给你们留下的却只有不幸、无知和艰苦的劳动。难道你们和其余玻利维亚人不一样吗？难道这种相同性不是人种相同的结果吗？为什么只有他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遗产、银器、房屋和农田，而你们不能呢？同志们，私有财产是玻利维亚的越轨行为和罪恶的主要根源。它是玻利维亚人之间长期斗争的原因。它是当前居统治地位的利己主义的基本原则。让我们不要再有什么财产，不再有什么财主。让我们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吧。为什么只有贝利维安份子能够占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呢？我的朋友们，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话来说，财产是强者剥削弱者；共同拥有财产是弱者剥削强者。用你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正义吧，因为不正义的人和时代不给你们正义[①]

事实上，很难分清在多大程度上他坚持穷人的事业是出于真诚的献身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是由于需要扩大他的个人追随者的基础，以便对付他的扩大势力的对手。由于经济持续不断地恶化，肯定存在着大批贫困的群众，他们容易响应任何考迪罗的蛊惑人心的呼吁。据估计，仅仅在1840至1849这10年当中，玻利维亚就发生过65次未遂政变。这对于解决玻利维亚紧迫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是十分有利的气氛。

在独立后的头半个世纪，玻利维亚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土地结构仍然保持它们的殖民地性质；那就是说，大庄园和印第安人村社——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那样——是生产单位，印第安人（他们构成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就在这些生产单位中劳动和生活。1866年以前，村社或者至少是印第安人使用的一块块土地得到玻利维亚当局的保证，就像过去得到西班牙人保证一样。和殖民地时期形成对照的是，这一政策现在不是为了确保印第安人劳动力（它对于采矿业的运转至关重要）的再生产，而

① 引自克雷哈苏著《玻利维亚与英国人》，第285—286页。

是为了确保国家通过贡金可以不断得到经常性开支所需的收入——并且保持农村的秩序。事实上，纳贡者和村社社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直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共和国将近40％的收入来自印第安人的纳贡。

何塞·马里亚·达伦斯在他的《玻利维亚统计概要》(1851年)一书中计算，在1846年的1,381,856总人口中，印第安人有710,660人(占51.4%)。82%的印第安人住在一些高原行政省，特别是拉巴斯、波托西和奥鲁罗。相比之下，只有6%住在，辟如说，科恰班巴。形成这种差别的历史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高原的贫困意味着地主不打算在这个地区进行种植，因而不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他们就继续留在村社的土地上。而在科恰班巴，这个地区迅速转变为波托西的谷仓，地主接管了闲置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土地，他们还把那些离开米塔制徭役回来的或者从那里逃回来的人并入庄园。因此，早在1793年，梅斯蒂索人和白人就构成这个地区人口的50％。除了上述印第安人口的地区分布之外，1838年的估计数字表明，在印第安人口构成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应当指出，纳贡的人数从1770年的58,571人激增到1838年的124,312人(1858年达到133,905人，1877年达到143,357人)。这种增加特别是在拉巴斯行政省和波托西行政省。另外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到19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小农发生了更大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在他们不是平等地得到可耕土地，也不是平等地交纳贡金。纳贡的原有居民(Originarios，即得到土地最多的原来的村社居民)的人数从1770年的19,853人增加到1838年的33,308人；纳贡的外地人(forasteros，即得到土地较少的后来者)和寄居人(像外地人一样，但得到的土地更少或没有土地)的人数加在一起从35,400人增加到66,930人。此外，纳贡的土著佃农(Yanaconas，有义务给某一个庄园从事个人服务的无地印第安人)的人数显著增加，从1770年的1,866人增加到1838年的22,227人。在荣加斯种古柯的土地上劳动的新的一类人——流浪汉，Vagos，即流动的劳动者

375

——在1838年总共有2,117名纳贡者。①

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玻利维亚的大地产所有者占有村社的土地和居民有明显的扩大。然而，对纳贡者的记录进行的分析表明，1838年至1877年期间，村社中的纳贡人口增加了，而在庄园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玻利维亚的5个行政省中，村社中的纳贡者1838年为68%，1858年为73%，1877年为75%。相反，庄园中的纳贡者的总人数在这个时期不断下降：1838年为29%，1858年为25%，1877年为23%。而且，外地人数目的增加看来并没有影响这一变化。例如，在1838年，外地人和寄居人占纳贡者总人数的53%，他们当中的79%在村社生活。最后，在1838年至1877年期间，和传统的看法相反，庄园和村社是同时一起扩大和同时一起衰落的，而不是前者在后者缩小的情况下扩大。②

玻利维亚农村人口结构中的这种显著稳定的原因要到经济中去寻找。像波托西、苏克雷和科恰班巴这样一些城市的衰落，加上拉巴斯和奥鲁罗人口增加不多，这就不能使国内需求有很大增长，因而也不需要动员诸生产要素。此外，国外市场也不能起补偿作用，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玻利维亚的奎宁由于哥伦比亚产品的竞争而逐渐无法进入欧洲市场。的确，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玻利维亚采矿经济的复兴导致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但是需求——下面我们还要解释——是通过其他机制得到满足的。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秘鲁棉花和制糖业的扩大对秘鲁经济产生的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574

然而，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在19世纪各个不同时期各届政府并没有试图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原则消灭作为一个集体单位的印第安人村社，建立一个由小业主组成的共和国。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对印第安人村社的这种威胁是从玻利瓦尔本人开始的。然而在玻

① 欧文·P.格里斯哈伯著《19世纪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村社幸存情况》(北卡罗来纳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7)，第79—80、106、132—137页。

② 同上，116、131、154、291—293页。

利维亚，人们记住的对印第安人财产发动重大进攻的发起人首先是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1864—1871）。为了继续掌权而经常进行军事活动的政府的财政需要日益增加，加上需要酬劳他的关系人和依附者，这些就是梅尔加雷霍决定出售印第安人村社土地的基本动机。1866年3月20日的法令宣布，拥有国家土地的印第安人将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是他们要付25比索至100比索进行登记并取得属于个人的地契。如果他在60天之内没有这样做，将被剥夺地产，实行公开拍卖。① 1868年9月进一步确定了这个法令的范围，当时全国制宪会议宣布所有村社土地都是国家财产，同时废除印第安人的纳贡。②

据拉斯特雷部长向立法院提出的报告说，在1866年3月20日至1869年12月31日期间，政府拍卖了梅希约内斯行政省（奥马苏约斯省、帕尔赫斯省、因加维省、锡卡西卡省和穆涅卡斯省）216个 575 村社、拉巴斯行政省（荣加斯、拉乌尼翁、拉雷卡哈、考波利坎和塞卡多）的109个村社、科恰班巴的塔帕卡里的15个村社、丘基萨卡的扬帕拉埃斯的12个村社、塔拉塔的4个村社、奥鲁罗的3个村社和波托西的1个村社的土地或它们的部分土地。③ 从出售这些土地所得款项总计为164,172英镑，其中130,144英镑是用贬值的政府债券支付，其余用现金支付。1870年，又进一步出售土地，筹集到67,637英镑。④ 废除纳贡——同时又分割村社土地——没有任何意义。印第安人的贡金由每人交纳4个博利瓦诺* 的个人捐税代替，同时征收土地税。4个博利瓦诺相当于原来无地的印第安人

---

① 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印第安人与纳贡》，第207页。

② 路易斯·安特萨纳著《梅尔加雷霍的封建主义与土地改革》（拉巴斯，1970），第39页。

③ 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印第安人与纳贡》，第207—208页。

④ 路易斯·佩尼亚洛萨著《玻利维亚经济史》（拉巴斯，1954），第1卷，第294页。

* Boliviano，货币名。——译者

交纳的5个比索，而土地税现在取代了有土地的印第安人以前交纳的贡金。①

用贬值的政府债券购买村社土地当然无助于解决玻利维亚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这种办法使债权人可以把他们的债券变成资本，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农村经济部门的地位。对帕卡赫斯在1866年至1879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出售土地的受益者——除扩大了他们的地产的传统地主外——还有中等规模的业主、商人、甚至印第安人酋长和梅斯蒂索人，这些人因而参加了当地的和地区的上层人士的行列。这些人整个来说还没有把土地看成生产手段，而认为它是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附带可以获得向中小规模的采矿企业进行投资的资本。②

这一掠夺过程的另一个结果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印第安人抗议运动，如1869年、1870年和1871年的暴动。农民群众对1871年初推翻梅尔加雷霍起了积极作用。结果在1871年7月31日，制宪会议宣布一切出售、分配和转让村社土地的作法全部无效，同时保证让全体印第安人充份享有财产权。这既不意味恢复村社的财产，也不意味把印第安人变为无地的打零工的工人。有人认为，土地并没有归还给印第安人，但是从在帕卡赫斯四个村社得到的证据来看（在那里，印第安人在1871年的确成功地收回了他们的土地），这种看法值得怀疑。③然而，帕卡赫斯作为传统的地方叛乱的中心，它的例子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例外情况而不是典型规律呢？就贡金来说，它已经从国家预算中取消，但是印第安人并没有得到豁免；贡金委托给行政省当局继续征收，一直到

① 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印第安人与纳贡》，第208—209页。

② 西尔维亚·里维拉著《玻利维亚高原大庄园的扩大》，载《前进》（拉巴斯），2(1978)，第95—118页。

③ 佩尼亚洛萨著《经济史》，第298—299页；格里斯哈伯著《印第安人村社幸存情况》，第200页。

1882年才最后取消。①

显然，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来估价梅尔加雷霍的土地政策和莫拉莱斯(1871—1872)纠正这种政策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应当看到，1874年10月5日颁布的撤销限定继承权法明确规定法律不允许印第安人村社自由存在，同时宣布，村社成员此后对他们的财产绝对拥有所有权，而在此以前只拥有用益权。② 我们仍然缺乏必要的证据来衡量对印第安人村社财产权利的这种新进攻的程度如何，但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这一措施从法律上取消了扩大玻利维亚大庄园的障碍。然而，要实现这种扩大，光有法律批准是不够的。必不可少的是当时玻利维亚人称之为“进步”力量——那就是采矿、国际市场和铁路——的状况。

从19世纪中叶起，玻利维亚经济的增长是同采矿活动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使玻利维亚经济和国际市场建立起更密切关系的是采矿业，而采矿活动最初依然主要以开采

玻利维亚的采矿业没有帮助农业发展，至少当时是如此。相反，它促使智利扩大了小麦和面粉的出口，这一进程反过来又把传统的商业性农业地区科恰班巴和查扬塔变成了自给自足经济地区。

玻利维亚采矿业不能刺激国内农业的发展也说明了为什么印第安人能够在那么长时间内保持他们的小块土地。同时，正如秘鲁的鸟粪一样，采矿业的恢复破坏了印第安人的纳贡作为资助公共开支的一种手段的重要性。在1827年至1866年期间，贡金平均占每年全部财政收入的37%，而到1886年，印第安人的贡金只占国家收入的10%。① 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白银大王"却对印第安人的财产和文化发动了更有力、更成功的进攻，这一次是以进步和消除对文明的障碍的名义进行的。

在1860年左右，高原地区的主要矿藏的所有权集中在主要由科恰班巴的商人和庄园主组成的新兴上层人士手中。例如，阿拉马约家族拥有波托西、安特克拉和卡瓜伊科略皇家矿井。阿尼塞托·阿尔塞是万查卡公司的首脑，而格雷戈里奥·帕切科接管了重要的瓜达卢佩矿权。然而这些矿主严重依赖外国资本，这些外国资本控制销售并且提供投入。在危机时期这种依赖变成彻底的屈从。在这方面，万查卡公司的例子说明了一种总的倾向。

在19世纪50年代，万查卡公司的经营活动尚能做到收支相抵，甚至还可以略有利润，但增长率不大。由于冶炼能力不足，使得它不可能从普拉卡约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它的未来发展取决于矿井和冶炼厂之间的交通的改善，也取决于提高冶炼能力。为此，必须求助于外国资本，1873年成立玻利维亚万查卡公司就反映了外国资本的流入。这家公司在成立时有562,500英镑资本，分为3,000股。外国资本对公司的控制立即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反映在董事会的人员组成上。董事会由智利人华金·多拉多、梅尔乔·孔查—托罗、路易斯·沃尼、埃尔曼·菲舍和维

578

① 同前，第221页。

一的一名玻利维亚人阿尼塞托·阿尔塞（他控制33%的股份）组成。当时，外国资本的参加没有重大意义，但是1877年公司的改组促使英国、法国和德国资本进一步流入。19世纪80年代，英国资本已占绝对优势。

英国对玻利维亚的渗透，像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在独立时期和紧接着独立后，英国出口货物迅速占领市场；二是接着以直接投资或贷款形式输出资本。在这方面，特别应强调一种因素。在19世纪上半叶，玻利维亚经济较小的市场迅速饱和和这一经济的不稳定性使玻利维亚成为一个对英国利益集团没有吸引力的国家。只是在1869年，玻利维亚政府通过乔治·E·丘奇设法在伦敦筹集一笔贷款（170万英镑），但这笔交易不久即被取消。在此之前，曾在秘鲁（1865年）和智利（1868年）分别筹集187,500英镑和255,549英镑的小额贷款。结果和秘鲁形成对照的是，玻利维亚在1879年只有283,333英镑的外债。[①] 没有多少英国国民住在玻利维亚。对英国使节斯蒂芬·圣约翰来说，玻利维亚即使在1875年11月仍是"世界上最没有意思的国家之一。"[②] 然而，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情况开始急剧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是玻利维亚的对外贸易扩大。如，1869年至1871年，在梅尔加雷霍的经济开放政策下，英国对玻利维亚的出口从8,000英镑增加到24,000英镑，玻利维亚对英国的出口在同一时期从127,000英镑增加到169,000英镑[③] 对这一贸易的一些主要产品——不再仅仅是白银——进行的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智利的资本的渗透日益增加，不仅在高原地区而且在太平洋沿岸地区。

579

---

① 关于这些贷款和玻利维亚的外债，见佩尼亚洛萨著《经济史》，第11、344、403、405、409、416页。

② 引自克雷哈苏著《玻利维亚与英国人》，第362页。

③ 同上，第349页。

从1840年起，智利、英国和法国公司开始勘探玻利维亚沿海地区(阿塔卡马省)并在那里殖民，目的是开采铜矿，特别是重要的鸟粪储藏。在1857年至1866年期间，在阿塔卡马南部的梅希约内斯地区发现硝石矿，智利和英国资本对它进行开发并且把硝石出口到对肥料的需求日益扩大的欧洲市场。从1868年起，安托法加斯塔港(它的人口像科维哈一样，90％以上是智利人)成为玻利维亚沿海主要港口。

外国资本开发硝石使玻利维亚沿海地区和阿塔卡马沙漠的广大地区参加到国际贸易中来。1869年，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最重要的公司是梅尔本·克拉克公司，这是一家由英国国民威廉·吉布斯、乔治·史密斯和梅尔本·克拉克、智利人阿古斯丁·爱德华兹和弗朗西斯科·普埃尔马拥有的公司。这为1872年成立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打下了基础，后者是在瓦尔帕莱索注册的一家智利—英国公司，它从玻利维亚政府得到慷慨的特许权。1870年，由于发现和开始经营卡拉科莱斯银矿(它们通过梅希约内斯港和外部世界联系)，外国资本在阿塔卡马地区的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到1872年，投资总额达到200万英镑左右，投资者中有英国国民吉布斯、史密斯和辛普森，智利人爱德华兹、孔查—托罗、纳波莱昂·佩罗和多拉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已经控制这个地区的硝石的开发和出口的人。① 卡拉科莱斯居民将近有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智利人。

为了筹集贷款和避免商行强加苛刻条件，一些大的矿业康采恩发起建立金融机构。1871年玻利维亚国民银行的成立满足了许多需要。成立这家银行的特许权给与了纳波莱昂·佩罗，他是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公司的创始人，创办资本300万比索，由已经在这个地区建立经济领导权的那些人提供。② 这个集团除控制贸易、

580

① 见安东尼奥·米特雷著《19世纪玻利维亚银矿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哥伦比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7)，第137—139页。

② 同上，第139—140页。

硝石、白银和银行以外，在19世纪70年代还把它的控制扩大到波托西以南的采矿地区，首先是垄断销售，然后是提供投入，一直到最后完全占有。

1878年2月14日，玻利维亚政府决定对1874年以来在南纬23°和南纬24°之间开采的每一公担硝石征收10分钱出口附加税，这一决定使19世纪70年代扩大了的经济活动陡然中断。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认为这是明显地违反1874年同智利缔结的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玻利维亚同意不对在这个以前有争议的地区经营业务的智利公司增收捐税，作为交换条件，智利同意南纬24°为两国边界线。安托法加斯塔当局奉命向安托法加斯塔公司征收9万美元；10个月后，由于英国经理乔治·希克斯拒绝交纳这笔“不公平的”和“非法的”税款，玻利维亚地方长官下令拍卖这家公司的资产，直到卖得要求它缴纳的数目为止。安托法加斯塔公司经过紧张的国会游说活动之后，智利的反应是对安托法加斯塔进行军事占领(1879年2月)，旋即宣战(1879年4月)，战争立即扩大到秘鲁，秘鲁自1873年起根据秘密条约已成为玻利维亚的盟国（见上文）①。两个月内，智利军队占领了玻利维亚的阿塔卡马省。到年底，玻利维亚军队被完全击败。玻利维亚永远丧失了全部沿海领土以及它的大部分财富。然而，智利并不打算侵入高原。主要敌人是秘鲁，而玻利维亚在太平洋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从政治上说，玻利维亚的失败导致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它结束了军事考迪罗的统治，建立了有矿业上层人士直接参加的文职寡头政府。

玻利维亚经济的改组（这是1850年后采矿业发展的结果）使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新出现的集团是由那些同开采白银以供出口有关的人组成的，它的政策同旧有的寡头（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对

① 关于硝石问题和太平洋战争起源的更详尽论述，见科利尔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Ⅲ卷，第14章。

土地和手工业的控制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发生了冲突。然而,这些 518
新的经济上层人士未能直接在政治上控制国家或政策，不得不庇护各类考迪罗，希望通过他们对政府施加影响。具有平民党风格的贝尔苏的继承人是何塞·马里亚·利纳雷斯(1857—1861)。利纳雷斯是第一位文职总统，他通过实行更自由的政策，为加强国际贸易采取了一些初步行动。1858年他废除了国家对金鸡纳树皮的垄断，把进口粗棉布的关税减少了13%，并且开始采取措施为货币提供保证，尽管他未能建立白银的自由市场。他被一次政变推翻,结果再一次使军人获得政治控制,但是实际上军人越来越被迫执行与新的统治集团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措施。这种情况在梅尔加雷霍政府统治下在某种程度上已有迹象，而在以后几届总统统治下更为明显。奥古斯丁·莫拉莱斯(1871—1872)在1872年最终下令建立金块银块自由市场,托马斯·弗里亚斯(1872—1873，1875—1876)、尤其是阿道弗·巴利维安(1873—1874，前总统的儿子)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表现出同他有联系的采矿企业集团的利益。然而，由于在刚崛起的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在新统治阶级和军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长期动员城乡下层阶级(他们是传统经济被打乱的受害者)，这些政府仍然是非常不稳定的。战争为文职上层人士提供了代替军人执政的机会。伊拉里翁·达萨是弗里亚斯总统和巴利维安总统(1872—1876)背后的强有力人物。他1876年5月担任总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领导玻利维亚进行战争，遭到惨败，1879年12月被推翻。取代他的是得到矿业上层人士支持的纳西斯科·坎佩罗将军。他致力于建立稳定的文官寡头政府。这开创了玻利维亚政治中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5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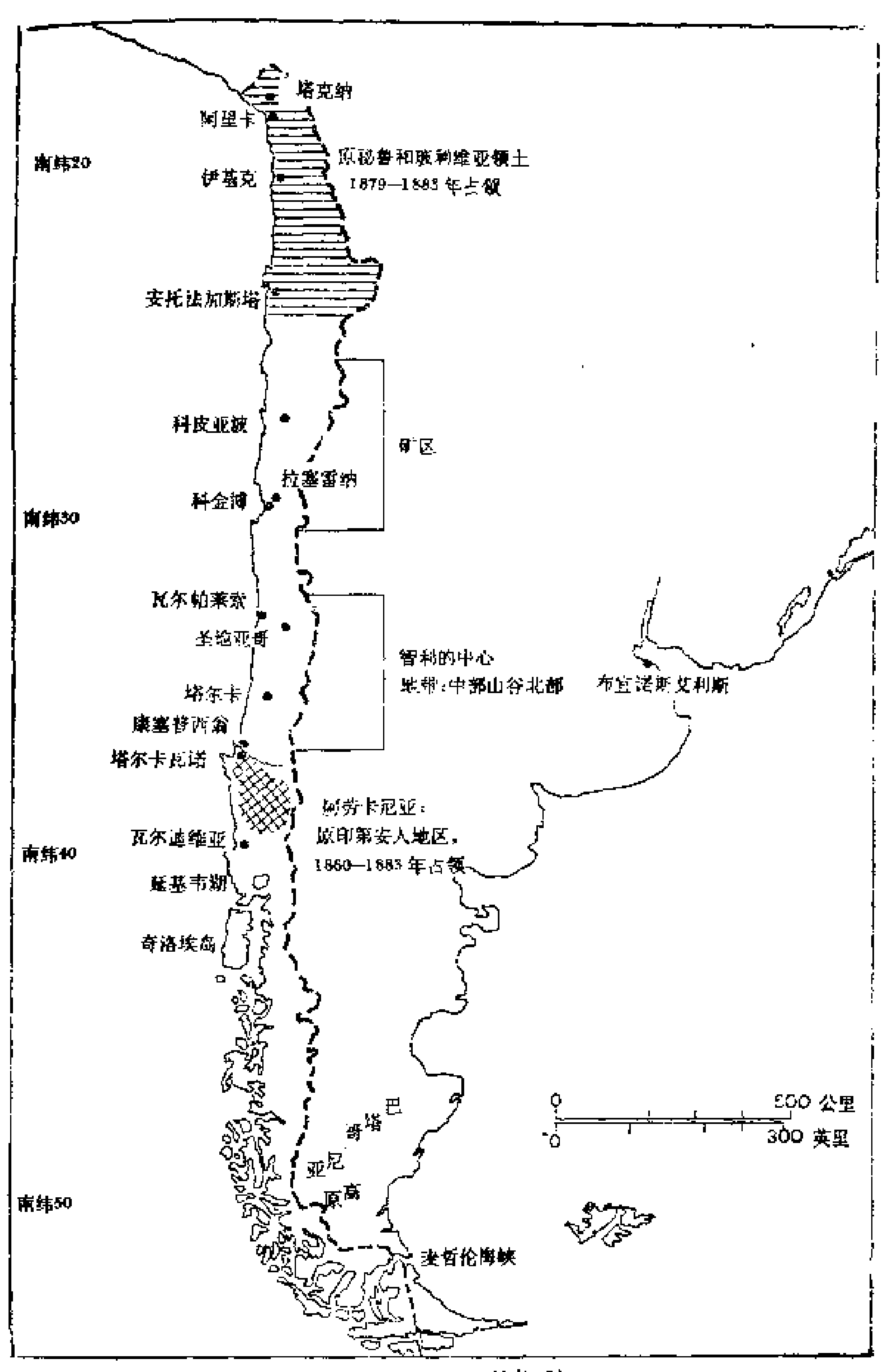
秘鲁和玻利维亚从遥远的过去到殖民制度发生危机一直共享同一个历史，而在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走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持续不断的国内动乱和两国军队之间的争端最终使重新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同时鼓励了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多少有些狭

隘，但是并没有因而减弱力量。然而，它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行发展的。两国政府都不稳定。它们建立在一个狭隘的克里奥尔集团的利益之上，这个集团在财政上勒索印第安人群众而同时又不让他们有参预政治的任何可能性。两国经济不断衰退，直到秘鲁出现了鸟粪繁荣和玻利维亚重新发现白银以及发现硝石为止。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制订一种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整个经济的政策。由于玻利维亚的隔绝状态以及它的经济复兴发生得比较晚，它并没有象秘鲁那样遭到轻率举借外债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它的市场，像秘鲁的市场一样，被外国产品占领。玻利维亚和秘鲁在1879年共同遭受的不幸是两国统治阶级由于在独立后头半个世纪未能使经济得到加强、未能使社会有更大的凝聚力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 14 章

从独立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智利

1852年在瓦尔帕莱索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阿根廷的时事评论 583 家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提议为“南美洲光荣的例外情况”干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9世纪智利的历史的确对通常的西班牙语美洲的模式来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在独立后的15年内，智利政治家一直在建立一种立宪政体的制度，由于它的耐久性和适用性而证明是卓越的（从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标准来看）。一个有效的全国性国家的这种卓有成效的巩固使得一些不那么幸运的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既忌妒又羡慕，因为它们之中有那么多国家由于一再发生斗争和考迪罗统治而四分五裂和遭到灾难。毫无疑问，对于智利的不寻常的经历所作的解释大部分在于这种情况——最好可以称之为这个国家在独立时“容易管理”，这一点从领土和人口这些基本因素来说并非不重要。19世纪20年代智利有效的国家领土比现在要小得多。它的领土从宽度来说特别狭窄——它是“美洲两边悬挂的一把剑”——这种情况由于明显的山岳形态方面的原因过去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那时它的纵长仅有700英里左右，这使得在拓居地北部边界（南纬27°）的科皮亚波周围沙漠的矿区和南部（南纬37°）沿比奥比奥河一带的绿色的肥沃土地分隔开来——这一地区传说上指的是“边疆”，在“边疆”之外，阿劳卡尼亚的印第安人顽固地保持他们独立的生活方式。在瓦尔迪维亚和森林茂密的奇洛埃岛（这个岛在1826年才从西班人手里解放出来）这些更往南的地方，一群群周边地区的居民点是共和国的遥远的 无关紧要的附属品；稍微晚些时候对于1843


塔克纳
阿里卡
南纬20
原秘鲁和玻利维亚领土
1879—1883年占领
伊基克
安托法加斯塔
科皮亚波
矿区
拉塞雷纳
科金博
南纬30
瓦尔帕莱索
圣地亚哥
智利的中心
地带：中部山谷北部
布宜诺斯艾利斯
塔尔卡
康塞普西翁
塔尔卡瓦诺
阿劳卡尼亚：
原印第安人地区，
1860—1883年占领
瓦尔迪维亚
南纬40
兰基韦湖
奇洛埃岛
巴塔哥尼亚高原
南纬50
麦哲伦海峡
0 500 公里
0 300 英里

19世纪的智利

年建立的并且当作罪犯充军地使用的在麦哲伦海峡上挣扎的拓居地也可以这样说。除了阿劳卡尼亚人以外（他们大概有20万人），智利人口仍然是相当少的：它从估计独立时的100万人慢慢增加到1875年的207.6万人，这是官方数字（可能是保守的）。绝大多数智利人在这个国家传说的腹地、在圣地亚哥以南绵延300英里的中央河谷（或非常靠近这个河谷）的地方生活和劳动。根据阿根廷、墨西哥、秘鲁或新格拉纳达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块非常密集的领土，住着一批密集的居民。 584

智利人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个具有同类性的居民群体。不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社会上，过去的殖民地历史都留下了不能消除的印记。在比奥比奥河以北，各个村社中没有多少印第安人（如果说还有的话）幸存下来。村社中的少数黑人和穆拉托人的痕迹似乎在废除奴隶制（1823年）以后的二、三十年内已经消失了。实行共和制的智利基本上是少数克里奥尔上层阶级（以贵族精英作为它的核心）同广大贫穷的劳动群众（他们主要是梅斯蒂索人并且主要是在农村）相互共处的国家。种族区分和社会区分是一致的。在政治上，独立后的斗争主要是反映了上层阶级内部的分歧，而不是社会主体的比较普遍的和更为深刻的冲突。在整个时期，农村穷人仍然是消极的，并且事实上远不止是消极。这种比较简单的社会结构并未因上层阶级内部经济利益的尖锐分裂而复杂化，也没有因为任何类似严重的地区紧张关系这样的问题而复杂化。圣地亚哥及其富饶的腹地控制着这个共和国。比较遥远的北部或南部各省，不管它们满意不满意，是没有力量改变这种力量对比使之对自己有利的，这在1851年和1859年的两次内战中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康塞普西翁和南部地区从独立战争中无精打采地慢慢恢复过来；而康塞普西翁凭借它作为一个守卫边疆的军营城市的作用而能够在19世纪20年代的捉摸不定的气氛中把它的意志强加给首都——正如它在1823年所做的那样推翻了贝纳尔多·奥希金斯，以及它在1829年再次所做的那样——但是在通常时期，

一个控制着军队(或大部分军队)的坚决的中央政府是不可能轻易地被赶下台的。

使19世纪20年代智利上层阶级政治家分裂成为大概可以预料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的那些问题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和涉及到个人方面的问题。这些年居支配地位的人物拉蒙·弗莱雷将军是一个好心的自由派，他渴望避免他们前任、解放者奥希金斯所制订的那种独裁模式。新的共和国从一种权宜之计的政治实验转到另一种这样的实验。1823年底，胡安·埃加尼亚设计的复杂而精致的宪法在6个月内就垮了，它的讲求道德的保守主义内容遭到弗莱雷周围的自由派的拒绝，这些自由派希望——正如他们所说的——"在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共和国"。不久以后使政界人士倾倒的联邦主义思想的风尚，也许与其说是应当归因于地区性的愿望不如说是应当归因于当时的要人何塞·米格尔·因方特的顽固的激进信念；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出现了一部宪法草案、许多新法律、一种日益捉摸不定的气氛、若干城镇中的温和的骚乱以及军队方面发生兵变的倾向。智利的历史学家往往夸大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同当时安第斯山脉另一边发生的混乱相比，这种"无政府主义"是非常有限的。另一个自由派军人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平托将军自1827年至1829年担任总统，他在短时期内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显示出巩固的迹象，并且一部新宪法(1828年)——这是独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按时生效。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足以制止人们对自由派改革主义所作出的日益增强的反应，而这种改革主义是涂上了反贵族的措辞和一定程度的反教权主义的色彩的。1829年9月，在康塞普西翁军队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强有力的保守派三方联盟——传统主义的和亲教士的"要人"、被放逐的奥希金斯的追随者和作为专卖商①而闻名的一批顽固份子——发动叛乱，反对自由派政权。弗

585

① 1824年，专卖业即国家对烟草的垄断权租给了瓦尔帕莱索的商行波塔莱斯-塞亚公司，这家公司保证支付两年前奥希金斯政府在伦敦募集的100万英镑

莱雷堂吉诃德式地跳出来保卫它，于1830年在利尔凯被击败，这场战役结束了短期的内战，迎来了在 1/4 世纪以上的时间内的保守派统治。

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解决办法就像已经提示过的那样，是19世纪拉丁美洲比较卓越的创造。人们通常把取得这种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迭戈·波塔莱斯，他是瓦尔帕莱索的商人，他比任何人都更适合被称为是组织保守派反应的天才。当然，波塔莱斯的无情的坚韧态度是使新政权聚合在一起的关健性因素，尽管他担任首席部长职务的任期是相当短的。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妨碍了考迪罗传统在智利政治中的定形化，因为虽然波塔莱斯的影响十分重要，但是他对炫耀权力的厌恶是足够真诚的。他写道，"如果我拿起一根棍子使国家平静的话，那只是为了让圣地亚哥的杂种和婊子使我安宁"。① 尽管如此，他不论是在政府中的还是在幕后的行动、他严格强调有秩序的管理、他有时对被击败的自由派的粗暴态度以及——这同样是重要的——他坚持国家尊严的立场，这些都为以后岁月中的官方政策定下了调子。 586

批评这个政权的人后来把保守派在19世纪30年代的工作描述为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地反应"。它是对19世纪20年代命运不佳的自由派改革的一种反应，这一点是够清楚的了。但是，把新的政治制度看成是殖民地独裁传统(这种传统在智利仍然非常强大)同19世纪立宪主义的外表形式(和某些精神)的一种讲求实际的结合，也许更确切一些。1833年的宪法的正规运转在1891年以前没有中断，并且这部宪法以修改过的形式幸存下来，一直到1925

贷款的本息。这家企业失败了，1826年合同撤销了，造成很大恶感。这一专卖商集团是由和这个命运不佳的企业有关的人组成的，他们的领导人是迭戈·波塔莱斯。

① 埃内斯托·德拉克鲁斯和吉列尔莫·费利乌·克鲁斯主编《堂·迭戈·波塔莱斯书信集》，3卷本（圣地亚哥，1937），第1卷，第352页。

年。它体现了保守派所迷恋的许多主要思想。可以看出，它比1828年的命运不佳的前一部宪法更具有独裁的性质，特别是非常强调总统的权力。宪法允许连续两次任职，每次任期为5年，这一条款实际上导致了4届连续任职“十年”的政府，第一届政府是波塔莱斯提名的华金·普列托将军的政府(1831—1841)。总统的任命权、对司法和公共行政的控制以及控制国会的权力是非常广泛的，尽管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不同意预算、税收和军事建制这种技术性权利对行政长官进行最后的制约。总统以“特殊职权”或宣布地方性戒严的形式享有的紧急权力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这些权力曾经常被使用——在1833年至1861年整个时期的1/3时间内这些权力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持其有效性。这部宪法的中央集权精神同样是显著的。19世纪20年代联邦制在体制上微弱的遗迹现在已一扫而光了。每个省的监督官现在已确定为总统的“天然的和直接的代理人”——因此这实际上是证明：监督官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权的主要官员，每一个监督官管辖区从实际意义上说成了当地的施政环节。已经很牢固的圣地亚哥的霸权就这样在牺牲地区主动性的情况下得到加强。

588

没有任何宪法是靠自己产生效力的，在西班牙美洲尤其是这样。新的政治制度的有成效的运转，靠的是那个时期的历届政府以有条不紊的坚持态度使用的一些经过充分检验的办法。有些办法比其他办法更明显。镇压是30年来一再使用的一个战术。根据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种镇压并不十分严重。人们更经常地是援引死刑的条文而不是付诸实施。对政治反对派的标准刑罚是监禁、国内流放(“充军”)或在一定时期内放逐国外。自愿流亡（有时是根据契约）并不罕见，特别是在19世纪50年代严阵以待的10年。在保守派恢复教士影响的小心翼翼的方式中可以看出一种反复灌输社会纪律的不太明显的作法。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教会是这个制度的有意的支柱。同样，由于大量清洗自由派军官和广泛改组国家的民兵组织而使19世纪20年代刚露头的穷兵黩武的主张遭到

抑制。到1831年年中，国民警卫队总共有2.5万人。后来它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并且是一支非常可靠的同正规军抗衡的力量。正规军在和平时期的建制很少有大量超过3,000人的时候。民兵曾两次帮助这一政权免遭武力推翻，这两次是1837年6月的兵变和1851年4月的兵变。他们在政府控制选举进程方面也配合得很好。

干涉选举像一个经常的主题那样贯穿于整个时期。它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镇压措施之后还幸存了很长时间。事实上，一位自由派总统曾说过下面这样的话：当他的一个部长在1871年问他智利是否将享有"真正的"选举时，他简短地回答说，"绝对不会！"① 1833年的选举法严格限制了选举权，但是它把网撒得很宽，足以把手工业者和店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国民警卫队的普通士兵）包括进来，这样就在每一次选举中提供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投票队伍。除了这一非常宝贵的支持以外，政府还采取许多办法——恐吓、暂时逮捕、冒充、行贿——以防止反对派选民行使他们的选举权和确保它自己的候选人轻而易举地得到多数票。这一行动是由内政部长协调的，而他在各个省的下属代理人——监督官、地方行政区的政府代表和副代表——在"拉"选票方面像任何现代芝加哥选区头目一样熟练（并且可能更为熟练）。在1833年至1864年期间举行的11次国会选举中（每隔3年定期举行一次选举）有7次不是无人竞选就是几乎无人竞选，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即使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比较容忍的政治气氛中，反对派肯定没有任何可能在选举中得到国会的多数席位。直到19世纪90年代行政长官才停止直接干涉选举。 589

新的保守派制度在其最初的岁月中既面临了战争的最后考验也在这一考验中幸存下来。智利和秘鲁的关系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急剧恶化。商业上的敌对、活跃的关税战以及秘鲁未能偿还智

① 阿夫东·西富恩特斯著《回忆录》，2卷本（圣地亚哥，1936），第Ⅱ卷，第69页。

利的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是奥希金斯1822年在伦敦募集的100万英镑贷款的一部分，智利早就不偿还它了）——这些事情本身都不是进行侵略的充足理由。理由是在1836年提出来的，当时安德烈斯·圣克鲁斯将军用武力使秘鲁和玻利维亚结成联盟。波塔莱斯认为这一具有强大潜力的国家的形成是对智利独立的威胁；如果说他把他的国家推入了战争，这并非夸大其词。他本人就是战争的最初牺牲品之一。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使自由派重新采取阴谋手段，而1837年4月这位十分强有力的部长被一营叛军暗杀，这个事件看来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战争政策和一般来说对政权的支持。波塔莱斯的死亡推迟了事态发展的进程，但是没有使它改变方向。智利的两支远征军中的第二支在曼努埃尔·布尔内斯将军指挥下侵入秘鲁，并且在永盖战役(1839年1月)中击败了圣克鲁斯的军队。联盟瓦解了。1836—1839年的战争是维护国家权利的一个范例，这种作法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但是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智利的国际威望。在国内，它使普列托政府能够对反对派采取一种比较和解的态度，而获得胜利的布尔内斯将军成为总统职位的明显的继承人。就在选举之前，布尔内斯和前自由派总统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平托的女儿订婚，从而巩固了显然在政治上走向宽松的倾向。

布尔内斯将军的总统任期(1841—1851)经常被说成是“有好感的时代”，这在其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如此。的确，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自由主义几乎是由于心地善良而被扼杀了。尽管布尔内斯非常和蔼可亲，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破坏独裁统治的框架；

590 在某些方面(例如1846年的强硬的新闻法)他还加强了这一框架。在他的第二任的末期，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复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首席部长曼努埃尔·卡米洛·比亚尔的野心。当比亚尔在1849年被解除职务时，他的追随者(他们在国会中有很多代表)成了积极的议会反对派。那个时期的主要自由派知识分子何塞·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试图指导这一新的反对派，并

使它团结起来。在国会舞台之外，对1848年法国革命着迷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和圣地亚哥·阿科斯积极设法动员首都手工业者的支持：他们的平等协会以及协会举行的集会和游行在1850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直到政府不可避免地强制实施紧急权力为止。自由派和平等主义者的这一鼓动的主要后果是恐吓了保守党，使它接受曼努埃尔·蒙特作为布尔内斯的继承人。

蒙特总统(1851—1861)是能做到使治理智利的时间超过几个星期的第一个文职人员。他的出奇的死板性格使得一切想确切描绘他的历史的尝试都成为泡影。他的才干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严格的不灵活性也是如此。(他的前任私下表示的坦率看法是此人“头脑清楚但是没心眼”)。蒙特的当选激发了3个月的全面内战，在内战中对政权的挑战不仅来自由派，而且更严重的是也来自南部各省。叛乱的领导者何塞·玛丽亚·德拉克鲁斯将军事实上是一个保守派，并且是前总统布尔内斯的表兄弟；布尔内斯在一次短暂而血腥的战役中击败了他。政权暂时保住了。然而，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蒙特的独裁态度引起了执政的保守派联合体本身内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由于政府和教会之间在司法方面的大吵大闹的冲突而公开化了，教会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而重新兴起。1857年，大部分保守党人都叛离了，并且和反对派自由党的残余力量联合在一起。那些仍然忠于蒙特的保守派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党，但它缺乏刚建立起来的自由党—保守党联盟所享有的比较广泛的上层阶级的支持。有力的鼓动又一次导致了新的镇压，并且因而导致了对政权的进一步的武装挑战。1859年的内战主要是由于叛乱军队在北部矿业省份——战争的焦点——所完成的临时性奇迹而为人们所铭记，但是政府再一次获胜。然而这一次，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接着却是政治上遭到失败。蒙特发现，要强使人们接受他自己选择的继承人是不可能的。这个继 591 承人本来是安东尼奥·巴拉斯，他是蒙特的最亲密的同伴和非常

有才干的政治家。后来选择了一个年长的、随和的、仁慈的贵族何塞·华金·佩雷斯来代替巴拉斯。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佩雷斯总统(1861—1871)是4个"任期10年"的总统中的最后一个。在他的统治下，智利的政治制度终于开始开明了。佩雷斯本人依靠当时被人们所称之为的"从最最冷淡的态度产生的最大的容忍态度"作了同19世纪智利的任何人所做的一样多的事情来增强稳定的立宪主义传统。镇压是结束了，即使对选举的干涉并没有结束——佩雷斯的部长们负责作到这一点。尽管新总统本人名义上是一个国民党人，但他迅速地把自由党——保守党联盟的人召来任职(1862年)。这一从前的敌人之间的联盟证明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执政联合体，虽然它理所当然地不仅遭到被取代了职务的国民党人(他们对蒙特和巴拉斯的忠诚使他们赢得了蒙特-巴拉斯份子的名称)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强烈反教士的、"红色的"或"激进的"自由派的反对，这些自由派现在已称为激进党。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就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全景，并且(除了选举以外)"新的政治"得以发展和昌盛，尽管事情碰巧是这样，即当1865—1866年一个在太平洋海域巡弋的西班牙海军舰队中队迫使智利和它的3个姊妹共和国跟它们以前的宗主国发生短期战争时①，国内的敌对情况已多少有所减弱了。到19世纪60年代结束时，自由派关于宪法改革的概念占据了政治舞台的最前线。首先集中于限制总统的权力的这些思想，越来越成为四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共同立场。关于迄今为止不可侵犯的1833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是在1871年通过的；重要的是，它禁止总统连任。

在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萨尼亚图政府时期(1871—1876)，发生了最后过渡到自由派控制的政治制度的情况。在19世纪70年

① 曾经发生的这种战斗(这种情况并不多)是在海上发生的。然而，西班牙人在从太平洋彻退以前使瓦尔帕莱索遭到毁灭性的炮轰(1866年3月)。

代初期，“神学问题”(人们这样称呼这些问题)开始作为政治问题提了出来。事实上，它们与其说是同神学有关，不如说是同在国家生活中划分教会职能和世俗职能有关；它们产生了大量的感情问题，其中既有对宗教的虔诚的方面也有非虔诚的方面。1873年关于私人教育的一个纠纷使反对教士的人和保守派（他们正越来越变得可以被视为政治上的好斗的天主教党）争斗起来，这场纠纷导致了自由党—保守党联盟的分裂。保守党成为反对派，这样就为以自由党为中心的新的统治联盟铺平了道路。聪明的埃拉苏里斯玩弄了必要的手腕。自由党联盟(1875年)是这个时期第三次伟大的执政联合体，但是它是最不稳定的联合体，因为人们总是发现强有力的自由党中的若干派别是既支持政府又反对政府。在埃拉苏里斯担任总统期间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宪法改革，这些改革都倾向于限制行政长官的影响。对选举程序作出了重要改变(1874年)，其目的是减少官方干涉。但是在1876年，埃拉苏里斯和联盟毫无困难地就以通常方式把下一任总统强加于人。他们选择的是阿尼瓦尔·平托，他是19世纪20年代晚期自由党总统的儿子。

592

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保守派的解决办法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原封未动的话，那么它的内部活动情况却正发生重要变化。在佩雷斯执政十年之后，政党政治已迅速发展；政党本身正取得初步的组织形式。激进党人拥有他们在地方上的议会网络，他们也许是第一个设计出一个明确的(即使是灵活的)结构的团体。保守党人是第一个举行党的全国会议(1878年)的团体。但是，在国会中按照党的方针投票则远不是自动的。当1876年激进党议员拉蒙·阿连德(未来总统的祖父)建议，在国会投票时党的考虑应高于私人原则时，有些人对这个意见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与此相距甚远的是，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事情已变得很明显，整个国会都渴望对行政长官进行控制，其控制的程度要比先前尝试过的或者也许甚至曾经设想过的要大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宪法是强烈支持总统的；但是，正如一些政治家现在所证明的，对宪

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议会式的”解释也是可能的。通过经常使用质询和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办法，议员们使得内阁部长们的生活越来越沉闷和困难了。在阿尼瓦尔·平托担任总统期间（1876—1881）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是和若干非常尖锐的危机同时发生的。智利的体制已经在19世纪50年代的风暴中幸存下来，它们还显而易见地变得更加容忍——这些事情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原因，但是有一些政治家(包括平托)认为这些政治争吵是无益的，因为它们现在经常使国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而把更紧迫的国家事务排除在外；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家则怀疑，行政长官和好斗的立法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破坏稳定的传统。一个保守党议员在1881年惊呼：“多数派的先生们，部长们，我告诉你们，别把绳子拉得太紧，因为这个东西会爆炸的！”①

593

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一清二楚的。尽管如此，看来这样说是公平的：智利在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在商业方面有相当大的扩大，这既应归功于国际上对智利能够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同时至少在某些方面也应归功于可以在这个国家找到的那些稳定的条件。然而这种扩大并不是完全顺利的。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时，由于失去了小麦和面粉的某些海外市场，加上接连两次歉收和北部某些银矿的枯竭，曾经发生过短时期的严重衰退。在其他时期（特别是从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再从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贸易的增长的确很快，智利出现了繁荣的情况。国家对外贸易总值从1825年的750万美元上升到1875年的7,400万美元。政府收入增加得多少比较慢一些，从1835年的200万美元增加到1875年的1,640万美元；从19世纪30

① 克里斯蒂安·塞赫尔斯著《阿尼瓦尔·平托。他的统治的政治史》（圣地亚哥，1969）。10年以后，在1891年的政治危机中，这个“东西”的确爆炸了。

年代末期起，政府收入一般都非常轻而易举地超过支出。①

在独立后的岁月中，一批四通八达的贸易界人士在瓦尔帕莱索建立了根基，而这个时期的历届政府都认为同北大西洋的海洋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贸易是刺激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确，伴随着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解决办法有一种“经济解决办法”，这种“经济解决办法”主要是由卓越的曼努埃尔·伦希福（1830—1835年的财政部长，1841—1844年再次担任这一职务）贯彻执行的。伦希福在他的经济措施中把自由主义和务实主义合在一起，这些措施包括简化财政制度和关税法，清理公债，以及——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在瓦尔帕莱索建立永久性的公共仓库，商人们可以把免税商品储存在仓库里等待有利的市场。瓦尔帕莱索应当成为太平洋沿岸居支配地位的港口，这句话对伦希福和波塔莱斯两人来说是一条基本格言。 594

智利政府严重依靠关税作为它的收入，它有尽可能最强有力的理由来希望增加贸易交流，这个目的当然反映了整个智利上层阶级的看法。但是官方思想中从来没有完全排除关于国家发展的更广泛的考虑。国家在许多领域中——包括改善交通状况——是积极的；而且，除了出口者的利益以外，关税政策并没有忽略地方利益。1864年的关税改革（历史学家往往把它说成是向自由贸易的一次猛冲）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暂时脱离了比较标准的19世纪政策，这种暂时的脱离是努力（相当不力地）把贸易扩大到最大限度同时给予某些国内活动以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护。尽管如此，看来相当清楚的是，在这个新国家极端贫困和缺乏“联合精神”（特别是曼努埃尔·蒙特非常经常地对此表示痛心）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付力量强大得多的保护主义药剂也几乎不可能作很多事

①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智利比索（美元）保持一种差不多是不变的价值，大约值英镑中的45便士，或稍微不到1美元，除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以外，那时比索的价值稍微多一点。

情来使经济活动多样化或发展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地。国家在这个时期的抉择是相当狭窄的。

从对外贸易观点来看，采矿业是整个时期中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北部的矿主积累了当时最大的个人和家族财产。阿塔卡马和科金博这两个人口稀少的省份——智利人现在把这个地区称为小北地区——构成了国家最有活力的地区，人口（1865年大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比中央河谷以种植园为主的一些省份增长得快得多，中央河谷的这些省份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吸引到贫瘠的北部的草草建成的、吵闹的、并且有时发生叛乱的采矿营地；到19世纪70年代那里大约有3万矿工。强悍、有事业心、勤劳、定期的发作、非常骄傲——这就是矿区具有特色的文化。它依靠勤劳挖出的财富对国家的其余地方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巴尔马塞达总统后来也承认，它“使中部城市高贵起来并且使南部田野肥沃起来”。① 在殖民地时代智利开采的3种主要金属中，黄金生产在595 独立后搞得最不好，从19世纪20年代每年平均生产1,200公斤降至19世纪70年代的大约270公斤的水平。相形之下，在同一时期，白银生产从每针大约20,000公斤增加到大约127,000公斤。（鉴于存在着持续不断的走私情况，这一数字也许还是保守的）。铜是三种金属中最有利可图的，在19世纪20年代每年平均生产2,725公吨；这一产量非常平稳地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的45,600公吨的水平，那时智利的产量经常占世界供应量的1/3至1/2。

矿业财富的诱惑力把许多商人、投机者和勘探者吸引到北部沙漠来。人们不断地寻找新矿脉，矿区慢慢地向北扩大，进入阿塔卡马沙漠和通向和玻利维亚接壤的漫长而未经划定的边界。1811年在阿瓜阿马加和1825年在阿克罗斯发生的重要的早期银矿工人罢工不久就由于1832年在科皮亚波以南的查纳西约激动人心

① 罗伯托·埃尔南德斯著《胡安·戈多伊与查纳西约的发现》，2卷本（瓦尔帕莱索，1932），第Ⅱ卷，第560页。

地发现银矿而完全黯然失色了。它是这个世纪唯一的产量最高的矿区，是一座名符其实的"银山"，它在最初10年是至少产生了1,200万美元的收益，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那里已有100多座银矿。1848年发现的特雷斯蓬塔斯银矿是对繁荣的进一步刺激，尽管不是那么激烈。这个时期最后一次采银热发生在1870年，那时越过边界在玻利维亚境内的卡拉科莱斯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矿区，虽然它几乎完全是由智利人开采的。铜矿开采主要不是依靠新的勘探，而是依靠采掘已经确定的商品位矿脉，但是采掘这一矿藏也同采掘其他矿藏一样，耐心的勘探有时获得了巨额报酬，像何塞·托马斯·乌梅内塔的惊人的例子就是如此，他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寻找矿藏18年，然后在塔马亚偶然发现了他的传奇般的铜矿矿藏。他很快成了百万富翁，也许是几十个靠小北地区发了大财的非常富有的人之一。

智利采矿的办法只是缓慢地和部分地从殖民地时代晚期建立的那种方式中改变过来，那种方式的特点是小企业很多、由个人和家庭经营企业、技术简单和短期的边际活动。的确，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大矿，例如乌梅内塔在塔马亚的矿和何塞·拉蒙·奥瓦利在上卡里萨尔的矿，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机械化，有意思的是，所提到的这两个地区的产量在19世纪70年代占铜的总产量的1/3。但是，在这个时期许多到过北部地区的人证明了人们坚持 596 用老的办法和进行大量的小规模开采活动，这些小规模开采活动不喜欢用蒸汽机而是继续依靠健壮的矿工和驮运工，他们采掘矿石，并把它们从矿井中搬运出来。在19世纪70年代，小北地区大约只有33座矿使用了蒸汽机，剩下的755座矿没有使用。在冶炼铜方面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更值得注意，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广泛使用反射炉(即"英国系统")。此后20年等于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技术革命，在沿海地区、最著名的是在小北地区的瓜亚坎和通戈伊以及更往南500英里处的利尔肯和洛塔建立了几家大冶炼厂；这些冶炼厂是智利第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

它们还加工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矿石，并且部分地抵销了生产者以前对南威尔士冶炼工业的依赖。这些冶炼厂对燃料的无法满足的需求深深侵蚀了小北地区的稀少的木材资源，并且促使沙漠往南推进——这是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智利历史上那个通常未被人们注意然而是基本的生态学题目。主要可以代替木材的东西是煤，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从沿海地区到康塞普西翁以南的地带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开采煤矿。在这里，国内生产的煤容易被从英国（或偶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高质量的煤所击败，但是从长期看它还是坚持下来了，这部分的是因为人们发现把本地煤和外国煤混合使用在冶炼方面是理想的。

智利人（往往是第一代智利人）在这个时期的矿业企业家中是杰出的。一两家铜矿康采恩是英国人拥有的，但是这些是例外，虽然外国工程师在整个矿区是突出的。像乌梅内塔这样的人以及少数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是凭自身的本事发迹的、自然很有实力的资本家，并且他们经常利用他们的巨额横财，向矿业以及运输业和农业投资，尽管他们也并没有忘记给自己提供一种相当富裕的生活方式。许多较小的矿业企业家严重依赖一种被称为代理商的中间人，他们购买这些小矿业企业家的矿石而以提供贷款和供应品作为交换条件。这种买卖是形成若干巨额财产的基础，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古斯丁·爱德华兹·奥桑东的发迹史，他是刚刚在独立前在小北地区定居的一个英国医生的儿子。到19世纪60年代，爱德华兹已是智利最富有和最活跃的资本家之一。在1871—1872年，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插曲中，他悄悄地积累和储存了大量的铜，促使铜价上涨了50%，并实现了估计为150万美元的利润。在爱德华兹执行这一大胆妙计时，智利的19世纪的白银和铜的周期正达到高潮。银矿又保持了20年的高额产量，但是，在美国和西班牙出现生产繁荣的情况下，“智利铜条”在世界上铜的供应方面已经变成越来越不重要的组成部分，到19世纪90年代，来自智利的铜只占6%。当然，这时更往北的沙漠正在提供一种更大的

财富来源：硝石。

尽管采矿业支配了出口部门，但是支配大部分老百姓的是农业。在19世纪60年代，5个智利人中就有4个人住在农村。这里，正如其他许多方面的情况一样，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压倒一切的。在整个19世纪，智利仍然是个由大庄园组成的国土，拥有大庄园就拥有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如果愿意得到的话)和(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不那么自动地得到的）相当不错的收入。这种拥有土地的传统是了解在殖民地时代和20世纪中叶之间的智利历史的关键之一。19世纪中叶种植园的确切数目是难以估计的。1854年的收税记录表明，大约850名地主得到智利中部全部农业收入的2/3左右，而这些地主中有154人拥有每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的庄园。(为了进行比较，这里可以指出，该共和国的总统的薪金是12,000美元，1861年提高到18,000美元)。种植园至少占有全部农业用地的3/4；大多数种植园每年都有大片不耕种的土地。这些庄园是由一个稳定的、住在那里的劳役地租佃农阶级和在必要时从外边雇来进行季节性劳动的债役雇农来耕种的。我们知道，这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制度在西班牙语美洲的许多地方都是常见的(尽管也有许多变种)。当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骑马穿过智利农村时，他认为这种制度“像封建制度那样”。智利的劳役地租佃农是通过习惯和便利条件的纽带而不是通过法律或债务的纽带被束缚在种植园上的，允许他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交换条件是他要向地主提供定期的劳动服务。在不存在欧洲那种传统的村社的情况下，庄园变成了他效忠的唯一中心，并且成为他自己的小天地。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1861年写道，“智利的每一个种植园都形成一个单独的社会，它的首脑是地主，它的居民则是劳役地租佃农……而地主在他的种植园中就是一个专制的君主”。① 对于佃农来说，生活是很苦的，虽然不一定是严酷的；他 598

① “阿特罗普斯”著，《智利的佃农》，载《太平洋评论》，第5期(1861)，第94页。

们的耕种方法是原始的，他们的饮食单调，有时刚够糊口，而他们在社会等级上升迁的机会是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的。但是种植园的相对安全感可以和外边大多数雇工的困境形成对照——这些雇工是一群赤贫的人，他们靠非法占用边缘土地、靠在中央河谷游荡以寻找季节性工作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靠偷牲口和当盗匪来勉强过着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生活。从种植园主的观点来看，农村中既有没有使用的土地也有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在1850年前后并不大规模地需要土地和劳动力。

如果说农业在这个时期的初期没有收益和无利可图，那么，要指出其原因是够容易的了。当地的需求很快就得到满足，而出口市场却很少。18世纪和秘鲁的粮食贸易（历史学家可能一直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在独立战争和19世纪30年代发生的商业敌对之后再也没有在从前的规模上真正恢复过来。然而，在1850年至1880年，由于种植园对打开海外的新市场立即作出响应，地主的前景十分急剧地得到改善。智利作为美洲太平洋沿岸唯一主要的生产粮食的国家，处于很好的地位来利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淘金热所提出的宪法的需求。1848年向加利福尼亚出口的小麦和面粉共计6,000公担左右。两年以后，至少向北方运去了277,000公担的小麦和221,000公担的面粉。这一繁荣是短暂的，到1855年加利福尼亚已自给自足了，但是这一繁荣在持续期间产生了高额利润，并且它使得在塔尔卡地区和塔尔卡瓦诺湾一带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圣地亚哥本身的一种在技术上现代化的碾磨工业巩固下来。到1871年，智利大约有130家左右的现代化面粉厂。（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在美国的中西部和欧洲开始进行碾磨技术的进一步变革，但是相形之下，这些变革到达智利为时较晚。）澳大利亚在19世纪50年代为智利提供了第二个短命的（并且是有些不稳定的）市场，在一段时期内这个市场是赚钱的。地主们十分懂得，地理条件和好运气是发这种横财的原因，这笔横财为数是够大的：农产品出口值在1844年至1860年期间增加了4倍。事情绝不是到

此为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市场上获得的经验加上运输条件的重要改善使得智利在19世纪60年代能够向英国出售大量粮食（小麦和大麦）：1874年出口了200万公担，这一年达到最高记录。然而，情况再一次发生变化：智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比它看上去的要脆弱，几年以后当粮食价格下跌并且新的、更有效率的粮食生产国开放以后，智利的竞争地位就被永久地削弱了。

这个世纪中叶的这种出口繁荣的刺激给农村带来一些明确无误的变化。也许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是现在建造了许多灌溉运河，其中有一些是工程方面了不起的杰作。（1854年曼努埃尔和其他种植园主发起修建的拉斯梅塞德斯运河花了30年才建成，并且最后在非常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75英里）。通过引进外国品种，牲畜质量慢慢得到改善。随着城市的发展，日益扩大的水果和家禽市场使附近的种植园和较小的（往往是专业化的）农场（它们被称为小庄园）得到很大好处。智利人从殖民地时期的最初年代时起就喝上了他们自己酿造的葡萄酒；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第一次在当地种植从法国带来的比诺葡萄和加伯内葡萄时才为栽培葡萄的伟大传统奠定了基础，这一传统使得后来能生产西半球最好的葡萄酒。政府本身以及全国农业协会（从1838年以后断断续续地存在）设法改进农业知识。这样来描述像这样的事态发展似乎给人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印象，但是这多少有些欺骗性。农村社会和传统的耕种方法并没有真的被猛烈地打乱，尽管事情看来可能是这样：农村中的货币交易比以前更广泛了。人们比较少地对农业进行巨额的资本投资（除了灌溉工程以外），而尽管一些进步的地主有热情，但是从来没有大规模地进口或使用农业机器。（直到20世纪30年代，智利仍然普遍使用牛）。在出现出口繁荣的幸福年月中，地主在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都有充足的储备可以取用。这些年的耕种面积很可能增加了2倍甚至3倍。从种植园以外来的新家庭受到鼓励（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无疑是渴望）来扩大劳役地租佃农的行列。劳动制度本身肯定是收紧了，对佃农提出的要求更高了。和 600

劳役地租佃农制极为不同的是，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还实行了一种佃农用谷物分成交租的作法，以便有助于为出口繁荣提供粮食。小庄园的数目看来也增加了。但是一般来说，由于19世纪中叶的变化而最明显地得到巩固的是种植园制度本身——它是国家精英的基本支柱。

在智利独立时和以后二、三十年内存在的制造业是由城市小作坊的手工业者和工匠经营的。在农村，种植园居民大部分穿自己做的衣服，尽管这些年英国棉花进口的日益增加大概起了缩小当地纺织业的范围的影响。总的说来，上层阶级能够满足它对国外制成品（包括奢侈品）的需求，因而对于促进工业革命不感兴趣。（在这里，矿业企业家是一种部分的例外情况，而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和政治家认为工业主义是使国家前进的一种可能的道路）。然而，这一点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即大约在1850年前后，国家财富的扩大的确为经营制造业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有时是被抓住了——通常是被外国人抓住的——尽管这些人也许可以被视为第一代智利人。第一批主要的工业企业随着出口的繁荣而兴起，它们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炼铜厂和面粉厂。除此以外，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诸如纺织、食品加工、制砖和吹玻璃等领域小规模的工厂生产也发展了。到19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至少有30家酿酒厂。此外，在新铁路和采矿业的需要的刺激下，出现了一些能够进行维修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制造装备的小铸造车间和机械车间。事实上，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看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冶金和机械部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使人们认为，智利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往往被说成是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应当往前推回10年左右。

不用说，如果没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智利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扩大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于加强新国家的政治凝聚力也显然是重要的。停靠智利港口的船只

数目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差不多是在不断地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增加到每年4,000艘以上。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美国人威廉·惠尔赖特（英国拥有的太平洋轮船公司的创始人）在1840年从英国把两艘700吨的明轮轮船开到智利。外部世界开始缩短了距离。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要是在适当的连接上穿越巴拿马地峡，就可在不到40天之内到达欧洲，这已经成为可能的了（机帆船仍然需要3、4个月）。1868年，这时根基已很牢固的太轮公司（这个公司的名称的缩写后来引起了几个著名的智利笑话）开辟了瓦尔帕莱索和利物浦之间经过麦哲伦海峡的直接航运业务。同时，由于铁路的不可避免的到来，内陆运输也正慢慢地革命化。的确，智利北部铺设的铁轨里数在拉丁美洲数第一。惠尔赖特修建的这条铁路在1851年完工，它把瓦尔帕莱索和50英里外的卡尔德拉港连接起来。这条铁路是由一批富有的矿主资助的，它为以后在矿区修建的若干铁路树立了样板。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之间的重要联系不得不再等一些时候。这条铁路的修建最初是由一个合资企业承办的，政府提供了大约一半资本，但是在1858年，经过令人厌倦的拖延和困难之后，国家购买了大多数私人股东的股票；一个霸道的美国企业家亨利·梅格斯被委托完成这条铁路；最后一段宽轨是在1863年铺设的。另外一个合资企业发起修建向南穿过中央河谷的第三条主要铁路，生产粮食的种植园主对这条铁路特别感兴趣。埃拉苏里斯政府在1873年接管了这条铁路，只在几年之后这条铁路就和另外一条铁路连接起来，后而这条铁路那时是从塔尔卡瓦诺向内地修建的，它往南进入富有浪漫色彩的阿劳卡尼亚风景区。1882年，智利有将近1,200英里的铁路线，国有的占一半稍多一点。国家还津贴并且后来购买了刚开始形成的电报网（它是在1852年开始兴建的）——这是不知疲倦的惠尔赖特的又一项事业，后来在适当时候人们为他在瓦尔帕莱索建起一座雕像。20年后，智利人胡安·克拉克和马特奥·克拉克弟兄把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连接起来；在1874年铺设了巴西的海底电 601

缆后，智利第一次和旧世界建立了直接接触。

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经济活动日益加快的步伐在这个国家的 602 金融和商业体制上留下了它的印记。例如，直到19世纪50年代，主要的贷款来源一直是私人贷款者或贸易商行。现在，由于出现了第一批正规的银行——19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了奥萨银行和瓦尔帕莱索银行——这种情况已经改变，而银行的活动已足够广泛，因而有理由在1860年的重要法律中作出规定。1856年成立的著名的抵押信贷所向农村输送贷款——实际上主要是向大地主输送贷款。合股公司这时变得越来越普遍，尽管它们是补充而不是代替那些由个人和家族成立的康采恩和合伙公司（这些康采恩和合伙公司到那时为止一直是企业组织的标准模式)。最早的合股公司是铁路公司；到19世纪 70 年代末，150多家这种企业已经在这个时候或别的时候成立起来，主要是在矿业、银行与保险、以及铁路方面。智利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显示出显著的扩张倾向，它的资本流入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硝石企业以及卡拉科莱斯的银矿。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在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就有经营没有规章的股票交易活动，那个时候"卡拉科莱斯热"正驱使投资者进入智利史无前例的疯狂的投机活动。

整个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由以瓦尔帕莱索和首都为中心的几十家进出口商行控制的；这些商行大大有助于建立新的金融市场，并在以后经济的不断发展的公司社团部门中仍然有影响。外国人，不管他们是永久性居民还是在智利设有分行的海外贸易商行的暂住的代理人，在这里都是特别突出的，而英国人居领导地位。和英国的关系对智利来说是基本的。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投资大部分限于政府债券——到 1880 年高达700万英镑左右——而在这些年中的任何一年，智利全部出口的1/3到2/3都是运往大不列颠的，它的全部进口的1/3到1/2都来自大不列颠。从法国的进口也很多，这反映了上层阶级的爱好。像在殖民地时期一样，和秘鲁的贸易继续进行，但是这种贸易由于现在和北大西洋

铸造起的联系而黯然失色了。汽轮、铁路、电报、银行和合股公司在巩固智利同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形成的国际经济日益增强的联系方面都起了它们的作用。政治家们可能不时地谴责英国商人是“新的迦太基人”或者甚至(比较通俗的说法是)说他们是“异教徒”,但是整个说来人们欢迎他们的到来，认为他们的到来在人们确信是国家的进步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603

取得独立的60年后，智利整个说来是一块比在1810年看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更繁荣的土地，在经济上也比殖民地时代更统一。它在这方面的记录同其他几个西班牙美洲共和国的明显停滞状态形成强烈对比。但是这一新的繁荣并不是按比例地（更不是均等地）分布在各个阶层的人们之间。上层阶级的财富非常惊人地增加了，并且上层阶级对于如何处理这一财富有相当明确的想法。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美国访问者说，关于获得财富的“伟大的生活目的”似乎是“搬到首都去，大量花钱来购买昂贵的家具、设备和过一种华丽的生活”。① 具有道学气质的作家对比较老的、比较严肃的、被认为是比较有道德的生活习惯的逐渐消失感到痛心；而这样说大概是公平的：即采取比较高级的、欧洲的生活方式——从戴的帽子到赛马这整个范围的风尚在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可能大大加深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它也可能是了解1861年以后开始的政治开明化的一个关键。智利社会的精英阶层从来都不是对新来者关门的。矿业和金融的新大亨很容易就被同化了，正如同取得成功的移民的子孙被同化一样——尽管人们议论很多的、智利上层阶级中具有非西班牙姓的那批人只是在这个世纪末才真正显露头角。（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历届内阁中只有一个人是英国姓)。在矿业、土地、银行和贸易方面的一系列互相重叠和经常是互相联系

① 〔C.M.默温夫人〕著《在智利的3年》(纽约，1863)，第95页。

的经济利益为这一开放的、灵活的精英阶层提供了基本凝聚力。矿主或商人——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下本来可能成为进行征服的资产阶级的先锋——从一开始就被包括在社会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之中，在那里，基本上是贵族的观点和态度占上风。上层阶级的最高价值是同家族和拥有土地有关的那些价值。在这个时期，家族关系的重要性怎样说也不会夸大。它是常常在政治中显露出来的东西。布尔内斯总统是他的前任中的某一个总统的女婿，是另一个前任总统的侄子并且是他的一个继任人的连襟。在1830年后的那个世纪中，埃拉苏里斯家族给予共和国一位大主教、3个总统和50多名国会议员。同样，农村财产的吸引力使精英们结成一体而不是使他们分裂；拥有土地是贵族地位的非常珍贵的标志。这些使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显然在智利的社会发展中鼓励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励变革和重新安排。

604

由于经济扩大的结果，在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有一个人数较少、各种人混杂在一起的社会上的“中间群体”显而易见地发展壮大了。它包括小企业主和小农场主、人数日益增多的从事贸易的办公雇员、行政机构的下等成员（甚至在1880年他们的人数只不过有3,000人）以及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工匠。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智利人使用工人阶级这个名词时就是指这些手工业者和工匠。在中间群体的上层边缘，想要进入最优秀圈子而遭受挫折的那些人构成了一种可以识别的类型的人，那个时期的一些小说中对他们曾有过很好的描述。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晚期起，这种人被称为故作风雅的人，传统上说这个新名词（即使它不再被广泛使用，人们也仍懂得它的含义）是拉斯塔里亚创造的。至于智利手工业者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受到商业政策的很好保护，但是，城市（和上层阶级财富）的增多就产生了对服务和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最好能够在当地得到满足，因此许多工艺和买卖似乎至少是适度地发达起来了。这伙人在举止和抱负方面明显地是仿效高级社会的气派。一位目光锐利的访问者在

谈到1850年圣地亚哥的“技工和零售店主”时指出：

“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有一种固有的不整洁的情况；但是在公开场合，精致的衣着是他们的强烈的爱好，一个陌生人很少会怀疑他所遇到的穿着精致的绒面呢大衣、陪伴着一位穿着丝织品、戴着珠宝的妇女的那个男子在社会等级上所站的地位并不高于一个白铁工人、一个工匠或是一个店主的地位，他的仅有的全部工具可以装在一个五英尺见方的盒子里”。①

以后几年互助协会的普及对手工业者和工匠提供了更大程度的安全。第一个互助协会是1853年在印刷行业中建立的，它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到1880年，由于建筑师费尔明·比瓦塞塔和其他人的努力，大约有39个这种协会享有合法地位，这预示着工会在以后的兴起。

605

一种深刻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裂痕使得上面所说的各个社会集团和城乡广大劳苦大众分离开来，这些劳苦大众的境遇在这个时期只是稍有改善，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尽管现在农种植园定居的家庭数目增多了，但中央河谷的雇工还是常常被迫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工作。他们数以千计地迁移到主要城市的过份拥挤和不卫生的地区。在智利和国外，城市劳动者和雇工还成群结队地来到北部的采矿营地和参加到修建铁路的人群中来。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有冒险精神的亨利·梅格斯（他因说过下面这样的话而出名，他说，他宁可雇用500个智利城市劳工而不雇用1,000个爱尔兰人）。在秘鲁着手进行宏伟的修建铁路的计划时，至少有25,000名智利人响应他的号召。这种劳动力的外流在国会中引起辩论，并且提出了限制向外移民的建议，同时地主们抱怨农村“缺乏人手”。事实上并不是真的缺乏人手，而那些比较敏锐的智利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开始使贫穷的劳动者受到比过去多少更为仔细的彻查。

① 美国海军上尉J.M.吉利斯著《美国海军在1849—1850—1851—1852年期间对南半球进行的天文学探险》，第1卷，《智利》（华盛顿，1855），第219页。

如果说人们移居国外（在短时期内）是智利立法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从欧洲移民进来作为使下层阶级“开化”的手段的主张则更经常地被提出来。排外情绪的痕迹可能在穷人中幸存下来——偶而还被煽动起来，像在1829－1830年的内战时期那样——但是，一般来说，人们对外国人是张开两臂表示欢迎的。安东尼奥·巴拉斯有一次说过，“‘外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字眼，应该把它从字典中删掉！”1875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智利居民中有4,109名英国人，4,033名德国人和2,330名法国人，其他国籍的人总共将近15,000人，这个数字中包括7,000名阿根廷人。人们已经注意到英国人在贸易中的作用；一些著名的智利家族在一定时候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早些时候提到的面粉工业大部分是美国人建立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帮助建立了铁路网，后来又帮助经营它们；以后几年占很大比例的一些工业企业家也是从国外来的。外国人在比较适度的水平上也在日益扩大的手工业者阶级中找到位置，主要是在那些适合富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行业中。像法国人克劳德·加伊（作家，写过著名的30册史籍叙述这个国家的自然与文明史）和阿马多·皮西（他绘过这个共和国以南纬28°10′到南纬41°58′的地图）这样一些欧洲学者和科学家作了许多工作来增添智利的知识宝库；政府有一种或多或少是系统化的雇用这些人的政策。没有出现所希望的那种大量移民，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政府鼓励从德国来的家庭在瓦尔迪维亚和延基韦湖周围的人口稀少的南部地区定居。到1860年南部已有3,000多名德国人，他们是吃苦耐劳的拓荒者，他们清除森林、开垦土地以种植作物。

606

官方对南部的这种新兴趣使得独立的印第安人的阿劳卡尼亚飞地开始消失了，这块飞地很不方便地夹在新拓居区和这个国家在比奥比奥河以北的腹地之间。独立后在南部各省对广泛的盗匪活动的镇压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已完成了，这种镇压使阿劳卡尼亚人处于一种比以前多少更容易遭到伤害的地位；但是他们在这

个世纪下一个25年中大体上没有受到骚扰。像殖民地时代一样，军队在边境巡逻，同时圣地亚哥的政府扶植(和津贴)一批有亲善倾向的酋长。然而，19世纪50年代农业的扩大把拓居者吸引到比奥比奥河以南的地区，使得和阿劳卡尼亚人的关系紧张起来。随后在1859—1860年印第安人对边界新拓居区的进攻把“阿劳卡尼亚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提了出来，以后几年曾经过多次讨论。佩雷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通过建立碉堡“战线”把阿劳卡尼亚人圈在一块逐渐缩小的地带里。印第安人又进行了一系列袭击（1868—1871年）来抵抗进行蚕蚀的智利军队，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拓居区渗入边界，这些“战线”无情地更靠近在一起了。太平洋战争后，曾派军队去“平定”和占领残存的印第安人的狭窄的边缘地带。阿劳卡尼亚漫长的自豪的历史可悲地结束了。印第安人本身在名义上被给予一块在圣地亚哥心目中认为是慷慨的新拓居区，但是以前20年在边界上进行的土地交易的方式很难说是一个好兆头。政府努力想为南部的土地转让定出规则但是失败了，它未能制止往往是通过诈骗和恐吓而建立新的大庄园。为保护阿劳卡尼亚人的利益对付掠夺成性的(大小)地主而采取的措施也不能不说是不够的。

在19世纪70年代的智利，最生动的对照是在城乡之间。文明——这个词非常经常地用来证明“平定”阿劳卡尼亚是正确的——也许在城市环境里表现得最明显。19世纪智利的城市化（根据20世纪的标准来说它的确是初步的）基本上是一部双城记，这两个城市就是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圣地亚哥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约7万人增加到1875年的13万人；而瓦尔帕莱索到我们说的这个时期结束时则达到将近10万人。其他智利城市远远落在后边。的确，在采矿业繁荣时期，科皮亚波曾享受过繁荣的全盛时期；康塞普西翁曾在1835年遭到地震的破坏，由于小麦种植业和面粉业的发展，它又繁荣起来了；而在中央河谷的无精打采的小城市中，塔尔卡培育出一种发扬得很好的公民自豪感。但是在1875 607

年，这些地方没有一处的人口超过 2 万人。受到政治和商业霸权支持的首都和主要港口的突出地位是无可争议的。正如那个时代的绘画和印刷品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圣地亚哥在到1850年左右还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面貌，但是这个世纪中叶的出口繁荣迅速留下了它的印记。到1857年，通常是冷静的安德烈斯·贝略能够这样写道，“过去5年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巨大的。富丽堂皇的大楼到处拔地而起……在一年的某些日子里看着林荫道会使人想像他是身在欧洲的某一个伟大的城市之中。”① 事实上，在1857年漂亮的市剧院落成了，街上有了马拉的驿车和煤气灯。建筑式样改变了，现在正在建筑的新的贵族府邸喜欢采用法国的（甚至英国的）式样。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他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初期传奇般的监督官——使首都有了大街、公园、广场和圣卢西亚山这样奇伟的城市建筑（它到今天还使圣地亚哥人感到高兴)。瓦尔帕莱索是智利第一个组织正规消防队的城市(1851年)，它也有了类似的、尽管不那么大事宣扬的改善。它的商业区有一种淡淡的英国气氛。首都和港口两地(以后还有其他城市)不久有了值得尊敬的报纸，1861年后它在比较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以特别的活力发达起来。1827年在瓦尔帕莱索创办的智利资格最老的报纸《信使报》(1829年起成为日报)是今天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最老的报纸。

这个时期的教育的进步比许多智利人原来希望的要慢，尽管像蒙特这样一些总统做了最大的努力，他和他的伟大的阿根廷朋友萨米恩托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执着的兴趣。文盲人数逐渐减少了，1875年减少到77%左右，那时 17% 的学龄人口正接受某种形式的小学教育。到1879年，也大约有27所公立中学(2所是女子中学）和大量的提供中等教育的私立学校；还有一所有威望的国立学院，在这些地方，有那么多的共和国领导人接受他们的中等教

608

① 多明戈·阿穆纳特吉·索拉尔著《智利的民主》(圣地亚哥，1946)，第132页。

育（并且用许多年的时间在那里接受他们的大部分高等教育）。高级研究工作（特别是职业训练，根据1877年的法令，妇女可以接受职业训练）由于1843年成立了智利大学而大大地得到促进。这所大学仿效法国研究院的模式，它在最初几年中是一个审议和监督机构而不是一个教学机构，但是它的标准很高。这时变得显著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明显加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杰出的委内瑞拉学者安德烈斯·贝略，他漫长的一生的最后36年是在智利度过的。贝略是诗人、语法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不知疲倦的公仆和参议员，他具有一种坚韧的和多方面的天才，这种天才鼓舞了一大批专心致志的学生和弟子。要在这一章的篇幅里概述这个时期的文化全貌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方面使得提及。这就是把历史摆在首位，大学和政府本身（小规模地）鼓励这种首位。结果是在1850年至1900年左右叙述历史的作品繁荣起来，这首先体现在迭戈·巴罗斯·阿拉纳、米格尔·路易斯·阿穆纳特吉、拉蒙·索托马约尔·巴尔德斯和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的著作中。这4个人当中，巴罗斯·阿拉纳最勤奋和有学问，比库尼亚·麦肯纳的作品最抒情和生动。现在读这4个人的作品仍然可以获得益处。

情况可能是这样：智利把历史放在优先地位既反映了又加强了国家意识的增长。当然，爱国主义从来是不容易估量的。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种明确的智利精神是否真的已深深渗入农村，这是可以怀疑的。相形之下，城市人民热情地响应1839年庆祝胜利的活动；每年的国庆日——18日虽然往往成为长时间纵情饮酒的借口，但它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公私两方面都建议务必要为以1856年弗莱雷将军作为开始的独立英雄和其他全国性人物建立雕像。（波塔莱斯和奥希金斯的纪念像分别在1860年和1872年建立）。受过教育的智利人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比西班牙美洲其他国家优越——而且人们很难 609 拒绝这种结论：即从某些重要的方面来说，他们是正确的。正在

兴起的保守派政治家卡洛斯·沃克·马丁内斯写道，“我们从普遍的船只失事中拯救了自己”。① 智利作为共和国楷范，作为难驾驭的“热带”国家的范例，是在演说和社论中一再出现的题目。安东尼奥·巴拉斯在1864年说，“我非常不了解那些姊妹共和国，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同它们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② 这种意见往往是同外国对智利的看法一致的，尤其是在欧洲。（1880年4月，甚至《泰晤士报》也使用了“模范共和国”一词）。欧洲的奉承话使受过教育的智利人深深地感到高兴，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尤其是法国正在率领世界走上一条进步的大道，而在适当时候智利本身肯定也将走这条道路：“欧洲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③

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各种危机使这种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情绪发生严重动摇。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从卡拉科莱斯的白银繁荣所引起的投机热在1873年垮台的时候开始的。此后增长起来的经济困难一部分是来自那一年（也就是在长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繁荣之后的“大肖条”的开始）开始的严重的国际性衰退，但是这些困难也反映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由于世界经济中在小麦和铜两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和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智利现在正从它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被排挤出去。繁荣的源泉正在干竭。铜的价格由于普法战争而在短期内得到提高（正如它早先曾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提高一样），现在已急剧下跌。白银的出口额4年之内降低了一半，尽管人们往往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之于德国和其他国家转而采用金本位，但是这种原因可能是被历史学家夸大了。此外，中央河谷惊人的和不适时地连续发生水灾和旱灾造成了连

① C.W.马丁内斯著《波塔莱斯》（巴黎，1879），第452页。

② 安东尼奥·巴拉斯著《书信》5卷本（圣地亚哥，1918—1929），第V卷，第48页。

③ 社论，《信使报》，1844年9月18日。

续三年的灾难性歉收。生活费用急剧上涨使成千上万更加贫穷的智利人陷入一贫如洗和接近饥饿的状态。出现了社会骚乱的令人不安的迹象。那么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的比索开始贬值，从1872年的46便士降至1879年的33便士。（记录下这一点是有点意思的：在这种绝望的气氛中，一个法裔美国骗子在短时期内提高了官方的希望，他自称能把铜变成黄金；他被捧为名流并且有一种女式紧身短上衣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平托政府担心现在大部分已经资不抵债的银行会发生灾难性的挤兑，于是采取了果断步骤宣布不兑换钞票（1878年7月），因此钞票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历时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的开始。为了努力解决尖锐的财政困境（由于需要支付过去几年以危险的速度增长的国债的本息，这种困境更加尖锐了），政府首先采取削减公共开支的措施；例如国民警卫队被减少到仅有7,000人。由于衰退深入发展，许多聪明的智利人注意到他们的国家严重依赖出口，主张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部门采取一种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1878年的关税改革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点）并且还主张对富人征收新税。据英国总领事说，后面这种想法"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其钱包将主要受到影响的、以及由于他们国家的不幸现在大部分刚刚当上议员的那些人除外。"① 事实上，国会经过许多争论之后，在1878—1879年的期间意对遗产和财产征收小额的税。这些税收对解决危机没有多大影响，智利不是靠在财政上临时凑合的东西而是靠铁血政策被拯救出危机的。

610

19世纪70年代威胁性的国际紧张局势起源于智利和阿根廷、玻利维亚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在殖民地时代，和这两个国家的边界都没有确切地划定过。1843年以后智利在麦哲伦海峡的存在提出了巴塔哥尼亚的归属问题，阿根廷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① 帕肯汉姆总领事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的信，圣地亚哥，1879年2月24日。伦敦档案局：外交部，16/203。

在1878年的费耶罗-萨拉特阿协定中，智利除了要求得到这一面积很大然而很荒凉的土地的一小块之外，实际上已放弃了它对整片土地的要求。国会接受了这一协定，尽管国会大厦外边的群众表示愤怒而且怒气冲冲的前外长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演说，他对智利现在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共和国"而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表示痛心。这一协定避免了同阿根廷发生战争的危险；安第斯山脉的两边都曾有过相当大程度的剑拔弩张的情况。同玻利维亚的问题比较难办，因为在巴塔哥尼亚不牵涉什么切身利益，而在阿塔卡马沙漠就断然不是这样了。阿塔卡马沙漠是智利实行经济扩张主义的主要场所之一。这里，在19世纪60年代，在玻利维亚沿海地区，智利企业家何塞·桑托斯·奥萨和弗朗西斯科·普埃尔马率先开采硝石，国外正越来越需要它当肥料。(智利资本 611 在更往北的秘鲁沙漠的硝石企业中也是突出的；但是秘鲁政府在1875年把那里的这个行业国有化了)。在阿塔卡马，由于玻利维亚给予的慷慨的特许权，强有力的安托法加斯塔硝石与铁路公司(这是一家智利—英国公司，主要的智利政治家拥有它的股票）接近于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智利人。这样一种情况总是具有潜在的爆炸性的。1874年，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问题，智利同意把边界固定在南纬24°，交换条件是玻利维亚答应在25年内暂停对智利硝石企业进一步征税。1878年玻利维亚突然征收每公担10分钱的出口附加税，这显然是不守信义。（首先玻利维亚给予特许权是否轻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硝石公司拒绝付款，玻利维亚就威胁要没收它。为了先下手，一支小规模的智利军队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1879年2月)，并且进而控制了沿海地区。冲突很快便更加严重了。秘鲁根据6年前同玻利维亚缔结的秘密同盟条约被卷了进来。智利在1879年4月对这两个国家宣战。

当时人们(一些人)把太平洋战争看作是经过奸险的预谋而进行的掠夺演习，其目的是通过攫取北部沙漠的矿物财富来解救智

利的经济困境。其他一些人则看到了和硝石企业如此密切地搅在一起的若干更强有力的国家和外国贸易公司的无形之手。美国国务卿、令人吃惊的詹姆斯·G·布莱恩后来甚至说，它是“一场英国对秘鲁的战争，以智利作为工具”，这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很难站得住脚的判断。① 然而，必须说，智利政治家知道从控制沙漠而可能获得的好处并且也同样知道这个国家在1879年的悲惨的经济地位。（特别是那些在硝石企业中拥有或曾经拥有股份的人知道这一点。）就几个月前公众曾有“打仗的意愿”而言，这主要是针对阿根廷的。尽管如此，这一点很可能是真的，即人们（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普遍来说）热诚地欢迎战争爆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发泄在衰退的年月里所积累的被压抑的沮丧情绪。（智利在1879年2月的行动可以似乎有道理地说成是仓卒行事）。但是，不论是智利还是它的敌人都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他们的军队人数很少而且装备不良。智利在衰退期间已削减了它的军事力量，而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明显地是军官太多。在海上，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没有海军）也许比较势均力敌；而控制海洋是战争的关键。最后，智利的比较大的国家凝聚力和稳定的政府的传统大概具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在这个具有生死存亡危险的时期的各种时刻，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都遭到严重的政治动乱的危害。相形之下，在智利，国会和总统选举照常举行，内阁在没有发生过份的戏剧性事件的情况下进行了更换，而且精力充沛的政治活动也绝没有停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比库尼亚·麦肯纳（他曾于1876年企图担任总统但未成功）领导的心怀不满的自由派集团都没有被吸收到内阁中来，而他们通过无情地斥责政府在指挥战争方面的许多犹豫不决的和失败的事件作为未能参加内阁的补偿。 612

① 关于这些论点，请见V.G.基尔南著《太平洋战争中的外国利益集团》，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第35期（1955），第1—36页，以及约翰·梅奥著《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公司与太平洋战争》，载《历史》，（圣地亚哥）第14期（1979），第71—102页。

最初几个月是进行争夺制海权的斗争，对智利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时期，但是它也提供了战争中唯一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事件。1879年5月21日，在伊基克附近海面，老朽的、木制的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埃斯梅拉尔达号”遭到秘鲁的装甲舰“华斯卡尔号”的进攻。尽管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被超过一个档次并且从一开始命运就已注定，但是智利指挥官阿图罗·普拉特上校拒绝降旗投降。当“华斯卡尔号”撞击他的船时，他本人在一次完全无望的攻击敌船的行动中阵亡了。他的船在遭到进一步撞击后下沉了。普拉特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成了他的同胞钦佩的无与伦比的“世俗圣人”。5个月后，在安加莫斯角附近海面，智利舰队围住“华斯卡尔号”并且迫使它投降。这一胜利使智利获得了制海权，并且使它能够在陆地上发动攻势。在安加莫斯战役之后不久，一支远征军侵入秘鲁沙漠中的塔拉帕卡省，迫使敌人退到北面的塔克纳和阿里卡。1880年初，一支12,000人的军队在曼努埃尔·巴克达诺将军指挥下发动了一次沙漠战役（这次战役以1880年5月—6月凶猛的坎波德拉阿连萨之战和阿里卡山之战为最高潮），把这些省也征服了。这个时候，欧洲列强中曾讨论过进行 613 干涉以便使冲突停下来，但是这个建议被俾斯麦有效地破坏了。然而，美国在1880年10月在阿里卡附近海面的一艘巡航舰上成功地安排了交战国之间的会谈。会谈破裂了。智利政府现在已控制了全部主要的生产硝石的地区，本来几乎肯定会愿意讲和，但是公共舆论要求使秘鲁遭到屈辱，大声疾呼“向利马挺进！”1880年末，一支2.6万多人的军队再次在巴克达诺率领下在秘鲁中部沿海登陆。1881年1月经过极其残酷的乔里约斯之战和米拉弗洛雷斯之战打开了利马的大门。战争又在秘鲁内地继续了两年，游击队对占领军进行了抵抗，但是一切都掩盖不了智利已取得全部胜利这一事实。一个新的秘鲁政府终于根据1883年10月签订的安孔条约接受了胜利者提出的大部分严厉的和平条件。塔拉帕卡被永久割让了，允许智利暂时占有塔克纳和阿里卡——对这两个地方

进行了长时期的外交争吵，这一争吵直到1929年才最后解决。最后一批智利士兵于1884年8月离开秘鲁。1884年4月同玻利维亚的休战，允许智利保持对阿塔卡马的控制直到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和平解决办法为止，而全面和平解决只是到1904年才实现。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使智利获得很高的国际威望。对智利人自己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情不自禁的傲慢情绪，这种傲慢情绪是不能完全抗拒的。前10年的危机非常严重地破坏了的乐观情绪很快又恢复了，因为人们发现——正如比库尼亚·麦肯纳很有特色地说的："在士兵穿的本国纺织的粗布紧身短上衣或粗糙的披巾里面所包藏的智利人的灵魂中，古代崇高的英雄主义在跳跃"。[1]似乎每一个智利人都是一名士兵。由于征服了玻利维亚沿海地区和秘鲁南部一些省份，智利把它的国家领土扩大了1/3。占有硝石的产地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大大增加了——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智利繁荣的来源显然已枯竭的情况下，这种增加来得正是时候。由于硝石取代了铜和白银，在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实现的物质进步和19世纪80年代的繁荣相比，很快就开始显得不大了。国家突然获得的这笔横财需要仔细地估价和审慎地处理。对拉丁美洲模范共和国智利来说，和平的胜利也许比战争的胜利更不那么有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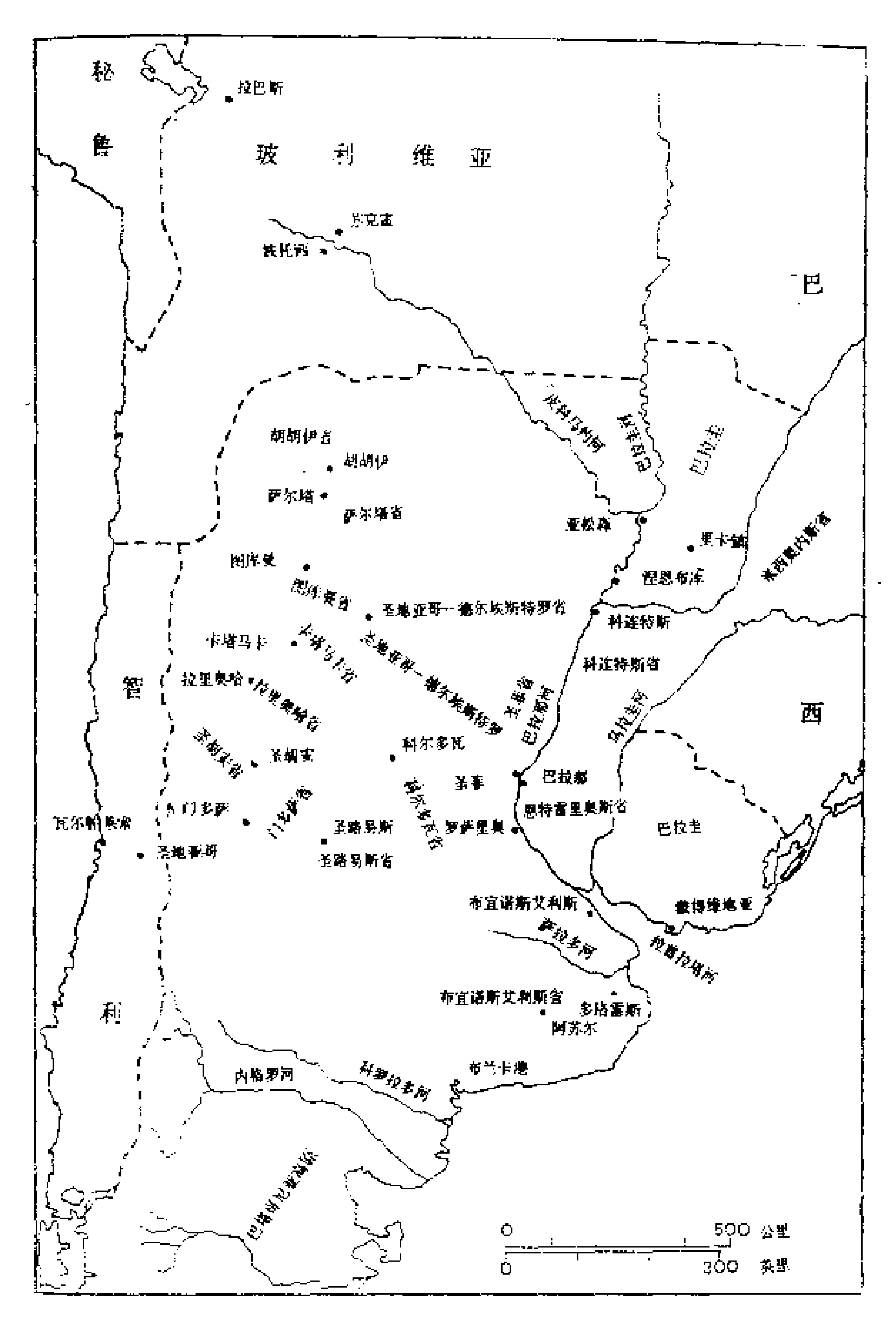
① 欧亨尼奥·奥雷戈·比库尼亚著《比库尼亚·马肯纳，生活与工作》第3版（圣地亚哥，1951），第376页。

第 15 章

自独立到巴拉圭战争时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各共和国

615　阿根廷在19世纪第二个10年中取得独立，当时，在人们认为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资金方面，它没有什么东西。它有矿物但是没有矿井，有土地但是劳动力很少，有商业但是商品很少。布里诺斯艾利斯的经济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生产者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货物集散地而从它过去的殖民地地位中兴起的。布里诺斯艾利斯的商人谋取利润的办法不是靠出口这个国家的产品而是靠进口消费品来供应从大西洋延伸到安第斯山脉的市场，以换取波托西所生产或赚到的贵重金属。布里诺斯艾利斯市的农村腹地几乎是不发达的。在独立时，畜牧业产品只占布诺斯艾利斯全部出口的20％；其余的80％是白银。直到1815—1820年前后，土地开发继续是次要活动，养牛的庄园数目很少，规模也不大。至于农业，则仅限于城镇郊区的少数农场，生产的东西只勉强够供应城市市场。

独立使这种原始经济发生变化。首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被外国人排挤出去了。英国人以其优越的资源、他们的资本、航运和在欧洲的关系接替了以前由西班牙人在企业方面所担负的任务。当地商人无法和外来者竞争，就在土地和养牛方面寻求出路。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到那时为止一直是比较富裕的养牛地区的一个穷邻居——就从它的对手的不幸中赚到了钱。在1813年以后的一些年中，圣菲省、恩特雷里奥斯省和科连特斯省



1820—1870 年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各国

遭到为脱离阿根廷而进行的战争的破坏，同时另一个富饶的畜牧地区东班达又遭到革命、反革命和1816年葡萄牙入侵的毁坏。布宜诺斯艾利斯利用了这个机会，而那些有资本的人在经营养牛的牧场方面得到很好的报酬。牧场开始在牺牲耕地的情况下扩大了，这个省增加了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不久它就变得依赖进口粮食。最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内地的贸易缩小了。这种贸易过去一直依靠内地从出售它的矿业经济产品来赚取白银的能力。但是当战争和脱离阿根廷的运动正在消除已经在智利和上秘鲁建立起来的市场的时刻，英国进口品的竞争使内地的农村工业和手工业行业衰落了。

616

英国的竞争、战争的破坏和内地的衰落加在一起，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的经济无力支撑统治集团了。因此，他们开始使他们的利益多样化，获取庄园，建立农村基地。土地是丰富的，土壤是肥沃和深厚的，在大草原上通常有充足的地面水的供应。最大的危险在边界，边界是令人不安地近在眼前。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萨拉多河的南边和西边，他们是平原上所有印第安人中最凶猛的。他们是无可救药的野蛮，他们生活和战斗在马背上，是机动和流窜的敌人，在使用长矛和石弹方面有高超的本领，可以迅速袭击拓居区、庄园、人员和财产。1815年以来的扩大庄园的作法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个灾难。拓居者开始占领他们在萨拉多河以南的猎场，于是他们就增加他们的袭击次数和扩大他们的掠夺来报复。经常参加他们行列的有流浪的高乔人①、军队逃兵、逃避治安官的罪犯、逃避社会或政治冲突的难民；而在当时的内战中有时这一方或那一方还谋求同他们结成联盟。新的庄园主希望大草原上有法律和秩序，希望边界太平。他们也谋求地位的稳固。

从1822年起，马丁·罗德里格斯省政府实行现代化的部长贝

① 指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牧牛人。——译者

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采用了出租国有土地制度。他授权个人和社团可以在20年内以固定的、极低的租金租用公共土地（出售公共土地是被禁止的）；申请者只要丈量和要求得到一个选好的地区就可以了。这样做既将土地置于生产性用途（特别是在日益扩大的南部边界上的大片保留地），同时又满足了繁荣的家族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这一制度对大庄园和土地集中有利。地主可以租用的地区是有限制的；然后他可以任意出卖他的权利和把土地转租出去；决定土地价值和管理分配工作的委员会是由庄园主控制的。从1874年至1827年，进行了一些大量赠予土地的工作，有些个人每人得到10平方里格以上（64,710英亩）的土地。到1828年，几乎有1,000平方里格（650万英亩）的土地赠给了112个个人和公司，其中有10个个人和公司每个得到13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有2,1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被转让给500个个人，其中许多人是城市社会新来的阔人，像安乔雷纳家族、圣科洛马家族、阿尔萨加家族和萨恩斯·巴连特家族，他们是阿根廷土地寡头的鼻祖。

617

当畜牧经济进入发展时期时，它的扩大是粗放式而不是集约式的，因为人们大量拥有的是土地而不是资本，并且一直没有技术革新，也没有试图改进牲畜品种或使生产现代化。牛的数目和庄园大小就是一切。但是，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那就是由于放牧的土地受到压力和缺乏可以进一步租用的国有土地，对畜牧业来说，要进行有利可图的扩大已达到极限。牧场主再一次往南推进到印第安人领土，以寻求廉价的空地。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占领新的领土并且保护它。虽然里瓦达维亚曾经积极地分配土地，但他对农村秩序或边界安全没有做什么事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他是南部边界的开拓者、大量庄园的所有者、无数雇工的主人、能够和印第安人谈判和使政治家感到害怕的一位民兵司令，从1829年起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长——主张采取一种扩大和拓居的政策，并且采取了若干积极步骤来改善在拥有土地

方面的安全状况。他组织并且领导了1833年到科罗拉多河和内格罗河的沙漠远征，其目的是遏制印第安人的侵略，扩大边界和强加一种持久的和平。他的政策既包括外交手段也包括使用武力，既有奖也有罚。他的政策成功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增加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些土地不是沙漠而是用大河的水灌溉的土地。马上就使人们得到报酬。省政府在1833年以外的几年里把大片新土地转让到私人手里，特别是转让给远征军本身的高级军官。而随着拓居者向南推进，他们再一次浸蚀了印第安人的猎场。但是这时，在19世纪40年代，印第安人怀着更多的敬意看待他们，一部分是由于罗萨斯的军事声誉，也有一部分是由于通过发放津贴进行安插的政策。

罗萨斯还对土地拥有方面的法律结构作了一些重要的和持久性的改变。有三种获得土地的办法——租用、购买和赠与。出租国有土地的制度现在已经老得没有用了。它曾使土地开发（和土地集中）得到便利，但是国家几乎根本无利可图，因为租金是微不足道的。罗萨斯因此决定干脆出售公共土地，并且在他需要钱时可以得到一笔特别收入。1836—1838年的土地出售法把大片土地投放到公开市场。大部分土地显然落到富人、有力人物、受宠信的人手中；而大买主的名字几乎就是在出租国有土地制度下的大承租人的名字：安乔雷纳、迪亚斯·贝莱斯、阿尔萨加和阿拉纳。到1840年，这个省的3,436平方里格(2,061.6万英亩)土地为293人所拥有。然而并没有发生抢购土地的情况，许多可能的购买者或是由于经济衰退(像在1838—1840年法国封锁期间那样)或是由于政治不稳定而不愿购买。因此，作为出售土地的代替办法，罗萨斯把土地赠送出去。他把土地慷慨地赠送给支持政权的人、为政权打过仗或粉碎过叛乱分子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宠信人物。土地几乎变成了一种货币，有时变成一种工资和养老金的基金。它是庇护制的根本来源，当它被没收时，就是一种可怕的惩罚。

618

到19世纪4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平原分成了许多大量养

牛的庄园，饲养着大约300万头牛，这是这个省的主要财富和出口经济的源泉。它们是品种低劣的牧畜，在空旷的放牧区由少数牧人饲养；但是它们可以提供皮革和腌肉，这是市场需要的东西。

庄园必须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以外的地方出售它的产品，但是这个省的基础设施甚至比它所服务的庄园更原始。这是一个没有公路或桥梁的国家，只是在几条主要线路上有道可通。几乎一切事情都是从马背上来做和供应的，马像牛一样，是庄园的一种重要产品。马把高乔人运过平原，把军队送去打仗。渔民骑着马在河里钓鱼；乞丐甚至骑着马要饭。但是主要的送货办法是牛车，它们是图库曼作坊制造的，由战争中得到锻炼的车夫驾驶，他们主要沿着穿越阿根廷的两条大道进行活动，一条大道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圣路易斯和门多萨到智利；另一条大道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科尔多瓦、圣地亚哥、图库曼、萨尔塔和胡胡伊到玻利维亚。他们大约有14辆大车排成长队前进，每辆车由6条牛拉车，还有3条牛备用，穿过大草原和小山慢慢前进，旅途长达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运费很贵，每吨货物要20英镑（包括省的捐税），而光是运输就占最初成本的40％甚至50％。运牛比运货容易得多，它们可以由熟练的牧民从牧场迅速地驱赶到港口。 620

庄园的主要出路是大屠宰场。这些屠宰场是大的设施，在那里宰牛，提炼牛脂，腌肉并把它晒干以及制作皮革，以便出口。它们是在18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张的，1817年由于据称是城市肉类缺乏的原因而关门了，但是从1819年起又开始营业并且在靠近这个城市的南部地区发展起来。到19世纪20年代中叶大约有20个大屠宰场；它们这时屠宰的牲口比城里屠宰场屠宰的要多，它们把皮革出口到欧洲，把牛肉干出口到巴西和古巴。大屠宰场代表了畜牧经济唯一的技术进步。到19世纪40年代，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围的屠宰场的数目仍然只有20个，但是它们的产量大大增加、每个屠宰场在旺季每天要屠宰大约200头到400头牲口。大屠宰场在工厂、蒸汽设备和其他装备方面构成相当大的

投资；大部分屠宰场属于协会而不属于个人，许多外国人在这个行业中拥有资本。它们是庄园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专业人员管理、由牧场主供应并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的牛肉干从1835年的113,404公担增加到1841年的198,046公担，1851年增加到431,873公担。

国家在使小农场主付出牺牲的情况下支持养牛人，而国家最后依靠进口粮食。在一个缺乏资本、技术低劣和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下述做法是现实的，即集中力量发展畜牧业，把国家的自然资产变成钱和促进国家的最有成效的出口，即使这意味着把资源从有价值的然而不是那么盈利的企业方面转移过来。里瓦达维亚的经济政策是对移民给予补助，并且依靠肥沃的土地和市场力量。但是，和具有其自己内部动力的庄园的大规模扩大相比，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垦殖化计划由于缺乏资本 组织和安全而失败了。无论如何，农业要受一些特殊的障碍的影响，并且需要特殊的对待。劳动力不足而且昂贵，耕作方法原始，产量很低。高昂的运输成本迫使农民迁移到土地价格提高的、更靠近城市的地方；而且一直存在着外国粮食的竞争。因此，农业需要资本和保护：在这一点上历届政府都犹疑不决，担心这将使食物的价格提高和丧失人民的支持。从独立到1825年，尽管农民抱怨，但是一直盛行着对消费者和出口利益集团有利的低关税政策。而农民并不是唯一批评自由贸易的人。

沿海各省和内地各省在许多方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同。首先，它们不那么繁荣。独立战争和随后发生的内战破坏了沿海各省——圣菲省、恩特雷里奥斯省和科连特斯省——的经济并且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当它们终于开始恢复时，它们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属于支配地位，决心垄断贸易和航运（以及从这方面得到的关税收入），并且推行一种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各省之间关于联邦公约的谈判是以对经济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为标志的。在1830年期间，科连特斯省代表和沿海地区保护主义运动领袖、佩德罗·

费雷不仅要求关税收入国有化和内河自由航行，而且还要求修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税政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何塞·玛丽亚·罗哈斯一帕特龙在回答时争论说，实行保护将伤害消费者而并不会真正帮助生产者；如果国内工业既无竞争力又不能供应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多少保护也拯救不了它们。牧场经济依靠廉价的土地、低息贷款和外国市场对皮革的经常性需求。实行保护将使价格提高、成本提高和损害出口贸易；然后人民群众将为了畜牧经济以外的少数人而受罪。费雷驳斥了这些论点，谴责了自由竞争，要求保护本国工业抵制比较廉价生产的外国货，并且还要求开放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其他港口以便进行直接的对外贸易，这样将为各省缩短距离和减少运费。只有用这种办法沿海地区和内地才能发展它们的经济，节省现有的投资和减少失业。布宜诺斯艾利斯拒绝让步，而沿海地区公约(1831年)是在不包括科连特斯省的情况下缔结的，虽然它后来还是遵守这个公约。科连特斯省率先要求实行保护并非巧合。除了牧场以外，它还有一个生产棉花、烟草和其他亚热带产品的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扩大需要保护以对付巴拉圭的竞争以及巴西的更大的竞争。但是在罗萨斯第一任政府期间(1829—1832)，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养牛业而制订的。1831年提出的改革——减少对盐和运往这个城市的牛所征收的捐税——只是为了保护屠宰业，因屠宰业自称它正在遭到蒙得维的亚和南里奥格兰德的竞争。1833年减少了出口皮革的关税并且取消了国家船只从南部各省运来的盐的捐税。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农业、沿海地区的产品和内地的工业——这些并没有得到特殊待遇。 622

内地(中西部和西部)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受到独立的直接影响，并且和沿海地区相比，它在内战和破坏中受到的损失也要小些。的确，几年来西北边界是一个战区，它同上秘鲁和智利的市场的传统联系暂时中断了。但是从1817年起，智利经济又开始运转起来，现在它受到比较活跃的海外贸易的刺激。阿根廷

西部重新并入横越安第斯山的市场，它把骡子出口到矿区，把牛运给城市的大屠宰场和消费者，同时还出口安第斯山的其他产品像水果和酒等等。这些出路是很及时的，因为独立后欧洲酒类的竞争实际上已向门多萨人关闭了与海岸市场。萨尔塔的经济仅能维持生存，尽管它仍然把骡子养肥了出口到省外。图库曼继续生产大米和烟草，制造食糖、烧酒和鞣制过的皮革。但是这个省是一个高成本的生产地区，并且离市场太远而无法和——比如说——巴西的食糖竞争。安第斯山脉的矿藏也是处于经济之外的。拉里奥哈的黄金、白银、铜和铁，圣胡安的黄金、白银和铅、门多萨的黄金——所有这些都是潜在的资产。里瓦达维亚企图通过英国资本开发矿藏的梦想从未实现。它们极其遥远、非常缺乏劳动力、技术不足和几乎完全没有通往海岸的运输条件，这些使得阿根廷的矿藏成本太高和产量太低而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因此，“内地工业”只不过是纺织品、酒类和粮食等行业，布宜诺斯艾利斯认为这些行业没有一个是值得保护的。

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存在着一种保护主义兴趣，它有时在议会里表达出来，有时在公共辩论中表现出来，它要求采取措施捍卫国家的工业和农业。这些意见分别反映了某些制造业企业的焦虑、对外国人的一种潜在的然而是强有力的不满以及一种基层的联邦主义；但是它们的确代表了各种各样的少数人和利益集团而不是代表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很难说它们是经济民族主义。布

623 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由纺织品制造者、银匠、马具制造者和铁匠组成的、人数很少的工业阶层。他们供应当地和下层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有时供应国家需要的东西；的确，战争使他们当中许多人有事可做，因为战争带来了关于制服、装备和金属器具的订单。183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94家皮革作坊，83家木匠作坊，47家铁工场和42家银匠店。这些主要是手工业行业，但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工厂制度开始了，有些制造者在一个地方雇用若干名工人，专门从事一种行业并且使用机器；这种情况适用于纺织、

制帽业、制作家具和其他几个行业。这些企业很少能在价格和质量上同外国进口品竞争，并且它们经常要求国家为它们的利益进行干涉。例如，1836年1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制鞋人向政府请愿，要求禁止进口外国鞋，其理由是他们无法同外国制造商竞争，这些外国制造商生产成本低，原料价格便宜，有丰富的劳动力和现代化的机器，从而使他们占有压倒优势。另一方面，包括罗萨斯和安乔雷纳家族在内的庄园主根据经济利益的理由和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畜牧业利益而赞成自由贸易，不赞成实行保护。他们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在原则上反对国家干与，并且争辩说，工业只有在够条件繁荣时才能繁荣，而在价格和质量上无法同外国进口货竞争的国家产品是不值得保护的。罗萨斯政权比较开明的发言人之一、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佩德罗·德·安赫列斯强烈抨击对各省的酿酒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制鞋业给予保护的主张，其理由是实行保护将会对广大消费者提高价格并且把本可在农业领域更好地雇用的劳动者转移到工业中来。

尽管如此，对国际收支逆差的关切足以使保护主义的游说者保持活跃，而在适当时候罗萨斯注意到要求干涉的理由。在1835年12月的关税法中，他提高了进口税，关税从17%的基本进口税向上移动，从而对比较容易受损害的产品给予更大的保护，直到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禁止大量进口像纺织品、金属器具和小麦（它要视国内价格而定）这样一些物品。罗萨斯谋求用这种办法来积极帮助从事耕种的农业和制造业。

为什么他这样做呢？难道他真的认为阿根廷能够变得在工业上比较自给自足吗？他相信他的政权能够减少对外国进口品的依赖、抵制外国竞争并且容忍生活费用上涨吗？还是他是在政治压力下由于需要扩大他的政权的社会基础而这样做的呢？看来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在1835—1836年罗萨斯需要平民集团或中间集团的支持。政权巩固地建立在庄园主的基础之上，他们仍然是这个省居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和政府的最密切的同盟者。罗萨斯的日

624

的似乎是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同时保护那些在这个结构中受害最大的少数人集团。因此，1835年关税法的制定是为了缓解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困难而又不使畜牧业的出口经济遭到破坏。同时这个法律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省际内容；它打算通过向各省以及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提供保护的办法使人们信赖联邦主义的政策。

结果，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各省的国家工业未能对关税法所给予的保护和法国的封锁作出响应。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当当地制造商能够利用由于货物稀少而使价格上涨的条件时，他们也证明无法满足全国的需要。如果现有的工业不能扩大，就没有什么刺激力量来冒险把为数不多的资本投入新企业。政府经不起继续把不适当的负担加在消费者身上，因而罗萨斯开始重新考虑保护问题。1835年，进口税减少了 1/3 以便把法国的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见下文)。然后，罗萨斯说需要得到新的收入并且指出某些物品出现短缺情况，因此在1841年12月31日便决定允许以前禁止进口的大批货物进口。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国家的生产没有能够利用保护而得到好处，关税法只是造成了短缺和涨价，而主要受害者是消费者和财政部。罗萨斯本人看来在保护方面丧失了信誉：实行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对经济最薄弱的部门实行人工呼吸，同时扼杀了较强的部门。没有什么人会为此而感谢他。因此，工业仍然处于局限在由作坊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经济生活的边缘。当英国人查尔斯·曼斯菲尔德1852—1853年访问拉普拉塔河地区时，他像是一个宣传英国货的活广告：他在科连特斯买的白棉布披巾是曼彻斯特制造的；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电镀马刺是伯明翰制造的。这种对于一个农牧业 625 经济的偏爱既反映了经济情况也反映了社会结构。上层集团喜爱进口的制成品，而居民中的其余部分并没有为国家工业形成消费者市场。在罗萨斯统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多少自由，但是自由贸易却是其中之一。

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对外贸易生活，而它的日益扩大的庄园则

依靠外国市场。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有相当大的贸易差额，因为贵重金属的出口减少了而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因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花了20年时间才恢复了贸易的平衡。在1829年和1832年，进口仍然大大超过出口，而差额必须用出口硬币来弥补。结果是国内缺乏货币，要靠空前大量地发行纸币来代替它。国际贸易的媒介是向伦敦交易所开出的信用证，结果是英国商人控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市场。基本联系是英国纺织品换取阿根廷皮革的贸易，这种贸易经历了稳步的、虽说是不惊人的增长，只是在1838—1839年和1845—1846年遭到封锁的年月除外，当时这种贸易急剧下跌。从1822年至183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值从大约70万英镑增加到100万英镑；从1837年到1851年出口值翻了一番，每年达200万英镑。这些出口货大部分是皮革。在19世纪3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年平均出口798,564张牛皮；到19世纪40年代达到2,303,910张。在1836年，皮革占布宜诺斯艾利斯全部出口值的68.4%；在1851年占64.9%。如果把牛肉干和其他畜产品和皮革加在一起，那么畜牧业在1836年占全部出口的82.8%，在1851年占78%。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把更多的土地并入了经济，特别是在1833年沙漠战役之后扩大了南部边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现在生产沿海各省出口的全部皮革的2/3左右。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外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封锁，这种封锁通过暂时停止运送皮革而增加了牛的存栏量，使牛在大草原上成倍增加。

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进口从1825年的总额150万英镑增加到1850年的210万英镑，由于欧洲制成品价格下跌，这种增加可能在数量上比在价值上更多。储蓄或资本积累很少。进口奢侈品和消费品用光了任何剩余的资本，不然的话这种资本本来是可以用于投资的。钢琴、钟、珠宝和宝石占进口品的10%。供应重质量的市场的奢侈类消费品——家俱和金属器具、服装和鞋类——占32%。这样，几乎一半的进口品是供应市场上高档的制成品。像煤、铁和其他金属等工业原料只占进口的3%，这说明工业化 626

程度小，缺少技术，和手工业者的就业处于低的水平。

阿根廷已经在同英国发展密切的经济联系了。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托运人运送的货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出口贸易中占60％；到这个世纪中叶，由于竞争增加，英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运量只占总额的25％。大部分贸易是同英国（1849—1851年有322艘船，占总吨数的22.8％）和美国（253艘船，占总吨数的21.6％）进行的，而这仍然剩下大量贸易（33％）可以同欠发达的国家——古巴、巴西、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值在19世纪前半期并没有惊人的增长。在1822—1825年期间，每年平均出口值在70万英镑到80万英镑之间。在1850年，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值仍然大约有90万英镑。然而尽管竞争越来越厉害，英国到1837年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贸易还是超过了所有外国贸易的总和；甚至在1850年，离这种情况也不是很远。阿根廷依靠英国的制成品、英国的航运、英国的市场，但是它还并不需要——还不能利用——英国的资本和技术，它作出它自己的经济决定，并且它的独立性从来是无可怀疑的。到这个世纪中叶，它已经在朝着更为平衡的贸易前进，因为英国市场更多地消费它的原料了。

社会结构是简单的，规模很小。阿根廷是一个充满牛群的国土，人口稀少，它的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在1820年容纳的人口大约只有当时伦敦人口的1/3。然而阿根廷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人口稳步增长，从1816年的507,951人增加到1825年的57万人，1857年增加到118万人，1869年增加到1,736,923人。从1825年至1857年的32年中，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在经济情况正在改善的时刻，没有发生重大传染病，而霍乱和黄热病大爆发的情况还没有到来。在这个时期只有少数移民迁进来，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封锁刚结束时，一些巴斯克人、法国人、加那利群岛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进入了布宜诺斯

627

艾利斯。沿海各省人口增加得最多，这些地区的人口从1800年占人口总数的36％增加到1869年的48.8％。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尔多瓦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3以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不卫生和闹瘟疫的城市，没有舒适的环境，没有下水道，甚至没有干净水的供应。但是它的人口数目从1822年的55,416人增加到1869年的177,787人，这座城市和这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在同一时期从118,646人增加到495,107人。

社会的根基在土地。大的庄园给人以地位并且也把从属地位强加于人。庄园主和他们的委托人控制着政府、众议院、当地政府和民兵。社会的两极分化是绝对的。有一个由地主和他们的一伙人组成的上层阶级，还有一个由其余的居民组成的下层阶级。的确，有些社会界限不是那么分明。商业在经济上是重要的，在社会上是受人尊敬的，它为阿根廷的一些主要家族，例如安乔雷纳家族、阿尔萨加家族和圣科洛马家族，提供了最初的财产。但是19世纪初期的城市精英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实体或成为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在面临独立后的一些年中英国持续不断的竞争的情况下，当地商人开始把他们的资本转向土地，并且在不放弃他们在城市的职业的情况下变成了庄园主并且使自己成为一个新贵族阶层。当时没有其他人来填充中间的行列。结果是外国人来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英国商人不久控制了商业活动，而欧洲移民则从事手工业职业，补充当地手工业者的作用。但是虽然在社会上克里奥尔商人向上发展，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而手工业者和从事制造业的人则明白无误地并入了下层阶级，这些下层阶级以他们的手工操作的职业为标志，这些职业往往是由有色人种来干的。

如果说在城里没有希望形成一个本国的中产阶级，那么在农村甚至更不可能找到它。在农村，一个巨大的鸿沟把有土地的业主和无地的雇工分隔开来。拥有土地的阶级也不是绝对一样的。有些庄园主拥有真正庞大的产业，而其他一些人则只拥有比较一般的庄园。前者往往是出身于城市、受过一些教育和向往高级生

活水准的资本家。后者更可能是农村居民的后代，和他们周围的高乔人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识字、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并且不进行什么投资来改善生活。然而，尽管庄园主在收入、文化和处世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和他们庄园上的雇工以及大草原上的高乔人比较起来，他们像一个人一样。在拥有土地的阶级中有一种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团结感。罗萨斯本人就是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庞大的亲属集团的中心。他周围有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网络，把议员、执法官、官员和军人（这些人也是地主，他们彼此之间有关系或者同他们的领袖有关系）联系起来。罗萨斯用他的广泛的庇护力量把这一人数不多的寡头集团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安乔雷纳家族尤其能够凭借他的直接帮助来扩大他们在城乡的财产，从他们所谓对国家的服务中来谋利。

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住在大草原上的是野牛、不屈服的印第安人和不驯服的高乔人。高乔人是由不同的种族混合而成的；人们对他们的合成成份有过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在沿海地区有三个种族：印第安人、白人和黑人。如果简单地下个定义，高乔人就是骑马的自由人。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即指的是一般的乡下人。更精确地说，他们可分为定居的农村居民（他们为自己或为一个保护人耕种土地）和纯粹的高乔人（他们是游牧的和独立的，不从属于任何庄园）。如果把这个词汇再细分一下，那还有坏高乔人，他们是靠暴力和几乎是犯罪来生活，国家认为他们是罪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典型的高乔人不顾一切正常制度来维护他的自由；他对政府及其代理人漠不关心，对宗教和教会也漠不关心。他不谋求得到土地；他靠打猎、赌博和打仗为生。高乔人的游牧生活有许多社会含义。它不使人有固定的工作或职业。财产、勤劳、定居——这些都是异己的概念。高乔人的家庭也是如此。上层部分在家庭方面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从亲属关系中吸取力量。下层部分在体

制上要脆弱得多。这部分地是由于有两种文化之间的城乡区分；它也是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个特色。在高乔人和雇工当中，两性结合是暂时性的，由此而建成的家庭只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结婚是一种例外情况，通常是未婚母亲形成农村家庭的核心，因为双亲中只有她是持久性的。即使作父亲的倾向于过高乔人的游牧生活，他也不得不在他能够出卖劳动力的地方去出卖劳动力，否则 629 他就要被招募到军队或游击队中去。

乡下的统治集团传统上对他们认为是“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强制施行一种高压制度，这些人是没有雇主或职业的流浪者，是懒人，他们成群地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歌、喝马黛茶或酒、赌博、但是显然不劳动。这个阶级被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劳动力，并且受到拥有土地的业主的许多约束——惩罚性的远征、监禁、征募到印第安人边界、肉体的惩罚和其他惩罚。法律谋求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和坏女人”定名为罪犯阶级并且把流浪本身定为犯罪。治安官严格执行反流浪法，制定反流浪法的目的就是要在乡下强行维持秩序和纪律，给种植园主提供备用的劳动力和为军队提供兵源。民兵实际上变成一座公开的监狱，农村居民中最不幸的一部分人被强迫赶到那里去。对高乔人来说，独立后的岁月甚至比以前更严酷。财产集中使人民群众无法获得土地，而庄园的扩大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可以共同利用大草原，这使得高乔人可以在空旷的牧区得到野牛。但是，当建立和赠予了庄园、平原上到处是私人地产、土地所有者把牛占用了的时候，这些传统的作法也就结束了。共和国的法律——里瓦达维亚的法律和罗萨斯的法律——向流浪行为进攻并且把农村居民动员起来。人民被迫携带身份证和就业证明；一个雇工未经许可而在他的庄园之外被抓住将被征入军队或派去建设公共工程。这样，高乔人被迫从一个自由的游牧者变成一个被雇用的牧场工人，即庄园雇工。

这种原始的社会是没有资格建立立宪政府或使人民参与政治

的。庄园控制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变成了政府的模式。庄园主以个人权威统治着他们的地盘，并且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是一个强有力的和有凝聚力的阶级，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和它匹敌。阿根廷还没有一个商业上或工业上的中间阶层，也没有大量集中的农民。平民阶级虽然在数目上占优势，但组成成份不纯，并且分成各种不同的集团——庄园雇工、雇佣劳动者、小农或佃户、边界高乔人和罪犯。下层阶级的从属情况、他们的暗淡的前程和他们在广阔的平原上的隔绝状态——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无法从下边形成一种自发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是进行军事动员的理想材料，并且他们很容易被转变成为平原上的游击队。他们打仗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阶级冲突：原因是由于上层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拥有土地的业主之间或是主要家族之间的争端、对现政府的攻击、或是同邻近省份的冲突。在各派之间处于平衡的情况下，领袖们将号召他们的从属者和更好地汇集他们的人力储备以便使力量对比对他们的敌人不利。然而，动用平民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具有平民的目标。庄园可以把它的雇工动员起来或者去劳动或者去打仗，而一个地区性首领反过来也可以号召依附他的庄园主。此外，寡头集团内部的这些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人口条件下发生的，那就是人口比较少，他们稀疏地分散在平原各地。虽然社会上层的亲属关系很密切，但是平民阶级成员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乡下)是很少的，这部分地是因为农村社区之间距离很远，部分地是因为雇工被束缚在他们的庄园上并且由于庄园的规定使他们无法活动。因此，群众是被命令、被召募、被摆布而不是参加政治活动。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630

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这就是基本环节。地主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需要劳动力、忠诚和服务。雇工需要生存和安全。因此，庄园主就是一个保护者，拥有充份的力量来保卫他的从属，以便对付进行劫持的印第安人、征兵的军官和敌对的游牧部落。他也是一个供应者，他开发和捍卫当地资源并且能够提供就业机

会、食物和住所。一个庄园主通过供应所需要的东西和利用所提供的东西来召募一个雇工。这一原始的政治结构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之上，靠对个人的忠诚树立起来，由庇护者的权威和雇工的依赖性加以巩固，最后建成国家并且成为考迪罗制度的模式。因为各个庇护者依次成为比他更有势力的人的依附者，这种情况一直达到权力的顶峰，他们全都依附于一个超级庇护者，这样，个人的联盟就扩大为一个社会金字塔。因此，一个当地的考迪罗在依附他的庄园主及其从属的支持下，就可以从他的农村基地为他自己、他的家族、他的地区征服这个国家。然后，作为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或一个省的代表，他将再次制造养育他并且使他发迹 631 的那种个人效忠主义和庇护制。考迪罗制度是社会的形象，而考迪罗则是它的产物。

考迪罗首先是一个战士，是一个有资格进行领导和防御的人；在解放战争、内战和民族战争期间，考迪罗是能够招募军队、掌握资源、保护他的人民的强人。考迪罗生来就能把军事力量和个人权威结合在一起。然而，他不仅要对军事需要作出反应，而且也要对人民的压力作出反应，他往往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的代理人，他实际上构成一个统治王朝。他有时是地区经济利益的代表，这种地区经济利益需要一个保卫者来对付其他一些地区或对付中心地区；他有时是一个能够成功地把一项具体利益——例如以出口为方向的庄园——变成一项国家利益的人。在国家资源由他来支配的情况下，考迪罗于是作为这样一个人出现：他对许多人分别施行庇护，把掠夺到的东西分给他的依附者并且又从他们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服务；因为考迪罗这个超级庇护者通过赠予官职和土地来实现他对他的追随者所作的诺言并且使他们处于一种政治雇工的状态。

阿根廷的考迪罗们的起源和生涯符合这种样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来自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是有财有势的家庭，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拥有地产，他们当中许多人担任军职。考迪罗们本人便保

留了这一传统。在1810年至1870年统治阿根廷的各个省的18个考迪罗中，13人是大地主，1人拥有中等规模的土地财产，1人是造船厂老板。他们全都担任军事职务，不是在军队中任职就是在民兵中任职；在12个在独立战争时已到参军年龄的考迪罗中，有9个人打过仗。财产是一个内在的条件。在这批人中，15人是极其富有的，2人有中等财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政治前程并不好；9人暴死，3人流亡。在他们的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动。毫无疑问，争取独立的革命使克里奥尔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进入政界、行政机构和商业；但是建立在土地、财富、威望和教育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仍然基本未变。根据财富的标准，18个考迪罗中只有2个人（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和费利克斯·阿尔道）显示出向上变动的迹象，即从中等富有变为非常富有。其余的人在财富和威望方面都是遵循他们的家族的传统，并且只是增添了他们的遗产。他们所走的职业路线有同样的路标：从庄园主到军人，到考迪罗。

1820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一年。从西班牙取得独立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国家的统一而是造成普遍的四分五裂。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各省之间、中央政府和地区利害集团之间、拥护中央集权者和拥护联邦主义者之间的10年冲突，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政治组织的框架已经垮掉了。各个独立的共和国散布在内地各处，当布宜诺斯艾利斯谋求制服它们时，它们进行了反击。外省的考迪罗们——圣菲省的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率领他们的不正规的游牧民高乔人（可怕的游击队）反对首都。1820年2月1日，他们在塞佩达战役中击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并进而摧毁了代表中央权威的一切东西。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幸存下来，而当人民和财产听任小的考迪罗、高乔人和印第安人摆布时，它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骚扰。布宜诺斯艾利斯向乡下寻求保护。当它的两个领袖马丁·

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多雷戈拚死抵抗这一潮流时，他们要求南部的庄园主率领他们的农村民兵前来援救。他们迅速作出响应——罗萨斯也是如此——他们从当时的渗透性的无政府主义中意识到对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威胁。罗德里格斯就是在庄园主的支持下于1820年9月当选为省长，并且同考迪罗们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

罗德里格斯行政当局背后的鼓午力量是它的首席部长——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的、富于从政经验的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里瓦达维亚希望使阿根廷现代化。他谋求通过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移民来发展经济。他实行出租国有土地的制度，把阿根廷的自然资源投入生产性用途。他有一个关于自由主义体制和一种新的基础结构的设想，在这种设想中，现代化的框架将加以扩大，把一个伟大而统一的，不因各个地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而分裂的阿根廷包括在内。这就是里瓦达维亚的开明的、发展的和中央集权的计划。事实上它更多的是一种梦想而不是一个计划：它的有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其他一些想法则是为时过早的。但是这整个模式遭到罗萨斯和他的同伙的拒绝，认为它是不恰当的，罗萨斯和他的一伙人代表一种比较原始的经济——生产牛以便出口皮革和腌肉——但是这种经济即时带来收益，并且同国家的传统是协调的。他们对新政权的革新感到惊恐。1826年2月7日，里瓦达维亚被任命为拉普拉塔联合省的总统；他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宪法和许许多多想法。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宣布为国家的首都并且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9月12日，里瓦达维亚向国会提出他的建议，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未由联邦政府管辖的部分一分为二：北部的巴拉那省和南部的萨拉多省。这些措施使庄园主利益集团感到伤心。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围由联邦政府管辖，就把这个省最好的部分和它的一大部分居民都砍掉了。它还包括把这个港口的收入国有化（它占省政府收入的75%），这就引起人们的担心，认为下一步将是通过征收所得税或土地税来获得另外的

633

收入。对于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它的腹地、港口和那个省是一个整体，这些措施有造成分裂和灾难的危险。

里瓦达维亚的政策打击了太多的利益集团以至无法取得成功。他的直接的政敌联邦主义者拒绝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认为它不民主，并且他们在美国的联邦制的影响下谋求以联邦制来解决国家的组织问题。庄园主认为里瓦达维亚对他们的经济和财政资产是一个威胁，认为他是这样一个知识份子，即他忽视农村安全并且在促进城市实现一种欧洲式的进步的同时允许野蛮的印第安人在平原上游荡。他们反对外国人移民，认为这是浪费金钱、不必要的和可能是颠覆性的，并且给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竞争和提高了这两者的成本。这个政权的反教士的政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教会的世俗权力、扩大宗教自由并且使阿根廷符合外国的期望，但它不只是成了教士所诅咒的东西而且也成了所有那些具有保守的价值观念的人们所诅咒的东西，并且有助于使联邦主义者、庄园主和神父在“不信教勿宁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罗萨斯和安乔雷纳家族率先组织反对里瓦达维亚计划的力量。在那时以前，罗像斯并不属于联邦党，和该党领导人曼努埃尔·多雷戈也没有联系。但是在1826年下半年，他站在他的朋友、亲属和依附者的关系网的最前面，和那个政党结成联盟，最后他将合并和摧毁那个党。他参加联邦派并不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原因（他并没有政治思想），而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政策威胁了他在乡下建立霸权的计划。

634

里瓦达维亚向反对他的人组成的联合力量屈服了，于1827年6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归根到底，他并没有一批支持者：他代表知识份子、行政官员和职业政治家，这批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认为是共同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罗萨斯有一个具体的权力基础，即庄园主，他们拥有国家的主要资源和相当大的准军事力量。但是罗萨斯并不进行统治。上台执政的是真正的联邦主义者，1827年8月12日曼努埃尔·多雷戈当选为省长。多雷戈的深得人心、他的独立性和他拒绝接受意见使罗萨斯和他的朋友们警觉起

来：以前的经验表明在统治庄园的那些人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执政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发生分裂的危险。结果1828年12月1日多雷戈被推翻了，他不是被他的内部敌人推翻的，而是被来自外部的主张中央集权的人推翻的，当时胡安·拉瓦列将军领导着一个从巴西战争归来的军人、职业政治家、商人和知识份子组成的联盟。12月革命是以拥护自由主义原则、反对农村保护主义、考迪罗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它是为恢复里瓦达维亚的制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但是当拉瓦列下令处死多雷戈——一个和平和温和的人——时，他使他的敌人得到了意外的好处。这一野蛮的判决在各个阶级特别是在平民中引起了反感。这一判决使主张中央集权的人背上了政治杀人犯的罪名，并且加剧了当时的无政府状态。它还为罗萨斯领导联邦党敞开了道路。罗萨斯在他的庄园主同盟者和他的农村游牧部落的支持下，从拉瓦列和中央集权派手里重新取得权力并于1829年12月6日被一个感激不尽的议会选举为省长。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因为新省长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并且有权下令恢复秩序。

建立了罗萨斯的霸权，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他部分地是环境的产物。他代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庄园主——开始掌权。1810年革命的典型精英是商人和官吏。争取独立的斗争产生了一批职业革命家——职业政客、国家官员、一批新军人，这些人靠为国家服务和从国家得到收入来生活。作为主要经济利益集团从殖民地兴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最初是这些新精英的强有力的同盟者。然而，大约从1820年起，许多商人家族开始谋求其他出路并且向土地、牛和腌肉工厂投资。这些人是未来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是扎根于商业和来自城市社会的、拥有土地的寡头集团。然而，当时他们并不拥有国家行政权力，而事情仍然是这样：拥有经济力量的人并不进行统治，而进行统治的那些人又缺乏经济基础。不可避免的是，拥有土地

的人开始谋求直接的政治控制。他们在1827—1829年击败里瓦达维亚和拉瓦列时不仅推翻了中央集权派而且也推翻了现有的统治阶级——职业政客——并且通过罗萨斯掌握了政府。

因此，是环境造就了罗萨斯。他是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个别的综合产物，而当这一阶层的利益与城市的联邦主义者的利益一致时，罗萨斯立即成为这个联盟的代表和执行人。但是他也有一些具体的条件：他的出身、经历和控制事态发展的力量等等甚至在他当选为省长之前就已经使他成为国内的一个有权势的人，并且使庄园主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个人的经历是独特的，并不完全符合由商人变成地主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支持他的许多人的特点)。他从庄园开始，从劳动中学会了经营，在农村领域本身积累了资本并且从那里前进。他在扩大土地占有数量和养牛方面是一个先锋，在1820年开始的向南部大推进的几年之前他就开始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干活的而不是一个在外地主，在养牛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参加工作。这样，他可以直接接触高乔人、罪犯、印第安人和大草原上的其他居民，这部分地是为了雇用他们为他的庄园劳动，部分地是为了动员他们参加他的民兵。由于罗萨斯既是庄园主又是民兵司令，所以他比任何和他具有同样地位的人有更多的军事经验。在招募军队、训练和控制民兵以及不仅在边界而且在城市行动中部署军队方面，谁也比不过他。正是罗萨斯早期生涯中的军事方面使得他比他的对手占有优势。这种情况导致了在1829年游击战期间他所发挥的作用，当时他招募、控制和率领非正规军中的杂乱无章的平民力量击败了拉瓦列的职业军队。因此，罗萨斯是一个自我造就的考迪罗。

罗萨斯把社会分为两类人：指挥者和服从者。他迷恋秩序，而他最钦佩的人民品德是服从。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民主更使罗萨斯憎恶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他之所以憎恨中央集权派，其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根廷，而是因为他们是相信人道主义和进步的世俗价值的自由派。他认为他们和共济

636

会成员和知识份子一样，是破坏秩序和传统的颠覆份子，他认为他们最终应对1828年至1835年使阿根廷公共生活处于残暴状态的政治谋杀一事负责。他对两个政党的立宪学说不感兴趣，并且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像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那样来思考问题和进行统治，并且他主张推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霸权。罗萨斯破坏了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的传统区分，并且使这种分类实际上失去意义。他代之以罗萨斯主义和反罗萨斯主义。

罗萨斯主义是什么呢？它的权力基础是庄园——一个经济资源的焦点和一种社会控制制度。庄园对经济的控制在罗萨斯统治下继续下去并且完成了。在他的政权初期，最后构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印第安人控制的。而且甚至在边界之内，在萨拉多河以北，有大片未被白人占领的地区。罗萨斯主张采取一种拓居和扩大领土的政策。1833年的荒漠远征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增添了内格罗河以南的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还有新的资源、新的安全感以及由于取得对印第安人的巨大胜利而产生的信心。南边的土地和北边未被占领的或国家出租的土地使国家有了它可以出售或赠予的巨大的财产储备。罗萨斯本人是这一大量分配的主要受益者。由于他领导荒漠远征有功，1834年6月6日的法律准许他完全占有乔埃莱—乔埃尔岛；允许他用这个岛交换不论他在何处选中的60平方里格的公共土地。他的追随者也得到奖励。1834年9月30日的法律把总共最多达50平方里格的土地赠给曾经参加荒漠远征的军官；同时1835年4月25日的法律赠予了多达16平方里格的土地，以便把它们分配给参加这一战役的安第斯师的士兵。1839年11月9日对参加粉碎1839年南部叛乱的军人赠予了土地以示奖赏；将军得到6平方里格，校官得到5平方里格，军士得到半里格，士兵得到1/4里格。平民由于他们的忠诚也受到奖赏。

奖励服兵役的土地证是分配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罗萨斯政府发放了8,500份土地证，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土地证都被接受者 637

使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没有钱的政府付给它的仆人们工资、津贴和赠予品的一种手段。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种政治因素，因为土地是现有的最安定的庇护来源，它对罗萨斯来说是一个武器，对支持他的人来说是一种福利制度。罗萨斯是伟大的庇护者而庄园主是依附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萨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并且是一个相当排外的利益集团。因为在庄园主之外没有任何阶层有使用这些赠予品的装备。不足1里格的土地证在士兵和小官吏手中实际上毫无用处；当时存在的农业结构是每个庄园平均为8里格。但是这些土地证要是在已经拥有庄园或有资本来廉价购买庄园的那些人手中，它们就是一个使土地集中的强大工具。赠给士兵和平民的土地证90％以上最后落到了地主或那些正在购买土地的人手中。

因此，罗萨斯政权的趋势是财产越来越多的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1830年，980个地主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5,516平方里格的被占领的土地；其中60个业主垄断了几乎4,000平方里格，即占76％。在1830—1852年期间，被占领的土地增加到6,100平方里格，共有782个业主。在这些人当中，382个业主占有面积超过1平方里格的地产中的82％；而200名业主即28％的人占有面积超过10平方里格的地产中的60％。有74人拥有面积超过15平方里格（9万英亩）的地产，42人拥有面积超过20平方里格（12万英亩）的地产。同时，人们拥有的小块土地只占使用中的土地的1％。在1835至1852年期间担任众议院议员的80％左右的人当中，60％是地主或拥有和土地有联系的职业。这就是选举罗萨斯掌权的和继续投他的票的议会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控制决策。他们一直不允许罗萨斯增加直接税（对资本和财产征收的一种税）并且他们经常不让他在使庄园主作出牺牲的情况下获得任何收入。1850年，当收入总额达到6200万比索时（这主要来自关税），直接税只占总额的3％，而这笔钱大部分是由商业而不是由土地交纳的。政府也是由地主控制的。罗萨斯的经济顾问胡安·N、特雷

罗拥有42平方里格土地并且遗留下5300万比索的财产。罗萨斯的主要将领安赫尔·帕切科拥有75平方里格土地。外交部长费利佩·阿拉纳拥有42平方里格土地。甚至诗人、议员、最高法院院长比森特·洛佩斯也拥有12平方里格土地。但是这个省最大的地主是安乔雷纳家族、罗萨斯的堂兄弟们和他的最亲密的政治顾问们。他们拥有的地产多不相同，共计有306平方里格(185.6万英亩)。至于罗萨斯本人，在1830年在一批拥有50平方里格（30万英亩)以上土地的大约17个地主中，他排在第10位，有70平方里格(42万英亩)土地。到1852年，根据关于他的财产的官方估计数字，他已经积累了136平方里格(81.6万英亩)土地。

庄园使罗萨斯有了进行战争的本钱，使他和其他庄园主结成联盟并且有了招募一支由雇工、高乔人和流浪者组成的军队的手段。他有一种本能，就是可以操纵群众的不满情绪并且使他们以一种不损害社会基本结构的方式反对他的敌人。虽然罗萨斯在文化上和高乔人是一致的，但是他并不在社会地位上团结他们，也不在政治上代表他们。他的军队的核心是他自己的雇工和从属，他们是他的仆人而不是他的支持者，是他的依附者而不是他的同盟者。当罗萨斯在1829年、1833年或1835年需要发动重大攻势时，他招募乡下的高乔人和城里的暴民。这些人是唯一可以得到的人力，并且当时他们在庄园主外有一种价值。而通常的农村政权是非常不同的：就业是强制性的，庄园就是一座监狱，否则眼前的代替办法就是被招募到印第安人边界去。高乔人军队持续多长时间要视罗萨斯对他们的需要而定。从1835年起一旦他掌握了国家机器，一旦他控制了行政机构、警察、最重要的是控制了正规军，他就不需要也不打算要乡下的平民军队了。罗萨斯迅速招募、装备、武装和清洗了一支战斗部队，这支部队的分遣队被用来对付农村以便把招募的人聚拢起来。由于他手里有了最后的高压手段，他就不再依靠非正规的农村部队了。此外，只是从高乔人民兵是由乡下雇工组成的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才是“平民”部

队。他们不是一直支持一项事业的志愿兵，他们也不是在从事政治活动。属于一个军事组织这一事实并没有使雇工得到权力或代表权，因为庄园的刻板结构被移植到民兵中来，在民兵中庄园主就是司令，他们的监工就是军官，他们的雇工就是士兵。这些士兵并不同罗萨斯发生直接关系；他们是由他们自己的具体庇护人动员起来的，这意味着罗萨斯不是从自由的高乔人群众那里得到支持，而是从领导从雇工中征来的士兵的庄园主那里得到支持，国家付钱给庄园主作为这项服务的报酬。这个省是由庄园主、民兵司令和治安官的非正式联盟统治的。

农村政权的严酷性反映了在一个扩大庄园的时期大草原上空空荡荡、人口非常稀少和人们无情地寻找劳动力。奴隶制在阿根廷的残存下来，是说明缺乏劳动力的又一迹象。罗萨斯本人就拥有奴隶，并且他并不问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尽管发生了5月革命、1810年发表了宣言以及随后在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方面出现了希望，但奴隶制在阿根廷还是残存下来了，一种非法的奴隶买卖成为它的供应来源，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以前，政府还公开地容忍这种买卖。在殖民地时代结束时，拉普拉塔河地区有40万人，其中就包括了3万名以上的奴隶。奴隶制的影响在城市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最大的。18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40,398人的全部人口中，有11,837人是黑人和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即占人口总数的29.3%，而大多数黑人是奴隶。在独立战争期间奴隶数目减少了，当时把解放奴隶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而服兵役往往导致死亡。182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居民55,416人，其中13,685人即24.7%是黑人和穆拉托人；这些人当中，6,611人即48.3%是奴隶。1838年，总人口为62,957人，其中非白人为14,928人，即占23.71%。非白人的死亡率比白人高，穆拉托人和解放了的黑人的死亡率比奴隶要高得多。然而从1822年至1838年，非白人的数目保持不变，因为他们的数目从国外得到补充。罗萨斯要对恢复奴隶买卖负责。他在1831年10月15日发

布的命令允许出售进口的奴隶作为外国人的仆人；因而从巴西、巴拉圭和非洲来的非法奴隶买卖在19世纪30年代还残存着。直到1839年，当时罗萨斯需要英国支持他反对法国人，所以才签订了全面反对奴隶买卖的条约。据英国人的一项估计说，到1843年，阿根廷各省仅有300名奴隶；那些参加了联邦派军队的奴隶，尤其是如果他们属于中央集权派的主人的话，都获得了自由，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当1853年宪法规定在阿根廷全境最后废除奴隶制时，剩下的奴隶已经不多了。同时，罗萨斯雇用了许多黑人，在他的政治机构中使用了更多的黑人。他似乎没有种族偏见，尽管他并不提高非白人的社会地位。他们干的是最下层职业：他们是守门人，驾驶货车的人、搬运工、车夫和洗衣女工以及家庭仆人。他们在街道上给予罗萨斯有益的支持并且是他的"平民"追随者的一部分。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各省扮演一种军事角色，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支民兵队伍——联邦黑人军，是穿红衬衣的黑人军队，他们当中许多人以前是奴隶。但是归根到底，罗萨斯在黑人和穆拉托当中的蛊惑人心的作法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在周围社会中的地位。 640

地主的霸权、高乔人的低下地位、雇工的依附性——所有这一切就是罗萨斯的遗产。阿根廷在以后许多世代都刻有社会阶层划分得极其明显的印记。社会变得固定在一个僵化的模型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变革以后不得不去适应它。罗萨斯的国家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庄园。社会本身就建立在庇护人一雇工的关系之上。这似乎是无政府主义之外的唯一抉择。

罗萨斯从1829年至1832年以绝对的权力进行统治。在空了一段时期以后(在这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不稳定状态和各省的不服从状况有使无政府主义恢复的危险)，他在1835年3月根据他自己的条件重新任职，并且以全部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统治了以后的17年。众议院仍然是省长的产物，而省长是它正式"选出的"。众议院由44名议员组成，其中一半人每年通过选举予以更新。但

是只有少数选民参加选举，而把选票送交政权是治安官的责任。议会由于不起立法作用和财政控制作用，主要是为了给外国和本国观众看的一种公共关系方面的演习，并且它通常是对省长的倡议唯命是从。罗萨斯一方面控制了立法机构，另一方面还控制了司法权力。他不仅制订法律，而且解释法律，改变法律，和应用法律。司法机器毫无疑问继续运转：治安官、关于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官、上诉法官、和最高法院全都使政权得到体制上的合法性。但是进行统治的不是法律。行政长官的专横干涉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罗萨斯亲自处理许多案件，阅读证据，研究警察的报告，并且当他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时就作出判决，在档案上写下“枪毙他”，“处他罚款”，“监禁他”，“交军队处理”。罗萨斯还控制行政机构。他的第一批最不妥协的措施之一就是清洗旧政府；这是除掉政治敌人和奖励追随者的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这种办法是这个社会的庇护人—依附者组织中所固有的。新政府并不过份庞大，而一些早先的空缺未予填补，以此作为政府不得不采取的削减开支的行动中的一部分。但是各种各样的职位都是为政治依附者和联邦派人士所保留的；其他资格是无足轻重的。

641

宣传是罗萨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简单而激烈的口号取代了意识形态；政府中弥漫着这些口号，它们被坚持不懈地强加给公众。人民被强迫穿一种制服并且使用联邦的颜色—红色。这种象征性作法是保持高压和一致的一种形式。每个人要有联邦的外表并且使用联邦语言，以此代替正统的关于忠诚的测验和宣誓。联邦的一致性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压力的措施，通过这种措施迫使人民放弃一种消极的或不关心政治的作用而接受一种具体的义务以表明他们的真正立场。教会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盟者，但耶稣会会士除外，他们再次被允许入境，同时又再次遭到驱逐。人们胜利地举着罗萨斯的画像穿过大街，把他的画像放在主要教堂的祭坛上。教士在布道中颂扬这位独裁者和赞美联邦事业。教士变成政权的重要辅助者，他们宣讲说反抗罗萨斯就是一

种罪过。不只用文字而且也用行动来传达政治上的正统观念，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厂保持满员，用西班牙文和其他文种出版报纸，这些报纸刊载官方新闻和宣传资料，以便向国内外发行。但是最后的制裁手段是武力，它由罗萨斯控制，由军队和警察应用。

这个政权严格地说并不是军事独裁：它是一个雇用了一支顺从的军队的文职人员政权。然而，由正规军和民兵组成的军事机构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而且是为了占领它，不只是为了保护人民而且是为了控制他们。罗萨斯的军队是从雇工、流浪者和罪犯中招募的，由职业兵当军官，靠战利品和压榨庄园过活，它对其他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它不是一支有效率的军队的话，那么它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也许有2万人——和一支活跃的军队，经常从事对外战争、省际冲突和国内安全活动。但是，战争和战争的经济需求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但它们为少数人创造了财富。防御支出为某些工业提供了可靠的市场，为这些工业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由于相当经常的需要制服、武器和装备，这就帮助维持了一些小作坊和手工制造业，不然的话，这一工业部门就要衰退。首先，军事市场对几个大地主有利。像安乔雷纳家族这样的业主长期以来订有向边界要塞供应牛的宝贵的合同；现在其他前线的军队变成了贪婪的消费者和经常的顾客。然而，军队及其债务是在收入缩减的时刻增加的，因此必须牺牲某些西。当法国的封锁从1838年4月开始产生不利影响时，不只是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受到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的打击，而且这个政权看到它的关税收入——它的基本收入——急剧下降。在面临巨额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它立即强行大大削减开支。这种削减大部分落在教育、社会服务和一般的福利上面。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实际上已关闭了。当检验应当优先办理哪些事情时，罗萨斯甚至没有假装要“得人心地”治理国家。

642

军事开支和社会开支的悬殊差别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也反映了价值观念。内部的敌人、同其他省份以及和外国的冲突，还有

援助内地同盟者的义务——这一切都促使罗萨斯保持一个巨额的国防预算。这些选择中有一些是强加给他的，其他一些是他喜欢采取的政策，然而还有一些是反映了对福利的一种普遍冷漠的态度。无论如何，其结果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在19世纪40年代，内政部得到的款额平均占全部预算的6—7％，而这笔钱大部分用于警察和政治方面的开支，而不是用于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国防费用得到绝对的优先。军事预算在一些年份是不同的，1836年是400万比索，即占预算总额的27％，在1840年法国封锁时期增加到2,380万比索，占49％，而在1841年增加到2,960万比索，占71.11％。在这个政权的其余年份，它从没有少于1,500万比索，即占49％。

这就是支撑罗萨斯掌权20多年的全部施政制度。大多数人民服从他，有些人怀着热情，其他人是出于惰性，许多人是出自畏惧心理。但是它不仅仅是专横地强加于人的暴政。罗萨斯政府是对阿根廷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情况作出的反应，在阿根廷社会，人们在没有一个使他们大家都畏惧的共同力量的情况下生活得太久了。罗萨斯取代了一种自然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可能是野蛮的和短促的。他提供了一种逃避不安全状态的办法和一项和平诺言，条件是授予他全部的权力，这是对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的解毒药。罗萨斯用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来行使他的主权。即使这样，也有一些人反对。内部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力量，它部分地来自中央集权派，部分地来自年轻的改革家；这个反对力量发展到顶点就是在1839年发生了一次未成功的阴谋事件，而在这个政权执政的整个时期，反对派继续从它在蒙得维的亚的基地进行活动。内部反对力量的第二个焦点是由这个省南部的地主形成的，地主们的不满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利益。由于要求他们提供人力物力送往印第安人边界，他们已经受到骚扰；他们还特别受到法国封锁的打击，法国的封锁断绝了他们的出口品的出路，为此他们怪罪于罗萨斯。但是他

643

们在1839年的叛乱并不是和政治阴谋事件同时发生的，而他们也被粉碎了。最后，这个政权还有一种外部反对力量，它部分地来自其他各省，部分地来自外国。如果这一反对力量同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联合起来，罗萨斯就会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因此他储备了另一种约束力量：恐怖。

罗萨斯利用恐怖作为一个施政工具，以消灭敌人，约束持不同政见者，警告动摇份子，以及最后控制那些支持他本人的人。恐怖不仅仅是一系列例外的插曲，虽然它是根据情况来调节的。它是罗萨斯制度固有的一部分，是这个政权特有的方式，它的最后的制裁手段。罗萨斯本人就是恐怖的创造者，他根据授予他的特别权力不经审讯就下令把人处死。但是恐怖活动的具体代理人是“人民复兴协会”，这是一个政治俱乐部和类似警察的组织。这个协会有一个武装的侧翼，人们通常称之为“玉米棒子”。① 这些人是真正的恐怖份子、他们是从警察、民兵、职业谋杀者和罪犯中募集的，他们组成武装小队执行各种任务：杀人、抢劫和威胁。虽然“玉米棒子”是罗萨斯的产物，但是它比创造它的人更恐怖：像许多这种死亡小队一样，它在行动时有一种半自治权，它的创始人认为他不得不允许这种半自治权作为一种必要的施政手段。残酷情况可以按年代排列成表。恐怖行动的发生根据政权受到的不同压力而有所不同，在1839-1842年达到高峰，当时法国的干涉、内部叛乱和中央集权派的入侵使罗萨斯的国家有被摧毁的危险，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措施。罗萨斯从来不大批杀人；有选择地暗杀几个人就足以实现恐怖了。而1839—42年的高峰对整个政权来说不是典型，而是总的统治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即恐怖行动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强使人们服从政府的政策。

644

这一制度使罗萨斯在20多年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享有霸权。

① 人们对人民复兴协会的尊称，因为它的会标上面有一个玉米穗。——译者注

但是他不能在整个阿根廷应用这一战略。首先，他并没有统治"阿根廷"。13个省独立地治理它们自己，尽管它们集合在拉普拉塔联合省这个大联邦之内。罗萨斯接受这一点，并且宁愿使省际关系由非正式的权力来管理而不是由一部成文的宪法来管理。他拒绝拟订一部阿根廷宪法，他争论说，在时间适宜于实现全国性组织之前，各个省必须首先把它们自己组织起来，局部的进步必须先于整体的就序，而首要任务是击败那些中央集权派。然而，即使在没有正式联合的情况下，各个省也被迫把某些共同的利益委托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这主要是国际和外交政策，以及一种司法方面的东西，它将使罗萨斯能够不时地伸出手来并且指控他的敌人是联邦罪犯。因此，罗萨斯对各省实行了某种事实上的控制；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部分地是为了防止颠覆活动和无政府主义渗入布宜诺斯艾利斯，部分地是为了使经济和外交政策获得广泛的基础，部分地是为了使他的政权的力量遍及全国。为了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不得不使用某种武力，因为各省并不是自愿地接受他。在沿海地区和内地，罗萨斯被看成是一个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利益服务的考迪罗；在这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种植园主的忠诚和他们的雇工的服务。在内地许多省中，联邦党的经济根基比布宜诺斯艾利斯要弱一些，社会基础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要窄一些；而在联邦的比较边远的地区，罗萨斯不能马上实行独裁的控制或掌管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因此，阿根廷的统一意味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阿根廷的征服。联邦主义让位给罗萨斯主义，后者是一种从中央进行控制的非正式的制度，这种控制是罗萨斯通过耐心取得的并且是坚持不懈地行使的。

1831年1月4日沿海各省(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圣菲省、以后还有科连特斯省)之间缔结的联邦公约开辟了在10年之内东部比较稳定的局面，尽管这不可能掩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霸权、它对关税收入和内河航运的控制以及它对其他各省的经济利益所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罗萨斯是在1835—1840这些年

945

里开始扩大他在沿海地区的权力的。首先，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帕斯夸尔·德·埃查圭脱离了强有力的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的影响并且使自己无条件地服从罗萨斯。然后，科连特斯省不满足在经济上的屈从地位，对它的新宗主国宣战；但是省长贝龙·德·阿斯特拉达在帕戈拉戈被击败和阵亡(1839年3月31日)，使得科连特斯省也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控制之下。现在只剩下圣菲省了。它的省长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是各省考迪罗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他对联邦的政治活动富有经验并且享有和罗萨斯同等的名声。但是罗萨斯等着，1838年洛佩斯死了。随后选出的多明戈·库连是个无党派的反对罗萨斯的人，他惹起了一场小的危机，这场危机由于罗萨斯的被保护人、现在成为他的追随者的胡安·巴勃罗·洛佩斯的胜利而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东部省份，罗萨斯逐渐成功地强加了一些与他联盟的、依赖他的或较弱的省长。然而，在乌拉圭(它从1828年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那么容易取得成功。他的同盟者曼努埃尔·奥里韦总统在1838年6月被敌对的考迪罗弗鲁克托索·里维拉(他得到拉瓦列将军的支持并且受到流亡的中央集权派的欢呼)所推翻。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罗萨斯不能容许这些地方上的火焰不被扑灭，因为它们有被卷入国际大火之中的危险。法国政府对罗萨斯所知甚少，但是它不喜欢它所看到的事情。法国渴望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扩大贸易和权力，并且由于在罗萨斯管辖下的法国国民的地位问题上和罗萨斯发生的纠纷而感到恼火，因此授权法国海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封锁从1838年3月25日开始，接着是法国军队和罗萨斯在乌拉圭的敌人结成联盟。法国封锁持续到1840年10月29日，在许多方面使这个政权受到损害。它使经济停滞，使政府失去至关重要的关税收入；它使联邦制度不稳并赢得了沿海地区和内地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它还导致了罗萨斯以更大程度的独裁进行统治。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太小因而没有决定性意义。原来期望拉瓦列将军在法国人和蒙得维的亚来的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港登陆以支持内部的两条叛乱份子的战线——首都的同谋者和南部的地主。事实上各种行动未能同步进行。拉瓦列没有把他的军队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带到恩特雷里奥斯省，他答应把联邦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且使各个省自治。但是他同法国人的联合——许多人认为法国人是对联邦发动侵略的人——使他在恩特雷里奥斯省失去了支持。于是他转向科连特斯省，在那里，佩德罗·费雷省长接受了他并且宣布反对罗萨斯。但是科连特斯省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太远，而且在拉瓦列的军队到达攻击距离时，它缺乏钱、武器、也许还有信心。法国人向他提供海军支持和武器，但是不能提供军事冲力。拉瓦列在1840年8月5日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并且最后看来是作好了准备要向罗萨斯发动进攻。在这个时候，他的判断、也许是他的神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停下来等待法国援军，而法国援军没有来，因而他失去了进行突袭的有利条件。9月5日，使他的同伙灰心并且使历史学家感到不解的是，他向圣菲省撤退了。这时他的军队已经由于失败和开小差而士气低落，开始向北部作长距离撤退。

进行解放的远征队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丢了脸，但是在别的地方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仅仅是远征队本身的存在就有助于激励起罗萨斯在内地的敌人。从1840年4月起，由图库曼省省长马科·阿韦利亚内达组织的，包括萨尔塔、拉里奥哈、卡塔马卡和胡胡伊在内的北方联盟在阿劳斯·德·拉马德里将军指挥下和拉瓦列结成联盟，开始作战，再次从内地威胁罗萨斯。总的来说，1840年对罗萨斯是个危险的年头。然而他幸存了下来，而且在1841年初潮流开始变了。联邦派的考迪罗们控制了远在西部的库约并且开始反击。乌拉圭的前总统奥里韦也为罗萨斯进行了血战。1840年11月25日他在克夫拉乔埃拉多击败了拉瓦列的解放军并且完成了对科尔多瓦的征服。第二年他摧毁了北方联盟的残余部队，首先是在1841年9月19日在法迈亚摧毁了拉瓦列的精疲力竭的军队，然后在1841年9月24日在罗德奥德尔梅迪奥摧毁了拉马

德里的军队。这些是残酷的战争，罗萨斯的将领们在战斗中打垮的敌人和通过恐怖手段打垮的敌人一样多。拉瓦列本人在1841年10月8日前往玻利维亚途中在胡胡伊被杀死。然而，摧毁了内地的中央集权派军队激怒了沿海各省而不是使它们陷于瘫痪。它们的叛乱最后被挫败了，这既是由于它们自己的不团结，同样也是由于奥里韦的能力，他在1841年12月迫使它们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到1843年2月，奥里韦已控制了沿海地区。里维拉和逃亡者被包围 647 在蒙得维的亚市内，而奥里韦和罗萨斯的人驻扎在郊区的塞里托。在河流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舰队完成了对中央集权派的包围，摧毁了蒙得维的亚的海军力量，强制实行封锁，并且等待胜利。可是对蒙得维的亚的包围持续了9年。

英国的干涉现在是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在1843年中，英国海军打破了对蒙得维的亚的封锁并且使得供应产品和新兵可以到达守军那里。这一行动在拯救这个城市方面是关键性的，它使战争延长并且迫使罗萨斯进行长期的和痛苦的包围。除了保卫乌拉圭的独立以外，英国还谋求使河流自由通航：罗萨斯被说成是对第一点的威胁和对第二点的障碍。从1845年9月起英法海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强施封锁；11月，一支联合远征军强行沿巴拉那河顺流而上，护送一支商船队开辟和内地的直接贸易。但是远征军遇到的既不是欢迎的盟友也不是有前途的市场，它们所遇到的只是高昂的关税、当地的怀疑情绪、滞销和怎样沿河而下重新返回的问题。封锁并不比远征有效。这是一个缓慢而不灵活的武器，它打击的是贸易而不是敌人。阿根廷的原始经济使它实际上不受外部压力的损害。它可以一直回到维持生存的经济上来而且一直坐到底，在它的牛的资源进行积累的时候，等待被关闭的贸易重新开放。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封锁了他们自己的贸易。与此同时，罗萨斯却从1843年—1846年的干涉中得到很大的信誉。他的违抗精神、决心和最后的胜利使他在阿根廷爱国者的万神殿中处于很高的地位。阿根廷团结在罗萨斯周围，而当紧急状态已经过去而

英国人回来谋求和平与贸易时，他们发现这个政权比以往更强大了，经济正在改善，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但是，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罗萨斯通过无情的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使内地驯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然而是持久的主权。但是他不能把同样的办法用之于沿海各省，在那里，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是同强有力的外国利益相一致的。这些省份要求巴拉那和乌拉圭的沿河港口有贸易权利，它们要求分享关税，它们还要求地方自治。在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变成罗萨斯的唯一致命的弱点。英国人已经同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和巴拉圭的考迪罗们谈判，648 要求建立一个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盟，但是恩特雷里奥斯省长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过于小心而不愿在没有强大的地面部队的保证下拿他的前途来冒险。如果英国人不能提供这种部队，巴西却能够提供。

巴西有它自己的账要和罗萨斯来算，巴西决心防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追随者在乌拉圭和沿海地区盘踞下来，并且渴望获得从马托格罗索通往大海的河流网络的自由航行权，它准备采取行动来反对罗萨斯的"帝国主义"或者是由于它自己的帝国主义而驱使它采取行动。近在手边的同盟者是恩特雷里奥斯省。像罗萨斯一样，乌尔基萨是一个农村考迪罗，拥有辽阔的庄园，是拥有几百平方英里个人封地的统治者，有数以万计的牛羊和四个大屠宰场。他作为被围困的蒙得维的亚的供应者、制造品进口商和向欧洲出口黄金的人在19世纪40年代发了财。他的秘密野心很容易和该省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且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愿意取代罗萨斯和使阿根廷实行结构上的改组。此外，他对教育、文化和自由表现出比他的对手更大的敬意，他在蒙得维的亚的流亡知识份子中有优越的名声。因此，在乌尔基萨身上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力量，而他把自己置于省份利益、自由派流亡者和乌拉圭爱国者所结成的联盟的前列，这个联盟得到足够的巴西金钱和海军力量的

支持，使得力量对比不利于罗萨斯。这样，这位独裁者遭到的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的、由恩特雷里奥斯省、巴西和蒙得维的亚结成的三方联盟的对抗，这个联盟从1851年5月采取了行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罗萨斯主义的享有特权的受益者，但是那里的热情也减退了。人们曾期望罗萨斯能保障和平与安全；这是这个政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冲突和浪费了这么多力量之后，他仍然准备进行战争（甚至在1850年以后），无情地追求他在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目标，总是谋求再取得一次胜利。他的军队现在已衰弱和混乱了，他的军事司令官们不再能被信赖了。通过他采取的恐怖主义办法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非政治化的作法，他已经摧毁了一切残存的"平民的"支持力量。而当1852年初三方联盟的侵略军前进时，他的军队逃跑了，城乡人民并没有起来支持他。2月3日他在蒙特卡塞罗斯被击败；他独自一人从战场骑马逃走，在英国领事的家里避难，登上一艘英国船，驶往英国流亡。

649

罗萨斯是由于军事失败而被摧毁的。但是他的制度所依靠的经济结构和国际联系已经开始变了。养牛是罗萨斯政权所喜爱的政策。它需要在土地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低的投资，并且，如果由能够对付被动的出口市场的大单位大规模地进行饲养的话，它将产生非常高的利润。投资必须集中在养牛方面；因此需要富饶、廉价和稳定的土地。但是养牛业只提供范围有限的出口品，主要是皮革和牛肉干，而国际上对它们的需求并不大可能增加。即使在欧洲大陆开始作为英国市场的补充时，皮革市场也远不是有活力的；而对腌牛肉的需求只限于巴西和古巴的奴隶经济，这种需求更可能缩小而不会扩大。因此，罗萨斯的经济面临当前的停滞和未来的衰退局面。同时，到19世纪40年代中叶，南美洲的其他地区也参加了竞争。南里奥格兰德的大屠宰场开始削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抢生意。而在联邦内部，力量对比不再使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么占压倒的优势。从1843年起，当罗萨斯集中他的战斗

部队对付乌拉圭时，沿海各省尽量利用它们所享有的和平条件。牲畜资源成倍增加：恩特雷里奥斯省拥有600万头牛，200万头羊，和17家大屠宰场，它是一个新的经济力量。竞争还不那么厉害；恩特雷里奥斯省出口的牛肉干仍然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牛肉干的10%。但是这里面有政治含义。恩特雷里奥斯省和科连特斯省的庄园主们在某种程度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封锁中获得了好处，他们不准备永远忍受他们的宗主国所施加的约束。为什么他们要维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垄断呢？他们不应当绕过它的海关直接进入外部市场吗？为了回答这些挑战，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需要多样化和改进。这种多样化和改进以另外一种活动的形式出现了。养羊业已经开始威胁了养牛的庄园的支配地位。正是由于出口羊毛，阿根廷才第一次建立起它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它的国内生产能力和它的资本积累。罗萨斯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人物、一个从另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利奴绵羊化”——一种大型的由绵羊和羊毛组成的经济的兴起——是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不久就导致了一场对新土地的争夺。国外的刺激力量是欧洲纺织业的扩650 大，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国内条件也是有利的，其中包括优良的土壤和一个能够进行改善的当地绵羊品种。1810年该省有200万至300万头绵羊，但是它们属于低劣的品种并且占据边远的土地。到1852年，数目增加到1500万头，1865年增加到4,000万头。羊毛出口从1829的333.7吨增加到1840年的1,609.6吨，1850年增加到7,681吨；然后在1860年加速地增加到17,316.9吨，1870年增加到65,704.2吨。1822年，羊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全部出口值中占0.94%，牛皮占64.86%，在1836年，分别占7.6%和68.4%；1851年占10.3%和64.9%，1861年占35.9和33.5%；1865年占46.2%和27.2%。

在独立的最初几年，庄园主对改良绵羊品种不感兴趣。这种事情留给少数英国人特别是约翰·哈拉特和彼得·谢里登来指明

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他们开始购买西班牙的美利奴绵羊，保留和精心培养改善了的品种，并且在英国几乎全部取消对羊毛的进口税的鼓励下向利物浦出口。人们对养羊的兴趣越来越大也反映在1836—1838年进一步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美利奴绵羊一事上，同时还把大草原上的绵羊同萨克森种的绵羊进行杂交。改善绵羊品种不仅需要进口欧洲品种的绵羊，而且还需要新的生产方式——改善大草原的青草，在牧场上修筑篱笆，建造剪羊毛和储存羊毛的棚子，打井。所有这些反过来又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高乔人逐渐被牧羊人所取代。移民拓居者到达了，他们不是来当雇工就是作为分享利润计划的合伙人或者是来当佃户。爱尔兰移民作为牧羊人特别受欢迎，但是巴斯克人和加利西亚人也来了；虽然这不是大量移民，但它带来了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和产品。这些新来的人往往通过一些为期五年的合同在一个养羊人的羊群方面入股，根据合同，他们变成了合伙人，他们可以得到新增殖的绵羊的1/3和羊毛的1/3作为他们照料羊群和支付开销的报酬。一个移民者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够赚得足够的钱来购买一半羊群的股权，并且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他就拥有足够的绵羊和金钱来自己经营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萨拉多河的大草原上绵羊开始把牛从土地上赶走；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个接一个庄园落入养羊人的手中。当然，一些养牛的庄园幸存下来，它们或者是作为混合农场或者是在低洼的沼泽地上经营，那里的芦草不适于养羊。一般来说，这个省北部地区被占领时间最久的土地最适于养羊，而南部的新土地比较适于养牛。罗萨斯本人曾一直鼓励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养羊，如果说不是鼓励改善羊的品种的话。

651

外国人大量购买土地、羊的数量成倍增长、比较高级的消费倾向的出现，这一切都是表明一个新的阿根廷的迹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在发展和改善：铺设了街道，有了马拉的公共交通工具和煤气供应，这些都改善了环境。城镇附近，把土地圈起来用于农业和园艺的工作在进行，因此，在罗萨斯之后的10年之内，布

宜诺斯艾利斯市周围半径15—20英里以上的全部土地都再次划分和圈起来，作为农场或作为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这些农场和菜园由意大利人、巴斯克人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移民种植，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城市市场。铁路开始把该省内地同首都连接起来，一个汽船船队使沿河的各港口每天都同这个巨大的贸易集散地有联系。远洋汽轮每隔两三天就抵离这里。在1860年至1880年期间，从欧洲的全部进口值翻了一番，其中主要包括英国的纺织品、金属器具和机器以及来自大陆的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主要是通常的商品、羊毛、皮革和腌肉，这些商品构成了全部出口值的90％以上。

当然，三大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的。尽管内战和对外战争、国家的压榨和边界印第安人的袭击阻碍了发展，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保持其支配地位。沿海地区有些落后，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它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圣菲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不同，它有空旷的土地可以占用；农业垦殖化计划已经开始，从而为移民提供了一种艰苦的生活，但是也为那些购买了土地并且又把土地出售给殖民者的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活。罗萨里奥现在是一个活跃的内河港口，为进一步发展作好了准备。恩特雷里奥斯省(乌尔基萨本人是那里最大的业主)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繁荣，它有富饶的养牛的庄园和养羊场，并且同巴西和乌拉圭有贸易联系。外国人现在比较频繁地渗入上游的市场。甚至部分是庄园、部分是烟草种植园的科连特斯省(在那里，一切外交场合都喝英国的瓶装啤酒)最后也从一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内地是阿根廷的不发达地区，由于距离东海岸遥远和欧洲的廉价竞争使它的生产受到损害，它的唯一可作为补偿的出路是智利的矿物市场。经济贫困和可用的土地集中于大庄园的情况把穷人赶出土地，使他们落在考迪罗的手里，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沿海地区正在进入另一个时代的时候，这些考迪罗仍在回顾着过去。

罗萨斯的失败并没有摧毁现有的结构。土地寡头的霸权幸存了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处于支配地位。而省际冲突只是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各省授予卡塞罗斯的胜利者乌尔基萨以阿根廷联邦临时执政官的头衔并且使他起全国性作用；他反过来下令使关税国有化并且使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自由通航。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离出去了，它拒绝使自己听任其他各省的摆布（有些省只不过比沙漠稍好一些），并且仍然对乌尔基萨召开的立宪国会采取超然态度。1853年5月1日通过的宪法反映了若干影响——阿根廷以前的一些宪法、美国的范例和过去冲突的痛苦教训。但是也许最强大的影响是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的政治思想，他建议在中央权力和各省权利之间实现公正的平衡并且执行一项关于移民、教育和现代化的计划。这个宪法规定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并且把传统的自由和公民权利合并在一起。它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实行分权。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一个是参议院，由各省的立法机构选出的两名成员组成；一个是众议院，由男性选民通过公开投票选出。宪法保证各省有地方自治权，同时授予联邦政府以抵销权。总统由选举团选出，任期6年，他被赋予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他可以提出他自己的法案，可以不经国会而任免他的部长们的职务。总统还有权干涉各省事务以便维护共和政府来对付内部骚乱或国外的进攻；为此他可以撤消当地政府和强行安排联邦官员。宪法的经济条款也说到联邦的问题。省际间的关税取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收入将实行国有化，不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专有的财产，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进行抗拒的另一个原因。乌尔基萨当选为任期6年的总统。但是他并没有主持一个全国性国家。一种国家实体感并不存在，不然的话就是这种国家实体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胜过对各个省或对个人的忠诚。虽然各省接受了1853年的宪法，但是各省继续由考迪罗们统治着——即使他们被称为省长——，而联邦基本上是由个人对总统的忠诚的网络组成的。 653

阿根廷现在分裂成两个国家，一方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它们由该省省长（从1860年起是巴托洛梅·米特雷）和自由党统治；另一方面是阿根廷联邦，它由乌尔基萨和联邦党领导的13个省组成。过去是各个省拒绝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控制，现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拒绝和各省合作，也不服从它认为是替考迪罗主义充门面的宪法。而各省无法迫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违背它的意愿去参加联邦：它强大，它富足，它的海关仍然是阿根廷主要的收入来源，它是外贸的焦点和一个省的财产。因此联邦在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巴拉那建立了它的首都，在那里，乌尔基萨——不管他对宪法的感情如何——作为一位老式的考迪罗进行统治，虽然他又增添了沿海地区和内地的领导人的身份。作为第一任总统，乌尔基萨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了商业条约，并且开放了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使之可以自由航行以进行对外贸易。在通常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进口品的几乎70％是运往各省的。现在，联邦的政策是使自己摆脱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同外部世界直接贸易，并且使罗萨里奥成为一个新的货物集散地。乌尔基萨亲自参加同欧洲进行的商业企业活动，参加在罗萨里奥建立进出口商行的计划并且参加寻求外部资本的活动。但是，外国航运业并不响应这一新的机会，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卸货：事情仍然是这样，即罗萨里奥还不是一个充份的市场或货物集散地来证明多增加5天的航程是有道理的。1857年联邦又提供了进一步刺激措施，当时公布了一项差别关税，希望引诱欧洲贸易绕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即使这样做（它仅持续到1859年）也无法战胜经济生活的现实。因此商业战让位给军事冲突。

到1859年双方已准备好进行一场新的战斗较量。乌尔基萨的军队在塞佩达战役中击败了米特雷的军队，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勉强地同意并入联邦。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仍然有金钱和人力的储备，1861年它再一次进行反击。双方在帕翁战役中相迎，人们认为这次交锋如果说不是米特雷的胜利的话它至少是联邦的失败，联邦明显地无法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不服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654

省。乌尔基萨从场战上撤退了，但显然认为如果联邦不能迅速取胜，它就将根本无法获胜了。他把他的军队带到恩特雷里奥斯省以便至少保卫他那个省的利益，并且听任联邦削弱和迷失方向。同时，米特雷在各条战线上前进。他派出他的军事纵队去支援沿海地区和内地各省的自由派政权。他以实力地位和乌尔基萨谈判，说服他自愿解散联邦。他还迫使他自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政客接受他的全国改组计划，并且使这项计划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进行。

结果达成的解决办法是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妥协。米特雷接受了1853年的宪法及其偏向中央集权和总统权力的规定，然后他被宣布为全国的以及这个省的领导人。这样，在1861年，建立一个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内地在那里设置代表的联邦的思想就被人们接受了。而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包围蒙得维的亚的英雄米特雷在1862年10月当选为整个国家的第一位宪法总统。现在各省的联合实现了，阿根廷第一次被称为阿根廷而不是用一种拙劣的转弯抹角的说法来称呼它。

如果不是两位杰出的总统巴特洛梅·米特雷(1862—1868年)和多明戈·F·萨米恩托(1868—1874年)掌握政权，1862年以后国家改组的机会就可能丧失掉。这两个人既是政客和政治家也是知识份子和文人。这两个人多年来都曾致力于建立一个大阿根廷的理想；现在两个人都拥护三个目标：国家统一、自由主义体制和现代化。在反对联邦方面米特雷不仅仅是为某一个省而战，而是为反对四分五裂和考迪罗主义而战。他谋求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置于统一的阿根廷的首脑地位和保持这种地位，在1862年以后他继续战斗。因为考迪罗们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灭亡的。在1863年，后来又在1866—1868年，米特雷不得不镇压内地的叛乱。这些叛乱的政治近因是考迪罗们反抗新秩序。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内地经济衰退、各省的贫困和它们无法维持它们的人民就业或生存。没有工作和食物驱使农村人民过游击队的生活，实际上是靠

偷盗抢劫为生。就是这种军队支持着荒野而遥远的拉里奥哈省的考迪罗、绰号叫“小伙子”的安赫尔·比森特·佩尼亚洛萨，在那个省，一所小学对全省就足够了，但是在那里，考迪罗个人为他的追随者提供福利。当“小伙子”在1863年叛乱时，米特雷允许圣胡安省长、内地的联邦主义的付总督萨米恩托对叛乱者进行殊死战斗，而萨米恩托的军队用野蛮来保卫文明，他们杀害俘虏并且把“小伙子”的头悬挂在杆子上。1866—1867年，“小伙子”的一个以前的军官费利佩·巴雷拉从智利侵入阿根廷西部并且招募了另一支游击队，但是他也被击败了，他的追随者被国民军残酷地粉碎了。游击队的结束已经在望，尽管它在进行了进一步的活动之后才被消灭。乌尔基萨现在已同中央国家和解，他对据说他曾庇护过而现在不赞成的各省运动持超然态度，并且在支持新阿根廷方面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但是到头来他成了他一度代表的那个制度的牺牲品，他在1870年4月在他自己的庄园里被一个敌对的考迪罗和以前的被保护者下令暗杀了。杀他的那个人、里查多·洛佩斯·霍尔丹在恩特雷里奥斯省保持了叛乱精神和对考迪罗主义的崇拜，一直到1876年。在这期间，萨米恩托（他宣布他在各省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外省人）继续了米特雷的工作，用剑和笔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并且一接更加残酷无情地对付叛乱者。

尽管存在着各省的传统和考迪罗的反抗，中央政权和国家组织仍幸存下来并且生了根。它们得到属于阿根廷范围的一些机构的发展的支持：报纸、邮政、国家银行、铁路系统。但是两个特殊机构促进了国家的一体化和统一——联邦司法机构和国民军。根据1862年的法律，建立了国家司法权，并且在1865—1868年拟订了阿根廷民法。最高法院和各种下级法院的建立使现代化国家的结构完备了。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家级或省一级的、和最高法律抵触的任何法律或法令不合宪法，从而成为宪法的解释者，尽管它不能裁决权力之间的冲突。行政长官有干预各省的权利，

这种权利一旦有国民军支持，就变得更有效了。根据1864年1月 656
26日的法令，政府建立了一支有6千人的常备军，分为炮兵、步兵和骑兵。1869年成立了军事学院，并且组织一个职业军官团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1872年9月21日的征兵法规定实行全国征兵。这是新军队的体制上的框架。而在考迪罗们叛乱和巴拉圭战争期间这支军队的活动提供了更有效的推动力量，当时它增加了人数并且增添了经验。这支军队给予总统真正的权力并且使他能够把行政长官的力量扩大到阿根廷最远的角落。地方寡头逐渐变得顺从了，为了酬答他们的合作，向他们提供了在全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地位。

使米特雷和萨米恩托的总统任期生气勃勃的那些政治原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原则。米特雷领导了一个有显著特色的自由党，而在帕翁战役之后他的国家改组战略不只依靠扩大联邦权力而且还依靠在各个省遍设自由派政府，这是通过自愿选择而进行联合的工具。自由主义代表了一个知识份子贵族阶层，他们是1837年那一代人的幸存者和继承人，现在可以随意实现他们的想法，促进政治与物质进步、法治、小学和中学教育，消除萨米恩托所憎恶的野蛮作法，并且把贫穷的高乔人变为有用的人。但是自由派精英并没有给人民群众提供什么东西：对牧民和雇工来说，他们处于政治范围以外，他们的地位就是为别人服务，他们的作用就是劳动。只有一部名叫《马丁·菲耶罗》的史诗曾描绘他们的情况，这部史诗对过去的辉煌岁月的消逝表示痛惜。自由党承认的唯一反对派是联邦派，后者追随乌尔基萨和传统，并且他们显然属于这个政治上的国家。自由党在米特雷担任总统期间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派是自治主义者，他们后来和乌尔基萨死后无人领导的联邦主义者合并，另一派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继续保持纯粹的米特雷主义的原则。同时，在各个省，自由主义像联邦主义一样，往往只是考迪罗主义的别名，而政党头目很快就以“考迪罗”闻名了。

现代化意味着通过农村领域的出口来发展、对新的基础结构进行投资以及移民。有些当地的资本被用于主要部门、养牛的庄园、养羊场和甘蔗种植园。但是投资基本上依赖输入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对阿根廷的贸易主要是纺织品的贸易，而英国的投资限于在商业和私人庄园方面。但是从1860年起新的趋势出现了。首先，在1861—1865年组织了几家合股企业。它们是英国企业家用英国资本建立的，它们经营铁路和银行。1863年1月1日，伦敦与拉普拉塔河银行第一个分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业，1866年罗萨里奥分行开始营业。从这时起，钢铁、金属制造品和煤在英国向阿根廷的出口中所占的地位就比较重要了。第二个阶段是开发性投资，它受到阿根廷的鼓励，并且得到希望为其商品改善市场的英国人的促进。1860年，巴林斯公司为阿根廷政府在伦敦搞到250万英镑贷款。这是英国资本稳步流入阿根廷的开始，贷款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或是作为直接投资，或是作为对国家的贷款。比较大量的外国投资不得不等到1870年以后的时期，当时银行、工厂和公用事业变为主要的接受投资的机构。但是，一个投资领域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就是铁路，铁路对经济发展是必要的，它们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广阔腹地的农产品，并且把进口品运进来。

第一条铁路是1857年开通的；它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6英里，是用当地私人资本修建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北部和南部铁路开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外展开；1870年阿根廷中央铁路把罗萨里奥同科尔瓦多连接起来并且打开了广大的中央平原。为了修这条铁路，政府和英国资本签订合同，保证最低限度的收益并且赠予附近土地（这对把资本吸引到一个空旷地区来说是必要的让与），这些土地的价值在于未来的前景而不在于目前的经营。20年中阿根廷铺设了1,250英里铁路。与此同时，由于汽轮代替了帆船，同外部世界的交通正在改善。皇家邮轮公司在1853年开始对拉普拉塔河开设定期航班；兰波特和奥尔特合伙公司在1863

年、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在1868年开设了定期航班。从英国到拉普塔河的航程乘快船已减少到22天。汽轮也参加了内河港口的航运，到1860年，已开办了一些业务。改善码头和港口的工作变得迫切需要了，同欧洲的海底电报和电讯联系也是如此，而所有这一切不久将由外国资本和技术来提供。

658

新的阿根廷也需要人。在1852—1870年时期联邦权力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霸权的增大并不仅仅是一种宪法上的或军事上的程序。它还代表了人口和经济的力量。阿根廷的人口在1852年以后增加得比较迅速，从935,000人增加到1869年的1,736,923人。沿海地区人口较多的局面变得更明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1869年占全部人口的28%；沿海地区占48.8%。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居民从1854年的90,076人增加到1869年的177,787人，其中89,661人是阿根廷人，88,126人是外国人。移民现在大大促使人口增长。1852年后联邦作出特殊努力来吸引欧洲移民。1853年的宪法使外国人几乎享有阿根廷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而不负担义务。在1856—1870年期间，圣菲省政府把欧洲家庭引进来形成农业垦殖区，它们是在大草原上“粮食化”的先锋。1862年以后，移民变成一项国家政策，并且在欧洲成立了办事处，尽管政府并不资助这种进程，听任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使人们前来定居。从19世纪50年代晚期起，每年大约有15,000移民进入阿根廷。

萨米恩托和其他一些人在美国的扩大边疆的模式影响下，鼓吹农业和小农场有许多好处，在农村地区安置移民很重要，以及有必要为殖民化提供土地和必须阻止投机活动与建立大庄园。但是实际结果是不同的。政府认为土地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可以为了财政目的而予以出售或租借。养牛羊是乡下的基本活动。庄园主形成了一个与城市商业领导人联系起来的、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认为获得土地是饲养牲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土地投机，不管是购买公共土地以便以后以能够赚钱的价格卖出去还是把地产划成小块和分租出去，都是一种太赚钱的生意而无法制

止。因此，到19世纪的80年代，根据一系列法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部分公共土地已作为私人财产转让给大庄园主和投机商：其他省也仿效这种形式。毫无疑问，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趋势是朝着小地产发展，因为大草原变得被有效地占据了，土地变得稀少和价格昂贵了，养羊业使土地划小，新业主购进土地而代替了老业主。但是，这是一种从超级大庄园向一般的大庄园发展的趋势。

659　乌拉圭在独立后拥有一种畜牧经济、一种出口贸易、一个国际港口和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这些资产先是被浪费了，然后被掠夺了。乌拉圭人开始为争夺他们国家的资源而自相争斗。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土地的斗争，因为老庄园主谋求确保他们的财产而新来者想争夺一份。人们把自己置于当地考迪罗统治之下，这些考迪罗又把自己置于更大的考迪罗的统治之下，他们参加了两个企图争夺权力的敌对政党——红党和白党。结果是发生了“大战”，它开始时是两个主要考迪罗曼努埃尔·奥里韦(白党)和弗鲁克托索·里维拉(红党)为控制乌拉圭而发生的冲突，而随着1838年10月奥里韦的倒台而变成一场国际战争。

冲突的持久性、红党处在被包围的蒙得维的亚市内而白党处于周围的乡下——这种情况使得两个政党一直隐藏的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了。红党获得一个城市政党的身份，它愿意接受自由主义的和外国的思想、欧洲移民和巴西的支持。他们同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反对罗萨斯和他的付手奥里韦的自由派流亡者联合在一起，并且当外国利益和红党的需要一致时，他们首先是欢迎法国的干涉(1838—1842年)，然后是欢迎首先是欢迎英国和法国的干涉(1843—1850年)。因此，蒙得维的亚是红党的，从人口上说这是一座欧洲城市，它的31,000居民中，只有11,000人是乌拉圭人。欧洲商人控制了它的贸易，欧洲的贷款支持它的财政(以关税收入为代价)，并且欧洲的思想浸入了它的政治。而红色既代表思想

也代表利益。他们不仅得到希望自由与改革的年轻人的支持，而且还得到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是希望得到赠予土地的移民、利用蒙得维的亚作为返回家园的基地的阿根廷流亡者、拥有海关并且认为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笔好生意的资本家以及从蒙得维的亚实行自由贸易和拉普拉塔河自由通航中得到好处的商人。里维拉本人基本上是一个谋求权力的考迪罗而不是一个立宪主义者。因此这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联盟。

另一方面，乡下是白党的。白党是庄园主的党，是拥护权威的传统的政党。它对它抵抗外国干涉、捍卫“美洲主义”和同罗萨斯的阿根廷结盟感到自豪。它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得到罗萨斯的补助，并且是由这样一个人——奥里韦——领导的，奥里韦尽管在对欧洲的干涉方面采取民族主义态度，但是许多人认为他是他的主人的工具。罗萨斯和奥里韦的联合军事力量至少足以抵抗——如果说不是战胜的话——敌对的联盟，而对蒙得维的亚的包围从1843年2月16日一直持续到乌拉圭人之间在1851年10月8日建立和平为止。 660

结果两个党都对外国干涉感到幻灭，里维拉是因为对他的英法同盟者未能摧毁罗萨斯，奥里韦是因为对罗萨斯容易遭到乌尔基萨领导的叛乱的伤害，而双方都感到幻灭的是对它们各自的同盟者明目张胆地剥削乌拉圭这一事实。在乌尔基萨的推动下，两个敌对的政党在1851年10月言和，并且一致认为谁也不是胜利者，谁也不是失败者。这样，它们参加了反对罗萨斯的叛乱，但是他们是在和比较强大的伙伴特别是巴西的关系方面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参加的。乌拉圭现在和巴西缔结了一个极其不利的条约，让与了领土权利，把关税作了抵押，并且允许自由地（即免税）把牛从乌拉圭运往巴西；对所有这一切的报酬是每月得到一笔津贴，这是乌拉圭国库可以得到的唯一款项。

“大战”使乌拉圭屈服和贫穷了，它的畜牧业和屠宰业被毁坏了，它的政府欠国内和外国大量债务，它的人口下降了。私人财产

减少了，人民群众一贫如洗。整个国家笼罩着巴西的威胁性阴影。从人口而言，战争是一个造成损失的时期，人口缺少大概是乌拉圭以后许多年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人口从1840年的14万人减少到1852年的13.2万人；蒙得维的亚的人口从4万人减少到3.4万人。许多人，特别是外国移民，离弃了乡村而去拉普拉塔河比较繁华的地区或巴西谋求安全和生计，从而留下了一种劳动力的真空，这种真空阻碍了恢复原气。在社会上，虽然土地所有制的结构未变，但是庄园经常易手。许多当地地主被赶到蒙得维的亚去避难；他们的土地于是没人管了或被抢夺了，土地失去了它的牲畜和它的价值，地主们被迫以贱价把土地卖给新来者。在19世纪50年代，巴西人从南里奥格兰德涌进空旷的乌拉圭，买下数以万计的庄园，接着来的是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外国人业已控制了城市领域：1853 年在 2,200 名商人和手工业者中，有1700人即几乎80%是外国人。现在乡下贵族的成份也变了，因为它并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新来的人在权利方面是保险的并且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他们并不积极参加乌拉圭的政治生活。仍然存在的当地庄园主阶级现在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因为已经在乡下控制了 9 年之久的白党现在享有多数，不再发生红党与白党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了。“大战”因此有助于使乡村平静下来。然而农村群众处境艰难。战争加剧了他们的贫穷和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因为有些人被拉去当兵，其他一些人从军队中逃跑了；现在在战后，他们不愿意处于雇工地位，宁愿当牛仔或偷牲口的人来过一种刚够糊口的生活。

661

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同样是严峻的。乌拉圭经济的基础是生产和出口皮革、牛肉干和羊毛。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牲口、交战军队和欧洲舰队对牛的大量消费，加上巴西人从南里奥格兰德大规模袭击庄园上的牛群，这些使乌拉圭的牲畜遭到大批毁灭。牛的头数从1843年的600万头以上减少到1852年的200万头，这些牛中有许多是野牛和未经选种的，不适宜供应出口市场。大屠宰场

缺少牛并且遭到巴西的竞争，后者同他们争夺余下的牛群；1842年经营的24家工厂中在1854年只剩下3、4家了。刚兴起的养羊业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进口牲畜来提高它的羊毛等级，现在已停工了。战争时期增加的唯一的动物是野狗，它们捕食小牛，成为乡下的祸害。

战争使财政付出的代价在和平以后很久还持续下来。国家全部资源都被抵押出去，不是抵押给资助红党事业的资本家就是抵押给法国政府和巴西政府。19世纪50年代，每月从巴西得到的津贴几乎是乌拉圭政府的唯一收入，为此，关税仍在抵押中。巴西变成了非正式的宗主国，乌拉圭变成了一个卫星国，成为经济渗透、财政依赖和政治屈从的受害者。因为乌拉圭不仅遭受津贴的压力，而且还遭受1851年条约的遗留物之害——一支5,000人的巴西军队（直到1855年）和以数以万计的庄园主形式出现的巴西第五纵队，他们的存在使乌拉圭北部几乎成为南里奥格兰德的附属品。在当时阿根廷（它是巴西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传统对手）被一场消耗性内战牵制住的时候，乌拉圭处于丧失它的独立的真正危险之中。

这些年是乌拉圭处于无政府主义、孤立状态和游牧生活的年 662 月，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所指的不安全时期。国家失去资源和基础结构，它太软弱而无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由于国家权威衰落了，个人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并且回复到比较原始的社会所特有的那种个人权威和从属的关系。最粗野的考迪罗主义和依附关系现在盛行了。

乌拉圭在"大战"之后怎样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下来以及它的社会结构怎样聚拢在一起呢？到头来他们的毫无希望的处境迫使庄园主和商人们谋求和平，说服政党结束它们的毁灭性斗争并且让经济发展来代替冲突。从这里产生了联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各政党同意使它们的分歧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建立一个由和平的理想、进步与经济恢复来赋予活力的单一的运动。与联合

的同时还采取一种政策，即在敌对的考迪罗之间签订公约，给农村带来稳定。1855年11月11日，奥里韦同红党领导中最开明的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签订了“联合公约”。因此，尽管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定期发生的革命曾威胁到联合，事实上1852年以后的这段时期是农村相当平静的时期。这就是经济开始恢复时的政治格局，并且它是和这样一种情况同时发生的，即在这10年当中乌拉圭享有外部和平并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欧洲强烈需要畜牧业产品并且出高价购买这些产品。

首先在人口改善方面可以看出这一变化。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852年的132,000人增加到1860年的221,248人。蒙得维的亚的人口从34,000人增加到57,911人。外国人从占人口的21.6%增加到35%；在蒙得维的亚他们占48%。由于国内对进口品需求的增长，商业发展了。蒙得维的亚从内河自由通航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能为力的状态中得到好处，它日益增加它的进出口数量，这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且还为了沿海其余地区和南里奥格兰德。外国航运业增加了；外国企业家（其中包括巴西人毛阿男爵）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并且除其他资产外他们还获得了从战争债务中出现的国家债券；外国控制的银行也建立起来了。

在乡下，养牛业在6年之内（1852—1858年）使牲畜头数增加了一倍，从200万头增加到400万头，在1859—1862年从400万头增加到800万头，而进口的像德拉种的牛（1858年）和赫里福德种的牛（1864年）开始使乌拉圭的牛群提高了质量。羊种也有很大改进，羊的头数从1862年的100万头增加到1860年的300万头。大屠宰场的数目日益增加，它们处理庄园的产品，在1858年屠宰了16万头牛，在1852年屠宰了50万头牛，皮革和牛肉干的出口猛增。在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土地价格上涨了200%以上。但是由于这种原始经济盲目地向前发展，它不久就达到了产品和购买者的不可避免的限度。

663

正如阿根廷也曾发现的那样，皮革和牛肉干市场并不是有活

力的。特别是牛肉干出路有限，它只供应巴西和古巴的奴隶经济，而当生产远远超过需求时，价格就下跌了。这样，国内的和平环境和农村的富足就产生了它们自己的问题，并且使人们注意到经济的限度。当繁荣让位给肖条时，革命所涉及的风险看来并不那么可怕。经济基础是如此狭窄，以至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利害攸关的，而联合和稳定的主要理由已失去了它的力量。只有一个新增加的领域可能有些关系，这种情况将随着养羊业的大发展而在下一个10年（1860—1870年）中到来。同时，由于乌拉圭得来不易的繁荣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于1862年结束了，因此主张联合的人的设想受到挑战，而政治冲突又重新出现了。

乌拉圭国家正如都铎王朝以前的英国一样，比它最强有力的臣民要软弱。1830年的宪法及其总统、部长、国会和公民自由权等只是表面现象。在1860年的选举中，拥有6万居民的蒙得维的亚在公民登记册上只有1,500个名字，而且只有662人参加了选举。这个政府缺乏一个中产阶级的或平民的基础，没有收入，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现代化的基础结构，它是无力抵抗考迪罗们的挑战的，如果这些考迪罗有更多的马、更多的刀剑长矛、也许还有外国付款人提供的更多的金钱的话。只有当国家拥有枪支大炮、一个运输系统、电报、铁路、公路和桥梁时（那就是说大约从1875年开始），只有到那个时候，国家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胜过它的强大的臣民。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没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制裁手段，它所依靠的是，那些拥有可以使一个政府上台也可以使它下台的手段的考迪罗们的善意。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状态结束了，而内战再起。贝尔纳多·F·贝罗总统（1860—1864年）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来保持立宪制。但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进行统治、不理睬地方性的考迪罗主义的派别政治，那是办不到的。同时，他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对付巴西——带来了遭到干涉的危险，这种干涉是他无法抵抗的。

巴西拓居者总数差不多有2万人（这还没有把那些未登记的人 664

计算在内），占全部人口的10—15％，他们占据了乌拉圭领土的30％，并且拥有这个国家最好的牛群。当他们扎下根基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扩散开来的时候，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飞地，其中有2个方面特别使乌拉圭当局感到担心：一个方面是他们的庄园集中在边界地区，另一个方面是这些拓居者倾向于求助他们本国的政府来对付乌拉圭的任何压力。巴西政府有它自己的理由来支持它的移民的事业——在温和地区谋求另外的农业土地，希望控制通往它内地各省的河流交通，以及有必要安插拓居者最接近的同盟者、南里奥格兰德（这是一个具有分离倾向的边界省份）的大老板。而贝罗总统的政府方面试图控制巴西拓居者并且把它自己的法律与秩序强加给边界地区。政府采取了若干积极步骤来维护乌拉圭的主权。它开始让乌拉圭人移民到边界地区，设想有人居住就是进行保卫。它谋求限制巴西庄园使用奴隶劳动力。在乌拉圭，废除奴隶制是缓慢的然而是肯定的，这是一个为时25年的进程（1825—1853年），其中包括废除奴隶买卖、解放奴隶作为服兵役的报酬和逐步颁布解放奴隶的法律。现在政府采取步骤来解放巴西庄园主从南里奥格兰德引进的、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廉价劳动供应品的奴隶和半奴隶。乌拉圭人还拒绝更新1851年的贸易条约，以便对从乌拉圭运往巴西的牛征税从而和大屠宰场竞争。最后，他们对乌拉圭的一切土地和牛群征收较高的直接税并且迫使巴西庄园主分担地主阶级其余成员的捐税负担。里南奥格兰德养牛的大老板和大屠宰场主反对这一运动，因为它打击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在乌拉圭的拓居者中的同盟者和依附者的切身利益。他们要求里约热内卢政府采取行动，以便在乌拉圭产生一个比较听话的政权。巴西1863年支持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的革命部分地就是对贝罗政府奉行的政策的一种回答。

与此同时，乌拉圭还受到阿根廷的压力。贝罗对1861年的阿根廷内战仍然严守中立，尽管他和他的奥里韦派同伙在政治上是“联邦派”，并且更倾向于支持乌尔基萨而不是米特雷。另一方

面，贝南西奥·弗洛雷斯曾在帕翁为米特雷作战并且公开支持他的事业。这样，米特雷和红党就由于过去的联盟和现在的适宜机会而结合在一起。新的阿根廷总统将显然宁愿使乌拉圭出现这样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将是拥护阿根廷统一的同盟者而不是联邦制的朋友。即使阿根廷不能把乌拉圭包括在它的国家改组之内，它至少可以制造一个卫星国式的乌拉圭并且消除一个传染联邦主义的来源。 665

贝罗政府被夹在巴西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阿根廷的具有威胁性的——即使是不肯定的——意图之间，它谋求通过和受到两个巨人威胁的另一个国家巴拉圭缔结联盟的办法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建立一种力量均势，并且他提出签订一项友好通商航运条约以拯救两国的独立。但是巴拉圭直到1864年底才作出积极反应，那时已为时太晚了。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贝罗太老实了。他没有力量来同阿根廷与巴西对抗，他在乌拉圭内部也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基础来抵抗阿根廷与巴西的同盟者、红党的考迪罗贝南西奥·弗洛雷斯。1863年4月19日，贝南西奥·弗洛雷斯从阿根廷入侵乌拉圭。当地的支持并不很大。自由主义的红党并不喜欢帮助考迪罗主义，而贝罗有一个致力于国家利益的非党派政府的记录。但是弗洛雷斯有其他的牌可以打。他得到米特雷总统的支持，阿根廷海军在运输人员和武器越过乌拉圭河方面提供援助，还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情者提供的资金。他还受到南里奥格兰德的边界庄园主的支持，并且希望通过他们得到巴西皇帝的支持。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的革命到1864年已经变成一场更广泛的冲突的插曲。

巴西和阿根廷两国都关心它们的一些较小的邻国当中的事态发展。两国都同巴拉圭有边界纠纷，并且两国都有有关的其他利益。巴西要求保持巴拉圭河的自由通航，以便马托格罗索有安全的出海口。地区性的安全也意味着要有一个顺从的乌拉圭，它的港口与资源对它的邻国来说可能是一件宝贵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

威胁。然而巴西越过乌拉圭的白党政府施加压力，这个政府就越迫切地向其他地方寻求支持。1864年巴拉圭准备作出响应。

为了更积极地干涉乌拉圭，巴西需要阿根廷的善意。米特雷有意提供这种善意，因为他同他的较小的邻国也有分歧。在阿根廷，为了使联合和自由主义取得彻底胜利，人们认为必须挫败巴拉圭的力量，因为它是离心的保守力量的一个具有持久性的、也许还有感染性的范例，这种离心的保守力量对联邦派考迪罗们有吸引力。阿根廷也需要一个稳定、友好和最好是自由主义的乌拉圭，并且谋求通过弗洛雷斯来实现这一点。1864年9月，巴西军队进入乌拉圭支持弗洛雷斯。1865年2月，蒙得维的亚投降了，弗洛雷斯掌了权。他是一个从属但不是一个卫星，只要他既同阿根廷结盟又同巴西结盟他就不是一个卫星，阿根廷和巴西既是盟国又是对手。这是一个三边联盟。至于巴拉圭，它没有盟国，并且它实际上降低到孤立的地位。

666

巴拉圭在独立后恢复到一种接近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它陷在河流系统顶端的一个内陆死胡同里，一方面受到阿根廷的骚扰，另方面受到巴西的骚扰。但是巴拉圭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政策的产物。在这一简单的社会中，国家统治阶级和驯良的农民之间形成两极分化，这个社会受到一连串独裁者的统治，他们强加或继承了一种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隔绝状态。这些独裁者中的第一个人是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他是一个克里奥尔律师和哲学家，1814年国会任命他为任期5年的独裁者，然后在1816年由另一届国会任命他为终身的最高独裁者，此后他在没有国会、没有对手、没有任何种类的报纸，但是有一支保卫他的军队和一个向他提供情报的间谍系统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一直到他在1840年死去时为止。人们是根据他自己的条件接受他的，因为看来他是唯一能够捍卫巴拉圭的独立地位的领导人，并且为实现这一任务，他要求绝对的权力。这一施政传统被

另一个律师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继承下来，他首先作为联合执政官进行统治，然后从1844年起作为独裁者进行统治，一直到1862年他死去时为止。洛佩斯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建立和促进他自己家族的事业和为它捞取好处上面，他把最后的奖赏——继承权——留给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这些专制统治者的比较长期的统治和建立王朝的趋势使得巴拉圭政府差不多成为一个伪装的君主制政体。

弗朗西亚加剧了大自然强加给巴拉圭的偏僻状态，他使巴拉圭处于有控制的虽然不是全部的隔离状态，把它封闭起来，同外部世界隔绝，使之处于一种对付它周围的危险情况的持久的防御态势。他的政策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策作出的反应，布宜诺斯艾利斯拒绝接受巴拉圭的独立或者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叛乱省；布宜诺斯艾利斯谋求封锁河流交通和扼杀巴拉圭的经济，不让它享有它的天然出口——巴拉那河——的自由航行权。巴拉圭遭到的进一步屈辱是，下游的考迪罗们也掠夺巴拉圭的贸易，进行骚扰、没收和征税。为了拯救巴拉圭脱离新的依赖状态，弗朗西亚强施一种隔离性的统治。但是他允许那些可能对国家有用的外国人入境，并且允许在两个河港进行有控制的贸易。他通过皮拉尔对阿根廷并且通过伊塔普河对巴西出口巴拉圭茶、烟草和坚硬木材，进口武器和其他制成品，而国家对整个贸易进行密切监督和征税。在其他方面，巴拉圭将不得不着眼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服从政府的垄断。主要产品是巴拉圭马黛茶和木材，尽管弗朗西亚也鼓励比较多样化的生产，如烟草、食糖和皮革。农民们被指定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棉花，他们必须满足这些定额以便代替进口。国家不只控制私人庄园的活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在它支配下的广阔土地上的生产，这些土地是以前王室的土地、以前耶稣会的土地、从教会和政治反对派那里没收的土地和垦荒的土地。这些公有土地不是出租给农民就是由国家监督人直接管理，后者经常雇用奴隶。大约50处这种"国家庄园"变成有效的生产单位，

667

它们提供出口商品，为军队提供供应产品以及在必要时为穷人提供储备粮食。但是，由于没有巨大的外部刺激，经济是在比停滞水平稍好一些的情况下运行的，生活水准仍然是原始的。

社会呈现一种特别的形式。老的殖民地贵族被弗朗西亚摧毁了。西班牙企业家阶级被捐税、隔离状态和迫害打垮了。剩下的人到庄园主阶级中避难，如果这也算避难的话。没收庄园并且不给出口货以自由出路的作法使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并且使巴拉圭丧失了拥有一个可以和沿海地区其余部分的庄园主阶级相匹敌的庄园主阶级。当这些阶级在1820年策划阴谋企图反击时，弗朗西亚以恐怖统治——处决、监禁和流放——粉碎了他们。统治阶级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下层阶级的上升。实际上，国家和它的少数仆从代替了农村和商业中的传统精英。弗朗西亚并不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的领袖、印第安农民反对有土地的贵族的救世主而掌握权力的。人民群众、温和而驯良的瓜拉尼人——没有组织起 668 来的农民和不关心政治的农民——是弗朗西亚独裁统治的消极的旁观者。他们继续在一种屈从的地位中生活和劳动，同时政府的代理人管理在米西奥内斯的印第安人的劳动问题。奴隶制在弗朗西亚统治时期以后还持续着，而“国家的奴隶”在政府庄园和公共工程中劳动，尽管1842年的法律结束了奴隶买卖并且下令使1842年以后奴隶生下的儿童在年满25岁时获得自由（即获得自由的奴隶）。根据1846年的人口普查，在238,862人的总人口中，17,212人是黑白混血种人（有色种人），其中7,893人是奴隶，523人是获得自由的奴隶。

弗朗西亚的继承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改了他的政策。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他是梅斯蒂索人，长的很肥胖，像牛一样，他脖子上的肉凸出在他的衣领上）使外国人得到一个不良的印象，但是对巴拉圭人来说并不如此。他也是一个独裁者，然而比弗朗西亚仁慈。他也拥有全部权力，然而他利用它释放政治犯，提供最起码的教育，组织一个简单的司法制度并且出版报纸。他也

赞成由国家控制土地和经济，尽管这倾向于意味着由他自己的家族来进行控制。然而，他在两个基本方面背离了弗朗西亚的制度：他结束了巴拉圭的隔离状态，他引进了现代化的初步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他已经既允许少数医生入境又允许若干外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入境。1852年以后，在罗萨斯倒台和开放河流之后，洛佩斯开始大规模进口技术。他转向欧洲特别是英国寻求技术和装备以便使巴拉圭有一个关于工业、运输和武器方面的现代化的基础结构。他派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担任代表团团长去购买陆军和海军的武器并且招募技术顾问。这批人在1853—1854年访问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伦敦，洛佩斯和莱姆豪斯的A·布莱思合伙公司（一家造船和工程公司）签订了关于提供供应产品和人员的合同，而巴拉圭不久就变成他们最好的顾客之一。巴拉圭订购了一艘蒸汽机发动的战舰，购买了装备和武器，雇用了工程师和技师，并且为训练巴拉圭学员作出了安排。一整队签订合同的英国技师连同军事顾问和医生前往巴拉圭，总共大约有200人，其中包括一位有才干的青年工程师威廉·K·怀特黑德，他是南美洲第一个现代化计划的出谋划策人。英国的机器和装备被用来兴建一座能够建造和修理汽轮的造船厂以及一个新码头和一个干船坞；这一工程到1860年完成。1856年，建立了一个能够制造大炮和海军装备的兵工厂。一些工厂、一个炼铁厂、一个电报系统在几年之内都设置起来了。1856年开始修建把亚松森和里卡镇连接起来的铁路，并且创办了用巴拉圭建造的汽轮组成的国家商船队。这整个行动是巴拉圭的决心、英国的精巧技术和瓜拉尼人的劳动的纪念碑。然而它包含一些独特的方面。首先，这一进程并不代表投资资本继续不断的流入巴拉圭。政府直接从国外进行采购，用现金购买装备并且付给人员高工资。这样，它并没有产生"依赖性"，但是同时它缺乏持久性。其次，这些基本上是防务合同而不是从任何长期经济意义上说的现代化工具。虽然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但这纯粹是为了军事目

696

的，不是为了发展。第三，社会结构基本未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拉圭政府进口了一个整个的中等阶级——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教员、商人和手工业者。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人拥有这个国家大约一半的营业执照。但是他们对巴拉圭社会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现代化依靠也谋求实现巴拉圭的地区安全。洛佩斯希望建立比弗朗西亚所允许建立的更广泛的贸易渠道，并且向现代世界打开巴拉圭的大门。他允许贸易顺河而下通往所有国家，如果能说服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沿海地区的考迪罗们让它通过的话。结果是各种各样的。同阿根廷和巴西的边界问题仍未解决。它们仍然是一个摩擦的根源。此外，洛佩斯发现难以对抗罗萨斯，他认为巴拉圭是一个走入歧途的省份，并且限制它使用河流系统。同科连特斯省以及同巴西的联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罗萨斯以封锁作为回答，而洛佩斯在1845年以战争作出反应；但是打这一仗为时过早，因为巴拉圭还没有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只能作为巴西的一个工具来进行战争。正是这些令人屈辱的经验促使洛佩斯要使他的国家现代化。罗萨斯的倒台（在这方面巴拉圭除了和巴西有形式上的联盟以外没有起什么作用），使巴拉圭得以打破隔离状态。阿根廷联邦在1853年宣布了河流自由通航。美国和欧洲国家在1852年至1860年期间同洛佩斯签订了条约，河流系统向外国船只开放了。这种新的贸易并没有给巴拉圭经济带来无条件的解放。它引起了某些商品的竞争，这种竞争损害了迄今由于隔离状态而得到保护的当地生产。在弗朗西亚时期，人们广泛种植棉花供国内消费；但是在1852年以后外国制成品渗入上游地区，当人们能够以每码1角钱的价格购买进口纺织品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以每码7角5分钱的价格购买国内纺织品了。甚至在科连特斯省也出售北美的木材（松木）同当地木材竞争。

670

国会曾授予洛佩斯权利来任命一个临时继承人，他于1862年9月10日去世以前提名他自己的儿子作继承人。世袭的考迪罗

主义——这是南美洲的一个新现象，是政治实验室中巴拉圭的展览品。对于这一继承是无所谓临时性的。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一直是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在他的贫乏和古怪的才能的限度之内，他曾受过掌权的教育，而他的整个人的形成过程就是为了使他成为新巴拉圭的军事领袖。他不仅钦佩英国的技术而且还钦佩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思想，他从访问欧洲回国时怀有伟大的幻想。他梦想建立一个从亚松森进行治理并且由洛佩斯二世统治的南美洲帝国，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和他父亲密切合作来建立一部军事机器和它的工业基地。当他继承政府职务时，他决心把这一新的力量投到国外，使巴拉圭成为拉普拉塔河地区力量均势的捍卫者。弗朗西亚博士的军队曾占去预算的一大部分，但是在亚松森的军队人数不超过1,500人，也许在边界也有这么多的军队。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把常备军增加到2.8万人，并且创造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虽说是粗劣的——军事国家的仿造品。

洛佩斯二世继续执行国家干涉，控制经济和垄断巴拉圭茶及其出口的政策，这同布宜诺斯艾利斯所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形成对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报纸对他进行了嘲笑攻击。他反过来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尖锐的批评，部分地是为了自卫，部分地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他看来，通过仁慈的专制主义，巴拉圭已获得了秩序、物质进步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在阿根廷，新政权正谋求用一个自由主义的模子来重新塑造国家。但是阿根廷的联邦主义者和仍然幸存的原始的考迪罗们把巴拉圭看成是反对中央集权和自由主义革命、维护自治和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因此，两个敌对的模式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争夺霸权，进行了一场选择何种模式——立宪主义还是专制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米特雷还是洛佩斯——的殊死斗争。而双方都害怕被另一方所传染。 671

当洛佩斯准备抵抗阿根廷的自由主义原则和经济控制的挺进

时，他还面临着巴西的影响和力量在南向拉普拉塔河地区扩散的情况。巴拉圭对巴西的政策是政治家才能的一种考验。尽管弗朗西亚博士对付邻国巨人的态度一般说一直是友好的，并且巴西人曾支持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采取的反对罗萨斯的立场，但是两国关系后来恶化了。边界纠纷使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相信，巴西威胁了他的国家的安全，而对自由航行和有争议的边界领土的要求只是更广泛的主动行动的一部分。然而洛佩斯拒绝同巴西或阿根廷就边界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谈判一项解决办法；同时他不愿采取军事上的主动行动，而军事主动行动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然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有更基本的信念：他怀着一种几乎是种族主义的强烈感蔑视巴西人并且他相信阿根廷的国家改组计划将失败。因此他愿意使他父亲所说的上述各点得出其合乎逻辑的结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两者进行战争以保卫巴拉圭的国家利益和传统价值。他认为形势是适宜的。如果他受到联盟的威胁，他也有潜在的同盟者，即阿根廷的农村考迪罗和乌拉圭的白党。他的敌人是团结的吗？对巴拉圭进行战争在阿根廷绝不是得人心的事业。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粗野的权宜之计，其结果将是扩大国家的权力，扩充国民军，并且虽然它能使某些人从向国家提供供应品方面得到好处，但是将把不可忍受的负担加给社会。此外，人们认为巴西是一个讨厌的盟国：许多人谴责说让阿根廷人流血和花阿根廷的钱去支持一个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奴隶国家是最大的蠢事。因此战争造成了分裂。此外，它给予各省的考迪罗一个机会来恢复一个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支持地区性利益的比较原始的阿根廷。然而，拥有军事优势的洛佩斯并没有利用阿根廷内部或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这些分歧的本领，并且他胡乱地浪费了他的本钱。

巴拉圭是阿根廷、巴西和它自己的统治者的牺牲品，尽管是它自己的统治者让他自己充当了侵略者的角色。洛佩斯要求巴西和阿根廷发表一个意图声明一事被置之不理。他然后向巴西发出

最后通谍要它不要入侵乌拉圭。这遭到拒绝。当巴西侵入乌拉圭时，洛佩斯在1864年11月同它断绝关系，在亚松森扣押了一艘巴西轮船，并且侵入马托格罗索。这是许多战略错误中的第一个错误：本来在乌拉圭而不是在巴西自己领土的中心攻击巴西是可行的。1865年1月，洛佩斯要求阿根廷允许它越过米西奥内斯以到达巴西。这一要求被拒绝了，3月份，洛佩斯对阿根廷宣战并且侵入科连特斯省。这使米特雷能够在不使国内发生政治灾难的情况下实现同巴西的联盟。这样，米特雷对洛佩斯宣战，参加了巴西和乌拉圭的弗洛雷斯政府一伙。至于阿根廷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现在无人领导，因为乌尔基萨本人投入了战争并且成为军队的主要供应人之一。三方联盟的公开目的仅仅是确保河流的自由通航和粉碎暴君洛佩斯；而这场战争被说成是为文明和自由而进行的十字军战争。这是宣传。联盟的条约包括一些秘密条款，规定巴西吞并巴拉圭北部有争议的领土，阿根廷吞并巴拉圭东部和西部的地区；以及要把战争进行到彻底摧毁巴拉圭政府为止。基本上这些盟国是决心要消除一个强大的巴拉圭在它们周边地区发挥吸引力的那个焦点。

因此对巴拉圭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无论如何，对两个巨人进行的战争对于基础如此狭窄的一种经济来说势必是削弱性的和一种严峻的考验。洛佩斯需要迅速取得胜利，如果他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大概他将根本无法取胜了。如果他坚守阵地，除了西南部和巴拉圭河战线以外，巴拉圭本来几乎是攻不破的。事实是，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出击和浪费了他的力量。他的舰队在战争初期(1865年6月) 在里亚丘埃洛战役中实际上已被摧毁，而巴西的海军和陆军力量能够顺流而上进入巴拉圭中心地带。局势对巴拉圭人民来说严酷地恶化。他们的供应被联军的封锁切断。他们的武装部队遭到屠杀，其中许多人包括外国顾问是被疯狂的洛佩斯本人屠杀的，他认为他既被敌人又被阴谋家所包围。当洛佩斯在1870年3月1日在塞罗科拉战役中被击毙时，恐怖行动才结

束。

结果对巴拉圭是灾难性的。传统的说法是它损失了100万人，673 这是个毫无根据的神话。事实本身是足够惨痛的。它失去了一半人口，从1864年的406,646人减少到1872年的231,000人。大多数幸存者是老幼妇孺。那么长时期处于隔离状态和完整无缺的国家被撕裂和毁坏了。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尽管巴拉圭终于取得了作为拉普拉塔河地区其他部分的典型的、次等形式的、以出口为方向的经济发展，但是到头来它未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现代化进程是它自己开创的，现在却被阿根廷和乌拉圭垄断了。在领土方面巴拉圭也受到损失，尽管阿根廷和巴西的敌对状态使它未遭到更坏的肢解。它被迫把巴拉圭河东北部的领土赠送给巴西；把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之间的米西奥内斯领土和更往西的其他土地割让给阿根廷。在政治上，这个国家瓦解了。大独裁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东西来填补这个真空；流亡的反对派回国了，而巴拉圭开始了一个政变时期，更换考迪罗和改变行不通的体制。因此巴拉圭模式的发展是对人们的努力、金钱和生命的彻头彻尾的浪费。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它证明了在南美洲创造一个普鲁士是不可能的。

拉普拉塔河地区其他国家避免了战争的最坏的结果。对乌拉圭来说，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确，在政治上前景不是有希望的。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的战时政府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它是结束了联合和使红党垄断权力的独裁政权，从而不可避免地激起白党和其他派别的挑战。乌拉圭分裂为敌对阵营，而弗洛雷斯和贝雷两人都在同一天——1868年2月19日——被暗杀。中央政府垮了，乌拉圭孤立无援地滑入动乱和考迪罗主义，而经济和社会享有它们自己的自治并且经历了巨大转变。但是，虽然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自动地阻止经济发展，而经济上的变化也没有立即恢复政治平衡。事实上在1860—1868年

的发展与1875 年的迟迟到来的稳定之间存在着一段长时期的时差。

乌拉圭的人口从1860年的22.1万人增加到1868 年的38.5万人。蒙得维的亚的人口增加得更快一些，从5.8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在1860—1868年这些年中，大约有5万移民来到乌拉圭，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商业的扩大、建筑业的繁荣、远洋轮船的增加以及沿海与内河航运的活跃——这一切都使蒙得维的亚成为一个发展中心和移民的焦点。外国人在1860年占人口总数的48%，到1868年增加到60%。同时，在乡下，日益发展的养羊业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拓居者。新的人口刺激了进出口行业。进口从1860年的820万比索增加到1870年的1500万比索；出口从1860年的540万比索增加到1870年的1200万比索。蒙得维的亚的商业也受到一种新产品——羊毛——的刺激，拥有仓库的业主从农村生产者那里购买羊毛并把它们出口到欧洲。这个港口在巴拉圭战争期间是盟国军队的供应基地，此后它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货物集散地，它的主张自由贸易的政权鼓励过境贸易并且使它能够作为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分配中心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匹敌。 674

羊毛生产发生了巨大而突然的转变。在1860年至1868年期间，羊的数目从300万头增加到1,600万至1,700万头。刺激力量部分来自国内：乌拉圭养羊业具有有利环境；由于牛肉干价格稳步下降，人们从养牛转向养羊；中等规模的农场增加，而对这种农场来说羊是比较划算的投资；以及外国移民作为养羊人和改进羊种的人所发挥的影响。外部刺激力量是下面这些情况提供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纺织业提出强烈的需求，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从棉花方面提出竞争。养羊，特别是饲养改进了品种的羊，不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还需要一种定居的劳动力和不受考迪罗主义和革命影响的劳动力。而养羊业使至少是较小的地产和农场——如果说不是农村中产阶级的话——出现了，因为移民们可以在这一行业比养牛（像在阿根廷那样）更容易取得进展。这样，

养羊业就使农村社会结构多样化了，并且引进了不同于养牛的大牧场的另一种选择办法。1862年，羊毛在总出口额中占10.6%，皮革占32.9%，牛肉干占11.5%。1872年，羊毛占24.4%。

乌拉圭这时有三种基本产品：羊毛、皮革和牛肉干，市场也是多样化的：皮革主要运往英国和美国，牛肉干运往巴西和古巴，羊毛运往法国和比利时。如果说它是一种依赖性经济的话，它不是依赖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这种多样化是乌拉圭未来的繁荣的关键。经济环境是有利的，足以吸引外国资本。在此之前，675 巴西金融家毛阿男爵（他在1857年成立了毛阿银行）的影响一直居支配地位。现在，英国资本进来了。1863年底，伦敦与拉普拉塔河银行的分行在蒙得维的亚开业。1861年至1865年期间，英国和德国资本在弗赖本托斯成立了利比希的肉汁公司，这是外国对肉制品工业的第一笔投资，它从牛的生产过剩、低廉的价格和廉价的劳动力中获得好处，通过生产一种欧洲市场可以接受的肉汁（至少为它们的军队）来为有限的巴西和古巴的口岸提供另一个出口。1864—1865年，英国资本开始把钱借给这个国家，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企业进入铁路系统并且把它们接管了。

这种趋势由于1868年的危机和1870年的内战而暂时停止了。1869—1870年的大旱灾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这次大旱灾造成牲畜和羊群猛烈地大批死亡。但是若干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例如金融不稳定，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进口增加是由于人口增长和上层阶级阔绰的消费的增加所促成的，而出口则受到国际价格下跌和庄园生产下降的打击，这些庄园还不能应付农业改良和现代化的局面。1870年，乌拉圭进口了价值1,500万比索的货物，而出口仅为1,200万比索。1864年至1869年期间，进口超过出口1,800万比索。到1875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乌拉圭这时已作好准备进入现代化和发展的阶段。在事物有希望改善的情况下，商人和庄园主需要和平和强有力的施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一支国民军的时刻正在来临。

阿根廷在三个方面是同乌拉圭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它起步较早，它的规模较大，它的政治基础比较巩固。在阿根廷，从旧到新的过渡同样是以危机作为陪伴的。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巴拉圭战争是同金融不稳定和欧洲的危机同时发生的，从而使阿根廷经济出了毛病。牛类产品和羊毛出口的市场萎缩而且生产下降了；甚至养羊业也发生了衰退。危机的国内原因在于土地，因为在长有适于养羊的牧草的比较有限的地区饲养的牲畜过多了。牲畜头数过多是同严重旱灾同时发生的，旱灾对拥有牛羊的业主是进一步的挫折。国家的政策并没有帮助。1864年11月的法律下令出售在边界以内可以利用的一切公共土地，但它订的价格太高并且加剧了农村危机。因此，在扩张和渴望得到土地的时期之后发生了衰退。 676

经济恢复是迅速的，但是这一经验使人们重新估价阿根廷的问题与前景。忧心忡忡的庄园主开始谈论有必要使农业生产多样化，使方法现代化，并且进行更大的资本投资。人们也谈论把农业和畜牧业合并，把城市资本投入农村领域，合并新土地，建立示范农场。这种革新思想是一批庄园主的特征，他们在1866年成立了阿根廷农村协会作为一个进行辩论和发展的工具。一种保护主义情绪在增长。这个协会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虽然是流产了的——计划就是要建立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纺织厂，希望利用阿根廷自己的原料和使它免除对外国市场和外国进口品的依赖而发展国家的纺织工业。农村劳动力、它的困境和它的供应变成人们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把雇工的不安全状况、贫困和低下的地位归因于罗萨斯和他的军事压榨，但是在1852年后并没有什么改善的迹象，而巴拉圭战争的需求成为大草原的新的灾难。迫切需要更多的人，这种必要性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大量移民是作为填充荒漠的一种动力开始的，结果是以城市膨胀而告终。阿根廷已经到了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



第 四 篇

独立后的巴西



第 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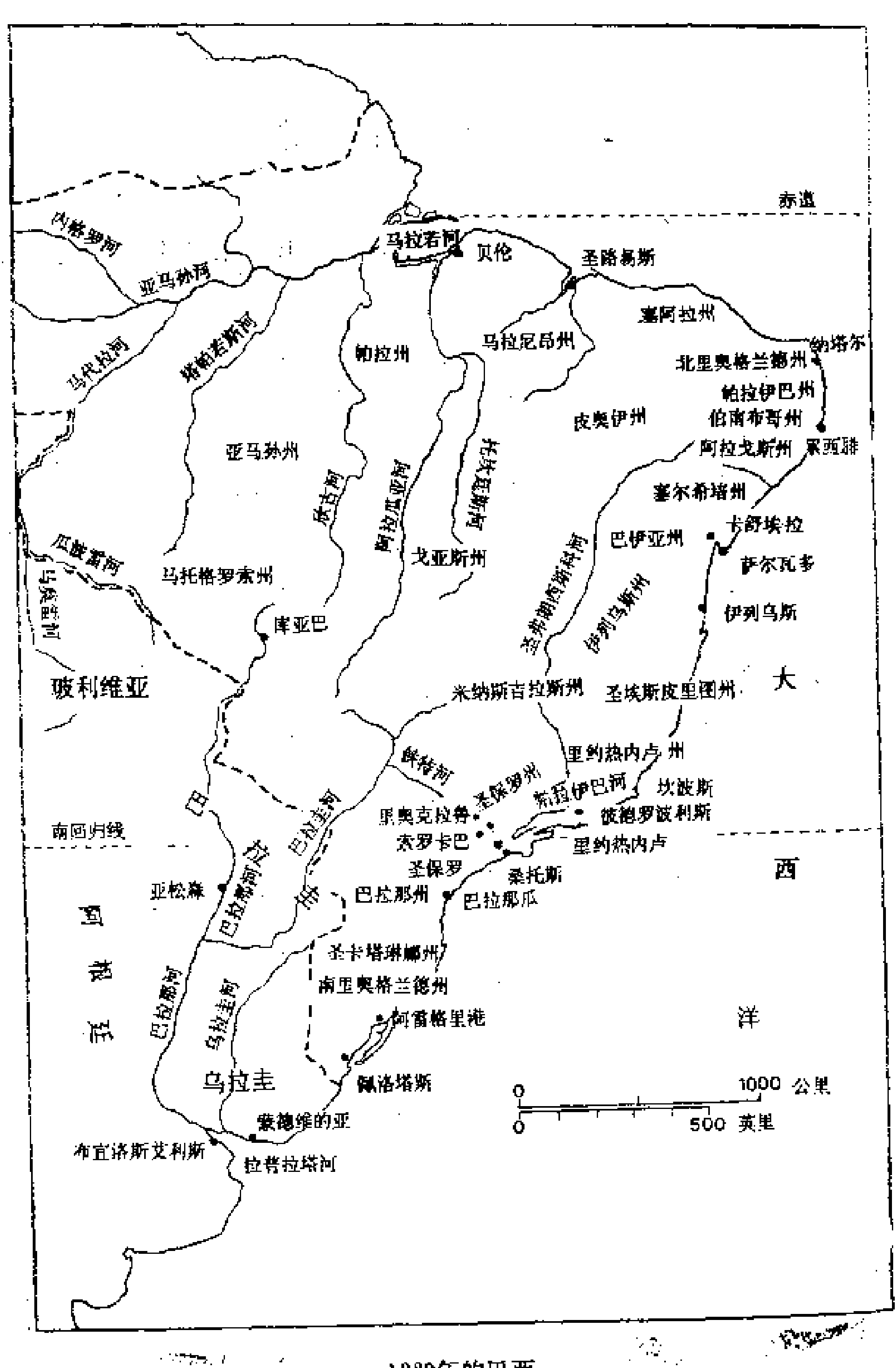
自独立至19世纪中叶的巴西

巴西1822年脱离葡萄牙独立时，有四、五百万人口(包括80万巴西印第安人)。这样少的人口分散在300 多万平方英里辽阔的土地上，但是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从东北部各省至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南部距大西洋海岸不足200英里的地区内(东北各省占全部人口的40%—45%)。人口较多的唯一内地省份是米纳斯吉拉斯，那里曾是18世纪前半叶淘金热的中心，迄今〔19世纪中叶〕这个省的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20%，大部分人居住在与里约热内卢省毗邻的南部地区。有些内地省份：象马托格罗索，居民不到4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全国最大城市是首都里约热内卢，约有10万居民，第二大城市、前首都萨尔瓦多(巴伊亚省)，有居民6万人，有一半省份的省会都不足1万人。公共卫生条件极差，平均寿命很短。普通教育水平也很低。在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中，教育从未占优先位置。到1872年(这一年官方第一次公布统计数字)，在自由居民中仅有1/5的人识字。

1822年，白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黑人或穆拉托人，奴隶至少占30%。据最恰当的估计，1823 年奴隶总数是1,147,515人。① 3/4的奴隶集中在18个省中的5 个省——马拉尼昂、伯南布哥、巴伊亚、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在这5个省的许多地区，奴隶构成人口的多数。横渡大西洋的非洲奴隶贸

---

① 《帝国统计史料》，日期与作者不详，发表于《巴西历史与地理学院杂志》第58卷第1期(1859)，第91—99页。根据这个资料来源人口总数是3,960,866人。



赤道
内格罗河
亚马孙河
马拉若河
贝伦
圣路易斯
塞阿拉州
纳塔尔
北里奥格兰德州
帕拉伊巴州
伯南布哥州
累西腓
阿拉戈斯州
塞尔希培州
马代拉河
塔帕若斯河
帕拉州
马拉尼昂州
皮奥伊州
亚马孙州
欣古河
阿拉瓜亚河
托坎廷斯河
卡舒埃拉
萨尔瓦多
巴伊亚州
戈亚斯州
圣弗朗西斯科河
伊列乌斯
伊列乌斯州
马托格罗索州
库亚巴
瓜波雷河
玻利维亚
米纳斯吉拉斯州
圣埃斯皮里图州
大
里约热内卢州
坎波斯
帕拉伊巴河
圣保罗州
波德罗波利斯
里约热内卢
南回归线
亚松森
巴拉圭河
巴拉那河
桑托斯
巴拉那州
巴拉那瓜
圣卡塔琳娜州
南里奥格兰德州
阿雷格里港
阿根廷
西
乌拉圭河
洋
乌拉圭
佩洛塔斯
蒙德维的亚
布宜洛斯艾利斯
拉普拉塔河
1000 公里
500 英里

1830年的巴西

易不仅在经济发展时期可以满足巴西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也是补充现有奴隶所必不可少，因为奴隶本身的繁殖率极低。每年运进巴西的奴隶从19世纪初的1.5—2万人上升到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3万人。

在巴西农村，到处都有奴隶在劳动。他们饲养牲畜，生产谷物，种植供当地消费的主要产品和自己生活所需的农作物。米纳斯吉拉斯省自18世纪中叶淘金热结束后，经济上主要经营养牛场和小农场，奴隶人口为各省之冠，1819年有17万人。在里约热内卢城，在萨尔瓦多和累西腓，在从北部的贝伦和圣路易斯到南部的阿雷格里港和佩洛塔斯，奴隶也被普遍当作家庭仆役使用。城市中的男性奴隶什么都干，如码头上装卸和搬运货物，担水和清除垃圾，充当轿夫、石匠和木匠，从事卖淫，甚至沦为乞丐。宗教团体和医院也拥有奴隶；政府拥有或雇用奴隶来建造和维修公共工程。在1830年宣布向巴西贩运非洲奴隶为非法并第一次认真取缔奴隶贸易以前，到处可以买到奴隶，价钱也便宜。巴西有“敞开的边界，”有的是无穷无尽的免费或廉价的土地，但劳动力短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奴隶制在巴西是如此重要，成为农村和城市的一个特点。但是和美洲所有的奴隶社会一样，巴西的大多数奴隶也集中在种植单一农作物的、以出口为目的的种植园里（大农场）。

到17世纪中叶，巴西已丧失它的差不多垄断世界食糖供应的地位，但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甘蔗始终是巴西的主要经济作物。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给巴西的甘蔗种植业以新的推动，不仅推动了东北部伯南布哥的马塔地区和巴伊亚的雷孔卡沃地区（那里自16世纪30年代起一直产糖），而且也推动了里约热内卢省的坎波斯地区和圣保罗省的甘蔗种植业。独立时，食糖占巴西出口收入的40％。棉花居出口收入的第2位，占20％（主要种植地区在马拉尼昂，伯南布哥次之），尽管巴西在英国原棉进口中所占比重现在呈下降趋势。从里约热内卢省出口的咖啡从

681

792年的160阿罗瓦* 增加到1817年的318,032阿罗瓦和1820年的539,000阿罗瓦，差不多构成巴西出口价值的另一个20%。其余出口产品主要是皮张、烟叶和可可。

自从1808年葡萄牙宫廷到达并开放巴西各港口以来，进出口一直掌握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另外除葡萄牙商人外，也有法国、德国和美国商人。现在英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给予本国殖民地特别优惠的制度，有效地把巴西的糖和咖啡(但不包括棉花)排除在英国市场之外。尽管如此，英国商人还是把一大部分巴西农产品运往欧洲市场。同时英国将大量制成品输往巴西，特别是棉织品、毛织品、亚麻布和金属制品。葡萄牙商人则以经营外国货物的零售业和巴西货物的对内贸易为主。由此可见，巴西经济的生产几乎完全掌握在巴西人手中，而商业则由外国人控制。

在经营出口农业的地区——东北部、里约热内卢省、圣保罗省的部分地区——已经产生以种植园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寡头，尤其是在较老的出口中心，象伯南布哥的马塔、巴伊亚的雷孔卡沃以及马拉尼昂的圣路易斯河谷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由主人和奴隶组成的典型社会。其他地方的社会则比较复杂，因为巴西的自由居民人口比奴隶人口多一倍，而自由居民中的种植园主或畜牧庄园主(estancieiros)毕竟只是少数。在辽阔的东北部内地养牛地区，自米纳斯吉拉斯北部至马拉尼昂南部、南里奥格朗德、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以及整个巴西种植园地带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有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牛场主，佃农和公地上不同独立程度的定居者。在米纳斯吉拉斯有大量奴隶，但他们并不象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集中在种植园里；到1823年，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已经与奴隶一样多。在塞阿拉和皮奥伊等北部省份，(和南部的圣卡塔琳娜一样)，奴隶人口尚不及10%。在帕拉，

682

* 阿罗瓦(Arroba)，葡萄牙重量单位，约等于14.7公斤。——译者

奴隶占人口的30%，但是印第安居民的人数也很多，而且没有地位巩固的地主或商人阶级。城市里的社会分层当然更复杂。在高级官员、大商人和资本家与奴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小商人、下级官员、手工业者、职员和雇工。城市奴隶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

巴西中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圣埃斯皮里图、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圣卡塔琳娜、南里奥格朗德)自18世纪上半叶的黄金繁荣以来经济上多少已联结起来。18世纪最后10年和19世纪头30年期间里约热内卢港口的发展和这个地区蔗糖及咖啡生产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里约热内卢与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部各省的经济联系。米纳斯吉拉斯向里约热内卢市场供应肉类、豆类和奶制品。南里奥格朗德出口小麦和腌肉供奴隶和贫困的自由民食用。从南里奥格朗德经过圣保罗著名的索罗卡巴集市向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贩运骡和牛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巴伊亚及其卫星区塞尔希培、伯南布哥及其邻省阿拉戈斯、帕拉伊巴、北里奥格朗德和塞阿拉以及北部各省(马拉尼昂、皮奥伊和帕拉,包括今天的亚马孙州)多半彼此隔绝，与中南部也不来往。它们有自己的综合出口贸易和自给自足经济。但是它们有地区之间的贸易，并非完全互不交往。例如，巴伊亚与中南部有牛的贸易，南里奥格朗德与北边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有腌肉贸易。但是陆路交通只有原始的道路和牲口走的小道，旅行极为危险。各省之间的交通大部分经由海上和一些主要河流，如连接米纳斯吉拉斯与东北部的圣弗朗西斯科河。穿越北部雨林的亚马孙河和位于西南边界的巴拉那河。在使用蒸汽船以前，从马拉尼昂到里斯本反而比到里约热内卢花的时间少。遇到顺风,从累西腓走海路到里约热内卢只需3个星期。

1822年的巴西在经济上不统一，也不存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从葡萄牙殖民地向独立帝国过渡时期所保持的是政治上的统一，然而并不牢固。10年以后，推动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的各种力量 683

的联盟终于破裂，政治统一受到严重威胁。

巴西在1822年实现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一个葡萄牙王子愿意担任独立运动的领袖——这是保证向独立、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国家统一顺利过渡的决定性因素。① 与此同时，许多巴西政界领导人对这位皇帝许诺拥护宪政的诚意深表怀疑，更令人怀疑的是，他是否真有断绝与前殖民帝国一切家族和王朝联系的决心。这两方面的怀疑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是互相联系，彼此增强的，因为巴西的上层人士和普通百姓很容易地会从佩德罗一世的专制思想联想到他可能会保护葡萄牙在巴西剩下的利益，甚至担心巴西重新沦为殖民地。佩德罗一世在位时期是一个不断出现政治紧张与冲突的时期，最终导致他在1831年4月逊位。

制宪会议是巴西政界上层人士与佩德罗一世发生第一次冲突的场合，离宣布独立还不到一年，但应该记住，当时葡萄牙军队尚未从巴伊亚、巴西北部和锡斯普拉蒂内省撤走。制宪会议最初是在1822年6月3日由摄政王召开的，但直到1823年5月3日才正式举行。会上关于未来巴西新国家的组织形式争论得很热烈，有时甚至非常激烈。虽然许多最直言不讳地反对1822年安排的人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若阿金·贡萨尔维斯·莱多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皮里亚诺·巴拉塔被监禁，直到佩德罗一世逊位前不久才获释)，但是自由派中的"温和派"和"极端派"都想限制这位年轻皇帝的权力，尤其是他可以否决法规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巴西独立运动的元老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他在独立后继续担任唐·佩德罗的顾问和首相)，有一段时间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站在皇帝一边。与此同时，他也试图阻止唐·佩德罗完全倒向"葡萄牙帮"。当时专制制度显然已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复辟，那里的自由主义试验已于1823年

① 关于巴西的独立，见贝瑟尔著《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4章。

5月告终。因此，若泽·博尼法西奥于1823年7月16日辞职，是巴西独立后不久出现的政治上两极分化的一个重大事件。 648

1823年下半年，制宪会议和新闻界反对皇帝日趋激烈。最后，1823年11月12日制宪会议被强制解散，若泽·博尼法西奥和他的两个更自由主义的兄弟、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德·安德拉达·马查多-席尔瓦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里贝罗·德·安德拉达等人皆被逮捕并流放到法国。① 唐·佩德罗立即亲自成立一个国务委员会，它很快起草了一部宪法。宪法规定成立参议院（50名成员）和众议院（100名成员）。参议员由皇帝从各省的三份当选人名单中挑选，终身任职。众议员则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先由选民选出选举人，然后由选举人投票选出众议员，任期4年。选举权受到一定限制。选民每年的财产或就业净收入不得少于100米尔雷斯*（在1830年约合10英镑；选举人的年收入不得少于200米尔雷斯。众议员须有400米尔雷斯年收入，参议员须有800米尔雷斯。宪法确认了国务委员会的合法性，10名国务委员由皇帝挑选，也是终身任职。皇帝对法规有否决权。各部大臣和最高法院法官都由皇帝提名，大臣向他负责。根据邦雅曼·贡斯当的“皇权论”，他有帮助解决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之间的纠纷的“调处权”，这项权力使他能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此外，政权高度集中：由皇帝任命省长；省政委员会和市政会委员由选举产生（省政委员会间接选举，市政委员会直接选举），但权力有限。省政委员会的决定须经众议院批准。最后，宪法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有权任命主教和分配教会的有俸圣职。

1823年11月强制解散制宪会议1824年3月颁布新宪法，使唐

① 若泽·博尼法西奥1829年7月回到巴西，先是代表巴伊亚任众议员，佩德罗一世逊位后担任年轻的唐·佩德罗的教师，但于1833年被捕，监禁在瓜纳巴拉湾的帕克塔岛、1838年死于尼泰罗伊。

* 米尔雷斯（milreis），巴西货币单位等于1,000里阿尔。——译者

685 ·佩德罗不但与独立运动的发祥地中南部，而且也与东北部的巴西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的蜜月时期猝然终止。当解散制宪会议的消息于1823年12月12日传到巴伊亚时，发生了反葡萄牙人的骚乱，而且威胁要脱离巴西独立。然后，1824年3月在伯南布哥爆发由激进教士弗雷·卡内卡和曼努埃尔·卡瓦略·帕埃斯·德·安德拉德领导的武装叛乱。叛乱得到北里奥格朗德、帕拉伊巴和塞阿拉等省的支持，赢得了整个东北部地区（包括巴伊亚）的同情，并导致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赤道联邦。卡内卡教士认为，唐·佩德罗一世的宪法没有“明确地、肯定地划定帝国领土的范围，因此留下了将来期望与葡萄牙合并的可能性”；“这部宪法不是自由主义的，它与自由、独立和巴西权利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向我们提出宪法的是一个没有权力这样做的人”；参议院将成为“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和人民的压迫者”；调处权是“一项马基雅弗利式* 的发明，是压迫巴西民族和有效地扼杀人民自由的重要手段”；最后，这部宪法的中央集权制对巴西的政治自由特别有害，因为它剥夺各省的自治权，使它们彼此分隔，每个省完全从属于中央行政机关，服从“亚洲式专制制度”① 1824年叛乱发动6个月后被帝国军队镇压下去。叛乱者受到由不符合宪法规定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的严厉惩处。这样做扩大了皇帝和自由主义反对派（温和的和激进的）之间的鸿沟。弗雷·卡内卡本人，象整个东北部的其它许多人和里约热内卢的一些人一样，为他的信念付出了生命，1825年1月13日在累西腓被行刑队处决。

佩德罗一世除了他的专制统治手段和丑恶的私生活外（在他的妻子利奥波迪纳于1826年12月去世前后，他的情妇桑托斯侯爵夫人多米蒂拉·德·卡斯特罗·坎托经常露面），他同里约热内卢

---

*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利用权术，不择手段。——译者

① 弗雷·卡内卡著《政治论文》（里约热内卢，1976），第67—75页。

的葡萄牙人社会（包括1808年随同宫廷来到里约热内卢、同当地地主和商人家族通了婚、得到了财产并于1821年决定留下来的葡萄牙官员和葡萄牙商人）以及“葡萄牙人”内阁成员的密切交往日益引起关注。特别令人憎恨的是他的葡萄牙朋友们的“秘密内阁”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中间有他的声名狼藉的酒友弄臣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席尔瓦。50％的大臣是文武官僚，而且在第一王朝期间，与商业活动有联系的大臣比帝国时期的任何时候都多，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①

686

就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问题进行的谈判增强了一种看法，认为唐·佩德罗对葡王朝的关心超过了巴西的国家利益。根据英国派往巴西的特别代表团团长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代表葡萄牙在1825年8月29日签订的条约，巴西同意付给葡萄牙200万英镑赔偿金，其中140万英镑指定用于偿还1823年葡萄牙在伦敦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券是当时用于开展重新统治巴西活动的。而且，条约故意为继承问题留下了后路。佩德罗一世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葡萄牙王位的权利，这一点使许多巴西人怀疑皇帝家族之间私下进行了交易，他们担心唐·若昂死后，唐·佩德罗将成为葡萄牙国王，巴西与葡萄牙自动地重新统一，巴西可能降低到原来的殖民地地位。②

巴西不得不为英国帮助它及时获得葡萄牙和国际上的承认付

---

① 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著《建立秩序：帝国的政治上层人士》（里约热内卢，1980）第87页。

② 若昂六世于1826年3月逝世。唐·佩德罗确实卷了入葡萄牙王位继承问题。5月2日，他勉强同意将葡萄牙王位让给他年仅7岁的女儿。玛丽亚·达·格洛里亚嫁给他的叔叔、佩德罗一世的兄弟唐·米格尔。米格尔受命担任摄政。1828年，米格尔解散议会，重新建立专制政府，本人任国王，当时佩德罗一心想维护他的女儿对葡萄牙王位的权利。同年玛丽亚·达·格洛里亚回到巴西与父亲团聚。1831年4月唐·佩德罗在巴西逊位后，与女儿一起回到葡萄牙。唐·佩德罗在1834年9月去世前不久达到了他的目的。

出代价，但是许多人猛烈批评唐·佩德罗付出的代价太高，尽管他在这件事上的选择余地很少。尤其是，巴西承担了明确的义务（虽无文字规定），它应在奴隶贸易问题上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自1822年以来，所有的外交谈判中都包含一个交易：以废除奴隶贸易换取承认。总之，一旦巴西与葡萄牙正式分离，向巴西提供奴隶的大部份贩卖活动即成为非法，至少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是这样争辩的。因为葡萄牙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规定，它必须停止从非洲向大西洋彼岸的非葡属地区贩运奴隶。（当时赤道以南的葡属非洲领地，主要是安哥拉，运入巴西市场的奴隶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英国千方百计——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迫使葡萄牙签订了这项条约。）英国先是由斯图尔特，继而由英国驻里约热内卢公使罗伯特·戈登（唐·佩德罗称他为“那个态度恶劣顽固的苏格兰人”）同巴西进行了多次棘手的谈判，最后终于在1826年11月23日签订条约，规定在条约批准3年后，整个巴西的奴隶贸易成为非法。（皇帝很快在一艘驶离里约热内卢港开往南里奥格朗德的巴西战舰上签了字，英国亦于1827年3月13日批准。）

坎宁努力使三年内废除奴隶贸易显得好象是巴西独立的必然结果，巴西没有其他选择，唯有接受葡萄牙签订的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一项明确的条约义务，不是……我方的要求和地方〔皇帝〕的无条件投降”，但是大多数巴西人认为这个条约是在一个强大的外国坚持下，巴西国家利益的一次重大牺牲。罗伯特·戈登毫不怀疑这个条约是“在我方要求下取得的让步，与整个帝国的看法和愿望相悖”，“极不得人心”。① 而且是英国说服了皇帝，要他不予考虑众议院的意见。众议院曾在1836年5月首次召开会议，讨论两个逐步废除奴隶贸易的议案：一个议案由若泽·克莱门特·佩雷拉（里约热内卢）提出建议到1840年12月31日废除；另

① 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剑桥，1970），第54—55、62页。

一个由尼科劳·佩雷拉·德·坎波斯·维尔格罗(圣保罗)提出主张6年以后废除。1827年5月众议院再次开会时，废除奴隶贸易已是既成事实，但议员们(甚至那些思想开明的议员)都认为这对商业、航运和政府收入，尤其对巴西农业，只能是一场灾难。在巴西能大量招募自由的欧洲移民(若泽、博尼法西奥称他们为“贫困的、不幸的、勤劳的欧洲人”)以前，巴西的农业，特别是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找不到能代替奴隶的劳动力。1808年后，曾多次试图招募欧洲移民，主要是日耳曼人和瑞士人，结果令人失望，而且战略和军事上的考虑仍比经济上的考虑更为重要。在1823年和1830年之间，大约有1万名欧洲人抵达巴西，其中，6千多人到达南部边界省南里奥格朗德。

许多巴西人认为唐·佩德罗的日益增多的失败纪录上，还应加上不得人心的、花钱很多而最终并不成功的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政策。东岸(东班达)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一百多年冲突的根源，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反对阿蒂加斯的斗争中，1817年被葡萄牙军队占领，1821年并入巴西，改称锡斯普拉蒂内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继承了西班牙对这块领土的要求，决心重新把它夺回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会利用发生拉瓦列哈领导的叛乱的机会(这次叛乱至少在蒙得维的亚以外赢得广泛支持)，于1825年10月25日宣布东岸并入拉普拉塔联合省。这无异于向巴西宣战。6个星期后，巴西皇帝被迫作出反应。这次战争对巴西来说是灾难性的；帝国部队一再败北。海上的战争引人瞩目，因为双方的舰队都由一名英国指挥官指挥作战——海军上将布朗在阿根廷一边，海军上将诺顿在巴西一边——水兵也大多是英国人。最终，主要作为英国外交斡旋的结果，1828年10月阿根廷和巴西双方承认东岸为一个独立的缓冲国——乌拉圭。 688

战争耗资巨大，给本来已经紧张的国家财政增加了额外负担。战争还导致大量征兵，这可能是巴西政府在19世纪最招怨恨的措施。事实上，征兵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致皇帝决定雇用外国部队

以补充国内征兵之不足。这个决定证明是灾难性的，它不但未能阻止战争的失败，而且招致1828年6月数千名爱尔兰和德国雇佣军在里约热内卢哗变。这座城市被雇佣军控制了两天，政府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请求英、法海军部队援助。战争的最后一个消极后果是破坏了南里奥格朗德向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供应骡和牛的交易。20年代最后几年，骡和牛的价格急剧上升，对这3个省的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① 对南里奥格朗德的牧场主来说，由于为战争出力未能得到适当的报酬，也感到不满。这一点为他们在1835年发动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增加了一条理由。

689

但是如果以为唐·佩德罗除了"葡萄牙帮"那个狭小的圈子以外再没有其他支持者，那也是错误的。君主政体对群众有很大吸引力，大多数上层人士仍把它看做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同时，佩德罗一世是布拉干萨王朝能够统治巴西的唯一成员。他作为独立运动的英雄依然能赢得某些好感。不存在整个国家的上层人士已经转而反对皇帝的情况。不少人当上了大臣、参议员、国务委员，有些人获得了尊贵的称号。在1825—1826这两年，佩德罗授予104个贵族头衔(大多是男爵和子爵)，占第一王朝时期所授全部头衔的2/3以上。② 在拥护佩德罗的巴西人中，有的是顽固的专制派；许多人不愿意反对他，是因为担心君主制度本身会因此受到威胁。但是毋庸置疑，在20年代的最后几年，唐·佩德罗同他的臣民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的主要集团以及里约热内卢的一部分人对最高权力的离心离德，与群众对葡萄牙人的憎恨和军队的不满结合在一起，终于迫使他

① 骡子和牛经过圣保罗省索罗卡巴集市的数量从1822年的30,474头下降到1829年的21,817头，骡子的价格从1820年的每头14美元涨到1829年的60美元。马里亚·特里萨·肖勒·佩特罗内著《伊瓜佩男爵》(圣保罗，1976)，第21—28页。(14美元和60美元系揣译，原文印刷有误。——译者)

② R、J.巴曼著《新大陆的贵族：爵位在巴西帝国的作用》，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1974)，第43页。

下台。

经济和财政困难也起了作用。诚然，里约热内卢的咖啡出口在1822—1831年期间增长了两倍多，但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棉花、皮张、可可、烟叶和咖啡——的价格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不断下跌。糖的价格有1.7％的微小上升（它仍占巴西出口额的30％至40％），但无补于大局。① 1827年8月签订的英巴商务条约——偿付在独立时期英国人提供服务的第2张账单——确认了1810年授与英国的所有贸易特权，包括对英国进口货征服的关税税率最高不超过15％和英国人有权在涉及巴西英国商人的审判中指定法律辩护人，但是英国不提供互惠。为了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英国对巴西的食糖和咖啡分别征服180％和300％的从价税。

对英国货物按价征收的关税不超过15％的限制（1828年扩大到所有国家的进口货），除妨碍巴西制造业的发展外，还使财政收入受到限制，加重了巴西政府的财政困难。独立两年后，巴西第一次在伦敦发行300万英镑债券，用以支付给葡萄牙的赔偿金。随后又在1829年第2次发行40万英镑债券，用以支付第一次债券的利息。发行第一次债券时商妥实付80％，第2次仅52％。这清楚地说明，在英国商业银行家眼中，这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很低。唐·若昂1808年创建的巴西银行，自1821年国王在返回葡萄牙以前全部抽走它的金属货币和王室珠宝后，一直处于困境。唐·佩德罗采取发行大量铜币的政策，助长了通货膨胀，也为普遍伪造钱币开辟了道路。从1822至1829年，货币供应量每年增加10％，提高了生活费用，尤其是主要城市的生活费用。伪造铜币的扰乱，特别是在巴伊亚省，给货币市场造成混乱，迫使政府在1827年试行以纸币替代硬币。但不论是巴西银行的纸币还是国库债券在里约热内卢以外都不太受欢迎，须打折扣。1829年在圣保罗的折扣

690

① 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莱斯和威尔逊·苏齐等著《巴西货币史：货币政策、行为、制度分析》（里约热内卢，1976），第51页。

率达43%。[1]巴西银行最终于1829年停业。1822至1830年期间，米尔雷斯对英镑的兑换率差不多每年下跌8%。货币贬值虽对出口有利，但引起进口货价格上涨[2]。

城市群众的不满给巴西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爆炸性因素。独立带来了改善生活的期望，不管这种期望是多么渺茫。当期望不能实现而生活条件反而进一步恶化时，失望情绪高涨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失望最容易在葡萄牙人尤其是那些控制商业的葡萄牙人中找到发泄的目标。皇帝也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因为看来他和以前的同胞尚未割断联系。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沿海城市，人们一再要求驱逐葡萄牙人。

691 从反对转变为公开叛乱的催化剂是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危机。七月革命(1830年)和查理十世下台在巴西产生了深刻反响，甚至成了国务委员会讨论的主题。唐·佩德罗本人在1831年2月22日结束对米纳斯吉拉斯省视察时发表宣言，批评利用法国事件攻击他本人和政府的乱党(partidodesorganizador)。3月中皇帝回到里约热内卢时，在他的拥护者(多数是葡萄牙人)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5昼夜的街头冲突，以"扔酒瓶之夜"著称。唐·佩德罗曾试图集合一批大臣，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巴西人"内阁，但是他在4月5日行使宪法授与他的权力，突然以另一个更合他个人胃口、更反动、更多"葡萄牙人"的内阁取代它。这个决定是招致第一帝国最后危机的直接起因。

1831年4月6日上午，人们开始在首都的几个公共场所聚集。傍晚，大约有三、四千人汇合到圣安娜广场。自1821—1822年激动的政治事件以来，这里一直是传统的集会场所。群众推派了一个地方治安官代表团去见皇帝，敦促他让前"巴西人"内阁复职，遭皇帝拒绝。有20多名众议员参加群众集会。到晚上9时左右，

---

① 见佩特罗内著《伊瓜佩男爵》，第16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的财政史，见佩莱斯和苏齐等著《货币史》，第47—57页。

里约热内卢卫戍司令弗朗西斯科·德·利马-席尔瓦同意去劝说皇帝作出让步。此时，已有两支炮兵部队和一营掷弹兵参加群众队伍。稍后，由利马-席尔瓦的兄弟指挥的皇帝警卫营也采取了同样行动。巴西军官虽然并不同情激进思想(只有少数例外，但愿意加入反对皇帝的运动，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罢免葡萄牙官员。至于普通士兵(大部分为穆拉托人)，他们也怀有城市居民最低阶层的那种失望、不满和排外主义偏见——他们多数是从这部分居民中征召入伍的。事实上，他们还要经常忍受延期发饷和严酷军营的纪律，条件比城市居民更糟。

4月7日凌晨，唐·佩德罗发现自己已失去军队的支持，但不愿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据报道，他说了这样的话："为了人民，我愿意做一切；在人民逼迫下，我什么也不干。")或许是因为更关心为他的女儿获得葡萄牙王位，他感情冲动地将巴西王位让给他的5岁的儿子佩德罗。消息传到圣安娜广场，群众热烈欢呼，并立即宣布佩德罗二世为皇帝。立法机构虽然不在正式开会期间，但还是迅速采取行动，选出了一个临时三人摄政委员会。他们是：弗朗西斯科·德·利马-席尔瓦将军、尼科劳·佩雷拉·德·坎波斯·维尔格罗(来自圣保罗的自由派参议员)和卡拉韦拉斯侯爵若泽·若阿金·卡尔内罗·德·坎波斯(保守政治家和前司法部长)。① 在逊位那天，唐·佩德罗一世和他的家属(包括12岁的葡萄牙女王)以及随行人员登上停泊在里约热内卢湾的英国舰船"战争遗恨号"。(一旦有事，须载运葡萄牙或巴西王族横渡大西洋时，看来英国海军每次总是侍候在侧，招之即来。)4月13日，"战争遗恨号"启航前往欧洲。

1831年4月5—7日的事件仅造成一人死亡，但无意之中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据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报告，唐·佩德罗

① 后面两人于6月17日被众议员若泽·达·科斯塔·卡瓦略(后封蒙蒂阿莱格里侯爵)和众议员若昂·布劳利奥·穆尼斯取代。

在“战争遗恨号”船上发表的一次简短的非正式讲话中谈到他离开巴西的决定时说，“巴西人不喜欢我，他们把我看做葡萄牙人。”毫无疑问，他说得很对。唐·佩德罗一世，这位领导了1822年巴西独立运动的葡萄牙王子让位于在巴西出生的儿子，构成了王位的民族化并象征独立过程的完成。直到1831年，巴西才切断了它与葡萄牙的最后联系，自此以后，巴西属于巴西人——或者至少属于巴西的统治阶级了。

唐·佩德罗逊位的冲击波传遍整个帝国。首都发生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各省——对于象戈亚斯那样距离较远的省份，消息从里约热内卢传到省会可能要3个月，到达内地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爆发了一连串的群众骚乱和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城市，意识形态是激进的或至少是排外主义的，但不是共和主义的，少数是复辟主义的。到1832年中，骚乱大部分平息，或被镇压下去。但有一起在逊位后爆发的叛乱，即伯南布哥的卡巴诺派战争，是农村的复辟主义者发动的，一直延续到1835年。

693

在里约热内卢本地，逊位危机后一连串发生了5次暴动，除最后一次(1832年4月)是主张复辟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反葡萄牙的。由军队发动，有群众参加。一营陆军，一支警察部队，海军炮兵和两个要塞的官兵，在一些激进鼓动者(如弗里亚斯·德·瓦斯康塞洛斯少校和永远的革命者西皮里亚诺·巴拉塔)领导下相继拿起武器。1831年7月，几乎整个里约热内罗卫戍部队发动武装起义。他们象4月6日所做的那样聚集在圣安娜广场，这次也有群众参加。他们使整个城市陷于恐怖之中达10天之久。他们的要求几乎完全是反对葡萄牙人性质的：将89名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将其他几十名葡萄牙人开除公职，十年内禁止葡萄牙籍移民入境。在巴西第2大城市萨尔瓦多，“扔酒瓶之夜”的消息传到后，4月4日群众即开始示威。以后两年间，至少发生了6次军队和群众暴动。最普遍的要求是解除当局(通常是指军队司令)的职务，驱逐

葡萄牙商人和官员。在巴伊亚*增加了另外一个要求：采取联邦制政治结构。这表明这个前首都对权力集中在里约热内卢感到愤慨。在第三大城市累西腓，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在逊位消息传到后的第二天，军队和群众组织示威，主要目标是专制主义社团"皇权与教权纵队"，它的成员和同情者自1824年叛乱失败后一直控制着政府。示威者要求解除军队司令、法官和几名军官的职务，因为这些对国家的忠诚可疑。1831年9月，发生更严重的骚乱。这一次有些奴隶也参加了进来，显然他们认为皇帝逊位的消息意味着他们的自由的到来。这次暴动是这个时期群众暴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暴动没有明确的领导和要求，群众呼喊"佩德罗二世万岁"、"巴西万岁"、"'纵队'、葡萄牙人和军队司令滚开"。整个城市完全被接管，大约有42家商店和25家酒店被抢劫一空。许多叛乱者喝醉了酒在风化区过夜，后来在那里找到了大部分被抢的东西。政府被迫请求民兵并武装平民来镇压暴动。奥林达法学院的学生也自愿出来帮忙。结果大约有100名叛乱者和30名忠诚的士兵和平民死亡，一千多人被捕。同年11月，另一次暴乱提出了一份应该驱逐出境的葡萄牙人名单，还要求把所有单身葡萄牙人(工匠和资本家除外)驱逐出境并解除所有葡萄牙人的武装。 69

1832年4月，在累西腓发生了一起同里约热内卢一样的复辟派的叛乱，叛乱由一个几乎全部由葡萄牙人组成的民兵营领导。这次叛乱很容易地被击败了，但是接着发生了一起30年代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群众叛乱。它以"卡巴诺派战争"著称，第一次发生在城市以外，接触到更深的社会基层。这场战争从1832年持续到1835年，参加者有小地主、自耕农、印第安人和奴隶，开始阶段还有一些糖厂主参加。它发生在伯南布哥省盛产蔗糖的马塔地区的南部边缘与邻省阿拉戈斯的北部之间。主要领导者文森特·费雷拉·德·保拉是一个神甫的儿子，在他脱离军队前是个中士。他自

* 此处仍指巴伊亚首府萨尔瓦多。——译者

封为复辟军总司令。在累西腓的葡萄牙商人和里约热内卢的政客们(他们都鼓吹佩德罗一世复位)的支持下，卡巴诺派进行了3年游击战，在当地茂密的森林中躲避政府军的攻击。最后，政府认识到必须用武力以外的其他手段击败他们，决定把奥林达主教请出来帮忙。他设法使许多卡巴诺派成员相信，佩德罗一世已经逝世(他确已于1834年9月去世)，佩德罗二世是正统的皇帝，他们现在这样做罪孽深重。许多人投降，但最后一批人(大部分是奴隶)"象鹿一样"一个个在森林中被射杀。领导人设法逃走，把原拥护者组织起来，一直到1850年被捕。在一份给阿拉戈斯省省长的报告中(1834年7月7日)，政府军指挥官若阿金·德·索萨上校说，叛乱者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与心理状态使他感到震惊。在政府军奉命摧毁叛乱者所有的木薯田和压榨机以后，叛乱者被迫以野果、蜥蜴、蛇、昆虫和蜂蜜充饥。卡巴诺派的成员对是否投降犹豫不决，他们害怕被不信教的立宪主义者拷打和活活剥皮，或被自己的领导人处死。这些英勇的游击队员很难说清他们的悲惨命运的真正性质，他们为他们的宗教和皇帝而战，反对他们所称的激进的烧炭党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最终是被曼努埃尔·卡瓦略·帕埃斯·德·安德拉德击败的，他曾在1824年宣布成立赤道联邦，如今是这个省的省长。

然而伯南布哥的卡巴诺派战争是对佩德罗一世逊位的例外反应。在几乎所有其他省份——18个省中只有皮奥伊省和圣卡塔琳娜省没有发生骚乱——群众示威都在城市，都和里约热内卢一样反对葡萄牙人，其激烈程度则因城市大小和葡萄牙人在政府和商业中的力量而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公共秩序在米纳斯吉拉斯以及圣保罗、圣卡塔琳娜和南里奥格朗德等南方省份受到的影响最小，这些省缺少重要中心城市和港口。

第一帝国是1831年在各种成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联合打击下结束的。唐·佩德罗一世逊位的主要受益者以及继承他在

三人摄政委员会领导下行使政治权力的，是巴西统治阶级中的那一部份人，他们曾在1822年支持独立，但在独立后的十年里，日益反对专制制度、极端的中央集权和皇帝的偏爱葡萄牙的政策。这些巴西的自由主义者自称为“温和派”（moderados）以区别于极端自由派即激进派（axaltados or farroupilhas），其中有些人，象西皮里亚诺·巴拉塔和博尔热斯·达·卡塞卡，是共和派。他们按照在独立时期颇有影响的共济会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传统，首先在圣保罗，然后1831年5月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自由与国家独立保卫者协会。”大多数自由派政治家和他们的更有势力的拥护者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协会迅速发展到全国其他各省。【组织不够严密的有1831年底由一些省的激进分子组织的“联邦协会。”官僚机构、军队和商界的专制主义者和复辟派(即所谓卡拉穆鲁党人，caramurus)* 在1832年成立了“巴西宪法保护者协会”(后改称“军人协会”)，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葡萄牙的渊源。】温和派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有不少是神甫，还有一些科英布拉大学毕业生。从社会地位来看，大多数是地主和奴隶主。在此时期这群人中最杰出的领导者有在科英布拉受过教育的米纳斯吉拉斯的地方行政长官贝尔纳多·佩雷拉·德·瓦斯康塞洛斯、圣保罗的神甫迪奥戈·费若和里约热内卢的出版商和书商、自1827年起创办《河滨曙光报》的埃瓦里斯托·德·维加。《河滨曙光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这些人受法国和美国的思想影响，主张修改宪法，增加自由主义内容，扩大分权，但是始终在君主政体的框架内。有些人为美国式的联邦制所吸引，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与里约热内卢或它的经济有联系，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和改革现存的政治制度，允许他们参与(实际上是统治)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更符合他们

696

* 卡拉穆鲁（earanuru）是保皇派在19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一种杂志。——译者

的利益。何况，上层人士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巴西保持奴隶制度，这使巴西的自由主义一直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在奴隶贸易问题上，自由派不想改变1826年的英国-巴西条约。相反，他们利用巴西奴隶贸易因市场上供过于求而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原因是前几年由于担心奴隶贸易即将结束，输入的数量很大，加上贸易界对英国和巴西两国政府现在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心中无底），1831年11月7日通过法律，规定对被发现非法向巴西输入奴隶者严加惩处，并宣布所有进入巴西的奴隶按照法律获得自由。但是没有人相信，当重新出现对奴隶的需求时（在30年代中期的确出现了这种需求），这条法律真能付诸实施。这是"一条按照英国人的意志制定的法律。"在一些地位巩固的农村寡头执政者看来，自由主义差不多就是实行地方统治。他们赞成奴隶制但与里约热内卢没有牢固的经济联系。例如，伯南布哥的卡瓦尔坎蒂家族，他们在"巴西人"内阁中的代表奥兰达·卡瓦尔坎蒂·德·阿尔布凯克，4月5日被唐·佩德罗免了职，奥兰达鼓吹将帝国分裂为两三个国家，为此曾于1832年和1835年两次提出建议。以卡瓦尔坎蒂家族为代表的争取各省权力的斗争，和以埃瓦里斯托·达·维加和米纳斯吉拉人特奥菲洛·奥托尼，等城市自由派为代表的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是1831年至1835年间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动力。

对于象特奥菲洛·奥托尼那样立场坚定的自由派来说，在摄政委员会统治下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不是反对社会上的专制分子，而是反对4月7日斗争的同盟者，尤其是士兵，确实使他们感到失望。自由派过去一直厌恶军队，把它看做是专制制度的工具。事实上，圣保罗人在1830年就曾提议建立国民警卫队接管维持国内治安的责任。佩德罗一世逊位后，自由派更加厌恶军队，但出于相反的原因，因为军队显然已成为群众激进行为的工具。现在，立法机构在1831年匆匆忙忙通过了建立国民警卫队的法案作为对付军队和群众骚乱的一项措施。当法案正在讨论时，摄政委员会征召里约热内卢的选举人（年收入不低于200米尔雷斯者）参加市

697

警卫队。委托他们维持这个城市的治安。司法部长迪奥戈·费若还分发武器给大约3,000名选举人。里约热内卢的"保卫者协会"帮忙为这个城市进行巡逻。1831年7月里约热内卢发生群众和军队暴动后，圣保罗的"保卫者协会"迅速集合了大约2000名志愿者，以备必要时救援中央政府。米纳斯吉拉斯也保证给予支持。暴动平息后，摄政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里约热内卢人民保持镇静，宣布政府已采取措施对付"无政府主义者"："武器掌握在要求维护公共秩序的公民手中"。

考虑到国民警卫队在整个帝国时期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作用，对它的建立值得作一评论。1831年8月的巴西颁布的法律是以同年的法国法律为样板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将保卫国家的责任托付给有财产的公民这一资产阶级观念。在巴西，这样做既可剥夺政府的强制手段，又可防备"危险的阶段"。但由于军官是选举产生的，对他们的收入条件也不高(四个主要城市是200米尔雷斯，其他地方为100米尔雷斯)，而且没有种族歧视，因此，同它所取代的殖民地时期的民兵和地方部队相比，国民警卫队仍不失为一大民主进步。而且，他在中央一级受司法部而不是陆军部，管辖，地方上则受地方治安官管辖。这项法律的第一条规定，国民警卫队的任务是"保卫宪法、自由、独立和帝国的完整"，实际上是负责巡逻、保护公共建筑、押送囚犯和维持一般秩序等警察任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把他们调到市区以外，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在军队的指挥下与叛乱者作战乃至协助保卫巴西边界。被自由派欢呼为公民民兵的国民警卫队最初几年在抗衡和替代正规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规军已被纪律败坏和士兵公开暴动所瓦解，而且被费若有意识地缩减为仅有6,000人的一支象征性军队。(例如，里约热内卢卫戍部队到1832年已完全解散，军官被集中到一个营里。)深刻改变国民警卫队性质的转变将在下文介绍。

698

一个更明确的自由主义步骤是向旧的地方行政长官(主要是葡萄牙人)进攻。自由派认为他们和军队一起是旧制度的支柱，不

断指控他们专横腐败。司法机构中的自由主义改革在唐·佩德罗一世在位时即已开始。1827年，每个教区都配备了地方治安官(juizes de paz，即民选的地方行政长官)，并授予许多行政、司法和警察职权，以代替由中央任命和控制的王室法官(juizes-de fora)。1830年颁布了一部深受边沁功利主义影响的刑法，目的在于保护政治反对派免遭政府的专横措施的压制，特别是象1824年事件后迫害伯南布哥叛乱者时使用的军事法庭这样的手段。但这些自由主义措施只是在佩德罗逊位以后才得以充分实现。1832年颁布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地方治安官的警察和司法权力，他们现在有权逮捕和审判罪行较轻的犯人。他们还向市政委员会推荐街道纠察员，并会同当地神甫和市政委员会主席一起商定陪审员名单。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设立专职县法官一职，由当地市政委员会提出名单，由省长任命。最后，刑事诉讼法还仿效美国和英国的诉讼程序和法规，实行陪审团制度和人身保护权。和国民警卫队一样，自由派对选举产生的地方治安官，尤其是陪审团抱着很大期望，希望他们成为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

第三次进攻的对象是1824年宪法中那些他们认为与自由制度不相容的部分。关于摄政委员会的法律(1831年)已经剥夺了摄政委员若干皇帝拥有的宪法权力，特别是与行使调处权有关的权力。摄政委员无权解散众议院、颁布大赦令、授予爵位、中止保证个人自由和对外宣战。除任命大臣、参议员和省长的权力外，摄政委员几乎完全从属于议会。无疑在巴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然而，当宪法本身成为改革运动的目标时，巨大的困难出现了。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对调处权、国务委员会和参议员终身制的攻击，以及扩大省级机关权力的企图。参议院强烈反对上述大部分改革，以致与众议院论战差不多达3年之久。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1834年8月通过了一个《补充文件》。调处权保持原封不动(尽管不在摄政委员会统治下行使)；不出所料，参议院的权力亦未触及；但是取消国务委员会。

699

省长继续由上面任命，但新设立的省议会取得比旧的省政委员会大得多的权力。此外，双方同意在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实行财政收入分成制度，自1836—1837财政年度开始实行。此外，为了使国家共和化，《补充文件》规定由群众选举一位摄政，取代1831年成立的永久性的三人摄政委员会。圣保罗自由派神甫、司法部长迪奥戈·费若于1835年4月当选为摄政，10月就职。

在以后两年(1835—1837)中，连续由几任自由派内阁统治巴西，知名的内阁成员有安东尼奥·保利诺·利波·德·阿尔布雷乌、曼努埃尔·阿尔韦斯·布兰科和奥兰达·卡瓦尔坎蒂。但是随着1834年8月通过《补充文件》和1835年4月选举费若为摄政，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主要冲击可以说已告结束。自由派斗争的两个方面——反对专制制度和反对中央集权——已部分地得到满足。关于建立共和政府和实行联邦制等更激进的要求被挫败。这是温和的自由派对激进派和专制派的一次几乎是彻底的胜利。这一胜利由于1834年9月佩德罗一世在葡萄牙去世而得到加强，他的死消除了复辟派存在的理由。政治力量分裂为温和派、激进派和复辟派的局面宣告结束。同时形成了新的政治组合，这是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之一。

自由主义思想和体制移植到巴西并未结出预期的果实。1831—1834年改革实施不久，就出现了失望和幻灭。前摄政、圣保罗参议员维尔格罗(他是自由主义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对改革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让我们的政治组织跪到了我们的社会组织前面。"① 他的这个判断或许反映了大多数巴西政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在唐·佩德罗一世下台后执掌过中央政权的人的感受。 700

如果说在1831年以前，法律和秩序这个手段掌握在中央政府的压迫者手中，如今它们落到了地方上有权势的压迫者手中。在

① 1841年7月12日在参议院的演说，引自维斯孔特·多·马鲁瓜伊著《有关行政法的论文(里约热内卢，1960)第504页。

农村地区，当选的地方治安官依附于当地豪绅，同时他们自身大多也是当地显赫家族的成员。在大城市，也有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当选，但是他们也得依附权势，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推进自己的工作。例如，众所周知，地方治安官包庇伪币制造者和奴隶贩子。他们对法律的无知是正常履行职责的又一障碍。马丁斯·佩纳1833年创作的著名喜剧《罗萨的地方治安官》中形象地描绘一个国民警卫队员为了反对非法拘捕，诉诸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对此，地方治安官进行反击，宣布废除宪法。此外，地方治安官不断卷入与地方行政长官、国民警卫队司令官、神甫甚至市政委员会的冲突。他们不能在当地富豪之间，或在地方富豪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中充当中间人；他们属于当地的派系；而且，由于他们能对选举进程施加影响，他们就成为当地倾轧而不是当地和谐的一个因素。至于陪审团，尽管有钱人通常避免本人参加，但是参加陪审团的人因害怕报复。很少主张严厉判决。罪犯不受惩罚的现象大量增加，对此陪审团应比地方治安官负更大责任。这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一致承认的事实。不仅对刑事犯罪（包括卷入现在已属不合法的奴隶贸易）有这种现象，对政治犯罪也一样，叛乱、密谋、暴动的领导者常被轻判，或宣判无罪释放。不但有权势者被带上法庭受审判（这是罕见的情况）时是如此，对无权势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很少与有权势者无联系。侵犯奴隶和女奴的犯罪行为比比皆是，但大多被视为个人私事。

701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国民警卫队初建时是比较民主的。地主不太敢参加这个组织，担心竞选较高职位时被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击败。可是，没有国民警卫队，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又不能完成（这是它的主要任务）。国民警卫队成立不到一年，政府即在1832年10月颁布法令，将竞选军官的收入条件增加一倍，在主要城市增加到400米尔雷斯，其他地方增加到200米尔雷斯。后来警卫队开始受新设立的省议会的支配。据省议会对1834年《补充文件》的解释，文件赋予它们支配警卫队中的高级职位的权力。

当时这样的权力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是一种政治资源，是取得身份的手段。结果，几乎所有的省议会都窜改了法律，取得了任命军官的某种控制权。例如在圣保罗，1836年取消了选举。公民的民兵这个设想在一个极不平等和等级分明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国民警卫队也就很快适应了社会现实。

《补充文件》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重大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它是妥协的产物。比较激进的建议，如省议会选举省长和征收进口税的权力遭否决。文件的作者贝尔纳多·瓦斯康塞洛斯(那时是自由派)提出过警告，如果把联邦制推进到美国那样的程度，会造成无政府状态，严重危害国家统一。但是，文件既然是温和主义的，它给了省议会支配省、市事务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文件规定了省议会任命公务人员的权力。由于文件的措词含糊不清，这项权力成为省议会和中央政府争论不休的原因。结果，省议会开始在省的范围内行使任命几乎所有公职人员的权力，包括地区法官——这个职务过去一直是明确地由中央政府支配的。某些省议会还设置和任命市长，并将地方治安官的权力转移给他们。省议会未加干预的官员只有上诉法院法官、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省长本身。可是省议会可以提名副省长，而副省长经常有机会行使权力，因为省长经常要到里约热内卢去参加全国议会的工作。

1831年开始掌握的自由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以及1834年后实施的政治权力下放，鼓励并激化了各省乡村不同寡头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为社会冲突铺平了道路，这些社会冲突比1831年危机后不久产生的社会冲突更广泛、更深入，对业已确立的秩序为害更大。与此同时，帝国脆弱的政治统一也受到严重的威胁。1835年在国家最北端的帕拉省和最南端的南里奥格朗德省爆发了叛乱。随后在巴伊亚省(1837)和马拉尼昂省(1838)也先后发生叛乱。这4次是巴西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激进和最激烈的叛乱，但除此以外，各省还发生了一系列叛乱，它们都是在实行自由主义 702

改革特别是1834年颁布《补充文件》后发生的，虽然根源比过去更深刻。它们的差别反映了这些省份的不同社会(和种族)结构内部的冲突和紧张程度的不同。但它们都主张实行联邦制。还有几次叛乱，包括最严重、时间最长的叛乱，则公开主张分离，至少有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

19世纪30年代第一起重大叛乱发生在帕拉省。这次叛乱后来以"卡巴诺派叛乱"著称(因为人们称这些叛乱者为"卡巴诺，"也这样称呼早些时候伯南布哥省的叛乱者，见上文)。帕拉省的人口将近有15万，其中30％是奴隶，还有大量自由的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居民，被称为"塔普依奥"。* 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亚马孙河盆地各大支流沿岸。帕拉省没有根基牢固的大地主寡头集团，社会结构总的说来，譬如说，比东北部各省松散得多。省会贝伦是个小城市只有大约12,000居民，但因位于亚马孙河口而成为重要商业中心。它是这个省产量不大的烟叶、可可、橡胶和大米的主要出口港。那里有很多葡萄牙商人，少数英国和法国商人。自从佩德罗一世逊位以来，自由派巴西人和复辟派葡萄牙人之间的冲突使这个省和它的省会深受其害。1833年，省政委员会拒绝接受摄政委员会任命的新省长，说他是个亲卡拉穆鲁分子。同年晚些时候，两派发生冲突，造成大约95人伤亡。许多葡萄牙人丧生，其余的离开了帕拉省。一位自由派新省长设法凑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政府，直至1835年1月一名自由派激进分子刺杀省长和军事长官并发动叛乱。叛乱者的领导人中有地方治安官、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军官、703 神甫和一名割胶工人。他们推选一名叛乱领导人为省长并宣布帕拉独立。

里约热内卢的摄政任命的新省长是一位八十多岁出生在葡萄牙的陆军元帅。他在路上走了60天才到达，在马拉尼昂省召集到

* Tapuia是葡萄牙人征服巴西前，巴西腹地的印第安人主要部落之一，葡萄牙人因此称印第安人为塔普依奥(Tapuios)。——译者

120 名士兵与他同行。他最终得到允许接管省长职务，叛乱者的省长撤退。但这次停战只是昙花一现。1835 年 8 月，一支叛军(大多数是黑人和塔普依奥人)进攻这座城市，经过9天逐屋战斗，据说大约有 180 名白人被打死，甚至停泊在港口的英国和葡萄牙舰船的支持也不能挽救这位省长。他决定放弃贝伦，约有5,000名葡萄牙人和巴西人跟随他一起乘上一艘巴西战舰避难。正如这位省长所描述的，他们大多是"业主、商人、头等公民。"

叛乱者的省长在战斗中阵亡。继任者是一名21岁的塞阿拉省人爱德华多·安热林。他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群众领袖之一。安热林组织新政府，建立新的战斗部队，任命新的军官(通常从士兵中提拔)。一位神甫担任省长的秘书，他是少数几个能比较流畅地书写的叛乱者之一。战争沿亚马孙河向这个省的内地扩展。叛乱者袭击城市和农场，掠夺食物、武器和贵重物品，然后退往森林。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阻挡他们。海军对亚马孙河口的封锁和全省生产混乱不久就削弱了叛乱者在省会的地位。官方派遣的新省长安德雷亚将军带着新的部队、弹药和船只于1836年4月到达。安热林决定放弃这座城市，随他撤退的有5000人，留下的居民几乎全是妇女，令人惊讶的是省金库中的 9.5 万米尔雷斯还留在主教手中。安德雷亚将军进行残酷镇压，逮捕所有的叛乱者，下令对抗拒者就地枪杀，通过建立辅助部队实行全省军事化，将10岁以上无财产无职业的全部男子集中到"劳动队"，强迫他们有的为私人雇主劳动(工资很少)，有的参加公共工程。双方普遍施行暴力和残酷虐待对方人员。有人竟然残忍傲慢地戴着用死去的卡巴诺的耳朵制成的念珠。仅在监狱、船上和医院里就有大约4,000名卡巴诺死去。1836年10月，安热林被一年前击败伯南布哥省卡巴诺派的同一个军官逮捕，他没有进行抵抗。叛党领袖的贫穷、尊严和诚实给若阿金·德·索萨上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40年宣布大赦后，最后一批叛乱分子(许多人只用弓箭武装自己)投降。据统计，在这次叛乱中共有 3 万人死亡，相当于这个省全部人口

704

的20%，叛乱者和非叛乱者大致各占一半。省会贝伦几乎全部被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叛党从未提出系统要求，也没有提出任何统治纲领。他们只是大声呼喊反对外国人、葡萄牙人、共济会员，拥护天主教、佩德罗二世、巴西人、帕拉与自由等口号。1836年再次宣布该省分离，并不是一个中心要求。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是，在叛乱者中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可是他们并未废除奴隶制；安热林还镇压了一次奴隶暴动。这次卡巴诺派叛乱是印第安人和卡波克洛(caboclo,即梅斯蒂索)居民长期被压抑着的对殖民统治及其代表、对一般是有钱有势的白人的仇恨的爆发的，是摄政委员会时期的政治动员所释放、高阶层居民之间的冲突所激发的。这是一次人民运动，但并不是自由派心目中的人民。埃瓦里斯托·达·维加用最贬义的词语来称谓叛乱者，说他们是乱民、放荡者、暴徒；他还说帕拉省看起来更象是西班牙语美洲的，而不是巴西的一部分。①

按时间顺序发生的第二次叛乱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以"法罗皮利亚(Farroupilha)著称，这是佩德罗一世逊位后用来称呼激进分子的名称。这次叛乱发生在南部省份南里奥格朗德。这个省有10万多居民，省会阿雷格里港 1830 年有居民 1.2～1.5 万人。和帕拉省一样，奴隶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是南里奥格朗德的社会结构与巴西其他各省很不相同。成立这个省的历史条件使军人和地主融为一体，军事化的统治阶级几乎绝对控制了社会从属团体。此外，这个省在19世纪的第 2 个十年经历了一次重大经济转变，从农业生产转变为畜牧业生产。腌肉工业也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1817年占领东岸曾给畜牧庄园主(estancieros)以巨大推动。他们不但购买成了巴西锡斯普拉蒂内省的土地，还把大量的牛转移到巴西。1828年巴西丧失东岸对他们是一次严重打击，尽管它并未停止已习以为常的边界上牛的走私。事实上，南

705

① 《河滨曙光报》，1835年1月1日，11月11日。

里奥格朗德省、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和科连特斯省的畜牧庄园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是发生1835年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考迪略集团，寻求一个最能适合他们利益的政治组织。

这次叛乱的开始同卡巴诺派叛乱没有多大区别，它根据自由派的反应，反对1833年成立的复辟派组织“军人协会”，反对摄政委员会任命的省长。这位省长(他怀疑当地领导人在策划脱离巴西)于1835年9月被推翻。在下一个省长(他是一个富有的畜牧庄园主)的任期内，各派联合起来，1836年2月爆发公开战争。1836年9月，法罗皮利亚派宣布该省独立，成立共和政府，尽管他们没有能力控制省会。1839年，他们在意大利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组织的一小支海军舰队的援助下，侵入邻省圣卡塔琳娜，那里也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不久即夭折。这场战争持续达10年之久，直至1845年3月双方同意停战为止。

这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相当数量的畜牧庄园主，特别是那些权力基础和庄园位于靠近阿根廷和乌拉圭边界的畜牧庄园主，与中央政府的部队作战。但是腌肉工业家和一部分畜牧庄园主站在政府一边。这里我们不想去争论法罗皮利亚派是否真想脱离巴西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应该指出有利于分离和不利于分离的因素。首先，在畜牧庄园主与腌肉厂厂主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后者依靠巴西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前者可以不要巴西市场，只要有乌拉圭的腌肉厂即可以依靠。另一方面，南里奥格朗德的腌肉厂厂主需要靠畜牧庄园主供应他们原料。就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看，畜牧庄园主和腌肉厂厂主对巴西都是必不可少的。鉴于阿根廷的经常威胁，南里奥格朗德省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这里有着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包括腌肉及其有关产品运往国内外市场所提供的税收，牛群越过边境缴纳的税收，向其他省份的奴隶提供食品的价值，以及战略上的考虑等。对于畜牧庄园主来说，分离似乎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只要能保证一种安排，譬如说政治

706

上与乌拉圭(或许再加上阿根廷的几个省)合并。叛乱领导人本托·贡萨尔维斯上校(一个畜牧庄园主和共济会会员)通过与拉瓦列哈和罗萨斯接触,看来是有明确计划的,那就是同乌拉圭和阿根廷建立联邦。但由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政治情况变化无常,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第2名最重要的叛乱领导人本托·曼努埃尔(也是上校兼畜牧庄园主)在斗争中三次倒戈,开始时站在叛乱者一边,后来倒向政府,然后又回到叛乱者方面,最后又与政府合作以结束战斗。最后,还是给了畜牧庄园主一些好处,才使他们站到政府一边来,政府将给予腌肉和有关产品以特殊保护,让南里奥格朗德省能够成功地与阿根廷和乌拉圭竞争。

上面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和中央政府作出的某些让步(如1840年开始对外国腌肉征收25%的进口税),加之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人民疲惫和养牛业衰落,最终使斗争在1845年结束。叛乱在其他省份的失败——帕拉、巴伊亚以及后来在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参阅下文)——使高乔人连一个巴西联邦也没有搞成。

第三次重要叛乱发生在巴伊亚省,称为萨比诺叛乱,来源于它的领导人的名字萨比诺·巴罗佐医生。它是30年代前期城市动乱在更大规模上的重复,加上强烈的联邦主义倾向(且不说是分离主义倾向)它的一些领导者参加过前面的几次叛乱。这次叛乱 707 1837年11月6日在萨尔瓦多的军营中开始发动,立即得到省会几乎全部卫戍部队的支持。只有国民警卫队和海军继续效忠政府,但他们不是陆军和警察部队的对手,后者除军官外,全体参加了叛乱。次日城市被攻占,省长未放一枪就逃之夭夭。市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巴伊亚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以后的情况几乎是独立战争的重演:雷孔卡沃地区的蔗糖大王们把省会团团围住,他们还有帝国海军从海上支援。雷孔卡沃地区以外的内地保持平静,使叛乱者打算象帕拉省那样把战斗扩展到农村地区的希望落了空。叛乱者完全被包围,失败已只是时间问题。1838年3月13日,在省会城内展开了最后3天象在贝伦一

样的逐门逐户的战斗。5,000多叛军被一支4,000多人更有经验的正规军击败。总共约有1,200名叛乱者和600名效忠分子丧生。1840年的大赦挽救了7名被判死刑的叛乱领导人的生命。

萨尔瓦多企业界和知识分子中的某些重要成员的支持使萨比诺叛乱较之先前在巴伊亚发生的更纯粹的群众动乱得到的支援更广泛。萨比诺·巴罗佐是新闻工作者和声誉卓著的医学院(帝国仅有的两所中的一所)的教授,但是除了知道叛乱者有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倾向外,没有更多关于他们的计划的资料。他们一开始就与里约热内卢分离,看来疏远了一些支持者,因为这个决定的含义到后来才加以限制:实行分离只限于摄政统治时期。这次革命也没有利用奴隶的革命潜力,这或许是因为对1835年巴伊亚奴隶暴动引起的惊恐余悸未尽(参阅下文)。他们在1837—1838年组织了一支黑人部队,但是没有对奴隶进行普遍动员,也没有废除奴隶制。在以前的运动中十分突出的反葡萄牙情绪,至今业已消退,几乎无声无息了。地主和商界上层人士不敢参加群众和城市知识分子要求本省脱离巴西的运动,尽管这种思想可能很投合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心意。对叛乱的抵抗是由萨尔瓦多警察局长组织的,他也是雷孔卡沃地区有权势的糖厂主家族的后裔。

这个时期最后爆发的一次叛乱与卡巴诺派叛乱十分相似,尽 708 管深度和激烈程度不足。它的战场在马拉尼昂省南部,靠近皮奥伊省边界。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小农和养牛的小牧场主。与这个地区北部边界接壤的是富庶的梅阿林河、伊塔皮库鲁河和平达雷河流域,由一个从事稻米和棉花的生产强大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寡头集团控制。这个省的人口当时已超过20万,其中50%以上是奴隶,是巴西奴隶比例最高的省份。省会圣路易斯超过3万人,葡萄牙商人在那里影响很大。

这次暴乱以"巴莱奥叛乱"著称,因为一名叛乱领导人绰号"巴莱奥"(草蓝商)。这是一次与自由派改革尤其是与1834年的《补充文件》有最直接联系的叛乱。两派争夺对当地控制的方式,

与其他省份基本上一样：自由派称为“本特维”派，这是一份自由派报纸的名称；保守派称为“卡巴诺”派。保守派省长利用《补充文件》授予省议会的新权力，通过一条新法律，在市一级设立市长(prefeitos)，并将地方治安官的大部分权力转移给市长。

另一条由省议会制订的法律授予他任命国民警卫队军官的权力。这些措施意味着夺走了“本特维”派原来享有的权力，很自然，“本特维”派在省会的报纸上发动了一场猛烈反对省长和新法律的运动。情绪日趋激昂，当时一件微小的偶发事件激起了叛乱。有一个名叫赖蒙多·戈麦斯的“卡夫索”(印第安人与黑人混血种)牛仔，在一位“本特维”神甫(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身边工作。这个牛仔的兄弟和他的一些帮手，被当地副市长、神甫的卡巴诺政敌无理逮捕。牛仔为了营救他的兄弟，袭击了当地监狱。支持者从各地蜂拥而至，1838年12月戈麦斯成了叛乱领袖。后来，巴莱奥也参加了叛乱，他的动机是为他的被一名警官强奸的女儿报仇。第三位领导人科斯梅是黑人，自称“唐·科斯梅，本特维自由的导师和皇帝”。他率领3,000名逃亡奴隶指挥另一次同时进行的暴乱。

“巴莱奥派”动员了大约11,000人，1839年8月占领这个省的第二大城市卡希亚斯，也是自由派的一个根据地。他们在那里成立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废除上述省议会制订的两条法律，本省驱逐葡萄牙人。中央政府从各省调集兵力，派出一支总共有8,000人的部队，由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席尔瓦上校指挥。叛乱运动的主力很快被打垮。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的“巴莱奥”和奴隶“巴莱奥”内部的分裂。利马上校从中

709

"巴莱奥派"的要求大多是属于"本特维"和"卡巴诺"两派之间的斗争：如撤消关于市长(prefeitos)和改变国民警卫队任务的法律；加上传统的反葡萄牙人的措施、大赦和给叛乱部队发饷。一个半文盲的"巴莱奥"领导人在宣言的结尾高呼天主教、宪法、佩德罗二世、地方治安官和"神圣的自由事业"万岁。他们没有提出社会和经济性质的要求。"巴莱奥叛乱"虽然大部分领导和士兵具有群众性，但不能避免上层和中层冲突的思想和政治色彩。它或许比"卡巴诺派叛乱"更直接了当，但这也是较少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许多"巴莱奥"是小农、牛仔和工匠；有些是富有的地主。有一个宣言提到必须拯救"我们的家庭和财产"。这大概是自由的"巴莱奥"和奴隶"巴莱奥"之间关系始终不好的一个原因。但是叛乱者与创造了叛乱气氛的城市自由派关系也不密切。圣路易斯的"本特维"派，不是害怕保守派反扑，就是害怕在叛乱中群众采取的暴力，所以行动刚一开始就立即退却。只有在帕拉省，城市和乡村的激进派携手合作。受压迫者(奴隶和自由民，乡村穷人和城市贫民)的分裂，是统治集团力量之所在，并且常常把他们从自身的倾轧中挽救出来。

对1831—1834年自由主义改革实施状况的失望，以及席卷全国的叛乱浪潮(它是1834年《补充文件》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导致了不稳定并对国内秩序及国家统一造成威胁)，为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两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两个政党将在第二帝国时期支配巴西。

71

应当记住，从一开始保守反应在国家的上层人士中就是十分普遍的。早在1835年，埃瓦里斯托·达·维加的《河滨曙光报》和瓦斯康塞洛斯的《4月7日》报就已开始批评自由主义改革。他们当时还是同盟者，但后来对究竟应该向秩序、权威和一个强大的中央行政机构后退(regresso)到什么程度发生了分歧。瓦斯康塞洛斯的态度变得严重保守，而埃瓦里斯托仍持中间立场。埃瓦

里斯托主张对自由主义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作重大修改。他认为从专制制度向自由迅速过渡已经弄松社会的网络组织，“我们看到无政府状态遍及全国”。巴西正在陷入前西属美洲殖民地所经历的那种政治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政治上四分五裂。他承认，过火的进步措施已经在公众舆论中引起一种反动反应，但是他声称，瓦斯康塞洛斯很快地(太快了)注意到这种变化，并已决心成为这种反动的维护者。许多人肯定愿意支持“短暂和合理的后退”，但是他感到瓦斯康塞洛斯把问题“夸大到了超出正确思想的界限”。①

悲观情绪也开始感染新当选的摄政、温和派堡垒迪奥戈·费若。他确信南里奥格朗德的分离已无法避免，伯南布哥可能会迅速仿效。他在1836年的御前演说中谈到广泛而且日益严重的蔑视当局的情况，并警告说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受到威胁。在曾经通过1834年《补充文件》的立法机构内，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甚至更为明显。那里出现了一个由瓦斯康塞洛斯领导的强大的反对派，它很快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和未来保守党的核心。1837年埃瓦里斯托去世，使费若失去了他在议会中和新闻界的主要支持者。他无力对付议会中的反对派(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身的独裁性格)，对方又对他施加压力，指责他处理南里奥格朗德的叛乱不力(因为在叛乱者的领导人中有他一个堂弟)。1837年9月费若被迫辞职，将政府移交给新任命的帝国(内务)大臣佩德罗·德·阿劳若·利马(后封奥林达侯爵——一个保守派参议员，前众议院议长，伯南布哥省的糖厂主出身)。随后进行新摄政选举，选举结果表明，新的保守倾向是全国性的。阿劳若·利马在18个省的15个省当选，包括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和南里奥格朗德，共赢得大约45％的选票。(对比之下，费若在1835年仅获得30％的选票，只在8个省当选)新立法机构的选举出现了同样的趋向：反对费若

711

① 《河滨曙光报》，1835年4月6日，8月12日，9月4日。

的领导人全部重新当选。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明显保守倾向的地方行政长官在立法机构中心的人数从24％上升到39％，神甫的人数则从23％下降到12％，他们大多是自由派①。

在1838年的摄政选举中，阿劳若·利马的对手是奥兰达·卡瓦尔坎蒂(他也曾在1835年的选举中反对费若)。阿劳若·利马和奥兰达·卡瓦尔坎蒂都是伯南布哥省糖业寡头集团的成员。但是阿劳若·利马在科英布拉接受过教育而且自独立以来一直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曾到一些欧洲国家旅行并在法国学过法律。奥兰达未曾受过高等教育，通常宁愿照管他自已的糖厂，不愿呆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关于国家政治组织的观点完全不同。奥兰达以鼓吹最大限度的权力下放甚至实行分离的主张闻名，利马则是坚定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曾投票反对《补充文件》并且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后退”。

温和派集团已分裂。大部分地方行政长官和官僚以及一部分地主阶级，特别是里约热内卢、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地主利益集团，已坚定地向右转，从温和派中分裂出来成为“后退”派。留下的是一些比较注意城市的成员、少数神甫和许多来自非传统地区，特别是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朗德等省的地主，这些人成为后来的自由党的核心成员。加入“后退”派行列的有卡拉穆鲁党的残余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盘踞在官僚机构和参议院中)和卡拉穆鲁党的传统支持者(主要城市的葡萄牙商人)。在阿劳若·利马1838年组成的政府中，瓦斯康塞洛斯(他反映了众议院中的保守派多数，本人是个在科英布拉大学受过教育的地方行政长官，一个与土地没有联系的米纳斯吉拉斯人)被授予两个大臣职位(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公认为内阁领导人。参加内阁和他共事的有：米格尔·卡尔蒙·多·平-阿尔梅达(后封阿布兰特什侯爵，巴伊亚省糖厂主，也在科英布拉大学受过教育)；雷戈·巴

712

① 卡瓦略著，《建立秩序》第83页。

罗斯(在德国受过训练的军官)和马西埃尔·蒙特罗(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医生),他们两人都同伯南布哥省的寡头集团有联系；若泽·达·科斯塔·卡瓦略(后封蒙蒂·阿莱格里侯爵，前摄政)；以及若阿金·若泽·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后封伊塔博拉伊子爵,在科英布拉大学受过教育,与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种植园主有联系)。这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和甘蔗及咖啡种植园主的联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在欧洲，尤其是在科英布拉大学)并有丰富的管理政府的经验。

为新联盟提供理论基础的是瓦斯康塞洛斯与保利诺·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后封乌鲁瓜伊子爵)。后者也是地方行政长官，曾在科英布拉受过教育，是罗德里格斯·托雷斯的联襟。瓦斯康塞洛斯和保利诺也是修改早些时候的自由主义法律的法规的主要起草人。他们的基本前提是，这个国家对1831年后采取的先进的自由主义措施尚未做好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不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但是保利诺经常强调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问题，而瓦斯康塞洛斯考虑得更深。在他的影响下出版的《4月7日》报论述了建立一个得到保守阶级支持的政府的必要性。根据它下的定义，这个阶级就是地主、资本家、商人、工业家以及艺术界和科学界人士的联盟，这些人“在突然的变革中只会失去一切而一无所获”。① 根据《4月7日》报的说法，这个阶级关心进步，但应是有秩序的进步。有才干的穆拉托新闻工作者和瓦斯康塞洛斯的门徒、儒斯蒂尼亚诺·若泽·达·罗沙的报纸《新闻报》同意这个观点，并把它同基佐的“合法

年也写过温和派代表"有秩序的进步"这样的话。《曙光》在一篇分析瓦斯康塞洛斯的政治哲学的颇有洞察力的长篇文章中，把他描绘成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追随者，唯利是图的信徒，他认为人类行动的唯一动力是物质利益，唯一的约束是害怕那些利益受到损害。①在《曙光》这篇文章中，大概已将瓦斯康塞洛斯的目的暴露无遗：找到牢固的物质利益，以便在它的基础上建立君主政体和整个政治制度。 713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困境是，各保守阶级对于什么是适合他们利益的最佳体制缺乏一致认识。一个原因是这些利益不完全一致，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许多成员（地主多于商人）没有很好考虑如何通过国家的调解来进行统治。到1843年，J.J.达·罗沙还在争辩君主政体在巴西缺乏牢固的根基。国家是理性认识的产物，是认识它在维持秩序方面的重要性的产物。现在仍然有必要说服地主和商人——那些土地和财富的贵族——他们最大的利益在于支持国家并得到国家的支持。②由于在统治集团内部缺乏统一认识，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后退"运动远未获得一致的支持。保守派联盟除依靠东北部特别是巴伊亚的甘蔗种植园主外，在开始时还严重依靠地方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僚以及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种植园主。一次以咖啡生产为基础的新的经济繁荣与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中心的地理位置恰好符合，这是政治权力重新集中的过程最终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后退派通过的第一条法律是1840年5月对《补充文件》的解释（interpreta,çao）。它虽是作为一种"解释"提出，但事实上从公务人员的任命和撤职以及对他们的管辖范围的限定来看，它大大地削弱了省议会的权力。在这个关头，众议院中的自由派少数派，作为最后的一着，决定提出（时机尚不成熟）皇帝"已成年"的议案，以防止进一步采取后退措施。皇帝已成年是一个被广泛

① 《河滨曙光报》，1838年7月23日，10月17日。

② 《巴西报》，1843年9月19、21、23、26日。

接受的观念，自1835年来已多次提出，作为支持中央政府的正统性的一种方式。尽管通常看来它更象是一种保守措施，但政治机会主义导致自由派把它提了出来。1840年7月23日的"议会政变"结束了阿劳若·利马的摄政，开始了第二帝国。这次政变得到自由党、政府官僚、军队和国民警卫队、以及里约热内卢人民的支持，(但并非最不重要)，也得到了15岁的皇帝本人的支持。立即组成了成年皇帝的自由党内阁，阁员包括安德拉达两兄弟(安东尼奥·卡洛斯和马蒂姆·弗朗西斯科)、卡瓦尔坎蒂·德·阿尔布凯克两兄弟(奥兰达和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安东尼奥·保利诺·利波·德·阿布雷乌(后封阿巴埃特子爵，米纳斯吉拉斯省的自由派)，以及奥雷利亚诺·科蒂尼奥(对年轻皇帝具有强烈个人影响的宠臣)。由于佩德罗二世经验不足和缺乏领导能力，冲突迅即在内阁内部爆发，1841年3月底内阁垮台。新的保守派内阁保留了有影响的奥雷利亚诺并推荐保利诺·苏亚雷斯·德·索萨担任司法大臣，阁员还有米格尔·卡尔蒙(巴伊亚的糖厂主)、阿劳若·维亚纳(佩德罗二世的导师)、维莱拉·巴尔博扎(陆军军官)和若泽·克莱门特·佩雷拉(葡萄牙出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最后两人是著名的佩德罗一世的拥护者。(1843年1月—1844年2月的内阁除保利诺外，还包括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和奥诺里奥·埃尔梅托·卡尔内罗·莱昂(后封帕拉纳侯爵)。莱昂是科英布拉大学训练出来的年轻地方行政长官和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省的政客，他象罗德里格斯·托雷斯一样，也是一个里约热内卢的种植园主。依靠瓦斯康塞洛斯在参议院中进行帮助，保利诺让众议院匆匆通过了重新设置国务委员会的法律(1841年11月)并修订了刑事诉讼法(1841年12月)。

修订刑事诉讼法是后退派的重要成就。它使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行政和司法机关。所有法官，从高等法院和地区法院法官到县市法院法官全由司法大臣任命。特别是加强了地区法官的权力。只有地方治安法官仍独立于中央权力之外。但是在这

方面也加强了控制：新法律规定在所有省会设置警察长官(chefes de policia)——由司法大臣任命。在市和教区一级，警察长官则由代表(delegados)和副代表(subdelegados)代理，他们是由省长从平民中推荐并任命的。地方治安法官的大部分司法和警察权力都移交给代表和副代表，使这些选举产生的地方治安法官的权力被剥夺殆尽，他们甚至还把提出陪审员名单和任命街区视察员的权力也移交给了这些“行政司法官”。只有选举委员会仍保持它的义务。通过警察长官，司法大臣甚至能控制全国监狱看守的任命，由他规定他们的薪金。此外，对陪审员的条件要求更高了：他们必需是有文化有学问，必须在主要城市有400米尔雷斯以上的收入，其他地方有200米尔雷斯以上的收入。这个条件比先前的收入要求提高了一倍。重要的是，倘若是工业和商业收入，必须再加一倍，即800米和400米尔雷斯。这进一步表明，最受欢迎的是地主和官僚。还有一个中央集权化措施是所有的副省长都由内务大臣任命。以前副省长是由省议会提出六人名单提名的，中央政府只是确定他们任职的先后次序。“后退”的彻底性的最后一个证明是，刑事诉讼法要求每一个在帝国境内旅行的人携带护照，否则他可能受到盘问并可能被当地“代表”驱逐出该地区。只有国民警卫队在这次对1831—1834年间的自由主义措施的进攻下保存下来，尽管中央政府过去在镇压各省叛乱(当前在镇压南里奥格朗德的叛乱)期间，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常常暧昧不明。但是我们下面就能看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而且政府现在已开始再次扩充军队。

715

这一揽子目的在于重新集中政治权力的措施还包括恢复行使在摄政委员会统治时期被停止的“调处权”。1842年5月1日，保守党政府采取决定性行动，解散了在1840年10月自由党政权尚未组成的短暂空白期间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它甚至还没有召开过会议)，并举行新选举。自由党深恐保守党利用皇帝年轻和不久前通过的法律(它们已经广泛地扩大了政府的官职任命权和控制)，

巩固其权力并将他们永远排除在外。两年前他们曾经依靠皇帝成年亲政，现在只有诉诸公开叛乱了。1842年5月，圣保罗省发动武装叛乱；6月，米纳斯吉拉斯省也揭竿而起。叛乱蔓延到里约热内卢省的帕拉伊巴河谷的部分地区圣保罗省和米纳斯吉拉斯省的最重要的自由党领袖，包括圣保罗省的费若和维尔格罗与米省的利波·德·阿布雷乌和特奥菲洛·奥托尼，都被卷入。被任命为革命省长的人——圣保罗省的托比亚斯·德·阿吉亚尔和米省的平托·科埃略——在他们本省是最富有的人。阿吉亚尔因在索鲁716 卡巴(这里是叛乱中心)经营骡子贸易而致富，他的家族在殖民地时代和帝国初期也在这里靠包税获得巨额利润；他还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在1840年的自由党政府时期担任过省长。平托·科埃略靠开采金矿发财，最近以112,500英镑的价格卖给英国人一个采矿企业。在里约热内卢，叛乱领袖若阿金·若泽·德·索萨·布雷维斯无疑是这个省最富有的人。据说他拥有6千多个奴隶，30多个大种植园。每年收获10—20万阿罗瓦咖啡。他还是直接参与非法奴隶贸易的有名人物。他与该省的保守党省长，特别是保利诺·苏亚雷斯·德·索萨长期不和，因为后者经常想结束咖啡的偷漏税和奴隶贸易。

从领导方面看，1842年的叛乱与当时还在南里奥格朗德省继续进行的叛乱十分相似，但是动机各不相同。圣保罗人和米纳斯吉拉斯人进行斗争，主要是为了反对"后退"派的新法律和里约热内卢的保守党内阁。圣保罗人另外还抗议政府在1842年初颁布法令，禁止与叛乱的高乔人进行骡马贸易，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促成这次叛乱的主要因素，虽然它可能是托比亚斯·德·阿吉亚尔加入这次叛乱的原因。圣保罗人提出了分离的要求，但是这种思想似乎并没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方面，这个省的东北部构成帕拉伊巴河谷的一部分，它的咖啡经济与里约热内卢港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过去远征探险者的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似乎已经消失了。不象武装的畜牧庄园主们，圣保罗的大种植园主们轻易

地被力量很弱的中央政府军队击败了。在米纳斯吉拉斯省，它的马塔地区也是巴西咖啡经济的一部分，那里根本不谈分离问题。对布雷维斯来说，分离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种植园正好在里约热内卢咖啡地区的中心。

1842年的自由党叛乱表明，在拥有地产的阶级内部当时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三个省的地主都参加了叛乱，但并不是一致参加。冲突双方都有地主(国民警卫队也是分裂的)。例如，在圣保罗省，维尔格罗是革命者，而科斯塔·卡瓦略则是效忠于中央政府的省长。在帕拉伊巴河谷，其他种植园主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布雷维斯。此时里约热内卢的省长是奥诺里奥·埃尔梅托，他本人是本省的咖啡种植园主，第二年(我们前面已讲过)，他参加了实力大大增加的保守党内阁。米纳斯吉拉斯省没有象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那样强大的出口经济，但有一个在采金热时期发展起来的十分重要的小城镇网络。这里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源地，特奥菲洛·奥托尼是最好的代表。但是即使这些小城镇，也象这个省的地主们一样，在叛乱期间是分裂的。 717

叛乱在圣保罗坚持了一个月，在米纳斯吉拉斯坚持了两个月最终都被击溃。在随后几十年中，直到1889年帝国垮台为止，自由党的主要力量在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朗德。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脱离中央，而南里奥格朗德的分离企图已告失败。它们接受了独立时期建立起来的、尽管有30年代的混乱但得到了维护的国家统一。它们没有力量对里约热内卢在国家政治中的最高地位提出异议。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大多数自由派现在所能做的，或许仅仅是防止中央集权走得太远。

苏萨内特伯爵于1842和1843年访问巴西时说，南里奥格朗德已经分离，圣保罗即将效法于后；“巴西的统一只是虚有其表，所有省份都期待着独立。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共和国，这是它们力求

实现的梦想。"① 这是第二帝国开始三年后，这个国家给一个不抱好感的访问者留下的印象。后来证明，这位伯爵的预言是错误的。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政治方面，奥雷利亚诺对皇帝不断施加影响有助于使政府又一次发生更迭。1844年初，自由党重新掌权。政府对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叛乱者实行大赦，他们很快回到了众议院和大臣的位置上。对保守党永远独掌权力的恐惧就这样消除了，两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制度开始形成。更重要的是，自由党一旦掌权，发现保留1840—1841年的后退法律对于加强法律的秩序，行使官职任命权和赢得选举是有利的。在新政府举行第一次立法选举以前，他们撤换了全国几乎半数的地区法官和若干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从1844年至1848年是自由党在朝的5年，巴西连续由几届自由党内阁统治，其中最主要的阁员依然是阿尔韦斯·布兰科、利波·德·阿布雷乌和奥兰达·卡瓦尔坎蒂，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若泽·卡洛斯·佩雷拉·德·阿尔梅达·托雷斯(马卡埃子爵)和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索萨-梅洛。他们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去取消"后退"派的作为，这使特奥菲洛·奥托尼等坚定的自由派不免感到失望。在首先从自由党政府手中获得在穆库里河上创办航运业的一张40年许可证后，这位米纳斯吉拉斯省的革命者怀着厌恶的心情放弃国家政治回到了家乡。

718

与此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里约热内卢为中心的咖啡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帝国的政治统一和稳定得到巩固。这不但巩固了里约热内卢咖啡种植园主的政治权力(他们与政府官僚和地方行政长官构成保守党的骨干)，而且特别是在1844年关税改革后大大加强了巴西的国家财政。1848年9月执政的、由奥林达子爵(阿劳若·利马)领导的保守党内阁，象1841年和1843年的内阁一样，6个高级大臣中有3个与里约热内卢省的咖啡利益集团有联

---

① 孔德·德·苏萨由特著《巴西在1845年》(里约热内卢，1957)，第87页。

系。在经受了最后一个省的自由党叛乱——伯南布哥省普拉亚人叛乱——后，内阁接着就去完成集中政治权力，甚至找到了权威去处理巴西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紧迫问题之一——奴隶贸易和与英国的关系问题。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三种产品——糖、棉花和咖啡——继续占巴西出口产品的75—80%。但是，第一次使巴西出现适度但是扎实的全面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咖啡。这个时期咖啡生产和出口的引人注目的扩大是巴西经济史上最惊人的特点。在西欧和美国日益扩大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出现了对咖啡的爱好。为了适应那里不断增长的需求，咖啡种植业扩大到了整个未开垦过的帕拉伊巴河流域的高原。这条河离里约热内卢城约70英里，流向与海岸线平行，大部分河段在里约热内卢省境内，但也流经米纳斯吉拉斯省的东南部和圣保罗省的东北部地区。帕拉伊巴河谷的土壤、海拔和气候特别适宜于培植咖啡。在巴西东南部这个新发展的咖啡种植区，土地价格飞涨，土地兼并加剧，又出现了甘蔗种植地区的那种大种植园。 719

独立时，咖啡在巴西最重要的商品作物中已名列第三。在1831—1835五年间，咖啡超过棉花和糖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到30年代末占巴西全部出口收入的40%，到1850年几乎达到出口收入的一半(见表1)。持续达一个多世纪的新的出口周期由此开始。在第一阶段，几乎全部咖啡生产都集中在帕拉伊巴河谷(80%在里约热内卢省)，由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数量日益增长(见表2)。到40年代后期，咖啡种植已扩展到圣保罗省的西部，从坎皮纳斯到里奥克拉鲁，把甘蔗田变成了咖啡种植园。同时不顾需要翻越马尔山这样困难的运输条件，将桑托斯变成了重要港口。1836—1837年，坎皮纳斯往桑托斯出口15.3万阿罗瓦糖，只有5,000阿罗巴咖啡。1850—1851年，坎皮纳斯出口的咖啡第一次超过糖。到1854—1855年，出口31.3万阿罗瓦的咖啡而只有

表1　1821—1850年巴西主要出口产品价值占出口总值的比例(%)

	糖	棉花	咖啡	前三项合计	皮张	其他*
1821—1830	30.1	20.6	18.4	69.1	13.6	17.3
1831—1840	24.0	10.8	43.8	78.6	7.9	13.5
1841—1850	26.7	7.5	41.4	75.6	8.5	15.9

* 其他指：烟草、可可、橡胶、马黛茶等。

资料来源：《巴西统计年鉴》(里约热内卢，1939/40)，第1380页。

表2　从里约热内卢出口的咖啡数量

（单位：阿罗瓦）

1792	160	1835	3,237,190
1817	318,032	1840—1841	4,982,221
1820	539,000	1845—1846	6,720,221
1826	1,304,450	1849—1850	5,706,833
1830	1,958,925	1851—1852	9,673,842

资料来源：斯坦利·T·斯坦著《瓦苏拉斯——巴西的一个咖啡县，1850—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1957)，第53页。

1.2万阿罗瓦的糖。①

巴西在世界咖啡产量中所占比例，从19世纪20年代的不足20%上升到30年代的30%和40年代的40%以上，此时巴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咖啡大部分出口到欧洲，特别是德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及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英国人更喜欢喝茶，而且只从它在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亚的

① 玛丽亚·特里萨·肖勒·佩特罗内著《1765—1861年圣保罗一个甘蔗实场的兴衰》(圣保罗，1968)，第166页。

殖民地进口咖啡并给予特惠关税，实际上将巴西咖啡排除出英国市场。巴西的出口收入稳步增长，从1822—1831的年平均380万英镑增加到1832—1841年的年平均540万英镑，主要得益于咖啡出口。而且，尽管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下跌，由于产量增加，40年代的咖啡收入仍超过30年代100多万英镑(见表3)。在1842—1851年，巴西全部出口收入平均每年增加590万英镑(在1852—1861年期间，更引人注目地上升到年平均增加1,090万英镑)。但是，鉴于在此期间巴西人口的增长(1850年已超过700万)，即使在东南部，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还没有超过中等速度。在东北部，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除了糖以外，出口部门发展较慢，有时停滞甚或实际上下降，人均收入或许有所下降。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尤其是圣多曼格作为世界最大蔗糖生产者的支配权的终结，促成了巴西制糖业的繁荣，但这次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无论在传统的东北部产糖地区巴伊亚和伯南布哥，还是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省的坎波斯周围，蔗糖生产继续增长，虽然相对地缓慢一些。在1831—1840的十年间，蔗糖生产总量比1821—1830年增长了50%。但是和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一样，在此期间国际市场糖价也在下跌，而且增加产量不足以维持出口收入的原有水平。由于咖啡出口增加，糖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821—1830年的30.1%下降到1831—1840年的24%；然后在此后的十年中又稍有回升，达到26.7%(见表1)。①

721

在19世纪30年代，巴西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古巴之后，是第三个主要食糖出口国，占世界糖产量的10—15%。但是在世界需求迅速扩大时期，巴西面临古巴蔗糖(主要出口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也扩大了它本身的生产)和欧洲甜菜糖日益加剧的竞争，逐

① 纳撒尼尔·H·莱夫著《巴西的发展不足与发展》(两卷集，伦敦，1982)，第1卷，第08页。

表3　1821—1850年巴西的咖啡出口

年　份	60千克袋装（单位：1000袋）	英　镑（单位：1000）	每袋价格（单位：英镑）	咖啡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百分比
1821	129	704	5.50	16.3
1822	186	789	4.24	19.6
1823	226	878	3.89	20.1
1824	274	704	2.57	18.8
1825	224	623	2.78	13.5
1826	318	690	2.17	20.8
1827	430	774	1.80	21.1
1828	452	659	1.46	15.9
1829	459	705	1.54	20.9
1830	480	663	1.38	19.8
10年合计	3,178	7,189	2.26	18.4
1831	549	964	1.76	28.6
1832	717	1,832	2.56	39.2
1833	560	1,383	2.47	42.4
1833/34	1,121	2,775	2.47	49.3
1834/35	970	2,435	2.51	45.7
1835/36	1,052	2,555	2.43	37.7
1836/37	910	2,237	2.46	40.9
1937/38	1,149	2,197	1.91	53.2
1838/39	1,333	2,494	1.87	51.3
1839/40	1,383	2,657	1.92	46.7
10年合计	9,744	21,529	2.21	43.8

续表

年　份	60千克袋装（单位：1000袋）	英　镑（单位：1000）	每袋价格（单位：英镑）	咖啡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百分比
1840/41	1,239	2,300	1.86	42.7
1841/42	1,363	2,311	1.69	46.8
1842/43	1,444	1,909	1.32	41.6
1843/44	1,541	1,933	1.25	41.0
1844/45	1,525	1,838	1.20	37.2
1845/46	1,723	2,259	1.31	39.7
1846/47	2,387	2,465	1.03	41.9
1847/48	2,340	2,936	1.25	43.4
1848/49	2,106	2,242	1.06	38.2
1849/50	1,453	2,462	1.69	41.5
10年合计	17,121	22,655	1.32	41.4

资料来源：阿卡索·德·E·陶奈著《巴西咖啡简史》(里约热内卢，1945)，第547页。

渐丧失了它在国际市场上的阵地。依靠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巴西工业技术落后，能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本有限。无论是巴西国内还是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费用都比较高。和咖啡的情况一样，由于英国给它自己的殖民地各种优惠，巴西糖实际上被排除在英国这个最大的市场之一之外。在1846年关税逐渐平等以前，每英担巴西糖需付63先令关税，而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的糖每英担仅付24先令关税。欧洲大陆是巴西糖的主要市场。（许多糖由英国船直接运到欧洲港口，或先运到伦敦再转口）。

至于棉花，自18世纪最后25年的初步繁荣以来，到19世纪30

年代和40年代，其生产和出口第一次经受绝对下降（直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得到恢复）。巴西棉花的主要国外市场当然是英国。英国在棉花进口问题上不实行本国殖民地优惠制，但是对廉价的美国棉花实行优惠，这使巴西在英国原棉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801—1810年的20%下降到1821—1830年的13%和1841—1850年的3%。结果，棉花在巴西出口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821—1830年的20.6%下降到1831—1840年的10.8%和1841—1850年的7.5%（见以上表1）。

若泽·博尼法西奥在1822年11月曾对英国总领事亨利·张伯伦说："我们还不致于如此荒谬，竟想成为制造商。因此我们愿意买你们的工业品，向你们出售我们的农产品。"① 在独立后的时期内，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英国与欧洲大陆相比，是巴西农产品的次要市场。早在1838年，美国也差不多与英国一样是巴西的重要出口市场。但是在那一年，英国供应巴西的商品占巴西全部进口商品的41%，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只占8%。到40年代后期，巴西进口的商品几乎一半来自英国（与之相比，大致10%来自法国，10%来自美国，10%来自葡萄牙）。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中，棉织品超过一半，棉、毛、麻织品加在一起占75%。其余25%是从金属制品、陶器、玻璃到帽子、雨伞、乐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业制成品价格甚至比初级产品价格跌得更快。因此，巴西出口（主要因咖啡增加出口，总的出口扩大了）的实际价值，如果按巴西的进口能力计算，是增加了。这个时期的贸易数字很难确定，但是据估计，在这二十年中，除1831、1837和1842三年外，巴西市场每年进口英国工业品价值约为200万至300万英镑，1851年上升到350万英镑。在大多数年份，英国对巴西的出口额仅稍低于（有些年份甚至高于。）英国对整个

723

① 引自c.k.韦伯斯特编《1812—1830年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外交部档案选编》（两卷集，伦敦，1938），第1卷，第215页。

西班牙语美洲的出口额。① 虽然巴西进口英国产品仅占英国出口总值的5—7%，对欧洲出口总值的1/4，对美国出口总值的1/3，但巴西居美国和德国之后，是英国第三个最大市场。

根据1827年英巴商约，和1810年的英葡商约一样，对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它们本身就已经很便宜）征收最高不超过15%的关税。这是巴西在唐·若昂留驻里约热内卢时期(1808—1821)以及紧接着的独立后时期，未能发展本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里约热内卢1850年有人口20万和其他巴西城市到处是手工业2人的坊，他们制造肥皂、腊烛、棉线、衣服、帽子、鼻烟、雪茄、家具和铁器，但是纺织和食品加工工厂(它们后来成为巴西早期工业发展的基础)直至1840年以后才出现，而且直至70年代以后才开始明显发展。在19世纪上半叶，除廉价的英国进口商品外，使巴西工业化较晚的其他因素有：缺乏工业燃料，特别是煤炭；运输条件简陋，没有公路、运河或铁路，只有内河与沿海的航运；国内或外国资本有限，银行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商业立法陈旧，妨碍建立股份公司；劳动市场受奴隶制支配；教育水平低下，几乎完全没有科学技术训练；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狭小，因为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不是奴隶就是自由的穷人，购买力有限；许多种植园都能自给自足；不存在一个全国性市场(仅有松散地结合起来的地区和当地市场)；在巴西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人中间盛行“自由放任”思想；以及政府未能鼓励工业发展。 724

对英国进口商品实行15%的最高税率的一个直接后果(实际上，由于巴西对它的其他贸易伙伴一律给予最惠国待遇，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实行15%的最高税率)，是限制了巴西政府的财政收入。到19世纪40年代，80%的财政收入来自关税(见表4)。这个时期——对外和对内进行战争的时期——的政府支出平均超过政府

① D.C.M.普拉特著《1806—1914年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伦敦，1972)，第39页。

表4　1830—1850年关税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总额

年　　份	里约热内卢关税收入占关税收入总额的百分比	关税收入总额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
1830/31	44	47
1831/32	54	42
1832/33	55	57
1833/34	55	59
1834/35	53	50
1835/36	53	59
1836/37	53	77
1837/38	54	74
1838/39	55	78
1839/40	57	78
1840/41	58	84
1841/42	60	82
1842/43	56	80
1843/44	54	79
1844/45	50	78
1845/46	51	80
1846/47	49	78
1847/48	49	78
1848/49	54	79
1849/50	49	81
1850/51	50	82

资料来源：阿马罗·卡瓦尔坎蒂著《前巴西帝国1889年财政概况》(里约热内卢，1990)，第330页。

财政收入40％。因此流通的货币不断增多。1839年和1843年又在伦敦筹借贷款。

1827年英巴商约。也象1826年的反奴隶贸易条约一样，是在巴西十分软弱、需要依靠英国的时候通过谈判签订的；它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并获得英国承认的时间还不久。巴西人对这项商务条约日益感到厌恶。它特别使正在台上的保守党人恼怒(前面讲过，他们在1837—1840年和1841—1844年期间执政)。首先，他们憎恨条约授予英国人治外法权，尤其是任命英国人自己的为被告人辩护法官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是与巴西的主权不相容的。其次，该条约给巴西带来不小的财政困难。到40年代，开始出现一些初步迹象，表明有些人已认识到，保护国内制造业，提高关税率，不仅是财政收入的宝贵来源，也可以是改变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确实，对英国商品征收低关税，与英国对进入英国市场的巴西农产品征收非常高的禁止性关税，形成对巴西极不利的对照。除非英国改变它的商业政策，降低巴西糖和咖啡的进口税，允许在英国与巴西之间进行比较平衡的贸易，否则巴西有充分理由对英国工业产品提高关税。巴西在较早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尝试，想修订1827年条约，将英巴贸易关系置于比较平等的地位——1836年派遣巴巴塞纳代表团前往伦敦——结果失败。但是条约将于1842年11月(批准后15年)期满。(实际结果是英国援引了条约的一项条款，根据这一条款。条约的有效期可延长至1844年11月。)整个巴西普遍感到，倘若不作彻底修订，条约不应续订。

725

在英国，此时要求自由贸易尤其是要求降低对进口食品的关税的压力日益增长。可是在糖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复杂的因素：奴隶制。巴西(还有古巴)的甘蔗是奴隶生产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利益集团可以用比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维护殖民地优惠制。放弃对奴隶生产的蔗糖实行财政上的歧视政策，除了会破坏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外，还会刺激巴西和古巴的生产，因而也刺激它们对奴隶的需求，破坏英国争取在全世界废除

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努力。1841年底，英国政府向巴西建议签订一个与原有条约相似的新商务条约(对英国制成品给予优惠税率)，但是有重要和惊人的补充：英国对巴西糖减少进口税；作为回报，巴西除履行现行条约规定的关于禁止奴隶贸易的承诺外，将早日(具体日期通过谈判决定)宣布所有女奴生下的孩子都获得自由，并考虑尽早解放所有奴隶。

726

1842年，一个由亨利·埃利斯率领的特别代表团来到巴西，他们发现里约热内卢的报界和公众舆论反对"用条约奴役巴西……激烈和无礼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埃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主要目的——说服巴西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证"在不远的时期内"在巴西废除奴隶制"根本不可能实现"。① 巴西不在奴隶制问题上让步，英国就不能在食糖进口税问题上让步。而英国不让步就不可能重新签订现有商务条约。当埃利斯与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商人商议时，他吃惊地发现，他们不再太重视在巴西的司法特权和15%的优惠税率；当过去英国在巴西市场上开始树立其地位时，上述条件是有用的，但是只要对英国商品已没有明显的歧视，英国对它最邻近的对手的经济优势将保证英国继续保持在巴西的优越地位。但是，埃利斯甚至未能签订一个只要保证英国商人和他们的货物获得与其他国家同等待遇的条约。作为给英国制成品以最惠国待遇的回报，巴西谈判代表要求英国对巴西的糖、咖啡、烟草和其他农产品征收的关税高出对英属殖民地产品征收的关税至多不超过10%，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取得同等条件。至于废除奴隶制问题，当时的保守党外交大臣奥诺里奥·埃尔梅托·卡尔内罗·莱昂毫不含糊地声明，这是"将来而不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1843年3月谈判破裂，在巴西激起一阵敌视英国的新浪潮。这一年晚些时候在伦敦重开谈判，仍未成功。在巴西坚持下，1827年的条约于1844年11月终止。

① 引文摘自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第232页。

在英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圈子里，对于这次谈判未能以至少签订一个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约以取代1827年的条约，会对英国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表现出一定的忧虑。1843年12月，预料到条约即将终止，巴西保守党政府任命一个关税委员会准备对进口商品实行新税率。政府给委员会的指示表明，政府再次表现出对保护民族工业对付外国竞争的关心。对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将征收最高税率(60%)。而对新兴纺织工业所需机械则免除一切税收(1843年5月17日法令)。1844年2月，自由党重新掌权。财政大臣曼努埃尔·阿尔韦斯·布兰科1844年8月宣布的新税率稍微减少了一点保护主义。只有烟草及有关产品征税60%。棉布和棉纱仅征税20%，这样的税率对英国的进口商品很少甚至没有不利影响(1844年8月12日法令)。但民族工业继续享有免税进口机械和原料的优惠，它们的职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1846年8月8日法令)。40年代末，政府为了进一步使经济多样化，开始贷款给象伊里内乌·E·德·索萨(后封毛阿男爵)这样的工业家，他后来成为帝国最活跃的企业家(1848年10月2日法令)。尽管这些措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表明国家作用扩大了，还表明企图在巴西扩大经济活动并使之多样化。然而，1844年把大部分税率从15%提高到20%或30%，其主要目的是财政方面的，而不是保护主义的。政府财政收入从1842—1843年至1844—1845年增加了33%。到1852—1853年又比1842—1843年增长了一倍。①

对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来说，1827年条约在1844年终止也有它有利的一面。该条约曾保证巴西糖与其他输入英国市场的外国糖享有同等的减税优惠。罗伯特·皮尔爵士已经分两个阶段降低咖啡的关税，外国咖啡从每磅15便士降到6便士，英属殖民地咖啡从每磅6便士降到4便士(这是英国政策不一致的一个例子，如果

① 阿马罗·卡瓦尔坎蒂著《前巴西帝国1889年财政概况》(里约热内卢，1900)，第328页。

咖啡能够减税，为什么糖不能？）现在他又将对自由民生产的外国糖（例如瓜哇糖）征收的关税降低到每英担34先令，而对奴隶生产的糖每英担仍征收63先令不变。一年后，对从英国殖民地进口的糖的关税进一步降低到每英担14先令，外国自由民生产的糖降低到每英担23先令。但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皮尔政府垮台。

728

接着辉格党首相约翰·罗索勋爵建议用5年时间（后来修订为8年）逐步减少有利于英国殖民地的食糖进口税的差别，直至最终对"不论是什么人生产的，不管从什么地方进口的，所有种类的糖"的关税一律相等。（到1851年，对咖啡的关税也一律平等了。）英国针对巴西糖和咖啡的歧视就这样在1846年以后逐渐结束。《食糖关税法》无疑刺激了巴西（主要是东北部）的制糖业。例如，伯南布哥的糖产量从1844—1845年的4.2万吨上升到1846—1847年的5.1万吨和1848—1849年的7.3万吨。① 糖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841—1845年的22%上升到1846—1850年的25%。咖啡出口也继续上升，1846—1850年比1841—1845年增加了40%，但是英国降低进口税对巴西的咖啡生产影响不大。正如英国某些废奴主义者所担心的，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巴西对奴隶的需求增加，尽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不仅是因为对进入英国市场的奴隶种植的农产品停止征收歧视性关税。而且，辉格党政府（帕默斯顿勋爵担任外交大臣），按他们的话来说，虽然放弃了"财政上的胁迫"政策，但丝毫没有打算放弃用"物质胁迫"的手段来进行的结束奴隶贸易的斗争。

巴西的奴隶贸易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直左右着巴西与英国的关系。1826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1830年3月生效）和巴西法律（1831年11月）早已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然而此后奴隶

---

① 小大卫·艾伯特·登斯洛著《1858—1908年巴西东北部和古巴的食糖生产》（耶鲁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74），第9页。

贸易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831年和以后几年，事实上输入巴西的奴隶数目很少，主要原因是，抢在可能要废除奴隶贸易之前，1827—1830三年间输入了17.5万名奴隶。（1831 年以后输入巴西的奴隶数目，见表5。）因此出现了对奴隶需求的暂时下降，奴隶价格也变得便宜。但是合法奴隶贸易的结束正好与咖啡种植业在整个帕拉巴伊河谷迅速扩展同时发生。咖啡大种植园从一开始就使用奴隶劳动，大多数从非洲输入。奴隶们砍伐森林，培植咖啡树，收获并加工咖啡豆，维护种植园，有的则在主人的大邸宅里劳动。此外，即便奴隶劳动力已组织起来，但由于巴西的奴隶死亡率极高，以致不断需要从大西洋对岸定期补充。法国移民夏尔·奥古斯特·陶奈在他的《巴西农业手册》（1839）一书中写道："美洲在吞噬黑人。倘若不能不断输入，取得补充，这个种族将

表5　巴西的奴隶进口（1831—1855）

729

年份	奴　隶　数	年份	奴　隶　数
1831	138	1844	22,849
1832	116	1845	19,543
1833	1,233	1846	50,324
1834	749	1847	56,172
1835	745	1848	60,000
1836	4,966	1849	54,061
1837	35,209	1850	22,856
1838	40,256	1851	3,287
1839	42,182	1852	800
1840	20,796	1853	—
1841	13,804	1854	—
1842	17,435	1855	90
1843	19,095		

资料来源：《外交部备忘录》，1864年8月4日，摘自莱斯利·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剑桥，1970）第388—393页附录：1831—1855年巴西输入奴隶的估计数目。

很快从我们中间消失”。① 因此，在巴西，特别是在中南部咖啡地带，对奴隶的需求很快再次兴起，价格上升，巴西的奴隶贸易1830年以后又逐渐在非法的、然而非常有利可图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

在摄政领导下工作的历届巴西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去实施1831年的反奴隶贸易法。历届政府大多脆弱而且短命，没有足够的财政、陆军和海军力量，它们忙于处理政治和宪法问题以及有可能破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各省叛乱。再说，在基层实施法律的权力掌握在选举产生的地方治安法官和国民警卫队军官手中，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不接受贿赂，而且大多数本人就是地主或与地主阶级有紧密的家庭联系和利害关系。而地主阶级与恢复和扩大非法的奴隶贸易有着利害关系。除了个别例外，他们都嗾使非法的奴隶输入。奴隶贩子被逮捕和带到当地陪审团前，总是宣判无罪。非法输入的奴隶一旦通过了海岸线，法律就管不着了；咖啡种植园主和糖厂老板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的庄园内行使着最高权力。

1835年有一个短时期出现过明显的反对奴隶贸易的反应。那是1835年1月24日和25日在巴伊亚爆发较大范围的马累人（非洲的穆斯林）叛乱以后，这次叛乱是19世纪最严重的城市奴隶暴动。结果，暴动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尽管非常激烈。大约有40名黑人、奴隶和自由民丧生。数百人被起诉并判刑。18人被判处死刑（实际被处死的有5人）。其他的判决包括驱逐出境至非洲、强制劳动和体罚（有些奴隶被处以笞刑鞭打一千鞭）。巴伊亚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1835年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凡是杀死或严重伤害他们的主人或监工的奴隶一律处死。刑法原先规定，死刑判决必须有陪审团全体一致的裁决，现在对这一条作了修改，只要2/3的多数就够了，而且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不准上诉。这样，国内

① 引自斯坦利·J·斯坦著《瓦苏拉斯，巴西的一个咖啡县，1850—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1957），第227页。

安全和白人统治迅速得到增强。即便如此，巴伊亚的奴隶叛乱，以及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类似奴隶叛乱的威胁提醒巴西白人，每年合法或非法地输入数以千计的非洲奴隶本身就包含着危险。自由派编辑埃瓦里斯托·达·维加认为，输入一个新奴隶就是在巴西地雷中增加一桶炸药。[①]即使对奴隶叛乱的恐惧减退后，"非洲化"的担心继续存在。

尽管如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非法奴隶贸易仍逐步发展起来，沿海岸巴西当局很少或完全不加干预，直至最终达到并超过1826年以前的水平。到1836年底，奴隶价格在五年内第一次下跌。1837年9月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首脑是贝尔纳多·佩雷拉·德·瓦斯康塞洛斯，他大声疾呼地反对1826年条约和1831年法律）抵制了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各市镇日益增长的废除反奴隶贸易立法的要求，但也没有努力去实施它。先前各届自由党政府采取的有限的反奴隶贸易措施大部分都被废弃了。甚至以反对奴隶贸易闻名的大臣们也认为对那些参与奴隶贸易的人提起诉讼毫无用处，因为正如巴西外交大臣1838年2月对英国代办说的，"根据经验，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没有一个法庭会对他们判罪"。[②]在1837—1839三年中，每年至少有3.5万名（很可能多达4.5万名）奴隶非法运进巴西，主要来自刚果、安哥拉和莫桑比克。80—90%在里约热内卢以北的坎波斯和以南的桑托斯之间一带沿海登陆，有的就在首都上岸，大多数显然运往帕拉伊巴河谷的咖啡种植园。

731

1837年前后，巴西政府不但抵制了来自里约热内卢英国公使馆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它实际上在巴西充当一个废奴主义者社团的角色，要求巴西通过并实施更有效的反奴隶贸易立法），而且拒绝向英国让步，不同意让英国海军（特别是西非分遣舰队）必要时

① 《河滨曙光报》，1835年3月20、27日、4月4日。

② 引自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第84页。

在公海上制止奴隶贸易。根据1817年签订的英葡条约，英国海军舰艇有权在非洲和巴西（当时只限于赤道以北）之间登船搜查怀疑非法进行奴隶贸易的船只，如怀疑得到证实，有权将船只扣留。1831年，巴西同意将1817年条约规定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巴西全境（因为现在在赤道以南贩卖奴隶也已属非法），并将条约有效期从1830年3月起延长15年。被捕获的巴西船只可押送到塞拉利昂或里约热内卢由英巴混合委员会裁断。但是1817年条约没有关于“装备”和“拆毁”的条款，而这两条是西非分遣舰队发挥有效作用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说，对于有贩运奴隶的装备，但并未实际装运奴隶的船只，不得登船搜查和扣留。对于已被混合委员会定罪的船只不能为了防止它再次进行奴隶贸易而予以拆毁。所有为了加强这个条约与巴西进行的谈判年复一年地进行了多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可是，即便谈判成功了，对英国舰队反奴隶贸易的活动减少了限制，19世纪30年代的西非分遣舰队也缺少必需的数量——还应该说缺乏必需的速度——去制止巴西奴隶贸易的增长。即使有一支更强大的海上警察部队，也会无济于事。

1839年，英国的辉格党政府，尤其是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732 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制止，如今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巴西奴隶贸易。这些措施包括：通过所谓《帕默斯顿法》，单方面扩大英国海军的权力，它可以拦截悬挂葡萄牙旗的贩奴船（不管船上有无奴隶）并将它们押送到英国海事法庭受审；确认混合委员会英方委员在里约热内卢和弗里敦（塞拉利昂）的以下裁决，即1817年条约与1826年条约准许英国巡洋舰搜查并扣押企图进行奴隶贸易的巴西船只；加强西非和好望角分遣舰队，制止奴隶贸易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责任；决定允许英国战舰在执行反奴隶贸易巡逻时沿海岸巡航，进入非洲水域与河流，封锁非洲沿海要津。（此时南美洲分遣舰队也变得更为活跃，但是可用来巡逻巴西海岸的舰艇相对不足，而且它们不得不谨慎从事，避免对正常的沿海贸易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对巴西领水主权也不得不表示某种象

征性的尊重。即便如此，与巴西地方当局的磨擦仍难完全避免。部分地由于英国主动采取以上措施，英国海军捕获的贩奴船数目明显增加，结果在1839年中至1842年中的三年间，运进巴西的奴隶人数下降到不及不久前的一半(见表5)。在自由党短暂执政期间(1840年7月—1841年3月)，巴西当局某些人士对限制奴隶贸易多少做了一些比较坚决的工作，奴隶贸易的相对下降也可能与此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30年代后期的大量输入使市场上暂时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

正是在40年代初期奴隶输入减少的背景下，同时由于至少有一些人已认识到奴隶贸易甚至奴隶制本身归根结蒂终究是要衰落的，1841年3月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政府与里约热内卢省的咖啡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开始考虑用其他劳动力资源来代替奴隶的问题。对欧洲移民的预算分配已于1830年终止，在摄政时期几乎完全没有做鼓励移民的工作。30年代到达的移民比20年代更少，事实上在30年代的头五年，完全没有移民(见表6)那些来到的移民则不愿长途跋涉数千英里到甘蔗或咖啡种植园里去和非洲奴隶一起劳动。1841—1842年重新为移民工作提供预算拨款，但这样做是不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引诱到巴西来的自由的移民劳动力固定在咖啡种植园里，组织起来进行奴隶劳动。因为首先，广袤无垠的公共土地可以随意使用(也就是说，如何防止移民占用公共土地，成为土地所有者。其次，咖啡地带由于劳动力不足而进行竞争。

1842年8月，瓦斯康塞洛斯仿照E.G.韦克菲尔德的澳大利亚垦殖计划(首次发表在《来自悉尼的一封信(1829)》中)起草了一份计划，提交给国务委员会。计划有两个目的。首先，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塞斯马里亚份地(sesmaria)制度(皇家授予公共土地的制度)已于1822—1823年终止并无取代办法。结果，一直混乱不堪的私有土地地契如今已处于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引起了局部冲突和暴力行为。

表6 （1820—1855）年进入巴西的欧洲移民

年份	移民人数	年份	移民人数
1820	1,790	1838	396
1821	0	1839	389
1822	0	1840	269
1823	0	1841	555
1824	468	1842	5,568
1825	909	1843	694
1826	828	1844	0
1827	1,088	1845	2,364
1828	2,060	1846	435
1829	2,412	1847	2,350
1830	177	1848	28
1831	0	1849	40
1832	0	1850	2,072
1833	0	1851	4,425
1834	0	1852	2,731
1835	0	1853	10,935
1836	1,280	1854	18,646
1837	604	1855	11,798

资料来源：根据乔治·p·布朗著《1822—1870年巴西帝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一书中的资料，美国天主教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第328页。

塞斯马里亚份地(其中大部分已超越它们原来的合法界限)将予以重新确认，在公地上定居的人所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将予以合法化。对地产要进行丈量、登记，有的地产要减少，费用一律由业主负担。其次，瓦斯康塞洛斯计划的目的在于吸引贫穷的青壮年男劳力向巴西移民同时把他们束缚在咖啡种植园里。公有土地只在将来出售，而且故意把价格定得超出市价。计划的论点是，如果土地必须用钱购买，而且价格昂贵，移民们势必要工作几年以后才买得起一小块归己所有的土地(他们还得偿还一部分移居费

734

用）。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加上每年的土地税可以用来补贴输入自由劳动力。

1843年6月，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向众议院提出一个包括以上内容的议案。他说，“我们不能让从世界其他地区来到我们这里的自由劳动者，到达巴西后，还没有为土地所有者至少劳动一些时候……就立即得到公有土地”。①这个议案获得主要受益者、帕拉巴伊河谷咖啡种植者的代表们的大力支持，但是其他省份的代表并不认为如此迫切需要欧洲移民，因而不愿为这个主要对里约热内卢省有利的议案付出代价。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代表的反应特别强烈。这两个省有许多拥有大片尚未合法化的土地的人。他们反对登记土地，也反对高价出售。征收土地税引起舆论大哗。某些代表预言，议案如获通过，可能爆发内战。尽管如此，1843年9月16日，保守党占多数的众议院经过微小的修正后批准了议案并送交参议院。但是议案在自由党执政的五年内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40年代末另一个保守党内阁上台（内阁中包括罗德里格斯·托雷斯），才设法使之成为法律，尽管经过了重大修改。

在此期间，奴隶贸易在减少活动若干年后开始再次恢复。1845年3月，根据先由国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由蒙蒂阿莱格里侯爵〔若泽·达·科斯塔·卡瓦略〕、瓦斯康塞洛斯和奥诺里奥三名主要保守党成员组成），然后又由年轻皇帝主持的国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建议，巴西政府在1830年15年后决定终止1817年反奴隶贸易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海军行使了搜查被截获的巴西贩奴船的权利，英巴混合委员会作出了裁决。这不只是为了巴西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使奴隶贸易摆脱英国干预的问题。（巴西人坚持——不是很令人信服——他们自己能制止奴隶贸易。）在追捕奴隶贩子时，英国的行动很蛮横，有时还很粗暴。如今在公众的心目中，继续奴隶贸易不仅是个经济生存问题，而且与国家的主

735

① 引自沃伦·迪安著《19世纪巴西的大庄园制和土地政策》，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杂志，第51期（1971年11月），第614页。

权联系在一起。这项条约以及任何谈判签订新条约的企图却极端不得人心。早在1842年10月，儒斯蒂尼亚诺·若泽·达·罗沙已在《巴西》报上写道："如果今天在这个国家存在一种普遍的甚孚众望的看法，那就是英国是我们的最背信弃义、最顽固的敌人"。①

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无意放弃反对巴西奴隶贸易的斗争。首相皮尔和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遭到了帕默斯顿的攻击，指责他们允许巴西在1842年后恢复奴隶贸易。现在重订或更换1827年商约的谈判已经失败(参阅上文)，他们经受不起在巴西这个软弱的从前依附英国的国家的压力面前作第2次退却，特别是因为把巴西置于"迄今证明唯一有效的抑制手段所达不到的地方"，必然会导致奴隶贸易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1817年条约一直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引起了无休无止的争吵，现在有机会抛弃1817年条约，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如果可能找到一种相等的而且是更有效的代替办法的话。如今1826年的条约依然完全有效，只是没有关于搜查和扣留的特别条款。但根据第一条，应将巴西的奴隶贸易"视为海盗行为，并作为海盗行为对待"。英国人发现，"海盗行为"这个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1845年8月的《(巴西)奴隶贸易法》(在巴西称为《阿伯丁法》授权英国海军将巴西贩奴船作为海盗船对待，并可押送它们到英国海事法庭受审。

736 《阿伯丁法》的根据是对1826年条约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甚至在英国也是有争议的。(理查德·伯顿在他所著《对巴西高原的考察》(1869)一书中称，这个法案是"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国的最大侮辱之一"。)英国公使向伦敦报告说，通过法案的消息在里约热内卢不可避免地使"公众情绪激动……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议论、恶意和谩骂"。② 1846年6月重返外交部的帕默斯顿对外国舆论不甚关心。在他看来，《阿伯丁法》中所规定的措施按情况需要

① 《巴西报》，1842年10月1日。

② 引自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第265页。

来说还不够严厉。但他对本国批评者对政府的指责倒是敏感的，他们指责辉格党提出的《糖税法》将破坏《阿伯丁法》所起的全部好作用。他警告，倘若巴西的奴隶贸易继续发展，英国将诉诸“更严厉的强制措施”。①

1845—1850这五年，西非和好望角分遣舰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成功。它捕获了400多艘专门从事巴西奴隶贸易的船只，并把它们送往海事法庭(其中一半送到圣赫勒拿岛，其余送往塞拉利昂和好望角)。可是奴隶贸易继续发展。确实，在40年代后期，由于需求旺盛，奴隶价格高涨，奴隶贸易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水平：1846—1849年，至少每年有5万至6万名奴隶运进巴西(见表5)。其中2/3在里约热内卢以南和以北沿海200英里长的地段内登陆，其余的上岸地点是首都(这里仍能见到公开拍卖新近运到的奴隶)、巴伊亚和伯南布哥以及在桑托斯以南靠近巴拉那瓜处新开辟的一地点。现在的奴隶贸易较之以往更高度地组织起来。第一次使用了汽船——汽船引擎是“英国所能制造的最好的”。现在奴隶贸易已成为一种大行业，象曼努埃尔·平托·达·丰塞卡和若泽·贝纳迪诺·德·萨这样的奴隶贩子，十年前还在小杂货铺里当差，如今掌握着雄厚的财源并对政治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写道，“他们是巴西的大财主，成了显赫一时、腰缠百万的暴发户阶级”。② 据英国公使詹姆斯·赫德森1847年1月报告，巴西外交大臣凯鲁男爵曾这样说：“〔丰塞卡〕和许多较小的奴隶贩子进宫觐见时坐在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公民的位子上，有的是众议院议员，甚至在国务委员会也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警惕性、坚定性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他们不敢硬碰的人就进行收买……对这样一些人，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③

737

① 同前，第295页。

② 同前，第289页。

③ 同前，第290页。

1844—1848年期间的各届自由党政府力量不够强大，执政时间也不长，无法考虑（更谈不上取得议会支持并执行）新的反奴隶贸易措施。较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对奴隶贸易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感到不安，虽然有些人首先关注的是不断输入"数以千计的海地制度的维护者"对巴西社会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也意识到，一个本国国旗在公海上不受尊重、本国的某些法律要由外国人来实施的国家，很难把自己看成是已完全取得独立和充分行使主权的国家。然而大多数在国务委员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巴西政治家都积极支持奴隶贸易（有的本人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主，间接地参与奴隶贸易），或者鉴于它对巴西经济的重要性，宁愿放任不管。1848年由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索萨-梅洛领导的最后一届自由党政府终于想到向众议院提出新法案，但是取代1831年法律的法案拖进到1850年1月开始的下一届议会才能讨论。因此把这个巴西最棘手的问题留给了1848年9月掌权的保守党政府。

40年代后期，在英国反对英国自命为反奴隶贸易的世界警察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者主要是北部的厂主和商人以及自由贸易主义者，也有废奴主义者。这种制止奴隶贸易的方式耗费巨大；它使英国——譬如说——同巴西的政治关系，因而也同它的商业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方式已告失败。用下院议员（代表盖茨黑德）威廉·赫特的话来说，英国应该"把对世界的道义管理……交给一个更高的权威"。甚至《泰晤士报》也在1849年10月问道，"使用和不使用我们的分遣舰队对奴隶贸易产生的差异，值得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调动分遣舰队吗？"① 但是辉格党和皮尔派领导人——帕默斯顿、皮尔、阿伯丁、罗素——决心抵制任何削弱甚至摧毁以英国海军力量为基础的制止奴隶贸易的制度的企图。"压制派"非常需要的是一次显著的成功，还有什么比最终扑灭巴西奴隶贸易更好的成功呢。1849年谣传，帕默斯顿正在

738

① 《泰晤士报》，1849年10月24日。

准备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而且是第一次在大西洋的巴西一边采取措施。到40年代结束时，奴隶贸易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无论在巴西还是在英国，有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清楚，解决奴隶贸易问题不会拖得太久了。

1848年9月，在自由党统治四年半以后，唐·佩德罗二世皇帝邀请前摄政(1837—1840)佩德罗·德·阿劳若·利马(奥林达子爵)组织一个保守党内阁。保守党刚一重新掌权几乎立即面临自由党在各省的武装叛乱，就象自由党在1841—1842年所做的那样。这次叛乱不是发生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它们现在与里约热内卢的中央政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在伯南布哥。这一次是在1848年底爆发的，是这个时期最后一次较大的外省叛乱。这次暴动以“普拉亚人叛乱”著称，这个名称来源于一条街名——自由党一家报纸的印刷厂就坐落在这条普拉亚街上。这家报纸发表一些文章有些是早期的外省叛乱中司空见惯的，有的是针对伯南布哥的。

乍看起来，伯南布哥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譬如说——巴伊亚省没有多大差别。两省都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城市，周围是被富有的种植园寡头集团控制的产糖地带。在这个地带的边缘上，以及地带以外，有各类较小的种植园主、农场主和养牛户。但是这两个省的政治斗争传统很不相同。在巴伊亚省，保守的雷孔卡沃家族总是有能力制止省会的城市激进分子，广大的内地一直保持平静。而在伯南布哥省，自1817年和1824年两次叛乱以来，城市激进分子和整个种植园主阶级都卷入了这个省的政治，甚至外围地区的农村贫民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卡巴诺派战争(1832—1835)。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自由和保守两派政治力量分裂后，在伯南布哥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力量组合。马塔地区的糖业寡头集团发生分裂，著名的卡瓦尔坎蒂家族组成自由派，加入他们的有城市的新闻工作者和鼓动者，还有马塔地区周围的地主。

1844年里约热内卢的保守党政府垮台后，伯南布哥的自由党的普拉亚派起来掌权。普拉亚派省长利用保守派提出的立法，彻底更换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人员，以自己的拥护者取代保守派。后来中央的政治情况发生进一步变化——阿劳若·利马组成保守党内阁，他本人系伯南布哥人——使保守党1848年重新在伯南布哥掌权，他们试图摧毁普拉亚派建立的政治基础。正是这种情况在1848年11月引发了自由党的武装叛乱，虽然自6月起形势已趋紧张（当时累西腓爆发反对葡萄牙人的暴乱，使5名葡萄牙人丧生，40人受伤）。这场斗争大部分发生在马塔的南部周围地区，以及累西腓以北的所谓干旱的马塔地区。20个糖厂是招募新兵和向自由派军队提供装备的基地。1849年2月，叛乱者的北路和南路军队约2,500人集中力量进攻累西腓。但是他们未能获得城市群众的支持以至失败，500人暴死街头。战斗在内地持续了一段时间，游击队在种植园主的保护下一直坚持到1850年，但是没有对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739

叛乱者最激进的要求有实行联邦制、废除皇帝的调处权、驱逐葡萄牙人和零售业国有化，还有一件新花样——实行普选。这些要求是由城市领导人系统地提出来的，特别是佩德罗一世的共和派老对手博尔热斯·达·丰塞卡。但是，尽管1848年法国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要求中并未包括建立共和政府。而且，再一次丝毫未触动奴隶制这场斗争虽然在城市里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工作，但结果主要只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吵。他们分裂的原因至今不完全清楚。无疑，对少数家族控制湿润的马塔地区的肥沃土地存在着愤恨，尽管卡瓦尔坎蒂斯家族自己控制着这个地区1/3的种植园和糖厂。英国《糖税法》（1846）或许也起了作用。正如我们前面已讲到的，作为这项法律的直接后果，伯南布哥糖的生产在1844—1845年与1848—1849年之间增加了70%，但价格从每吨78美元降到64美元。较富有和创业已久的蔗糖生产者肯定对生产过剩的困难有较好的准备，而较小的生产者

和那些因初期为糖价上涨所吸引而放弃了种植棉花和养牛的人，肯定受害最大。此外，甘蔗生产的扩大还导致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小种植园主、公地定居者和自耕农的土地，使他们对普拉亚人产生同情。 740

普拉亚自由派1848—1849年的失败，也许还加上这些年遍及欧洲的自由党人的失败，加强了里约热内卢保守党政府，巩固了整个巴西的保守党的权力。1849年的众议院选举结果实际上清一色由保守党垄断，自由党人仅赢得一个席位。1850年，保守党对他们在1837年开始的政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进行最后一件工作：将国民警卫队置于中央政府更牢固的控制之下。取消了1831年确立的选举原则。军官现在由省长或直接由中央政府任命，再由军官任命他们的军士。① 此外，军官必须具有选举人的收入条件(现在是400米尔雷斯，约合46英镑)，还必须为他们的委任状支付一笔相当于本人军阶的一个月薪金的款项。这个规定实际上限制了通向军官团的门路，警卫队员中仅有少数人具备上述条件。乍看起来这项措施可能被解释为反对当地富豪的步骤。但更准确的看法是，象其他中央集权法律一样，它是中央政府与地主之间的一种妥协。一方面，它表明没有地主的帮助政府无力维持内地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说明没有政府的调解地主们无力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这一改革就是将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吸收进政治体系，用以交换承认他们的社会力量，使之合法化。

1848年9月掌权的巴西政府，特别是在1849年10月蒙蒂阿莱格里侯爵取代了奥林达担任大臣会议主席以后，是独立以来最强有力的政权。象1837—1840年的，特别是1841—1844年的保守党政府一样，它是国家官员和地方行政长官与里约热内卢省的土地

① 与此同时，1850年9月6日的法令规定军队中的提升应以立功多少和服役时间长短为依据。据约翰·舒尔茨所著，《1850—1894年巴西军队的政治》(普林斯顿大学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1973第53—58页)，这个法令在消除按个人影响和地位进行提升的做法以及在军队职业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所有者尤其是咖啡种植园主的联盟。它的主要人物是保利诺·苏

741 亚雷斯·德·索萨(外交大臣)和若阿金·若泽·罗德里格斯·托雷斯(财政大臣),还有欧塞比奥·德·克罗斯·科蒂尼奥·马托佐·达·卡马拉(司法大臣),他出生在安哥拉,是法官的儿子,与里约热内卢一个富有的"资本家"家族联姻。这个政府在国务委员会中还得到贝尔纳多·佩雷拉·德·瓦斯康塞洛斯(直至1850年5月他死于黄热病)和奥诺里奥·埃尔梅托·卡尔内罗·莱昂等人的有力支持。

所有这些人,除欧塞比奥外,都是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的知名成员,那几届政府曾不顾英国反对,允许非法的奴隶贸易欣欣向荣。可是这一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象上届自由党政府一样,看来已准备认真对付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除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古巴以外,如今巴西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是孤立的。用不了多久,巴西的农业将不得不使其本身适应奴隶贸易的终止。如果巴西人不想让英国人来终止奴隶贸易——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英国现在比过去有更大的决心这样做,甚至准备将反奴隶贸易的海军行动转移到巴西沿海——他们有朝一日终将不得不自己来制止这种贸易。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有权威的自尊的巴西政府能够允许继续这样普遍地藐视法律。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巴西对战略上敏感的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心,它认为乌拉圭的独立和帝国本身的领土完整正受到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威胁。一旦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战(目前正在为与乌拉圭的反罗萨斯派别和恩特雷里奥斯省的乌尔基萨将军建立联盟铺平道路),巴西至少需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而只有解决奴隶贸易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巴西国家的较大利益集团开始在若干方面要求采取行动反对巴西的奴隶贸易。1849年底,司法大臣通知里约热内卢警察局长,政府正在准备终止奴隶贸易的新措施,打算在下一年向众议院提出。

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南美分遣舰队的一些舰只从拉普拉塔河

地区转移到巴西沿海，专门是为了完成反奴隶贸易的任务。从捕获的奴隶人数来看，1850年1月是英国海军在大西洋的巴西一侧最成功的一个月。在巴西政府能够采取任何行动以前——5月间在欧塞比奥·德·克罗斯向众议院的报告中许诺提出一个法案——英国采取了一个决定性步骤，这一步骤最终制止了巴西的奴隶贸易。1850年4月22日，也就是在154名下院议员——比1848年一次类似的辩论中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投票反对英国继续用武力制止外国的奴隶贸易以后一个月，英国外交部通知海军部，根据1845年《阿伯丁法》，英国战舰无需将反奴隶贸易军事行动限制在公海上，它们可以进入巴西领海乃至巴西的港口。6月22日，南美分遣舰队司令官雷诺兹海军少将将此指示传达给他的舰只。随后巴西沿海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英国舰船"科摩兰特"号(船长舍姆贝格)与巴拉那瓜要塞之间发生交火。 742

巴拉那瓜事件的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时，引起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有些人议论要向英国开战。但是巴西没有道义或物质手段抗拒这次对它主权的露骨侵犯。而且，英国的"战争行动"如果继续下去并进一步扩大，会使贸易瘫痪，损害经济，破坏国家财政，煽动奴隶居民，危及国内稳定和团结，削弱巴西未来与罗萨斯对抗的地位，(不久前的海军行动的规模以及在它背后蓄意的计划都被夸大了。)7月11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巴西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完成它自己的制止奴隶贸易的计划，即使这样做看起来是向英国侵略投降(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现在自己采取行动已经太迟了。最后，欧塞比奥在7月12日向众议院提出法案，要求加强1831年法律，尤其是建立特别海事法庭处理奴隶贸易案(早已宣布奴隶贸易相当于海盗行为)。法案迅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于1850年9月4日成为法律。皇帝如今已25岁，开始在政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守党顽固分子意欲强行改换内阁的企图在最后一分钟被他拒绝。

部分地由于英国西非和南美分遣舰队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多

年大量输入后再次造成供过于求，50年代奴隶贸易大大削弱，这使巴西政府的任务较易完成。在1月至6月间，事实上仅有8,000名奴隶在从坎波斯到桑托斯的沿海一带输入巴西，这是五年多来最低的数字。但是咖啡种植园主对奴隶的明显贪得无厌的需求已暂时得到满足。提出1850年法律的大臣欧塞比奥·德·克里斯指出，许多地主已债台高筑，不少人已将他们的财产抵押给最著名的奴隶贩子。后者多数是外国人，而且是葡萄牙人，由于他们明显的财富和政治影响，现在也遭人忌恨。1850年的法律重点打击那些装运进口和出售奴隶的贩子，而不是那些非法购买奴隶的人。各省省长、省警察局长、市镇代表、区县法官、国民警卫队、陆军、海军和特别法庭迅速而有效地将法律付诸实施。1851年在巴西登岸成功的只有9起，总共3,287名奴隶，其中在这一年最后4个月登岸的(都在巴伊亚省)只有两起。此后已知登陆的仅有3起，两起在1852年，一起在1855年。巴西的奴隶贸易至此完全结束(见表5)。

743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没有再让奴隶贸易象30年代那样死灰复燃。此时过剩的输入已被吸收，市场恢复，价格再次上涨，奴隶贩子又看到了赚取巨额利润的前景。在咖啡城市里约热内卢，奴隶价格在1852至1854年间差不多翻了一番，但是所有恢复奴隶贸易的企图(最晚的一次是1856年)均告失败。当然，英国人声称，使奴隶贸易停止的首先应归功于英国海军，而要在巴西水域恢复海军敌对行动的持久威胁最终使其完全终结。帕默斯顿在1864年写道："我怀着最大和最纯洁的愉快回顾的成就是，将1845年的《阿伯丁法》付诸实施，迫使巴西人放弃了他们的奴隶贸易。"①(《阿伯丁法》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直到1869年才废除。)更有意义的或许是，自独立以来，里约热内卢的政府第一次具有权威和必要的力量在全国贯彻它的意志。

① 引自贝瑟尔著《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第360页。

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结束后产生的巴西咖啡种植园劳动力 744
的供应问题，在短期内部分地是靠国内奴隶贸易，最终则是靠欧洲移民解决的。1847年，在当时的自由党政府鼓励下，尼科劳·维尔格罗是第一个试验合伙佃农制(parcercasyptem，一种分成制形式)的巴西地主，他先是输入日耳曼人后来是葡萄牙人当合同工(实际上的契约奴)在利梅拉(圣保罗省)他的不久前由甘蔗改种咖啡的种植园里劳动。1850年8月，保守党政府重新恢复1843年的土地(和移民)法案，该法案在自由党统治时期曾遭到米纳斯吉拉斯人和圣保罗人的反对并在参议院受阻。这一次，法案在两院迅速获得批准并于1850年9月18日成为法律——在通过新的反奴隶贸易法两星期之后。为了消除某些争议和适应新的形势，对法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删掉了关于征收土地税的部分。但某些众议员依然认为法案对地主阶级非常不利；一名米纳斯吉拉斯众议员甚至认为其中有共产主义的因素。结果，这条新法律证明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它的主要目的——通过划界和登记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整顿——在很大程度上落了空。然而，这条法律表明巴西政府对劳动力供应的长期问题越来越感到关注。1850年以后，欧洲移民到达巴西的数目增加了，虽然增加速度不快(见表6)。

保守党政府还开始注意巴西未来的经济发展。里约热内卢省长曼努埃尔·德·热苏斯·瓦尔德塔罗1848年5月写信给内务大臣说，巴西曾将它的“鲜血洒在国内冲突的战场上，”而今“〔这个国家〕对斗争已感到厌倦，力求进行政治改革，它似乎正在集中它的大部分精力开发它的富饶资源，发展它的物质利益”。① 1850年6月，巴西将过去(包括殖民地时期)的各种法律和条例汇集在一起，经过修订增补，成为第一部巴西《商法典》。在这部法典中特别重要的是为各种类型的商业公司确定了定义以及有关它们的经

① 引自托马斯·弗洛里著《1808—1871年巴西帝国的法官与陪审团》(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1)，第181页。

营活动的规则。法典发表的时间十分恰当，因为此后几个月内即有相当大数额的资本从奴隶贸易中解脱出来。这个国家第一次经历了一次商业活动和投机的热潮，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在过去20年，政府只批准17家企业营业，而在以后10年中，从这个数字跳到155家，包括银行、工业、蒸汽轮船公司、铁路、垦殖公司、采矿企业、城市运输公司等。①尽管许多这样的新企业带有投机性质，但是它们确实表明了这个国家的一种新气氛，开始从主要关注政治事务转向致力于经济活动。结束奴隶交易，通过土地和移民法，颁布商法典，所有这些都是沿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的，因为它们都是试图为动员劳力、土地和资本引进并组织市场。不久，英国资本开始进入巴西，在铁路和城市运输部门进行投资，英国银行也开始在巴西开业，推动巴西经济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新的联系。

745

50年代初，即在实现独立将近30年后，巴西取得了政治稳定，从北至南的国内和平与主要以咖啡出口为基础的一定程度的繁荣。在对外关系方面，英国在奴隶贸易问题上获得了满足，罗萨斯在1852年2月被击败。国家机器(至少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统治阶级在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相对的一致意见，在下一个十年中，自由党与保守党在同一个行政机关内工作(这个时期称为"和解"时期)。经过一段困难时期后终于保持了国家统一。但是能够说已经锤炼出一个民族国家了吗？回答至少是有条件的。

在全部750万人口中(包括巴西印第安人)，②25%—30%依

① 利伯拉多·德·卡斯特罗·卡雷拉著《巴西帝国的财政和预算史》(里约热内卢，1889)，第378—379页。

② 大部分靠近海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生活在贫困中接近灭绝。在亚马孙河及其主要支流上，特别是在内格罗河流域，19世纪上半叶经济衰退时期给存活下来的部落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8世纪就有接触，现在可以少受一些骚扰了。但是两个新近受安抚的部落卷入了1835年帕拉省的

然是奴隶，一个更大的百分比（甚至可以说是压倒多数），用一个当今的词来说，是“不积极公民”，也就是一些或者无合法权利，或者文化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都很低的巴西人，他们不能以

卡巴诺叛乱；穆拉部落站在叛乱者一边，而蒙杜鲁库部落站在当局一边。在托坎廷斯—阿拉瓜亚盆地和马拉尼昂及皮恩省腹地，此时是边界扩张时期。一些讲热语的部落接受了和平接触：如托坎廷斯河流域的阿披纳耶、奇伦特和克拉霍部部落马拉尼昂省的东廷比拉部落；阿拉瓜亚河下游的北卡亚波部落。沙万蒂部落向西撤退并变得日益好战；戈亚斯省经常受到出没无常的卡诺埃罗部落的袭击。马托格罗索省中部的博罗罗部落的某些群体常与殖民者作战，但其他部落一般是爱好和平的，如巴拉圭河流域的特雷纳和瓜托部落，阿里诺斯河流域的阿皮亚卡部落，巴西南部幸存的南卡亚波和瓜兰部落，阿拉瓜亚河流域菲近巴纳纳尔的卡拉雅部落。授权对圣埃斯皮里图为米纳斯吉拉斯东部的所谓博托库多部落和凯因冈族印第安人进行奴役的法律于1831年10月废除。但是这些部落的许多印第安人继续进行抵抗。其余在多西河一带的印第安人则对前法国军官居伊·德·马利埃给予的良好待遇作出了良好反应。

在庞巴尔的世俗官员在18世纪后期遭到悲惨失败后，再次把传教士的《教义问答集》看做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良方。但一般说来，19世纪40年代特别是1845年通过印第安人立法以后到达的意大利圣方济会的传教士，遭到了可怜的失败，他们不能适应巴西中部和亚马孙河流域的酷烈气候，并且在与印第安人沟通方面还不及殖民时代他们的耶稣会和圣方济会的前辈们。

就在这个时期，巴西印第安人第一次被非葡萄牙的欧洲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看到。最重要的有：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施皮克斯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菲里普·冯·马齐乌斯（他们奠定了巴西人类学的基础）；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朗斯多夫（他由赫尔克里士·弗洛伦斯陪同，1825—1829年到达马托格罗索；奥地利人约翰·纳特雷尔（他在1828—1835年在亚马孙河与内格罗河上游搜集了人种学方面的材料）普鲁士阿德尔伯特亲王（他由俾士麦伯爵陪同1842—1843年在欣古河进行考察）；弗朗西斯·卡斯泰尔诺伯爵（19世纪40年代他曾在阿拉瓜亚—托坎廷斯河以及亚马孙河上游进行考察）；亨利·沃尔特·贝茨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他们在1848年到达亚马孙河）；以及理查德·斯普鲁斯（他于1849年到达）。

各位作者感谢约翰·亨明博士为本注释提供资料。

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产生民族意识起最大作用的因素大概是反葡和反英情绪。前者弥漫于摄政时期的大部分社会和政治抗议运动中，在普拉亚人的叛乱中仍很突出；后者则在1839年以后因英国加紧对奴隶贸易进行国际讨伐而变得突出。苏萨内特伯爵在40年代初期访问里约热内卢时，他为对外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普遍憎恨而且轻易地把这个国家所有的麻烦都归咎于外国人感到吃惊。另一个法国人，夏尔·埃克斯皮利，50年代初期作为商人在里约热内卢定居，他也有类似的观察。他到达后不久，就有一个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一些时候的德国人劝告他对这里的事情只说赞扬的话，免得被视为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作出结论道，"这种不明智的爱国主义感情在巴西被过分地鼓动起来了"。① 但这些还只是在一部分居民阶层中产生的主要是消极的民族情绪。除地区差别与深刻的社会和种族分裂之外，在巴西各省之间的联系还太少，经济结合还太少，分享对国家的管理还太少，还不足以产生积极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还有待今后去发展。

① 夏尔·艾克斯皮利著《巴西现状》（巴黎，1862），第34页。

第 17 章

自十九世纪中叶到巴拉圭战争时的巴西

19世纪50年代初期，巴西人口为750万多一点。他们象以往一样，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40％居住在东南部的三个省——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以及首都里约热内卢，后者有18万居民。东北部是殖民时期的主要定居区，其人口仍占44％。黑人和穆拉托人奴隶大约有200万到250万，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的1/4到1/3。到1872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巴西的总人口已增加到1,000万人。东北部所占的比例下降到40％，而里约城人口则增长到27.5万人。奴隶贸易结束20年之后，奴隶人数下降到150万(15％)，奴隶人口比例较大的省份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东南部咖啡出口的迅速增长蔗糖的相对减少，说明了1850年到1870年之间人口的区域性转移。咖啡贸易使种植者同国际经济发生联系，这种情况使里约热内卢的商业阶级兴旺发达起来。但是，劳动人民，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没有从增长的财富中得到多少好处。同时种植园主和商人把赤裸裸的暴力和仁慈的保护措施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保持工人们对他们的依赖。帝国的政府对种植園主和商人的阶级利益是关怀的，它已变成了这些人争取保持政治和社会控制权的工具。在这20年间，政界领袖们也成功地把一度反对中央政权的人吸引过来，在这同时，他们逐渐向介乎保守和改革之间的中间立场转移，虽然有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政体，但是政界领袖对于盛产出口作物的特定地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忠诚。

748 19世纪50年代初期，糖业在巴西经济中继续占有重要地位，糖的出口虽然落后于咖啡，但在价值上却远远超过棉花、皮革、烟草及其他产品。从1841—1845年到1871—1875年之间，糖的出口增加了50%（见表1）。但是同时世界糖产量却增加了四倍，因而巴西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从大约10%下降到5%。巴西全国各地区都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糖，但是巴西所有出口的糖，除了里约热内卢省的坝波斯周围的一个小生产中心之外，几乎都来自东北各省沿海岸50到100英里纵深的狭长地带，其中特别是巴伊亚和伯南布哥两省。当代人士往往把东北部糖业生产的相对停滞归因于技术的落后。当然，巴西的糖业生产用当时的国际水平来衡量似乎是原始的。每隔一至三年，由奴隶们用锄头把老甘蔗根刨出来然后在深深地粘土地里种上新苗。最后种植园主就打发他们到新的土地上去耕作而放弃旧的土地，因为土地很多，在地里施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年一度奴隶们把成熟的甘蔗倒码成堆，装在牛车上或用骡子驮往榨糖厂去。在榨糖厂里，金属制成或用金属包皮的滚轧机把甘蔗压碎，榨出糖汁。在1854年时，伯南布哥省80%的榨糖厂都用牛或马做动力，另外有19%的糖厂使用水车，只有1%的厂用蒸汽作动力；对比起来，1860年时，古巴的榨糖厂已有70%使用蒸汽动力。接着把甘蔗汁放进一排排大铁锅中煮沸，以蒸发水份。热源来自燃烧木材，这种做法使森林遭到砍伐。当蔗糖开始定型时，工人们把糖浆倒入园锥形的陶土模子里，深褐色的糖蜜在其中逐渐排除水份，留下潮湿的粗糖。进一步的精炼加工主要在欧洲和北美洲进行。

然而，之所以未能采用最新技术，是由于经验和稳健的判断造成的。榨糖技术的改进并不能战胜古巴蔗糖和欧洲甜菜生产者所享有的接近市场的优势。巴伊亚省的某些糖厂主曾经采取步骤使他们的糖厂现代化——最著名的是若昂·毛里西奥·万德莱，

表1　1841—1880年巴西主要出口产品（以10年为阶段）

产品	1841—1850		1851—1860		1861—1870		1871—1880	
	价值（千英镑）	%	价值（千英镑）	%	价值（千英镑）	%	价值（千英镑）	%
咖啡	22,655	46.99	49,741	53.67	68,004	50.38	112,954	59.49
糖	14,576	30.23	21,638	23.35	18,308	13.56	23,540	12.40
棉花	4,103	8.51	6,350	6.85	27,6293	20.22	19,070	10.04
皮革	4,679	9.70	7,368	7.95	8,958	6.64	11,106	5.85
烟草	974	2.02	2,679	2.89	4,567	3.38	6,870	3.61
橡胶	214	0.44	2,282	2.46	4,649	3.44	10,957	5.77
可可	337	1.11	1,033	1.11	1,388	1.03	2,438	1.28
马黛茶	477	0.99	1,583	1.71	1,817	1.35	2,945	1.55
主要出口品总计	48,215	99.99	92,674	99.99	134,984	100	189,880	99.99

资料来源：巴西，巴西地理与统计学会，《巴西统计年鉴》，第5年（1939—1940），第1381页。

后为科特日皮男爵——但后来发现几乎不可能获得令人鼓舞的经济收益。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大量土地和森林资源的存在使他们失去对农业发展进行投资的劲头：既然蔗田可以随时向处女地扩展，就不必花心思去在老的田地上施肥了。借贷资本又在别处寻求较少风险的机会，使借债费用增高。再者，传统的操作方式给少数最大的种植园主带来令人放心的可观的收入，使这些人得以保持一种轻而易举的社会与政治的支配地位。

749 和殖民时期一样，巴西的蔗糖种植者可划分为两个主要类别：一类拥有土地和榨糖厂，另一类则仅仅拥有土地。前一类人称为蔗糖主(senhores de engenho)，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重要性上都高于蔗糖农(lavradores)，但他们设法说服后者采取同他们一样的观点，去反对佃农、自由雇工和奴隶劳工的观点。甘蔗农场主向榨糖厂主供应甘蔗，其办法或者是通过订立合同，以现金偿付所供应的甘蔗，或者是换取一半的蔗糖产品。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甘蔗农场主向榨糖厂主借债过多，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在蔗糖主之间发生的尖锐的分裂使他们中的少数人变成事实上的寡头统治者。在伯南布哥省的一个县里，据统计，15%的糖厂主控制着70%的全部种植园的土地。仅仅9个相互有亲族关系的家族就占有差不多全部财产。恩里克·马克斯·林斯和他的儿子、女婿们拥有30个种植园，他和他的家族在当地具有强大的政治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1863年有一位新闻记者曾经把那个县称做林斯家族的“采邑”，而所有其他的家庭不过是“芸750 芸众生的奴隶”。①

在19世纪30年代，咖啡已超过蔗糖成为巴西的主要出口产品。到1850年，咖啡已占到巴西出口收入将近一半（见上表1）。咖啡种植业已扩展到整个帕拉伊巴河谷，到19世纪中叶，它已在

① 彼得·L·艾森伯格引自从1840—1910年伯南布哥的蔗糖工业：没有变化的现代化》(伯克利，1974)，第138—139页。

圣保罗城以以西的地区取代了蔗糖业。咖啡出口由19世纪30年代的970万袋（每袋重132磅），增加到50年代的2,630万袋，到60年代又增加到2,880万袋。不过，重要的是不应忘记，那时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出口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已大大超过咖啡：例如，19世纪50年代从美国南部地区出口的棉花，就赚取了五倍于巴西咖啡的收入。

最初的拓荒者们从帕拉伊巴河谷的处女林带开辟出自己的庄园，他们的后辈继续劲头十足地在他们继承的庄园上或新的地区进行砍伐森林的工作。虽然某些历史学家曾经强调这些人更看重地位与权力而不是利润，但是新的证据表明这些种植园主大部分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小心谨慎地衡量每一笔投资的风险和利益。到1870年，细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到帕拉伊巴河谷经济停滞的第一批现象：奴隶人口的老化，老咖啡树没有更新，以及人们宁愿到别处去投资也不愿在地力耗尽的土地上施肥。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被吸引到圣保罗省的中西部地区。那里的山丘没有那么陡峭，而平缓起伏的地面保证了良好的排水和使咖啡树能得到斜射的阳光。种植园主仍然使用同样的农耕方法，他们发现圣保罗的红色土壤甚至比帕拉伊巴河谷的土壤更加肥沃。土地好象无边无际地向西伸展。尽管最初越过近海悬崖的运输费用耗去了从离海岸有相当距离的土地上获得的利润，种植园主们仍然很有信心地相信铁路建造者会最终克服这一障碍的——这一点在1868年终于实现了。虽然如此，在1870年以前，主要的咖啡产地仍然是帕拉伊巴河谷，也就是说，是里约热内卢省和圣保罗省的东北部。

在一座咖啡种植园中心，主人的房屋面对着奴隶劳工的房舍和工棚。这些用砖坯和木材修造的房舍稳固地环绕着用泥土夯实或用砖块铺成的晾晒咖啡的大场子。在收获季节（7—11月），奴隶劳工从咖啡树上摘下樱桃般的果实，放进大篮子里，然后从山丘上运到场子里。他们把咖啡果散开铺在场上，让阳光晒干，黄昏时 751

还要把它们耙在一起，防止露水的侵蚀。当果实发黑时，就用水力驱动的木制捣臼除去干燥的外壳，剥出绿色的咖啡豆。奴隶们接着用吃力的手工操作办法，把泥土和有缺陷的咖啡豆拣出去，然后把咖啡装包待运。

这里的公有土地和其他拓居区一样，早就通过从殖民时期开始的皇家土地授予制或大小占地者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让渡出去了。但是随着出口农业的发展，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农场主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遭到更有势力和更富有的种植园主们的反对，他们或者不得不接受有吸引力的出价而迁居别处。连皇家授予的土地产权也时常会重叠在一起。无论是公共官员还是私人土地所有者都不曾进行过系统的土地测量或登记过他们的地产。1850年的土地法要求在今后应出售（而不是赠予）所有公有土地，并对现时人们占有的土地进行系统测量，其费用由所有希望确认其所有权的人负担，这一土地法的出台使人们有希望结束那种混乱的状态。但是，虽然许多土地所有者按土地法要求提出了正式的初步作证书，他们所提出的内容包括列举他们土地边界上的邻居们的姓名，而并没有作过任何的丈量，也没有解决相互间矛盾的权利要求，而且不久就忘掉了土地法的进一步的各项规定。即使时至今日，土地所有权仍然是混乱的。

在这一时期，除了咖啡和糖以外，巴西其他出口作物中只有棉花才是重要的项目。虽然长绒棉——巴西特产——在本世纪初期的巴西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发明了轧花机因而可以使用美国南部盛产的短绒棉品种以后，它的出口就一直在下降。巴西的大部分棉花出产在不太湿润的东北部纬度稍高的距海岸约30到100英里的地区。在1863—1864年度，伯南布哥省在棉花出口中领先，其出口额占生产总额的30%，马拉尼昂省出口21%的产品，居第二位。东北部其他省份——特别是阿拉戈斯省和帕拉伊巴省——提供45%。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巴西棉花出口有了一次突飞猛进的虽然是短暂的增长。（见上表1）。1860—1861年度出口

2100万磅，五年后增加到9200万磅，到70年代初期增长到更高的水平。甚至圣保罗一些种植咖啡的地带也曾在短时期内改种短绒棉花。

752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一部分南方居民移居巴西，他们希望重新建立以奴隶劳工为基础的棉花种植园。但是在巴西棉花大都是由小业主生产的，它不象咖啡或糖那样需要为出口前的加工投入较多的资金。在圣保罗，人们在不太肥沃的地带种植棉花，并在同一块地里种上豆类和玉米。他们仿效在东北部使用的办法，在播种前焚烧地里的灌木丛，以杀死害虫和迅速为土地增加肥料，虽然这样做有些浪费。虽然较大的种植园主使用犁和其他农业机械，大部分人还是继续象过去种植粮食作物和咖啡时那样依靠锄头。耕地或除草也是用锄头吃力地进行，而不用马拉农具，因此这两项农活也不象农业专家们建议的那样经常进行。当价格开始疲软时，许多勉强维持的生产者就宁可放弃这种作物。不过当时巴西纺织业的发展为棉花提供了一个新的国内市场。

烟草在1850—1870年期间只占巴西出口收入的3%，这同他在殖民时期的突出作用形成对照。它主要出产在萨尔瓦多湾对面的卡舒埃拉地区。象棉花一样，烟草是使用少数奴隶劳工在相对狭小的地段和家庭农场上种植的。烟叶成熟后要一叶一叶地摘下，然后放在户外的木架上晾干。在萨尔瓦多的工厂中工人们制作雪茄烟；在那里和在里约热内卢，工人们还制作鼻烟。米纳斯吉拉斯省生产的烟草通常拈成卷，论英尺出售，供制作手制卷烟之用。

在亚马孙区域，印第安人及其混血后裔总起来说被称作卡沃克洛(caboclos)，他们从森林中野生树上采集可可并把它们出售给企业主。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土地所有者使用奴隶劳工在巴伊亚南部试种可可。工人们剥开成熟的黄色或绿色大果实的软壳，除去包在褐色种子外面的白色粘汁，然后把他们放在太阳下或高出地面的凉棚里晾干。那时巧克力制造业已在欧洲开端。

自从1839年发现橡胶硫化法以后，巴西橡胶就开始引起日益

增长的注意。橡胶出口从1840年的388吨，增加到10年后的1,447吨，1860年增至2,673吨，1870年达到5,602吨，这正是真正的“橡胶热”开始的前夕，在亚马孙的雨林中，卡沃克洛在野生橡胶树上开口引流，然后用木材点火加热使橡浆变硬，做成一个个大球。流动商贩前来出售各种工具和食品以换取这些橡胶，常常让卡沃克洛以高额利率来赊购他们的商品。土地所有者由于需要定居的劳工为他们干农活，因而厌恶这种流动的收集橡胶的活动，他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交易在随后的年代所带来的发财致富的机会。

753

在南部省份巴拉那、圣卡塔琳娜和南里奥格兰德，卡沃克洛还从野生灌木中收集马黛茶。他们摘取叶片和嫩芽，放在篮子里以文火烘烤，再在原始的木罐内把叶子捣成粗糙的粉末。马黛茶装袋以后运往南方的邻国。一部分在巴西国内销售的马黛茶不加烘烤，只把叶子晒干后出售，供制茶之用。尽管马黛茶、可可和橡胶的出口在上升，但这些农作物加在一起在1851年至1870年期间的巴西出口中只占不到6%。

在巴西，养牛是为了皮(大部分出口)和肉(主要在国内消费)。外国观察家描绘了三个不同的养牛区，它们各具特色。东北部干旱的地区，远离沿海湿润的狭长地带，甚至还在棉花种植区以西，那里的养牛业从16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主要的行业。这个地区虽然有足够的平均雨量，但降雨倾向于集中的倾盆大雨，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小规模的耕作外，对于常规的农业生产却雨水不足。偶而发生的干旱使土地枯干，连牛类都无法生活。梅斯蒂索人口具有相对的游牧性，他们身穿式样独特的皮护腿套裤，戴皮帽子，穿皮茄克，保护自己免受仙人掌和其他带刺植物的伤害。这地区向产糖区供应牛类，既提供新鲜肉类，也提供活牛去驱动榨糖机，或者去驮拉装满甘蔗的沉重木车或运糖的木箱。

另一个区域是米纳斯吉拉斯省绵延起伏的草原，那里的养牛业是该省经济的主要支柱。18世纪时，那片长满牧草和散乱地生长着多节疤树木的土地，曾经向淘金和淘钻石的人们以及矿区新

生的暴发的富裕城市供应肉类。19世纪时，养牛业主把注意力转向为里约热内卢供应新鲜牛肉，这座城市因咖啡出口增长而财富猛增，城区迅速扩大。人们在通向里约城道路的两旁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牛群从陡坡上被赶下低平地带的肥沃牧场。

不过，在19世纪的巴西，养牛业主形成最富裕兴旺的阶层，却是在南里约格兰德省。南部地区牧草丰茂的平原特别有利于养牛业，尽管该省的资源无法与乌拉圭和阿根廷这更肥美的大草原相提并论。初期的拓荒者(同比较近期到达的欧洲移民形成对照)在经过早期试种小麦之后，转向养牛业。到1863—1864年，南里约格兰德省已出口全巴西近十分之七的牛皮。它也出产牛肉干或腌牛肉，卖给北部的咖啡和蔗糖种植园，供那里的人们食用。在腌肉场，奴隶们把肉放在盐水中浸泡，然后在日光下晒干。这样肉可保存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

754

除吃肉以外，巴西人还从豆类与大米或豆类与玉米的混合食物中摄取蛋白质。用木薯块根制成的粗糙的木薯食品也是提供日常热量的来源。咸猪肉有时也用来丰富人们的饮食。除了南里约格兰德省的干牛肉和进口的面粉与鳕鱼外，本地居民都是从邻近的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的。无疑，种植园主们在收获季节以外的时间中使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食物，而小种植主和农民们则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出售给种植园主或城市居民。乡村与城市中参予日益增长的咖啡业经济活动的人们都从米纳斯吉拉斯省的农业区获取大部分食品。南里约格兰德省的移民垦殖区也生产足够的豆类与玉米向省外运送。巴西越来越多地进口某些食品来满足城市中心甚至种植园的需要。不过，本地区自给自足正是一般的规律。当然同种植出口作物相比，有更多的巴西人在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食粮而劳动。

虽然巴西所有地区的每一种农业活动都要依靠某些奴隶劳工，例如牲畜饲养，谷物生产，甚至橡胶与马黛茶的采集——而

且，奴隶们自然是作为手工工人和家奴来劳作的——但是巴西对黑人奴隶的重大依赖还是在蔗糖与咖啡这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方面。每个地方奴隶主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才能最好地驱使奴隶们按主人的意愿来干活。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奴隶制度包含了若干劳动关系的问题。大多数地里的奴隶工都被编成班组，在监工密切监视下劳动，这些监工毫不犹豫地使用皮鞭、木棍或其他惩罚办法来迫使他管辖下的奴隶们每天劳动16甚至18小时。几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使用极其廉价的奴隶劳动的经验，使大部分种植园主对有关奴隶的衣食住的福利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不过其他一些奴隶主们，不论是出于慈善心理还是良好的生意眼光，却感到通过对不顺从者严加惩戒和对驯良的和服从的奴隶给以家长式的照顾这两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实现最充分的控制。例如，帕拉伊巴的种植园主帕蒂多阿尔费雷斯男爵弗朗西斯科·佩绍托·德·拉塞尔达·维尔内克在关于如何建立一座咖啡庄园的《论文》(1847年)中就写进了关于给奴隶以适当照顾的详尽指示。他的意思是，一个种植园主所谋求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使奴隶自愿的服从。但是如果这些手段达不到目的，他就毫不犹豫地"露出真面目"。[①]只有在主人有能力使用最大限度的暴力的条件下，仁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755

在其他活动中，奴隶们也遇到类似双管齐下的控制手段。因为即使在种植园的奴隶中，他们也决不是全部从事耕种与收获咖啡与蔗糖或者加工这些作物。他们还干着大型庄园的经营中所需要的许许多多其他的工匠工作。城镇是稀少的，相互之间距离又

① 帕蒂多阿尔费雷斯男爵弗朗西斯科·佩绍托·德·拉塞尔达·维尔内克著《论里约热内卢省种植园的创建及其管理方法、作物种植和收割季节等》(里约热内卢，1847)；同一作者致贝尔纳多·里贝罗·德·卡瓦略的信，1856年3月31日发自蒙特·阿莱格里种植园，见国家档案馆(里约热内卢)维尔内克文件，个人档案部分，手抄本112，第3卷，复制品工，第352张。

很遥远，因此一个有众多产业的大种植园主常常宁愿保持一批自己专用的有技术的奴隶劳工，来修理机器装备，建筑仓库，缝制奴隶们穿着的衣服，或者甚至让他们来装饰他的庄园内的房舍。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到种植园来租赁这些有技术的奴隶替他们劳动。奴隶们也提供家务方面的服务，而随着种植园主从出口产品赚取的财富的增加，就有越来越多的奴隶们干这类差事。豪华的宅邸时常宾客盈门，成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这种地方就需要为数众多的仆人。另一方面，出口经济的衰退，例如在米纳斯吉拉斯省，也释放出一大批奴隶去从事粮食生产和家庭服务。住宅里的奴隶和工匠们享有比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们要好一些的生活条件：有较好的衣服，也许还有鞋子，而且常常吃的是和主人一样的饭。他们可能在言谈上也学得文雅一些，甚至偶而还可以学着读书识字，他们比地里的劳工有更多的机会因服侍主人特别忠诚而获得自由。但是，他们同主人的接近却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并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地受到监视。有人甚至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暴力比包揽一切的家长式统治更能促使人们认识到奴隶所具有的人性。

种植园主们在选择最好的办法为奴隶提供食品方面各有不同，而这种差异同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有紧密的联系。有些人 756
宁愿直接为奴隶供应伙食，而另一些人则允许他们得到种粮的场地来栽种粮食作物。前一种人认为最好还是让奴隶们专一地从事主要任务——生产咖啡和蔗糖——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则向小土地所有者和在种植园之间的空隙地带从事生产的自耕农去购买。或者向在种植园主土地上劳动的自由仆役们去购买。帕拉伊巴河谷的咖啡种植园主往往让奴隶们在比较新的园林中种植粮食作物，在一排排咖啡树之间栽种的豆子和玉米从经常的耕作中得到好处，并且获得了充足的日照。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拥有成熟的咖啡园的人，宁愿摆脱为奴隶们供饭的任务，而且大概也注意到，为他们干活的奴隶们更愿意在一周里劳动六天而第七天则为

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来干活。从奴隶们的观点来说，我们可以猜想有些人愿意由主人来供养他们，这样安全可靠，而另一些人则在自己的小块田地上享有相对的自由，尽管需要不停地劳作，并且前途比较飘忽不定，也有更多的担心。

控制奴隶的种种努力——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仁慈行为——并不总是获得成功的。为了这个目的而采取多种多样的技巧，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由一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另一个人的行动是何等的困难。奴隶们对这些行动的反应不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反叛性的举动，而且还在于不执行命令，"懒散"，工作马马虎虎。即使是遵命行事，也会在举止中表明存在着另一个人的意志。以前曾经是奴隶的人们还记得，奴隶们哼唱的小调中显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困苦的处境。① 而且杀害主人的事件频繁发生，使奴隶所有者感到害怕。逃跑是另一种反应。在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和累西腓这样的城市，日报上刊登着整栏整栏的广告寻找逃走的奴隶。常常有逃出的奴隶在丛林中聚合，组成小的棚户区，即逃奴群体，在这里多达二十个或更多的逃犯在一起种植木薯和谷类庄稼，他们在那里能够生存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他们袭击种植园以取得更多的供应品，有时候在选择他们的目标时表现出相当高的政治敏锐性。

奴隶们也能够组成自己的家庭，并同奴隶和自由人建立其他社会联系，同时形成一种相互间的共同理解的模式，把这种理解模式传到下一代。有许多文件显示为父、为母、为夫或为恋人者出757 钱替一个奴隶赎买自由。获得自由的人留下的遗嘱表明了他们对于昔日身为奴隶时的伙伴们怀有亲密的感情联系。相距遥远的种植园的奴隶们相互间的个别信件，深刻地表明了被迫分离的痛苦和坚贞不渝的感情。奴隶们不仅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而且通过

① 见斯坦利·J·斯坦著：《瓦索拉斯，1850—1900年的一个巴西咖啡县城》(麻省坎布里奇1957)第208—209页。

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不论它们经过何种变迁）把他们的文化流传下来。在特殊的节日午蹈或击鼓节目中，参加者学习击鼓（与制作鼓的）技巧的秘密，同时也从中学到一整套留传下来的信仰。巴西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一些的宗教活动渊源于对非洲的回忆，这个事实表明人们不断努力创造和保护文化遗产。

不仅农奴们有争取独立的某些机会，而且他们和自由劳工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明确的。某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奴隶们的种植园地中看到一种农民经济的因素。当然，奴隶们根据正当权利有时候向主人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但有时也向乡村商店的店主们出售，这些人也毫不犹豫地收买小量“偷窃来的”咖啡。这样，奴隶们终于拥有一些自己的财产并拿它来提取现金。实际上，有些种植园主把现金当作刺激超额工作的手段，譬如，为最低限额之外多收获的每一筐咖啡支付现金报酬。这样一来，奴隶劳动者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且，奴隶个人实际上是可以由奴隶身份转向自由人的。顺便说一下，由于这种情况，奴隶文化已变成贫穷自由人的文化。

19世纪时巴西奴隶主们经常给一些奴隶以自由，这种情况使当时的外国访问者感到惊讶。贷款利率很高，加之把奴隶的子女抚养到劳动年龄所需的费用长期不得收回，这些情况早就促使奴隶主们在奴隶子女一出生时就给予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即使养大之后也卖不出高价的女孩。同时也需要自由劳工来满足某些工作要求，诸如监督管理奴隶之类，这就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做法。更重要的也许是，解放农奴甚至解放成年奴隶，是鼓励良好行为的又一个工具，通过少数人的范例说明极其忠诚和顺从就能得到这样的报偿。对于可能获得自由的期望也许还减少了逃跑、杀害主人或因失望而自杀的奴隶的人数。有时候奴隶主给予奴隶自由，其条件是在一定的年数中继续为主人忠实地服役。社会重视解放奴隶的行动，赞扬给奴隶以自由的种植园主的慷慨大度。 758
那时人们常常根据法律上的某些理由争辩说，一个奴隶如能支付

赎买自身的价款，他就理应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黑人并没有威胁社会秩序，因为无论男女都会很容易地被吸收到社会结构中各个低级阶层中去。1872年，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占全体黑人和穆拉托人总数的74%，占全部人口总数的44%。不过，有一些证据表明，一旦在非洲再也买不到奴隶的时候，解放奴隶的数量就减少了。

当人们能够买到更多奴隶的时候，久已确立的非经常性的解放奴隶行动便不会破坏奴隶制度。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以空前的速度从非洲输入奴隶，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这些奴隶大部分是运往帕拉伊巴河谷的咖啡庄园去的。1850—1851年，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终于停止了。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国内奴隶贸易的兴起。1850年最劣迹昭彰的葡萄牙奴隶贩子被驱逐出境，但这只是为里约城和桑托斯城的奴隶商贩开辟了道路，他们继续充当中间人，出卖从东北部运来的奴隶。东北部的蔗糖种植园主由于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日益下降，开始由南部兴旺发达的咖啡种植区出售奴隶。从1852年起的十年间，每年从其他省份来到里约热内卢港口的奴隶平均达到3,370人。[①] 其他奴隶是由陆上运输的。虽然比起1845年到1850年期间每年平均从非洲进口41,400名奴隶来，这个数目是微小的，但他们帮助填补了咖啡种植园对于劳工的仍然难以满足的需求。在1864年至1874年期间，东北部，主要是蔗糖生产区的奴隶人数从774,000（人占巴西全部奴隶人数的45%）下降到435,687人（占28%），而咖啡种植区的奴隶人口从645,000人（占43%）增加到809,575人（占56%），圣保罗省奴隶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80,000人增加到174,622人。

---

① 对奴隶人数估计各不相同。比较罗伯特·康拉德著《1850—1888年巴西奴隶制的毁灭》（伯克利，1972），第289页，与塞巴斯蒂安·费雷拉·苏亚雷斯著《关于巴西帝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短缺状况的统计》，复制本（里约热内卢，1977），第135—136页。艾森伯格著《蔗糖工业》，注（156）和赫伯特·S·克莱因著《中间通道：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比较研究》（普林斯顿，1978）第97页。

虽然如此，奴隶制在19世纪五十年代的确进入了长期的衰落时期。随着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的中止，奴隶的总数量就不能维持。早先依靠从非洲强征奴隶，造成奴隶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运往巴西的奴隶只有1/3是女性。同时，部分地由于奴隶主愿意解放奴隶少女，在巴西出生的奴隶中能生育的女性一直是比较少的。高额利率促使人们解放儿童，同时也使人不愿意去照顾怀孕妇女或新生婴儿。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无疑也意味着男女奴隶的死亡率都很高。粗劣的衣着，住房不足，缺乏充足食物(大部分质量粗劣)，再加上过度劳动，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奴隶人口下降的原因。黄热病、天花、霍乱等19世纪五十年代的流行传染病使身体已经衰弱的奴隶们受到特别的摧残。1850年的奴隶人数没有可靠的统计，但是人们估计在200万和250万之间。到1864年，一位研究奴隶制的细心的学者阿戈斯蒂尼奥·马克斯·佩尔迪高·马列罗得出的奴隶数目只有1,715,000人，而1872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数字(不包括1871年9月以后出生的儿童)是1,510,806人。

756

在这期间，由于奴隶更加按区域集中，巴西的精英阶层开始在奴隶制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伯南布哥省一些产糖县份的农业工人中奴隶所占比例在1872年只有14%，而里约热内卢省产咖啡的县份奴隶占46%。东北部的土地所有者们同奴隶制度的关系变得日益疏远，他们卖掉原有的奴隶而越来越能向自由的虽然是依附的劳动者。同时，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在圣保罗陡坡上修建的铁路接近竣工，富有的咖啡庄园主得到西部的土地并建立铁路公司使他们同铁路干线相连接，这时候他们清楚地看到，除非采取新的劳工制度，否则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将会遭受挫折。最后，虽然巴西南部的腌肉工厂还在使用奴隶，该地区作为整体来说，尤其是养牛业主，与奴隶制并没有特别的联系。不过，在里约热内卢省和沿帕拉甲巴河上游的圣保罗省老区以及在米纳斯吉拉斯省的部分地区，人们仍坚决信奉奴隶制度，并且决心要使它继续成为

巴西占支配地位的劳工制度。但是，由于很大一部分奴隶是在巴西出生的，并且往往是穆拉托人，且奴隶获得解放的希望又似乎在下降，奴隶们变得越来越难以驯服了。

甚至在从非洲贩卖奴隶的贸易中止之前，就有人试图以欧洲的契约雇工来代替奴隶。尼科劳·佩雷拉·德坎波斯·维尔格罗（1778—1859）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桑托斯从事输入奴隶的行当中赚了一大笔财富。他还在圣保罗的高原地带的好几个种咖啡园中投资，他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进口的奴隶，而且还把他们分给他的邻居们。1847年，他说服了帝国政府和省级政府给他无息贷款，他用这笔钱作经费，派出征募人员前往日尔曼地区和瑞士，当时这些地方正受到土豆饥荒的袭击。第一批契约雇工来到他自己的种植园，他让这些雇工住在泥笆墙的简陋棚屋里，在分成制的基础上分配他们栽种、培育和收获咖啡。不久以后，邻近的种植园主就开始通过他的公司来雇用从国外移入的劳工。桑托斯的其他商人也仿效他的榜样，获得成功。不过，没有过几年就放弃了这种试验。移民劳工发现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从种植园外出受到限制，而种植园主在会计帐目上搞鬼又使他们债台高筑，他们表明不愿意屈从这种奴隶一般的纪律约束。1856年，在维尔格罗的一座庄园上工作的一群瑞士劳工，由于他们的发言人托马斯·达瓦茨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感到惊恐，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等待对指控维尔格罗欺骗工人事件的官方调查，而维尔格罗则声称工人们在奴隶们的帮助下策划反叛，他们还从住在圣保罗城的一个瑞士“共产党人”那里得到指示。① 这次事件是一个例证，说明要用从奴隶制沿袭下来的那套办法来控制自由的欧洲人是多么困难。持续不断地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东北部买到奴隶，

① 引自沃伦·迪安著《克拉罗河，1820—1920年一种巴西种植园制度》（斯坦福，1976）第102页，同时参阅《商业邮报》1857年12月10日第3版上关于缉拿“逃跑移民”的广告。

同时也能得到更易于管教的巴西自由劳工，这两种情况阻碍了人们去作类似的努力，并且把吸引欧洲农业工人的认真尝试又推迟了30年。

乡村雇主和巴西本地出生的自由劳工之间的关系同奴隶制非常相似。例如，在自由劳工中间有一种被人们称作“仆役”(agregado)——一种仆人——的社会类型，他们通常出现在东北部产糖区以及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区。一个仆役是依赖别人的，特别是在住房方面，或者至少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这个男人或女人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甚至是一位可敬的父母、姊妹或兄弟，只是缺乏独立的收入来源，可是一个仆役更经常的是贫穷的农业工人，或单身母亲，有时是已被解放的奴隶，地主 76I 授权给他，让他在大庄园周边的某块土地上栽种维持生计的粮食。作为交换，仆役偶而贡献一些劳务，但特别是要表现对主人的忠心。对男人来说，这就常常意味着参加由选举争端引起的武装械斗，或反对邻近的敌对的地主们的斗争。一个仆役在生活保障方面的权利仍然是脆弱的，地主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赶走。另一方面，仆役们如能找到另一个保护人，也能自由地流动，而地主们有时候就抱怨仆役们“毫无歉意地”① 抛弃原有的保护人而去投靠另一个保护人。在城市里，仆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通常类似学徒或家务佣人所作的贡献。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来自保护人一方的照顾和来自仆役一方的忠诚和劳务，这两者在他们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然而，有时用现金支付劳动力或剩余农产品以及对某个特定地主的联系变化不定的这些情况，表明货币报酬已部分地渗入，而社会关系也日益流动了。

在位于生产蔗糖的沿海和从事养牛业的内地之间的东北部棉花与粮食生产地区，地主们——拥有的地块比沿海地区要小——在他们的庄园上使用的人力往往几乎全是仆役们，并且依靠他们

① 见艾森伯格著《蔗糖业》第148页上的引语。

而不是靠奴隶来劳动。1874年年末，为数可观的农民短暂地发动了一次显然无领导的称为“凯布拉·基罗”的叛乱，反对对他们带到市场去的谷物和蔬菜课以新税，并反对当地商人利用度量衡实行公制之机来改变物价，这个时候，这些内地的地主们，在保存土地档案的公证机关不被打乱的情况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沿海产糖区的仆役们在糖厂主的率领下开进来镇压了这次叛乱。各个地区在心理上对地主的依赖程度是迥然不同的。

不论是仆役，还是为现金工作的雇工，农业劳动者的工作所得到的只是最低限度的报偿。关于这一时期的农村工资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但是有证据表明工资数额只达到勉强略高于糊口的水平。大部分自由劳工都生活在市场经济的范围之外，极端贫困，赤着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中有些人也兼干些挣工资的活——情况稍好一点。在试图制止擅有占地行为的1850年土地法通过以后，要获得土地就变得困难多了。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也是毫无保障的，他们夹在富有的庄园之间朝不保夕。他们不得不同有势力的庄园主们结成联盟并向他们表示服从，来换取安全保障和保护。

762

巴西种植园主依靠狡猾地运用暴力和许诺给以报酬或保护二者相结合的手段来操纵他的劳工——自由工或奴隶，以及依赖他的近邻们。他通过对自身荣誉和社会地位的细心关注——有时还需要摆阔式的挥霍浪费或显示一种大手大脚的慷慨大方——总的来说成功地争取到使他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得到的服从合法化。种植园主们这种努力支持和维护他们在自给自足的种植园社会制度内的权威的做法有时候给观察家们造成错误印象，以致不重视他们在经济上的合理推断力。大多数种植园主大概在充当家长式的庄园主和充当资产阶级企业家这两种角色之间并不感到紧张。他们理解巴西出口经济的复杂的内部结构，而对巴西的中间商人和外国出口商行，为他们的利润盈亏帐目担忧。他们认识到巴西在国

际劳动分工中的作用，并且目光敏锐地注视世界商品价格的变动。他们把作为整体的巴西经济——铁路的发展，银行系统的成长，进出口水平，甚至制造业的发端——当作他们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在铁路建成之前，陆上运货与载人的最普通的工具是骡子。753 在整个帕拉伊巴河谷，赶骡人同种植园主签订契约承办运输咖啡到沿海小城镇，这些咖啡再从那里用小帆船运到里约热内卢去。他们或者把骡子队直接赶到里约城，这些牲口的粪便把那里本已污秽的街道弄得肮脏不堪。一头骡子可以驮上两袋每袋重60公斤的咖啡，走下弯曲陡峭的小道运往海边。要走完这段路，骡子必须克服陡坡造成的障碍，有时这种陡坡在五英里的距离之内就下降2,500英尺。落在陡坡地带的倾盆大雨使人们叫苦不迭，抱怨政府除了在最险峻的转弯处垫上几块平坦的大石头之外，没有改善山路的状况。骡子常常陷入泥沼，弄湿了咖啡，使下山路程拖延几小时，直到把骡子拖出泥沼为止。东北部较为平坦的土地上使用慢吞吞的牛车，它们装上沉重的盛糖木箱，运到沿海地带，牛车的固定车轴沿途发出刺耳的声响。

赶骡人常常是独立的小商人，他们在圣保罗省南部的牲口集市上从赶牲口的人手中买得这些骡子，它们是从南里奥格兰德北上成群地赶来的。除运输出口农产品以外，赶骡人还把内地小城镇从南往北连接起来，把盛产咖啡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同生产蔗糖的巴伊亚与伯南布哥，甚至更远些的皮奥伊、马拉尼昂与帕拉联系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购买了土地，变成了种植园主。面向海洋贸易的港口城市更多地致力于同欧洲而不是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而它们的内地却让纵横交错的骡子队道路网联结在一起。

帕拉伊巴河谷的咖啡种植园主对修筑道路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只能调动有限的资源。穿过本地区的一条主要骡子道是一批拓荒的种植园主开辟出来的，随后有些大土地所有者捐款来改善道路或寻求政府拨款补助来修建桥梁。不过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证

能够从他们自己的庄园进入主要路线。第一条横越南部陡坡地带供带轮运载工具行驶的道路是联结里约热内卢与彼得罗波利斯的皇家避暑地的道路。在19世纪50年代，一家私营的公共马车公司把这条路线延长到咖啡种植区，并启用这条以碎石铺面的道路，供马拉车辆行驶。另一条质量差得多的道路是从桑托斯通往圣保罗的，直到铁路取而代之以前，那里一直是骡子队的天下。

事实证明，缺乏资金是巴西修筑铁路的主要障碍。尽管咖啡生产者兴旺发达，这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使他们能自行修筑铁路，甚至也无法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些人仍然对在别处，如在美国，扩大陆上铁路网更感兴趣。只有到1852年，当巴西政府保障投资利润时，投资者才感到巴西的投资前景有吸引力。但是，即使这样的好处也并没有吸引海外的谋利者参加横跨陡坡地区连结里约港和帕拉伊巴河谷的第一项工程。咖啡种植园主兴办了这项事业(唐·佩德罗2世铁路)，但是半数投资还是依靠国库支出。然而这家铁路公司还是垮台了，政府负担了修建这条铁路的全部费用。它的第一段于1858年竣工，到60年代初期，铁轨伸展到帕拉伊巴河。1868年修建了圣保罗铁路，这条非常赚钱的短程铁路连结着桑托斯港和圣保罗沿海地脊那边的平原地带。从长远说来，这条铁路证明对咖啡出口甚至更为重要。这条英国人拥有的铁路依靠一批斜面刨路机，克服了主要的技术困难，为巴西发展穿越正在出现的圣保罗省咖啡产区的铁路线开辟了道路。也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投资者在东北部还修筑了其他铁路线，最著名的是累西腓与圣弗朗西斯科铁路，巴西大西部铁路，和巴伊亚与圣弗朗西斯科铁路，这就无意中鼓励了蔗糖种植者去开发新的土地而不去为老的土地施肥。巴西拖延了很长时间，没有修筑能够使各主要城市相互联结起来的任何铁路网，而只着眼于乡村与一个港口之间的联系。随着对固定线路的大量投资，铁路公司往往使得各个地区自行发展其本身的经济，从而削弱了广大内地之间的联系，而以前赶骡人正是依靠这种联系来从事他们的贸易的。

764

巴西种植园主控制着生产，而英美商人在出口贸易中却占着支配地位，包括咖啡从里约热内卢与桑托斯的出口，和蔗糖从累西腓与巴伊亚的出口。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里约热内卢的20家最大的出口商行——经营4/5的咖啡出口——全都是外国人拥有的。菲利普斯兄弟公司(英国)，马克斯韦尔—赖特合伙公司(美国)和爱德华·约翰斯顿合伙公司(英国)控制着咖啡出口业。最重要的巴西和葡萄牙商号远远落在后面。英国出口商行对蔗糖贸易的控制甚至更为彻底，这也许是因为巴西蔗糖大部分出口是运往英国的。

在种植园主与出口商之间有一系列其他中间商，他们大部分是巴西人，或至少是葡萄牙人。例如，在里约热内卢城，有一二百家咖啡代理商(comissários)，他们是种植园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代理商在咖啡由骡子或火车运到城里后，立即把它存放到自己的仓库里。作为种植园主的代理人，他寻求出售这批咖啡的最高价钱，从销售货款中提取一定百分比的酬金。作为代理人，他还购买供种植园中的奴隶食用的牛肉干，谷物或木薯粉，以及铁制工具，咖啡去壳器具，甚至装咖啡用的口袋。随着种植园主们日益兴旺发达，代理商们的货单上也列入了各种奢侈品，巴黎来的服装和帽子，酒和奶油，水晶玻璃和瓷器，钢琴和书籍。

在包括向种植园递交奴隶在内的所有这些活动中，代理商由于开辟了信贷途径而产生了他的最重要的作用。外国制造商和当地商人以赊销方式向他提供商品和奴隶，他接着又把它们转售给种植园主。要不然，由代理商支付现款，而实际上是将这笔钱借给种植园主。种植园主希望在收获季节中补偿他们对代理人的欠帐，但是如果生产下降，他们就指望代理人把欠帐转到下一年度。有时候代理商把短期贷款延长成为抵押贷款。种植园主们希望在他们等待下一个收获季节或在长时期内得到经济支持，因此代理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765

虽然咖啡种植园主偶而也对他们代理人的所作所为提出抱

怨，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原因很简单：种植园主与代理商往往是亲戚，甚至更经常的是合伙人，而且有时候是同一个人身兼二职。早些时候的历史学家认为商人与种植园主之间互相敌视，他们靠一些孤立的例子来加以证明；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里约的代理商号的全部合伙人中间，至少有1/6的人是内地的咖啡种植园主；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商人虽然住在城市里，却拥有自己的种植园。[①]还有其他一些人同种植园主的女儿结了婚，这样他们的儿子就既是种植园主又是代理商。在累西腓、巴伊亚和里约的商业协会中，种植园主同商人，甚至一些外国人联合起来，为保卫他们在出口贸易中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活动。如果代理商同种植园主真的发生冲突，那也更多地是同较小的种植园主而不是同真正富裕的种植园主发生冲突。

有一个事例可以用来说明商业与土地之间的结合。安东尼奥·克莱门特·平托(1795—1869)作为一个少年，身无分文地由葡萄牙来到里约，开始以当办公室勤杂工谋生。通过辛勤劳动，凭着商业敏感和好运气，他终于在商业界取得成功，他先是充当奴隶贩子，后来又做咖啡代理商。接着，他购置土地，到1850年，他已经进入里约热内卢省最大的地主行列。到1857年，他获得新弗里堡男爵封号。他贷款给别的种植园主，同时也在铁路企业中投资。他的住宅座落在当时里约城时髦的卡泰特区，这座住宅经过移民巴西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加以精心的装潢修饰，后来成为巴西总统官邸。平托庄园的价值按当时外汇比率折算估计为80万英镑(大大超过350万美金)。他身后遗留下14座咖啡庄园，2,000多名奴隶，一个代理商行以及多处市内房屋，其中一处藏有进口名酒约1,500瓶。

---

① 约瑟夫·E·斯韦加特著《巴西出口农业的资金筹集与市场销售：1850—1888年》里约热内卢的咖啡代理商》(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0)，第66—98页。

代理业与银行业之间的距离只有小小的一步。长久以来，来 766 源于咖啡生产利润的资本就被种植园主作为贷款借给别的种植园主：这种借贷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也可以借给可信赖的邻居，或者提供给想打他主意的地产所有者，盘算着最终会取消他的抵押财产赎回权而把那块地产据为己有。作为提供商业贷款的代理商行合伙人，种植园主变得习惯于预测风险和对变化莫测的货币市场作出判断。到19世纪50年代，种植园主同咖啡代理商一起成为好几家银行的主要投资者。投资者把以前会借给奴隶贩子的钱存在银行里。几乎所有这些银行都把业务集中于商业贷款，主要是向那些以种植园主的契约作抵押的代理商贷出款项。有些银行也被授权发行货币，特别是在1857年到1860年放宽银行法的短暂期间。金融界的意见把1864年发生的导致好几家金融公司破产的金融危机归咎于这次放宽银行法的长期影响或者是随后实行的限制。1862年建立的三家英国银行在危机中幸免于难，而且继续经营获得繁荣。只是在下一个十年中，当法律做了改动，使拖欠的贷款更易于收回时，抵押银行才开始直接借钱给种植园主。但是由于缺乏确定的土地契约，总是使奴隶变成重要的抵押品，随着奴隶的老龄化和难以补充，种植园主们感到要为种植园的长期现代化或扩展的计划筹集资金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看来威胁出口繁荣的不是奴隶制度，而是奴隶制即将完结的预兆。

信用贷款为进口提供了资金，而其中大部分进口货来自英国。19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提供了巴西进口的一半商品，第二个最重要的供应国美国只占进口的1/10。到1875年，法国人取代了美国人，但英国人仍然占第一位。1850年到1870年期间从英国进口的货物的70％是纺织品，其余的一半是其他消费品。资本货物和原料——五金和其他铁制品、煤、水泥和机器——只占15％。大部分进口货物运到里约热内卢（1845年到1849年占54％），而巴伊亚（占19％）和累西腓（14％）则远远落在后面。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拥

有大部分进口商行。外国商号或者向巴西批发商出售商品，或者更经常的是向零售商以及通过代理商向土地所有者出售商品。他们保证使种植园的奴隶们穿上英国的棉布，使用英国的锄头。

任何限制进口的措施——诸如某些想成为工业家的人所要求767的保护关税之类——都遭到那些要保持低水平的进口货价从而降低出口品生产成本的决策者们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种植园主和商人在政府有效地执行其某些职能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为此就需要财政收入，最好这种收入是来自进口关税，而不是其他来源。在1850年后的25年中，进口商品的税收占政府收入的60％，而出口税收只占16％。1844年政府终于得以摆脱1827年英国—巴西条约的规定的15％关税税率的约束。新颁布的关税税率一般提高到30％，某些项目提高到60％。虽然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财政方面，却也产生了一种温和的保护作用，在一个时间内帮助了传统的手工工匠们经受住大批进口商品的冲击。但是，1848年上台的新保守政府的财政部长，本人是咖啡种植园主的若阿金·若泽·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后为伊塔博拉伊子爵，1802—1872)，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和修改关税税则。1853年发表的委员会报告极力鼓吹自由贸易的优点。报告起草人引证了一大批权威人士，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的意见，显示他们强烈赞成政府不应限制国际贸易的这一原则。他们说，巴西应当集中力量于它最擅长的事情：种植咖啡。虽然如此，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这就减慢了实行自由贸易的步伐，直到1857年关税法和更自由的1860年关税法才大大降低了税额。巴拉圭战争(1864—1870)的花费需要增加额外收入，其结果就导致实行略微高一些的税率，但其中并不含有保护主义的用意。

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制造业都是由各种作坊组成的。10个到20个人一组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在这些小作坊里劳动，他们制作帽子，靴鞋，马鞍，书籍的封皮，绳索和家具。他们也在酿酒厂和鼻烟厂里工作，还制作植物油和罐装食品。肥皂和蜡烛也是

当地制造的。到1861年，巴西人或外国企业主已在里约建立了10家翻砂厂，虽然后来由于近口机器和零件比较容易，这些工厂数目减少了。由于向内地运输的条件有了改善，那里手工织出的纺织品在近口织物的竞争下变得不合算了。最重要的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阻碍了经济发展：奴隶制的存在和自由民中间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公正现象相当严重地限制了消费品的市场。 768

然而，19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两家巴西棉纺厂由于受到关税的保护，却在19世纪中叶繁荣兴旺起来。1850年，位于紧接里约热内卢内地地区的奥尔贡山麓的一家棉纺厂，拥有50部织机，2,012个锭子，并雇用116名工人。巴伊亚的一家棉纺厂在1861年使用4,160个锭子和135部织机。到1866年，共有九家棉纺厂，其中五家在巴伊亚，生产越来越多的纺织品，这些工厂雇用800名工人在350台织机和1,400锭子上工作。几乎全部工厂都依靠水力作为动力。到1875年，已有30家棉纺厂，其中1/3在巴伊亚，其余的分布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但他们的产品仍然只占巴西全国消费量的很小一部分。

巴拉圭战争大大地刺激了19世纪60年代末期的工业生产。直接的因素是政府采购战争物资，但是另外两个因素也起了作用：政府赤字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和为资助战争事业而提高关税所产生的并非有意的保护作用。尽管如此，商人们还是抱怨政府宁愿购买例如蹩脚的进口制服，而不愿扶植巴西工厂的发展。

战前有一位企业家显得特别突出其原因如果不是由于他事业成功的话，那么就是由于他涉及的方面繁多和他做生意中的浮夸声势。他就是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男爵，后为毛阿子爵(1813—1889)，此人生于南里约格兰德，13岁时为里约热内卢一个英国进口商人当差做僮仆。他的一个叔父为他找到一份差事，但看来以后他主要是依靠自己在企业经营和政治这两方面的才能。到他20岁的时候，他已是这家进口商号的合伙人，24岁时成为它唯一的经理，他受到1844年关税法的鼓舞和早些时候访

问英国工业城镇时的启发，建立起一座翻砂厂，制造铁管子供给政府为里约城的积水区排水之用。到1850年，他已雇用300名工人。在这个企业的基础之上，毛阿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不久以后，他投标获胜，承揽了里约的煤气供应并为此制造必需的导管和灯具。接着他购买和扩大了一座造船厂，最后造出了72条小船，其中大部分是汽船。这时他办起了一个轮船公司，船只在亚马孙河中定期航行，还在南里奥格兰德开办了一家轮船公司。到1857年，他雇用的工人增加一倍以上，达到667名，其中包括85名他本人拥有的奴隶，75名租来的奴隶，还有300个外籍工人。

769

1857年的削减关税迫使毛阿不得不同外国制造的产品竞争，这时候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银行业的活动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从1840年起，他就同他的英国商业合伙人一起，成为曼彻斯特一家商业银行的合伙经营者。1851年他在巴西创建了他的第一家银行，后来的毛阿银行不仅在整个巴西南部遍设分行，而且在乌拉圭和阿根廷都设有分行。他认为银行是铁路的盟友，他在铁路中也有大量投资。事实上巴西的第一条铁路(1854年)是他兴建的，尽管这条铁路只有14公里长，实际上到不了哪里，而且象他自己说的，只是作为一个"样品"，表明铁路是什么样子和它能干些什么。① 更重要的是毛阿在圣保罗铁路中的巨额投资和轻率地给予筑路承包商大量透支，这个承包商后来破产，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1864年使里约好多家商业银行倒闭的危机进一步耗尽了毛阿的资财。同时他卷入乌拉圭的政治漩涡，成为一个摇摇欲堕的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持者，这件事迫使他屈膝认输。1875年巴西发生的下一个金融危机终于迫使他陷于预料得到的破产境地。

在他所有的活动中，毛阿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种植园主所支配

① 阿尔伯托·德·法利亚所引，见所著《毛阿-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毛阿男爵和子爵，1813—1889》(圣保罗第2版，1933)第165页。

的政府的一个依附者，他象所有依附者一样，发现只要他的庇护人认为合适，就会轻易地牺牲他的利益。但是政府没有给被围困的毛阿以信用贷款，并非象有些人声称的，出于一个庄园主阶级对他的商业背景的敌视，而是由于种植园主们能够比他更精明地利用这种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商业利益。

经济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港口城市。咖啡代理商和其他商人，银行家，初出茅庐的工业家，保险公司经理，轮船公司代理人以及大小官僚，连同随之而来的店主，旅馆老板，律师，医生和教员，这些人构成了城市中上层阶级的队伍。他们的雇员或奴隶——搬运工人，女佣，建筑工人，运水工人，女裁缝，推销员，会计员和办事员——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人口的构成。到1872年，里约热内卢城有25万以上的人口，而累西腓和萨尔瓦多的人口都在10万以上。虽然按国际标准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大城市，但比起巴西其他城市或与它们本身早先的情况相比，就看来是很大的城市了。

770 在这些日益扩大的城市中，奴隶们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男性奴隶抬着高贵女士乘坐的有窗帘的轿子到她要去的各处走动。他们在港口把成袋的咖啡装上等待的轮船。他们还穿过大街把整袋咖啡扛到仓库去，据说他们沉重的负载会在10年之内压垮一个人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外国旅客时常议论手工作坊广泛使用奴隶的情况。象累西腓或萨尔瓦多这样的城市以及更突出的里约热内卢，都需要各种各样工匠的、范围极其广泛的劳作，包括银匠、木匠，石匠，油膝匠，制鞋工和制帽工。他们或者是奴隶，或是自由劳工。从事家务劳役的奴隶主要是妇女，她们不仅被上层阶级而且也被中等收入的人雇来背水，从市场取回食品，在公共水源处洗衣服，或到海边去倒垃圾和粪便。

两种做法使城市奴隶制接近于工资劳动制。奴隶们常常并不直接为他们的主人劳动，而是为租赁他们的另外的人劳动。这种做法给奴隶劳工带来一种灵活性，这一点常常为后来的理论家所

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同他的劳工只有一种金钱的连系，而且他宁愿去寻找另一名劳工，也不愿作出太多的努力或耗费过多的物力去通过强力手段或施以恩惠的办法来行使个人的权威。有的奴隶自己租赁自己，按月向主人缴付定额租金。这些奴隶给自己找到工作，他们争取以最好的条件来与别人订约出卖自己的技能或劳力，他们将挣到的钱除主人所索取的数目以外的多余部分都留给了自己。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住所，负责满足他们个人所有的需要，有时甚至雇用别人——奴隶或自由工——替他们工作，以实现合约的要求。

随着发展中的咖啡业对奴隶的需求日益增长，城市中奴隶人数减少了，而且同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下降了。大批城市中的奴隶主受到种植园主所出高价的引诱，纷纷出售他们的奴隶到种植园去劳动，他们自己则转向自由劳工来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要。1870年里约热内卢的3万名家庭女佣中，只有43%是奴隶。[①] 在棉织业中奴隶业为工资劳动者所代替。在棉纺厂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由妇女和儿童，一位当代学者说，这些人是“从最贫穷的阶级中吸收过来的，少数人处境极端悲惨”。[②] 同时为失业所迫从葡萄牙出走的移民们不愿在奴隶般的艰苦条件下到咖啡园里去工作，就在巴西城市中寻求就业。在1846—1875年的30年期间，有30万多一点的移民到达（平均每年10万人）；其中一半是葡萄牙人（见表2）。到1872年，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移民比奴隶的人数还多。

城市不仅为奴隶而且为自由民开辟了乡村所缺少的机会。城

① 桑德拉·劳德戴尔·格雷厄姆著《保护与服从：1860—1910年里约热内卢家务女佣的家长制世界》（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2）第10、18页。

② 引自斯坦利·J·斯坦著《巴西棉织工业：一个不发达地区的纺织企业，1850—1950年》（麻省坎布里奇，1957）第54页。

表2　1846—1875年移居巴西的移民

年代	葡萄牙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其　他	总　计
1846—1850	256	2,143	5	2,399	4,925
1851—1855	25,883	5,213		7,936	39,078
1856—1860	43,112	13,707		25,813	82,669
1861—1865	25,286	7,124	3,023	15,354	50,970
1866—1870	24,776	5,648	1,900	13,689	46,601
1871—1875	32,688	5,224	4,610	37,716	81,314
合计	152,101	39,058	9,533	102,907	305,557

资料来源：伊姆里·费伦奇编制，载沃尔特·F·威尔科克斯主编的《国际移民》(纽约：全国经济研究局，1929)，第549—550页。

市容许少许增加一点人际关系中的非个人性质，容许较多的社会流动性和比较多样的被认可的行为。黑人可以比较容易地创造和传播他们的习俗，语言，音乐，家庭传统，总之，他们的文化。家务女佣人尽管受到严密的监督，仍可以在她们每天的日常事务中偷偷得到一些空闲时间；她们在城里游逛，的确比她们有些女主人更随便和不受拘束，这些女主人受到一个充满嫉妒的男性统治社会的清规戒律的禁锢。然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以雇主给予多少好处为转移的，给工人这种好处是为了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服务，不管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民，是巴西人还是葡萄牙人。统治集团的社会价值观甚至渗透了城市生活。例如，城里的作坊主或商人同他们的雇工住得很近：典型的情况是，工人们在店铺后面睡觉，雇主和他的家庭成员在楼上居住。连工厂厂主人象家长式的种植园主一样，向雇工们提供食品，衣服和住房，还有对他们的训练。雇主们对工人们如何利用任何一点剩余的空闲时间也想加以控制，雇主们监视他们的来来去去，他们偶而有的同外人的关系，总之，监视工人们行为的一切方面。自由劳工常常拿不

到任何工资，而仅仅得到日常必需品，也许在年终时可以得到一772 些奖金，这还要靠他们的良好行为（这样就缩小了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差别）。虽然在城市里用公开的暴力来对付不顺从的自由工人比对奴隶要少，他们还是会经常受到解雇和随之而来的不仅丧失工资而且失去住房和保护的威胁。由于城市中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很少，这种威胁就变成一种隐蔽的暴力。即使城市里的奴隶制度已经衰落，现金工资也只是缓慢地取代依附性的义务。尽管城市居民中觉得必需保持奴隶制的人已越来越少，奴隶仍然继续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直到1888年被废除为止。

虽然随着城市的发展，终于出现了与地主阶级性质不同甚至相敌对的社会集团，但是在187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在大部分政治决策中仍行使着明确的权力。虽然人们认为所谓的商人和地主之间的权益对分制更多地是历史学家们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过去的现实情况，而且人们注意到即使是曾经存在过，它也只是偶而导致利害冲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地主和商人一起在政治制度中起了支配作用。1870年以前，制造商们并没有形成一股重要的或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自己就是从事出口贸易的商人。作为无产者的奴隶或自由劳工，尽管他们当然是绝大多数，但他们除了通过由来已久的消极抵抗以外，对国家事务不能产生任何影响。某些历史学家提出，有一个官僚—政治阶级或集团作为对地主阶级的平衡力量而存在着，但是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政治家和官僚不是本身拥有土地，就是通过家族联系同地主的利益连结在一起。其他人通过同商人和金融界的联系，其利害关系本质上是与有产阶级相一致的。即使那些感到并未从现存制度中公平地分享到一份利益的地主们，总的说来也还是甘愿让最富有的阶层去掌握权力以便维持社会秩序，而这一点对他们继续控制奴隶和下层阶级以及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至关紧要，因此，巴西的宣传家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将巴西的稳定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所谓的特有的

动乱加以对比。为社会统治集团提供合法根据的价值观念也加强了政治制度中有产阶级的权威。

一个立宪君主曾统治过巴西。内阁同时向君主和议会负责，这个议会是由有50多一点的成员的参议院和大约120个成员的众议院组成的。皇帝在国务委员会的建议下，从各省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选人中任命参议员。参议员终身任职。众议员由至少每四年一次的间接选举产生。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佩德罗二世（1825—1891）在1831年其父佩德罗一世（1798—1834）退位后继承王位。到1850年，他已25岁，不再依赖即位初期曾指导过他的顾问小圈子，但他在行使1824年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时仍然十分谨慎，他对巴西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现实比他父亲要敏感得多。事实证明他在裁决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争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尽管他向内阁成员发出一系列指示，一般是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但是内阁成员只是偶尔重视他的意见。他从来不能——也很少愿意——下令实行会威胁到有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性变革，这个有产阶级是他权力的支柱。他竭力避免发生个人不道德行为和举止不检点而损害他的政府的信誉。佩德罗二世是个头脑清醒的并常常是忧郁的人，他专注于政府事务的细微末节，这并不是由于他拥有广泛的权力，而是因为他能够运用的权力很小。可是由于他这种经常干预细节问题的行为，他就无意中招致了人们的责难，认为他使巴西不能进行重大的变革。

因为皇帝的存在明显地影响着全国。国民永远是把支持执政内阁的代表们选进议会。这是事实，尽管表面上采取了一些开明的措施，包括保护政治反对派的权利，维护新闻自由以及试图保证选举中的公正计票。只有皇帝才能免除总理的职务和召入一名对手，通过这种方式引进另一个政党来控制政府机器。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从实际上同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的选民中获得支持的——在某些情况下同一批选民会在两党中变换支持对象——因此佩德罗二世即使这样做也并没有威胁到任何占统

773

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或经济利益集团，相反，他倒是响应了这样的节奏，即按照与各地区企业有密切联系的政界领袖和官僚上层分子寻求的方向，去推动或限制政策上作出适度的变化。

国务委员会由12名高级政界人士组成，由皇帝任命，终身任职。委员会负责就皇帝如何行使他的“适度的权力”提出建议。774 在遴选这些国务委员时，按惯例皇帝要依靠总理的提名。反过来，皇帝在运用他的权力任命和解除部长职务方面又向国务委员会征求意见。每届内阁都还必须获得立法机构的信任，不然就要要求皇帝解散议会和举行新选举，皇帝将在与国务委员会成员磋商后采取这一行动。立法事项需经皇帝批准，通常他在批准之前要与国务委员会磋商。最后一点是，国务委员会还象法庭一样行事，它审议那些牵涉到政府各部门之间争议的案件和控告政府的诉讼，这样，国务委员会就对法律和政府法令是否合乎宪法行使了司法审查权。

名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总理在选择他的内阁阁员时，仔细地注意在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地区实力以及议会技巧等门路之间取得平衡。① 内阁指导政府的政策。它制定预算提交议会，而且在实际上还拟订提交议会辩论的立法提案。最重要的是，内阁任命所有其他行政官员，在某些限定条件下任命全部法官和主教，并决定大部分军事官员的升迁。

各省省长的任命显得最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省长负责执行内阁发布的指令和保证帝国法律得到遵守，但事实上他的主要职责是使选举结果有利于内阁。为完成此项任务，他们依靠封官许

① 若泽·莫里略·德·卡瓦略著《巴西帝国的上层集团与国家结构的建立》（斯坦福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4）第190页，表明在1853—1871年期间，26％的内阁成员来自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另有26％的成员来自里约热内卢市和省，18％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24％来自其他省份，还有6％来自巴西境外，大概是来自葡萄牙。

爵作为最重要的手段。省长们给一些人分配官职，作为对他们过去一以及将来一政治忠诚的报偿。内阁特别依靠省长来取得政治信息和正确的判断。但是，尽管省长的作用极其重要，他们的任期却十分短暂。他们的任用随总理的爱恶而定，后者经常改组全国政府机构，他把省长们在各省之间调来调去，或者把他们召到里约去担任重要职位，提升他们到内阁任职，如果认为某些人不称职就把他们调去担任不重要的挂名职务。相当数量的省长同时还在议会中任职，因而在每次议会会期开始时都要离开省城前往里约热内卢，把该省的日常行政事务交给副省长去掌管。

省长手下执行法律和收集政治情报的主要人员是各省警察局长以及他们的警长们(delegados)，这些人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副警长(subdelegados)和街区警官(inspectores de quarteirão)——每25所房屋为一个街区——起码在理论上说，把中央政府的权力贯彻到每一个小区。不过除了警察局长以外，警察官员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薪俸，而是从他们日常的私人活动中获得个人收入。简言之，在农村地区热中于这类职位的大部分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对当地对手们的权威。伯南布哥富有的蔗糖种植园主恩里克·马克斯·林斯给他的一个女婿搞到了警长的职位，并使他的一位姻兄弟充当他的副手。该县的其他三位警察官员共拥有8座种植园。在城市地区，省长们喜欢挑选律师和法官担任这些职务，但有时觉得任命军官来担任这类职务是有利的。政府依靠普通公民去执行命令，这样就使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并且承认了当地名流的权力和重要性。

正如自古以来那样，葡萄牙国王基本上是象法官一样进行统治的，因此司法权威与执法功能或警察职能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自从1841年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法律以来。地方上的警长就拥有司法权力。他们不仅提出控告，而且收集证据，听取证人的证词，并且向县法官(juiz municipal——也是由中央任命的——

提出关于案件调查的书面纪录，法官则据此作出判决。由当地选出的治安法官(juizes de paz)在早些时候曾经掌握警察权力，现时的作用只是组织选举军委会。对普通公民说来，警长现已成为权力中心，可以实行宽恕以减轻法律的严酷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政治上顺从的人们，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仁慈也可以随时停止。

法官们的情况和警长们形成对照，他们在巴西的两所法律学校之一接受同样的教育(常常在第一所学校开始学习，而在另一所学校完成学业)，希望在专业的等级制度中逐步得到提升。他们虽然可能拥有土地，奴隶或商店，却接受政府发放的薪俸，听任上级把他们在各地之间频繁地调来调去。地方法院法官(juizes de direito)可以终身任职，但通常在一个地点只任职四年。该处任期届满后，他或者被重新委派续任一期，或者被"提升"到高一级法院任职，不过任职地点却不一定更有吸引力。在第二任期满后，再一次面临调动的可能性。一个地方法院法官可能随时由于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失去原有职位，在担任警察局长职务之后即使任期很短，他也会被调回法院，但不一定是回到原先的地方。他也可能留用而没有具体职位，一面领取薪俸，一面等候空缺。地方法官是从县法官中间吸收的。而县法官更是随时被到处调动，在选举期间，安置他们就象在一场复杂的象棋赛中把棋子挪来挪去一样。

所有想要保持职位的公职人员都专心致志于使里约热内卢的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选举是间接的，选举权是有限的。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不让参加投票，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以外，法律还禁止以下人员参加选举：25岁以下的男人，乞丐，流浪汉，私人和家庭仆役，以及所有本人财产的年收入低于200里亚尔*的人。围绕着收益应如何界定和如何证实的问题进行过许多辩论，但是任何人只要他的姓名列入合格选民的名单就可以参加投票。

* real(复数为reis)，当时巴西的货币单位。——译者

这件事——以及确定一个可能的投票人是否名副其实——完全由选举委员会来决定。如果有人对未来投票人的收入或身份提出疑问，后者只需要提供由三名证人宣过誓的声明来证明他的情况属实即可，但是相反的证词也能很容易地使他丧失投票权。假如正反两方面都有证人——当然通常是这样——就由选举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尽可能妥善地作出决定。从1846年以后，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人数视上届选举结果而定。投票只是选出选举人(县议会议员除外，他们由直接选举产生)。再由选举人在地区选举圈中开会选出议会众议员，省议会议员，并在参议院有空缺时提名参议员。每个教区中得票最多的选举人就成为治安法官，并在下届选举时主持选举委员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选举人。

在选举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寡头统治者有充分机会来施加压力。公民们并不是秘密投票。由于大部分投票人是文官，他们只是把本地的庇护人交给他们的一张选举人候选者名单投进票箱。选举时由警长来维持秩序，有时这就意味着把"捣乱分子"——也就是反对派投票人——从投票站赶开。选举结果如果受到怀疑，就可以由县法官或省长予以否决。选举人本身大体上和当地统治者一样，会从支持政府候选人中间获得很多好处，而如果这个候选人失败，他们就会丧失很多利益。结果议会选举总是一成不变地产生有利于执政内阁的多数席位，有时候政府在众议院中几乎得到全体议员的一致支持。1855年，采取了由一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来代替以往在全省范围内的选区内选举多名议员的做法，这使得少数派能够在议会中得到一些代表席位，因为政府不可能充分注意到所有的地区，虽然由于1860年修改了选举法，连这个新的开端也再次受到了限制(见下文)。

777

一个追求全国声望，也许最终想当上总理的政客，是以给予地方上的委任职位去酬谢支持者的办法来显示他的实力的，由于内阁成员或他们直接任命的官员实际上可以派人担任任何地方上的职位——无论是司法，警察，教育或征税等各个方面——一个

拥有官职恩赐权的错综复杂的纵队就形成了政治制度的支柱。① 最终，官职恩赐制把朝廷与乡村联结起来，甚至使"仆役"阶层也和一个个人恩惠的全国性制度连结在一起。地方上的有权势人士通过政治活动来维护一种实行保护臣民的和家长式统治的社会结构，并且把它传到下一代。奴隶主或他的儿子参与其事，为的是替他的家庭以及家庭的每个成员所属的大批依附者和被保护人谋取官僚机构的职位，挂名差事，俸禄或军队职位。当然，政府并不仅仅是势力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执行委员会"，其原因是，第一，这些经济集团相互间对于特定的目的与手段意见并不一致；778 第二，为了维护总的社会制度，有时需要采取一些触犯权势集团利益的行动。但是政府使双管齐下的家长式统治——一面要求顺从，一面施以恩惠——在它内部不断延续，这样就加强了有产阶级的霸权地位。

帝国借重一批人的政治和行政才能来维持和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批人为数较少，却具有相似的背景、教育程度和经历。最近的研究材料表明，在那些可以从人名词典中查证其社会背景的内阁部长们中间，有54%的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势力有关，另有14%的人与商界有关。72%的人受过法学教育，他们要么属于第一代，

① 在通过政治上的恩赐制度(patronage)来委任的官职中有教会中的职位。依照殖民时期的前例，政府为巴伊亚大主教职位以及另外八名主教职位向梵蒂冈提名。教区付教士也同样由政府向主教提名任命，而所有升迁和调动都取决于政治上的效忠。虽然教会本身有权号召人们效忠，但是通过恩赐官职的网络，它同其他一些机构纠缠在一起。国家征收什一税并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付给教会人员有限的薪金。其他任圣职的教士谋求庄园牧师的职位，或者到城市有钱的世俗兄弟会中任职。无论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庇护人都期待着神职人员像其他依附者一样对他们表示顺从。教会人员在早期曾积极参予叛乱，但到了19世纪中叶，他们却宣扬遵守秩序与服从合法权威。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才有一些教会人士对于这种权威究竟属于皇帝还是属于教皇提出了质疑。

进过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要么上过累西腓和圣保罗的法学院。① 投考这些学院的人必须受过花费很多的中等教育，而且还要结交有权势的人物。另一条进入政治精英阶层的门径是通过军事院校，对于出身并不显赫而有才能的年青人，这条路子是更加开放的，不过1850年以后，这条途径变得不大常见了。事出以后，这位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在越来越多的不同地区寻求职位，扩大他的社会联系，同时也就总是越来越迫使自己不得不报答那些军长的更有威望的人物所给予的恩惠。从担任地方检查官，到县法官和地方法院法官，接着又升任省主席职位，这位地位不断升迁的候选人表现出他的行政才能和政治上的坚定性。最后被选入众议院和参议院，这就使他成为从中挑选内阁部长的后备队伍中的一员。拥有土地和奴隶的阶级由于积极参加各种层次包括最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它超越省际和区际界线而形成各种联系。各地由于致力于本地特有的出口农产品而形成地方性的忠诚，同时在铁路当局鼓励下人们又日益面向港口城市，尽管如此，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各种势力之间的基本的政治上的团结还是得到了加强。对国王的共同效忠就是这种团结的象征性表现。

然而在较小的范围内，意见不一还是免不了要表面化。虽然“自由党人一旦当政，就比任何人都更象保守党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仍然出现一些分歧，其原因如果不是别的，那就是自由党人经常不能执政。那个时代的某些政治领袖——少数人——对个人自由比对公共秩序强调得稍为多一点，比起中央权力，他们更喜欢省级的或地方的自治权。虽然在某些特定时刻，这些分歧会显现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一些人即使在这些分歧问题上的立场也前后变化巨大，使人怀疑这些只不过是为暂时的政治利益而在口头上玩弄的观点，而不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当然，任何分歧都未曾在总体上涉及社会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来自

779

① 卡瓦略著《上层集团与国家结构的建立》第97—98，132页。

南里奥格兰德、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以及来自城市的政治家比来自盛产咖啡的帕拉伊巴河谷的政治家更经常地倾向于同自由党结合，但是也可以找到许多相反的事例。那些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希望采取行动结束奴隶制度的人很有典型性地同自由党人站在一边，但实际上保守党人通过了少数解放奴隶的法律，而事实证明自由党人则在这个问题上多半出现分歧，因为他们的选民，就象保守党的选民一样，也包括了奴隶主。

要谈论政党，不免会造成一些错误印象，因为议会集团缺乏统一性，不依靠有素养的选民，也不代表按意识形态划分的运动。有好几个重要的政治领袖背弃了自由党转而加入保守党，相反的情况也有发生。在广大地区中，政党的标签很少是前后一致的，而地方上的斗争大多发生在所谓政党的内部而不是在它们相互之间。乡村的派系纠缠在家庭关系以及庇护人与依附者的古老连系之间，为赢得选举的胜利而相互竞争，以便获取地方权力机构中的职位。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哲学来划分各个集团。它们的当选代表，一旦进入议会，就相互间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然而，当代人却仍然按照19世纪英国两党的模样来看待自由党和保守党。

从1853年到1868年期间，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寻求不同意见的妥协，害怕政党斗争和努力防止急进的改革派要求。历届内阁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充其量只能倡议渐进的和有分寸的变革。凡是可以接受的改革都必须由上层人物来恩赐，而决不是因下层群众的要求而产生的。社会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当代人看来，它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只是用家长式的小恩小惠加上铁腕手段才使它保持稳定。

1837年以后，当咖啡在全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时，就逐步出现了一种与前十年的自由主义相反的运动，以及一种朝向恢复中央政府权力的反向运动。1841年设立的由中央任命的拥有广泛司法权力的警务长官，使这一进程达到顶点，并且在此以后一

789

直成为自由党——保守党分歧中的试金石。1842年和1848年发生的两次不成功的自由党反叛，对于那些认为过多的省区自治和个人自由使社会秩序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的人们是有利的。1849年选举中保守党的胜利——只有一名自由党人在议会中赢得一席——为1848年九月任命的内阁中保守党的地位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基础，这届内阁的首脑是著名保守党人和前总督佩德罗·德·阿劳若·利马，后封为奥林达子爵(1793—1871)。保利若·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后来的乌鲁瓜伊子爵(1807—1866)，和他妻子的姻兄弟若阿金·若泽·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后来的伊塔博拉伊子爵[①]，同欧塞比奥·德·克罗斯·科蒂尼奥·马托佐·达·卡马拉(1812—1868)一起参加了政府。所有这三个人都直接地或通过联姻同里约热内卢省拥有奴隶的咖啡种植园主有紧密的联系。他们以"萨瓜雷马派"(Saquaremas)(源自他们经常聚会的庄园名)著称于世，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可以指望在其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个保守党内阁实行的强有力的控制使它得以通过和实施一些过去曾争论不休而难于解决的措施，其中显著的事例是禁止国际性的奴隶贸易和1850年的土地法。内阁还在1850年促成议会通过一项商业法典，这项法典曾在议会中先后辩论了15年。由于这部新近编纂的法典把有关合伙关系，契约和破产的各种商业关系均列入其中，同时还建立了由商界主持的法庭来裁决商业争端，这种做法帮助了巴西国内的企业同国际经济挂钩。不久以后，议会授权政府保证铁路投资的利益，这一措施支持了种植园主们为使巴西同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作出的努力。成立半官方的巴西银行，取代了地区性的私营货币发行银行，这样就扩大了政府对货币的控制。伊塔博拉伊还为降低进口关税而作出了努力。最后，1850年改革国

[①] 为简便起见，凡第二次和随后提及某个个人人名时，均将使用其爵位称号，即使这些爵位是后来才获得的。

民警卫队，取消其军官的选举制，这项改革把国民警卫队置于全国政府牢固的统辖之下。这届内阁通过上述措施就完成了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的过程，这个政府现在牢牢地掌握在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种植园主的手中。

781 中央政府一旦稳固地建立起来，事实证明，它是能够同敌对的政治派别进行和解的，办法是允许顺从的自由党人在体制之内有一些活动余地。1853年，保守党人奥诺里奥·埃尔梅托·卡尔内罗·莱昂子爵，后封为帕拉那侯爵(1801—1856)，主持了一届和解政府，举例来说，这政府就包括了两位人士，一位是著名矿业主安东尼奥·保利诺·利波·德·阿尔布雷乌，即阿巴埃特子爵(1798—1883)，此人曾是1842年米纳斯吉拉斯州自由党叛乱中的一位领袖，另一位是从1855年起担任陆军部长的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席尔瓦侯爵，即未来的卡西亚斯公爵(1803—1880)，此人的威望主要来自镇压地区叛乱中他的军事功绩。欧塞比奥，伊塔博拉伊和乌鲁瓜伊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比较年轻的若昂·毛里西奥·万德莱，即日后的科特日皮男爵(1815—1889)——他曾试图使他在巴伊亚的糖厂现代化——同样认为，保持旧秩序的办法一般来说就是对旧秩序加以修改。何塞·玛丽亚·帕拉尼奥斯，即日后的里奥布朗库子爵(1817—1880)，以及邦雷蒂鲁子爵路易斯·佩雷拉·多·科托·费拉兹(1818—1886)，都曾是自由党人，而现在却可以算是进步的保守党人。若泽·托马斯·纳布科·德·阿劳若(1813—1878)此时虽然还被看作是保守党人，却已经倾向于自由党，日后他成了这个党的领袖，他十分信奉个人自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教权主义，他怀疑君主政体的价值，主张逐步解放奴隶，不过同时又认为巴西如果要避免社会革命的破坏性混乱，它只能慢慢地实行变革。

这届和解政府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1855年终于建立了单一候选人选区制度。政府允许自由党人在保守党大体控制着选举系统的情况下也有机会选出一些自己的议员，这样就吸引了自

由党人来和平参政，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有重新掌权的可能性。由于这项法律的颁布，1856年选出了相当数量的一批自由党少数派议员。鉴于这批自由党人参加了议会，奥林达领导的内阁延揽了自由党领袖贝尔纳多·德·索萨·佛朗哥(1805—1875)出任财政部长。他终于使他的前任在1851年首次提出的降低关税建议得以实现，通过这一行动，他把他本人的思想意识倾向同维护面向出口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利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的得意工作是对银行法的改革，他创立了货币发行银行，从而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在这个问题上，种植园主和商人们一样意见不一，各以其本身作为债务人或债权人的特定情况为转移。然而，这项措施结果 782 证明是短命的，欧塞比奥、伊塔博拉伊和乌鲁瓜伊(萨瓜雷马派)在参议院中一致攻击这项措施。在1858年的一次内阁改组中，新闻记者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托雷斯·奥门，即日后的伊尼奥米林侯爵(1822—1876)取代了索萨·佛朗哥。

伊尼奥米林的任命标志着保守主义的重新抬头，他曾经一度是自由党人，事实上他曾恶毒地批评皇帝并参与过1842年的自由党叛乱，因而遭到放逐。此后他变得老成起来，并被劝诱重新回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中来。通过他主编的一家报纸，他为和解政府的温和保守政策热情辩护。接着，索萨·佛朗哥的银行政策激起了他的怒火，他在报纸上和在议会里都是这一政策的最强有力的批评者。伊尼奥米林出任财政部长后，就着手撤销索萨·佛朗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他也反对毛阿建立不受控制的股份公司的做法。最后，他开始制订一项严厉限制公司活动的法律，1860年通过的这项法律迫使所有即将成立的公司首先要获得政府的批准。1859—1861年的下一届保守党政府不仅贯彻实施了这项限制公司法，而且扭转了选举改革的方向，扩大了选区的范围，使每个选区产生三名候选人，而不是每区产生一名候选人。这样一来，各地区的豪绅势力就超过了各个地方的派别力量，而地方利益集团和少数派观点要找到代言人就更加困难了。

1860年12月举行的选举制止了这种保守主义的趋势。中间路线的(妥协派)保守党人由于对那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也大为不满，就同自由党人联合起来，后者自从在1856年获得局部的胜利以后，就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行使政治委任权。竞选运动发展成为一场特别激烈的角逐，这种情况在作为不同政见的温床和全国注意力焦点的里约城尤其明显。自由党的一位往日的领袖特奥菲洛·奥托尼(1807—1869)，此人曾是1842年米纳斯·吉拉斯斗争中的老手，他在里约各教区竞选时挥动一条白色手帕作标帜，赢得了城市平民的热烈欢呼。这次大选的结果虽然保守党继续在议会中保有多数席位，却也使好几个激烈的自由党人得到了席位。30年后，帝国时期的第一位重要历史学家若阿金·纳布科写道，1860年的选举扭转了于1837年开始的保守主义潮流，标志着形势已变得对改良主义有利，这一趋势在1889年推翻君主政体时达到最高潮。不过在当时，内阁政治的特点仍然是调和两方面的分歧。

837

1860年的选举使保守和自由"两党"都发生分裂。当选的保守党人中比较进步的分子同一些自由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议会联盟。这个有时被称作"进步联盟"的结合体打算废除1841年12月的立法，解除警察当局的司法权力。萨瓜雷马派仍然认为这种做法会威胁到他们曾经如此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极端的某些自由党人则认为这些措施还过于温和。他们把这一改革看作仅仅是朝向修改整个宪法的第一步，而宪法的修改应该终止，或者至少是限制皇帝的"调处权"('moderative power')；修改的宪法还应规定参议员必须定期选举；允许各省主席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任命；以及众议员改为直接选举。这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没有一项能在19世纪60年代取得进展。

议会中的这些新的分歧导致了1861年任命的保守党政府很快垮台。进步联盟支持一项不信任的动议证明是决定性的，但是当联盟的一名成员——前保守党人扎卡里亚斯·德·戈伊斯-瓦斯康塞洛斯(1815—1877)——被任命为总理而他仅仅建议对1841年法

案进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时，自由党人就抛弃了他，他也被迫辞职了。接着，一个妥协内阁上台后不愿意采取任何方向的行动，它证明并不比前任更强，但是由于没有可以代替的人选，一直勉强延续下去，直到1863年被迫举行新的大选为止。

1864年1月开会的新议会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发生的两个变化。进步联盟起草了一项温和的改革纲领，明确地排除了对宪法的重大修改，但要求把司法权从警察机构分离出来。在这期间，保守党领袖们已经认定1841年法律的规定不再是他们自身生存或帝国稳定的必要条件。当这些趋势变得更加明朗时，那些“更纯粹的”自由党人发现自己陷于孤立。中间力量又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这时扎卡里亚斯再次出任总理。

扎卡里亚斯出身于巴伊亚的一个富裕家庭，1850年以保守党人的身份被选进议会，不久就参加了伊塔博拉伊内阁。然而，扎卡里亚斯作为累西腓法学院的学生和后来的教授，早已深受阅读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杰里米·边沁著作的影响：他越来越相信个人应从国家控制下得到保护，他成为1841年法律的反对者，并在1860年发表尖刻的评论，批判皇帝的“调处权”。但他还是没有怀疑更大范围的政治框架，他只是希望实行谨慎的改革，事实上后来他变成教会特权的一个坚定不移的辩护人。他是一个措词尖刻的演说家，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来通过讽刺挖苦和无情的嘲笑到处树敌。当他在寻求实现巴西对乌拉圭的外交目标上显得魄力不足时，南里奥格兰德的自由党人马上群起而攻之。他执政七个月后倒台，那时巴西正走向战争，先是同乌拉圭开战，后来又同巴拉圭打仗。 784

巴拉圭战争是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它除了阻止扎卡里亚斯推行其温和的改革政策以外，还产生了其他的影响。它暴露了政界名流冠冕堂皇的言词的外表，和大多数巴西人所面临的被剥削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它也加剧了巴西军界内部的紧张关系。但是由于促使巴西国内分歧的尖锐化，它最终促进了改革的事业，特

别是在有关奴隶制的问题上。在扎卡里亚斯于1866年重新出任总理之后，他就在晚些时候发生的那次政治风暴中成为中心人物。不过在最初阶段，巴拉圭战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变革吸引来。

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巴西人，都在卷入拉普拉塔河东岸(乌拉圭)的事务方面有长久的历史。葡萄牙人在1680年设立萨克拉门托移民区，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到1776年才撤离。1816年葡萄牙军队重新占领这一地区，而从1821年到1828年乌拉圭独立国建立之前的期间，这块地方是巴西的一个省。接着，巴西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由于专注于确保其自身的统一，无法抵抗阿根廷的考迪略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①]在乌拉圭的势力扩张。在这期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牧场主在边界两边扩展他们的牛群和土地，他们时常把饲养的小牛赶到乌拉圭更肥美的牧场去放牧，随后再赶回南里奥格兰德去屠宰。1845年他们放弃了历时10年的建立独立国的斗争，而指望中央政府来保护他们在乌拉圭的利益。从1848年起在里约当权的保守党人和主张中央集权的萨瓜雷马派欣然予以协助。担任外交部长的乌鲁瓜伊子爵也希望最终为巴西船只开辟一条可靠的通道，以保证乌拉圭河上游的自由航行，直达马托格罗索省。为实现重建巴西在南部势力的目的，1851年巴西联合了乌拉圭反对罗萨斯势力的一个派别，并且——同阿根廷东北部的一位性情急躁的考迪略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一起——指令卡西亚斯指挥下的巴西军队试图(不久就成功了)推翻罗萨斯，作为代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一个进步的，面向欧洲的，世界主义的政府。

785

但是乌拉圭继续被内部争斗搞得四分五裂。不管哪一个政府在蒙得维的亚执政，都不得不同至少2万名巴西居民进行争斗，这些巴西人拥有大约400个庄园，其土地几乎占国土的1/3。乌拉

---

① 拉普拉塔河共和国的政局与巴拉圭战争的起源在林奇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撰写的第15章中有详尽的论述。

圭的两个“政党”白党与红党之间持续不断的内战使得许多巴西人对历届乌拉圭政府心怀不满并要求作出经济补偿。而且，巴西人希望不缴纳任何税款就把牛群从一个庄园赶到另一个庄园，或者越过边境进入南里奥格兰德州把牛群赶到那里的市场。乌拉圭的历届政府都认为这些税收是支付维持治安的费用所必需的。在这期间，毛阿的商行实际上已变成乌拉圭的官方银行。该地区的巴西牧场主谴责毛阿，因为政府征收的税款是为了偿还欠他的债务，而毛阿本人则认为他们提出的赔偿损失的要求过了头，这样会引起迫使政府不得不拖欠还债的危险。此外，乌拉圭人在1853年已废除了奴隶制度，他们威胁要解放巴西人带进该国的奴隶。一场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些曾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参加过进步联盟的巴西自由党人在南里奥格兰德州欠下了政治债。这样他们就有义务向乌拉圭坚持巴西方面的要求。这样做的办法之一就是支持当时已不掌权的集团——红党，当时红党在阿根廷支持下正企图推翻蒙得维的亚的白党政府。这时候，白党正确地觉察到来自巴西和阿根廷这两方面的威胁，它力图联合巴拉圭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

说瓜拉尼语的巴拉圭人对洛佩斯极端忠诚，此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国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隔绝。他感觉到巴西与阿根廷强权侵犯的威胁，害怕最后丧失巴拉圭所要求的两方面边界的有争议的领土。他非常乐意地响应了一些乌拉圭人要求帮助的呼吁，但是他并没有十分清楚地宣布他的意图，以便让巴西和阿根廷的领袖们都理解他认为任何对乌拉圭的威胁就是对巴拉圭和他自己的威胁。尽管如此，当1864年6月阿根廷和巴西的部长们在蒙得维的亚会晤以制订他们设想的解决乌拉圭内部斗争的方案时，他们仍然非正式地达成协议，一旦巴拉圭出来援救失败的白党，两国就采取联合行动来加以对付。 786

这次协议的条款后来证明，所作的预言一步步地变成了事

实。由于他们的行动，洛佩斯更坚定地确信巴西和阿根廷阴谋策划瓜分巴拉圭。当解决乌拉圭矛盾的办法已不起作用时，巴西调遣军队进入乌拉圭(1864年9月)，强制执行赔偿巴西公民损失的要求，并扶持红党上台执政。巴拉圭作为反击，立即扣押巴拉圭河上的巴西船只，并入侵巴西领土。洛佩斯由于错误地指望阿根廷东北部的乌尔基萨会给予援助，就下令军队越过阿根廷的领土，结果发现他自己也同阿根廷处于战争状态。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在1865年签订的条约中附有秘密条款，除其他问题外，这些秘密条款还规定争议中的巴拉圭领土分别转让给阿根廷和巴西，同时规定巴拉圭境内河流向国际贸易开放，并废黜洛佩斯。当这些条款在新闻界走漏风声之后，国际上出现了轩然大波，但联盟各国并未放弃它们的目标。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描绘成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巴拉圭暴君疯狂策划的结果。事实上，它是由各方利益冲突逐步升级而造成的，而有关各方作出的一系列错误的但可以理解的判断使事态更加复杂化。洛佩斯害怕巴拉圭被肢解，害怕他的国家不复存在，他的担心并非不合理，他知道巴拉圭的生存有赖于本地区势力的均衡。他严重地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以及他能从乌尔基萨那里获得的援助，在这方面他显然不大相信这位阿根廷考迪略已在1862年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实现了和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袖们很有理由担心乌尔基萨在同洛佩斯和乌拉圭白党联合起来之后在东北地区崛起。某些巴西议员的好战言论和巴西外交官们的应变计划更助长了洛佩斯对巴西的恐惧心理。他相信他已经清楚地陈明了立场，即一旦巴西对乌拉圭进行干涉，那就意味着战争。巴西则需要红党在乌拉圭掌权，以促进巴西公民的利益，并维护它在本地区的势力。巴西人不相信洛佩斯真的会投入战争，但他们确信如果洛佩斯开战，巴西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从而摆脱令人讨厌的边界问题，并保证巴拉圭河上的自由通航。所有各方的错误想法终于触发了战争。

战争一开始就对巴拉圭人不利。巴西军队已在蒙得维的亚安置了一个顺从的政府，他们迅速开往巴拉圭前线。到1865年9年，巴西人已把所有外国军队清除出南里奥格兰德州。但是巴西急于要维护它在本地区的霸权，这时就轻蔑地拒绝了巴拉圭寻求和平的努力。一旦战争打到本国的领土，巴拉圭人就更加坚定地进行战斗。1866年9月，盟国军队在库鲁派蒂遭到重大的挫败。阿根廷将军兼总统巴托洛梅·米特雷一直对盟国军队只保持着松散的指挥，这时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对付阿根廷国内的不同政见人士，这场战争在国内证明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各省的考迪略中间。巴西顽固地坚持要推翻洛佩斯，它就单独把战争继续下去，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又拖延了四个悲惨的年头。

这场战争暴露了巴西社会内部的多种紧张因素。巴西把巴拉圭军队逐出本国领土之后还一心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坚决要推翻和杀死洛佩斯，这表明了国内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忧虑不安的状况。巴西领导人为他们行动辩解所提出的理由是，他们必须把文明带给那个野蛮的国家，并且把巴拉圭人从专制暴政下解放出来。他们时常嘲笑巴拉圭的种族传统，并且流露出一种白人至上的观念。巴西政治家们或许是怀疑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害怕同欧洲国家对照之下自惭形秽，因为这些欧洲国家正是他们如此密切地加以认同的，巴西人周围到处都是奴隶，但他们对这种奴役制的犯罪感却越来越强烈。巴西猛烈地进行这场战争，似乎是给自己制造一个解脱令人苦恼的自我怀疑的机会。

巴拉圭战争刚结束时首次上演的一部歌剧间接揭示了这种种族怀疑的某些方面。安东尼奥·卡洛斯·戈麦斯(1836—1896)根据若泽·德·阿伦卡尔(1829—1877)的一部名为《瓜拉尼人》("O Guarani")的浪漫主义小说编成他的歌剧。故事发生于16世纪，在小说和歌剧中都赞美了高贵的野蛮人和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通婚，但是对巴西大部分人口的非洲背景却不予理会。这是寻求一种能把巴西的主题装进欧洲的形式里的神话故事

787

——这部歌剧采用意大利文歌词，并且在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首演——它反映的不仅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分离，而且是知识阶层同国家的疏远，这个国家79％的成年自由人口是文盲。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韦斯(1847—1871)由于在他1870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里提出对奴隶贸易的激动人心的谴责而常为人们提起。但即使是他，也在他书中所写的黑人主人公身上加上了“白人”的品质，甚至改变了他们的面貌特征，使他们能够作为英雄人物为人们所接受。奴隶们斗争的对象不是有血有肉的奴隶主，而是模糊不清的邪恶的非人格化的力量。在这种出口经济体制下的高度欧洲化的文明显示了某种可以理解的心理：不愿意面对现实的震撼人心的含意，而在种植园里或城市大街上日复一日地发生着人压迫人的事情正是这一现实的特征。

788

巴拉圭战争也使巴西武装部队内部的冲突尖锐化了。占有土地的阶级采取措施来保证他们对公共武力手段的支配地位，办法是在1831年建立了国民警卫队，由他们来担任军官。作为一项集中权力的措施，1850年的保守党内阁对国民警卫队中所有军官职位都实行任命办法，而不采取选举产生的办法，但这些任命的职位继续几乎全部落入大地主阶级的手中。典型的事例是东北部富有的蔗糖种植园主恩里克·马克斯·林斯，他统率全县的国民警卫队，其所属15个连队的连长中有8人总共拥有16个种植园。可是，正规军的军官团也进行了改组，到1850年已实现某种程度的职业化。现在对于那些既付不起进法学院所必需的中等教育的高昂费用，又没有必要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的人们来说，这样一项通过军事学院接受人才的职业变成了可能的进身阶梯。这样就在军官们和文人政客之间种下了某种阶级敌对的种子，最终会增长扩大，虽然其恶果直到19世纪80年代及其随后的时期中才显现出来。

在巴拉圭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最高层军官通常仍然来自一些上等家族或同这些家族有密切关系。例如，卡希亚斯是帝国一位主要金融家的兄弟，本人于1845年曾被选入参议院，是一位活

跃的保守党政治领袖，在三届内阁中任职，两次出任首相职务。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他维护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是比较年青的中等官阶的军官，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得到迅速擢升的军官，并不具有同卡希亚斯一样的对权势集团的自然而然的亲近感。

由于连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们自己也承认他们通常不适宜于在实际作战中担任领导，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就常常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停止这些军官的职务，而任命陆军军官代替他们。在巴拉圭战争期间，特别是开始阶段，陆军军官不够调遣，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们过去的经验只限于在星期日使队员们穿上花哨的军装列队举行阅兵式，现在却突然间发现自己掌管着炮火纷飞下的军队。不过，在战争拖长下去以后，从国民警卫队抽调的军队人数从1866年的74％下降到1869年的44％。正规军官团的人数却相应地扩大了。陆军军官对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对手们所有的成见并不出人意外地在战争中得到了证实。战后，里奥布朗庶领导的内阁停止了所有在国民警卫队中强制服役的制度，规定国民警卫队军官为没有指挥权的纯粹名誉职务，并拒绝给予他们从陆军征召士兵的权利，或行使警察职能的权利。地主阶级默认了这些决定，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欢迎有机会把打仗的任务转交给别人，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仍然是稳固的，而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并不依靠对军事力量的直接指挥。

最后，对巴拉圭的战争加剧了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促使保守党人重新掌权（在1868年），并导致持中间路线的进步联盟的解体。1864年年中，行动有些谨小慎微的进步联盟派改革分子扎卡里亚斯下台时，取而代之的是弗朗西斯科·若泽·富尔塔多（1818—1870），他也是一名进步联盟派分子，不过比扎卡里亚斯更有决心从事改革。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很能干的政治家。他任命保守党人里奥布朗库子爵为使者前往蒙得维的亚，这件事使议会中自由党

议员们离心离德。接着，巴拉圭军队侵入了巴西领土，这时让谁来统领巴西军队，理所当然的选择本会是卡希亚斯。但是，作为保守党的一员干将和1841年法律一贯的保卫者，他在自由党人心目中成了他们所反对的一切事物的化身。尽管如此，富尔塔多政府在这一危机时刻还是派人同他接触。他的回答是，由于他将主要依靠来自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因此州长一职决不能由现任的人继续担任，因为此人是被任命来执行自由一进步党人的意旨的，陆军部长表示同意，但是当自由党议员们得知对卡希亚斯的保守党倾向如此卑躬屈膝时就大为震怒，这种情况使富尔塔多犹疑不决，结果陆军部长辞职，富尔塔多挑选一名人所共知的卡希亚斯个人的夙敌接任部长，卡希亚斯不出所料，完全拒绝出来统率巴西的军事行动。这场争端使富尔塔多内阁于1865年5月倒台，仍由进步一自由党人组成的继任内阁决心不要卡希亚斯而应付局势。

790 巴西军队最初没有他也干得相当不错，到1865年10月，洛佩斯似乎已走向了不久将遭受到的失败。与自由党关系密切的两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将统率着巴西军队。但是库鲁派蒂之战(1866年9月)的失败使局面完全改变了。巴西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这种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明显。同时，在里约的进步联盟派内阁在废除1841年法律的老问题上发生分裂；结果扎卡里亚斯于1866年8月再次出任首相。

扎卡里亚斯此时既赢得卡希亚斯的支持，又并未失去自由党人的拥护，这表明了他真正的政治才干。他向自由党人提出一项令人吃惊的激进的建议：在走向解放奴隶方面采取重大的步骤。扎卡里亚斯在为皇室草拟的于1867年5月发表的演说中，让皇帝宣布，一俟战争结束，即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付诸实施。除了政治策略以外，其他方面的考虑也引向同一方向。有些领导人害怕英国要求废除奴隶制的压力，担心在这种压力下还会

发生奴隶暴动。① 一部分新咖啡种植业的显贵们，特别是圣保罗的种植园主，日益怀疑奴隶们是否会继续满足他们对劳工的需要。而且有迹象表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日益反对奴隶制度。扎卡里亚斯采取走向解放奴隶的行动，因而获得了许多自由党人士的坚决支持，尽管他任命卡希亚斯担任巴西军事行动的唯一统帅。然而，一旦卡希亚斯终于使战争前线的情况获得好转并在1868年初开始打胜仗，保守党人就认为他们理当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他们阴谋在卡希亚斯和首相之间制造分歧。虽然他们的诡计最初并未得逞，但是扎卡里亚斯还是在那年年中辞职了，因为皇帝在国务委员会建议下选定一个当时已是著名的反自由党人士的伊尼奥米林为参议员。不过，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评论家对他辞职背后的动机一直是意见不一的。历史学家若阿金·纳布科认为，选定伊尼奥米林为参议员不过是为扎卡里亚斯辞职提供借口，真正的问题在于卡希里亚斯对内阁的敌对态度。由于以后巴西国内表现出来的文官—军人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解释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有很多证据，包括扎卡里亚斯本人的演说，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扎卡里亚斯辞职是因为他认为国务委员会的保守党成员反对他迅速采取行动来着手结束奴隶制。② 甚至温和派扎卡里亚斯也是走得

791

① 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驻巴西公使威廉·克里斯蒂令人恼火地要求巴西实行一系列措施，来最终结束奴隶制。1863年他下令英国舰船在里约热内卢港口外劫持多艘巴西船只，表面上是为对巴西不遵从他的一些次要的要求一事进行报复，但显然是暗示英国在有关奴隶制度问题上不惜使用武力。巴西政府吸收了教训。例如在1867年，圣维森特子爵若泽·安东尼奥·皮门塔·布埃诺在向国务委员会提交一项关于解放奴隶母亲们所生养的子女的建议时，就表明有必要采取这一行动以避免"英国的压力"。见理查德·格雷厄姆著《1863年巴西与英国外交关系破裂的原因：'克里斯蒂问题'》，《历史评论》第24卷第49和50期(1962)，第117—138，379—402页；和理查德·格雷厄姆著《一篇解释性文章：巴西废除黑人奴隶制的原因》，《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46卷第2期(1966)第123—137页。

② 巴西国会参议院《年鉴》1870年7月15日和18日，第94—142页。

太远、太快了，必须加以制止。对扎卡里亚斯继承人的选择证实了这一观点。

1868年伊塔博拉伊取代扎卡里亚斯担任首相，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萨瓜雷马派咖啡种植园主。新内阁成员包括乌鲁瓜伊子爵之子保利诺·小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1834—1901)，以及巴伊亚州保守党新出现的领袖科特日皮，里奥布朗库和小说家—政客若泽·德·阿伦卡尔。国务委员会既然以其威望扶持了保守党反动集团，因此在伊塔博拉伊要求举行新选举而自由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予以批准时就支持了他的行动。政府照例毫无困难地获得了压倒的胜利。

为对付这些事态的发展，象富尔塔多和扎卡里亚斯这样的进步联盟—自由党人同议会中的自由党同僚如纳布科·德·阿劳若等人，甚至象特奥菲洛·奥托尼这样的激进自由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由纳布科领导的"革新俱乐部"。1869年5月，这个组织发表宣言，号召对宪法进行彻底改革。他们要求废除供警察以司法权力的1841年法律，要求给司法部门更大的自主权，废除国民警卫队和废除陆军的强迫征兵制，限制参议员的任期，削减国务委员会的权力以及逐步实行解放奴隶的措施。尽管如此，他们的宣言仍然是一个谨慎的文件，虽然末尾有虚张声势的口号："不改革，就革命!"① 同年11月，另一个团体发表一项《激进宣言》，其中除以上目标及自由党人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其他目标外，还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和扩大选举权，选举省长和地方警察官员，废除皇帝的调处权和国务委员会，以及立即废除奴隶制度。在这一文件上签名的人中间，有许多接着在次年12月里约热内卢的《共和宣言》上也签了名，要求废除帝国制度。

792

一旦索拉诺·洛佩斯于1870年3月死亡，对巴拉圭的战争随

① 阿梅里科·布拉西连塞·德阿尔梅达·梅洛主编《各政党的纲领和第二帝国。第一部分：原则说明》(圣保罗，1878)，第42页。

之结束，同时具有革新思想的新一代年青的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商人和进步的种植园主对伊塔博拉伊内阁的批评日益增长，面临这种情况的保守党阵营中较为开明的领袖们认识到，为避免更严重的意见分歧而采取重大让步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甚至伊塔博拉伊本人也接受了一项建议，停止公开拍卖奴隶。担心一个自由党内阁会在某个时候利用1841年法律来造出一个清一色的自由党议会的这种心理，促使某些保守党人相信废除这项法律是有利的。皇帝和通常一样运用其权威来支持革新事业。经过五个月临时内阁的统治，里奥布朗库子爵在1871年3月出任首相。他在政治生涯起步时的自由观点，他参加和解内阁的经历，他在巴拉圭战争中充任外交使者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实行温和改革的良好预兆。然而，里奥布朗库后来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手腕迅速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措施，对此却很少人有思想准备。他把警察与司法的职能分开，同时延长了法官的任期，解除了警务长官的司法职务。从而使1841年法律终于失去效用。他缩减了国民警卫队的权力：从此以后成为专职的警察队伍，在力量不足时候使用陆军部队来维持公共秩序。最重要的是，他说服了国务委员会实行180度大转弯来支持他推行“自由人出生法”（1871年）的努力，这个法令给女奴隶此后生育的一切子女以自由并为解放成年奴隶而建立一项基金。在不剥夺种植园主现存财产的情况下，他试图以上述行动来使奴隶们相信，只要他们继续俯首听命，将来就可以获得自由。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作为保守党首相的里奥布朗库，尽管遭到他本党内部右翼萨瓜雷马派的反对，却满足了大多数自由党人。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公正无私的政治家风度，消除了批评帝国的人们的敌意，把更广泛的变革推迟到下一个十年的末期。巴西政治领袖们又一次寻求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中间立场，这种立场对于在一个基于奴隶制的等级森严而又潜在地动摇不稳的社会制度中维持正常秩序是非常必要的。

793 在这20年中，知识界以大部分精力集中探讨了国家的本质和如何正确运用政治权力的问题。在巴西，成为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律师或法官是许许多多有文化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法学界人士在知识界精英中居于首位。乌鲁瓜伊子爵本人于1857年退出政治与外交活动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从事两项关于巴西法理学的颇具权威性的研究：《论行政管辖权》(1862年发表)及《对巴西各省行政管辖状况的实际研究》(1865年发表)。他为保守派观点所作的强有力的辩护无疑影响了随后好几代的法学院学生，官僚和政治活动家。1857年圣维森特侯爵若泽·安东尼奥·皮门塔·布埃诺(1803—1878)发表的关于公共法与巴西宪法的论文，其特点是比较强调个人自由，但是他也肯定了巴西政府制度的基本优点。这两位作者都认识到19世纪中叶巴西国内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所作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仅仅主张作一些细小的改进。阿戈斯蒂尼奥·马克斯·佩尔迪高·马列罗于1866年和1867年发表了关于研究奴隶的法律的论文《巴西奴隶制：从历史、司法和社会角度的论述》，其情况也大致相同。

前前后后的法律界人士首先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民法法典来代替从葡萄牙继承下来的民法。坎迪诺·门德斯·德·阿尔梅达(1818—1881)曾在1870年出版卷帙浩繁、具有学术价值的现行菲律宾法典(从1603年起即已生效)的版本，他主要是通过撰写有关法律与习惯上的改动的一系列脚注来为制定详尽的新法典奠定基础。自由党人纳布科·德·阿劳若着手拟订法典的草稿。虽然这部草稿到他1879年逝世时并未完成，但他所拟订的文本直到1916年新法典颁布之前一直是讨论的基础。

宪法制度也受到一些十分出色的批判，最有力的是扎卡里亚斯1860年在他的小册子里写下的关于调处权的性质与局限性的评论。自由党人奥雷利亚诺、坎迪多·塔瓦雷斯·巴斯托斯(1839—1875)超越于政党之上，探讨了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地方主义；他为作为巴西政治生活中一支主要力量的联邦主义的最终出台奠

定了基石。尽管他们为革新而努力，扎卡里亚斯·塔瓦雷斯·巴斯托斯及其他相类似的人士仍然继续赞同帝国制度的基本结构，即使他们试图对之作一些变动。他们基本上是温和派，寻求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意见一致，以便维持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 794

然而对保守党和自由党同样利害攸关的社会安定，主要地并非来自政治制度，而是来自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以忠顺服务来换取保护和恩赐的基础上的。的确，就象佩德罗二世扮演着全民之父的角色一样，蔗糖主、咖啡种植园主或工业家们也扮演着他的属下的工人之父的角色。依次类推，真正的父亲对妻子儿女保持着十足的权威，就象对其他的亲属，佣人，仆役和奴隶那样。而在一切情况下，残酷的暴力总是披上仁慈的关怀的外衣。在政治生活中，一套完美的恩赐制度使人们能够给那些坚定地支持现存体制的人以好处——特别是授予他们以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威。施以各种恩惠的办法不仅赢得了那些预料会听命的人们的服从，而且还缓和了那些被责成强制执法者的感情。这一时期以出口咖啡为基础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加了政府可动用的财力，使它得以真正实现它的家长式统治的作用。于是，政府不仅保持了本身的合法性，而且也同时保持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对许多仍然珍视社会等级结构的巴西人来说，这20年(1850—1870)意味着政府既开明又稳定的黄金时期。



第五篇

文化生活



第 18 章

自独立到1870年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和艺术

如果不了解与19世纪同时开始的革命斗争和独立运动时期，对难以理解拉丁美洲的文化史。的确，即使拉丁美洲当时的经历本身，也不曾感到自己同1776年和1789年革命、欧洲工业革命初期以来的国际事件来龙去脉，以及启蒙运动一个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传播，是如此紧紧扣在一起的。从欧洲殖民地向独立共和国（就巴西而言，则是从殖民地向独立帝国）的历史转变，从广义上讲，是与艺术方面从新古典主义（它在不久前刚刚取代了娇揉造作的巴罗克风格）向浪漫主义开始转变相对应的。取得胜利的浪漫主义，特别在文学领域，是新时代具有特征的形式——尽管在艺术的其他领域，特别在绘画和建筑方面，并不受到普遍赞赏的新古典主义仍然继续保持着更大的影响。雨果关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相当于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之论断，应用于拉丁美洲尽管遇到的阻力甚至更大，却比在欧洲更具有说服力，在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对前科学、前工业世界的一种贵族式的怀旧感。这种情况导致了历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碰到了往拉丁美洲文化史中的各个艺术领域贴标签的老问题。诸如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在欧洲这个发源地也往往含糊不清，然而，批评家们常常用它们来指明艺术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却不表达艺术上所产生的形式和概念方面矛盾重重的历史过程。这些同样的标签在拉丁美洲似乎有时完全不能体现实际情况，与历史条件

丝毫没有直接具体的关系，并在从事美洲研究的艺术家中间引起
798 了一种长期对立的看法，即美洲的“自然的”和自发的现实总是一再受到欧洲式冷酷的理性“文化”形式的束缚和压制。

西班牙是赋予欧洲以流浪汉小说（Picaresgue novel）和《堂吉诃德》的国家，但它又是一个殖民强国，它的宗教法庭禁止在西属美洲境内撰写和传播白话文小说，特别是以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为题材的一切作品。因此，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时期的第一部杰出文学作品《癞皮鹦鹉》*（1816）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既是合乎情理的又具有深刻讽刺意味。作者是墨西哥人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这是一篇对机会主义和腐败现象讽刺性的概括，它发挥了当时小说功能共同具有的特点，以支持解放的鲜明态度，运用大众文化的题材和语言，破天荒地针砭了当代墨西哥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利萨尔迪，自称“墨西哥思想家”（这是他1812年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的名称），是一名记者兼政治家和官员，也是一位作家，他那一代人形成的新闻界与文学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拉丁美洲大陆一直流传至今。他除了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外，还发表了无数的讽刺性小册子和单行本，要求言论自由并为尚处于幼年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争取担负指导公众舆论和趣味的任务而努力，他指出：“公众舆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是约束暴君、罪犯和蠢人的笼头和缰绳。”① 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利萨尔迪把他的想法隐寓在小说里似乎并非因为艺术家的职业癖好，而是为了避开书报检查和防止遭到监禁或陷入更不利的境地而出于此。然而，他具有特色的这类著作却向我们提供了那段动荡和浑浊时期的最完整的画面。他的情况令人联想

* El periguillo Sarniento，一译《佩里基略·萨尼恩托》。——译者

① 引自他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墨西哥每周邮报》（1826），引文见卡洛斯著《墨西哥新闻报道选集》（墨西哥，1980），第19页英译文系本文作者所译。

799

到阿根廷的巴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3)，后者编的谢利托*和高乔人在革命时期有关当代政治的对白，以生动的语言和思想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然而，利萨尔迪的教诲的智慧和伊达尔戈的大众幽默只不过是特殊的例子。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主要作品是英雄颂歌、爱国主义颂歌、哀歌、情歌、讽刺短文、寓言和贺拉斯、布瓦洛和卢桑**式的散文。脱离了这些作品创作时以及制约它们的感情和习俗，现代读者是难以鉴别这些作品的；然而这些作品形式上都覆盖了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文学语汇。新古典主义作家中的一些人，由于支持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当代的文化政策，逐渐变得赞同启蒙运动的保守看法和法国大革命的独裁主义后果。因此，作家寻求某些新的事物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找到的正是头一眼见到就感到十分贴切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这种政治激情与个人内在感伤性的结晶之所以将对拉美文学艺术特别具有普遍持久的影响，正是因为它与新生共和国早期的几十年历史相适应。赫尔曼·阿西涅加斯甚至断言：“新大陆共和国自诞生以来就是浪漫主义的，这是最伟大的成就，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杰作。”① 另一位现代评论家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则把这种思想个人化了，宣称西蒙·玻利瓦尔本身就具备固有的浪漫主义精神，这是西班牙语美洲艺术表现的焦点：“如果没有玻利瓦尔这样一位人物和作家的促进，我们的浪漫主义将会经历多久才能出现呢？如果没有以玻利瓦尔为中心的文学和浪漫主义的气氛，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使之成为现实呢？”②

西班牙语美洲独立前夕和独立时期是旅游者、知识分子 记

* Cielitos，阿根廷的一种民间歌舞，——译者

**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文学理论家；卢桑（Ignaciode Luzán，1702—1754），西班牙文学理论家。——译者

① 赫尔曼·阿西涅加斯著《七种肤色的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第391页。

② 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著《美洲文学比较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Ⅱ，第230页。

者、诗人和革命者的时代。许多人具有上述的各种经历或者同时兼有上述多重身份，他们通过在别国生活、学习、工作和参加斗争使美洲精神的概念具体化了。例如拜伦，把他的游艇命名为《玻利瓦尔号》并渴望到美洲去，加里波第亲自去过美洲并直到垂暮之年还身着美洲的彭丘*以象征反抗精神。象墨西哥神父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耶尔（1765—1827）、委内瑞拉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西蒙、罗德里格斯（1771—1854）、玻利瓦尔（1783—1830）和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或危地马拉的安东尼奥·何塞·德·伊里萨里（1786—1868）等生活经历丰富的人物在他们巡游所到之处的活动与欧洲启蒙运动或革命时期所能见到的活动，表现得同样突出。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80—1847）以他的诗作表现了玻利瓦尔的梦想："啊，联合起来各族人民，争取自由再也不会重蹈失败，伟大的安第斯绵绵山脉将加速这种联合。"这个梦想，正如大家知道的（"我们在大海中耕耘"）那样，并未实现；然而，不论在现代政治或文学中对它的缅怀仍萦回至今。在早期的岁月里，甚至在新生共和国临时边界都尚未最后确定之前，许多作家们早就预言过这种新秩序（即使并未成为现实，也显现了克里奥尔人和资产阶级的意图），他们可能支持过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1780—1834）在1822年所作的宣言。巴列是一位洪都拉斯文学家，也是一位热忱的中美洲主义者，他声言："自今日起，美洲是我全神贯注的信念。我白天为美洲而写作，夜晚我为美洲而思索。每一个美洲人研究的真正目标就是美洲。"当革命时期过去后，美洲的主题虽仍继续存在，但由于人们和共和国（尽管是无可奈何地）返回了现实，现在已受到民族主义的约束和指导。

800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已经在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以

* 彭丘（Poncho），一种斗篷，状如一块长方毛毯，中间开有套头的口子。——译者

表达他们关于美洲现实的新看法。例如，利萨尔迪这样的作家，虽然他无疑比大多数人更有所创新，实际上却仍属于启蒙运动，并且，似乎不无道理地以帮助本国同胞加紧填补知识空白和纠正今昔错误，作为他当务之急，而不忙于建设刚在萌发的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如果每一个人都象他那样致力于基础工作，那么，更多的堡垒——或者，不如说，政府的宫殿——将建设在坚实的地基上，而不是空中楼阁。劝善惩恶和宣扬爱国主义的戏剧在各个地区的舞台上曾盛极一时，同类的剧目多如牛毛，但当时的剧作没有一部得以流传至今。只有抒情诗经受住了环境的不断变化，如奥尔梅多、贝略或年轻古巴诗人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1803—39）的少数诗作如同几幅著名的玻利瓦尔、苏克雷和圣马丁的肖象以及描绘他们战役胜利情景的画卷一样，至今仍能扣住有教养的拉美人的心弦。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大片荒漠中的孤零零的里程碑。

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何塞·华金·奥尔梅多，以其《胡宁的胜利：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1825）的名作而久负盛誉。这是独立斗争这类题材中极其难得的严肃作品之一。奥尔梅多为他的浪漫主义题材几乎找不到适当表现的形式，然而这篇诗作却是淋漓尽致的。无论如何，诗章开篇时著名的雷鸣般炮声是令人难忘的，虽然它为许多这类并未亲身经历而试图表达现实的拉美文学作品开创了先例。没有参加过胡宁战役的奥尔梅多，在他开篇的万炮齐轰中，意欲为我们以“连珠似的炮击”再现当时的情景，以致玻利瓦尔本人都感到不得不指出，“那里没有听见过一声炮响”。萨米恩托以后撰写了对阿根廷草原浪漫的回忆——并具有持久的影响——却从未亲眼见过它；而他20世纪的门徒罗穆洛·加列戈斯则效法他而创作了《堂娜芭芭拉》（1929），后者在显然作为他这本权威性小说背景的委内瑞拉平原地区，总共才呆过五天。然而，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所有人的典范宗师却

801

是夏多布里昂*，后者所著《阿达拉》(1801)的背景是密西西比河畔，然而——或许正因为——作者本人从未到过如此遥远的地方而作此安排。难怪有些评论家指出(这并非完全出于想象)，从艺术家和学者们的作品来判断，梦想中的美洲多于美洲的现实。

不论是奥尔梅多，或是与他同一时代更为显赫的委内瑞拉作家安德烈斯·贝略，在诗律和风格方面都没有什么创新，他们的诗作基本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整齐、和谐、规范和非人格化的。只是在主题方面有所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主题的态度有所变化。新的主题是美洲的自然，它又恢复了原状，正如征服时期西班牙人所想象的那样(而现在它已归新的主人所拥有)；印第安人现在不再被看成是野蛮人或被强制干活的劳动力，而是正待拯救的高尚的蛮族；政治和文化解放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如果贝略从来不去写诗的话，也许已成为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这方面而言，他与巴西首相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德—席尔瓦有相似之处)，但他写了诗。他的《与诗谈论》(1823)正确地预想到革命力量最后终将获得胜利，并明确地开始宣告了19世纪西语美洲文学的独立。这篇诗作后来被作为序篇编入了阿根廷作家胡安·马里亚·古铁雷斯的《美洲诗论》(瓦尔帕莱索，1846)，此书是拉美第一部重要的诗歌选集。《与诗谈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接近于维吉尔*和贺拉斯而非维克多·雨果，但它明确地抓住了美洲未来的伟大主题，要求诗歌"飞向景色壮丽的哥伦布的国土，那里的大地依然保留了它最原始的风貌"，然而，贝略本人比较冗长的诗句(正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所说的，是辩才多于诗意)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天然的世界、诗歌的源泉，在19世纪期间依然大部处于尚未开

* 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译者

发的状态，——套用一个世纪以后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对拉美小说状况所作的评语来说——是“有诗境而无诗人”。当然，贝略大力要求的，正是以后称之为本土主义或克里奥尔主义的作品，这两种美洲主义文学的形式确实在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中逐渐显现。在贝略的第二篇主要诗作《致热带地区农艺的颂歌》（1826）中，描写了美洲的自然景色、花草树木和农作物，令人联想起早先危地马拉教士拉斐尔·兰迪瓦尔的回忆（《墨西哥乡村》〔1781〕）或巴西诗人若泽·巴西利奥·达·加马的《乌拉圭》（1769），以及后来临近浪漫主义末期时哥伦比亚诗人格雷戈里奥·古铁雷斯·冈萨雷斯（1826—1872）所著可与之比美的《在安蒂奥基亚种植玉米的回忆》（1868）。然而，尽管贝略作出了热情的呼吁和尽管无数的美丽诗选现在已大多被评论界所遗忘，拉丁美洲天然的地方景色长时期仍仅仅处于“舞台背景”的地位，文学上的人物并未真正登场。自然景色很少与内心世界融合，巴西则是例外，因为巴西的社会与文学环境都不同，它承袭的是葡萄牙的传统。同时，也必须指出，把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和散文贬抑为叙事性和单调的许多批评，本身不免失之轻率和肤浅。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本土文学很少有，甚至没有观察自然的传统，而当时去新大陆的欧洲旅居者也只不过稍稍引起人们对拉美自然景色和居民的注意，因为他们的著作仅含蓄地表达了外来者必然受到局限的看法。拉丁美洲人自己则正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悄悄地探索象征性的形象——印第安人、高乔人、安第斯山和热带丛林——而非现实，正如他们不得为自己寻找国歌、国旗和国徽的主题一样。

当贝略和奥尔梅多创作他们著名诗篇时，都是已近中年的成年人了，他们也都开始形成他们启蒙运动的模式而放弃了新古典主义形态。然而，他们都很幸运地目睹了奥尔梅多所说的安第斯秃鹰在南美大陆战胜了西班牙鹰的历史事件。年轻的秘鲁诗人马里亚诺·梅尔加（1791—1815）是最受崇敬的诗人之一，他参加

303 起义被西班牙人处决。他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所作的爱情诗歌在秘鲁传诵至今，其中包括热情洋溢、印加风格的“亚拉维”*。按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说法，梅尔加因此而成为“在西班牙诗歌中以和谐一致的格调抒发印第安人感情的第一位诗人”。① 梅尔加在其著名诗作《自由颂》中，预见到知识分子同人民将在未来的浪漫主义新世界中团结起来，他写道：“残酷的专制主义，恐怖的世纪，黑暗的长夜，已经消逝。你们要知道，哭泣的印第安人，全世界被人藐视的有识之士，邪恶再也没有了，我们已迈出走向我们渴望的目标的第一步……把我的祖国曾叫做‘黑暗之国’的那些人，现在见到竟是如此丰饶富裕而惊叹不已并且说，‘真的，这确实是一个新的世界’。”梅尔加生前未能亲眼见到这个新的世界，但是，他充满青春活力和热情洋溢的诗篇使他不愧为这个世界真正的先驱。

古巴诗人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这位从事独立运动遭到失败的诗人，经历不同但也是不幸的。他是这个时期最纯粹的真正抒情诗人，也是第一位流亡国外的伟大诗人（参见他的诗作，特别是《南方的突变》和《流亡者之歌》，均作于1825年）。关于他在文学上的倾向，评论家们并不一致，但许多人认为他是浪漫主义的先驱，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拉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尽管新古典主义显然是他的起点，但他的早熟、政治上的失败和不幸的命运促成了他的浪漫主义观点，这种说法是具有说服力的。他17岁时创作的《在乔卢拉神坛上》（1820）和部分由于受夏多布里昂的启发有感而作的《尼亚加拉瀑布》（1824）成为拉丁美洲的自然至上以及即将来临的历史性事件的文学象征。当埃雷迪亚看到令人欢欣的独立斗争胜利成果显然与古巴无缘时，他移居美国、委

---

* 亚拉维（Yaravi），克丘亚语抒情诗的一种格律。——译者

①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流派》（墨西哥，1949）第112页。

内瑞拉和墨西哥，逐渐绝望。在《暴风雨中》(1822)他已经变得伤感："我们终于离开了，受命运摆布的世界：旋风与我，现在已经分手"；在《醒悟》(1829)中，他再次责备他的消极的同胞们并承认他自己悲观失望和深居简出（"我多灾多难的生活篇章，在爱妻的怀抱中结束"）。他不会知道，在许多新生共和国中亲眼见到政治解放的那些人本身，直到19世纪中叶，也在为政治解放的烟消云散而忧伤。

巴西的演变不是那么激进，然而，却比较富有成果。作为葡萄牙在新大陆唯一的殖民地，巴西较早地在文学上明显地形成统一的民族性观念。它的形成与大约自1770年到1820年期间从米纳斯吉拉斯传播到里约热内卢以及伯南布哥的新古典田园诗派或田园文学的高潮相应。此外，巴西还是以"矿区密谋事件"*（1788—1789）的形式对欧洲和北美进步思想反应的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一时期尤为出色的最伟大作家是若泽·博尼法亚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1763—1838），他是巴西文学独立运动不懈的倡导者也是1822年比较和平的政治独立运动的创始人。他是一位启蒙运动的人物，以渊博和科学钻研精神著称，而且同时又在葡萄牙和巴西担负着重要的行政职务。尽管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许是他的爱国主义诗歌，但他的文学事业是从维吉尔的古典主义走向类似拜伦式的浪漫主义的。他同时兼备米兰达和贝略的某些素质，可说是拉丁美洲那个时代学识最广和最丰富多产的文人。

304

* 矿区密谋事件（Inconfidencia mineira），指1788—1789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省欧鲁普雷图城发生的企图推翻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密谋事件。因主要组织者之一，当过牙医的龙骑兵军官席尔瓦·沙维尔（Joaguim Jose da Silva Xavier，1748—1792）以其绰号"拔牙者"闻名，故又称"拔牙者密谋活动"（Tiradentes conspiracy）或"拔牙者起义"。后因事泄而失败，席尔瓦·沙维尔在1792年被处决。——译者

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期间，是拉丁美洲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的时期，斗争激烈并往往四分五裂。地方首领和地方寡头的利益在农村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但这个时期的建设计划显然是城市性的和资产阶级式的。除了巴西和古巴外，到处都采纳了自由主义和废除了奴隶制，彻底改革了教育并按民族方针逐渐对文化进行整顿。除了文学以外，其他一切艺术领域在大部分地区最初都出现了萧条或衰退的情况，因为它们要求一定程度的财富、投资和稳定，而西班牙语美洲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更晚，一般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巴西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在19世纪中叶以前，建设的重大建筑物相当少，除了为教会而作的传统的宗教作品外，绘画和音乐方面也只有受官方委托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问世。在一些大城市中，创建于殖民地时代末期的学院，仍然沉浸于令人无法理解的经典理论和风格之中。艺术的政治功能并未立即显示出来，在巴西则有所不同，君主制和贵族政治局面的延续，使里约热内卢得以从事主要按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复兴。但是，文学领域仍保持其传统的社会功能并获得了新的功能。19世纪大部分最著名的作家是活动家。然而当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得暇环顾左右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片辽阔而荒芜的大陆上，它并不像，例如，贝略回忆自己流亡伦敦时在雾中对它的梦想那样令人欢迎。这是一片空旷的、几乎只有乡村和农业的大陆，唯一算得上工业的是采矿业。1850年分散在20个国家的人口总共才有三千万人。大多数城市仍然保持着殖民地时代当时的面貌；除了里约热内卢拥有将近20万居民外，只有墨西哥城、哈瓦那和萨尔瓦多（今巴伊亚）超过10万人。

既然这个时期的建设计划是以新的文化建设新生的共和国，不妨先从建筑领域谈起。19世纪末叶，是新古典主义建筑风行整个西方世界的极盛时期。它在19世纪初在拉丁美洲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它被误认为是代表法国大革命(把它与拿破仑帝国联系起来的人比较少，至少自由派不那么看)。而巴罗克建筑则与西班牙

和葡萄牙联系在一起，这恐怕是荒唐的，因为具有拉美特点的结构与装饰与后者之间的不协调其本身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叛逆精神。不论怎么说，巴罗克风格曾经是拉丁美洲艺术的统一风格。由于拉美大陆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影响外，变得更加容易接受，或者说，抵挡不了——这也许更恰当——当代欧洲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在建筑和绘画方面，和以后浪漫主义在其他领域，赋予艺术以世俗的功能并增强了这种共同性。

在几个西班牙语美洲城市，特别是在诸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没有多少殖民地时期建筑特色的城市中，独立斗争为建筑革新带来了动力，它象征着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否定。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建筑并非按西班牙的格局建设的，而是经常由意大利和英国建筑师营造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在殖民地时期末期早已开始了。新古典主义的比较素净和比较理性的风格已见诸于西班牙人曼努埃尔·托尔萨（1757—1816）在墨西哥城建造的矿业宫（他并以塑造改革大道上卡洛斯四世骑马雕象而闻名）、托尔萨的学生爱德华多·特雷斯格雷斯在墨西哥低洼地区建造的教堂和大宅邸；见诸于达米安·奥尔蒂斯·德·卡斯特罗（1750—1793）在墨西哥城设计的主教座堂的圆顶和尖塔以及意大利建筑师华金·托埃斯卡（1745—99）于19世纪最后几年中在圣地亚哥建造的蒙内达宫。与此同时，同样应予注意的重要问题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建筑仍继续存在，从严格地数量上来说它们占优势，而保守观点也保持着固有的地位，也就是说，西班牙语美洲的建筑即便在独立以后，从整体上看仍然不可避免地仍然是土里土气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依旧如此）。与巴西不一样，大多数新共和国都太穷，以致在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所谓无政府状态的时期大多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然而，已经作出的那些创新之举，一般都是按照新古典派的风格，它代表新兴欧洲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派精英们所采用的象征，并在通往当时所设想的拉丁美洲社会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未来的进程中指点着方向。这一点

在19世纪设计的各地建筑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为它使拉丁美洲以启蒙运动和法国作为自己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的这种选择最突出地形象化了。后者，据说经常被解释为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和拿破仑时期的巴黎。如果从寺院或堡垒方面加以观察，对殖民地文化是作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造的话，那么，包罗拉丁美洲19世纪文化的大厦实际上依旧是一座新古典主义的学院——尽管先前是浪漫主义而后又是现代主义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对拉丁美洲艺术上的这种影响将是持久不变的。(圣卡洛斯学院1785年在墨西哥创立，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仍然是那里正规艺术活动的支柱之一。)如果说，巴罗克艺术风格表明了一种同一性，尽管政教之间仍存在矛盾；而新古典主义则象征了资产阶级自由和市民社会，象征了世俗教育的发展和进入大欧洲世界秩序一体化的总进程。因此，玻利瓦尔和里瓦达维亚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邀请了兰开斯特和汤普森等欧洲教育家访问加拉加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此同时，成群结队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来到拉美，正如西班牙人当年在前哥伦布的遗址上进行建设那样，在殖民地建筑群旁建立起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早在1816年，当唐若昂*驻里约热内卢期间，以若阿基姆·勒布雷东(1760—1819)为首的一个法国美术委员会到达那里指导未来的建设，实际上为19世纪的艺术政策拟订了蓝图。奥古斯特—亨利—维克托·格朗让·德·蒙蒂尼(1776—1850)是主要建筑师；他设计了里约的美术学院和其他许多建筑。以后，路易·莱热·沃捷在累西腓省圣伊莎贝尔、帕拉省贝伦和马拉尼昂省圣路易斯建筑了剧院。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模式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意大利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仍在西班牙语美洲大多数新生共和国中保持着影响，但是，早在1823年正是一位法国建筑师普罗斯珀·卡特林(1764—1842)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一座主教座堂完成了外观装

* 指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ão Ⅵ,1816—26在位)。——译者

饰工程，这是在这种风格开创的70年之后；另一位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吕内·德·贝恩斯（1799—1855），在智利创办了第一所建筑学校，不过，却是一位智利人，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1831—1886）以后重新规划了城市中心并赢得了“智利奥斯曼*”的名声。

从美洲巴罗克式奇异的教、俗混合体——即使它外表冠冕堂皇却隐藏着许多紧张关系和矛盾——向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过渡，也是向一种实际上象征等级森严的建筑过渡，这种状况在拉丁美洲艺术中有可能形成——它确实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专制的学院主义，它在长期的过程中变得反动和陈腐了，而且在一个世纪后，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终于动摇。正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领域的艺术家们倾向于认为——由本能和直接的形成的——巴罗克艺术风格，才是拉丁美洲梅斯蒂索性格的真正媒介和表现形式，因此，殖民地时期的艺术比较接近拉丁美洲的现实。不用说，这是大可争论的问题，但是，十分显然，巴罗克风格的装饰远较其他任何古典形式为兼收并蓄与混杂留有更多的余地。

无与伦比的巴西建筑师和雕塑家小瘸子*（1738？—1814）的作品在里约遭到了法国艺术代表团的贬抑，被斥之为“莫明其妙的哥德式老古董”。他真正的价值被埋没了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外国专家们的价值观却几乎在19世纪的巴西建筑和造型艺术中居于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反映了艺术史上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从19世纪初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艺术的主线一直在美洲主义—本土主义潮流和欧洲—世界主义潮流两者之间摇摆，这种特

---

* 指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mann，1809—1891），法国金融家，曾任塞纳省省长，以改善巴黎市政建设而著称。——译者

* 原文为Aleijadinho，是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利斯博阿（António Francisco Lisboa）的绰号。——译者

点常常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令人难以解决。然而，在上个世纪，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拉丁美洲艺术的本身，已与殖民地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学院派艺术（高雅的艺术）和通俗艺术（通俗的或未加修饰的艺术）之间出现了特大的——确实，在本质上是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当然，后者还说不上有什么悠久的历史，因为只是到19世纪40年代一些欧洲人在浪漫主义驱使下才开始形成了民俗学的概念。拉丁美洲人经过长期的阶段才能吸取这种教训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期间却在企图抑制或隐默他们自己尚未开化的和暗中引以为耻的民间艺术和音乐，直到强烈的地方主义运动终于脱颖而出和社会主义初次展现在拉丁美洲的舞台上为止。如果我们以绘画为例，在墨西哥正是象迭戈·里韦拉这些后来的艺术家们才认识到波萨达或加奥纳等民间雕刻师的全部价值，也正是弗里达·卡洛恢复了龙舌兰酒店壁画的民间传统；同样，在秘鲁正是艺术家们，而不是批评家们，在19世纪后期最忠实地向独立后的秘鲁和智利文化界重新评价了“穆拉托希尔”（何塞·希尔·德·卡斯特罗，1785—1841）的贡献和伟大民间艺术家潘乔·菲耶罗（1803—79）的贡献。拉丁美洲的艺术批评十分狭隘和主观，几乎完全局限于历史、传记和一般的“文学”方面，美学方面的洞察力十分少见。报纸上几乎所有的艺术批评和大部分批评家都来自诗人和作家，因此纯造型艺术领域实际上遭到忽视。阿根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以后的总统多明戈·福斯特诺·萨米恩托（1811—88）是南美大陆的首批批评家之一，几乎也可以肯定，是阿根廷最早的批评家，而比库尼亚·麦肯纳则是智利的先驱者。最早的展览会是在1817年和1829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但是以后的半个世纪这种展览会在大多数其它城市中都是十分稀少的。

虽然新古典主义，首先通过对造型艺术学院的影响，在建筑领域居于优势地位，寻求民族艺术和文学，正如我们所知（可追溯到贝略及其后的萨米恩托），是自独立以来整个大陆的主题，然

508

面，这一理想的付诸实现却是一个十分长期的过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期间，拉丁美洲的绘画几乎完全是记述性的。例如，巴西的绘画，在殖民地时期（它与音乐、雕塑和建筑都不同）是特别落后的，自1822年独立以后开始走上了较有决定意义的民族化过程，但是，民族化却是通过法国和意大利教师的渠道，而且不时产生了一种几乎毫无特色的想象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全盘欧化的——艺术风格。学院派绘画鼓励记述历史人物和大卫与安格尔* 风格的历史事件。帝国政府从巴黎和罗马聘请教师到巴西执教并资助青年艺术家去欧洲旅行和学习。在旅居巴西的艺术家中，最重要的是尼古拉—安托万·陶奈（1755—1830），他随法国艺术代表团来到这里，绘制了许多肖象画和风景画，其中包括《1816年的圣安东尼奥山》。让—巴蒂斯特·德勃雷（1768—1848）绘制了《若昂六世》、《唐·佩德罗一世加冕礼》和《巴西帝国首相唐·莱奥波迪纳下船登岸仪式》等肖象画，并创作了关于奴隶生活状况的著名画卷。巴西本身的绘画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让·莱昂·帕利那勒·格朗让·德·费雷拉回到巴西以后才真正开始，他是格朗让·德·蒙特尼的一个孙子，早年大部分时期在法国度过，受到艺术世界的熏陶，学习了最新的欧洲技法。圣安杰卢男爵曼努埃尔·德·阿劳若·波尔图·阿莱格雷（1806—79）既是一位著名诗人又是画家德勃雷的一名高徒，以其《唐·佩德罗二世登基大典》闻名。但这还是宫廷绘画最收敛的时期，而欧洲学院主义直到巴西共和国1889年成立以后很久，甚至在维克托·梅雷莱斯(1832—1903)、佩德罗·阿梅里科(1843—1905)、小若泽·费拉兹·德·阿尔梅达（1950—99）和鲁道夫·阿莫埃多（1857—1947）这些最有成就的后起艺术家们的作品

809

* 指法国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gues Louis David,1784—1825）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u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译者

中，仍有影响。

欧洲艺术家们为新解放的大陆之绚丽多采、风光、习俗和景色所吸引而相继到来，也是其他国家在独立后半个世纪中最显著的现象。现维达尔、菲斯克特、内贝尔、维拉齐、门佐尼尤其是德国人约翰一莫里茨·鲁根达斯（1802—58）和法国人雷蒙一奥古斯特·坎萨克·蒙瓦赞（1790—1870）来到这些国家工作、教学和写作并发挥了与他们自己在本国的真正地位或者在艺术史上并不相称的影响。他们经常将作品送回国复制或者出售给绘画收藏家。例如，在智利的英国艺术家海军军官查尔斯·伍德（1793—1856）致力于绘制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海景；鲁根达斯在访问巴西和墨西哥以后，于1834年至1845年期间曾长住在瓦尔帕莱索，并成为安德烈斯·贝略的朋友之一；蒙瓦赞19世纪40年代也曾在此居住，当时E·沙尔东·德·特雷维尔（1818—78）也在其中，以后智利历史反映这一期间的插图大都采用了他当时绘制的景色。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后才有重要的本地出生的艺术家崭露头角。在墨西哥，当时最有影响的画家有墨守成规的卡塔兰·佩莱格林·克拉韦（1810—80），他是圣安纳于1846年邀请到墨西哥来重建艺术学院的，还有意大利人欧金尼奥·兰德西奥（1810—77）他以1857年展出的《奇马里斯塔克》、《墨西哥山谷》和《马特拉拉连环拱的景色》等浪漫主义风景画著称，并且是19世纪墨西哥最重要的艺术家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40—1912）的导师。这些旅居当地的外国艺术家往往是共和国建立初期记录拉丁美洲生活的先驱者，在许多国家里，只是在稍后的时期本国艺术家们——例如，哥伦比亚的拉蒙·托雷斯·门德（1809—85）、委内瑞拉的马丁·托瓦尔-托瓦尔（1828—1902）——才能够采用常常带有较浓郁浪漫主义倾向的欧洲人传授的那种体裁和风格。

810

大多数艺术家，不仅是民间画家，也都认为他们探索民族艺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风俗派绘画。卡洛斯·莫雷尔（1813—94）是阿根廷第一位重要的民族绘画家，他绘制了罗萨斯以及他母亲的

肖象，但最著名的还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绘制的题为《大车》、《在酒店里的赛歌》、《高乔人的家庭》或《潘帕酋长和他的妻子》等关于高乔人、印第安人和地方风俗题材的绘画。这些画作，不少是在他1844年发表的画册《拉普拉塔河的风俗习惯》中首次出现的，并重印过多次。在这类绘画以及诸如卡洛斯·佩列格里尼（1800—75）等其他阿根廷画家的绘画中，我们看到把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社会和自然天地硬塞在一个画面里。这些都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现实的看法——尽管，这里的主要问题当然是，这还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现实——而其中有一部分却是欧洲人的看法。然而，总的说来，他们比文学家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主要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大大超出了沙龙生活的社会圈子，而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则往往局限于沙龙生活。确实，在西班牙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有许多风俗派诗人和作家主要向当代的画家们学习观察技巧来再现他们所要描绘的景象和流浪汉小说人物。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1805—51），学生时代他与卡洛斯·莫雷尔是同班同学，他创作那部揭露兽行的小说《屠场》（1838），也许正是部分地受到了英国画家埃默里克·埃塞克斯·维达尔一幅画启发的结果。

在18世纪期间，肖像画发展缓慢，但在19世纪头六十年期间却有迅速发展。新古典主义提倡风格严肃的巨幅肖像画，如旅居当地的鲁根达斯的作品中所示范的那样。确实，大多数艺术家们为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绘制写生肖像，但这个行业约在1860年银板照相术推广以后，当然就很快衰落了，当时，许多画家如阿根廷的莫雷尔和普里利迪亚诺·普埃伦东（1823—70）等人都变成了摄影师。普埃伦东是著名的胡安·马丁·德·普伦东将军的儿子，他与大多数的画家不同，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曾旅居欧洲多时并在那里受到大卫和德拉克洛瓦*的影响。他绘制了大量画作，计有二百幅以上，其中油画肖像超过半数。最著名的是曼努埃利塔·罗萨斯身着红色制服的肖像画（1850），但他还为他的 811

父亲(1848)和他的友人唐·米格尔·J·德·阿斯库埃纳加(1864)绘制了杰出的肖像画（前两幅都是写生），并为里瓦达维亚和加图波第画了像。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位典型人物，普埃伦东实际上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当他第二度旅欧回国后，曾在1854年到1864年期间，负责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附近建筑了许多公共建筑物。他还创作了如《高山之路》(1861)和《圣伊西德罗》(1867)等著名风景画以及许多民间风俗题材的画卷。

然而，只是当浪漫主义在造型艺术和文学方面逐渐取得胜利时，诸如阿根廷的普埃伦东、巴西的小阿尔梅达，墨西哥的贝拉斯科和乌拉圭的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1830—1901）这类画家才能够开始摆脱学院派、叙事体或纯粹风俗派的绘画而走向更富独创性的道路，从而达到——这个阶段即——民族风格。在19世纪后半叶，当艺术家们更深入一层地吸收了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本身又被库尔贝*的自然主义所取代后，有几位画家——他们往往接受了（如J·L·斯蒂芬斯和E·G·斯奎尔等）考古队结论的影响——首次举步蹒跚地试图从历史背景中寻找灵感，而对土著居民的根源从形式上作了浪漫主义的回归。例如，秘鲁的弗朗西斯科·拉索(1829—69)，在《科迪勒拉山的居民》(1855)这类画作中试图通过个人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索这条道路，似乎预示了土著主义的出现。

民族音乐的概念直至19世纪中叶以后很久才有所反映，这时音乐学院和一些造型艺术院校或有所发展或刚刚建立。在此以前，大都往往是大的主教座堂的乐师长，如巴西的若泽·毛里西奥·努内斯·加西亚(1767—1830)和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达·席尔瓦（1795—1865）或阿根廷的何塞·安东尼奥·皮卡萨里

812

* 指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译者

* 指法国名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译者

(1769—1843)，组建音乐学校、管弦乐队和合唱团，为本国音乐生活奠定基础，从而使爱国主义或本土主义的潮流在这块大陆上并未采取远离宗教基础的艺术音乐形式。何塞·马里亚诺·埃利萨加（1786—1842）支配了独立后时期墨西哥的音乐舞台，他在家长制气息十分浓厚的那个世纪里以“墨西哥音乐之父”著称。据说圣马丁生就一副好歌喉并于1818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为集会群众高唱了帕雷拉谱写的《爱国进行曲》，而几年后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却谱写了许多为沙龙演奏的钢琴曲。那时，小步舞曲和玛祖卡舞曲和波尔卡舞曲和圆舞曲已传到拉丁美洲，迅速适应下来并产生了本地的改编曲和变奏曲。

如果说有教养的男士和女士们对音乐都有兴趣的话，那么，在教堂乐师长时代以后，公共演奏和音乐的发展都牢牢地操在外国人的手里，在智利，德国的影响特别深；但它也同其它地方一样，自18世纪早期以来意大利歌剧即已流行并从罗西尼和贝利尼开始，持续统治了音乐舞台。由于在18世纪最后25年期间，即使在较大的国家里也才真正有可能演奏交响乐和室内乐作品，因此，新的剧院一开业通常就联想到上演歌剧。除歌剧外，主要的音乐活动是钢琴独奏会和独唱会，以及轻音乐剧，特别是通常由西班牙巡回剧团演出的名为说唱剧和独幕喜剧的西班牙小歌剧。

在这个时期里，就音乐方面而言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家——阿根廷也同别的国家一样，爱国音乐以及乡土气息更浓的民间歌舞——“谢利托”(cieiliros)——都特别盛行。与此同时，欧洲沙龙音乐在1830年以后也迅速地为社会所接受，它与高乔牧民的对歌以及他们草原的加托舞曲、比达利塔和特里斯特* 等乡村音乐，多少形成了一种讽刺性的对比。然而，尽管当时似乎笼罩着这类民间音乐的野蛮和天然气氛，但是阿根廷的欧洲传统仍很明显。

---

* 比达利塔(Vidalitas)是阿根廷和智利民间的一种情歌，特里斯特(tristes)也是南美洲民间流行的一种情歌；都用吉他伴唱，曲调凄婉。——译者

而高乔人虽然在当代文学中被贬抑为蛮夷，但他们开始的程度并不低于在其他国家中占优势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普拉塔地区，即使在18世纪最后25年欧洲移民浪潮来到之前，已大多沿着欧洲的趋势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是不足为奇的。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始终是特别欢迎意大利歌剧的东道主，从19世纪20年代——罗西尼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于1825年首次演出——开始，上演意大利歌剧似乎已是一种常规，截至1850年为止，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年经常上演歌剧约24部。19世纪期间这个城市开业的剧院有一打以上，其中包括在1857年开业的哥伦布大剧院，它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迟早将跻入世界性歌剧之都。

意大利歌剧在巴西的适应性甚至更强。巴西的文化发展并非革命性的转变而是通过有机的步骤循序渐进。虽然在18世纪末叶时最初显然使这种创造性受到抑制，然而，1808年葡萄牙宫廷迁往里约热内卢以及1822年独立的巴西帝国成立，却为后继的几十年提供了比别的国家更为稳定和有可能持续发展的环境。若泽·毛里西奥·努内斯·加西亚这位穆拉托教士，虽然主要是一位杰出的圣乐（包括一首令人赞赏的安魂弥撒曲(1816)）作曲家，也因1809年谱写了巴西的第一部歌剧《孪生姐妹》而享有盛誉。1840年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达·席尔瓦改组了帝国圣乐团，使首都的音乐活动活跃起来；并于1847年创办了全国音乐学院。1856年著名诗人兼画家曼努埃尔·德·阿劳若·波尔图·阿莱雷曾为全国音乐学院意大利教授若阿金·贾尼尼谱写的乐曲用葡语填词，创作了《瓜拉拉皮斯节日的前夕》；1860年埃利亚斯·阿尔瓦雷斯·洛博更进了一步，他自己为歌剧《圣若昂之夜》谱写了乐曲，在新建的国家抒情歌剧院上演，这是一部以当时最著名的小说家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1829—1877）的叙事诗为基础而编的歌剧脚本。第二年，则发生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件，即《城堡之夜》的公演。它是19世纪拉美最有成就的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戈麦斯(1836—96)的第一部作

品。他的最佳之作是《瓜拉尼人》(1870)，是根据阿伦卡尔的著名小说《瓜拉尼人》(1857)改编的。至今仍是拉丁美洲歌剧中在国际上的唯一保留剧目。

关于19世纪拉美戈剧的历史很少为人所重视，草率的观察家也许得出结论说，剧院、剧作家或剧本即或有的话也是寥寥无几的。这与实际情况却相去甚远，虽然主要是首都和省会才有剧院，艺术水平一般也低，这都是事实。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大多数剧院是专为了上演歌剧或轻型音乐喜剧才开业的。然而，当文学艺术尚远未形成今天这种以个人活动为主的特点时，戏剧在那种时代里是文艺活动的主要中心，它在形象创造方面具有与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同等的地位。因此，当年轻的萨天恩托1841年首次到达智利圣地亚哥时，才会感到那里宛如一座充满陌生人物的"剧场"而他则是应邀在那里演出。 814

以墨西哥城为例，在19世纪20年代时已有两家剧院开业，一家是为医院筹集经费，另一家盖在斗鸡场的场地上，在民众心目中则与斗鸡活动继续联系在一起。1821年，即伊图尔维德取得胜利的那年，新建大剧院上演了名为《自由墨西哥》的话剧，剧中战神、墨丘利*和自由之神联合起来，在墨西哥土地上战胜了专制主义、盲目信仰和愚昧无知；在20年代其余的期间还上演了名为《带着镣铐的自由人》和《没落的专制主义》等话剧。演出的主要经理人和演员都是西班牙人，这种惯例只是在1827年他们被驱逐后才暂时中断。曼努埃尔·爱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1789—1851)是一位自由运动的勇敢斗士，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面包、洋葱头和你》(1823)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他是那个时期被驱逐的不幸流亡者之一。尽管已是独立时代，审查制度仍然盛行，虽然多半仍是出于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动机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

* 墨丘利(Mercury)，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译者

动机。到1830年时，墨西哥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一样，观看歌剧也变成了上层阶级爱好的娱乐。法国芭蕾舞巡回剧团、外国魔术师和气球驾驶员、异国的动物表演等等，也都访问过墨西哥城，有时还有别的娱乐节目，诸如1843年达盖尔的西洋景和1849年的摔跤比赛。几乎所有这些节目都在剧院内或者就在剧院外面的空场上表演的。演出团体的经理人员出头的时代开始了，娱乐业的兴旺随即而来。19世纪30年代末，欧洲浪漫主义戏剧传来，首先是雨果式的剧本，早在1840年，费尔南多·卡尔德隆（1809—45）所编的《马战》或另一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伊格 815 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加尔万（1816—42）所编的《墨西哥督察穆尼奥斯》等墨西哥仿制品已经问世，而西班牙人曼努埃尔·布雷顿·德·洛斯·埃雷罗斯的风俗派剧作不久即充斥了墨西哥的剧院，正如它们遍布西班牙和拉美各地一样，达半个世纪之久。

不用说，在19世纪期间，特别是在80年代以前的浪漫主义时期，戏剧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而且是一种重要社会活动的中心，而戏剧评论往往被视为不仅与剧本及其演出有关而且与观众行为及剧场状况有关的大事。当时的大多数剧本和剧作者早已被人忘却，但那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戏剧，不论是历史剧或风俗剧，比小说或诗歌都更直接地反映了当代的现实。例如，在1845年，美国承认得克萨斯独立时，一部名为《得克萨斯人复仇记》的墨西哥剧作即是针对时局的愤激之作。与此同时，西班牙在戏剧和音乐传统方面的持续影响也不容忽视。19世纪50年代，西班牙说唱剧在西班牙半岛再度流行并传播到西语美洲，尤其盛行于墨西哥。何塞·索里利亚的《堂胡安·特诺里奥》1844年在西班牙首次演出仅六个月后当年就在墨西哥上演，并在墨西哥首都演出多时。在19世纪整个期间，其他许多外国旅行剧团和著名演员也越来越经常地访问拉美各国，有时他们个人为此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其中有些人在访问演出期间死于霍乱和黄热病。

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城又有4家剧院开业，1858年开业的国

家剧院首次上演了墨西哥作曲家塞诺维奥·帕尼亚瓜(1821—82)的歌剧《卡塔利娜·德·吉萨》——这部歌剧实际上除作者本人以外，别的都不是墨西哥的。不久以后，一部描绘民族习俗的喜歌剧《通往圣阿尼塔之路》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成为"综合演出"的先驱，是后来墨西哥通俗戏剧史中的重要一页。1861年华雷斯取得胜利以后，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并大力提倡具有墨西哥风格的剧作。胡安·A·马特奥斯（1831—1913）和比森特·里瓦·帕拉西奥（1831—96）是这一时期两位第一流的戏剧家，后者是华雷斯亲密的合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里瓦所作《再见了卡洛塔妈妈》是一首著名的讽刺诗歌，它为1867年赶走了法国人而欢呼，费利佩·苏亚雷斯的浪漫主义话剧《自由胜利》也为此而欢欣鼓舞，剧情是一位墨西哥游击队战士在紧要关头赶到，保卫了他心爱的墨西哥女郎拉帕特里亚*的荣誉。第二年，诗人华金·比利亚诺沃斯即以《拉帕特里亚》为剧名另编了一个剧本，剧中的主人翁拉帕特里亚是一位印第安少女，她在伊达尔戈神父和米涅瓦*的共同协助下，打败了法国入侵者。 816

在这个时期，象墨西哥如此大量的戏剧活动只有秘鲁才能与之相比，秘鲁有两位特别突出的剧作家，一位是保守主义的费利佩·帕尔多（1806—68），作有《教育的果实》(1829)；另一位是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塞古拉（1805—71），名剧《卡努托军士》(1839)和《卡蒂塔夫人》(1856)的作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利马社会合为一体的两个方面，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里卡多·帕尔玛观察世事尖锐而愤世嫉俗的特点开辟了道路（见后文）。尽管巴西也同别国一样，许多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也编写过剧本甚至歌剧脚本，但19世纪巴西却没有几个真正杰出的剧作家。值得一提

* 原文为"La patria"，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祖国"或"故乡"——译者

* 米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

的一位浪漫主义剧作家是巴西喜剧创始人：路易斯·卡洛斯·马丁斯·佩纳(1815—48)；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诗人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是巴西戏剧的真正的开创者。马丁斯·佩纳的风俗喜剧——《乡村保安官》(1833年编剧，1838年上演)是最好的例子——未免轻佻和肤浅，但也还完满，饶有风趣。它们和西班牙语美洲各共和国的戏剧不同，而是出自于一个相对稳定社会的产物，隐晦的批评并不令人感到有危险，这些戏剧基本上是里约热内卢所有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再现。佩纳十分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给予了公众想要得到的东西。正如塞缪尔·普特南颇为尖刻地指出的："他的同胞们在他的创作中，象照镜子般地看到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是平庸之极，并有机会嘲笑他们自己的形象，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①

然而，毋庸置疑，墨西哥、秘鲁、和拉美其它国家的戏剧尽管具有其社会意义，但在文艺作品的各种流派中都难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就此转议文艺表现的其它形式，特别是关于浪漫主义运动对该大陆的影响。还是接着从巴西谈起顺理成章，因为最完整地经历了"欧洲式"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无疑是巴西，尽管它也许缺乏某些更为突出的特点，然而，这正是因为巴西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总的说来不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那么动荡不定的缘故。1822年巴西获得独立，没有多少英勇壮烈的业绩（甚至还保持了君主制），这就意味着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变并不太突然，比西班牙语美洲的矛盾少得多。因此，巴西的古典主义倾向持续的时间更是额外地长久，它在这段期间里与浪漫主义更加流畅地协调一致，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本身，总的说来，则是柔情多于苦闷，没有表现多少革命的激情。西班牙语美洲陷于四分五裂的各个部分，不论是以突发的或间歇的方式，

·817

① 塞缪尔·普特南著《奇妙的旅行：对四百年来巴西作品的综合评论》(纽约，1948) 第161页。

都不得不彼此对话并因此而使拉美大陆的这一部分形成一种比巴西更深入和更持久的美洲主义观念，而就整个巴西而言，却大致沿着欧洲的方向，没有什么偏离。对比之下，本身象一块大陆那样幅员辽阔的巴西，所遇到地方主义观念的问题远比大多数西语美洲国家要复杂得多。浪漫主义在巴西首先开放的花朵是诗歌方面，它开始于1836年，当年多明戈斯·若泽·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在巴黎发表了他的《诗意的叹息和思念》，他是旅居巴黎的《尼特罗伊》杂志社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另一位成员曼努埃尔·德·阿劳若·波尔图·阿莱格雷（如前文所述，他还是一位画家）也于同年发表了《自然之声》。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并不沉湎于那种刚强有力雨果式新的浪漫主义，而更多地受到《阿达拉》和《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夏多布里昂多愁善感的影响。作为一位旅居国外的贵族，他的才能主要是摹仿，他大部分的文词与其说是浪漫主义的倒不如说依然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体裁，但与他同时代的人却感到，这是意在将虔诚的宗教意识和意气消沉的怀疑主义、狂喜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新诗。

巴西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许是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64），他在1846—1857年期间出版了四部诗集（第一部诗集以歌德和夏多布里昂的诗作为序篇）、一部剧本《莱奥诺尔·德·门多萨》（1847）以及拉美最早的印第安主义诗篇之一的《廷比拉人》（1848）（后者激发了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于1856年创作了自己有影响的长诗《塔莫约人的联盟》）。许多巴西评论家认为，这位赞美热带的泛神论颂歌的多产作者，同时又是一位眷恋乡土和执著、爱国的美洲主义者和印第安主义者，文笔流畅风格优雅，堪称全巴西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确是最杰出的巴西民族诗人，特别是他在科英布拉大学时写的，被人们反复引述的《流亡之歌》：“祖国土地棕榈成荫，林中鸫鸟尽情欢唱；歌声甜美远胜异地。祖国星空灿烂无比，祖国丛林繁花似锦，祖国

森林苍翠茂盛更有生机，故乡生活充满热爱，他乡莫及。”贡萨尔
818 维斯·迪亚斯在返航途中离岸不远处的一次沉船事故中遇难身亡，回溯此事更加强了他伟大诗篇中的思乡特点。他的重要诗作《战士之歌》与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类似；其它一些作品甚至令人联想起埃尔南德斯以后写的《马丁·菲耶罗》。他是巴西浪漫主义的标志，是他的伟大已经超越了许多批评家们所说的作为第一位巴西真正之声的界限。

继贡萨尔维斯·迪亚斯之后，浪漫主义的印第安主义和风景画派的发展取得了势头。许多巴西诗人的贵族家庭出身允许他打有可能在总的民族主义观点内比大多数西语美洲国家采取一种更带有家长式倾向的雨果式风格。印第安人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被打败了的和被消灭殆尽的文化，因此，用以作为一种民族神话的基础是相当安全的。在1870年以前的巴西文学中，印第安人的地位比黑人要显著得多，而在经济上却仍然主要依靠黑人。自然景色是浪漫主义关注的另一个方面，但是对农村社会及其居民实际情况却显然缺乏真正的兴趣。作为替代，某种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这正是被许多批评家们拣出来视为巴西民族某种特征的东西——却显而易见，这就是说，上帝和自然在巴西如此辽阔的天地里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弗朗西斯科·阿道弗·德·瓦尔纳根（1816—78）是最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巴西史诗》（1843）的作者并主编了著名的选集《巴西诗歌集锦》（1850），同时又是一位民族历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倡导者；另一位是奇人路易斯·尼科劳·法贡德斯·瓦雷拉（1841—75）。

然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按批评家们习惯的说法共有四代）完全缺乏任何宗教信仰。他们组成了撒旦派，根据塞缪尔·普特南看法，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按照阿弗拉尼奥·佩绍托的说法，他们是“杀人文学”作家，① 他们比西班牙语美洲的任何人

① 阿弗拉尼奥·佩绍托著《巴西文学思想史》（里约热内卢，1931）第161页。

都更早地受到颓废浪漫主义的"世纪病"*或"厌世观"的侵蚀，沉溺于醇酒和其它梦幻世界*中，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和美洲主义都是一些空洞的概念。西语国家相近的例子也许是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库尼亚（1849—73），他在年仅24岁时即自杀身亡，而当时墨西哥比较正统的青年浪漫主义诗人则更多是为了政治事业而牺牲的。这辈巴西诗人也大多英年早逝。巴西浪漫主义神童是这一辈诗人的主要特点，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德·阿塞韦多（1831—52）可与拜伦或波德莱尔**病态达到顶点的时期相比。他被人们称为"怀疑派诗人"，他曾建议在自己的墓志铭中写上"他是一位诗人，有过梦想，有过热爱。"这些诗人同那些颇为自得和家长式的前辈们相比，带有更多的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尽管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实际上——正如批评家在谈到阿塞韦多最著名作品之一时所指出的——有如漫长地、昏暗地"在酒店中度过的夜晚"。然而，他们之中的另一位，卡济米罗·若泽·阿布雷乌侯爵（1839—60）却成为描写青少年恋爱相思题材的饮誉最久的巴西诗人之一。

819

另一位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德·阿尔韦斯（1847—71）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是那个时代巴西最伟大的社会诗人，甚至是一位比贡萨尔维斯·迪亚斯更优秀的诗人。他以抱负远大、展翅高飞的"秃鹰"(Condoreiro)诗人而闻名，可以当之无愧地跻于雨果式人物之例，但在感情倾向方面却保持着巴西固有的传统。1867年他以《贡扎加，或米纳斯的革命》一剧首次影响了公众的觉悟，这个剧本是以18世纪末叶伟

---

* mal de siècle，指19世纪初叶法国文艺界部分人对法国大革命后社会动荡感到彷徨、悲观和矛盾的病态心理。——译者

* 原文是"artificial paradises"，可直译为："人为的天堂"

**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和《人为的天堂》等。——译者

大的矿山诗人托马斯·安东尼奥·贡扎加的生活为基础而编写的。卡斯特罗的诗作表里如一，激昂而亲切、既是雨果式的又是拜伦式的。他是出生于巴伊亚的穆拉托人，满怀同情心和热带感情倾注于工作。埃里科·维里西莫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当其他浪漫主义诗人还在絮絮诉说他自己的忧愁烦恼时，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已在抚慰他受苦同胞们的伤痛，有不少是黑奴，充满义愤的《黑奴船》是他最著名的无与伦比的诗篇。《浮沫》集(1871)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装订成册的一本诗集。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令人联想到19世纪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世纪。它也是《最后的莫希干人》**的世纪。在巴西小说中最广泛和最持久地反映了印第安主义主题的是巴西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然而，在50年代末阿伦卡尔开始成名之前，已有两部著名的小说。一部是若阿庸·曼努埃尔·德·马塞多(1820—82)的名作《黑小妞》(1844)，是一部天真无邪、感人心弦的小说，至今仍为巴西妇女普遍喜爱和阅读，也是巴西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通俗读物。另一部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1831—61)的《一个民兵中士的回忆录》(1853)，一看就感到风格迥然不同。读者在最初阅读这部著作时，会觉得它的创作似乎走在时代前面好几十年，具有惊人的客观现实主义特点；然而批评家们指出，尽管外表如此，其内在的动力还是浪漫主义的；它通过风俗派的透镜流露出对19世纪初若昂六世驻巴西时那些美好年代的留恋。另一位比较明显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特谢拉-索萨(1821—61)，他是一位穆拉托人，最著名的作品是《巴西的独

820

* 美国废奴文学作家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译者

** 美国小说家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t，1789—1851)的短篇小说之一。莫希干人(Monicans)指原住美国康奈狄克州的莫希干族印第安人。这篇小说中反映了印第安人部落绝灭的情况。——译者

立》(1847)，但他也像当时拉美其他国家那些摹仿大仲马和欧仁·苏风格的小说家一样，著有名为《两个青年的命运》(1856)和《玛丽亚，或被拐骗的女孩》(1859)等。它们都是阿伦卡尔作品时隔不远的前驱，就它们惯于着重描写年轻迷惘的恋人(经常通过对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加以渲染而具有异国情调)，对原始森林环境的刻划，以乱伦、互相残杀、割取人头等题材引起哥特式小说的震颤这些手法而言，它们可说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典型作品。若昂·曼努埃尔·佩雷拉·达·席尔瓦(1817—98)，也像阿伦卡尔一样，是一位身受比较严肃的华特·司各特影响的小说家。他像当时大多数巴西大作家一样，有可能长期旅居欧洲，特别是在巴黎长住，并在那里写了以16世纪为背景的《皇家圣哲罗姆教团》(1839)和《巴西帝国创立史》(1864—68)。

若泽·德·阿伦卡尔是一位贵族政治家，出身于伯南布哥省的一个家族，他也写过不少剧本和许多诗，其中有以印第安人为主题《图皮小孩》(1867)，然而，他是巴西浪漫主义小说的最杰出的大师。他几乎同巴尔扎克一样，立意包罗巴西全部历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从题材广泛、文笔流畅、细致入微等方面来看，他所达到的成就，是同时代西语美洲任何小说家都无法相比的。然而，奇怪的是，同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情况相似，正是他所提倡的印第安主义使他留名至今。正如费尼莫尔·库珀一样(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将他与库珀相提并论)，他也深受司各特与夏多布里昂的影响，但就对情节的总体安排和细致入微方面而言，他比后者更有技巧，而他对散文运用自如的功力却毫无逊色，铿锵有力而又匀称和谐。他的作品充满柔情、老生长谈，但又正确无误炉火纯青，堪称19世纪拉丁美洲土著主义和整个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上品，感人肺腑、诗情画意、格调高雅，令人联想起雨果、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此外，他还经常使用巴西民间语汇和地方性题材。最著名的小说有《瓜拉尼人》(1857)、《伊拉塞玛》(1865)——写一个美丽的印第安姑娘与葡萄牙军人的爱情悲剧、《高乔》

821 (1870)、《乌比拉雅拉》(1875)、《腹地人》(1875)、以及死后出版的《回忆录》(1887)。《腹地人》一书中对民间风俗更详细的描述超过了他以前的著作，但还是脱离了当时现实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他塑造的人物是鬼魂而不是社会中的常人，正如后一个时代的一位小说家若泽·林斯·多·雷戈尖刻地然而却中肯地评论说，阿伦卡尔“就像植树时挪动树苗一样，把他们任意挪来挪去。”①

正如巴西在19世纪前75年期间的历史经历与西班牙语美洲的历史经历截然不同那样，巴西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截然不同，它的发展比较全面而不象西语美洲国家那样引人注目；西语美洲国家政治和社会动乱产生了一种尚未完善的文学，其中强调浪漫主义中激情、肯定和偏执的倾向。此外，巴西浪漫主义中源于许多诗人贵族家庭身世的忧郁和朦胧的宗教观及其无言的悲观主义情绪，则是由于担心他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奴隶制——渐渐但注定要走向灭亡而油然而生的恐惧感所形成的，这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在阿根廷，浪漫主义现象作为一种运动而出现则比其它地区更早，也更有活力。确实，这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阿根廷文学的重要特点，从典型的历史角度来看，就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整体而言，往往可以只举这个国家的文学史为例，甚至连墨西哥和秘鲁均居其次。埃切韦里格、马莫尔、巴雷拉、济佩斯、米特雷、萨米恩托、阿尔韦迪、古铁雷斯、高乔派诗歌：甚至在该地区处于冲突的期间，也表现了与典型的西欧文学之间没有间断的联系及延续性。就这一点而言，只有很少受到动乱影响并更能有机地发展的巴西可以与之相比。的确，有人认为，在这段期间，阿根廷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文学（在1850年以前它与智利文学有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历史范畴，而其它西语美洲国家的文学则属于另一个历史范畴。这一点当然由于阿根廷现在是一个边远的前哨人

① 转引自普特南著《奇妙的旅行》第148页。

基地——它在殖民地时期大部分期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次要地区——而尤其突出。然而，阿根廷正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地传统较少，拥有一批深受英、法影响的文学精英，它成为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之乡直至现代主义时代到来为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而现代主义来到阿根廷则是晚得出奇，这或许也正是因为该国具有它自己真正的文学—社会发展轨道的缘故。 822

拉丁美洲文化历史中许多持久性议论的主题出现得最为突出的地方正是阿根廷。正是阿根廷从一开始起就出现了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美洲的对立，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看成是孤立于一片荒野、杳无人烟的大陆上的一块广大前哨基地。L·多明格斯在1843年的一篇诗作《树商陆》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诗中为一座无名氏的坟墓而悲叹，墓中葬着"众多勇士中的一位，他们理应扬名享誉，但因他们生于此地竟未留下姓名令后人回忆"。这种思想对了解迄今为止的阿根廷文学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杳无人烟的感受促使了另两种主题的发展，两者导向了浪漫主义倾向的情绪——孤独感和遥远感——而且，两者都在拉丁美洲一些伟大文学作品中，甚至在这些作品的标题中出现。这类主题是欧洲白人移居到土著居民稀少而幅员辽阔的那些地区（特别令人联想到澳大利亚这类地区）的主题。罗慕洛·加列戈斯在他所作一切有关前个世纪的小说中，首先在《卡纳伊马》(1935）中，回溯到"创世纪"时"未完成的世界"，既是上帝也是人类尚未开创的世界：未经勘察、无人居住，没有开发、无人知晓。整个大陆有待于通过感情和理性（浪漫主义的方案）和通过科学的经验论（实证主义的方案）来加以探索，尽管按照这种次序也许并不太理想。不幸的是，知识分子们错把新建立的各国真正当作一无所有的文化真空，不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遗产而是由法国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一张白纸，他们以为可以越俎代庖地在这张白纸上任意填写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征服者们梦想的是黄金之乡；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梦想的是乌托邦。他们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深感失望，在阿根

廷这种失望的情绪超过了别的地方，因为原来所寄予的期望最高。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1810—84）这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兼作家对于这种困境有深刻的体会，他曾一度担任记者并以西班牙作家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为自己的榜样。1838年阿尔韦迪曾经写道：

革命把我们突然从中世纪的怀抱中拉出来，使我们毫无准备地面对19世纪。这两种文化在我国结为夫妇，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19世纪宛如一位风雅飘逸的青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情不自禁地总是嘲笑他那愚蠢、衰老和可笑的妻子。这类不相称的安排在我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种种不幸事件中俯拾即是。①

823

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1805—51）是独立后阿根廷知识分子中造反的一代的领袖，是先后成立于1837年和1838年的“青年一代”和“五月协会”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政论文献《社会主义原理》(1837）的作者。他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西班牙语写作浪漫主义诗歌的作家。1826—30年期间他旅居巴黎，当时正值维尼发表《桑—马尔斯》(1826)和雨果发表《克伦威尔》(1827)及《爱尔那尼》(1830)的期间，于是他几乎把当时的文学运动连同他的行李统统带回了阿根廷。在欧洲期间他阅读了席勒、歌德、尤其是拜伦的作品，认识到新的运动——正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所说的——是“一种精神的革命，它同冷酷的、极端理性的古典主义的一般性相对立，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表达自己的方式，完全吐露自己的心灵，开辟了道路。”②虽然埃切韦里亚诗才并不十分出众，但他天生的性格却无疑促使他更适于投身这个新的运动，这一点在他《漫谈我三十岁生日……》(1835)的

① 《南美洲可笑的习惯》，载《首创》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第7期(1838年7月15日）；转引自胡安·卡洛斯·吉亚诺著《埃切韦里亚的〈屠场〉及风俗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第68页。

②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流派》第121页。

片断回忆中，有所流露："我在18岁到26岁期间，感情和激情十分充沛，它们的能量冲破了所有限制，把无法忍受的东西轰得粉碎。如饥似渴地求知识、立大志、盼荣誉、对未来抱有大量幻想……向往我感到的一切。"评论家加西亚·梅罗1894年曾评论说，埃切韦里亚作品鲜明的特点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反映了"渴望改变命运、追求更高地位、但并未如愿以偿的那些人的抗议和不满"。①

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目睹国家被统一派*和联邦派之间的斗争弄得遍体疮痍。罗萨斯已经统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即将成为独裁者。当时埃切韦里亚发表了他的诗作《埃尔维拉，又名拉普拉塔河的新娘》(1832)和《慰安集》(1834)，并正在准备他最著名的诗篇《女俘》(1837)，这首诗叙述了一位热情的女英雄在荒野的草原上面对凶恶的印第安人不畏艰险地救护自己爱人的故事。然而，他真正的才能，正如在杰出的、现已成为经典小说的《屠场》(1839)一书中所表现的，是在散文写作方面，浑厚有力而又清晰透澈。可是，在当时，他仍以他那比较呆板却十分理智的浪漫主义诗篇而闻名于世。这是那一整个时代的特征：直到19世纪结束以前阿根廷评论家们仍然认为该国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远高于散文写作方面的质量，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当1839年自由派的革命失败后，埃切韦里亚一伙被迫逃亡，大部分人流亡蒙得维的亚。他全心投入写作，心灰意懒——郁忿满腹，正如我们所知，这是那个时代大部分流亡者文学著作的特点——并在罗萨斯最后战败于卡塞罗斯的前一年去世。他对与他同时代的人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胡安·马里亚·古铁雷斯(1809—78)早期作品中是很明显的，如1833年发表的《民歌手的爱情》；在巴托洛梅·米特雷(1821—1906)这位19世纪阿根廷伟人之一所作的《桑托斯维加》(1838)中也同样明显。

824

① 前引吉亚诺书，第11页。

* 原文是"Unitarians"，一译"中央集权派"。——译者

在埃切韦里亚去世那年，他的年轻的门生之一，何塞·马莫尔（1817—71），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阿玛利亚》。其中的有些篇章1844年以后已陆续问世，这是那个时代突出的小说著作，尽管当时还有别人创作了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小说如：米特雷的《孤独》（1847）、米格尔·卡内）1812—63）的《埃斯特尔》（1850）、比森特·菲德尔·洛佩斯（1815—1903）的《异连徒的新娘，又名利马的宗教法庭》（1840）、以及古铁雷斯的《贵族的上尉》（1843）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在流亡时期创作，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版。上述大部分作品主要是华特·司各特作品拙劣的仿制品，这是因为阿根廷本身缺乏这种历史传统，以致这些远离祖国的作家们难以基于这种模式创作出令人信服的小说作品。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阿根廷的第一位重要的女小说家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1818—92），其夫是玻利维亚政治家曼努埃尔·伊西多罗·贝尔苏，她创作了一些早期的浪漫派的印第安主义作品，如《笛子》（利马，1843）。然而，马莫尔的《阿玛利亚》却比它同时代的任何其它同类作品更令人感兴趣。它是拉丁美洲描写独裁制的第一部小说 它以一位妇女的名字这一个词作为书名，以它那夸张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国家与历史之间因果关系的一致性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同司各特以后的大多数浪漫主义小说不同，《阿玛利亚》描写的是不久以前的事，尽管象马莫尔在序篇中所解释的，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以便书中的观点能立即为后代的人所理解。书中戏剧地描写了在“玉米棒子党”* 统治时期两位青年反对罗萨斯政权的英勇斗争。阿玛利亚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寡妇，是其中一位青年的恋人和另一位青年的堂姊妹；他们都是独立战争时期英雄的子女。当我们首次见到阿玛利亚时，她正在她那十足欧洲风格布置的、十二分雅致大方的家中阅读拉马丁的《沉思集》，而外面却是罗萨斯令人窒息的恐怖世界。不幸的是，

825

* 玉米棒子党（Mazorca），罗萨斯统治时期人们对联邦党人民复兴协会的蔑称，因为它的党徽上有根玉米穗。——译者

只有反派人物是生动的——对罗萨斯的刻画令人难忘——而英雄人物则是贵族式的超人，他们理想化的行为和最后的厄运（尽管中间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插曲）却令现代读者感到扫兴。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份记录文献，尽管有它的思想偏向，《阿玛利亚》还是十分珍贵的。马莫尔在第5章中对他的同胞作了如下诊断："缺乏教育，愚昧无知；种族偏见深，报复心重；受气候影响，容易激动……好似一匹桀骜暴跳的野马，当人们想去驯服它的野性时，却在巴塔哥尼亚直到玻利维亚横冲直撞，排斥文明和正义"。这种形象极富于暗示性，类似埃切韦里亚在《屠场》中对罗萨斯凶残的追随者们的描述，也是萨米恩托在《法昆多》中高乔人形象的前驱。然而马莫尔在自述时却清楚表露出他的知识界同胞们对实际情况基本上是无知的，而罗萨斯对此却了解得太透彻了。这位考迪略在下等阶级中的深孚众望，令自由派文明的代表们无法容忍——但后者则更令罗萨斯愤怒，他把他们斥之为"野蛮的臭统一派"——而历史却孕育了一套长期的辩证法，它将是整个现象重复出现直至发展到庇隆由盛及衰的见证。

马莫尔在学生时代即因分发反罗萨斯的宣传品而被监禁，他的第一首诗正是在监狱中写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在流亡期间创作的。马莫尔也是在1844年被迫逃亡蒙得维的亚的，此后，他就开始创作了他拜伦式的《巡礼者之歌》，这首诗，尽管有些不匀称和不够完善，往往被认为是用西班牙语创作的突出的浪漫主义诗作之一。诗人回忆他扬帆于暴风雨的海洋："荣耀想念吟游诗人，诗歌渴望与荣誉重逢，为什么没有悦耳之音，难道身、心都已消逝？欧洲不再传来琴音和捷报，歌声已与拜伦一起死亡，荣耀已与拿破仑一同被埋葬"。马莫尔每年一度写诗对罗萨斯的诅咒（在流亡期间每年5月25日写一首）已汇集成册，可算得上是用文字书写的最恶毒的语言之一（"你这地狱呕出来的草原禽兽……啊，罗萨斯，我们决不能庆祝五月节除非把你骂得永遭天罚"）"同埃切韦里亚不一样，马莫尔活到了过上体面生活的比较太平的时期，就

象以后的许多著名的阿根廷作家一样，脱离了写作而担任了国立图书馆馆长。

826 显然，阿根廷19世纪文学活动之所以如此激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该国政治生活的斗争十分激烈，特别是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痛感他们的统治权利被罗萨斯的独裁剥夺了。因此，阿根廷是从流亡生活中造就作家的一个早期和主要的国家，此后，作家兼政治家和政治性作家似乎成为拉丁美洲的一种长期现象。19世纪大多数大作家因此也是名记者。1852年米特雷在《论战》中，引用了拉马丁著名的格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主要的、具有特征的激情：如果正确理解，它就是生活的源泉。我们时代的伟大激情是对未来的激情，争取社会尽善尽美的激情，为争取实现一个有道德的世界的这种激情，其手段就是报纸，它是我们时代主要的文化工具。

当然，米特雷后来创办了《国民报》(1870)。许多过去反对罗萨斯的作家们在他倒台后掌了权。首先是米特雷本人（1826—8任总统）和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68—74任总统）。萨米恩托的意识形态顾问阿尔韦迪——罗哈斯·帕斯在其著名的传记中称他为"孤独的市民"——从未获得实权，但他的《基础》一文却对拟订1853年宪法起了作用。

如前所述，阿根廷造反派在罗萨斯围攻蒙得维的亚之前主要在该城避难，以后又去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环境较为稳定，单调和保守得多——不是浪漫主义的，并且已经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之乡，著名的1842年论战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安德烈斯·贝略和萨米恩托就何种形式最适合于拉丁美洲的语言形态问题展开辩论；萨米恩托的友人比森特·菲德尔·洛佩斯和贝略的弟子何塞·华金·巴列霍（笔名"霍塔维切"，1809—58）之间就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问题展开辩论。这场论战不久就普遍开展，并在萨米恩托开始把语法与保守主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时，论战就公然发展到政治领域了。这场论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何塞

·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1817—88）——他在以后四十年里成为智利知识界的主要人物——公开宣称，文学应该成为“我国民族真正的表现形式”。这也正是爆炸性的《智利的社会性》(1844)一文的作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1823—65),以及比库尼亚·麦肯纳在圣地亚哥知识界留下他们痕迹的时刻。当时那里大多数的年轻人依然拜倒在遥远的西班牙大诗人兼记者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笔名“费加罗”）的脚下。贝略也许没有料到会在智利首都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他在这场论战中受挫后就隐退了，并着手编写他著名的《语法》(1847)。贝略曾一度担任过玻利瓦尔导师——虽然他对玻利瓦尔的影响不如热情的西蒙·罗德里格斯*——，1810—1829年旅居伦敦期间，主编过划时代的刊物并创作了他著名的诗篇，以后移居智利，成为智利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可以说是19世纪知识界中最渊博和始终最富于启迪性的西班牙语作家：他在法律、文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而且对智利共和国的文化改革工作有主要影响。象他和奥尔梅多所代表的那种拉丁美洲式的家长式严谨作风较之英国和西班牙式的毫无逊色。贝略在晚年甚至设法向拉美介绍雨果而翻译了雨果的著作。

827

萨米恩托除了他的大量成就与贝略有共同之处以外，一看就是与贝略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他至今仍是拉美19世纪中少有的几个优秀的伟大文人之一，尽管他几乎未写作多少纯文学性的作品。他对承袭已有的“模式”不感兴趣，因为“灵感”就是他自己生活方式的源泉之一；同时，他象埃切韦里亚一样，比较善于写作有关政治和哲学的题材而不是想象的文学题材，然而表达方式富于热情，而且他只写散文。有意义的是他的生卒年(1811—1888)常被用来标志整个西班牙语美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始末，特别是他

* 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iguez, 1771—1854），委内瑞拉教育家，也是玻利瓦尔的启蒙老师之一。——译者

去世的当年正好是鲁文·达里奥发表诗文集《蓝》的那一年，这是标志现代主义开始的一部著作。萨米恩托在流亡智利时创作的《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1845)，虽然主要是一部社会学或"人文地理学论说文"著作，却是19世纪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至今依然脍炙人口。书中所议的，能够与全国江山的现在和未来同呼吸、共命运的是一种充满自主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性格，然而，矛盾的是，却令人觉得更像是他一直几乎恨透了的独裁者和高乔人，而不象被他理想化了的、理智的欧洲文明世界，他越是抬高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他的文章读起来就越发显得肤浅和不真实。越发空洞和令人不满意。最令人惊奇的是萨米恩托的坚信不移：他似乎真正知道未来是属于他的（书中准确地预言了罗萨斯的倒台），并明确无误地谈论了他企图接管权力的那个物质世界。同时，他毫无贵族气质：他把文明的观念用作一根棍子去打击敌人，而不是当成一把扇子用来扇去群众讨厌的味道。他的著作中没有象一百年后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马列亚或穆雷纳等作家观察本国时的那种抽象的冷漠。萨米恩托是一个梦想家，但他也是一个认真务实的人。他对自然科学（对土地的改造和耕耘栽培）和教育（对人的改造和栽培）深感兴趣。1842年，他在圣地亚哥创办了拉美第一所师范学校和智利首都的第一份严肃的报纸《进步》报。与此同时，当贝略主张恢复古典的语言规范时，萨米恩托则反驳说"一种正确纯洁的文体只是在全面发展文化以后才能获得的结果"，萨米恩托是一位自学成材的浪漫主义者，其文体有如其人，富有活力而自然流畅。他指出西班牙语美洲的浪漫主义——与巴西或欧洲截然不同——其特征是：挑战、建设和取得成就的史诗。的确，他的文章极其富有活力，只不过是他不断动荡的生活写照。如前所述，西班牙美洲独立以后，有许多悲剧式的人物：埃雷迪亚、梅尔加、埃切韦里亚、阿库尼亚。也有不少伤感主义者，例如豪尔赫·伊萨克斯，他实际上更象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巴西人。然而，萨米恩托却是他那个世纪的真正的人。因此，在19

世纪40年代以后拜伦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只是对巴西的撒旦式的一代有些影响而已；甚至夏多布里昂也只居次要地位，尽管仍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巴西——并对一些基础作品有启迪作用。在诗歌和戏剧方面的主要人物是维克多·雨果，在叙事文小说方面则是华特·司各特。

如果说，正当别的浪漫主义者还在着手描绘大陆风景的诗境画意，或刻画大陆居民的风格习俗之时，萨米恩托则是一位浪漫主义矛盾着的两种激情中与缅怀过去相对立的、向往未来的那一部分的代表人物。华特·司各特和华盛顿·欧文开创了历史浪漫主义的传统，大仲马和欧仁·苏继承并加以通俗化，使之成为一种最为持久的大众文学形式。但其真正的意义却往往遭到误解。当浪漫主义作家发掘历史题材时，并不总是仅仅怀着恋旧的保守主义激情；他们也可以加上自己对事后的调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在根据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写历史。同样，当他们陶醉于神话和民间传统中的中心人物时，为了占有如此大量醇酒般脍炙人口的素材就要对此加以再现。米特雷在其所著浪漫主义小说《孤独》(1847)的序篇中评论说：

南美洲是世界上最缺乏富独创精神小说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应该欢迎小说把根深深扎在美洲原始土地上的缘故。我们的人民对自己的历史无知，他们好不容易形成的风俗习惯，尚未从哲学体系方面进行过研究。……小说把握住征服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我们对独立战争的回忆，将使我们的历史大众化。

在此15年以前，埃雷迪亚曾撰写过一篇有先见之明的《论小说》(1832)，阐述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其中指出了历史小说和伤感主义小说之间的主要区别。

因此，在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历史浪漫传奇（historica romance）的两个亚神——即“传奇”（leyenda)和“传说”（tradicion）——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浪漫主义中比较保守的

一翼相应的，这是与欧洲的一般情况不一样的。16世纪和17世纪以后西班牙现实主义传统的偏离正轨，以及，既缺乏令人满意的历史传统又缺乏蕴藏于本国的神话、传奇和民间传说，使拉丁美洲各个新建共和国的作家们陷于一种困境，他们无从选择只能临时凑合。如果善于写细节，可以去描述风俗小品；如果擅长想象，多愁善感，可以写传奇，通常是以叙事体散文或诗歌描述过去的神话、当地某些宗教奇迹或奇异自然现象。这种倾向最终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传说”——这是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开创的一个流派。虽然拉丁美洲历史小说大多主要源出于司各特、大仲马和欧仁·苏，但作为短篇小说雏形的风俗小品、传奇和传说却基本上以里瓦斯公爵、拉腊和索里利亚等西班牙作家的著作（1843年出版的选集《西班牙作品集锦》是这个运动的顶点）为模式，只有在层次更高的作品中才以法国风俗浪漫传奇（roman de m-moeurs）中具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为模式。虽然这些西班牙语作家是贵族出身或具有贵族倾向，但他们所发展的流派因移植到美洲的土地上而有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实际上每一部作品都必须从它具体的情况加以考察：有些作品具有现代精神，但题材是古老的；其它一些看起来是探寻现代风俗，观点却是反动的。在探索民族真谛时往往陷入一味追求绚烂如画或地方色彩和肤浅的说教。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巴尔扎克及其模仿者）很晚才传到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在那些想去效法这类小说并同时以它作为自己特点的那些地方，以它为代表并以此定型的往往是通俗主义作家们，虽然他们经常再现了大众文化的方言和土语，但是，他们的意图往往是讽刺和丑化却又回避进行真正的社会批评和不愿正视苦难和压迫。

830

因此，传奇和传说主要见诸于过去西班牙帝国时期比较传统的“殖民地”地区是不奇怪的。例如，其中的两位先驱是危地马拉作家：何塞·巴特雷斯·蒙图法尔（1809—44），以笔名“唐·

佩佩”*闻名，是《危地马拉传说》这部深有影响的作品之作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表》一书，趣味盎然，很有拜伦轻松作品的遗风；另一位，安东尼奥·何塞·德·伊里萨里（1786—1868），以他半自传体小说《流浪的基督徒》（1845—7）最为著名，在他类似的短篇小品中也显示了他是一位擅长冷嘲热讽的大师。其他值得一提的危地马拉作家还有，胡安·迭格斯·奥拉瓦里（1813—66）和何塞·米利亚-比道雷（笔名“萨洛梅·希尔”（1822—82），后者是叙事诗《唐·博尼法西奥》（1862）、小说《阿德兰塔多的女儿》（1866）和著名小说《一位花花公子的历史》（1882）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司各特、大仲马和欧仁·苏等人强大的影响显然终于已让位于浪漫主义时期结束时其他一些更为现实主义的模式。

墨西哥出现了许多擅长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他们之中都没有达到真正伟大的水平或真正具有全拉美地区的重要意义。曼努埃尔·派诺（1810—94）是其中最早的之一，著有小说《诡计多端的人》（1845），他也是最长寿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不仅经历了而且超越了整个浪漫主义时代。诗人胡安·迪亚斯·科瓦鲁维亚斯（1837—59）在被反动势力处决前一年创作了富有代表性的题为《起义者希尔·戈麦斯，又名医生的女儿》（1858）的诗篇。比森特·里瓦·帕拉西奥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宗教法庭题材凄惨可怕的小说，如《苦难和鼓手》（1868）或修女与已婚妇女、处女与殉道者》（1868）。里瓦是一位与华雷斯密切合作的作家，他的著作具有民族主义、反西班牙和反教权的倾向，萌发着一种渴望恢复土著传统的明确征兆。在墨西哥，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论证从一开始起在观点方面就比拉普拉塔地区要含糊得多和复杂得多。印第安人问题从来不象在阿根廷那样表述得这么简单和突出，救赎的思潮显然甚至早于巴西。伊格拉西奥·拉米雷斯（笔

* 'Don Pepe'，意为“花花公子”。——译者

831 名"巫师"，1818—79）虽然不是一位小说家，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启蒙文人；但在革新时期及其后对墨西哥文学生活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伊格纳西奥·阿尔塔米拉诺(1834—93)，他本人同华雷斯一样也是印第安人，著有浪漫主义的风俗派小说《克莱蒙西亚》(1869)；怀旧思想和十分令人喜爱的《山区圣诞节》(1871)和惊险小说《埃尔·萨科》(作于1888年，1901年出版)，后者是以19世纪60年代初为背景的盗匪故事。这个题材在路易斯·G·因克兰(1816—75)的《狡黠》(1866)中已经出现过并在派诺所著很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的《里奥弗里奥的匪徒们》(1891)中再次用过。同西班牙一样，匪徒在墨西哥小说里也是读者喜爱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渲染了像海盗一样浓郁的传奇色彩，而且因为他同重大的社会现实相呼应。然而，阿尔塔米拉诺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更为重要的文化运动倡导者。正是他以后于1867年发起了著名的"文学晚会"，邀请当时所有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参加；他并在1869年创办了《复活》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进行探索。阿尔塔米拉诺宣称，墨西哥在文化领域中"尚未听到'多洛雷斯的呼声'"，并号召进行民族革新，后者在以后几十年中得到响应，直到20世纪20年代；尽管如此，阿尔塔米拉诺本人实际上是最后一批浪浪漫主义者中的一位，而不能算是某种真正的过渡性新人物。

古巴的浪漫主义小说是富有激情的，在小说家们由于西班牙殖民主义残暴统治达到其顶点时与民族解放斗争相冲突的压力而感到震惊的国度里，这是可以理解的。曾在西班牙度过她动荡颠沛大半生的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1814—73)，是一部勇敢而伤感的废奴主义小说《萨布》(1841)的作者，这是自利萨尔迪的《癞皮鹦鹉》(其中含有值得纪念的谴责奴隶制度的内容)以来美洲第一批反奴隶制作品之一。安塞尔莫·苏亚雷斯·罗梅罗(1818—78)在1832年开始创作他的小说《弗朗西斯科》，但只是在他死后直到1880年才出版。书中写一对相恋的奴

隶终因无法如愿以偿而自杀的悲剧，这是浪漫主义时代以各种形式在古巴和别的地方反复出现的典型情节。风格与此类似（出版时期和情况也相近）的作品有西里洛·比利亚韦德（1812—94）所著的《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又名天使山》，这是19世纪古巴最著名的小说，开始创作于1839年，但直到1879年才完成，最终于1882年出版问世。在19世纪期间，古巴作家们对于他们的著作是否能保证出版是毫无把握的。

832

最伟大的散文小说家在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姗姗来迟——西语美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直到1870年前后才发现了它明确的中心而确定了主题。这位最伟大的散文小说家有秘鲁的里卡多·帕尔马（1833—1919），他是《秘鲁传说》的创作者，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了这部著作的雏形，但直到1870和1915年之间才陆续正规出版。他是一位19世纪的经典作家，同时又具有特点和独创性，他的老师实际上是塞万提斯和克维多，他们的讽刺诙谐风格使他有可能既保存了又在破坏殖民地传统。帕尔马的故事具有轻微的反贵族和反教权的倾向，尽管没有进行谴责，但通过幽默和讽刺抨击了不公正的行为；他以普通话、西班牙谚语和秘鲁方言三者精巧结合而编写的各种故事始终趣味盎然，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城市的喜爱，既讲优点也毫不隐瞒缺点。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把它们称作“又苦又甜地篡改历史”，而欧亨尼奥·马里亚·德·奥斯托斯则抗议说，仅仅为了供人娱乐消遣而白白糟踏了许多学问，其内容中几乎看不到对殖民主义又有什么批评。然而，帕尔马的著作还是明显地预示了摆脱早期风俗派的一种转变。它们毕竟实质上为独立后正在出现的新阶级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讽刺文。在索里利亚诗作中和贝克尔散文中采用的“传奇”——“传说”的前身——是属于半岛传统一种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形式。帕尔马的“传说”则实际上是“传奇”和“风俗小品”的一种混合体，它极其新颖，具有短篇小说的倾向，在巴西通过马查多·德·阿亚斯的作品早在19世纪60年代短篇小说已经出现，但

在西班牙语美洲直到进入现代主义时期以后很久才正式出现。帕尔马的著作，尽管象一面哈哈镜，却有助于再现已经失传的殖民地往昔风貌，有助于奠定民族文学的基础，并且，确实成为20世纪拉丁美洲记述体中博尔赫斯无与伦比的"虚构小说(fictions)"和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潮流的先驱。他显然希望，他的小说化的历史片断通过文学传奇体裁真正能变成民族历史与民间传说相结合的秘鲁"传说"。在他首次发表于1860年的早期"传说"《一位总督和一位大主教》的序言中，他写道：

在美洲，传说几乎没有任何生命力。美洲仍然是新近发现的新鲜事物，而传说的价值至今只不过是挖出的金银财宝而已。……我们年轻人有责任保证传说不致完全失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传说，并使它令人们感到兴趣的缘故，我们认为，使每一件历史轶闻披上传奇色彩的外衣是合适的。

帕尔马最后定型的《秘鲁传说》的第一卷于1872年问世。他以后成为建设图书馆的一位重要成员并在1884年至1912年长期担任国立图书馆馆长。

833

帕尔马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奇作家们企图用他们新发展的体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美洲的题材寻找美洲的表现形式的问题。当这位秘鲁人正在创作他的小小的文学宝石之时，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95）也在设法寻找一种令人信服的浪漫主义小说模式——但不久以后它终于完全过时了。伊萨克斯的成果是《玛丽亚》(1867)这部整个西班牙语美洲最成功的浪漫主义著作。这部小说是属于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保尔和薇吉妮》、拉马丁的《葛莱齐拉》或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一类的。但是对伊萨克斯具有最直接影响的还是夏多布里昂：这本小说中的人物本身就在阅读《阿达拉》和《基督教真谛》上化了大量时间，十分凑巧地是，在以后的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女主人翁在泪流满面地阅读《玛丽亚》，它至今在流行的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仍保持着强大

的魅力。一本与它极其近似的巴西小说是阿尔弗雷多、戴斯克拉尼奥勒·陶奈所著久盛不衰的内地传奇《无辜的人》(1872)。《玛丽亚》一书中的叙说者，那位总是把夏多布里昂搁在脑海中的埃弗拉因，在谈到他心爱的人时说道："她正如这位诗人所创造的那样美丽，而我也正如这位诗人所想像地那样爱着她"。实际上，这部小说对作者是很大的补偿。伊萨克斯在父亲死后哥伦比亚内乱战祸期间，无力经营自家的埃尔帕莱索庄园（即小说中的同名庄园），只能靠当公路督察员维持生活，他是在名叫拉比沃拉的热带森林高山营地的帐蓬中写作本书大部分文稿的。作品把怀念童年纯真的一种浪漫主义与拥有土地和奴隶的贵族中的自由派阶层执著追求清白无辜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成果是一种热带田园牧歌式的交响乐：柔情、悲怆和泪水；客观上是妄想但感情是真实的。具有新意之处在于伊萨克斯的小说并不是以人们可能想象的其它文学著作为基础的，而主要是以自传式的亲身经历和真实的背景——美丽的考卡山谷——为基础的，与此同时，除了作品有关的最间接的社会背景以外，无情地删除隐去了一切。（伊萨克斯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有产业的地主，时而是自由派时而又是保守派，他深深地卷入了内战和军事斗争，但在小说中这些情况都无影无踪。）正如哥伦比亚评论家梅希亚·杜克指出的，"对于成千上万的读者而言，《玛丽亚》继续活在热情的普通人心中，使他们陶醉于最甜蜜的梦幻和最令人迷恋的神话之中"。[1]

834

正是这个时候，印第安主义——在历史上走下坡路的浪漫主义的变种——在西班牙语美洲达到它的顶峰，它抬高了征服时期以前的印第安人而避而不谈当代的印第安人后裔（捍卫他们的运动后来才开始出现，被称为"土著主义"），这与阿伦卡尔更早一

---

[1] 海梅·梅希亚·杜克著《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生平及其小说》载米尔塔·亚涅斯编《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哈瓦那，1978），373—422(442页)。

些时候在巴西创导的运动情况相同。看来也许矛盾的是，要不是西班牙语美洲人需要用那么多的时间才足以把他们自己的现实同他们审美观之间的差距弥合起来——然后才能像欧洲人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那样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美洲同胞们的话，西班牙语美洲人就不会只能在19世纪70年代才达到法国小说家在启蒙运动后取得的成就。如前所述，实际上更为突出的是，直到19世纪晚期，在巴西这类印第安人不是主要社会“问题”的国家里，或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种印第安人早已灭绝的国家里，印第安人才被描绘为英雄人物。正如林斯·多·雷戈以后的评论中尖锐指出的“阿伦卡尔为了避开巴西而躲进森林；为了避开巴西人而发现了印第安人”。确实，19世纪文学中的印第安人形象，常常是15世纪和16世纪那种稚气未泯的蛮夷贵族，以象征19世纪独立后的解放，而不是至今仍在这块大陆几乎无异与封建时代的庄园中上下奔忙操劳的被蹂躏和营养不良的人物。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曾经说过：活着的印第安人没有诗意。

1879年厄瓜多尔作家胡安·莱昂·梅拉（1832—94）发表了他异国情调的著名小说《库曼达》，副标题是《野蛮人中的戏剧》，其中充满了色情挑逗，包括互不知情的亲属之间几乎发生乱伦的危险，并以亚马孙森林中猎取人头的希瓦罗族印第安人为背景。象《玛丽亚》一样，犹如一枝晚开的妖艳花朵，是美洲印第安佩义的顶点。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保守作家何塞·华金·主雷斯创作了叙事诗集《土著幻想曲》（1877），抬高了殖民地初期印第安人的形象，而曼努埃尔·J·加尔万（1834—1910）则于1879到1882年发表了他以同一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恩里基约》，335 本书现被公认为上个世纪伟大的历史性著作之一，以其内容详尽、观点进步见长。1888年，乌拉圭作家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发表了他的最著名19世纪叙事诗《塔瓦雷》，主人翁是一个由西班牙妇女同印第安酋长所生的儿子。索里利亚既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通过他的悲剧色彩的

传奇故事哀悼印第安族的消亡，但并不令人信服；然而，他的诗已经显露了有别于达里奥在当年发表的诗文集《蓝》的象征主义潮流迹象。索里利亚以后被誉为“乌拉圭民族诗人”，并在1910年受政府委托写作了为纪念独立一百周年的《阿蒂加斯的诗史》。

如前所述，浪漫主义最初掀起了美洲主义的表现形式然后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但从整体来说继此而来的却仅仅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地方性的记叙性文学，它很少超过西班牙的通俗主义。阿伦卡尔、伊萨克斯和梅拉等作家在当时很晚才把这个运动引向其艺术的最高峰，但这是以缜密地排除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的痕迹为代价的。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更具体地是在80年代，浪漫主义才开始以风俗小品与历史小说脱颖而出分蘖为现实主义记述文的一枝，以及更严格的专业化诗歌的一枝，其中浪漫主义诗歌的洋溢情感和传统的精雕细凿修饰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更为精确、音乐性更强和更风雅的现代主义运动。在此之前，如埃切韦里亚的《屠场》或萨米恩托的《法昆多》等杰出的著作，则是令人惊异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是一种往往出人意料的杂交和聚变的产物。而阿根廷作家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36）所作的高乔式诗篇《马丁·菲野罗》(1872)及其续篇《马丁·菲耶罗的归来》（1879）则是所有这些著作中最伟大的之一。虽然人们习惯于将高乔式诗歌单独分类，但这种拉普拉塔河的现象显然是各种本土主义的潮流之一，是浪漫主义冲动与民间精神交流的一个部分。它出现得很早——在解放时期，在浪漫主义本身创始之际即已同时出现——而并不是19世纪后期与土著主义及其它这类运动同时出现的。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浪漫主义的早熟，它从一开始就把高乔人的乡村歌曲和音乐作为一种可以采用的题材纳入艺术文学，这与16世纪西班牙宫庭的城市诗人模仿古老的传奇歌谣同出一辙。与此相似，高乔式诗歌也并不是高乔人创作的，而是有文化素养的城市居民创作的。但其渊源可上溯到18世纪的口头传说，正是巴托洛梅·伊达尔戈在独立运动时期把它记 836

录为书面文学和历史，这促使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想起了高乔人为战胜西班牙人所作的贡献并为克里奥尔主义倾向提供了持久的动力。高乔人的存在，不论萨米恩托及其同一代人认为他们是多么野蛮，毕竟使印第安人更容易展现在文学之中，而以后在本卷所述时期结束之际他们则终于被灭绝了。

正是伊拉里奥·阿卡苏维（1807—75）最确切地认识到高乔主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创造一种以乡村生活为基础、通过乡村语言和民间歌谣而表现的民族文学。他最著名的作品有《保利诺·卢塞罗》始作于1838年，其中充满了反罗萨斯的情绪（这根本不是真正高乔人的特点）；以及《桑多斯·斯加》（作于1850年，1872年出版）。埃斯坦尼斯劳·德尔·坎波（1834—80）的《浮士德》(1866)的观点则更带有城市气息，德尔·坎波是一个城里人，他结束流亡生涯后回到阿根廷时把乡村的高乔人看成是代表阿根廷民族的一种多少带有喜剧性的象征。作品再现了一个老实的高乔人对大名鼎鼎的哥伦布大剧院开业十年之际上演古诺的《浮士德》诗剧的观后感。德尔·坎波的诗作老练、有趣并且很有阿根廷文学传统特点。

埃尔南德斯与19世纪大多数阿根廷的大作家们不同，他本人在罗萨斯执政时，一直是一个罗萨斯支持者，但在这位诗人18岁时，罗萨斯就下台了。他也具有高乔人的生活经历，并在1882年发表了有见地的《庄园主的训示》。他在罗萨斯下台以后的阿根廷的大部分期间内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萨米恩托任总统期间更是如此。他的诗作《马丁·菲耶罗》是一部深孚众望、独具风格的史诗，堪称西班牙语浪漫主义诗歌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象《堂吉诃德》一书那样，作品设法令人想起其中的景色，而不必着实地逐一加以描绘。埃尔南德斯对高乔文化融会贯通，他在故事中所用的方言土语生动活泼，令读者信服，尽管如此，博尔赫斯还是在评论中指出，高乔人从不象马丁·菲耶罗那样说话。诗篇对阿根廷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然也对为此带头的那些欧洲化的

作家们，作了影射的批评。相反，埃尔南德斯令人想起孤独和广阔的草原及其居民平凡的英雄主义，以及关于骏马、道路和地平线等淳朴的西班牙式浪漫主义，全都编写为以吉他伴奏演唱的歌词，它们将在后一个世纪南北美洲的文艺天地里吟行数千里。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它是阿根廷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在1913年时曾把它称为："阿根廷的民族史诗"。与此同时，其挽歌式的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自独立以来由于文明的进步和私有地产的扩张，大草原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此外，也正是高乔人以及整个农村居民最直接地受到了外来移民浪潮的侵袭，而在这部诗篇创作之际，移民浪潮还只是刚刚开始掀起。回顾埃尔南德斯对一种高乔民族主义神话的明确表达，再次突出了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以及，自伊达尔戈以来的其它高乔式诗篇的重要意义，并为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的《胡安·莫雷拉》(1879)和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1926)奠定了基础。

然后，从19世纪60年代起，现实主义时代逐渐在拉丁美洲开始破晓。甚至埃尔南德斯笔下的冷静和坚韧的高乔人也显露了那种倾向。人们虽然依旧以妒羡或怀恋的心情回顾独立运动时代的英雄岁月，但大多数人开始感到这种英雄言行非己所属。如果说，浪漫主义就整体而言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消极反应，那么，现实主义则重新显示了启蒙运动塑造西方精神的决定性贡献，而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则又加强了这种趋势。这种结果在拉丁美洲则是一种完全不成问题的发展，即从浪漫主义的历史的和风俗派的形态转向现实主义，或者更常见的是，转向其变种——自然主义。有人甚至会说，这些流派是比那种风俗派——它以前具有并且在它继续盛行的那些地方依旧保持了没有变化的乡土气息——更具世界性、更具城市特点的派别，它们在进入20世纪时，同那种以城市为基地的小说家们从艺术民族主义的进步观点出发，试图再现内地生活状况的地区主义，以

及，同那种希望社会和文学尽可能长期保持原封不动，体现保守主义感情的克里奥尔主义之间，出现了更大的区别。

回顾过去，独立运动时期和独立后时期树立起来的拉丁美洲文化，与其说是整个大陆的模式倒不如说是它的民族模式。这不仅是一个经过民族内省而热情激荡的时期——部分是按照意志的选择，而更多地却是不可改变的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各个独立共和国同迅速发展着的国际经济体系相结合才刚刚开始的时期。虽然在1780—1830年期间曾有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去到欧洲（和美国），但在183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尽管他们仍不可避免在继续采用和模仿欧洲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模式，但除了巴西的贵族分子外，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到欧洲大陆获得第一手的经验。这或许可以真正解释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拉丁美洲很多艺术表现为什么会枯竭和所谓"不纯正"（巴西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这并非象通常所说的，欧洲形式不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现实，尽管，这一点仍的确是个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更多地却是拉丁美洲作家和艺术家们本身还不能完全适应那些形式；因为，如果不通过亲身经验，他们不可能掌握外国的形式，也就难以把它们具有说服力地应用于他们自己土生土长的现实。两种不成功的同化作用导致了他们这种不纯正的两重性。除了象何塞·埃尔南德斯这样的个别例外，一位拉美艺术家越是真正的"纯正"——也就是说，他受到欧洲的影响越是少——他的作品似乎就越发不纯正。决定性的重大变化是发生在现代主义（在巴西是高蹈派—象征主义）以后，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期间，因为这个运动的大部分期间只不过是在逆转历史进程：由于交通的进步（其本身是由于拉美同国际经济体系相结合的缘故），作家们更熟悉地掌握了文学的工具——语言和思想——分享到他们醉心模仿的欧洲人的经验，然而，其中大部分人，或者由于自己身在欧洲，或者往往由于过分迷恋去欧洲，而对他们自己的现实太不了解，以致于无法将新的工具应用于本乡本土的素材。后一个进程直到20

838

世纪20年代时才真正开始前进。综上所述，重要的是，不要再去重复那种或明或暗地把一切不符合“欧洲人”口味的文学艺术知识和作品都加以排斥的大部分有关拉丁美洲艺术批评的陈词老调，特别要指出的是，有许多缺点在拉美艺术中出现，恰恰是因为竭力去模仿那些远隔重洋的模式才产生的，此外，欧洲艺术本身，如果撇开“杰作”或“天才之作”的范畴不谈的话，也是差别很大的。拉丁美洲的历史现实始终在创造拉丁美洲本身适当的文化表现方式：如果说，拉美艺术在许多方面，特别在19世纪时，果真歪曲或掩盖了拉丁美洲的现实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拉丁美洲现实本身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归咎于艺术家们了。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们如果对他们在这一时期拉美文化艺术中所发现的东西感到“失望”的话，那么，他们有必要说明，他们期望发现什么，基于何种假设。更重要的是，理解拉丁美洲文化史的运动和方向正是他们的任务和职责，对于每一位艺术家来说，这一直是个人、民族和全大陆的自我表现都在追求的问题，它将为从殖民地的过去走向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美好的未来指明道路。为了这种追求而在民族独立时期早期出现的希望和幻灭，是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最好不过的例证。

书 目 评 论

缩写全称对照表

缩写	全称
ESC	《中美洲社会研究》
HAHP	《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
HM	《墨西哥历史》
JIAS	《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
JLAS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
LARR	《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TA	《美洲》月刊

1. 西班牙美洲独立的起因

大部分文献汇编和叙述性资料有助于说明独立的进程而不是独立的起因，但有关独立的起因的一些资料可以在下述书籍中找到：《米兰达将军档案》(24卷集，加拉加斯，1929—50)；《全国历史研究院图书目录》(82卷集，加拉加斯，1960—66)；《秘鲁独立文献集》(30卷集，利马，1971)。墨西哥和南美洲北部引起当代著名观察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注意。他所著的《有关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杂文》(胡安·A·奥尔特加-梅迪纳编，墨西哥，1966)和《新大陆赤道地区游记》(5卷集，加拉加斯，1956)，对殖民时代晚期的状况作了阐述。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济著述，可参阅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著《经济文稿》，由格雷戈里奥·温伯格编(布宜诺斯艾利斯，1954)。

有关西班牙背景的书目很多，以下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精选书

目：贡萨洛·阿内斯著《18世纪西班牙的经济和实例说明》（巴塞罗那，1969）和《现代西班牙的农业危机》（马德里，1970）；约瑟夫·丰塔纳·拉萨罗著《君主专制制度的失败（1814—1820）》（巴塞罗那，1971）；约瑟夫·丰塔纳·拉萨罗编《旧体制结束时的西班牙经济。卷Ⅲ：商业与殖民地》（马德里，1982）。关于启蒙运动及其在美洲的影响，可以分别在理查德·赫尔的《18世纪西班牙革命》（普林斯顿，1958）和R·J·谢弗的《西班牙世界的经济会社（1763—1821）》（锡拉丘兹，1958）进行研究；并可参阅M·L·佩雷斯所著的《通过宗教法庭的作用来看18世纪墨西哥的两个意识形态阶段》（墨西哥，1945）。何塞·卡洛斯·恰拉蒙特编的《启蒙思想。18世纪伊比利亚美洲的经济与社会》（加拉加斯，1979），提供了有关这一课题现状的概要和精选的原著文本。

专注于启蒙或帝国改革以及美洲对此作出的反应，可以通过斯坦利·J·和巴巴拉·H·斯坦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殖民遗产》（纽约，1970，第86—119页）加以探讨，然后可以在下述著述中加以详细研究：约翰·林奇著《1782—1810年西班牙殖民政府。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地方行政长官制度》（伦敦，1958）；J·R·费希尔著《殖民时期秘鲁的政府和社会。1784—1814年地方行政长官制度》（伦敦，1970）；以及雅克·巴维耶尔著《1755—1796年波旁王朝时代智利的改革和政治》渥太华，1980）。下述著作论述改革分配制和控制地方经济利益集团的尝试：布赖恩·R·哈姆内特著《1750—1821年墨西哥南部的政治和贸易》（剑桥，1971），以及斯坦利·J·斯坦著《1759—1804年西班牙帝国的官僚统治和商业：墨西哥和秘鲁的波旁王朝式改革的失败》，载HAHR，61/1（1981），第2—28页。下述著作对军事改革下了精确定义：克里斯顿·I·阿切尔著《1760—1810年波旁王朝时代墨西哥的军队》（阿尔伯克基，1977），利昂·G·坎贝尔著《1750—1810年殖民时期秘鲁的军人和社会》（费城，1978）和阿伦J·基西著《1773—1808年新格拉纳达的军事改革和社会》（盖恩斯维尔，

1978)。南希M·法里斯所著的《1759—1821年殖民时期墨西哥的王室和教士。教士特权的危机》（伦敦，1968），对教士的豁免权以及改革和革命对它的侵害进行了研究。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所著的《1810年的传统和改革（圣地亚哥，1961）和亚松森·拉夫林所著的《在新西班牙经济中执行整顿巩固法。目标与结果》（载HAHR，53/1 1973，第27—29页），对智利和墨西哥加强财政压力的情况分别作了说明。

若干论述18世纪叛乱的著作对于人们对税收和其他负担的强烈反应进行了研究。约瑟夫·佩雷斯所著的《西班牙美洲解放运动先驱》（马德里，1977）确认了重大的解放运动及其特性。利昂·坎贝尔所著的《对1750—1820年安的斯山区农民起义的近期研究》（载LARR14/1，1979，第3—49页），对“印加民族主义”地区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提供了重要评述。塞贡多·莫雷诺·亚涅斯所著的《18世纪初至殖民时代末期斯多检审庭管辖区土著人的反叛活动》（波恩，1976），以土地结构为背景，叙述了1760—1803年基多地区印第安人的抗议和暴乱活动。上秘鲁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运动是雷内·阿尔塞·阿吉雷所著的《民众参与玻利维亚的独立运动》（拉帕斯，1979）一书的主题。下述著作对个别叛乱进行了研究：博莱斯拉奥·莱温著《图帕克·阿马鲁叛乱和美洲解放运动的起因》（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阿尔韦托·费洛雷斯·加林多编《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文选》（利马，1976）；斯卡利特·奥费伦·戈多伊著《图帕克·阿马鲁主义运动的阶段、经济形势和该运动领导层社会构成的轮廓》，载《国际图帕克·阿马鲁及其时代座谈会记录》（利马，1982），第461—88页；约翰·莱迪·费伦著《人民和国王。1781年哥伦比亚公社社员革命》（麦迪孙，1978）；卡洛斯·E·穆尼奥斯·奥拉著《委内瑞拉的公社社员》（梅里达，1971）。 843

经济因果关系的问题仍在磨炼着历史学家。图略·霍尔帕林唐伊编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秩序的衰落》（布宜诺斯艾利斯），

将许多论述殖民地秩序危机的社会一经济特征的研究报告汇集在一起。西班牙人关于殖民地贸易的思想，是马塞洛·比塔尔·莱塔伊夫所著的《18世纪的西班牙经济学家。他们关于同西印度群岛进行自由贸易的想法》（马德里，1968）一书的主题，而E·阿西拉·沃里亚斯的《美洲有文化的世纪。18世纪新西班牙的经济改革》（加拉加斯，1955）和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的《贸易和殖民地危机·独立的神话》（圣地亚哥，1968），则叙述这方面的政策和做法。霍尔迪·纳达尔和加夫列尔·托特利亚合编的《当代西班牙的农业、殖民地贸易和经济增长。西班牙经济史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巴塞罗那，1974），探讨了殖民地贸易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自由贸易及其在英国一西班牙战争期间的命运的定量研究是由下述著作提供的：安东尼奥·加西亚-巴克罗著《加的斯和大西洋省（1717—1778）》（2卷集，塞维利亚，1976）和《殖民地贸易与革命战争》（塞维利亚，1972）；哈维尔·奥尔蒂斯·德·拉·塔夫拉·杜卡塞著《1778—1821年维拉克鲁斯的对外贸易》（塞维利亚，1978）。约翰·费希尔所著的《1778—1796年帝国的"自由贸易"与西班牙语世界的经济》（载JLAS 13/1 1981，第21—56页）精确地估量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而下一阶段的情况则由下述著作进行了研究：哈维尔·昆卡·埃斯特万著《1792—1820年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统计资料：领事职责，存货清单和贸易平衡》（载HAHR 61/3 1981，第381—428页），同一作者还著有《1778—1826年西班牙帝国覆灭时的贸易和庄园》，载前引丰塔纳著《贸易和殖民地》一书，第389—453页。

844　殖民时代晚期西班牙美洲内部经济状况是新的基础研究的课题。戴维·A·布雷丁所著《1763—1810年波旁王朝时代墨西哥的矿工和商人（剑桥，1971），对矿业部门及其在墨西哥社会一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有关秘鲁矿业，见J·R·费希尔著《1776—1824年殖民时代秘鲁的银矿和银矿工人》（利物浦，

1977），有关上秘鲁矿业，见罗斯·玛丽·比克勒著《1776—1810年波托西矿业社会》（锡拉丘兹大学，1981）。恩里克·坦德特尔所著的《殖民时代后期波托西的强制劳工和自由劳工》（载《今与昔》，93，1981，第98—136页），论证了徭役劳工对波托西生产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所著的《墨西哥的玉米价格和农业危机（1708—1810）》（墨西哥，1969），考察了墨西哥起义前夕日益增长的玉米价格、农业危机和农村贫困。温贝托·坦德龙所著的《加拉加斯皇家领事馆和委内瑞拉对外贸易》（加拉加斯，1976），阐述了农业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委内瑞拉和西班牙观点的冲突，而迈克尔·T·哈默利所著的《1763—1842年旧瓜亚基尔省社会和经济史》（瓜亚基尔，1973），对另一种出口经济及其腹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苏珊·米格登·索科洛所著的《1778—18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人。家族和贸易》（剑桥，1978），分析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人集团的组成、经济作用和社会地位，而莱曼L·约翰逊所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银匠：对法人社会组织受挫的一项实例研究》（载JLAS，8/2，1976，第181—213页），对鲜为人知的手艺人的历史作了调查。

独立时期以前的社会结构涉及到阶级、克里奥尔人和种族等问题。历史学家们最近倾向于强调经济利益集团、社会观念和政治集团，而不是以简单的克里奥尔人一半岛人的冲突作为一种说明独立的解释。有关墨西哥社会阶级的概况，见路易斯·比略罗著《争取独立的革命思想进程》（墨西哥，1967）；戴维A·布雷丁所著的《殖民时代晚期墨西哥的政府和精英》（载HAHR，53，1973，第389—414页）和多丽斯·M·拉德所著《1780—1826年独立年代墨西哥的贵族》（奥斯汀，1976）进一步对此作了精细分析。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所著的《委内瑞拉殖民地社会危机》（加拉加斯，1976）和米格尔·伊萨尔德所著《害怕革命。委内瑞拉争取自由的斗争（1777—1830）》（马德里，1979）对委内瑞拉各 845

种结构作了说明；而下述著作对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作了叙述：费德里科·布里托·菲格罗亚著《殖民地社会黑奴的起义》（加拉加斯，1961），米格尔·阿科斯塔·赛涅斯著《委内瑞拉黑奴的生活》（加拉加斯，1967）和I·莱亚尔著《委内瑞拉克里奥尔人贵族和贩卖黑奴法典》（载《历史评论》，2，1961，第61—81页）。革命在圣多明各的影响，可以在埃莱亚萨·科尔多瓦-贝略所著的《海地独立及其对西班牙美洲的影响》（墨西哥-加拉加斯，1967）一书中加以探讨。马克A·伯克霍尔德和D·S·钱德勒合著的《从软弱无能到有权威。西班牙王室和美洲检审庭管辖区（1687—1808）》（哥伦布，1977）对克里奥尔人要求官职和西班牙人对此作出的"反应"进行了估量。

对早期民族主义尚未进行系统研究。J·A·德·拉·普恩特·坎达莫所著的《秘鲁公社思想和先驱者的证据》（利马，1956）和内斯托尔·梅萨·比利亚洛沃斯所著的《君主统治期间智利的政治意识》（圣地亚哥，1958），探讨了这个课题的各个方面，正如戴维·布雷丁在《墨西哥民族主义的起因》（墨西哥，1973）一书中所作的那样。约翰·林奇所著的《1808—1826年西班牙美洲革命》（伦敦，1973，第24—34页，335—38页）对此进行了综述。

2.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独立

有关墨西哥争取独立斗争的图书目录是大量的，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也许是最庞大的。已出版的文献集很丰富；这里只能提一提其中最著名的。基本的一套是胡安E·埃尔南德斯-达瓦洛斯所著的《墨西哥独立战争史文献集》（6卷集，墨西哥，1872—82）。几乎同样有用的图书目录是赫纳罗·加西亚所著的《墨西哥历史文献》（7卷集，墨西哥，1910-12）和《墨西哥教士阶层和独立战争》第9卷，载《墨西哥历史上未发表的或珍本文献》（墨西哥，1906）；华金·加西亚·伊卡斯瓦尔塞塔著《墨西哥历史文献集》（墨西哥，1925）和《新文献集》（5卷集，墨西哥，1886）。关

于莫雷洛斯，有路易斯·卡斯蒂略·莱东所著的《莫雷洛斯，未发表的鲜为人知的文献》（墨西哥，1927）。同样重要的是由参与者和观察家所撰写的历史。经典著作有卢卡斯·阿拉曼撰写的《从1808年准备发动的墨西哥最初独立运动到当代的墨西哥历史》（5卷集，墨西哥，1849—52）。其他十分有用的著作是：卡洛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著《墨西哥革命的历史景象》（2卷集，第2版，墨西哥，1843—44）；阿纳斯塔西奥·塞雷塞罗著《墨西哥革命史回忆录》（墨西哥，1869）；塞尔万多·特雷莎著《新西班牙革命史》（墨西哥，1822）；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著《墨西哥与墨西哥的历次革命》（3卷集，巴黎，1836）；亨利·乔治·沃德著《1827年的墨西哥（2卷集，伦敦，1828）。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阿兰戈伊斯-贝尔萨瓦尔所著的《1808—1867年的墨西哥》（4卷集，马德里，1871），是派生的著作，而且通常是按阿拉曼的思路写的。

8.16

关于墨西哥殖民时代晚期和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研究对学者总是极有强烈吸引力的课题，但是近期有了变动。一些探索墨西哥政治史的最重要新作有：蒂莫西E·安娜著《王室政府在墨西哥城的垮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8）和《西班牙与美洲的丧失》（林肯，1983）；罗梅欧·弗洛雷斯·卡瓦列罗所著的《1804—1838年独立年代的反革命：墨西哥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西班牙人》（墨西哥，1969）给予迥然不同的解释；有关保皇主义分子及其对独立的抵制的另一项研究，是布赖恩·R·哈姆内特所著的《墨西哥和秘鲁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主义、王权和分离主义（1800—1824）》（墨西哥，1978）；研究伊达尔戈的基本著述有：小休M·哈米尔著《伊达尔戈反叛：墨西哥独立的序幕》（盖恩斯维尔，1966）；对莫雷洛斯的研究，有安娜·马西亚斯著《1808—1820年墨西哥立宪政府的起始》（墨西哥，1973）；海梅·E·罗德里格斯·O著《西班牙美洲的出现：比森特·罗卡富埃尔特和西班牙美洲主义（1808—1832）》（伯克利，1975）；以及

路易斯·比略罗著《争取独立的革命思想进程》(墨西哥,1967)。对新体制和社会的重要研究包括:克里斯顿I·阿切尔著《1760—1810年波旁王朝时代墨西哥的军队》(阿尔伯克基,1977)和《新西班牙的军队和独立战争(1790—1821)》,载HAHR,61/4(1981);第705—14页;迈克尔P·科斯特洛埃著《1800—1856年墨西哥的教会财富》(剑桥,1967);N.M.法里斯著《1759—1821年殖民时期墨西哥的王室和教士:教士特权的危机》(伦敦,1968);多丽斯M·拉德著《1780—1826年独立年代的墨西哥贵族》(奥斯汀,1976);以及哈维尔·奥坎波著《一天的想法:墨西哥人民实现其独立》(墨西哥,1969)。对殖民时代晚期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供许多新见识的,有下列著作:戴维A·布雷J著《1763—1810年波旁王朝时代墨西哥的矿工和商人》(剑桥,1971);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著《玉米价格和墨西哥农业危机(1708—1810)》(墨西哥,1969);布赖恩R·哈姆内特著《1750—1821年墨西哥南部的政治和贸易》(剑桥,1971);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和伊莎贝尔·希尔合著《波旁家族改革和经济增长的纪元:1750—1808年》(墨西哥,1974);以及约翰·图蒂诺著《墨西哥庄园社会关系:独立年代的查科地区》,载HAHR,55/3(1975),第496—528页。戴维A·布雷丁的《墨西哥民族主义的起因》(墨西哥,1973)也许是对克里奥尔主义起源的最有创见性的研究。所有这些著作都改变了早期对独立运动的意义和进程的看法,特别是阐明社会的、经济的和阶级的结构。

同时,一些年代较久的著作仍保有其无法估价的贡献,主要是在叙事历史和体制的研究领域。这些较老的著作包括内蒂埃·李·本森编的《1810—1822年墨西哥和西班牙的议会:八篇论文》(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5)和《州议会和墨西哥联邦制度》(墨西哥,1955);路易斯·卡斯蒂略·莱东著《英雄伊达尔戈的生活》(2卷集,墨西哥,1948—49);唐纳德·B·库珀著《1761—1813年墨西哥城的流行病》(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5);马里亚诺·

奎瓦斯著《墨西哥教会史》（5卷集，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1928）；莉莲·埃斯特尔·费希尔著《争取墨西哥独立的革命背景》（波士顿，1934）和《改革战士曼努埃尔·阿瓦德-凯波》（纽约，1955）；恩里克·拉富恩特·费拉里著《伊图里加拉伊总督与墨西哥独立的起因》（马德里，1941）；约翰·赖德乔德著《外国在新西班牙独立中的利益》（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35）；威廉·斯彭斯·罗伯逊著《墨西哥的伊图尔维德》（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52）；威尔伯特H·蒂蒙斯著《墨西哥的莫雷洛斯，教士、士兵，政治家》（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1963）；以及玛丽亚·德尔·卡曼·贝拉斯克斯著《1760—1808年新西班牙的战争状态》（墨西哥，1950）。论述反叛活动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是何塞·玛丽亚·米克尔-贝赫斯所著的《起义者辞典》（墨西哥，1969）。关于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见M·S·阿尔佩罗维奇著《1810—1824年墨西哥独立史》（墨西哥，1967）。

中美洲编史工作虽然不如墨西哥独立编年史工作那么庞大或复杂，但独立运动及其影响也强烈地吸引着中美洲的编史工作，不过中美洲的历史是一部相对不流血的政治运动史。一些已出版的文献集是有用的。其中著名的有：卡洛斯·梅伦德斯著《中美洲独立运动基本文稿》（圣何塞，1971）；拉斐尔·埃略多罗·巴列著《何塞·塞西略·德尔·巴列的活思想》（第2版，圣何塞，1971）和《中美并吞到墨西哥》（6卷集，墨西哥，1924—27）。独立年代编辑的两个重要期刊已经再版：佩德罗·莫利纳的《宪法编辑》（3卷集，危地马拉，1969）和何塞·德尔·罗列的《祖国之友》（2卷集，危地马拉，1969）。19世纪撰写的著名历史书有洛伦索·蒙图法尔著《中美洲简史》（7卷集，危地马拉，1878—88）和亚历杭德罗·马鲁雷著《中美洲革命史纲》（危地马拉，1837）。

有关独立运动背景的重要著作包括：奥什卡·贝尼特斯·波尔塔著《危地马拉从西班牙和平分离出去》（危地马拉，1973）和豪尔赫·马里奥·加西亚·拉瓜迪亚著《中美洲立宪民主制的起源》

848

（圣何塞，1971）。近期全面论述中美洲独立的最佳著述是小拉尔夫·李·伍德沃德著》中美洲：分裂的国家》（纽约，1976），第4章；这一著述还包括最全面的文献目录。一些书中有关独立运动的章节也是同样著名的，这些书是富兰克林·D·帕克著《中美共和国》（伦敦，1964）和托马斯L·卡恩斯著《联邦的失败：中美洲（1824—1975）》（修订版，坦佩，1976）。最重要的专题著作有：安德烈斯·汤森·埃斯库拉著《中美联合省：共和国的基础》（危地马拉，1958；第2修订版，圣约瑟，1973）；路易斯E·布姆加特纳著《中美洲的何塞·德尔·巴列》（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63）；马里奥·罗德里桥斯著《1808—1826年卡迪斯在中美洲的实验》（伯克利，1978），该书提供了对西班牙自由主义立宪政体的影响的最全面研究；拉尔夫·李·小伍德沃德著《阶级特权与经济发展：1793—1871年危地马拉商业领事馆》（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1966）。并参阅R·L·伍德沃德所著的《1773—1823年危地马拉政党的经济和社会来源》，载HAHR，45/4（1965），第544—66页。其他值得一提的论述独立时期的近期著作包括弗朗西斯科·佩科里尼·莱托纳的《萨尔瓦多解放运动中的人民意志》（圣萨尔瓦多，1972）；切斯特·塞拉亚的《独立年代的尼加拉瓜》（圣约瑟，1971）；里卡多·费尔南德斯·瓜尔迪亚的《哥斯达黎加独立史》（第3版，圣约瑟，1971）；拉斐尔·奥夫雷贡的《我们祖国的历史：独立的最初年代》（圣约瑟，1971）；埃克托尔·萨马约亚的《中美洲独立运动杂文》（危地马拉，1972）。有关墨西哥干预和兼并的情况，见H·G·佩拉尔塔所著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和哥斯达黎加》（第2修订版，圣约瑟，1968）；（还可参阅内蒂埃·李·本森和查尔斯·贝里合著的《1822—1824年出席墨西哥第一届立宪大会的中美代表团》，载HAHR，49/4，（1969），第679—701页，以及迈尔斯·沃特曼所著的《政治合法性与地方主义。墨西哥帝国与中美洲》，载HM，26（1976），第238—62页。佩德罗·华金·查莫罗-塞拉亚

849

所著的《中美洲联邦史》（马德里，1951）和阿尔韦托·埃拉尔特的非常有用的著作《中美洲联邦》（圣约瑟，1972），论述了从墨西哥分离出去和建立联邦事宜。还可参阅戈登·凯尼恩撰写的两篇文章：《墨西哥在中美洲的影响》，载HAHR，41/2（1961），第175—205页，和《加维诺·盖恩萨和中美洲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载《美洲》，12/3（1957），第241—54页。关于尤卡坦的独立，见保罗·约瑟夫·里德所著的《卡迪斯宪法和尤卡坦的独立》，载TA 36/1（1979），第22—38页。名人传记包括塞萨尔·布拉尼亚斯著《历史上的危地马拉人安东尼奥·德·拉腊萨瓦尔》（2卷集，危地马拉，1969）和恩里克·德尔·锡德·费尔南德斯著《唐加维诺·德·盖恩萨和其他研究成果》（危地马拉，1959）。卡洛斯·梅伦德斯所编的《中美洲独立年代的显贵》（圣约瑟，1971）一书将独立年代主要人物的传记汇编在一起。

3. 西班牙语南美洲的独立

西班牙语南美洲的独立运动长期以来成为保守的历史学家们特别喜爱的论题，却吸引不了几个拉丁美洲或其他国家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尽管如此，多亏传统学者和官方机构的共同努力，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可以获得异常广泛的印刷资料汇集。这些汇集范围很广，从古典的题名使人误解的《奥利里将军回忆录》（加拉加斯，1879—88）（共32卷，其中只有3卷事实上专门论述玻利瓦尔的爱尔兰助手丹尼尔F·奥利里的回忆录），到近期的《秘鲁独立文献集》（利马，1971—），该文献集是集官方文件，独立时期报纸、“理想家”的著作、回忆录和游记之大成。相当可观数量的报纸也已自行再版，其中也许最重要的例子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6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15）和《哥伦比亚公报》（5卷集，波哥大，1973—75），各该公报的时间跨度约为10年。除巴拉圭、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外，各国出版了一部或更多的重要资料汇编，甚至还出版了一些次要的汇编。

留下自传体回忆录的高层爱国领袖不多，在那些留下回忆录的爱国领袖中，只有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撰写了一部仍具有重大资料价值的回忆录：《自传》（第2修订版，2卷集，纽约，1871），不过的确应慎重使用。更有价值的是外国冒险家留下的回忆录，像奥利里的《玻利瓦尔和独立战争》（小罗伯特F．麦克纳尼译编，奥斯汀，1970）和威廉·米勒的《米勒将军为秘鲁共和国服务的回忆录》（第2版，2卷集，伦敦，1829），由约翰·米勒编。威廉·米勒为圣马丁和玻利瓦尔两人服务。同样有助益的，特别是在叙述战线幕后或战斗在特定地区结束之后的景象的，是未参加战斗的外国人的论述。威廉·杜安著《1822和1823年哥伦比亚之行，途经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越过科迪耶拉山脉到波哥大，由此经过马格达莱纳到卡塔赫纳》（费城，1826），关于大哥伦比亚，查尔斯·斯图尔特·科克伦著有《1823和1824年期间居住日记和哥伦比亚游记》（2卷集，伦敦，1825），有关智利，玛丽亚·考尔科特著有《1822年居住智利日记；1923年从智利到巴西的航行》（伦敦，1824），关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约翰·P·和威廉·P·罗伯逊兄弟著有《南美书信集；包括巴拉那河和拉普拉塔河岸游记》（3卷集，伦敦，1843）。上述著作对这一流派作了充分的例举说明。

第二手的文献多半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约翰·林奇所著的《1808—1826年西班牙-美洲革命》（伦敦，1973）一书中有关章节的概述提出极好的全面看法；其他的总论远远不是那么好。目前甚至还没有一部真正令人满意的玻利瓦尔个人传记，这种传记可能作为描写大部分南美洲斗争的综合记叙文，虽然已撰写了大量传记。大概最有助益的是格哈特·马苏尔所著的《西蒙·玻利瓦尔》（修订版，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69）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著的《玻利瓦尔》（伦敦，1951），这两部书中，前者内容多少有点平淡，后者则有批判的倾向性。圣马丁的情况较好，这多亏阿根廷第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巴托洛梅·米特雷

撰写的经典研究著作《圣马丁和南美解放史》（第2修订版，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90）以及20世纪这样的阿根廷学者所认真撰写的著作，如何塞·帕西菲科·奥特罗的《解放者何塞·圣马丁的历史》（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32）和里卡多·皮西里利的《圣马丁和各族人民的政策》（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对若干次要人物的研究是充分的，虽然不大具有权威性，比如说，约翰P·胡佛的《令人钦佩的武士、争取南美独立的战士苏克雷元帅》（底特律，1977）。然而总的来说，以传记体语调撰写的独立运动英雄们的作品，不管是假装虔诚的还是暴露性的，多少都有一点肤浅。

未曾专心跟踪一名军事人物从一个战场跑到另一战场的历史 851 学家们很少论述一个以上的国家。关于委内瑞拉，最佳的单卷概览无疑是西班牙历史学家米格尔·伊萨尔德所写的《害怕革命：1777—1830年委内瑞拉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德里，1979），这本书的标题揭示了它的中心论点，即克里奥尔精英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真正的革命。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所著的《委内瑞拉殖民地社会的危机》（加拉加斯，1976），作了一个激励性的简要解释，但是最赏识这部著作的是那些通过伊萨尔德、玻利瓦尔传记或通过委内瑞拉学院历史学家卡拉乔洛·帕拉-佩雷斯的充分研究而对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全面了解的人。帕拉·佩雷斯的著述有《马里尼奥与委内瑞拉的独立》（4卷集，马德里，1954—56）和《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史》（第2版，2卷集，加拉加斯，1959）。论述哥伦比亚独立的作品不如论述委内瑞拉的丰富。尽管如此，哥伦比亚历史研究院发行的《哥伦比亚全史》的有关卷集——特别是卡米洛·里亚尼奥的《军事史；独立：(1810—1815)》（波哥大，1971），吉列尔莫·帕拉萨斯·奥拉特的《军事史；独立：(1819—1828)》（波哥大，1971）——对新格拉纳达的斗争给予相当全面的论述，而关于多年来大哥伦比亚联邦情况的，有戴维·布什内尔撰写的《大哥伦比亚的桑坦德政权》（特拉华州纽瓦

究，1954)。

在厄瓜多尔，人们以非同寻常的注意力来致力于第一届基多洪达的研究，而有关这方面能得到的著作主要是对一些专家有兴趣。秘鲁历史学家对独立运动的研究一向不如他们的大哥伦比亚或拉普拉塔邻国的历史学家那么着迷，但是1971年秘鲁独立150周年纪念至少恢复了一点平衡。那一场合不仅激励上述多卷集的出版，而且激励一些有意思的左翼修正主义思想，诸如比尔希略·罗埃尔·皮内达撰写的《解放者们》(利马，1971)和豪尔赫·安娜的范围广泛的阐述性文集《历史上的不幸和历史的局限性》(利马，1973)。蒂莫西·安娜奉献了《秘鲁王室政府的垮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9)，该书进行挑战性分析，说阿瓦斯卡尔的好话，但没有使别人增什么光。从智利学者方面说，他们创作了优秀的专题论文和有关独立方面的专门研究著作，即使这一论题对当代学者的吸引力不如对19世纪智利伟大历史学家的吸引力那么大。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比如说，沃尔特·哈尼希·埃斯平多拉在《政治一基督教徒教义要理；1810年各种思想与时代》(圣地亚哥，1970)，以及海梅·埃萨吉雷在《智利解放运动的思想体系与路线》(圣地亚哥，1957)都作了充分论述。埃萨吉雷所著的《奥希金斯》(第6修订版，圣地亚哥，1965)是有关这位解放者最著称的现代传记。近年对智利独立的最重要的单项研究，是西蒙·科列尔所著的《1808—1833年智利独立的种种思想和政策》(坎布里奇，1967)。

852

如同厄瓜多尔作者一样，玻利维亚作者强调了1809年的洪达经验，但产生的持久价值不大。有关玻利维亚独立的最佳论著，仍然是查尔斯·阿纳德所著的《玻利共和国的出现》(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57)。关于巴拉圭的论著甚至还要少，论述阿蒂加斯的乌拉圭著作固然很丰富，但多少有点单调。一个荣幸的例外，就是露西亚·萨拉·德·托龙、纳尔逊·德·拉·托雷和胡利奥·C·罗德里格斯合著的《1811—1820年阿蒂加斯及其土地革命》

（墨西哥，1978）对阿蒂加斯的社会和土地政策所进行的考察。这部著作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反映了作者勤奋的纪实的调研成果。同样有价值的，是约翰·斯特里特所著的《阿蒂加斯与乌拉圭的解放》（坎布里奇，1959）。但是总的说来，对阿根廷独立的论述仍然最为充分。在本世纪前半叶，由米特里开创的传统曾被诸如里卡多·莱韦内这样的人物有力地继续下去，莱韦内在他的《关于五月革命和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历史杂文》(第4版，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就是这样做的。右翼和左翼修正主义思想过多，例如，鲁道夫·普伊赫罗斯所著的《五月革命的领袖》（第2修订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对文化发展的充分而及时的论述例如，奥斯卡F·乌尔基萨·阿尔曼多斯所著的《通过1810至1820年的定期报纸来了解布宜诺斯艾利的文化》(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和对经济政策的充分而及时的论述例如，塞尔希奥·巴古所著的《里瓦达集团执政时期(1811—1827)的经济计划》（罗萨里奥，1966）；以及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所著的《革命时期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坎布里奇，1975），这本书的标题本身表明研究的广度在大部分旧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由于上述几种因素而使近期论述阿根廷独立的作品丰富了。

对社会结盟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分析虽然还不是在西班牙美洲独立问题上所完成的成果的主要倾向，但事实上这一分析吸引了人数越来越多的学者。查尔斯·格里芬的先锋小品文《独立时代社会和经济主题》（加拉加斯，1962)提供一个简短的介绍。关于社会一经济方面，有一些很好的专门化研究，其中的一、两项研究前面已经援引了，还有若干启发性的文章，诸如玛丽·L·费尔斯蒂勒的文章《智利独立运动中的亲属政治》，载HAHR，56/1 853
(1976)第58—80页。费尔斯蒂勒在精英行为的问题上同霍尔珀林-唐伊有着共同的兴趣。根据定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某种的社会一经济重点，他们当中一些人也撰写了有关独立的著述。但是除了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在他的《博韦斯及其历史行动

的社会一经济方面（第2修订版，加拉加斯，1968），和《委内瑞拉殖民地社会的危机》（加拉加斯，1976），乌拉圭对阿蒂加斯农业民众主义思想的再发现者，和曼弗雷德·科索科的《1789至1830年革命周期：比较革命史课题评论》，载《国家、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6(1969)，第211—38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要倾向于，要么提出机械经济宿命论，要么作出宣传努力以便为了当前事业把玻利瓦尔和类似的英雄们争取过去。当然，在后者方面，他们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不乏同伴。除了格里芬外，也没有打破地理界限提出对独立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总看法。

比较容易得到大陆上对教会立场的全面看法的资料，如鲁文·巴尔加斯·乌加特所著的《南美解放时代的主教》（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和佩德罗·莱图里亚所著的《罗马教廷和西班牙美洲之间的关系》（3卷集，罗马，1959—60），后一著述是对西班牙美洲和梵蒂冈研究的重大奉献，其中有2卷专门论述独立时期。后一本著作主要论述对外关系领域，其大部分篇幅几乎必然是将面对外界列强的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论述。

4. 巴西的独立

有关1808—31年整个时期的第一部编年史（重点固然是1821—31年），是约翰·阿米蒂奇所著的《从1808年布拉甘萨家族的到达到1831年唐佩德罗一世的退位这段巴西史》，1836年出版于伦敦，作者当时还只有29岁，1928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商人前往里约热内卢。阿米蒂奇的这部历史著作为巴西独立时期的每一位历史学家所使用并获得公正的赞扬，该书本打算作为罗伯特·索锡的不朽著作《巴西史(1810—19)》的续集，后者是殖民地时期的第一部巴西通史。在许多当代的论著中，最知名，最有价值的论著也许是玛丽亚·格雷厄姆所写的《1821、1822和1823年的部分时间航行和居留巴西日志》（伦敦，1924）。作者从1821年9月至1822年3月，后来又从1823年3月至10月在巴西居住，也就是说，

紧接着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这段时间在巴西居住。研究唐若昂在巴西居住这段时期(1808—21年)所必不可少的，是路易斯·贡萨尔维斯·多斯·桑托斯〔1767—1844〕所著的《服务于巴西王室史的回忆录》〔1825〕(2卷集，里约热内卢，1943)。

关于巴西独立的传统编年史，主要有四部巨著，这些巨著基本上都详尽地论述各种政治事件，它们是：弗朗西斯科·阿道弗·德·瓦恩哈根著《巴西独立史》(里约热内卢，1917)；马诺埃尔·德·奥利韦拉·利马著《唐若昂六世在巴西(1808—21)》(1909，第2版，3卷集，里约热内卢，1945)，是对里约巴西宫廷的典型研究，和《独立运动》(圣保罗，1922)；以及托比亚内·多·雷戈·豪泰罗著《帝国史。独立的精心制作》(里约热内卢，1927)。有关巴伊亚的独立史，有布拉兹·多·阿马拉尔所著的《巴伊亚独立史》(萨尔瓦多，1923)。

卡约·普拉多·胡尼奥尔是第一位分析导致巴西独立进程中的内部紧张关系，和矛盾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参阅《巴西政治演变》(圣保罗，1933年和后来的许多版本)；《当代巴西的形式：殖民地》(圣保罗，1963)，已翻译成《现代巴西的殖民地背景》(伯克利，1967)；和为摹真版本的《塔莫伊奥》(圣保罗，1944)写的序。奥克塔维奥·塔尔基尼奥·德·索萨所著的《何塞·博尼法西奥》(里约热内卢，1960)和《唐佩德罗一世的生活》(3卷集，第2版，里约热内卢，1954)是重要的传记。

在有关巴西独立的较近期综合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塞尔希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编的《巴西文明通史》，第2册，《君主制的巴西》，第1卷，《解放的进程》(圣保罗，1962)；卡洛斯·吉列尔梅·莫塔编《1822年的情况》(圣保罗，1972)；尤其是何塞·奥诺里奥·罗德里格斯著《独立：革命与反革命》(5卷集，里约热内卢，1975)；第1卷《政治演变；第2卷《经济和社会》；第3卷《武装部队》；第4卷《民族领袖》；第5卷《国际政治》。论述巴西独立的最重要，最引起争论的一篇文章，是埃米莉

娅·维奥蒂·达·科斯塔所著的《研究巴西政治解放的入门》，载卡洛斯·吉列尔梅·莫塔编《展望中的巴西》（圣保罗，1968）；修订的英文译本《巴西的政治解放》，载A·J·R·拉塞尔德编《从殖民地到国家。巴西独立文集》（巴尔的摩，1975）。并见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伦何塞·博尼法西奥的两篇文章：《何塞·博尼法西奥：神话和历史》，载《保罗博物馆编年史》，21(1967)，后经修改并转载于《从君主国到共和国：决定性时刻》（圣保罗，1977）；和《何塞·博尼法西奥：人与神话》，载莫塔编《1822年的情况》。弗朗西斯科C·法尔孔和伊尔马尔·罗洛夫·德·马托斯合著的关于里约热内卢独立运动的文章《里约热内卢的独立进程》（载莫塔编的《1822年的情况》）别有意思。关于巴伊亚的运动，参阅路易斯·亨里克·迪亚斯·塔瓦雷斯所著的《巴伊亚的巴西独立运动》（里约热内卢，1977），和F·W·O·莫顿所著的《1790—1840年保守的独立革命：巴伊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74）。

关于葡萄牙和巴西的关系和18世纪晚期巴西的发展，参阅芒叙-迪尼斯·席尔瓦所著的CHLA I，第13章和奥尔登所著的CHLA II，第15章。有关殖民地时期晚期，特别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巴西、葡萄牙和英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杰出近期著作，有费尔南多A·诺瓦伊斯所著的《在旧的殖民体系中的葡萄牙和巴西(1777—1808)》（圣保罗，1979）。有关贸易的平衡，还可参阅何塞·霍伯森·德·A·阿鲁达所著的《殖民地贸易中的巴西》（圣保罗，1981）。启蒙运动对殖民时代巴西的影响，由玛丽亚·奥迪拉·德·席尔瓦在《阐释巴西的特点》一文中进行了研究，该文载《巴西历史与地理杂志》278(1968)，第105—70页。并参阅卡洛斯·吉列尔梅·莫塔所著的《对巴西的革新态度(1789—1801)》（里斯本，1970）和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所著的《1724—1822年作为变革动因的知识分子和巴西的独立》，载拉塞尔-伍德编的《从殖民地到国家》。在肯尼斯R·马克斯韦尔所著的《1750

—1808年巴西和葡萄牙的冲突和密谋》（坎布里奇，1973）一书中，可以找到有关《矿工的不信任(1788—89)》这一最佳研究成果。并参阅马克斯韦尔写的论文《18世纪90年代的一代人和葡萄牙-巴西帝国这一思想》，载多里尔·奥尔登所编的《现代巴西的殖民根源》（伯克利，1973）。有若干关于《巴伊亚的不信任(1798)》的研究著述：路易斯·亨里克·迪亚斯·塔瓦雷所著《1798年巴伊亚预期煽动叛乱的历史：裁缝的密谋》（圣保罗，1975）；阿方索·鲁伊著《1798年巴西第一次社会革命》（第2版，萨尔瓦多，1951）；卡蒂亚·玛丽亚·德·凯罗斯·马托索著《法国对1798年巴伊亚民主运动的影响》（萨尔瓦多，1969）；和摩顿所著的《保守派的革命》一书的第4章。还有何塞·若阿金·达·库尼亚·德·阿泽雷多·科蒂纽的现代版《经济文集》，塞尔希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写的序（圣保罗，1966）。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参阅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所著的《阿泽雷多·科索纽在巴西启蒙运动中的作用》，载HAHR，44/2(1964)，第145—60页。

856

葡萄牙宫庭从里斯本转移到里约热内卢(1807—08)一事，在下述著作中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艾伦K·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它的兴衰》（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33），第3章；《葡萄牙宫廷转移到里约热内卢》，载亨利H·基斯和S·F·爱德华兹合编的《巴西社会的冲突和连续性》（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1969）；和《1808-1821年巴西官僚统治的发展》，载JLAS，4/1(1972)。关于巴西港口对外国贸易开放(1808年)，除了曼彻斯特的《英国的突出地位。它的兴衰》外，还可参阅曼努埃尔·平托·德·阿吉亚尔所著的《港口的开放。凯鲁与英国人》（萨尔瓦多，1960）和何塞·万德利·德·阿劳若·皮尼奥所著的《港口的开放——凯鲁》，载《巴西历史和地理研究所杂志》，243页(1959年4—6月)。曼彻斯特的《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它的兴衰》依然是论述1810年英—葡条约和葡萄牙在东岸地区的扩

张主义的最佳研究著述。尼西亚·比莱拉·卢斯的《1808—1930年争取巴西工业化的斗争》（圣保罗，1961）和艾丽斯P·卡纳布拉瓦所著的《巴西D·若昂六世时期的制造业和工业》，载：路易易斯·皮利亚等编《文化交流的开拓经验》（阿雷格里港，1963），对鼓励巴西工业发展的早期尝试进行了研究。法国艺术使团是阿丰索·德斯克拉格诺列·陶奈所著的《1816年艺术使团》（里约热内卢，1956；巴西利亚，1983）的研究课题。有关伯南布哥1817年革命的唯一现代研究著述是卡洛斯·吉列尔梅·莫塔所著的《1817年的东北。结构和论据》（圣保罗，1972），该书集中精力于这一斗争的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有助益的，是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弗朗西斯科·穆尼斯·塔瓦雷斯的论著《1817年伯南布哥革命史》（第3版，累西腓，1917）。关于这个时期的武装部队，除了罗德里格斯所著的《独立》一书第3卷外，还有一部F.W.O莫顿有关巴伊亚的有兴趣的实例研究著述《1800—21年巴伊亚的军人和社会》，载JLAS，7/2(1975)。巴西议会，特别是巴西代议制的作用，是以下两篇论文的主题：乔治C·A·博赫雷尔所著的《巴西代表从里斯本的吉拉斯议会的溃逃》，载HAHR，40/4(1960)，第497—512页，和费尔南多·托马斯所著的《1821—1822年巴西制定议会》，载莫塔编的《1822年的情况》。有关立宪会议的更近期著作是何塞·奥诺里奥·罗德里格斯所著的《1823年的制定》（废特罗普利斯，1974）。莱斯利·贝瑟尔所著的《巴西奴隶贸易的佩除》（剑桥，1970）第一、二章，对继续奴隶买卖和巴西独立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参阅他的文章《巴西独立和巴西奴隶买卖的废除：1822—1826年英国—巴西关系》，载JLAS，1/2(1969)。关于英国—巴西总的关系和英国承认巴西的独立，曼彻斯特所著的《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它的兴衰》，仍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佳作。但还可参阅卡约·德·弗雷塔斯所著的《乔治·坎宁和巴西》（2卷集，圣保罗，1960）。

857

5. 国际政治与拉丁美洲的独立

有关独立时期英国同拉美关系的基本资料来源，是C·K·韦伯斯特所编的《1812—1830年英国与拉美的独立：选自英国外交部档案的文献》（2卷集，伦敦，1938；再版，纽约，1970），该书序言对英国政策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全面看法。下述著作对整个独立时期的相继阶段作了更详尽的探讨：J·林奇著《1783—1808年英国政策与西班牙美洲》，载JLAS，1（1969）；C·M·克劳利著《法国和英国对加的斯议会的影响（1810—1814）》，载《剑桥历史杂志》6（1939）；J·顿乔德著《1811—1813年英国调解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争端》，载HAHR，21（1941）；C·K·韦伯斯特著《1812—1815年卡斯尔雷的对外政策》（伦敦，1931）和《1815—1822年卡斯尔雷的对外政策》（第2版，伦敦，1934），以及H·坦帕利著《1822—1827年坎宁的外交政策》（伦敦，1925；再版，伦敦，1966）。莱斯利·贝瑟尔所著的《乔治·坎宁和拉美的解放》（西班牙和葡萄牙巴西理事会，伦敦，1970），对坎宁的作用给予简短的重新评价。W·W·考夫曼所著的《1804—1828年英国政策与拉美的独立》（纽黑文，1951；再版，伦曼，1967），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对整个时期作出有趣的，别具风格的解释。

下述著作对英国的贸易关系作了研讨：D·B·戈贝尔著《1796—1823年英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载《美洲历史评论》，43（1938）；R·A·汉弗莱斯著《英国商人与南美的独立》，载《英国研究院会议录》，51（1965）；J·F·里庇著《拉丁美洲与19世20年代英国投资"热"》，载《现代历史杂志》，19（1947）；D·C·M·普拉特所著的《1806—1914年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伦敦，1972）一书的一部分。上述文献记载于R·A·汉弗莱斯所编的《1824—1826年英国领事馆关于拉丁美洲贸易和政治报告》（卡姆登学会，第3辑，第53卷，伦敦，1940）。

各地实施英国在南半球的政策的情况，可以通过挑选出来的 858

英国海军司令发出的电讯加以探究。这些电讯已刊印在G·S·格雷厄姆和R·A·汉弗莱斯合编的《1807—1823年海军与南美》，海军档案学会出版物，第104卷(伦敦，1962)。有关英国同巴西和阿根廷的种种活动可以在下述著作中进行探索：A·K·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它的兴衰》(北卡罗莱纳州查佩尔希尔，1933；再版，纽约，1964)的前几章；莱斯利·贝瑟尔著《巴西废除奴隶买卖：1807—1869年英国，巴西和奴隶买卖问题》(剑桥，1970)；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和阿根廷》(牛津，1960)；V·B·雷伯著《1810—1880年英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9)；J·斯特里特著《1808—1815年斯特朗福特和拉普拉塔河地区》，载HAHR，33(1953)；J.C·J·梅特福特著《英国承认拉普拉塔河联合省》和《英国和拉普拉塔河联合省的1825年条约》，载《西班牙语国家研究公报》29(1952)和30(1953)。

用英文撰写的论述南美洲北部的著作不多，但在C·帕拉-佩雷斯编的《欧洲国家外交部论述委内瑞拉独立文献集》(2卷集，加拉加斯，1962)和C·L·门多萨所著的《早期委内瑞拉外交使团》(2卷集，加拉加斯)，刊印了用西班牙文翻译的英国档案馆的资料。在卡洛斯·皮·苏涅尔所著的《独立运动的显贵胡安·罗伯逊将军》(加拉加斯，1971)中，有许多有关英国在地方一级的关系的情报，同一位作者所写的《美洲的爱国者在伦敦》(加拉加斯，1978)有大量有关英国在大都市一级的关系的资料。D·A·G·沃德尔的《英国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独立》(加拉加斯，1983)，是一部有关英国当局与爱国者和保皇主义者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著作。

正如墨西哥同欧洲其他强国早期打交道的论述一样，海梅E·罗德里格斯O.所写的《西班牙美洲的出现：维森特·罗卡富埃尔特和西班牙美洲主义(1808—1832)》(伯克利，1975)一书，根据墨西哥档案资料研讨了英国同墨西哥的多次谈判。在J·赖乔德

的《外国在新西班牙独立中的利益》(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35；再版，纽约，1972)一书中，对1810年之前的时期进行了探究。

在W·R·曼宁编的《美国关于拉美国家取得独立的外交通信》(3卷集，纽约，1925)中，有与美国关系方面充分的文献记载，A·P·惠特克的《1800—1830年美国和拉美的独立》(巴尔的摩，1941；再版，纽约，1962)对美国关系作了全面探讨。C·C·格里芬所著的《1810—1822年美国与西班牙帝国的分裂》(纽约，1937；再版，1968)，对研究美国同西班牙的关系是有价值的。D·珀金所著的《1823—1826年门罗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27)仍然是这一课题的佳作，然而E·R·梅的《门罗主义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一书将新的重点放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上。美国同个别拉美国家的关系可以在下述著述中加以探究：W·R·曼宁的《美国和墨西哥早期外交关系》(巴尔的摩，1916；再版，纽约，1968)；E·B·比林斯利的《保卫中立权：美国海军与智利和秘鲁的独立战争》(北卡罗莱纳州查佩尔希尔，1967)；H·F·彼得森的《1810—1960年阿根廷和美国》(纽约，1964)一书中的有关章节；L·F·希尔的《巴西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32；再版，纽约，1969)；以及E·T·帕克斯的《1765—1934年哥伦比亚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35；再版，纽约，1968)，

J·F·里庇的《1808—1830年美国和英国在拉美的竞争》(巴尔的摩，1929；再版，纽约，1972)对英—美竞争作了地方一级的调研；B·帕金斯的《卡斯尔雷和亚当斯：英国与美国(1812—1823)》(伯克利，1964)对英—美竞争作了大都市一级的调研；R·A·汉弗莱斯所著的《英—美竞争和西班牙美洲的解放》，载《皇家历史学会学报》，第5辑，16(1966)，是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论文。

论述法国政策的标准著作是W·S·罗伯逊所著的《法国与拉

美的独立》(巴尔的摩，1939；第2版，纽约，1967)。H·坦珀利的《1820—25年法国对西班牙美洲的图谋》论述一个引起争论的时期，载《英国历史评论》40(1925)。R·H.巴特利所著的《1808—1828年帝俄和拉美争取独立的斗争》(奥斯汀，1978)，是对俄国关系的一项近期研究课题。M·科索克的《神圣同盟史与拉丁美洲的解放》(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对中欧列强的政策作了充分报道，K·W·克尔纳的《西班牙美洲的独立与德国外交》(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对此也作了阐述，该书附有欧洲的各种档案文献。W·S·罗伯逊的《梅特涅对拉丁美洲革命的态度》，载HAHR，21(1961)，提供一些基本事实。J·L·米查姆所著的《罗马教皇统治与西班牙美洲的独立》，是一部简明的通论，载HAHR，9(1929)。

860

6. 海地和圣多明各(1790—1870)

在当代出版的作品中，梅代里克L·E·莫罗·德·圣梅里所著的《圣多明各岛法国部分的地形、自然、公民、政治和历史的说明》(2卷集，费城，1797—98；3卷集，巴黎，1958)和布赖恩·爱德华兹所著的《圣多明各岛法国殖民地历史综述》(伦敦，1797)，对法国革命之前圣多明各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最全面的看法。有关海地革命的最佳和最全面的著作，仍然是C·L·R·詹姆斯的《黑人雅各宾派：杜桑·卢维杜尔与圣多明各革命》(纽约，1938；第2修订版，1963)，其他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作品包括何塞·L·佛朗哥的《海地革命史》(哈瓦那，1966)和T·O·奥特的《1789—1804海地革命》(诺克斯维尔，1973)。由于刊载种族主义内容而现已不合于时尚，但仍保有一定影响的书，就是T·洛思罗普·斯托达德的《法国革命在圣多明各》(波士顿，1914；再版，1982)。在写杜桑·卢维杜尔的许多传记中，有两部传记现在是经典著作，即维克托·舍尔谢的《杜桑-卢维杜尔的生活》(巴黎，1889)和雷勒斯·保罗·桑浓的

《杜桑-卢维杜尔的历史》(3卷集，太子港，1920—33)。关于海地革命的军事方面，有一些大不相同的论述。一种有利于杜桑的论述是阿尔弗雷德·内穆尔所著的《圣多明各独立战争的军事史》(2卷集，巴黎，1925—28)。从法国人观点写的，有亨利·德·普延-贝利斯莱的《圣多明各革命军事史》(巴黎，1899)，从西班牙人观点写的，有安东尼奥·德尔·蒙特-特赫达的《圣多明各史》，第3和4卷(圣多明各，1890—92)；从英国人观点写的，有约翰·福蒂斯丘爵士的《英国军队史》第4卷(伦敦，1906)。一部重要的近期研究著作是戴维P·格古斯所著的《奴隶制，战争与革命。1793—1798年英国占领圣多明各》(牛津，1982)。

有关海地革命对西班牙的圣多明各的影响，若干著作值得一提。比如说，可参阅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德莫里西编的《圣多明各割让给法国》(特鲁希略城，1958)和《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时代》(特鲁希略城，1955)，华金·马里诺·因乔斯特吉·卡夫拉尔编《供研究的文献：时代范畴和圣多明各西班牙部分1795年巴西莱亚条约的问题》(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和曼努埃尔·阿图罗·佩尼亚·罗特列著《巴西莱亚条约》(特鲁希略城，1952)。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德莫里西编的《1801、1805和1822年海地的入侵》(特鲁希略城，1955)，论述了海地对圣多明各的入侵。有关西班牙为收复1795年割让给法国的那部分圣多明各所作出的努力，参阅米格尔·阿托拉著《1808—1809年重新征服圣多明各之战》，载《西印度群岛评论》，11(1951)，第447—84页。有关圣多明各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现代综述，参阅弗兰克·莫亚·庞斯的《圣多明各殖民史》(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1974)。 86上

这个时期访问该岛的若干英国人和美国人按年代对独立之后法国的演变作了记述。其中4部论著依然是当代有关这个时期的可靠资料来源。它们是：乔纳森·布朗著《圣多明各史和现况》(2卷集，费城，1837；再版，伦敦，1972)，该书对海地社会风

俗和海地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充分报道，布朗经过考虑将海地政治制度称为“由刺刀支撑的共和君主制”；约翰·坎德勒著《对海地的短评，海地的环境，资源及前景》（伦敦，1842；再版，伦敦，1972），该书包含有关布瓦耶政府的有价值的资料；詹姆斯·弗兰克林著《海地(圣多明各)现状》（伦敦，1828；再版，伦敦，1972），该书对佩蒂翁和克里斯托夫时代海地经济与农业的演变作了极好的评价；最后是查尔斯·麦肯齐的《居住海地共和国期间对海地作的笔记》（2卷集，伦敦，1830；再版，伦敦，1972），该书包括作者1826—1827年在海地任英国领事时收集的评论，作者对该岛两部分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提出有用的统计资料和开明的见解。海地对其早期独立史的传统论述，可以在博布兰·阿杜安的不朽著作《海地史的研究》（11卷集，巴黎，1853—60；第2版，太子港，1958）中找到；该著作对了解布瓦耶政权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为它反映官方的观点和海地穆拉托精英的思想。现代著作不多，但可参阅休伯特·科尔的《海地国王克里斯托夫》（纽约，1967）；莱斯利·F·马尼加特的《1807—1818年亚历山大·佩蒂翁政府的农业政策》（太子港，1962）；戴维·尼科尔斯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自主。海地的经验》（蒙特利尔，1974）和《海地农村抗议和农民反叛(1804—1869)》，载《M·克罗斯和A·马克斯合编的《加勒比地区的农民，种植园和农村社会》（吉尔福德和莱顿，1979），第29—53页。并参阅伯努瓦·若阿基姆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来源于他的论文《1825—1874年法国同海地关系的基本方面：新殖民主义在试验中》（未发表的论文，巴黎大学，1968），特别是《法国对海地的调查研究(1825)：新型的国际关系的诞生》，载《现代与当代历史》，22(1975)，第369—96页，《圣多明各的殖民补偿和遣犯问题》，载《历史评论》，246(1971)，第359—76页，和《贸易与非殖民化：19世纪法国—海地经验》，载《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27(1972)，第1497—1525页。

862

多米尼加有关这个时期的传统论述可以在何塞·加夫列尔·加西亚所著的《圣多明各历史简编》(4卷集，圣多明各，1893—1906)的第2、3卷中找到。海地在布朗耶统治时期对圣多明各的占领，是弗兰克·莫亚·庞斯所著的《1822—1844年海地的统治》(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1973)一书的主题。莫亚·庞斯对布耶瓦曾试图在原西班牙部分的农业结构中实行变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对那些年代穆拉托政府的农业政策所造成的海地农业的衰退进行了研究。有关布耶瓦的倒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告独立的事宜，有下述当代的研究著作：托马·马迪乌的《1843—1846年海地史》(4卷集，太子港，1847—48和1904)和罗穆亚尔德·勒佩勒捷·德·圣雷米的《圣多明各，研究海地问题和新的解放办法》(2卷集，巴黎，1846；圣多明各，1978)。并见H·保勒乌·桑浓的《关于1843年革命的历史评论》(海地，列凯，1905)。1843—44年的事件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发表的数以百计的文章的主题，但是我们仍然缺乏为总结发表在若干文献集的资料所需要的重大综合叙述，特别是埃米利奥·罗德是格斯·德莫里西所著的《1843年革命：研究这一革命的札记和文献》，载《国家总档案公报》，25—6(1943)和《法国领事在圣多明各的通信》(2卷集，特鲁希略城，1944—47)，以及《勒瓦瑟和其他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相关的法国机构的通信》(特鲁希略城，1944)这些是多米尼加政府在独立100周年之际发表的。

有关1843年之后的海地政府以及特别是论述福斯坦·苏卢克的，居斯塔夫所著的《苏卢克皇帝及其帝国》(巴黎，1856)仍然是有助益的，但是应当慎重使用，据报道说，该书实际上是法国驻海地总领事马克西姆·雷博的著作。斯潘塞·白金汉·圣约翰爵士所著的《海地或黑人共和国》(伦敦，1884；多版，1972)对19世纪下半叶海地经济作了资料很丰富的说明，虽然该书的观点全然是反对海地的。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德莫里西出版了一长系列的文献，论述1844年后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一海地

863

关系，其中有些卷集附有重要的序言；最有助益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文献》（3卷集，特鲁希略城，1944—47），《多米尼加—海地之战》（特鲁希略城，1957），《兼并到西班牙的背景》（特鲁希略城，1955），和《多米尼加—西班牙关系（1844—1859）》（特鲁希略城，1955）。弗兰克·莫亚·庞斯在《关于第一共和国期间多米尼加经济的数据》，载《埃梅-埃梅多米尼加研究》，4（1976），根据那个时期英国领事的报告，设想了独立后年代圣多明各的经济演变情况。关于西班牙兼并圣多明各和海地对此事的反应，可参阅拉蒙·冈萨雷斯·塔夫拉斯所著的《统治的历史和西班牙在圣多明各的最后一战》（马德里，1870），是曾在圣多明各服役的西班牙陆军军官写的（危急的）战争回忆录，以及根据在圣多明各"复辟战争"期间西班牙军队司令员何塞·德·拉·甘达拉-纳瓦罗所写的《吞并与圣多明各战争》（2卷集，马德里，1884）。格雷戈里奥·卢佩龙所著的《自传摘记和历史札记》（1895—96；3卷集，圣地尼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1939）说明多米尼加人对这个时期的看法，是反对西班牙人的斗争中杰出的将军之一的著作。请参阅战争的另一参与者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奥夫希奥所著的《格雷戈里奥·卢佩龙和复辟史》（2卷集，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1939）。佩德罗·玛丽亚·阿尔尚博所写的《复辟史》（巴黎，1938），是一部有关这场战争的现代的，然而"传统的"论述。比较近期的和令人满意的论著是海梅·德·赫苏斯·多明格斯所著的《1861—1863年圣多明各兼吞到西班牙》（圣多明各，1979）。有关19世纪下半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哈里·赫埃廷克所著的《1850—1900多米尼加人民·历史社会学札记》（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列罗斯，1972），对当时发生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变化作了明智考察。该书的英译本题名为《1850—1900年多米尼加人民》（巴尔的摩，1982）。

要么是因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相对面积，要么是因为该岛的编年史工作处于早期状态，要么也许是因为有关某些时期的文献

记载仍然不足，有关海地和圣多明各历史的最佳论述往往是在通常著作的范围内出现的，而这些著作的书名不应使读者误以为这些著作的论述很肤浅。比如说，詹姆斯G·利伯恩所著的《海地人民》（纽黑文，1941；修订版，1966，附有W·明茨写的长篇序言和最新文献目录），作为研究海地社会最佳的民族一历史指南，还未被别的著作所超过。还可参阅杰出的海地知识分子当泰·贝

864

于多米尼加人不希望统一到海地而对多米尼加人表示强烈不满这一情绪的支配下所作的解释。雷福德W·洛根所著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伦敦，1968）提供了有兴趣的准确的综述，但缺乏作者早期论述美国一海地关系所表现的才华。

7. 从18世纪中叶到1870年前后的古巴

休·托马斯著《古巴或追求自由》（伦敦，1971）是一部自1762年以来的古巴通史。雷蒙德·卡尔著《1808—1939年的西班牙》（牛津，1966）是这一时期最好的西班牙通史。菲利普·福纳著《古巴及其对美国关系史》（2卷集，纽约，1962—1963）是一部带有20世纪罪恶色彩的美国和古巴到1895年的关系史。拉米罗·格拉-桑切斯著《加勒比的食糖与社会：古巴农业经济史》，马乔里·乌尔基迪译（纽里文，1964）和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著《古巴的对偶：烟草与食糖》，哈里特·德·奥尼斯译（纽约，1947），是伟大的古巴作家所写的光辉的和有启发性的文章。H·S·艾梅斯著《1511—1868年古巴奴隶制史》（纽约，1907）是一个北美历史学家所写的一部独具匠心的、虽说有时使人误解的学术著作。罗兰·伊利著《当陛下统治糖的时候：对一出拉美悲剧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这是主要根据德雷克和特里家族的事件重写历史的主要著作，和富兰克林·W·奈特著《19世纪古巴的奴隶社会》（麦迪逊，1970）对种植园主社会有很好的分析。还参阅奈特最近的一篇文章《1750—1850年古巴的财实起源与食糖革命》，载HAHR，57/2（1977），第236—253页。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著《蔗糖厂：第I部分》（哈瓦那，1964），英译本《蔗糖厂，1760—1860年古巴食糖的社会经济联合体（纽约，1976）从技术观点极好地研究了食糖工业。戴维·默里著《丑恶的买卖：英国、西班牙和古巴奴隶贸易的废除》（剑桥，1980）充分叙述了19世纪古巴奴隶贸易及其废除情况，同时阿瑟·F·科温著《1817—1886年西班牙和奴隶制在古巴的废

除（奥斯汀，1967）分析了西班牙方面废除奴隶买卖和奴隶制的情况。还参阅劳尔·塞佩罗·博尼利亚著《食糖与奴隶制的废除》（哈瓦那，1948）。最近研究古巴奴隶制的其他作品有：赫伯特·克莱因著《美洲的奴隶制：对弗吉尼亚和古巴的比较研究》（芝加哥，1967）——它受一种倾向之害，就是认为西班牙关于奴隶的法律是说话算数的——格温多林·霍尔著《奴隶种植园社会的社会控制：圣多明克与古巴的比较》（巴尔的摩，1971），贝雷纳·马丁内斯-阿列尔著《19世纪古巴的婚姻、阶级与肤色。关于一个奴隶社会中的种族态度和性价值的研究》（剑桥，1974）和佩雷斯·德·拉·里瓦著《货栈。古巴的奴隶制度与资本主义》（巴塞罗那，1978）。关于19世纪中叶美国对古巴的态度，除了福纳外，参阅巴兹尔·劳赫著《1848—1855年美国在古巴的利益》（纽约，1948）和罗伯特·E·梅著《1854—1861年一个加勒比帝国的南方梦》（巴吞鲁日，1973）。

8. 独立后西班牙语美洲的经济与社会 866

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合编的《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1977），是一部现存的补充文献的综合概览，它集中叙述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的情况。西罗·F·S·卡多索和埃克托尔·佩雷思·希里尼奥利合著的《拉丁美洲经济史》（两卷集，巴塞罗那，1979），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全面的经济史，它包括有价值的关于独立后时期的一章（第2卷，第11章）。也可参阅图略·阿尔佩林·东吉著《拉丁美洲现代史》（马德里，1969），第3章和4章以及《拉丁美洲革命的后果》（纽约，1973），特别是第2章。

关于独立后时期新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商业和金融关系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著：例如，D·C·M·普拉特著《1806—1914年拉丁美洲与英国的贸易》（伦敦，1973），利芝·H·詹克斯著《至1875年英国资本的流动》（纽约，1927；伦敦再

版，1971），和J·弗雷德·里庇著《1822—1949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明尼阿波利斯，1959）。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著《商业与殖民危机，一个独立的神话》（圣地亚哥，1968），研究了智利的情况，将普拉特对伴随着政治解放而来的贸易开放的真正影响的怀疑主义观点推向极端，这种观点不仅限于智利人。

总之，无论如何，在这个时期中对国别或地区层次的研究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即一般研究皆受到依附或反依附的主题的鼓舞，在最近十年中这方面材料如此丰富，以至一般研究论著的注意力集中于殖民时期或1870年以后的时期。例如，下面的著作就是这种情况，斯坦利和巴巴拉·斯坦著《拉丁美洲的殖民遗产》（纽约，1970），或马塞洛·卡马纳尼著《一个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危机。从16世纪到现在的拉丁美洲》（墨西哥城，1976）。

关于独立战争对西属美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一份开拓性研究论著是查尔斯·C·格里芬著《西属美洲独立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载HAHR，29/2(1949)第170—187页，这篇论文经修改补充后写成《独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主题》（加拉加斯，

867 1962）。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著《为研究委内瑞拉农业问题的材料(1800—1830)》（加拉加斯，1964）研究了关于政治与军事危机对委内瑞拉农业社会的影响。关于乌拉克在L·S·德·托龙、N·德·拉·托雷和J·G·孟德里格斯的合著《阿蒂加斯人的农业革命》中（蒙得维的亚，1969）有所研究，此书有节本名为《1811—1820年阿蒂加斯及其农业革命》（墨西哥，1978）。路易斯·比略罗著《独立革命：历史的阐述随笔》（墨西哥，1953)的墨西哥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研究。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著《我们历史上的社会和经济的大冲突》（41卷集，波哥大，1966），中的有关部分以更武断的方式对哥伦比亚进行了研究。关于阿根廷，则在图略·阿尔佩林·东吉著《阿根廷在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伦敦，1975）一书中进行了研究。

R·A·汉弗莱编《1824—1826年英国领事关于拉丁美洲贸易与政治的报告》(伦敦，1940)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不同港口的形势，反映了对这些港口以及对一般来说直到最近仍然处于政治与军事危机中的新国家的影响。探索一个国家在商业和政治军事的双重危机影响下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的努力可在乔纳森·C·布朗所著《1776—1860年阿根廷的社会与经济史》(伦敦，1979)中找到。

对于独立后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政治的重建，最重要的写作成果再一次涉及到具体国家：大卫·布什内尔著《大哥伦比亚的桑坦德政权》(特拉华，纽瓦克，1954)，是对一个新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困难的典型研究，而这个新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决不仅仅限于哥伦比亚。迈伦·伯金著《1820—1852年阿根廷联邦的经济形势》，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6)，重新研究了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在胡安·阿尔瓦雷斯所著的《关于阿根廷内战的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14)中曾作多少有些印象主义的，但具有感性认识的研究。一份关于智利的同样是印象主义但实际得多的研究是由弗朗西斯科·恩西纳在一本书中提供的，此书注定了在国内外发挥值得注意的影响，书名为：《我们的经济劣势》(圣地亚哥，1911)。对于19世纪第2个1/4时期的社会变化的研究是很少的。约翰·V·隆巴尔迪著《1820—1854年》委内瑞拉黑奴制的衰落与废除》(康涅狄格韦斯特波特，1971)，是值得提到的；还有关于墨西哥，琼·迈耶著《农民问题与土地混乱状况(1821—1910)》(墨西哥，1973)。关于古巴，富兰克林·W·奈特著《19世纪古巴的奴隶社会》(麦迪逊，1970)，与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著《蔗糖厂》(哈瓦那，1964；英译本，《糖厂》，纽约，1978)，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旅行记载资料皆被列入伯纳德·内勒的著作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H·G·沃德著《墨西哥在1827年》(两卷，伦敦，1828)，这是由一个见闻广博的而感觉敏锐的——如果不能说是公正无私的话——观察者所进行的系统的研究。对于这方面还应该加上当地出生的作家的批 868

判性的分析论著：例如，何塞·安东尼奥·萨科的杰出的《关于古巴岛上的游荡生活的回忆》(哈瓦那，1832)，和马里亚诺·奥特罗著《关于在墨西哥共和国出现不安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真相杂文》(墨西哥1842)。关于1850年以后的时期和在西班牙语美洲新秩序的基础的著作是范围广泛的，但几乎是更为分散和杂乱。对整个拉丁美洲有内含关系的少数国别研究论著是值得一提的。如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所著的《秘鲁的海鸟粪肥与资产阶级》(利马，1974）这样一部关于在出口繁荣时期一个统治集团的形成的研究论著，正如这一时期全部秘鲁经验一样，无疑是一个例外：农民感受最深的新秩序的影响是T·G·鲍威尔所著《自由主义和墨西哥农民中部的农民（1850—1876)》(墨西哥，1974）和阿诺德·丁·鲍尔所著《从西班牙的征服到1930年的智利农村社会》(伦敦，1975)。的主题。前一部著作对农民与自由主义的最初倡导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比一般看法更少一些的否定观点。对自由主义改革的另一个方面，即没收教会的财产，在简·巴赞特所著的《1856—1875年》墨西哥教会财产的转让。自由主义革命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剑桥，1971)中进行了研究。弗兰克·萨福德著《实践者的理想：哥伦比亚为形成一个技术精英阶层而奋斗》(得克萨斯，奥斯汀1976)，提出了一种关于改良主义的微妙观点，这种观点把自己同自由主义的标准观点拉开了距离。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与阿根廷》(牛津，1960）提供了关于在一个国家中向铁路时代过渡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个国家所感受到的铁路的影响或许胜过其他任何事物。这个时期出现了关于这些新国家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详尽描述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按照阿戈斯蒂诺·科达西的一部开拓性的研究著作的思路而出现的，这

869 部著作出版于1842年。书名为《委内瑞拉的地理概貌》。在哥伦比亚，也是由科达西领导的“地理学委员会”出版了曼努埃尔·安西萨尔所著的《1850年和1851年在新格拉纳达北部省份最初的长途旅行》(波哥大，1853)。在秘鲁，有意大利地理学家安东尼奥·雷蒙

迪的不朽著作《秘鲁》(3卷集，利马，1874—1880)；在智利，有法国植物学家克劳德·加伊的更加抱负不凡的著作《智利的物质和政治史》(巴黎—圣地亚哥，1844—1871)，其中有两卷是关于农业的，出版于1862年和1865年，这两卷尤其值得注意；在阿根廷，有让-安东-维克多·马丹·德·慕西所著的《阿根廷联邦的地理描述与统计》(3卷集，巴黎，1860—1873)。

关于个别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书目评论见CHLA第3卷书目评论第10—15节。

9. 独立后西班牙语美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

图略·阿尔佩林·东吉在所著的《拉丁美洲现代史》(马德里，1969)第3章和第4章及《拉丁美洲革命的后果》(纽约，1973)中对独立后的时期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深入见解。

关于所有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制宪的历史，连一部著作也没有。一本关于墨西哥早期制订宪法情况的重要著作是内蒂·李·本森所著的《省议会与墨西哥联邦制》(墨西哥，1955)，关于中美洲研究的一个最近贡献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所著的《1808—1826年中美洲的加的斯试验》(伯克利，1978)。大卫·布什内尔著《大哥伦比亚的桑坦德政权》(特拉华，纽瓦克，1954)是关于一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早期行政和政治构成的一本典型的专题著作。

关于19世纪拉丁美洲上层人物的思想意识的全面考察可在莱奥波尔多·塞亚所著的《拉丁美洲的精神》(俄克拉何马，诺曼，1949)一书中发现。某些通过论述特定国家来阐明整个拉丁美洲情况的著作包括，西蒙·科利尔著《1808—1833年智利独立的思想和政治》(剑桥，1967)；海梅·哈拉米略·乌里韦著《19世纪哥伦比亚人的思想》(波哥大，1964)；查尔斯·黑尔著《1821—1853年莫拉时代的墨西哥自由主义》(纽黑文，1968)。还可见海尔的另一篇令人感兴趣的论文《西班牙语美洲19世纪政治的重建：思想史

的一个实例》，载LARR8/2（1973）第53—73页。

关于19世纪中叶政治上的两极分化问题在黑尔所著的《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和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所著的《1848—1853年墨西哥政权的解剖》（墨西哥，1977）中对墨西哥的情况进行了论述，后者是一本结构松散的著作，但有丰富的可作参考的详细材料。关于哥伦比亚，见罗伯特·L·吉尔摩著《新格拉纳达的社会主义幻想》，载HAHR36/2（1956）第190—210页；赫尔曼·科梅纳雷斯著《政党与社会阶级》（波哥大，1968）；以及丁·莱昂·埃尔格拉著《哥伦比亚南部1851年革命的社会背景（1848—1851）》一文，载《哥伦比亚社会历史及文化年鉴》，5（1970），第53—63页。关于智利，见一本当代的论述，即本杰明·比库尼亚·麦肯纳著《1851年4月20日的征战史：圣地亚哥街头的战斗》（圣地亚哥，1878）和一本新近出版的专题著作，即路易斯·阿尔韦托·罗梅罗著《平等的社会。1820—1851年智利圣地亚哥的手工业工人及其最初的政治经验》（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870

关于政治结盟的社会与经济形势的有价值的著作是图略·阿尔佩林·东吉著《阿根廷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剑桥，1975）；迈伦·伯金著《1820—1852年阿根廷联邦主义的经济方面》（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6）；弗朗索瓦·希瓦里埃著《墨西哥的保守党与自由党：在法国干预下的独立时期的社会学和政治地理论文》，载《世界史手册》8（1964）第457—474页；大卫·A·布雷丁著《墨西哥民族主义的根源》（墨西哥，1973）。弗兰克·萨福德著《西班牙语美洲早期建立的共和国中的政治结盟的基础》一文载理查德·格雷厄姆和彼得·H·史密斯合编的《对拉丁美洲历史的新探讨》（得克萨斯，奥斯汀，1974），第71—111页，提出了关于这个题目的批判性评论。

关于西班牙语美洲政治中影响教会的若干问题，J·劳埃德·米查姆在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教会与国家》（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1934；第2版，1966）中提供了一份逐个国家的调查；该

书第一版提供了一些关于19世纪的材料，而在第2版中被删去了。关于研究教会在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的较为晚近的著作是迈克尔·科斯特济所著的《墨西哥教会的财富》(剑桥，1967）和简·巴赞特所著的《墨西哥教会财富的转让。1856—1873年自由党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剑桥，1971)。阿博尔德·鲍尔斯的更为广泛的分析论著《1765—1865年教会和西班牙语美洲的土地结构》，载《美洲杂志》28/1（1971)，清晰地发展了某些印在巴赞特著作中的思想。

关于考迪略主义有大量的著作，特别是如果把所有考迪略的传记都包括在内的话。对于上述许多著作，可参阅这个时期关于个别国家的书目评论。有关这种现象的一般分析可在下列著作中找到：查尔斯·E·查普曼著《考迪略的时代：西班牙语美洲史的一章》，载HAHR12/3（1932)，第281—300页；小休·M·哈米尔编《西班牙语美洲的独裁》(纽约，1965)；罗伯特·L·吉尔摩著《1810—1910年委内瑞拉的考迪略主义和军国主义》(俄亥俄，阿森斯，1964)；埃里克·R·沃尔夫和爱德华·C·汉森合著《考迪略政治：一项结构性分析》，载《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杂志9/2(1967)第168—179页；费尔南多·迪亚斯·迪亚斯著《考迪略与酋长》(墨西哥，1972)；和马尔科姆·德亚斯著《关于哥伦比亚酋长制的一些笔记》，载《西方杂志》63（1973）第118—140页。最有益的贡献之一是对单一实例的分析（阿根廷萨尔塔省的马丁·圭梅斯，即罗杰·里格著《一个考迪略的产生和控制》，载HAHR44/4（1964)，第481—490页。大多数对独立后时期政治不稳定情况的分析也涉及到考迪略主义。两部经典著作是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龙著《拉丁美洲的兴起和进步》(纽约，1913）和L·塞西尔·简著《西班牙语美洲的自由与专制主义》（伦敦，1929)。最重要的新近贡献是两篇论文：理查德·M·莫尔斯所著的《对西班牙语美洲政府的一种理论》，载《思想史杂志》15（1954)，第71—93页，和《拉丁美洲的传统》，收入路易斯

·哈茨所编的《新社会的建立》(纽约，1964)，第123—177页。

关于个别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可参阅CHLA第3卷书目评论第10—15页。

10. 从独立至1867年的墨西哥

埃内斯托·德·拉·托雷等合编的《墨西哥的文献史》(两卷集，墨西哥，1964）是一部重要的文献集。F·特纳·拉米雷斯编《1808—1973年墨西哥的基本法律》(第5次修订版，墨西哥，1973)，翻印了所有的宪法以其草案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和法令。关于从1800年至1852年前后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应该查阅L·查韦斯·奥罗斯科编的《墨西哥对外贸易史文献集》，此书分两辑：第一辑共7卷(墨西哥，1958—1962)；第2辑共4卷(墨西哥，1965—1967)；它涉及了此书名所表明的大得多的范围。关于华雷斯时代的文献可在下列书中找到：J·L·塔马约编《关于贝尼托·华雷斯的文献演说及书信》(14卷集，墨西哥，1964—1970)，和总统府秘书处编《华雷斯时代的公共行政管理》(三卷集，墨西哥，1973)。关于对外关系，可参阅L·迪瓦斯编《墨西哥的法文译文。1853—1867年外交情报》(四卷集，墨西哥，1963—1967)，和L·迪瓦斯编《1851—1867年墨西哥的法文译文。经济情报》(领事报告)(两卷集，墨西哥，1974)。

有若干综合性的著作，其中包含关于独立后时期墨西哥历史的有价值的论述。在较老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卢卡斯·阿拉曼著《1808—1849年墨西哥历史》(五卷集，墨西哥，第2版，1942—1948）第5卷；比森特·里瓦·帕拉西奥编《绵延若干世纪的墨西哥》(墨西哥，1889；复印版，墨西哥，1958）第4卷和第5卷；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阿兰戈伊斯著《从1808年至1867年的墨西哥》(四卷集，墨西哥，1871—1872；第2版，1974)。较近的著作路易斯·冈萨雷斯—冈萨雷斯编《墨西哥通史》(四卷集，墨西哥，墨西哥学院，1976)第3卷（1821—1910）和简·巴赞特著《从

伊达尔戈到卡德纳斯的墨西哥简明史》(剑桥，1977）第2章与第3章，提供了宝贵的综合。仍然有用的是胡斯托·西恩拉著《墨西哥人民的政治演变》，现有英文版，名为《墨西哥人民的政治演变》（得克萨斯，奥斯汀，1970)。 872

关于这个时期的特殊方面，查尔斯·A·哈尔著《1821—1853年莫拉时代墨西哥的自由主义》（纽黑文，1968）对研究各种思想是必需的。简·巴赞特著《1823—1946年墨西哥的外债史》（墨西哥，1968）取代了埃德加·特林顿的较老的著作《墨西哥及其外国债权人》（纽约，1930)。迈克尔·科斯特洛著《独立的墨西哥的教会与国家。关于1821—1857年神职授与权争论的研究》(伦敦，1978）是一部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杰出的研究著作。R·W·兰德尔著《里尔德尔蒙特，在墨西哥的一家英国采矿企业》(得克萨斯，奥斯汀，1972)，是少数有关采矿业的书籍之一。罗伯特·A·波塔什著《1821—1846年墨西哥的贷款银行》(墨西哥，1959)，是关于制造业与政府银行业历史的主要著作。关于尤卡坦种族战争的背景，有三篇很有研究的论文：霍华德·F·克莱因著《1821—1847年“尤卡坦半岛的曙光”和尤卡坦的事业精神》，载HAHR27(1947）第30—60页；《1825—1850年在尤卡坦的糖的插曲》，载《美洲经济事务》1/4（1948）第79—100页；《在尤卡坦的龙舌兰插曲》，载《美洲的经济事务》2/2(1948)第30—51页。也可参阅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种族与土地》(墨西哥，1970)，和N·里德著《尤卡坦的种族战争》(斯坦福，1964)。关于土地结构和阿西恩达的历史，可参阅查尔斯·H·哈里斯三世著《一个墨西哥家族帝国。1765—1867年桑切斯·纳瓦罗斯的大庄园》(得克萨斯，奥斯汀，1975)；简·巴赞特著《五个墨西哥的阿西恩达。1600—1910年在圣路易斯波托西三个世纪的农村生活》(墨西哥，1975)，该书部分章节的摘要被译为英文发表于K·邓肯和I·拉特利奇，合著的《拉丁美洲的土地与劳力。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论文

集》(剑桥，1977)；赫伯特·丁·尼克尔著《墨西哥阿西恩达的社会形态学》(威斯巴登，1978)，这是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最好的阿西恩达研究著作之一；大卫·A·布雷丁著《在墨西哥低洼地带的阿西恩达和牧场》(剑桥，1978)。最后，关于教会财产及其处置的困难问题方面，请参阅M·P·科斯特洛著(墨西哥的教会财产》(剑桥，1967)，和简·巴赞特著《墨西哥教会财产的转让。1856—1875年自由党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剑桥，1971；第2版译为西班牙文，书名为《墨西哥的教会财产》墨西哥，1977)。查尔斯·R·贝里著《1856—1876年瓦哈卡的改革自由党革命的一部微观史》(内布拉斯加，林肯，1981)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本详细的地873 区性研究著作。关于19世纪墨西哥的经济与社会史有两本论文集，即由西罗·F·S·卡多索所编的《19世纪墨西哥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墨西哥，1978)和19世纪的墨西哥(1821—1910)，经济与社会结构史》墨西哥，1980)。

关于1821—1835年时期，同时代的著述包括丁·波因塞特著《关于墨西哥的短论》(伦敦，1825)和H·G·沃德著《1827年的墨西哥》(两卷集，伦敦，1828)。根舍·凯勒著《墨西哥独立初期的军队和国家结构》(科隆，1969)，是一部关于由争取独立的游击战士与前保皇派军官合并组成墨西哥军队的开拓性研究著作。迈克尔·P·科斯特洛著《1824—1835年墨西哥第一个联邦共和国(墨西哥，1975)，是一本以报纸和小册子的研究为基础的关于政治党派的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R·弗洛里斯·C著《反革命：1804—1838年墨西哥独立运动中西班牙人的作用》(内布拉斯加，林肯，1974)；H·D·西姆斯著《1821—1828年墨西哥驱逐西班牙人的行动》(墨西哥，1974)，该书包含有价值的统计资料；及布赖恩·R·哈姆内特著《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革命与反革命》(墨西哥，1978)，论述了墨西哥独立初期的艰难岁月。

得克萨斯革命和墨西哥战争自然地受到了美国和墨西哥同时代与现代的历史学家的很大关注。请参阅R·S·里普利著《与墨

西哥的战争》(两卷集，纽约，1849，1970年重印)；R·阿尔卡拉斯等合著《另一边：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历史札记》(由A·C·拉姆齐翻译并编辑，纽约，1850)，在该书中有15位著名的墨西哥人描述了这次战争；卡洛斯·E·卡斯塔涅达编译《1836年得克萨斯革命的墨西哥一边》(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71)，该书包含了5位主要的墨西哥参加者的叙述，其中有圣安娜；J·F·拉米雷斯著《与美国作战期间的墨西哥》，由W·V·斯科尔斯主编，E·B·谢尔翻译(密苏里，哥伦比亚，1950)；G·M·布拉克著《1821—1846年墨西哥对命定扩张论的看法，一篇关于墨西哥战争起因的论文》(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1975)，这是一篇根据墨西哥报纸和小册子所提供的大量文献写成的表示同情的记述；查尔斯·H·布朗著《命定扩张论的代理人。海盗的生活和时代》(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1980)，这是一本对这些冒险家的非常有益的研究著作。

关于1848年以后的时期有两本研究圣安娜晚年的著作：F·迪亚斯·D著《考迪略和酋长》(墨西哥，1972)和M·冈萨雷斯·纳瓦罗著《1848—1853年对墨西哥政权的剖析》(墨西哥1977)。关于自由党政治，可参阅W·V·斯科尔斯著《1855—1872年华雷斯统治时期的墨西哥政治》(第2版，密苏里，哥伦比亚，1969) 874 和理查德·N·辛金著《1855—1876年墨西哥的改革。对自由党建国家主张的研究》(得克萨斯，奥斯汀，1979)；关于法国的干涉，J·A·达布斯著《1861—1867年在墨西哥的法国军队对军政府的研究》(海牙，1863)；以及关于帝国，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汉纳和凯瑟琳·阿比·汉纳合著《拿破仑三世与墨西哥。美国对君主政体的胜利》(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1971)。

若干政治传记是值得注意的：W·S·罗伯逊著《墨西哥的伊图尔维德》(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52)，此书是基于大量的档案材料写成的(亦可参阅《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回忆录》(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71)，J·E·罗德里格斯,O.著《西

班牙语美洲的出现》。《1808—1832年比森特·罗卡富尔特与西班牙语美洲主义》(伯克利，1975)，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厄瓜多尔自由党人的优秀传记，此人曾参加过建立墨西哥共和国的斗争；怀尔德雷德·H·考尔科特著《圣安娜》(俄克拉何马，诺曼，1936)和小O·L·琼斯著《圣安娜》(纽约，1968)，上述著作应与A·F·克劳福德所编的《鹰。《圣安娜自传》(奥斯汀，得克萨斯，1967)一起阅读，托马斯·E·科特纳著《1792—1854年何塞·华金·德·埃雷拉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得克萨斯，奥斯汀，1949)；弗兰克·A·纳普著《1823—1899年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的一生》(得克萨斯，奥斯汀，1951)和C·G·布拉斯克斯著《米格儿·莱尔多·德·特哈达》(墨西哥，1978)；小I·E·卡登黑德著《贝尼托·华雷斯》(纽约，1973)，该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较老的卷数多的由R·罗德所著的传记《华雷斯和他的墨西哥》(两卷集，纽约，1947)；也取代了由卡登黑德所著的《杰瑟斯·冈萨雷斯·奥尔特加与墨西哥国家政治》(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出版社，1972)；最后有琼·哈斯利普著《墨西哥的皇冠，马克西米利安及其皇后卡洛塔》(纽约，1971)，这是一部关于这两个悲剧人物的个人和政治的综合性传记。

11. 从独立到1870年左右的中美洲

拉萨罗·拉马德里著《自1821年以来危地马拉编史工作概览。第一部分—19世纪》，载TA8/2(1951)第189—202页；W·丁·格里菲斯著《自1830年以来中美洲的编史工作》，载HAHR 40/4(1960)第548—569页；和格里菲斯著《中美洲》，收入C·C·格里芬所编的《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奥斯汀，1971)第403—421页，从这些著作的比较中反映了20世纪中叶历史学出版物的迅速增长。以下的一篇论文* 主要是论述格里芬以后出版

* 原文如此，下文没有列出这篇论文的题目、作者和出处。——译者

的一些著作的。如果把这篇论文与上面提到的若干指南和在小R·L·伍德沃德所著的《中美洲，分裂的民族》(第2版，纽约，1985)第278—312页上的内容广泛的书目评论，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手册》的相应部分一起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益的。

虽然早期的一般著作继续有使用价值，伍德沃德著《中美洲》，与西罗·卡多索和赫克托·佩雷斯合著《中美洲与西方经济(1520—1930)》(圣何塞，1977)却收入了许多关于独立后头半个世纪的新近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有关经济与社会史方面的成果。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中美洲社会发展的解释》(圣何塞，1971)对新近出现的中美洲社会科学严肃的历史研究起了大部分激励作用。反映近期学术成果的个别国家的历史著作是很少的，但例外的是阿拉斯泰尔·怀特著《萨尔瓦多》(纽约，1973)；纳达·多布森著《伯利兹史》(伦敦，1973)；O·N·博兰著《一个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伯利兹从被征服到英国直辖殖民地》(巴尔的摩，1977)；和大卫·卢纳著《经济史手册》(圣萨尔瓦多，1971)。关于参考书，尽管在质量上不平衡，在新泽西州梅特琴出版的《历史词典》丛书是有用的：菲利普·弗莱米翁著《萨尔瓦多》(1972)；H·K·迈耶著《尼加拉瓜》(1973)和《洪都拉斯》；R.E.穆尔著《《危地马拉》修订版(1973)；和西奥多·克里曼著《哥斯达黎加》(1977)。《世界书目丛书》(牛津：克利奥出版社的最初几卷也是有用的：R·L·伍德沃德著《伯利兹》(1980)和《尼加拉瓜》(1983)，以伍德曼·富兰克林著《危地马拉》(1981)。

有若干新近的研究著作论述了独立后时期的一些具体方面：D·R·雷德尔著《尼加拉瓜西部的历史地理：1519—1965年在莱昂、格拉纳达及马那瓜的势力范围》(伯克利，1969)；大卫·布朗宁著《萨尔瓦多，景观与社会》(牛津，1971)；阿尔韦托·萨恩斯·M著《哥斯达黎加的农业史》(圣何塞，1976)；卡罗琳·霍尔著《咖啡和哥斯达黎加历史地理的发展》(圣何塞，1976)；康斯坦丁诺·拉斯卡里斯著《中美洲思想史》(圣何塞，1970)；卡洛斯·冈

萨雷斯著《危地马拉教育史》，第2版（危地马拉，1970）；奥托·奥利韦拉著《危地马拉期刊出版物中的文献：19世纪》（新奥尔良，1974）；阿图罗·卡斯蒂略著《洪都拉斯货币史》（特古西加尔巴，1974）；塞缪尔·斯通著《征服者们的王朝》（圣何塞，1975）；克莱托·冈萨雷斯·比凯斯著《一本关于哥斯达黎加金融史的书的若干章节》第2版（圣何塞，1977）；和小R·L·伍德沃德著《阶级特权与经济发展：1793—1871年危地马拉的商务领事馆》（圣何塞，1981），这一著作包含了1966年英文版中没有载入的大量文献附876录。在中美洲杂志上新近发表的以新的研究和新的方法论为根据的最值得注意的文章有：西罗·卡多索著《哥斯达黎加咖啡庄园的形成（19世纪）》，载ESC2/6（1973），第22—50页；卡洛斯·阿拉亚著《1824—1841年哥斯达黎加采矿业及其同资本积累和领导阶级的关系》，载ESC2/5（1973）第31—64页，和《1821—1843年哥斯达黎加的采矿业》，载《历史评论》（哥斯达黎加）1/2（1976）第83—125页；埃克托尔·佩雷斯著《19世纪洪都拉斯的经济与社会。人口统计的结构》，载ESC2/6（1973）第51—82页；吉列雷诺·莫利纳著《生产结构与人口统计的历史（洪都拉斯的经济与发展）》，载《中美洲研究年鉴》，3（1977）第161—173页；阿尔韦托·拉努萨著《尼加拉瓜：领土与人口（1821—1875）》，载《中美洲的思想评论》31/151（1976），第1—22页，《尼加拉瓜的对外贸易（1821—1875）》，载ESC5/14（1976）第109—136页，及《采矿业在尼加拉瓜（1821—1875）》，载《中美洲研究年鉴》3（1977）第215—224页。小R、L.伍德沃德曾在《中美洲国家独立后头半个世纪人口的增长》，载《中美洲》1/1（1980）第219—231页的一文中评论过这个时期关于人口统计历史的文献。尽管托马斯·斯库诺弗忽略了已经做过的一些工作，但他所写的《19世纪中美洲的商业和航运业活动：对数量探讨的资料来源》，载LARR1/2（1978）第157—169页还是对这个领域提供了某些指导。

在论述中美洲独立运动中机构设置问题的新近发表的著作

中，显然最重要的著作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著《1808—1826年中美洲的加的斯试验》(伯克利，1978)。虽然路易斯·布姆加特纳著《中美洲的何塞·德尔巴莱》(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63)仍是关于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决定性的著作，但拉蒙·洛佩斯著《何塞·塞西略·德尔巴莱，中美洲的富歇*》(危地马拉，1968)提供了某些新见识，而拉斐尔·H·巴莱著《何塞·塞西略·德尔巴莱的有生命力的思想》第2版(圣何塞，1971)则是一本关于选编他的著作和综合其思想的极好的书。第一届中美洲制宪议会的作用在安德烈·汤森所著的《中美洲各省的统一：共和国的起始》(圣何塞，1973)中有详细的论述，这本书是他的1958年的同名著作的一个大幅度的扩充本。关于联邦时期的两篇具有修正倾向的论文是菲利普·弗莱米昂著《"国家"权力和党派政治：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和为中美洲联盟而斗争》，载HAHR53/4(1973)第600—618页，和毛里西奥·多明格斯著《圣萨尔瓦多的主教管区：政教对立的焦点》，载《中美洲研究年鉴》1(1974)第87—133页。弗朗西斯科·莫拉桑于1840年失败之后撰写并于1870年在巴黎出版的《回忆录》，1971年于特古西加尔巴重印，关于他个人论文的汇集已收入W·J·格里菲斯所著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的个人档案》中，载《语言学与文献研究》Ⅱ(出版物12，新奥尔良，图兰大学，中美洲研究所，1977)第197—286页。关于独立后时期，T·L·卡恩斯著《联盟的失败：1824—1975年的中美洲》修订版(坦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1976)与他的早期著作是同样的，和阿尔韦托·埃拉尔特著《中美洲的联邦制》(圣何塞，1972)，是他的《中美洲联盟》(危地马拉，1964)的节本。F·D·帕克著《1821—1840年在中美洲的旅行》(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1970)，记载了这个时期若干具有深度的旅行反映大量新研究成果的是下列作者关于危地马拉的论

877

*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e, 1763—1820)，法国政治家。——译者

文，这些作者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米里亚姆·威利福德、小R.L.伍德沃德和W.J.格里菲思，他们的论文载于《实践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一书（出版物23，新奥尔良，图兰大学，中美洲研究所，1972）。格里菲思在此书中的论文《对外国殖民化的态度：19世纪危地马拉移民的演变》引伸了在他早期的著作《在荒地上的帝国》（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1966）中所提出的思想。也可参阅威利福德所著的《马里亚诺·加尔韦斯博士的教育改革》，JIAS10/3（1968）第461—473页。关于这个时期的外交史，除马里奥·罗德里格思的优秀著作《中美洲帕默斯顿式*的外交官：弗雷德里克·查特菲尔德先生》（亚利桑那，塔克森，1964）外，可参阅R·A·汉弗莱斯著《英美在中美洲的抗争》，收入《拉丁美洲的传统与反叛一书中》（伦敦，1969）第154—155页；大卫·沃德尔著《1821—1861年大不列颠与海湾群岛》，载《历史杂志》2/1（1959）第59—77页；C·L·斯坦西弗著《伊弗雷姆·乔治·斯奎尔：他在中美洲的事业的各个方面》，载《中美洲保守主义思想评论》20/98（1968）；西里尔·艾伦著《法国在中美洲》（纽约，1966），该书集中于论述运河代理人费利克斯·贝利；及英德烈斯·维加·博拉尼奥斯著《伯利兹最高监督官的罪行》（马那瓜，1971），该书集中论述1840—1842年英国的活动。何塞·拉米雷斯在其所著《何塞·德·马科莱塔：尼加拉瓜外交之父》（两卷集，马那瓜，1975）中记述了一位早期的尼加拉瓜外交官的生涯。切斯特·泽拉亚和L·F·西瓦哈在《尼科亚集团的兼并》（圣何塞，1974）一书中论述了哥斯达黎加获取瓜纳卡斯特的情况。泽拉亚还在《奥塞霍学士》（两卷集，圣何塞，1971）
878 一书中叙述了J·F·奥塞霍的经历。路易斯·贝尔特拉内纳著《危地马拉共和国的创建》（危地马拉，1971）和基思·米塞利著

* 亨利·J·T·帕默斯顿（Henry J.T.Palmerston，1784—1865），英国政治家，曾两度任首相。——译者

《拉斐尔·卡雷拉：1837—1848年危地马拉农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促进者》，载TA31/1(1974)第72-95页以及R.L.伍德沃德著《1821—1850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拉蒙塔尼亚农民对危地马拉政府的反应》，载《美洲种植园社会》1/1（1979）第109—130页对传统的自由党人对拉斐尔·卡雷拉的谴责提出了挑战。也可参阅佩德罗·托瓦尔·克普斯著《拉蒙塔尼亚人：卢西奥斯匪帮与1846—1851年的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危地马拉，1971)。在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所著的《尼加拉瓜历史的40年（1838—1878)》,第2版（马那瓜，1974）中重新发表了一部关于这个时期的重要的回忆录。

英美为争夺一条横渡大洋的航线和威廉·沃克事件继续吸引着所有层次的历史著作。恩里克·吉尔所著的《威廉·沃克》(圣何塞，1971）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但它是一部合格的著作，而弗雷德里克·罗森加滕所著的《必须消灭海盗!》（赛夕法尼亚，韦恩1976）将生动的描述同许多当时的图表和地图结合起来。更有学术价值的是下列著作：大卫·福克曼著《尼加拉瓜路线》(盐湖城，1972)；R·E·梅，《1854—1861年一个加勒比帝国的南方梦》(巴吞鲁日，1973)；和赫尔曼·札尔克斯等著《1856年在巴列森特拉尔发生的霍乱传染病：人口统计的分析与结果》,《历史评论》(哥斯达黎加)2/3（1976）第81—129页。亚历杭德罗·博拉尼奥斯根据他一直在积累的大量资料开始出版一系列关于沃克时期的著作。在第一批出版的几卷中或许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所著的《海盗克林顿·罗林斯》(尼加拉瓜，马萨亚，1976)，在书中，他以被认为是沃克的一个同伙H·C·帕克赫斯特的化名揭露了罗林斯，以及他把沃克当成小说题材所进行的描述。

关于这个时期的终结，《英属洪都拉斯：殖民地的绝境》(巴吞鲁日，1967）的作者韦恩·克莱杰在《1865—1981' 年危地马拉从保守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一文中暗示文森特·塞尔纳政府起了过渡期的作用，这篇论著收入威廉·S.科克尔所编的《为纪

念马克斯·利昂·穆尔黑德选编的西班牙语美洲论文集》(佛罗里达，彭萨科拉，1979)，这一论著还以西班牙文发表于《中美洲思想评论》，31/151（1976）第60—65页。在此时期有一些研究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主要人物的著作：卡洛斯·梅伦德斯著《何塞·玛丽亚·蒙特亚莱格雷博士》(圣何塞，1968)，和伊塔洛·洛佩斯著《赫拉尔多·巴里奥斯与他的时代》(两卷集，圣萨尔瓦多，1965)。最后，这个时期有价值的当时的印象记已经重印：弗朗西斯科·莱恩非耶斯塔著《对危地马拉历史的记录，从1865年4月14日至1885年4月6日的20年》(危地马拉，1975)，和巴勃罗·莱维著《关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地理与经济笔记》，第2版（马那瓜，1976）。

12.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独立后的头半个世纪

概况

关于大哥伦比亚，请参阅D·布什内尔著《大哥伦比亚的桑坦德尔政权》(新泽西，纽瓦克，1954)；J.M.雷斯特雷波著《南美洲哥伦比亚共和国革命史》(八卷集，波哥大，1942—1950)；R·M·巴拉尔特和R·迪亚斯著《1797年至1830年委内瑞拉历史梗概》(两卷集，布鲁日，1939)。对了解大哥伦比亚的瓦解也很有用的著作是C.帕拉-佩雷斯所著的两本书：《马里尼奥与委内瑞拉的独立》(四卷集，马德里，1954—1960)第4卷和《大哥伦比亚的君主制》(马德里，1957)。关于整个地区的有价值的记述是C·A·戈塞耳曼所著的《1837和1838年关于南美洲国家的情报》(斯德哥尔摩，1962）和热普拉男爵M·M·利斯沃亚所著的《在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的一次旅行的描述》（加拉加斯，1954)，后一本著作是对1852—1853年的一次旅行的记述。一部有

---

* 原文如此，疑为1881年之误。——译者

益的同时代的对宪法的系列研究是丁·阿罗塞梅纳所著的《关于拉丁美洲政府宪法的研究》(第2版，两卷集，巴黎，1878)。

委内瑞拉

J·V·隆巴尔迪等著《委内瑞拉历史：一份综合实用的书目提要》(马萨诸塞，波士顿，1977)，是必需的读物。

以下的文献集对了解这个时期也很有帮助：P·格拉塞斯和M·佩雷斯·比拉合编的《19世纪委内瑞拉的政治思想》15卷集，加拉加斯，1960—1962)；T·E·卡里略·巴塔利亚著《委内瑞拉公共财政史》(10卷集，加拉加斯，1969—1973)；《19世纪委内瑞拉的武装力量》(至今已出版12卷，加拉加斯，1963—)；C·戈麦斯·R编《关于研究委内瑞拉土地问题的材料(1829—1860)。荒地的出现和转让》(加拉加斯，1971)；R·J·贝拉斯克斯作序，《1831—1842年委内瑞拉内政与司法部门所颁布的行政法令》(加拉加斯，1973)；A·L·古斯曼著《1846年所谓的'委内瑞拉人'编辑安东尼奥·L·古斯曼的阴谋活动的不公正案件的起因》(6卷集，加拉加斯，1884)。 880

同时代的回忆录和日记不如在哥伦比亚的那样丰富，但可参阅J·A·派斯著《自传》(两卷集，加拉加斯，1973)；J·M·德·罗哈斯著《正丧失的时代》)加拉加斯，1967)；W·迪普伊编《1825—1842年罗伯特·克尔·波特爵士的加拉加斯日记》(加拉加斯1966)；L·莱韦尔·德·戈达著《1858—1886年委内瑞拉现代政治及军事史》(加拉加斯，1976)；C·帕拉-佩雷斯编《陆军上校阿德列尔克勒兹伯爵的文件》(巴黎，1928)。饶有兴味的是B·布鲁尼·塞利汇编的《何塞·玛丽亚·巴尔加斯全集》(7卷集共10本，加拉加斯，1958—1966)；J·A·科瓦斯编的《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元帅的档案》(五卷集，加拉加斯，1957—1960)是混乱和令人失望的；R·R·卡斯特利亚诺斯·V所著的《亲密的古斯曼·布兰科》(加拉加斯，1969)包括从大量现存的档案中选出的材料；也可参阅他所著的《派斯，被流放的人和

漫游者》(加拉加斯，1976)。

最有益的传记研究著作是C·帕拉-佩雷斯所著的《马里尼奥和内战》(三卷集，马德里，1958—1960)；R·迪亚斯·桑切斯所著的《古斯曼。权欲的轨迹》(两卷集，加拉加斯，1968)—上述两部著作都提供了有关“生平和时代”的丰富的文献资料。F·布里托·菲格罗亚所著的《埃斯基耶尔·萨莫拉的时代》(加拉加斯，1975)引起了A·罗德里格斯以《埃斯基耶尔·萨莫拉》(加拉加斯，1977)；一书的一丝不苟的研究和讽刺性的故意轻描淡写来作出的迅速回答；M·兰代塔·罗萨尔斯和L·比利亚努埃瓦关于这个人物的早期生活的著作(两书均重印,加拉加斯,1975)同J·R·帕查诺所著的《胡安·C·法尔孔元帅传》(第2版，加拉加斯，1960)一样都仍然是值得一读的。也可参阅J·A·德·阿马斯·奇蒂著《费尔明·托罗与他的时代》(加拉加斯,1966)和R·A·龙东·马克斯著《古斯曼·布兰科,“开明的独裁者”》(两卷集，加拉加斯，1944)。

属于较老的历史著作中，F·冈萨雷斯·吉南所著的《委内瑞拉当代史》(第2版,15卷集，加拉加斯，1954),仍然包括有许多其他地方不易找到的资料；J·希尔·福托尔著《委内瑞拉宪法史》(第5版,三卷集，加拉加斯，1967),和E·冈萨雷斯著《委内瑞史，第3卷：1830—18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这两书皆叙述清楚。J·S·罗德里格斯著《对在研究委内瑞拉联邦战争作出的贡献》(第2版,两卷集，加拉加斯，1960),和L·阿尔瓦拉多著《委内瑞拉联邦革命史》(全书中的第5卷,共8卷,加拉加斯，1953—1958)两书仍然是主要著作。属于“实证主义学派”的著作中，L·巴列尼利亚·兰斯是最有成绩的，他的著作可望发行新版。P·M·阿卡亚的作品也仍然是有价值的。

委内瑞拉的历史编纂工作的演变可在G.卡雷拉·达马斯汇编的《委内瑞拉历史编纂学史。关于其研究的教科书》(加拉加斯，1961)一书中追溯其由来。最近的一部通史是约翰·V·隆巴迪

所著的《委内瑞拉》(牛津，1982)。

对有关19世纪委内瑞拉历史的最近的编纂工作情况的介绍是由以下作者的论文提供的，他们是M·佩雷斯·维拉，R·P·马修斯，·B·A·弗伦克尔，M·B·弗洛伊德和N·哈威克，这些论文收入M·伊泽德等人所著的《1810—1976年委内瑞拉的政治与经济》(加拉加斯，1976)。对这个世纪的最好的简短概括是一个单独的作者J·A·德·阿马斯·吉蒂所著的《19世纪加拉加斯的政治生活》(加拉加斯，1976)。一部关于政党和派别其中包括某些省份的政治活动的指南是M·V·马加良斯所著的《委内瑞拉历史演变中的政党》(加拉加斯，1973)。M·沃特斯所著的《1810—1930年委内瑞拉的教会史》(纽约，1933)似乎仍然是其主题的标准的概括。在其他新近的专题论著和论文中，J·V·隆巴迪所著的《1820—1854年委内瑞拉黑人奴隶制的衰落与废除》(康涅狄格，韦斯特波特，1971)大大超出了它的直接主题；R·P·马修斯所著的《1840—1858年委内瑞拉的农村暴力行动，联邦战争的社会经济背景》(加拉加斯，1977)更多地为利亚诺斯而不是为联邦战争进行解释；R·L·吉尔摩所著的《1810—1910年委内瑞拉的考迪略主义和军国主义》(俄亥俄阿森斯，1964)对于它的主题的准确性质似乎含糊不清。也可参阅B·A·弗兰克尔著《1810—1888年委内瑞拉与美国》(加拉加斯，1977)；R·W·巴特勒著《1830—1848年委内瑞拉自由党的由来》(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得克萨斯大学，1972)；小L.F.斯诺著《1830—1846年派斯的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立法》(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北卡罗来纳大学，1970)；G·E·卡尔著《在对等国家中的第一个：1810—1910年大不列颠与委内瑞拉》(安阿伯，1980)；J·V·隆巴迪和J·A·汉森合著《1830—1855年第一个委内瑞拉咖啡周期》载《农业历史》，44(1970)；D·布什内尔著《委内瑞拉选举权的演变》载《史学通报》39(1972)；A·莱莫·B著《1870年委内瑞拉的教育》(加拉加斯，1961)。

881

最著名的早期共和国地理学的著作是A·科达西所著的《委内瑞拉的地理概况（1841年的委内瑞拉）》（3卷集，加拉加斯，1940）。在这个时期描述这个国家的突出的旅行书籍是K·F·阿蓬所著的《在回归线上》（加拉加斯，1961）；E·B·伊斯特威克所著的《委内瑞拉或在一个南美洲共和国的生活素描》（伦敦，1868）；P·罗斯蒂所著的《在美洲一次旅行回忆录》（加拉加斯，1968）。M·L·甘森穆列尔·德·布莱在《有关委内瑞拉的旅行与考察书目一览》（加拉加斯，1964）中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书目。

安东·戈林的绘画已在《一个世纪前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69）中得以重印：第52号传达了关于一支军队比许多语言所能传达的更多的东西。

下列统计汇编是能够得到的：M·伊萨尔德，著《关于委内瑞拉历史的统计系列》（梅里达，1970）；A·A·莫雷诺汇编的《派 882 斯时代各省的统计资料》（加拉加斯，1973）；M·兰达塔·罗萨莱斯著《地理大汇编，委内瑞拉的统计与历史》（两卷集，加拉加斯，1889。第2版，加拉加斯，1963）；R·贝洛斯著《1830—1944年委内瑞拉的经济与财政》（加拉加斯，1945）。

哥伦比亚

不幸的是没有与J·V·隆巴迪及其小组完成的委内瑞拉历史的书目相同的哥伦比亚历史的书目。哥伦比亚第一个书目编者I·拉韦德：阿马亚所著的《关于哥伦比亚的书目摘录和散文与诗歌选集》（波哥大，1882）依然是对这个时期的作者的一本有价值的指南。以下的著作在广泛的范围内都能得到：G·希拉尔多·哈拉米略著《哥伦比亚书志学的书目》（第2版，由R·佩雷斯·奥尔蒂斯校订和增补新材料，波哥大，1960）；同一作者著《哥伦比亚的旅游书目》（波哥大，1957）；S·贝尔纳尔著《人类学家必备的哥伦比亚书目指南》（波哥大，1970），对研究当地的历史是非常宝贵的；H·H·奥尔胡埃拉著《有关哥伦比亚文学研究的一般材料，书目指南》（波哥大，1968）；Z·奥尔特加·里考尔特著

《1902—1952年学术性的书目》(波哥大，1953)；M·G·罗梅罗等著《关于研究哥伦比亚历史的书目卡片》(波哥大，1961)。

下列出版的个人档案是特别受到推荐的：R·科塔萨尔汇编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的书信和函电》(10卷集，波哥大，1953—1956)和《致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的书信》(14卷集，波哥大，1964—1967)；L·A·奎尔沃汇编的《鲁菲诺·奎尔沃博士书信集》(3卷集，波哥大，1918—1922)；J·L·埃尔格拉和R·H·戴维斯合编的《莫斯克拉将军的书信档案》(3卷集，波哥大，1966—)；H·罗德里格斯·普拉塔所著的《亲密的何塞·玛丽亚·奥万多：档案—书信—评论》(波哥大，1958)；S·E·奥尔蒂斯和L·马丁内斯·德尔加多汇编的《何塞·玛丽亚·奥万多将军的文件与书信》(4卷集，波哥大，1973)；E·莱迈特雷作序的《拉斐尔·努涅斯同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的书信集》(波哥大，1977)；G·埃尔南德斯·德·阿尔瓦编的《鲁菲诺·何塞·奎尔沃同路易斯·玛丽亚·列拉斯和其他好友的书信集》(波哥大，1970)；G·埃尔南德斯·德·阿尔瓦等汇编的《多明戈·凯塞多将军的书信档案》(3卷集，波哥大，1943—1947)。

S·卡马乔·罗尔丹著《各种论著》(3卷集，波哥大，1892—1895)，M·桑佩尔著《政治经济著作》(4卷集，波哥大，1925—1927)和R·努涅斯著《哥伦比亚的政治改革》(7卷集，波哥大，1946—1950)，是对19世纪的哥伦比亚的基本评论性著作。在R·多诺索所著的《何塞·安东尼奥·索菲娅在波哥大》，(载《词典》(波哥大)31/1，1976)一文中收入了一份具有巨大敏感性的单独的外交报告。

关于回忆录，可参阅J·M·雷斯特雷波著《自传》(波哥大，1957)和《政治与军事日记》(4卷集，波哥大，1954)；J·M·科多韦斯·莫雷著《追忆圣菲和波哥大》，由E·穆希卡主编(马德里，1962)；F·德·P·博尔达著《同我的儿女们的谈话》(3卷集，波

883

哥大，1974）；A·帕拉著《回忆录》（波哥大，1912）；S·卡马乔·罗尔丹著《回忆录》（两卷集，波哥大，1945）；J·M·桑佩尔著《一个人的历史》（波哥大，1971）；J·M·奥万多著《历史的记录》（两卷集波哥大，1945）；J·波萨达·古铁雷斯著《历史政治回忆》（4卷集，波哥大，1929）。关于内战的当代论述，可参阅A·奎尔沃著《一支军队是怎样消失的》（波哥大，1953）；M·布里塞尼奥著《1876—1877年的革命；对于历史的回忆》（波哥大，1947）；J·M·巴尔加斯·巴尔德斯著《漫游国土》波哥大，1938）；V奥尔蒂斯著》1854年4月17日革命的历史》（波哥大，1972）。

传记：C·奎尔沃·马克斯著《何塞·伊格纳西奥·德·马克斯博士的一生》（两卷集，波哥大，1917）；E·波萨达和P·M·伊瓦涅斯合著《埃兰的一生》（波哥大，1903）；E·戈麦斯·巴里恩托思著《唐·马里亚诺·奥斯皮纳和他的时代》（两卷集，麦德林，1913—1915），后又以《安蒂奥基亚洲的25年》（两卷集，麦德林，1918）一书继续为此人作传；A·奎尔沃和R·奎尔沃合著《鲁菲诺·奎尔沃的一生及其时代的情况》（两卷集，巴黎，1892）；J·M·阿沃莱达·略伦特著《伊尔的一生。波哥大的圣菲大主教曼努埃尔·何塞，莫斯克拉先生》（两卷集，波哥大，1956）；A·J·莱莫斯·古斯曼著《奥万多》（波帕扬，1959）；I·列瓦诺·阿吉雷著《拉斐尔·努涅斯》（波哥大，1944）；G·奥特罗·穆尼奥斯著《拉斐尔·努涅斯的冒险生涯》（波哥大，1951）。

G·阿沃莱达著《哥伦比亚现代史》（六卷集，波哥大，1918—1935）是较老著作中最完整的一部，但可惜的是只叙述到1861年。关于这个世纪晚期的有价值的著作是E·罗德里格斯·皮涅雷斯所著的《1864—1884年激进的奥林波》（波哥大，1950）。

一部为其论题提供全面而大量材料的研究著作是J·L·埃尔格拉所著的《1845—1899年新格拉纳达的第一届莫斯克拉政府》（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北卡罗来纳大学，1958）。关于19世纪中叶的情况，可参阅G·科梅纳雷斯著《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波

哥大，1965）；关于文明发展，可参阅J·哈拉米略·乌里韦著《19世纪哥伦比亚人的思想》（波哥大，1964）。一部介绍党派斗争的著作是J·L·埃尔格拉所著的《1849—1885年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放入F·B·派克编《拉丁美洲史：选出的若干问题》（纽约，1969）。

关于经济史的基本著作仍然是L·奥斯皮纳·巴斯克斯所著的《1810—1930年哥伦比亚的工业与保护》（麦德林，1955），该书比起不总是可靠的W·P·麦格里维伊所著的《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更受欢迎。F·萨福德著《实践的理想》（得克萨斯，奥斯汀，1975），该书通过对技术教育的考察探索了许多主题，他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821—1870年哥伦比亚中部的商业和企业》（哥伦比亚大学，1965）和在他所著的《哥伦比亚18世纪的概况》（麦德林，1977）中的一些论文都是重要的。下列著作也是如此：J·P·哈里森著《1778—1876年从政府垄断到自由贸易的哥伦比亚烟草工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51）；R·C·拜尔著《1740—194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工业：起源和主要趋势》（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明尼苏达大学，1947）；J·J·帕森斯著《哥伦比亚西部安蒂奥基亚的垦殖化》（伯克利，1968）；R·布鲁著《自独立至1920年安蒂奥基亚的经济发展》（波哥大，1977）。关于运输，可参阅R·L·吉尔摩和J·P·哈里森合著《胡安·贝尔纳多·埃尔贝尔斯与马格达莱纳河上蒸汽轮船航行的引进》，载HAHR，28（1948）；H·霍纳著《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西斯内罗斯：哥伦比亚运输和经济发展的先驱》（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范德比尔特大学，1970）。J·弗列德著《印第安人为土地而斗争》（波哥大，1944和O·法尔斯·博尔达著《博亚卡的人和土地》（波哥大，1975）分别论述了在南部和中部高原农业发展的形势。V·雷斯特雷波著《对哥伦比亚金矿和银矿的研究》（波哥大，1882）仍然是到它出版时为止关于共和国采矿业的最好的资料来源。关于印第安人村社，可参阅A·加西亚著《哥伦比

884

亚关于土著人的法律》(墨西哥，1952)。关于一般参考书，有A·帕尔多·帕尔多所著的《哥伦比亚的经济与人文地理》(波哥大，1972)。M·乌鲁蒂亚和M·阿鲁布拉合著的《哥伦比亚历史统计概要》(波哥大，1970)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人口、工资、价格、对外贸易、烟草、咖啡和总统选举的资料。

关于19世纪的地理，A·科达西的报告被收入区域地理委员会编的《新格拉纳达各省自然与政治地理》(第2章，4卷集，波哥大，1957—1958)；F·佩雷斯著《哥伦比亚联邦的综合地理》(波哥大，1883)，来自同样的原始资料，而M·安西萨尔著《漫游阿尔法》(波哥大，1956)则来自同样的旅行。R·古铁雷斯著《专论集》(2卷集，，波哥大，1920—1921)包含了许多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用材料。

其他有价值的记述是J·斯图尔特著《1836—1837年的波哥大》(纽约，1838)；I·霍尔登著《新格拉纳达：在安第斯山的20个月》(纽约，1857)；E·罗特利斯贝尔赫著《埃尔多拉多》(波哥大，1963)；F·冯·申克著《1880年在安蒂奥基亚的旅行》(波哥大，1952)；A·赫特纳著《1882—1884年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的旅行》(波哥大，1976在《区域地理委员会图集——(哥伦比亚大众文化报)增刊》中复制的一系列水彩画是对19世纪中叶的典型人物、风景与各种活动的特殊的记录。

885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的历史编纂工作的问题在下列著作中有所论述：A·萨斯迪著《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历史编纂学》，载HAHR44/4·1964)；J·迈瓜施卡写的短篇论文和更短的书目摘要，这些论著收入E·弗洛雷斯卡诺所编的《拉丁美洲经济史》(2卷集，墨西哥，1972)，以及M·T·哈默利著《用数量表示19世纪：作为著量原始资料的厄瓜多尔各部的报告和公报》，载LARR13/2，1978。C·M·拉雷亚著《厄瓜多尔的科学书目》(马德里，1952)

列出了9,300个细目，但是历史部门中的许多书实际上是得不到的。

三本短的历史书提供了一个介绍：G·塞瓦略斯·加西亚所著的课本《厄瓜多尔史》(昆卡，1967)；O·E·雷耶斯所著的《厄瓜多尔简明通史》(2卷集，基多，1942)；E·阿亚拉所著的《厄瓜多尔的政治斗争与党派的起源》(基多，1978)。

I·罗瓦利诺·达维拉著《今日厄瓜多尔的由来》多卷版，至今已出版6卷，普埃布拉，墨西哥，1966—)是一系列资料丰富的政治和人物传记的研究著作，时间跨度是自弗洛雷斯的掌权至阿尔法罗的经历。这套丛书的保守主义偏见越来越明显，关于加西亚·莫雷诺的一卷比对阿尔法罗的处理要成功得多。这套丛书仍然代表了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最有抱负的努力，而且较之J·L·R〔T·M·莱·戈伊里·罗达斯〕所著的《厄瓜多尔共和国史》(3卷集，基多，1920—1938）中的党派性要少得多，后者是一本耶稣会会士的著作，其文献资料仍然是有用的。J·托瓦尔·多诺索著《历史专题论著集》(基多，1937）和他的《十九世纪厄瓜多尔的教会：自1809至1845年》也是有价值的。基多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出版的杂志《文化》第2卷，第6期1980年1月—4月号完全用于刊载《1830年的厄瓜多尔：意识形态、经济、政治》。

在厄瓜多尔，没有弗洛雷斯的传记，也没有关于罗卡富埃尔特斯的活动的正式研究著作。关于加西亚·莫雷诺，可参阅罗瓦利诺·达维拉所著的《起源》第4卷，和R·帕特著《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和他那个时代的厄瓜多尔》(第3版，墨西哥，1962)；关于蒙塔尔沃，可参阅O·E·雷耶斯著《胡安·蒙塔尔沃的一生》(第2版，基多，1943)。本特米利亚的年代产生了一种来自他的侄女玛丽塔的生气勃勃的辩护：M·本特米利亚著《厄瓜多尔的几个历史事件》(利马，1890）和一个来自弗洛雷斯之子安东尼奥的回答：A·弗洛雷斯著《厄瓜多尔史》(两卷集，基多，1891)。关于阿尔法罗，可参阅F·瓜德拉斯著《蒙特克里斯蒂的

886

老人：阿尔法罗传》(基多，1953)；A·帕雷哈·迭斯-坎塞科著《野蛮的激情(埃洛伊·阿尔法罗的一生)》(墨西哥，1944)。关于19世纪晚期的教会，可参阅F·冈萨雷斯·苏亚雷斯著《内心的回忆》(瓜亚基尔-基多，无日期)，介绍文章是由H·罗德里格斯·卡斯特洛撰写的。

加西亚·莫雷诺的作品汇集的目录被列入罗瓦利诺·达维拉撰写的传记里；他最大的已发表的书信集是W·洛尔所编的《加西亚·莫雷诺的书信》(4卷集，基多，1953—1955)，但是这部书信集远远不够完全。E·阿尔法罗的《选集》提供了他的思想的风格。(2卷集，瓜亚基尔，1959)。

现代的专题论著很少。最著名的是M·T·阿梅尔莱著《1763—1942年瓜亚基尔老省的社会经济史》(瓜亚基尔，1973)。

在下列著作中有关于山区历史的有意义的资料：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CIDA）著《厄瓜多尔的土地占有状况与农业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65)，这是一份由R·巴劳纳指导的研究著作；和A·鲁维奥·奥尔韦著《厄瓜多尔的土著人的立法》(墨西哥，1954)。

C·M·拉雷亚的书目提要列举了旅行者和地理学的研究著作。最早的全面的国家地理书是M·比里亚比森西奥所著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地理》(纽约，1858)。关于外国观察家的著述，比较容易见到的和资料丰富的两本著作是F·哈索雷克所著的《在西班牙语美洲人中的四年》(纽约，1867）和A·霍林斯基所著的《厄瓜多尔——美洲生活的实况》(巴黎，1861)。

13. 从独立至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秘鲁与玻利维亚

关于从独立到太平洋战争整个这个时期，豪尔赫·巴萨德雷的巨著《秘鲁共和国史》(第5版，10卷集，利马，1992—1964)，无疑地构成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早期著作《秘鲁，问题与可能性》(利马，1931)，和《民众，城市与乡村》(利马，1947）不但

保持了它们的新鲜感而且担负起研究秘鲁历史的开拓者的责任。除了巴萨德雷的经典著作外，另一本由埃米利奥·罗梅罗撰写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概要《秘鲁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包含至今仍有价值的资料。比较新近的著作有，埃内斯托·德尔·卡斯蒂略著《1820—1920年的秘鲁。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利马，1972)曾提供了有关19世纪的一个全面说明，当时胡利奥·科特莱尔在《秘鲁的阶级、国家与民族》(利马，1978)一书中探讨并阐明了1821年后秘鲁国家和社会继续保留殖民地的特征。一部有用的用英文写的通史是弗雷德里克·B·派克写的《秘鲁现代史》(伦敦，1967)。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著《一个世纪的随波逐流》(利马，1980，第一、二章)，和沙恩·亨特著《1830—1962年秘鲁出口价格与总量的估计》(普林斯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讨论文件33，1973)曾提出在该国出口功绩的基础上划分19世纪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

在从殖民体系中解离出来并崭露一个新的国家秩序的过程中，1821至1840年是决定性的。然而，迄今尚无人着手对这个时期进行综合性研究。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的《大不列颠与秘鲁。经济控制的机制》(利马，1977，考察了秘鲁独立后英国存在的条件和结果。安第斯地区这种独有的经济和社会特性曾在下述著作中涉及：，约翰·F·威贝尔著《在西班牙帝国与秘鲁国家内地区社会的演变：阿雷基帕（1780—1845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75）和阿尔韦托·弗洛雷斯-加林多著，《19—20世纪阿雷基帕与安第斯山南部》(利马，1977)。公社与庄园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时期公社范围内部解体和恢复的过程，是克里斯廷·亨费尔特所著的《争夺土地的斗争与土著人的抗议》(波恩，1982)的主题。两部关于军队和教会的综合著作包含这个时期有用的资料。它们是维克多·比利亚努埃瓦著《秘鲁的军队从无政府主义的指挥到改良主义的军人统治》(利马，1973）和杰弗里·克莱伯著《1824—1976年秘鲁的宗教与革命》(印第安纳，圣母，1976)。

关于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这就是说，这两个国家联合的失败尝试，下列著作值得查阅：L·C·肯德尔著《安德烈斯·圣克鲁斯与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载HAHR，16（1936），第29—48页；罗伯特·伯尔著《通过理性或武力。智利与南美洲的权力均势（1830—1905年）》（伯克利，1965）；卡洛斯·奥尔蒂斯·德·塞瓦略斯·帕斯·索尔丹著《1835—1839年秘鲁-玻利维亚邦联，》（2卷集，利马，1972—1974）。

888 乔纳森·莱文所著的《从历史观点看出口经济的发展模式》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0），开创了鸟粪对秘鲁经济的影响的现代探讨。莱文认为鸟粪繁荣在秘鲁产生一种典型的飞地经济，而亨特在其著作《19世纪秘鲁的发展与鸟粪》中对此论点表示怀疑（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1973）。另一方面，威廉·M.马修在《1820—1865年英-秘商业与金融关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64）和在《1840—1870年-秘鲁和英国的鸟粪市场》，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23，1970），根据他本人对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秘密文件的研究，指出在市场上出售鸟粪的技巧以及秘鲁政府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主。亦可参阅W·M·马修著《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秘鲁（1820—1870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21（1968）；《第一笔英-秘借款及其清偿（1822—1849年）》，载JLAS，2/1（1970）；《外国承包商与秘鲁政府在鸟粪贸易的开始》，载HAHR，52/4（1972）；《原始的出口部门：载19世纪中期秘鲁鸟粪生产》载JLAS，9/1（1977）；《安东尼·吉布斯父子公司，鸟粪贸易与秘鲁政府（1842—1861年》，载D·C·M·普拉特编《商业帝国主义（1840—1930年）》（牛津，1977）；和《吉布斯家族与秘鲁鸟粪的垄断》（伦敦1981）。

统治阶级对鸟粪资源政策和1872年国际危机影响秘鲁金融的看法，是胡安·迈瓜施卡《对1840—1880鸟粪年代的再解释，》（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大学，1967）研究的主题。亦可参阅R·米列尔和R·格林伊尔合著《1873—1879年秘鲁政府与硝石贸易》，

载JLAS，41（1973）。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的《鸟粪与秘鲁资产阶级》（利马，1974）从统治阶级的特性和国内市场的局限性这一角度来研究鸟粪时期秘鲁经济的崩溃。阿方索·基罗斯在《内债的整顿》一文（未发表的学士学位论文，利马天主教大学，1980）中，对《内债的整顿》的想法提出疑问，也就是说，将鸟粪欺骗性收益的支付给许多本国债权人，是造成秘鲁上层人物经济复苏的原因所在。鸟粪在为出口农业所提供的生产性资本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在下列著作中曾进行了研究：巴勃罗·马塞拉著《1821—1875年安第斯山区制糖种植园》，载《史学著述》，（利马）4（1977）；曼努埃尔·布尔加载著《从委托监护制到资本主义庄园》（利马，1976）；胡安·R·恩格尔森著《1825—1878年秘鲁沿海农业发展的社会方面，》（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1977）。与沿海间农业的直接联系形成对照的是，安第斯高原农业部门的发展则与海鸟粪的影响无关。在下述著述中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弗洛伦西亚·E·马伦的《秘鲁中部高原公社的防御。农民斗争与资本主义过渡《1860—1940年）》（普林斯顿，1982），内尔森·曼里克著《中部山区内部市场的发展》（利马，1978），玛尔塔·希拉尔多和安娜·利西亚·弗朗奇合著《庄园与权贵政治（1850—1920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利马天主教大学，1979）。与鸟粪的全部影响有关的其他变化是，资本的流通和银行系统的创建，大批中国劳工的输入和秘鲁铁路网的建设。关于银行，卡洛斯·坎普鲁维·阿尔卡萨著《秘鲁银行史（1860—1879年》（利马，1957）第1卷，仍然是有用的。关于中国“苦力”，瓦特·斯图尔特的先驱著作《中国的劳役在秘鲁。秘鲁的中国苦力史（1849—1874年》（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51），可由阿诺尔德·J.梅格埃尔较近期的、虽然比较一般性的研究著作加以补充，该著述题名为《拉丁美洲引进中国劳工：1847—1874年苦力贸易，》（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1975）。关于铁路的研究迄今尚

未着手。与此有关联的唯一著作是瓦特·斯图尔特所写的关于铺设第一条铁路的美国承包商的传记:《亨利·梅格斯:美国佬皮萨罗》(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46)。现在众所周知,鸟粪既产生财富又产生贫困。19世纪70年代早期在象利马这样的城市中,鸟粪价格的巨大增长引起最早的重要的群众暴动之一。那次暴动的组成和目标是玛加丽塔·希塞克的一部细致的研究著作的课题,书名为《历史上的城市群众与叛乱:利马1872年政变》,(利马,1978)。

889 这个时期的人口统计史基本上被人们所忽视。尽管在整个库斯科地区正进行某些重要的研究,但目前可得到的唯一的基本参考著作是乔治·库布勒著《1795—1940年秘鲁印第安人的社会等级》(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0)。

这个时期引起人们兴趣的政治探讨,特别是对国家作用的探讨可在下述著作中找到:罗纳德·H.伯格和弗雷德里克·斯特顿·韦维尔合著《对秘鲁独立后第一个世纪政治变化的再说明》,载JAIS,20/1)1978),69—83,和斯蒂芬·M.戈尔曼著《19世纪秘鲁的国家,上层人物与出口》,载JIAS21/3(1979),395—418。

关于同智利的战争曾出版了许多不同性质的书籍。亨利·法弗勒是第一个从一种新的观点引起人们注意去研究这次冲突的学者。他的著作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关于秘鲁的阶级斗争的评论》,载《从19世纪至今秘鲁的文学与社会》(格勒诺布尔,1975)。那次战争也是分析诸如民族认同和现代秘鲁的殖民地传统问题的一个起点。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所著的《太平洋战争与秘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一文,载《过去与现在》,81(1978),提出了关于重新研究上述两个问题的方针。自此以后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内尔松·曼里克的《农民与民族: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部山区》(利马,1981)。

有关1825至1879年间这段玻利维亚历史的书目不幸仍然很薄弱。有关这个时期的一般著作包括赫伯特·S.克莱因著《玻利维

亚：多种族社会的演变》(牛津，1982)；J.瓦莱丽·菲费尔著《1825年后玻利维亚的土地、布局与政治》(剑桥，1972）和路易斯·佩尼亚洛萨著《玻利维亚经济史》(2卷集，拉巴斯，1946—1947)。《玻利维亚人对贡内尔·门多萨L·表示崇敬的研究》(拉巴斯，1978）是一部关于玻利维亚历史的不同方面的有趣的文献汇编。

从殖民地到共和国的过渡是下述著作的课题：威廉·F·洛夫斯托姆著《改革的诺言和问题：玻利维亚独立后最初年代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尝试》(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康奈尔大学，1972)；查尔斯·阿纳德著《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出现》(盖恩斯维尔，1957)；和阿尔韦托·克雷斯波等著《独立战争期间拉巴斯的日常生活》（拉巴斯，1975)。在独立时期这个国家的资源状况在J·B·彭特兰的著作《关于玻利维亚1827年的报告》，中有所描述，载J·瓦莱丽·菲费尔编，《卡姆登杂记》，皇家历史学会，伦敦，35(1974)。一部比较完全的西班牙文版本：J.B.彭特兰著《关于玻利维亚1827年的报告》(波托西，1975)，是一部有关玻利维亚19世纪中期人口统计和经济资料唯一的重要的汇编。费尔南多·卡希亚斯著《1825—1842年阿塔卡马省》(拉巴斯，1975)，是一个有价值的地区研究报告。关于残存的印第安人纳贡制度，可参阅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上秘鲁印第安人与纳贡》(利马，1978)。圣克鲁斯控制了玻利维亚独立后时期的政治生活。论述圣克鲁斯的权威著述有阿方索·克雷斯波的《圣克鲁斯——印第安的神鹰》(墨西哥，1944)。亦可参阅奥斯卡·德·圣克鲁斯编《圣克鲁斯将军，塞皮塔大元帅与大秘鲁》(拉巴斯，1924)。曼努埃尔·卡拉斯科的《1805—1852年何塞·巴利维安》(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是第三位最重要的早期总统（名列苏克雷和圣克鲁斯之后）的传记。关于这个时期玻利维亚政治的有趣的探讨，可参阅詹姆斯·邓克利著《对1825—1879年玻利维亚考迪略主义的再评价》，载《拉丁美洲研究会刊》1/1（1981)。罗伯托·克雷哈苏以棘手的方式在《玻利维亚与英国人》(拉巴斯，1973)，对这个时期英国

与玻利维亚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描述。安东尼奥·米特雷在19世纪玻利维亚白银采矿业经济与社会结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7）和《拉普拉塔的长老》(利马，1981)，对了解19世纪采矿业提供重要帮助。欧文·格里斯哈伯的《19世纪玻利维亚残存的印第安人公社》(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北卡罗来纳大学，1977)，和《19世纪玻利维亚残存的印第安人公社：地区比较研究》(载JLAS，12/2（1980）第223—269页）是有关十九世纪残存的印第安人公社的重要论述。路易斯·安特萨纳所著的《梅尔加雷霍封建制和土地改革》(拉巴斯，1970)，是一部有关梅尔加雷霍各项政策的有用的专题著作。有关高原地区庄园与公社之间的关系，由西尔维亚·里韦拉·C·在一篇题为《玻利维亚高原大庄园的扩展》(《前进》，2（1978），第95—118页）的重要文章中进行了考察。

14. 从独立到太平洋战争的智利

智利传统型的历史学倾向于将重点放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而不是独立后时期。尽管近期的研究有助于，填补我们知识中的某些空白，大量的基础工作（同样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仍有待于完成。西蒙·科利尔的《智利的波塔尔“时期的历史编纂工作（1830—1891)》载HAHR57（1977)，第660—690页)，提供了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有关这一著述的一般探讨。

在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恩西纳的《从史前时期至1891年的智利史》（20卷集，圣地亚哥，1942—1952)，第9—17卷中可以找到对整个这个时期范围最广泛的叙述。对这部庞大的风格独特的保守著作不乏批评者。当使用该书去查阅里卡多·多诺索的持续的抨击的有关章节时，是有启发的多诺索著作题名为《弗朗西斯科·A.恩西纳，模拟者》(2卷集，圣地亚哥，1969—1970)。从独立年代至1833年的历史在迭戈·巴罗斯·阿拉纳的《智利通史》（16卷集，圣地亚哥，1884—1902，第11—16卷）中作了非常详

892

细报道。对一些具体的总统的记事，包括拉蒙·索托马约尔·巴尔德斯的《唐华金·普列托将军统治下的智利》(第2版,4卷集,圣地亚哥，1900—1904),迭戈·巴罗斯·阿拉纳的《智利历史的十年——1841—1851》(2卷集,圣地亚哥，1905—1906),阿尔韦托·爱德华兹的《唐曼努埃尔·蒙特的政府》(圣地亚哥，1932),以及有关1841至1876年间的历届政府，见阿古斯丁·爱德华兹的《智利的四任总统》(2卷集,瓦尔帕莱索，1932)。贡萨洛·布尔内斯的《太平洋战争》(3卷集，圣地亚哥,1911—1919),对太平洋战争作了典型报道。许多有关这次战争的文献在战争终止后不久作为民族自豪的一种姿态，被收集在帕斯夸尔·阿乌马达·莫雷诺编写的《太平洋战争：所有的官方文件、书信和其他有关战争的出版物汇编全集》中（9卷集,瓦尔帕莱索，1884—1890)。此外，没有几部有关这个时期出版的文献汇编可以与已有的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年代的文件相比。但是，国会的辩论从1846年起以《国会历届会议》的名称出版。巴伦廷·莱特列尔编写的《智利共和国立法机构会议,(1811—1845年)》(37卷集,圣地亚哥,1887—1908)收集了1846年以前的国会文件及某些辩论。

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政治情况，阿尔韦托·爱德华兹所著的具有激励性短论《高贵的树丛》(第7版,圣地亚哥,1972),富有敏锐见解，可以加以推荐；20世中叶智利历史学家的老前辈里卡多·多诺索写的《智利的政治思想》(第3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对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了记述；在加夫列尔·马塞利亚的《19世纪西班牙美洲的政治结构：1833—1891年智利的寡头政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圣母大学,1973）展现出一条有希望的探究路线。一些有价值的短篇论述讨论伸延到经济和社会领域，这些报告包括塞尔希奥·比利亚诺沃斯R.费尔南多·席尔瓦V.、奥斯瓦尔多·席尔瓦G.和帕特里西奥·埃斯特列M.合著的《智利史》(4卷集，圣地亚哥，1974—1976),3—4卷，由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和费尔南多·席尔瓦·V执笔；还有布赖恩·洛夫曼著《智利，

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遗产》(纽约，1979）第116—196页；和胡利奥·塞萨尔·霍贝特著《智利经济与社会发展评论文集》(圣地亚哥，1955)，第31—75页。路易斯·比塔莱的《对智利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3卷集，圣地亚哥，1967—1971)，第3卷，对于1859年以前的时期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

893　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研究著作充分涉及19世纪智利的经济史，为了回顾现有的著作，读者可参阅塞尔希奥·比利亚洛沃斯R.的《智利的经济史编纂及其开端》，载《历史》(圣地亚哥)，10(1971)，第7—56页，卡门·卡里奥拉和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的《智利》，载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合编《1830—1930年拉丁美洲经济史指南》(伯克利，1977)，第275—363页。马科斯·马马拉基斯所著的《智利经济的发展与结构》(纽黑文，1976)，第3—85页，对1840—1930这个时期一带而过。何塞·加夫列尔·帕尔马的《1830—1935年智利制造业的发展与结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大学，1979)，包含对这个时期经济史的有价值的见解。长期被忽视的农业主题已在阿诺德·J.鲍尔斯第一流的研究著述《从西班牙征服至1930年智利的农业社会》(剑桥，1975）中提出。尽管书名如此，但该书主要注重于这个时期。在贡萨洛·伊斯基耶多的《对智利人思想的研究：19世纪的农业社会》(圣地亚哥，1968)。对土地所有者的思想进行了考察。更需要了解的是关于铜和白银的开采，但是L.R.彼得森的《智利奇科北部的采矿业》(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1966)，第160—229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介绍。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硝石史话可在奥斯卡·贝穆德斯的经典著作《硝石的历史从开始至太平洋战争》(圣地亚哥，1963)中了解到。还有托马斯·F·奥布赖恩的《智利的上层人物和外国投资者：智利的硝石政策（1880—1882年)》JLAS，11/1（1979)，第101—121页，及《1870—1891年硝石工业与智利的关键性转变》(纽约，1982)。亦可参阅奥布赖恩的《安托法加斯塔公司：对外围资本主

义的实例研究》，载HAHR，60/1（1980）。下述著述对这个时期早些时候的关税政策进行了研究：约翰·L·雷克托著《智利的商人，贸易与商业政策（1810—184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印第安那大学，1976），第88—112页，对这个时期晚些时期关税政策的研究有威廉·F.萨特著《经济民族主义和智利19世纪晚期税制改革》，载TA，33（1976），311—335页。有关商船队兴衰的经典著作是克劳迪奥·贝利斯的《智利商船队史》（圣地亚哥，1961）。罗伯特·B.奥本海默的《智利运输业的发展：中部谷地铁路和社会经济变化》（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76），对铁路建设及其经济背景作了详尽报导有关地区问题特别好的著述有，约翰·褒利著《（1850—1915年）智利比奥比奥地区的运输》（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印第安那大学，1974）。在皮埃耳·维西埃尔的《智利：从殖民地经济到通货膨胀》载《拉丁美洲手册》，5（1970），第5—31页一文中可以找到对1878年以前的 894 货币问题的最佳论述。对1858—1861年的经济衰退尚未进行详细研究，但是19世纪70年代更为严重的危机，下列著述中有所论述：威廉·F·萨特尔著《智利与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萧条》（载JLAS，11/1（1979），第67—99页）和路易斯·奥尔特加著《1865—1879年智利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和危机》（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9），后一文章对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的论题也提出了有价值的证据。

对社会史（不论界限多么广泛）迄今尚未认真加以论述，而我们的知识中这方面的某些空白是巨大的。鲍尔著《智利的农业社会》对农村劳动阶级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路易斯·阿尔韦托·罗梅罗所著的《平等的社会。智利圣地亚哥的手工业工人及其最早的政治经验》（托尔夸托·迪特利亚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对19世纪50年代手工业工人和技工进行了研究。对城市下层阶级、北部矿工和上层阶级精英本身都迫切地需要加以研究。让·皮埃耳·布兰潘所著的《德国人在智利（1816—1945年）》

(科隆，1974）是一部研究巨著，对1850年以后南部德国人移居点作了细微描述。约翰·梅奥的《英国在智利的利益集团及其影响(1851—1886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大学，1977）考察了英国影响存在的各个方面，这对这个时期的智利是如此的重要。亦可参阅他所著的《硝石时代以前英国代办行与智利经济（1851—1880年)》，载JLAS，11/2（1979）第263—303页。阿劳坎印第安人飞地的衰落与瓦解在下述著述中进行了广泛研究：札克·罗西尼奥尔著《19世纪中叶智利人与阿劳坎印第安人》，载《西班牙语与葡语巴西世界手册》，20（1973)，第69—98页，以及托马斯·格瓦拉的旧著《阿劳坎人文明史》(3卷集，圣地亚哥，（1900—1902）第3卷，这一卷叙述直至19世纪80年代。亦可参阅莱昂纳多·莱昂S.著《阿劳坎印第安人与潘帕大草原印第安人集团之间的军事联盟：1867—1872年阿根廷与智利的阿劳坎人叛乱》，载《新历史》1/1（伦敦，1981)，第3—49页。

这个时期的城市史一般是缺乏的。论述圣地亚哥的，有雷内·莱昂·埃查伊斯的两本著作《圣地亚哥史》(2卷集，圣地亚哥，1975)，和《努尼奥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后者论述东部郊区，可以被视为有用的入门书，但也就如此而已。教育的进展情况在费尔南多·坎波斯·阿列埃特的《教育的发展（1810—1960年)》圣地亚哥，(1960）作了有益的概述。关于“历史的用途”，可参阅艾伦·沃尔的《起作用的过去。19世纪智利历史的用途》(巴吞鲁日，1982)。有关天主教会的作用，近期尚未进行详细研究，本哈明·奥维多的《智利共济会》(圣地亚哥，1929)，是根据共济会观点写的。从这本标准的叙述著作出版以来对共济会纲领的研究未取得进展。对19世纪人口统计史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发展，如罗伯特·麦卡的《智利社会与人口统计史：资料、问题和方法》(载LARR，13/2（1978)，第104—126页)，对这些问题做了明智的综合评述。一部好的实例研究著述是安·哈格曼·约翰逊的《19世纪智利农业市场对家庭和家庭结

构的影响》，载HAHR，58（1978），第625—648页。

有关智利的国际地位与它的外交发展可以在罗伯特·N.伯尔的《通过理性或武力。智利与南美洲的权力均势（1830—1905年）》（伯克利。1965），以及在马里奥·巴罗斯的一般论著《1541—1938年智利外交史，》（巴塞罗那，1970，第63—440页）获得最佳探讨。 895

中央统计局早在1843年即已建立，稍后该局积极收集统计资料，同样从1861年起出版《统计年鉴》。如同1854，1865和1875年的人口普查一样，自1844年起开始发表商业统计。但是对这个时期，统计资料一定要非常慎重使用。有关智利政府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可参阅罗莎·金特罗·梅萨编《拉丁美洲系列文献。第7号，智利》（纽约，1973）。马科斯·马马拉基斯编《1840—1865年智利历史统计》，（4卷集，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油印本）提供了有用的材料。

除了标准的书目提要这一辅助材料外，还有两本智利资料值得在此指出。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已系统地编入拉蒙·布里塞尼奥编的《智利作品书目统计》（3卷集，圣地亚哥，1965—1966）的目录中。布里塞尼奥原来的两卷分别出版于1862和1879年。第3卷包含劳尔·席尔瓦·卡斯特罗的增添和修正部分。后来《历史》杂志（圣地亚哥）在保持智利历史上所有发表的材料的详细记录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努力。这些材料已编入该杂志定期出版的"书目卡片"中。第一批这样的书目转载于奥拉西奥·阿朗吉斯·多诺索编的《历史书目（1959—1967年）》（圣地亚哥，1970）。其后的"卡片"曾在《历史》杂志上刊出，10（1971），11（1972—1973），12（1974—1975），13（1976）及14（1979）。 896

15. 从独立到巴拉圭战争时的拉普拉塔共和国

有关19世纪阿根廷的书目可以通过以下书籍中加以探讨：约瑟夫·R·巴拉杰的《1930年后拉普拉塔河地区历史编纂工作》，载

HAHR，39(1959)，588—642页，和詹姆斯·R·斯科比的《阿根廷。一个城市和民族》(纽约，1964)，248—274页。一部更为专门性的著作是胡利奥·O·恰皮尼的《关于罗萨斯的书目》(罗萨里奥，1973)。

国家文献则转载于许多汇编中。有关政府首脑的正式政策评论见诸于H·马夫拉加尼亚著《1810—1910年文告》，(6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届省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历史档案馆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版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历届省长文告(1822—1849年)》2卷集，拉普拉塔，1976)。有关基本立法、立宪和省际文本)可以在埃米利奥·拉维尼亚尼编的《阿根廷立宪会议》(6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37—1939)。中找到关于罗萨斯的主要文献就是阿道弗·萨尔迪亚斯编的《罗萨斯的论文集》(2卷集，拉普拉塔，1904—1907)，该书还可以由两部关于巴萨斯的思想和政策的实用汇编加以补充，安德烈斯·M.卡雷特罗著《胡安·M.德·罗萨斯的政治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和阿图罗·恩里克·桑派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政治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罗萨斯的反对派情况在下述著作中得到文献证明：格雷戈里奥·F.罗德里格斯编的《历史和文献稿》(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1—1922)，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历史档案馆编《拉瓦列将军的解放运动(1838—1842年)》(拉普拉塔，1944)。在其他较小规模的汇编中，阿根廷三位最杰出的政界和文学界人物的不朽作品特别醒目，首先是胡安·B.阿尔韦迪的《全集》(8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76—1886)和《遗稿》(16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95—1901)。《巴托洛梅·米特雷将军的文学、历史与政治书信集》(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2)和《米特雷-埃利萨尔德书信集》(《阿根廷历史文件》，26，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可以补充巴托洛梅·米特雷的《米特雷将军的档案：文件与书信》(28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1—1914)。多明戈·F.萨缅托的《全集》(52卷集，圣地亚

897

哥，1887—1902)，是一部有关阿根廷历史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和它一起的还有《萨缅托-米特雷：1846—1868年》通信，(布宜诺斯艾利斯，1911)，《法昆多》(拉普拉塔，1938)，及《1845—1888年萨缅托与波塞书信集》(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1947)。

对这个课题的叙述资料是丰富的，而以下所列出的不过是短篇选集。伍德祥因·帕里什爵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拉普拉塔河地区各省》(第2版，伦敦，1852)，最早出版于1838年，是由前英国驻阿根廷代办所写的一部客观的学术著作。威廉·麦卡恩的《横贯阿根廷各省的两千英里旅行》(2卷集，伦敦，1853)，赋予潘帕大草原的经济和人民以生命力。首次对定量的探讨之一，是由维克多·马丁·德·莫西的《阿根廷邦联的地理与统计数字》(3卷集，巴黎，1860—1864)提倡的。托马斯·约瑟夫·哈钦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阿根廷拾遗》(伦敦，1865)，作者是英国驻罗萨里奥领事，该书是一部资料不那么准确的论著，但是一直记述到1862—1863年。威尔弗雷德·莱瑟姆所著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国家》(第2版，伦敦，1865)，是首次出版于1866年的一本书的扩大版；写成于作者的"草原之家"，是一个大牧羊场。

通史是由国家历史科学院牵头主编的《阿根廷史》(第2版，10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1950)，及其续集，《1862—1930年阿根廷现代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这些都是集体编写的著作，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图利奥·霍尔珀林·唐吉的《阿根廷：从独立革命到罗萨斯邦联》(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一书的分析是高明的，正如他介绍《一个民族的方案和建设(阿根廷1846—1880年)》(加拉加斯，1980)的高明小品文一样。此书是阿根廷国家建设年代一些主要作者的文章选集。艾德·戈罗斯特吉·德·托雷斯，所著的《阿根廷：民族国家组建》(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年)，对1852—1874年这段时期作了均衡论述。

对经济的研究开始于乔纳森·C·布朗，他所著的《阿根廷社会经济史(1776—1860年》(剑桥，1979)一书兼有综合、有创见的研

究及编年表的意义。关于资料及其说明方面，迈伦·伯金的《1820—1852年阿根廷联邦制的经济方面》(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6)一书迄今仍然是卓越无比的。胡安·卡洛斯·尼科劳所著的，《罗萨斯与加西亚（1829—183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集中阐述金融与财政政策。米格尔·A.卡卡诺的《1810—1916年公有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度》(第3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最早出版于1971年，对土地所有制的基本体制作了说明埃米利奥·A.科尼的，《关于里瓦达维亚土地长期租借的真相》(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 对里瓦达维亚的土地政策作了确认。对于土地的获得和集中情况的进一步详情是由哈辛托·奥多内的，《阿根廷的地主资产阶级》(第3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提供的，但是为获得更准确的数据还可参阅安德烈斯·M·卡雷特罗所著的《对识别18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农村地产的贡献》，载《阿根廷历史学院通报“埃米利奥·拉维尼亚尼博士”》(第2辑，13/22—23 1970，第（246—292页）和《罗萨斯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家畜饲养业可以在奥拉西奥·C·E·希韦蒂所著的《阿根廷畜牧业经济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一书中进行研究，有关加工工厂的情况，可以在阿尔弗雷多·J·蒙托亚所著的《阿根廷屠宰场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 和《1810—1862年时期的畜牧业和肉食腌制工业》(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进行研究。早期工业发展状况在下列著作作了阐述：何塞·M马里卢斯·乌尔基霍的《国家与工业（1810—186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是一部文章的汇编；胡安·卡洛斯·尼科劳的《关于阿根廷工业的背景》(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和《阿根廷工业与海关(1835—185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及克利夫顿·克罗伯的《拉普拉塔河地区航运业的发展（1794—1860年)》(麦迪逊，1957)。有关对外贸易和外贸参与者们的情况在一篇有用的论文和两部书籍中进行了研究：胡安·卡洛斯·尼科劳著《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外海活动（1810—

1854年)》，载《我们的历史》，12(1973)，第351—361页；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与阿根廷》(牛津，1960)；贝拉·布利斯·雷伯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社，(1810—188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9)。关于羊毛的周期和过渡中的经济，可参阅何塞·卡洛斯·恰拉蒙特所著的《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阿根廷(1860—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和现可称经典作家H.吉布森所著的《阿根廷共和国养羊工业的历史与现状》(布宜诺斯艾利斯，1893)。

社会的人口统计状况由埃内斯托·J·A·马埃德尔在《1810至1869年阿根廷人口统计的演变》(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作了充分的记述而对短时期的人口变化是由苏萨纳·R·弗里亚斯、塞萨尔·A.加西亚·贝尔松塞等人估量的，他们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人口普查撰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人民（1800—18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上述这些著述由乔治·里德·安德鲁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非洲裔阿根阿根廷人(1800—1900年)》(麦迪逊，1980)加以补充。关于移民问题，可参阅胡安·安东尼奥·奥多内所著的《前往拉普拉塔河的欧洲移民》(蒙得维的亚，1966)。胡安·卡洛斯·科罗尔和伊尔达·萨瓦托合著的《爱尔兰移民在阿根廷的情况》(布宜诺斯艾利斯，1981)对爱尔兰人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了新的研究。马里亚·萨恩斯·克萨达的《庄园主》(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对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进行了研究。加斯东·戈里的《游民与坏的试用人员》(第2版，圣菲，1965年)，和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莫拉斯的《高乔人的社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将高乔人、雇工和游民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鲁文·H.索里利亚所著的《考迪略的社会出身（1810—187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探讨了考迪略主义的社会基础。

899

阿根廷政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包括里瓦达维亚、罗萨斯和民族国家组建。对于第一个时期，里卡多·皮西里利的《里瓦

达维亚和他的时代》(第2版，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是一本有学术成就的著作，塞尔希奥·巴古的《里瓦达维亚集团的经济计划(1811—1827年)》(罗萨里奥，1966)用文献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有关罗萨斯的浩繁书目是有碍于而不是有助于理解问题。阿道弗·萨尔迪亚斯的《阿根廷邦联史：罗萨斯与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9卷集，1958)，最早出版于1881—1887年，取材来自官方的罗萨斯资料，是一部有用的大事编年史。罗伯托·埃切帕拉博尔达的《罗萨斯：有争论的史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是对这些"问题"的一部现代评述。恩里克·M.巴尔瓦的《罗萨斯怎样取得政权》(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说明对权力的夺取。在撰写罗萨斯的历史学家中，卡洛斯·伊瓦古伦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他的生活，他的戏剧，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最早出版于1930年，提供了一部文献丰富的政治传记；及胡利奥·伊拉苏斯塔的《通过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书信了解他们的政治生活》(第2版，8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提供了许多细节和文献。埃内斯托·H.塞莱西亚的《罗萨斯的历史贡献》(第2版，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内容有敌意，但研究很充分。贝尼托·迪亚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地区治安法官(1821—1854年)《(拉普拉塔，1959)，对该政权的一个重大机构进行了研究。有关外国封锁与其他形式的干涉，可参阅约翰·F.卡迪著《外国对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干预(1838—1850年)》(费城，1929)，和内斯托尔·S.科利著《法国在拉普拉塔河的政策：罗萨斯与1838—1840年的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以及前引弗恩斯的著作。罗萨斯垮台的国际背景由撰写罗萨斯的历史学家何塞·马里亚·罗萨在《罗萨斯的覆灭：巴西帝国与阿根廷邦联(1843—1851年)》(第2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一书中进行了探讨。关于罗萨斯的近期历史，他的权力基础和政策，可参阅约翰·林奇著《阿据廷的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1829—1852年)》(牛津，1981)。

在民族国家组建时期的过渡人物是乌尔基萨参阅比阿特丽斯·博什著《乌尔基萨与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詹姆斯·R.斯科比的《为阿根廷民族的巩固而进行斗争(1852—186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现已取代了罗萨斯以后十年的较老的论著。伟大的立宪政治家们曾吸引了许多人为他们写个人传记，其中突出的有豪尔赫·M.马耶尔的《阿尔韦迪与他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里卡多·罗哈斯的《阿根廷大草原上的预言家：萨缅托的生活》(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和何塞·S.坎波巴西的《萨缅托与他的时代》(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对萨缅托给予学术上的关注。

19世纪的乌拉克历史有一个既定的政治记事和文献框架这在爱德华多·阿塞韦多的《乌拉克编年史》，第2.3卷(蒙得维的亚，1933)一书中有所阐述。关于19世纪中叶的情况，该书已由胡安·E.皮韦尔·德沃托的《大战的结束》(蒙得维的亚，1953)加以补充。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杰出分析是由何塞·佩德罗·巴兰在《牧人与考迪略式的乌拉兰的极盛时期与危机(1838—1875年)》(载马拉克史，4，蒙得维的亚，1974)一书中提供的关于农村结构，可参阅何塞·佩德罗·巴兰和本哈明·纳温合著《现代乌拉克的农村史》第1卷(1851—1967)(蒙得维的亚，1967)，这是一部基本的学术著作。胡安·安东尼奥·奥多内的《自由主义的乌拉克的经济与社会(1852—1904年)》，载《文章选集》(蒙得维的亚，1967)，是一部文献集，书前附一篇有价值的导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可参阅卡洛斯·M.拉马所著的《乌拉克人民的社会史》(蒙得维的亚，1972)。

了解乌拉圭19世纪历史的最佳探讨是由约翰·霍伊特·威廉斯在《巴拉圭共和国的兴起和衰落(1800—1870年)》(奥斯汀，1979)一书中提供的。该书是一部研究和解释性著作。理查德·艾伦·怀特所著的《巴拉圭的自主革命)1810—1840年)》(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78)，对弗朗西亚采取一种崭新的，虽然不是

全面的看法。关于巴拉圭人的观点，可参阅胡利奥·塞萨尔·查韦斯,《最高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德·弗朗西亚传记》(第4版，马德里，1964)。同一作者还撰写了弗朗西亚的继任者的历史著作《洛佩斯总统。唐·卡洛斯的生活与治理》(第2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亦可参阅胡安·F.佩雷斯·阿科斯塔的《唐·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至高无上的工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关于这个时期人口统计和发展的历史，参阅约翰·伊特·威廉斯著《对巴拉圭1846年人口普查的几点意见》，载HAHR，56(1976)，第424—437页，和》外国技术与巴拉圭的现代化(1840—1870年)》载《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2(1977)，第233—257页。后者的课题由何塞菲娜·普拉在《巴拉圭的英国人(1850—1870年)》(伦敦，1976)中做了进一步详细的探讨。关于巴拉圭战争，佩勒姆·霍顿·博克斯的《巴拉圭战争的起因》(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29)仍然值得一读，但是应由埃弗拉因·卡多索所著的《巴拉圭战争前夕》(布宜诺斯艾利斯，1954)和《巴西帝国与拉普拉塔河》(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加以补充。同一作者的《百年前》(8卷集，亚松森，1967—1972)，是根据当代巴拉圭报纸编写的一部有用的大事编年史。关于用英文撰写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参阅查尔斯·科林斯基著《独立或死亡。巴拉圭战争史话》(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65)，然而拉蒙·J.卡卡诺的《巴拉圭战争》(3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83—1940)，作为一本参考书仍然是有价值的。有一本由约翰·霍伊特·威廉斯撰写的有关巴拉圭书目的专门评述，书名为《巴拉圭的历史资料。第4部分。精选的巴拉圭史书》，载TA，34(1978)，第1—20页。

901

16. 巴西——从独立到19世纪中叶

《巴西文明通史》(塞尔吉奥，布瓦克·德·奥兰达编)2卷集包括1822—1848年这一时期：其中第2卷《关于巴西的君主制》分上册：《关于解放的进程》(圣保罗，1962)和下册：《分散与

统一》(圣保罗，1964)。仅有的英文版通史是G·H·哈林著《巴西帝国。新世界君主制的经历》(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8)一书,内容切合实际也有条理，但多少有些肤浅而目前已稍嫌陈旧。斯坦利·J·斯坦著《1808—1889年巴西的历史编纂学》,至今仍有价值,载HAHR 40/2(1960)第234—278页。关于1822—1831年这一时期有托比亚斯·多·雷戈·蒙特罗著《帝国史：关于第一个统治时代》(里约热内卢，1939),本书仍是著作中叙述政治事件最详细的一本。约翰·阿米塔奇著《从1808年布拉干柴家族抵达巴西到1831年唐·佩德罗一世退位的巴西史》(2卷集，伦敦，1836)是一部记述当时史实的重要著作。19世纪其他重要的记事史有若昂·曼努埃尔·佩雷拉·达·席尔瓦著《1831年至1840年的巴西史》(里约热内卢,1878)、曼努埃尔·杜阿特·莫雷拉·德·阿泽韦多著《国家史：1831至1840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1884)和海因里希·汉德尔曼著《巴西史》(柏林，1860：葡译本，里约热内卢，1931)。

尼西亚·比莱拉·卢斯著《巴西》，载斯坦利·J·斯坦和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合编《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手册》(伯克利，1977)第163—272页,是巴西经济史入门有用的二次文献。有两本巴西经济通史，至今仍是典范之作，其中涉及这段时期的有：小卡约·佩德罗著《巴西经济史》(第6版,圣保罗，1959)和塞尔索·富尔塔多著《巴西的经济构成》(里约热内卢，1959)：英译本《巴西的经济增长。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的概括》(伯克利，1963)。纳撒尼尔·H·莱夫著《巴西的不发达与发展》是近期对独立后巴西经济史最全面(和有争议)的研究著作，全书共两卷，第1卷《1822—1947年经济结构与改革》;第2卷《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再评价》(伦敦，1982)。关于咖啡繁荣的早期阶段，见斯坦利·J·斯坦著《瓦索拉斯。1850—1900年巴西的咖啡之乡》(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7)，沃伦·迪安著《里奥克拉罗·1820—1920年巴西的种殖园制度》(斯坦福,1976)和阿丰索期 902

德斯克拉尼奥勒·陶奈著至今仍有帮助的《咖啡史》(15卷集，里约热内卢1939—1943)。关于蔗糖方面，见马里亚·特蕾莎·肖勒·彼得罗内著《圣保罗的一个甘蔗农庄：1765—1861年兴衰史》(圣保罗，1968)和彼德·L·艾森伯格著《伯南布哥的制糖业：1840—1910年没有变化的现代化》(伯克利，1974)。关于英国的帝国特惠制，特别是蔗糖关税方面，对巴西经济发展或不发达的影响的两种不同观点，见小保罗·诺格拉·巴蒂斯塔著《英国关税政策与19世纪上半叶巴西出口发展》，载《巴西经济评论》34/2（1980）第203—239页，以及罗伯特·M·德尔森著《为供应19世纪英国市场的蔗糖生产：对巴西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作用的再评价》，载A·格雷夫斯和B·艾伯特合编《1860—1914年国际蔗糖经济的危机与变化》(即将出版)。关于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巴西商务和财政（以及外交和政治）关系的杰出著作有艾伦·K·曼彻斯特著《英国在巴西优势地位的兴衰》(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33)。尼西亚·比莱拉·卢斯著《为巴西的工业化而斗争》(圣保罗，1961）的前几章对巴西独立后这段时期工业化的失败进行了考察。关于这段时期的财政史，见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莱斯和威尔逊·苏济甘合著《巴西货币史》(里约热内卢，1976)。关于政府收入特别是支出方面的情况，可见利贝拉托·德·卡斯特罗·卡雷拉著《帝国建立以来的预算》(里约热内卢，1883）和《巴西帝国的财政与预算史》(里约热内卢，1889)这两本至今仍是不可缺少的著作。并见阿马罗·卡瓦尔坎蒂著《截至1889年为止的巴西前帝国的财政详细报告》(里约热内卢，1890)。阿尔西尔·伦哈罗著《省吃俭用的群众(论1808—1842年对宫廷的供应在巴西政治结构中的影响》(圣保罗，1979）是近期出版的一篇专著，它通过对国内贸易，特别是对里约热内卢组织食品供应的考察而开辟了新天地。

何塞·穆里洛·德·卡瓦略的博士论文《巴西帝国的精英与国家结构》(斯坦福大学，1974）对巴西帝国的政治制度作了最广

泛的研究。其第一部分，经过修改和补充已经出版，题为《等级结构。帝国的政治精英》(里约热内卢，1980)。并见他的文章《政治精英与国家结构：19世纪巴西实例》，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24/3(1982)。此外，费尔南多·乌里科埃谢阿著《巴西官僚政府的世袭基础》(伯克利，1980)和托马斯·弗洛里著《1808—1871年巴西帝国的法官与陪审团。新国家的社会控制和政治稳定》(得克萨斯，奥斯汀，1981)是最近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前者着重考察了国民警卫队，后者阐述了法官的政治和行政任务。关于国民警卫队，并见珍妮·贝兰斯·德·卡罗特罗著《城市民兵：1831—1850年的国民警卫队》(圣保罗，1977)。没有关于这个时期军队的著作，但可参见约翰·H·舒尔茨著《1850—1894年巴西军队在政治中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的前几章。若昂·卡米洛·德·奥利韦拉·托里斯著《御用民主(巴西帝国的政治理论)》(里约热内卢，1957)对于了解帝国政治史仍是宝贵的资料。《内阁的组织与计划。帝国时期的议会》(第2版，国家档案库，里约热内卢，1962)也是不可缺少的参考材料。关于这段时期的选举立法资料可见弗朗西斯科·贝利萨里奥·苏亚雷斯·德·索萨著《论帝国的选举制度》(1892；巴西利亚，联邦参议院，1979)。有用的还有若泽·奥诺里奥·罗德里格斯编《议会和国家演变》(1826—40年期间)(8卷集，联邦参议院，巴西利亚，1972)·《国务委员会以后》(14卷集，联邦参议院，巴西利亚，1973)和塔瓦雷斯·德·利拉著《帝国的政治制度》(联邦参议院，巴西利亚，1979)。

关于这段时期一些政治领袖人物传记，较突出的有奥塔维奥·塔基尼奥·德·索萨所著的《若泽·博尼法西奥》(里约热内卢，1945)，《佩德罗一世的一生》(3卷集，里约热内卢，1952)《贝尔纳多·佩雷纳·德·瓦斯康塞洛斯及其时代》(里约热内卢，1937)，《埃瓦里斯托·达，维加》(圣保罗，1939)和《迪奥戈·安东尼奥·费若(1784—1843)》(里约热内卢，1942)，再版

后收入《巴西帝国开创史》（10卷集，里约热内卢，1957—8）第1—7卷。

904 奥古斯丁·沃内特著《1831—1832年的政治团体》(圣保罗，1978）是最近对摄政时期开始时政治动员状况所作的有文献根据的杰出研究。

关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地方上的叛乱情况，除了《巴西文明通史》第2卷第2章，和小卡约·普拉多著《巴西的政治发展》(圣保罗，1933)的第3和第4章的各地区史中涉及以外，还有一些著作值得注意。曼努埃尔·科雷拉·德·安德拉德著《卡巴诺派之战》(里约热内卢，1965）是对卡巴诺派战争现有研究著作中最好的一篇，其中有一部分经摘要收入罗纳德·H·契尔科特编《安哥拉与巴西的抗议与抵抗：比较研究》(伯克利，1972）一书中《卡巴诺派之战的社会与种族的意义》一文。迪尔塞乌·林多佐的近著《武装的乌托邦。皇帝退位后森林中的穷人起义》(里约热内卢，1983)，强调了战争的思想与文化方面。关于摄政时期在伯南布哥的一些较小的叛乱，见曼努埃尔·科雷拉·德·安德拉德著《伯南布哥的本土主义运动：九月和十一月》(累西腓，1971)。阿斯托尔福·塞拉著《巴莱奥派叛乱》(里约热内卢，1946)，和小路易斯·维亚纳著《萨比诺派叛乱（1837年的巴伊亚共和国)》（里约热内卢，1938）至今仍是关于这些运动的最佳著作。关于萨比诺派叛乱，还可参考F·W·O·莫顿著《保守派的独立革命：1790—1840年巴伊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74，第11章)。多明戈斯·安东尼奥·拉约尔著《1821年至1835年帕拉省的政治动乱，或政治事件的主要史实》(3卷集，贝伦，1970）一书尽管杂乱无章，但仍然是有关卡巴诺派的最佳研究著述。根据事实材料研究法罗皮利亚派的最佳著作是阿尔福雷多·瓦雷拉著《大革命史》(6卷集，阿雷格里港，1925)。沃尔特·斯波尔丁著《法罗皮利亚派革命·伟大十年的人民史》(圣保罗，1939)一书也有价值。新近的一篇研究强调了这次叛

乱的经济根源，它是斯潘塞·L·莱特曼撰写的《贫民战争的社会-经济根源：早期巴西史的一章》（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后以《贫民战争的社会-经济根源》为题出版（里约热内卢，1979）仅有的一本关于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的自由派叛乱的新近著作是维克拉·M·菲勒著《巴西帝国的自由主义：1842年的地区叛乱》（斯坦福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6）若泽·安东尼奥·马里尼奥著《米纳斯吉拉斯省1842年事件实况与政治运动史》（拉法耶蒂顾问城，1929）是一位身临其境者的看法。除法罗皮利亚派以外，关于普拉亚人的叛乱是对这一时期叛乱最有成效的研究。这一方面有两篇新近的重要研究：伊萨贝尔·安德拉德·马森的《1842—1849年普拉亚人运动：新闻界、知识界与政治权力》（圣保罗，1980），本文着重于思想方面，而南希·普里西拉·纳罗的《巴西1848年的普拉亚人叛乱》（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1）一文则考察了叛乱的政治和经济方面。 905

独立后几十年里关于巴西人口的有用资料（以及有关奴隶和移民），可见T·W·梅里克与D·格雷厄姆合著《从1808年至今巴西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79）。并见马里亚·路易扎·马西利奥著《从1872年的普查看巴西利亚的人口发展》，载《历史年鉴》第6卷（1974）第115—137页。在开始大批欧洲移民以前，最佳的移民研究是乔治·P·布朗著《1822—1870年巴西帝国政府的移民政策》（美国天主教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2）。一位德一瑞（士）殖民者对维尔格罗参议员的自由劳工政策所作的批评中，告诉我们很多19世纪中期圣保罗的乡村情况，这就是托马斯·达瓦茨的《一位巴西殖民者的备忘录（1850）》（圣保罗，1941），本书由塞尔吉奥·布瓦克·德·奥兰达所编并撰写序言。沃伦·迪安著《19世纪巴西的大庄园与土地政策》中研究了土地政策，以及特别是1850年法的起源，载HAHR 51/4（1971）第606—25页；关于土地政策还有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著《现代化的障碍：帝国的土地政策》，载《巴西历史评论》1/1（1981），

以及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著《巴西的土地政策和我们的联邦制国家》,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国：决定的时刻》(圣保罗，1977)。鲁伊·西内·利马著《巴西土地简史。土地分配与空地》(阿雷格里港，1954)比较概略，仍然有用。关于本时期城市的发展，见书目评论第17节所引的理查德·莫尔斯、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欧拉利亚·马里亚·拉迈尔、洛博以及卡蒂亚·M·德·凯罗斯·马托佐等的著作。书目评论第17节中还讨论了19世纪关于巴西奴隶制的书目。此外，还有一篇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本世纪上半个世纪时期里约热内卢农村奴隶制的论文：玛丽·C·卡拉斯奇著《1808—50年里约热内卢的奴隶生活》(威斯康星大学，1971)。另一篇重要的博士论文是若昂·若泽·雷伊斯著《巴西的奴隶叛乱。1835年巴伊亚非洲穆斯林起义》(明尼苏达大学，1983)。莱斯利·贝瑟尔透彻地研究了英国—巴西关系中的奴隶贸易和1850—51年最后废除奴隶贸易的问题。其著作有《巴西奴隶贸易的废除；1807—1869年英国、巴西和奴隶贸易问题》(剑桥，1970)。关于本时期的最佳外交史仍是若昂·潘迪亚·卡洛热拉斯著《帝国的对外政策》(3卷集，圣保罗，1927—33)，第2卷《关于第一个统治时期》，第3卷《罗萨斯统治的瓦解》。

906

巴西独立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许多欧洲旅游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到巴西访问后所作的报告：例如，马里亚·格雷厄姆、奥克斯特·德·圣依莱尔、让·巴蒂斯特·德布雷·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阿尔奇德·德奥尔比尼。他们已被列入伯纳德·内勒编《19世纪南美洲的报告》(伦敦，1969)。并见吉尔贝托·弗雷雷著《富豪与奴仆。农村族长政治的衰落与城市的兴盛》(第2版，3卷集，里约热内卢，1951；英译本《大楼与棚屋：现代巴西的形成》〔纽约，1963〕)，这是继他阐述19世纪问题的名著《主人与奴隶》；以及《19世纪中期巴西的社会生活》(载HAHR 5/4(1922)第597—630页)之后的一个续篇。对司法案卷很有的一篇开拓性著作是帕特里夏·安·奥夫德海德著《秩序与暴力：

1780—1840年巴西社会偏离正道的人与社会控制》（明尼苏达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6）。

17. 巴西——从19世纪中叶到巴拉圭战争

鲁文斯·博尔瓦·德·莫赖斯和威廉·贝里恩合编《巴西研究书目提要手稿》（里约热内卢，1949）是个基础；虽然它的规模参差不齐，但其诠释条目和编史文章为历史学家编纂《拉美研究手册》提供了基本条件。斯坦利·J·斯坦著《1808—1889年巴西的历史编纂学》，载HAHR 40/2（1960）第234—78页，也仍有用。为研究巴西19世纪中叶的所需资料之中，有坎迪多·门德斯·德·阿尔米达杰出的作品《巴西帝国地图》特别值得重视。

雷蒙多·法奥罗著《权力的主人》（第2版，阿里格里港和圣保罗，1975），和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著《巴西的平民革命》（里约热内卢，1975）是对巴西中世纪的社会与政治情况做了引人入胜广博说明的两本研究著作。两书都涉及对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及事件之间联系的探讨。尽管费尔南德斯在他结构中也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这两本书都受到韦伯式类型学的严重影响。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的平民史》（里约热内卢，1964）较少矫饰但带有比较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小卡约·普拉多著《巴西经济史》（第5版，圣保罗，1959）一书对社会和政治从经济方面所作说明，不像索德雷那么严格。 907

巴西帝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若阿金·纳布科，他对我们了解本时期仍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所著关于他父亲的传记《帝国的政治活动家》（2卷集，第2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1935），1897—1900年第一次出版，按年代学处理了政治家和政治事件，而且并未忽略他们活动所处的重大社会背景。纳布科的保守、亲帝国的观点与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在1909年所出版的《在历史的边缘》（第2版，波尔图，1913）一书中所采取的批评立场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库尼亚比纳布科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帝国

的变革失败。若泽·马里亚·多斯·桑托斯著《巴西政治总况》（圣保罗，1930）为帝国作了辩护，淡化了帝王的作用，而强调体制对社会和精英分子变化特征所作出的反应。

另一本政治史是保拉·贝伊格尔曼的《巴西政治构成，1：废奴主义者的思想、理论与活动》(圣保罗，1967)，本书以关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立法为其主题。C·H·哈林编纂了唯一的一本用英语写的整个时期的编年史记事：《巴西帝国》(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85)。哈林一书是以截至当时他所阅览的范本著作为基础的，若以该书同塞尔吉奥·布瓦克·德·奥兰达编《巴西文明通史，第二部：巴西君主制第3卷、第4卷和第5卷》（圣保罗，1967—1972）中各篇文章作一对照，可以看出此后的10至15年期间对巴西帝国了解方面的种种变化。

巴西的两位学者——一位政治学家和另一位社会学家——做出了19世纪巴西政治生活详情的突出研究：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运用传记辞典和其他一些出版的原始资料在他所著的《等级结构》(里约热内卢，1980）一书中创造了一幅综合政治精英的结构图——《巴西帝国的精英与国家结构》（斯坦福，1974）是他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英译本；费尔南多·乌里科埃谢阿在他所著《巴西官僚政府的世袭基础》(伯克利，1980）一书中利用一些原始资料手抄本探讨了国民警卫队生活所表现的价值关与社会关系。若泽·卡米洛·德·奥利维拉·托雷斯著《御用民主》（里约热内卢，1957）叙述了帝国时期的政治体制，尽管不太深入但仍有用。阿丰索·德斯克拉尼奥勒·陶奈对议会两院议员的两篇研究著述：《论帝国的参议院》(圣保罗，1942)和《论帝国的众议院》载《圣保罗博物馆年鉴》14(1950)第1—252页，反映了他的保守和赞成君主政治的观点。若泽·奥诺里奥·罗德里格斯著《国务委员会：五分之一的权力?》（巴西利亚，联邦参议院，1978）一书对国务委员会——兼有立法和司法的部分职能——作了颇有才华的研究。托马斯·弗洛里的《巴西帝国的法官与陪审

团》(得克萨斯，奥斯汀，1981）一书虽然主要研究1850年以前这一时期，但最后一章（第181—200页）却对巴西1871年以前地方法官在社会、政治与思想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作了很好的探讨。潘友索和罗恩·L·塞金杰合著的《巴西帝国的要人》，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14/2(1972)第215—44页，也是带有争论性的。关于各省省长没有多少重大的研究著作，而他们显然是形成帝国政治史的重要层次，关于选举的唯一研究著作是1872年一次出版的弗朗西斯科·贝利萨里奥·苏亚雷斯·德·索萨著《论帝国的选举制度》(第2版，巴西利亚，联邦参议院，1979)。

关于佩德罗皇帝二世的许多传记中，最好的一本仍是：埃托尔·利拉著《1825—1891年佩德罗二世史》(第2版修订本，3卷集，贝洛奥里藏特与圣保罗，1977)。玛丽·W·威廉在她的《高尚的唐·佩德罗》(查珀尔希尔，1937）一书中作了传奇式的记事。关于三人摄政委员会——欧塞比奥、伊塔博拉伊和乌鲁瓜伊——他们被划为我们可称之为中世纪式的极右派，只有最后的一位有一本有价值的传记，即若泽·安东尼奥·苏亚雷斯·德·索萨著《乌鲁瓜伊子爵的一生(1807—1866)(保利诺·若泽·苏亚雷斯·德·索萨)》（圣保罗，1944)。关于中右的较富于创造性的保守派分子——里奥布朗库和科特日皮——比较幸运：可见，例如，若泽·万德莱·皮尼奥著《科特日皮及其时代：初期，1815—1867》（圣保罗，1937），可惜作者没有继续撰写；又如，里奥布朗库男爵二世若泽·马里亚·达·席尔瓦·帕拉尼奥斯著《里奥布朗库子爵》(第2册，里约热内卢，1943)；利迪亚·贝佐谢特著《里奥布朗库子爵若泽·马里亚·帕拉尼奥斯。历史简传》（里约热内卢，1945）一书则阐述得比较令人感兴趣。关于中左的人物纳布科·德·阿劳若，其子若阿金·纳布科所著的传记已如前述。特奥菲洛·奥托尼维护了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改良主义措施；可见保罗·皮涅伊罗·沙加斯著《特奥菲洛·奥托尼，民众的首相》(第2版，修订本，里约热内卢，1956)。

909 在19世纪，伴随议会辩论，有关政治演说的主旨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其中许多都已再版。可见，例如，小雷蒙多·马加良斯著《有关第二个统治时期的三本小册子：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托雷斯·奥门及论“民众的讽刺文”；儒斯蒂尼亚诺·若泽·达·罗沙及“行动、再行动、交往”；安东尼奥·费雷拉’维亚纳及”一次神奇的会议”》（圣保罗，1956）。

关于巴拉圭战争除了军事方面的著作以外其他文献仍然不多。约翰·霍伊特·威廉斯著《1800—1870年巴拉圭共和国的兴衰》（得克萨斯，奥斯汀，1979）一书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材料，而佩勒姆·霍顿·博克斯著《巴拉圭战争的根源》（厄巴纳，1930），则考察了它的直接起因。埃弗拉伊姆·卡多佐著《巴西帝国与拉普拉塔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恰当地介绍了巴拉圭的立场观点。奥古斯托·塔索·弗拉戈佐著《三国同盟与巴拉圭之间的战争史》（5卷集，里奥，1956—60）是这场战争最杰出的军事史。在内尔松·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军事史》（里约热内卢，1965）一书中，对巴西军事本身作了富有争论性的讨论。

关于这一时期巴西经济史的研究须以尼西亚·维莱拉·卢斯撰写的巴西一章作为开始，载斯坦利·J·斯坦合编《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1977）第163—272页。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的概括》（英译本，由理查多·W·德·阿吉亚尔和埃里克·查尔斯·德赖斯代尔合译；伯克利，1963）一书中作出了总的说明。富尔塔多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知识使他的论述富于启迪性而不是模糊不清。在小卡约·普拉多的著作中能够看到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已如前述。J·F·诺曼诺著《巴西，经济模式研究》（N·C·查佩尔希尔，1935）虽然比较旧，但还有用。纳撒尼尔·H·莱夫著《巴西的不发达与发展》（2卷集，伦敦，1982），虽有些倾向性，但拥有充分的有用资料。

具体研究部门没有足够的详细研究。虽然潘友素在《19世纪

巴西的现代化与蓄奴派》载《跨历史杂志》季刊9/4(1979) 第667—88页,一文中主张另一种观点,但关于蔗糖经济著名的论述却是彼得·L·艾森伯格著《伯南布哥的蔗糖业:没有变革的现代化,1840—1910年》(伯克利,1974)。关于咖啡业,最优秀的著作是阿丰索·德斯克拉尼奥勒·陶奈著的15卷集《咖啡史》(里约热内卢,国家咖啡部,1939—43),其中包括了许多文件的转抄本。据说,作者是按字数计稿酬的,于是他尽其可能地写了那么多;幸运地是,他还撰写了一本名叫《巴西咖啡简史(1727—1937)》(里约热内卢,国家咖啡部,1945)的摘要。奥迪隆·诺格拉·德·马托斯著《咖啡与铁路:圣保罗的铁路发展与咖啡种植的发展》(第2版,圣保罗,1974)一书更为生动而又简扼。关于咖啡业,还可见下面所引的理查德·格拉厄姆、斯坦利·J·斯坦、沃伦·迪安和埃米利娅·维奥蒂·达·科斯塔等的著作。约夫瑟·斯韦加特著《巴西出口农业的金融与市场:1850—1888年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经纪人》(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0)研究了咖啡贸易。同关于咖啡业和蔗糖的许多论述相比,其他农作物生产或养牛业经济的论述则相对地比较少。然而,巴西的第一位统计学家塞巴斯蒂昂·费雷拉·苏亚雷斯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巴西帝国时期关于农业生产与食品缺乏的统计注释》(第2版,里约热内卢,1977)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仍然是有用的。还可见,若泽·伊尔德布兰多·德坎阿尔和塞吉厄斯·贡萨加合编《南里奥格兰德:经济与政治》(阿雷格里港,1979)中有关南里奥格兰德经济的一章,以及巴巴拉·温斯坦著《亚马孙橡胶业的繁荣,1850—1920年》(斯坦福,1983)的第一部分。还可见,艾利塞·卡纳布拉瓦关于圣保罗省时期短暂的棉花生产的论述:《圣保罗省棉花种植的发展》(圣保罗,1951)。 910

有若干关于巴西19世纪的运输业著作。其中几乎是民间传说,但也有一些关于骡子运输队的资料,如若泽·阿利皮奥·古拉特著《巴西牲畜运输队的形成》(里约热内卢,1961)。若泽·B·素

萨关于牛车的书《巴西牛车的路线》(圣保罗，1958)更为详细，甚至渊博。理查德·格拉尼姆著《1850—1914年英国与巴西现代化的开始》(英国剑桥，1968)谈到了巴西早期铁路史。其后的著作包括奥迪隆。诺盖拉·马托斯在内的著作如前所述，还有小罗伯特·H·马图思著《巴西圣保罗的铁路、咖啡，和大企业的发展》，载HAHR 57/2(1977)第273—55页。

理查德·格拉尼姆著《英国与现代化的开始》也研究了外国控制的进口企业。安娜·塞莉娅·卡斯特罗著《1860—1913年巴西的外国企业》(里约热内卢，1979)为外国投资情况提供了简要的概括。要了解更大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情况，请查阅D·C·M·普拉特著《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1806—1914年》(纽约，1972)，以及欧文·斯通的两篇文章：《1865—1913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长期投资》，载《商业史评论》42/3(1968)第311—39页和《英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地理分布(1825—1913)》，载《当代历史》2/3(1971)第495—518页。这些著作使人想到J·弗雷德·里比著《1822—1949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明尼阿波利斯，1959)一书有必要进行修订。

911

关于巴西的现代制造业第一阶段与毛阿本身有紧密的联系。不幸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关于他的生活的满意著作。阿尼达·马钱特的《毛阿子爵与巴西帝国》(伯克利，1965)并没有探求说明企业家的成功或失败，而把毛阿本人所作所为的问题归因于与其他人不和。她同阿尔贝托·德·法里亚所著《毛阿：伊雷内奥·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毛阿男爵与子爵》(圣保罗，1946，第3版再版)一样，忽视了有助于增进学识的所有脚注。斯坦利·J·斯坦的《巴西的棉纺制造业：一个欠发达地区的纺织企业，1850—1950年》(马萨诸塞，剑桥，1957)是研究纺织厂的最好著作，确实是一本富有争论性的论文集。

不论在城市或乡村中奴隶制都是巴西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而成为大多数研究的主题。罗伯特·康拉德著《巴西的奴隶制》

（马萨诸塞，波斯顿，1977）是一本有用的书目提要。莱斯利·贝瑟尔撰写了关于奴隶贸易的结束重要著作：《巴西的奴隶贸易的废除》（剑桥，1970）。关于奴隶制本身的废除，见罗伯特·康拉德著《1850—1888年巴西奴隶制的覆灭》伯克利，1972）；罗伯特·布伦特·托普林著《巴西奴隶制的废除》（纽约，1972）；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著《黑人之村落与殖民地》（圣保罗，1966），首先是一本关于奴隶制和在圣保罗废除奴隶制的重要著作。所有关于巴西奴隶制的著作反应了一种倾向，或另一种倾向。即吉尔伯托·弗雷雷关于种植园制度观点，例如在他的《大楼与棚屋》（英译本，哈里特·德·奥尼斯译；纽约，1963）所表明的观点。与弗雷雷所赞赏的主人与奴隶之间家长式统治关系的观点恰成鲜明对比的，有斯坦利·J·斯坦的杰作《瓦索拉斯。1850—1900年巴西的咖啡之乡》（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7）。以此后不久改种咖啡的地区为重点的类似著作有沃伦·迪安著《里奥克拉鲁。1820—1920年巴西的种植园制度》（斯坦福，1976）。还可见小阿米尔卡·马丁斯和罗伯特·B·马丁斯合著《在非出口经济中的奴隶制：重访19世纪的米纳斯吉拉斯》，载HAHR 63/3（1983）第537—68页，及第569—90页的注释。从其他角度研究这个主题的著作，见理查德·格雷厄姆著《巴西奴隶制再探讨：评论文章》，载《社会史杂志》3/4（1970）第431—53页。马丽亚·西奥维亚·德卡瓦略·弗朗哥在她的《奴隶制度中的自由民》（圣保罗，1974，第2版再版）中指出了自由民对奴隶社会的重要意义。罗伯特·W·斯伦尼斯著《1850—1888年巴西奴隶制时期的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斯坦福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5）是一篇突出的细致的定量分析文章。 912

人口、城市生活和土地占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丽亚·路易莎·马西利奥在其《1872年人口普查以后的巴西人口发展》，载《历史分析》6（1974）第115—37页中，指出了关于巴西19世纪的人口不同的估计数。理查德·莫尔斯在《19世纪拉丁美

洲的城市和社会：巴西例证》一文中提出一些关于村庄、农村地产和城市的关系方面积极的建议，该文载理查德·谢德尔，豪尔赫·阿多伊和诺拉·斯科特·金策合编《从开始直到现在的美洲城市化》(海牙，1978)。还可参阅埃米利亚·维奥蒂·达·科斯塔著《19世纪巴西的城市化》，载《从君主制到共和国：决定的时刻》(圣保罗，1971)。欧拉利亚·克里亚·拉梅耶·洛沃著《里约热内卢史（有关商业资本和工业以及金融资本）》(2卷集，里约热内卢，1978)中有里约热内卢城的丰富统计资料。桑德拉·劳德戴尔·格雷厄姆在《保护和服从：家庭女仆的家长式统治的世界(里约热内卢，1860—1910年)》(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1982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文中对家仆的城市背景和文化价值观作了探讨。卡蒂娅·M·德·凯罗斯·克托佐在《巴伊亚：19世纪萨尔瓦多的一个城市及其市场》(圣保罗，1978)中论述了萨尔瓦多(巴伊亚)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琼·E·哈纳著《1850—1937年巴西妇女及其社会和政治斗争》以城市妇女作为主题，该著作由马丽亚·特里萨·P·德·阿尔梅达和埃托尔·费雷拉·达·科斯塔合译(圣保罗，1981)。关于1850年土地法，见书目评论第16节所引沃伦·迪安、若泽·穆里洛·德·卡瓦略和埃米利亚·维奥蒂·达·科斯塔等人的文章。

安东尼奥·坎迪多·德·梅洛—索萨著《巴西文学的形成》(圣保罗，1959，2卷集)一书中的有关部分恰当地概括了这段时期的文学史。他谨慎地谈到了较大的团体与文学的思潮之间的联系。若泽·吉列尔梅·梅基奥尔的《从安谢塔到欧克利德斯：巴西文学简史，第一部分》(里约热内卢，1977)比较侧重于文学风格方面的评论。阿弗雷多·博西的《巴西文学简史》(圣保罗，1970)是一本概略的参考书。阿弗拉尼奥·科蒂尼奥编《巴西文学》第1卷，第2章：《浪漫主义》(里约热内卢，1968，第2版再版)则更详尽。若泽·德·阿伦卡尔，巴西最著名的中世纪小说家——也是政治家——是好几本传记的主题；例如，小赖蒙多·

913

马加良斯撰写的《若泽·德·阿伦卡尔及其时代》(里约热内卢，1977，第2版再版)。

哲学和音乐为洞察19世纪思潮提供了另一个主题。若昂·克鲁斯·科斯塔著《巴西思想史》(英文版由叙泽特·克塞多译；伯克利，1964)，类似于安东尼奥·坎迪多的著作，叙述了社会和经济变革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纳尔逊·萨尔达尼亚在其著作《巴西的政治思想》(里约热内卢，1979)中探讨了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最后，杰勒德·贝阿格著《拉丁美洲音乐介绍》(新泽西，贝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9)一书，对曾以其《瓜拉尼人》震动了1870年的歌剧界而闻名的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戈麦作了重要评述。

18．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和艺术

对于19世纪拉丁美洲艺术作品的研究工作现仍处于一种很不完整的凌乱状况。以文学情况为例，这方面虽有大量书目，但极为分散，许多最基本的任务尚待完成。除巴西、阿根廷、和秘鲁以外，拉丁美洲各国的本国文学史都不完整，而各国和整大陆之间也没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相互联系。与此矛盾的是，过去二十年期间人们对现代拉丁美洲及其文化的兴趣有了特别大的发展，各个领域的拉美艺术家们都受到国际瞩目，贬抑或抹煞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打算专门从事殖民地或19世纪文学与文学的研究。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必须主要依靠25年前曾经使用过的许多相同的原文和评论的材料，尽管，首先还要在书目方面增加一些极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文化史的综合著作，有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化史》(墨西哥，1947；英译本《西班牙语美洲文化简史》由G·蔡斯翻译并附有由译者补充的一章，纽约，1947)，虽然它只不过是一部加以注释的目录，但是也许仍是极有 914

用的资料。G·阿西涅加斯著《七种肤色的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英译本《拉丁美洲：文化史》纽约，1966)，内容更丰富，虽不太均衡，但也仍有价值。M·皮康·萨拉斯著《从征服到独立》(墨西哥，1958；英译本《从征服到独立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化史》，(伯克利，1960)，本书写成后直至今日仍是一部令人鼓舞的著作。巴西专论，有F·德·阿泽韦多著《巴西文化》(里约热内卢；英译本，纽约，1950)是必不可缺少的资料。还可参阅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文化综述》(里约热内卢，1970)。

相对而言，拉丁美洲艺术史的著作更少，而且，19世纪通常被视为是从殖民地的兴旺时期到现代的冒险时代的一个成果甚少的过渡时期，因此就特别被忽视了。对前哥伦布和殖民地背景的了解则是主要方面。特别见D·安古洛·伊尼格斯著《西班牙语美洲艺术史》(3卷集，巴塞罗那，1950)，P·凯莱曼著《拉丁美洲的巴罗克和罗可可式的艺术风格》(纽约，1951)，尤其是G·库布勒和M·索里亚合著《1500—1800年西班牙、葡萄牙及其美洲领地的艺术和建筑》(巴尔的摩，1959)。如果要开展更充分的探讨，可参见CHLA 第2卷书目评论第17节、L·卡斯特多著《从前哥伦布代时到现在拉丁美洲艺术和建筑史》(纽约，1969)是一本最容易获得的历史大纲。R·塞格雷编《拉丁美洲的建筑》(墨西哥和巴黎，21世纪出版社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5)是一本试图对历史进行综述的有用的著作。

关于该地区的这一时期绘画和雕刻的权威性著作极少。但可参阅前引卡斯特多和安古洛·伊尼格斯的著作。D·巴扬编《拉丁美洲的艺术》(墨西哥和巴黎，1974)一书作出了整体性历史的概括。关于国家的发展，可参阅M·罗梅罗·德·特雷罗斯著《19世纪墨西哥的风景画家》(墨西哥，1943)、R·蒂博尔著《墨西哥艺术通史》(墨西哥，1964)和B·史密斯著《墨西哥：艺术史》(伦敦，1979)；M·伊韦里克和G·加拉斯合著《从殖民地到1981年的智利绘画》(瓦尔帕莱索，1981)；R·布鲁格蒂著《阿根廷艺术

史》(墨西哥，1965)、A·克蒂恩索著《阿根廷艺术先驱——卡洛斯·莫雷尔》(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和A·多诺夫里奥著《普里利迪亚诺·普埃伦东时代及其艺术》(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J·M·小多斯·雷伊斯著《巴西绘画史》(圣保罗，1944)。

关于音乐方面，英文版的三本最著名的著作是N·斯洛尼姆斯基著《拉丁美洲的音乐》(纽约，1945)、G·蔡斯著《拉丁美洲音乐指南》(纽约，1955)和G·贝阿格极有价值的现代史《拉丁美洲音乐概论》(新泽西，1979)。最有用的也许是《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20卷集，伦敦，麦克米伦，1980)，贝阿格又一次为这一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既有拉丁美洲全大陆又有分国的部分，包括当地的民间音乐和艺术音乐，以及作曲家许多单独的条目。O·克耶尔-塞拉的《拉丁美洲的音乐和音乐家》(墨西哥，1947)仍是基本资料。

915

关于分国的，可参见O·克耶尔-塞拉著《墨西哥音乐概况》(墨西哥，1941)、R·M·斯蒂芬森著《墨西哥音乐》)纽约，1952)和G·萨尔迪瓦著《墨西哥音乐史》(墨西哥，1954)；A·卡彭铁尔著《古巴音乐》(墨西哥，1946)；J·I·佩尔多莫·埃斯科瓦尔著《哥伦比亚音乐史》(波哥大，1938)；E·佩雷拉·萨拉斯著《智利音乐史》(圣地亚哥，1957)以及S·克拉罗和J·乌鲁蒂亚·布隆代尔合著《智利音乐史》(圣地亚哥，1973)；M·G·阿塞维多著《阿根廷建国时期的音乐》(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V·赫苏阿尔多著《阿根廷音乐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和R·阿里萨加著《阿根廷音乐百科全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L·G·科雷亚·德·阿塞韦多编《1820—1950年巴西书目提要(里约热内卢，1953)、R·阿尔梅达著《巴西音乐史》(里约热内卢，1942)。

虽然有大量关于拉丁美洲文学的书目，但有关这段期间可以找到的和有用的著作却少得出奇。S·布赖恩特编《拉丁美洲文学书目提要选编》(得克萨斯，1976)是一本基础书目资料，它有

662个条目。W·雷拉编《从19世纪到1970年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书目提要指南》(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本很有条理的总概括，J·贝科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研究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也是一本有用的简易目录。F·弗洛雷斯编《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书目提要，1609—1914年》(纽约，1975)，也许对各个作家的评论提供了最有用的实际指导。

鉴于对19世纪的著作中重大原著的确定版本缺乏了解，在现有情况下要去编一本指南，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本书目评论首先专门介绍二次文献资料。然而，这里要提出的一件事是，阿亚库乔图书馆自1976年以来，在已故安赫尔·拉马主持下，在加拉加斯公布了它已再版了许多历史著作，这些著作在不少情况下已有好几十年见不到了。近来再版的选集有J·C·基亚拉蒙特编《启蒙运动的思想》(1979)；J·L·和L·A·罗梅罗合编《1790—1825年，解放的政治思想》(2卷集，1977)；E卡利拉编《独立运动的诗歌》(1979)；E·努涅斯编《西班牙语美洲人的传说》(1979)；以及A·拉克编《高乔人的诗歌》(1977)。

916

这段时期没有多少英译本，而那些现有的译本与其说是专家的成果倒不如说往往是翻译爱好者的译作。总的看来那些书还是有用的。见W·K·琼斯编《英译本中的拉丁美洲作家：分类书目提要》(华盛顿特区，1944)、B·A肖编《英译本中的拉丁美洲文学：诠释的书目提要》(纽约，1976)；以及以下的选集：W·K·琼斯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选译：1888年以前的散文、诗歌和戏剧选》(纽约，1966)，J·恩格尔柯克等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选》(2卷集，第2版，纽约，1968)和F·弗洛雷斯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6卷集，纽约，1966年开始出版)。有关这段期间，译著的范本有阿尔梅达的《一个民兵中士的回忆》(L·J·巴雷特译，华盛顿特区，1959)，萨米恩托的《在暴君时代的阿根廷共和国的生活》(H·曼夫人译，纽约，1868)，阿伦卡尔的《伊拉塞玛，甜蜜的嘴唇》(I·伯顿译，伦敦，1896)，帕尔克的《披肩骑士》

（H·德·奥尼斯译，纽约，1945），陶奈的《无辜的人》（H·张伯伦译，纽约，1945），阿尔塔米拉诺的《匪徒埃尔·萨科》（M·奥尔特译，伦敦，1957），以及比利亚韦德的《塞亚莉亚·巴尔德斯》（S·G·杰斯特译，纽约，1962）。

关于截至1940年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杰出的综述仍然是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流派》（墨西哥，1949），其中包括巴西，并且首先是英文出版的（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5）。还有秘鲁老练的评论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积毕生经验而创作的有价值的《美洲文学比较史》（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关于1820年以前时期的两本有用的著作是M·埃尔南德斯·桑切斯-巴尔瓦著《1492—1820年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与文学》（马德里，1978），和L·伊尼戈·马德里加尔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第1卷《殖民地时期》（马德里，1982），第2卷是论述19世纪的，尚未出版，但肯定会是一本基础材料。

有一些著名通史。J·弗朗科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概论》（剑桥，1969）和《自独立以来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伦敦，1973），都是英文写的有用的提纲性概论，类似的英文著作还有D·P·加拉格尔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载P·E·拉塞尔编《西班牙西班牙语研究手册》（伦敦，1976）第429—71页。西班牙文写的最好的总况著述有R·拉索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第1卷：《殖民地时期》（墨西哥，1965）和第2卷：《19世纪，1780—1914年》（1967）；E·安德森·因贝特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2卷集，墨西哥，1954，并有英文版）；及A·苏姆·费尔德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评论索引》（2卷集，墨西哥，1959）。K·施瓦茨著《新编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史》（2卷集，迈阿密，1972），是众多著作中特别有助于了解独立和独立后时期，尤其是小说方面的情况的著作。关于戏剧方面，参见F·道斯特著《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语美洲戏剧史》（墨西哥，1966）。

论述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时期文学的杰出权威著作有E·卡里

利亚的《西班牙语美洲的巴罗克文学》(纽约，1972)、《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时期的文学：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简明、但被人大量引用的《西班牙语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马德里，1958)，以及其内容包括对19世纪早期一些作家重要研究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研究》波哥大，1977)。关于浪漫主义，参见M·苏亚雷斯-穆尼亚斯著《西班牙语美洲浪漫主义小说》(纽约，1963)，本书对了解二、三流小说家特别有用；M·亚涅斯编《西班牙语美洲浪漫主义小说》(哈瓦那，1978)，本书是对重要原著的著名研究论文的汇编；R·拉索著《浪漫主义：西班牙抒情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墨西哥，1971)，及C·梅伦德斯著《1832—1889年西班牙语美洲的印第安主义小说》(波多黎各，圣胡安，1961)。J·布拉什伍德的《高雅的野蛮状态：试析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内布拉斯加，林肯，1981)，对八篇名著作了分析。论述社会背景的著作有E·L·廷克著《美洲的骑手及受其启发的文学》(得克萨斯，1967)；P·韦尔代瓦耶著《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的“考迪略”、“卡西克”和独裁者》(巴黎，1978)，本书附有伊里萨里、马莫尔等人的文章；F·福克斯-洛克哈特著《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的女小说家》(新泽西，梅塔钦，1979)；G·布拉拉泽斯顿著《乌维拉哈拉、亚瓦塔、库曼达：美洲印第安文学中的美德》，载《比较文学研究》杂志(1972)第9期第243—52页；以及A·洛萨达的创新之作《拉丁美洲社会中的文学。1837—1880年秘鲁与拉普拉塔河》(法兰克福，1983)。

关于墨西哥，见J·希门尼斯·鲁埃达著《19世纪的墨西哥文学》(墨西哥，1944)，以及首先是J·L·马丁内斯的一些著作，如《民族的表现。19世纪墨西哥文学》(墨西哥，1955)、《墨西哥文学的解放》载(墨西哥，1954)以及《在寻求表现中的墨西哥》，(墨西哥通史》第3卷(墨西哥学院，1976)。重要的还有R·E·沃拉著《19世纪墨西哥小说史》(墨西哥，1953)、J·L·里德著《1826—1910年墨西哥历史小说》(纽约，1936)、J·S·

918

布拉什伍德著《墨西哥的浪漫主义小说》(密西西比，哥伦比亚，1954)、S·奥尔蒂斯·比达莱斯著《墨西哥文学中的盗匪》(墨西哥，1949)以及L·雷耶斯·德·拉·马萨著《1810—1910年墨西哥戏剧的一百年》(墨西哥，1972)。关于古巴，J·J·莫雷斯著《古巴文学的历史进程》(马德里，1958)和M·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古巴文学史》(2卷集，纽约，1963)；以及，关于危地马拉的有，D·贝拉著《危地马拉文学》(2卷集，危地马拉，1944—5)和O·奥利韦拉著《19世纪危地马拉期刊中的文学》(新奥尔良，1974)。关于委内瑞拉，见M·皮康·萨拉斯著《委内瑞拉文学的形成与进程》(加拉加斯,1940)和R·迪亚斯·桑切斯著《委内瑞拉文化的历史面貌》(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关于哥伦比亚，见D·麦格雷迪著《1844—1959年哥伦比亚小说史》(波哥大，1962)。关于秘鲁，见M·J·沃森·埃斯皮内尔著19世纪秘鲁的风俗小品》(利马，1980)和L·A·桑切斯著《秘鲁文学概论(利马，1972)。

关于智利，见R·席尔瓦·卡斯特罗著《智利文学概览》(圣地亚哥，1962)、A·托雷斯-里奥塞科著《智利文学简史》(墨西哥，1956)、F·阿莱格里亚著《智利的诗歌：它的起源与16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墨西哥，1954)、N·皮尼利亚编《1842年关于浪漫主义的论战》(圣地亚哥，1945)；最近出版的一本有价值的著作是B·苏韦卡索著《19世纪文化与开明社会·拉斯塔里亚：思想与文学》(圣地亚哥，1981)。

关于阿根廷的书志数量很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与一般的情况有所不同，对19世纪的研究却比对20世纪的更好。对这段期间特别有用的著作有，R·罗哈斯著《阿根廷文学史：关于拉普拉塔文化发展的哲学论文》(9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J·C·贾诺著《阿根廷文学的延续性》(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这部是杰出的经典之作以及E·卡里利亚著《阿根廷文学研究：19世纪》(图库曼，1965)。专业较强的著作有A，普里埃托

等著《阿根廷文学中的罗萨斯主义影响》(罗萨里奥,1959)、H·E·弗里齐·德·隆戈尼著《1800—1852年文学团体与新闻界》(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R·H·卡斯塔尼诺著《1830—1852年罗萨斯时代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戏剧史文献》(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J·克鲁斯著《阿根廷浪漫主义戏剧》(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并附有马莫尔和米特雷著作的原文,F.查韦斯著《罗萨斯时代的文化:阿根廷的非殖民化思想贡献》(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R·科塔萨尔编《阿根廷文学中的印第安人和高乔人》。关于乌拉圭,见L·阿耶斯塔兰著《1812—1838年乌拉圭高乔人的原始诗歌》(蒙得维亚的,1950)和W·雷拉著《1808—1968年乌拉圭戏剧史》(蒙得维的亚,1969)。关于巴拉圭,见J·普拉著《1870年以来的巴拉圭戏剧》(亚松森,1967)。

关于巴西,阿弗拉尼奥·科蒂尼奥著《巴西文学概论》(里约热内卢,1955;英译本,纽约,1969)也许是最令人满意的代表作。英文版的还有,E·维里西莫·查蒂的《巴西文学大纲》(纽约,1945)和S·普特兰的名著《奇妙的旅行:对四百年来巴西作品的综合评论》(纽约,1948)。C·休利特编《巴西文学》(3卷集,华盛顿特区,1974),是一部既有葡文原著又有英文评注的很有价值的评论选集。其他基本著作有,席尔维奥·罗梅罗开拓性的经典之作《巴西文学史》(2卷集,里约热内卢,1888)、A·坎迪多著《轻骑兵团》(圣保罗,1945)和《1750—1880年巴西文学的形成》(2卷集,圣保罗,1959)、N·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文学史及其经济基础》(里约热内卢,1940;修订版,圣保罗,1982)。和A·博西著《巴西文学简史》(圣保罗,1972)。关于浪漫主义,特别见F·库尼亚著《论巴西的浪漫主义》(里约热内卢,1971)、D·萨莱斯著《从理想到幻想》(里约热内卢,1980),和J·G·梅尔基奥尔著《论浪漫主义的空想》(彼得罗波利斯,1981)。关于社会方面的主题有,D·德赖弗著《巴西文学中的印第安人》(纽约,1942)和M·加西亚·门德斯著《1838—1888年巴

西戏剧中的黑人角色》(圣保罗,1982)。最近出版的著作有,戴维·T·哈伯利著《三个悲惨的种族。巴西文学中的种族同一性与民族意识》(剑桥,1983)一书中有论述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若泽·德·阿伦卡尔和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等人的章节。

索　　引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各边码）